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民国春秋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风

## 第一章 “洪秀全第二”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秦、西汉起至元、明、清止，经过 2000 年历史长河，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自孔子学说形成之后，逐渐有了牢固的社会基础，任何企图冲破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都难以发展。人们对封建社会制度的弊病最终归结于帝王身上。因此，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朝廷的变更，而无社会革命。然而，社会的发展必定有它自己的规律，任何阻挡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愿，终归要不破自灭的。随着西方英、法、德进入资产阶级革命长达二三百之久，中国终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文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不屈不挠，从 1895 年起，在十几年内他先后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结果是十起十落。

1866 年 11 月 12 日，孙文生于广东南部香山县（1925 年改为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 年改号逸仙。1897 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用化名中山樵，由此而得名孙中山，后又化名高野长雄。

他在欧美及南洋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吴仲、高达生、杜嘉诺等，也曾用载之、公武。辛亥革命之后，人们都习惯地用孙中山称呼他。

孙中山同胞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孙眉和姐姐孙妙茜，下有妹妹孙秋绮。

孙中山童年和少年因生活困难而没鞋穿，常赤脚走路。家中以蕃薯为主要食粮，很难吃到米饭，过着半饥半寒的穷苦生活。孙眉于 1871 年被迫离乡背井，跟亲戚漂洋过海到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即檀香山）谋生。他先在菜园里当工人、在农牧场当雇工，旋往茂宜岛（夏威夷五大岛之一）艰苦地开垦荒地，开办牧场，经营商店，还兼营酿酒、伐木等业。到 1885 年前后，他有了 6000 英亩的大牧场，雇佣工人 1000 多人，畜养牛、马、猪数万头，成了茂宜岛的首富之一，被称为“茂宜王”。孙眉的经济富裕起来，他寄给家里的侨汇成为孙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孙家也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家庭。

孙中山 6 岁便随姐姐上山砍柴草，到塘边捞塘瓢，年龄稍长便下田插秧、除草、排水、打禾、放牛，到 10 岁时才进本村私塾读书。两年后，孙中山随母亲去檀香山投靠哥哥生活。他起初在哥哥的茂宜岛茄荷蕾埠商店里当店员，并很快学会了记帐和珠算。孙眉发现他聪明好学，便送他进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办的意奥兰尼中学上学。他在那里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也学了一些圣经科目。3 年后毕业，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学习，他在那里开始学习英文，很快取得优异的成绩。

1883 年 7 月，孙中山归国回乡。他帮助家庭务农，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等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陆皓东是他在本村上私塾的同窗好友。孙中山称陆皓东为“道友”，陆皓东称赞孙中山是“再世的拿破仑”。

这“再世的拿破仑”确也有见地。他见到故乡凋敝不堪，乡亲们衣衫褴褛，唯独北极殿神庙中的香火旺盛，泥塑神像装饰一新，拜神的人们往来不断，心里十分生气。就宣称泥塑木雕毫无知觉，劝人们勿妄信神。他的宣

传不起作用时，他就决心毁掉神像，认为迷信是愚昧的表现，中国民族要进步，非毁神像不可。于是他便同陆皓东在中秋节赏月时分来到北极殿，见人们在供桌上摆满了月饼、水果之类，香炉里烟雾腾腾，烛台上烛光闪闪，有十几个人在那里跪着叩头求神佑保护，一片乌烟瘴气。

孙中山先是劝告人们不要信神，接着便跳上正殿，握着“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手，用力一拉，神像的手和身体顷刻分离，泥塑中的稻草和木头裸露出来。

孙中山和陆皓东又走到左廊的金花殿，将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的脸涂成大花脸，还把一只耳朵扯下。然后他们两人哈哈大笑，尽兴而去。

敬神的人们心惊肉跳，向神像叩头作揖，口中嚷着：“罪过，罪过！”“作孽，作孽！”孙中山和陆皓东的作为遭到乡人的责难，他们被迫出走香港。

孙中山在香港进拔萃书室（即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中等学校）读书。1833年底，他和陆皓东一起由美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主持，在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受洗，加入基督教。第二年4月，孙中山转入中央书院（香港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继续求学。由于他爱读诸子百家的著作，涉猎群书，知识较广，同窗们送他“通天晓”绰号。

孙中山在翠亨村毁神像、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的事，引起孙眉的不满，他写信责备他，并要他辍学去檀香山。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后，受到哥哥的严厉斥责，被强迫到茄荷蕾埠商店当店员。孙中山勉强干了几个月，便设法离开檀香山经日本归国，回翠亨村。

孙眉想以“成亲”的办法来羁绊孙中山，便写信嘱咐家中父母速为孙中山办理婚事。

年不足19岁的孙中山与香山县商人之女卢慕贞结婚。婚后生孙科、孙金琰、孙金琬一男二女。

孙中山于1884年8月赴香港，回中央书院复学，1886年夏毕业。经喜嘉理介绍，进入美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孙中山在班里是高材生，他给同学的印象是：“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人士，他有余钱，便不论教师、学生、工人、商贩，都纳为朋友，在外聚餐，茶饭完毕，谈论国状危险，国人应群起自救。他两袋空空，便不出校门，或伏案读书，或与同学谈论时事。

有一位同学郑士良认为孙中山是位奇人，同他结交。郑士良，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淡水墟人，少有大志，常从乡中父老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他十分钦佩孙中山，每当孙中山发表言论，他都细心倾听，听到会心处，不禁哈哈大笑。一天，孙中山问他：“你为什么不读书，不看报，整天游游荡荡？”郑士良爽朗地答道：“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从此，这对同窗成为莫逆之交。

1887年，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他在香港不出一二年，得革命同志3人。这3人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4人皆志同道合，暇则放言高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4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四座为惊，毫无忌惮。起卧出入，均相与偕，情胜同胞，因相结为一小团体，人称“四大寇”。

陈少白，广东新会县人，身高玉立，丰姿俊美，才思敏捷，诗文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有“风流才子”之称。

陈少白经人介绍从广州来香港会见孙中山。孙中山见陈少白风度翩翩，心中非常高兴，同他谈了十分钟便说：“我们去逛逛公园吧！”他们在植物园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谈论时局，觉得投机，便有恋恋不舍之意。

陈少白因家境日衰，想在香港半工半读。孙中山劝陈少白在香港学医。陈少白顾虑自己习性不近，不太愿意。孙中山干脆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

一天，陈少白来到孙中山宿舍谈天，正是谈得兴高采烈，孙中山忽然说道：“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听课去，下课了，再回来同你谈天。”过了一会，孙中山匆匆地跑回宿舍，对陈少白说：“康德黎博士请你见面。”陈少白诧异：“我不认识他呀！”“有事情才请你去。”孙中山含笑抓住陈少白衣袖，把他拉到教务长室。

康德黎博士见到陈少白，满脸笑容地说：“我们是很欢迎你的。”陈少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含含糊糊地回答说：“谢谢。”待陈少白明白过来，正要埋怨孙中山不该强作主张，孙中山笑着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谈了。”陈少白分在比孙中山低两级的班里久，他们两人结盟拜为兄弟。陈少白小孙中山3岁，为弟。

尤列，字令香，别字少筠，号小园，广东顺德县北水乡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孙中山与他在广州相识。一天傍晚，孙中山同郑士良上街买荔枝，忘了带钱，吩咐小贩翌日前来学校取款，小贩不肯赊账，双方正在争执，尤列恰巧随同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尤裕堂到博济医院访友经过，尤裕堂代付了钱，然后一同回校。当晚，他们以水果当饭，边吃边谈，非常投机。孙中山同尤列从此经常来往，谈政治，结成好友。尤列在1890年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来香港充任华民政署司书记。

杨鹤龄，字礼遐，是孙中山同村人，比孙中山小2岁，他们自小就玩着长大。杨鹤龄后来入广州算学馆读书，与尤列同窗。他在广州与孙中山重逢相聚，自然更觉亲切。杨鹤龄毕业后也来到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店里，孙中山常常到“杨耀记”与杨鹤龄叙会。

孙中山觉得在西医书院谈论时政不便，就与杨鹤龄商量。杨决定在“杨耀记”内独辟一楼，作为朋友聚集交谈的地方。遇有闲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便在这里聚会。碰上刮风下雨，他们4人干脆躺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筹磋商中国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孙中山说：“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而我们4人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样，那么，我们4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四大寇”的称号由此传播开来。

孙中山于1892年7月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英国籍教务长康德黎发给他西医书院第一名毕业执照，并授予他医学硕士学位。

孙中山前往澳门镜湖医院任医师。几个月后，他自己开设了一间中西药局，单独行医。一些葡籍医生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文凭，禁止他为葡人治病，不许各药房为其处方配药。孙中山便离开澳门，赴广州行医。

孙中山在广州西关开设东西药局和医务分所，同时还在香山石岐镇与人合股开设东西药局的支店。

孙中山行医，对贫者实行赠医赠药，一年仍然有1万多元的收入。他

在金钱面前丝毫没有动摇改造中国的决心，他“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从事“医国事业”的活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孙中山常对人说“官僚生活中的乌烟瘴气，犹如死海上的浓雾一样。满政府既借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孙中山思考改造中国之策：要救国救民，就非要锄去恶劣的清朝政府不同。而要推翻清朝政府，决不是几人所能完成的。孙中山物色同志，把目光投向军队。广东水师广丙军舰年轻的管带程璧光患有胃病，找孙中山医治。孙见他是海军人才，估计以后必有大用，且他又是自己的好友程奎光的哥哥，有这一层关系，便决定结识程璧光“共任国事”。

孙中山对程璧光说：“你的病需要每天早晨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方可治愈。”程璧光果真这么办了，孙中山陪他到郊外散步，借机谈天说地，批评时政，终于同程璧光结成朋友。

孙中山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旧友保持密切联系，又先后结交了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周昭岳等志士。

1893年冬，孙中山考虑成立革命团体，他召集朋友们到广州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秘密聚会，酝酿筹备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兴中会”组织。

他们开始行动。陆皓尔、尤列、周昭岳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场所。

郑士良四处奔走，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

但是，要立即组织武装暴动，推翻清廷，仅仅依靠十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除程璧光、程奎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他人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孙中山反躬自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路不通。他转而把目光射向清朝政府中“识时务”的大臣李鸿章，如果李鸿章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未尝不可挽救贫弱的中国。

李鸿章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手握军政大权的汉族重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及海军30多年。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称他是“中国之俾斯麦”。李鸿章曾通过康德黎向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进京候缺。”1894年1月，孙中山悄悄地回到了翠亨村，关起门来，用10天时间，埋头写了6000字的《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从广州乘轮船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们拜访了郑观应、王韬。郑观应立即给老友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写了一封介绍信：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乘船赶到天津，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

盛宣怀接到介绍信，在信封上手批：“孙医士事。”介绍孙中山等往见李鸿章。

李鸿章传出话来：“等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上书改良成为泡影。

1894年夏秋，孙中山和陆皓东漫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

在天津，他们“窥”到李鸿章的底细：李由于“军功”，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提升为总督、大臣，被尊为傅相，成了清朝政府忠实的看家犬。

李鸿章发财致富靠的是各级文武官员的供礼。这些官员携带敲诈勒索来的钱，蜂拥前来向他进贡以寻找提升的门路。

一位青年海军军官告诉孙中山、陆皓东：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炭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火药订单付款的。

他气愤不过而辞去了职务。

北京城内的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下令动用饷需和边防军费100万两，挪用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各衙门摊派强征290多万两，专供她挥霍。

孙中山和陆皓东这才觉醒，对腐败无力的清廷是无法用改良的办法挽救的。他们决定分头活动，创立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1894年11月底建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吸收会员20多人。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选出刘祥、许直臣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

檀香山兴中会派员到各埠扩展组织，在茄荷蕾埠建立了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分会；孙盾又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主席的兴中分会。檀香山在很短的时间内吸收会员130人之多。

孙中山又到了香港，召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等人，讨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事宜。

1895年2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参加人数达几十人。为避人耳目，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

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赴广州秘密串连，设立了广州兴中会分会，陆续加入者达数百人，设立了起义机关。

孙中山筹集军费，令宋居仁、夏百子等20多人组织兵操队，聘请一位丹麦人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

孙中山打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兵谋举事。

他们奔走于港、粤之间，策划部署，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机关，确定起义计划和起义后的具体政策。孙中山亲自担任军务，拟订攻取方略；陆皓东主持广州起义总机关工作，设计起义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决定在农历9月初9（10月26日）重阳节起义。

孙中山命杨衢云在香港负责筹措经费和购运军械等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活动，购买了600枝新式手枪。

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各县绿林；又派人联络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他们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志士，贮藏文件、武器；在广州河南洲头咀设置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还购置了两

只作为运输工具的小火轮。

起义工作筹备甚周，声势颇众。孙中山提出公举一位会长领导广州起义。大家同意他的意见，便在 10 月 10 日召开兴中会会议，选举会长（也称总统）。结果孙中山当选。

大家同他握手道贺，预祝起义成功。

孙中山当选了总统，决定回广州主持起义。他把银行里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军械统统交给杨衢云负责，他们商定 10 月 25 日晚上由杨衢云率领三合会 3000 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上岸，立即发动起义。

过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义，所以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待我到了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还给你，你看怎样？”孙中山本是一位无私的战士，听到杨衢云这么说，沉思片刻，便很坦率地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但这个总统名义是大家公举的，所以你要当，还是请大家再来商量好了。”孙中山立即找来陈少白、郑士良等，把事情告诉他们。

郑士良听罢勃然大怒，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非杀他不可。”陈少白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我们还能起事吗？按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没有关系的。”孙中山点头称是，采纳了陈少白的意见。

当天晚上，兴中会再召开一次会议，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由于事前已经说妥，表决时大家便通过了。

## 第二章 流血广州

10 月 13 日，孙中山到了广州，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来到广州。

重阳节前夕，广州附近的各路队伍，打着醒目的灯笼，云集广州。省城巡防勇丁和城外兵丁的战斗力的很弱。有战斗力的安勇一部 3000 人，经过兴中会运动，答应起义时反正。珠江中吨位最大的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由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响应起义。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

翌日，天刚黎明，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以“除暴安良”作口号，红带缠臂做标志。身藏利器的 100 多名卫队战士，也在起义总机关周围待命。

等待孙中山下命令，可是，孙中山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

原来，孙中山在自己的住所接到汕头、西江两路会党的报告：“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他还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孙中山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向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说明情况有变化，商量应急办法。

陈少白大吃一惊，连忙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如果硬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待以后再说吧！”这话说得有道理。孙中山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

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危险，他命令战友们立即离开广州，走晚了恐怕出不去了。他自己去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形势果然发生突变。

当天上午，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年迈昏愤的谭钟麟淡淡一笑，说道：“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也没弄清楚，要我留神，岂非捕风捉影？”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谭钟麟报告：“市面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可能是要造反。”谭钟麟半信半疑地问道：“党首是哪一个？”“孙文！”谭钟麟认识这位名医孙文，孙文常出入督府给少爷、小姐看病。他不相信孙文会造反，不由仰面哈哈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但谭钟麟毕竟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决定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令军队加强巡防。

侦探到了河南瑞华坊，并不知道孙中山的住处，便问在街口闲坐的轿夫：“孙医生住在这里吗？”轿夫平日与孙中山友好，见来者不善，便佯装着糊涂：“这里只有伊医生，并没有孙医生。”侦探信以为真，也就走了。

孙中山宛如常日一样，他和区凤墀牧师准时赴王煜初牧师娶媳宴会。城内谣言四起，街上兵弁来回不断。孙中山情知有变，仍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问孙中山：“为什么今天的兵弁这么多？”孙中山微微一笑：“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区凤墀大吃一惊，忙回：“什么缘故？”孙中山反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到吗？”谭钟麟得到飞报，兴中会会员朱淇自首告密，他大吃一惊，连忙调兵遣将，把守各处关口、码头。

朱淇的哥哥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当他知道朱淇名列党籍，作《讨满檄文》，生怕株连自己，便冒用朱淇名义向李家焯自首告密。

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安排机关人员转移，自己最后离开，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经管的同志是否带走，决定返回机关寻找。这样做十分危险，同行的同志极力劝阻他。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落入敌手，我们岂不是被一网打尽？我个人即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全同志，实属份内的事。”说罢，毅然返回机关。

陆皓东进了机关，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门外，兵勇果然接踵而来，将机关包围得水泄不通。待兵勇破门而入，名册已经烧成灰烬。如释重负的陆皓东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容被捕。

谭钟麟令南海县县衙李征庸审讯陆皓东，妄图迫使他供出同党，一网打尽。陆皓东昂首挺立，不跪不拜。他反令李征庸拿纸、笔、墨来。陆皓东奋笔疾书：“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29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

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颀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诟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



据我子女玉帛，试思维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手。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歿，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李征庸狂施酷刑，陆皓东拒绝供出同党。铁钉插入陆皓东的手、足，凿掉了他的牙齿，鲜血淋漓的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横眉冷对审判官，嘲弄地问：“你虽然严刑加之我身，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又奈我如何？”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钟麟发出布告，以悬赏花红银 1000 或数百元缉拿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

孙中山化装成商人，镇定自若地来到水鬼潭埠头，登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辗转水路，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然后抵香港。

陈少白、郑士良早已来到香港，他们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他们听说孙中山已经被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中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惊喜交集，连忙问道：“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孙中山放下行李，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待以后再说，先谈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孙中山想起他的老师康德黎，便去请教。

他向康德黎通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询问他们住在这里是否安全。

康德黎听罢，自己也无主意。他沉思一会，说自己不久要回英国，要孙中山去见友人丹尼斯律师。

丹尼斯详细询问了情况，觉得这是个棘手的事情。他翻阅了法律书籍，查无案例。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劝告孙中山：“像这样的事情，我看最有效的安全措施，还是你们马上远走高飞为妙。”孙中山鞠躬致谢，正要告辞，丹尼斯把他叫住，不厌其烦地叮嘱他：“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果然不出丹尼斯所料，香港政府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

香港既然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决定立即离开香港。

到哪里去呢？一时间，他们又茫无头绪。

从报纸上，看到当天晚上有船开赴安南。正是急不择路的时刻，去安南也未尝不可，就派人去买船票。怎知，这是艘货船，不载客人。再去打听，还有一艘“广岛丸”的日本货船，有 4 个客位，11 月 2 日启航日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决定乘坐这艘货船出走。

孙中山从汇丰银行里取出 300 美元，以备东渡之用。时间仓促，也来不及向康德黎老师告别了。

“广岛丸”一出港口，便遇上大风，海浪像山起谷落。

8 天之后，“广岛丸”在日本神户港靠岸。他们踉踉跄跄地走上岸来，举目四望，一切都异常陌生，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

孙中山等人从神户转到横滨，在那里见到了陈清、谭发等人，又结识了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联络了 20 多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

冯镜如任分会长。

孙中山决定到欧美各国向华侨宣传革命。他先赴美国，尔后去英国。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去探望他以前的老师康德黎，在大街上被邓廷铿等3个中国人纠缠，以认同乡为名，拉着孙中山去“吃午饭”。孙中山被他们挟持到一幢房子里，关闭起来。

绑架孙中山的邓廷铿是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馆三等翻译。公使龚照瑗在清廷授意下，出7000英镑的高价，向格来轮船公司租了一艘2000吨位的轮船，造了一只木箱，准备秘密地把孙中山装进箱内运回国杀害。

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有铁栅的小房间里。他是坐以待毙，还是设法冲破罗网，重获自由，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决计逃走，不肯坐以待毙。重获自由的关键，在于能传消息于外，他多次耐心说服常给他打扫卫生的使馆英仆贺维太太和清洁工柯尔，暗中给康德黎送信。

康德黎知孙中山被囚禁，四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他先后到英国外务部和伦敦警察署、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交涉，都无结果。最后，康德黎只得把孙中山被非法诱捕的消息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囚徒》为题在《地球报》上发表，其他各报纷纷转载，震动了伦敦的舆论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朝公使极大不满，公使馆门前聚集着数百名示威的群众，高呼：“释放孙逸仙！”一些市民号召捣毁清使馆。

英国政府怕引起风潮，派遣代表去清政府使馆交涉，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

清使馆不得不把羁压12天的孙中山释放。孙中山从使馆里走出来的时候，街头人山人海的群众向他挥手致敬。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声名大著。

1897年8月的一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陈少白的寓所，接待了慕名而来的一位日本人宫崎滔天，这位日本人比孙中山小5岁。

他们寒暄之后，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说先生以中国为志，希望详细领教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孙中山低头沉思，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宫崎急剧地思索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担起振兴中国的重任吗？他能够身居4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吗？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奄滔天，出生在自由民权运动活跃地区的一个“自由民权之家”——日本熊本县荒尾村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他少怀大志，早有救世的念头，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目睹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变成欧美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曾经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亚洲的责任。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却成了欧美列强压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伙伴，充当了侵华急先锋。这样，他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事业。他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

孙中山继续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廷执掌政权已经200多年，以愚民政策为要义，以压榨人民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因此，我辈力量虽小，仍然冒险起事，只是不幸遭受失败。”宫崎凝视着孙中山，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

在不是以此重任推给别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孙中山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这在宫崎听来，仿佛是滚滚的激流，稍遇遏制，顷刻又飞流激溅。

孙中山停顿片刻，又说下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我辈的志业。拯救中国4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宫崎觉得孙中山的话言简意赅，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洋溢着无限的热清，恰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暗自称赞：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宫崎从此决定通过协助孙中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悦诚服，矢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翌日，宫崎和友人平山周乘上去东京的列车。

到了东京，他们俩人直奔犬养毅的家门。

犬养毅正在客厅抽烟。一见他们进来，笑着说：“你们回来了。”宫崎喜气洋洋，显得十分得意：“犬养君，我们这次不辱使命。”犬养盘膝而坐，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呀？”“我们见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原来犬养毅是日本民党领袖。松方正义组阁后，犬养毅以在野党领袖名义推荐平山周和可儿，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的活动。行前陆军省参谋部宇都宫太郎少佐告诉他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孙文，他是提倡革命的，你们要多注意这个人。”他们在横滨英文报上看到载有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消息，怀疑孙逸仙就是孙文。到了上海，他们在书店里发现孙中山写的《伦敦蒙难记》，立刻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才知道孙中山的概况。他们赶快将这本书摘要译成日文。到了香港，又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得到一些有关孙文生平的资料。他们很快将这些资料报告了犬养。

现在，犬养又听了宫崎的报告，喜出望外，问道：“他在哪里？”“就在横滨，我和他谈了一整天。你想见见他吗？”“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见面并不困难，只是孙先生的生活还没有着落。”“你们可以找平冈浩太郎（日本著名实业家）商量，一两年生活费用，他是出得起的。”犬养思索：麻烦的倒是外务省的态度。他决定到外务省去找外相大畏重信谈谈。

犬养取得了外相大畏重信的默许，派宫崎和平山专程去横滨，迎接孙中山来东京相会。

有了犬养、宫崎他们的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市麹町区平河町五丁目30番地租了一栋房子居住。孙中山以平山语言学教师的名义，由东京府发给“居留地外侨许可证”，准予留居日本。

孙中山通过宫崎和平山周的介绍，不但认识了民党领袖犬养毅和大畏重信，随后又结识了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

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为了再次策划武装起义，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同日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湖南、湖北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了发动。

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

这年冬季，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后，兴中会便邀约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上，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三合、哥老三会结成一个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收到香港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革命党人与李鸿章联合“改造中国”的献策，征求孙中山的竟见。

原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勾结这个地区的军界、政界头目，倡议“东南互保”。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主张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传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又向陈少白献策：首先由革命党人联名向卜力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求给予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

孙中山既了解李鸿章的为人，又对英国策划李鸿章同革命党人“合作救国”的方案抱有怀疑态度。

正在这时，孙中山接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读了这封信，不由在房里来回踱步。他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刘学询的信又使他不忍放过机会。他想：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不妨一试。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召集在港的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署签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的名字交给卜力。

卜力马上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暗中与李鸿章接洽：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

清廷还未陷于绝境。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仍然迟疑观望，不肯正式表态。

1900年6月9日，孙中山依约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烟狄斯”号，从横滨出发，直赴香港。

孙中山在船上同大家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他说：“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内，我不能在香港停留，因此，我们到香港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和宫崎上岸办事，我即去西贡，然后前往新加坡。我们在那里会集，观察情况，然后决定以后的大计。”宫崎提出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秋季流亡日本，通过宫崎和平山的居间联络，孙中山等满腔热忱地希望联合康、梁共同反清。孙中山、陈少白同康、梁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康、梁坚持保皇立场。谈判没有结果。

对于宫崎的建议，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由于大家赞成，也就同意

了。

17日，船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来接孙中山、杨衢云。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建议改派宫崎、清藤、内田3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广州谈判。

3人上了“安澜”号炮舰，被接到广州刘学询寓所谈判。

宫崎提出了保证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刘学询当即请示了李鸿章。

刘学询传李鸿章的话：“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傅相不便有所表示。至于借款6万元，傅相表示同意，先在香港付予一半，希望孙逸仙先生早日前来，共商大事。”宫崎等人连夜返回香港，孙中山已前往西贡。宫崎他们在香港停留了3天，办完了事，便赴新加坡。

在新加坡，宫崎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在于行刺，不但避而不见，并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他们。

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入狱。

孙中山来到新加坡，获悉宫崎、清藤被捕，立即组织营救。英国殖民当局虽然释放了宫崎、清藤，但却勒令他们和孙中山立即离开新加坡，5年内不得入境。

孙中山一行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海面，便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孙中山的5年驱逐令尚未满期，不准登岸。

孙中山在香港港口船上得到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计划，李决定进京。孙、李“联合救国”成了过眼的云烟。孙中山决定加紧策划起义。

入夜，孙中山在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广东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系会党；孙中山同宫崎、清藤则转回日本折入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

9月18日，孙中山等由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揽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他们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支援他们的活动。

### 第三章 孙、黄同盟

郑士良领受了组织起义的命令，便和陈少白研究联络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的方法。当时，三合会会员散处四方，不易号召。郑士良、陈少白决定派人去请正在南洋婆罗州谋生的黄福回来。黄福身材高大，手指宛如香蕉，农民出身，在三合会首领中最得人望，而且和郑士良友谊深厚。黄福领受郑士良的命令，潜入内地，联络三合会会员。说也奇怪，黄福一到，各处堂号的“草鞋”都集拢过来。他们约定时日，在惠州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会集，听候郑士良、黄福指挥。

三洲田地势险要，交通方便，便于接济，利于进取，是个战略要地，又是会党啸聚的地方。

郑士良和新安县绿林首领黄庭耀来到三洲田，开了一间粮油小店。店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不久，便集中了壮士 600 人，洋枪 300 枝，子弹 9000 多粒。

孙中山原计划从香港海面潜入内地指挥起义，到那时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他传令郑士良固守三洲田待命。

壮士们在三洲田静候了两三个月，粮食渐缺，不得不分散到附近农民家里，只留下 80 人守卫大寨。他们担心风声外泄，凡是邻近村民入山寨砍柴的，全都拘留，不许走出。

结果，适得其反。邻近村民看见凡入山寨的乡亲都是有进无出，联想到粮油小店的异常现象，逐渐产生疑惧，谣传也跟着四起：“三洲田山寨中有人聚众谋反。”把守山寨的 80 人谣传成“数万大军”。

两广总督德寿根据各方密报，命令广东师提督何长清抽调 4000 多人进驻深圳，又令陆路提督邓万林率领惠州防军进驻淡水、镇隆，企图围困三洲田。

形势危急，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示进退。

孙中山复电说：“筹备未竣，令暂解散，以避敌锋。”郑士良、黄福又续电孙中山：“如能将弹药送到广东某一地点，明示其处，便能一鼓作气，突出重围，接此弹药，以击敌军。”清军何长清部的 200 人部队已经进驻沙湾，逼近三洲田，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革命军迫于形势，决定先发制人，发动起义。

10 月 6 日晚上，三洲田大寨月光如水，岭岗顶上的大旗，随风招展，四处闪烁着月光剑影。600 名精壮的三合会会员头包红布，腰缠红带，腰插一面小旗，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显得十分神气。

黄福头包红布，身上挂着大红绣球，威风凛凛地带领战士们，在马兰头祭旗，庄严宣誓。

祭旗完毕，起义军分两路下山：南路由黄福率领敢死队 80 人袭击沙湾，一阵激战，斩清军 40 人，活捉 30 人，缴获洋枪 40 枝，弹药数箱，清军惊溃；东路由林海山率领攻下新墟。

旗开得胜，士气大振。黄福原想一鼓作气，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志士会攻新城，直取广州。

孙中山在台湾得知起义已经发动，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并电令起义军：“若能突出，可直趋厦门。”

到厦门当有接济之法。”孙中山电令起义军进攻厦门，而不是进攻广州的原因是：他在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商借武器、人员和军费时，儿玉源太郎表示：“倘若你真的一封电报便可唤起革命军的话，那你就让他们在离厦门最近之处发起战争，并向厦门进军，等他们接近厦门时我们便将你送去，并且给你们武器和弹药。”后藤告诉孙中山：“目前借款不好办，重新偿还也太麻烦，日本台湾银行厦门分行金库存有几百万元，革命军进驻厦门以后，可以从那里强取出来，待革命成功以后，只需要做个‘道义上’的偿还，日本政府也不会过于追究。”其实，这是日本设下的一个陷阱，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孙中山果真占领了厦门，而且果真攻取这个金库，那末，日本出兵占领厦门就有了借口。

孙中山不知道这个阴谋，他别无选择，就电令郑士良东进厦门。

郑士良从香港进入内地，他接替了黄福的指挥职务，率领起义军改道，

往厦门方向挺进。

义军避开何长清部主力，向镇隆前进，行军四五里，探知清将邓万林的哨官严宝泰带领 100 多人前往镇隆，便立即赶到清军必经之地佛子坳埋伏。天渐黄昏，清军果然来到坳顶，郑士良一声令下，义军猛烈开火，打得清兵东逃西窜，击毙清兵数十人，捕杀严宝泰，活捉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占领了镇隆。

义军继续向水湖进发，一路秋毫无犯，所向披靡，各处乡民沿路燃爆竹迎送，具酒食慰问，各地来投义军的多达数千人。

义军到达上杨围，与归国华侨杨发领导的 600 多名义军会合。

义军从上杨围出发经白芒花，攻克崩冈、黄沙洋，进入三多祝。这时，义军已经增加到 2 万多人。义军急需弹药。

孙中山接到义军沿海岸东上的电报，想方设法接济义军，竭尽了全部心力。

他致函犬养毅：“吾徒人心虽勇，而兵器弹药尚乞接济之源。久持非计，不得不先作未雨之绸缪。敢乞先生一为尽力，游说政府，为吾人借一臂之助。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物也。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支那兴亡，在此一举。贵政府如允济弱扶危，则各物可从台湾密送，文当划一切施行之策，可保无虞。如何之处，务乞早示佳音。”孙中山电令宫崎向菲律宾独立军借用枪枝弹药。

他又多次向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接洽，请他们援助武器弹药。

可惜，孙中山的一切活动，都落空了。

原因是：日本政府更换内阁，新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禁止台湾军火外运，禁止日本军人参加中国起义军，也不准兴中会在台湾活动。

宫崎复电孙中山：“枪械难送。”粮尽弹绝的义军变得无能为力了。荷枪实弹的清兵对义军层层拦截围攻。郑士良只得连续急电请孙中山援助。

孙中山接济武器和潜入内地都成了泡影，他只好忍痛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从台湾经海丰到达义军大本营，传达他的命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义军接到这样的命令，悲愤交集，慷慨激昂。郑士良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决议：“厦门的接济既然不成，不如重回三洲田山寨据守，设法由香港购买弹药，然后向西北会合新安、虎门同志，一举攻陷广州城，作为根据地，发号施令。”会议决定解散家在附近的战士，只留洋枪手 1000 多人，分水陆两路返回三洲田。

这 1000 多人的洋枪部队计划袭击横冈，生擒何长清，但粮尽弹绝，也只好解散，大批地流亡海外。

郑士良、黄福坐舢板逃到香港。

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的史坚如、邓荫南，屡谋响应惠州起义，皆因没有机会未能如愿，迫不得已，决定用炸药炸毁广东巡抚衙门，炸死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打乱敌人的中枢和后方。

10 月 28 日，史坚如预埋的炸药爆炸后，震塌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从床上震落在地，大吃一惊。

史坚如于 31 日前往码头，途中被捕，11 月 9 日在广州壮烈就义，年仅 21 岁，他是革命党人因暗杀而成仁的第一人。

郑士良在香港脱去满服，换上西装，散发披肩，神采奕奕，决心继续革命。1901 年 8 月的一天，他应邀到宴琼林酒楼赴宴，痛饮之时，忽然觉

得浑身难受，由同伴护送回家，途中丧命。从此，兴中会失去一位重要的活动家，孙中山失去一位亲密战友。

孙中山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远涉重洋为革命继续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横滨、本州和歌山县及檀香山等地，1902年在香港、日本及越南，1903年又往来于越南西贡、暹罗（泰国）、日本和檀香山之间，1904年间再次去美国的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等地，同年底又去欧州的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他历尽千辛万苦，几次在亚、欧、美洲各地，宣传非革命不能救亡的道理，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联合华侨和会党，组织革命团体；并考察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结交外国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地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友人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为校长，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孙中山规定入学学生须填写盟书，表示革命决心，并亲自主持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在军校传授军事知识、枪炮火药制造方法、游击战术及以寡敌众的夜袭法。

孙中山离开日本时，委托冯自由等人负责。

孙中山在纽约同中国留学生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人相识；在欧洲同中国留学生史青、朱和中、贺子才等人结交，把留欧学生中的七八十人吸收到他的革命组织中，形成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他向他们指示说：“诸君加入革命矣，仍应努力求学，即返国后，亦可仍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军起，诸君以官吏地位，领导民众，更易奏效。

如诸君学业未毕，而国内革命军已起事，遇有必要余当来电，电到盼即返国，为我臂助也。”1903年夏至1905年夏，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反清革命团体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它们和兴中会一样，共同的目标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这些革命团体中比较有作为的有：1903年5月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由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7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冬季蔡元培、章炳麟（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主的“光复会”，湖北的“日知会”等等。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

7月19日，孙中山来到横滨，他的目的是：“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几天之后，孙中山便从横滨赶到东京。

几千留日学生荟萃东京，而且不少人是忧国忧民之士，他们革命热情高涨，这里是组织革命力量最理想的地方。

孙中山来到宫崎的住处，寒暄几句之后，便问：“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当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有没有可以加入我党的志士？”正在泡茶的宫崎转过头来答道：“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啊，那好！我们就去看看他。”宫崎连忙制止：“连茶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况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茶等着吧，我去叫他过来。”黄兴住处离宫崎住所不远。宫崎正要出门，孙中山站起来道：“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我同你一起去。”“黄兴也经常打听你什么时候到东京的消息，说要拜访你。”孙中山笑着：“我最先打听到他的消息，所



以还是应该我去拜访他。”宫崎推开黄兴住处的窗子，往里看去，地上摆着一堆拖鞋，里面一群学生围坐成一圈，正在吱吱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黄兴被宫崎叫了出来。黄兴见到宫崎身边的孙中山，脸上顷刻露出惊喜的神色，连忙向孙中山点头致意，又对宫崎轻声说道：“请先到那边去等一等。”黄兴进屋里让宋教仁、张继出来。他们3人将孙中山、宫崎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几句，便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

他们坐在一桌酒肴周围，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中国革命豪杰欢聚一堂边饮边谈，畅所欲言。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大家举杯祝贺。

黄兴，号克强，1874年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他是留日学生中才华横溢的佼佼者。他11岁就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1900年，26岁的黄兴参加了自立军起事的密谋。1902年，他赴日本留学，结识宫崎滔天。次年，他自东京启程回国，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等湖南志士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被举为会长。接着他筹划长沙起义。起义事泄失败后，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离开长沙，乘日本轮船避走日本东京，与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同志会，成了公认的学生领袖。

孙中山在宫崎的带领下，去《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革命志士宋教仁、陈天华会面。孙中山向宋教仁、陈天华提出，“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建议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宋教仁等赞同孙中山的意见。

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其中有李书城、邓家彦、何天炯等都先后拜会孙中山，拥护他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

孙中山、黄兴邀约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于7月30日下午在东京黑龙会会址集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大事。他们中间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全国内地17省均有代表到会，这是中国革命者一次史无前例的聚会。

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他屈腿盘坐，微笑颌首向大家致谢。

黄兴首先致词：“孙先生最近从欧美回来，现今天下大势如何？中国革命怎样进行？我们请孙先生发表意见。”大家屏息静听，全神贯注。

孙中山洋洋洒洒地从天下大势讲到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方法，大概是不外联络人才一事。中国现在不必担忧各国瓜分，但要担忧自己的内讧。如果这一省要起事，那一省亦要起事，大家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各国必然乘机干涉我国。这样，中国必亡无疑了。所以，依我看来，我们应该以互相联络为首要的事。”孙中山端庄的仪态，革命的激情，伶俐的口才，使听众神往。他阐明了革命的理由和实行的方法，提议将全国各地的组织结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抗清廷的革命，他鼓励大家：“一切破坏之前的建设，破坏之后的建设，件件事情都得有同志去做。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文明的政府。”大家以连续不断的掌声表示赞同孙中山的倡议。

孙中山豪情满怀地提议：“新的革命组织，就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怎样？”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黄兴深思熟虑，慢慢说道：“我们现在侨居他国行动还须隐蔽，‘革命’二字一出，同志活动更是不便，从有利革命出发，建议把‘革命’二字删去。”孙中山向黄兴点头微笑，表示欣赏他的观点，接受他的意见。

有人说道：“既然我们以驱除清廷自任，当与对象立名。

我看称为‘对满同盟会’才好。”有些人赞同这个意见。

孙中山站起来说：“不，不应该这样立名。满清政府腐败，我们才起来

革命。但我们革命的宗旨，不是专在排满，而是废除君主专制，创建共和。”经过一番争论，“中国同盟会”的名称确定下来。

孙中山提出：“中国同盟会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经过一番争论，孙中山的提议被通过。

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提议：“请入会诸君自愿签名。”会场变得寂静。

刚从湖南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来，边走边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到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说罢，写上“曹亚伯”3个大字。

程家桢跟着前来：“我亦凭我良心签名。”大家拥到桌边按次签名。

签署了盟书，孙中山领着大家同举右手向天宣誓。

会员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00余人。黄兴首先倡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这个倡议，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众人举手赞成。

孙中山根据章程规定，当场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居协理地位，总理缺席，有全权主持会务。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副领袖地位，也正式确定了下来。从此，人们把孙中山、黄兴两人并称为“孙黄”。

同盟会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应设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5个支部，分辖各省及蒙、藏、新疆等区分会；海外应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

同盟会成立之后，留日学生相继加盟的400多人；至1906年末，仅东京一地加盟的已达800多人。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迅速扩展到1万人以上。

## 第四章 镇南关星火

在同盟会本部领导机关中，除黄兴外，同孙中山最接近的干部还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等人。胡汉民担任评议部议员，后任执行部书记部书记，汪精卫担任评议部议长，朱执信担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廖仲恺担任执行部外务部干事，兼任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

胡汉民，1879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士大夫家庭，他自幼接受封建教育，12岁时，日能诵数千言，遂尽读十三经者，更及史记古文辞之属，下笔为古文时，文俱斐然可观。

乡试获举人。他19岁以后，交游亦渐广，日与社会接触，而受环境之刺激，益思奋起而改革之。好友史坚如被捕牺牲，更是给胡汉民当头一棒，他常独居深念，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犹不足充所怀之志愿。1902年、1904年，他两度以官费生身份游学日本，接受民主共和思想。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原籍广东省归善县人，1877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里。廖仲恺童年从父母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美

国排华的惨事，年纪稍大，又亲眼看到外国人嘲弄、欺凌华人的情景，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16岁那年，他的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留下临终遗嘱：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按客家人的规矩，儿子必须讨大脚的姑娘作媳妇。廖仲恺陪同患病的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国。过了几个月，母亲也离开了人间。廖仲恺依靠叔父的资助，进入香港皇仁书院读书。廖仲恺20岁那年，宣扬他要一个没有裹足的姑娘作媳妇。

有一位年龄与廖仲恺相当的姑娘何香凝，从小反对母亲为她缠足，因而长了一双与男人一样的大脚，父母正暗地愁着她嫁不到好人家，正好碰到专挑没有缠足作妻子的廖仲恺。

何香凝原籍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1878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大地产商家庭。

1897年，廖仲恺同何香凝结婚。他们是志趣相同，情投意合，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夫妻。

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的学习生活，得到妻子何香凝的支持和资助，于1902年秋东渡日本留学。何香凝也随后来到了日本。在东京，他们很快结识了有志之士苏曼殊、胡汉民、黎仲实、朱执信。以后又多次去拜访孙中山，他们向孙中山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中山嘱咐他们：“请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和他们交朋友。”1903年9月，孙中山离开日本前交给廖仲恺夫妇一项任务：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的军事知识，准备将来发动武装斗争。

这对夫妻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革命。他们在东京牛込区组织了义勇队。为避人耳目，每天凌晨，义勇队员秘密聚集到大森操场，由黄兴教授枪法，练习射击。不久，义勇队的活动被日本警察侦破，义勇队练习射击的活动，不得不中断。

1905年9月初，正在广州渡假的胡汉民和廖仲恺，听到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消息，马上返回日本。

刚刚到了东京住处，当天晚上，孙中山就到了他们那里。

胡汉民初次见到孙中山，自然十分高兴。

他们经过一番交谈，廖仲恺首先表示参加同盟会，胡汉民也跟着同意。由孙中山主盟，他们加入了同盟会。

朱执信，原名大符，1885年生于广州，父亲是位知名度颇高的知识分子。朱执信从5岁起便勤奋读书。在12岁时，他的刚刚请来的塾师章奏对他的评价是：“朱大符颖寄磊落，昂昂若千里驹，闻一知一，无所留滞，而文思潮涌，下笔千言，议论雄放处，虽老师宿儒，亦所不逮，其才非吾力能胜任，何敢素餐以误人子弟哉！”章奏箴便提出辞职。

朱执信到了16岁随母舅学习数学，自弧三角以上至微分、积分及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则自读书籍而习之，每夜钻研，非至四更不就寝。不独能忆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来之原理与其应用之范围；不独谙新式之算法，各正史之天文志、律历志、周髀、算经、勾股、开方、捷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中西算学大成，华蘅芳、梅定九算书，则古昔斋算术等，自古代以至前清时代诸算书，无不探其蕴奥。

父亲见他聪明好学，很是欢喜，但又谆谆告诫他：“你不患不成名，但应当考虑到名应与实相称，不要像世俗那样沽名钓誉而沾沾自喜！”朱执信铭记父母教诲，他写信告诉弟弟朱秩如：“先人初无他贻，惟此耿介之性，

实赋诸我。倘腴颜苟活，岂不有忝于祖。”朱执信的父母不幸早逝，他们一家只得依赖舅父生活。

朱执信对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投降卖国不满，他便开始纵谈国事，发表自己的政见，和古应芳、汪精卫等人组织“群智社”，购买新书杂志，互相切磋，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

1904年，朱执信公费留学，他是留日学生中年纪最轻者，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他在东京结识了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同廖仲恺交往尤其密切。同盟会成立时，他毅然宣誓加盟，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兼书记。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他长得眉清目秀，且聪明好学，善承人意。父亲望子成龙心切，5岁时入家塾读书识字，9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内有庭院，每天晨曦初露，他就“习字中庭”。

下午放学回家，父亲还亲自“课督”，要他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或习吟陶渊明、陆放翁的诗。

汪精卫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但好景不长，他13岁时母亲去世，第二年父亲病故。汪精卫随比他大20多岁的嫡长兄客居粤北乐昌，衣食之费，都仰仗于长兄。

长兄汪兆镛是个举人，几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即以游幕为生。他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不稍假辞色，使得汪大有动辄得咎之感。尽管汪精卫对长兄貌极恭顺，如对严父，实际上内心却不免忌恨，但又无可奈何。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后来汪精卫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

青年时代的汪精卫，痛感于“国势日危”的现实，在社会改革浪潮的冲击下，走上了反清斗争的革命道路。

1904年，汪精卫同朱执信一起东渡日本，官费留学。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把从前束缚自己的“君臣之义”抛到九霄云外。1905年，他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长。

汪精卫发表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的政论文章，笔锋犀利，宗旨严正，文从字顺，师出以律，博得读者称赞，也获得孙中山的信任。汪精卫声誉大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留学生，变成了名噪一时的年轻革命党人。

孙中山、黄兴和战友们制定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加强宣传工作，发展各地同盟会组织，扩大革命力量，募捐革命经费，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

1906年春，同盟会会员蔡绍南回湖南活动，他得到同盟会员、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很快和萍乡、浏阳、醴陵一带洪江会首领龚春台等取得联系。在湘赣哥老会和他们的共同策动下，于12月4日发动萍、浏、醴起义。贫苦农民、会党群众、萍乡安源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

革命军在10日内迅速发展到了3万人左右，一度控制四五个县，震动了长江流域中下游各省。

当起义消息传到东京时，同盟会会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战斗。孙中山

和黄兴立即派宁调元、杨卓霖、胡瑛、孙毓筠等会员，赶回国内，到苏、皖、湘、鄂、赣、粤等各省发动起义，以图响应。

但萍、浏、醴革命军由于仓促起事，准备不足，起义后又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在数万清兵围攻下，英勇奋战 20 多天，终以孤立无援而失败。同盟会员刘道一（刘揆一的弟弟）和会党领袖冯乃古等人被捕就义。

1907 年春，孙中山决定再次策划两广起义。他带胡汉民、汪精卫前往安南（越南）；命朱执信回广州领导南部起义；命黄兴到香港等地开展活动，廖仲恺潜回天津及吉林等地。他计划先夺广东，次取广西、云南，占领南部 7 省，然后北出长江，直捣清廷。

孙中山等人离开东京赴安南河内，在甘必达街 61 号设立武装起义总机关，决定因势利导，在钦州、廉州、潮州、惠州四府同时举义。

孙中山派出胡汉民往香港做策应工作，函召黄兴南来协助。他自己在旅越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

5 月，孙中山派黄兴、胡毅生（胡汉民堂弟）分赴郭人漳、赵声营中鼓吹革命，运动清朝新军反正，并委任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负责联络会党及领导钦、廉地区起义的军事行动。

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的许雪秋，也在岭东一带的潮州、汕头等地积极联络会党，准备起义。

许雪秋是广东潮安人，其父因商致富，留下遗产很多。许雪秋在新加坡从商，富有革命思想，早就在潮汕一带，联络会党，图谋起义，却未成事。后来远到南洋，见到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孙看他能够发动会党力量，就授他都督头衔。

但因潮州方面机谋泄露，清军到饶平县黄冈镇进行搜查镇压，革命党人陈涌波、余既成等急于应付清军，被迫违背孙中山的指示，在许雪秋尚在香港时，于 5 月 22 日聚众 700 余人仓促起事。起义军于次日占领黄冈，成立军政府，推举陈、余为正副司令，同时，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等名义发布檄文。

25 日，起义军准备进取潮州，与清军激战于洪港。清军大举进攻，起义军坚持战斗了 5 天，因粮械短缺而失败。陈涌波、余既成等为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解散起义军，余等由海道潜赴香港。

被孙中山派往惠州筹划起义的同盟会员邓子瑜等，听说潮州起义已发动，并不知起义失败，却领导一部分会党武装于 6 月 2 日在归善县七女湖响应。

他们先劫夺了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接着攻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等墟、村。

起义军和清军战斗了 10 多天，多次击败清军，敌人死伤甚多。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以缺乏弹药，起义队伍迫不得已于 6 月中旬将武器埋在地下，自行解散。

9 月初，孙中山命王和顺率领 200 余人在钦州王光山起义。这王和顺是几年前广西会党起义的领袖，失败后流亡到香港和越南西贡，后遇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委任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回去起事。起义军于 5 日内便攻占了防城，擒杀县令宋鼎元等。

随后移师攻袭钦州府城及灵山等地，在云秀桥、狮子口等处与清军激战，均未得手。

孙中山立即从河内派人四出募款购械，准备接济。

清朝新军统领郭人漳一面诈称“赞成革命”，一面派兵袭陷防城。起义军腹背受敌，坚持到9月中旬，因枪械弹药和军需给养均发生困难，退入粤、桂两省交界的十万大山中。

孙中山、黄兴计划从南袭取要塞镇南关，进攻广西。

孙中山委派王和顺为镇南关都督，前往桂边那模村，同早与革命党有联系的广西游勇凭祥土司李祐卿联系，议定了攻取镇南关的计划。但李祐卿所部游勇不服从绿林出身的王和顺调动。王和顺无奈，折返河内。

孙中山改命游勇首领黄明堂为都督，以李祐卿为副都督。

黄明堂与镇南关炮台清军守兵迅速联系成功。

12月2日，黄明堂迎着刺骨的山风，率领游勇80人，携带快枪42枝，由镇南关背面小路摸索前进，向镇南关炮台迂回偷袭。他们攀登断涧危崖，直趋第三炮台，正在睡梦中的100多名清兵，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做了俘虏。

游勇一鼓作气，相继夺取了第二炮台、第一炮台。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和日本友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一行10人，从河内搭火车北上。他们包了一个车厢，纵谈横语，好不兴奋。孙中山更是一反常态，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孙中山自从离开日本到了河内，清朝政府悬赏白银20万两索取他的脑袋，或以云南一省作为报酬，要求法国政府逮捕、引渡孙中山。孙中山一直幽居隐所，足不出户。而今，他在荒漠的大原野上，呼吸新鲜空气。

“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进入中国最南角的镇南关，然后悬军万里，旌旗堂堂，贯通中国的中腹，而出中国最北角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爱新觉罗王朝就彻底完蛋了。”孙中山说罢，纵情大笑。

列车经过谅山，到了安南铁路的终点同登。他们下车步行10分钟，便到了文渊。

前来迎接孙中山等人的几名起义军代表，早已在那里等待。他们牵来了5匹马，准备了几辆马车。大家稍事休息，就要向那模村进发。

孙中山跃身上马，马鞭一扬，骏马四蹄翻腾，身后尘土飞扬。

黄兴、胡汉民也都跃身上马，扬鞭跟上前去。

来到那模村，用过晚饭。当地头目何伍集合了增援部队，连同孙中山一行，共60人。

他们点燃几十个火把，向镇南关攀登。

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座落在右辅山上，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攀登相当吃力。

目的地到了，黄明堂率领北炮台战士，奏着军乐，列队欢迎。

孙中山当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翌日上午，清军援兵赶来反扑。孙中山用望远镜观察敌军阵地，命令狄氏发炮轰击，一炮击中敌人阵地，清营着火，清兵死伤60多人。

清兵恃险向起义军开枪放炮，枪弹呼啸，硝烟弥漫，震天动地。孙中山动手开炮，他感慨地说道：“反对清政府20余年，此日始得亲手炮轰击清军耳！”鏖战终日，清军参将陆荣廷损兵折将，未能前进一步。他见硬打不行，便取缓兵之计，派一樵妇持函登台约降。

孙中山立刻召开战地会议，商议对策。有人说：“陆荣廷在东京加入过

同盟会，此信真情可信。”另一人反驳说：“陆荣廷这契弟是个反骨仔，醉心名利，丧尽良心，不知杀害了多少同盟会兄弟，哪能和我们一起革命？不要上他的当！”黄明堂熟悉炮台情况，沉思良久，瓮声瓮气地说：“我们山上大炮虽多，但只有1门可用，枪只有70多枝，子弹缺乏。我们实难久持，可以暗与陆荣廷联络，命他率部反正。

请孙先生等火速回河内筹款购械，以便大举进攻。”胡汉民赞同黄明堂的意见。但孙中山表示：“我们走了，这个炮台可能会马上失守。”胡汉民辩解道：“我认为坐守在这里是不必的。我们守这台饱和数十枝枪，不是最终目的。这里的将领明白，我们在这里是无法帮助他们的。我们回河内，能想办法策应帮助，他们决不会因此而失望的。”会上正在争论，突然接到一封急信。孙中山拆开看去：“大宗粮食、枪枝、子弹，在文登被法军扣留，交涉无效。”起义军如果缺乏粮械补充，必然遭受挫折。孙中山改变了主意：下山筹款购械。他要求黄明堂率领起义军坚守阵地5天，一俟饷械运到，立即进取龙州；同时，复函陆荣廷，要他准备内应。

孙中山一行10人不顾战斗的疲劳，当晚从山后小道迂回下山。

孙中山回到河内，立即筹款。

9日晚，孙中山接到电报：“炮台失守。”起义军将领到了河内，向孙中山报告了这次战役概况：起义军共获大小炮14门，步枪400多枝，和几千敌兵昼夜血战，打死清兵数百人。大批增援的清军部队即刻开到，起义军寡不敌众，弹绝粮尽，被迫撤离镇南关，退往越南境内燕子大山里。

孙中山听罢，慰勉道：“这次起义，已显示出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震撼了清廷，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继续不断地革命，是我们今后的责任。”孙中山在返回河内途经一个火车站时，被一名法国警察辨认出来，法国殖民当局便驱逐孙中山出安南。孙中山临行前，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兴、胡汉民二人，要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工作，黄兴负责军事策划工作，自己则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孙中山先后任命胡汉民为南洋支部支部长和南方支部支部长，策应河口起义，与黄兴共同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若广东光复，胡汉民出任都督。

黄兴根据孙中山的命令，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 第五章 屡败屡战

1908年1月底，黄兴和谭人凤再赴钦州郭人漳指挥部，运动郭人漳配合起义。谭人凤是湖南人、同盟会会员，也认识郭人漳。

黄兴是1904年秋在上海认识郭人漳的。郭是一个军官，当时他们两人由于在一次暗杀事件中涉嫌而误遭逮捕，从此两人保持联系。黄兴曾在1905年秋赴桂林找当时任桂林巡防营统领的郭人漳，劝说他参加起义。郭对黄表示友好，但拒绝采取任何公开行动。

他托词与同僚随营学堂监督蔡锷相处不睦，行动不能自主。蔡锷是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湖南人，又是黄兴的老朋友。黄兴想居间调解，终不见

效。

这次，黄兴、谭人凤和郭人漳见面，郭的态度友好，要接济黄兴弹药并相机反正。

但第2天郭接到广州来信，说 he 已复原职，就改变了态度。

黄兴立即返回河内，以免遭不测。

黄兴在河内组织了一支 200 人的队伍，半挂长枪，半挂短枪。3 月 27 日，黄兴率领队伍由越南向钦州进发。29 日抵小峰，战败郭人漳部管带杨某所部 600 余人。30 日、31 日，于途中连续击败清军 3 营。4 月 2 日，在马笃山再败来犯清军 3 营。起义军经过数次激烈战斗，队伍扩大到 600 多人，缴获敌人快枪 400 余枝和大量子弹，军力有所充实。正准备向广西边境移动时，郭人漳以数千人尾追，企图围歼起义军。黄兴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夜袭战术粉碎了清军的阴谋。此后，起义军在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 40 多天，历经数战，屡败清军，但队伍始终未能再扩大。最后，因弹尽援绝，不得不率队伍退回越南。这已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七次武装起义了。

在河内负责后勤供应的胡汉民，一度以为黄兴已经遭难。

当黄兴于 5 月 5 日身强力壮、精神焕发地回到河内，胡汉民喜出望外，一则是黄兴平安无事，二则是云南河口起义已经爆发，前线迫切需要富有经验的革命领袖亲临指导。

4 月 30 日，黄明堂、王和顺等人按照孙中山的部署，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 200 多名革命军人，在越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 500 人，向河口进攻，发动了河口起义。在当天凌晨攻占河口，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等地，直逼蛮耗、蒙自。他们在战斗中收编清军降卒，使起义军从几百人扩展到 3000 多人，声威大振。

但是，部队必须有给养和薪饷。在河内，胡汉民困窘万状。他心绪烦乱，不断电告新加坡，催促孙中山火速设法。孙又急电催其他同志，并派汪精卫去荷属东印度筹款。

孙中山得知黄兴已返回河内，立即发电给黄兴，委任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去前线督师。黄兴便立即奔赴云南。

从河内到河口，火车约需行驶 12 小时。黄兴到河口后，发现投诚清军不听他的调度，对黄明堂、王和顺等指挥不灵。黄兴意识到：必须有一支他自己直接指挥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的军队，才能顺利地指挥其他各军。他打算把他从钦廉战役带到越南去的战士召集起来。因此，他回河内同胡汉民商量。

5 月 11 日，黄兴在河内同胡汉民会面后，折返回前线，途经安南境内的老街时，被一个法国警察盘问。黄兴佯装为广东人，但说话方音太重而暴露了身份，法国殖民当局令他离境，他只好离开安南赴新加坡。

清朝云贵总督锡良派出大军，广西方面亦调兵围攻起义军。起义军里的一些降兵又反正过去，法国殖民当局在河内至老街铁路沿线加强警戒，阻止起义人员和武器、粮食从越南增援云南，起义军陷入困境。他们坚持战斗了近 1 个月，终于无法坚持。

黄明堂率领 600 多名起义战士突围撤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孙中山领导的第八次起义失败后，花费了 1 年零 7 个月，积极准备发动第九次起义。



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募款集资，派汪精卫在安南、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新加坡等地筹款。那些地方的倾向革命的侨商，如张静江等捐资几尽家产。孙中山只好前往欧美筹款。

黄兴在新加坡逗留时间不长，便去日本。

河口起义失败后，汪精卫变得更加悲观颓丧了。这时，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孙中山和他的广东籍同志大加讥嘲，信口雌黄地说，他们让别人在前线作战，而自己则在海外逍遥。汪精卫被这种妄加于孙中山的诽谤所激怒。他想借助某种英雄行动来反击恶意攻击。同盟会内的磨擦，特别是章炳麟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蔑谩骂，使他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依靠某种振奋人心的行动，才能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于是他便倾向于暗杀和恐怖活动。

当时中国的暗杀活动已是司空见惯。早在 1900 年，革命党人史坚如就曾谋杀清广东巡抚德寿于广州；1904 年 11 月，万福华曾在上海谋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5 年 9 月，吴樾曾在北京车站掷弹狙击被派往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这些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与黄兴商量，想去北京暗杀摄政王，一令敌人胆丧，二鼓同志意气。“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黄兴认为汪精卫是同盟会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掷，殊不值得，便竭力劝阻。

汪精卫去志已决，对大家痛哭道：“我要为已死的同志报仇，如果大家不放我去，我就投水自尽。”黄兴自觉阻拦不住，就让他带上一笔钱，派两个同志同去北京，一人是四川的黄复生，也是热心暗杀的，另一人是一位姑娘，名叫陈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儿，因为爱读汪精卫的革命文章，所以加入同盟会，已与汪相爱很久，此次入京，陈璧君自告奋勇扮作汪精卫之妻，以遮人耳目。

他们 3 人到北京便开设了一个照相馆作幌子。

汪精卫秘密侦查摄政王载沣的行踪。他花了许多钱，买通了宫中的一个太监，在摄政王载沣每天上朝进宫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将药线与电线相结，只要按动电门，就会爆炸。

正当汪精卫以为大功快要告成，很是兴奋之时，不料隔墙有耳，事机不密，他与那太监密商时，却被另一太监听到，深夜到摄政王府告发。

载沣立刻通知步军统领衙门，一帮辫子兵直扑汪精卫的照相馆，把汪精卫、黄复生一一捉住。陈璧君因是个姑娘，兵弁没有逮捕她。

汪精卫快被押走时，陈璧君握住他的手，泪眼相看：“汪君，你怎么处置我？”汪精卫慨而以慷：“我与你相交日久，相爱甚深，原以为来日方长，没有考虑婚姻大事，今天我这一去，必死无疑，咱俩身份未明，今天就得一言而定，你肯为我精神上的妻子吗？”陈璧君于愿已足，破涕为笑：“汪君放心地去，我一辈子为你守着！”汪、黄被关押在内城巡警总厅。法部审讯此案，那黄复生便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谋，与汪精卫无关；汪精卫也咬定是自己主谋，与他人无关。法部堂官只得把他们打入牢房。

汪精卫、黄复生分别押在死牢，肩扛 40 斤的铁枷，每人每天只给稀饭一盆，粗面饼一块，脖子已被铁枷磨烂了。

有一位青年人前来探视汪精卫，被狱卒拦住不放进来，就写了一首词送给汪精卫，汪即和一首，词曰：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旧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数襟期，梦里重携手。一腔血，

为君剖泪痕。莫滴新词，透倚寒窗。巡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底事，空令多情孱慙愧。戴却头颅，仍旧跋涉山河。知不易，愿孤魂绕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

汪精卫和了这首词，似觉得话犹未尽，便又写了一首题为《被逮口占》的五言诗，其中八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悲壮动人的诗句，读来铿然有声，脍炙人口，曾经被传诵一时。

陈璧君既然把心身许给汪精卫，便在外面奔走营救，一刻不停。她结识了肃亲王善耆。胡汉民听到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入狱，震惊焦灼，即与同志商讨营救办法。

这善耆却是个清宫中的新派人物，同立宪派同革命党人都有联系，他想借着这两股势力，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那各省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请愿提前立宪时，摄政王载沣很是震怒，各衙门各大员对代表们避之惟恐不及，而这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却独树一帜，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谈话至紧要处，忽然掷冠于地，唱了一声“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的戏词，意思是说：光绪帝若在，立宪早已实行，现在载沣不愿，我却是同情立宪的。

陈璧君找到肃亲王这里，肃亲王认为这是同革命党联络的好机会，遂为汪精卫等说项。那摄政王载沣对汪精卫等原本是杀无赦的，肃亲王说了话，不得不从轻发落，定为永远监禁。善耆便将汪、黄转移到他那民政部监狱，住在裱糊一新的房间里。汪精卫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

孙中山在南部发动 8 次起义都失败了，他认为依靠会党作为主力，战斗力不强，便转而侧重于新军的策反工作。

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潜入广州新军串联，宣传革命主张。

广州有三个标的新军，都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那赵声就是一个标的标统。他曾是个秀才，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与朱执信等人素有联系。在 1907 年的钦州暴动中，黄兴曾争取过他的支援，尔后他奉命调来广州，不久因被怀疑同情革命，受到郭人漳的排斥，遭黜职。降级后的赵声跑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有些老部下愿继续听他指挥，他便成为同盟会起义的军事组织者之一。

另有一位广州新军炮队排长、安徽人倪映典加入了同盟会，对部属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利用学科讲授机会，演讲历史故事，宣传革命思想，启及反清觉悟。他的工作很出色，很多新军加入了同盟会。

胡汉民又派邹鲁等在广州军队中积极策划起义。

朱执信、赵声、倪映典等决计以运动新军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

1908 夏，朱执信、倪映典等召集军中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白云山能仁寺集会，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头运动，并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广州新军加入同盟会者已达 3000 多人。

1910 年 1 月，倪映典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成熟，要求订于夏历元宵节前后起义。

南方支部又报告给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并要求筹措汇款 2 万元应急。

孙中山此时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建立了同盟分会。他答应准如所请，两月内汇奇港币 2 万元，并嘱进行勿馁。此前他已先后汇回了在美国华

侨中募捐到的港币 8000 元，允作起义经费。

广州的武装起义原计划在 1910 年 2 月末动作。旧历年节日气氛笼罩着武装暴动的策划与发动。

不料，在 2 月 9 日下午，少数新军士兵在市内为一些琐事与警察发生了磨擦。双方争斗起来，一刻间，军队与警察之间似将发生武装冲突。革命党人在起义前不愿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且避之惟恐不及。在紧急时刻，倪映典急驰香港，同胡汉民、黄兴、赵声等人磋商。黄兴是在 1 月底由日本来到香港的。

经过彻夜会议，决定在当月 15 日发动，届时赵声、黄兴将到广州指挥战斗。

会议刚刚结束，2 月 12 日清晨，倪映典回到广州。情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他离开广州时，一标士兵发生骚动，清吏严加戒备。

倪映典当机立断，即于当天下午回到一标，率领 1000 余士兵起义，倪映典被推选为总司令。他身穿蓝袍，手持红旗，来往驰驱，指挥起义军经沙河进攻东门。

起义军进入阵地，同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部 2000 余人展开猛烈激战。

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计划不周，三标新军，除一标起义外，其他两标因清朝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封存了全部枪械弹药，未能行动。一标战士孤立无援，倪映典在作战时中弹牺牲，起义军奋勇战斗 1 个多小时后，不得已而退却。延至次日晚，起义军退守白云山一带，被清军所镇压，起义失败。死难和被捕者 300 多人，其余溃散，有些逃到香港。

第九次起义失败时，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药，侨胞们应速立志以实行革命。”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在洛杉矶同美人咸马里、布恩等多次会谈，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委任布恩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要求布恩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

孙中山连续发电报和长信给在香港的黄兴、胡汉民等人，提出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建立革命基地，组织军队，训练军官，贮藏从海外输入的武器等等。在香港的革命党人读过电报和长信，靡不欢跃之至。

黄兴是位热血之人，当即回信表示：尽管有 2 月的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黄兴向孙中山报告，在广西军队的军官中，有数十位同志。在江苏、浙江和江西等省军队的军官中，也有许多人是革命者。在湖北军队中，有孙武竭力运动，成绩亦好。在湖南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也不弱于任何其他一省。在云南，同盟会成员深深渗入军队，以致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长江流域之秘密会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黄兴向孙中山建议：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他从各省推荐的人材有：刘揆一、宋教仁、杨守仁、蔡元培、吴稚晖等。说杨守仁思想缜密，文采人品亦如汪精卫，美材也。说蔡元培虽开阔达之度，而办事精细有余。说吴稚晖甚属人望，惟偏于理想，若办事稍低减其手腕，自亦当行出色。黄兴深有感触地说：“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见信。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孙中山

看到祖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深感再次举事不宜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再蹈羊城失败的覆辙，他在 1910 年 5 月 30 日，乘“蒙古”号轮船赴日本，同黄兴等人筹划广州起义。

3 年前，孙中山被日本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因此，这次赴日，他事先写信给东京的同志，请他们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驱逐令。结果，日本政府表示：“改名亦可通融。”轮船到达横滨的前一天，孙中山在船上用化名给日本友人池亨吉拍发电报：“明日请偕宫崎同来横滨‘蒙古’号船上一晤。”6 月 10 日，孙中山乘坐的轮船刚刚靠岸，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就跳上船去，两人久别重逢，兴奋异常。不及寒暄，便讨论起革命形势。

4 天后，孙中山同黄兴、赵声等人在日本横滨孙中山的旅馆里会面。讨论设立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策划武装起义问题，对未来的若干大计取得了一致看法。

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要立即离开日本去缅甸。他快要离开时对孙中山说：“哦！对了，钱！您有钱吗？”“是的，我有。”孙中山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这是他在美国向华侨募集的全部资金。

黄兴没有过数，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他想起孙中山常常把钱用于革命，生活陷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便说：“哦！对了！我还是给您留些，您身上大概没有钱吧！”孙中山微微笑着点了点头。黄兴打开皮箱，拿起几迭，也不点数，交给孙中山，关上皮箱，提着走了。在场的人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惊叹不已。

日本政府不准孙中山在日停留，他便经香港去马来亚。他在槟榔屿致函南洋各地革命党人：“机局大有可为，不可不乘时图大举。”他努力募集 10 万元作为经费，约黄兴、胡汉民等来槟榔屿，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

1910 年 10 月 13 日，在槟榔屿，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邓泽如等人秘密聚会。

孙中山豪壮地表示：“一败何足馁。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乘此良机，重谋大举。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会议决定从同盟会会员中召集 500 人组织敢死队，再次发动广州起义，并策动清朝军队中同情革命的部队响应。在起义之前，必须筹集一笔巨款，购买枪枝弹药。决定以振兴中国教育的名义，计划在海外侨胞中筹款港币 13 万元。

赵声被派往香港，作起义准备工作；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分赴南洋各埠募款，还派人到海外购买武器。

英属马来亚当局得知孙中山在槟榔屿活动，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把他驱逐出境。他再度去美国和加拿大筹款。

在加拿大、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越南、缅甸、美国等国筹款已达 19 万港币，超过了原定计划。

1911 年 1 月 18 日，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跑马地 35 号建立了起义总机关“统筹部”。

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胡汉民为秘书课课长，陈炯明为调度课课长。因胡汉民尚未到达香港，陈炯明代行秘书课课长，宋教仁为编制课课长。

陈炯明，字竞存，又字赞三，1879 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他幼时是出名的顽童，对学业素不重视，喜欢与人取闹打架。不幸门庭中衰，3

岁时父亲辞世，7岁时祖父去世。不幸的事接踵发生，使幼小的陈炯明的个性和心理都受到强烈刺激。他较早尝到人间炎凉和艰辛，养成了发愤自立的思想。祖父去世后，他顿易初行，不仅读书用功，与人交际亦温文有礼，显得少年老成。当他20岁时就一举考中了秀才。他受革命党人影响，于1900年同马育航等集资，在田心乡试办小农场，并在那里“时与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兵学，以备用”。1904年海丰师范学堂创办伊始，陈炯明即考入该校，毕业后于1906年考入广东法政学堂。

陈炯明在法政学堂同在那里任教的朱执信、古应芬结成较深厚的师生情谊。陈炯明比朱执信大6岁，比古应芬小6岁，他们比较相契。朱执信称陈炯明“品学兼优，热心国事”，形容他“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一见如故，坦诚相谈”。陈炯明与同学邹鲁交往甚密。

陈炯明颇有反抗精神，1907年4月，他了解到惠州府知府陈昭棠因握有就地正法之权，每遇盗警，即派兵围捕乡村，不问是非轻重，被捕者即尽杀之，甚至未幼年岁之童子，亦不能免。他对此极为愤慨，乃毅然为首，联合惠州一批学子名流，向广东当局据实控告，函电交驰，颇有一番声势，终于迫使广东当局撤掉了陈昭棠的职务。

陈炯明又和同学、同乡马育航、钟景棠等30余人宣誓缔盟，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县仓。他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个人影响，为他跻身政坛创造了条件。

1908年7月，陈炯明从法政学堂毕业，便登上了政坛。次年2月，广东成立咨议局筹办处，着手进行咨议员选举，陈当选为议员，又成了广东咨议局议员研究会成员，他在咨议局的活动颇为活跃。1909年11月，陈炯明、邱逢甲作为广东咨议局代表，到上海参加咨议局代表联合会议，决意加入同盟会。

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便积极投入策划武装起义的工作。他在香港设立了“乐群书报社”，作为策反的联络机关。1910年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巡警查出陈炯明、邹鲁与起义有联系，因而把陈炯明、邹鲁等列入黑名单。陈、邹等成了清政府的缉拿对象，只好匿居香港。后来邱逢甲以社会名流身份出面作保，清朝广东地方政府才表示不予深究，陈炯明等闻讯，返回广州。

陈炯明、邹鲁回广州后积极参加咨议局禁赌案活动。赌商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企图诱使陈收回禁赌议案。但陈炯明不为所动，拒绝了赌商的贿赂。他和邹鲁、邱逢甲等人同倾向于反对禁赌的议员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将那些议员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一时社会舆论沸腾，全省震动。那些议员个个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粤督袁树勋也因此失去了官职。

陈炯明拒收贿金力砭时弊，私生活也极为严谨。他在禁赌案事件中，显示出较强的政治手腕。这样，他成功地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廉洁、正直、精干”的形象，从此名声大噪。

黄兴委托陈炯明、邹鲁创办《可报》，目的是进行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陈、邹为了遮人耳目，以咨议局机关报的名义于1911年3月20日创办了《可报》，以军队为主要宣传对象，每逢报纸出版，就派人尽快送到兵营，名义上对军人半价，实际上是免费赠送。

《可报》在军队中流传较广，从而促进了军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陈炯明还召集了100多人的敢死队队员，并在军队中进行了策反工作。

原来计划广州起义成功后，便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同时组织

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捣清王朝的首都北京。

谭人凤等人被派往长江流域联络各省的革命团体，组织当地的起义。谭人凤多年在两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熟悉那里的情况。他提醒黄兴：“南京举义的事，谋划很久了。”

湖南、湖北居中原中枢，如果夺得，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假若得不到两湖，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大作为，希望你们加以注意，以收到响应的效果。”在槟榔屿会议上曾决定组织 500 人的敢死队，但这个数目不敷应用，其后扩大到 800 人，分为 10 路，每路 50 至 100 人不等。这 800 人敢死队，作为“选锋”，以冲锋陷阵。从广东、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各省及南洋各地召集的“选锋”队员，到香港集中，这些队员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为了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 40 多个秘密机关。

各个机关之间不发生关系，如果一个机关被敌人破获，就不会牵连别的机关。

从国外购进的军火，首先运到香港，然后通过不同路线偷运到广州。在广州和香港都开设了出卖假发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则密藏在假发内或装染料的锡罐里，从香港运往广州。枪械也夹杂在里面运到广州。

## 第六章 血祭黄花冈

广州起义的日期预定于 4 月 13 日。但是，4 月 8 日，从马来亚归来的温生才擅自行动，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

温生才被捕就义。

《可报》对刺杀孚琦的温生才烈士公开表示赞扬。清政府对《可报》本来就嫉恨，因它是咨议局办的，苦于没有把柄，奈何不得，现在便借题发挥，以“恐莠言之乱政，禁邪说之惑人”，以免“片纸风传，一倡百合”为借口，勒令《可报》永远停版。

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 4 月 27 日。黄兴于 4 月 23 日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

广州城内谣传：革命党人在 4 月底前举事，粤督张鸣岐对起义已有所闻。4 月 25 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守卫观音山高地。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讯大惊，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但参与选锋的喻培伦、林时埭等深恐事情败露，无法再举，故坚决反对。黄兴再三思考，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

于是黄兴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港的选锋队勿来广州。

但是，喻培伦、林时埭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

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再三深思！”喻培伦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他更是激烈主张按期起义：“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你们四肢俱全，难道还不如我这个残废人吗？”这一番话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集合三四十人围攻督署；杀掉张鸣岐。

4月26日，李准从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属巡防三营入城。据说，其中10名军官中，哨官温带雄等8人热心革命，一人中立，仅一人反对革命。陈炯明闻讯，由惊而喜立即改变主意，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4月27日按期起义。黄兴也很受鼓舞。革命党小东营会议因此决定：在广州的500人“选锋”兵分4路，于27日下午5时同时发动。

黄兴立即给胡汉民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这份27日起义的电报，直到26日夜间10点钟才传到香港。此时尚有300多“选锋”滞留在香港，200多枝枪还在香港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启航。

香港统筹部的赵声主张：所有300多“选锋”携带武器次日搭早班船去广州，上岸时若被查觉，即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但是，胡汉民和刚从湖北来到香港的谭人凤反对，他们提出：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人乘晚班船去广州。于是，香港统筹部急电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日。谭人凤和黄兴之子黄一欧乘早班船去广州。赵声、胡汉民带领300“选锋”搭乘晚班船去广州。

陈炯明接到香港统筹部的电报，即派马育航向黄兴汇报，主张延期一天起义。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谭人凤到达广州起义机关时，黄兴及其选锋队伍已经准备就绪。谭人凤未能说服黄兴推迟起义日期。

4月27日下午，黄兴命令在广州的“选锋”队兵分四路：黄兴率领第一路进攻总督署。

姚雨平率领第二路进攻广州小北门，驛已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新军进城；胡毅生率领第三路守大南门；陈炯明率领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以便该所200名学生投入起义行列。陈炯明擅自主张，通知胡毅生起义改期。胡亦抱消极等待情绪，以拒发枪械来作抗拒立即起义的表示。由于上述原因，第二三四路没有及时发动，只有黄兴率领的第一路按时进攻。

黄兴等决意起义，他们精神奋发，不少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写下遗书。

林觉民在给他怀孕的妻子的绝笔书中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方声洞给父亲的绝笔书：“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但望大人以国事为重，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甘有

六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死中救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4月27日下午4时许，黄兴、朱执信、林时壘、方声洞、林觉民等人率领130名选锋，臂缠白布，脚穿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全体集合。

众人见喻培伦也来到这里，不同意他参加战斗，劝他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技术传授给同志，这比参加战斗更重要。但是，喻培伦道：“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会制造炸弹，现在做好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又有人劝道：“不少你一个人嘛！”“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人都强。”喻培伦有些生气地回答。

黄兴慷慨激昂地作战斗动员：“清政府从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百姓，弄得中国暗无天日。如果不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推倒，亡国之祸，即在目前。革命，是救国的唯一良方，是我们的天职，要靠我们富有热血的男儿，不顾一切，抱着牺牲的精神，才有办法。只要我们肯牺牲，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同志们，努力吧，革命一成功，我们就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和清政府的压迫，大家都可以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身穿白长衫的朱执信，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从外面跑过来，要求参加战斗：“我愿跟黄胡子去拚命！”有人笑道：“你穿着长衫，怎能冲锋陷阵？”朱执信瞪了那人一眼，立即取出剪刀来，将白长衫的下半截剪去，双手拿着两个炸弹，站队待命。

年已半百的谭人凤向黄兴要枪。黄兴瞥他一眼，婉言拒绝：“先生年高，还有事要你去办。这是决死队，你不必参加了。”谭人凤顿时满脸通红，高声责备黄兴道：“你们敢死，难道我谭人凤独怕死么？”黄兴微微一笑，无可奈何，只得发枪给他。

谭人凤并不懂枪术，拿过枪来，马上误触扳机走火，把众人吓了一跳，幸好尚未伤人。

黄兴不待谭人凤解释，一把将枪夺回，连声说道：“先生不行！先生不行！”谭人凤摇头叹息，只得埋怨自己。

黄兴身穿雪青色纺绸短衣，双腿扎布，双手持枪，威风凛凛，神采奕奕。他看看手表，指针正指在5时30分，便立即发出命令：“各位同志记住：胆要大，心要细。时间已到，向督署进攻！”司号员拿着用海螺做的号，吹响了进军号。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向前。

督署东西辕门驻有一连卫兵，正在吃晚饭，起义军冲来，大喊道：“我们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举义，举起手来！”清军卫兵面面相觑，有的企图拔枪反抗。起义军枪弹齐发，当即击毙卫队管带，冲入二门，与清军卫队对射，所向皆摧。

黄兴双枪连连射击，弹无虚发，迫使卫兵弃枪请降。

朱执信却将平日常文的姿态抛到九霄云外，勇敢地冲锋陷阵，显示出十分机智勇猛。

黄兴、朱执信、林时壘、李文甫、严骥冲入私寓，分头搜索张鸣岐。

喻培伦、熊克武等从督署后门进攻。三天三夜因赶制炸弹未合眼的喻培伦，身负一箩炸弹，双目炯炯有神，抛出两颗十磅炸弹，“轰隆隆！”督署



后墙炸开两个大洞。起义军战士冲进去，喻培伦高喊：“活捉张鸣岐！”张鸣岐正在督署同司、道官员议事，听到警报，连忙穿过后壁，转入水师行台。

黄兴见张鸣岐等官员已逃跑，下令纵火，焚烧督署。

起义军出了总督署，行抵东辕门，同清朝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林时廪向前劝降：“我等皆汉人，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不料突然中弹而死。

刘元栋、林尹民等5人相继中弹身亡。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黄兴举枪射击，连连击毙数人，他右手中弹受伤，断中、食二指。一臂已废的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敌人见之，无不丧胆。

起义军兵分三起，分途进攻。战火迅即蔓延全城。黄兴带领10人，打算出南大门，在途中与巡防营相遇，接火后，因寡不敌众，败北。黄兴避入一家已歇业的绸布店，更换衣服而出，奔向珠江南岸郊区的一个秘密机关。那里的女同盟会员徐宗汉给他包裹伤处，安全地把他护送去香港。以后，黄、徐结为夫妻。

朱执信随黄兴转战到双门底，从牺牲的同志手中拾起一枝枪，继续战斗。他手、胸负伤，鲜血淋漓，竟不理睬，直到子弹打光，队伍散了，他才避入方言学堂学生林云陔家中，等到大南门、大平门开放，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搭船前往香港。

方声洞等一队起义军驰攻督练公所，方中途饮弹牺牲。

陈炯明等人在黄兴发动起义时，却逃进城去，接着又逃回香港。

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林时壘、方声洞、罗进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共计86人。

胡汉民、赵声率领300“选锋”赶到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遂大哭而归。赵声不久便忧郁逝世。

事后，收殓在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72具尸体，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后改名为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

此乃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即后人所称的辛亥（1911年）广州起义或“黄花岗之役”。

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黄兴在香港见到陈炯明，甚为气愤，对亲近同志说：“竟存此人，不足与共大事，观其眸子，足知其阴险，须亟除之，免为后患。”陈炯明在大事面前，专擅自为，见危却步，其后果是极严重的，理应除之。但是，他在新败之后逃到香港再图革命，许多同志认为应给予他悔过立功的机会，不同意黄兴的处置办法。此事也就作罢。

谭人凤和居正在黄花岗起义之前，被黄兴派往长江流域，组织起义。

谭人凤，号石屏，又号雪髯，1860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36岁以前尚在乡村教私塾，未能研究时事政治，后遇友人谈论中外大事，竟瞠目无以应对，愧恨难当。先参加反清复明的哥老会，被推为龙头，后结识黄兴，入华兴会。44岁参与黄兴等谋划湖南起义，事泄后回乡以创办“福田小学”为名，设立革命机关，联络会党。后任新化中学堂监督。

因招纳宝庆会党起义残部事泄，逃往日本，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年纪最长者。他为人耿直，仪表威严，热心实干，讨厌清谈，对孙黄多有批评，

独崇宋教仁为俊杰。萍浏醴起义爆发，他受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国策应。未果，重回日本，入法政学校学习。后参加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夏在日本东京的11省区同盟会分会会议上，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这是黄兴派他回来组织起义的原因。

居正，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1876年生于湖北广济县。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31岁在东京参加发起共进会，次年赴南洋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返回日本，与宋教仁、谭人凤等筹设中国中部同盟会，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旋归国。

谭人凤同居正来到武汉，与《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以及孙武等人见面，商量运动新军的事情。

孙武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1879年生于湖北汉口，原名葆仁，字尧卿，号梦飞。18岁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21岁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被举为岳州司令。25岁加入科学补习所，负责联络军队与会党。事泄，逃往日本，学习海军。回国后加入日知会。28岁再度赴日本，参加组织共进会，被推选为军务部长。归国后仰慕孙文大名，佯称是孙文之弟，为孙文所派，来武汉领导革命，即与彭楚藩在武汉建立湖北共进会，组织革命力量。次年到香港，加入同盟会，不久便回武汉。

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质存。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次年到武汉，任《商务日报》总主笔，宣传革命。《商务日报》被清廷武汉当局查封后，又筹办了《大江报》。

谭人凤开口便道：“事情紧急。黄兴指示：孙中山先生赴美筹得款项，拟在广州再图大举，定由革命同志组成800选锋，分四路攻取总督署、水师提督署、将军署和督练公所，运动巡防营响应，待得手后，黄兴率一起义军入广西，赵声率一起义军入江西，命我率一起义军入湖南并联络各处。我此来即要亲自联络两湖革命同志。诸位同志应急努力，届时响应。湖北由居正负责，我即赴长沙联络，月底须赶回广州参加起事。”他们商谈之后，谭人凤提出去武昌监狱中去看望胡瑛。胡瑛年纪甚轻，却已是同盟会的老同志。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1904年，他和两湖革命志士们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即投入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把革命团体设立在新军内部，在新军中吸收革命党人，扩大革命组织。当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他参与组织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醉心暗杀，先后参与谋刺兵部侍郎铁良，后与吴樾刺杀清廷出洋五大臣，逃亡日本留学，适逢同盟会成立，成为第一批会员，后奉同盟会之命回武昌策动日知会响应湖南萍浏醴起义，事败，与日知会主持人刘静庵、张难先、季雨霖等9人被捕。原拟斩首，却改为终身监禁。

胡瑛才气纵横，易于接近，他便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把狱吏争取过来，狱吏因而给了他一定自由，允许他与外通讯，接待革命同志。革命志士詹大悲、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常来看望送钱。老狱吏谈国华觉得胡瑛绝非寻常之辈，终有扬眉吐气之日，便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姑娘便天天来狱中为胡瑛操持琐务。胡瑛喜结良缘也。

谭人凤、居正、孙武、詹大悲等来看胡瑛，见胡瑛果是衣冠整齐精神健旺，深觉放心。谭人凤便把将在广州举事告诉胡瑛。孙武便道：“我党在广州失败多次，为何又在广州起义？”“此事是孙中山总理指示，南洋诸同志也不甘心，狂热要再作此一举。”谭人凤说完，看了孙武一眼。

孙武对孙中山专心在广东省起义，而对长江流域的起义在经济上不支持颇为不满：“武汉为中国九省通衢之地，且又有基础，为何不在武汉举事？我代表湖北共进会发表意见，过去革命是运动士官，结果感到他们腐化消极；后来是联合会党，又感到会党思想不纯，不能用武。现在是运动新军士兵的时候了，武昌是新军集中之处，又有工业基础，将来武器供应不用发愁，汉口商业区有无尽之饷源，水陆交通又十分便利，一旦发动，即可震动全国，加上湖南支援，可无后顾之忧，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可堵清军南下，东南半壁江山，传檄可定，北方各省，可从容布置，而民众反满情绪十分高涨。

凡此种种，皆非濒海之广东可比，实应在武汉首先发动。”谭人凤此次奉黄兴之命，携带 2000 元回湖北、湖南组织当地起义，与广州起义相呼应：“总部计划既定，即如此行事为好。”孙武继续同谭人凤争论，居正默不作声，还是胡瑛道：“广州与武汉同作准备，以后看情况再定。”胡瑛是同盟会老会员，又同黄兴关系密切，当地革命党人都很尊重他。谭人凤和孙武便听从了他的劝告。谭人凤拿出了 600 元给居正，又拿出 200 元给孙武，让他们用这些钱从事革命活动。

湖北省有两个重要的革命组织，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这两个革命组织，都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

科学补习所便是湖北的第一革命组织，1904 年 7 月由青年学生吕大森和青年军人刘静庵等人在武昌建立，所址设于武昌多宝寺街，会员共计 40 余人，推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时功璧、宋教仁、曹亚伯分任文书、宣传等职。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借研究科学为名，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后因华兴会计划在长沙起义事泄，清政府发觉科学补习所与谋，下令搜查，幸事先有备，未遭破坏。但“科学补习所”这个名称不能再用，次年 2 月，刘静庵、曹亚伯等人组织“日知会”继续活动。

“日知会”的名称，来源于武昌的美国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日知会内分设干事、评议两部，推刘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冯特民等为评议。会员共计 100 余人，分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以军界为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萍浏醴起义，该会准备响应，被清政府发觉，刘静庵、胡瑛、季雨霖、张难先等 9 人被捕。领袖们被关进监狱，使湖北革命运动一时受挫。至 1908 年夏，日知会成员再趋活跃。7 月 26 日，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亚东等人在武昌建立军队同盟会。

军队同盟会吸收 400 余人，多属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公推任重远为总干事，主持会务。并创办《通俗白话报》，由陈少武主编，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为防止泄密，议决不定会章。后被清政府发觉，《通俗白话报》被迫停刊，任重远逃往四川，会务遂告停顿。12 月改组为“群治学社”。

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黄申芑、杨王鹏等人继日知会之后，将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设社长一人，文书二人和评议员若干人，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他们在 1909 年接办了汉口的《商务报》，作为他们的机关报，宣传鼓动革命。1910 年春，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黄申芑等准备武装起义，因清政府发觉，《商务报》被查封，群治学社亦被迫停止活动。不久，改名为振武学社。

振武学社于 1910 年 9 月由群治学社改组而成。吸收社员 240 余人，推杨王鹏为社长，李玉如为文书兼庶务，设干部会，由新军各标的革命分子派

代表参加，以蛇山蕲春学社作为各标、营的联络机构，借“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为防止泄密，各营不能互相联系，营代表只能承标代表之命。该组织被新军协统黎元洪查，派施化尤为队官，秘密侦查，开除杨王鹏，李玉如等人的军籍。社务遂由蒋翊武接替。

蒋翊武原名伯夔，1885年生于湖南澧县。18岁入常德师范学堂，因谋革命被开除，奔走于沅、湘之间，结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他20岁时打算去日本，但在途经上海时病倒了，病愈后便入中国公学读书。不久他遇见了同乡、同盟会员杨卓霖和刘复基，同他们一起创办《兢业旬报》，宣传革命。蒋翊武经刘复基、杨卓霖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蒋翊武随刘复基回武汉入新军，并参加群治学社。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后，仍为社员。次年，刘复基、詹大悲、蒋翊武等人以振武学社已暴露，商讨改名为文学社。

他们借新年团拜之机，由詹大悲以《大江报》名义发出请柬，邀请潜伏在新军的老同志聚首武昌黄鹤楼，正式成立文学社。

## 第七章 风满黄鹤楼

辛亥年（1911年）大年初一早晨，便有许多新军士兵走上黄鹤楼。黄鹤楼一带，商贩云集，游人如堵，热闹非凡。这些身着土黄色新军制服，头戴大盖帽，腰束皮带的士兵，也同游人一样，说说笑笑来到山上。在奥略楼内有三个人正在等候这些士兵们。其中一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便是《大江报》主笔詹大悲，另两位是身着军装的蒋翊武和刘复基。

刘复基，名汝夔，字尧澄，湖南常德人，19岁便参加马福益领导的洪江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在长沙设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并与禹之谟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鼓动学潮。因禹被捕，东赴上海，同杨卓霖、蒋翊武创办《兢业旬报》。1909年回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因拟击杀立宪派杨度未果，被捕，旋释出，入湖北新军。参加振武学社。两年前的这一天，詹大悲、刘复基、蒋翊武同在《商务报》共话国事，结为友好。

20位代表来齐，他们都是20至26岁的青年，是新军各营的代表。

詹大悲把铅印的《文学社》简章分发给大家：“今天是文学社成立大会，简章无革命字眼，只是研究文学，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以前的学社被敌人侦破，但我们从不放弃革命，如今重整旗鼓，以研究文学为名，争取同志，总有一天，我们要把新军变成革命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端营主义’。以后，《大江报》便是我们文学社的机关报，欢迎大家多多投稿。”蒋翊武接过话题：“今年说不定会有革命发生，我们方略已定，急应开展活动，一日有事，不致坐失良机。”简章规定文学社设正、副社长各一人，下设文书、评议两部。文书部又分设文书四人，会计和庶务各一人。评议部设评议、纠察若干人。大家公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刘复基为文书和评议部长。于武昌小朝街设总机关，并在汉口、汉阳等地成立分机关。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

字为纲领。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开展活动，通过新军各标、营代表掌握武装。以出版《大江报》进行公开宣传。吸收社员达5000余人，多属新军士兵，也有少数官佐参加。

文学社能够如此发展，与胡瑛的指导有关。蒋翊武经常去狱中征求胡瑛的意见，胡瑛与同盟会会员有着广泛的联系，蒋翊武也就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和帮助。

至于共进会，前面说过，它是在东京成立的。1907年春，黄兴离开东京时，要刘揆一代理他的同盟会庶务职务。刘揆一打算从各省吸收秘密会党成员和革命者加入同盟会，他把这项任务交给同盟会云南主盟人吕志伊去办理，但吕志伊不久回国，这项工作被搁置。其后，热心这件事的同盟会会员、四川籍人张百祥，同盟会会员、湖南籍人焦达峰，同盟会会员、湖北籍人刘公，以及日知会成员孙武等人发起，于当年8月成立共进会组织，目的是谋求革命党人合作，策划长江流域起义。他们拟定法规10条，推张百祥为会长。

张未就任，即改推邓文辉担任，次年刘公继任会长。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它的纲领同同盟会的纲领几乎一样，只是以“平均人权”代替了“平均地权”。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会党中吸收会员，发展组织。1909年又在武昌设立共进会总部，联络长江下游各会党，统一行动。同年焦达峰在长沙建立共进会组织，邓文辉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并在上海、岳州等地设立通讯机关。

以新军会员编成七军，以会党编为三镇，推刘公为大都督。

共进会拥护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兼任共进会最高领导，谭人凤曾被列为共进会会员宣誓的监誓人。

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以及其他一些两湖革命志士，开始集中注意力于长江流域，特别是武汉地区。为了指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需要组织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同盟会在国内本来就准备设中部支部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和胡汉民情绪沮丧，与外界暂时隔绝，孙中山则像往常一样居留海外。因此，同盟会中部地区组织，便由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建立起来。

宋教仁字遁初，又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生于湖南桃源。17岁入漳江书院读书，喜政治、法律、地理诸学科。21岁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议论时政，渐萌革命思想。

次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在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任文书。参加长沙起义，领常德一路起义军响应，事泄，遭清政府通缉，逃日本，入法政大学，继改入早稻田大学，仍习法政。1905年同程家桢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并参加同盟会筹备会。同盟会成立时，任司法部检事长。同年被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次年，黄兴去安南，指定他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的工作。1911年1月初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揭露清廷腐败，反对外国侵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4月赴香港，参加筹备广州起义，任编制课长。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地区总会，被举为总务干事，筹划在南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

中部地区同盟会设会长一职，经过深思熟虑，公开表明“虚位待贤”。

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宋教仁、陈其美等为总务干事。

中部地区同盟会成立后，由谭人凤负责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负责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负责组织四川分会。

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空前活跃。在湖北，居正和孙武热情工作，但到4月中旬，谭人凤给他们的活动经费已用光。正在经济困窘的时候，共进会会长刘公来到武汉，情况有了好转。

刘公名湘，字仲文，1881年生于湖北襄阳。21岁东渡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并为《民报》出版捐赠巨资。萍浏醴起义，回国谋响应，失败后复往日本。共进会在东京创建时，他起了重要作用。1910年秋，他回到鄂西北的家乡。1911年夏天，父亲给他一笔巨款，让北上京城纳粟捐官，当他在省城露面时，同志们便劝说他留在武汉起事，又推他做湖北都督。他慨然将5000两银子捐出作为革命经费，此是后事，暂且不表。

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了。而在联合问题上的困难是：两个组织争夺领导权。虽然某些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文学社，但是，这两个组织的领袖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和才能。

共进会的领袖们全部是留日学生，又是同盟会会员，同中部地区同盟会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文学社的领袖们及其成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虽说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是同盟会会员，但除刘复基外，蒋翊武和他的同志们都从来没有出过国门。蒋翊武与同盟会有些联系，但他们主要是通过胡瑛同全国革命志士取得联系的。文学社的社员，几乎全是湖北新军士兵。其中有一些人有学识，但没有一个人具备同盟会领袖们所具备的领导才能。

从实际力量来说，文学社胜过共进会，它的成员遍布湖北新军的各个单位。但是，共进会的领袖们具有更高的威望，因此，蒋翊武对于联合共进会颇有疑虑。

刘复基被推为文学社评议部部长后，便同蒋翊武商量：“现已找到小朝街85号楼上做文学社机关，我们两人早晚要有一人出来主持机关。”刘复基遂设计退出军营。这一天却是号称“小诸葛”的刘复基在协司令部大门站岗，一个标统走过来，刘复基故不举手敬礼。那标统停步训斥：“为何不敬礼？”刘复基道：“部下一时眼花，未看清长官。”标统大怒：“目无长官，罚跪半小时，跪下！”刘复基下岗遂写了退役报告，称有眼疾，久医无效，不宜在营中服役。呈递队官，队官有心爱护他，认为复基在军中颇有前途，不批出营。刘复基恳请，队官只好割爱，呈送营管带。管带说复基扯谎，却要亲验。刘复基固求，亦得批准。

刘复基急忙解装出营，去理发店剪掉辫发，提了行李来到小朝街85号坐镇机关。

5月11日那天，共进会会长孙武派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邀约刘复基等到长湖堤处所，共商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事宜，均认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当此之时，极宜风雨同舟。讨论联合的具体问题时，杨玉如建议：共进会给文学社以经济援助，但需由孙武出任文学社社长。这建议即出，顿觉气氛紧张，如此遂罢。

孙武加紧同文学社进行联合，改派共进会马队代表陈孝芬去找刘复基等商谈会社联合问题，因陈孝芬同蒋翊武、刘复基均有私谊。

陈孝芬找到蒋、刘二人，陈述起义时机成熟，应有统一号令，孙武诚

心合作等等。

蒋翊武道：“合作当然很好，只是那些留洋的长衫人物，会叫我们上当，那孙武领袖欲特强，恐怕不好相处。我看还是殊途同归的好。”陈孝芬道：“此时正是同归时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万一暴露，清廷决不会偏爱哪一派革命党。清廷不去区分会社，我们自己何苦去孤立自己？”刘复基见陈孝芬说得有理，说：“慢慢来吧，文学社端午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希望你能来陈述意见。”端午节这天，文学社果在“同兴酒楼”开会，到会者70余人。大家都赞成文学社与共进会加强联络，推刘复基为联络员，安排蒋翊武同孙武面谈。陈孝芬建议：可约孙武来文学社见面。

既是会员又是社员的彭楚藩、蔡济民等人，更是鼓动蒋翊武去同孙武见面。蒋翊武以示主动和礼貌，便同刘复基一起往孙武处拜访。

他们见面很是礼貌，略作寒暄便谈正题。蒋翊武道：“我们文学社在军营中力量很大，合作是可以的，只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孙武急忙道：“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是中部地区同盟会的组织，与长江流域各省都有组织关系，在本省的力量也很大，人数超过文学社，联合后，共进会当然居于领导地位。”二人随即争将起来，各不相让。

刘复基双手微微摆动，示意他们不必再争，道：“今日是谋合力反清，为何比较实力呢？”蒋、孙顿时语堵。刘复基便打圆场：“以后慢慢谈吧。”刘复基、彭楚藩、蔡济民等人商量，必得找一个妥当办法，加以联合。这身材高大的彭楚藩原名潭藩，字青云，湖北鄂城人，20岁入湖北新军，结识刘静庵，加入日知会，被推为评议。不久，日知会被侦破，易名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充宪兵，递升正目，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辛亥年初，先后加入文学社与共进会。那蔡济民是湖北黄陂县人，18岁投笔从戎，后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肄业，任司务长，再升排长，素怀革命大志，交游甚广，颇有号召力。文学社本想选他为副社长，他坚辞副社长职，甘当一名普通社员。

这一日，谭人凤回到武汉，便同孙武、居正等人见面。孙武等请求谭人凤留鄂主持大计。谭人凤对起义屡次事败，已经心灰意冷。听说运动新军有很大成绩，开始相信湖北党人的事业。孙武道：“不要小看我两湖同志，非得做番大事，让孙、黄看看。”谭人凤要去狱中探望胡瑛，商谈湖北革命大计。

胡瑛见到谭人凤，喜出望外。恰好蒋翊武等人亦来探望，便向谭人凤介绍，此是文学社社长，等等这般。

谭人凤见那蒋翊武虽穿军装，却是土头土脑，其他一些文学社中之人，亦毫无惊人之处，不觉少言寡语。蒋翊武本久仰谭人凤大名，极想攀谈，见谭很是冷漠，便即告辞。

蒋翊武等人离去，胡瑛望着谭人凤道：“先生不可以貌取人，文学社同志多是肝胆相照的质朴之人，军中社员已逾3000，此几位都是文学社的领袖。”谭人凤即觉错失交臂，作跌足失悔状。

胡瑛道：“先生不妨去《大江报》了解文学社详情，结识群英。”谭人凤性情急躁，辞别胡瑛，即去《大江报》，会詹大悲。坐定稍谈，那蒋翊武等便破门而入，他们来找詹大悲倾谈与谭人凤相遇，受冷落之情。这谭人凤早已变得热情奔放，急忙起身，向前一步抓住蒋翊武的双手：“刚才多有失礼，老夫目不识英雄，原谅则个。”蒋翊武见状，那点怨气顿时云散，不由

得一股热流传遍全身：“文学社加上共进会力量，进行武昌革命，甚是稳当，唯是举事之后，缺乏主持大计者，恳请先生与黄克强、宋教仁诸位来鄂领导。”谭人凤紧紧握住蒋翊武的双手：“这两湖形势实是令人振奋，我当回沪邀黄、宋来鄂，惟愿文学社与共进会携手并进，为天下倡，此是革命成功希望所在。”谭人凤几日后便返回上海，向宋教仁备述两湖形势，宋教仁却也振奋，加紧组织中部地区同盟会，决定于 1913 年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起义，谭人凤函告居正等人，湖北党人得这项消息，颇感高兴。

这一天，章太炎弟子、名士黄侃从京来汉，在《大江报》同居正相遇，便商谈北京各类新闻，尤其是清朝皇族内阁成立，立即宣布铁路“干线均归国有”的内幕，及湖南、广东、湖北、四川四省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斗争最为激烈，已发生了全省性的武装暴动。天下将要大乱，革命党应乘时而起，云云。那副主编何海鸣听来很是鼓舞，便设酒肉相待。黄侃微醉，何邀黄为《大江报》写篇政论文，黄侃起身：“待我写来再饮。”即挥笔落纸，一气而就：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绝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长日为年，昏沉虚度，痛饮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将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致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女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写毕，收起笔墨，将稿付于何海鸣，继续饮酒。

何海鸣读罢，一拍大腿，大叫一声：“妙文！”即交詹大悲定夺。詹大悲亦是叫好，即命发排。

不料，这篇妙文在《大江报》刊出，却引出一场轰动全国的报案来。

巡警道王履康发现该文，即密报湖广总督瑞澂：“卑职近查《大江报》馆职员均系剪发辫者，行迹可疑，今又发现《大江报》刊行这篇乱文。”瑞澂对《大江报》鼓吹粤汉铁路保路风潮已积有宿怨，决计巡警道前往查封，传下话去：“《大江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应即封闭永禁发行，并传撰稿人、编辑人等交审判厅照律究办。”这天夜晚，巡警队包围《大江报》馆，数十名巡警和赤膊打手闯进《大江报》馆。

撰稿人黄侃已乘轮船东去，何海鸣去租界戏馆看戏未归，那詹大悲不知祸之将至，应传归来。

詹大悲一看报馆被封闭，即令报馆人等将须用物品搬出。

巡警打手把詹大悲押到审判厅，已是深夜 12 点钟。检查厅立时起诉。法官要詹大悲将副主编何海鸣交出，大悲道：“我是发行兼编辑人，一切责任均由我承担。”法官无奈，令将大悲押赴看守所，次日再审。

何海鸣闻报馆被查封，大悲被关押，有苦无处去诉，遂向全国报界发出通电求救，汉口报界即开公会递公呈，要求释放编辑人。审判厅不听，再讯詹大悲，问乱文是何人所作，大悲仍是一人承担。法官便问：“登此政论，是何用意？”大悲道：“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警觉，故出此激忿之语。”法官道：“你这政论文中有‘和平改革之路无望’一句，明明是淆乱政体，扰乱治安。”大悲道：“试问立宪之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法官无语对言，若要将其释放，又不敢做主，报由督院拍板定夺。



督院岂肯了结，遂要审判厅判詹监禁一年半。何海鸣亦被抓获，与詹同案被判。

武昌新军中同志群情激愤，都想早日发难，坐镇小朝街机关的刘复基急去各营，安慰同志，要冷静慎重。但组织发展已有相当规模，又无法收缩，宜早日大举。

6月1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等人聚集在小朝街机关，研究起义。

彭楚藩忽然来到：“情况紧急，清政府急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瑞方带领鄂军兼程入川，除第31标及第32标一营随瑞方入川外，第41标一营开宜昌，二营开岳州，马队8标开襄阳，第19标三营开郢阳，限令7月20日前出发。”刘复基道：“若是翊武将要去岳州，一部分新军同志也要随军调走，兵力一旦分散，干部随队出发，起事很是难办。”却是如何应急？众人面面相觑。

彭楚藩道：“能否乘机起事？”复基道：“先无准备，也未同共进会达成协议，怎能起事？”彭忿然作色：“为何与共进会总是不能联合？既然是宗旨一致，如此这般，恕我直言，就是湘鄂两派在争领导权！”复基道：“我提出一个方案，刘公、孙武、蒋翊武均不担任都督，他日有德者居之，若何？”众人觉得有理，即令刘复基去共进会联络。又决议，蒋翊武随军离开武昌后，机关社务由王宪章、刘复基分担，一旦武昌起义，调防各地的同志立即就地响应。

彭楚藩再把新军调动消息告诉孙武。孙武更是着急，便派邓玉麟与刘复基商谈，彭楚藩、蔡济民从中撮合。遂定军政大权由蒋、孙分担。

孙武却觉对刘公应有安排，共进会曾推定他当湖北都督，现在缺少起义经费，还期望他设法筹款。

一日，杨玉如探得消息，遂告孙武，刘公家里汇来5000两银子，而款到多日，刘公却密而不宣。孙武大怒：“他不仁，休怪我不义，必定设法把它弄来。”孙武遂将彭楚藩找来，请彭带宪兵中同志，以搜查为名，把刘公的汇票弄来。彭楚藩觉得都是同志，不必大动干戈，他便另设一法。

这日晚间，彭楚藩同共进会李作栋登门拜访刘公。略作寒暄，彭楚藩道：“有一事相告，我从宪兵营探得情报，有襄阳某人汇来汉口5000两银子，官厅已加注意，不知此款与您是否有关？”刘公大惊：“不错，我刚接到汇款，尚未取来。”楚藩道：“听说您将携款纳官，不知然否？”刘公作色道：“纳官是家父主意，我借纳官向家中索款，以作革命经费，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嘛！”彭楚藩道：“如此甚好，请把汇票交来。”刘公道：“顶好还是由我管着，当用则用，当缓则缓，何必如此着急？大家都是共谋革命，我管又有何不可？”彭楚藩满脸怒气：“怪哉，你把钱抓住不放，莫非真是要去北京捐官不成？”彭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革命方略》，又道：“这是在你处发现的，我就拿它告官，你所捐的红顶子乌纱帽我先拿来戴戴。”李作栋忙劝解道：“刘公当然有权过问，汇票当由谁管，可请几位同志商量，不必争执。”刘公道：“不在谁管，这钱我应该监督，以免滥支。我现在就把汇票交给你们。”彭楚藩笑道：“作栋是共推的理财部长，汇票可由他管。”

5000两银子可兑7000块银元，革命经费有5000元就行，其余2000由你花用。刚才鲁莽，请见谅。”刘公却也不计较，双方重归于好。

## 第八章 辛亥枪声

刘复基、邓玉麟、杨玉如等人商定，共进会和文学社领袖们在刘寓所召开联席会议，推刘公主持会议。

刘公俟诸位落座，即道：“诸位，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今天商讨联合大事，有何高见，请发言。”孙武起身道：“在我们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努力下，武昌革命时机已到，实在应该动手了，但只有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成一体，才能取胜。”刘复基道：“现在革命形势已到紧要关头，为了精诚合作，应暂时放弃文学社、共进会团体名称，大家皆以革命党人身份参加革命。”刘公亦起身道：“本人以为，不光团体名称放弃，就是从前所推职务亦应作废。比如我自量就不能胜任那大都督，指挥起义军，恳请大家另推贤能。”蒋翊武、王宪章亦表示辞去文学社社长、副社长职务，以示取消两团体，共作一个大组织，听命于联席会的决定。

杨玉如等提出，两团体领袖都取消头衔，必得推一主帅，不然，那就群龙无首，成为乌合之众了。众人甚觉有理，便在刘公和蒋翊武之间推选主帅，二人固辞。遂决定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武汉主持。即决定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邀请主帅。孙武建议他们带上 1000 银元购买手枪和子弹，以便起义时供干部们使用。

居正、杨玉如赴上海，向宋教仁、谭人凤报告联席会议决议，得到他们赞成，即电告黄兴，邀他由香港返上海赴武汉共谋大事。

湖北新军果有调动，那蒋翊武随军开往岳州。一部分革命力量随军调走，使革命党人力量削弱。但同时也导致湖北腹心地区——武汉反动统治的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

9月24日，刘复基、刘公、孙武等人召集共进会、文学社要人举行联席会议，60余人到会，蒋翊武赴岳州未归，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向大家介绍两团体合并情形。清朝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变，急应乘机起义。

大家积极赞成起义，遂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并通知焦达峰，希望他在湖南同时发难。

大家根据刘复基草拟方案，及事先商定的协议，作出革命领导机关军政府人员名单的决议：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总参谋长孙武；参议部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内务部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等等。

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布起义作战方案，及发动与攻击步骤、各部队所担负的任务等等。离起义的日期还有 12 天，要求抓紧时间准备，众人欣然应命而去。

湖北常备军有一镇一混成协，那一镇是以张彪为统制官的第八镇，那一混成协是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 21 混成协。黎元洪还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且管理兵工、钢药两厂。张彪兼任湖北讲武堂总办，黎元洪兼任讲武堂会办。

张彪位居湖北军官之首，他自幼酷爱武术，18岁中武举人，后中武进

士。张彪系旧派将领，没有进过近代化的军事学堂，是凭着多年跟随封疆大臣张之洞，受到宠信而身居高位的。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20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读书用功，遇事勤勉，擅长轮机驾驶技术，且善骑术。待人朴厚，有长者之风，学友视为兄长。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舰队主力舰上，参加甲午海战，他所在的铁甲舰被日本海军击中，他在海上漂泊3个多小时，被人救上岸来，逃到天津，因战败船毁被惩，监禁数月。获释后到上海谋生。闻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招募海军人才，毅然去南京投奔张之洞。张之洞询问他关于海军建树和营建防御工程意见。黎倾其所学，思虑周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张大为赞赏，扭头对其身边的官员说：“黎先生是我长期以来才遇到的一位非常可靠的干才。”张又见他厚重寡言，宽裕能容，便亲手书写“智勇深沉”4字赠之；并委任他监修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诸炮台工程。

黎元洪通过修建炮台，给张之洞留下印象：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且又忠实笃厚，是难得的可贵人才。黎受到重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又把他调来湖北，希望他在湖北新军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于是连续3次派他赴日考察军事。

黎元洪逐渐成为湖北新军中令人瞩目的军事人才。从1896年至1906年的10年间，黎元洪以营帮带而升至协统，并曾兼护镇统制，军阶由都司升至副将。

1907年9月，张之洞奉调入京，补授军机大臣，以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

赵尔巽素知张彪从前进身之历史，颇看不上眼，便欲以黎元洪取代张彪位置，黎闻讯力辞，并对赵尔巽说：“公强逼我，我将并此末秩而弃之。”赵尔巽见他语气恳挚，不忍相强，只得作罢。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爱兵”著称，他律己严，对士兵则较为宽容。他为人不慌不慢，老谋深算。黎元洪不但在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中赢得一定威望，而且在军队以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人望。连革命党人也觉得同他易于合作。居正曾说：“元洪廉洁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士，众望归之。”但是，黎元洪毕竟是清廷湖北新军副将，他曾多次奉命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1906年底，他率步队6营、炮队3营去湖南屠杀萍浏醴起义者；1909年又带兵去淝阳芦林湖，残酷屠杀饥民；1910年黎奉命率“六楚”、“四湖”舰艇，去长沙镇压参与“抢米”风潮的灾民。

湖北一些新军将领，往往对查讯潜伏新军内的革命党并不那么认真。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一旦查出部下有革命党，他们自己也会因防范不力而影响官运。再者，新军中革命党很多，同情革命的更多，如果采取过激手段，会激起众怒，酿成巨变，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除了这些顾虑之外，还因为他平素喜爱文化人，有些文化人在他们的革命党身份暴露以前，已经同他有了交谊，所以处置更为温和一些。

1903年，刘静庵投入湖北护军马队1营当兵，得该营管带黎元洪爱重。次年，黎升护军前锋4营督带，刘随至先锋营，并升为护弁，帮理文件。刘参加科学补习所，并积极筹划响应黄兴预谋的长沙起义，恰值黄兴自长沙来信联络，不幸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大骇，立即报与黎元洪。黎闻后，嘱刘静庵以有病为名辞去军营职务，并将黄兴来函销毁，此乃刘万幸也。刘静庵离营后，又积极组织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廷侦破，被捕入

狱，坚贞不屈，死于狱中。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数愈益增多，清廷对革命党的防范愈益加紧。

黎元洪对自己部下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两条原则：对下，坚决清除“隐患”；对上，瞒天过海，敷衍了事。

振武学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杨王鹏和李抱良，都是黎元洪所辖41标的士兵。由于振武学社发展很快，事为黎元洪侦知，遂传唤1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亦为振武学社社员）斥责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胡若罔闻？”潘康时道：“程度稍优之士兵，常集合研究学术，实无会党情形。”黎怒斥道：“革命党作法，现尽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耶？”于是下令将潘撤职，委派亲信施化龙为队官。

施上任后，对杨王鹏外松内紧，示谦和，阴结行间最服从者，充彼密探。不到3个月，搜集许多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材料，密报黎元洪。黎对施化龙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办理。”于是将振武学社的杨王鹏、李抱良等4人开除。对于潘康时，黎令潘的上峰，即管带戴寿山写一份假报告，诬潘吸食鸦片，呈请撤差了案。把这一政治事件掩盖了过去，保全了潘康时、杨王鹏等人的性命。

黎元洪之所以没有滥杀潜伏在自己部队中的革命党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他清楚地看到，清朝已是风雨飘摇的破船，他不得不窥测方向，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在客观上却缓和了他同革命党人的矛盾。

1911年10月初，清廷湖北当局和革命党人都进入临战状态。这段日子里，黎元洪忧心忡忡，他不赞成瑞澄、张彪的高压政策，唯恐会激起众怒，惹出大祸。但他因长期受张彪排挤，且到任未久的湖广总督瑞澄对他也极不信任，所以处世惟谨，对防务大计，更不敢多言，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防务措施上，提出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

10月2日，瑞澄召张彪、黎元洪、铁忠秘议，策划武汉防卫。次日又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防务会议，武官管带以上，文官司、道以上参加会议。会场气氛十分紧张，瑞澄说他已得到秘报，革命党定于中秋节举事，他问在座文武官员，应该如何部署防务，加强防范？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武昌城里顶要紧的地方是楚望台，因为那里是湖北总军火库。一旦有失，大局将不可收拾。”张彪问是哪部分队伍在守楚望台，有人告之是工程第8营。工程8营代理管带阮荣发，便从袖口中掏出一份工程8营的革命党人名册来，报告营内革命党人最多。

张彪大怒，打了阮荣发一个大嘴巴，责其治军不严，并夺过名册，立即撕毁。阮荣发没有想到，不但在工程营有革命党人，其他各部，甚至与会者中间可能也有革命党人，他当众揭发，反而会打草惊蛇。张彪毕竟老奸巨猾，当众撕毁名册，可暂时稳住革命党人。

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30标1营旗籍兵士替换工程第8营兵士守楚望台军械库，免生意外。

黎元洪表示反对：“我楚人素多谣，吾人今宜处以镇静。谈革命者，不自今始，余亦不能保其必无，如革命党果多，则鄂事难料，少数旗兵，何济于事？满、汉界严，始有革命，今以旗人换守军，民多误会，反为革命所乘，藉以煽惑。据余管见，工程营兵多武黄子弟，多有父母妻孥在近，而前营长李克果，感情颇洽，不若仍以工兵专守，添派李前营长监之。”张彪也不以

铁忠的话为然，因为工程 8 营隶属他第 8 镇之下。又不欲受人指摘，于是遂从黎议。

又经会议讨论，决议派李克果、参议厅工兵课长及课员成炳荣、马祖荃、张策平、刘绳武诸人，常驻军械库，协同阮荣发带领工程 8 营守楚望台。

瑞澄在会上张牙舞爪地宣布了防务措施，诸如各城门加派警士，早 7 时开，晚 6 时闭，夜间行人无通行证者，不许通过；旅社、客栈一律细密检查；命令各标、营、队官长，设法劝导士兵，如受革命党欺骗，倘若觉悟，不咎既往；密令检举革命党人，确认形迹可疑者，即格杀勿论。他规定实行弹械分离，收缴士兵子弹。

瑞澄把武汉城播弄得阴霾满天，用加强警卫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他的督轅大量增加守卫之兵。还特别饬令第 21 混成协所属第 41 标 1 营士兵逡巡宾阳门外一带，黎元洪亲率本协步兵逡巡武胜门及塘角沿江一带。但瑞澄还不放心，又在长江中的兵舰上设置行辕，夜间宿于其中，以备有事逃跑便利。

张彪、黎元洪也加倍小心，为收买士心，对守卫各军每日均有赏赉，中秋节每人赏钱 2000。按军营旧例，中秋节应放假停操，兵士可请假回家过团圆节。此时风声吃紧，特规定停止中秋请假。处事谨慎的黎元洪特传令混成协各标、营、队于中秋节的前一天一律置备酒肴，庆祝中秋。中秋节那日照常上操，禁止请假，以防趁人众闲散之际，酿成巨变。

到了中秋节这日，武汉三镇居然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气氛中，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使清朝湖北官吏大出意外。

其实，这并非湖北官吏震慑住了革命党人，而是武汉革命党人因南湖炮队事件的惊扰，以及派赴上海请黄兴等主持大计的代表未归，而将原订中秋节起义的日期往后拖延。

武昌革命党起义的时间订在中秋节，士兵们都很受鼓舞，便有人沉不住气，露出马脚。那炮队中有几名士兵退伍，却是共进会同志，炮标共进会代表孟发臣便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那值日的刘排长便过来干涉：“不许喧哗！”饮酒的人已有酒态，又是人多势众，便骂道：“婊子养的，找老子麻烦，到时候要你好看！”刘排长听出话中有话，便去报告管带。管带即传孟发臣等，喝令跪下，重责军棍。

营中共进会员甚众，发一声喊，便暴动起来，将营部砸烂，抢了军刀。管带人等惶惶而逃。孟发臣等遂高叫反了反了！去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再去弹药库搬炮弹。库门上锁，又撞库门。

炮队标统忙报告第 8 镇统制，张彪令马队就近弹压。

炮队闹事者 20 余人当即逃跑，马队士兵亦多是党人，磨磨蹭蹭装作追赶不上，听任逃去。

孟发臣仓皇进城找孙武报告，请求即时发难。孙武遂邀请刘复基商量，复基沉吟良久，道：“各军尚无充足准备，似难成事，可由发臣回南湖营盘察看，如果大家已经大举，即通知各军响应，如仅是少数人暴露，赶快避去，不坏大局。”孙武表示同意。所幸闹事人等已经逃跑，炮队营队官亦怕因此得咎，以“酗酒闹事”开革数人，敷衍上峰。

孙武因为局势紧张，同刘公夫妇等都搬到俄租界去住。

革命党总部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孙武留学日本时学会制作炸弹，他便同邓玉麟等日夜赶制炸弹；刘公与李作栋等在印好的中华银行钞票上盖章，拟定起义后各机关接收事宜，预拟军政府文告与致驻武汉各国领事照会，绘

制起义旗帜：18 星军旗，代表 18 行省。

10 月 9 日这一天，孙武制造炸弹，所用硫磺将尽，即着邓玉麟上街去买，恰这时，刘公之弟刘同，叼着纸烟走进来。刘同并非党人，但由于是刘公之弟，也经常参预一些活动，对革命党务机关都很熟悉，也经常来看孙武做炸弹，很有兴味。这刘同大大咧咧，那嘴上的香烟火星进落在炸药盘中，霎时闪烁蓝光，轰隆一声爆炸，地动山摇，孙武顿时炸得一身焦黑。刘同吓得飞逃，楼下李作栋闻声上楼，见孙武兀自站立，忙用长衫裹了头脸，即送日租界医院抢救。

俄巡捕听到爆炸声，即吹警笛飞奔而来。机关中人各自逃去，巡捕登堂入室，不见人影，炸弹数十赫然在目，忙室内搜索，把革命党人名册、文告、18 星旗帜、袖章、印信等全部查获。因名册中的刘公一家，新近搬来附近，遂去搜捕，将神色慌张的刘同等一并逮去。

邓玉麟外出归来，见巡捕已将巷口守住，便混在人群中探听到切实消息，即过江往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却在途中遇到逃出人等，确知孙武被炸送往日租界医院。

小朝街总指挥部里，刚刚从岳州回来的蒋翊武同刘复基等人正说着话，邓玉麟进来便把汉口机关失事情况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彭楚藩却又急匆匆赶来，说那刘公家被捕人等，已被引渡中国官厅，转押总督衙门了，都说那刘同年少无知，一经大刑必然招供，且文件名册已经被搜去，这便如何是好？刘复基道：“只有立即发动今夜起事，不能等死。”蒋翊武踌躇半晌，跳将起来：“就是这样！”便起草起义命令：“南湖炮兵今夜 12 时放炮为号，城内外闻炮一齐动手。”杨宏胜正好进门，拿出藏在竹篮里的子弹，却是邓玉麟让他从军械所朋友处买来的。

邓玉麟便把提前起义因由告诉他，叫他一道去工程营传送命令并交子弹。这命令便分头送住各营。

刘同等已在督署关押，瑞澄即命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审讯。刘同被带上堂来，看到堂上刑具侍候，早是腿肚打抖，一经刑讯，果然经不住，就把武昌小朝街等处机关一一供出。铁忠忙报瑞澄，瑞澄且惊且喜，即令关闭武昌城门，着警察满兵等搜捕革命党，并下令截断武昌和汉口、汉阳间的交通。

邓玉麟刚把城内命令送大营盘，再出门去南湖炮队，各处城门已关，且有兵搜身盘问。无法，只得把炸弹子弹等物抛在水沟中，待混出城去，到达南湖，已近半夜，翻墙入营，唤醒同志，口头传达起义命令，炮队同志道：“毫无准备，今晚举事已不可能，况且没有步兵掩护，夜间炮兵很难行动。”邓玉麟无奈，只得权且住下。

杨宏胜给工程营送去了起义命令，往而复返。他携了炸弹，又来工程营给熊秉坤送炸弹。方才去传达起义命令时，工程营需要炸弹。到营门处，却有人突然窜出阻拦，杨宏胜只得逃去。原来这杨宏胜却是开了个杂货店做为革命机关，此时亦已被刘同供出，杨宏胜方归，即有军警闯入，杨宏胜被促。

彭楚藩探得消息，即去小朝街向刘复基、蒋翊武报告。众人却也无奈，便在灯下等候那南湖炮响。

张彪亲率巡防兵、督院卫兵数十名，至小朝街围捕党人。

蒋翊武等人忽听院外门响，却是木棍捣门声，知道不妙。

蒋翊武摸出一颗炸弹，道：“大家不要慌。”刘复基摸出两颗炸弹，抢前一步：“我来对付，你们快走！”哗啦一声，大门被砸开，刘复基大叫：“你们等死吗？赶快掀瓦上房！”他边说边向楼下冲去。

敌人已闯进院内，刘复基扔出炸弹，却未爆炸，再扔出第二颗，也没爆炸。楼上又抛一颗，却也未炸。原来没有装上导火管，敌军再无畏惧，一轰而上，将刘复基捉住。

楼上3人便只有破房而出。跳下巷去，便有警察冲上，彭楚藩忙道：“我们是捉人来的，我是宪兵。”那巡防兵细瞧，果是宪兵，便要放行，不料有个瑞澄的亲兵在场监视，却将彭楚藩、牟鸿勋捆起，再捆蒋翊武，蒋叫起屈来：“我是看热闹的，捆我干么事？”那些兵弁见蒋翊武长辫乡巴佬模样，不像革命党人，略一犹疑，已被蒋翊武挤进围观人群逃跑。这里彭、刘、牟三人即被押赴总督衙门。被捕者还有杨宏胜等30多人。

当夜，瑞澄命令组织军事法庭会审，以参议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为主审，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瑞澄亲临指挥。

铁忠等便升堂，令先提彭楚藩。铁忠问道：“你可是彭楚藩？”“老子便是！”铁忠却又犹豫，想那宪兵营管带果青阿是自家亲戚，如宪兵营出现革命党，于果青阿很是不利，便道：“你不是宪兵吗？为何将你捉来？”彭楚藩直认不讳：“我正是革命党！”“你是宪兵，为何盲从革命党？”“拿纸笔来！我写给你看！”铁忠便命衙役端上笔墨纸张。彭楚藩就灯疾书，写毕，由衙役呈上铁忠，三审官传阅供词：

余乃大汉黄帝子孙，立志复仇，誓与清廷不共戴天。

予非革命党，谁为革命党？……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袋裔，皮骨仅存。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腆颜曰：‘宁赠友邦，弗与家奴’。我炎黄子孙不忍见我民族沦亡，特伸革命救国之大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非尔等若冥顽不灵，亦当从速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惟尔等图之。

三审官相顾失色，铁忠拍案狂吼：“你竟敢诽谤朝廷，罪该万死！”彭楚藩亦高叫道：“革命党岂会怕死！”铁忠提笔写了旗标：“谋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刀斧手即押彭楚藩赴刑场，彭楚藩边走边呼：“轩辕黄帝万岁！国民革命万岁！”铁忠便审刘复基、杨宏胜等人，那刘、杨亦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召唤同胞起来革命，慷慨就义。

陪审官陈树屏因见被捕者和搜获到的党人名册上，尽是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怕因此酿成巨变，主张从宽处理，只办刘、彭、杨三人，并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遭到铁忠反对，瑞澄更坚决不允，要根据党人名册，按图索骥，把武汉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次日晨，瑞澄召张彪、黎元洪，命令立即按名册继续大搜捕，不使一人漏网。黎元洪也见名册上革命党人数过多，恐酿巨变，请求瑞澄，别图处理，庶可消祸于无形。瑞澄怀疑黎元洪有贰，严词申斥，黎不敢辩，喏喏而退，未至协本部，经返私第。盖明知兹事，穷极追究，必有意外之虞也。

瑞澄即派张彪率警宪到各革命机关、兵营、旅栈、学社和交通要道搜捕党人。

这天上午，又有30标排长张廷辅等一批革命党人被捕，于是军心动摇。

正午，瑞澄又召集军管、巡防、水师及各机关长官参加军事会议，谓

革命党谋反叛逆，反对我朝，非搜杀尽净，不无后患。特责成部署严为防备，尽力搜捕，以绝其根株为要。

铁忠又命派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阳奉阴违，违者必究。

于是继续大搜捕，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各营士兵不许出营房一步，官长领弹携枪守在各排出口，武装巡查各棚，甚至士兵大小便均令以痰盂盛之，不许外出，气氛极为恐怖。

革命机关被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捕，瑞澄欣喜若狂，当天即向清廷发电告捷，并为其部下报功：“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工程8营正目、革命党人营总代表熊秉坤，昨日接到邓玉麟、杨宏胜送来命令与子弹。

熊即密传同志，闻炮起事，因子弹大少，只能择最勇敢同志每人两粒，自留三粒备用。

入夜，军营忽然紧急戒严，不许士兵出棚，一个巡逻的护兵朋友密报熊秉坤，那杂货店老板杨宏胜被捕。次日清晨，又听说刘、彭、杨三人已成烈士。忙派可靠同志设法出营探听，获悉五处革命机关均已破坏，巡防营已在工程营左右成包围之势，铁忠着工程营代理管带阮荣发，按名册捕杀工程营党人380余名。

熊秉坤暗自琢磨：到这个地步，再不死里求生，就太窝囊，手中有枪，何不果断行动？遂将工程营内可靠同志召集起来，道：“奉起义机关命令，由我们工程营首先发难，我们营正是防守军械所，各营响应后都要来领取子弹。”众人默不作声，秉坤看出大伙有点胆怯，高声道：“我们是不得不发，大家听说昨天捕杀革命党没有？我们的名册全被搜去，正按名捕杀，不反亦死，反亦死，为什么不死得轰轰烈烈？”便有那前队代表徐少斌道：“熊哥说得对，大家拚命向前，革命未必就不成，如果坐以待毙，就不是我们革命党所为了。”众人便跃跃欲试，便定当晚行动。只是为子弹发愁。原来昨晚发的子弹，各人害怕搜查，便都抛弃了。

这天中午，却是大雨不停。熊秉坤弄到出入营盘的腰牌，到15协30标、29标的党人接洽起事，回到班里，恰有一位党人士兵问他：“熊代表是否要子弹，我哥哥从外地当兵退役，带回几盒子弹，可以取来一用。”又有一位党人士兵从排长处偷来两盒子弹，熊秉坤大喜。

时至晚7时，又逢熊秉坤所在棚值班守卫，即给各同志发下子弹两粒，沿本营四队巡视营房，见同志都已欲动。忽听二排那边鼓噪，急忙端枪往巡，却是二排长在查问革命同志金兆龙：“为何擦枪？”夺过枪去，又见枪中有子弹，喝问道：“你要造反吗？”金兆龙大叫：“老子就是要造反！”遂扭打起来。金兆龙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便有一同志用枪柄猛击那排长，那反动军官便要逃去，却值熊秉坤赶到，对着那排长，便是一枪。

这便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

## 第九章 “俘虏”都督



1911年10月10日晚8时半，熊秉坤率领第8镇工程8营后队革命党人首先发难，起义士兵便都持枪在手。代理管带阮荣发督率少数军官闻讯来堵，又放枪威胁，打伤两个同志，起义士兵遂开枪打倒阮荣发，其余军官便都逃窜。熊秉坤集合起义队伍直奔楚望台军械所，那守卫楚望台的工程营左队革命士兵马荣等立即响应，便设法打开库门，取出子弹，分发士兵。这熊秉坤率队前来会合，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

熊秉坤遂以总代表名义命令：“本军是湖北革命军，即以楚望台为大军营，金兆龙马上带兵去接应南湖炮8标，并掩护进城，然后进攻总督署。”临时参加起义者甚众，出现了随意开枪，难以指挥的现象。恰在这时，左队队官吴兆麟便出场，众人遂推吴兆麟来指挥作战，熊秉坤也非常拥戴他。

吴兆麟字畏三，湖北武昌人，先后毕业于湖北武汉普通中学堂、参谋学校、军官讲习所。原本是日知会员，后来消沉多年，但在营中素有威望，且对革命活动暗中同情。

他见众人恳切推戴，便同意临时指挥，部署进攻防守等，甚是周详妥当。

金兆龙带兵出中和门至南湖，恰炮队已有准备，队官张文鼎等已与邓玉麟等接洽妥当，金兆龙一到，遂带领炮队入城，途中又与混成辎重营起义部队汇合，遇着城内吴兆麟所派第二批接应步兵，遂一路杀奔城内，至楚望台，吴兆麟又请炮队再去把留在营内的大炮拖来。

蔡济民、方维等党人遂率队来楚望台汇合，陆军测绘学堂学生亦在党人代表李翊东带领下投入起事。

各起义部队推举吴兆麟统一指挥进攻督署，布成步炮阵地，便由大炮射击督署，且轰击尚未起义的41标，促其响应。

黎元洪10日晚一直在协司令部里坐镇。第21混成协各部将士大多出调外地。黎元洪接到驻守在武胜门外塘角之21混成协炮队营管带张正基打来的电话，告以同驻塘角的21混成协辎重队纵火起事，黎闻讯恐慌异常，令张立即扑灭，同时电话通知铁忠。他又想到要设法阻止城内本协士兵响应起义，于是命所属41标3营管带谢国超严防本营士兵行动，同时下令召集41标全体官佐到会议厅集合。

黎元洪面色庄重地环视着聚集在会议厅内的官佐，宣布了三项命令：严阵以待，来则还击，去不追击。然后只说了两个字：“请坐。”他便一言不发地来回踱步。

会议厅沉默了一个多小时，黎元洪接到督署电话：第21混成协工程21队、辎重第21队兵变。没过10分钟，得到21混成协驻塘角的炮兵亦变。继而又接到张彪电话通知，城内工程8营和右旗部队兵变，又不到半小时，听说第8镇炮标进城，在楚望台驾炮攻督署，城中大乱。约10点钟，瑞澄逃至楚豫兵舰，11时督署电话不通。

黎元洪和41标官佐静坐着听会议厅之外的枪声、炮声、喊杀声，黝暗的夜空不时闪着火光。

突然，41标士兵、共进会员邹玉溪夺门欲出，黎元洪当即开枪将其打死。约11点半钟，听到有人攀营墙高呼：“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然后逾垣而入，为守者所执。拉到黎元洪面前，黎向此人猛砍一刀。由于用力过猛，刃折而人未死，仍高呼革命，护兵乱刃齐下，移尸沟中。被杀者是由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所派给各营送信并联络响应起义、攻打督署的共进会员

周荣棠。

黎元洪一连杀死两个革命党人，并未挡住革命党人的进攻。过了一会，隔壁 30 标留守兵枪声大作，势将及 41 标，黎指挥标兵，乘墙防之，他命令：“如人来攻我，则发枪击之！”黎见革命军势力强大，又下命令说：“不还枪，好言劝之。”见地的部下慌乱已极，再下令说：“如来攻我，退守营房。”起义军在蛇山的炮兵阵地和楚望台上的炮火交相辉映，呼啸的炮弹直向 41 标营房射来，41 标的军士亦有哄动之相。

黎元洪眼见大势已去，始令官佐各自回营，并最后训话说：“带兵出外避炮，如能维持，不负皇恩，是所至盼；更能维持到底，将来定予重赏；否则听其自便，余不能为汝等负责。”41 标全体官佐一哄而散。

41 标革命党代表阙龙、廖湘芸在队官胡廷佐等人协助下，集合队伍，冲出了营门，直奔楚望台。

起义军士臂缠白巾进攻督署。先头部队到督署东面不远，忽遇张彪亲自率领的队伍，在望山门城楼抵抗，进攻受挫。

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等商量第二次进攻，定下放火之计，兼为炮兵射击参照，便令民众从督署周围撤走，日后赔偿所损房屋，民众则搬出油桶、棉花，自愿毁家，便把督署照得如同白昼。炮兵遂用排炮轰击督署与第 8 镇司令部。起义军组成敢死队，熊秉坤带队猛冲，督署遂为起义军所占。

第 41 标起义队伍亦不甘人后，在队官胡廷佐等带领下攻下藩署，都是白银满库，胡廷佐下令封存守卫，有妄取者立斩，无人敢动。

电报局、官钱局也相继拿下。张彪见大势已去，遂领残余兵将，出城渡江到汉口刘家庙车站喘息，城中残兵便都投降。

黎元洪焦灼万分。参谋刘文吉、管带谢国超、执事官王安澜等劝他暂避他处。他便偕王安澜等至黄土坡刘文吉家。黎对刘说：“我身居协统，部下兵变，如革命党失败，我必受处分；若革命党成功，我能否逃命，不得而知。我有金钱几许，存于某处；田地若干，均有契据。更有金表一只，现款几何，暂为拜托。我若不幸，我之家属儿女，烦君照料。”黎元洪在刘家换了一身便衣，又偕王安澜一起至谢国超家。他在谢家辗转不能成寐，忆及平时积蓄，乃派伙夫回家搬运。

伙夫从中和门内黎宅挑出了个皮箱，担任巡查的工程起义士兵马荣、程正瀛等见其神色慌张，怀疑是乘火打劫的窃犯，喝令止步，并声语要严加惩办。伙夫慌忙答辩，吐出真情。马、程二人连忙回楚望台将此情报告。

11 日拂晓，很多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纷纷聚集在楚望台坡下，集议下一步行动方案。吴兆麟、蔡济民等人都在场。

蔡济民道：“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当时，革命党的领袖们：刘公隔绝在汉口，孙武炸伤，蒋翊武出逃，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胡瑛在狱中，刘复基等被害，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起义各军领导人，均以资望浅，不敢出来负总的责任。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李作栋、张振武等等商，邀请原谘议局正副议长及议员前来开会，商讨地方政府组织事宜。

议会会长汤化龙字济武，37 岁年龄，湖北蕲水人，中过进士，担任过

授法部主事、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被选为议长，1910 年被推选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要求清廷召开国会，实行立宪，抨击皇族内阁，与谭延桾等发起组织“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他正为武昌兵变惊慌，闻说开会，很是没底。

议长、议员来到楚望台，关于组织政府，便有人推举汤化龙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倒也知趣，知道手中无兵，都督如何能干。正在此时，马荣和程正瀛回来报告黎元洪去处，吴兆麟、蔡济民当即作出决断：“以黎在湖北负人望，且甚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吴兆麟同黎元洪有师生和同学之谊，当然拥护黎为都督。蔡济民政治上十分幼稚，又有单纯的排满思想，他种族界线清楚，而阶级界线模糊，却把都督位置让给属于革命对象的旧官僚黎元洪。吴、蔡当即派各军代表，偕同马荣、程正瀛率兵一排，前往谢宅迎黎。

黎元洪闻起义军至，忙躲进床下，却被马荣识破，只得爬出来，端出协统架子叱责革命战士：“余带兵并不刻薄，汝等何事难余？”众人答道：“我等来此，特请公出主大计。从则生，不从则死。统领自择之！”黎知不可抗拒，只得由众人拥到楚望台。

吴兆麟等派出一排士兵，列队鸣号欢迎。众人这才注意到黎元洪身着灰呢长夹袍，上罩一件青呢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背后仍拖着一条“豚尾”，一派颓败的前清官僚神气，面容沮丧，失去了平日作协统时的威仪。黎见到这个欢迎场面，无可奈何地向革命士兵笑了笑：“各位辛苦！”吴兆麟等引黎至中和门城楼观战，黎见众人视线集中在远处的战场上，小声对吴兆麟道：“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军队进级很易。请你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闹太大了，更不得了。”吴兆麟小声回道：“我也是被众人挟来的。”马荣在旁，听黎元洪竟出此言，大怒。斥黎元洪道：“我们同志很抬举你，你反不受抬举，叫我们回营，待瑞澄派人来杀。你昨夜亲手杀了我们传信的同志周荣棠，我们尚未问你的罪！今请你来，仍是反对我们。你就是一个汉奸，我们就要杀你。”吴兆麟急忙喝止，对马解释道：“黎统领素来是很爱我们的，刚才所说的话，是关照我们，看我们同志太辛苦了，暂请回营休息，黎统领自有维持之法。”又低声对黎道：“请统领暂且容忍，因昨晚杀人太多，此时都是一鼓奋勇之气，稍不如意，即动手来，反于统领面子不好。”黎不再发言。吴又对黎道：“瑞澄自督鄂以来，措置乖戾，激起湖北军队全体革命，足证清廷无道，今闻瑞澄与张统制均已出走，仅统领一人在武昌城内。统领素爱军人，甚得军心。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黎元洪听说督署已被攻下，瑞澄、张彪、铁忠逃走，武昌城全城已被革命党人控制，便临时集会，在了解了大致情况后冷笑道：“瑞澄、张彪统清兵水陆并进，何以抵御？海军军械尤犀利，不需 10 弹，此城将粉碎矣。汝等将退何处？依吾之见，汝等不若暂且回营，待吾往说瑞、张使不追究，何如？”革命党人大怒：“吾人革命，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统领意见，绝不可行。”黎元洪长叹一声：“我只老命一条，给汝辈玩掉吧！”革命党人决计在原湖北谘议局设址办公。蔡济民等与汤化龙等商定，起义军代表、黎元洪等去谘议局开会，组织政府。革命党人方维牵来一匹骏马，供黎乘坐。吴兆麟又派 100 名士兵护卫，熊秉坤、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马骥云等随行。

会议正式开始，众人公推汤化龙为主席。因有人曾提议汤为都督，汤首先发言道：“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鄙见瑞澄自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等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助。”吴兆麟起而发言，表示赞成汤化龙意见，并补充说明武昌首义后，革命所处的有利形势，鼓舞大家必胜的信心，然后说道：“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众人拍手赞成。黎元洪答称：“此事体太大，务必谨慎，我不胜都督之任，请另选贤能。”立宪派人士汤化龙、胡瑞霖以及吴兆麟都婉言劝黎；革命党人蔡济民、张振武、李翊东更强迫其必须接受推戴，黎仍无动于衷。蔡济民拔出手枪厉声道：“事已至此，黎公再不允就，我等只有自杀，以谢同志，而慰死难诸先烈！”话音未落，突然有一人举刀自杀，血溅满座。

原来是革命志士朱树烈试图以鲜血感动黎元洪，黎居然不为所动。一霎时，空气极为紧张，许多革命战士感到愤怒、焦躁。正在僵持之中，忽见李翊东手捧一夜之间写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对黎说道：“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黎元洪吓得双手发抖，颤声道：“毋害我，毋害我！”李翊东大怒，手持长铗道：“汝罔颜事仇，官至统领，岂大汉黄帝子孙耶？罪不容于死，今不罪汝，举为都督，反拒绝之，岂非生成奴性，仍欲效忠于敌耶？余杀汝，另举贤能。”蔡济民、陈磊急忙劝止。黎元洪瑟缩不语。李翊东提笔代书一个“黎”字，并对黎元洪说：“余代为书，岂能否认乎？”众人鼓掌，表示称赞。然后把黎元洪关在谘议局楼上的一间房屋里，并派兵把守。

黎元洪见此情景，思虑：革命党人把他当成囚徒，清朝又把他当成叛臣，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把他的脑袋搬家，故此整日愁眉苦脸，饮食不进。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在武昌城内广为张贴，这告示为六言文：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

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

告示是武昌城内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人们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地观看，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限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

武昌城内，人心为之大定，而残余的清吏、旗兵则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甚多。甚至汉口租界的外国人士闻讯，也大为惊愕：“想不到黎统领也是革命党！”逃散之陆军官长，闻黎公出任都督，多归附焉。

汉口民众得知武昌起义成功，便急入监狱看望詹大悲，卫兵也不阻止，

任由詹大悲等自由行走。汉口街面已乱，盗匪横行，詹大悲等急忙过江，找到蔡济民道：“你们如何在武昌闭城造反，不管汉口，请速派兵过江占领。”蔡济民等深觉有理，便派军队随詹大悲过汉口设司令部。革命党人群集詹大悲身侧，遂成立汉口军分府，出示布告，共推詹大悲为分府主任，何海鸣为副主任。当夜藏在汉口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发动 42 标一二营，在汉阳、汉口行动起来，赶跑反动军官，举在狱中的党人李亚东为汉阳知府。武汉三镇，已经光复。

黎元洪被软禁在谘议局，闭目不语，实乃木偶尸居，不画一策。革命党人的本意是借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并不需要黎负任何责任和过问事情，所以当蔡济民、邓玉麟、王宪章、吴兆麟等人看到黎的态度如此顽固，毫无转变立场的表现，即决定举行会议，成立谋略处，负责军政大事，实即军政府的决策机构。会议推蔡济民为谋略处负责人，其成员还有吴醒汉、高尚志、张廷辅等，共 15 人。谋略处遂议决：都督署设在谘议局；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 4609 年；用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革命军旗为 18 星旗；军政府暂设机关四部：参谋部、军务部、政务部；设立招贤馆。谋略处又派出刚出狱的胡瑛为外交部长，带军政府照会过江会见各国驻汉口领事，洋人们原来不知底细，至此才知局面。此时军情却也紧张，武汉革命军不足 3000 人，清兵必将很快南下，谋略处遂定扩军四协，退伍老兵通知归营。

蒋翊武长衫短发，满面风尘闯进设在谘议局的谋略处，众人大喜，急道辛苦。原来蒋翊武那日从小朝街机关逃出，拟至京山县找会党首领刘英，伺机再举。于途听说武昌革命党起事，遂折身回返，一路奔回，却是 3 天 3 夜工夫。

黎元洪不言不笑，不进饮食，终日正襟危坐，形同偶人，人皆目为泥菩萨。黎元洪的执事官王安澜看见黎每天不食不语，心里着急，惟恐饿坏了这位他跟随多年的黎协统，便把黎的情况报告了军政府的革命党人。

几位革命同志商议，都说黎如此反对革命，终日忧闷，饮食不进，若真饿死，岂不麻烦！当时在座的陈磊道：“我想黎元洪是故意装模作样，他以为革命难以成功，一旦失败，他则求请政府原谅，或者再谋做官；如果革命成功，他则享受元勋。此时假装愁闷，其心正在计算。不然，他果忠于满清，何以当初晚间不死？”都督府警卫司令甘绩熙起而支持陈磊：“黎元洪这个态度，甚是可恼！我们真看不来！依我愚见，不如用手枪扣了完事！”说着，陈、甘二人提着手枪便朝黎元洪的房间走去，其他革命党人连忙劝阻，争说不可如此激烈，以致外间有所藉口。甘绩熙遂改口道：“我纵不扣死他，亦要他决心。”说罢推开黎元洪的房门，其他同志亦随着进去，甘对黎道：“黎宋卿先生，我们汉人同志，流血不少，以无数头颅换得今日成绩，抬举你为都督。你数日来，太对我们同志不起。我对你说，事不成，你可做个拿破仑；事若成，你可做个华盛顿。你很讨便宜的，你不再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待！”黎元洪这时头脑似乎略觉清醒，慢条斯理地道：“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已在此两日，并未有什么事对你们不起。”陈磊道：“你的辫子尚未去！你既为都督，该做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表示决心。听说你自到了谘议局，茶饭不进，你未免太着急了。”

我今有一言奉问：现在是民国了，你若尽忠民国，你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满清，你就该早天尽节。二者必居其一，何以如此装模作样？你非

才智胜人，即你不干，以中国之大，汉人之多，岂无做都督之人耶！望你三思，不然，恐同志等不容汝也！”这时蔡济民等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劝他剪辫子。黎连忙道：“你们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

我前在营内并下过传知，谓：愿剪发者，则听其便。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剃去就是。”讲话间，起义士兵丁仁杰和刘度诚二人一起当即给黎剪去了辫子，现出圆圆的光头来。蔡济民毕竟是 20 多岁的青年人，竟抚摸着黎元洪的光头开玩笑道：“都督好像个罗汉！”黎元洪苦笑道：“有点似弥勒佛。”黎元洪所以转变了态度，是他看到残余的反革命势力逐步被清除，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尤其是他听到起义炮兵 1 营、步兵 1 队在武胜门外两望一带阵地上，同停泊在长江的楚豫（瑞澄在此舰上）、楚材、江清各兵舰炮战约 2 小时，楚豫、江清两舰被击伤，敌舰向长江下游败走，这对他震动颇大。他向来迷信清政府的海军实力，今见清朝海军竟败于革命军之手，可知清朝的前途不妙，于是态度方始有所转变。

另有文字记载，正当黎元洪心情郁闷，自杀未遂的当口，黎家老仆来到都督府，欲面见黎元洪，卫兵不许其入内，老仆遥对黎元洪喊道：“如夫人劝主公降”，自是黎持两端，不坚欲殉节。这未免夸大了如夫人的作用了，那如夫人，即是黎元洪以 3000 元买的妾危文绣是也。

其实，在革命党人中，反对黎元洪做都督的不乏其人。革命党领导人张振武见黎元洪态度仍无改变，主张杀掉他，以吴兆麟为都督，李作栋、陈磊赞成，但吴兆麟坚执不肯。又有一些革命党人见黎元洪态度顽固，主张罢黎元洪都督职，以黄兴易之。赏叙长李翊东力持不可，谓：“黎名为都督，实则俘虏，以黄易之犹如反掌耳。然窃以为不可，盖黎厚重知兵，为人望所归，一旦去之，恐摇动人心，招致内乱，则为敌所乘，其害可胜言哉。且黎氏为吾人所立，旋又去之，将何以取信于人，而招致天下士耶？”

## 第十章 武汉血战

士兵们给黎元洪剪了辫子，天真的革命党人以为黎元洪真的拥护革命，便欢呼雀跃，燃放鞭炮庆贺。其实，黎元洪之肯于此时剪掉辫子，是因为他看出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瑞澄经此炮击，谅不敢再有举动；纵然再来，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至于张彪盘踞在汉口一隅的刘家庙，手无实力，更是掀不起风浪。革命形势日有发展，他想就任新职，以迎合革命潮流。但又不肯明说，只好借剪辫子为题，来表示他转变了态度。

当晚，在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当众慷慨宣布：“我对于革命，自 11 日至 13 日上午，犹未下决心，此际心已决矣。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但革命必须有充分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即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

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拟即建议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仍为我等之长官，兄弟愿往前方督师作战；张彪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回去尽其职责，速召集旧同事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逃脱思想，这是目前要紧的任务。”听了黎元洪的讲话，诸人欣喜若狂，会场之中，掌声雷动。这表明黎元洪正式承认他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了，从此要就任了。

就在黎元洪公开转变态度的次日，那谭人凤、居正自上海来到武昌，他们带着一大把手枪，于途已知武昌大势，即奔谘议局，一到即由蔡济民介绍与黎元洪见面，黎元洪即现出一幅可怜相道：“革命二字，从未闻之，今强制我于此，岂非意外之事？”黎元洪接任都督的最初一个时期，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团体若何？事机若何？处处谨慎从事，凡事不多表态，现出一种莫测高深的模样，他窥视对革命别有用心的旧官僚、政客，招引他们向革命党人开展夺取军政府的大权，他的盟友便是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

汤化龙、胡瑞霖等人趁机向黎元洪靠拢，他们急欲设法使黎元洪真正掌握都督实权，排挤革命党人。

谭人凤、居正来武昌之后，对湖北军政府的状况颇不满意，使黎元洪有了操纵大权的机会。当时军政府既要招军、组编军队，组织迎击敌人；又要处理政务，发布各种函电、文告；制订各种政策、纪律；安置各方来投靠的人；处理各种矛盾等等，真是繁忙混乱到了极点。加之首义诸子，大抵年少气盛，动机虽正，计事实疏，既难容人，又轻于动作。故军政府成立后，一切措置，颇有未尽之处。谭人凤、居正目击军政府整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喧闹，混乱非常，觉得有必要重新整顿军政府，以加强军政府的职能。居正首先想到的是加强都督的权威，因为有许多革命党人着实瞧不起黎元洪，虽然拥戴他为都督，但对他既推重而又加以贱侮，甚至插刀拍案，嘲弄辱骂，居正颇虑主帅徒拥虚名，无以整肃三军。

汤化龙、胡瑞霖等窥破居正的心思，便在军政府大造舆论，说武昌起义乃“汤武革命”，必须举行隆重仪式，以示顺天应人。建议仿照古礼，筑坛祭天，以昭示光复大义，并祀列祖列宗。

居正赞成此议，因与谋略处商议，在阅马场“设坛场，具礼仪，请都督誓师”。

黎元洪身着军服，骑马来到了帅台，各军举枪向都督致敬。然后，都督率各高级将校升坛面南。台中设黄帝神主，摆香案，置玄酒、太牢（以小黄牛代），两旁旗剑分列。

先由都督率众将校面对香案跪下，行免冠四叩礼，继由都督亲读祭文。然后由谭人凤代表同盟会向黎授旗授剑，接着便是黎元洪慷慨誓师。

一时台下欢声雷动，全军举枪，三呼中华民国万岁！4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

黎元洪威风空前，兴奋异常。随即请居正演讲同盟会革命之精神及创立民国之意义。居正大声疾呼，听众鼓掌。最后黎元洪下台阅兵，绕场巡视一周。

如此用封建帝王祭天的古老形式来树立黎元洪的权威，埋下了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种子，对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不啻是一种污辱。

瑞澄仓皇逃出武昌，登上楚豫兵舰，连夜给清廷发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叛军占领省城，速派知兵大员率领北洋第 1 镇劲旅，多带枪炮，配足弹药，刻日乘坐专车来鄂剿办。”清廷接到奏报，犹如晴天霹雳，惊恐万状。下令将瑞澄革职，命陆军大臣荫昌为第 1 军军统，统率约一镇兵力迅即南下剿办；另加派北洋悍将、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第 2 军军统，统率约一镇兵力为预备队，又令河南巡抚宝芬就近调派第 52 标张锡元统率两个营前赴汉口，与张彪残部汇合。

黎元洪不听谭人凤等人的劝告，以“新造之卒军械不完备、战斗力薄弱”为词，遂不出兵。谭人凤见黎对战事一再延宕，焦灼万分，遂邀集部队军官入都督府，对大家说明形势危急，决定一致胁迫黎元洪下攻击令，倘再犹豫，欲为清廷作留守，当以手枪饷之。黎元洪命令旧军官原第 2 协统领何锡蕃为汉口前线指挥官，率革命军 1300 余人向刘家庙之敌发起进攻。

由于革命军斗志昂扬，士气旺盛，作战极为英勇；人民群众热烈支援革命军，一般军民均不畏死，面对清军，大有灭此朝食之慨。10 月 18 日攻打刘家庙首战告捷，打死清军 400 余人，伤者更多。拆毁京汉铁路十余丈，使载有两标清军的一列火车脱轨，清军死伤枕籍。19 日革命军出动 3000 人，胜利占领刘家庙车站，清军丢盔弃甲，向北溃退至滠口三道桥以北，遗弃载有粮食、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的列车约 10 余辆。

攻占刘家庙之后，本应乘胜前进，驱清军于汉口郊区以外。可是在何锡蕃指挥下，仅追敌至三道桥而止，使清军得以在桥北设防固守，以后革命军队再想通过三道桥，进攻滠口之敌，遭到桥北敌军机枪猛烈扫射，伤亡惨重，越过三道桥的可能性不大，只得退回原来的阵地。

清军大部陆续南下，北洋军第 4 镇和第 2 镇的第 3 协共 2 万多人，已经布置在孝感、祁家湾、滠口一带，并从北方运来了大批退管炮和马克心式机关枪等新式武器。清廷正在准备起用袁世凯，袁的头号大将冯国璋已取代了荫昌，在孝感设立司令部，直接指挥对汉口的进攻。

黎元洪任命旧军官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不久革命军又加派张廷辅统率的第 4 协、熊秉坤统率的第 5 协、蔡德懋统率的炮兵第 2 标和方兴、马荣统率的敢死队增援汉口。所以从 26 日双方战斗又激烈起来。

27 日、28 日两天的激烈战斗，革命军伤亡达 2000 余人，清军死伤人数大致与此相当。

正当汉口前线紧张鏖战之时，探悉前线总指挥张景良（投黎元洪的旧军官）在汉口后城马路与原第 8 镇正参谋官刘锡祺密商暗害革命军阴谋。汉口军政分府负责人詹大悲亲自审讯刘、张二人，证实刘确为清军奸细。詹大悲认为此二人非处死不可，遂报告黎元洪，请示办法，黎命将二人解至军政府审问。詹大悲对黎不放心，认为若把张、刘解到军政府，一定会“从宽赦免”，甚至会受到重用，便在汉口江汉关将二人枪决，枭首示众。

正在汉口战役进入极端艰苦的危难时刻，国内同盟会主要负责人黄兴偕宋教仁、田桐、李书城等由上海抵达汉口，渡江抵武昌。

武昌起义时黄兴正在香港，得到消息后，立即回到上海，并作出即赴武汉的决定。

这位以领导历次武装起义著称、为民主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功臣的到来，使武汉军民为之一振。黎元洪更感到如释重负，对黄、宋抵鄂，亦喜形于色，对这两位同盟会领袖的态度，备极谦恭。



黄兴片刻不曾休息，即与各方面负责人集议汉口战事。经商谈后，知汉口形势已然危急，难于从根本上扭转局势，但见士气可用，加上革命同志的积极主战，便不计个人利害，自告奋勇，率师督战，得到革命党人和军政府各方面负责人的一致赞同，遂公推黄兴为总司令，到汉口组织反攻。

黄兴偕居正、田桐、蒋翊武、胡瑛、蔡济民等率队渡江。临行时，黎元洪告诫诸将曰：“诸事惟黄先生之命是听！”诸将皆敬诺。

黎元洪为安定人心，命人赶制1丈2尺长的“黄”字大旗两面，一面由领队人高举前导，使武汉人民都知道黄兴到汉口督战；另一面插在总司令部的门前。表示黄兴在此，借以振奋军心。

黄兴等来到汉口前线时，军民已退至汉口中心区。黄兴对众人道：“如不急谋进攻，包围圈会越缩越小，形势将愈形危急。”于是决定将援兵分成两部，采取攻势。背负长江、汉水，只能背水一战。

黄兴尚未部署完毕，即接到报告，清军已进至六渡桥，炮兵2标统带蔡德懋、第4协统领谢元恺阵亡，敢死队长马荣、工程队长李忠孝战死，何锡蕃受伤。马荣尸体被清军剥肤剖心。黄兴闻讯大怒，立即带领江防军出战。

清军闻黄兴名，俱胆落。黄挥队猛扑，清军反奔，直追抵刘家庙。

但由于敌军武器精良，且军队人数众寡悬殊，革命军对失去阵地虽得而不敢守，仍退回原地防御。

冯国璋到达汉口前线，亲临指挥。他竟凶残地传令各部清军火烧汉口。繁华的汉口市区成为一片火海，坚持巷战的革命军被迫节节后退，11月1日下午退往汉阳，当天夜间，汉口终于沦陷敌手。

汉口战事结束，汉阳之战开始。

经过汉口战役的殊死战斗，革命军人数锐减，调到汉阳的兵力，总数不足5000人，另有湖南来援的两个协，总共亦不过一万三四千人。来自湖南的两个协援军，是训练精良的新军，和那些汉阳前线作战的衣衫褴褛，装备低劣的新募士兵大不相同。他们的到来，使汉阳的守军增添了信心，黄兴十分高兴。

正在这时，在武昌的一些同盟会会员讨论让黄兴取代黎元洪作为湖北军政府的首脑问题。

同黄兴同来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田桐、李书城等，以及湖北革命党人居正、蒋翊武、杨王鹏等人力主拥护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地位和职权均在黎元洪之上。11月2日晚，宋教仁、居正、田桐等部分党人及军政府有关人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拥护。但是，那旧派人物吴兆麟却提出反对意见。他站出来滔滔不绝地罗列了6条理由，反对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革命党人不敢坚持原则，在辩论中显然也没抓到要害，他们既不敢公开揭发黎元洪、汤化龙等排挤革命党人的反动企图，又不敢公然为革命争夺领导权。相反，吴兆麟强调更换都督将引起军队内部分裂和帝国主义干涉的指责，倒是触动了革命党人的隐忧。吴兆麟这么一说，宋教仁马上退缩了，于是大家决议，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

对战时总司令的职权和出任方式又出现了争论：党人主张与黎元洪分权，总司令的名义由“公推”产生，不经黎元洪委任。旧派人物则以“统一事权”为理由，力主由黎元洪委任。那汤化龙、胡瑞霖道：“黄兴由黎元洪

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这种主张获得通过。

次日，黎元洪以最高权威、开国元勋的身份，在武昌阅马场“拜将台”上，效法汉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印信、委任状和令箭。

黄兴在坛拜将典礼后，即于当日率领有关人员渡江，在汉阳西门外昭忠祠设战时总司令部。在筹划战守方针时，军政府参谋部副部长吴兆麟、军务部部长孙武同战时总司令部黄兴、李书城等发生分歧。黄兴、李书城等人主张乘汉口清军立足未稳，集中兵力反攻汉口，而对于孝感、新沟、蔡甸一线，则凭坚固守。吴兆麟、孙武则认为民军新兵多，缺乏大炮、机枪，且汉口挫折后，元气尚未恢复，只能凭借汉水固守汉阳，以疲清军而待各省响应。

由于黄兴没有采纳吴兆麟的意见，吴便到都督府向黎元洪反映，希望黎能亲自出面阻止黄兴。黎元洪沉吟道：“据黄兴派李书城来言，现在攻击计划已定，颇有把握，我亦不便阻止。”黄兴也到武昌见黎元洪道：“现在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超过全国半数以上，如能攻下汉口，起义的省份将更多，清廷势不能支，非垮台不可。”那黎元洪对黄兴的说法心里虽不尽然，表面上却唯唯称是。

反攻战斗非常激烈。16日下午，队伍待命出击。当晚，他们渡过汉水，胜利地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遇到了敌人的猛烈抵抗，经过24小时的连续战斗，革命军损失惨重，800余名伤亡。黄兴在撤退中也几乎丧生。一个敌兵在离黄兴很近处准备向他开枪，被跟随黄兴的日本友人萱野长知发觉，向黄报警，黄兴迅速转身，一刀把那个敌人砍死。这次反攻失利，使黄兴极为沉痛，几不欲生。

黎元洪派蒋翊武到汉阳慰勉黄兴，谓汉阳有襄河之险，且系武昌保障，仍要固守。

此时之败不足虑也，一俟各省援军齐到，再图恢复可耳。

黄兴召集军事会议，确定凭借汉水之险，固守汉阳。从此，革命军完全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

在革命军谋攻汉口之时，清军除留主力部队守在汉口龙王庙至玉带门一带防止革命军强渡汉水外，另派出两支部队迂回进攻汉阳。琴断河以东，依次密布着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汤家山和磨盘山，居高临下，形势险要，成为汉阳城两侧的天然屏障。革命军在这一带设置了防守汉阳的一道防线。但是，冯国璋调动了3万人的精锐部队向汉阳发动了进攻。从21日至26日，革命军同清军双方为争夺这一带险要山地而展开激烈的战斗。革命军付出重大牺牲，与优势火力的清军展开艰苦的拉锯战，几个山头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最后终于落入敌手。25日，湖南援军第1协统领王隆中擅自率部撤离前线，后又擅自率部潜回湖南，第2协统领甘兴曲，则率部退往湘南岳州。

黄兴见湘军既撤，汉阳形势危急，恐兵工厂为敌所用，经大家议决，暗将兵工厂一切紧要部件及所余枪枝弹药搬运武昌储存，以免资敌。

27日凌晨，清军突破十里铺防线，沿大道向汉阳城推进。同时，汉口清军也由硃口渡过汉水，进占钢药厂、兵工厂，并夺取龟山炮台。

黄兴逐日至前线亲自督战，每日敌炮落在咫尺，不为所动，随从人员辄强拽以避。

其英勇如此。黄兴看到败势已不能挽回，愤不欲生，黎元洪派人来劝慰，并请回武昌休息。

黄兴于 27 日渡江回武昌，革命军也全部撤回武昌，汉阳失守。

黄兴在军政府会议上报告了汉阳失利情况及原因。最后，他说道：“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黄兴说完，黎元洪立即站起身来，表示赞同，并征求众人同意。

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老日知会会员、同盟会会员范腾霄起立发言：“武昌关系全国，不啻如人身之首脑，首脑有失，民国生命岌岌危矣。如弃城不守，风声所播，敌即欲入武昌而可得，是自绝也。我无数流血志士艰难缔造之新起民国，其血食将由此而斩！”范腾霄又从战术上分析了汉口、汉阳虽失，武昌仍旧可保。他最后高呼：“敢大胆请诸君一决，赞成死守武昌者，起立举手！”话未毕，全体齐举手，欢声雷动。大家纷纷表示：“头可断，武昌不可弃！”军务部副长张振武拔出手枪，大声喝道：“倘再有言退者，即杀之！”黄兴只好放弃己见，约同李书城、田桐一起回上海而去。

黄兴是否真的提出放弃武昌，败走南京的计划，已不可知。有人分析认为，黄兴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计划，因为武昌、南京相距遥远，这样的长途军事行动，既乏补给，又缺交通运输工具，又可能遇有敌人途中袭击的危险，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那么，为什么又有黄兴建议撤军武昌的说法呢？有人认为，这是湖北某些军阀政客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挑起人们对黄兴的恶感而蓄意捏造的。

黄兴在汉口和汉阳之战中，在众寡悬殊形势下，率领革命党人舍身捐躯，竭智尽力，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在坚守汉口的日子里，有 5 个省脱离清朝，在坚守汉阳的日子里，又有 10 多个省宣布独立，黄兴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也。

## 第十一章 “龙头大哥”

武昌首义之后 12 天，湖南第一个起来响应。湖南起义的领袖便是 24 岁的焦达峰。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菴，湖南浏阳人。15 岁时毕业于南台高小，经姜守旦介绍，加入洪福会。华兴会成立时，他又参加过同仇会，从事联络会党工作。18 岁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肄业，并加入哥老会，受反清思想影响，倾向革命。1906 年赴日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旋加入同盟会。湖南萍浏醴起义时，奉黄兴之命回国，任浏阳会党领袖李金奇为联络参谋。因遭清军突然搜捕，李金奇落水而死，焦达峰逃回日本。

次年被推为同盟会调查部长，专任联络各省会党事；同孙武、胡瑛、张百发、邓文辉等在东京创立共进会，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纲领为“平均人权”，主张在中国长江流域地区，联络会党发动起义。黄兴对成立共进会不满，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答曰：“同盟会举趾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兴道：“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达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1909 年，

焦达峰回国，在长沙建立湖南共进会总机关。他在浏阳县召集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的洪门会的“龙头大哥”30余人集会，经龙头大哥们抬举，焦达峰便成了“穿靴子上山”一步登天的“龙头大哥”，成了会党首领。

焦达峰原与学界有紧密的联系，现又同会党有很深的关系，他有这两方面的条件，遂成为重要人物。

1911年10月，长沙新军酝酿起义。

最早在湖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是刘文锦。1909年刘文锦从保定速成军官学校毕业后到南京会见其兄、同盟会会员刘承烈，在那里结识同盟会会员邹永成。邹永成是湖南新化人，原是华兴会会员，后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奔走于湘、桂、鄂、赣、苏、皖各省，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到苏州任新军第23混成协管带，在军中联络了不少同志，被清廷发觉，逃到南京。刘文锦在邹永成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在南京别后，刘文锦到长沙进新军25混成协。邹永成赴日本留学。次年下半年，邹永成同谭人凤、宋教仁在东京密议加强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邹永成便回湖南，在长沙见到刘文锦，刘已是马队排长。邹便把东京商议的计划告诉他，要他在军队中设法组织革命党。邹永成还介绍吴任到新军当文案，暗中帮助刘文锦。

刘文锦在新军中组织革命党，发展很快，他把25混成协的革命同志严密地组织起来，标有标代表，营有营代表，队有队代表，排有排代表，棚有棚代表，都由目兵担任。除了刘文锦、吴任之外，没有官长。虽然有几个官长在日本留学时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但恐人一做官，思想便不免动摇，所以索性不让他们知道。

1911年2月，谭人凤、刘承烈、谢介僧等来长沙设立起义机关，邹永成派人送信给刘文锦，要他同谭人凤联系。谭人凤约集文斐、刘文锦、陈作新、吴任、曾杰、文经纬、龙毓峻等人开秘密会议，推刘文锦负责军队的起义，文斐等负责学界鼓动，焦达峰、杨任、谢介僧等联络会党，龙毓峻筹集经费，文经纬在铁路协会与士绅联络。由于焦达峰当时在武汉，谭人凤便赴武汉同他商议。

刘文锦便在长沙天心阁三棱召集新军各标营代表开会，25混成协的步、马、炮、工程、辎重等队代表安定超、徐鸿斌、刘安邦等五六十人参加了会议。刘文锦道：“清政不纲，国土日削，我辈为救亡图存光复祖国而革命，必须群策群力，方克有济，幸勿稍怀疑惧。”话毕，旋即对江宣誓，共约死生，并由各个自行认定担任联络。

抚院探目汪子林、探兵刘宏德等在天心阁二楼喝茶，见到刘文锦召集这么多军人在楼上集会，便产生怀疑。会散后，找人打听，便有与会者年少气盛，言词间不免有所流露。汪子林等立刻向湖南巡抚杨文鼎报告。杨文鼎大惊，即同协统萧良臣密议，认定刘文锦是“乱首”，但又怕在湖南动手杀害，会激起兵变。于是设计派刘文锦到北方买马，暗中嘱湖北新军统制张彪在途中把他杀掉。他们找马队管带张翼鹏前去商议。张在日本曾加入同盟会，托称刘文锦早已因酗酒滋事而被撤职，张又暗中通知刘逃走。

刘文锦脱离部队，去武汉。刘出走后，萧良臣又亲自到各营房大事搜查，没有得到证据。杨文鼎还想杀马队头目数人，以止乱源。张翼鹏道：“这事未获实证，枉杀恐激起变乱。”49标2营管带陈强亦是在日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的，也暗中帮助被探出在天心阁开会的目兵张海斌、徐鸿斌逃走，并

嘱安定超、丁炳尧二人转告，叫他们各自小心，相机行动。由于张翼鹏、陈强两位管带暗中掩护同志，革命势力就一天天壮大起来。

湖南同盟会会员多在学界。在 5 月的铁路保路风潮中，又有湖南绅商学界的文斐、文经纬、龙璋、粟戡时、易宗羲、左学谦、黄瑛、姜济寰、曾杰、常治、龙铁元等发起组织铁路协赞会，以贾太傅祠为会址，掀起保路高潮，其中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派人。

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协手合作为湖南起义打下基础。

刘文锦亡命武汉，对湖南的起义仍积极筹划，曾多次秘密函电湘中同志计划一切，但因那些大多数学界中的同盟会员们不主急进，没有收到效果。于是，刘文锦又把活动目标直接转到新军中去。他写信给马队的党人刘安邦转告各位同志：“加紧组织，趁四川铁路风潮，即速起义。”刘安邦在城东清水塘召集会议，到会者有 200 余人。刘安邦宣读了刘文锦的密函；各代表报告了工作进展状况，决议加紧宣传联络工作，务使全协目兵接受。会后，各代表分头去作，新军中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被开除的徐鸿斌又投入中路巡防营当哨官，把革命火种撒向巡防营中。

焦达峰同刘文锦在汉口相遇，刘以湖南军队中的组织相告，并写了秘密函件，介绍焦达峰到长沙，找安定超、刘安邦、熊光汉接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入长沙，湖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跃跃欲试，正苦于缺乏领导时，焦达峰带着刘文锦的介绍信返回长沙，即与安定超、刘安邦、熊光汉见面，又召陈作新、丁炳尧、徐鸿斌等相见。焦达峰道：“奉同盟会命特派来湘联络同志响应武昌起义。”那新军党人听命于刘文锦者，转而瞻焦达峰之马首矣。焦以甫行到湘，初次接洽，对新军之能否任此艰巨尚无把握，因言已于浏阳、平江方面联络洪门会多人，并购有手枪炸弹，须俟人械到齐，再与新军联络发难。

湖南巡抚余诚恪刻意防范，与司道黄忠浩密谋，将新军分调各府州县驻扎，以散其势。又将驻各府州厅县的巡防队兵弁，拨回省城，听候调遣。再派多员稽查新军各兵士往来函电，凡新军函电概由稽查员拆阅，先行登记，不准径交兵士，各兵士亦不准擅发函电。

已是防不胜防，湖南的立宪派也积极行动起来。

湖南政学各界占有最大优势的是立宪派的首脑人物谭延颀。那谭延颀字组安、组庵，号畏三，31 岁，湖南茶陵人，是原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儿子，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09 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次年因长沙抢米风潮事，对湖广总督瑞澂、湖南巡抚岑春煊过于人不满，曾以谘议局议长名义致电军机处、遭清廷申斥，渐生怨望。后赴北京，参加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他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任主席，并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他号称“文武全才”，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

湖南立宪派因独占谘议局地盘，可以公开活动，连官府也不敢奈何他们。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湖北立宪派汤化龙等人参加湖北军政府，给他们很大震动。武昌首义的第三天，蒋翊武派蓝综、庞光志拿着他的介绍信来长沙联络，由阎鸿飞陪同，见过谘议局的左学谦和常治等人。他们便并设法多方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在李藩家中找到了陈作新。

陈作新字振民，湖南浏阳人，他本是个文人，曾捐了监生去应乡试，没有及第，作过家庭教师。1899 年随唐才常在湖南联络会党，准备起义。1902

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军事。后加入同盟会。毕业后任新军 25 混成协炮队兵营排长，旋改步兵 49 标排长，因倡言革命被撤职。1909 年该协创办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他任教官。次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时，他对管带陈强道：“报告管带，机会到了，我们拥护管带。”陈强问道：“陈教官讲什么呀？”“管带在日本留学很久，自然知道的，不用我多嘴。”陈强大惊，心想这人如此冒失大胆乱说，必会弄出事来，就装作不懂，喊道：“护兵，陈教官喝醉了酒，送他回去。”便借故辞了他的职。

陈作新失业后，便到李藩国家里教书，新军里的目兵同情他，常找他聚谈。陈作新自称和同盟会领袖孙文、黄兴是拜把兄弟，又是湖南革命十领袖之一，云云。

立宪派黄瑛、曹惠邀陈作新到自治公所商量。陈作新放言高论：“湖南如果要响应武昌起义，新军由我负责，只是巡防营和会党须与焦达峰商量。”立宪派人求文经纬、易宗羲介绍认识焦达峰，约他到贾公祠见面。焦达峰正在运动各界参加起义，毫不犹豫地同立宪派商定，由他担任联络会党的任务，惟以清室铁桶江山，不易破毁，仍主张采纳烧毁教堂洋行，捣毁学校之手段。文经纬、易宗羲力劝勿扰乱秩序，以至垂涕。

立宪派对陈作新不够信任，认为此人爱说大话，常信口开河。陈作新虽说过“新军由我负责”，总觉得陈作新不为新军所信，事体重大，若仅恃陈一人接洽，未能坚信，乃托陈直接间接转知新军士兵，派代表接头，以便互相认识，利于行动。于是，陈作新就邀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安定超到福寿楼与政商学各界代表黄瑛、左学谦、黄翼球等见面。

安定超是刘文锦离开后新军中革命党的核心人物。

安定超同邹永成商量是否去同立宪派人见面，邹永成道：“此辈是临时投机的，最不可靠，我是决不去的，你们去时也得小心些，不要上他们当。”40 余人来到福寿楼聚会，先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的焦达峰，次来者陈作新，那些长袍短套、不伦不类的代表也陆续来到。

士绅们问焦达峰：“浏阳可到多少兵马？”焦答曰：“至少 2 万人。”“进城时有什么标识？”“青衣青包头。”“带来多少炮火？”焦达峰毫不在意地随口答道：“没有炮火。今日局势，只须 10 个洋油桶，10 挂万子鞭炮，即可将抚衙门攻下。”有人突然发现抚署的侦探唐满老鸦正坐在这家茶馆里，会议中途散去。焦达峰即去浏阳联络会党。

次日，陈作新邀集部分新军代表到小吴门外义冢山开会，30 余人到会，推安定超、刘安邦、徐鸿斌分别指挥新军。巡防队于 10 月 20 日起义，由成邦杰等通知哥老会响应。

10 月 18 日，焦达峰返回长沙，因他联络的会党未到齐，便召陈作新、安定超、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徐鸿斌、左学谦、阎鸿飞、成邦杰、栗戡时、黄瑛、文斐等 100 余人在贾太傅祠体育学堂开会，决定 21 日起义，由炮兵营举火为号。

21 日夜始终未见火光，原来清军防范很严，炮兵营没有举火机会，没能起义。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是急不可耐，在营士兵不论白天晚上，操场讲堂，三五人一碰头，议论纷纷，群情激动，有一触即发之势。官长对各代表外出不敢过问，对于在营士兵的议论也不去管，偶尔碰到，则装作不闻不见，悄悄地走开。

湖南巡抚余诚格知道新军不可靠，就同主持湖南全省营务处兼中路巡防营统领的黄忠浩商量，将巡防营的枪、炮、子弹都收缴存军装局，每营只留 10 小箱，作警卫之用。

新军的子弹已收缴，新军部分部队已调驻岳州、临湘、宁乡、盖阳等地，各县的巡防队 15 营则调防省城。

黄忠浩有“小诸葛”之称，他由文人而任武职，足智多谋，余诚格对黄倚之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黄同绅商学界都有广泛联系。立宪派人甚至曾想拥他当湖南都督。他最初心存观望，派心腹去武汉侦探革命军是否取得武胜关，如果取了武胜关，他便响应，否则便帮清朝“戡平祸乱”。侦探回报武胜关仍在清军手里。21 日起义没能发动，次日上午，余诚格、黄忠浩便听到消息，商量用大炮对新军营房轰击。

安定超 21 日夜未见火光，认为事情已迫不可缓，于 22 日拂晓向前来报告消息的炮队同志李金山道：“汝速回营准备，听枪声轰动，当齐集发难也。”安定超并派人分头通知新军各标营和巡防队准备。

22 日是星期日。安定超于 8 时便率领 49 标士兵发难了。

这日 8 时，安定超要谭满芳在操场吹紧急集合哨子，2 营左队把营部军装库打开，军需长问他们：“到底什么事？”安定超道：“今天起义，你听命令好了。”每个目兵得 10 发子弹。官长不知何事，个个大惊失色地望着。

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枪，向目兵演说革命意义，并传禁令：各队由代表指挥，官兵不准擅离队伍，违者以临阵私逃论罪；未遇敌人反抗，不准随便放枪；不准取民间物品。

违令者就地正法。

安定超命令：彭友胜率 49 标 2 营后队会同 50 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水池军装局；李金山率炮队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他自己率 49 标 2 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辘重炮兵工程 3 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起义队伍分途出发，旧官长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同去。旧官长易棠龄问：“你们干什么事？”一个目兵拿出刀来：“今天我们起义，你要反对，便先杀你。”易不敢反抗，跟着队伍进北门。

黄忠浩已下命令要各营管带督促士兵，严密防守城门，不使新军入城，准其开枪制止。令各营管带派兵巡逻四城，缉捕革命党人防止暴动。但各路防营士兵要求改善待遇，未得解决，军心涣散。

彭友胜率一路起义队伍开到北门，守北门者为巡防营管带赵春霖，他早已被部下徐鸿斌联络成熟，故起义军入城时，他便列队举枪致敬。

守军装局军械弹药库的是巡防 8 队，起义部队赶到，那已被联络的王鑫涛、周福堂、易尚志便开库门。新军目兵猝见大批枪弹，如获至宝，各各尽量饱装；又见拨壳枪枝，知是利器，而未谙用法，则坏其壳而取其枪。

安定超等到达小吴门，巡防营管带已命目兵将城门关闭，并令向起义军射击。目兵却不放枪，但也不开城门，彼此相视而笑，毫无敌意。相持 1 小时余。安定超命炮队退到教场坪，将炮架起，装作将射击恣恣。恰在这时，在城内的工兵代表赖福春来到城门口，见城门虽闭，尚未加锁，就上前摇落门杠，守兵也不加阻止，城门豁然洞开，起义军一拥而进。

安定超一队起义部队也来到军装局取军械弹药，见身穿便衣的焦达峰被兵士捉住，便上前解释，请他们放人，原来兵士不认识焦达峰，见他拿枪

在军装局往来，以为他是奸细，便把他捉住。

谭延闿正在抚署同余诚格议事，忽一仆至，称报新军攻城，余诚格道：“没有的事，再去打听。”谭延闿即欲辞去，起身道：“今日中丞有事，改日再谈。”余诚格亦起身解释道：“今日新军开往株洲，他们误会了，所以才说新军攻城。”谭延闿刚欲下楼，又一仆至，道：“报告大人，新军进城了！”余诚格还是不信：“没有的事，再打听罢。”谭、余刚下楼梯，又一仆至：“报告大人，新军已到了贡院东街！”余亦不信：“没有的事！”但他又道：“你们准备去罢。”余对谭道：“回去拜上老太太，请她老人家放心，没有甚么事，不要紧的。”谭延闿向余诚格点头而别。

新军到抚署，抚署卫队即投诚。余诚格见势变，出来向起义军士兵道：“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他令仆人将他亲书在白布上“大汉”的标语悬挂在桅杆上，自己便进堂内，钻进后院的洞内，逃往小西门外的洋行，乘轮避往上海。

黄忠浩听说势变，便骑马带领几个卫兵奔往城门指挥，同一队起义军相迎。起义军并不认识黄忠浩，黄的卫兵故意大声道：“这就是黄忠浩。”起义军立即把黄忠浩击毙，尸体落下马去。

新军占领了长沙城，整个起义过程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反抗。

焦达峰在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问题，一些同革命党人有联系的士绅参加了会议。

焦达峰首先讲话：“我是奉孙文的命令来的。孙将湖南的事交给了我。”于是，大家推焦达峰力湖南都督。

陈作新忽然当众对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焦达峰道：“原议并无副都督一职，湖北也没设副都督，你当都督好了。”“我不是和你争都督，我只要当副都督。”同陈作新私交很厚的黄瑛见焦、陈意见分歧，便小声地对常治道：“你的声音洪亮，你就提名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由大家去决定。”大家听到常治的提议，一阵掌声通过了。

焦达峰提议推举谭延闿为民政部长，阎鸿飞为军务部长，一致通过。

新政权一成立，立宪派便开始争夺领导权。22日晚，军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谭延闿突然提出设置临时参议院的计划。焦达峰道：“这件事，明天再讨论如何？”谭延闿坚持：“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焦达峰询问大家的意见。曾杰、吴孔铎同意设立。文经纬道：“议会是应该设立，但现在就设，未免为时过早，我们的一切设施，都在草创时期，此刻设立议会，可能对革命政府的工作，发生牵制。”大家急于散会休息，对文经纬的意见没有注意，就匆匆忙忙决定设立临时参议院。

次日清晨，谭延闿便将临时参议员名单交给焦达峰，请求即发聘书。

这天下午，谭延闿便召开临时参议院议员第一次会议，这些议员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会议选举谭延闿为议长。临时参议院一成立，便要夺都督之权力，制订《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命令必先送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才可发交各属执行。未经参议院盖印的，各机关得拒绝执行，参议院认为应该兴革的事宜，可先行议决送请都督发交各属执行。参议院的决议，都督不同意时，可以送还请求复议，经复议后，已盖院印，都督不能再持异议，当即执行。

照这样做来，临时参议院总揽一切大权，都督只是个傀儡而已。



焦达峰看到《都督发令条例》，愤然道：“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先行取消参议院。”谭人凤于当月26日到达长沙，看到这种情形，不满地道：“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30日，在谘议局开会商议都督府各机关组织职能时，谭人凤、曾杰、阎鸿飞等坚决主张取消临时参议院和军政府，另订章程，一切军事、行政、理财、司法均由都督掌握。

这个主张得到多数人赞成。

次日，焦达峰召集全省各界开会，公布取消各机关，谭延闿当场辞去临时参议院议长之职，愤愤而去。

起义的新军驻长沙的人数不多，军政府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准备援鄂，便招兵买马。

应募入伍的新兵有会党群众，他们是焦达峰联络来长沙参加起义的各地洪门会会员，他们涌入长沙：“焦大哥作都督，吾洪家天下矣。”这些人无器械，无戎装，则皆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是汉官威仪，若戏剧中之武伶装束。应募入伍的还有青年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18岁的毛泽东在湖南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一个革命党人来校作鼓吹革命演讲，毛泽东和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朝政府，号召同学行动起来，参加革命，建立民国。

毛泽东异常兴奋，认为武汉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需要更多的人去参加战斗。他决定和几个同学一起弃学从戎，参加革命军。但是，毛泽东不愿参加由学生入伍组成的学生军，认为学生军的基础太复杂，而去正规军报名投军，被编入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

他在营内同班长以及大多数士兵交了朋友，被称为“秀才”。还同士兵们热烈地议论社会主义问题。

招募新兵，以49标各营为基础，添募部分巡防兵，新编独立第1协，在协统王隆中率领下乘轮船赴鄂。这支部队开拔后，使湖南革命党的实力处于空虚状态，因新军49标是发动长沙起义的主要力量。

独立第1协开拔后的第三天，即取消参议院的那一天，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杀害了。

发动叛变的是原新军50标第2营管带梅馨。长沙起义后，军政府不仅留用了他，还任命他当标统。梅馨不满足，要当协统。焦达峰也同意。但他又不愿受镇统的管辖，要当独立混成协协统。焦达峰道：“独立协的名目，原议是没有的，等和大家商量后再说。”梅馨很不高兴，便在士兵中煽惑：“焦达峰只有会党，不喜欢新军，我们不杀他，他就会解散我们。”士兵中早有对焦达峰用人以会党分子为多不平。焦、陈两都督亦自知不满人意，屡次出有谕帖，声明草创伊始，用人行赏多有未当，此后应由士兵具折呈报，按照升赏；委任各种人员，应由各总机关甄别去留。另有一部分士兵没有发饷，对焦、陈强烈不满。焦、陈对于自己私人又特别照顾，又引起士兵不满。梅馨便同部下吴家铨、袁富荣密谋杀焦、陈两都督，由吴家铨领一队至都督府杀焦，袁富荣领另一队趋北门杀陈。

这日，都督府忽然接到报告，说许多人在和丰洋火局挤兑。都督府正在商议，忽又有人对陈作新道：“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自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陈作新办事素来漫不经心，匆忙带了卫队两棚，亲自骑马向和丰洋火局进发。

路经文昌阁附近一家成衣铺门前，袁富荣带领的预伏在那里的一队叛军拥出，将卫队缴械，另有一叛兵使马刀劈向陈作新，陈拔枪不及，跳下马来，抓起一条板凳，将那人砸死，陈作新连中几枪，倒地而亡。

吴家铨一队叛军冲入都督府，假索饷为名，要焦达峰接见，那焦达峰和从浏阳赶来的会党领袖龚春台共进午餐，听卫兵报告，把龚春台送出仪门，与叛兵相撞，叛兵将焦达峰拥出府门，达峰道：“你们要怎么办？”叛兵道：“要杀你。”“要杀就在这里。”焦达峰说完，就在都督府前坪立着不动。

叛兵乱刀将焦达峰砍死。吴家铨用马刀割下焦达峰衣襟，蘸着血在照壁上写：“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应予处决。”写毕，用脚踢几下尸体，便结队往东而去。

叛兵涌到戛子桥谭延闿寓所，哗呼：“谁为谭延闿？”谭延闿不明来意，坚不肯出，叛兵将他抬上轿子拥入都督府，推他为都督。谭延闿赏叛兵 500 金。

谭延闿虽任都督，湖南局势仍动荡不安。长沙城内风传，革命党人要为焦、陈报仇。

黄兴得知湖南形势，派人给谭人凤、周震麟送去一封长信，要他们稳定湖南局势。湖南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既然谭延闿已被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

周震麟等召集新旧两军集会，发表演说，旌恤了焦、陈两都督，以明是非；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不要相互歧视、排斥，严守纪律。那谭延闿令厚葬焦陈二人，亲往致祭。

湖南援鄂部队开至鲇鱼套，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以分革命之势，亦惟有沫血饮泣，与清军拚生死而已。

谭延闿任都督，立宪派人在湖南掌握大权。常德巡防营西路统领陈斌升便杀害焦达峰派去的西路招讨使、同盟会会员杨任，剖腹取心致祭黄忠浩，造成复辟惨案。

但谭延见黄兴、周震麟、程潜等同盟会人胸襟开阔，深受感染，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能接受革命党的一些主张，几个月后，他也参加了同盟会。

## 第十二章 “兴汉灭旗”

在湖南起义的同一天，稍迟几个小时，陕西便发生了起义。领导起义的核心力量，便是在陕西的同盟会会员。

陕西较早的同盟会员便是井勿幕。井勿幕，1888 年生于陕西蒲城，字文渊，是民国初年在榆林做了 20 多年陕北镇守使的井岳秀的弟弟。1903 年赴日本东京，入东京大成中学。1905 年参加同盟会成立会，旋奉孙中山命回陕西建立支部。他虽年少，活动却很见成效，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新学，也能同中年秀才举人们做诗谈旧学。他从小跟着武秀才的哥哥习武，对于十八般武艺也都会耍，能与江湖之人结交。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展同盟会会员 30 余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子端（字欣）、焦子静（字冰）、李仲特（字异材）、李桐轩（字良材）、张拜云（字铁）等，大多是学界中人，井

勿幕任支部长。

次年，井勿幕再赴日本，与赵世钰等在东京组织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井勿幕从日本回陕西。那王子端、李仲特、焦子静、张拜云等已在西安创办健本学堂，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活动据点。

1909年11月，陕西谘议局成立，议长是进士王锡侯，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和倾向革命的举人郭希仁被选为副议长，李仲特和井岳秀等为议员。郭希仁不久便加入同盟会。

郭希仁在一次同盟会的会议上，痛陈革命乃大义，事不可视为儿戏。王子端、焦子静等听言，众相顾失色。1910年5月，陕西成立国会请愿团，推郭希仁和王敬如为代表，进京请愿。去后，同盟会开会，改推郭希仁为会长。

井勿幕比会长郭希仁更激进，他在陕西各地奔走，在三原办了畜牧场，说要预备养好了马将来革命时编马队用。因没枪械弹药，便于1911年5月返回西安，筹措资金，派张奚若到日本购买手枪和炸药。

张奚若到日本，找吴玉章、洪承点、任鸿隽等，都说买手枪、炸药没问题，运回国内困难，尤其上海检查时不易逃过。

张奚若离开西安不久，四川省同盟会主盟人，曾在四川多次领导起义，发动广安、嘉定起义，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的熊克武，应井勿幕邀约抵达西安，同井勿幕、郭希仁、胡景翼等会面。他们商讨了今后的活动办法。井勿幕表示要在陕西关中地区举义，如果事成，便可以震动南北，但因交通不便，军械弹药缺乏，须要多方准备。他请熊克武折回上海购买制造弹药的机器。

熊克武到上海找到宋教仁、陈英士、于右任、居正等，报告了陕西形势和他来上海的任务。宋教仁等道：只要武昌起义成功，则陕西方面的军火接济自然容易解决，为陕西购买弹药机器的事可缓后一步。

井勿幕购买枪械弹药没着落，也就难以发动起义。

但是，另一批在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着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担任营副的钱鼎成为主要人物。

钱鼎字定三，陕西白河县人，由陕西陆军小学推荐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入步兵科就读，加入同盟会，被推为陕西同学会会长。1909年他毕业后回陕西，先在新军1标当排长，后升3营营副。这是一个温文而且多才的人，有周密计划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决定策略不轻出口，同仁都愿和他接近。同钱鼎一起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回陕西新军的，有充当队官的曹位康和党仲昭，充当排长的张钊、张宝麟，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陕西新军中原来已有同盟会会员4人，即队官朱叙五、张作栋、彭世安，以及司务长张光奎。

陕西新军中还有一名同盟会员张凤畀。张凤麈字翔初，陕西咸宁人，家里开铁匠铺。

他19岁中秀才，1902年初入陕西武备学堂，因成绩优异，没毕业便被陆军部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并加入同盟会。因与留学生监督李士锐有矛盾，毕业回国后，受一年内不准录用处分。1909年回西安闲居。次年先后出任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第39混成协司令部参军、参议兼2标1营管带等职。他学术水平较高，办事认真公允，平素为人深沉果断，谦虚诚恳，获得一般中下级军官好评，享有很高威信。

张钊同张凤畀曾在武备学堂是同学，祖籍又都是河南，常在一起无话不谈。在谈论国家兴亡，以及孙、黄倡导革命问题时，意见相合。张凤戢道：

“我们是军人，搞革命切要机密，以免僨事。目前处境困难，未便直接参加，以免暴露。”张钊介绍钱鼎同张凤儁见面，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钱鼎、张钊把准备革命的事告他，他虽不直接参加革命行动，但他另有一套做法，他从全协的军事训练中，尽量在中下级军官中树立自己的威信，时机一到，便出来参加起义。

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西安，陕西震动。官府对新军很不放心，计划把西安的新军全部调离。张钊先从巡警道机要科长公恩傅那里得到消息。张钊和钱鼎会面商议，为了保密，两人用笔谈达4个小时，认为时机紧迫，决定发动起义，并秘密串连，商议起义日期。最后确定10月22日起义。

关于起义领导人问题，钱鼎是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核心人物，又有同盟会、哥老会双重身份，大家推举他为领袖。但钱鼎觉得自己的才能和声望不足以当此重任，主张由张凤闾担任。由于张凤闾平时态度持重，不少革命党人对他并不了解，担心他没有参与革命活动，仓促间万一不允，将暴露机密，坏了大事。钱鼎、张钊力主同张凤冗接谈。

10月21日傍晚5时，张凤闾带第1营从临潼野外演习归来，张钊便在西安西关梢门外途中通知他：事已紧迫，要他晚间在营部稍候。

晚上7时，钱鼎、张钊来到营部见了张凤闾，因营附、旗人恩厚在室内，他们3人只好出去到大操场，在黑暗中商谈。

钱鼎对张说道：“时机紧迫，不能再有迟延，决定明天起义，你负责指挥。”张凤翔默然沉思一会，毅然答道：“这是革命大事，既承大家不弃，要我出来干，这是义不容辞。成功了是国家民族之幸。万一失败，你们都说由我一人主使，千刀万剐我一人承当。既然决定明天起义，那就事不宜迟，明早发饷后，各方面的主要人在林家坟开会，决定起义部署。”钱、张二人高兴地同意。分手后，钱鼎对张钊道：“我们平日没有看错。”22日上午7时，协部及督办公署、藩台衙门的委员分别到军营，点名发饷，以防顶替。

8时放假，旗籍和同革命没有联系的军官，纷纷回家或外出。张凤翔以参军身份命令各营目兵擦枪、整理内务、听候命令，再行出营。

参加会议的各营代表和新军中的洪门帮会代表75人，陆续来到林家坟，林家坟在新军营房外的古庙景教寺右面，有10多亩地的松柏树林，是士兵平日聚赌的去处。

张钊宣布：“决定今天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公推张凤翔为指挥，钱鼎为副指挥。”众人表示赞成。

有人提出起义日期推迟到26日或28日。

张凤翔道：“我们响应武昌起义，推倒清政府，这是革命义举，是生死大事，成功是国家民族之幸，失败就流血杀头，不是儿戏。据确实消息，巡抚衙门已决定把我们新军最近几天调走，还开了要逮捕的革命党人名单。时机已不许我们再迟延，迟延就是失败，因此必须当机立断，今天就干。我蒙大家不弃，被推举出来，这是救国大事，义不容辞。我向大家有个要求，要听我命令，还要互相团结、不论同盟会还是洪门帮会都是一家。成功大家都是革命功臣，都有前途；万一失败，我一人承当。”众人无异议。张凤翔宣布起义部署和各人的行动任务：上午行动，记号用白布缠左臂；炮、骑兵分骑马和徒步零星入城，在高等学堂附近集中，听候招呼，这一路由张钊指挥；1标听到枪声后，向陆军中学前进，收缴该校枪弹，编制学生，占领鼓楼及北城门楼，从满城西北进攻，这一路由钱鼎指挥；二标进攻军装局，取得子

弹后，由东、南两方向攻满城，工、辎两队随 2 标进攻，这一路由张凤翔指挥。起义的口号是“兴汉灭旗”。

张钊带领两骑，先进西门，侦察军装局附近情况。左队队官朱叙五随即带领 20 多骑由西门续进。党仲昭带 30 骑到骑兵营监视出入，从南门进城。其余徒手兵三三两两，形同闲游，由西门进城，顺着僻静街巷向军装局进发，到高等学堂门前空场等候。

张钊骑马途中，遇见省谘议局议员严庄，嘱他到谘议局通知郭希仁听到枪响，便是起义。

已有 28 骑来到军装局附近。张钊见到已有宪兵和警察前来干涉，怕迟延会生变故，便下令进攻军装局抢枪。起义士兵没有子弹，将军帽掷向天空，大声喊杀，蜂拥而入。

军装局毫无戒备，巡防队士兵大半出外游玩，少数士兵见冲进的人多势猛，不敢抵抗，都从后门溜走。

起义军士冲进南院库房，见铁栅门上大铁锁长达尺余，便找来 3 尺长的青石条撞击，铁栅门洞开。起义军士进入楼内，见枪弹箱堆积高与梁齐，乃从上层推箱坠地，木箱破裂，将枪枝子弹运出库房，实弹朝空发射，枪声震天。炮营及其他徒步士兵赶到，控制了军火库。张凤翔率领的队伍迅速来到军装局，取得枪弹后，向西安城内东北隅的满城进发。

钱鼎带领一队起义军队来到北校场陆军中学，学校不加抵抗，便开门迎接他们。钱鼎率队将学校存贮的 1000 枝枪和 16 万发子弹取出，发给起义部队，按计划攻占全城，并组织陆军中学学生 700 余人占领藩台衙门，保护存有 70 余万两银子的藩库。

陕西官员正在谘议局开会，听到枪声四起，仓皇失措，立刻作鸟兽散。有人弃去官服，藏匿在民家，不敢回衙。陕西巡抚钱能训慌忙躲在一个随从家里，用手枪自杀未遂。

起义军攻击的最后目标便是满城。满城是西安的城中之城，满城四周筑有城墙，城内全是旗民 2 万户，有步枪 1 万余枝，旗兵四五百人，不许汉人入城，汉人经过这里都侧目而视。满人将军文瑞，听到西安城内枪声四起，立即下令关闭南西两面通汉城的城门。

满城骑兵几次冲击起义军，均被起义军击溃。

起义军大炮轰击满城，击中旗兵火药库，弹药爆炸，旗兵伤亡极大，顿时陷入混乱，失去抵抗能力。起义军中的哥老会头目刘世杰、马玉贵等，率部从被炮兵轰塌的满城城墙处，冲入满城，其他起义部队也攻进满城，在满城内逐巷逐院搜索。那起义的部队都是汉人，一贯对旗人不满，杀了些不该杀的旗兵和家属。张凤翔得知，急忙禁止。文瑞自知不能幸免，便在混乱中跳井自杀。

西安光复，张凤翔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名义，发出安民布告，但局势一时难以稳定。

新军士兵多是会党群众，帮会势力极大。陕西地方贫穷，连年灾荒，民众生活日趋暗淡、游民遍地，流传着“想当兵，拜仁兄”的谚语，当兵的多数是洪门帮会的弟兄。

这些士兵虽然对清政府强烈不满，但缺少革命意识。高级军官大部逃散后，军队中的哥老会头目们便各自运用洪门的组织关系发号施令，自立山头。起义胜利后，大批军火落入哥老会头目手中，他们擅自扩编军队，任意

委官招兵，自立系统，个个气焰万千，成为难以驾驭的力量。在会党首领中万炳南和张云山势力最强。

万炳南是湖北郧西人，当兵后来到西北，加入洪门，在行伍二三十年之久，开山结友，麾下众多，形踪诡秘。他先在巡防营内称雄，后转入新军，是1标3营下的正目。他因自己是老资格的哥老会头目，号召力大，认为军政府最高权力应属于他，他的党徒们也说：“我们只认识万大统领，不识什么张大统领。”万炳南又有谋士、同盟会会员陈素子相助，便有不可一世之概。

张云山是陕西长安人，幼年失学，入行伍，曾转战青海、新疆。他吹号技术名噪关中，升至协部司号官。他拥有一批帮会群众，用红绸包裹铜铡，每次外出，铡刀队跟其后，前呼后拥。后请清朝翰林宋伯鲁为军师，逐渐改变作风。

张凤 使用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发布告示，万炳南、张云山等对用“复汉军”名不满，主张改用“洪汉军”，并要洪门哥老领导。万炳南表示要当大统领。

10月25日，张凤 召集各方负责人来军装局开会。他表示谦让，道：“起义之初，蒙大家一致推举我负责指挥，为国家民族我是义不容辞。承大家协力一致，现在取得胜利，以后要做的事很多，我资望、能力均属不够，请大家另选贤能接替大统领之职。”钱鼎立即起身道：“我们起义，很快就能成功，张大统领指挥有方，功劳最大，大家应当一致拥护。现在西安虽然平静，但豫、甘两省清军势力强大，前途如何，未敢逆料，我恳请大统领再勿谦辞，准备对敌。”张凤 部下正目、洪门帮会舵把子马玉贵、吴世昌相继发言，表示拥护张凤 。万炳南没有参加会议，其军师陈素子刚要讲话，张凤 部下、会帮分子陈殿卿猛然起立道：“大家一致拥护张大统领，没有别的可说。谁若不顾大局，我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经过多次商量，又选举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大都督，马玉贵为粮饷大都督，刘世杰为军令大都督。后来，张凤 为陕西军政府都督。

陕西起义的次日，即10月23日，江西九江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三声炮响，宣告起义。

九江沿江交通便利，早有同盟会会员林森、吴铁城等在那里创办书报社，灌输革命主义于军、学界。林森字子超，1867年生于福建闽侯，是同盟会较年长的会员。

武昌首义的第二天，一位同盟会会员身着新军服从云南昆明经武汉来到九江，他就是在云南新军工作的九江籍人蒋群，字君羊。蒋群在江西督镇公所任过事，同驻九江的新军第53标标统马毓宝是旧交，同该标下属的3个营的管带范福增、黄焕章、何文斌是军校同学；同九江炮台总台官徐公度、统领戈克安等是老朋友。他在这批军官中奔走相告，运动反正，进展迅速。清朝派庄守忠率55标4个营来九江，又派周树森为九江炮台总稽查官，名为充实江防，实为监视53标和九江炮台。蒋群见事不宜迟，就同马、范、黄、何、徐、戈约定，10月23日起义。

金鸡坡炮台三声炮响，各营便放枪一排，起义军臂缠白布，向道府两署进攻，遂唾手而得。九江道保恒和知府璞良，携同眷属逃避无踪。

起义军出南门，进攻驻扎在火柴厂的第55标。标统庄守忠和江西按察使张检，立即逃往省城。九江起义，兵不血刃。

马毓宝、蒋群、徐公度等在道台衙门商定，宣布九江独立：马毓宝为都督，蒋群为帮办军务兼参谋长，刘世均为参谋次长，徐公度为炮台总司令，戈克安为副司令，吴铁城为总参议，吴照轩为副总参议，林森担任交涉事宜，罗大任为政事部长，舒先庚为财政部长。

九江刚刚独立，又有一同盟会会员李烈钧来到九江。李烈钧字协和，1882年生于江西武宁，中过秀才。20岁入江西武备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在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归国，任江西新军54标一营管带，积极宣传革命，事泄赴云南，任陆军讲武堂教官兼炮兵科科长、陆军小学堂总办。武昌起义时他去北京观操。起义发生后，秋操停止，他便潜返九江。李烈钧是位有才能和胆略的人，蒋群要他代替自己出任参谋长，他自己则去南昌，发动起义。

九江光复，南昌大震。南昌的新军只有27混成协，且许多人倾向革命，又有同盟会会员蔡公时从中鼓动。10月28日，新军中革命党人20余人，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军官有：马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工程队官蔡杰、排长韦兆熊、米洛宾、司务长沈鹤年、辎重队官宋炳炎等。推选方先亮、蔡杰、宋炳炎为司令，蔡森为独立马队指挥，韦兆熊为前卫司令，决定10月30日晚举事。蔡森为爬城队队长，由他挑选勇敢精壮士兵充当爬城队员。

蔡森率领爬城队，爬进南昌城，警察和抚台卫队早有联络，起为内应，把城门全部打开。方先亮率骑兵营，蔡杰率工兵队，宋炳炎率辎重队，各路起义部队，蜂拥进城。

警察用石油纵火焚烧皇殿、抚台衙门两侧的鼓楼、旗杆。

江西巡抚冯汝骥听到满城枪声，赶快从后门逃走。

蒋群提议在万寿宫开会，宣布江西独立。在推选军政府领导人时，军队方面推举吴介璋为都督。

吴介璋是江西新军第27混成协协统，在江西军界资望高，曾任过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兼陆军测绘学堂总办、督练处总办等职，多数江西新军军官是他的学生。吴介璋却不肯任都督，提出：“巡抚还在省城，都督应由冯汝骥担任。”冯汝骥得知消息，道：“要我仍做抚台，司道照常办事，则可。要我为都督，宁死不愿，即砍头亦不做。”最后商定仍由吴介璋任都督，推刘凤起为民政部长，雷恒为财政部长，李瑞清为文事部长。李瑞清不肯任职，以副长熊育锡代理。

吴介璋宣布就都督职，规定以青蓝市衣为礼服，男人剪去长辫，废除作揖、跪拜等旧礼。吴介璋对冯汝骥留居省城不安，请蒋群去要冯汝骥的印信。冯汝骥道：“因恐事情发生，已把印信差人送京。”蒋群不信：“这不能取信于一般军民。”冯汝骥取纸笔书写“印已送京，决无他虞，请各界安心。”署名后交给蒋群。

2日后，冯汝骥离开南昌赴九江，在九江服毒自杀。

江西境内，袁州光复，推新军第54标二营管带胡谦为都督。鄱阳光复，推防营黄金台为都督。赣州光复，推蔡锐霆为都督。

吴介璋办事庸懦，任用非人，故视事10日之久，亦无甚表现，名虽改革政治，其实仍旧时专制政体故辙，致令外间啧有烦言。他扩充军队，军饷开支增大，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引起民众不满，又受到新军第55标标统冯嗣鸿等人反对，局面难以维持，只得离职出走。

江西各界在军政府集会。原第 27 混成协骑兵营排长邹恩灏，有去武昌参加革命活动的身份，便报告道：“吴都督离职，不知去向，本会急须决定继承人选。我在武昌时曾谒见黄克强先生，谈到江西光复后都督人选，我提出彭程万最为适当，黄克强先生赞同，并发了印信，交我带回江西。”到会人等，均无异议。

彭程万是留日学生，起义前在江西测绘司工作，又在测绘学堂任教。虽然积极响应起义，却无实力和影响。他起身道：“吴都督既已离职，不知去向，地方秩序不可无人负责，大家如要我出来，我便维持几日。一面打听吴都督去处，请他回来复职。至于黄先生发的印信，我暂时不能接受。

本会可去电告黄先生，说明今日会议情形。”彭程万也无法控制江西局势，处境亦难。南昌起义时的骨干方先亮、蔡杰、蔡森等，担心形势再变，秘密开会，酝酿倒彭迎马，派人去迎接九江都督马毓宝来省城，做江西省都督。

彭程万得知方先亮去九江迎马的消息，便自卸江西军政府都督职务，又电劝袁州、赣州、鄱阳都督胡谦、蔡锐霆、黄金台取消军政分府，让马毓宝做江西都督，以谋统一江西。胡谦等人表示赞同。

马毓宝便来南昌就任都督，实行援鄂、锄奸等措施。但马毓宝亦没有控制江西局势之能力，众人便推李烈钧来南昌任都督，那李烈钧办事之能力，处事之果断，为军民所倾服。

## 第十三章 山西立威

陕西起义后的第 7 天，山西便在 10 月 29 日响应。

山西、陕西地域毗连，两省革命党人早有联系。他们曾约定同时起义，相互策应。

陕西起义后，山西群思起义，举事如箭在弦，随时都可爆发。

山西革命党人力量，主要在新军中，新军中有一批军事人材，他们大多是留日学习军事的，起义后被推选为都督的 28 岁标统阎锡山，就是其中之一。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堂名斌役堂，是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他 6 岁进入小堡私塾，学习认真，能熟读、背诵课本。10 岁丧母，受到很大痛苦和刺激，有时沉默寡言，呆若木鸡；有时像一匹脱缰野马，狂奔乱跳，且好打抱不平。15 岁到父亲在五台县城办的钱铺里当小伙计，与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增长见识。他探行情、记帐、算利息、讨债，什么都干。学会了精打细算，牟取暴利，投机钻营。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摘录了许多古代圣贤修己治人的名言要语，名曰“补心录”。

1900 年，阎锡山的父亲在“打虎”市场上折了本，欠了债，一时间，讨债、打官司的人涌上门来。他两手空空，一筹莫展，招架不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乘着黑夜，悄悄离开五台县城。凤凰落毛不如鸡，只好给人当帮工。阎锡山也落了个走街串巷卖饅饼的下场。

但阎锡山必然比他父亲精明，18 岁混上个司厰纠首，相当于村长。时



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德军进攻五台县龙泉山，阎锡山被清军拉去做杂工，吃尽了苦头。他预防清军扰害村民，偷卖了继母首饰，纠集壮丁，组织武装，保卫村庄，备受村民称赞。初露头角的阎锡山，树大招风，引来了络绎不绝的讨债人，父子俩人躲避他乡，先在忻县的一家药铺帮忙，后奔太原。

阎锡山拜一位在太原开“裕盛店”的同乡魏老五为干爹，在裕盛店当伙计。他交结了一些朋友，与黄国梁、张瑜拜为“桃园三结义”，阎年龄小，为老三。

阎锡山涉世后，饱尝了社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刺激着他的爱国心，清朝腐败无能萌发了他忧国忧民之思想，他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他报考了武备学堂，论文有见地，口试对答如流，即被录取。他的结拜兄弟黄国梁、张瑜一同考上。

1904年，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满三年，报考日本留学，他同黄国梁、张瑜以及朋友温寿泉、乔煦、焦纯礼、姚以价、王宝善、金凤巢等被录取。阎锡山、姚以价还是公费留学。

阎锡山东渡日本，在东京入振武学校学习。1905年，阎锡山加入了同盟会，他对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一语不解，便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给他讲解了30分钟，使他茅塞顿开。

同盟会设立各省分会，山西分会干事是谷思慎，山西分会会员还有温寿泉、荣炳、荣福桐、景定成、赵戴文、何澄、王用宾、张瑜、乔煦等人。同盟会在留日军校学生中秘密地组织了“铁血丈夫团”。山西籍学生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等人加入了这个组织。“铁血丈夫团”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团规，规定每个团员都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同盟会山西分会积极派人回省进行革命活动，第一次回省的荣炳在武备学堂学生中，发展了常樾、王嗣昌、张煌等人参加同盟会。以后，谷思慎、景定成等回省，学校中又有一些人参加了同盟会。

1906年，阎锡山、赵戴文利用假期回省运动革命。临行前，他们接受同盟会总会要他们在华北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势力的使命，并领了两颗小型炸弹。轮船抵达上海港时，阎锡山得知海关检查非常严格，便将赵戴文携带的炸弹藏到自己身上，对赵说道：“如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

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戴文道：“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以我站前列为宜。”海关检查人员果然前松后严，阎锡山安全地渡过了这一难关。赵问阎为何有先见之明，阎道：“事到危险宜放胆，不可畏缩，畏缩会让人生疑。”阎锡山和赵戴文在山西活动了3个月。假期满之后，赵戴文留太原发展同盟会会员，阎锡山返回日本，进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实习结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他在这里同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绥光等人结识，一起分析时事、研究政情。

1909年，阎锡山毕业归国。山西革命形势日益发展，革命党人不仅在学界发展组织，而且在军界、商界和其他阶层发展了许多同盟会员。但政治局势复杂，拥护革命的有两派，一派以省咨议局议长、清翰林梁善济以及咨议局副局长、清举人杜上化为首，称北路派；一派以《昔阳日报》主笔王用

宾、北京《国风日报》主笔景定成，以及温寿泉为首，称南路派。南路派比北路派激进。

阎锡山绕道北京，谒见清朝陆军部左丞姚锡光。他自称是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谈吐谦恭而庄重，得到姚锡光的赏识。姚的儿子姚鸿法是山西新军协统，他写信嘱咐儿子优待阎锡山。阎锡山回太原即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3个月后升为监督。

阎锡山在山西上层搞社交活动，拜访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标统夏学津，又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但阎锡山很快意识到，夏、丁不去，他很难夺取军权。于是，他同同盟会会员李蒿山、张树帜等人，联络北京《国风时报》、太原《晋阳公报》制造社会舆论。时值“交、文禁烟惨案”发生。交城、文水产烟区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全部铲除。两县群众拥往巡抚衙门请愿，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多人，造成流血惨案。丁宝铨与夏学津之妻有暧昧关系；标统齐允贪污腐化。这些丑事公诸于报，社会舆论大哗，丁被朝廷给予降职留任处分。

清政府为选拔军事人才，下令召集留日归国学生到北京会试。会试结果，温寿泉成绩最佳，阎锡山、黄国梁、姚以价、乔煦等人为上。温寿泉为陆军炮兵科举人，提为副军校，阎锡山等为陆军步兵科举人，授以协军校。不久，温寿泉任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监督；阎锡山升为86标副标统，黄国梁升为85标标统，乔煦为86标3营管带，张瑜为1营管带，姚以价为85标2营管带。革命党人在新军中有了相当力量。

阎锡山同温寿泉、赵戴文、张树帜、南桂馨等人策划，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和模范队组织，以研究学术和训练表演为名，联络团结革命同志，鼓动革命，作起义准备。

清朝调江苏藩司陆钟琦为山西巡抚，丁宝铨被免职。陆撤了夏学津的86标标统之职，命阎锡山为标统。阎推荐南桂馨为86标军需官，仇亮、常樾为陆军督练公所科员。

阎锡山见新军中多是老兵，那些老营混子纪律松懈，军队不易掌握，便提倡征兵，得到有关方面支持，便招劳动农工子弟入伍，兵员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山西督办姚鸿法提出老兵逐步退伍。但很多老兵是同盟会会员，又是班长之类的骨干，遣散老兵，对革命党的力量有较大影响。阎锡山等人决定筹款，建设农庄，开设店栈，安置退伍老兵。

南桂馨、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杨彭龄等人，于1911年中秋节召集退伍老兵八九十人，以聚餐为名，为将要退伍老兵饯行。席间歃血饮酒，立誓结盟，约定退伍时，按计划进行。山西当局怕酿成事变，不敢贸然遣散老兵。

同盟会会员景定成、谷思慎、王用宾等人到北京办《国风日报》，抨击时弊，揭露山西统治者劣迹。南桂馨等在太原创办“振兴派报社”，与《国风日报》呼应，开展革命活动，革命思潮传遍全省。

山西巡抚陆钟琦思想守旧。陕西起义那天，他急电平阳总兵谢有功调集所部步马7营，加强黄河河防，他又召集督办姚鸿法、协统谭振德密谋对策，认为新军绝不可靠，决定将新军调出太原，85标和86标分别调往晋南和晋北，加以分隔，将驻在外地的巡防营调来省城，以资震慑。85标革命党人多，先行调离，规定部队先开拔，后发子弹。因黄国梁、姚以价等力争，才允许发给子弹4万发。

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南桂馨、乔煦、赵戴文感到形势危急，便在 85 标标统黄国梁家秘密集会，商议对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 85 标遵令开拔，等领到子弹后将军队开往韩信岭，伺机返回太原，举行起义；二是不离开太原，待领到子弹后即发动起义。

决定采取第二方案。

却在这时，一位革命党人张树帜，从陕西返回太原，即找阎锡山商议起义之事。阎锡山道：“我同志等，逢此时机，尽可举事，想君早有筹划。我省若不速为起义，以分清兵势力，时机一失，吾辈革命有何价值，即我前辈数年辛苦，竟成画饼，何面目对武汉同志乎？”张树帜道：“即然如是，决不失此宝贵时机。”阎锡山道：“现在事体大，非靠军队不能成功。不过，目前有机可乘，陆钟琦要 85 标到韩信岭南驻扎，我们可以军需品一时难以备齐为借口，罢兵不动，陆钟琦必然以违抗军令论处，我们就先发制人，杀 85 标反动军官 3 营管带熊国斌而起义，陆钟琦必定命令我们 86 标进攻 85 标，我以 86 标以同室不相操戈为辞，拒绝执行命令，并乘机起义。派人逼令陆钟琦出城暂住，我们到谘议局开会，推举都督。”张树帜道：“如此办法很好。”两人作了分工，张到 85 标发动起义，阎找 85 标标统黄国梁商议。

黄国梁已接到命令：10 月 29 日前必须开拔。他问阎锡山是否出发。阎道：“不出发，过不去，你带标部先出发，把队伍留下，你走了，我反好运用。”两人默契，互相配合。

黄国梁因出发命令催逼甚紧，不敢违抗，便同南桂馨率先行队南下。

张树帜到 85 标和缉探队运动起义，又回来向阎锡山报告，劝阎从速起义。阎决定立即起义，道：“85 标官长兵士如能响应，即以该标 2 营攻抚署，本标 2 营接济；85 标 1 营两队攻警署，两队攻满营，本标 1 营二队守军装库，两队接济攻满营。85 标驻城外，今夜入城，诸多不便，必得翌晨进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事成，我诸同志即到谘议局开会，公举都督。”

事不成，由东门退出，无堪阻碍，以便举兵南下，与陕省民军结合，势力膨胀，好图再举。”阎锡山派张树帜到 85 标发动，嘱咐：“特别注意头目和下级军官，将头目和下级军官运动好，以他们带起军队，逼迫营长。等运动好，即打电话通知我，暗号为‘债讨起’，运动不好的暗号为‘债不能讨’。”阎锡山又道：“你纵使运动不好，也不可离开 85 标的队伍，如本标发动时，你在 85 标能拉多少就拉多少，至少要纠合同盟会员带队响应。”阎锡山又命令刘文英通知张培梅、王赞绪、王栋材、张子奇等，联络军界，准备起义。

张树帜来到 85 标一营，找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等人，商谈起义大事，人愈聚愈众，一时齐集 30 多人。张把阎锡山起义计划当众宣布，众人拍手叫绝，当场推张树帜为司令。

时至半夜，张树帜令人分头到各官长门口把守，劝其顺应革命潮流，响应起义。他又带数人到各官长处，晓以参加革命推翻清廷大义，各官长莫不从命，愿意共图大举。

管带白文惠已走未遇，督队官苗文华，素抱革命意志，蓄谋已久，对起义极表赞成。

张树帜与营队各官见面，宣传革命，同心共举，磕头订盟，誓共生死。明晨进城，严守纪律，勿得抢掠焚毁，致失革命宗旨。随即发布命令，号召全营士兵持枪站队，领取子弹。士兵一呼百应，蜂拥齐集，入军械库自取枪

弹。广大战士将锅碗砸碎，以示“破釜沉舟”决心。

张又派人去 85 标 2 营找同盟会员杨彭龄、王嗣昌联系，告知 1 营决定立即起义，希望 2 营同时起义。杨、王表示赞同。经王嗣昌与各队官联系，众人都道：“我辈素有此意，岂肯任人先我着鞭。”于是，众人行动起来，并将起义之事报告管带姚以价。姚虽不是同盟会员，但对清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愿协同动作，率队起义。

姚以价对阎锡山起义计划颇为赞同。

张树帜见姚以价地位高，兵权在握，遂与苗文华商量，推姚为司令，统一指挥 85 标的部队。

阎锡山召集加入同盟会的 86 标中下级军官来他家开会，商量起义：“我们是遵令开拔，还是起义？”众人同声道：“我们应该起义！”阎道：“85 标不同意怎么办？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众人道：“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有什么关系，85 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阎道：“好罢！那就等待 85 标动静。先把我们 86 标的行动计划研究一下！”午夜，阎锡山接到张树帜的电话，知道运动成功。便让 86 标同志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迎 85 标进城。85 标攻打抚署前门，86 标攻打抚署后门。

抚署侦探瑞禄在阎锡山大门口，见排长李执中出来，拉住他的手道：“你们开会作什么来？”李一时语塞，认为事已败露，造反罪大，便投井自杀。

有人向阎锡山报告李执中自杀，阎心急如焚，仍命令众人随时同他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阎午夜骑马来到 86 标标部，召集军队，发布起义，并将反动军官二营管带瑞壖囚禁起来。

姚以价一夜没有合眼。次日凌晨，他集合全体官兵誓师起义。杨彭龄、王嗣昌、苗文华发表演说，阐明起义宗旨和革命重要意义。姚以价大声疾呼：“满清入至，虐我汉人两百余年，可算是穷凶极恶；清朝皇帝昏聩，官吏贪暴，压制人民，虐待士兵。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伎俩，谄媚外人，压制汉人。

我们不要当这家奴，要救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我宁拚个死活，不当这亡国奴。”姚以价声泪俱下，众官兵齐声道：“愿拚死，愿服从大人命令。”姚以价宣布起义命令：“苗文华率一营前左两队直扑满城；崔正春率一营右后两队，夺取军装局，杨彭龄为冲锋队长，张煌为奋勇队长，随本司令直捣清抚署衙门。”姚以价宣布起义军法四条：“一、不服从命令者斩；二、不勇往直前力战者斩；三、扰害百姓者斩；四、伤害外人者斩。”姚以价又派人飞速到炮兵营联络。炮兵营班长于凤山、刘德魁、高永胜得知步兵起义，便立即集合全队宣布起义，将炮拉出来，作好出发准备。管带张治尧企图阻拦，下令全营不许行动，高永胜举枪向张治尧射击，张慌忙逃走。于凤山等便率领炮兵，尾随步兵之后，攻打满营。

10 月 29 日凌晨 4 时，姚以价率 85 标起义军来到新南门，城内早有人响应，打开城门，起义军顺利进城。

各队起义官兵，按照计划行动。杨彭龄、张煌率队进攻抚署，队伍跑步来到巡抚衙门。张煌派两排人分别把守东、西、南三条街和抚署门口。协统谭振德得悉兵变，仓皇持剑赶到抚署门口，厉声道：“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杨彭龄道：“协统也知道革命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请退！”谭振德不听，力阻不退。杨彭龄举枪射击，将谭击毙。起义军一拥冲入抚署，抚署卫兵不作抵抗，纷纷溃散。

巡抚陆钟琦被枪声惊醒，慌忙整衣而出，刚到二堂，起义军已涌入。他勃然大怒：“我来此没有一个月，有何坏处，竟如此对我。”陆钟琦次子陆光熙紧跟父后，右手开枪射击起义军，左手扶其父避退。父子俩人被起义军乱枪击毙。

阎锡山率 86 标围攻抚署后门的巡防队，令 2 营前队 3 排长张培梅，右队 3 排长金殿元率队，从抚署后门西围攻，左队队官王缙绪，后队队官吴信芳带队从抚署后门东围攻。巡抚马队 1 营管带谭金标领队在抚署后门顽抗。阎锡山督兵奋战，顷刻击溃谭部。

姚以价和阎锡山前后夹攻，攻下了抚署。

温寿泉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队占领了省谘议局。

苗文华一队起义军登上城墙，向东冲向满城。满城内的兵丁有些还在家里睡觉，起义军兵临城墙，才吹集合号。起义军居高临下，发起进攻。阎锡山又率队赶来，并调炮队向满城轰击。炮弹如注，枪弹如雨，清军抵挡不住，即由东门向马家花园溃窜，满营悬挂白旗，派人向起义军联络投降事宜。起义军占领全城，太原光复。

阎锡山、温寿泉、姚以价、乔煦、张树帜、张瑜等起义领导人在谘议局召集紧急会议，学界、警界、军界和谘议局均有代表参加，赵戴文、李成林、杨沛霖、徐一清、贾英、姚鸿法等人也都参加了会议。

谘议局议长梁善济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建立军政府，推举都督等。但梁善济反对建立新政权：“官厅不可推倒。”革命党人群起反对，说陆巡抚已被击毙，不推倒官厅，还发动起义作甚？张树帜一气之下，拔出手枪，要击毙梁善济。

梁善济吓得躲到副议长杜上化背后。

阎锡山要大家平静下来，他主张选姚鸿法为大都督，姚因其父任清廷陆军部侍郎，坚辞不就。众人主张选阎锡山为都督。梁善济等人主张投票公举都督，且颇有当仁不让之势。

张树帜担心都督落入梁善济之手，一个箭步跳到主席台上，将梁挤到身后，大声疾呼：“我们选阎锡山为大都督，不要选票，举手表决。”他即高举左手，要众人也举手。

正当一部分人迟疑张惶之际，周玘掏出手枪拍案而起：“赞成的举手。”于是，个个举起手来。张树帜检查，即宣布：“一致通过。”会议又选举了温寿泉为副都督，杜上化为总参议，姚以价为总司令。推举完毕，众人拍手称赞。

阎锡山、温寿泉等，立即组织山西军政府：都督、副都督以下，分设七部，军政部部长温寿泉兼任，副部长马开嵩；参谋部长黄国梁，副部长孔繁蔚；军令部长常樾；政事部长景定成；财政部长曾记刚，副部长徐一清；外交部长乔义生；司法部长张映竹，副部长张宴林、李凤翔。军政府设在谘议局，用黄帝纪元年号，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门前悬挂“八卦太极图”旗。

85 标 3 营管带熊国斌对民军起义极为仇视，产生刺杀都督歹心。这天夜里，熊忽然带着他的全营官兵来找阎锡山，道：“我来保护都督来了。”阎深知来者不善，便道：“好罢！你先命令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熊集合部队返回向阎报告，阎乘其不备，一枪将他击毙，并向他的部下宣布：“熊国斌是要反对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枪架原地候命。不赞成的自动回营。”有两连留下，其余溃散而去。

## 第十四章 血盟人头愿

山西省起义的第二天，云南昆明又举义旗。

云南籍在日本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人数较多，同盟会云南分会早就在东京成立，分会支部长是吕志伊。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云南主盟人。与赵伸等发刊《云南》杂志及《滇话报》，宣传革命。1908年与杨振鸿等发起云南独立会，发表宣言，同清廷断绝关系，并组织人员支援河口起义。

同年冬赴仰光，与居正同任《光华日报》、《进化报》主笔。1910年返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次年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部地区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

云南省内的同盟分会在1906年成立。同盟会会员杨大铸、徐濂、张大义等先后成立了文明演说会，编刊《云南旬报》，出版《新云南》、《醒滇梦》等书籍，组织云南公学会，以研究科学为名，其实则是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杨大铸得到云南谘议局议长张世勋等赞助，又在昆明设立云南国民大会，以“挽回矿权”为口号，暗中推动革命运动。

在云南新军中，有不少中级军官是革命党人，这些人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其中有37协统领蔡锷，74标1营管带唐继尧，74标2营管带刘存厚，74标3营管带雷飙，73标3营管带李鸿祥，炮兵19标2营管带刘云锋，炮兵19标3营管带谢汝翼，马兵19标教练官黄毓英，机关枪19营管带李凤楼，工程19营管带韩凤楼、陆军讲武堂代理监督沈汪度，讲武堂教官张子贞、顾品珍、刘祖武、庾恩旻（兼炮兵19标1营管带）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参谋处总办殷承瓏、督练处副参议官李根源、74标教练官赵又新等等。

此外，李烈钧、方声涛、张开儒等也在讲武堂任过教官。

在云南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蔡锷和李根源。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湖南邵阳人。父亲是个裁缝，家贫，无法供他上学，被当地名士樊锥收为免费弟子。1896年，14岁的蔡锷考中秀才，后到长沙入时务学堂，梁启超、谭嗣同、樊锥均在学堂教书，对他影响很大。戊戌政变后至沪入南洋公学。次年，16岁的蔡锷东渡日本求学。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及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将在汉口发动的武装起义，事败复去日本，入成城学校，继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同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常相往返。1904年回国后，曾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职。1905年夏，被调至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混成协协统等职，对训练新式军队极负时誉。黄兴、赵声、谭人凤都曾到他军中活动。1911年初调至云南新军。

同盟会会员黄毓英希望蔡锷支持革命，蔡道：“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李根源字印泉，云南大理人。1904年去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同唐继尧、罗佩金、顾品珍、谢汝翼、刘祖武、庾恩、刘存厚、李烈钧等人一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返回昆明。任云南

陆军讲武堂监督。次年升任讲武堂总办，沈汪度、张开儒分任监督、提调，云南讲武堂完全落入革命党人手中。

云南讲武堂是全国少有的几个讲武堂之一，是西南各省最重要的军事教育机构。附近各省有志学习军事的青年，不惜远道来这里就学，其中便有一位英姿青年朱德从四川来到这里。

云南讲武堂在 1909 年秋成立，设甲乙丙三班，分步、骑、炮、工四科，招收学员 400 余人。甲班从新军驻扎在云南的第 19 镇的管带、督队官、队官、排长中选调 120 余名学员，乙班从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哨长中选调 100 余名学员；丙班招考贡生、生、秀才、普通中小學生及识字健壮青年。同盟会在讲武堂建立组织，发展会员，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酝酿革命起义，成为云南革命党人的重要据点。

云南总督李经羲对李根源有了戒心，委派他赴滇西办理防务，历时半年。回省后，即被削去讲武堂总办职，调任督练处副参议官，这是个闲职。

1911 年 8 月，讲武堂 300 余名学生立意起义，策划于 8 月 12 日特别班毕业，李经羲总督来讲武堂行毕业式、发文凭时，即行刺杀，共同举事。监督沈汪度、总办唐继尧均知其事。沈即告之谢汝翼，谢认为时机未到，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极力阻止。

特别班学生 100 余人毕业，同盟会会员朱德、范石生、杨蓁等被派到云南新军中担任队官。

武昌首义后，云南革命党人狂欢欲舞，策划起义。

李经羲和新军统制钟麟同，异常惶恐，连日召集各司道密议，飞调蒙自防军 4 营来省城；军械局筑碉楼，以防袭击，夜晚派侦探到巫家坝 74 标、炮队搜索，严加防范。

蔡锷任职协统，阶级较高，资格较老，且有才干，有眼光，众人拥他领导起义。蔡锷、唐继尧、刘存厚、罗佩金、雷飙等人密议：联络官兵，与可靠之官长逐层组织小团体，歃血为盟，坚其信用，预备子弹，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

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李鸿祥、殷承瓏、张子贞、雷飙歃血为盟。殷承瓏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 16 字，众人看过，将纸烧了，灰烬调入酒中，众人分饮。蔡锷道：“我们这人头愿已许了多久，迟完不如早完。”雷飙道：“我们的事，彼等早已知道，不干必遭毒手，快干可望成功，并可保全地方。”10 月 28 日晚，蔡锷等集议，10 月 30 日夜 12 时起义，以 37 协所属步兵 73、74 两标和炮兵 19 标为起义主力。73 标占领昆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进攻重点是军械局和五华山；74 标占领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进攻点是南门外巡防 2、4 营、南门城楼、督署、藩库、盐库；炮兵向督署、五华山、军械局射击；讲武堂学生负责开启昆明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众人推蔡锷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

蔡锷决定起义的指挥部设在巫家坝的 74 标标部。74 标标统罗佩金和所属 3 个营的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飙均是密议起义的革命党人。

19 镇统制钟麟同听到革命党人秘密集会的风声，便于 30 日清晨 7 时突然来到巫家坝，集合 2 营官兵训话：“得有确报，今夜有匪作乱攻城，将谋革命。凡尔官兵如发觉妄言革命者来报，本统制见官加一级，并奖银 200 元。”钟麟同又召集 74 标军官会议，道：“谣传今夜巫家坝军队将作乱，你们看如

何？”蔡锷道：“此处军队保无此事。但天时人物现已如此，何不对李督办自行宣布独立？”“该统领且莫胡说，你我吃王爵禄，当报王恩。要云南独立，非 23 省中 22 省俱已独立则可；否则，纵有 21 省独立，我都不肯任云南独立的，你可莫乱说独立。”钟麟同的讲话更激起革命党人的怒火。各队下级军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

晚 7 时，蔡锷召集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飙、炮标管带庾恩旻、刘云峰、谢汝翼、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等集议，决定 12 时鸣号，传步、炮两标官长在指挥部前集合，宣布革命宗旨，31 日晨 3 时发难，若有反对者，当场击毙。

蔡锷又找没有参加密议的炮标统带韩国饶，把发难的计划告诉他，韩国饶当即表示极力赞成。

30 日晚，发生了意外事件，使起义提前爆发。

讲武堂派刘祖武去 73 标联系。73 标除 3 营管带李鸿祥是革命党人外，标统和 1、2 营管带都是北洋派。但下级军官和士兵同情革命的人不少，8 时半黄毓英等排长派士兵将装有枪枝子弹的箱子抬出，被右队官安焕章发现，使用指挥刀阻拦，士兵开枪把他击毙，同时击毙值日队官唐元良、督队官薛树仁等。士兵们便从营房冲出，喊杀声起，李鸿祥急忙命号兵吹集合号，并调 1、2 营士兵出动。1 营管带成维铮把所属四个队多数官兵拖走，只有一队队官胡庚先率队前来，2 营管带齐世杰逃走，队官马为麟率 2 营官兵前来。

李鸿祥命令刘祖武为 3 营营长，马为麟为 2 营营长。

标统丁锦率卫队赶来镇压，向起义士兵开枪。李鸿祥命起义部队回击，将丁锦卫队击溃，便整队向昆明北门进发，途中迎面来了一顶轿子，问后便知是李根源。

李根源这天晚上吃饭，听到枪声，便问前来看望他的沈汪度，知道夜间起义，便立即坐轿绕南门赶往北校场，见到李鸿祥的起义部队，便一同前进。

北门城门紧闭，李鸿祥命排长黄毓英、王秉钧、杨秀林、蒋光亮等数人，持刀带枪爬上北门城墙，打死守兵，开了城门，起义部队拥入城内。

这支起义部队弹药较少，战斗不能持久，便决定首先进攻五华山北的军械局。19 镇统制钟麟同已占领五华山，指挥军械局顽抗，发生激烈的战斗。

云南总督李经羲听到 73 标枪声，即打电话向蔡锷求救。

蔡锷得知 73 标行动，决定提前起义。

步兵 74 标和炮兵 19 标官兵来到指挥部前，蔡锷即发表演说：“钟统制疑本协及炮标目兵将作乱，今日已有命令到协，饬我限今夜将枪、炮机柄收缴后再行严加惩办。我辈军人无辜受累。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为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山河，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赞成者举手三呼‘革命军万岁’。”步炮两标官兵齐声三呼：“革命军万岁！”刘存厚当即宣布：“公推蔡锷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官兵们三呼“万岁”，表示赞同。

74 标 2 营首先开拔，李凤楼率机关枪营随后。来到昆明城南门，守兵



官兵不战投诚。

起义部队陆续进城。那讲武堂的起义人员也行动起来。

炮兵管带谢汝翼率部，由东城埂上炮轰总督署和五华山、军械局。军械局守军凭借弹药充足，仍据险顽抗。起义军用炸药炸倒军械局围墙，谢汝翼率部冲入，占领了军械局。

军械局存有德国造五子步枪子弹数百万发，日本造 1000 枝枪，双筒无烟 2000 枝，九子枪、音响毛瑟枪 5000 枝，马的里数千枝，退管炮弹数十万发。

唐继尧率兵进攻总督署，朱德等人事先与总督署卫队有过联系，卫队很快缴械投降。

总督李经羲仓皇逃走。

钟麟同在五华山指挥据守，起义军炮兵射击，士兵四散。钟麟同以手枪自杀未遂，卫生队把他放到担架上，抬至南门城上，被士兵杀死。

31 日清晨，战斗结束，起义胜利。

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为都督，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改为“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

军都督府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军政部总长为李根源，李曰垓次之，参议院院长由李根源兼；参谋部总长为殷承瓛，刘存厚、唐继尧次之；军务部总长为韩国饶，张毅次之。

云南起义的第 4 天，即 11 月 3 日，上海发生了起义。

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策源地。在上海宣传革命的要数于右任最为突出。于右任名伯循，陕西三原人，1903 年，24 岁的于右任中举人，因讥刺时政，曾遭清政府捉拿，于次年潜逃上海，入震旦学院肄业。旋因抗议外籍教员干涉校务而离校，与学友创办复旦公学。1906 年赴日本，访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7 年 4 月回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任社长，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继而创办《民呼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黑暗，该报被查封后，又办起了《民吁日报》，报名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激烈抨击清政府和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该报仅发行 48 天，便被日本驻沪总领事函请上海苏松太道查封。1910 年 10 月，于右任再创日报——《民立报》，自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报纸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导各地革命运动，深受读者欢迎。

1911 年 7 月底，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一大批同盟会骨干分子，如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都在那里活动。担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的陈其美实际上是领导人，他在联络上海社会各界、策划上海起义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活跃。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早年学习典当业与丝业。1906 年 23 岁到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学习警察，结交革命青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08 年回上海，往返沪浙及京津各地，联络党人。1909 年在上海接办革命机关天宝栈，拟与浙江会党首领张恭等策动浙江起义，因叛徒刘师培告密未果。1909 年至 1910 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加入上海青帮，是大头目之一。

在上海还有一个由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李燮和等人创建的光复会组织。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1893年，15岁为塾师，喜读新书，遂萌反清革命思想。

1900年去东北，后到北京，观察形势。1902年赴日本留学，不久返回祖国，在浙江积极联络会党，谋响应黄兴等将在长沙发动起义。1904年在上海与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次年与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设体育专修科，召集金州、处州、绍兴各府会党头目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革命骨干，并捐官知府，再赴日本，入陆军联队，被拒，又欲入振武学校及陆军经理学校，亦未成功。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1908年赴南洋各地筹集革命经费，先后任新加坡《中兴日报》和仰光《光华日报》记者。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于1910年去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推章太炎为会长，自任副会长。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以为通讯机关。次年回上海，与李燮和等人组织光复社上海支部，以李燮和为总干事。

李燮和原名柱中，湖南安化人，曾在长沙求实书院读书，参加华兴会，后又为光复会会员。1904年9月，参与黄兴等策划长沙起义，事泄逃亡日本。次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1906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后往香港，入南洋文岛滨港中华学堂和双溪烈埠启智学堂任教三年，曾配合黄兴筹措广州起义军饷。1911年到上海。

光复会上海支部对外称锐进学社，发行《锐进学报》并建立了秘密活动机关。同盟会和光复会携手合作，为起义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同盟会会员沈缙云、王一亭等人为议董的上海商务总会，对上海起义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沈缙云1868年生于江苏无锡，原名张祥飞（或翔飞），因入赘上海沈家，改姓沈，名懋昭，字缙云。1905年任复旦公学校董，次年创设上海信成储蓄银行。1907年被选为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议董。1909年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后加入同盟会，资助创办《民吁日报》、《民立报》。1910年代表上海总商会赴北京参与速开国会请愿活动。次年与李平书、叶惠钧等发起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被推为副会长，6月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任会长。

王一亭名震，别号白龙山人，浙江安吉人，早年习业钱庄，业余在广方言馆学习外语。1907年，40岁任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又兼任日商大阪商务会社买办，同时进行多方面投资活动，任沈阳地产公司、上海内地电灯厂、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等董事，兼任上海信成银行董事长。1909年，被选为沪南商务总会总理，同年起又担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积极参与上海地方自治活动，先后被举为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上海自治公所议董，并担任基本商团会长，与绅商政学各界交往密切，又暗中结交革命党人，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负责同盟会上海机关财务工作。曾资助《民立报》创刊。

陈其美、沈缙云、王一亭、叶惠钧等同盟会会员争取商团，筹划上海起义。

1907年夏，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总董曾铸和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发起成立南市商团公会。会员每晨操练，对维持地方治安起了一定作用。清政府遂发给七九步枪120支，子弹5000发，并准自购杂色枪械。商团公会会长先后由李平书、曾铸、王一亭、叶惠钧等担任。会员人数增至2000余

人。1911年4月8日，全国商团联合会上海成立，李平书被推为会长，沈缙云，叶惠钧任副会长。

李平书原名安曾，改名钟珏，号瑟斋，晚号且顽，优贡出身，1854年出生于江苏宝山。1899年在署广东遂溪知县任内，因支持民众反对法国侵占广州湾，被革职。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此后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及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主持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兼办商团。

1911年5月7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上海日报公会等10个团体在上海召开大会，欢迎由东京留学生组成的国民代表，决定成立中国国民总会。一个月后，中国国民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5000余人到会，公推沈缙云为会长，以提倡尚武精神，兴办团练，实行国民为宗旨。

武昌首义，上海民情沸腾。

光复会上海支部总干事李燮和正在家乡湖南安化，武昌起义后受到都督黎元洪委托，以“长江下游招讨使”之名奔赴上海，与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密议发动起义，认为如果得不到江浙响应事情终不能成。于是，他们决定派王文庆赴浙江省会杭州，章梓赴南京，柳承烈、张通典等赴江苏省会苏州。李燮和、伊锐志等在上海招募敢死队，组织光复军，争取上海的巡防营。吴淞、闸北军警上层人物中有不少是湖南人，李燮和利用老乡关系，拉拢了吴淞巡官黄汉湘，通过黄汉湘与闸北警备队队长陈汉钦等人建立联系，运动起义。

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宋教仁、范鸿仙、沈缙云、叶惠均等，在民立报馆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

沈缙云介绍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李平书与陈其美见面，结为莫逆之交。同盟会与商团联络渐次成熟。

商团加紧起义准备，11月1日，上海各商团在九亩地举行检阅。刚从湖北归来的新军第9镇马标1营管带、李平书的族侄李英石担任检阅官，并被推为上海商团总司令。

11月2日，陈其美、李燮和代表同盟会和光复会在民声报密议共同行动问题，决定次日午后4时，命令各路军警易帜，宣告独立。

当晚，同盟会和光复会分别部署起义。陈其美同李平书在城自治公所召集会议，宣布次日起义，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控制南市和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也在光复会部署起义，给光复军发了白旗，派人到闸北和吴淞通知起义时间。

3日上午10时，闸北革命力量出人意料地提前行动起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巡警道汪瑞閏和巡警总局总办姚捷勋，在武昌起义后防范很严，对警士亦很注意，平日发出的子弹，除每枪限留五粒外，多者悉令上缴，运存缉私营所属海豹兵舰，以防不测。

但他们对警备队队长陈汉钦仍很信任，提升他为警备营管带。陈汉钦早已同李燮和及其光复会建立了联系，被推为闸北巡警起义的总指挥。陈汉钦便于这天上午10时，鸣枪为号，发动巡警起义，攻击巡警总局，汪、姚两人逃入租界。下午3时，起义者占领巡警总局，高悬白旗，宣布闸北独立。巡士均袖缠白布，商店闻风，争先闭市，民军立即晓谕，照常贸易，无庸恐怖。

闸北起义发动，商业体操会商团代司令朱少沂、总教练沈鹏也在南市

发动。上海道台刘燕翼听到革命党人起义消息，携带关防，逃入租界。刘燕翼一逃，道台衙门群龙无首，毫无抵抗。起义军随即将道台衙门付诸一炬。大街小巷贴出李书平署名的安民告示。

陈其美等在西门外斜桥西园，召集同盟会重要人物举行会议，通知所部齐集进攻制造局。

商团和新成立的敢死队午后在南市九亩地集合。敢死队队长张承樵是上海中国公学学生，和于右任有师生之谊，他因偶然机会，结识了一批上海的青红帮分子刘福标、田鑫山等，号称有 3000 人，原准备赴武汉参加作战。于右任得知后，对张承樵说，既然有如此多人，何必往武汉，就在上海动手亦可，于是，刘福标决定将他所有弟兄 300 余人交给张承樵，成立敢死队。

陈其美率敢死队百人和商团数百人，均袖扎白巾，于下午 5 时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

制造局东、南两面临黄浦江，只有北、西两面是陆地，制造局四角围墙上设有炮楼，大门前是一条长巷，门口安置重机枪守卫。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外甥，所部是安徽同乡 300 余人的卫队，武器弹药充足。他们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

起义军趁工人放工之际，一人持白旗，一人持红旗，率队冲向制造局，开放排枪，并放炸弹轰击，与制造局卫队相持一个多小时，起义军连放炸弹 20 余枚。商团武器稍为精良，敢死队只有手枪 4 枝，炸弹几十枚，另有几十把短刀和一些手雷，制造局卫兵用机枪猛烈扫射，敢死队难以接近，始退至局门，摇旗复战，敢死队几经冲锋，死伤已达 50 余人。

陈其美忽然站出来道：“我来说服守卫制造局的军队，可以不再流血。”他贸然只身闯入制造局，企图说服守军响应起义，结果被扣押起来，捆绑在办公厅前的柱子上。

进攻制造局失利和陈其美被扣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沈缙云、叶惠钧、王一亭和上海商团总司令李英石，集合商团 1000 余人。沈缙云、叶惠钧、王一亭 3 人向众人痛哭道：“愿众于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则域中无数生灵，我团员数千家室得保安全。”随即由李英石率领这支队伍向制造局出发。

4 日凌晨 3 时开始，起义军向制造局发起多次进攻，仍以敢死队为前锋，同顽抗的制造局守军激战两个多小时，守军以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敢死队仰攻受挫。

制造局大门为铁制，背后又护以铜板，难以打开。商团团员、九亩地新舞台京剧武生演员潘月樵发现门侧有木制栅栏，可以火攻，但一时没有引火物，附近杂商铺店主自动捐助汽油十几斤，纵火焚烧。

商团团员许奇松等又从制造局炮兵营护墙沟内夺得钢炮一尊，对准大门轰击，守军开始陷入混乱。通宵酣战，直至黎明。

李燮和率领的吴淞，闸北起义军燮赶到，起义军声势更盛，张士珩在四面楚歌声中，率亲信数人狼狈逃离，搭乘事先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小火轮，退往法租界，制造局悬出白旗，商团、起义军警、敢死队一齐拥入。

李燮和等即将军火库内装箱待运南昌的步枪和弹药分发给起义人员，人手一枪。

寻觅被囚的陈其美不见，询问制造局投降人员，得知陈其美被囚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储藏钢铁的小房间里。陈其美手足带镣铐，坐在一条凳上，发

辫从新凿的壁孔穿过，吊在房外的铁钩上，头紧紧贴在板壁，他默然不动。同志们给他打开镣铐，放下发辫，他手脚麻木，不能走动。

拿下制造局，11月4日8时，上海光复。

6日下午，在小东门内大街海防厅署召开会议，推选军政府领导人员，五六十人参加会议，李平书主持。李平书、李英石、陈其美先后发言。推选开始，有人推举李英石为都督，有人推举陈其美为都督。跟随陈其美来会场的敢死队头目刘福标突然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其美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李平书无法维持秩序，便宣布散会。

会议在混乱中无结果而散，后来经过各方协商，推举陈其美为都督。军政府各部长官是：司令部部长陈其美，副部长盛典型；参谋部部长黄郛，副部长刘基炎；军务部部长钮永建，副部长李英石；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总理李平书；财务部部长沈缙云；外交总长伍廷芳；交通部部长王一亭；海军部部长毛仲芳；顾问虞和德、沈思孚、姜国梁等。

李燮和在上海起义中也有很大功绩，因没得到沪军都督职，便另组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为都督，同时设光复军司令部于吴淞中国公学内。

## 第十五章 “竹竿挑檐瓦”

上海光复的第二天，苏州、湖州同时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

上海革命党人在准备起义时，便策动江苏独立。光复会上海支部总干事李燮和派柳承烈、张通典到苏州活动。同盟会派徐文斌到苏州枫桥新军45标进行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已跃跃欲试。

江苏省城苏州兵力十分空虚。新军名为一协，即第23协，协下属只有一标即第45标。

协统艾忠琦不能控制部队。45标统带刘之洁倾向革命，向江苏巡抚程德全进言：“时局转移视鄂胜利及他省响应与否；倘长江各省响应日多，苏居其间难独异，宜沉机观变，以俟时耳。”程德全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局势，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11月4日，上海光复，江苏独立的时机成熟。这日上午，45标正在操练，统带刘之洁从抚署回来，登上操场旁土丘上，集合队伍，高声道：“武昌起义以来，瞬已二旬有余，各省先后响应者络绎不绝，天命人心，于此可见。

满清政府不久推翻，可操左券。苏州所以不敢冒昧从事者，因布置未妥，恐流血殃民，徒滋纷扰而无济于事。现在时机成熟，不日即可宣言独立。”官兵听罢喜形于色，准备行动。

这天，苏州城内传出消息，言今晚6时，新军营有马队入城，宜家制白旗以待，严扃门户，毋早睡。

晚上，上海民军50人从上海乘火车赴枫桥同新军会合。新军士兵向队官请领子弹，队官初时未允，嗣见士兵不散，遂一律发给。

5日拂晓，新军马队、步队、工程队、辎重队偕上海民军一律臂缠白布入城。队伍来到抚署，谒见程德全，拥为都督。

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做过黑龙江巡抚，奉调江苏才一年多，

他在清朝封疆大臣中，可算作较为开明者，同国内立宪派首领、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交往颇密。武昌首义后，曾全力镇压江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串通立宪派，电请清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后见大势已去，表示同意江苏独立。

起义官兵随即给程德全送上印信。印信用砚石一方刻其底，文曰：“江苏都督印。”江苏省提法司左孝同、巡警道吴肇邦、新军协统艾忠琦等闻变逃走，左路巡防营管带戚从云被变兵所杀。

江苏宣告光复，都督府设在都练公所，刘之洁任苏军统领，顾忠琛任参谋厅长，蒋懋熙为巡警道，应德闳任财政司长，江绍烈为司法司长，黄炎培、沈恩孚、罗良鉴为秘书，李平书为民政厅长。其余官吏一仍其旧。都督府门前，悬有红字白旗一面，上书“中华民国军江苏都督府”，傍有“兴汉安民”四字。

江苏省谘议局解散。在拙政园成立省议会，原谘议局议员 55 人到会，程德全亲自莅会，宣布开会宗旨。谘议局议员摇身一变，成为省议会会员，遂由会员公推议长，张謇选为会长，蒋炳章为副会长。

当时就有人记下江苏独立的情形：“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之。”浙江同江苏同一天宣布起义。

浙江的革命党人大多在新军中。浙江省早先就有武备学堂、弁目学堂、陆军小学堂、炮工学堂等。这些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多数人后来成为浙江新军中的革命党骨干力量。

早在 1905 年，同盟会重要干部秋瑾就到杭州从事革命活动。秋瑾字璇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1890 年，15 岁随父入湘，依父母之命嫁给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1902 年王廷钧纳资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其去北京。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于 1904 年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己筹资留学日本，先入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继入青山实践女校。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提倡男女平权，并参加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即军师。1905 年回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 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1906 年初回国，在上海与易本羲等创办中国公学。与尹锐志、陈伯平等设立“锐进学社”。又创办《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为日后创设中国妇女协会打基础为宗旨。仅出二期而止。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继与徐锡麟分头准备浙、皖两地同时举事，被推为大通学堂督办，往来沪、杭间，联络沪、杭军队与会党，组织光复军，徐锡麟为首领，她为协领。预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然后以起义军渡江攻杭州，如不克，则带队回绍兴，由金华、处州入江西，攻安庆，事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她与少数学生持械抵抗，失败被捕。绍兴知府贵福深夜提审，她坚贞不屈，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以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在杭州时，曾运动弁目学堂周亚卫等加入光复会。朱瑞、周凤岐、吕公望、夏超、俞炜、叶颂清、徐世镡、傅孟等军界人士加入光复会。秋瑾有光复会、同盟会双重身份，朱瑞等也既是光复会员，又是同盟会会员。在浙江新军军官中，还有一批人加入了同盟会，如顾乃斌、来伟良、黄元秀等。

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同盟会会员褚辅成归国后，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支部长，1907年被推举为浙江谘议局议员，同新军有密切联系。

至1911年，浙江军界中下级军官中已有不少人是革命党人，如第81标代标统朱瑞，营督队官俞炜，第82标3营管带顾乃斌、教练员吴思豫、冯炽中，督队官傅孟，炮队队官徐士镛，工程营队官来伟良，陆军警察营督队官童保暄，旗官傅其永，队官王桂林，辎重营管带韩绍基，陆军小学队长葛敬恩、周亚卫，督练公所科长黄元秀，科员吕公望等。

起义前夕，82标标统周承楨，经吴思豫联络，同意参加革命。

上海革命党人有不少是浙江籍人，同盟会方面，陈其美是湖州人，黄郛是杭州人，蒋介石是奉化人，王逸是嵊县人；光复会方面，尹锐志、尹维峻是嵊县人。沪杭有铁路相通，当天可以来回。武昌首义后，陈其美曾多次到杭州，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意周和尚处密议，策划起义。

杭州新军两标都驻扎在城外，每个士兵所带子弹不满5粒，城内驻有防旗营，兵多械足，巡抚衙门驻有巡防营1营，卫队两连，军械局内也有巡防营驻守，新军进城需要城内配合。新军工程营驻在城内，该营管带田继成早已辞职，由左队队官、同盟会会员来伟良兼代。来伟良表示，愿在城中首先发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劈开几处城门，将城外新军放入城内。

10月23日，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到杭州，召集褚辅成、朱瑞、顾乃斌、韩绍基、葛敬恩、吴思豫、周亚卫等人开会，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在横箭道巷李桐棠家设临时机关，存储军需弹药物品，及接洽外地来杭人员。上海又先后派庄之盘、吴文禧等人运去炸弹和送去经费。

浙江革命党人同抚署卫队长金富有、军械局守备队长吴秉森等取得了联系。

11月3日，上海发难，黄郛、蒋介石同浙江革命党人褚辅成、顾乃斌、俞炜、童保暄、葛敬恩、徐士镛、吴思豫、王桂林、韩绍基、来伟良、傅孟等，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午夜12时起义。

会上推选都督时，众人推顾乃斌，顾不肯；又推朱瑞，朱瑞的代表俞炜说，朱的身体不好。顾、朱是众望所归的人，他们不肯任都督，众人呆了。再推褚辅成，褚则主张由前任谘议局长汤寿潜出任。汤素来与革命党人无联系，人又在上海。这时童保暄在会上慷慨陈词，顾乃斌提议由童保暄担任临时都督。虽然童保暄的地位和声望都不高，但事情不能拖延，只好这样定下来。童保暄提议由葛敬恩担任临时参谋，起草命令，众人同意。

4日下午，抚署各官绅会议，多数绅界人士坚请独立要求，至晚8时未允，旋退出。

起义按计划进行。81标3个营、炮兵1营、骑兵1连，从笕桥出发；82标从南星桥出发，分别向杭州城开进。陆军警察营童保暄、傅其永、王桂林率宪兵，会同工程营前队3排排长陈涤飡率目兵打开望江门，工程营左队队官来伟良率队打开艮山门。两标起义士兵长驱直入。

傅孟等率领的82标同蒋介石率领的一部分敢死队向抚署进攻。抚署卫队长金富有作内应，起义军只开了几枪，掷了几个炸弹，就进入抚署衙门，纳火焚烧抚署。浙江巡抚增韞从后围墙逃走，躲进马房里，被起义士兵拿获。

81标起义部队和光复会会员王金发带领的敢死队进攻军械局。军械局守备队长吴秉森等人作内应，很快占领了军械局。

是晚，真正发生战斗的地方，只有茅郎巷，那里新招之巡防兵颇有效忠于清政府者，同起义军相战半小时，力竭始降。

清军最后的据点是旗营，旗营的新兵 500 人，壮丁 700 人。而起义军有 5000 人之众，整个大势已去。满人将军德济主张投降，但协领贵林主张顽抗到底。浙江谘议局议长陈棨宸谓贵林曰：“清天命尽矣，公无徒死。”贵林答道：“吾唯一死以自谢耳。”到了 5 日下午，贵林等探得巡抚增韞已被活捉，革命声势浩大，眼下无法再顽抗下去，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兩名随从，向起义军接洽投降。

偌大个杭州省城，兵不血刃而白帜飞扬，遂宣布独立矣。

浙江谘议局的议长陈棨宸、副议长沈钧儒以及马叙伦等，商议迎接在上海的汤寿潜回杭州，担任浙江都督，当即由马叙伦起草了电报稿，除陈、沈、马三人具名外，沈钧儒还加上了议员褚辅成的名字。电报由马叙伦发出。

革命党人在总司令部召开军政紧急会议，正式推选浙江都督。褚辅成提议推汤寿潜为都督，多数赞成，王金发等少数人反对，理由是：汤寿潜过去怂恿浙江巡抚张曾扬捕杀秋瑾，不应该推他作都督。会议最后仍决定汤寿潜为都督。

汤寿潜得知推他做都督的消息，他不愿就任，道：“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颀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汤寿潜在他人劝说下，还是在当天返回杭州，上任了。

汤寿潜就任浙江都督，周承颀为浙军总司令，褚辅成成为政事部长。汤寿潜任职 2 个月，便辞去职务，由蒋尊簋接任都督。蒋尊簋字伯器，浙江诸暨人，早年肄业于浙江求是书院，后留学日本。1905 年，23 岁加入光复会，同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浙江陆军第 1 标统带、浙江讲武学堂总办，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兵备处总办、1909 年任广东新军协统。1911 年 11 月 9 日，他参与驱走两广总督张鸣岐，宣布广东独立，被举为临时都督，迎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自任广东军务部长，旋任浙江都督。

安徽革命却是难产。早在 1904 年，陈独秀、柏文蔚等就在安徽成立了反清组织岳王会，参加岳王会的有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学生，约 30 多人。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陈独秀为会长。次年，柏文蔚在南京设立分部，自任分部长。柏文蔚当时在南京南洋第 9 镇 33 标 2 营，任前队队官，后升至管带。同盟会成立后，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全体同志参加。

在日本留学的安徽籍学生吴春阳、管鹏、王天培、常恒芳等在 1905 年加入同盟会，吴春阳任安徽主盟人。他们归国后，到安徽省省会安庆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会员。武备学堂的学生、岳王会会员倪映典、熊成基等先后投入安徽新军。岳王会在安徽新军中有二三十人，因人数太少，没有建立分会，便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新军 1 标 3 营的官兵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此时，倪映典已加入同盟会，他在新军先后任炮队队长、骑兵营管带、炮兵管带。他同队官熊成基密谋发动起义。熊成基已加入了光复会。

1908 年 11 月，倪映典、熊成基等乘太湖会操的机会，率马、炮两营 1000 余官兵起义，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起义军进攻安庆，激战 3 昼夜，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退至庐州解散余众。岳王会的主要骨干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兰瑞等英勇就义，全省牵连被害者达 300 余人，岳王会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一些幸存者，大多加入同盟会。



熊成基起义失败后，吴春阳加紧活动。吴春阳字墀谷，安徽合肥人。曾和熊成基同在炮营任职，并奔走各地。武昌首义的前三天，他回安庆。随后又去武昌会见黎元洪，10月28日再次回到安庆。30日，他和王天培、韩衍、史沛然、李乾瑜、陈安仁等在奚家花园附近的一家客栈萍萃楼召开会议，新军步兵两标、马炮营、工程队、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堂都有代表参加，决定当晚由新军发难。推胡万泰为总指挥，约定晚8时先由62标举火为号，61标和马、炮营继起响应，先攻标部，夺取子弹，再合力攻省城。

驻安徽的新军是第31混成协，协下设第61标、第62标和炮营、马营、辎重队、工程队。61标驻安庆城外五里庙，62标驻安庆城外20里的集贤关，炮营、辎重队设东门外迎江寺下，马营设西门山上，工程队设城内关帝庙。新军中识字的人很多，其中还有文武秀才。每到夜晚，书声琅琅，达于户外。

安徽巡抚朱家宝是个思想顽固的旧官僚，他曾镇压熊成基起义。武昌首义后，他十分恐慌。他认为新军不可靠，除将发给新军的子弹悉数收回，命驻扎在安庆城内的巡防营统领刘利贞加强防务外，将新军革命情绪较强的62标3营调往皖鄂交界的英山驻防，该营管带是革命党人桂丹翘。朱家宝又请求清朝政府调来张勋所部江防两营到安庆，并派军舰到安庆长江江面游弋，以资威慑。

起义总指挥胡万泰在30日晚突然借口“送母”离开安庆。

负责率62标首先发难的排长李乾瑜，因参加策划起义的会议，回营太迟，被标统顾琢堂拘留，62标不能及时行动，也无法举火为号。

61标和62标、马炮营、工程队驻地相距很远，传递消息很慢，不知道情况临时有了变化。

到了规定时间，炮营队官陈安仁、排长吴士英将该营管带逐走。但炮上机关均已被预先卸去，众人无能为力。

61标士兵也如期进攻本标标部，标统胡永奎率弁兵居高临下开炮轰击，不少起义士兵牺牲。双方相持到晚11时，仍不见62标举火信号。起义士兵便各自回营。

巡抚朱家宝得到新军起义的消息，立即命卫队以机关炮守城。次日，61标标统胡永奎调来江防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官兵，作为警戒，收缴了62标官兵枪械，并将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训话，宣布将全标解散，听候分批遣送回籍，无令不准出营，否则枪杀勿论。

这日下午4时，62标起义士兵由陆国荣、史明家率领，救出被拘留的李乾瑜，赶走标统顾琢堂，向省城进发，61标官兵闻讯，乘机冲出营房，徒手向省城进发，逼近北门，发出了联络信号，可是城防已由江防营严密控制，城内新军不敢响应，而江面上又有兵舰巡游。起义军攻城，因枪弹不足，且守城的江防营和巡防营都配有新式快枪，起义军被击溃，退往桐城。潜伏在城内的吴春阳，逃离安庆，前往武昌求援。起义失败。

朱家宝下令新军各营一律解散。他还准备在城内大搜捕。但有人向他进言，党人皆挟有猛烈炸弹，如逼其走险，恐全城俱毁。朱家宝因而不敢搜捕。

江防营是朱家宝请调来的客军，纪律很坏，随意抢劫居民财产，两家当铺被其抢劫一空，还想抢劫藩库，激起民愤。安徽省谘议局要求朱家宝将江防营调离出境，将溃散的部分新军招回，编为商团，维持省垣治安。商团团长由原62标教练官王道济担任。朱家宝只好答应。

省城安庆动荡不安，皖北重镇寿县又举义旗。同盟会会员张汇滔从日本回来，在寿县以“信义会”名义开展活动，其誓言和同盟会誓言完全一致。11月5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革命武装发展到2万人，编成21营，由王庆云任淮上军总司令，张汇滔、袁家声、张纶为副司令，寿县举事，震动省城。

江防营撤离安庆，朱家宝失去了兵力。正当此时，江西省军政府致电安徽省谘议局：“浔将遣师，恢复金陵，道出安庆，要求独立。”这个简短的电报，使安徽士绅甚为疑惧，与其让九江的革命军到来方始独立，不如及早自为作主。同盟会会员、测绘学堂的王天培自称是奉黎元洪命令，主持安徽独立，对谘议局施加影响。

11月8日，谘议局开会，决定宣布安徽独立，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各界将都督印信送至抚署。朱家宝接见，放声大哭，再三推让，始允暂受。

逃往武昌求援的吴春阳，于当晚返回安庆，被任为总经略。

朱家宝将抚署改为都督府，于头门外竖立白旗二面，一书宣布独立，一书兴汉保民。

谘议局推王天培为副都督后，又借口各省都没有副都督，要王天培改任军事总监。

王天培有炮营支持，便到谘议局，限时要他们交出都督印信，否则以铁血相见，谘议局弄巧成拙，不得不向朱家宝索回都督印信，交给王天培，并承认他为都督。

王天培不能控制局面。原巡防营统领刘利贞等唆使流氓在城内鼓噪，王天培被迫出走，都督印信又回到朱家宝手中。

朱家宝虽然再任都督，手中却无兵力，全靠巡警道方耿寰所率警察维持地方秩序。

原62标教练官刘国栋，便乘机率领一部分招收回来的新军，包围巡警道衙门，赶走方耿寰，自称都督。胡万泰也率领测绘学堂学生百余人，包围巡抚衙门，要朱家宝交出印信，并以皖军总司令名义出布告安民。安徽一时竟有三个都督，省城安庆一片混乱。

安徽同盟会领导人吴春阳看到局势无法收拾，便向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请求派兵援皖。马毓宝派团长黄焕章带兵两营开赴安庆。

黄焕章是个庸劣异常之人，他所部2000人是新近招募来的洪江会会徒，军纪很坏。

有人得知黄焕章的部队毫无纪律，便极力反对他的军队进城，指定他们驻城外五里庙，说明军饷由省库供给。黄焕章根本不理，擅引军进城，驻扎师范学堂。

黄焕章向谘议局要军饷万元，议长龚以珪答应先付2500元。黄焕章不满，先唆使军士放枪威吓，后指挥所部围攻都督府，洗劫军械库、藩库，以至商店和富户。藩库存银洋8万余元，军械库快枪200余枝、子弹100余万发、机关炮6尊、过山炮12尊被劫走。100余家商店所失达100万元。

朱家宝在混乱之中逃离都督府。黄焕章便出布告说，安徽一切军政由他负责，俨然是安徽都督。

黄焕章胡作非为，吴春阳极为愤慨，他决定去责问他。他的一位朋友

拉着他的手劝阻道：“焕章狼子野心，不可理喻，何轻身入虎穴乎？”吴春阳厉声答道：“焕章假借民军，行同盗贼，践我土地，虐我人民。吾皖素称多志士，今事如此，竟无一人仗义执言乎？”言罢，便去黄焕章军营。

吴春阳要黄焕章将所掠夺的库银、军械和商民财物如数归还，至于军费，可以保证筹给。黄焕章不理睬他。

次日，吴春阳再次找黄焕章，被黄拘禁。吴春阳自知不免，写了一首绝命诗：来来去去本无因，只觉区区不忍心，拚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

……诗还未写完，黄焕章便指使卫兵用手枪向他射击。吴春阳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被朱家宝调驻英山的原 62 标 3 营的同盟会会员，听说吴春阳被害的消息后，便在管带桂丹慄的率领下，开回安庆，准备用武力逐走黄焕章部。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黄焕章部难以抵抗的。

此时，马毓宝派总参谋长李烈钧来安庆处理善后。李烈钧见安庆群情愤激，便将黄焕章撤职看押，将黄焕章的谋士、肇事人顾英枪决。复令黄部士兵将所掠财物悉数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请商会派人，会同发还原主认领。

李烈钧被推为安徽都督，但仍有皖人不服。李只得以援鄂为借口，率黄部离皖。众人推桂丹韻为临时都督。

胡万泰仍以总司令自居。实际上，安庆陷入无政府状态。

安庆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皖北重镇庐州、皖南要地芜湖同时光复。庐州首邑在合肥，同盟会会员孙万乘为庐州军政分府总司令；从武汉刚刚返回芜湖的陆军小学学生吴振黄为芜湖军政分府司令。

在混乱中，安庆的同盟会会员韩衍、管鹏等，以及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尚志学堂学生为主，组成一支青年军，由韩衍任总监。韩衍等发电报给上海的同盟会组织，请求派刚由南京出狱的安徽籍老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为安徽都督。淮上军总司令王庆云，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等，均一致拥戴孙毓筠。

孙毓筠，安徽寿县人，1905 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判刑 5 年。他于 12 月 21 日抵达安庆，成立安徽军政府，出任都督，以桂丹墀为军务部部长兼总司令，韩衍为青年军总监兼代参谋长，管鹏为内务部长，史推恩为财政部长。

## 第十六章 乞降与反复

福建革命，亦从新军发起。

早在 1906 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支部长是郑祖荫，总干事为林斯琛。同盟会福建支部创办了机关报《建言报》。

福建新军原是左宗棠旧部湘军改编而成，设誓编陆军第 10 镇，镇下属 2 协 4 标即第 19、20 协，第 37、38、39、40 标。其中第 19 协始终未建立。第 10 镇统制是孙道仁，孙道仁是名将孙开华之后，是个纨绔子弟。他并未受军事教育，于军事诸多隔膜，只是承袭父职。

他的部下重要军官，大多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色彩较新。第 20 协统领许崇智字汝为，1886 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1905 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毕业归国后，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总教习，擢新军 10 镇 40 标标统，迁 20 协协统。

同盟会运动新军下层士兵起主要作用的人是彭寿松。彭是湖南长沙人，他的父亲早年以武弁随左宗棠入闽。曾在台湾任武职，后病死在福州。性格豪侠、好用意气的彭寿松早年加入哥老会，曾当过福州缉私局局长，后由林斯琛介绍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须靠武力，争取武力必须从军警下手，便建立军警同盟会，运动新军。彭既湘人，又湘军将门之后，且系哥老会中人，故游说较易。军队中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

1911 年 11 月 1 日，林斯琛去武汉、上海联络后回到福州。他同郑祖荫、许崇智以及 40 标统带林肇民、炮兵营管带萧奇斌等，在南台白泉庵开军事会议，策划起义。虽然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已转为革命力量，但镇统制孙道仁尚未争取。林斯琛通过英商乾记洋行买办蔡展庞，劝告孙道仁。孙先是犹豫不决，后见省内外形势剧变，才表示赞成革命。

5 日晚，郑祖荫、林斯琛、许崇智、彭寿松、孙道仁、刘通等人在一艘停泊在魁岐江面的夹板船上讨论和部署起义，孙道仁即宣誓加入同盟会。

闽省清廷旗人将军对该省新军防范较严，已将药库子弹悉行搬入旗界，新军军士每人只有四五发子弹，难以发难。幸好驻守屏山军械库的员兵多已加入军警特别同盟会，便偷凿墙垣，于 6、7 两日晚，将子弹秘密运出。

孙道仁于 8 日发出密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彭寿松为先锋队 and 差遣队指挥，于当晚向于山发起总攻。洋枪队由刘通等率领，保护领事馆区和外侨，并占领银元局、厘税局。

当日晚上，许崇智率队进入于山。于山俯瞰旗营，为必争之地，旗军失此先着，成为困守一隅之局。福州将军朴寿所部八旗捷胜两营，官兵 2500 人，起义军 5000 余人，兵力强，地势利。

9 日拂晓 5 时，号炮鸣响，起义军开始进攻。炮兵集中火力轰击福州将军署，满人死伤颇多。中午 11 时半，清军势不能支，士无斗志，在城上竖起白布降旗，上书：“将军出走，停战议和。”起义军怕他们诈降，置之不理，继续炮击。下午 2 时，清军又在于山天君殿前门的标杆上，挂一面白布阵旗，上书：“请求停火，愿将全部缴械乞降。”许崇智见到白旗，即命停火。一个旗营官员，手持粉纸白旗，上书“献械乞降”四字，挑夫随其后，挑着步枪机柄数担。

翌日 8 时，八旗都统胜恩率领八旗兵 1300 余人，到南校场指定地点参加受降仪式。每人得银洋一元，遣散。福州将军朴寿在押送途中被起义士兵乱刀砍死。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

彭寿松集合同志，进总督衙，议定组织军政府，众人举孙道仁为都督。都督府设参事委员会，掌管民政，推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 10 人为参事员。彭寿松为会长。

都督府成立，13 日举行都督就职典礼。郑祖荫代表同盟会授予孙道仁都督印信，文为“中华军政府闽都督之印”。孙道仁接印，张贴就职告示。参事委员会稍后改为政务院，彭寿松为院长，郑祖荫、林斯琛为副院长，许崇智为第 1 师师长。那些立宪派人士，也参加政府组阁，原谘议局长高登鯉任民政部部长，副议长刘崇佑任次长；另一名副议长陈之麟任财政部部长，

谘议局秘书长林长民任外交部长。

贵州起义却是另一番气象。起义前有两大组织在活动，一个是自治学社，一个是历史研究会和它的外围组织皇汉公。

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是张百麟。

张百麟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长沙，一名景福，字石麒。1902年，23岁赴日本，肄业于早稻大学法政速成科。次年归国，他父亲给他捐了个通判，并在1907年上半年考入贵州法政学堂，成为官班的学员。这一年他和钟山玉、黄泽霖等组织了自治学社。张百麟在成立大会上演说：“我辈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于痛哭流涕，惟在讲求救亡方法。据不佞愚见，我辈现今保国，当用国民责任说，将来立国，当用国家主体说。故研究结果，首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借以唤起一般人之责任心。即以个人自治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学社社章规定：“本社名曰自治学社。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学社向官府立案，得到批准。

1909年9月，自治学社筹办的《西南日报》出版，张百麟任编辑。扩大了学社的影响，学社社务发展很快，社员逐渐增多。从1907年至1911年五年间，他们派出干部到各县活动。时值清政府宣布筹办地方自治，各县自治学社得以比较顺利地成立起来。贵州全省府、厅、州、县64个，有47个建立了自治学社。全省学社社员达1·4万余人。

自治学社在贵阳已有相当大的势力。1909年，贵州省谘议局成立，有议员39名，自治学社社员却占去33席。自治学社社员谭西庚选为副议长；常驻议员办事处书记长，也是社员周培艺担任。后来议长辞职，谭西庚被选为议长，朱焯、龚文柱为副议长。整个谘议局全被自治学社控制。

由于形势的发展，自治学社趋于革命。张百麟写信给东京中国同盟会贵州主盟人平刚，表示自治学社愿加入中国同盟会，得到同盟会总部的批准，自治学社加入了同盟会，张百麟为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自治学社的势力遍及军、政、学各界。

历史研究会是由贵州陆军小学堂学生席正铭、阎崇阶、江务滋、刘莘园、田子玉等，于1908年4月发起建立的。其会员除陆军小学堂学生外，还有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学校少数学生参加。会址设在陆军小学堂内，由席正铭负总责，阎崇阶、刘莘园、田子玉、江务滋及公立中学学生何器之协助。一二月内，发展会员数十人。

席正铭等考虑：革命要拚命，要流血。学校的学生，对宣传革命，组织革命，虽然能取到较大作用，但毕竟不能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要执干戈与满人决胜负，不能不预备大批武装斗士和英雄豪杰。他们便决定联络新军。

贵州新军只有常备步兵第1标，标统由镇江人袁义保担任，其余管带、队官、排长，湖北籍占居多数。兵员注重土著，新军头目和士兵，90%以上便都是袍哥阶级。袍哥某些规章习惯俗不可耐，高尚人士尝诋毁他们为下流、自好者，雅不屑为。

历史研究会与新军联络，两全之道，只有自立公口。他们便在贵阳城内王家巷朱勇烈公祠，成立“皇汉公”码头，同新军士兵联系，也兼顾绿营、巡防营、帮会、社会人士的联络。“公口”由席正铭任“大爷”，掌“码头”。

席早年在家乡沿河县参加过哥老会，有基础。阎崇阶、朱绍再任正副“钱粮”，刘莘园、江务滋、朱导江任正副“管事”。

他们很快联络了新军中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如正目杨树青等。标部的两个密查金渭滨和庄鹏程也被他们联络，金、庄既是贵阳有名的袍哥，又是标统袁义保的耳目，他们转而帮助拉拢贵阳城内外的各个公口，使皇汉公的活动得到蓬勃发展。

席正铭、刘莘园、江务滋等于 1909 年毕业于陆军小学堂，去武昌陆军中学堂就读，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席正铭离开贵阳，历史研究会和皇汉公两个组织由阎崇阶、何器之负责。皇汉公公口也由朱勇烈公祠移入陆军小学堂内。有人认为皇汉公的“皇”字含义不明，遂改名为“汇英公”。

阎崇阶于 1911 年从陆军小学堂毕业，去武昌陆军中学堂升学，江务滋因病从武昌退学，转回贵阳，被陆军小学堂总办派为助教，历史研究会和汇英公便由江务滋、肖道生、莫纪莹等主持，新军方面由谭梦芝、康俊武、张伯西、庄鹏程、金渭滨负责，文学校仍由何器之负责。

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贵阳，张百麟召集会议，作紧急部署，先成立 10 人委员会，总揽起义计划，以张百麟、黄泽霖、胡刚等人为委员，委员会下设三个委员会：一、军事委员会，以张百麟为委员长；二、民政委员会，以周培艺为委员长；三、交涉委员会，以谭西庚为委员长。召集会党、联络学界、军界、警界，同陆军小学、新军联系，准备起义。

张百麟去标统袁义保家，道：“如各省纷纷起义，贵州恐亦不免。只有负重望的人出来领导，则地方少糜烂。为达到贵州和平独立，愿推义保为都督，如湖北黎元洪故事。”袁义保以为贵州贫困，独立后军饷将断，军政两费，支用繁多，无法应付，辞不愿就。双方约定各不泄露而散。11 月 3 日晚，自治学社决心发难，发出动员令。

陆军小学堂总办姜若望下令收缴学生枪枝入库，学生们跃跃欲试，伺机而起。

贵州巡抚沈瑜庆调动外地巡防营来省，防范陆军小学堂和新军，并加调最反动的兴义黄草坝团防营刘显世营来省城，10 天就可到达。

陆军小学堂江务滋等得到消息，议定 11 月 10 日前后发难。11 月 3 日是星期日，陆军小学堂 200 多名学生放假，纷纷出校到新军营内活动。中午回校后，众人喜形于色。晚上自习时，三三两两在讲堂上或自习室内谈论起义之事，不料被值星学长毛凤岗察听，令学生肖道生、莫纪莹、雷世魁等，到值星官室内拍桌怒骂。肖道生说出实情，并劝导毛凤岗参加起义。

毛凤岗即跑出向总办姜若望报告。

江务滋等觉得此时纵欲罢手，也不可能，随即决定乘校中没有官长机会，立即行动，破库取枪，于是全体学生直冲库门，各自拿枪在手，但子弹一粒也没有。学生们便磨利了刺刀。准备战斗，并推江务滋、肖道生、雷世魁分赴城内和南厂新军告急求援。

姜若望和队长阮俊斋赶到学校，被学生看守起来。清军巡防营胡锦棠部把陆军小学堂包围起来。

江务滋来到南厂新军 1 标营中告急道：“陆军小学同学已于晚间 8 时发动起义，现在被巡防营胡锦棠部包围，情势危急，特来请求新军兄弟们火速援救。”全标骚动。

标统袁义保赶来，集合全体官兵训话：“军人以绝对服从为天职，……”

他的话还未说完，杨树清在队伍中朝天开了一枪，并喊道：“我们不能再‘绝对’了！”队伍顿时哗变。

标教练员杨荃诚站出来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学生，他口述命令，分派各营任务。

杨荃诚是四川秀山县人，秀山与贵州的松桃县为邻。他初进武备堂，后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贵州供职。初任营务处帮办，后调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兼任新军教练员，职位相当于副标统。他为人忠厚老成，思想进步，对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士兵，爱护备至，受到学生和士兵们爱戴，众人服从他的指挥。于是，队官赵德全立即率部出发，将包围陆军小学堂的胡锦涛部监视起来。

新军前哨向胡锦涛部逼近，胡部被迫撤离。杨荃诚命令赵德全部立即入城，直捣大兴寺军械库，夺得800余枪支、子弹多箱。枪支和子弹分别配给驻马棚街的新军徒手队和陆军小学堂学生。这时已是4日拂晓。

杨荃诚率陆军小学堂学生和新军部队，由大南门入城，直趋谘议局。

贵州巡抚沈瑜庆得知新军哗变，便打电话询问，接话人谎称袁义保已被起义部队枪毙，南厂新军营内尚在混乱之中。

沈瑜庆惊慌地下令：“炮兵向新军营地和陆军小学堂两处轰击。”炮兵队回答：“所有炮门已被人盗走，尚在追查。”沈瑜庆又令抚署卫队加强防守。卫队管带彭尔坤表示：“若土匪妄动，则卫兵持枪配弹准备以待久矣，若谘议局与学生及军人起义，卫兵已共表同情，不能战也。”沈瑜庆见大势已去，便派巡警道贺国昌、劝业道王玉麟为代表，找谘议局局长谭西庚和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谈判。双方商定由沈瑜庆通飭全省文武官员，宣布辞职，交政于民。民军保护官吏及眷属生命财产；库储、卷宗及一切公用房屋器具悉数移交，不得损坏、隐匿或遗失；教民、教堂、教士及外人生命财产，由民军负责保护。

沈瑜庆交出巡抚印信后，离开贵阳，经汉口去上海。

谭西庚、张百麟以谘议局名义，召集各界开会，商定成立军政府事宜，会上推选杨荃诚为都督，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又决定成立枢密院，张百麟为院长，贵州城内第一巨富、宪政派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行政总理。

贵州省军政府各机构的权力和分工，与其他各省不同。各省都督总管全省军政、民政事宜。贵州军政府组织大纲却规定：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办民政；枢密院策划军事，指导民政。11月7日，军政府将谘议局改为立法院，谭西庚为院长、朱焯为副院长。

新军和陆军小学堂在起义中起了决定作用，但在成立军政府时，只得到了权力有限的都督职位，无力影响局势发展。在独立后，反而显得无所作为，变得无声无息，被自治学社派和宪政预备会派排挤。

宪政预备会议派则由与官场互通声气的名士名绅组成，主张接近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何可澄、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

起义前，自治学社派与宪政预备会派为争夺谘议局席位相斗，宪政预备会派失败，在谘议局内只得到了几个席位。

军政府成立后，内部矛盾与倾轧随之而起，杨荃诚与枢密院、立法院时生摩擦，而赵德全不能同杨荃诚融洽合作，且受宪政会挑拨，摩擦遂愈扩愈大。张百麟又与赵德全策划锄杨。

杨苾诚终是老实之人，不善政治斗争，表示亟欲求去之意，众人以杨既愿退，遂决定以第2标第3标共编1混成协，由杨率领援鄂，都督名义仍旧，赵德全代行都督职权。第1标已由叶占魁率领援川，杨苾诚又带去两标援鄂，贵州军队全部离境，陆军小学堂学生也有一批学生随之赴外地，省内革命军事力量顿见空虚。

自治、宪政两派的矛盾又速上升。宪政派没有兵力，自治派在新军中的基础也很薄弱。张百麟便以黄泽霖为五路总统，广招游民，组织哥老会。新成立的哥老会，月必数起，开山堂时必迎一次帅印，敲锣打鼓，会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缕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配刀剑，招摇过市。这些人品质复杂，在城里估买估卖，抢劫居民。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

宪政派见自治派势力日增，便窃窃自危，也照搬自治派的办法，开公口，以陈钟岳为正龙头，陈廷芬为副龙头，组织斌汉公，与自治派对抗。

那些未离境的新军士兵在混乱中到都督府大闹，声言他们的官长杨、赵都当了都督，只是他们没有着落，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都督府无奈，便成立军官团，凡士兵都升为官长，承认他们按月照官长支薪。于是军官突然增加了数百名，每日无所事事，租房子，娶太太，盛极一时。而哥老会丢拐子，作高揖，行见面礼随处可见。

贵阳城内乌烟瘴气之时，宪政派头子任可澄、封建团练头子刘显世同云南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戴戡密议，让戴戡回滇策动滇军唐继尧部，以借道贵州北伐为名，入贵阳。

1912年3月1日，五路总统、自治派领导人黄泽霖，被宪政派出金收买的叛兵所杀。

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唐继尧于次日率部突然进入贵阳，大肆屠杀。张百麟、赵德全外逃。滇军对自治学社骨干按名册捕杀，已投降的黔军1700人被押赴螺丝山，用机关枪扫射，尸骸成丘，血流成河。赵德全也被唐继尧派人捕杀。

唐继尧随即接任贵州都督，戴戡、任可澄为参赞，刘显世为军务部长。贵州落入唐继尧和贵州宪政派之手。

## 第十七章 新瓶装旧酒

广西省会在桂林，广西提督府在南宁。桂林的革命党比较活跃，南宁的旧军事力量较强大。

在广西的同盟会会员，一部分是在谘议局、政法学堂、中学、师范学堂等单位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都是到东京、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求学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回到广西工作，进行革命活动的本地人；另一部分人在新军、兵备处、陆军小学、陆军干部学堂等部门的外省籍人士。兵备处的帮办钮永建字惕生，是上海人，原是留日的同盟会会员，他到日本考察军事时，找到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李书城，要他毕业后到广西去，并代为聘请可靠同志去广西。1908年，士官毕业生、同盟会会员李书城、王孝缜、孙孟戟



一起从东京来到广西。王孝缜的祖父做过工部尚书，父亲做过四川粮道，叔父中过状元。广西巡抚便派他去北京邀集更多人才。他到北京后，又邀请留日士官毕业生孔庚、赵恒锡、尹昌衡和保定军官速成学堂毕业的革命党人耿毅、何遂、冷颀、陈之骥、刘建藩、吕公望等，于 1910 年来到桂林，分配到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学兵营等处工作。李书城先后担任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和陆军小学堂监督。

一天，广西巡抚请王孝缜和几位新来的人吃饭，酒过耳热之际，尹昌衡失口道：“要想中国复兴，满清是不能存的。”王孝缜急忙用脚踢尹，被那巡抚察觉，笑道：“大家不用顾虑，畅所欲言好了。”他还拿出几支新购的手枪让众人传看。

王孝缜酒后兴起，接过枪来连放数响，把天花板打了好几个洞。巡抚连称：“壮士！壮士！”不久，巡抚先将钮永建、李书城调离桂林，后以浮躁成性，遇事生风为由，将王孝缜、孙孟戟、尹昌衡、吕公望、陈之骥撤差，并将孔庚拘捕起来。

耿毅与刘建藩、杨明远等 20 余人商量，过去人虽然多，但没有组织和计划，乱说乱闹，反把事情搞坏，便决定组织广西同盟支部。推耿毅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杨明远为陆军干部学堂分部长，梁史为陆军小学堂分部长，荣经为谘议局分部长。制定会规，发展组织。入会者要填具志愿书。志愿书上写着：“誓同生死，志共恢复，此心可表，天实鉴之。”入盟人、主盟人和介绍人都须刺破手指，压上血印，然后把志愿书烧成灰烬，和入酒中，众人分饮，表示歃血为盟，永无反悔。

同盟会广西支部慢慢地发展会员，在学兵营、陆军小学堂、以及谘议局的议员中，共发展会员 200 余人。陆军小学堂的学生李宗仁也在这时加入了同盟会。耿毅又去运动巡防营，联络绿林会党，同广西天地会首领刘古香建立密切联系。同盟会支部发行《南报》，后改为《南风报》，鼓吹民族革命，扩大政治影响。

1911 年 4 月，桂林新军学兵营改为混成协，到广西担任巡抚不到 1 年的沈秉坤的亲信胡景伊任协统，但实际兵力只有步兵两营，马炮工辎各 1 队，约 2000 人，大多数人拥护革命。新军枪炮装备很好，就是没有子弹，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分部长刘建藩对协统胡景伊说：“外面风声不好，土匪很多，旧军防营靠不住，新军没有子弹是不行的。请赶快发下子弹，以备万一。”胡景伊是个官僚，信以为真，便下发了子弹。

刘建藩同耿毅在一个星期日通知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分散到郊外集合，耿毅对众人说：“现在武昌已经起义，湖南就要响应，我们广西要积极准备，革命要流血，你们大家愿不愿流血？”80 余人齐声道：“愿！”耿毅又问：“现在预备好了没有？”众人道：“预备好了。”刘建藩道：“支部长的话大家要好好记住，齐心协力，共图大事。”于是抬出一坛酒来，众人举杯痛饮。

耿毅又分别到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处作了动员。作了准备之后，耿毅、刘建藩、冷颀等便决定在 10 月 30 日起义。具体计划是：30 日晚 9 时，刘建藩率领新军出发，12 时到达桂林南门，耿毅率一部分人开南门接应；陆军小学提调冷玑开文昌门迎接陆军小学队伍入城。起义军队入城后会攻抚台、藩台、巡警道，以及旧军。

30 日下午，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新军在滂沱大雨中出发，到了将军桥，平地积水达 6 尺深，桥被水淹没，无法徒步过去。起义被迫延期，风声却已外漏。

31 日，广西东部的重要城市梧州宣告独立。起义的领导人，是在日本东京担任过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的刘岷。刘岷依靠当地的绿林 2000 余人攻下梧州城，在全省引起很大震动。

桂林城内人心浮动，起义和攻城风声不绝于耳。桂林商界怕发生战事，自己利益受损失，开会请求独立。

11 月 6 日，谘议局代表劝巡抚沈秉坤、藩台王芝祥宣布独立：“广西协饷全靠湖南、广东等省协饷补助，现在湖南已宣布独立，倘广西不宣布独立，则湖南、广东的协饷定不会来，财政方面怎能支持？梧州已经独立，省内各处都在酝酿行动，桂林将成为一座孤城，如何能守？新军、民军、会党都准备起事，万一发生战事必致地方糜烂，怎对得起地方父老和各界人士？”沈秉坤、王芝祥无言以对。

耿毅也先后两次去见王芝祥，陈明利害，并宣称：“广西只要独立，我们这一班人决不会呆在广西，我们将率领新军北上援鄂。广西的都督，你们愿意给谁就给谁。”王芝祥最后说：“我已和抚台商量好了，我们广西宣布独立。”王芝祥当晚令人将桂林市面上的黄布、黄纸和天然墨一起买下，连夜动员许多人赶写黄色三角旗标语。旗上写着：“广西全省人民恭请沈大都督领导广西独立。”第二天早上，桂林市全市大街上插满黄旗标语，每隔十步左右就是一面。上午 10 时，在谘议局召开独立大会，到会的有 1000 余人，全副武装、上起刺刀的新军最多，他们从头门口列队赶到会场，情绪激昂。

沈秉坤和一班旧官戴着红顶子花翎，穿着旧行装，仅仅免了袍褂，来到会场。新军士兵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是假革命，有两连士兵子弹上膛，准备冲进会场。耿毅生怕出事，忙劝士兵退出枪内子弹，没有命令，不准行动。他又跑去找王芝祥，低声道：“铁老，赶快开会，快点散会，时间长了，会出乱子。”沈秉坤、王芝祥等慌忙讲了几句话，推举沈秉坤为都督，王芝祥和广西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宣布散会，命令军队回防。

广西新军官兵都主张立即援鄂，耿毅、赵恒惕、冷昉等率领新军北上，陆军小学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

不料那王芝祥乘新军离开桂林之机，统率巡防营两个大队士兵突然叛变，枪声大作。

叛兵先抢劫藩库未成，即转攻谘议局及电报局，机器部件全行毁坏。一时仓猝，沈秉坤不知所为，避匿无踪，各官亦大半逃避。

王芝祥赶走了沈秉坤，想自己充当都督，哪知谘议局改造都督时，陆荣廷当选为都督，王芝祥见势不妙，便借口出师援鄂为名，离开广西，去南京。

陆荣廷字干卿，僮族，广西武鸣人。早年曾操舟贩盐。中法战争时，投唐景崧部当兵。战后被裁，与游勇秘密结伙，投入绿林。1893 年，受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所部编为一营，任管带。1905 年升为荣字各营统领，同济字各营统领龙济光齐名，号济、荣二军。由于他是绿林出身，便经东京广西籍同盟会会员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当时有人不同意陆荣廷参加同盟会，孙中山说：“允许他吧！”担任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的刘岷经孙中山的同意，发给了他入会证。但是，陆荣廷在孙中山 1907 年发动广西镇南关

起义时，却和龙济光一起镇压了这次起义。他以“功德”升广西左江镇总兵，龙济光得升广西提督，不久，龙济光调往广东，陆荣廷又升为广西提督。他驻节南宁，归他节制的新、旧军队有数万人。

同盟会在南宁也有支部，支部长是当地商界人士雷鲲池。在南宁新军工作的同盟会会员有从日本归来的谭昌、王金波等，他们负责新军的联络工作。武昌首义后，南宁支部经过缜密研究，决定争取陆荣廷宣布独立，响应武昌起义。不久，陆荣廷又收到省城谘议局推举他为副都督的电报。当同盟会的代表又来找陆荣廷时，陆当即将桂林的电报给他们传观，并说明他完全赞同独立，于是南宁于11月9日宣布独立。当时官绅商民均不知中华民国的旗帜是什么样子，只是用白布写“独立”、“光复”等字挂外，独有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旗。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假独立，当晚又想发难。

陆荣廷派兵把新军驻地包围，架起大炮对向新军，下令逮捕谭昌，强迫新军缴械。陆荣廷完全控制了南宁局势。

广西谘议局再推举陆荣廷为都督时，陆荣廷便率精兵数千来到桂林，就任都督。以后又将省会迁至南宁。

革命策源地广东，竟远落他省之后，粤同志莫不耻之。在香港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胡汉民、朱执信、胡毅生等，对于粤省发难策略，独重视绿林会党方面，初令陆领、陆常等在顺德乐墟起事，两广总督张鸣岐派粤绅江孔殷率防营攻之。

陆领等竟为所败，党军声势因之顿挫。

朱执信、胡毅生便潜入内地。他们名声虽大，但事实上掌握的力量有限，运动军队未见多大成效，着重努力的只是各路民军。

1911年10月24日，革命党人彭瑞海在广东化州发难，接着南海、顺德、三水等地民军联袂而起，迅速出现民军数千挺进佛山、直取广州的声势。

负责策划东江地区起义的陈炯明，与邓铿等在惠州淡水发动了具有较大影响的起义。

惠州长期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争夺的地区。在淡水起义前，同盟会员严德明等已在这里作再度举义准备。严被迫离惠后，陈炯明接替了他的工作。为使东江地区形成革命大火燎原之势，陈炯明召集东江的同盟会员于香港，对起义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命曾国琮入陆丰，邓伊臣、刘定叔进海丰，赖仲璧、周锋、游克桢、赵紫金、李子先、欧阳俊往河源、龙川，廖容、廖肃入连平、河平，丘耀西、梁镜球、林毓真、陈洁入博罗，陈炯明和邓铿到淡水。推陈炯明为总司令。

陈炯明、邓铿于11月1日入淡水，集合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约百余人，攻占淡水警署，队伍随即扩大到500余人。严德明、陈经、丘耀西等亦率师来会，起义军共约3000人。陈炯明把这支起义军编成7个大队，即向惠州进发。

陈炯明事先已在惠州清军内部进行策反工作，与巡防营管带洪兆麟达成协议，约定革命军到达时，洪部即投诚。那洪兆麟又是清军驻守惠州的陆路提督秦炳直的外甥，洪部素为秦倚重。

授命驻佛子凹的洪兆麟巡防营反戈，终于迫使秦炳直献城投降。11月9日，惠州光复。

陈炯明光复惠州后，布告剪发和安民，归善县易名惠阳县。随后陆丰、

海丰、紫金、河源、龙川、连平、河平，亦相继光复，并派队到惠州城会合。进城队伍不下万人，不少系会党、绿林改编而来，但由于陈炯明等约束较严，对居民商店均丝毫不犯，受到时人称赞。

陈炯明将民军大队补充整编，连同秦炳直降军，改编为七个旅，任命严德明、洪兆麟、陈月桥、丘耀西、陈焯廷、谢子瑜、黄德修为旅长。陈炯明自任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并采用“井”字旗号，寓古代井田之意，表示对中国社会及土地问题的关心。这支军队在惠州编成，惠州古称循州，故此军称“循军”。

陈炯明准备西下，光复省垣。

惠州之捷，先声夺人，西江、韩江诸路起义军，同时响应。高剑父、莫纪彭、任鹤年、林君复等以驻香山钱山之新军反正，自称香军。黄明堂起于高州，自称都督。此外，陆兰清、李福林、陈逸川、何克夫、周之贞、王兴中、梁金鳌、杨万夫、石锦泉、刘肇愧等亦揭竿而起，各树一帜。

两广总督张鸣岐甚是顽固。他素以办事干练见称。广东设有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水师提督李准所率巡防营，战斗力较强。以后又增调广西提督龙济光所部济军来广东。

清廷在广东将大约 1 万人的军队扩编配成陆军第 25 镇，任命龙济光为统制官。龙济光为从速编成陆军第 25 镇，派员赴滇省募兵，其用意是须编成有心腹可靠的部队。广东省的反动军事力量在南方各省中位居前列。

同盟会会员在新军中虽然有一定影响，但远不能同 1910 年新军起义失败前相比，控制不了整个部队。

自鄂事发生后，粤垣官吏异常戒严，民间谣言尤多，无日不宣传党人将于某日举事。

粤督大恐，因邀集省中大绅江孔殷、梁鼎芬等商解息之策。

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声威大振，整个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张鸣岐、李准等深感孤立难支。广东各地民军纷纷举义，又使他们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10 月 24 日，刚往广东赴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用炸弹炸死，官吏无不为之丧胆。

那些广东省的士绅巨贾看到大势所趋，提出和平独立。10 月 25 日，粤绅、在籍翰林、清乡总办江孔殷召集省内各大团体开会。他在会上发言道：“广东提倡独立，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当求完全，不可糜烂。……”言罢，人人鼓掌。接着。广东 10 大善堂，72 行商总商会各团体，又举行集会，作出决议：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合力举办商团，公举代表赴港，与共和政府机关直接宣达意见。

10 月 29 日下午，各团体集议于文澜书院，有人拿出上书“广东独立”四字白旗一面，由工人温东用竹竿挑起，旗帜招展，大呼：“广东独立万岁！”应和之声震瓦壁。温东将旗负诸肩上，先行出院，众人尾随其后，以为拥护，从西关起巡行城内各街，至督署时，已聚众 2 万余人，要求张鸣岐立即宣布独立，与清廷脱离关系。爆竹声起，各店户皆以为广东果独立矣，也纷纷燃放爆仗，或树独立旗灯于市面，一时城厢内外，及附城各处皆起而响应，爆竹声不绝于耳，自黄昏以至三鼓后，爆声始歇。

两广总督张鸣岐背人意愿，贴出告示：

今晚西关河南，纷竖独立旗帜，显有匪徒主谋。希图扰乱人心。良民误受煽惑，无知愚蠢可矜，本应立即剿办，诚恐玉石俱焚。用特先行示谕，

准其悔过自新，所有居民商店，立即擲去旗灯。倘仍不知悔悟，有意抗拒不遵，甚或聚众滋扰，则是冥顽不灵，惟有严加剿办，彼时良莠难分。各有身家性命，务宜一律慎遵。

告示贴出，广州一片混乱，路上行人稀少，米价、菜价上涨，各种船舶、火车都异常拥挤。督署防范森严，除将卫边街华宁里的街口用砖石堆塞、只能容一人往来外，又将新丰街的街石掘出，筑成炮台。全城只开大南、小东两门。重要街道，开铺者，百中一二，各铺宅多以铁链锁门，或用木板钉盖，街上满目荒凉，天愁地惨，有令人不忍游视者。

香港代表上书要求张鸣岐宣布独立，张初云时机未到，上书人道：“今日各省不独立，中国必肇瓜分。广东当先树立风声为各省望。”张不答，使人运动上书人，如不解散，即开枪击之。上书人退后扬言：“张鸣岐如不愿独立，广东人当自为之。”香港革命机关报宣告：“限二日内宣布，否则当以大炮敬之。”手握重兵而一向忠于清朝的水师提督李准，本与革命党结下怨仇，他是镇压广州“三·二九”起义的主要责任者，革命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许多人要得他而后甘心。随着革命党人声势日增，使李准内心感到十分恐慌，促使他力图以功赎罪。革命党人陈敬岳潜往广州，同广州的林冠慈携炸弹行刺李准，结果只伤了李准的脚。陈敬岳被张鸣岐派人捉拿。李准即手书致张鸣岐，戒勿害陈君，勿兴党狱。以后关于党事嫌疑者，李准俱不问，好象他已与革命党相通了。

李准感到，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纵报私恩，徒伤公义，无裨于国，贻祸生灵。利害相权，宜审轻重，于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立意反正广东，藉消兵祸。

张鸣岐对李准失信。广州“三·二九”革命党人起义，张鸣岐只身走匿李准处。李颇挟功凌之，张不能堪，而惧夺其位，则奏调龙济光部到粤，龙为张鸣岐旧部将，龙兼为广东新军镇统，位势在李上，李渐不平。胡汉民等人洞知其情，则使人离间之。李被陈敬岳刺伤，不敢更与结怨，故为陈求免死，护送但懋辛等回里；中路清乡之任务，李亦以让之他人。张更疑其与革命党人通，遂夺其中路所统30营，且收取虎门要塞大炮撞针，李益不安。然虑革命党不能容赦之也，则托其幕友谢义谦至港，征探革命党意旨。

谢义谦是在香港的同盟会骨干分子谢良牧的叔父。11月5日，谢良牧陪同谢义谦来见胡汉民，胡汉民便作书至李准，正告之以大义，若能幡然改悔，舍昔日之助满政府者而助国民，则去敌而为友。

胡汉民要求李准亲书降表，并立即逐走张鸣岐，逼迫龙济光投降，同时，去掉清朝旗帜，改用青天白日旗帜，通电反正，将全部要塞、兵舰、军队交出，由革命党人处理。

李准立刻表明当尽力为民国，革命党人可直取广州，张鸣岐并不足虑。

李准立即行动，派周子文、陈了明等往说龙济光，动以至诚，使之勿启兵祸，殃及生灵。龙遂感动，愿表同情。李准复遣水师营务处刘冠雄往见张鸣岐，告以他决意反正，劝其勿恋虚荣，贻害地方。张鸣岐仍犹豫，欲窥各省成败，不肯早决。李准以龙济光既归心，新军均表同情，遂传谕所部水陆各军，沿海炮台，由吴宗雷、吴占高督饬各营队约期同举义旗，各部悉受命令。

李准部署完毕，便以电话告张鸣岐，谓已已通款于革命军，四江兵舰之炮，实比他部队为利，即他舰亦集中省城，请张好自为计。张得电，召龙

济光谋。张问龙，能即扑灭李否？龙告以不能。张鸣岐见大势已去，于是逃往沙面英国租界，由那里乘船逃往香港。

11月9日清晨，李准下令各炮队军舰一律升起国民军旗，并电邀胡汉民来广州。

谘议局和各界代表开会举定胡汉民为都督，因胡未到省，又举新军协统、同盟会会员蒋尊簋为临时都督，陈景华为民政部长。

蒋尊簋在广州大东门外谘议局旧址，组设广东省军政府，主持政事，调新军进城维持治安。五羊城中，焕然一新。

次日，胡汉民率谢良牧、李君佩、李郁堂等从香港来广州。蒋尊簋宣布解除代理临时都督责任。胡汉民当即着手组织都督府。

然而，胡汉民面临的却是荆棘遍布的局面，尤其是诸军林立于广州，秩序混乱，而胡汉民素不谙军事，亦未直接掌握过军队。因此，准备进城履任时，在港同志有劝他不即上省者，以为李固新降，龙济光叵测，新军在省只有两营，且朱执信、胡毅生尚未到省，手无一兵，不如且待。

胡汉民虽来广州主持工作，但很快认识到：急需一位掌握军事实力的革命党人来协助。陈炯明已据惠州，拥有七旅民军，是广东革命党人中最有军事实力和影响的人物。

于是胡汉民便于11月17日召集广州各界代表会议，提出补选陈炯明为副都督，反正新军协统黄士龙为参督。举座欢呼赞成，遂决议。于是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

胡汉民随即电告陈炯明，促他率部火速进省。

陈炯明率所部7000人马，于11月29日抵达广州。

## 第十八章 天府英魂

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十人。他们归国后，大多数分散在省城和各县任职，并在地方有一定的声望。四川省的第一个同盟会组织，是1906年春，由邓家彦在成都建立的分会。几个月后，同盟会总部委派熊克武、谢奉琦、黄树中为川省主盟人。他们奔走成都、重庆、泸州、叙府、屏山、井研、永宁、永安等府县，在学界、新军和会党中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策划革命活动。1907年和1908年，先后发动江安、泸州之役、成都之役、叙府之役、广安之役、嘉定之役等五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同盟会在四川的影响却不断扩大，同盟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导致了全省范围的武装起义。

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引起铁路股东和民众的反对。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遭到朝廷申斥：“铁路国有既经定为政策，决无反议之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已横下一条心，要蛮干下去，他们所谓的铁路国有，其实是要卖路，要把铁路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这更加激怒了四川人民。

6月17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议员江三乘任总务部长，《蜀报》主笔邓孝可任文牒部长，谘议局议员程莹度任讲演部长，谘议局副局长

罗纶任交涉部长。

保路同志会便发宣言书，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专载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保路同志分会在全川各地纷纷成立，数日省内签名已逾10万。各州县成立分会的，达64个。

7月2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欢送代表刘声元赴京请愿。

刘声元在台上，向台下众人鞠躬道：“声元此去，守定本会宗旨，作奏庭七日之哭，冀朝廷有悔，以达破约保路之旨。

约不破，声元有去而无生还。”台上台下，无不痛哭失声。无数乡间老农，握其半收之伞，向台上连连作揖，且咽且言曰：“我们感激你！我们感激你！”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一再为四川商民代奏，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那腐败的清政府多次申斥王人文，并命手握重兵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署理四川总督，要他兼程去成都赴任，制止保路运动。

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任。王人文交卸离省。王去赵来，更增人民愤懑不平之情。成都几万人送王于北门外。

在双方形成剑拔弩张的尖锐对峙局面之中，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人发起，在成都召开。8月3日，各地股东代表陆续到成都。

保路同志会召开万人大会欢迎480余位各地代表，罗纶代表同志会致欢迎词。各地代表推出南充代表张澜致答词。张澜年近40，中过秀才，去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顺庆府中学堂和成都东文学堂学监。张在答词中称：“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张之答词，显出侃侃明秀的精神，遂博得不断的热烈掌声。

代表们投票选举颜楷为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颜楷是翰林出身，能随时拜会总督。

端方得知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发来恫吓的“佳电”。大会闻知“佳电”，顿时会场声如沸鼎，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众情愤极。

股东代表同清朝政府争论20多天，政府坚持：“国家政策既定，必宜坚持到底，稍一游移，必致不可收拾，各项号令皆将不信于民。在内在外，均宜恪守谕旨办法。”股东代表总结斗争经验，认识到：以前总一再请川督代奏朝廷，结果却毫无实效，不能再用这套办法，应依靠自己力量去做。很多人道：“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应该决议罢市！”

非争回铁路决不开市。”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都罢市、学生罢课。

罢市罢课一个星期，毫无结果。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又决议：“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四川是中国西部最富庶的省份，每年上缴朝廷达二千数百万两，一旦抗纳粮捐，势必对清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原来曾担任过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显赫要职，后失宠免职的端方，行贿数十万，仅获川粤汉铁路督办，闲居武汉、早就垂涎四川总督这块肥缺，致电内阁，请代奏参劾赵尔丰，要求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朝廷果然颁发谕旨，派端方赴川查办。又对赵尔丰传旨申斥，命其切实弹压：“致

滋事端，定治该署督以应得之罪。”端方曾任湖广总督，便带鄂军一个标由武昌启程赴川。他认为，鄂军军官是他所拔用之人，可以指挥如意。端方率军经宜昌、万县、重庆，11月18日来到资川。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革命党人。11月26日，革命党人陈镇藩等20多人，到资川郊外秘密集会，决定杀端方起义。1000余人的新军队伍，不到3个小时，除标统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次日，新军鸣号整队，把端方和他弟弟端锦押往上宫，在戏楼下，将他们两人杀死，整个队伍返往武昌。

赵尔丰也是狗急跳墙，他在9月5日接到谕旨后，明知“慎遵谕旨”会出大乱子，他顾不得这些，便拿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会场门口向股东代表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一事开刀，抓住“自保”两字做文章，把“自保”说成就是独立，把罪名栽到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头上。赵尔丰在给清朝政府的电报中写道：

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嚣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晓谕不听，解散不从，逆谋日炽。

赵尔丰调集多兵护卫治城，调外邑巡防军数百人到督署保护，又分拨各军，将铁路总公司、铁路学堂围守，将交通督署各路口用兵扎住。托辞“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待磋商”，诱骗保路同志会、谘议局、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鼓芬、邓孝可、江三乘等到督署议事。这些人刚到督署，就被逮捕。每个被捕者有砍刀一柄随于后，手枪两支伺于旁。

消息传出，全城震动。传言罗纶盛气抵抗，立被枪杀，余人皆锤镣丢监。民众听了这些传言，更是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地各捧光绪皇帝灵牌，到督院衙门去请愿。1000余人拥入辕门，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命人阻拦，无效，便下令开枪，当场死难的群众有30余人，年龄最长者73岁，最幼者15岁。受伤的群众更多。赴南院求情之市民、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光绪帝牌位在手不放。其幼尸仅13岁。

当天下起雨来，是夜雨更大，众百姓各人一手执稻草一束，一手捧着先皇神牌，沿街哀哭。大雨淋漓，人在水中，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次日大雨竟日，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徒手冒雨赴城下。守城官兵问其来意，众人答曰：“如罗纶、蒲殿俊等人已死，则来吊唁，未死则来求情。”赵尔丰又命官兵开枪，击毙十余人。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

赵尔丰见众情仍愤噪，复勒令被枪毙之亲属，领恤银数十两。只有一家，因极贫无知，前去照领。余皆云宁饿死而不遵。

赵尔丰下令屠杀四川人民的惨案，是在新历9月7日，旧历7月15日，历史上称作“七·一五”惨案。时人以“赵屠户”称赵尔丰。

四川人民决定以暴还暴，同盟会四川组织是武装起义的领导者。

同盟会的秘密机关，设在成都地方偏僻的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这所学堂，是从日本返回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创办的。龙鸣剑又被推举为省谘议局议员。他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人参加了同盟会。

早在6月17日，龙鸣剑和来成都参加股东代表会议的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曹笃、方潮珍、肖参、张颐、刘裕光以及新军中的党人密议，策划武装



起义。朱之洪提出：“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辩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然成都自丁未事败，清吏防革命甚严，党人无兵力可恃，即发难亦无所济，惟有各道同时发动，而成都乘时响应，庶可济事。”众人赞成，遂决议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于是，他们便从省城分道四出：朱之洪返回重庆，曹笃返自流井，方潮珍返井研，张颐则去青神、仁寿、井研、荣县、自贡，刘裕光则去荣县、盛远、富顺，策划部署。

8月4日，龙鸣剑和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各地，召集各路哥老会领袖到资中罗泉井举行“攒堂大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以及有同盟会身份的各路哥老会领袖秦载赓、罗子舟、胡朗和、张达三、胡重义、张泽沛、侯国治等到会，看哨放出一二十里以外。研究决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川南的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等负责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起义军一律称同志军，严肃军纪。

“七·一五”惨案刚发生，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同盟会会员，在城南裁成木板数百片，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投入河中。让木板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见到木板，便知道成都发来的消息，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这写字的木板被称为“水电报”。

成都很快被四路同志军包围，第一路是东路同志军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部；第二路是南路同志军侯宝斋、周鸿勋部；第三路是西路同志军张达三、张捷先、姚宝珊、张国藩、刘丽村、杨莹阶部；第四路是北路同志军侯国治部。

秦载赓是华阳人。从其祖父辈起，秦家便以侠义著名，四方豪杰多归之。秦载赓膂力绝伦，18岁便被举为华阳哥老会总团长，又经龙鸣剑介绍加入同盟会。9月8日他率数千同志军抵成都东门外，遭到清军抵抗，不能入城。两日后，附近各路同志军万余人前来相会。秦载赓亲率大队攻城，失利。向南退至田铺，同王天杰、龙鸣剑率领的荣县同志军会合，成立东路民军，秦载赓为统领，王云杰为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

王天杰和龙鸣剑都是荣县人，又都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骨干分子。龙鸣剑从成都返回荣县，和王天杰一起发动起义，并率领1000余人同志军准备出发攻成都。是时，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从日本回到荣县，龙鸣剑、王天杰便把后方事宜委托给吴玉章主持，龙鸣剑击剑发誓：“此行不捷，吾不复入此门矣！”秦载赓部、王天杰、龙鸣剑部会合后，同清军发生激烈战斗，历时数日，大小战役20余次，战况不利，乃分路转进。

王天杰、龙鸣剑部准备攻取嘉定。途中得知，胡重义率同志军5000人正准备攻取嘉定，王天杰便率部回师荣县。龙鸣剑进军途中病重离军，11月27日不幸病死，年仅34岁。

荣县知县和土豪劣绅听到王天杰回师的消息，便都逃走了。王天杰、吴玉章等人商议，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因吴玉章不久将离开荣县，推举同盟会会员蒲询主持县政。于是荣县9月25日宣布独立。

秦载赓所部又与陈孔白、范燮、方潮珍、胡良辅等同志军会师，先后占领资阳、井研、富顺，并围攻自贡。

秦载赓闻井研虽经收复，一切新政多为官绅把持，便单骑驰往调查，被反动绅商派出的歹徒邓大兴从马后暗算牺牲。

南路同志军侯宝斋等部，于9月8日挺进成都南效，与清军激战于红牌楼。

侯宝斋名邦富，新津人，是哥老会著名首领。幼年在码头混饭，做过刀手，后入新津总爷衙门当差。他风尚侠义，凡告贷者，无亲疏多倾囊相助，江湖游士无不知其名。

1904年，侯宝斋召四路哥老数千人集会，九府哥老皆派人参加，故秘密结合九成团体。

9月4日，侯宝斋聚集众人，首攻五津镇清军营房，放火烧毁营房。9日，他率部同双流、温江等地同志军会合，进攻成都南门，前锋直抵武侯祠，与清军激战。各属应召而来的同志军越集越多，声势大振。歼灭驻武侯祠之部分清军，后因物资供应不足，于26日南撤，回新津同周鸿勋所率的清军巡防营起义部队会合。

周鸿勋是四川郫县人，早年因事被通缉，逃往云南，回四川后入川边巡防营，驻防邛州，升至巡防营第八营书记。以哥老会结纳同营，同营士兵以周马首是瞻。8月29日，邛州城内外贴出标语：“为争路权，全川罢市，人心不齐，不如娼妓。”随之邛城罢市，周鸿勋乘机鼓动，群情激动，杀营管带，全营160余官兵，公推周鸿勋为营长，宣布起义。

整队由邛州出发，开往新津，这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正规军，增长了起义军的实力和声势。

侯、周部会合，共推侯宝斋为川南军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附近各地起义部队纷纷前来会合，号称十万。

赵尔丰十分惊恐，命新军第17镇统制朱庆澜和四川提督田振帮，领新军和巡防营由成都向新津扑来，与同志军隔新津河对峙，开始了激烈的新津争夺战。

但是，新军中有不少军官是同盟会会员，如方声涛、姜登选、程潜、张次方、陈锦江等，新军士兵多数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因此，作战并不出力。姜登选率炮兵开炮数百发，皆暗取其信管，炮口射向他处。方声涛为东路指挥，兵抵秦皇寺不进，诡称：“敌众我寡。”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但同志军不知内情。10月初，陈锦江率一个连新军，在温江三渡水渡河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吴庆熙、孙泽沛部同志军突然袭击，陈锦江和100多新军士兵被枪杀。姜登选闻讯大怒，便用猛烈的炮火向同志军进攻，新军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渡河，占领新津县城。

侯宝斋、周鸿勋率部退出新津。19日，侯宝斋不幸被叛徒杀害。周鸿勋加入同盟会，率队向南转战。

同盟会会员方潮珍指挥同志军驻青神，写信与方声涛、姜登选联系，双方约定，方声涛兵至籍田铺，姜登选兵至新津，皆按兵不动。方潮珍、曹笃等得以从容布置，使同志军在川南继续向前发展，取数十州县为根据地。

西路同志军领导人张达三、张捷先两人，都是哥老会首领。张达三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张捷先是灌县崇义辅总舵把子，他们在袍哥界的声誉，深入西陲，并达滇黔秦陇和长江中上游。二人互相标榜为房谋杜断，辅车相依。1910年，同盟会成都分会派人到郫县、灌县，找到他们，介绍他们加入同盟会，他们又号召各地哥老会尽力支持同盟会。

张达三参加“攒堂大会”之后，回到郫县，会集各路起义军，编为5路和1个学生军。

张达三任各路总指挥，并第 1 路大统领，张捷先为第 2 路大统领，姚宝珊为第 3 路大统领，张国藩为第 4 路大统领，刘丽林为第 5 路大统领，杨萱阶为学生军统领。

西路同志军最初仅由有武器的哥老组成，群众要求加入，自带武装，自备伙食。于是，同志军骤然形成数十万众。这支大军，许多人奇装异服。有绾结成道装者，有束发为绺者，有披头散发者，有剪长辫为短发者。他们的武器，绝大多数是明火枪，有前膛枪者为利器，不少人持戈矛刀叉。

西路军先后向成都西郊出发，同清军发生战斗。由于赵尔丰将主要兵力调去同侯宝斋、周鸿勋部作战，无法再顾及其他方面，因此，西路同志军没有遇到强大的敌军，队伍迅速扩大。

同志军不但包围了成都，而且成都通往各地的所有通讯都被切断，几百里路的电线杆被砍倒弄走。

赵尔丰急调驻打箭炉、泸定、宁远一带的精兵 1 万人增援成都。赵尔丰原任川滇边务大臣，这些军队原属他统领，赵署川督后，由傅华封统领。这支部队如能回援成都，对同志军威胁极大，必将对四川政局产生重大影响。但这支部队返师成都，必须经过雅安、荣经等城镇。

雅安哥老会首领罗子舟集合雅安附近同志军，阻截傅华封军队返师。

罗子舟是雅安县上坝乡人，自幼不好读书，尚武术，尤精于少林拳法，与人角力，三五人不能敌。结纳江湖，从事袍哥活动。武功过人，好打不平，不畏权势，逐渐成为雅安义字旗袍哥领袖，闻名于嘉定、雅安两府。孙中山曾派同盟会会员、川南著名哥老会首领余英回川准备武装起义，余又派人与罗子舟联系，被清廷侦悉，下令通缉。罗避居峨眉山金顶寺庙内，被清兵围困。罗带随身卫士两人，跳入数十丈悬崖，两卫士摔死，罗落谷底荆棘丛中，受轻伤而脱逃。因大难不死，被人称为“罗八千岁”。

罗子舟参加“攒堂大会”，返回雅安组织同志军，全军 2 万人口，罗任川南同志军水陆全军统领。9 月 17 日攻破雅安城。

雅安西南 90 华里的荣经，西有天险大相岭，是军事要地，又是傅华封部援成都必经之道。荣经同志军首领李永忠遣人送信，向罗子舟求援。罗子舟把雅安事交人临时主持，自带同志军往援。罗军各持火枪，以草纸一叠，捆于胸腹，御枪弹。罗子舟缠头亦足，口衔朴刀，手提独子毛瑟枪，率队奔向荣县，并派所部赶往大相岭各要隘设防，狙击清军返援。与傅华封部前锋相遇，清军数千人发动强攻，屡次冲锋，均不得逞。双方相持达 40 余日，清军不能越过大关一步。傅华封部苦于鞭长莫及，难以返师。

四川重要城市重庆，是四川同盟会活动的最重要基地，早在 1906 年，同盟会就在重庆设立了支部。1910 年，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堪（沧白）学监张培爵，教员周国琛、向楚、熊兆飞、黄圣库，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学监朱之洪等，均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重庆支部即设重庆府中学堂，杨庶堪是支部总负责人。

11 月 5 日夜，新军驻龙泉 68 标 3 营 3 队督队官夏之时，联络新军 230 余人，在龙泉驿附近的土地庙誓师起义，杀清军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推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连夜率兵东下。夏之时原是从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夏之时率队渡沱江，绕道北路东下，沿途加入起义军的士兵近千人，声势大振。从潼南经水路，抵达重庆江北的黄梅树。

是时，重庆附近的长寿、涪陵、南川、江津、合江，在同盟会人策动下，先后宣布独立。

重庆同盟会派朱之洪前往黄梅树与夏之时联络，共同议定：夏军经浮图关进入重庆。

夏军入城后，即宣布重庆起义。

朱之洪返回重庆，将同夏军接洽的情况向杨庶堪等报告。支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和平方式发动重庆独立。

夏之时部于 11 月 22 日进抵重庆。重庆知府钮传善闻讯，急忙命令关闭 9 门，宣布戒严。

朱之洪、张颐从城墙低处缘梯出城，来到夏之时部。巴县中学监督朱蕴章同体育学堂学生来到城门，喝退守兵，打开城门，夏军整队入城。

此时，同盟会在重庆城内的朝天观城议事会会址，组织各方数千人集会。会上，张培爵宣布重庆独立。

知府钮传善被挟持到会。他平时善言词，今慑于群众威势，畏缩气阻，瞠目结舌，低头表示投降，跪在地下，剪去辫子，缴出伪印，亲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誓词，当众宣读。随即由党人挟之游街。

当晚，宣布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设蜀军政府于原巡警署。杨庶堪、朱之洪担任军政府高等顾问。军政府各部院的部、院长，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

川北军政府也在广安成立。同盟会会员、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于 9 月中旬率数千人起义，攻破大竹县城。同盟会会员曾省斋招集民军，得到李绍伊部支持，占领垫江县城，又于 11 月 21 日攻下广安州城，召开全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曾省斋为大汉蜀北军政府都督，当地会党首领张雅南为副都督。蜀北军政府成立后，分兵三路出征，先后攻下十多座城镇。在川南，同盟会会员杨兆蓉、席乾生、邓西林等人策动南路防军士兵起义，逼迫泸州永宁道刘朝望反正。刘迫于形势，剪去辫子，宣布反正。于是成立川南军政府，以刘朝望为都督，举人温翰楨为副都督。重庆的蜀军政府见川南军政府没有革命党人参加，认为是假独立，便准备派兵进攻。刘朝望只得通知川南 25 州县派代表到泸州，改举同盟会会员但懋辛为副都督。不久，川南军政府撤销都督名号，由刚从成都出狱的黄方任总司令，王树槐任副司令。温翰楨改任枢密院院长，但他不常上班，杨兆蓉、邓西林为副院长，负实际责任。川南军政府也为同盟会人掌握，并听命于蜀军政府。

素以“赵屠户”著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已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成都自 9 月中旬以来，兵团相持两月余，交通阻塞、金融混滞，军无官饷可发，大清银行存款均已借空，各兑号不能放帐，所有各局所军营人员，均给半饷。驻省陆军千余人，月饷不济，大有怨言，军心异常惶乱。统制朱庆澜得耗，与各标统出以善言开导，几欲下泪，云准限 3 日发饷，然军心不为之所动。

11 月 14 日，赵尔丰在难以支撑的局势下，释放被囚禁 70 余天的蒲殿俊、罗纶等 7 人。

蒲、罗等人被释后，便公开发表《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要求各路起义军“息事归农，力挽和平”，充当“赵屠户”之说客：“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

初之宗旨哉！此不肖等所以哀告我伯叔兄弟，而愿急急回头者也。约既废，路既保，保路同志会之事已完，则斯会可以终止；危身家，害性命，非保路国志会之宗旨，则兵戈亟宜罢休者，此义甚明，我伯叔兄弟不可不熟思而审处之。若夫保路同志会其名，而家破亡身者其实，此道甚误，我伯叔兄弟不可不明辩而慎择之。”许多成都市民为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而暴尸街头，但他们被释放后，却把人民起义称为“祸毒”，要求人民“回头”，让赵屠户继续压迫人民，这未免令人齿冷。然各道民军挟义反正，非蒲、罗等所能动。

赵尔丰见大势已去，而蒲殿俊等已变成他的走狗，便将政权暂交给他们，让他们当作挡箭牌，以便把自己的实力保存下来，伺机再起。他同蒲殿俊等达成协议：四川独立自治，设军政府，举都督为机关，赵尔丰等部署军旅就绪后，出关任边务。

11月27日，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新军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但军权仍由朱庆澜掌握。

赵尔丰暗中挑唆成都纪律废弛的巡防军营官兵，向军政府索饷闹事。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在东较场阅兵。新军在前，巡防军在后。蒲、朱出立阅兵台，训话甫数语，后队枪声忽作。蒲、朱等台上之人，即首先下台四窜。后队见正副都督逃窜，更枪声四起。前队新军即张惶四顾，那带队军官亦随台上之人逃之不见，全场秩序大乱。

于是，巡防军变兵开始大肆抢掠，先抢大清银行、浚川源银行，随后延及各银行票号，傍晚抢藩库、商业场、东大街各商铺，当夜抢劫各街铺和私宅，火光四起冲天。公私财产损失不下1000万元。

担任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尹昌衡便挺身而出维持成都治安。

尹昌衡是四川天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回国后曾在广西新军任职，后进川任陆军小学堂监督，在四川新军中威望较高。

尹昌衡先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占领成都北门一带，又赴凤凰山，号召留营新军数营经北门进城平乱，又召成都附近的同志军吴庆熙、孙泽沛、侯国治等部入城。变兵饱掠财物后，满载离成都而去，城内秩序渐见安定。

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兵变中解体。新军将领彭光烈等、同盟会会员张澜等，以及士绅徐炯等人，在北较场开会，改推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罗纶为副都督，重建军政府。尹昌衡将各路同志军改编为川军第2镇，彭光烈为统制，张捷先为参谋长，张达三、孙泽沛、吴庆熙、侯国治等分任标统。

赵尔丰密召驻打箭炉的边军傅华封开来成都，先头部队已抵达雅安州府。

尹昌衡见势，当机立断，先利用哥老会分化赵尔丰卫队，然后围攻总督衙门，将赵尔丰捕获，枭首示众。

傅华封见赵尔丰已死，自愿去职将军队交出。可谓树倒猢猻散。

成都局面稳定后，成渝两军政府酝酿合并，双方达成协议，推出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罗纶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夏之时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四川完成了统一。

## 第十九章 钟山风雨

南京成为清朝政府在长江流域的一座孤城。两江总督张人骏有督署卫队 2000 人；江南提督张勋率江防军 23 营，计 7000 人驻南京。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1884 年投军，1891 年任广西参将。1895 年参加袁世凯小站练兵，充工兵营管带，后随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升至总兵。1902 年调北京，多次扈从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后调奉天任职，1908 年升云南提督，后改任甘肃提督，1910 接任江防营，驻浦口，1911 年 8 月任江南提督，思想顽固，极端忠于清朝，是个凶残能战的悍将。张勋部下有两标领，一是王有宏，一是赵会鹏，各领 10 营，其余 3 营由张勋直辖，称为亲兵。

武昌首义后，江防军手持大刀，到处搜索革命党人，遇着剪去辫子的青年，立即逮捕，押往小营、一枝园、万关等处刑场。杀人无数，谓之“杀和尚头”，杀后悬首示众，惨不忍睹。南京下关仪凤门等，都有江防兵把守，城内无辫青年不敢出走，吓得戴上假发，坐在家中，不出大门一步。

南京城里驻新军第 9 镇，统制是徐绍桢。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人，举人出身。曾任福建武备学堂总办，江西常备军统领等职，1905 年任新军第 9 镇统制，倡行征兵制。第 9 镇属第 17、18 两协，有第 33、34、35、36 四标、马队 1 标、炮兵 1 标、工程兵 1 营、辎重 1 营、宪兵 3 营，是一支建制完整、装备精良、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镇司令部、17 协司令部、33、34 标以及马、炮、工、辎、宪兵各部队驻南京，18 协司令部、35 标驻镇江，36 标驻江阴。

第 9 镇的革命党人活动，始于著名革命党人赵声担任 33 标标统时。赵声乃江苏丹徒人，原名毓声，字伯先，号百先。1902 年毕业于江南陆军师学堂，遂倾向反清革命。次年游日本，与黄兴结识，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员，撰写七字唱本《保国歌》，秘密散发，宣传革命，为当局所忌，离南京，赴长沙，任实业学堂监督。1905 年，谋于新军在保定秋操时策动革命，未成，到南京任督练公所参谋官，在江阴训练新军。不久辞职，随郭人璋到广西，任巡防营管带。年余，仍回南京，任 33 标 2 营管带，旋擢该标标统，曾援引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林之夏、林述庆、陶骏保、冷遯等人先后来第 9 镇任军佐。

孙中山派吴暘谷到南京组织同盟会，柏文蔚的岳王会南京分会集体加入同盟会，赵声、林之夏、冷遯、林述庆、伍崇仁、孙麟、韩金声、何遂、杨韵珂等人以次加入，公推赵声为长江盟主，设机关于鼓楼之东，先定玄武湖之湖神庙为会议地点。

赵声进行革命活动，被两江总督瑞方发觉，便赴广州，在新军中担任标统，并筹谋广州新军起义。

虽然赵声等人离开南京新军第 9 镇，但留下了不少革命种子。

武昌首义后，张人骏、张勋等人严重疑忌新军，便将新军子弹收缴，又收新军炮 6 挺、机关枪 6 门。与此同时，将驻浦口的江防军调入南京，人发 500 颗子弹。新军和江防军，便成冰炭。新军众论沸然，无不发指眦裂，终日聚议，均欲与张勋的江防军作生死拼，因子弹未能得手，是以累欲起事而又累蹶。张人骏、张勋摸透新军用意，乃于狮子山北极阁高架大炮数尊，炮口对准 33、34 标；水路又于三叉河要道架大炮一尊，炮口对准工、辎两营。新军无子弹，日坐愁城。

张人骏要在新军各标营大事搜捕，召徐绍桢密议。徐特异议，谓是适以激变，张人骏不敢轻举妄动，便将新军 5000 人调出南京城，移驻城南 60

华里的秣陵关附近。张人骏答应拨发新军每人枪 150 发子弹，机关枪 1 万发子弹，炮弹 1000 颗，弹药和 9 月份饷银于 10 月 31 日运往出防地点。出防前，各级将校欲先领弹药，后出发。张人骏坚持到防地即发。

但部队到了驻防地方，根本不见弹药饷银运来，受了张人骏之骗。

在新军人心愤激、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的情况下，上海革命党人派柏文蔚来南京。柏文蔚安徽寿县人，字烈武。原任第 9 镇 33 标管带，因与孙毓筠等拟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走东北，任吉林屯田营管带。同冯麟阁、蓝天蔚等计划在东北起义。武昌起义爆发，乃去上海，受同盟会派遣来南京。南京同盟会机关设在内桥，由上江公学校凌毅、李华侗主持，策动新军起义。柏文蔚便住在机关里。新军官兵知道他来到南京。有几十人前来同他联系，皆以新军有枪无弹而虑。

新军革命党人以下级军官和士兵为多，中上级军官害怕，且有逃离军队者。第 9 镇统制徐绍桢亦惴惴不安。新军移至秣陵关后，柏文蔚便随之前往。徐绍桢得知，约他相见。

柏文蔚告诉他，只要他能领导反正，当拥为都督。徐道：“余老矣，汝辈青年，万不可叫我做难题。”第 9 镇正参谋官史久光、17 协协统沈同午、18 协协统孙铭在座，反复讨论，决定先上海、以次攻南京的策略。徐绍桢当即命柏文蔚返上海运枪炮子弹来，作起义准备。当天，上海光复。次日，江苏、浙江同时光复。

正在柏文蔚、徐绍桢等准备起义时，南京局势突然变化。由武昌潜回南京的原第 9 镇马标排长苏良斌，贸然在南京城内单独采取冒险行动，于 11 月 7 日夜半纵火。督署附近卫队和汉西门巡防营内革命党人，误认新军发动起义，乃同时响应。张勋的江防军统领王有宏亲自用机关炮击毙卫队起事士兵 20 余人。其余起事者力不支，乃遁去。巡防各营革命党人相继起事，打开城门，未见大军来到，江防军用枪乱击，杀伤甚多，起事者溃散。

次日，张人骏、张勋将巡防营未起事者即行调离城外，将城门紧团，严密防守。由凌毅运动的城内的响应力量、巡防军等，因先斯发动，被各个击破。

驻扎在秣陵关的第 9 镇新军，在上海、江苏、浙江、镇江相继光复的消息鼓舞下，急于一显身手，不等柏文蔚从上海运弹药来，便于 7 日下午下达起义的命令，计划分三路向南京进攻，主力向城南雨花台进击，由沈同午任总指挥，口号是“兴汉灭满”。

新军士兵把刺刀、马刀一律开口，准备肉搏拼杀，夺取雨花台，作为进攻南京之据点。第 9 镇士兵多是勇往直前，但官长有勇有怯。有些中级军官，本来亦不能为部下所容，于是，能逃者逃，不能逃者，只好收起那种夜郎自大的骄傲态度，对部下俯首听命，假意赞成，遇机再图脱逃。

第 9 镇新军准备在 8 日上午发动进攻，却不知苏良斌在 7 日夜半冒险行动，城内响应部队已被击溃，还以为在攻城时能得到城中内应，故在弹药不济的情况下，决定进攻。

8 日上午 11 时，各路纵队抵达无名纬河南岸。主力纵队先锋骑兵刚出花神庙北端，遭雨花台清军守兵炮击，但炮手的技术极差，炮弹落点离起义军很远。起义军 33、34 标继续前进。

两标展开后，始报协司令部，沈同午急进花神庙，见两标已成战斗队形，军队均脱离总指挥官掌握，陷于各自为战之情况。起义军前队又误认为

炮台守军已背叛清朝，便挥动手臂，号召守军同起义军联合。当起义军靠近守军时，遭到守兵排炮袭击，死者无数，少数幸存者才伏地开枪还击。

起义军除 34 标每人有子弹 3 粒外，33 标及马炮标、工、辎等营均无子弹、战斗不能持久。下午 5 时，接到从南京城内逃出的谍报员报告，方知苏良斌冒险发动，造成失败的消息。内应断绝，又势成骑虎，沈同午决定只能夜袭，组织敢死队 100 人，每人发 8 发子弹，携手榴弹猛扑雨花台。

傍晚，33 标吹起冲锋号，部队向前冲杀。但毕竟弹药缺乏，清军守兵据险用机枪扫射，起义军伤亡达 200 余人，他们一面进攻，一面盼子弹运来。听说子弹用棺材装运而来，但终不见运到。

9 日天将拂晓，起义军疲惫不堪，难以再战。沈同午暗想，天明必陷于全灭，不如背进镇江，以图再举。适大雾不辩咫尺，乃命马炮工辎队先退，33、34 标继之。因大雾笼罩，张勋军队不敢追击，也不敢下山搜索。起义军溃败后，大部沿句容大道退往镇江，小部分退往安徽，也有奔往武汉的。

张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因涉戮而惨遭杀戮者达数十人。是以盗贼蜂起，随处抢掠，人们恐慌动荡，四出逃避，人心普遍对清廷不满。

原驻江阴的新军 36 标早已移驻镇江。镇江驻有新军 18 协司令部和 35 标 3 个营、36 标 2 个营，计 5 个营，子弹万发。那 36 标营管带、同盟会会员林述庆，奉中部同盟会密令，同李竟成一起，率镇江新军起义。镇江驻有京口副都统载穆所部旗防步兵 1500 人、山炮 1 营、机关炮 4 尊、马队 300 余人，又有巡防队 1500 人，枪械子弹充足。旗军将山炮、机关炮分置南门城上，防御新军。但旗军兵力摇动，夜不敢眠，纷议他徙，一夕数惊，纷纷隐匿财产，已无战斗力。

李竟成由沪到镇，策动驻镇各部队暨各界志士，齐举义旗。李竟成同林述庆密议后，召开军事会议，推林述庆为镇江总司令，许崇灏为参谋长，于 11 月 5 日发动起义。

起义军包围了镇江，威胁旗兵，并派人往旗营劝降。京口副都统载穆，深知旗兵游惰日久，不堪一击，恐战事一启，旗人遭屠杀。又以大势已去，非镇江一隅所能抵抗。

当地士绅等又反复劝说，遂传令所属马步各旗，一律缴械，共步枪数千支、炮数门、马数百匹。

驻镇江的水师管带徐宝山，经李竟成联系，渡江开往扬州。驻镇江的张勋所部江防营，也经李竟成联络反正。

于是，镇江未经战斗便宣告光复。林述庆被推为镇军都督，陶骏保为参谋长，李竟成为军务部长。

柏文蔚从上海运武器弹药来到镇江，被推负责招集从南京撤退的军队，以待整编。

尚有从南京城内坠城而出的巡防军千余人，也被柏文蔚改编为先锋队两营。

第 9 镇新军退集镇江时，徐绍桢自赴上海，同沪军都督陈其美和旅沪各团体接洽，商议联络各方进攻南京。

11 月 11 日，沪军都督府议推徐绍桢为进攻南京联军总司令，电请江苏、浙江两省都督府公认。

但是，徐绍桢原来所统率的第 9 镇兵力，均全部转入林述庆控制之下，林述庆便不再欢迎空手赤拳的徐绍桢重新做他的上级。然而，林述庆的资望



远不能与徐绍桢相比，镇军内不少人劝他服从徐的领导，同盟会会员林之夏劝之不从，乃不辞而别，表示脱离镇军。后经柏文蔚再三劝说，林述庆才勉强表示同意。

徐绍桢从上海乘火车来到镇江，召集各方代表会议，组织苏浙联军总司令部，徐绍桢为总司令，顾忠琛为参谋总长，孙毓筠为军事参谋。主要兵力有镇军、苏军、浙军、淞军四支，还有海军相助。镇军包括原第9镇全体部队，编成镇军第1镇，以柏文蔚为统制，受镇军都督林述庆管辖。下属两协，第1协为前卫，第2协为总预备队。苏军由协统刘之洁率领，共步兵4营，炮马各1队。淞军黎天才部，共步兵600人。浙军朱瑞部，步兵1标、马队2营，炮兵2队，工程辎重各1队。此外，后期开到的还有：洪承点的沪军义勇队，江阴、淞江的巡防营，以及女子国民军30名。这些军队中，镇军和浙军战斗力最强，淞军虽人数不多，但强悍善战。

徐绍桢于11月16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林述庆、柏文蔚、刘之洁、朱瑞、黎天才等参加。决定分兵三路：淞军为北路进攻乌龙、幕府两山；苏军为南路进攻雨花台；浙军、镇军为中路，镇军攻天保城，浙军攻紫金山。各路军作出发前准备。20日，徐绍桢发出命令，各路从速进攻，海军随同前进。

联军各路向南京进攻，首先取得突破的是北路的乌龙、幕府两山炮台。联军总司令部的同盟会会员官成鯤曾任幕府山炮台官，同炮台兵感情一向融洽，立意策计运动炮台兵反正，秘密谒见徐绍桢，徐绍桢十分高兴，遂派徐朔相助。官成鯤、徐朔密召两台弁兵，晓以光复大义，弁兵表示愿意响应。徐绍桢立刻调淞军黎天才军600人和浙军马队，在夜间随同官成鯤、徐朔直赴乌龙山麓，直达山巅，炮台兵开门欢迎，改插白旗。拂晓，又分兵占领幕府山。捷报传来，徐绍桢立刻任命官成鯤为炮台司令，并留黎天才所部镇守两山。

张勋命令狮子山炮兵轰击幕府山炮台。狮子山、幕府山炮兵都系湘人，彼此心心相印，不愿轰伤同乡，故狮子山之炮，只轰幕府山麓，或半山，或越山而过，从未命中。

25日，联军向南京正面发动进攻。以朱瑞为支队长、吕公望为参谋长的浙军3000余人，是进攻的主力。这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经东流市向麒麟门前进，同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击退从马群来的清军，一举占领紫金山东部，右翼在孝陵卫附近，左翼到达紫金山中部。清军统领王有宏被击毙，死者1000余人，被俘数百人。王有宏是张勋的一员大将，素来强悍善战，他战死，对清军士气是个很大的打击。

因张勋部的辎重在浦口，镇军柏文蔚率11营渡江，向六合前进，作为攻击南京的右侧支队。

刘之洁所部苏军向上方镇进攻，并占领了上方镇。

占领幕府山的联军，向城内北极阁两江总督府、满旗将军府和张勋提督府等衙门轰击，炮声震天。1枚炮弹命中北极阁，在总督张人骏、满旗将军铁良和提督张勋3人居住的庙宇内爆炸，击毁了2尊小炮，那3位清朝大臣胆战心惊，惊慌失措地逃入附近的日本领事馆避难。

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麒麟门，命镇军速拨步兵1标、骑兵2队、山炮8门，到前线助攻。

张勋见联军围城很紧，于11月26日拂晓5时，亲率奋勇队4000人，

旗兵 1000 余人，袭击联军。战斗自晨至夕，清军不支，退入城内。浙军奋勇追击，直到朝阳门外。

张勋从此只知消极守城，再不敢相机出击。联军对南京已成合围之势，张勋部队正无异坐以待毙。

联军总司令部发布向天保城攻城命令。

天保城地处南京城东朝门外的钟山半腰，钟山山势高峻，居高临下，俯瞰南京全城。

天保城上筑要塞，既高且峻。天保城地形窒碍，起伏无定，山路崎岖，羊肠曲径，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天保城为攻取南京之要点。南京过去一直流传着这样的兵谚：“要得南京城，先打天保城。”敌军在天保城设江防兵 1 营，旗兵 400 人，炮 10 余门，机关炮 4 尊。敌军以坚强之兵力，凭险死守，接电话与城内通消息。

徐绍桢下令镇军、浙军、辅以洪承点的沪军，以及刚刚赶来的粤军，会同猛攻天保城。

30 日下午，林述庆率镇军第 2 标，同浙军 2 队、沪军义勇队以及粤军从钟山山麓，攀藤附葛，猛力冲锋。清军弹如雨下，战斗异常激烈。镇军管带杨韵珂、浙军敢死队队长叶仰高等战死。

12 月 1 日晨 6 时，联军终于攻克天保城。争先冲上天保城者，为镇军连长季遇春。是时，浙军、粤军亦由两翼相继攻入。沪军亦派队增援，始把天保城完全占领。

联军在攻克天保城的同时，苏军也攻占了南京城南的雨花台。

天保城既破，南京再也无法坚守。张勋遣清军统领胡令宣、被俘的联军总司令部顾问史久光出南门，手执白旗，臂缠白布，投苏军司令部，谒见刘之洁求和。

当晚，张勋率残余部队潜出南门，由大胜关一带渡江，赴浦口。两江总督张人骏、满旗将军铁良，仓皇搭乘日本军舰“秋津州”号出走。

南京城内军心本来不稳。张勋待军不均，素来厚于江防军，薄于巡防军。每战必令巡防军冲前阵，少却则令江防队以炮击之。城中缺米，江防军有食，巡防军则无粮，苦战数日不得食，甚惨。张勋走后，胡令宣和巡防营统领张联升、赵荣华等，各率残部投降，开城门迎联军入城。镇军林述庆部从太平门入城，苏军刘之洁部从南门入城，徐绍桢率联军总司令部从马群开拔入城。

张勋率残部向浦口溃退，遭柏文蔚部截击，缴得枪械饷银甚多。柏文蔚借机扩充了部队。

原新军第 9 镇主要兵力都落入镇军都督林述庆的手里，林述庆实力雄厚，颇有不可一世之概，不愿受徐绍桢控制，他率部入城后，擅自住于两江总督署花园大洋房内，署内全驻镇军，不许其他部队入署。他不再打着镇军都督的旗号，自改称江宁都督。徐绍桢率联军总司令部到两江总督署，镇军不准他们入署。徐绍桢只得将总司令部带往谘议局屯驻。

徐绍桢虽然号称联军总司令部，只能仰人鼻息。林、徐不和，使南京城内开始出现混乱现象。联军兵力虽以镇军为最强，但其他各部队对林不服，认为林述庆不过是原系徐绍桢的部下的管带，论其资望及功勋，实相差甚远，扬言要举兵攻之。苏浙两省也对林述庆不满，甚至连镇军内部亦反对林述庆夜郎自大的行为。林述庆自称都督，无法控制南京全局。城内浮动，其势汹

汹。有谋暗杀的，有谋围攻督署的。

徐绍桢处境狼狈，力辞重任。他致电各省军政府并各报馆：“已将南京城光复，民军陆续进城，此皆群策群力所致，桢实无丝毫之力，善后诸务极繁，务求诸公推举都督以图长治久安。俾桢敛身归隐，没齿铭感。”黄兴、宋教仁、章太炎以及沪军都督陈其美立即复电：“此间已公推程德全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并推林述庆为出征临淮总司令。东南要人，本党英俊，共表同情。德全即日赴宁，北征尤为重要。”江苏省议会全体议员复电称：“江苏本为一省，宁苏分治，原属满廷弊政，今既改为共和，一省之中应只设一行政总机关，俾民政有所统一。而宁苏相较，自以驻宁为宜。

程德全平昔行政，注重民事。现在金陵光复，拟即请程公移驻宁垣，抚绥保定以慰全省民望。”早在联军集合于镇江进攻南京之前，徐绍桢见林述庆欲另立联军总司令部，曾电致上海总机关部，力辞总司令职。上海总机关部便改举程德全为总司令，以徐绍桢副之。

程德全自称无军事学识，通电力辞，但允许亲赴前敌抚慰各军。上海总机关部以军事紧急，电请徐绍桢以国为重，勉任其难，徐绍桢不得已，遂率联军向南京进发。

12月3日，同盟会要人宋教仁、于右任等由沪赴宁。宋教仁面见林述庆，劝道：“倘程公督宁，一切军需上补充，必能极力担任，不使君丝毫掣肘。”林述庆迫于南京情势，终于允诺，参谋长陶骏保即执笔立草电稿，付电局拍发。其电文中有一省不可三都督之语。自此电发出，南京城内混乱的局势消弭。

于右任等立即致电陈其美：“林都督承认临淮司令任务，军民全体急盼程都督火速莅宁，维持治安大局。”程德全于12月6日，从上海乘专车到达南京，随即就任江苏都督。从此，江苏省会由苏州迁往南京。

林述庆被改举为北伐临淮总司令，但镇军中许多人对他并不心服。进攻南京时，林述庆委柏文蔚为镇军第1师师长，徐宝山为镇军第2师师长，郑权为镇江军政使。林被推为总司令后，即赴浦口晤柏文蔚，商量就职和北伐事宜，柏对林态度冷淡，商谈也毫无结果。林述庆又赴扬州去晤徐宝山，徐也不加理睬。他只得回到镇江，与镇江军政使郑权商议，郑亦无所表示。那雄心勃勃的林述庆，不得已，只得宣布下野。

武昌形势十分危急，黎元洪已退洪山，致电南京求援。宋教仁、于右任便派淞军黎天才率部往援。黎是湖北人，积极赞同赴武昌，遂将收编的巡防营张联升、赵荣华部同淞军合组一师，以黎天才为师长，星夜驰援。

## 第二十章 北洋军阀之路

袁世凯指挥北洋军进攻武汉。

袁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因是河南项城县人，人称“袁项城”。其曾祖父袁甲三，是清朝漕运总督，伯父袁保绪是天津海关道，父袁保庆是江南道员。袁世凯少年以世家子弟应试陈州，考试列前10名，不幸被主试官挤出。他气愤已极，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另找门路，向亲戚刘延年借了路费，

投奔天津伯父袁保绪那里，并通过伯父的关系，谒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看他一表人材，大加赞赏，说他的功名前途远在袁保绪之上，便想让他入帐下听令。袁保绪认为他年轻，刚刚涉世，恐怕误事，不让李鸿章派遣他。

袁世凯遂投奔世交前辈淮军提督吴长庆，在其军营从戎。袁渐渐取得吴长庆好感。

一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 3 天，士兵聚赌产生纠纷，彼此开枪射击，各营营官多已回家，无人维持秩序，袁灵机一动，假传提督命令，带领亲兵赶到现场，查明真相，立即把管事者就地正法。事后向吴长庆报告事情经过，就自己专擅杀人事向吴请罪，吴不但不怪，反奖许他有临机应变之才，提升他为营务处帮办。

1882 年，朝廷派庆军入朝鲜解决内乱，23 岁的袁世凯随军入朝。庆军在朝鲜纪律很差，抢劫强奸事件不断发生，朝鲜人民非常愤恨，驻在朝鲜的日军方面也异常不满。袁向吴长庆建议整肃，可吴认为孤军远征异国，如果操之过急，会酿成变故。袁一再陈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吴终于同意，还提升他为营务长总办，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他从各营抽调一批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日夜巡查，遇到害群之马，立刻就地正法，因此营中纪律严整。

袁世凯又奉命为朝鲜国王编练一支亲军，定名为“镇抚军”。他还经常代替吴长庆从事外交活动，和日本、帝俄等国使节交往，清政府奖授五品同知衔，不久，李鸿章保荐他为三品道员。吴长庆带领庆军撤出朝鲜，袁世凯驻扎朝鲜，为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才奉命归国。

他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

袁世凯还有巴结上层的本领，他的老相识阮忠枢在他归国时，正好在李莲英弟弟家里做私塾先生，袁世凯抓着这条线巴结上了李莲英。那李莲英生性狡黠，自阉为宦后，以善梳新髻得慈禧太后宠信，由梳头房太监擢升总管太监，赐二品顶戴，干预国政，卖官鬻爵。李莲英便在慈禧那里美言袁世凯，慈禧大喜。当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奏请训练新军时，慈禧便让袁世凯领导小站练兵。

袁世凯未受过军事教育，从戎后靠自学钻研有关操典、战略战术书籍，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他善于把兵书、律令编成顺口溜，教士兵唱诵，士兵学习进步很快，不懂军事的满清官吏也觉得他的道理好懂。小站练兵每次发饷，他亲自点名发给，杜绝中间层次的吃空额冒领的时弊，他在士兵中也有了点威信。袁世凯带兵，有一绝招，他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挨刀。这使官兵觉得他就是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袁世凯善处小圈子内的人，他工于心计，非同小可。阮忠枢为他做了美事，他则向来对他成心买好。在小站练兵，阮负责文案。一天，阮向袁说，他在天津某妓院里交了个叫小玉的相好，想纳她为妾。袁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免了吧。阮只好作罢。不久，袁以公事为名，要阮同往天津。在天津下车，天色已晚，袁说先到一位朋友那里。阮跟他走进一个院门，看到房屋内铺得花天喜地，堂上红烛高烧，摆了一桌酒席。他们登堂入室，便见一个丫头喊道：“新姑爷到！”里间搀扶出一个新娘装束的俏丽美人。袁让阮迎亲，那阮忠枢一时如坠云雾中，及至细看，才知新娘便是小玉，真是大喜过望，袁世凯哈哈大笑：“妥了妥了！”袁世凯赞成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为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倡，又有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倾向变法图强，给维新人物以游说公卿掀起变法的机会，又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变法先从改订官制和法律入手。于是，光绪便将变法之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等人任用。变法诏书纷纷发布，新政方略颇广，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提倡实业、创办国家银行、精练陆军、添设海军、开办学堂、废除八股、选派留学生等等，举国震动。

变法触犯了一班清廷守旧大臣的利益，也犯了慈禧的胃口。慈禧便召光绪过来问话：“变法也是要紧的，但是，不要违背祖制，不要损害满清权势。听说你这变法只听康有为、翁同龢的话，康有为能叫人放心吗？翁同龢揽权狂悖，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事情能弄好吗？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可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你把翁老头子撤了吧，他也能当户部大臣？让他回家养老去吧。以后新任命的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到我这里来谢恩。

我也不能太偷懒了，这祖宗的基业也不能靠你一人撑着。那直隶总督是个紧要去处，就叫荣禄去当吧。你当这皇上总叫我操心啊！”慈禧开去了一个变法大臣，变法依然闹腾着，那康有为有一份请定立宪召开国会的奏章，写好了又不敢递进，被内阁学士满人阔普通武知晓，便给康有为壮胆，自己也签了名。光绪看了连呼：“不错！”立即下旨，提升阔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立意实行立宪政体。大学士孙家鼐不觉大骇，在光绪帝前连连磕头：“这立宪政体是万万行不得的！”

百姓有权，皇上就无权了。”光绪拍案道：“朕欲救中国，无权何害！”孙家鼐劝不拢，忙去报告慈禧。

变法裁撤冗员最难，光绪帝召康有为进宫商议，意欲尽裁各闲废衙门，便下谕裁去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那班有名无实的京卿，金饭碗被打破，将康有为恨了个半死。光绪帝春风得意，又下旨把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尽行革职，这便是太岁头上动土。那礼部尚书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内亲，便赶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那一班被砸了金饭碗的官儿，那许多受到威胁的皇亲国戚，也纷纷请求太后重新听政。太后听后，也不多言，便暗中派人到天津，把直隶总督荣禄召来，设下一条计来。

这一天，光绪身着康有为从宫外给他弄来的一套西洋服，手里拿着一条棍子，在书房中踱来踱去，正在十分得意之时，忽听报说：“老佛爷到！”光绪慌张起来，但也来不及更换衣着。慈禧一脚踏进书房，见皇帝这副模样，皱起眉来，光绪忙上前请安。太后道：“你们天天讲变法，我也觉得不错。尤其是东洋人把我们打得这个样子，实在是该练练兵了。那荣禄上奏，请皇上跟我去天津阅兵，看看现在这练兵到底练成什么样子。”光绪不知其中有诈，遂下旨要荣禄将行宫御营准备，令京津铁路总办预备特别花车。

康有为闻外间盛传，太后要在阅兵时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便进宫禀告，光绪大慌：“此事不可不防，却是如何是好？”康有为向光绪推荐一人，说他手握重兵，定能救皇上。此人便是直隶按察使、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练就一支新式劲旅，它操演纯熟，纪律严明，配备新式枪炮，又有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勋、段芝贵一班将才。若把袁世凯召来，加官优奖，危急时可以依靠。

光绪遂下旨：“电寄荣禄，着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袁世凯入京，

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详细询问新建陆军的情况，又问及变法，袁极为赞扬新政。光绪破格提升袁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光绪又称赞袁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暗示袁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世凯连连磕响头，谢此隆恩。

袁世凯此时深知帝后两党斗争情况，实际上他在心里脚踏两只船。

光绪觉察自己的举动有人监视，行动失去了自由，知大事不好，便写了一道密诏，交军机章京杨锐，让他立即转交康有为。杨出宫后打开密诏一看，大吃一惊：“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受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杨锐竟然不敢把密诏转给康有为。

光绪又写了朱谕，让林旭转交。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便把梁启超、康广仁、谭嗣同等召集起来，传看了皇上给袁世凯的朱谕，面面相觑。康有为道：“要救皇上，只有杀掉荣禄。此事端赖袁世凯精忠报国，皇上召见过他，他现在还在北京，快去找他。”谭嗣同道：“皇上要有为兄离开北京，有为、启超二位先走，我去找袁世凯。”袁世凯见谭嗣同深夜来访甚感惊讶。寒暄数句，谭嗣同单刀直入：“天津阅兵是阴谋，皇上现在有大难，可救圣主者，唯有袁公，袁公要救便救，如果不救，请到颐和园告发我，可以得到荣华富贵！”袁世凯勃然大怒：“谭公以为我是什么人！圣主是我等其事之主，我与谭公同受皇上隆恩，救护之责，难道就是谭公一人的吗？您有什么高见，请就指教。”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慷慨激昂，便取出朱谕给他过目。皇上令袁世凯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将荣禄正法，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铲除旧党，助行新政。谭要袁收了皇上朱谕，等布置妥当，再定日期动手。

袁世凯道：“我万万不敢惜死，只是担心万一泄露，必将累及皇上，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谭公请先回府，容我深思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若何？”谭道：“皇上很急，我们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袁跺脚道：“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谭公别急，下个月两宫巡幸天津，待到那时集合军队，皇上下一纸条，谁敢不遵。”谭嗣同叹口气道：“等不到那时候，就可能废主弑君。”“既有巡幸之命，不会忽有意外，必须到下月方可万全。”“万一一个月没有巡幸，怎么办？”袁世凯微微一笑：“现在已经预备妥当，花了数十万金，我这里再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以放心。”谭嗣同不由自主，只好客随主意，又道：“荣禄有曹操王莽之才，恐怕不容易对付。”袁世凯拍案而起：“若皇上在我营内，杀了荣禄如同杀一条狗！”次日，袁世凯进宫上朝，请准返回天津。光绪道：“爱卿返回天津后，抓紧训练军队，报效社稷。”袁世凯心领神会，叩头出宫，即乘火车回津。

袁世凯一路思索，力量悬殊，怎能做飞蛾扑火之事？下了火车，长叹了一口气，看准总督衙门，直奔了过去，见了荣禄，便把谭嗣同夜访之话，全盘托出。荣禄大惊失色：“你的意下如何？”袁世凯振衣而答：“我前来报告，就是为了破他们的奸谋，保卫老佛爷。”荣禄道：“这样很好。”袁世凯走后，荣禄随即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变。慈禧便命荣禄返回天津，掌握军队。

慈禧赶回紫禁城，带大批侍从，闯进光绪寝宫，光绪见慈禧满脸杀气，知道大事不好，连忙跪下：“给母后请安。”慈禧恶狠狠地说：“你好没良心，

你4岁时我就立你为帝，又把你抚养成人，如今你翅膀硬了，好大胆子，变法变到我的头上，想加害于我，你想想，你的良心哪里去了？”慈禧摸一把眼泪，叹了口气：“我想，你命薄，没有福再当皇帝。”她转脸对侍从说：“传我的话，就说皇上病了，今后不再理事，明日开始，还是我听政。”光绪帝从此被幽禁在瀛台。

慈禧重新垂帘听政，降下懿旨，捉拿所有维新党人，不得放走一个。

谭嗣同和梁启超在屋里谈论变法，有人闯进来报告：“大事不好了，皇上已经被太后软禁起来，朝廷下令捉拿维新党人。”谭嗣同脸色阴沉，在房内踱了几步：“梁公，你快走，以后维新大业要靠你们了！”“谭公，咱们一起步！”谭嗣同摇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尚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这是中国不昌盛的原因，今日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梁启超见谭嗣同已横下决心不走，便一人离去。

荣禄派出捕快，将谭嗣同押入死囚。谭嗣同在墙上写下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杨深秀6人，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场。谭嗣同一路高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6位维新变法志士就义，戊戌变法失败。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才知道：改良之路不通，中国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荣禄被慈禧召回京城，授大学士，权在军机大臣之上，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又召见了她，准许在西苑门内骑马，赏银4000两，以示优渥。

那些知道袁世凯与维新党人关系的亲贵王公，说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荣禄忙出面保护：“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次年，义和团在山东沿海地区以及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起义。参加起义的是些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船工。他们受贪官污吏、地主劣绅的欺压、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和侮辱。在民间秘密结社的义和拳，便起而同星罗棋布的外国人办的基督教天主教堂斗争，几成战争状态。山东巡抚毓贤便将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以便控制利用，义和拳就此改为义和团，以扶清灭洋相号召，一时山东从者如流，几乎遍地都是义和团，对外国势力构成了很大威胁。

荣禄见状，便派袁世凯率新军8营，以演习为名，开往德州观望山东的动静，向义和团示威。袁世凯上奏朝廷，提出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导愚民，而缔邻好。朝廷便下令免毓贤职，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所部武卫右军开往山东。

袁世凯上任后，立即捕杀肥城团民，并将知县撤职，令村民交纳9000两银，作为赔偿给英国人。从此，袁世凯派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义和团，保护外国洋人。朝廷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诉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持兵力。袁上了一个奏折，称义和团“纠合百十万人鞭撻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但是，义和团杀不胜杀，直隶的义和团也遍及各州县，以至京城内的义和团也越来越多，到处有反对洋人的揭帖，公开设立坛棚，董福祥所部甘军的一部分士兵也卷入义和团活动，杀死了日本使馆官员杉山彬。

面对动荡局势，清廷群臣绝大多数满族朝贵赞成利用义和团打洋人，

以毒攻毒是也。

那义和团已制它不住，若是剿迫急了，岂不是不利朝廷？另一派汉族官员反对，要求把义和团当作“乱民”镇压下去。

浙江人、太常卿袁昶入殿向慈禧奏曰：“义和团自称神拳，号称刀枪不入，所请的天神都是《封神榜》上的鸿钧老祖、元始天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皆出自于说部，倘使真有灵验，为什么在山东抗不了北洋新军和德国驻军？依此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明察，义和团实不可恃。”慈禧不悦：“这义和团如今愿供我天朝驱使，正是天朝洪福，你却有何术阻挡洋人？”端王载漪向慈禧奏曰：“有洋人照会，译奏如下：皇上屈居瀛台，终非久计，应该恢复新政，太后应撤帘退朝；外国人有权代收中国钱粮，代管中国兵马。”慈禧不知载漪等人伪造此照会，意在促她向洋人宣战。慈禧已对洋人同情光绪不满，以为确有洋人这样照会，气得浑身发抖：迫我归政，此恨不得不报之。遂发了一纸诏书：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会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这道诏书在国内一发，反抗英、美、德、意等国联军入侵的局部战争，变成整个北方的杀伐。

在天津列强组织八国联军 1.2 万人攻击清军。清军将领聂士成率部抵抗联军，战死。

所部归马玉昆指挥，马玉昆要义和团大刀长矛在前冲锋，而清军官兵殿后，从背后开枪杀死义和团勇士。朝廷派往天津任帮办北洋军务大臣的宋庆，又下令痛杀团民。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尽皆散去。

宋军屠杀义和团的当天，联军便攻进天津城，天津城外的 7、8、10 营清军立即纷纷溃退。联军长驱直入，包围了北京城。

慈禧即命掩藏珍珠财宝，传旨让珍妃投井自裁。她自己身着一套乡妇服装，又命光绪、皇后、大阿哥、少数妃嫔王公化妆，结成一队乘轿轿向外逃难，护卫队 2000 人远远跟在后面。北京城的守军也全部逃跑。这是 1900 年 8 月 15 日事。

慈禧一行逃到山西，住进太原行宫。慈禧又讲究起来，每日菜谱选百种，费银 200 两，虽比不上北京宫中，慈禧也就将就了。

八国联军在北京杀抢烧掠，为所欲为 8 天，见人不分青红皂白，按倒就杀。那些粗壮的官兵将所获妇女，不分老少穷富，集中在裱背胡同，剥光衣服，集体轮奸作乐。将寺观和王公府第纵火焚烧。颐和园的珍宝古玩，装入箱内，用骆驼队运往天津租界，运送了几个月。有个名叫樊国梁的法国传教士，闯入户部尚书立山家，一次就抢走了 1 万两白银的财物。日军从户部抢去了 300 万两库存银子，并放火烧掉衙署。联军烧杀抢掠之后，做出进兵山西的姿态。

慈禧令李鸿章去北京议和，她便领朝官逃往西安。

那班洋人，各自争夺中国领土，俄国除了派兵攻打京津，又派了 18 万大军攻陷东北。

英国怕俄独占中国，便联合德国派兵占领山海关，阻止俄军南下，又集中英国扬子江舰队，开到大沽，准备对俄一战。日本反对俄国独占东北。德军占了山东。那美国没有势力范围，便嚷着门户开放利益均分的腔调。



慈禧在西安仍放心不下，担心联军进攻西安，传谕发电李鸿章与奕勳：和谈可成不可败，议和条件即照八国所提应允。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北京城内各帝国主义者代表，想瓜分中国，碍于各自争权夺利，很难取得妥协，不如维持清廷以维护各国既得权益，又提出议和条款：赔款4.5亿两，39年付清，加上每年摊还的利益，共计近10亿两，以关税、盐税作保；削平大沽及京、沽间一切炮台，天津城外10公里之内，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和驻扎，北京和山海关之间12处要地，各国派兵驻扎；北京设立特殊的使馆区，占地120亩，华人不准居住在内，各国使馆可以自设军队；禁止中国人从事任何排外活动，惩办赞助义和团的官吏，惩治和禁止各地反帝社团，停止山西、直隶、东北、河南、湖南、陕西、浙江共45城的文武官科考5年；禁止中国从外国购买军火两年；废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

议和条款电奏西安行宫，慈禧一看，狠是狠了点，没有追究自己，便道：“传我的谕，让李鸿章、奕勳跟他们签了吧。”条约签了，可以回京了。慈禧启銮回京。忽有电报传来，说李鸿章在京病死。慈禧叹口气说：“这些年来，没有顺心的时候。”遂传谕要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

袁世凯带骑兵千人前来接驾。一行回銮队伍非常壮大，行箱笼就有3000来乘，这些东西都是慈禧流亡西安行宫时，各地送给她的京饷，尤其是袁世凯，送的东西吃穿用样样周到。

慈禧回朝之后，准备正式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满族亲贵多半反对，向慈禧奏道：“袁世凯不能重用，当初吾朝向列强宣战时，袁与东南重臣划境自保，既未尽力谏阻排外，战祸既开。当以执干戈卫社稷为要务，举国对付洋人，才是办法，而他们袖手旁观，袁所部号称是北洋劲旅，与天津战场近在咫尺，却不一兵一卒援津，甚至帮助洋人杀义和团，这不是居心叵测吗？”慈禧劝说道：“满汉界限，不可分得如此清楚，吾朝力求中兴，非大大利用汉人不可，你们说袁世凯不能用，却又用谁呢？你们谁比他有办法？哪一个人能被朝廷依恃？至于你们所虑也是，我心里注意他就是了。”于是慈禧谕旨：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太子少保銜。慈禧和光绪以及两宫回銮北京，见宫内被联军破坏很重，袁世凯赶急筹款来置办宫内陈设用品。袁看向下摊派来不及，只好自己掏腰包，远远不够，就邀集直隶各属官前来商议，说要暂借他们的私款，来办皇上与太后的事项，以后再还。那些人便哭起穷来，袁办事极有分寸，就说算了。但他又派人悄悄地与天津的几大票号接洽，说是有一些公款要存在他们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回答说最高8厘。差人叫道：“别的票号比这高，你的利钱要长一长才好。”票号里的人便将帐簿拿了出来，翻开帐簿，用手指着某某官署，某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那差人一一记清帐簿上的100余万两存款和存款人名字，回禀袁世凯。这袁世凯便把那些官儿找来，把票号里的事说了，并变色道：“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我惩戒了他们，已经把冒名的存款暂时收借。”袁世凯用这笔款子，置办宫内陈设，那些官儿暗下叫苦不迭。

慈禧见袁世凯办事有方，便发下上谕，成立练兵处，总摄朝廷练兵事务，着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

袁世凯有小站练兵的经验，又有一大批具备近代军事素质、忠于他的军官班底。他于1902年1月以“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下，提出100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军费用，定出《募练新军章程》，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贍家饷银等等，以保证军队稳定。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地，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6000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6000壮丁共编10营，称为“新练军”。又制定《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給全饷，每月饷银4两2钱。

袁世凯以新练军10营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作为直隶全省军务总汇之所，袁世凯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3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担任总办。

慈禧对袁世凯十分满意，又叫他任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3000人，分批到保定训练，称为“京旗常备军”。袁世凯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管制太严惹出麻烦，便奏请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 第二十一章 国中之“国”

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领全国练兵之风骚。那朝廷满族亲贵担心汉族军阀掌握了全国军事力量，构成威胁，亦为不美，看那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新军也很不错，遂决定以北洋军与湖北新军为并列的两支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互相牵制制约。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练成后回原省管带新兵。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升降任用。

北洋军离朝廷最近，势力覆盖了北方半个中国。袁世凯并不满足，他以使全国的新军都整齐划一为名，达到操纵指麾无不如志的目的。1903年3月，他拟定了“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那慈禧太后亲自到保定视察。

袁世凯身着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北洋军和陆军学堂师生1000余人跪于路旁，迎接慈禧，太后见这么多穿着军服的彪形大汉整整齐齐地跪在眼前，心中大悦，说：“赏。”每人一枚银牌，以示恩慰。

慈禧来到军校，坐定之后，便召袁世凯过来问话，这陆军学堂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跪在慈禧脚下：“臣世凯为吾大清敢不肝胆涂地，以报圣慈的恩德之万一。”

臣接圣谕要办陆军学堂，去年就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奏派冯国璋督办，雷震春总办，二员倒也尽心。为编练新军培养官佐，非得好好训练他们。这些人主要是从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省官弁学堂学生中抽调而来，因此又名省将弁学堂。同时又设立北洋武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臣以为这才是初步，臣曾上奏，拟建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合计通筹12年毕业，以培养将才。”慈禧受八国联军之害，迫切感到，在列

强的环伺下，强兵才能富国，倒也很支持袁世凯办学堂，培养将才。便道：“唔。这也是好事，你放手办吧。你给学生上什么课呢？”“臣以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才力。除了军事课程以外，《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是必读的修身课，务使官兵忠君尊孔，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各陆军学堂，都有礼堂一所，供奉圣慈圣上牌位和文武圣牌，圣慈、圣上、文武圣诞日，各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很好！”袁世凯接着禀报：“总叫生员知道忠君报国。各学堂生员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新闻报纸闲书杂志未经允许，也不准携带入房，总叫外面的乱党邪说绝不污染生员耳目。”这话说到慈禧最关紧处，忙开口问道：“哦，这里有无乱党分子？江南最近可不安静，那广东就闹过会党造反。哼，听说那帮乱党在美利坚与日本闹腾得挺欢，知道孙文吗？”“臣听说过。”“年轻人容易听信那些邪端异说，你小心着点，士兵也是年轻人呢！”“臣敢保证这里没有一个乱党分子。”“我信得过你来说话吧。这里有不少日本教官吗？”袁世凯神色端庄：“这些教官倒还安分，虽然是日本人，倒还知道效忠圣慈圣主。”

虽然如此，我只让他们教习军事，对他们又多处防范。”慈禧仰面寻思一会。袁世凯偷眼观看慈禧圣颜。虽然她黑头发中杂伴着白发，但面部皮肤仍白嫩润泽，不失美女风姿。

慈禧低下头来，叹口气说：“我老了，可是老了也得想着变法，我是指望大清能国富民强，老叫洋人瞧不起到底不好，所以要行这些新政，可恨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吏不这么想，难得你对新政很上心，办事也得力，”“臣敢不鞠躬尽瘁，以报圣慈隆恩！”慈禧大悦：“你很好，你有了闲到宫里去，听你说话很开心，上次叫你在紫禁城骑马，听太监说你很会骑马，下次倒也见一见。”袁世凯忙跪下叩三个响头：“谢圣慈隆恩！”慈禧回京让人传下话来，袁世凯忠心办事，着不日即到颐和园觐见。

南方新军都已破获革命党人，倒是袁世凯所练北洋军深为可信，满朝亲贵对袁世凯毁誉参半，赞许他的人说他忠诚能干，反对他的人说他貌似忠诚，其实机诈，将来尾大不掉，不可不防。慈禧对他倒是坚信不疑。

袁世凯得到确信，太后在荣禄死后，内定庆王奕劻入掌军机，掌握政府实权，便赶紧派副官段芝贵到京，夜里给契廕府赠银 10 万两，奕劻变色道：“这袁官保是干什么，不能这么做。”原来那奕劻还不知道自己将掌握军机。

段芝贵辞出找到僮的管家，道：“您瞧，这点银子王爷不收，在下不能回见官保交差，官保已经得到确信，王爷就要入掌军机，这实是国家大幸，便差小弟来恭贺。那庚子与八国签订和约，是王爷和李鸿章主持，李鸿章今已不在，惟有仰仗王爷掌理国政，官保素常对王爷无比钦佩，又深知王爷素常谨慎。这次入掌军机，在宫禁内外必有一大笔开销，不如此，便不足以立威信。这些银子不过是官保的区区微忱，给王爷准备一些开赏的钱，不算什么礼物，千万请说周到些，必求王爷收下。这里还有官保不成敬意的心思，送给管家大人作买点的费用。”管家见他说得可亲可爱，笑道：“您客气了，您稍候。”过会儿，管家出来道：“受了受了！”奕劻果然与袁世凯有了交情。练兵处成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练兵处所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各司官员，都由袁世凯推荐。他推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

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这些人都是跟随袁世凯多年的北洋旧人。那袁世凯也推荐了一旗人铁良为练兵处襄办，以示对皇族中军事人材的重视。

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劻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这样练兵处便由袁世凯一人包办，一切要务均由各员请示他裁决。练兵处以《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程》为蓝本，拟定新军营制饷章，以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制度，命令各省遵照办理，从此把袁世凯编练北洋军的方法推行全国。

袁世凯不断扩军，这军饷就有了问题。于是，他便奏请慈禧批准，向全国各省摊派练兵费，每年达 900 余万两。袁世凯很快建起北洋 6 镇新军，那镇的编制，相当于现代化军队的师的编制。各镇将领都由袁世凯选定，这些人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第 1 镇统制先为风山，后为何宗莲；第 2 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 3 镇统制先为段祺瑞，后为曹锟；第 4 镇统制吴凤岭；第 5 镇统制先为吴长纯，后为张永成；第 6 镇统制先为王士珍，后为赵国贤。各镇属下之协统、标统、管带都是北洋的名人。除第 1 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都是他的嫡系部队，这些官兵只知道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袁世凯又把驻直隶的淮军各营整编为 39 营，由张勋等人统领，称为“北洋巡防淮军”。那武卫左军毅军统领宋庆死后，其 20 营军队也被袁世凯接收，交给他的亲信姜桂题统领，纳入袁世凯的北洋军系统。

袁世凯掌握着强大的北洋军队，踌躇满志，但他又不动声色，奏请举行秋操，从北洋 6 镇中抽调 2 万余人，分成两军。由王英楷、段祺瑞分别担任总统官，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以显军威。

慈禧回銮北京后，觉得守着老规矩不行，再度实行变法：“那洋人大概确有值得效仿的地方，不然何以这么厉害。尤其是这君主立宪，必定有许多好处。”她有心实行君主立宪，但却有点拿不准，便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一番，若果无妨害，则决意实行。

五大臣便是载泽、绍英、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称考察宪政大臣。他们选定佳日动身，各部官员到前门车站送行。五大臣上了专车，忽见一个青年，佣人装束，神色慌张，低头向车门内闯。车门口的守卫士兵忙去阻拦，喝问：“哪里去？”“来伺候我家大人。”卫兵看他可疑，极力把他推出去：“你们大人不配坐这花车，快下去。”那青年迅速掏出一颗炸弹，向车厢掷去，一声巨响，车内五大臣、一班卫兵和那青年刺客，应声而倒。送行的人忙抢上车去，见那五大臣不曾受伤，而是受惊倒地。那几个卫兵和刺客被当场炸死。

刺客身着内衣是“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制服，到保定一查，才知道刺客名叫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县人。1900 年，22 岁他去上海，旋北游直隶。次年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自此广结志士，与陈天华、赵声等相善。1903 年与杨笃生在上海发起军国民教育会，自任保定支部工作。又与人创办两江公学与《直隶白话报》，自兼教员、主笔，积极宣传革命。1905 年赴东三省，闻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并派五大臣出洋，乃潜入北京，于 9 月 24 日携炸弹进火车站行刺。他在行刺前留下遗书：“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颺汤止沸，抱薪救火。”五大臣出洋考察新政，归国后上奏请行宪政。五大臣之首载泽的奏折：“今改行宪政，则世界

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乱者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慈禧遂今朝臣商议宪政方案。多数人认为，宪政虽好，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何时立宪，还不能定，现在先从厘定官制入手，然后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设制巡警，作为立宪的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慈禧遂下“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一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清朝不久便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设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各部堂官设尚书1员，侍郎2员，并规定满汉不分。但那满族亲贵仍掌握绝大部分朝政，派任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的13个官员中，汉人只有4人。清廷到了这等地步，实在是病入膏肓，所谓新政，不过是骗人把戏，从上到下，满洲贵族不肯放权。那新政对老百姓，则是横征暴敛。老百姓本来就穷，而越来越腐败的朝廷，压在百姓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加上列强割地索款，老百姓被他们剥去的皮，一层又是一层，坐以待毙，不如造反革命。

主改良反对革命的梁启超流亡日本，认为腐败的清朝，在立宪空名之下，行腐败之实，只能为革命党提供借口。只有认真实行立宪，才能叫革命党不存在。他写文章，鼓动人民去争取真立宪，反对假立宪，还在日本成立了一个“政闻社”，去推动立宪政治的实行。梁启超宣称，他们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但那清廷，对康梁之辈仍是警惕，严禁他们在国内出版刊物、设立办事处，以及和各立宪团体联系。

国内，地主、绅士、资本家对清廷预备仿行宪政反应热烈。著名人物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曾铸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是个中过状元的纺织业大资本家，而且与官场关系密切，他同袁世凯曾一起随庆军入朝鲜，是老相识。他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燾代作《拟请立宪奏稿》，算是老立宪了。

郑孝胥字苏戡，又字太夷，福建闽侯人。举人出身，曾任清廷驻日本长崎的领事，又在广西、广东、安徽、湖南等省当过边防大臣、按察使、布政使，承办过瑗珲铁路。

他是上海实业界绅士中有头有脑之辈，对新政有独到见解，他道：“要中国文明，除非把中国一切地方尽行开放同外国人杂居。”他身上洋味十足。

汤寿潜就是前面所说的浙江都督，他原名汤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人。早年曾入山东巡抚张曜幕，撰《危言》，主张变法。1890年中进士，授安徽青阳县知县。1903年升任两淮盐运使，不久辞职。1905年加四品京堂衔，担任铁路总理。以后曾先后担任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浙江省谘议局成立时，被推为议长，浙江省光复时，被推为都督。

他是个老维新派。

曾铸号少卿，福建同安人，在上海贩运南洋大米进口，获厚利。1905年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和虐待华工，激起上海、广州、长沙、苏州等地的反美爱国运动，他在上海提倡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的权利。后又投资镇江造纸厂和江西瓷业公司，发起成立上海商团公会，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著有《山钟集》。

又有湖北汤化龙等成立宪政筹备会，湖南的谭延闿等成立宪政公会。这立宪运动，一时轰轰烈烈。

倒是那袁世凯，头脑机警，他不管是真假立宪，趁机扩张势力，又不打草惊蛇。他人在天津，却在北京办了个“临记洋行”，专为联络北京权贵，每日与庆王府通电话，报告有何新货到行，征询有无购买之意，利用这种业务刺探官中及各要员的行踪，以便见机行事。

庆王、军机领班大臣奕劻大寿临近，袁世凯与那桐、徐世昌、端方、盛宣怀等大臣，在北京什刹海西，造了个广大庭园，那庭园内，别有洞天，建有假山、流水、古轩、敞轩及西式楼房。此园方成，楼、轩、斋、馆所需铺陈，皆是袁氏临记洋行一手供奉。平日庆王府中大小婚丧喜庆之事，都由袁世凯一手包办，奕劻无须自费一文。奕劻本已广结财缘，那袁世凯等竭尽孝心，日用花费甚少，自然广有钱财。家中财宝约值亿两现银，比中国一年的财税收入还要高出许多倍。

袁世凯又与奕劻之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这便是袁世凯认奕劻为父。载振便是农工部尚书。奕劻每遇重要事件及简放各省督抚藩臬，必和袁世凯商量，袁世凯付给奕劻的是从老百姓那里收刮来的银子，从奕劻那里得到的是官衔。跟着袁世凯跑的人，自然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1906年底，慈禧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袁世凯把段芝贵招来，道：“你这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之职，干了已有将近两年。东北改行省制，载振与徐世昌两大臣就去考察，你们这两位伺候好。”段芝贵极机伶，心想这载振吃的喝的玩的什么没见过？光是供奉得好，恐怕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他一拍脑袋，便想起那振大老爷什么都无所谓，只有一样是永不厌倦的，便马上去张罗。

袁世凯摆了大宴，载、徐酒足菜饱，袁便对载振道：“振大爷，天津这里也有几出好戏，却也有一个女伶不错。”载振脑袋向前伸出三分，显然是有了兴趣。

那戏开锣，别的倒也平常，载振没有表示，忽然有个女伶出场，载振眼睛一亮，伸长脖子细细观看，便见女伶姿容丰满，且腰肢细软，迎风摆舞，表情极细腻，一双眼睛打过来，叫载振激灵灵一颤，那歌喉又婉转温柔，入得耳来，叫人软了半边。载振连道：“不错！不错！好好，她名叫杨翠喜，好好。”袁世凯领意，对段芝贵一笑，段芝贵心下明白，忙叫过一个警官来：“快去快去，找杨翠喜的妈妈来。”警官是个打更出身，干这些拉作合的事极有能耐，他去后回来回话，说杨翠喜身价特高，便是咱们去说，开值10万元妆奁费，换了别人，几个10万也打不住。

段芝贵拍案道：“值得，值得。”于是便付给10万元，将那杨翠喜接到载振屋内。

徐世昌备好了2000两银票，送到载振那里道喜。原来徐世昌同载振也是拜把子兄弟。

载、徐二人要出关北上考察。临行，对袁世凯道：“官保，这东三省的督抚人等，还得老哥你费心推荐，我知道你这里人材济济，小弟就省得费心了。”袁世凯大笑，便递过一份清单，东北督抚及各要员，皆开列得清清楚楚。

载、徐二人公干归来，在天津小住。载振又与杨翠喜聚首，却又不敢将她带回北京，必得回去报告父亲大人奕劻首肯，并得嫡妻同意。

不久，朝廷发表东三省督抚人等，总督为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分别是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

身份越级提拔，而杨翠喜事又为他人侦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

奕 父子是清廷近支皇族的一枝朽木，可谓撑下了半边天。奕 黠 好货，载振渔色无厌。朝臣中独有这瞿鸿 敢屡屡批评。这瞿鸿 字子玖，湖南善化人，晋内阁学士，先后典试福建、广西，督河南、浙江、四川学政使。中日甲午战争中，上四路进兵之策，未被采纳。八国联军入侵，随慈禧逃往西安，因为每次承旨拟谕，语中窍要，把好些微妙意思写得滴水不漏，很中慈禧心意。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处大臣，位在六部之上，参与筹计预备立宪。他做事很认真，想做一个中兴的大臣，可惜他撼山易，撼奕 父子难。

瞿鸿 为杨翠喜案弹劾奕 父子，载振也有点慌张，忙与袁世凯通话商量，袁说不忙，看是何人来查。

清廷本来是派载沣和孙家鼐查办，经奕 父子活动，去天津办案的人却是顺天府尹孙宝琦，孙是奕 提拔。他便私下同载振通气，要载振设法将杨翠喜另行安置。这载振便着人密送杨翠喜回天津，由袁世凯部下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领去。

孙宝琦知载振安置妥当，便去天津找王益孙查案，王便承认早已出钱买了杨翠喜为妻，用资若干，何处过付，何日入门，言之凿凿。

结果那奏劾段芝贵的御史赵启霖因“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降职。但载振把杨翠喜从天津带回北京之事，已成为马路新闻。这样办案，一时舆论大哗，督察院全体御史大为不满，声言会奏。慈禧亦有怀疑，再令复查。真相大白，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黑龙江巡抚，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慈禧对瞿鸿 颇信任，问他朝中能办事的有何人。瞿便推荐岑春煊可当大任。慈禧便下谕旨，提升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

岑春煊是广西人，云南总督岑毓英之子，慈禧“西狩”时，以迎銮护驾有功得任陕西巡抚，后任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他奉命调京，即奏罢侍郎朱宝奎贪黠误国。朱亦是袁党。

奕劻和袁世凯大怒，岂容瞿、岑二人如此胆大妄为！恰好革命党又在两广起事，便奏请调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设下调虎离山计。继而又由袁世凯心腹杨士琦拟稿，以白银2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玕“交通报馆”泄漏机密。

瞿鸿玕曾密奏慈禧罢免奕劻，慈禧遂有了罢免奕劻之意，驻华英使夫人在慈禧招待游园之际，当面询问，慈禧极力否认。但她寻思只有瞿鸿玕知道此事，便疑惑瞿氏不稳，杨士琦上奏弹劾瞿氏，她遂把瞿鸿玕开缺回家。

岑春煊知道朝局不定，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奕、袁深知此人不彻底推倒，终是祸害，遂叫心腹奏劾岑春煊在上海，暗通康梁，谋为不轨，把伪造的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慈禧，以为佐证。慈禧果然震怒，下谕即撤岑春煊之职。

奕劻、袁世凯终获全胜。这样的政府，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将终为奸人所毁。

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3镇和从其他镇抽调的两协，开往东北，东三省便成了北洋军的外府，不仅如此，全国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袁氏私人，袁氏势力，成为国中之国。怪不得有人传说，北洋天津督署是

中国第二政府。

皇族亲贵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一帮少壮，有了争权夺利的能力，见北洋集团势力逼人，双方遂斗将起来。

袁世凯奉旨进京参加改革官制，指使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议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另外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职等主张，以削弱袁的权势。那袁世凯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势之实；那铁良等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枪唇剑，互不相让。慈禧最后拍板，否定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让铁良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政权。

袁世凯虽然实力厚雄，但屡在朝中争斗，遇到铁良这样的贵胄势力，吃了闷棍，公开反抗，却是不行，便转变策略，以退为进，即连上两个奏折，请求开去兼职，奏曰：“臣自先世受国厚恩，复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

然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职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袁世凯说了冠冕堂皇的话之后，仍要抓住军权不放，但那北洋6镇，已有第1镇和第6镇在铁良之手，第5镇在山东，第3镇在奉天，只有第2镇和第4镇在直隶地面，故袁在奏折中道：“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请将第2、第4镇仍旧由袁统辖督练。”慈禧在奏折上批道：“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2第4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对于袁奏请开去兼职，慈禧直批：“着照所请。”对袁没说一句安慰的话，袁世凯气得病了几天。

铁良等亲贵集团并不就此罢休，鼓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说他权重势高，贪私误国，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慈禧压奏折不发，叹息道：“你们这些人，不知道做事的难处。”奕 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慈禧见那班旧军人不足以应付危局，预备立宪也需要袁世凯来参加意见，即发上谕，命袁世凯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又调两湖总督张之洞入京，同任军机大臣。

张之洞在南方各省，也有不少他的门生故旧掌权。让袁、张两虎离山，同居一笼，互相牵制，这是慈禧居心所在。那直隶总督，便拔摆袁世凯的心腹杨士骧继任，使袁世凯免生疑心。

光绪帝久病不愈，于1908年11月14日死于瀛台涵元殿。有人奔报慈禧，73岁的慈禧老太太面无表情，只是叹了口气，下谕张罗料理皇上后事。次日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庆亲王、醇亲王、袁世凯、张之洞等齐集阶前，慈禧太后遂立醇亲王载沣的3岁儿子溥仪为继嗣，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3岁幼儿溥仪即位，年号宣统。

摄政王载沣年27岁，以后的国家命运就系在他的身上，慈禧以新帝名义下谕，尊隆裕皇后为太后，自己为太皇太后。

慈禧忽然晕了过去，许久才清醒过来，急召光绪皇后、摄政王、军机大臣等：“我垂帘50年，今心力交瘁，乘我还清楚，便拟遗旨吧。”光绪、慈禧皆去，清廷重心移到摄政王载沣头上。载沣便会同铁良、良弼、善耆、载泽等谋划杀袁。载沣便命度支部尚书载泽夜访张之洞，把杀袁的意思一说，



张之洞吓得一身冷汗，忙道：“朝廷内外，俱知袁与我不和，无奈此时不可杀袁，天下方在多事，怎可骤杀重臣？务请禀告摄政王，镇静宽大为宣。”载沣再问计于张之洞，张道：“开缺回籍，已经够了，夺了袁氏大权，便无所作为，不足为患。”载沣听报，遂密电征求各镇统制意见，那第4第6镇统制先后复电，同意免去袁职，以免兵士有变。载沣主意已定，替袁造了个“观患足疾，步行维难”之借口，着回籍养病。

## 第二十二章 东山再起

慈禧归天，袁世凯回家，预备立宪继续。载沣根据以前的安排，令各省成立谘议局。

各省谘议局议员数目不等：最多的是顺天府与直隶，议员有140人；最少的是吉林、黑龙江、新疆等省，只有30人。那议员资格只有立宪派绅士才能获取，谘议局议长角色，自然都是有名的新派绅士，江苏张謇，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山东丁世峰，浙江汤寿潜、陈稼宸，陕西郭希仁等等，都是活跃人物。

张謇、汤化龙等，曾联合各省立宪团体，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提请清廷早日召开议会，清廷暂定9年后立宪。各省谘议局成立，张謇为首，邀请16省议员代表到上海集会，提出9年时间太长，请求两年内召开国会。他们赴京请愿，摄政王载沣回绝。1910年，各省谘议局和各地商会等社团代表，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两次赴京请愿，清廷宣告成立资政院。

资政院有200名议员，一半是摄政王钦定，一半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经督抚核定，称为“互选议员”。钦定议员有宗室王公世爵48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其余是硕学通儒或纳税多额者。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每年开一次议员会议。

要求召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高，载沣只得把预备期由9年缩短为3年，并答应立即组成新的内阁。载沣被迫答应，却又很恼怒，令民政部将各省赴京请愿团即日解散。

那立宪派人物也有靠山。以云贵总督李经羲为首的18省督抚两次联名打电报给清廷，主张内阁与国会同时设立。那些洋人以为袁世凯是新政的领头人，为袁被开缺回家不平。

袁党势力雄厚，尤其是北洋6镇，上下军官是袁一手提拔，自成体系，别人难以插足。载沣很是害怕权力被立宪派人夺去，急忙成立一个内阁。原来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改称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新内阁13个大臣，满人8人，皇族5人。这哪里是立宪，不过是原班人马更换了名字而已。但那立宪派对此却无可奈何。

既然朝廷不愿剪掉辫子，脱下朝服，让权于民，那些革命党人愤而起义，这便引出16省市武装起义，宣布脱离清朝政府。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朝政府内部立刻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能负责作出决断。身居最高位的摄政王载沣，素性懦弱，遇事优柔寡断，仰仗他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决难胜利。那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

甚于载沣，遇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贪婪无能，只知搜刮钱财。掌握兵权的军谘大臣载涛和毓朗、陆军部尚书荫昌等，都是些缺乏实际办事经验的纨绔子弟。调兵遣将，是军谘府职责。载涛作为秋操阅兵大臣正留在直隶永平，总监两军举行大操，留守京师的毓朗接到湖北发来的告急电报，一筹莫展，迟疑了半天才说：“这是内阁的事，我们不用管，让内阁去办吧！”奕劻召集内阁会议，决定由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命海军提督萨镇冰抽调军舰驶入长江赴援。

荫昌奉命督师，十分勉强，他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争，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调为难。他身穿袍褂，脚踏一双长统军用皮靴，摆出一幅三花脸姿态，走进军机处，当众高声嚷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用拳去打呢，还是用脚去踢？”众人见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这副形象，未免荒唐儿戏，却不知他说的是老实话。

奉命调往湖北的陆军两镇，即第4镇和第2镇第3混成协、第6镇第11混成协，都是北洋陆军的精锐。但这些部队都是袁世凯亲手训练出来的。第4镇统制吴凤岭以及不久继任的陈光远、第3混成协统领王占元、第11混成协统领李纯都是袁世凯的心腹，素来只知道有袁宫保，不知遵他人命令。

荫昌率领这样的军队去汉口外围同起义军作战，没有多大进展。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又有湖南、陕西、九江相继独立，清廷慌了手脚，即令被开缺回籍养病的袁世凯出山。

摄政王载沣召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载泽商议。

奕劻、那桐、徐世昌同袁世凯关系密切，提议起用袁世凯。载沣不语，片刻，奕劻又道：“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各国使馆，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载沣很不放心，道：“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这个不消说。”载沣蹙额：“你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的办。但是，你不能卸责。”尽管袁世凯被罢黜家居，他的潜在势力却丝毫不减。他所以能够操清室政局，而别人莫可奈何，6镇新军实系根本。清末练新军时，以北洋6镇配备最好。枪炮弹药，皆最新购自外国，效能极强。各省新军名为洋枪洋械，但与北洋相比，则又多系粗劣旧械，故实力相去甚远。北洋6镇兵源选择极严，兵士之体格、文化，皆有一定标准；而各省多系旧兵改练，即新招者亦未经严格甄别。北洋选聘外国知名军人充当教习，尤其中下级军官熟习新操新制；各省之新军训练敷衍塞责，且没有强者作教习。北洋6镇军费充沛，官兵军饷较他省为高。袁世凯苦心经营的，只有袁宫保的北洋6镇军队，使他居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多年来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又出任过外务部尚书，长期掌管清朝对外交涉事务，同帝国主义列强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精明干练和讨好列强，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器重。他被罢黜后，列强们仍一直对他寄以极大的希望，强烈要求启用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驻北京的各国使馆发出“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

袁世凯同立宪派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通过唐绍仪、梁士诒、杨士琦、周学熙等将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控制的铁路、航运、电报、煤矿等事业夺到自己的手里。他又支持立宪运动，在一些人中博得“开明”的

声誉。他罢黜家居后，对他存有芥蒂的立宪派领袖张謇曾去拜访过他，两人通宵畅谈。张謇临走时，袁世凯用亲切的口气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謇同袁世凯的关系更加密切。张又是在南方有相当大影响的人。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深知清廷对他有所疑忌，他的行动十分审慎。有人劝他乘时而起，依靠自己的实力，取清朝而代之。但他一则因清发迹，所谓“世受国恩”，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落个不好的名声；二则旧臣尚多，亦具有相当势力，北洋旧部尚未作充分准备；三则革命党人领导各省起义，民气发展程度尚未看透。他与革命党两军相对，内部不完全统一，想取胜有很大的难度。

清室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着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他却并不立刻出山，而奏称：“旧患足病，乞今尚未痊愈。”以此作为拖延时日的借口。袁世凯的目的是要更多的权力。荫昌作为陆军大臣在 frontline 督师，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他节制调遣，袁世凯自然也要受荫昌的指挥，不仅难以有多大作为，而且为人火中取栗，将来自己的结局依然难测。袁世凯看准了这一点，自然是不会迅速赴任。

清廷无奈，只好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给予湖北军务全权。袁世凯遂将冯国璋率领的第 1 军、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全部掌握在手中，才“旧患足疾”霍然痊愈，从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师猛攻，于 1911 年 11 月 1 日攻入汉口。

袁世凯在清政府的声望顿时陡增，清廷不得不把他看作唯一可资倚靠的南天柱。庆亲王奕立即辞去内阁大臣职务，袁世凯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但袁世凯仍不立即北上就职，他要确实控制北方局势后，才去北京。11 月 4 日，他派人到石家庄刺杀了第 6 镇统制吴禄贞。

吴禄贞字寿卿，湖北云梦人，素抱革命主义，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留学日本，就读于士官学校，参加过兴中会，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曾先后任武昌普通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新疆伊犁监督差使、东三省军事参议、延吉边务帮办及督办、陆军协都统、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又被派往德、法两国考察军务，回国后任第 6 镇统制。武昌革命事起，警报频传，因之雄心勃起，血肉为跃，愿为革命，以牺牲其生命，乃拟起事于北方，树数尺之白旗，振臂而起，期于嗟咄之间，推倒满洲政府。

不久，山西起义，吴禄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奉命率第 1 镇 1 协及第 6 镇第 12 协开赴石家庄，转进山西。吴禄贞认为这是实现革命抱负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到石家庄以后即派参谋周维桢、何遂与山西革命志士筹划革命大计。

阎锡山由于清军迅速移兵石家庄，而且力量比较强，他正在为难间，忽有清军第 6 镇参谋周维桢等持吴禄贞亲笔函求见。函的开头第一句话说：“我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继而又说：“革命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东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由于吴和阎都是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吴早阎数年毕业，为前后同学，阎深知其归国后，积极努力于革命工作，故当时即拟以同意复之。但是，参谋人员想得比较多，疑其有诈。阎锡山说：“他亦为同盟会的盟友，岂有骗

人的吴寿卿乎？”参谋人员则坚决主张请吴到太原面商。而且认为，必须于吴禄贞合歼当地旗军后，才能组织燕晋联军。他们说：“吴将军先令旗军攻固关，晋军击其前，吴军击其后，旗军歼，燕晋联军之举自可实现。”于是，阎锡山立即复函，请吴到娘子关会面。

阎锡山又派参谋职位的士官同学仇亮促吴进兵，并在电话中与吴禄贞开玩笑道：“将军为巡抚所动了罢！”吴禄贞答道：“这是哪里话，我们应该当面谈谈，共罄所怀。”阎锡山立即约吴到娘子关，吴慨然允应。

11月4日，吴禄贞与吴鸿昌、参谋何遂依约而来。阎锡山及温寿泉、黄国梁、赵戴文、姚以价、马开崧也乘火车准时到达。秘密会议立即进行，吴道：“清室授我为山西巡抚，是一种笼络手段，我决不就任。我们共同站在革命立场上，亟愿与山西携手。我们眼前事，山西很要紧，可能山西光复，中国就光复，重要在于起义的是时候，能使清廷震动。袁世凯是中国第一个毒东西，他现在湖北孝感指挥作战。

袁如回到北京，掌握大权，革命就有很大危险。我们现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破，山西的重要可想而知。还有，山西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堡垒，将来中国万一对外有事的话，海疆是不可靠的，山西要负很大责任，所以山西这个后方的堡垒，也要好好布置。

“我是老革命党，你可能不知：你山西军队情形与革命发动情形，我一概尽知。你千万不可游移，怀疑我想做山西巡抚，你太小视我了。我是同唐才常起义的失败者，我曾加入兴中会，组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起事失败，你可放胆同我合作，我不会骗你。”阎锡山立即赞同他的看法。吴禄贞只带少数参谋人员进入山西革命军防线之内，充分表示了诚意，也使阎锡山的幕僚人员均释疑虑。会晤中还讨论了斗争策略。吴禄贞道：“现时清军力攻武汉，第6镇兵与山西兵南下合击清军，为武汉民军后援是为上策；第6镇与山西兵北伐，直捣燕京，夺满廷巢穴，是为中策；第6镇兵与山西兵连营占领石家庄，守山西要隘，断满虏粮道，是为下策。上中二策，恐不能霎时办到，暂可缓图，先以下策着手。”阎锡山认为这种策略适合情况，非常赞赏。于是，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决定组织“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阎锡山答应派出两营兵力，进驻石家庄，听从吴禄贞指挥，共同作战。

吴禄贞又道：“我已有电约张绍曾赶速定期会师，直捣北京，推翻满清，成立民国，使革命早日完成，已得张复电同意。惟近日最可虑者为袁世凯，我有深报，此公野心勃勃，大肆活动，如彼出山到京，革命前途障碍最大。现在他尚在沉机观变。以吾所料，此公必出。北洋新军中他的党羽不少，他若就任内阁总理，或督兵大员，旧军中他的丰沛子弟尤多，鸡犬飞升，将是另一个局面，革命前途，三年五载难期成功。我之所以主张速会师都门竟此全功者在此，诸君以为如何？”当吴禄贞问到何时行动时，阎锡山道：“第一列军车，随君而后即开。”吴禄贞为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而不断放出烟幕弹，不断制造向晋军进攻的假像。

11日，他亲赴井陘，督师进剿，占领蔡庄，革命军退守滑驴岭。12日，与革命党接战，地势极险，悬崖绝壁，难以骑行，革命军坚韧不拔，相持一日夜之久，革命军不支，退守娘子关，并把赴娘子关与阎锡山组织“燕晋联军”说成派副官知府周维桢等驰入敌军，晓以国家艰危之大局及改良政治之苦心，已允输诚。顷已下令停止攻击，并即单骑往抚晋军，尤属忠勇可嘉。

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要他迅速进京组阁。吴禄贞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比较激烈，有所泄露，更为第6镇中袁世凯系统中的人侦破，密报袁。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知吴将军与晋军合谋阻袁北上的信息以后，恨之入骨，即以3万重金贿赂周符麟，去石家庄暗杀吴禄贞。

周符麟是吴禄贞的旧部，原为第6镇第12协统领，曾被吴撤职，所以怀恨在心，寻机报复。周到石家庄后大肆活动，首先串连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用重金收买。马与周是同乡，都是东北人，在延吉时就跟随吴禄贞，吴对他十分信赖，所以重用他为身边的卫队长。周、马私下约集军官集会，以金钱、官禄为饵，引诱军官反对吴。

参谋何遂发现马等行动鬼祟，便向吴报告。吴生平为人志大气豪，疏于防人，对何的报告不予重视，只是说：“不要紧，马惠田是靠得住的。”当晚，有人劝他调山西部队来作卫护，他不肯。同学刘道仁劝他搬出车站，找民房暂住，他也不允。因而没有作任何戒备。

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在车站一个小院办公室批阅文件。马惠田、夏文荣、吴荣章等4人，趁其不备，闯入办公室。马进门一面口称向大帅贺喜，一面在行跪礼时即掏出手枪向吴射击。吴见来者不善，即绕案桌躲避，并掏枪还击。随即跳窗冲小院，但马等紧追不放。吴又一个箭步跳上墙，准备翻墙而出。这时腿部中弹，跌下墙来，乘势射击。其时马有意向外逃走，吴跟随追击。殊不知是计，刚出墙外，伏兵四起，为一阵乱枪击倒。副官周维桢、来宾张世膺亦均同时被杀。

阎锡山所派晋军两营于11月5日运抵石家庄，当时吴禄贞十分高兴，招待猪肉馒头，并允另给新式服装。11月7日，吴禄贞殉职后，晋军领导人仇亮、姚洪昉、景晟、史宗法、马龙章、俱得勋等，共同向清军第6镇第12协协统吴鸿昌要求：联合破坏京汉铁路、黄河桥及滹沱河桥，并逼迫统带与之联合，速行北上。

吴鸿昌本是袁世凯系统的人，当然不会合作，带领清军逃窜栾城。同情革命的清军官孔庚、何遂、李敏等则到山西参加革命。两营晋军也因兵力单薄撤出石家庄。晋军撤不远，见清军都已溃散，即返回，将石家庄存储之弹药、粮秣、服装等，运送太原。

11月18日，袁世凯命段祺瑞为第6镇统制，到石家庄收拾乱兵，阎锡山为防清军进攻，命令晋军在井陘、雪花山布防。至此，“燕晋联军”失败。

袁世凯又派人暗中与南方立宪派人以及帝国主义者接触沟通。他做了这一切后，才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入朝觐见隆裕太后，表示效忠清室。2日后，袁世凯便公布了内阁名单，他的亲信居于重要位置：陆军大臣是王士珍，民政大臣是赵秉钧，邮传大臣是杨士琦。那立宪派代表人物也有了位置：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为司法部副大臣，他们虽然没上任，但对袁世凯却有了感情。

袁世凯又策划削减君权，加重阁权，遂呈递停止入对奏事说帖，清廷允准，自此一切政令均集中于内阁，袁世凯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清政府大权。但他却没有就此罢休，继续进逼清室，把清室残存的一点力量全数排除。载沣虽然庸懦无能，但他的摄政王之位，仍使袁世凯感到不便。12月6日，清室被迫准许载沣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朝廷用人行政，均归内阁。袁世凯又将禁卫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调心腹将领冯国璋接充第二军总统，负责畿辅和海防一带防务，兼充禁卫清军总统官。

对袁世凯有点牵制作用的，只剩下军谘府年轻的军谘使良弼。袁世凯还没来得及对他动手，良弼因反对共和，革命党人彭家珍却将他炸死。

袁世凯取得了清政府的全部权力，便设法对付起义各省，若靠武力镇压，全国人民反对清政府、拥护实行共和的情绪非常强烈，武力是压制不住的。于是，袁世凯便使用剿抚兼施、软硬并用的手法。

他先依仗自己手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队，集中地给首义的武汉起义军相当打击，后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议和。

袁世凯写信给黎元洪商议和事。黎元洪复信袁世凯，劝他赞助民军。并表示：“公果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 400 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袁世凯又派黎元洪的同乡、道员刘承恩，以及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到武昌议和。黎元洪召集各部长、参谋等在议事厅接见刘、蔡两人，刘、蔡首先表示：“我辈要求改革，无非为达真立宪之目的，今朝廷已宣布实行立宪，且开党禁，是则吾辈之目的已达。除民主国体外，无论何种意见皆可代达袁项城代奏，请朝廷采择实行。”黎元洪态度温和地表示若项城现率所部转取冀汴，尚不失为都督，将来大功告成，公举总统时，以项城威望或可当选等语。

但黎元洪并不能完全支配湖北军政府的实权，革命党人见有君主立宪，表示强烈反对。那朱树烈、陈磊、甘绩熙、范义侠等都抽出指挥刀，喝道：“谁主和，谁吃刀！”各部长俱起而痛骂袁项城无人格，讥两使无价值。那两使惟红涨两颊，默坐静听而已。

都督府门前又有民众团体作示威运动。刘、蔡两人见民军志不可挠，民气不可侮，失意而去。

袁世凯派刘、蔡和谈，实属试探。试探后他决定与汪精卫勾结。汪精卫被长期监禁，清朝政府对他又攻心软化，善耆常与他谈论政治，并赠以图史百余帙。汪精卫的意志、思想情绪发生了变化，他在狱中写下《有感》一诗，把自己曾经身体力行过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说成是“豆萁相煎”。在另一首题为《述怀》的五言长诗中，则谴责自己谋刺清摄政王的行动是一时感情冲动，缺乏修养，意境情态大变，实际上已向善耆投降。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解除党禁，宣布释放政治犯。

11 月 6 日，汪精卫被释。汪精卫刚从狱中释出，便被袁世凯找去，对他一再表示，他袁世凯早就同情革命，又令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为兄弟，借以笼络人心。汪精卫愿为袁氏出力，便与杨度、汪大燮共同组织“国事共济会”，以民间团体的形式主张南北议和，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

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屡遭挫折，他又意识到需要进一步给革命以打击，便密令北洋军猛攻汉阳。汉阳被攻破之后，湖北军政府张皇失措，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丧失了勇气和信心，因而很快落入袁世凯设计的“和谈”圈套。

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的坚持下，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从拒绝和谈，反对君主立宪，到放弃任何条件，主动要求停战议和。

## 第二十三章 恃强玩议和

袁世凯紧紧抓住攻克汉阳的有利时机，命令北洋军在龟山架起大炮，隔江炮轰武昌，以便给湖北军政府更大的压力。黎元洪极为惶恐。他的心腹李国镛给他出了个主意：汉阳既失，武昌危急，须别择地点，移驻节钺，以保根本。

黎元洪暗中派人到葛店准备住所，又派兵船停泊在葛店木鹅港附近备用。再暗嘱卫队，将枪支子弹准备齐全，以便保护他出走。同时把家眷送到上海避难。

袁世凯和汪精卫派朱芾皇携有汪精卫函自北京来到武昌找黎元洪。黎元洪很高兴，待以宾礼。汪精卫在信函中说，袁世凯将率北军反正，即请南中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以免兵临祸结。

第4镇第8协协统王遇甲奉袁命给黎元洪打去电话：“你是宋卿吗？我与你都是湖北人，我们都是协统，朝廷对你我都不薄，你为何做此不义之事，将湖北闹得天翻地覆？现在汉口、汉阳都在我们手中，此地虽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长江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你现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业，听候我们来处理。你如果马上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一样照旧。至于在朝廷方面，我们对你也说好话。你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大军一到，那就叫我们真的不好办了。”黎元洪听了这诱降的电话，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

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们拟定，我不仅事先不知道，写出以后我也未曾过目。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一笔帐专门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谈谈。”黎元洪的电话被都督府军令部谍报处参谋、共进会会员晏勋甫截获，并切断。晏立即来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该通敌。黎元洪面红耳赤，呆不作声。过了一会，才勉作笑容对晏勋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晏答应了，也没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黎元洪通敌不成，便决定逃跑。他在打点行李时被范腾霄发现。问他：“都督，岂非决议死守武昌者乎？”黎在汉阳失守的那天，曾致电各独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洪当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他把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只囁囁着答道：“势已迫，四周墙壁之被敌弹洞穿多处矣。

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锋。”黎元洪的卫兵抄起手枪对准范腾霄道：“汝辈主张不走，必欲置都督于死地而后已乎？”范腾霄见势，也不与他们辩论，急忙到军务部把情况报告给副部长张振武等。张闻言大怒，携甘绩熙、范腾霄、丁复等来到都督府，而斥黎不应违议私逃，黎无词以对。

张对甘绩熙及丁复道：“以都督交汝两人看守，如走脱，唯汝二人是问。”武昌城内起炮火，造成人心慌慌，纷纷向城外逃跑。军政府有人传言，说朱芾皇来鄂所携汪精卫函是假的，和议无望，于是人心溃乱。军政府机关人员亦开始逃散。那编制部长汤化龙逃往上海，理财部长胡瑞霖则托名赴沪募公债，挟多金以走，正副外交部长胡瑛、王正廷则诡称到汉口办理外交而去。甘绩熙也感到确有危险，遂与张振武、刘公等人商量道：“炮太厉害，都督欲出城，我辈宜许之。万一都督有故，我辈之罪大矣。”刘公、张振武同意甘绩熙意见，准备了一顶小轿，派亲随10余人和卫兵两队，令其护送黎元洪出宾阳门，逃至离城8里的洪山。但黎元洪出城后便逃到离城90里的葛店。

黎元洪出走之时，武昌百姓甚为惊慌，旋即拥挤出城，挤死妇孺甚多，

惨不堪言。

而兵士等见黎出走，亦相率逃窜，大有瓦解之势。

代理战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和参谋长吴兆麟正在青山，两人巡视防线，遥见城内起火，立即骑马赶回，得知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忙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 3 人，携带蒋翊武手书，骑马速往葛店，请黎元洪转回洪山，以资镇慑而维军心。他们 3 人来到葛店，天已逐渐黑下来，黎元洪已然歇息。甘等向黎说明武昌城内军民慌乱情形，拿出蒋翊武手书，坚请黎回洪山，黎元洪不听，于是甘绩熙 3 人商议，决定甘、谢在葛店监视，吴兆鲤回洪山报告。

袁世凯并不想立即占领武昌，因为清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以为政治发达之具，由他统一全国。于是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定停战条款，朱尔典电致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要他派人持停战条款渡江来武昌洪山总司令部，与孙武、蒋翊武、吴兆麟等接洽，表示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 3 天，只要双方在停战条款上盖印，即可停战。

葛福即派英人、万国商会会长盘恩，由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去武昌找吴兆麟。

盘恩对吴道：“民军自起义以来，极为文明，秋毫无犯，我辈英国人颇表同情。现在我们英国领事见武昌城天天受炮击，城内百姓甚念凄惨，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暂且停战 3 日。现在清军已表同情。我特来武昌见黎都督，请都督认可，将我带来公文盖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即可停战。”吴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带走，便问可否盖用总司令官印信。盘恩回道：“我在汉口已说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为是。”吴兆麟便嘱办饭款待盘恩，请总司令蒋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孙发绪商议，都督印在葛店，一时亦来不及，不如照样刻一个印盖了完事。孙发绪深以为然。于是吴兆麟即电话军务部孙武：“请速令刻字工人照样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盘恩饭毕，即来军务部盖印。”孙武闻停战 3 日，欣慰之至，当派高楚欢督令城内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样速刻。约一时许，电告已刻完好。那盘恩饭毕。吴兆麟即备肩舆数乘，遂谓盘恩曰：“都督印在城内军务部，请乘轿往军务部盖印可也。”于是盘恩和吴兆麟、孙发绪同到军务部盖印后，当晚渡江回汉口。

吴兆鲤由葛店赶来，向蒋翊武、吴兆麟等报告黎元洪在葛店坚不肯回城之事。蒋、吴又派 2 人随吴兆鲤仍返回葛店，携带蒋、吴 2 人手书，并手抄停战条件送呈黎元洪，要他们转告黎元洪：“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黎元洪闻已停战，喜出望外，答应回家祠。他在吴兆麟派出的马队迎护下，转回洪山附近的刘氏祠堂。次日又迁入武昌城内，将县华林高等小学旧址改为都督府。

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分析全国和武汉的有利形势，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都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汉阳虽然失守，但海军仍在民军手中，可以回击清军。他们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以及“和谈”圈套。汉阳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对袁世凯表示妥协。

在黎元洪的导引下，湖北军政府已不惜背弃革命党“创立民国”的原则，准备接受现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向袁世凯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之忠诚可疑，因此坚决反对他与清朝代表协商的任何协议。接着南京光复，革命军士气高昂，全国民心振奋，各省援鄂军队陆续到达，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至连黎的最忠诚的学生、参



谋长吴兆麟，对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为也予严厉批评，总监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甚至主张对黎通电劾之，因吴兆麟、蔡济民等劝阻，方才作罢。

黎元洪羞涩尴尬，不敢再公开附和君主立宪的调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报馆发表呼吁的方式声明：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朝，他赞成共和，收回他在汉阳失守后明确表示过的接受君主立宪的主张。

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议和的过程中变得生硬起来。英国人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吴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便有恃无恐，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当甘绩熙等问他何以逃离武昌，请他不要轻听人言，随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绩熙：“你青年人屡次说激烈话，实属不成事体。大家举我为都督，就要服从，勿得任意说不道德之言。”黎元洪一步步地脱离革命，倒向袁世凯那边。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钦此。”袁世凯奉旨后，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并以在京每省1人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山西渠本翘、陕西于邦华、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孙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张国淦、湖南郑沅、四川傅增湘、福建严复、广东冯耿光等。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道：“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有些代表以为袁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喜形于色，殊为瞿瞿。

唐绍仪等便乘车南下，准备在汉口同南方代表开议。

南方11省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公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留学于英国，后回香港担任律师，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96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赴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和古巴公使。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由于汉口陷入北洋军之手，伍廷芳致电黎元洪，告诉他们不能到汉口谈判，请转告唐绍仪等来上海开议。唐绍仪等从汉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们同行。

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3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革命党人极大的愤慨。

双方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伍廷芳便提出：“今日来开议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决，双方定约于19日起，一律停战，而日来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知清军已入境攻战。似此违约，何能议和？故今所当先解者，

须请贵代表电致袁内阁，飭令各处一律停战。得确实承诺回电后，始可开议。”唐绍仪立刻推托说是革命军先行开仗。

伍廷芳道：“谁先开仗，虽费调查，惟有一办法：凡停战期间违约进占之地点，应飭清军先行退还，如娘子关、潼关等处，是最著者，此外地点，应悉退出，应符初意。”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各方实行停战。

南北会谈，逐渐被袁世凯操纵。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面嘱他到上海后，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张謇早已被袁世凯拉拢。唐绍仪第一次晤张謇，先代表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露出口风：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张謇回道：“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袁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

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 8 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绍仪听后，道：“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唐绍仪在上海同北京的邮传部次长梁士诒密电联系，梁士诒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秘书长。

唐绍仪收到北京来的密电，有时只让两三个北方的代表看看。北方的代表人数很多，但他们都成了局外人。唐绍仪看过电报，并不去同伍廷芳商量，而是去找赵凤昌和张謇。

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张謇和赵凤昌。

赵凤昌与张謇交情笃厚。张謇曾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

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南方其他几个都督，同赵凤昌都有交情。张謇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等对张謇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于张，而张謇往往趋而谋于赵凤昌。

因赵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就常常到上海南阳路私邸惜阴堂赵凤昌家里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的过程中，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精卫、陈其美等，每星期总要有 1、2 天在赵家聚会。赵成了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唐绍仪几乎天天同赵凤昌通话。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

这与袁世凯、唐绍仪自然相当合拍。

但是，南方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相当激烈的态度，他们以为和议万不可恃，非接续准备进行战斗不可。这些党人激于义愤，认为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那上海革命党人追悼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谏词，声泪俱下。士女演说，无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

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以慰诸先烈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有广东北伐队 3000 人抵沪，主张激烈，认为那袁世凯一面议和，一面进攻秦、晋；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诈，决无诚心。各报纸宣传尤烈：吾宁亡国亡种，绝对不认君主政体，有背此主义者，吾党当以颈血溅之。

对于革命党人的反抗，袁世凯早已预料，他除了拉拢并利用汪精卫之外，又通过各种渠道与黄兴沟通。袁世凯派北京红十字会会长夏浚贻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来到上海，通过南京选锋队联队长朱葆诚的介绍，找到同黄兴关系比较密切的苏军总参谋长顾忠琛和元帅府秘书官俞仲还等人，经过深谈后，顾忠琛表示：“二君之希望和平，关系大体，深可钦佩，安得项城亦同此心理。总之，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项城而以保皇为重也，必出于战，项城而以保国为重也，须归于和。和战之机，实惟项城操之。现在反正者十余省，联军北伐者数十万，决无屈服君主问题之理，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愿以相属。”夏浚贻直截了当说道：“项城只可居于被动地位，其主动须由北军将士合力行之。”

所幸北军中，近来赞成共和，颇不乏人。顾不能无所疑虑者，正恐南军所举总统为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将来即难免于冲突，是以观望不前，苟公推项城，吾知天与人归，北军定当乐于从事，特迟延非计，应速请廖君宇春北旋，密为运动，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则大事谐矣。”顾忠琛等说：“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阶，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国无穷之福也。”廖宇春不放心，便提出：“吾辈私相计议，恐不足以取信于人，倘得黄元帅与程都督之同意，颁一纸证书，以为凭信，并订立草约，携之以归，则进言较易，而实行可期。”两日后，顾忠琛与廖宇春等再次会面。顾忠琛道：“黄元帅与程都督均极赞成廖君之手续，可以保全中国，并可以消释两军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帅且云：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顾忠琛即将黄兴给廖宇春的委任状交付。双方议定的条约是：确定共和政体，袁若能先推翻清廷，便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优待清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彼此在条约上签名画押，互换，欣然而别。

黄兴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袁世凯抗衡，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又存有相当大的恐惧，便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使袁对清室无所顾惜，从而实现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标。否则，他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河山奉还汉族，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

由于黄兴有这些美好的愿望和设想，他在武汉督师时，就曾写信给袁世凯，表示只要袁世凯能使清室退位，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袁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拱手听命。他的这种幼稚的想法，必然给革命带来悲剧。

这幕后的活动，已把南北议和的基调定了下来。第二次议和会议，唐绍仪道：“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伍廷芳曰：“甚善。”唐

绍仪接着说：“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伍廷芳一再追问：袁氏宗旨如何？对于民主共和之宗旨如何？唐绍仪先以“和平解决”四字回之，后在伍氏追问下，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唐绍仪与袁世凯利用空中信道，商定向清廷施加压力。唐在电致袁世凯，请代奏清廷的奏议中说：“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隆裕太后果颁发懿旨：“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着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速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袁世凯的计谋，着着得手。

第二次议和会议之后，又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商定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具体办法，以及国民会议地点等具体问题。

不料，袁世凯突然电告唐绍仪：“会议各名称，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唐绍仪只得电请辞职。

袁世凯随即电告伍廷芳，称唐绍仪一再来电请辞代表之任，已请旨准其辞任，今后应商事件，由伍直接同我往返电商。

袁世凯这样做，是因为他得知孙中山从欧洲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前往迎接，孙中山偕胡汉民由港至沪。又有在南京的 17 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他只是暂时担任组织政府之责，望袁早定大计。但素性多疑的袁世凯并不放心，生怕孙中山早先一步担任临时大总统，万一后来不愿拱手相让，他岂非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使用非常手段，推倒唐绍仪秉承他的意旨同南方所达成的协议，为自己下一步行动留下可进可退的余地，使形势继续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 第二十四章 临时大总统

南京光复的消息传至上海，那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等，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约独立各省代表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并发表通电话说：

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

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进行无滞，事机紧急，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

黄兴已于南京光复的前一天由武昌到达上海。

各省代表议决大元帅主持临时政府职权。陈其美、程德全并于江苏教育总会发起欢迎黄大元帅大会。程德全在欢迎大会上致词：“昨日自大元帅举定后，即邀同陈君其美亲往黄大元帅行辕道欢迎意，恭请莅会，大元帅谦辞不肯承认，以德全等再三劝驾，仅允到会重行选举。”陈其美的致词则是另一层含义：“昨日之选举，万不可无效，况大元帅责任重大，关系全国，方今北虏未灭，军事旁午，非有卧薪尝胆之坚忍力者，不足肩任巨任，故其美以为舍克强先生外，无足当此者。”黄兴则主张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再由各都督中选一副元帅，自己愿领兵北伐。至于组织临时政府，托词不能胜任。

各代表坚请之后，黄兴称：“孙中山先生将回国，可当此任。”代表们说：“方今军务倥偬，时间异常宝贵，孙君诚为数十年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因众代表坚请黄兴不必推让，黄兴才答应暂时勉强担任。他负责筹组临时政府之后，即电请胡汉民北上，商组临时政府事宜。因黄兴收到汪精卫为袁世凯说项的电报，便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

来电敬悉。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省，所未下者才二三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项城雄才英略，素色全国重望，能顾及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但现在事机迫切，中外皆注意民军举动，不早成立临时政府，恐难维持现状，策画进行。现已有各省代表拟举兴为大统领，组织临时政府，兴正力辞尚未允许。万一辞不获已，兴只得从各省代表之请，暂充临时大元帅，专任北伐，以待项城举事后，即行辞职，便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均有此意。惟项城举易速，易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万一迁延不决，恐全国人皆有恨项城之心，彼时民国临时政府如已经巩固，便非他人所能动摇。总之，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

项城若肯从民之请英断独行，中华民国大统领，兴知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此时盼速成功，民国幸甚。以弟尝与兄谈心之‘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一语为证。朔风冰肌，伏维珍重。

黄兴刚着手筹组临时政府，便遭到黎元洪的反对。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忽据来电称沪上有14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那些被黎元洪邀去武昌的各省代表，亦不满，认为此举事先瞒着他们，不令闻之，是荒谬行为，表示不予承认。

在上海的浙江代表章太炎也反对举黄兴为大元帅。他在会上发言说：“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除章太炎外，浙江司令朱瑞亦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说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尽管同盟会陈其美、宋教仁等力主黄兴为大元帅，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但黄兴崭露头角，其声望尚未居于统率全党的

地位，尚未成为核心人物，还不能指望，由他来制御那些附和于革命党的旧官吏和地方缙绅。那立宪派人，也想猎取临时政府的权力，因而各持己见、互不协调的现象，屡见不鲜。

1911年12月13日，独立各省代表先后由上海、武汉齐集南京，开会选举议长，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回国的浙江代表、34岁的汤尔和被选为议长；先后在日本、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的同盟会会员、30岁的王宠惠被选为副议长。并议决在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但是，情况有了变化。15日，胡瑛、王正廷来电：“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代表会议便承认上海选出的大元帅与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但是，黄兴因受到黎元洪和少数人的反对，坚不就职，并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暂定大元帅，建议推黎元洪为暂定大元帅。

黄兴看起来很谦虚，把政权拱手让给旧官吏黎元洪，他根本不知道，政权问题对革命党人是多么得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相让，否则，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叫花子才是最谦逊的。”代表会议接到黄兴的来电后，在当天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坚不就职，而代表会议的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分别因病和议和而前往上海。代表会议另举景耀月为代理议长，并备公函，请黄兴速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黎元洪终于争得了全国政权的中心位置，黄正、黎副的局面颠倒过来，便通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职权。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去沪欢迎黄兴，赴南京组织政府。

黄兴这时已获悉孙中山归国即将抵沪的消息，就延缓赴南京，等待迎接孙中山的归来。

孙中山正在美国募捐，他在丹佛城的一家报摊上，无意中买一份刊有革命党人占领武昌消息的报纸。但他没有立即起程回国，而是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担心中国革命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象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

孙中山首先争取美国政府对革命的支持。10月中旬，他参加了芝加哥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之后，在同盟会会员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华盛顿，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秘密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物质援助，或者是坚持中立。诺克斯没有接见他。于是，他到纽约，秘密会见了日本驻纽约总领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后得到回答说，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实际上拒绝了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要求。孙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就改变原定经欧洲、印度洋返国的计划，而经日本回国，这样既可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这些话没有反应。

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孙中山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纽约致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说：“黎元洪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

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两天后，孙中山由纽约抵达伦敦。他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

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

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和支持。英国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中山同英国政府联系。孙中山便托达耳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于取道回国。

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

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德·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然而他却得出结论说：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柯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

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

孙中山从马赛乘船经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于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们在香港就国内形势、应采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方面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

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去上海、南京。若孙去了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而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

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的意见，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广州其谓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未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 260 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汉民宜从我既行。”孙中山对成立中央政府满怀信心。他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当今政策，莫大于此。”胡汉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请廖仲恺返回广东布置一切，然后随孙中山同船赴沪。

孙中山回到离别 16 年的上海，受到黄兴、陈其美、黄宗仰、汪精卫等和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有些报纸宣传孙中山携带回大批款项，并买回三艘军舰，其驾驶皆为留英学生，因此，孙中山甫经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孙中山回道：“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中山到上海的消息传出后，已独立的各省纷纷来电表示欢迎。江西省军政府及全省军、绅、商、学各界的公电说：“大节抵申，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除已派代表在沪欢迎外，特此电贺。”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派遣马君武、景耀月、王竹怀、王有兰等 6 人为代表，专程赴沪欢迎孙中山。

但是，这时的同盟会内部已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相当尖锐。章太炎提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他又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瓦解同盟会队伍。反革命势力亦竭力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同盟会将以天下为己私者，诬蔑革命党人为“暴徒”，“无赖”。还有人冒充同盟会敲诈者，有假收会员领钱者。犬影吠声，同盟会几不利于人口，洁身自好之会员，则避之若浼。

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袁世凯的操纵下，那些立宪派分子张謇、赵凤昌等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幕后活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已被袁世凯收买，随唐绍仪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间公开为袁世凯制造舆论。

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在立宪派人的拉拢、影响下，也早就力主和议。

孙中山认为，必须对同盟会进行整顿。他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指出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已



被敌人利用，出现了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鼓簧，汉奸满奴则又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在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的严重局面。指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论调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闾茸之言，无一粟之值。强调革命党人的责任，决不限于推翻清朝政府，必须完全贯彻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指出：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利之数，未能逆料，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灵敏机关，剔弃败类，以成坚固不破之举，然后广益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

孙中山又同黄兴、陈其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密商组织统一的中央革命政府，在讨论政府的组织形式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宋教仁坚持主张实行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之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张静江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决定采用总统制，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但宋教仁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黄兴则从中调和道：“待到南京后，与各省代表商酌后再行决定。”宋教仁才不再坚持。

随后，黄、宋等人前往南京。

12月27日晚，各省代表举行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新政府实行总统制。会议同时决定：改用阳历，启用中华民国纪元。

各省代表会议指派代表赴沪，欢迎孙中山，代表们就拟选他为临时政府大元帅一事，征求他的意见。孙中山当即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代表们回道：“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决议此职暂时留以有待。”孙中山道：“那不要紧，只要袁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孙中山反对大总统之前冠以“临时”二字，是因为他在归国前向西方各国商谈借款时，他们都表示，中国正式成立共和政府时，才可考虑。

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在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临时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到会者43人，以每省一票为原则，共17票。

17省的代表是：湖北：居正、杨时杰、王正廷、马伯援、胡瑛。

江苏：陈陶怡。

浙江：汤尔和、陈时夏、屈映光、黄群、陈毅。

湖南：谭人凤、宋教仁、邹代藩、廖名缙。

四川：肖湘、周代本。

安徽：许冠尧、王竹怀、赵斌。

云南：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

山西：景耀月、李素、刘懋赏。

陕西：于右任。

江西：林森、王有兰、赵士北、俞应麓、汤漪福。

福建：藩祖彝、林长民。

广东：王宠惠、邓宪甫。

广西：马君武、章勤士。

奉天：吴景廉。

直隶：谷钟秀。

河南：李槃。

山东：谢鸣焘。

前一天预选，有候选资格者 3 人，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选举结果是：孙中山得 16 票、黄兴得 1 票。因此，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各省代表特派汤尔和、王宠惠、陈陶怡 3 人去上海欢迎孙中山来南京就职。孙中山立即准备去宁就职，他对陈其美说：“我辈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陈其美预备了专车，并且亲自护从。同行的有各省代表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 1 万多人到车站送行。

10 小时后，即 1912 年 1 月 1 日下午 6 时 15 分，孙中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总督衙门车站。各省代表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孙中山，礼炮齐鸣，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部队排列在南京下关车站至总督衙门车站，全程为 6 英里的道路两旁。城内万人空巷，欢声雷动。

孙中山等下车后，由黄兴、陈其美和海军代表护送，入临时大总统府。大总统府便是太平天国天王府。

当晚，孙中山在大总统府举行庄严而朴素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徐绍桢担任司仪员。

典礼开始，鸣礼炮 21 响。代表会公推景耀月致颂词。孙中山宣读《临时大总统誓言》：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民国。

就职典礼后，孙中山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称：“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临时政府谋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辛亥 11 月 13 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立即组织临时政府。成立政府需要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以每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 3 人组成。在参议院未成立之前，暂由各省都督代表代行职权，选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1 月 3 日，临时参议院举行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以全票当选。

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会议上提出国务员 9 人名单，即：

陆军总长 黄 兴；

外交总长 王宠惠；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教育总长 章太炎；

交通总长 程德全；

海军总长 黄钟英；

司法总长 伍廷芳；

内务总长 宋教仁；

实业总长 张 謇

临时参议院在审查这个名单时，一部分人反对宋教仁、王宠惠、章太炎，也有人提出改伍廷芳为外交总长。

黄兴根据讨论情况，向孙中山建议：“以宋教仁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宋教仁掌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掌内务，蔡元培掌教育，伍廷芳与王宠惠对调。”孙中山道：“内政、教育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伍廷芳长者，诸多不便，故用王宠惠，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黄兴便再次同临时参议院代表会商，并通过投票选举，其结果是：

总统府秘书长	胡汉民	参谋总长	黄兴（兼）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英	次长	汤芑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 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 第二十五章 联军北伐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一面建立法制，一面准备北伐，一面与袁世凯进行议和。

临时政府在一月份便制定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规定了临时政府的构成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

临时政府由立法机关参议院和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员组成。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对参议院负责，是临时政府的首脑。中央行政共设9个部，各部设总长1人，次长1人；次长由大总统简任，次长以下各员由各部总长按事之繁简酌定人数；各部局以下各员，均由各部总长分别荐任、委任。各部由临时大总统统辖，对临时大总统负责。

孙中山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致电各省都督府：“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立须组织参议院。参议院由各省都督派遣参议员3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参议员3人，付与正式委任状，克日来宁。参议员未至之前，每省暂留代表1—3人，驻宁代理其职权。”1月28日，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抵宁，于是便正式开会成立参议院。各省所派参议员共42人：广东：赵士北、钱树芳、邱逢甲湖北：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湖南：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浙江：王正廷、陈毓川、殷汝骊江苏：陈陶怡、杨廷栋、凌文渊安徽：常恒芳、凌 毅、范光启江西：汤 漪、王有兰、文 群山西：李 素、景耀月、刘懋赏福建：潘祖彝、林 森、陈承泽广西：曾 彦、邓家彦、朱

文邵贵州：平 刚、文崇高云南：段宇清、张耀曾、席聘臣陕西：张蔚森、赵世钰、马步云四川：张懋隆、吴玉章、周代本（后改为熊斐然、李肇甫、黄树中）奉天：吴景濂直隶：谷钟秀河南：李盘 42 名议员中，同盟会会员占了 30 余人，即 3/4 以上。议员会议选举林森为议长，陈陶怡为副议长。

参议院正式成立，孙中山率各行政官员莅会，并致祝词：人有恒言：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夫破坏云者，仁人志士，任侠勇夫，若心焦虑于隐奥之中，而丧元断脰于危难之际，此其艰难困苦之状，诚有人所不及知者。

及一旦事机成熟，倏然而发，若洪波之决危堤，一泻千里，虽欲御之而不可得，然后知其事似难而易也。

若夫建设之事则不然。建一议，赞助者居其前，则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见为利，则明日见为弊矣，又况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

呜呼！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矧为北虜未灭，战云方急，立法事业，在在与戎机相待为用。破坏、建设之两难，毕萃于兹。诸君勉哉！各尽乃智，竭乃力，以固民国之始基，以扬我族之大烈，则不徒文一人之颂祷，其四万万万人实嘉赖之。

孙中山提出设立法制局，由宋教仁任局长，负责法制的编订工作。孙中山在《大总统咨参议院法制局职制》中说：“窃维临时政府成立，所有一切法律命令，在在须行编订，法制局之设，刻不容缓。应将法制局职制提出贵院议决，以便施行。”孙中山特意召集同盟会议员，对宋教仁草拟的临时约法进行讨论。孙中山在讨论时指出，应将五权宪法纳入约法，道：“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于巩固。而中华民国主权，则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共和国宪法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制，赋予国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其主要内容有：（一）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二）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三）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四）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五）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六）人民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被选举的民主权利；（七）政权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独立、牵制、分而治之；（八）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九）人民享有参政权，国家实行民主管理。

所有临时政府一切重要的法制，均由法制局编订，呈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议决后，咨复临时大总统，经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发交各行政部门执行。一般的政策法规，则由临时大总统或各部发布执行。临时政府为宣布法令，发布中央及地方政事，设置公报局，以但焘为局长，负责编印《临时政府公报》。

孙中山对于亡清虐政，尤其用刑具逼供审讯，深恶痛绝，中夜以思，怒火中烧。他指出刑罚之目的在维持国权，保护公安，而非快私人报复己私，无非以示惩戒，使为后来相戒。他命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飭所属禁止刑讯，不许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并要求仍不时派员巡视，如有不肖官吏，日久故智复萌，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褫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

得之罪。

孙中山严禁对犯人施行体罚。他指出，近世各国刑罚，对于罪人或夺其自由，或绝其生命，从未有滥加刑威，虐及身体，如体罚之甚者。盖民事案件，有赔损害、回复原状之条；刑事案件，有罚金、拘留、禁锢、大辟之律，称情以施，方得其平。他命令司法行政各官署，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其他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

为了保护民权，孙中山下令内务部。严禁贩卖人口和拐卖人口到国外充当苦工。他在一个命令中指出：本总统对奸徒拐贩，痛心疾首，殷念不忘，禁止拐卖人口，尤为刻不容缓。

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命令，禁止鸦片的种植、吸食和买卖，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剪除辫子，禁唱淫戏等，废除贱民身份，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宣传不得歧视广东和福建的水上居民、浙江的“惰民”和河南的“丐户”，并给予和普通人民一样的平等待遇，使之享有国民的权力；革除清朝官厅中“大人”、“老爷”的称呼；发展文化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学，废止读经；还颁布了一些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奖励兴办实业；通令各省救济灾民。

临时政府成立后，消除了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人身不平等现象，体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革除封建社会的各种弊习陋俗。以振奋人们的精神。社会热心人士也纷纷组织团体，积极配合，努力宣传民众，转移社会风尚。于是，一股改革不适应于民主共和制度旧的社会习俗的潮流，蔚然兴起。时人对这种革新的社会潮流称颂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在外交方面，临时政府一方面希望中国能与外国平等友好相处，能够自立于世界；另一方面又宣传承认以往各国与清朝政府所订的一切条约和清朝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并表示“照旧尊重”外国通过清政府取得的一切权益，企图以这种妥协，来换取帝国主义各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

但是，孙中山仍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对外宣言》，态度鲜明地表示：在革命军兴起以后，清政府对外缔结之条约、所借之外债、出让之权利，民国一律否认。

孙中山下令整饬军队，他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严加约束士兵的命令说：“江宁光复以来，秩序紊乱，至今尚未就理。顷闻城乡内，盗贼充斥、宵小横行，夜则拦路夺物，昼则街头卖赃，或有不肖兵士，藉稽查为名，私入人家，擅行劫掠，以至行者为之戒途。

此皆兵士约束不严、警察诘奸不力所致。”孙中山命令陆军部迅切颁行军令，责成各军司令官以下将校切实奉行。他下令设立南京卫戍总督、直隶于临时大总统，并任命徐绍桢为卫戍司令。

徐绍桢会同在南京各军司令官，有浙军第1师长朱瑞、铁血军总司令范光启、沪军先锋队司令官洪承点、光复军司令李燮和、南京宪兵司令茅酉封、粤军司令姚雨平、江宁警察总监吴忠信，及卫戍总督府下所辖各分区司

令官等 20 余人，开会议决维持治安办法，发布告示，颁行军律若干款。

陆军部又颁行维持地方治安临时军律 12 条，规定任意掳掠、强奸妇女、擅杀良民、擅封民屋财产、硬搬良民箱笼及银钱者枪毙；勒索强买、私斗伤人者抵罪；私入民宅、行窃、赌博、纵酒行凶者罚。

临时政府在整肃军队纪律的同时，加强军政建设。临时大总统简任黄兴兼大本营兵站总监和参谋总长，钮永建为大本营兵站次监和参谋次长，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谭人凤为北伐招讨使。云集在南京的军队，不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苏军、粤军、赣军、海军陆战队，而且还有革命党人组织的各种名目的敢死队、义勇队，以及范光启的铁血军、林宗云的女子国民军等，人数不下 30 万。这些军队被整编为 21 个师。

孙中山决定北伐，他在任临时大总统的第 4 天，电令广东都督陈炯明出兵北伐。他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明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1 月 6 日，北伐联军总部从上海移往南京。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同时制定了 6 路北伐的计划，并通告黎元洪执行。6 路北伐军是：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北进，粤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推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 5 军，山陕为第 6 军，向北京进击。一、二、三、四军即达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

作战计划制定后，已经集结在南京周围的粤军姚雨平部和皖军柏文蔚部，立即沿津浦路向北推进，到皖北的固镇同清军张勋、倪嗣冲部发生遭遇战。

姚雨平、柏文蔚部 8000 名将士乘火车从南京直达蚌埠，在蚌埠用过晚饭，全体将士威然肃立在车站月台上，姚雨平登上临时用十几张方桌搭起的讲台上，用一只白铁皮喇叭筒对部队训话：“各位弟兄！当今，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民心趋向共和。可是，虏廷未灭，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对抗民国，仇视共和，罪大恶极，国人当不与共戴天！我们革命军奉孙大总统之命举师北伐，全线进军。我们北伐第二军今天开赴前线，进击南犯的张勋江防军。

古人云：‘师克在和不在众’。辫子兵的武器装备虽比我军好，人数比我军多，可是，就在两个月之前，他们曾是我们革命军手下败将，只要我们 8000 将士协力同心，就一定能直捣黄龙，踏平专制巢穴，把中华民国五色旗插到紫禁城头上去！”姚雨平训话之后，部队立即登上火车，向固镇方向驶去。

固镇本来控制在民军手里。两天前，张勋在徐州率 2000 辫子兵乘火车突然袭击固镇车站，守卫车站的民军仅百余人，扼险抵抗，后因张勋部从两翼包围上来，民军后援未至，战到薄暮，只得退到距固镇 30 里的新桥。夜半，固镇落入张勋辫子兵手里。

袁世凯在张勋攻占固镇后，即电令直鲁、东三省各派军队前往支援。北洋军第 5 镇已派出步队 4 营、炮队 1 营、马队 2 队、由东巡防营 1000 名清兵先后开到徐州和宿县，准备进攻南京。民军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是从辫子兵手里夺回固镇，拔除北洋军威胁南京的前沿据点。

张勋在攻下固镇后，又派了 7 个营的辫子兵到固镇下营，有一半是马队，准备第二天向蚌埠进攻。辫子兵巡逻队见到远处一列火车呼啸而来，又

突然在不远处熄了灯，停了下来，便认定是民军的北上部队。巡逻队哨官认为火车上来的，十之八九是小股民军。

目的是为了摸摸虚实。他想：何不把他们一口吃掉，好去向张大帅报功领赏。于是，辫子哨官一声令下，百十来个辫子兵便拉开了散兵线，手持新步枪，趁黑缓缓向列车摸去。

辫子兵巡逻队距离北伐军只有十几丈远时，北伐军的步枪、机枪突然一齐开火。走在前头的辫子兵十几人被击毙，走在后边的，见势不妙，慌忙掉头就跑。

北伐军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从地上跃起，向车站追去。正在车站里酣睡的3营步队，忽闻外面枪声大作，惊惶失措，指挥官也在搞不清民军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便瞎喊一通。

辫子兵骑上马，也就颠懂懂地冲了出来，胡乱地放一阵枪。

张勋的马队未曾打过夜战，黑灯瞎火中，遭到民军夜袭，吓得心惊胆跳。忽然，“轰”地一声，一发炮弹落在马群中爆炸，死伤了几匹马。战马受惊，纷纷拚命挣脱缰绳，在漆黑的旷野里狂奔乱跑。有的掉进了浍河中，被冰冷的河水冻得乱叫。

经过1个多小时的夜战，惊慌失措的辫子兵被打得一败涂地。一群群不成队形的辫子兵，没命地往北方逃跑，途中拦住一列自北往南开的货车，劫持机车司机倒回宿州方向去。

北伐军紧追不舍，炮轰火车头，终于将车头击毁。车上的辫子兵仓皇弃车奔逃，动作慢的或者被俘，或者被击毙。

拂晓，北伐军在固镇集合。辫子兵的枪枝弹药丢遍满地，在车站前还留下了一尊巨大的子母炮，辫子兵的尸体横七竖八。那些被打散的800余匹战马，也被北伐军士兵追了回来。

激战了半夜而大获全胜的北伐军战士，志气高涨，没有半点疲乏之意。司令员姚雨平站在一个台阶上，兴奋地向士兵们发表演说：“弟兄们，气可鼓，不可泄！敌人的残部正往宿州逃窜，那里是他们的第二大本营，兵贵神迅，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在宿县站稳脚跟。现在，我们务必一鼓作气，马上登车，趁胜追击！”战士们再次登上列车，火车汽笛长鸣，徐徐向北开去。从8000余名战士中抽出会骑马的800余人，利用缴获的800余匹战马，编成北伐骑兵队，尾随列车之后，向宿县奔驰而去。

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张勋，清早起来便同皖军头子倪嗣冲在宿州城内司令部楼上下棋。张勋嗜赌如命，倪嗣冲奕棋上瘾，两人正好一拍即合。他们自督军江淮以来，每天早晨，总要在这一楼上摆棋盘，拚杀数局。棋盘边搁着金戒指或玛瑙杯，便是赌注。张勋身边还坐着一个天姿国色的姨太太。

姨太太是苏州人，张勋把她买来，给她取名叫小毛子。她刚18岁，不但容貌绝世，棋琴诗书无一不晓。那57岁的张勋，门下妻妾成群，对小毛子有独爱之情，他让小毛子相随身边，寸步不离。张勋被革命联军赶出南京城，仓皇渡江逃跑时，没有顾上心爱的小毛子。小毛子在下关被江浙联军宪兵队捕获，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把她安置在南京门帘桥前清候补道陈善家里。陈其美得知后，建议将小毛子押解到上海，陈列张园，供人参观，门票四角，收入充当军饷，估计可得军资十万元。徐绍桢不同意，派津浦铁路局局长陶逊，专程将小毛子护送到徐州，交还给张勋。

张勋正因失掉小毛子而心情烦躁，几位不知趣的姨太太想趁机跟张勋

讨宠，不料张勋张开五指，左右开弓，打得姨太太们四处躲藏，再不敢去纠缠他了，参谋长向他汇报辫子兵在南京打仗时伤亡情况，他牛眼一瞪，拍着桌子大骂道：“丢了几营兵算得上几根鸟毛！老子把小毛子都丢掉了。”张勋烦闷不堪，副官进来报告：“大帅，民军把太太送回来了！”张勋跳了起来，一把抓住副官的衣襟，瞪着他问道：“在哪里？”副官吞吞吐吐地回道：“在徐州火车站，是由铁路局陶局长送来的，太太坐在轿子里。”张勋喜出望外，放开副官，喝令道：“快传我的令，速派仪仗列队出城欢迎！”从张勋公馆到徐州火车站的大路两旁，排列辫子兵仪仗队，张勋带着卫队，满面春风地到车站迎接小毛子。他见过陶逊后，便跑到花轿前，掀起苏绣轿帘，果见小毛子怀抱琵琶，端坐在轿内。小毛子抬头见到张勋，娇滴滴地喊了声：“大帅！”张勋重新得到小毛子，十分感谢陶逊，便把从南京劫持来的机车 14 辆、客车 80 辆悉数归还铁路局。陶逊即把机车、客车开回南京，姚雨平的北伐军所乘列车，便是张勋归还的。

张勋与倪嗣冲对弈，把那金戒指、玛瑙杯输了不下几十只。这小毛子不服气，便向张勋请缨，要把张勋输掉的金戒指、玛瑙杯全部赢回。

这天早晨，倪嗣冲来到张勋公馆楼上，见张勋身边的小毛子，有倾城倾国之色，心里便有些酸溜溜的，暗想：这老家伙还真有此艳福。他坐了下来，小毛子忙将棋子摆好，张勋便同倪嗣冲拚杀起来。小毛子只是静静地坐在张勋身边，暗中观察倪嗣冲的棋路却不言语。

不一会功夫，张勋却是输了一盘，把那镶有一粒蓝宝石的沉甸甸的戒指，从自己面前推给倪嗣冲，倪嗣冲“嘿嘿，嘿嘿”笑着，狡黠的小眼瞟着小毛子，抓过金戒指，套在无名指上。小手子忙伸开玉手，把棋子重新摆好，站起来向倪嗣冲躬了躬身子，娇声嗔气地道：“请倪大帅赐教！”倪嗣冲见小毛子与他对弈，从小眼里射出邪光，浑身不觉发痒，真想把小毛子一把搂在自己的怀里。但他却装得一本正经地说：“太太，这使不得，使不得！”张勋手端一个盖碗，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蛋奶，瞪着牛眼，瞅着倪嗣冲道：“你这野小子怎么啦，怯战了不成？”倪嗣冲道：“我和您老哥对弈，每盘皆是下赌注的，现在夫人上阵……”张勋拍着胸脯道：“哈哈，我当你野小子说什么来着，我老张一生好赌，事无大小皆好下它一注。赌什么，你只管说吧！”倪嗣冲摇摇头道：“只怕大哥舍不得。”只这一句话，惹得张勋骤发脾气，“嗖”地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剑，“嚓”地一声插在桌子上，恶狠狠地道：“赌什么你只管说，要赌身上的肉吗？”倪嗣冲也是个狡诈好色之徒，见张勋的性子已被激起，便“嘿嘿，嘿嘿”笑了两声，又用眼睛盯着小毛子，用挑战的口吻道：“把太太拿来下一注，你敢吧？”张勋一听，便愣住了。他挥金如土，甚至用刀子割下身上的肉，也在所不惜，但他不能失去小毛子，在张勋为难之时，小毛子便嘻嘻地笑了起来，她用那双秋波粼粼的眼睛瞟了张勋一眼，娇声道：“大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先恭喜您将又有一位新的太太了。”她用两只大眼瞟倪嗣冲，嘻嘻地笑道：“倪大帅的夫人，不也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娘子吗？”倪嗣冲见小毛子这般神态，恨不得立马把她赢过来。两人你来我往地厮杀起来。张勋把心都提到嗓子上来。眼睛死死盯着棋盘。

双方酣战得难解难分之际，忽听楼梯一阵乱响，张勋心里一惊，便知不好，没有大事，谁也不敢上楼打扰。他的贴身护兵阿三跑上楼来，跪在张勋面前：“禀老爷，先头部队昨夜在固镇遇上孙文的北伐军，敌众我寡，抵挡不住，已退回宿州，3 营骑兵和战马几乎全部损失。”张勋忽地从抽屉中



抽出一支手枪、恼怒地朝玻璃“乒乒”开了两枪：“蠢驴，还不快给我下令封锁城南，那些该死的民匪一定会追上来的！”小毛子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拉着张勋的胳膊：“大帅，怎么办呀？”张勋虽然心里惊慌，却装着镇静样子道：“不要怕，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指挥部队，把民匪打退后再回来！”倪嗣冲心里暗想：他娘的，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在我快把小毛子弄到手里时来。他眼巴巴地望着小毛子，又不得不跟着张勋下了楼。

宿州城内一片骚动，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各城门都有重兵把守。

城垣四周野炮林立，城墙上伏兵如蚁。张勋、倪嗣冲手提马刀，腰插短枪，匆匆登上城门，准备督战，举起望远镜一看，见那北伐军拖着山炮，端着机枪，骑着战马，分头而进，潮水般地涌了过来。

张勋暴跳如雷：“开炮！开炮！”“轰轰轰”几发炮弹都落在北伐军身后。张勋的炮队配的都是野炮，打远，不打近。

北伐军已勇猛地冲了过来，机枪朝城楼上猛射，大炮向城里猛轰，宿州城一时间硝烟弥漫，古城欲毁。

北伐军的敢死队手持雪亮战刀，在机枪掩护下，呐喊着向城垣冲过来。

张勋在混乱中喊道：“嗣冲老弟，胜败乃兵家常事，快退吧！”张勋左顾右盼，却不见倪嗣冲的踪影。他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两个卫兵的护持下，踉踉跄跄地从城楼上退了下来。一个卫兵给他牵来了一匹马，张勋跨上马鞍，气急败坏地对卫兵命令道：“快去通知各标各营，马上向符离集撤退。然后上火车，回到徐州老营。到徐州后。我要训话。”张勋慌忙打马回府。他翻身跳马，便迫不急待地朝楼上奔去。刚踏上楼梯，便听到楼上有女人哭泣声，还混杂着男人急切的喝斥声：“快跟我走！”张勋立即拔枪在手，冲上楼去，看见倪嗣冲搂住小毛子正欲下楼。

原来倪嗣冲趁张勋在城楼上督战，便悄悄地溜了回来，跑到楼上，佯称张勋受重伤，嘱他前来保护小毛子到徐州去。小毛子吓得没有主见，被倪嗣冲搂着。正欲下楼，没想到张勋赶了回来。张勋气得大喝一声：“你这狗杂种，竟敢搞到老子头上，看我毙了你！”倪嗣冲见张勋正要向他开枪，忙把小手子往前面推，张勋怕误伤小毛子，将手枪收回，倪嗣冲趁机飞步下楼去。

张勋把小毛子往怀里一抱，亲了一口，才拖住她向楼下跑去。张勋的十几房太太，各自从房里跑出来，趑趄趑趄地奔到张勋身边，扯着张勋的衣袖，哀叫：“老爷救命！”

老爷救命！”张勋圆睁牛眼，挣脱太太们的纠缠，紧紧搂抱着小毛子，翻身上马，扬鞭摧马，冲出宿州城北门，抄小道直奔符离集而去。这些晦气的太太们，嚎哭着，夹在乱兵之中奔逃。

张勋、倪嗣冲所部被姚雨平、柏文蔚部穷追猛打，节节溃败，一直逃到济南。

## 第二十六章 政党群起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立即命令北洋军炮轰武昌。黎元洪立即配合，他电致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吹嘘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这次未能当选大总统，识者惜之，还说：“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与选？”他特告伍廷芳转致唐绍仪：北军应遵守停战协议，立即休战、否则冠裳之会，变为干戈。黎元洪的这份电报，一则为袁世凯鸣不平，给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施加压力，再则暗示袁世凯、只要停止炮轰武昌，将来大总统之位，非袁莫属。向袁暗送秋波，略尽投靠之诚，可谓用心良苦。

黎元洪从清朝的一个中级军官，一夜之间，成了中华民国首义军政府都督，又两月有余，一跃而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他被时人称为“开国元勋”、“开国三杰”（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民国四大伟人”（即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这只是历史的机遇。对于被人强拉出来的那幕历史喜剧，他自己并不否认，他在1月2日复孙中山的电文中说：“元洪才识凡庸，素无定见，此次发难，皆赖群策群力，共赴事机，元洪何人，敢叨天之功以为己有？”黎在表示接受副总统职位的电文中又说：“诸君子创其苦因，而元洪收其乐果，纵诸君子谬蒙推奖，能恧然？”他还当众说过：“按照大清法律，革命行动可招杀头灭族之祸，岂可以掉以轻心，随便加入，我当时是被他们强拖出来的，实在情不得已。想不到，果然就成了一番大事业！”但是，黎元洪是一位争权的人，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宣布取消副大元帅职，但黎元洪仍然继续使用大元帅名义。他还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加紧集权。他利用亲信孙发绪、饶汉祥、杜锡钧等人，密密勾结原共进会领导人、军务部长孙武，拥黎自重，摧残湖北革命力量，打击、排挤原文学社系统革命党人和在湖北的同盟会领导人；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公开拥袁、拥黎，排孙、排黄，反对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孙武等人，因没有选上临时政府各部总长，便迁怒于孙中山、黄兴，攻击临时政府是“败将逃官，沆瀣一气”。

孙发绪乘机蛊惑在宁不得志之鄂人，谓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多材，应另树一帜，以与之相抗。于是孙武、孙发绪、刘成禺等人，拉拢一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一个新政党，一民社，与同盟会公开对立。

列名发起成立民社的人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黻、王正廷、王鸿猷、李登辉、孙武、朱瑞、张振武、吴敬恒、杨曾蔚、刘成禺、项骧、宁调元、孙发绪、周恢、张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刚、徐伟、高彤墀、郭健霄、何震等。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旅泰开成立大会，临时推举孙发绪为主席，决定在上海设立民社本部，选举职员，公推吴敬恒为总干事，何震为秘书。主事者为孙武，最活跃的是孙发绪，黎元洪为后盾。

民社成立后，在报端发表《民社缘起》、《民社规约》，标榜爱本卢梭人民社会之迺，发起民社，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以谋国利民福。实际上是拥护黎元洪为首领，向同盟会争权。他们在上海创办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又在武汉成立民社武汉支部，公举黎元洪为社长，孙武为副社长，孙发绪为评议长，丁立中为总干事。民社的中心实际上已由上海移到武汉。

黎元洪，孙发绪等，以民社为据点，掀起反对临时政府的阵阵恶浪。孙发绪在一次会上说：“孙文说话，完全是骗人的。从欧美回来，想做现成的总统。此次组织政府，所用的人，都是他从前打滥仗的朋友。我们万不可同他联合，免得陪着他一路垮台。”他蛊惑说：“黎氏德高望重，虽华盛顿复生无以过之。鄂中将士，皆起义有功，而南京政府均漠置之，且以湖北全省

矿产及赋税抵借外债，并谓武昌内政不良，将练一军平武昌。”这些无中生有、挑拨离间的谣言，正中孙武的下怀，孙武当即恨恨连声地道：“南京如此败坏，吾宁承认袁世凯，而不承认南京。”他们还要公开发表通电，表示反对南京政府。当即遭到同盟会员杨时杰、查光佛等人的痛斥，双方几致动武。黎元洪抱定主义，另立门户，垄断湖北一切政权，联袁拒孙。

武昌民社集团成了袁世凯在湖北的代言人。

黎元洪稳固掌握了湖北的政权后，又掌握军权。他利用孙武与蒋翊武之间的矛盾，免去蒋翊武的护理总司令职务，又将节制各军的谭人凤派为赴上海的议和代表，令心腹吴兆麟为总司令。吴兆麟立即改组司令部，设立参谋、副官、秘书、军法四处，其中只有1个副官是革命党人，又将原步、炮、马各队11个协的兵力编为3个大防御区，另编2大队和1个总预备队。每防区和每个队均设司令官1人，6名司令官中，革命党人只有2人，其他均为旧军官，而且统率先锋军的总预备队总司令官也安插了黎元洪的心腹执事官王安澜。原由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基本上已掌握在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手里。

黎元洪的心腹杜锡钧向黎献策道：“自古道‘当权者贵’，权是不可放松的。袁世凯为什么‘抖雄’，还不是仗着兵权在握吗？现在和议未定，正可借备战的名义，把军队扩充起来。尽管当选了副总统，大元帅的名义千万不可取消。各省来鄂的援军，编遣和节制权，都在大元帅手内。不过高级官吏，多物色几个亲信人。有了兵权，谁个敢不服从呢？”此话正中黎元洪下怀，黎元洪已有了掌握军权的计划。

杜锡钧又给孙武出谋划策：“一旦和议告成，鄂省需进行之事甚多。黎元洪既当副总统、都督一席，势必易人。谁人呢？非你孙武不可。做都督又非掌兵权不可，而现在兵权均在战时总司令吴兆麟手里，不如趁北伐时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把吴调开，请黎元洪下令将军队归军务部节制。”孙武颇为以为然。他和黎元洪各自装着杜锡钧所献计策，一起商讨扩军计划。把吴兆麟划分的3个防区改为3镇，令吴统率第3镇，外加混成第8协、机关枪1营、督战敢死队1营、护军队2队、卫生队1队，作为北伐第一军，吴为第一军总司令。此外，湖南、江西、安徽、广西、江苏、南京、贵州、广东、云南等省赴鄂援军近10万人编为第二、第三军，以江西援鄂军统领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统率安徽、江西、九江、南京各地援军，及鄂军第3协；以广西援军赵恒锡为第三军总司令，均归大元帅黎元洪统辖。其余鄂军部队编为守备部队和留守部队，各拥有3个协兵力，留守部队中还包括炮兵2标、工程兵1营，亦归黎元洪统辖。

杜锡钧野心勃勃，包藏祸心，在决定吴兆麟任第一军总司令后，又在孙武面前挑唆道：“吴任此职，指大功告竣，吴之功劳权势亦愈加大，是后患也，仍宜设法牵制。”孙武、杜锡钧便商定，请黎元洪改派吴为尚未建成之第4镇统制，暂指挥第一军所属军队。黎元洪不能驳孙武的面子，认为吴兆麟是自己人，好说话，如不行，再令他作参谋总长。于是当即照孙武的意思赶办委札，连夜派人送给吴兆麟。吴接到委札颇为恼火，立即打电话给黎，表示不满。黎元洪只得任命吴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孙武接让第一军总司令。

孙武争权、黎元洪朝令夕改，引起革命党人及军政府人员不满，总监刘公对吴兆麟道：“黎之左右佞任，非驱逐不可！”杜锡钧闻风逃往汉口，并派心腹之人潜往武昌，面晤孙武道：“先生若就第1军军统，则军务部势必

易人，就小遗大，甚为先生不取也。不如此时辞去军统之职，再由先生保荐一心腹之人，先生间接遥制之。此两全之策也。”孙武正为遭到众人反对而懊悔。听了这番话便向黎元洪建议暂命杜锡钧代理第一军总司令。黎元洪从恶如流，惯听小人播弄，且杜亦是他的心腹之人，买孙武的面子。于是，杜的目的便达到了。可谓手段狡猾矣。

黎元洪以大元帅名义发下了准备北伐进军的命令，命第一军由阳逻向黄陂方面前进；第二军由黄陂进占祁家湾，然后沿铁道线向三议埠行进；第三军占领新沟、汉川，嗣后即由孝感进攻。三军均需停战期满，即1月15日晨8时完成如上军事行动，一旦和议破裂，即向盘踞在杨店和孝感之敌发起正式进攻。但黎元洪雷声大，雨点小，他的主要希望是寄托在同袁世凯的和谈上，北伐仅成为他扩张军队的口实。

同盟会在袁世凯的诱惑下，在立宪派人的离间下，上层已经分裂。原同盟会会员、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太炎同立宪派人张謇、程德全、赵凤昌、应德闳等发起，于1912年1月3日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宣布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公推章太炎、程德全为正副社长。各省设立分会，经各省会员互选，其参议员为：

江苏：唐文治、张謇；  
浙江：蔡元培、应德闳；  
湖南：熊希龄、张通典；  
湖北：黄侃；  
安徽：江德渊、程承泽；  
四川：黄云鹏、贺孝齐；  
江西：刘树堂、邹凌沅；  
广西：陈郁瑞；  
云南：陈荣昌；  
广东：邓实；  
甘肃：牛载坤；  
贵州：符诗镛、王朴诸。

设机关报为《大共和日报》。中华民国联合会主要是由立宪派人和少数象程德全这样的旧官僚、把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当作旗帜而搞起来的。它的“假定政纲”计有10条：1、确定共和政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和平，保全国家权利；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计民生，采用稳健社会政策。

这些政纲是无所非议的。

但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实际活动，主要斗争矛头是对着临时政府的。诸如反对使用阳历，多队向临时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成立民选参议院。他们在临时政府准备将汉冶萍公司同日本合办、以向日本借款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等问题上，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使临时政府处在更加困难的境地。

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2个月之后，即改名为统一党。改组后的统一党领导机构是理事会议，选举章太炎、程德全、宋教仁、熊希龄、张謇五人为理事。理事主持一切党务。

各省推举评议员，有唐文治等 17 人为评议员。又将一批在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举为参事，以襄助理事办理党务，他们是：汤寿潜、蒋尊簋、庄蕴宽、唐绍仪、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穆青、汤化龙、温宗尧、叶景葵等。

统一党成立后，全力支持袁世凯，在许多方面抨击临时政府。

到了 1912 年 5 月，统一党与民社等社团合组为共和党。

除了共和党与临时政府、中国同盟会对立的组织之外，又有“国民协进会”、“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组织与同盟会对峙。又有“统一共和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建立起来。

国民协进会是由范源濂、籍忠寅、蹇念益、周大烈、王景芳、严修、黄远庸、蓝公武等人于 1912 年 2 月，在天津发起成立，是由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的成员组成。

政治倾向于黎元洪主义，主张推黎为党魁。

国民协会是由张嘉璈、温宗尧、唐文治、夏廷楨、沈祚延、赵熙、唐绍仪、杨士琦、袁树勋等人担任领导。它是袁世凯的政治附庸。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原宪友会的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胡瑞霖、张嘉森等人于 1912 年 1 月在上海发起 4 月 13 日成立。谢远涵、林长民、肖湘等人为文书干事，陆乃翔等人为会计干事，李文熙等人为庶务干事，胡瑞霖、黄可权、向瑞琨、刘崇佑、张嘉森等 40 余人为交际干事，汤化龙为主任干事，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本部。

共和建设讨论会以原立宪派人和旧官僚为主，其骨干多为原各省谘议局的议长、副议长、议员。该会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积极为梁启超归国创造条件；其二，策划合并反同盟会的各政团为一大党，和同盟会对峙。最后与国民协会一起，联合了几个小政团，组成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的民主党。

统一共和党是由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联合而成。

共和统一会是由同盟会员景耀月、胡瑛、王宠惠、陈其美、钮永建、汪精卫、马君武、于右任等和江浙立宪派人士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赵凤昌等，在 1911 年 12 月下旬发起成立，并在南京创办《大中华报》。

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是由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于 1912 年 1 月发起成立。

政治谈话会为同盟会员刘彦组织，其成员多为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

1912 年 4 月，这 3 个政治团体在南京合并组成统一共和党。选举蔡锷、张凤祐、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坤为总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怡、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吴景濂、沈钧儒、肖坤等 20 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日垓等 25 人为特派交际员。

统一共和党在云南、贵州、江西等十余省设立支部。党员人员达数百人。蔡锷为云南支部长，张凤翔为陕西支部长，唐继尧、李烈钧、戴戡等都分别积极从事建立贵州、江西支部的工作。

该党主要领导成员几乎全部是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人。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它在同盟会和其反对党之间，采取折中态度。

中国社会党的前身是江亢虎于 1911 年 7 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有 50 余人参加。

江亢虎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1901 年，18 岁赴日本考察政治，不久回国，被袁世凯任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次年留学日本，1904 年因病辍学回国，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1910 年经日本至欧洲各国，宣扬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并以此抵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在国外听得一点社会主义的门面话，归国后便鼓吹“社会主义”，组织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尽管江亢虎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去宣扬，但对落后中国来说，仍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上海光复的第二天，江亢虎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他在《中国社会党宣言》中说：“社会主义欧美极盛，在中国则本党实为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它的党纲为：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

中国社会党成立 2 个多月，便有党员 4、5 千人，设 30 余个支部。虽然中国社会党党员成分复杂，但其中确有一批热心于社会改革的进步人士，如苏州支部总务干事陈翼龙，以及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后来又有天津的李大钊。

中华民国工党是由中国社会党党员徐企文发起，于 1912 年 1 月 21 日在上海成立。公推朱志尧为正总领袖，徐企文、谢月为副总领袖。

该党的基层组织是按行业组建，分别在铁业、机器业、纱业、电业、外国木器业、眼镜业、红木业、丝业、银行业、雕花业、漆业、帽业、织业、寿器业、刻字业、印字业、红帮缝衣业、制烟业等建立基层组织，惟选各业领袖。

中华民国工党以“促进工业发达”为主旨，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工人同资本家通力合作，调和阶级矛盾。1912 年 6 月 23 日，中国社会党和中华民国工党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党“切实联合，一致进行”。

孙中山指挥 6 路大军北伐，1912 年 1 月 12 日，他命关外都督蓝天蔚率“海容”、“海琛”、“南琛”3 艘巡洋舰，从上海出发，经烟台北伐。

北伐舰队开抵烟台，受到已宣布光复的烟台人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又命刘基炎率领 2000 余名沪军为北伐先锋队，从上海分乘新铭、新昌、公平、太顺等四艘轮船，去烟台，先后占领了登州等地。沪军由蓝天蔚节制，从此北伐军以烟台为进军东北之基地，即从烟台乘船渡渤海，在辽东半岛登陆，进军东北三省。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早年以湖北武备学生资送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1903 年，25 岁，与钮永建、秦毓鎏等在东京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被推为队长，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回国后在湖北新军任统带官兼湖北将弁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不久赴日本考察军事，考入陆军大学。1910 年归国，任陆军第 2 混成协统领，驻奉天。武昌起义后，与陆军第 6 镇统制吴禄贞、第 20 镇统制张绍曾等，拟发动北方新军响应。不料吴被刺身死，张被解职，他赴沪任北伐军总司令，再赴烟台。

但是，蓝天蔚准备在辽东半岛进军东北的计划，却受日本帝国主义阻挠。日本“音羽”舰将校到“海容”号访问蓝天蔚，拒绝蓝天蔚军在辽东半

岛登陆，声称“不但中立地带绝对拒绝利用，即在其他满洲沿岸地域登陆，亦将使满洲之安宁秩序发生紊乱，并将进而危及各国居民之安全，以至于损害我国利益。为避免将来发生骚乱，应请贵军放弃登陆计划。”蓝天蔚不得不改为绕道在貔子窝附近经花园口至大孤山中立地区以外一带地点登陆。

孙中山组织的6路北伐大军，若能继续北伐，不出3个月，便可兵临北京城下。同盟会要人谭人凤在谈到北伐形势时说：“时南军援鄂者，有沈秉坤率统之湘、桂联军，马毓宝移驻九江之赣军，南京派遣黎天才之滇军，唐牺支、王政雅光复荆、襄，重庆、四川亦光复，鄂固无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滇、粤军驻临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扬州徐分府合皖军屯宿迁，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阳、六合等处，亦有军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中于南京城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以及固有之军队与新编之各军，合计不下10余万众。而广东，闽、浙尚议继续出军，兵力不可谓不厚，加之长安、太原早已光复，烟台有刘基炎独立，河南有王天纵举兵，直隶有滦州兵变之一事，东省自牛庄发难后，关外都督蓝天蔚尚谋大举。使南京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3路夹攻徐州，分1支捣开封与鄂军合，1支由京浦入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瓮中鳖矣，岂能操必胜之算哉！”袁世凯所依仗北洋6镇，至多10万人，临时政府的军队多出袁军好几倍。而且在兵源上，独立各省人民踊跃参军。相反，袁世凯到自己的老家招兵时，应募者认为是革命军，踊跃入伍，但一见龙旗，便群哄而散。清政府不得人心，它的兵源十分困难。总之，临时政府在军事上已处于优势，袁世凯则处于被动的守势。

临时政府在政治上也处在有利地位，南方各地军民，纷纷发布通电，要求取消议和，出师北伐。有的说：“今民国已立，总统有人，诸公早定大计，直捣贼巢。”“北伐北伐，纵以吾辈之血，染成民国地图，亦所不惜。”有的说：“和约且破，已堕袁贼诡计。

刻下敝军已联合五镇，预备开赴前敌，如何进行方略，速复，以免一误再误。”有的说：“北军势单力薄，调遣难周。我军朝气方新，万不可堕其延宕之术。敝军政分府现今整队北伐，一面廓清淮甸，以固我长江门户，然后与各民军合力北伐。务请我最崇拜、最亲爱诸公，持以决心，奋扬神武，毋使九仞之功止于一簣，是为至禱。”全国反对议和，要求北伐的呼声极高。

但是，6路北伐军队，除宁皖和淮杨两路沿津浦线北上，烟台、关外两路有所行动外，其他两路并无动作。由于南北议和，命令各路北伐军在停战期内不许进击，而停战协定一再延长期限。

停战议和，一则是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确定的方针，二则是新成立的诸多党派拥黎拥袁。孙中山事实上已不可能改变南方各省“举袁”的方针，同袁世凯中止议和。这样，临时政府所举行的北伐，终于夭折。

袁世凯在声势浩大的北伐军面前，已是惊恐之状。他手下的北洋“三杰”，也变得无所作为。

所谓“三杰”是袁世凯在山东的时候，曾请德国军官观操，那个德国人当着袁的面，用马鞭指着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称道：“你手下这三员均为杰出的将才。”于是，这三员便被吹嘘为“北洋三杰”了。后来军中进一步把这“三杰”吹得更形象化了。分别称之为“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冠的王士珍，城府很深，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见首不见

尾，知面不知心的人物，所以称之为“龙”；段祺瑞性情暴躁，好比恶虎。但这只“恶虎”长相却没有半点虎威，他脸膛扁平，眉毛疏淡，鼻子微微歪向左边，胡子散乱，嘴唇没有棱角。因此人们常常不叫他“段虎”，因他是合肥人，则叫他“段合肥”。冯国璋爱在主子面前点关哈腰，象一只摇尾的家犬。

冯国璋和段祺瑞虽是一对结拜金兰的把兄弟，可一直是面和心不和。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委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冯国璋丧妻后，袁世凯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嫁给他做填房。段祺瑞断弦后，袁世凯又将自己的干女儿张佩蘅许给他做继配夫人。由于各有这么一层不寻常的关系，冯、段二人常在袁世凯面前争宠，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常常明争暗斗，各不相容，互不服气。

段祺瑞的父亲在旧军中当过管带，段祺瑞因此自命为“将门之子”。他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曾到德国深造过。当时德国是世界上陆军最强的国家，而那时留德学生又很少，段祺瑞更是以此引为自豪，常在人前摆出一副门里金刚的架势。他非常崇拜德国，无论什么东西都必称德国的好。甚至他生了病也非要服德国药不可。在他的眼里，冯国璋简直是个无名鼠辈，根本无法和他相比。

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早年中过秀才，后来弃文习武，考入天津北洋武备步兵班。

毕业后，派往军队中当个小军官，不久又离开军队，重操本行，做起候补知县来。他到小站后，立即受到袁世凯重用，成为新建陆军的重要台柱子之一。

袁世凯对他手下这一“虎”一“犬”，采取暗中笼络，互相牵制，分而治之的驾驭办法，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表示他“用人唯公不唯亲”，便常用考试办法来提升军官。

当北洋新军成立第1协时，王士珍考个第1名，当了协统；成立第2协时，冯国璋考试也夺了桂冠，也当上了协统。那位留过洋的“将门之子”段祺瑞，却一连两次名落孙山，脸上无光，肚子里有气。成立第3协时，他满腹心事，坐立不安，深怕这次考试再落榜，那留洋镀金的面子将要丢尽，别说升官当协统没份，恐怕连在北洋军里继续呆下去的本钱也将蚀光。不料在考试前一天，他正惶惶不安时，袁世凯突然差人来把他叫到书房去，二话没说，悄悄地将试题递到他的手里。这次考试，他终于名列前茅。事后，他每与密友谈起此事，总是表示对袁世凯“受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士珍、冯国璋之所以早他登榜，也全赖袁世凯所施的“恩惠”，只不过段祺瑞一直被蒙在鼓里罢了。

冯国璋第一军攻下汉口和汉阳之际，袁世凯突然把段祺瑞从前线召回京，一见面，劈头就问：“芝泉，你看这仗该怎么打？”段祺瑞对主子袁世凯心思摸得很清楚，袁世凯不是真心为清廷打天下，那已被清廷封为一等男爵的冯国璋挂帅出征武汉，虽然连克2城，但伤亡严重。他又居功自恃，急于攻下武昌，即使他能打下武昌，他所指挥的北洋第一军也将拚得所剩无几。袁世凯不召冯国璋，却把他段祺瑞召回京来，必然是袁想利用历代权臣惯用的保存实力、养寇自重的手腕，来保存北洋实力。于是，段祺瑞便引用兵书上的两句话回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袁世凯仰头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



指夸道：“知我者，芝泉也！”袁世凯见冯国璋率北洋军与民军拚命，损兵折将，耗尽实力。冯在攻掠汉口、汉阳时，放火焚烧城市，两城已成瓦砾，湖北民众和民军深恨其人，如仍留这只“冯狗”在武汉督师，不利于实施和平诱降计划，于是便定下以“虎”换“犬”的办法。段祺瑞的回答，正中他的下怀，当下命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统率北洋第一、第二两军，取代冯国璋。

段祺瑞到了湖北，秉承袁世凯旨意，与民军隔江对峙，并派信使往返，秘密进行倒孙举袁活动，深得袁世凯赏识。

袁世凯把冯国璋召回，命他担任禁卫军军统。因为这个职务一直是由皇室最亲信的满族王公担任。冯国璋知道袁世凯这样安排，是为了夺取皇族兵权，作为下一步逼宫后盾，便愉快地回道：“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宫保看守家门！”冯国璋自从当了禁卫军军统之后，即伪装成与袁世凯政见不同，公开反对与民军讲和，力主组织军队进攻南方，大张挞伐，博得了良弼等一班亲贵的信任，使他得以摸清皇室的情况。

袁世凯又把段祺瑞和冯国璋叫到他的密室，商议北洋军今后的出路，这3个人都认为“逼宫”的时机已经成熟，由袁世凯取而代之的时候已经到来。

## 第二十七章 袁氏逼宫

袁世凯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2天，便唆使“段虎”、“冯狗”等联络北洋军官40多人，电请内阁代表，主张君主立宪，极力反对共和，又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声称如果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

袁世凯的这个阴谋，一则是以借清廷之信用，假补充军费之名，榨取清室内帑，作特别使用。他在代段、冯等代奏时，说民军要求太酷，依段、冯主张，即行讨伐，惟苦于军费无着，不能实行，愿辞总理之职。隆裕太后温谕慰留，并发内帑黄金八万锭。

临时政府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破坏议和、进行军事威胁而同袁决裂，孙中山针对袁世凯的疑虑，复电声明：“只要袁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定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辞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许诺，还是不放心，他致电伍廷芳质问：“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以总统让袁，有何把握？”袁世凯再次得到明确的答复。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仍令他与伍廷芳进行秘密交涉，并大体上达成清帝在优待的条件下自行退位，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协议。

但是，袁世凯却处于颇为困难的地位。他原来坚持国体问题应由国民会议决定，他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发出反对共和、主张讨伐南方的通电，现在要清帝自行退位，实在难以开口。他为了从这种困境解脱出来，便大造舆论，压迫清帝自行退位。北京各报纸纷纷发表敦促清帝退位的文章和社论。

袁世凯又通过他的亲信蔡廷干，动员外国在上海的商会，向清廷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认为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便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

袁世凯做了上述动作之后，便秘密地把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奕劻，说这是对清室和满人最为安全有利的办法。清室的王公亲贵就议和形势开秘密会议。会上，奕劻将袁世凯密示他的退位条件提了出来，除少数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大多数人意气消沉，会议无结果而散。

载沣见袁世凯，询问关于退位的问题，袁以不得要领的话敷衍他。袁世凯的话被传出后，亲贵中的一些人：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毓朗、良弼、铁良等，对袁世凯极为不满，酝酿组织“宗社党”来对付袁世凯。

袁世凯便把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找来，装着忧心忡忡的样子道：“菊人兄，孙逸仙不可小觑，他们的目的、不论是议和还是北伐，也不管是来文的还是动武的，不外乎是要我尽快向那孤儿寡妇下手。可眼下，一是宗社党那伙铁杆派在死顶着，二是隆裕太后本人至今还是六神无主，迟迟拿不定主意。而孙文又挥师北伐，那张勋、倪嗣冲的部队一触即溃，照此下去，这局势无须多时，……。”徐世昌慢慢地说道：“老弟，目下之形势，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可不能老是躲在家里哀声叹气。你若迟迟不下手，我敢断言，过了这村，就没你要的那个店了！依我之见，你明日上朝，即可借孙文北伐声威，狠狠地压一压隆裕太后，这可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只要这寡妇对退位一事略有松口，你便可马上与南方通消息，请他们开个价。这样，既可以速退南方之兵，又可避逼宫之嫌。”次日，袁世凯果然入朝谒见隆裕太后，依照徐世昌的计策装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跪在隆裕太后面前，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密奏太后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 6 镇，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如若迟疑不决，难免不遭外国干涉，民军亦必因此对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陈子遗也。请太后圣断。”隆裕闻奏，也早就吓昏了，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回答道：“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决定。”袁世凯在卫队的保护下出朝回府在东华门的马路拐角处三义茶馆门前，受到革命党人炸弹的袭击。那些刺客，也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员。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为了清除实现共和的大障碍，他们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对付这个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参加暗杀的人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肖声和女同盟会员郑毓秀等 10 余人。他们共分为 3 队，每人携带手枪 1 支，炸弹 1 枚。一队装作茶客到三义茶馆喝茶，一队装作酒客到祥宜坊酒店饮酒，最后一队则在东安市场附近准备接应。他们都未经过严格训练，而只是凭一腔热血胆气，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袁世凯的座车，只是炸死卫队巡警数人，袁世凯却得逃脱。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 3 人当场被捕遇害。当天，除郑毓秀外，其他 7 人全部被捕，后经外国新闻记者保释出狱。

这一暗杀活动对袁世凯不但未造成丝毫伤害反而给了他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从这天起，他称病不朝，只是派他的心腹外交大臣胡惟德做他的代理人。并让赵秉钧等人在朝廷里外散布“革命党人已经遍布北京城，咱们的生命都没保障”的谣言，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朝廷上下，人心惶惶。那些胆小怕死的王公贵族，有的干脆卷起金银细软逃往青岛、热河避难去了。

袁世凯在遇刺的第 2 天，即 1912 年 1 月 17 日，派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参加御前会议。

恭亲王溥伟问赵、梁：“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道：“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溥伟道：“朝廷以慰廷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道：“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这次会议，无结果而散。

18日，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有些激烈反对清室退位的满族亲贵未被通知出席。奕劻在会上将袁世凯告诉他的请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提出，遭到蒙古王公的激烈反对，仍无结果而散。

那些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人士，见形势日迫，集30余人，齐赴庆王府，包围奕劻，态度激烈，奕劻被迫，不得不改变他主张退位的态度。

19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满蒙王公亲贵14人会议。会上，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那王那彦图、载泽等4人，强烈反对退位，当面攻击“奕劻欺罔”，要求太后嗣后不要再信他言。并请求太后拿出宫中金银器皿，暂充军费，支持冯国璋再战。总管禁卫军的冯国璋，暗中虽听袁指挥，表面上也和诸亲贵采取同一的态度，表示拥护清帝。他在18日对载泽说：“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3月，能奏功。”隆裕太后已听不进溥伟、善耆等人的话。

溥伟道：“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又道：“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隆裕道：“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满蒙王公退席后，袁世凯的国务大臣晋见隆裕，赵秉钧正式提出由内阁商定的解决时局的方案，即将清政府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由袁世凯设立一个临时统一政府。

袁世凯又致电伍廷芳，要求在清帝退位后2日，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袁世凯自以为得计，但他的野心却被孙中山看穿。孙中山连电伍廷芳，要他向袁世凯提出3个条件：（1）清廷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

（2）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

（3）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举袁为大总统。

孙中山电致伍廷芳，要求将所提各条交各报馆公开发表。

孙文在电报中称：

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时举袁。嗣就后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清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政府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若袁能实行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则文当仍践前言也。

今确定办法如下：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国民政府，言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

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权授事。按 1、2 两条即为袁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请告袁。

孙中山将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公布后，袁就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他若不接受这最后解决的办法，又没有别的对付办法；若接受这些条件，宗社党尚在同他作对，并且还没有取得清帝退位的同意。他以后用清廷退位去换取自己的总统地位，还是半公开的秘密交易，孙中山把 5 项条件公布后，他过去进行的秘密交易，完全被公开了，再没有暗中回旋的余地。因此，他只好继续称病不入朝。

临时政府逼袁回电，他起初不理；再逼，他答称关于皇帝退位之事，从未与贵代表交涉；再电责问，他干脆置若罔闻。

孙中山公开揭露袁世凯，在各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袁世凯的恶势力便公开替袁讲话，英国《太晤士报》在社论《中国的新困难》中，攻击孙中山所提的条件是“有失审慎”，说南京政党及其领袖的行为，似乎是无法辩解的。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攻击孙中山背弃了他的许诺，提出了不可实施的新建议。那袁世凯的代理人唐绍仪说孙中山正在把事情弄糟，他致电孙中山说，再提什么条件，简直是发疯。伍廷芳、温宗尧急于同袁世凯达成协议，对孙中山公布的清帝退位条件更为恼火，温宗尧说：“如果我有一只手枪，我就亲手杀死孙中山。”临时政府电报局局长是唐绍仪的亲戚唐元昌，他所控制的《国民评论》，在一篇社论中竟说：“看来袁世凯在最近几个星期所做的工作，由于孙逸仙博士发出了一纸最后通牒，在很大程度上是白费气力了。这一通牒正当就要宣布退位的时刻送达北京，人们只能把它视为一件非常拙劣的恫吓，再无其他看法。”那些满蒙王公亲贵，尤其是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在孙中山公布清帝退位、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后，更加紧了反袁活动。他们准备袁世凯一辞职，便照准，由毓朗、载泽等出面组阁，以铁良任清军司令，作最后的斗争。

铁良已回到北京，他和良弼等人策划反袁，在北京城组织 1.7 万名满族士兵。北京恐怖行动正在蔓延，很多人设法购买武器，价格只有 45 法郎的勃朗宁左轮手枪，竟卖到 100 两银子 1 支。

袁世凯十分惊慌，他的便衣队卫士已达 350 人之多，每人配带着勃朗宁左轮手枪。他虽然采取了一切防卫措施，还是担心能否逃开暗杀。没有办法，他又将徐世昌找来，问计于他。

徐世昌道：“对付宗社党那几个死硬的家伙，依我之见，除之为上。”袁世凯点头，他也想过杀掉宗社党以良弼为首的亲贵，但是，他考虑到，一则良弼任禁卫军第 1 协统兼禁卫军训练大臣，仍有操纵禁卫军的实权，要除掉他，不是那么容易。

再则杀掉皇族，尤其是像良弼这样的皇族，很可能会惊动整个清室，这不但使他永远洗不清“曹操”之恶名，也不利于他稳妥地从清室手里接过权力。

徐世昌见袁世凯沉默不语，便不露声色地道：“老弟，你不便下手，可用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一计。”袁世凯禁不住敞怀大笑起来。

他要儿子袁克定把刚刚来到北京的汪精卫叫来。汪精卫自从随唐绍仪到上海议和，至临时政府成立后，他的职务，是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充当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但是，他在暗中，却又是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的秘密参赞。他平常下榻于伍廷芳在上海的住宅“观渡庐”，但又常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议和动态。尤为甚者，他竟攻击孙中山道：“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汪精卫还和一部分人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即：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以此用来促使孙中山放弃政权。

南北议和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后，汪精卫见呆在上海无事可做，便独自一人跑到北方。由于他暗中投靠袁世凯，倒孙举袁；又以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身份，阻挠、破坏北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同盟会京津分会内，没有人理睬他。

袁世凯以干爷的口气对汪精卫道：“从前我曾听说过，孙文先生是个高风亮节之人，为国为民奔走十几年，如今初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是众望所归。但是，如果为了当总统，就以兵戎相见，同室操戈，大举北进，那也未免有损于孙文先生的声誉。”汪精卫道：“我们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清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不惜使用任何革命手段！”“好！百川归大海嘛，我们的目标乃是一致的，就是要尽快结束满清专制。不过，为国为民着想，还是不动干戈为上策。”“清廷这些年来，已把国家糟蹋成千疮百孔，国贫民穷，若再进行一场内战，怕只有招致亡国了。”袁世凯故作姿态地叹了口气道：“清帝退位的事，目下已成僵局，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皇族亲贵，在死撑着，其台柱人物就是良弼了，他有禁卫军做实力后盾。据说他们还要另组皇族内阁，以取代我这责任内阁，随后良弼便要亲率大军征伐南方。照此下去，内战不休，兵连祸结，国将不国。”汪精卫见袁世凯一副悲天忧国的样子，沉思了一会，问道：“干爷，对于时局，您难道左右不了吗？”袁世凯摇摇头道：“你要议和，可南方不买帐，清廷又不接受。开战吗？我又不忍生灵涂炭，国家破碎。目下之清廷，虽可比作一座古老残破的大房子，不过，要推倒它，即使千百人一起使劲，也还不一定能达到目的，话又说回来，若抽掉其中一根顶梁柱，它便会自己倾倒下来。”汪精卫明白了袁世凯要他刺杀良弼的意图，他自己再也不敢搞暗杀活动，但他马上想起在天津的同盟会京津分会的同志正在准备暗杀良弼等人，便答道：“除掉良弼，我当尽力而为。”袁世凯喜出望外：“好！那就看你的了。”他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汪精卫：“先拿两万元花去，日后缺钱，跟你兄弟克定说一声就行了。”同盟会京津分会军事部部长彭家珍和黄复生等，因党人在滦州起义，被袁世凯派王怀庆带兵镇压，捕杀了大批革命党人，他们义愤填膺，秘密决议暗杀袁世凯、良弼、荫昌、载泽等清臣。彭家珍等在上海研制成一百余枚小炸弹，运回天津。汪精卫闻知此暗杀名单中袁世凯当首，便多方劝阻，不仅无人听从，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只好溜走。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1903年，15岁，入成都武备学堂炮科，毕业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常与革命党交游，立志革命。归国后充四川新军哨长，后升为队官。1909年5月调往云南，任新军随营学堂教练员兼教习，不久调赴东北，任奉天学兵营讲师、代理管带，后改任奉天讲武堂讲师，又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武昌首义后，与吴禄贞、张绍曾等谋联络北方各镇响应，并扣留清廷购自欧洲的大批军火。旋策动王金铭等在滦州起义。京津

同盟会成立，他即入盟，被选为军事部长。

彭家珍下了死心要除良弼，他认为良弼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此人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不堪设想。1月16日，革命党人投弹袭击袁世凯未中，党人被捕，彭家珍闻讯，悲不自胜，心焦欲焚，决心以刺杀良弼为己任。他独自潜入北京，从一位四川同乡家中找来良弼的像片，仔细观察，识别良弼的容貌特征，但因良弼出入均有卫兵护卫，几次想直接行刺，均无机会。

他想起他在奉天讲武堂时，听说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良弼交往甚密，正好他还保存了几张崇恭的名片，便决定冒充崇恭闯入良弼私宅，进行刺杀。

彭家珍探知清廷将于腊月初八（1月26日）假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于是他决定在腊月初八宴行刺。

1月25日那天，彭家珍在中西旅馆写了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他将银票百元和衣物用具交给仆人伍焕章带回天津。

1月26日傍晚，彭家珍更换服装，手提小包内藏2枚炸弹，乘马车进入前门，先到军咨府，没见到良弼，便转往红罗厂良弼私宅。

彭家珍叫马车夫将马车调转头在大门前等候，他便直进大门门房前，彬彬有礼地道：“请问，此处可是良弼总领的官邸吗？”门房盯着这位陌生人，见他身着军官制服，威武英俊，便恭敬地答道：“总领赴摄王府，尚未回府。请问老爷尊姓大名？”“敝人姓崇名恭，奉天讲武堂监督。今日专程来谒见挚友。”彭家珍说话间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崇恭的精制名片。

“啊，失迎，失迎！请进里屋坐！”“不必客气。我和良弼总领乃是多年好友，只是这几年忙于公务，久疏贵府。现在既然总领未归，我不妨先到附近办件小事，呆会再来。”彭家珍却是十分精明，他想良弼是十分熟悉崇恭的，自己乃是假崇恭，如果在府内等候，待良弼进门，先行禀报，难免事未遂而败露，使托故而出。

他整了整佩在腰间的军刀，蹬上马车，又朝着来的方向不紧不慢地驰去。走出数十丈远的一个丁字路口，转了个弯，便在一株老槐树下停下。他掀开车帘，点上一支烟，眼睛注视着马路上出现的车辆和行人。

一支烟还未抽完，便见一辆四轮马车奔驰而来，在路口拐往红罗厂良弼私宅方向。

彭家珍虽然没有看见车上的人，但凭那威风样子，便料定这是良弼回府了。

他吩咐车夫：“跟上！”前边那辆四轮马车在良弼私宅大门前停下，一个青年禁卫军将领从马车上跳下，便大步向大门走去。

彭家珍的马车紧跟着也在门口停下，他跳下马车，借风灯的昏光见那青年将领：四方脸，大鼻子，厚嘴唇，两撇细八字胡，便确信他就是良弼。

彭家珍机警地提着那只装着两枚烈性炸弹的小包，急步走到门边，亲切地叫道：“良弼兄！”良弼参加宗室密议南北战事，除了几个宗社党发言附合他的主战意见外，其他人皆默默不语，他窝了一肚子气，一路坐马车回来。烦恼地闭着眼睛，不愿看周围的一切，彭家珍尾随其后，他也没有介意。他刚踏上大门石阶，忽听身后有人亲切地叫他，他便站住了。

“不认得我了？”彭家珍从衣兜里取出那张崇恭的名片，恭敬地递了过去。

当良弼接过名片，在昏暗的灯光下注目觑看时，彭家珍便迅即从小包内取出炸弹，引动爆炸装置，掷在良弼脚下，可是，这是枚哑炸弹。良弼见掷下炸弹，吓了一跳，但他是个有胆略的军人，当即一转，跳上门前的台阶，“唰”地拔出腰间短剑，准备拚搏。

彭家珍扔出第 1 枚炸弹后，迅即掏出第 2 枚，向良弼扔了过去。

“轰”地一声巨响，那刚拔出利剑的良弼，左腿被炸飞出 1 丈多远，石阶飞裂。

机警的彭家珍掷出第 2 枚炸弹转身欲走，不料一片锋利的弹片被阶石反弹过来，直插他的脑颅，他眼前一黑，竟直直地倒下。良弼的 8 名卫兵、1 名马弁，也同时倒在血泊之中。

彭家珍牺牲时只有 24 岁。

## 第二十八章 清帝退位

良弼被炸死，清皇族心惊胆颤。铁良一听到他兄弟被暗杀致死的消息，便逃离北京。

其他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分子，也纷纷逃出北京，前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租界，托庇于帝国主义列强。这宗社党策划的反袁活动，也就烟消云散。

袁世凯趁机唆使亲信纷纷发出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先后发通电要求袁内阁代奏的有：河南巡抚齐耀琳，山西巡抚张锡銮，署直隶总督张镇芳，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署两湖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

段祺瑞的两封电报却是厉害。段率北洋将领 46 人联名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 2、3 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到了这个时候，清室满族亲贵没有人上朝了。袁世凯便授意外交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人，不时入朝恐吓隆裕太后，隆裕太后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哭求袁世凯：“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隆裕授权袁世凯，与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袁世凯立即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电文文驰，往迫磋切。2 月 6 日，由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优待皇室 8 条：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 400 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 400 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皇帝未完成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礼。那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仍然称病不入朝，他委派外交大臣胡惟德率领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10名国务大臣，头戴翎顶，身穿袍套，进入乾清宫门内东南角上的廊子里落座候旨。他们默默无语地坐着，喝盖碗茶，但却表情不一：胡惟德、赵秉钧、王士珍眉飞色舞，一副欣喜若狂神态；梁士诒眯着一双神秘莫测的眼睛；唐景崇表情迟钝；绍英一脸愤懑；达寿无可奈何地垂着头；谭学衡、熙彦一副怅然若失的神色。一个太监通报：“太后已至后殿，请各位大臣上殿。”10位大臣一齐起立，整了整头上的翎顶和身上袍服，从廊子里出来，由胡惟德领头朝大殿鱼贯而入。

进入大殿，胡惟德在离宝座一丈远的地方站定，各位大臣依次在胡惟德两旁，横列一行，面向宝座站定。大殿内的四个佩着军刀的侍卫武官，站在大臣身后。那内务府大臣世续、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也应召前来上朝。一位太监呼道：“请太后御驾。”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引导下，领着6岁小皇帝溥仪慢慢地从后殿走出来，走向宝座。

胡惟德忙带领众国务大臣朝隆裕太后三鞠躬。胡惟德上前一步奏道：“总理大臣袁世凯身体欠安，命我带领各位国务大臣前来给皇后请安，给皇上请安。”隆裕点点头，道：“好。袁世凯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南北议和，做到如此优待皇室等等条件，也是不易。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让袁世凯去办共和政府。

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御前太监把皇帝退位诏书放在隆裕面前，她看了几行，泪水便糊住了双眼，勉强看完。她想到：这大清268年的江山，被她拱手让出，她实在不愿把它奉送出去，但又无可奈何。想到这里，便顾不得太后的体面，“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双手死死地抱住退位诏书，呼喊道：“祖宗呀！祖宗呀……”整个大殿，充满了恐怖、阴森的气氛。那胡惟德见隆裕死死攥着退位诏书不肯交出来，深怕发生意外，他恨不得奔上去从隆裕手里把诏书夺过来，扬长而去。但他却从眼里挤出几滴泪水出来，哽咽着对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唯恭唯谨地奏道：“太后，现在大局只有如此。太后能睿明鉴远，顾全皇室，顾全百姓，袁世凯和群臣、百姓岂有不知，绝不会辜负太后的一番慈衷善意。况且优待条件已经确定，今后必然做到五族共和。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隆裕听了，反而哭得更痛心了，双手仍旧紧紧地把手捧在怀内。胡惟德料想不到，他善言相劝竟不起一点作用，正在着急的时候，站在他身旁的赵秉钧，忙向他递个眼色，用手指了指衣袖。胡惟德恍然大悟，想起入宫前，赵秉钧给他的一份孙中山发来的电报。他忙从袖里取出电报，上前一步，惊慌地奏道：“禀太后，这里有一份孙文发来的电报，我差一点忘了奏报。”隆裕说有孙文电报，止住哭声，抽抽泣泣地说：“电报里说些什么？”胡惟德展开电报念道：

万急。上海伍秩庸代表鉴：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钟以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总统孙文。震。



隆裕听了，如一声霹雳盖顶，山崩地裂。她浑身震颤，仆地而倒，两个随扈太监赶忙把她扶起，她悲痛欲绝地将诏书交给内务府大臣世续、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由他们钤印御玺后，交胡惟德。胡惟德捧在手上，大声地开读起来：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非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到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胡惟德读完清帝退位诏书后，他也不等隆裕太后发出退朝命令，便带着各位国务大臣，手拿退位诏书，急急奔出宫去，上了马车，直驰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向袁世凯复命去了。

退位诏书，是由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叫实业部长张謇起草，经唐绍仪转袁世凯的。

袁世凯亲笔加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这样以来，共和政府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清政府任命产生了。孙中山对此极为愤怒，他致电袁世凯，表示抗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可是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犹如遗言一样，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

袁世凯早已做好了接受诏书的准备。在外交大楼附近，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尤其是外交大楼的门口，便是戒备森严。从大门口一直排到正厅，一色扈卫的队伍。正厅里，两旁站着各级武官，再往里走，便是一些重要的大员了。正厅中央，静摆着一条大条案，条案中间，放着一个紫檀镂花的帖架。

胡惟德等人捧着诏书走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百余人哑口无声，甚为静穆。袁世凯从内室走了出来。胡惟德同去朝见的各内阁大臣，都以胡惟德为首列队站立。袁世凯一脸虔诚，轻整衣冠，朝胡惟德走去恭恭敬敬地向诏书鞠躬，双手从胡惟德手里接过诏书，把它放在大条案上的大帖架上陈列起来，然后转身站到下手。

胡惟德朗声道：“太后把国家大权交给了宫保，请宫保早日组织共和政府，以不辜负太后的愿望。”袁世凯恭恭敬敬地回了声：“是！”接受诏书仪式完毕，袁世凯转身，对胡惟德等人说：“你们辛苦了，到后厅里休息吧！”是日晚上，袁世凯在外交大楼剪去发辫，异常兴奋地哈哈大笑。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袁世凯，把发辫剪去。

次日，北京各家报纸，争先恐后地把《清帝退位诏书》全文发表。于是，北京城内街头巷尾，人们拱手相告：“改了朝代了！”“共和了！”“再也不会打仗了！”北京城的龙旗收起来了。人们只知道“共和”二字，但不知如何“共和”法。

袁世凯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即2月13日，便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

迫不及待地退位诏书送各国公使及南京临时政府，并发表声明：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各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袁世凯之声明，可谓情真意切，信誓旦旦。这些极其动听的言词，不仅迷惑了革命党人，就连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些首脑人物，也被他这番花言巧语弄昏了头脑。孙中山接到袁世凯声明电文的当天，便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他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说：“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员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专制，在咨文中附有3个条件：（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院自行解职。

（3）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

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根据孙中山推荐，以17票选举定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美、英、法、德等国公使，立即登门祝贺，并纷纷答应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孙中山辞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总统的消息传出，一般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及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孙中山，反对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平息众人的反对之声，孙中山在回电革命党人中说：

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

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滋所誓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

先生在野，吃苦辞甘，宁不喻此，祈更广之。

孙中山在复电海外华侨时说：“今日目的已达。我辈之义务告尽，而权利则享自由人权而已，其他非所问。”孙中山把用无数烈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以“成功而不私其权利”的磊落风格，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民军的中下级军官，仍表示强烈不满，有的要求立即出兵北伐，有的甚至愤而自杀，那临时政府陆军部致电：

徐州电局转镇军柏军长、湘军柴司令、粤军姚司令、清江蒋都督、孙司令、扬州徐司令、上海陈都督转陈汉钦君、安徽孙都督转皖北，各军司令均鉴：顷广东香、惠两军来电，大不满意于新大总统，并云决意北伐等语。果如此，于大局实有关碍。务希洞观时局之危急，曲体孙大总统之美意，互为劝阻，禱切盼切。

南京城内，部队听到孙中山退位，让位袁世凯，大家哗然，一般军官开会都主张立即出兵北伐，粤军旅长任介眉发言尤为激烈。陆军部总长黄兴闻之，到会极为劝慰，半夜始散。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通令各省军队改编。北伐招讨使谭人凤调任川汉铁路督办，所部立即解散，不尊者以土匪论。谭遵命照办。湘军将领邹永成独持异议，对谭人凤说：“袁世凯决靠不住，不特你的军队不可解散，连南京应裁的军队都不可裁撤，否则后悔莫及。”谭人凤不依，邹永成又坚持说：“你去和克强商量，把所有不要的军队都配好了子弹，交把我带到绿林中去训练，等到大局变动时也好出来备用。”谭人凤骂邹永成道：“你发神经病么？”邹永成气愤不过，又见一班老同盟会员只图苟安，马马虎虎地把民国重任交给靠不住的袁世凯，辜负从前的一片心血，因此郁闷在心，决计自杀。他投江自杀，被人救起未死。

孙中山认为，只要有了参议院制定的宪法，就能迫使袁世凯遵守宪法，从舆论。他从2月初开始花了1个月的时间，领导参议院制定了一部《临时政府约法》，并在3月11日公布。但孙中山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袁世凯对于一纸《约法》，不以为然。但对迁都南京，却十分恼怒，他致电孙中山，拒绝迁都：

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来，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讷外患，递引互牵，苦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

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此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世凯立即退归田园，为共和国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

袁世凯又密电张謇，希望他来京，予以襄赞。张謇虽没亲自北上，却派刘厚生持密函为袁献策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飞钳捭阖，在少川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来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此题不过政府尚在南方，公如何能组织正当之政府也。”张謇之计却是高袁一筹，袁便按张的妙计做去。

张謇又鼓动拥袁党派和势力做袁的后盾，2月21日，民社、中华民国联合会、国民协会，以及《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8社团，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程德全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后，庄接任江苏都督），并要求他转告黎元洪、各省都督、谘议局说：“查北都关系外交内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章太炎早就与张謇串通一气，他以上海光复会总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和袁世凯，反对民国政府设在南京，要求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以顺舆情”。

江苏都督庄蕴宽实际上是张謇的代言人，江苏都督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掌握在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人手中。庄蕴宽有了8团体要他出面抗议孙中山等建都南京的决定，便立即通电全国说：阅报载大总统咨交参议院全文，……光明磊落，薄海同钦，但附有办法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辞职。二项办法，蕴宽期期以为不可。各省代表所议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乃南北未统一以前，今事实既已变更，则前议岂

有拘执。至政府地点之应设在南京，与新总统之是否须到南京，当就事实上论之，不可参以主客尔我之见，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设为问题数则：一现势上观念，如袁公南来，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满蒙等处能无联外人拥幼主以破坏全局之事否？一地点与历史上之观念，披览地图，南京能控制西北各边否？中国古时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价值否？一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否？以鄙见测之，舍北就南种种危险，将使和平解决之共和政体自生荆棘，致启争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岂能不计？前见《大共和日报》13日登有《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书》、《民立报》同日登有空海《建都私议》，业已阐发尽致，太炎谓都南京之毒有五，有八报馆持论鉴定衡平，毫无偏倚，蕴宽南人，岂不以南都力便利，顾以大局所系，自当奉总统府删电转达袁公真电，有极愿南行，祇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等语，自系实情，明者自能鉴之。谨贡所见，以待公决，庄蕴宽叩咸。

庄电发表后，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表示：“袁君电称北京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能一致等，尚系实在情形，藉令举足南来，大局必定为牵动，故定都宁、鄂之说，目前决不能行。”顺直谘议局也通电响应，提出迁都南京之五虑，即：“关东一带现在正忧蠢动，又有外人从中窥伺，风声吃紧，可虑一。京都未靖，倘一摇动，难保不死灰复燃，再生意外之变，可虑二。各国公使对于此事皆喷有烦言，稍一不慎便生交涉，可虑三。庚子乱后与外国使馆订有使馆通路之约，若移南京则江阴、吴淞等炮台，必须撤毁，利害关系甚大，可虑四。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移则控御失宜，不但于殖民不便，且恐内讧外侮后患方长，可虑五。若就吾国历史上考察，则南不如北尤为彰明较著。”天津的旅津南10省绅商代表崔文藻、徐铮等10余人，致电孙中山说：“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章太炎先生论说极详，兹不复赘。恳乞允临时政府仍设北方，以维大局。如不得请，则拟邀约各省绅商来南京，哀请于大总统之前，必得请而后已。”对于庄蕴宽反对定都南京的通电，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致电驳斥道：“公为都督，行政中人也，即政府一分子也，对于国家大计，有所陈述，当告之总统或各部长，能行者以中央之命令行之，否则由中央政府交于议会，决定而后行之。断无以一人之意见，经电各部、各省、公人、私人及各报馆，至有类于耸动社会，反对政府，扰乱秩序之理。令中外闻之，将谓我政府何也。且公所提各问题，固易解决，无俟过为研究者。

维持秩序，赖有兵力，固与袁之在南在北无关也。控制西北，亦视兵力与政治若何，决不因京城为转移；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美于菲律宾，未闻因京城之远而失也。联外，拥幼主，系公过虑。至全国反对一节尤为大谬。义师一起，商务全消，各国何尝不反对，吾人固未尝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后施革命也。”黄兴以公开信的方式严厉地批评了庄蕴宽。

又有驻汉口的湘桂联军以8000人名义向孙中山、黄兴通电话说：“公等和平解决之苦心又为国人所欺，然以建都问题既经参议院第一次议决而不克实行，则袁公之心路人皆知。公等何必因循从事，希图苟安，坐令北氛逼人，胥我貔貅行见拚命流血换来之民国政府几奄奄无声息，可为痛哭。袁果赞成共和则请速推诚布公毅然南来，若犹眷恋于专制窠穴，负隅思逞，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拚死一战，不血洗二百余年之秽污地不为黄汉子孙。”南方军队虽然普遍地存在着主张定都南京的强烈情绪，但在高级将领中的意见反而不一。那南京联军参谋团的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

蔚、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第7师师长洪承点、江北都督蒋雁行、鄂军代表傅人杰、李正溶等、竟发出通电，主张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宜设在北京。这通电引起了南京军界内部的争论，陆军部便下令解散联军参谋团。而参谋团各统将群起不服，拒不执行陆军部的解散命令。

在定都问题上，临时政府内部、军队内部和参议院，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使孙中山、黄兴等，陷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表示：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

孙中山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照文、步兵第31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程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看到舆论多主张定都北京，形势对他极为有利，对如何对待欢迎团，已胸有成竹。

## 第二十九章 “老猿”称王

2月26日，欢迎团的汪精卫、唐绍仪先一天到达北京，袁世凯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所经之路均有军队夹道而立，火车站且有军乐队一班，人民观者如堵。

当晚，唐、汪晤袁，唐道：“国都建设北京，孙逸仙断无反对之理，惟虽定都北京，总统必先赴南京一行庶可化南北畛域，使南京布置略定，再回北京方可。”袁世凯答道：“若赴南，以后北方军队，恐有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可派大公子袁克定先行南下。”次日，欢迎团全部抵京。那袁世凯便在迎宾馆与欢迎专使蔡元培等开会，他拿出京外人民各团体条陈不可迁都之电呈一百余件，评述宜在北京奠都。

孙中山已在定都问题上退让，他密授专使：都城地点，决之于袁，但必先请袁赴宁一行，以与旧总统面议各事。蔡元培便道：“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

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但反对迁都南京，而且也不肯南下就职。但他在与蔡元培等会谈时表示：“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行期不能骤定。”他表现出打算南下的姿态，给欢迎团造成很大的幻想。

正当欢迎团准备陪同袁世凯一起南下时，袁世凯却导演着一场闹剧，他授意心腹在北京、天津等地发动兵变，并与外国特使通气，让他们调兵入京以“保护”使馆为名，与所谓的兵变相配合，故意制造北方的混乱局势，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假像。

那天晚上，蔡元培又去外交大楼催请袁世凯早日动身南下。袁世凯对蔡元培道：“正准备着，准备就绪就一同南下！”并执意留下蔡元培共进晚餐。

7时30分，突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人声喧闹，袁世凯当着蔡元培的面，立即假装打电话询问情况，“才知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

曹锟所部第3镇整队兵变，在东安门及前门一带放火行劫。不到半小时，电话再也打不出去。

顿时，外交大楼里大乱，人心惶惶，仿佛大难临头一般。江朝宗、姜桂题请示袁世凯，要带所部去弹压兵变，但是，袁世凯对他们命令道：“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兵变，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自有办法。”袁世凯命令江朝宗要随时报告外面的情况。江朝宗于是马不停蹄，东奔西走，不断进出外交大楼，向袁世凯报告外面闹到什么地方去了，死了多少人，什么地方又放火了。

袁世凯虽然遇事不慌，对于外面的曹锟兵变心中暗自有数，但他为了防备万一，也忙着做些应变准备。他换上短装，穿上马裤，登上一双青布便鞋，并收拾好了几箱细软，打点了随身穿用之杂物，让蔡元培留在他身边，选好了几个护从，不离左右。看来，袁世凯对外面的兵变是真是假，他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了，如果真的闹大了，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

曹锟的假兵变，一夜未停，商民有数千家被烧被劫，假兵变成了“北京正月十二兵变”。

这一夜，外交大楼里的人一夜未睡，种种猜测、谣言四起，越说使人越感惊恐不安。

一会谣传说：“听说亲贵中有人主张杀尽北京城内的汉人。民政部早就把巡警里的汉人，一律换由旗人充当了。”一会谣传说：“禁卫军要进城了！”一会又谣传说：“宗社党早就买通了曹锟！”欢迎团的其他几个人正在下榻的馆所里准备吃晚饭。饭菜刚刚摆好，就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人声嘈杂，继而，又看到四处火光冲天。不久，枪声越来越近。有人慌忙进来报告说：“北京驻军因为反对袁官保离开北京，闹兵变了。”欢迎员们看看那人，并不认识，但听到枪声逼近，就都坐不住了。接着，那人又说：“隔壁是个礼拜堂，那里有洋兵保护，乱兵不敢进去，墙根有个梯子，不如过去躲躲。”众欢迎员听了，觉得有理，就忙把饭菜端了出来，爬上梯子，往那边教堂里递过去。

是时，馆所外面像是已被乱兵困住，吵闹声乱哄哄地传来。众人端着饭菜刚刚翻过墙去，乱兵们便持枪一哄而进，把馆所抄了个底朝天。

欢迎团在礼拜堂内躲了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逃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去了。

各国公使，暗中配合兵变，借口保护在北京城内的使馆，纷纷调兵进京。大街上，处处可见外国军队，尤其日本军队最多，使北京人心惶惶。

袁世凯又派梁士诒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困留在那里的欢迎团，他说道：“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部队弹压，确保地方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欢迎团受到兵变的惊吓，又目睹了外国出兵的猖狂，再听梁士诒这么一说，不但心里发慌，而且也没有了主意。经过与梁士诒反复磋商，蔡元培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报告北京的局势，陈述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原因，并提出建议。

电文称：“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兵入京。设使再有此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袁世凯唆使兵变玩弄骗局，不但没有被揭露，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部分革命党人的

拥护。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呼声高了。有的甚至将兵变归罪于南京临时政府。

袁世凯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在3月4日发布通电话：“宣布共和已逾两旬，专使到京，亦已7日，而临时政府设置何处，袁大总统受任何时，统一政府如何组织，迄无定议，北京秩序似难维持，满蠢将再牵动，使馆卫队昨已调集、六国发兵既见电报，若徒事无理之争执，功亏一篑，更召灭亡，谁尸其咎？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国民协会致电孙中山，声称：“京兵构乱，外患日迫，全由争持临时政府地点致统一政府不能成立，尚在迁延，必至内乱环生，外人藉口，大局何堪设想，请速电袁暂缓南下，就近组织统一政府，以维人心而杜外患，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幸早定大计。”立宪派报纸《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实在恶毒，它说：“如当道不满意于项城，可以不举项城，既举项城矣，则凡事对于项城，宜尽力让步，岂能因争持临时政府地点之故，两相龃龉。……当道诸公，如以国家为前提也，为今之计，第一宜地点让步，第二宜阁员让步，第三宜临时宪法让步，百事皆弃捐，务须于此旬日内建成一统一之临时政府。统一之临时政府既设立，南京之政府，即宜取消，使全国之统治权出于一，全国之内不论如何军队，如何地方行政长官，皆当服从新政府之巩固，新政府既巩固，然后可以望秩序之回复。”江苏省议会通电指责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乞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惟有请孙总统速电袁总统在北京受任组织政府。

黎元洪也乘机说风凉话。他发布万万火急通电话：“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孽未靖，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拥袁定都北京的大合唱中，一些省份的都督和民军将领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将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纷纷出台表演。

革命党人也有反袁的激进派，但是，孙中山等已决定把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而在定都问题上同袁世凯争论，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那些坚决反袁的激进派，已是寒心，不再给孙、黄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在这场斗争中，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各国帝国主义在北京兵变之后，纷纷调兵入京，进行恫吓，通过它们在中国办的报纸，散布“不让袁世凯组织政府，即将进行干涉”的种种消息。

袁世凯搞的假兵变，使蔡元培等欢迎专使，完全上了圈套。他们惊恐之余，一再上书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说：“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蔡元培等提出两项主旨与袁世凯作最后交涉，即：“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

孙中山在国内、国外的压力下，不得不完全放弃他辞职时所提的三项条件中的二项。

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于是，袁世凯立即派唐在礼与范源濂作为代表前往南京。临行前，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

找到唐在礼对他说：“现在上边派你和范源濂为北方代表、尽快到南京去对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声明，说宫保由于北方局势的关系，无法离京到南京就职，为国民计，请他们从权考虑。这是件大事，请你们二位到南边把宫保的意思妥为转达，使他们承认通过。”梁士诒又小声道：“南方的临时政府和参议院方面，通过蔡元培等已经预先接洽好，并且不少的参议员也已经打点好了，我想这次到南京应当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袁世凯也接见了唐在礼和范源濂。袁淡淡地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到南京对他们把北方的情形说一说，我看你们只要说一说就行了。”唐在礼、范源濂二人抵达南京，孙中山带着他们来到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厅，当着全体参议员的面把他们作了介绍，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唐在礼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拟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道：“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2月18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世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致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仪节，从权考虑，俞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唐在礼读完发言稿，众参议员一致鼓掌通过。接着，参议院议决了从袁世凯受职至孙中山解职的6项程序：（1）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2）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3）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承认为授职，并通告全国；（4）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5）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待事宜；（6）孙大总统于交待之日，始行解职，由参议院电达。

实际上，以上六条早已讨论安排，现在只是履行手续罢了。先是孙中山向北京六国饭店迎袁使团致电：“经参议院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接着，袁世凯致电孙中山：“自经此变，北方商民愈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而南京政府亦鉴北方事之方殷，谅南行之宜缓。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不久，袁世凯便在北京宣誓就职，专使蔡元培等，也参加了典礼。袁在就职宣誓词中，宣誓遵守《临时约法》。这样，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了。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再妥协，老百姓看得十分清楚，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

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前夕，便致电孙中山，提出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由孙中山送交参议院通过。参议院讨论时提出，总理必须是同盟会会员。便有赵凤昌提出，由他劝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孙中山、黄兴拍手赞成，欢迎唐绍仪入党，于是参议院便通过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被正式任命为总理，于3月下旬赴南京组阁，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参入了同盟会。

内阁总理的人选经双方达成协议后，袁世凯便向孙中山提出内阁成员名单。袁拟定的内阁名单没有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力保宋教仁、陈其美、王宠惠等为阁员。袁世凯对政府中的要害部门，如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各部门，牢牢地抓住不放。革命党人对内阁重要席位，也是十分重视，他们力主必须由黄兴来任陆军总长。

两广党人开会提议军、财二部长官非民党不可，即由刘毅、朱先悴等出函纠合各军队署名致函参议院，推戴黄兴为陆军总长，反对段祺瑞为陆军



总长。参议院开议新阁员一案，也欲推黄兴管陆军，同盟会员覃振从南京急电上海各报说：组织内阁一节，袁公所提出阁员概属亡清旧吏，无一纯新人物差强人意者，此间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暗潮汹涌。寻见南北混合之统一政府，势将破裂不可收拾，贵报主持舆论，最有价值，务希鼎力维持，大张公道，使袁公幡然醒悟，以融合南北感情，为今日救急之要义，万不可循私行诈，功亏一篑，致五大民族之新共和国陷于分裂之惨境，不胜禱盼。

革命党人对陆军总长席位的要求，不但遭到袁世凯的坚决拒绝，其他各种拥袁势力也纷纷表示反对，压迫南京临时政府让步。正当南北之间就由谁任陆军部长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赵凤昌向黄兴和汪精卫提出，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黄兴任参谋长的方案。他首先给黄兴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接着又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汪精卫努力说服南方的革命将领柏文蔚、洪承点等人接受这一方案。

唐绍仪于3月25日来南京组阁，双方就陆军总长席位的争夺，仍然相持不下。唐便致电袁世凯：因南军力争陆军总长非黄兴不可，劝袁改段祺瑞为总参谋长。袁世凯复电谓北军亦为段力争。这时，统一党也发出艳电为袁世凯助阵，劝黄兴放弃做陆军总长，就任参谋总长。唐绍仪又电商北军，劝其顾全大局，一得允电，即向参议院宣布阁员名单，请求同意。

军权是袁世凯的命根子，他自然不会因为唐绍仪的电商，就会把陆军总长的位置交给黄兴。

这一斗争，最后还是黄兴退让而终结。黄兴正式向参议院公开宣布，他不接受陆军总长这一职务。黄兴在参议院演说，力辞陆军新任，言时声泪俱下，故表决时多数推段。

3月29日下午4时，大总统孙中山、内阁总理唐绍仪、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及各部总长国宴毕，至参议院报告新国务员名单，求其同意。6时开会进行投票，是时议长议员到会39人，以得20票者为通过。唐绍仪提出的经双方商定的内阁名单，经参议院投票的结果是：外交总长陆征祥（38票）

内务总长赵秉钧（30票）陆军总长段祺瑞（29票）

海军总长刘冠雄（35票）财政总长熊希龄（30票）

教育总长蔡元培（38票）司法总长王宠惠（38票）

农林总长宋教仁（34票）工商总长陈其美（21票）

交通总长梁如浩（17票）以上除梁如浩未能通过外，其他均获通过。唐绍仪提名汤寿潜为交通总长，遭到议员们的反对。最后，交通总长一席，决定由唐绍仪兼任。

《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的本来精神，总理处理一切国家事务，阁员和总理共同负责。内阁总理的人选虽由总统提名，但总理一经由议院通过之后，全部阁员应由总理自行遴选。可是，唐内阁的全部阁员，都是经过袁世凯所指定或同意的，由唐绍仪向参议院提出通过，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因此，唐内阁实际上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在唐内阁的10名阁员中，同盟会籍的阁员占有一半，即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和新入会的唐绍仪。从表面上看，这个内阁是以同盟会为中心的混合内阁。

但实际上，内阁中的要害部门：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外交都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或追随者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陆征祥手里。因而混合内阁的实权，却完全操在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为了缓和南方军人的情绪，便在内阁成立的次日，发布委任黄兴为参谋总长的命令，黄辞不就。袁世凯改任黄兴为南京留守。黄兴发表辞参谋长暂留守南京的通电，表示：

参谋总长任职綦重，非兴材力所能胜任，已复电力辞，至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已商请唐总理妥定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俟布置大定，始行告退。

袁世凯任黄兴为南京留守，统率南京附近集中的 10 余万军队，表面上是倚重黄兴，实际上是要黄兴来替他稳定南方局势，并替他遣散南方军队。黄兴肯接受这个委任，一方面是唐绍仪对他的请求，另方面是因为南方许多革命党人，感到在此过渡时期，不仅需要军事和行政权力，而且需要拥有一个民政和军政的总机关，以便保存革命力量，应付出现分裂时的非常局面。黄兴虽然表示归隐之志，但他又不能不顾及客观形势和许多革命党人对他的要求。

黄兴力辞参谋总长之后，袁世凯改委徐绍桢为参谋总长。徐绍桢因南京参谋部有人竭力反对，致电力辞。最后，袁世凯请黎元洪以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其实，军令、军政等实权都由陆军部掌握，参谋部并没有什么实权。

4 月 1 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参议院行辞任礼。5 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4 月 7 日参议院发出通告说：“本院已议决迁往北京办公，自本月初八始休会 15 天，于本月 21 日齐集北京。”4 月下旬，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

### 第三十章 留守穷城

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恶浪，一浪高过一浪，在定都之争之后，紧接着又掀起参议院风波。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中，同盟会会员居绝大多数。江苏、湖北两省便以种种借口去搞垮参议院，另立一个能为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进而否定南京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为袁世凯效劳。

江苏省籍的参议员杨廷栋、陈陶怡、凌文渊首先发难，他们借口南京临时政府未遵循法律程序，擅用汉冶萍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资财抵借外债和威逼参议员，蹂躏参议院，提出辞职。湖北籍参议员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在参议院审查通过一项向道胜银行借款合同，发生激烈争论后，便通电辞职。

江苏、湖北两省议员辞职，黎元洪控制的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发表《足以亡国之参议院》一文，公开号召取消参议院，另立国民议会。它指控南京参议院犯有“借款”、“争都”、“变乱政体”、“暴公肥己”四大罪状。并说“以上四罪仅犯其一，即足以亡国之祸，若兼而有之，其亡盖可立待”。

3 月 14 日，湖北省议会发通电：以南京参议院是由各省军政府委员组成，不能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近因南京临时政府以赋税抵借俄债，苏、鄂议员业已辞职，参议院人数不足，议案已难发生效力为理由，主张任用国务

员一节暂由袁大总统独立主持，不必再征得南京参议院的同意。要求各省议会在3月底之前，另行选出参议员，组织临时中央议会，待临时中央议会成立后，袁世凯所任命的国务员，再行追交通过。

湖北议会又致电江苏议会，提议：“每省由议会或谘议局选举10人以上20人以下议员，于20日内齐集汉口，筹划一切事宜，如蒙赞成，恳即先行告知本议会为盼。”江苏议会立即通电响应：“敝会本日开会，尊议极赞成，惟拟修正三事：一、正名为临时国会；二、每省由议会或谘议局选举7人；三、齐集临时政府所在地。贵会如表同情，拟请续电各省议会或谘议局，倘得多数赞同，仍由贵会挈名，电请袁大总统认可，共和肇建，事机万紧，伫盼赐复。”湖北黎氏集团原打算在汉口组织临时中央会议，以便控制。现在江苏提出不同意见，只好复电说：临时国会地点，原以汉口为齐集地点，俟首都决定后，即行移往，现事机紧迫，凡在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均齐集汉口同往北京，长江流域以北各省经往北京集会，限15日务各达到往在地点。他们的倡议已得到皖、粤、浙、闽、吉、奉、江、直、豫、晋等省来电赞同，要求江苏速选议员，如期集会。

湖北议会不但不承认南京参议院，而且否认南京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在3月17日的一份咨文中说：“自上月28日后，苏、鄂议员辞职，各省议员相继辞职者甚多，所余仅23人，已不足法定人数，断难开会，即令该院违背法律，任意开会，揆之法律决难发生效力，勿论该院所决《临时约法》为何项性质，人民决不承认，本议会除电恳袁大总统主持外，相应咨请贵军政府通电袁大总统及各省都督督抚，不以该院决定之《临时约法》为有效。”湖北议会利令智昏，它支持袁世凯集权，主张国务员的任命，不必再征得参议院同意，由袁世凯独立主持，又要废除对袁世凯的权力有所限制的《临时约法》。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是由参议院选举出来的。若废除《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和黎元洪的副总统，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南京参议院致电湖北议会，批驳其另立国会的主张：

昨接袁总统寒电，转达贵会通电各省发起临时国会，已得11省回电赞成，不胜骇异。本院之成，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现公布之《临时约法》，亦载明10个月内召集国会，当此参议院既成立之后，国会未成立之先，乃以一省议会名义，辄召集临时国会，不知何所依据？若不承认，临时政府皆将无效，民国之基础于以动摇。且今日以一省议会反对参议院而召集临时国会，他日将又有一省议会反对临时国会而召集第二临时国会，起覆纷纭，事权不一，民国前途，将何以赖？方今国基初肇，所赖以维持培植者，端在守法，参议院为法定机关，万不可任意破坏。至于参议员本应依约法选派，规定选派方法，权在各省，或民选或公派，一惟各省自定，万不能执民选二字反对参议员，因以反对参议院。且全国各地未设省议会或谘议局者有之，即现时省议会，亦多因仓卒成立，并未经正式选举。贵会所提断不能完全实行，非徒无益，实生纠纷，本院公认此举当然无效。

参议院又通电各省说：

鄂省临时议会发起临时国会为不正当之举动，经本院皓电通告，谅已达鉴。参议员能否代表人民之意，乃参议员之选派方法问题，非参议院可否消灭问题。若谓都督选派之议员不足代表人民，尽可按照《临时约法》第18条规定选派5人之数，尽由民选，选定后，即可陆续来院与该省前派之参议

员实行交替。《临时约法》规定选派方法由各省自定，各省如何选派，其权皆在各省。各省主张民选，应依约法选举参议院之议员，方不失为正当。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之机关，若不承认，则根本破坏中华民国，前途不堪设想，恐非真心爱国者所出此。总之，参议员可以全体改选，参议院为法定机关，断不能改。鄂省之发起临时国会实为非法举动，当然无效。

袁世凯出于维护自身的合法地位，于3月22日给南京参议院发出电说：“所论极为正当，《临时约法》既经议决公布，自为今日办事之唯一之依据。”但袁世凯又支持江苏省议会改选全体参议员的主张。把参议院中占大多数的同盟会籍议员改选掉，以达到能够控制参议院的目的。

袁世凯下令各省以临时省议会为选举参议员的机关。又通令各省，除已将咨议局改为省议会的省份外，所有未经设此项议会之省，应各就原设咨议局名称撤去，改称临时省议会。那些咨议局议员本是满清时代之议员，袁世凯只不过是让他们穿新鞋走老路而已。这样的议员改造，势必有许多原立宪派人成为议员，从而改变参议院中力量的对比，削弱同盟会在参议院的力量，增强参议院中拥袁势力。

袁世凯在3月28日通令各省由临时议会选举参议员，限于电报到达后一个月内办理完毕。但时间刚刚过去8天，袁世凯便迫不及待地再电各省，以“现在统一政党业经成立，非有正当立法机关相为对待，于一切进行，殊多窒碍”为由，要求各省所选出的参议员，必须于4月20日以前，一律起程赴京。

4月下旬，一些省份按照袁世凯的通令，由临时省议会新选出的参议员，陆续到达北京，南京参议院也已迁往北京。这就在参议院中，出现了所谓“官派”与“民选”参议员同时并存的局面。以至当4月29日参议院举行议会时，发生了新旧议员冲突的场面。会议刚刚开始，便有一新议员大呼：“今日为民选参议院开幕，林议长擅将官派而来未经民选参议员，滥列位次，殊为违背约法！”从而和者十数人，一时甚为叫嚣。

弄得林森议长无法出席主持会议。

由于出现争吵，便改为开谈话会，新议员又当面质询林议长，会议无结果而散。次日上午，民选议员仍在议场开谈话会，公推汤化龙为临时主席。江西议员李国珍、湖北议员张伯烈等人相继演说，认为所有各省官派之参议员自经改选之后，即当取消，万无再加入本院之理。

那些官派议员便站起来保护自己。杨廷栋对约法第18条原文作两层解释：“各省议员由各地方选派，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既谓自定，自不限定民选，但得地方上之承认，即为当选。今日各省改选之参议员亦不尽由省议会选出。”双方各持理由，争论不决，当日主席宣布表决，凡赞成官派议员一律退院者请起立，起立者仅21人，表决无效。

最后议决，凡民选参议员未到省份，暂由官派议员充数，俟民选议员到一人后，即将官派议员取消。

5月1日下午，参议院开会改选正、副议长，吴景濂以46票当选为议长，汤化龙以44票当选为副议长。又选出谷钟秀为参议院委员长。参议院下设法制股、惩罚股、请愿股、财政股。

新的参议院议员主要有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等党派的议员组成，其中同盟会33人，共和党26人，统一共和党13人，共和建设讨论会1人，还有12人无所属。

共和党是由原立宪派人发起支配和领导作用的政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与同盟会对立。统一共和党是介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党。

同盟会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那一度担任同盟会庶务干事并代理总理职务的重要人物刘揆一，继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之后，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应一律取消的主张。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也发表文章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一些领导成员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也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又有同盟会会员景耀月、胡瑛、王宠惠、陈其美、钮永建、汪精卫、马君武、于右任等，联合立宪派人伍廷芳、张謇、唐文治、赵凤昌等，发起成立“共和统一会”。许多同盟会会员，要求同盟会变为公开的组织。

孙中山不同意马上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他说：“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趁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孙中山反对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党，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一党之专制”。孙中山的这种主张显然是错误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同盟会必然思想混乱，并屡受挫折。

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国出现了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中，以立宪派人为主体的，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对同盟会十分不利。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又成为在野党。这时，孙中山、黄兴等才深感加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十分必要，他们指定居正等负责改组大会的筹备工作。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四五千人到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刘揆一、平刚、田桐、居正、马君武、李肇甫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

同盟会改组后的宗旨是“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最大政党，号召各地支部实力推广，以张党势。

孙中山又指定汪精卫、张继为总干事，马君武、田桐任文书，居正任财务。

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不数月间，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18行省。但是，改组后的同盟会，在思想认识上，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意见，会员既有激进派，又有稳健派。这两派各自利用自己掌握的报纸，进行着公开激烈的论战。

同盟会组织迅速发展，一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被拉入会内，如黎元洪被选为协理，造成组织严重不纯，孙中山并没有觉察。他在1912年4月初，应黎元洪的邀请，偕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乘船到达武汉，黎元洪派孙武、蒋翊武乘小轮至孙中山座舰迎请登岸，黎元洪则率文武官员在都督府门前脱帽站立迎候，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蜚声中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力赞黎元洪为中华第一伟人；黎元洪复颂孙中山功成身退，决非当今俊杰所及。孙中山当面敦请黎作同盟会协理。黎心中不愿，但仍未置可否。

显然，黎元洪借孙中山抬高了自己在革命党人的威信，但他不久便利用革命党人内部矛盾，去屠杀革命党人。但总的来说，同盟会改组有重大的意义。

其地位仅次于同盟会的共和党于 1912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它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以及国民党（江浙从事教育和地方公益的学士所组织的政团）5 政团合并而成。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 4 人为理事，并选出干事 54 人。

他们是立宪派达半数，因此，共和党的基本力量是原立宪派人。共和党成立后，其本部机构与各地支部、分部迅速发展。在本部先后设置了参议员讨论会、政谈会、政务研究部等机构，又设置交际员 100 余人。共和党共有支部 34 个，其中国内支部 27 个，国外支部 7 个。随着组织的发展，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全国人数不低于 10 万。

共和党的扩张方针是：在中央，努力向权力机构渗透。先后成为阁员的有：熊希龄、范源濂、张元奇、应德闳、章宗元。在地方，参加共和党的都督有黎元洪、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杨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

共和党以国权主义来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以国家社会政策来抵制同盟会的民生主义。共和党与袁世凯结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处处作对，想托庇于袁世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待自己力量壮大后，来实现自己独立执政的素志，或者取得与袁世凯联合掌权的资格。但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民国初年，中国有两大政治力量相互对立，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势力、以张謇等原立宪派人为主体的共和党的拥袁势力为一方；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一方。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后，革命党人努力保留南京留守这个中心。黄兴改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洋各军。他便成立留守府，以李书城为留守府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浚为总务处处长，耿觐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团长。

黄兴着手整编军队。他将在南京的各省民军编为 5 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

黄兴在任留守的第 6 天，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焚掠白门桥、太平桥一带。

兵变发生时，黄兴正在上海同唐绍仪洽商公务，闻讯急忙搭夜车回宁，到南京时已经天明，兵变已被驻宁各部平定。

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南京 10 余万军队，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曾许诺待到北京就任财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军费给南京，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给，虽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不理。南京留守府总参议李书城，公开指摘他失信，他还是不理。李书城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于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留守府便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 20 万元，暂维现状。

南京留守府所属军队，每月饷银约需 200 万元以上，抵借 20 万元显然不足维持数日。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

经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

这次兵变后，黄兴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但袁世凯还要利用黄兴去稳定南方局面和遣散南京的军队，不准其辞职。

南京留守府的辖区只不过是南京周围的那么一小块地区，而且南京又是江苏省的辖区，南京留守府的上司是江苏都督程德全。4月14日，袁世凯颁布《南京留守府条例》，规定留守府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留守府管辖范围内所需的款项，由留守咨商财政部筹解。

但是，财政总长熊希龄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对留守府所需军饷置之不顾。黄兴函电交加，熊仍置若罔闻。过了半个多月，袁世凯才让熊希龄去宁，会商解决。熊到南京后，口头上允拨款百万，但离开后仍一再拖延不拨，迫使黄兴天天发表演说，以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

袁世凯一方面不给革命军军饷，迫其解散，另一方面又制造谣言，攻击黄兴留守权力太大，存割据东南之心。黄兴忍辱负重，他在5月12日致电唐绍仪、熊希龄说：“此间经济又告罄，千方罗掘，敷衍至今。日来奇窘之状，几乎不敢告人。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似此情形，一两日内必有绝大险象。务恳无论如何，请尊处火速电知中国银行，立拨百万元以救眉急。万分危迫，立盼电复。”过了两日，黄兴又去电催问：“告急一电，谅邀鉴察。未蒙赐复，五内焦灼。前尚可靠军钞救济，今则坐困穷城。此间军队伙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加以急报密陈，日必数十至。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袁氏政府对此仍置若罔闻，不给予接济。黄兴因军饷无法解决，又受不住拥袁报纸的流言舆论压力，于5月13日通电要求销职。由于南京所属军队大多裁撤，袁世凯表面上装着挽留黄兴，暗中却着手准备结束留守府。

5月18日，袁世凯电告张謇，准备派陆军次长蒋作宾去南京与黄兴面商留守府结束事宜，要求张謇和江苏都督程德全（袁世凯窃国后，程德全再任江苏都督）会商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謇因病以密电告程。程德全害怕操之过急会发生变故，便密电袁世凯说：“在宁亲见克强办事情形，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不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宁，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猜虑。”程德全此招确实巧妙。袁世凯接受了他的建议，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前往南京。

### 第三十一章 与虎谋皮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秀才出身。1903年，19岁入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春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次年调陆军部军衡司任职。1911年升司长。

武昌起义后去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次长。

蒋作宾于5月23日到南京后，黄兴从蒋处得悉：熊希龄同国外银行团签订了《垫款章程》，得到一笔垫款，但这种乞求贷款的条件严酷，于是，黄兴便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熊希龄加以猛烈抨击。他召开留守府特别会议，邀集各师、旅、团长、巡警局长、宪兵司令参加，他在会上说：“现在3000万之外款，熊总长已擅自签约，不独失财政权，且失军政权，盖因度支竭蹶，而北方之对于国民捐皆不以为然，故熊总长非借不可。据我之意，发行不换券任何多数之款均可立得。即以国民捐为不换券之基本金，并于各省设立银行，非此不能济急。我之请取消留守，欲以诚意感动北京政府，庶国民捐与不换券皆可实行。”黄兴还说：“留守机关有碍统一，决定即日取消。推荐程德全来南京，接收管辖各军。”黄兴坚决要求解职，但蒋作宾和程德全都反对黄兴立即解职。几经协商，最后决定由蒋作宾出面要求袁世凯拨款。蒋致电袁说：“此间裁军密令已下，被裁之兵，束装待发。至今尚未收到拨款。两月又未发军饷，伙食无着。会党趁机运动，危险万分。程都督抱病甚深，一味推卸，实难胜军事繁重。数日内若无大宗款项来宁，宾即回京。非独不敢挽留，并不忍坐视糜烂。”袁世凯并不支持蒋作宾，他接到告急电报后，仍不拨款。黄兴、蒋作宾为了争取袁世凯拨款，以缓和因缺饷所出现的军队严重不稳，便商请程德全到南京来接收留守府机关。于是，袁世凯在5月31日发布命令准许黄兴辞职，并说：“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袁世凯并没有因为黄兴呈请取消南京留守府而受到感动。但对黄兴所提出的发行不兑换券以救目前之急的主张，表示同意。他要蒋作宾复电黄兴，表示“即日照办”。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表示：“南方富庶可以倡办，北方贫瘠，不能不借外债。”即请黄兴筹办国民捐，为留守府所辖军队的粮饷。

黄兴由于自己提出推行国民捐的主张，只好进行，颇得各界拥护，特别是驻扎南京各部队更为热烈支持。南京各界组织国民捐总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孙中山在6月1日发出通电表示接受，并要求国民捐总会以他的名义分电各省，使四方闻风响应。他又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民国存亡千钧一发，前经留守发起国民捐，实为求亡之要策。唯此举须由参议院采取累进法，须行一定章程，方能有效。务请诸公竭力提倡，应使共和基础得以巩固，民国幸甚。”推行国民捐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财政困难，提高人们的爱国心，抵制外国银行团的侵略野心。但是，作为下台的大总统孙中山和下台的南京留守黄兴，已无大的号召力，又有袁世凯暗中破坏，应者甚少，军饷无法维持，弄得非常被动。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80个师团，约45万人，这是袁世凯的一大心病。

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三令五申要军人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

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对于南方各省的军队，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队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曾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这一举动，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称赞他们是“仁心向义，懋树风声”。革命党人控制的



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 6 省，裁兵 27 个师，计 36 万人。

在湖北，黎元洪裁减了 7 个师，7 万人。但袁世凯的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袁世凯对此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黄兴辞去留守职务，同盟会内部的态度各不相同。稳健派认为黄辞职可以使“前此譬同盟会之专横者，疑军府之拥军自卫者，恶军人之争权黷货者，至此亦为之冰释。”激进派则批评黄辞职是功成身退的思想作怪，他们说：“留守其留，此非畏难苟安之时也。”“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同盟会上层领导人陈其美、范光启、谭人凤等对黄兴要求辞职、完全放弃军权的危险性，亦有所察觉，并试图挽回。

陈其美一面到南京劝黄兴留任，一面准备在苏州发动政变，推倒程德全而自为江苏都督，把江苏控制在革命派手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江苏省会苏州和近邻的上海，两个都督府并存，立宪派人支持下的程德全力图恢复清朝旧制，将上海置于江苏都督的管辖下。但由于上海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它在光复进程中的贡献，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已引起双方明争暗斗，颇为激烈。

陈其美与苏州的同盟会组织素有联系。在苏州同盟会以柳成烈为主脑，有骨干分子蒯际唐、蒯佐同、程宏、徐国华、吴康寿、朱葆诚等，都是策划酝酿苏州起义和响应革命的活跃人物。联军攻克南京时，朱葆诚、吴康寿、程宏等人都参加了沪军洪承点部队。

攻克南京后，朱葆诚被提任为沪军先锋队第 2 联队队长，吴康寿为朱葆诚部第 1 营营长，程宏也是该部军官。1911 年底，朱葆诚部调回苏州，扩编为“先锋团”。这个先锋团，名义上属江苏军政府，实际上却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系统的武力。陈其美为便利蒯际唐、蒯佐同在苏州活动，特委任蒯际唐为沪军都督府特派联络员，蒯佐同则由上海“共和协进会”委派组织苏州分会。

陈其美用柳成烈、蒯际唐、蒯佐同和朱葆诚掌握的先锋团，联合驻苏州的原新军 45、46 标，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把程德全赶下台。黄兴提出辞留守并荐程德全接收留守府，江苏就将完全被程德全控制。陈其美便决定发难倒程。柳成烈等组织了“洗程会”来领导这一行动。策划在 6 月 1 日由先锋团首先发难赶走程德全，举陈其美为江苏都督，陈不在苏州时，由柳成烈代理江苏都督。

但是，由于事机不密，被程德全所挫败。蒯际唐、蒯佐同、程宏、吴康寿 4 人被捕杀，先锋团被包围缴械，柳成烈逃走，朱葆诚被判永远监禁。

程德全在苏州处理了“洗程会”事件后，准备去南京接收留守府军政事宜。这时，谭人凤、范光启等，和同盟会南京支部幻想让袁世凯改委黄兴代替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这倒像是让败下阵来的将军重新上阵。6 月 4 日，谭人凤通电袁世凯说：

近且许黄留守请愿取消，而以 10 余师两月未发饷之兵，畀之老病龙钟之程都督，敢信其能维持现状乎？东南动摇，北面随之，民国前途，何堪设想！乞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则危局尚能支持。革命党断无拥兵自卫之心，如以谗慝之言存疑，窃恐贻误天下也。

范光启和同盟会南京支部也分别致电袁世凯，要求袁世凯改任黄兴为

江苏都督，言词激烈。

但黄兴已授袁以柄，袁便“理直气壮”地复电曰：“此次取消留守，本因黄君再三电请，无计可留。参以实行统一大义相责，故不忍强迫以累其盛德。至程都督接收军队，即系黄君再三力保，且称于南方军队决不受其影响。来电谓政府猜忌英雄，利用老朽，实未知兹事真像。南北统一，方消化意见之不暇，岂宜轻动恶感，为谗拘者所中伤。务望竭力维持，以维大局。”袁世凯据此回答，谭人凤、范光启等无言以对。黄兴在6月14日交卸留守职务、退居上海的第2天，北京便发生了袁世凯逼走唐绍仪的事件。

唐绍仪原来是袁世凯的亲信，但在上海议和期间，唐绍仪的态度已引起袁世凯一些猜疑。唐绍仪南下组阁加入同盟会后，在一些问题上站在同盟会一边，同袁世凯发生了分歧。

唐绍仪到南京组阁，参议院正式向唐提出由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王芝祥任直隶都督。

袁世凯答应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部总长的交换条件，但却坚决反对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由此引起双方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所领导的烟台军队万余人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在烟台的山东省临时议会也通电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袁世凯则通电声明：并未令柏文蔚代周自齐山东都督。唐绍仪颇接近同盟会的倾向，他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法对付袁世凯。他同袁世凯不断发生争执。

蔡元培等人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期间，曾同袁世凯达成临时政府北迁时可派军队护送的协议。现在袁世凯又口头上接受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同盟会就要求袁尽快发表委任王芝祥的命令，并由王芝祥率领军队3000人护送参议院和在南方的国务员北上就职。

唐绍仪就这两件事向袁提出后，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表示拒绝。

革命党人并没有因袁世凯的反对而放弃派兵护送参议员北上的决心，决定派由广西开到南京的3000军队，在王芝祥带领下北上。袁世凯见通过唐绍仪阻止南军北上，未能奏效，一面利用报纸大造阻止南军北上的舆论；一面唆使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等人、北京的社团和黎元洪致电唐绍仪，反对南军北上。最后，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派军护送参议员北上的事，才不了了之。

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唐绍仪再次向袁世凯提出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之审，袁世凯仍一口应下。唐绍仪便电邀王芝祥进京就职。袁世凯表面上对王赞誉不绝，但直隶是他老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背后指使直隶北洋军5路将领通电反对王芝祥。直隶各团体针对北洋军的反对，纷纷通电表示拥护王芝祥为都督。于是，袁世凯命令国务院以传达他的命令的形式，通令不准直隶各界随意欢迎王芝祥，同时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

唐绍仪表示反对，他当面对袁世凯道：“政府不能以军队反对为理由失信于民。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袁世凯赖账道：“是你答应的，我并未予闻。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吗？”“这是责任内阁职权。国务院会议因不用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将全体辞职。”“吾为总统，乃受全国委托。吾之用人，乃以国家为前提，且以不违背约法为标准。

国务员中如有告病者，可以告病。倘以同盟会为要挟工具，则吾将开

全国大会公布天下。”唐绍仪拒绝在袁世凯给王芝祥的委任状上副署，袁不顾唐的反对，公开破坏《临时约法》规定的大总统必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不经唐副署，将委任令交给王芝祥，并给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宣慰使公费，示意王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公费一律不必上缴，要王芝祥立即返回南方，给唐绍仪以难堪。

在内阁各部组建过程中，在人员安排上，唐绍仪又同袁世凯发生矛盾。内阁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原来南北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了表示南北合作，主张多用南方人。但袁世凯则明令各部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段祺瑞得到袁的尚方宝剑，在用人问题上便同唐绍仪大闹起来。赵对唐大加诘责，词极严厉，彼此遂大起冲突，几至用武。赵秉钧并以辞职相威胁。

最后，唐不得不退让，即与赵约决不干涉内务部中用人之权。陆军总长段祺瑞，在陆军部用人问题上同唐绍仪争吵。段祺瑞先是推荐其心腹、日本士官学校第8期毕业生徐树铮任陆军次长，但群滋不悦，不得不接受唐绍仪的意见，改任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任次长，并电其携带司员北来。但又不等蒋作宾到京，抢先委任王赓等5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80余人，无从一一位置，蒋大为愤懑，因之与段颇起龃龉。后经调停，于原订5司之外，添设3司安置南来诸员，并议定：“以后司长由段荐任，蒋不得预闻，科长以下则由蒋委任，段亦不干涉，并以段所推荐的徐树铮任秘书长。”内务部和陆军部情况如此，其他外交、海军、财政各部，也大体相同。唐内阁虽然成立起来，但袁世凯不仅将内务、外交、陆军、海军、财政等要害部门夺去，而且在唐内阁成立后，千方百计地缩小内阁权限，企图把唐绍仪架空。

但是，革命党认为责任内阁制直接关系到民主共和制度的成败，绝不能听任袁世凯随意破坏。根据《国务院官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文书，须有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或总理与有关国务员副署。如果不经国务总理和国务员副署强行公布，那就是违法越权。这对袁世凯想推行专制独裁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这是袁世凯难以容忍的。而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在政治上明显的倾向同盟会，在内阁中，每有要事，必就商于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他们决心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袁世凯决心等待时机，把唐绍仪赶下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黄兴在4月29日通电反对在苛刻条件下借外债、提倡开国民捐来解决财政问题以后，很快掀起反对在严酷条件下进行借款的声浪。这时，唐绍仪同4国银行团代表会晤，唐绍仪拒不接受银行团代表提出的对中国财政进行监督等条件，于是谈判陷于破裂。

谈判决裂的当天，唐绍仪同财政总长熊希龄一起去见袁世凯。唐绍仪同袁世凯、熊希龄在贷款问题上出现分歧。唐主张施行强迫公债及不换纸币等办法抵制外债。他说能出万元之资本家，中国尚不为少，得千人便是千万，且欲强行不换纸币。袁、熊均不以为然，并密电黎元洪、黄兴、孙中山征求意见。黄、孙赞成唐之政见，黎则极端反对。

袁决定改派熊希龄负责同银行团谈判，同时指使拥袁报纸，就借款事对唐绍仪进行攻击。

在袁的策划下，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内阁成员出席。会上，不少共和

党籍参议员就借款问题对唐绍仪进行诘责，有人说唐总理失信于国民，外见嫌于邻国。现在时势统一南北之责任全在总理，而总理之责任几乎全在借债以济焦眉之急。唐总理于借债事件已误大事，若留以当国，于将来外交财政上，必大受其苦，定不日提出弹劾案。共和党参议员张伯烈攻击唐为“亡国总理”。另一共和党议员李国珍登台演说，指责唐在借款问题上的失败：“非彼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唐绍仪在参议院受种种逼迫后，异常愤恨，到国务院时一言不发，裂眦咬牙，自谓非立时辞职不可。当晚，唐向袁世凯提出辞职。6月15日，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唐绍仪被袁世凯逼走的事件。

唐绍仪离职去天津，正中袁世凯下怀，但他表面上还派人赴天津对唐慰留。6月17日，袁世凯任命其亲信外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唐绍仪是为了民主共和制度、维护约法尊严才离职的，同盟会理应给唐以有力的支持，站出来公开揭露袁世凯的违法行为。但同盟会本部没有这样做，它于6月20日派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4人去见袁世凯，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手进行，实因党派意见不一致之故；因为唐内阁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

鉴于混合内阁的失败，今后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的超然内阁，如果再组织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世凯明确地表示，他做总统期间，是不允许政党内阁出现的。他说：“诸君须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袁世凯表示将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完美之内阁。”同盟会想通过袁世凯来实现在其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并成立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党内阁，这是与虎谋皮。袁世凯希望的是利用共和党去攻击同盟会，削弱同盟会在政府里的力量。

共和党视唐绍仪被迫离职为攻击同盟会千载一时之机会。它开秘密会议，决定对同盟会采取5项办法：(1)为同盟会多布谣言，令机关报尽力攻击，使同盟会中人个个体无完肤。

(2)所有津、汉、沪报告均由党内寄稿，使一致进行。

(3)请某政治顾问谒袁，谓同盟会中人无健全分子，无学识无经验，更率引外人为后盾，谓外人不信用同盟会，要求袁世凯此后万万不可用会中人。

(4)今日再开全体职员会，广征意见，期藉此事将同盟会一网打尽。

(5)推举后补国务员，探闻拟定总理熊希龄、内务赵尔巽、外交刘成禺、陆军张勋、海军程璧光、(司法未详，有谓汤化龙或薛大可)农林那彦图、工商赵凤昌、财政叶景葵、教育梁启超、交通孙武。

共和党在上述5项方针下，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攻击谩骂同盟会和唐绍仪、宋教仁等。共和党本部发出通话说：“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共和党控制的报纸《神州日报》，以戏弄怒骂交加的方式攻击同盟会说：

民国更始，同盟会必自夸首功，骄甚，惜黄克强失弃汉阳，不争气。

政府初建，同盟会先得总统，荣甚，惜孙中山私取公款，不争气。

内阁告成，同盟会竟位至总理，阔甚，惜唐绍仪潜逃出京，不争气。

熊氏借款，同盟会正可利用其机，猛事攻击，奈国人不输国民捐，可恨。

各地光复，同盟会本已假种种名义攫获多金，奈人民必须查账，可恨。

愚民无知，同盟会尚可肆其簧鼓再倡革命，奈各报馆必为揭破，可恨。

攻击同盟会的恶浪，甚嚣尘上，统一党继共和党之后，也发表公函，攻击唐绍仪“擅离职守，乘间潜逃”，攻击宋教仁、蔡元培“惟务党争，不为国计，非以同时辞职要挟，则以政党内阁饰词”，说“唐绍仪罪有应得，不可挽留。其他同盟会阁员，亦可听其逃罢。”同盟会领导人中，陈其美和黄兴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一度表示不满。陈其美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说：“今后内阁若不速为解决，我知非驴非马将继续出现，民国之危甚于垒卵。”袁世凯使出又打又拉之招术，他复电陈其美，指责陈：“误听浮言，殊出意外。”对于同盟会激进派揭露他“帝制自为”，他发出通电反咬一口说：“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视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万不宜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袁世凯又致电孙中山、黄兴，请他们“即日来京协同组织内阁”，用这种拉拢的办法，缓和同同盟会的敌对情绪。

陈其美、黄兴一时颇为激烈的态度，却很快缓和下来。他们在同盟会上海第10次夏季常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同盟会员正当对待共和党的造谣诬蔑，不必相对骂。又表示支持陆征祥的新内阁。

孙中山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后，抱定主意暂时不过问政事，专心致力于实业。唐内阁风潮发生后，孙中山并不怎样介意，认为政见之所以分歧，是由于经济困难引起的，是小争执，不足虑也。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知袁世凯实能斡旋大局，必不至有变动。”孙中山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对共和党、统一党造谣诬蔑同盟会置之不理，持不过问态度，但对共和党报纸诬蔑他受贿巨款百万，却通电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查明宣布实情：“如文受贿之事果确，国法具在，甘受不辞。倘实为少数私人凭空捏造，岂能任其逍遥法外？”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后，准备推徐世昌为内阁总理，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革命党人的猛烈批评。他们说，满清亡国妖孽之徐世昌做总理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徐世昌做总理，赵尔巽、梁启超、张勋为国务员，共和党之报纸亦居然为此辈鼓簧，呜呼！中华民国可以亡矣。袁之所以荐担任过清廷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盖欲位置一糊涂昏聩之徐世昌，而达其拿破仑之目的。共和党本为极守旧之官僚，趋炎赴势之滑政客，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知徐世昌若为总理，亦共和党之好友，则赞成而附和之。共和党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而利用糊涂昏妄之徐世昌，以揽政夺权，破坏共和之目的者也。

袁世凯见复辟帝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便决定暂时放弃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理，6月29日，他正式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

陆征祥，上海市人，原是清末驻沙俄公使，武昌起义后曾联合一些驻外公使电请清帝退位，因此，当上了唐内阁的外交总长。袁世凯因他无党派，可以实现他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的主张，就推他出来做内阁总理。参议院投票表决时，以74票对10票通过。陆征祥得到了共和党支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看到自己没有单独组阁的希望，便没有激烈地反对。

同盟会为表示政党内阁的立场，于陆征祥内阁成立的次日，便通电宣布同盟会阁员全部退出内阁：“鉴于混合内阁之弊，而超然内阁其害亦与之

相等，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盖非是则无以祛政治进行之障碍。此次陆征祥为总理，陆君硕材，中外同仰，惟义取超然，不合于本党之主张。吾党国务员同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王正廷诸公，已遵照本会多数同志决议，悉行引退。”同盟会发出通电的同一天，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等再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次日，他们去总统府当面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知道此时还不是和同盟会决裂的时候，便向宋、蔡等人表示坚决挽留。

宋教仁、蔡元培等为了表示辞职决心，于7月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一概不到院参加国务会议，从14日起不再到部办公，请及早派人接任。袁世凯这时才批准宋、蔡等同盟会员辞职。

同盟会发出的通电，除责令同盟会籍的阁员辞职外，并规定：“凡本会会员不得自由加入。”但袁世凯对同盟会的声明却置之不顾，仍准备委任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胡瑛、沈秉坤3人分别任教育、农林、工商3部总长。孙、胡、沈都是同盟会稳健派，他们又是临时参议院的新议员。来京之后，与袁世凯最愜。

同盟会对此极为不满。宋教仁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一种“逼奸政策”，并派魏宸组去见袁世凯，请他切勿提出。同盟会于7月16日开会，正式否决了孙、胡、沈3人参加内阁的意见。

袁世凯无视同盟会决议，仍提出这3人为补充阁员。因共和党对胡瑛有异议，将胡瑛换成王人文。袁世凯最后提出的补充阁员名单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坤、教育孙毓筠。袁世凯派陆征祥拿着他提出的阁员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

陆征祥是个不学无术、根本不懂政治的洋奴饭桶，他出席参议院会议，向参议员说明这份阁员名单时，说了许多鄙俗不堪的话，议员们听来听去，才明白陆征祥在大谈开菜单、作生日之类的废话。于是，一些参议员一气之下，在对阁员名单举行投票前，先提出陆不配做总理的问题。另一些参议员却认为陆就任总理还不久，既没有政策上的失败违法行为，推倒问题自无从发生。陆被选为总理时，得票较多，今日因一夕谈话，便把其人说得一钱不值，当日投陆之票，岂非盲举？袁世凯得知消息，坚决反对去陆之职，当天致函参议院，要求对阁员名单推迟表决再进行协商。次日参议院会议，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认为袁的信函不是正式咨文，应属无效，坚持进行投票。到会参议员99人，投票结果，袁世凯所提6位阁员，都被否决。陆征祥便躲进医院里养病，不敢再出任内阁总理，并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袁世凯决心施展手段来迫使参议院就范。他又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通电指责参议院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机，甚至叫嚷要用兵力解散参议院，用硬的一手来进行威胁；又邀请各党派参议员60多人到总统府开“茶话会”，劝说参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以挽救国家危亡，用软的一手加以笼络。

袁世凯向参议院送出新的补充阁员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前，恐吓信、匿名信、传单纷纷送给各议员。其中有署名军界公启声讨议长吴景濂、委员长谷钟秀，以及殷汝骊罪状的传单；有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者赏洋1万元的匿名传单；有说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署名公健十人团的传单。那军警会议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声称参议院再不通过阁员名单，就请大

总统予以解散。

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籍的多数参议员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投了同意票。除蒋作宾一人外其余5人均获通过。原拟蒋作宾任工商总长一职，由刘揆一登报声明脱离同盟会后充任。

袁世凯想让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接替总理，但担心不能为参议院通过，所以只任命赵为代理总理。又声言：国务总理人选，待孙中山、黄兴来北京后商定。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此人，可以为恶，也可以从善，主张用诚意来感化袁，争取他从善。黄兴也认为，只有停止内战，发展实业，国家才能繁荣。他们对袁的邀请，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

袁世凯深知孙中山、黄兴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他们采取拉拢欺骗的手段。他得知孙、黄同意北上后，立即去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并急派蓝建枢、张昉携带他的亲笔信赴沪迎接。又派梁士诒、赵秉钧、傅良佐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迎接事宜，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来欢迎孙、黄。

孙、黄决定8月17日启程北上。但是，在8月15日，突然发生了袁世凯枪杀武昌首义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的严重事件。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等同盟会员都认为袁世凯阴险毒辣，不足见信，反对孙、黄北上。京津革命党人也以袁捕杀首义党人包藏祸心，致电劝阻孙、黄北上。同盟会激进派本原就反对孙、黄北上，8月12日，《民权报》发表社论说：“彼袁世凯者，专制流毒于骨髓”，已为“中华民国之霉毒”，孙、黄北上，也决不能使袁“变种”，中华民国不去袁氏，决不会病愈。

孙中山仍以为大局混沌，力主以诚信感化袁氏。他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力排众议地说：“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认为可靠，必欲一视吾目光。”黄兴提出暂缓启程，孙中山则决定一人去京。

## 第三十二章 湖北黎屠户

张振武、方维被杀，是袁世凯、黎元洪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屠杀革命党人的典型事例。

黎元洪坐镇湖北，多次屠杀革命党人。湖北革命党人内部早有矛盾。以刘公、孙武为首的共进会与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在联合之前，就存在门户之见。武昌起义前夕，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联合总部，一起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在初期，即革命党人组成谋略处，与旧军人、立宪派抗衡的时期，两团体合作得较好。

但在联合总部组成中，共进会占据明显优势。在湖北军政府建成时，掌握军政府实权的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张振武，均系共进会党人。文学社对此不满，一直存有戒心。

文学社领导人之一詹大悲成立汉口军政分府，便在蒋翊武的积极支持下，大量安插文学社社员。在文学社社员心目中，只有汉口军政分府才可赖

以维持革命系统。他们往往不受武昌政府的指挥，而自行其是，想在汉口另树一帜，以待将来改组湖北军政府。孙武等共进会成员也对汉口军政分府心存疑忌，有人曾献计要取消汉口军政分府，以免所谓“尾大不掉”。

湖北军务部长孙武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一面打击文学社党人，一面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相勾结，拥黎以自重。而黎元洪也需要寻找党人首领作为代理人，于是，孙武与黎元洪的勾结日益加紧。

黄兴来武汉督师，孙武因忌妒黄兴的威信，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军官势力更加紧密勾结，与黄兴对立；蒋翊武等文学社党人则拥戴黄兴。恰值黄兴、宋教仁、胡瑛等同盟会领导人和蒋翊武、杨王鹏、宋锡全等文学社党人均均为湖南人，而孙武、黎元洪等均为湖北人，便形成了以黄兴为首的在鄂同盟会党人与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党人为一方，同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党人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势力为另一方的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

1911年10月29日，詹大悲看到汉口不守，同文学社员温楚珩、何海鸣等人乘轮离鄂，去安庆，得到安徽革命党人的支援。对于詹之弃职东下，黎元洪宣称为军法不容，孙武说是拆革命的台。詹等如果回武昌，则有被黎元洪、孙武加之“失陷汉口”的罪名而杀害的危险。

汉口失陷前夕，受文学社拥戴的胡瑛，虽然担任了军政府外交部长，但仍不满足个人权欲，利用文学社的不满情绪，挑唆驻汉阳的民军协统宋锡全于11月1日晚，自汉阳率兵撤往湖南，造成汉阳防守空虚。湖北军政府闻讯后，即电湖南都督将宋锡全就地正法，首级解武昌悬城示众3日。与宋同行的王宪章、胡玉珍等，经蒋翊武、蔡济民力保方获释。

由于宋走时佯称奉黄兴之令，时人信以为真，故宋被杀又引起文学社不满。

汉阳失守，黄兴东下，蒋翊武任战时总司令。军务部根据第5协协统熊秉坤的报告称，第5协第10标标统、文学社员杨传连前在汉阳临战时，私卸武装欲逃，将杨的职务撤销。

蒋闻讯大怒，函知军务部及熊秉坤，宣称欲撤熊协统之职以报之。孙武便以军务部长名义召开会议，第7协统领、与孙武关系密切的邓玉麟发言说：“今军事紧急，各军皆布列江岸战斗线内，而蒋代理总司令乃欲撤熊协统，殊属悖谬已极，将来军事必败于一人之手，安能久任此糊涂竖子耶！”于是，孙武等决计捧出谭人凤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方招讨使，将蒋翊武撤职。蒋被撤职，愤愤不平。其他文学社党人也对孙武等共进会领导人满腔恼怒。

孙武对与他意见相左的共进会负责人之一、军务副部长张振武也排挤打击，以致势成水火。由于孙武、蒋翊武、张振武3人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且都有一定的实力，3人又分别担任军务部长和副部长，时人称之为“鄂军三武”。随着南北议和达成协议，黎元洪日益倒向袁世凯，“三武”的政治态度也愈益分野：孙武组织民社，支持黎元洪，反对南京临时政府；蒋翊武则亲近黄兴，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张振武处于中间状态，但对湖北局势不满，声言要进行“二次革命”。

蒋翊武、张振武为了与孙武把持的《中华民国公报》抗衡，先后分别办起了《民心报》、《震旦民报》，各自抒发自己的政治意向，互相攻讦，在湖北军政府内形成了“三武鼎立”的局面。孙武因与吴兆麟争夺北伐第一军总司令，也发生了矛盾，总监刘公也对孙颇为不满。孙武树敌过多，除了政治原因外，他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攘功怙权，无所不至，不但排斥和打击



文学社党人，即对共进会同志也不大重视，所以同志们怨言极多。革命党人和军政府内的不满矛头，均指向孙武一人，驱孙几成普遍要求。

黎元洪就利用大家对孙武的不满情绪，从中挑拨。若有人对黎处理的事情不满时，他便说：“这是孙尧卿（孙武）的意思，是孙尧卿他们议妥了让我盖章的。”他既把责任推到了孙武身上，又挑拨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致使党人把对军政府的不满情绪均集中到孙武头上，反对孙武的情绪终于导致一场以“倒孙”为目标的事变。

倒孙事变的发起人是共进会员黄申芑。黄在革命准备阶段曾广泛联络会党，并在军队中发起革命团体种族研究会，拥有会员 80 余人，又联络其他团体，总并联络军中同志 500 余人。孙武自日本回鄂后，组织共进会，黄加入，并将所联络之团体归并成为共进会的群众基础。孙武对他极为器重，以孙中山名义委任他为大都校。但后来他一直没有被重用，武昌起义时，初任他为民军第 4 镇第 7 协第 14 标统带。1912 年 2 月，湖北军队编为 8 个镇以后，他升为协统。但资格和能力都在他之下的高尚志却是他的顶头上司（镇统制），他对这个委任不满，碍于面子，才勉强到军务部找孙武，谢军务部对他的委任。未料到，孙武对他的态度非常傲慢。孙坐在靠椅上，双足俱跣，昂然不动，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来了，接到委札没有？”黄申芑已是怒火中烧。孙武又道：“协统不小呀，你好生的干，听着没有？”黄申芑见他太瞧不起人，强忍怒火不辞而去，而且到处说：“尧卿得意忘形，连老朋友也不认识，我非杀他不可！”黄申芑与群英会的领袖向海潜关系极为密切，而且二人都是湖北大冶人。群英会是向海潜等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的会党性的反清团体，基本群众对外称 108 人，取水浒传梁山伯聚义 108 将之意，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数。曾得到文学社刘复基等人的支持，但文学社不吸收会党，故武昌起义前，群英会大多数加入共进会。黄申芑发动“倒孙”运动，便以向海潜的群英会相号召。提出“改良政治”的口号，组织“改良政治群英会”，企图驱黎倒孙，改组湖北军政府。后又收缩目标，专门打击孙武。

黄申芑为了团结各路人马，参加倒孙事变的人员很复杂，有文学社员王文锦、王国栋领导的伤兵团体毕血会、武昌起义以后从四川返鄂的原 31 标组成的教导团、起义老兵组成的将校团，以及义勇团、学生军等士兵组织。这些人各自带有不同的目的，有出于对孙武勾结黎元洪植党营私，打击革命党人不满意的；有革命有功人员因被置之闲散、或因伤残未得到应有的抚恤，而对军务部不满的；也有因个人权位未得到满足而郁郁不得志的，等等。由于参加人员极复杂，行动起来就没有统一的政治方向，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惟因同盟会、文学社中人暗中与群英会携手，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社，便无形中成为联络机关。起事时，各军重要人员，往来报社络绎不绝。

孙武对下面的不满情绪，有所耳闻，故以军务部长名义与副部长蒋翊武联合发出布告，针对群英会警告说：“近月以来，流言蜂起，争权利，挟意气，怀疑诈，树党援，第二次革命之风潮几于昌言不讳，试问此等无意识之举动为公乎？为私乎？其推倒异族乎？抑自残同类乎？……我同胞宜慎思之。”但为时已晚，不能奏效。

向海潜于 1912 年 2 月 27 日晚 10 时，对空放了一排枪，是为起事信号。毕血团、将校团、教导团、义勇团、学生军一齐出动，以黄申芑为总司令，在武昌城内采取暴力行动，驱逐孙武及其亲信镇统制邓玉麟、近卫军统制高尚志等人。起事队伍佩戴“群英会”徽章，手持百旗，上书“改良政治”、“驱

除民贼”、“保商保民”等字样，上街游行，鸣枪示警，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等口号。

孙武、邓玉麟、高尚志等事先得到消息，已避走汉口。群英会发出告示，只诛孙武一人。但由于诸人协谋时各有忿心，本非一致，祸机既发，各赴其事，内务部与军务部同时被扰，各部人员纷纷逃匿。参加事变人员一时失去控制，秩序大乱，军政机关，破坏殆尽，乱兵盛行抢劫，借机报复。第2镇统制文学社骨干张廷辅亦于当夜被乱兵所杀；蔡济民被绑架，经黎元洪力保，方得被释。

黄申芑见孙武已逃，于次日天明把他在武昌大朝街的寓所查抄，并扣押了孙武的家眷，不许随便出入，抄出的箱笼堆积如山。称孙为“民贼”、“悬赏购孙头”。

孙武在汉口闻讯，怒不可遏，要调兵平乱，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后经汉口绅商蔡辅卿等恳劝，又与武昌黎元洪商妥，向起事人提出3个条件：(1)不得动摇都督；(2)不得累及无辜；(3)不得骚扰平民。孙武发表辞职宣言后了事。孙武辞职后即寓居汉口，在英租界组织武汉民社，继续从事拥袁、黎，反对同盟会的政治活动。

黎元洪的本意是以革命党来残害革命党，他巴不得利用党人之间的矛盾，把孙武搞掉。在事变发生前，他已得到消息，但并不加制止，摆出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孙武也曾向他上书辞职，以免凶终，他却表示再三挽留，不使孙武离位，要把笑话看到底。

事变后，孙武果然被逐，他心中暗喜，顺水推舟地接受了群英会的要求，批准孙武辞职。

而另一方面，对驱孙的发动者黄申芑，同样不客气，当众申斥黄破坏秩序，给5000元作路费，要他立即出国留学。

黎元洪以镇压“叛乱”的口吻致电鄂省各军事机关谓：军务部长孙武，昨已平和解决，市廛无惊，秩序如常，各机关照旧办公，望勿轻听谣诼，仍在该地镇慑，是为至要。

由于孙武、邓玉麟、高尚志等去职，黎元洪便可以名副其实地独揽湖北的军政大权。

他首先将军务部改为军政司。原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张振武一同去职，改充都督府顾问。任命旧军官曾广大为军务长。为平革命党人之气，3天后又改任蔡济民为司长，但军务司失去了军官的任免权。改组后的军法处则成了黎元洪用来任意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工具。

第2镇统制张廷辅被杀，近卫军统制高尚志和第4镇统制邓玉麟去职，而代之以均是黎元洪的心腹、爪牙。在黎元洪的周围不但早已聚集了一帮阴险狡猾的文人政客，又聚拢了一批野蛮凶悍的旧军官以及共进会的败类，杀人不眨眼的蔡汉卿和与他同有“屠户”之称的军法处长程汉卿等，组成了一个极端反动的统治集团，对湖北革命党人施行血腥镇压。

黎元洪不但把革命党人从军务部赶走，而且把其他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如内务部长杨时杰、教育部长苏成章、副部长查光佛、实业部副部长牟鸿勋等均撤职，换上旧官僚。

黎元洪又撤销了总监察，改组为纠察处。不及半月，黎元洪仍嫌纠察处碍脚，又下令改为纠察院，大大缩小编制，只留60名工作人员，其余近千人全部解散、遣散。

军务部和监察处本是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都督权力限制最大的两个职能部门，现在这两个职能部门均取消、缩小，改变了性质，完全在黎元洪的控制之下。

可悲的是，革命党人并未能自觉地把“驱孙”与“倒黎”结合起来，而是把“驱孙”看作是“党争”，共进会、文学社，仇恨日深，形成势不两立，加剧了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

孙中山接到报告，立即意识到湖北党人存在内争大不利于革命，当即发电报给鄂省同志进行调解，可惜鞭长莫及。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没有看到黎元洪的阴谋，发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个字通告全体社员，甚至说：“如有不遵我副总统之命令及损失我副总统之威严者，惟以武装维持治安耳。”蒋的态度遭到文学社同志非难，有人批评他“胆小畏事，不足表率群英”。

4月，同盟会于鄂省组织支部，以石瑛为支部长。文学社遂与同盟会支部合并。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被推为支部长。民社成立后，共进会发生分化，部分共进会骨干，如居正、杨玉如、李作栋等回到同盟会阵营里。杨玉如当选为同盟会鄂支部总务干事。7月14日，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的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从此，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不复存在，代之以同盟会与共和党。

黎元洪在同革命党人争夺权力的实践中，看出革命党人的力量多集中在军事部门，便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将总揽军、民两政大权的军政府撤销，另立平行的都督府和民政府，都督和民政长各司其事，两不相扰。这样，都督独揽军事大权，可以削弱革命党人的军权。又规定民政府的民政长必须由“富于政治经验”之人担任，借此起用前清旧官僚，以旧官僚掌握行政大权，消除革命党人势力，是旧势力复辟夺权的一个重大政治步骤。

黎元洪选中了清朝老官僚樊增祥作湖北民政长。樊原籍湖北，曾任过清朝知县、布政使等官，并曾护理两江总督。武昌起义后寓居上海。黎元洪曾派人带着他的书信赴沪，恳切敦请。樊意存观望，坚不赴任。黎乃电请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仍不肯出山。黎元洪又推荐另一前清旧官僚刘心源暂代湖北民政长，袁又命刘署理湖北民政长，刘只答应代理3个月。

民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7个司。由夏寿廉、李作栋、李四光、姚晋圻、伍朝枢、张知本、熊继贞分别担任司长。民政府刚刚成立1个月，下属几个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李作栋、李四光、张知本、熊继贞都是过去军政府各部部长，民政府成立后，分别担任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司司长。黎元洪、刘心源迫使他们辞职，以满清旧吏代替，美其名曰“有经验”、“重资格”，让那亡清官场之山精海怪一齐出现。湖北军民分治的实施，是黎元洪全部篡夺湖北军政大权的标志，也是湖北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

袁世凯也看到了军民分治是削弱革命党势力的办法，便通电表示：“外省官制，必本伟论。”一些拥袁政党，也把黎倡导的“军民分治”赞为“建国良谋”。但是，一些革命党人都督敏锐地看出黎通过“军民分治”排挤革命党人的企图，所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电反对。袁世凯不甘心放弃，只得令赞成军民分治的湖北、四川、山西3省，首先实行，其他缓办。

黎元洪的军民分治，进一步激化了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以致激起湖北“第三次革命”风潮。

刘心源将民政府中大部分革命党人排挤出去，引起军界同盟会党人不满；而且刘心源腐败浅陋，不堪重用，且引用私人，因刘是嘉鱼人，致外间有称民政府为嘉鱼会馆，以致群情大愤，密议推倒。

一些反对同盟会的人乘机造谣生事，扩大事态。在都督府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共和党人造谣道：“同盟会在京争内阁，恐不胜，特派杨玉如君回鄂运动军队，以王宪章为主动。”他们还在会上宣布：“同盟会鄂支部副理事长王宪章、总务干事杨玉如等多人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同盟会党人起而反对共和党诬陷，引起争论，继竟斗殴。黎元洪调卫兵胁迫会议解散。上海同盟会机关部特致电黎元洪，指出上述传闻，系反对党因王、杨为同盟会支部干事，故有意中伤。同盟会本部干事居正、胡秉珂特为此事去会见黎元洪，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会断不致有革命之举。”黎元洪当面保证：“日内派兵巡城，亦为防范宵小起见，与同盟会并无丝毫嫌疑。

如有人心存破坏，我必力饬保护。”黎元洪的话是向来靠不住的，都督府军事参议王宪章、都督府顾问杨玉如、警察学校监学祝制六被他解职。王、杨被迫离鄂赴沪。同盟会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原系文学社党人，由于文学社屡遭黎元洪镇压，心中极为愤恨，积不能平。遂秘密联络，组织改良政治团，设立秘密机关，欲图改革政治，改组都督府。时称“第三次革命”。

这时，毕血会因退伍问题发生风潮，几致暴动。黎元洪下令戒严，发出严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

若被捕获，则就地正法。”祝制六等初拟7月8日，后又改为16日起事，均因大雨未成，17日，被都督府侦探探悉。黎元洪接到密报，立即调近卫军奔赴阅马厂同盟会事务所，将江光国、滕亚纲2人逮捕，交军法局审讯。又派出大批军警在汉口大公馆破获机关，逮捕祝制六，并立即解送过江，押至武昌汉阳门码头即被杀害。江、滕也于当日下午在狱中被杀。

黎元洪又出布告，指控祝、江、滕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民国罪人。他宣布说：“本都督辟以止辟，刑期无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乱党经伏诛，此外概不追究。”黎元洪所说的“概不追究”是为了稳革命党人之心，目的是为了了一网打尽。从7月17日开始，直至月底，破获机关数处，逮捕党人数十名，多数立时枪毙，少数永远监禁。黎还秘函驻汉口外国领事，要求协缉租界内之乱党。

### 第三十三章 袁、黎合谋

黎元洪及其党羽在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同时，大肆挑拨同盟会与共和党，以及“首义三武”之间的关系。7月18日，黎元洪亲信孙发绪对孙武说：“居正、蒋翊武等人认为祝、江、滕3人被杀，是你主使，故对你欲兴问罪之师。”孙武立即上书黎元洪，建议“速将所杀乱党罪状宣布，通告国中，以免同盟会先声诬我湖北，并诬我副总统也。”同盟会鄂支部得悉此信

非常愤怒，立即致函诘问孙武：“足下致副总统书，任意诬蔑，谓系本会所主持，不知足下果何所据而云然？夫士君子立身行己，须堂堂正正，庶俯仰无惭，奚必鬼鬼祟祟，为倾陷异己之举哉！”同盟会支部领导人虽然对会员祝、江、滕3人被杀深怀怨愤，但又不敢公开为3人申冤，只是竭力否认与3人之间的瓜葛，并指责孙武为事件的挑唆者。他们指责孙武出钱唆使祝、江、滕3人组织机关，然后又反过来唆使心腹向黎元洪告发，借以张大其事，波及无辜，为一网打尽之计，致使3人被杀。

同盟会既不敢为被害战友辩诬，使黎元洪更加猖獗，他屠杀了数十名革命党人之后，又藉口《大江报》刊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妖言惑众”，“破坏共和”，于8月8日将该报查封，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逃往上海。黎元洪又发出通电，指控《大江报》“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宣布将何海鸣、凌大同一律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

《大江报》在武昌首义前就是革命报纸，因宣传革命，曾受清廷当局查封，主笔副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1912年春，《大江报》复刊，发扬其一贯战斗作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甚激昂。对共和党魁黎元洪攻击尤为厉害，引起黎的忌恨。黎不顾一切地撕下“尊重舆论自由”的假面具，以“军法”惩治报界。

《大江报》被查封后，黎元洪遭到全国舆论抨击，上海《民权报》、《民立报》等7家报纸一致谴责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

同盟会南京支部亦愤怒表示：“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蹂躏。”但黎元洪根本不听舆论忠告，倒行逆施，凌大同于9月自沪返鄂，化名凌乔，参与南湖马队暴动，被黎元洪抓捕枪毙。

《大江报》被查封后，同盟会在鄂喉舌《民心报》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亦不能为之讳。”黎阅报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若辈公然庇护之，是非重办不可！”黎元洪下令将蔡寄鸥拿至都督府，经蒋翊武等说情力保，方释出，但《民心报》被他查封。

对黎元洪执掌湖北政权威胁最大的“首义三武”之首的孙武，已在群英会事件后倒台，还剩下“二武”，其中以张振武是黎元洪的心腹之患，他决定除掉他。

张振武（1870—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肄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后加入共进会，为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他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与蔡济民共同挑起了指挥全局的重任。起义胜利后，出任军各部副部长，对于革命初期的政权建设、稳定革命秩序以及阳夏战争，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思想激进，在武昌起义时，对旧势力的妥协思想较少，曾鲜明地反对黎元洪为都督，说：“我不相信他能够革命。”黎做都督后，他曾说过：“将黎元洪斩首示众。”汉阳失守后，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均支持放弃武昌的主张，张振武则激烈反对，怒斥：“敢言弃武昌者斩。”民国成立后，他发现革命果实有丧失的危险，见在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政局日益恶化，便道：“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他又在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军政府成立时，军务部长

孙武住院，军务部由张振武掌握，他在湖北军队中有较大影响，得鄂军士心。他直接掌握的军队将校团，约有 3000 余人，以心腹之人方维为团长。

黎元洪在群英会事件后，下令将校团解散，但未能成功。黎又千方百计使将校团摆脱张振武控制，派去一心腹任副团长，遭到该团拒绝。黎又下令将该团编入其亲信王安澜统率的第 6 镇，又遭该团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成命。黎又设计，企图将该团改为军官学校，此又没成功。

黎元洪下令遣散张振武直接掌握的另一支军队，这支部队是由原兵站总监所辖的 6 个大队，共 1000 余人。张振武则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军务司护卫队。黎元洪指责张“拥兵自卫”。

议和期间，张振武以军务部副部长身份去上海购置枪械，准备北伐。有人电告黎元洪，说张耗费公款，械不合用。黎元洪派人去清查他的帐目，并电沪都督陈其美监视他的活动。张一怒返鄂，当面质问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黎连声解释：“此为尧卿所为，与我无关。”从此，他同黎元洪、孙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黎实行“军民分治”，藉故将武昌起义有功的革命党人、警视厅长顾庆云排挤去职，张大愤，立即上书黎元洪，严词诘责。黎闻后，恼羞成怒。黎改军务部为军务司，军务部正副部长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同时被解除职务，孙、蒋均消极隐退，独张仍不甘退让，曾向黎要求留任，并继续掌握将校团武装力量，不肯放手，致使黎席不安枕，去张之心遂决。

黎元洪虽然打算除掉张振武，又顾张系革命功臣，恐杀之影响波及全国，因此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假手袁世凯，在北京除掉张振武；可免却湖北发生动乱的危险。

3 月 19 日，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令其由鄂调拨精兵 1 镇，赴东三省驻扎。袁也表示同意，但到 4 月中旬，又借口东省大局已静，南军不服北方水土，阻止鄂省派兵屯扎东北，实则不愿革命党人屯兵在自己的侧背，张振武的边防使名目也随之取消。

黎元洪又多次密函袁世凯，以首义元勋 16 人在鄂党见纷歧，恐将来酿生他患，请其将各员调京内用，名义上似为酬报有功，实际乃为化除党争之计。从 4 月份开始，袁世凯屡电首义党人百十人进京。然此间诸人大都窥见及此，深恐脱离巢穴，势力更形薄弱，故一再上书辞职。惟蒋翊武自恃兼人之才，欲一展其作用，电复袁世凯自欲赴京供职。

要求黎元洪给川资 1 万元，黎以鄂省有困难仅准拨给 4000 元。蒋既得此川资，故即乘快车首途。

5 月 26 日，拙于心计的张振武满怀希望地与孙武一同北上。袁对“三武”一概给以顾问官虚衔。张大为不满，甚至对段祺瑞大发牢骚：“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张又两次向袁呈递条陈，要求给以实职。袁无意认真对待，随便给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名义作为敷衍，张振武却很认真，又是申请经费，又是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又借口财政困难，不予理会。于是张便负气缴状留书而去，仍尽义务于桑梓。

6 月中旬，张振武回武汉，凭自己在湖北的实力，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并向黎元洪每月索款 1000 元，准备招兵 1 镇，往蒙古赴任。黎元洪对张振武的复返武汉极为恼火，于是杀机顿起，但却不敢贸然行事。

黎元洪便与袁世凯加快了筹划杀害张振武的阴谋。袁世凯和参谋次长陈宦派遣心腹之人万廷献来鄂，同黎元洪密谋后回京。袁世凯在北京与陈宦

进一步布置杀张阴谋，与此阴谋相配合的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张振武与孙武之间，原来“交谊契合”，而欲杀张，必须使其脱离任何党派的保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张振武本是好逞意气之人，经黎元洪心腹孙发绪的挑拨，张振武果然同孙武交恶。

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是袁、黎及谋士们的本意，是在暗中进行的；但还有更阴险的一手，是他们在明里给当事人灌迷魂汤剂：借调解孙武和张振武矛盾之名，行迷惑张振武之实，取得张振武的信任，将张振武等人骗往北京杀害。

7月底，湖北籍民社派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等，受袁世凯派遣返鄂，调解孙、张矛盾。刘、郑在汉口嘉宾楼设宴招待孙、张及黎本唐、蔡济民等50余人，进行调解。席间，郑万瞻首先发言：“此次奉大总统命令出京，实因鄂中时有暗潮，尤多误会。起义诸同志时起纷争，未免使旁观者暗笑，希望捐除意见，融化党派。”刘成禺说孙、张交恶，系出误会。那孙、张则自认前误，并誓以永无意见。

孙、张同刘、郑等人共同发布了《孙武、张振武原无意见之布告》，孙、张算是恢复了团结。

黎元洪便装出要与张振武和好的姿态，邀请刘成禺、郑万瞻来调解。刘、郑也热心周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皆大欢喜之事。黎元洪暗与袁世凯通气，时机成熟，袁便频频来电，请张振武进京，说什么：“屯垦事正在筹商，何以径行回鄂？仰速来京筹划进行。”黎元洪给张振武路费4000元，促他迅即北上，刘成禺等也劝张携眷去京。胸无城府的张振武不知此乃袁、黎调虎离山之计，兴致勃勃地邀集方维等30余人随同刘成禺、郑万瞻一同进京，临行时，黎元洪与张振武握手作别。

张振武喝下袁、黎“调和”迷魂汤剂，顿时忘乎所以，满脑子想的是消除党见，联络南北感情，又雄心勃勃地想在镇抚边陲方面有一番作为。他刚到北京，便向袁世凯呈递《上袁大总统书》，建议筹边之策。又为调和党见，在北京德昌饭店宴请两党要人，即同盟会宋教仁、张继，共和党张伯烈、刘成禺等，变得异常活跃。

袁、黎谋士们毒杀张振武的阴谋活动正在加紧进行。陈宦见张振武经刘成禺、郑万瞻调解后来京，立即与黎元洪的幕僚饶汉祥商议，共同为黎元洪起草了一道请袁杀张的密电，谓“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谋。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投专局。一言示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元洪抚驭又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饶汉祥将此稿带回武昌，由黎元洪签署，于8月11日发往北京，此即“真电”。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电报，召集北洋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杀害张振武、方维的具体方案。但又觉得黎元洪电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当即复电，拟为之设法调停。

黎元洪得袁复电后，又于13日发第2封电报给袁世凯：“不杀张不独

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并以参谋总长名义，派饶汉祥及军官 10 余人乘快车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报告：“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袁便于 15 日下捕杀张振武的军令。

15 日晚，张振武为增进南北感情，和湖北同来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参加宴会的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身上、已带着袁世凯立即捕杀张的军令了。宴席未终，段芝贵就说有点小事先行告辞。10 时左右，张振武和冯嗣鸣、时功玖分坐 3 辆马车，冯车在前，张居中，时殿后，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预先埋伏好的军警，将张逮捕，押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

方维于当晚 9 时左右在金台旅馆被捕，押送到执法处城外分局。16 日晨 1 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在木柱上，身中 6 枪毙命。临刑前，他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也在同时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坐在后边马车上的时功玖立即赶到共和党本部报告消息，并邀集孙武、邓玉麟等在凌晨 3 时赶往执法处营救。刘成禺、哈汉章也先后赶到，要求保释。但陆建章打断他们的话，说张已伏刑了，并且拿出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段祺瑞副署后交来的。面对这一惊人的事变，哈汉章伏尸痛哭，孙武一言不发，刘成禺大呼：“无怪外间多骂共和党无人格，似此自残同党，夫何人格之可言。”孙、方被杀，全国震惊，群情愤激，函电纷纷，诘难群起。

最感愤怒的是民社派（即共和党的湖北派）参议员，因为他们刚刚奉袁世凯之令赴鄂调解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并向张劝驾来京，几日后，张即被杀，他们感到受了愚弄，又颇蒙卖友之嫌。故最先采取行动。16 日晨 8 时，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孙武等同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未得要领。

17 日，袁世凯要报纸全文披露黎元洪“真电”原文以及袁世凯军令大意。18 日，由张伯烈领衔，共和党参议员 20 人署名，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袁世凯杀张、方军令的依据，即黎元洪“真电”进行全面批驳，将“真电”提到的张振武的“罪行”摘成“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倡二次蠢动，乘机思逞”，“蛊惑军士，破坏共和”，“要求发巨款，设专局”，“冒政党、藉报馆”等五个问题，进行反驳，认为均系诬蔑不实之词。对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的违法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

8 月 19 日，参议院讨论质议案，刘成禺首先起来对《质问书》作了简单说明。他说“查约法第 6 条明戴，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在讨论过程中，各党参议员对袁世凯、黎元洪耍弄权术，违法杀人进行谴责。同盟会籍参议员陈家鼎、彭允彝、刘彦等先后发言，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和黎元洪。刘彦说：“此事体重大，质问恐无效力，不如提出弹劾案，以尽本院保护人民之职。”张伯烈提出，弹劾案必须满法定人数，质议案则不需如此，参议院人数不足，不得已才提出质议案。

陈家鼎认为非提出弹劾案不可，弹劾后，或政府国务员解职，或参议



院解散。如果参议院此时尚不弹劾，尚有参议院何用？彭允彝主张必须在质问之后再提出弹劾案，弹劾时弹劾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刘彦补充说，还应弹劾黎元洪。

袁世凯就质问书向参议院作了答复：“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出之处。且以军事通例而言，事关军事秘密，未便宣布者，本可无庸宣布。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请其审查现在情形，如不至因此滋生枝节，可将犯事地方之证据，摘要宣布。俟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答复。国务员明日碍难出席。特此咨复。”20日参议院开会，参议院对袁的咨复极为不满。卢士模、彭允彝、覃振等主张即日弹劾，时功玖主张退回咨文，刘成禺认为咨文可作政府无法之根据，不能退回，张伯烈提出两种办法：（1）今日非政府出非答复质问不散会；（2）令其明日出席。最后表决：要求段祺瑞明日出席答复。

21日下午，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在讨论弹劾案问题时，发生分歧。同盟会籍参议员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共和党籍参议员则主张弹劾全体国务员。

同盟会和共和党参议员们各有各的想法：同盟会籍参议员对张、方案虽甚为愤慨，但他们同张振武的关系较浅，主要是从维护约法、着眼于改组政府，想通过张、方事件，推宋教仁出来改组内阁，他们并不敢与袁世凯直接对抗。所以不少同盟会籍参议员尽管言词激烈，但却害怕同袁氏政府决裂；共和党籍参议员中，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且兼含有一种嫌疑性质，故愤激异常，主张弹劾。而非民社派参议员，因张振武系共和党干事，不能不随声附合，但这些人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未根本改变。他们迫于形势，表面虽表示赞同，其内心却是反对弹劾，故提出弹劾全体国务员来和同盟会所提出的弹劾陆征祥、段祺瑞相对抗。

## 第三十四章 虚情欢会

袁世凯极力阻止参议院提出弹劾案，他在21日晚邀请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到总统府谈话，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表示“追悔莫及”，又请求刘等“仰仗诸公疏通意见”。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虽然表面上并不示弱、但实际上他们已开始软化。到22日参加议会时，刘、时、张、郑4人，意气稍平。

议会外，谴责政府的活动颇为激烈。黄兴于18日、20日连续电袁，指出黎电中所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而黎竟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致使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愈形危险”。他对共和前途，表示忧虑。同盟会本部于8月22日发布开除黎元洪的启事。

启事指斥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同盟会与黎元洪断决关系。

其他各政党、社团以及知名人士，也对袁、黎表示极大义愤。黎元洪任社长的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之敌”，与黎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拥戴黄兴为社长。黄兴婉言谢绝。

袁世凯杀张、方的主要目的是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使其失去革命党人的拥护，成为孤家寡人，以便为己所用，直至黎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黎元洪知被袁所卖，甚为尴尬，以至气喘旧痰复发，咯血时，精神颇觉不支。于是，亟通电自白。19日发出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21日再次通电，电文长达2000余字，把“十大罪状”扩充至“十五大罪状”。黎元洪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把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但全部“罪状”无一证据。黎元洪还列举了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假手袁世凯将张、方杀于北京的“理由”，以诉自己“苦衷”。他说：“元洪数日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柔肠九回，慈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受负振武罪，无受负天下罪。臂疗身，决蹈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黎元洪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一罪自己驭将才疏，造成武汉动乱不已，致使商民流离，市廛凋瘵；二罪自己本与张振武相从患难，情同骨肉，乃因不善调理，竟使首义之士，堕为罪魁，心怀惭德，愧对振武；三罪国基甫定，法权未张，乃有杀张之事，以致险象环生，祸机密切，快一邦黎庶之心，解天下勋庸之体。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黎元洪保证对张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派专员迎枢归籍，乞飭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枢到鄂，元洪当开会追悼，亲往祭奠，以安哀魂。

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正式提出辞参谋总长及鄂军都督职，又向参议院辞副总统职。

黎元洪是否真的认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不是，恰恰相反，黎元洪凶相毕露地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

张、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湖北，鄂人士甚震骇，军人尤不平。谣言四起，黎令武昌戒严益甚。各界人士群情愤激，莫可名状，黎竭尽全力削弱革命党人力量，首先派亲信部队将张、方统率的将校团包围，令即日缴械退伍，实即遣散。又召集军界人员在都督府开会，强词夺理地说，杀张振武，实出于万不得已。元凶既除，余党自解。此后我军人务宜和衷，同御外侮，不可再存党见。

黎元洪下令解散张振武所设军务司卫队和屯垦事务所，即连张振武创办的民国男、女公校也下令取缔，后经教育司力争，才决定将两所学校收归公办。黎元洪加派军警巡逻市街，缇骑四出，暗探密布，都督府周围长期处于戒严状态。黎谕令汉口电报局总办孙发绪：“凡有关系之电，概行扣下，不为代送。凡交鄂报馆来去访函至汉口邮局，均派人检查拆阅。”谴责黎、袁的电函无法从武汉发出。

黎元洪得悉参议院要弹劾自己，非常紧张，连忙策划对付手段。他采纳饶汉祥献计：“假用鄂军人联名挽留为要挟地步，又用商会、教育会名义，电责参议院不应弹劾，恐摇动大局。”于是，湖北全体旅以上军官、各级军事学校校长、都督府军事顾问，以第1师师长黎本唐领衔，在黎元洪提出辞职的第2天发表通电（梗电），对民社派参议员提出的质问书进行了逐条驳斥，为黎元洪辩解。未过一日，湖北军界再次气势汹汹地发出通电，语气尤为激烈，点名痛骂刘成禺、张伯烈等，说他们“混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

人民意思，褻瀆副總統威嚴，是為喪心病狂，玷辱祖宗”。還威脅說：“參議員如必欲彈劾，請將梗電所駁各款限于電到 24 點鐘內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誤，刀鋸斧鉞，悉加同人；貴議員如有一字之誣，刀鋸斧鉞亦必當有受之者。”在黎元洪及其親信的煽動下，又有湖北教育總會、商會，武昌、夏口、漢陽議會，以及“湖北保安社紳耆暨全體士民”、“旅滬鄂人”等，也紛紛致電北京，斥責參議員，挽留黎元洪。稍後，鄂省議會也致電北京。這些電文，均係黎元洪左右舞文弄墨者所為，那軍界之恐嚇電，更開武人干涉議會之惡例，為此激起參議院和輿論界的不滿。

黎元洪作賊心虛，連忙致電袁世凱，說是“軍界通電，措詞激烈，元洪往阻無及，索稿未獲，深為惶歎。伏念元洪于振武案辦理委曲，未能事先遍曉，致啟詰問，故謹請失察之罪，臨穎彷徨，淚隨電墮”。黎怂恿軍界攻擊參議院，又自請“失察之罪”，可見其已捉襟見肘，黔驢技窮。

黎元洪的這些活動，確實發生了作用。參議員們害怕動亂，袁世凱除親自接見湖北議員外，又暗中運動共和黨的非民社派議員，要他們說服民社派議員不要再堅持彈劾政府，一旦彈劾無效，則參議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為之動搖。稍後，袁世凱命參謀部次長陳宦、陸軍部次長蔣作賓、海軍部次長湯芴銘等宴請民社派議員，勸其勿迷于張振武私情，而與政府為難，即要求他們放棄彈劾案。民社派議員終於軟化。為了保全面子，他們只是沒有公開撤回彈劾案，而是消沉下去。

到了 22 日下午，參議院經過辯論表決，贊成彈劾陸征祥、段祺瑞者為多數，于是彈劾陸、段案得以成立，并举定由張伯烈、時功玖、劉成禺等為起草員。但是由于袁、黎收買和串連參議員不出席會議，使到會議員达不到法定人數，使彈劾案不能成立。28 日，拖延了 1 個星期的彈劾案，终于提交參議院。彈劾案由張伯烈、劉成禺、時功玖、鄭萬瞻 4 人提出，同盟會籍參議員陳家鼎、覃振、劉彥、彭允彝、歐陽振聲、盧士模、周珏、殷汝驪 8 人連署。該案僅把袁世凱不經審判，捕杀張振武、方維的違法舉動，歸罪于陸征祥和段祺瑞的“輔佐乘謬”，“陷臨時大總統于違法地位”，要求臨時大總統依約法將陸、段即予免職。與此同時，同盟會籍議員劉星楠提出《咨請政府查辦參謀長黎元洪違法案》，指控黎元洪恃有全國軍事上之大權在握，對張振武、方維不依法手續，堅持其就地正法之蠻橫辦法，屢電北京，強陸軍部以必行，為破壞約法，背叛民國之元惡大慝，咨請政府嚴行查辦。這兩個避重就輕均未涉及黎、袁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杀害張、方的提案，袁世凱和參議院中擁袁、黎參議員，仍千方百計加以破壞。彈劾陸、段案未能通過。

革命黨人遂將斗争重點放在查辦黎元洪身上，認為張、方一案，黎元洪假手袁世凱泄其夙憤，破壞約法，殺戮首功之罪在黎不在袁，此案黎為造因生禍者，袁為黎連帶，而陸、段當代負其責者也。故陸、段可遞咨減罪，而黎元洪則萬不可不問。黎元洪杀張、方非以參謀長電杀之，乃以鄂督電杀之，乃改查辦鄂都督案，举陳家鼎起草。

但查辦黎元洪案同樣遭到袁、黎勢力的反對，他們出于共同的打击革命黨人的立場，出來袒護黎元洪。9 月 3 日，陳家鼎提出了查辦鄂督黎元洪案，連署 20 余人，列出交參議院。拖延到 9 月 13 日，陳家鼎始得在会上報告，列举黎元洪十大罪狀，要求討論通過。十大罪狀从杀祝制六等到封闭《大江报》，通缉何海鸣、凌大同，逼走王宪章、杨玉如，到杀张振武、方维，以及外云军民分治，内实大权独揽，滥用刑讯，唆使鄂军界干涉政治等问题

均涉及到，虽然也是从法律角度提出问题，但接触到了黎屠杀革命党人的政治问题，说明了黎杀张、方非出于偶然违法，而出于敌视革命党人的一贯立场。

报告甫毕，刘崇佑、刘国珍等大声反对，不待议长宣布散会，纷言延会而去。至此，参议院中环绕着张、方事件的所谓弹劾与查办也就不了了之。但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声讨下，不得不为张振武开追悼会。他亲往致祭，并致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杀戮首功之罪在黎不在袁”的认识，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张、方被杀前，袁已多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面商国是，调停党争。16日，张、方被杀，大多数革命党人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

于是，众人力劝孙中山、黄兴不要轻入虎穴。同时，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也纷纷致电孙中山与黄兴，力阻他们只身进京，误入圈套。但是，孙中山对众人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袁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对于进京与否，黄兴也有所犹豫，于是，孙中山也劝黄兴暂止其行，以防突然。黄兴正踟蹰时，仆人乘机把他的行李搬回家。孙中山从上海同孚路黄兴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昉、程克陪同下，登上商局的“平安”号轮船。与孙中山同行的有其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还有魏宸组、居正、王君复等10余人。

在码头上，欢送孙中山的中外记者、各界人士，人山人海，他们团团将孙中山围住，并一再劝他不要贸然进京：“公世界伟人，历经险阻，岂怯于民国成立之后，惟此行以有益无益为断。观北方情形，似即行亦无大裨益。”但孙中山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决意北上。于是，送行的人。有人神情黯然，有人痛泣。孙中山一再向人们解释，让人们相信袁大总统，并声明他这次进京，主要是想帮助袁世凯当好民国总统，解决好迁都、治政、建军等一系列大事，并能一心一意搞些实业，改造中国。

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美丽、年轻的女子，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安平号轮。在安平轮上，她趁人不注意，把孙中山请进一间船室内，尔后关上门，正当孙中山愕然之际，她掏出一把寒光阴森的尖刀，道：“先生是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身虎穴，我誓死反对！”那年轻女子说着，便举刀刎颈。孙中山见是个女志士，慌忙拦住，从她手里夺过尖刀，掷于地上，然后慰言再三，劝止百般，那女志士才肯下了安平轮，怏怏而去。

8月18日下午，“安平”号轮在“海琛”号巡洋舰的护送下，载着孙中山一行从上海启程，去北京会见袁世凯。22日下午，“安平”号轮抵天津，孙中山在袁世凯的代表、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等北京专员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去北京。

袁世凯以欢迎元首的礼遇进行隆重的欢迎。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将自己的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供孙中山使用。

孙中山下了专列，只见北京站欢迎牌坊耸立，军警如林，政府各部总长、议员、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都来迎接。由于北京市民早就期望看看这位革命领袖，加上袁世凯有意隆重接待，欢迎群众达数万人。孙中山举帽从人丛中穿过，频频向人们致意、然后乘袁世凯的双马车由正阳门入城，进中华门。孙中山的马车前呼后拥，沿途军警林立，军警背后便是人山人海。孙中山在代理内务总长赵智庵等政府官员的陪同下，来到石大人胡同外交大

楼下榻。

袁世凯命令对孙中山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袁世凯为接待孙中山来京，筹划甚久，用心颇深。他把孙中山的馆舍选择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即袁世凯的总统府，这里建筑既宽敞轩朗，铺陈亦富丽堂皇，还便于警卫，而他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故意把总统府腾出来，加以修缮，让给孙中山居住。

孙中山因路途劳累，原准备在第二天会见袁世凯。但袁当晚就派人邀见，并举行晚宴欢迎。孙中山去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时，袁世凯早迎于厅下，互相礼毕，手拉手来到大厅。在晚宴上，袁世凯亲自执盏于孙中山，致词道：

我盼望先生与克强久矣，今克强未与同行，未及共聆伟论，深引为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殊为欣慰。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浅，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凯忝负国民付托，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

孙中山见袁世凯如此说，便道：“文久居海外，于国内情形或有未尽详悉之处，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早日筑成，则我民国前途受惠实多。”袁世凯忙道：“极是，极是！”孙中山原只准备作短时间的拜会，但同袁晤谈后，即“欢若平生，恨相见晚”，即留驻府中与袁畅论时事，至夜半犹未辍谈。

次日，孙中山宣布自己北上的宗旨和政见 7 条：(1) 男女平权。(2) 大铁道计划。

(3) 尊重议院。(4) 南北不可分离。(5) 大局急求统一。(6) 报界宜造成健全政论。

(7) 决不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袁世凯为了表示竭诚招待孙中山，特派唐在礼和大礼官黄开文在石大人胡同孙中山的行邸照料，并派有侍从多人听从孙中山等人支派使唤。孙中山如公出，即有人安排车马，预洽休憩餐膳之所。袁世凯又特别命令巡警总厅：凡孙先生出入除派马队侍从外，沿途均派军警护卫，并断绝交通。

孙中山每次外出，见途中总无一人，甚为诧异，得知是袁世凯特意安派之后，道：“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 1、2 日即他去矣！”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心思，忙将军警撤除。

孙中山住在袁世凯的总统府，石大人胡同一时车水马龙，前往谒孙的人很多，有新旧政府成员，有前清遗老，有广东同乡，有日本人，有新闻记者。孙中山应酬不暇。

28 日，袁世凯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孙中山，并邀请各部总长、各高级军官，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孙毓筠、沈秉坤、章太炎、王赓、孙武、宋教仁、张绍曾，还有诸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世凯致欢迎词，道：“孙先生游历海外 20 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袁世凯举酒向孙中山致敬，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

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深感谢。”他称赞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孙中山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宴后，袁世凯同孙中山就国内外重大问题举行秘密会议。

由于孙中山在北上前就认为，中国无论由何人来执政，都不能有所作为。因为国力日竭，外患日逼，现实的政治状况犹如一团乱麻，谁也一时难以措手足，如果只从党争下手，结果反而会越搞越乱，难以解决问题。现在既已让位给袁世凯，就应该努力去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支持他推行利国福民的政策，争取有一个较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实业，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从根本上解决国弱民困的问题。他对袁世凯失去警惕。来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又对他极为尊重，孙缺乏同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很容易受袁世凯的欺骗。袁世凯在张、方事件后，很需要孙中山的支持，来稳定革命党人的不满情绪，因而表现出极其尊重孙中山。他们俩人这才相互高呼“万岁”来。

孙中山与袁世凯初次晤谈后，就向自己的同志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总统为恶。”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袁世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像盼孙中山一样，也盼黄兴能北上，他坚请孙中山特电黄兴即日来京商议要政。孙中山致黄兴的电报，就是应袁的请求发出的。

黄兴在孙中山的敦促下，于9月5日率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徐少秋等10余人，乘铭新轮离沪北上。

9月7日，黄兴还在途中，袁世凯就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同时授上将衔的还有黎元洪和段祺瑞。

黄兴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20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事经国务会议，金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谓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 第三十五章 “化男为女”

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在北京着手把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同盟会5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宋教仁为什么要把同盟会与其它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呢？原因是南京参议院经过一场风波而北迁后，同盟会已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议席。5月中旬，共和党成立后在参议院的势力大增。在唐内阁风潮中，它同袁世凯狼狈为奸，宋教仁等深感要坚持责任内阁，就必须实行政党内阁，而要实

现政党内阁，就必须组成强大的政党，而要组成强大的政党，同盟会就必须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当时在参议院占有相当席位的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张耀曾、李肇等最积极，但屡次开会研究，均无结果。因为多数同盟会会员反对改组，他们认为“现值党争剧烈之时，本党若稍有动摇，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势，其危险而不堪设想者”。田桐、白逾桓等人反对尤为激烈，他们“痛陈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而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体，奈何提及改组？”蔡元培也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但是，由于袁世凯使用武力威胁参议院通过陆征祥任国务总理，统一共和党在陆内阁风潮中和同盟会一起受到共和党和军警的攻击，多数人异常激愤，于是终于决定和同盟会合并。同盟会为了增强在正式国会竞选中同共和党的竞争力量，也同意同统一共和党合并。

统一共和党的代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向同盟会提出两党合并的 3 个条件：（1）变更同盟会的名称。（2）废除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

吴景濂字莲伯，奉天宁远州人。1907 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后，留学日本。

1909 年回国任奉天谘议局议员，旋任议长。1912 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参议员，后任北京参议院参议员、议长。

8 月 5 日，以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党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合并的消息后，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所提出的合并 3 条件外，又提出取消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的要求。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光绪举人。1898 年任广东布政使，旋调甘肃布政使。1900 年率兵护送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至西安，升陕西巡抚，次年 3 月调山西巡抚。

后历任四川、两广总督，残酷镇压人民反清斗争。1907 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因与奕劻、袁世凯争权而解职。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又被起用为四川总督，见清廷大势已去，未赴任。

同盟会为了达到改组扩大的目的，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但坚持在党纲中必须保留“民生”两字。

8 月 7 日，三党代表开会，又有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派代表参加。提出参加合并。他们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推定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代表杨南生负责起草宣言。

8 月 11 日，同盟会代表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代表谷钟秀、国民公党代表虞熙正、国民共进会代表徐谦、共和实进会代表许廉举行正式筹备会议，宋教仁被推选为临时主席。

会上，通过了内部组织和“宣言”。两天后，五党联名正式发布了国民党成立宣言：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取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治。众志即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故斟酌损益，义取适时，概列五事，以为揭橥：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

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凡此五者，纲领略备，若夫条目，则当与时因应，不克图定。

国民党成立宣言发布的同一天，孙中山、黄兴便通电国内外同盟会各支部，通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张继为临时主席，报告五党合并经过以及政纲的起草经过。因为国民党政纲是由同盟会政纲演绎而来，但国民党政纲里取消了男女平权一条，于是，参加大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大怒，她们围着宋教仁严词诘问，其中一个女会员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嘴巴，使会场大骇。继而，为国民党政纲中是否补入“男女平权”一条，主席主持以举手形式表决。

结果，举手者未过半数，仍然没有通过。

接着，大会发选票选举理事和参议。不久，大会开检选票，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翔、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

国民党内部组织分为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隽等；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政事部下又设有选举科，主管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刘盥训、张耀曾、伍光建、文群、仇鳌等。交际部主任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等。

大会选出参议：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29人。名誉参议钮永建等7人。

孙中山来到会场，全体与会代表起立，脱帽向孙中山致敬。然后，孙中山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为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国民将可日进富强。故兄弟于五党合并，有无穷之希望。……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今五党合并，诸君皆当持此观念，则民国前途永无危险之象。……同盟会素所主张者有三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民族、民权已达目的，惟民生问题尚待解决。……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缓图，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孙中山语声刚落，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在奏乐声中，孙中山退出会场。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孙中山仍要宋教仁直接负责，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一再表示，不多问党事。他认为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重要。他说：“现在我正在集中我的思想与精力于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

对于西方国家劳资间的不协调以及劳工大众所处的困境，我所见已多，因之，我希望在中国能预防此种情形的发生。由于实业的发展，生产必将增



加，而此种情形的变化，必将有加深劳工阶级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野的危险。我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去增殖他的势力，直至成为财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大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把兴办铁路作为他工作的中心。

孙中山表示不多问党务，并不是不问，对于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他仍以国民党理事长的威望和权力，给予指导。

国民党成立后，为了扩大声势，争取多数，到处拉人加入。国民党对“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搀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佬，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

孙中山、黄兴都同意大批发展国民党党员。黄兴一到北京，一心一意扩大政党，他在北京逢人便动员其加入国民党，上至袁世凯，下至一般君主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以及前清遗老，都是黄兴动员的对象。孙中山、黄兴极力邀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首领。袁世凯内心不愿加入，他根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为了拉拢孙中山等人，态度暧昧，虚与委蛇，使孙中山、黄兴存在种种幻想。后来袁世凯向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黄兴到京后，袁世凯举行了欢迎黄兴的公宴，袁世凯再一次亲自到场主持。因为有孙夫人参加，所以政府方面除了国务院各总长、次长及总统府各重要大员七八十人为陪宾外，其夫人也都参加。

晚宴在居仁堂大殿举行。袁世凯讲了欢迎词后，孙、黄答谢，态度毫无拘束。然后便是陪宾们依次致辞。

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坐在西南角，他在致辞时，从恭维孙中山、黄兴，自然地转向恭维袁世凯，出于本性，继而不自觉地牵涉到政治，批评国民党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同盟会是暴徒，只会乱闹……”有人开始响应，高声叫喊：“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孙中山是孙大炮、大骗子！”晚宴骚乱起来，有人偷看孙中山，见他态度从容如常，若无所闻。黄兴虽然有些坐立不安，但见孙中山如此，也稳定下来，不为所动。

袁世凯见火候到了，该出来压一压了，便站起身来，用拳头猛砸桌子，众人立即寂静下来。袁世凯怒叱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尔后，他拱手向孙中山、黄兴说：“北洋军人都是老粗，程度不太够，望孙先生、黄司令海谅！”孙中山气量宽广，面带微笑点头，他见袁世凯坐下，便站起来，举杯道：“我与黄兴相约，皆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让项城作总统10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20万里，民国即可富强！”孙中山的这一席话，正中袁世凯下怀，他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接着呼喊：“袁大总统万岁！”黄兴本对袁世凯产生怀疑，尤其是张振武被杀案，使 he 不想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谈，后经孙中山说服，消除了对袁世凯的疑虑，他到京便说：“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还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世凯。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

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孙中山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态度，他说：“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孙中山极力说服党内和平了结张、方案件，认为“弹劾大可不必，盖于事实毫无补救。”孙中山在京近1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13次，每次谈话均由梁士诒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3、4次直谈到晨2时，所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包括政治、财政、实业、外交、国防等问题。每次会谈，报纸上都有大体的报道，但没有记录发表。每次谈话，袁世凯都装出十分谦恭的样子，无论孙中山说什么，他都颌首：“所言极是。”就连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激进主张，他也满口答称：“事所当然。”偶有异处，袁世凯也说“贵论宏大，可以参考”之类的奉承话。

某夜，孙、袁会谈结束后，梁送孙回行馆，孙问梁：“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

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到今尚疑，君为我释之。”梁问是什么事？孙道：“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改革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士诒回答道：“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者之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在北方，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者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也。”孙中山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的好感，是要孙中山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谈话中袁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之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很快就骗得了孙中山“十年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话很满意，他后来曾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袁世凯在发生内阁危机时邀请孙、黄北上，想请他们解决陆内阁的风潮问题。

8月20日，陆征祥提出辞职后，袁想让他亲信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但又怕参议院通不过，于是一面任赵为代理总理，一面声称内阁总理待孙、黄到京后协商解决。与此同时，又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姿态。他先是派范源濂、刘揆一动员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宋以仅换总理，阁员仍采各党混合，既不能组成强固的政府，又不合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辞谢不就，并表示待孙、黄到京后再议。

孙中山到京后，28日同陆征祥会见时曾劝陆勿存退意。当袁向孙征求内阁总理人选的意见时，孙提议由宋教仁出任，黄兴也来电劝宋担任。宋以临时政府即将结束，所余时间很短，不能多所施展，调和南北感情须有威望素著者，始能得到人们信仰之理由，反过来建议由黄兴任内阁总理。

黄兴北上到天津，宋迎黄于天津时，又动员唐绍仪、陈其美共同促黄出任总理。以后袁、黄会晤，袁也作出动员黄为总理的姿态。黄兴以准备专心致力实业来谢绝。袁世凯就趁势提出在赵秉钧和国民党籍的沈秉坤两人选一人担任总理。袁提沈秉坤自然只是作为陪衬。黄兴认为沈、赵两人均可。宋教仁反对沈而赞赵，因为他认为沈若出任，必然破坏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在京国民党人亦多认为国会大选在即，临时政府时间已不长，如沈勉强出任，万一短命，对国民党不利。

经过反复商议，多数国民党党员主张取放任主义，谓不如即用赵秉钧为总理，俾得组一纯粹的袁派内阁，黄兴便代表国民党正式向袁提出赵秉钧为总理，这当然正中袁世凯的下怀。9月24日，经参议院通过，赵内阁正式成立。

赵秉钧正式任内阁总理后，黄兴建议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以便实现政党内阁。狡猾的袁世凯见黄兴画饼充饥，极表赞成。于是黄兴、陈其美在六国饭店宴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议员、国民党本部各部正副主任与新闻记者，正式宣布“欢迎新加入国民党的国务员诸君”。可是那些新加入国民党的国务员们在宴会上说了几句应酬话之后，根本不拿国民党当回事。内阁总理赵秉钧说：“我们并未理他。”范源濂、周学熙、朱启钤表示不承认。表示积极的惟有最热心做官之外交总长梁如浩，及以留学生一跃而至农林总长之陈振先。有人讥笑黄兴拉这些人入党实是“天然凑成一部一见哈哈笑耳。”也有人说忠厚老实的黄兴劝赵内阁加入国民党，变赵内阁为国民党内阁，是要用“化男为女”的幻想，去化旧为新。

孙中山一心扑在中国的实业上，在他的心目中，头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国的铁路搞上去。他到张家口视察了詹天佑设计修建的铁路，并游览了长城。孙中山希望自己铁路建设计划能够得到“参议院之赞同，政府之特许”。袁世凯表面上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正式任命他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督办全国铁路。孙中山预定的3大铁路干线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一由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以达乌梁海。

资本定为60亿元，里程为20万里，期限10年。筹款方法是借债修路，允许外人承办，但限期若干年收归国有。

9月18日，孙中山离开北京，到各地考察铁路、矿务，结束了他这次北京之行。他在孔祥熙的陪同下，前往山西太原，去和阎锡山会面。

孙中山和黄兴在京热心调合南北，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为袁世凯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孙中山走后，袁世凯发表了自己拟定的袁、孙、黄、黎的共同宣言，即八大内政大纲。这共同宣言没有经过孙中山、黄兴的酌定。那黎元洪因为张振武案，回避与孙、黄见面，未入京，只列上了名。9月25日，“四大伟人”之协定政策予以公布，这“四大伟人”协定又称为八大内政大纲。其内容是：(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孙、黄为除祛袁之猜疑心理，表示无意竞选正式总统，而黎元洪亦通

电报辞总统：“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湖南善化人）。”黎又另致共和党之私电，则仅推重袁世凯一人。南北表面上的谐和一致赖以铸成，实则袁、黎之间扭得更紧。

## 第三十六章 国会争权

黎元洪在湖北惨杀革命党人，湖北、上海两地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送以绰号“黎屠夫”。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逃到上海的何海鸣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总机关设在武昌城内札珠街13号，顾开文为司令长，顾斌为干事，又设分机关3处，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机关不下10处，联络有志为张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袁、黎勾结，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一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第2标积极响应，计划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

黎元洪戒备森严。9月23日，宪兵队在嘉宾楼拿获党首1人，汉口亦获大头目黄某，立即正法。南湖马队恐事机泄漏，决定提前于24日夜12时起事，却不料24日下午城内的总机关被黎元洪的密探侦破，黎当夜派宪兵1营包围札珠街13号，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8人抓捕，将二顾二罗4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其他4人监禁20年。

南湖马队2标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第2营管带集合全标官兵演说：“机关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声称有某标某营可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2标标统周某亦和之，遂率全标官兵出。先攻起义门，希图乘敌不备，斩关而入，但第4师师长蔡汉卿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义门埋伏，并在城墙上以重炮向马队轰击，击死数十人。马队后队即往扑保门进攻，那里有第1师师长黎本唐把守。蔡汉卿亦率军出城夹攻，马队官兵腹背受敌，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至天明，马队3营仅剩1营，退回南湖本营，兑水死者甚众，仅存的400余人，犹敢恃险抵抗。黎本唐、蔡汉卿率军追随围捕，直至中午1时始逃散。对于被捕之马队官兵，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解至阅马场杀害，标统和2营管带均被正法。

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内各军，遇有马队2标中人，格杀勿论。又令军警稽查散兵，捉获即杀，不问口供，尸体丢进长江，连姓名、罪状均不宣布。此役死于战斗中的马队官兵200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数十人，被“正法”者数十人，共300余人，此外，有部分并未参加起事的马队也被误会，指为乱兵，四围合攻，当场枪杀200余人。蔡汉卿率军到南湖，又误会炮队参与起事，毙炮队数十人。

马队2标失败后，又有马队1标革命党人继起，密谋再举，结果被拿获，又处决数人。

9月25日到10月中旬，又陆续破坏“振武会”机关10余处，数十人被处死。此外，在武昌周围各县：襄河、沙洋都有振武会活动，荆门、当阳等县亦有振武会分支七星会组织，均遭破坏，多人被杀。加上零散被搜捕杀害者，死者当在1000人以上。军法局收禁的人犯达500余人，以至人满为患。这次被杀的革命党人，基本上是国民党员，即原来文学社系统的革命党人，经过这次杀戮，幸存下来的极少。

黎元洪电告袁世凯，轻描淡写地说：“正法5人，其余均弃械逃溃，暴动业已平定，现在省垣人心安谧。”他虽然这么说，但内心十分恐慌，特电袁世凯要求从直隶、江西、江苏、安徽4省派军到鄂驻扎，以资镇慑。袁世凯立即抽调北洋军1000余人到汉口，驻南湖马队附近，又命4省派军队援鄂。直隶、江西、江苏各派1营陆续到鄂驻扎。

黎元洪还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设立鄂军稽查处，加强对革命党人的秘密侦讯；下令禁止军人参加政党、社团，已入者务须脱离，尤禁参与秘密结社或开会，违反者，则惟该管上官是问；加强警戒，各军队按照区域添班巡，每晚发特别口号，在险要地点酌设快炮、机关枪，巡警厅、消防厅分途巡逻街道，晚9点钟以后戒严。10月5日以后，又下紧急戒严令。

首义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的武汉，气氛异常紧张，人民均有恐惧之色，群以国庆日为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

10月10日，纪念会场设在前清万寿宫，宴会厅设在抱冰堂。两个场所附近皆驻军队，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参加会议的人限制极严，各行政官署、局、所、学堂、军队只准派2名代表入场，其他一概不准入场。袁世凯这日发布大总统令，授黎元洪为人勋位，特派哈汉章前来参加武汉的纪念会，并带来授与黎元洪的嘉禾勋章1枚，以及纪念祭文一道。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义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他赞颂一番“中华民国共和立宪政体”诞生，然后便把民国成立1周年“国基未固，民生未宁，秩序未复，纪纲未振，风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现象归咎于坚持革命的党人。又把辛亥革命的功劳完全归于袁世凯：“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乾转坤，与各都督宣战议和。”黎元洪演说之后，惟恐革命党会有非常举动，匆匆离开会场，连国庆宴会也未敢参加。

首义纪念日在机枪、大炮保护之下过去，但局势远未平定。1913年阴历年关，又发生“同志乞丐团”的反黎活动。同志乞丐团的主力是退伍军人。他们谋生乏术，日食维难，曾上书黎氏求筹生计，亦被置之不理。于是以胡某等为首，联合被迫遣散而生活无着的起义官兵组成同志乞丐团，设立事务所，印发传单，共谋乞丐生涯。临近旧历年关，同志乞丐团向各暴富户告贷年费，于是各“伟人巨子公馆咸有破衣无褐辈”要求资助，此去彼来，络绎不绝，甚有成群结队硬索巨数，不予不走。

黎元洪惟恐聚众，兹扰来府，别蓄隐谋，即派人携银1.2万元，交给该发起人按名遣散。同志乞丐团拒却不受。该团参与革命党人活动，组织秘密机关，准备发难。黎侦悉后，督饬军士警察日夜奔驰，皆以捕乱党、抄机关、搜军械为事。捕获之人皆由军法处秘密处死。城内宣布戒严，每日下午2时即闭城门，除军警、宪兵外，又加派正式军队2营公驻各街巷；并加派楚材号军舰巡武汉。特饬警厅出示禁放鞭炮，甚至不准商铺停闭市，不准举办庆祝活动。以至商民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

黎元洪即使这样防范，仍不能安枕。由于历次反黎斗争均以军队为主，

他对鄂军队已不信任。同志乞丐团人数甚广，他不敢绳之以法，又苦于无法安置，便电请袁世凯设法维持，于是又一批北洋军进入湖北。

湖北革命党人几经镇压，党人被杀得寥落殆尽，稍有学望节操之士，则去之唯恐不速。南湖马队事件后，军务司正副司长蔡济民、吴醒汉辞职离去，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累累尸骨上，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又进一步倒向袁世凯，为袁氏北洋军统一全国出力。

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后，不再过问袁世凯的政治，而一心扑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上，他为考察日本实业和解决经营铁路的经费问题，于1913年2月，与夫人卢慕贞及其子女孙科、孙婉、英文秘书宋霭龄，乘坐山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南京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规定，要在其施行10个月内，需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选举。袁世凯由于迫不及待地急切登上大总统宝座，要求临时参议院尽快制定出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临时参议院在袁世凯的催促下，于8月3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及时予以颁布。

《国会组织法》首先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次规定参议院由以下几方面议员组成：1、各省省议会每省选10名；2、蒙古选举会选27名；3、西藏选举会选10名；4、青海选举会选3名；5、中央学会选8名；6、华侨选举会选6名，总计议员274名。众议院以各地方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其名额：各省取人口比例主义，每80万人选议员1名，但由于全国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时所能办到，所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咨议局额数1A3为标准，总计议员596名。

国会议员“选举法”规定实行限制选举制。所谓限制选举，除年龄、居住期限有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限制、教育限制、性别限制。具体规定是：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21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满2年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其中1、2项为财产资格限制，3、4项为教育资格限制。

限制选举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于选举之外。相当一部分工商资产者由于无田产，又未能在小学毕业，也失去了选举权。其次，无视女界要求，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争取政治上男女平等，从南京到北京掀起颇有声势的女子参政活动，接连两次上书临时参议院，指责参议院不承认女子选举权，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不以女子为人，坚决要求补定“女子选举法”。一部分参议员同情，大部分参议员拒绝，未经讨论，女界要求即被打消了。

“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各省登记的选民仍有4000万以上，占总人口4万万的9.98%，约每10人中便有1名选民，这较清末咨议局选举则增加24倍以上选民。“选举法”放宽了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毕竟有了点民主气氛，多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

国会选举自1912年12月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基本结束。

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秣马厉兵，为全面竞选作准备，宋教仁担任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

位，号召党员：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宋教仁还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共和党也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决心倾力以争。统一党于选举一事，同样不甘落后，它声称：“无论用何项手段，总以不使国民党取胜为是。”民主党虽成立最晚，但它以选举胜利激励党员说：“出而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掌握政权，亦何所不可。”各党激烈地竞选，而又不是通过宣传政见，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选举，那选举便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至明抢暗夺，愈演愈烈，出现了种种“怪状”和“丑闻”。诸如浮报选民，竞相效尤；拉票、冒投，还有比拉票、冒投更为新奇的，就是“列名指定”，真是无奇不有；抢票、毁票，时有发生；金钱收买，变本加厉；手持手枪，威逼胁迫；那些预料不能取胜的政党，最后使出拒不到会，以为抵制。“选举法”固然有违法、舞弊情事，得向地方、高等审判厅起诉的明文规定，但司法机关通常为一党把持，很难做出公正裁决，起诉、审判，几若虚设，无法有效地制止舞弊行为的发生。

国会选举开始，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认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但五花八门的选举作弊现象，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

但是，尽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点，却并非所有选民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因此卷入了唯党是争的漩涡，当选议员者，也不都是出于非法手段。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客观上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

宋教仁担任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成为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8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没有谩骂，没有恫吓，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平心论事的风度”。

他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反复宣传国民党的政见，满怀信心地准备组织国民党内阁，实行他的政治抱负。宋教仁的活动，博得了各界的支持。

在参众两院初选和复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个，占45.1%，共和、统一、民主党为154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123个，占44.9%，共和党、统一、民主党为69个，占25.2%。国民党虽未能达到超过半数的地位，但所占议席数，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党。国民党竞选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但是，在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势力展开了激烈地争论。

《民权报》在上海组织欢迎国会团，发表《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倡议国会自行召集，先开预备会议于上海，再举行成立会于南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立法机关的安全，预防北京的干涉，使议员可以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

统。

袁氏一闻此说，即张皇失措，日夕焦虑，求所以消弭之策。首先出来替袁世凯说话的是原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他发表反对迁移国会的通电。说自行召集国会，自行择定国会地点，即是变更国都地点，欲假国会之力，迫政府使必迁南方而后已。自孙、黄入都后，南北意见已洽，今倡此议，徒令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恶感，影响所及大有全国分裂之忧，小则亦起乱公安之渐。

针对孙毓筠的通电，激进派进行批驳，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袁世凯使出种种手段，力图取消“国会欢迎团”。他暗中指使冯国璋通电进行威吓，说：“该团员竞肆其无意识谬论，冀破坏我民国初基，其罪既不容诛，其心尤不可问。”

国璋嫉恶如仇，爱国如命，凡有敢簧鼓其僻辞邪说，冀以动摇国本、蛊惑人心者，惟有执法以随其后。”袁世凯亲自上阵，电令程德全取消“国会欢迎团”，并通电各省：“谓人心甫定，倘再动摇，演成分裂局面，不啻自求灭亡。”有人问袁：“上海欢迎国会团一事，甚为危险，总统当有以防其渐。”袁答道：“这都是瞎闹，本可以不理他们，他们若真干起来，则稳健派必齐到了北京，其余暴烈派主张南都者，必不肯来，就一概不要他，一概除名，令各地方另选。如果他们不服，我自有办法。”上海欢迎国会团成立后，曾派出代表到各地活动，并得到各地革命派的激烈进步分子的热列响应，继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国会地点研究会。袁世凯想尽办法，破坏欢迎国会团。利用金钱收买，允以官爵加以引诱，是袁世凯的一贯手法。袁通过孙毓筠用巨款收买了北京国会地点研究会赴上海代表石寅生，让石寅生到上海去活动，解散欢迎国会团。由于国民党稳健派不支持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它们的目的便不能达到。

宪法如何制定问题，袁世凯一再声明，他反对制定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国民党人则反复论述，宪法为一国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国民之消长，决不可忽视。袁世凯无视国会组织法“宪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议定”之规定，企图另行成立宪法起草机构，以便加以操纵控制。在袁的授意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出通话说：“夫宪法必由国会起草，表面虽似合共和原理，而实质上其弊甚大，因为国会中立法事件，极为纷繁，再益以最重之宪法草案，其不能得宽闲之时间，静一以求之，是可断言者。”他主张由各省都督联合呈请大总统向参议院提议，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 2 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

程德全的通电，遭到国民党的猛烈抨击，但得到许多都督的通电赞同。袁世凯便利用这些通电，宣布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国务院选定李家驹、汪荣宝、杨度等为委员。

袁世凯的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北京国民党本部否认宪法起草委员会。

不仅国民党否认，连一向支持袁世凯的黎元洪也不赞成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

袁世凯鉴于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实没有法律根据，便将起草委员会改称讨论委员会。这事又遭到国民党人的批驳，激烈抨击袁世凯有心劫夺，必欲将仅存一线之立法权摧残之无余而后快。袁世凯又将宪法讨论委员会改



称宪法研究委员会，但仍遭到批驳。

国民党与袁世凯势力的争论，不限于宪法的起草权，而且涉及宪法的内容。袁世凯先是一再表示反对限制总统权力的“弱国宪法”，后来又明白地提出，宪法必须规定“国务总理及陆海军总长委任之权，为总统专有，方能为正式总统之候补员。”为适应袁世凯的要求，云南都督蔡锷、江苏都督程德全、贵州都督唐继尧、四川都督胡景翼、直隶都督冯国璋、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陕西都督张凤翔八省都督，致电袁世凯，提出制定宪法的4条要点，为袁世凯张目。这4条是：1、组织内阁无须取得国会同意；2、大总统任期7年以上；3、大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4、大总统有不可裁夺之法律权。袁世凯接此电，喜出望外，立刻交给宪法研究会作为议题。

这个消息发表后，国民党人立即发表文章抨击，指责8都督逢迎袁世凯，实为无理取闹。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什么宪法研究会，声言研究会的经费应该由都督自己拿出，所研究的结果，不得向国会饶舌一句。

袁世凯没有达到目的，由于舆论界的批驳，使各省所举宪法起草委员，其自好者皆电京辞不就职。这样袁世凯始终没有能建起一个“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的班子。袁世凯所成立的那个有杨度、汪荣宝、李家驹等人的“旋起旋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始终没有得到参议院的通过。袁世凯得知参议院将他提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案”打消的消息，大怒：“若正式政府成立，选举余为大总统，国会新订宪法对大总统责任权限过于苛刻，没有意外干涉，余不认其咎。”除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之外，还有选举谁做正式大总统问题。

### 第三十七章 车站暗枪

袁世凯认为他做正式总统，是理所当然，势在必得；国民激进派认为，若袁世凯爬上正式总统宝座，就会覆辙重蹈，那绝对不行；国民党稳健派的不少人也开始感到：袁世凯实在是不可教诲，但究竟是否让袁世凯做正式总统，却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至于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看法，主张举袁为正式总统。黄兴和宋教仁虽然仍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由国民党取内阁以掌实权，而不取总统，但暗中确有拥黎元洪为总统的想法。

如果国民党议员不选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要当正式总统便成了问题。于是，袁派能员数十人，携款数十万，分赴各省运动自己为正式总统，袁世凯还特令总统府秘书函询国会事务局，将当选议员属何党籍详细调查呈阅。

在袁世凯着急的时候，他又听到黄兴、宋教仁联合孙武及共和党民社派，举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为副总统，将袁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消息，甚是惊慌。他指使他的党徒匿名大肆攻击宋教仁。宋教仁针对匿名攻击进行反驳，并揭露官僚派的“造谣生事”。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乘江新轮到上海，当晚住进黄浦路惠中饭店，后迁居同学路21号黄兴家里。不久，孙毓筠从北京致电黄兴说：“正式国会成立在即，谣言纷起，人心动摇，时势儻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我公，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黄

兴以袁世凯处事无诚意，拒不应孙之邀。

袁世凯没有达到将黄兴调北京之目的，便搞起恐怖来，多家报纸刊载消息：“大致谓选举总统在即，人心惶恐，纷纷迁避。各国使馆亦日日增置军械防备。”1周后，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枪声在上海响起。

使用暗杀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是袁世凯惯用的伎俩。

袁世凯最先曾企图拉拢并利用宋教仁。陆内阁风潮后，袁表示希望宋出来任内阁总理，宋以这“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刺谬”，坚辞不允。后来，袁又企图对他收买。宋教仁准备南下回湖南桃源老家省亲，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袁赠予50万元的支票，要求宋随意支用，宋不为所动，婉言将支票退还。

宋教仁南下后，袁极不放心，派他的爪牙随时监视。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的仇恨。

一天，袁世凯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道：“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

宋教仁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他劝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他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他认为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怕。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国民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宋教仁认为袁世凯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之前，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当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不相信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宋教仁错了。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阴谋正在加紧进行。

这天日黑时分，一辆黑色小汽车飞驰而来，在北京政府内阁总理赵秉钧的门前嘎然停住。一个身穿貂裘大衣、头戴海獭皮礼帽的人，从车门里闪了出来，一跛一跛地溜进了赵寓。这人便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

赵寓后宅的一间小厅里，壁炉火旺，灯光通明，不时传出一阵男人得意且淫荡的笑声和女人们娇柔造作的怪叫声。袁克定闻声，收住脚步，身子斜立在后院门前石阶上，袁克定很熟悉赵秉钧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若无紧急公务，他总要和妻妾们在这小厅间玩一阵牌，下几盘赌注，妻妾中谁个连赢3局，这天晚上她便可得到赵的宠爱。

赵寓内侍对袁克定也很熟悉，知道他此时亲自上门，必有要事。见他在院阶上驻足，侍人便匆匆往小厅跑去。

穿着长袍马褂的赵秉钧，一听来报，“哗”的一声，挥手推倒面前的麻将牌，起身离座，急步跨出小厅，迎至门前。一看来的果然是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心里不由一惊：通常到了这般时辰，这位“大爷”是绝不出门的，即使有要务急事，也都是挂个电话，叫赵秉钧去一趟罢了。今晚，到底有什么特别要紧事犯得着这位“大爷”亲自出马了？“‘大爷’驾到，未曾远

迎，……”赵秉钧的客套话刚一出口，袁克定一扬手，又向他瞟了一眼，他便知事非寻常，把后边的话慌忙咽下，赶紧把袁克定引到二楼一间密室内。赵秉钧刚把密室的门拴上，还未坐定，这位公子便抢先开了口：“赵叔，外面风声很紧，谅必你也有所闻了吧。国会选举揭晓后，大势不好呀！”

‘梁山匪魁’宋教仁趁国民党人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之势，借口回湖南故里省亲，在湘、鄂、皖、苏诸省，大放厥词，大肆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这小子野心倒不小。我爹早就看出宋教仁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袁克定见赵秉钧直愣愣地站着，急忙又说道：“赵叔，你想到过吗？若让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出山组阁，到那时，‘梁山宋江’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你就得卷铺盖，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个徒有虚名的大总统，我们的天下就算完了。”“唉，这个‘梁山宋江’，年纪不大，手腕倒是挺厉害的，真他妈的厉害！”赵秉钧为表示效忠袁世凯，连骂了几声。

“我爹说了，总统总统，就要统管天下。手上无权，听人使唤。他当总统由人摆布，仅仅是用来当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样的总统，他是绝对不当的。”袁克定说到这里，拧开一颗大衣纽扣，伸手从内襟口袋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尔后又掏出一个蜡纸包，轻轻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脸说：“我爹口谕，务必在四月初国会开会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这支手枪和5发带剧毒弹头的子弹，由你交给一个绝对可靠又有胆量的人去执行，不得有误，事成之后嘛，我爹应诺了，从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中支取10万英镑予以重赏。”赵秉钧听罢这位大少爷传达了他老子的口谕，犹如当头挨了狠狠一棒，脑子发胀，手脚发麻，两眼盯着桌子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叔，你看这桩事，……嘿嘿……”袁克定奸笑了几声。

赵秉钧立即意识到：若不马上应下这桩秘密差事，必将招致杀身之祸。他强掩着内心惊惶，赶快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两手垂立，摆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不卑不亢地说道：“总统口谕，智庵俯首听命，绝对服从，只是这合适的人嘛……唯恐一时难以选到，不过，我将尽力物色，尽快去干！”“好！赵叔，我爹一向是把你当亲兄弟看待，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袁克定没有说下去，只是用那对凶恶的眼睛瞟了下桌上的手枪和子弹。

赵秉钧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视线一触及到桌上的手枪和子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哀叹一声，垂首沉思起来。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因国会议员已陆续北上，他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资格，准备赴北京参加国会。这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从清早开始一直不停地下着，晚上夜更浓了。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陪同下，从《民立报》报社乘上一辆四轮大马车赴上海沪宁车站。虽然上海的十里洋场依旧是灯火通明，但街上毕竟不同晴天那样热闹，行人稀少了。他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在通往上海火车站的一条街道上，在茫茫细雨中不快不慢地行进，为了挡雨，车上四周的帆布帘篷全都落下，遮得严严实实的。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在车里谈笑风生。

坐在马车前排的宋教仁扭头对坐在后排的黄兴说：“克强兄，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待国会闭幕后，你即来京，根据国会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商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黄兴神情带着几分亢奋地回答说：“如果由我党组阁的事真的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定下来了，那连其美、仲恺，都得一起赴京才是。”“到那时候，孙先生也该从日本回来了。”廖仲恺补充了一句。

沪宁火车站临时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摆设得颇为排场：一盞 16 头的玉兰吊灯下，摆着几张长条桌，白绸桌布镶着荷花叶边，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各色糖果和香烟，条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经坐着 20 余位议员和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离检票进站上车还有 20 多分钟时，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刚从马车上下来，接待室门口便走出几个撑着雨伞的人，热情地迎到马车跟前：“噢，是黄先生、宋先生、陈先生、廖先生，失迎失迎！”宋教仁、黄兴等并不认识他们，以为是政府临时雇来的招待员。宋教仁、黄兴等人都穿着风衣，戴着礼帽，雨并不大，可迎候者还是举着伞，把他们接进了车站。就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在接待室通往进站口的拐角处，一个人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廖仲恺眼快，见此情况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近他的耳边说道：“钝初兄，那边似有坏人。”宋教仁听了，不以为然地朝拐角处瞥了一眼，轻声答道：“这类事，防不胜防。”便大大趑趄地走进了接待室。

窗外，依旧是风裹细雨，四处飞扬。初春的夜，寒意三分。车站接待室里却是一片热烈气氛，相识的，不相识的，彼此寒暄问候，特别是即将赴京的宋教仁，这样一位年轻而又颇负声望的大党魁的到来，人们自然是不约而同地向他围拢过来，客套话、恭维话不绝于耳。宋教仁兴奋地应酬着，那怕是在与人简短的几句交谈中，也几次提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以致使几个非国民党员在寒暄过后，一转身面孔上就呈现出几分不悦。

时间将近 10 时 40 分，一阵急促的铃声，使这喧腾热闹的接待室顿时静了下来。开始检票进站了。议员们自当是第一批进站的贵客。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转身对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说道：“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们的好消息吧！”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钝初，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

哈哈……。”宋教仁一边笑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其他议员已经稍前进入了检票口。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陪同下，匆匆向检票口走去。从接待室至检票口只不过数十公尺距离，他们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砰砰”地 3 声枪响，宋教仁惊喊道：“有人刺我！”宋教仁的小皮箱“啪”地一声从手里掉到地上。他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流出来。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随即将他送进附近的铁道医院。

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一个持手枪的人，正趁站内秩序大乱之机，慌慌张张夺路而逃。巡捕断定此人就是凶手，便跟踪紧追。凶手是个矮个子，穿一身黑呢子军官服，跑得并不快，看样子，心里十分惊慌惶。

车站外，风呼啸，细雨茫茫，灯昏暗。凶手刚跑到拐角处的沥青路上，见前面有一滩水，正想避开，不料由于湿漉溜滑，一侧身滑倒在路旁。巡捕奋力追上，眼看就要擒住，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前面两个巡捕应声倒在马路上，凶手立即跃身冲进一条小巷，待后面的巡捕追来，他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宋教仁由于被子弹击伤肾脏、大肠，手术后虽将子弹头取出，但因子弹带有剧毒，抢救无效，于 3 月 22 日晨去世，享年仅 31 岁。

宋教仁入医院时，神志清醒地囑于右任 3 事：“（1）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3）诸君皆当勉力进行，勿以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费尽心力，造谣者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宋教仁于痛苦中请黄兴代笔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道：“窃思仁自受任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丝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这位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家，直到临死，也没有看清南北之争是不能用调和的办法去解决的，更没想到暗杀自己的就是那甜言蜜语的袁世凯。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凶手当场逃之夭夭，便扮演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他颁布命令说：“昨据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电称，20 日晚在上海车站被奸人枪击重伤，当即飭江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及上海地方官、沪宁铁路总站，悬重赏勒限缉凶，并派交涉使陈贻范前往慰问。据陈交涉使电称，宋前总长于 22 日寅时因伤身故。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怜悯。”袁世凯又致电程德全等，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他又令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袁世凯自以为得计，没有料到事实真相很快就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和陈其美等痛心地点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总巡捕，请他们加紧侦缉，尽快破案。

陈其美派任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平时已从来往电报中获得不少线索。案发后，一个古董商人王阿法向巡捕房提供重要线索。英巡捕房于 23 日晚 12 时半在湖北路迎春坊 3 弄妓女李桂玉处将谋杀犯应桂馨逮捕。第二天又在应家捕获行凶者武士英，并搜出五响手枪 1 支以及应同主谋者赵秉均、洪述祖往来的密电码 3 本和函电多件。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江苏常州人，清附生，1884 年至 1891 年间当过福建兼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后来又当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民国后，充当赵秉钧在内务总长任内的内务府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指挥下的侦探头目。

应桂馨浙江宁波人，稍有家产，曾承父命在家乡办理学堂，后因仗势欺人，避捕出亡上海，成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武昌起义前，陈其美在沪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曾借应家在沪的房屋作为据点。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委应为上海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归国到上海，陈其美命谍报、庶务两科负责照料，应桂馨在上海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并兼任庶务科长。但是，应桂馨妄自尊大，挑拨是非，刁难临时政府官员，欺侮华侨来客，又从应办菜席中克扣银钱，“应办菜每席开支银 5 元，后减至 1 元，与 5 元菜相等。”孙中山才知道他从中舞弊。有不少人建议不仅要把他撤职，而且要逮捕查办。孙中山本着与人为善，又碍于他是陈其美推荐，就宽容了他，革了他的职。他回到上海后，重

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中华民国共进会”，自任会长。共进会成立时，虽标榜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该会成立后，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浙江都督朱瑞、江苏都督程德全先后通令查禁民国共进会，黎元洪也曾下令通缉应桂馨。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民国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民国共进会名义，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批给5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桂馨投靠了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

袁世凯、赵秉钧又通过洪述祖安排他刺宋。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是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退伍军人，只知金钱的兵痞，流窜到上海后，就被应桂馨收买，为直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

孙中山在日本接到黄兴的电报，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的原因。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返沪。他刚从轮船上下来，便被前来迎接他的黄兴请进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内，他迫不及待地询问宋教仁遇刺的情况。

### 第三十八章 杀赵灭口

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为凭核。”接着，他又电催程德全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嘱说：“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袁世凯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

4月16日、17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18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又将英、法总巡在应犯家中搜获的凶器五响手枪1支，密电码3本，封固函电证据2包，皮箱1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公共租界捕房总巡也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的函电证据5包。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照片。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中有：“密码送请验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1本，上注“国务院‘应’密”。

1月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同日，洪致应桂馨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经电老赵，索一数目。”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

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2月12日，洪致应电：“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兄（洪自称）一手经理。”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近来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

鄙人于4月7日到沪。”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中山和黄兴也在4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通话说：

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要报告中央，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孙文、黄兴。宥。

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

孙中山自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在座的有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当时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已无疑问，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道：“袁世凯之出此，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讎，伺瑕抵隙，思中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崇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孙中山说罢，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黄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

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莫及。”黄兴迟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愤之时，兴师问罪，兴兵讨伐。可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孙中山情绪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若助我，我则胜；日若助袁，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闲视之。”黄兴的情绪也有点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孙中山道：“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

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黄兴又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孙中山一向不赞成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黄二人争持甚烈。

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周震麟、覃蔭钦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旋得复电，皆主张法律解决。

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

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便乞外援相劝阻。

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孙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

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先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患得患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



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映，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的声讨。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集中在会场上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沈缙云、黄郛、陆颂橘。所有发言，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有关袁世凯、赵秉钧主谋刺杀宋教仁的材料逐渐透露出来，袁世凯、赵秉钧手忙脚乱，甚恐此种铁证即日公布后，政府中人变为国民公敌；袁世凯惊恐焦虑过好些日子，他深怕南方国民党人趁民愤鼎沸之时举兵北伐逼他下台；后得知国民党领袖们关于起兵一事尚在争论之中，他又暗自庆幸，急忙部署对南方异动的措施。4月初，袁世凯收到孙中山发去劝他下野的电报，他拿着电报杀气腾腾地对手下人说道：“你们听听孙文在说些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有‘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现在已下决心。”

孙文右是捣乱，左是捣乱，他除捣乱外再无别的本领了。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从此，袁世凯的活动更为频繁，加快了各方面的部署，差人到上海把凶手武士英、应桂馨等除掉，来个杀人灭口。以后又命赵秉钧辞职，以段祺瑞兼任总理，组成军人内阁，组织军政力量，以便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

赵秉钧辞职后便去了天津。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他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员，善于逢迎谄媚，深得袁世凯的器重，在清末当过民政部侍郎和尚书，民国时代他又爬上内阁总理的高位。

在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证据公布后的第2天，即4月26日夜，袁世凯为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苦于财力不足，为解决军费问题，不惜辱国丧权，命赵秉钧领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完全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又采取拖延的手法，以掩护他暗中积极备战的行动。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黄兴为此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袁世凯接到黄兴电报后，竟在复电中为应桂馨辩护，说：“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他借口立宪国司法独立，表示对许士英的反对成立特别法庭，“未便过于摧抑”。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就只能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5月8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是，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拒不到案。

赵秉钧辞去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袁世凯看到报纸后，就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赵秉钧得知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后被人杀死，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袁世凯不该拉完磨杀驴，并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袁世凯便对赵秉钧起了杀心，派了几个心腹拱卫军到天津去执行。

赵秉钧独自在天津督署内厅踱步沉思，忽然又忆起一桩往事：辛亥年武昌爆发革命，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袁入京组阁之前，曾邀请他在密室里共商谋取清室而代之的策略。他俩又仿照三国里诸葛孔明和周瑜比智的办法，各自在巴掌心上写四个字互相对照。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他写的是“两利俱存”。袁世凯一看发现赵的计谋比自己高出一筹，就冷笑三声。

赵秉钧想起袁世凯的那三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险奸猾的冷笑，顿觉一股寒气吹往脑门上来。他正想回卧房躺躺，突然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拦住他的去路。一个大汉走过来对他道：“袁总统听说你近来身体不适，特命我送点药来。”赵秉钧低头一看那来人手里拿着的两颗药丸，脑子“轰”的一胀，眼睛直了，脸色铁青，嘴唇发乌，方才那股寒气从头顶吹到脚跟。那人催促道：“请吧！这是袁总统特制的‘安神大补丸’。”“不！不不！”赵秉钧脑子迅速记起袁世凯命蒋自立去杀武士英时，交给蒋的正是两颗“安神大补丸”，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我没病！没病！不吃药。”“不准喊叫。”那彪形大汉喝了一声。

赵秉钧明知道躲不过，但又哀求道：“那就请你转告袁总统，就说我说没病，谢谢他的关切。”“没病也得吃下去，这是袁总统的命令。快吃！”赵秉钧仍不甘心，妄想死里逃生，唤家人搭救，高声嚷道：“好，好，我差人倒杯水来，我就服下。”“不必叫人取水，这里就有。”那人从腰间取下一只水葫芦，递给赵秉钧。

赵秉钧这才向周围看看，见门已被关严，屋里几个大汉一齐掏出手枪和匕首，都对准他。他颤抖的双手慢慢抬起，接过那两颗药丸，眼睛射出悔恨、凄楚、绝望的暗淡的光，在枪口和匕首的威逼下，吞服下那两颗“安神大补丸”，顿时七窍出血，凄死在地上。

那几个大汉，见赵秉钧横尸于地，便扬长而去，回京向袁世凯交令去了。

袁世凯将赵秉钧毒死灭口，顿觉心情舒畅，便邀新上任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总统府军事处的心腹大员唐在礼、段芝贵、陈宦等人在中南海乘画舫饮宴取乐，并叫来那给赵秉钧送毒药的领头军官，叙说赵秉钧服毒经过。那唐在礼见状，便明白了袁世凯的用意，他心里暗自说：“人都说袁世凯对付政敌有两件法宝，黄金和白刃。我看他对自己人也有一套戏法：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狠。”袁世凯早就察觉到，他在北洋军内部的基础并不稳实，许多将领并不是真心实意为他效力卖命，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他的权势作为个

人取得功名富贵的阶梯，这和他自己要利用这些将领们去拼杀，作为扩大势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一样，一旦目的达到，这种相互利用的“心腹”也就变成互相攻击的政敌。尤其是当袁世凯看到眼下南北交战已不可避免，而南方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四分五裂，南北开战，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

他疑虑在击败南方国民党之后，北洋派将领的个人力量必然会发展起来，将会养成“尾大不掉”和增长不利于他的趋势，特别是象“段虎”这样的人，目下虽是自己的“第一号心腹大将”，也口口声声说袁对他“私恩极重”，可是在袁世凯看来，段也是一个不好摆弄的人物，因为他有好几次发现，段祺瑞虽说目下不敢公开抗拒他的命令，但是段对下属却非常专横武断。段现在已是总理，日后如果权势再大，必然也会对他来像对待赵秉钧那么一手。

袁世凯对他的“心腹”都不放心，他视段芝贵私心重，视陈宦是黎元洪的人，视唐在礼心直口快，不易为他所用。他让人叙述赵秉钧被迫服毒的过程，目的是让这4个心腹大员知道，要他们永远俯首贴耳，不然的话，他袁世凯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除掉，就像除掉赵秉钧那样。

席上再也无人敢张声，再也无人敢举杯动筷。袁世凯沉思片刻，然后长叹一声，对儿子袁克定说道：“拿文房四宝来，念在智庵跟随我多年，有功还得记住，我给他写副挽联，明日你亲自送往天津。”“是！”那袁克定说完取来纸笔墨砚，摆在一旁小长桌上。

袁世凯挽起袖子，挥笔写下：“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站在一旁观看的唐在礼心中暗自说道：“这袁宫保真会做戏，红脸白脸花脸全是他自己一人唱。”袁世凯对国民党人采用金钱收买。在国会召开前，受袁世凯收买最先出来另外组织小政党的是曾任安徽都督的孙毓筠。孙毓筠纠合王芝祥、林述庆等人发起成立国事维持会，并接受袁世凯的重金，派人到南方从事解散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国会召开后，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7、8个政党，其中有陈家鼎等人组织的癸丑同志会，刘揆一发起成立的政团俱乐部，景耀月、孙钟等集合西北国会议员80余人组织的政友会，刘揆一和陈黻宸担任正副会长的相友会，司徒颖、陈垣等人发起成立的潜社，夏同和等人发起成立的超然议员社，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黄赞元和赵炳麟等人组织的国事商榷会，张汉杰等人组织的调和党，广东议员暗中筹建的第三党等等。

袁世凯对国会虽无兴趣，但根据约法，要有正式国会，尔后才能建立正式政府，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成为正式大总统，在刺杀宋教仁的前一天，就发布定于4月8日召开国会的命令。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建的众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临近各街道，张灯结彩，以示庆贺。那些参、众两院议员，均着新制礼服陆续进入会场。国务院总理和各部总长，以及内外来宾多人列席会议。

由于“宋案”关系，国民党与袁世凯关系紧张。一些国民党籍议员声言：国会一经召开，临时政府就不复存在，如果袁世凯到会，仅视为一般来宾，不以总统之礼相待。

袁为避免出现被动局面，未出席开幕典礼，仅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作代表前往祝贺。

上午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鸣礼炮108响致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随后公推最

年长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由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宣读四言颂辞，梁士诒代表袁世凯致贺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 4000 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 万万亿人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袁世凯虚伪地赞颂国会，却使不少国民党议员增添了“法律解决”宋案的幻想。

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召开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象征的国会，引出多数国民对国会的善良愿望，当时有一篇时评这样说：“今日多数人之希望，国会开后，公平以举议长、安稳以选总统，建设真正善良之政府，维持有秩序之议会，欢迎各国一致承认，此第一步也。

公人专心于国事，军队一志于国防，政党以光明之手段竞争，议员以正大之问题辩难，政治能任艰难之责任，各省力谋地方之治安，外交有方，法律不赦，此第二步也。

教育得以普及，少年以力学为荣，生计得以扩张，人民无失业之患，财政不求借债，军器不藉乎外来，言论不事夸张，而自有价值，人才不相嫉妒而各放光华，些第三步也。

三者能如愿，中国之民国固矣。由斯以进，富强幸福不难也。”但是，国会开幕后，没有满足人民的愿望，首先没能“公平以举议长”。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为另一方，就如何选举两院正、副议长问题上，展开激烈争斗。国民党为防止敌党分化、拉拢国民党的议员，预防党员投机取巧，主张记名投票，而共和、民主、统一 3 党则反对记名投票，经过多次预备会议，双方仍争持不下。一直闹了半个月，才商定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案。

## 第三十九章 北军南犯

4 月 25 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援引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参议员张继、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

共和、民主、统一 3 党，一看采用记名投票，国民党得了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席位，便在众议院选举问题上，坚决主张采用无记名投票。而国民党议员则坚持记名投票的主张。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后决定采用投票表决来确定选举正副议长是否用记名方式。

结果通过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众议院正副议长。

国民党在众议院中的议员，也同在参议院一样，居于多数地位。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 3 党的拉拢、分化，一些国民党议员纷纷退出国民党，转入共和、民主、统一 3 党，另有些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党。

4 月 26 日，众议院用无记名投票选举议长，民主党议员汤化龙获 272 票；国民党议长候选人吴景濂获 266 票。汤化龙虽然比吴景濂多 6 票，但未超过参加投票人的半数，依选举规则，应由 2 人决选确定。后经二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吴景濂，当选为议长。随后进行副议长选举，共和党陈国祥

当选。这样国民党在众议院正副议长的选举中，都失败了。

从此之后，国会两院内部，国民党议员与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环绕着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问题，呼应着院外国民党同袁派及拥袁派势力斗争，彼此施展种种手段，展开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在制定宪法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须先得参议院许可，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无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对于内阁，国民党议员主张组织纯粹政党内阁，只有众议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阁员；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阁员应当由总统亲自举任，不限众议院议员和政党；在大借款问题上，国民党议员认为，政府与五国银行团自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前参议院通过，是为违法，当然无效；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那彦图、汤化龙、籍忠寅、张伯烈、郑万瞻、李国珍等 44 人，则通电话说：

此项借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已通过之件，惟议决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以宋案证据发表，主使竟是政府，国会当根据约法提出弹劾，使袁、赵解职，由国民党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的审判；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召开 3 党议员会议，议决“对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当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围，如设特别法庭之类，则不能不反对。”由于两党议员（共和、民主、统一 3 党联合成立进步党）的尖锐对立，在国会的两院会议上，不是一党议员有意中途退席，进步党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决议，就是两党议员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议会：“中国议会有三特例：一曰叫骂，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殴人掷物未闻焉。今已开其例，日后必有以杀人掳人闻者，是亦可谓捣乱之极轨矣。”袁世凯见国民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恐正式总统不能到手，焦思苦虑，便有计划大规模收买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从向五国银行借款中拿出 300 万元，来收买议员。被收买的议员，可得到 5000 至 8000 元赃款，必需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主要是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去昼夜奔走。那国民党人、众议院议员邹鲁，从广州来到北京后，便被陆建章所派之人刘某、陈某纠缠，他们对邹鲁说：“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 40 万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们来致意先生。”遭邹鲁严词拒绝后，陆建章仍不死心，他亲自请邹鲁吃饭，并对邹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邹鲁再次拒绝收买。但已有不少国民党议员被收买，脱离国民党另入进步党，或另组新党。孙中山、黄兴对此十分焦急，力图加以挽救，但却无济于事。

孙中山、黄兴得知国民党籍议员郭人漳将脱党另组大公俱乐部时，致电劝阻说：“闻公欲脱离本党，自组政团，文等以党派愈多，相争愈烈，国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犹不足以尽维持之责。我公顾全大局，尽力本党，素所敬佩，他人出此，公尤当急止之，万不可发自公致兆分裂之势。十年肝胆，万里心期，风雨晦明，思急弥切，希即复交，以慰远怀。”郭人漳不理。湖南国民党人便采取行动，查抄郭人漳的家。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 will 共和、民主、统一 3 党合并为进步党。为尽快实

现合并，袁世凯在宣布暂不入党的同时，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 160 万元作为经费，由袁派统一党出面策划 3 党联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启超入京，商讨合党事宜。

梁启超进京后，便积极活动，他同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大体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 3 党党员恳亲会。梁启超还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名义，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并以《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为题，作了长达 3 小时的演说，阐释了共和党成立以来，为什么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凯政府而反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立场。

梁启超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在 3 党恳亲会上发表演讲说：“3 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为 3 党计，为敌党计，皆宜 3 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轨道。”汤化龙、孙武、王赓等在会上，一致认为 3 党的精神本来一致，他们强调为取得议院中的多数，彼此务必相互谅解，容忍与牺牲各方面的小意见与小问题，以取得合并的成功。会后，3 党正式签订合并为进步党的协议书。3 党又联合发出通电，通告各党决定合并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并事宜。

5 月 11 日，3 党职员及议员 400 余人召开会议，讨论党章和召开成立大会等诸问题。梁启超主持会议，丁世峰、孙洪伊逐条宣读党章。新党定名为进步党，采取理事制，设理事长 1 人，理事 10 人，下设政务、党务 2 部，政务部专主调查政况，进行研究，下分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等 8 科。党务部专主执行党中一切事务，下分文牘、会计、交际、地方、庶务 5 科。每部各设部长 1 人，副部长 2 人，各科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2 人，干事若干人。

党章讨论完毕后，梁启超提议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全体赞成，其他理事等到召开成立大会时再行推举。

梁启超再次发表演说，他说道：“以时事之需要，议会之现状，国家之存亡，其不能不仰赖进步党之出现。进步党之成否即在诸君，国家之存亡亦即在诸君，千钧一发，慎勿功败垂成也。”5 月 29 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在京全体党员大会，1000 余人到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

孙武担任会议主席，丁世峰报告筹备情况，刘崇佑报告党章及宣言书，陈国祥报告所选定的理事长和理事名单。随后孙武代表理事长黎元洪讲话，梁启超、汤化龙、王印川等相继在会上讲话。

进步党的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 9 人，另外，由理事长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阿穆尔灵圭、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阁、程德全、朱瑞、庄蕴宽、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陈国祥、汪大燮、徐勤等 20 余人，参议 100 余人。政务部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党务部部长丁世峰、副部长孙洪伊、胡汝麟。

进步党包含着袁世凯实力派、从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宪派 3 种力量。黎元洪虽挂名为理事长，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孙武在 3 党合并过程中虽代表黎元洪出面活动，但是进步党成立后并未主持党务。那彦图、伍廷芳并未参预党事；代表袁派势力的统一党党魁王揖唐、王印川，在并入进步党后，势力单薄，事事消极，不预党事。

在理事中实际控制党权的是原立宪派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蒲殿

俊。在政务、党务 2 部成员中，骨干力量都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因此进步党名为 3 党合并而成，实际上领导和骨干力量是原立宪派人。进步党成立的目的，是组成大党，以便在国会中战败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

黎元洪为进步党理事长，他早已踏上袁世凯的反革命战车。黎元洪虽未参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密谋，但黎似有预闻。当时曾有人以湖北为首义之区，进言黎元洪对宋案应有严正表示，而黎似预知此事为袁世凯所指使，暗中自然称意，为了应付湖北革命党人，才去电上海陈其美探询情形。为敷衍一番，又去电袁世凯，口是心非地要求“严拿正犯，务得主名”。

程德全发出通电公布宋案证据后，黎元洪当即致电袁世凯及各省，委婉地敬诫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要其“老成谋国”，劝其“勿狃于成见，掉以轻心”，“勿激意气以相残”；又意语双关地劝慰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强调“承办宋案尤应法庭详求真状”袁世凯接读黎元洪此电，颇感欣慰，复电说：“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无拟。”黎元洪又于 5 月 4 日、8 日、14 日、30 日、6 月 1 日连续发表通电，歪曲宋案真相，公然对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证表示怀疑，无端为袁世凯政府辩护，说什么“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桂馨、洪述祖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他颠倒黑白地指责揭露宋案真相的人们是：“前者宣布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犹窃律其非，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电，牵入政治，摇动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黎元洪诬蔑各阶层人士对刺杀宋教仁的声讨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摇动，谣琢逢起”的混乱政治局面，别有用心地劝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说为“巩固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也就是说宁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黎元洪对袁世凯为发动内战、武力统一全国而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债之“六大危害”说。

黎元洪唯恐袁世凯因宋案和大借款案而不能当选，又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他在电文中说：“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非举膺继任，不足以奠危局，拨逆乱。”他还向袁世凯发出效忠电说：“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以之。……俾元洪锋镝余生，获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总统之所赐也。

披肝沥胆，以此为盟。”黎元洪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袁世凯罪行之际，惟恐武汉出现反袁活动。他在 5 月 14 日发出布告：“谓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须由国会解决，毋庸平民聚讼。”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罪行。各省各县纷纷成立分会或支会。武汉各界亦召开会议，拟成立公民大会支会，黎元洪侦悉后，立即派军警干涉，未得成立。

章太炎此时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章太炎于 1912 年底曾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

宋教仁被暗杀后，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开始觉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凯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谬，于 1913 年 4 月 17 日弃官从长春赶回上海，就“宋案”发生后的形势，与孙中山、黄兴商讨反袁问题。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孙、黄等极表欢迎。对于宋案章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意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而主张“政治解决”，

即通过充分揭露袁世凯的种种劣迹与罪行，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出大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袁世凯的统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异想天开地于 5 月上旬来到武昌，谒见黎元洪，企图动员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决心与袁左提右挈，他一见到章太炎，便知章要说服他反对袁世凯，即先表明极端拥护项城之意见，使章氏说词不得出。稍后，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等相继到鄂，他们拉上章太炎一起，劝黎元洪处处以国家人民为重，不要相信袁世凯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则抱定非袁则乱之宗旨，始终不为稍动，反而劝诸人助袁，以固国基。谈话间，章太炎与黎元洪激烈辩论，终无结果，章以三国中人物讥黎曰：“吾尝论慰亭为人似袁本初，今观公未免类刘表。”由于岑、李、二章与黎晤谈时，于总统之位，极力劝进，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凯面前挑拨离间，连忙将与他们谈话的详细情形，电告袁世凯。“申明如选举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还公开接见新闻记者，更明确地将自己拥袁、反革命的态度公诸报端。他表示：“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黎元洪为了送走章太炎，反过来要章去北京劝袁世凯，并说：“苟其人可谏，安用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对岑春煊等，黎则示意：“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去。

黎元洪如此频频地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一则说明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则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凯的淫威。袁世凯何等样人？连宋教仁都敢杀害，岂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驰！黎元洪知道，袁世凯对他不无怀疑，在 5 月 12 日，袁世凯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名为查察要事，实为侦察江西、安徽 2 省举动，监视黎元洪行止。黎元洪处处赔尽小心，一再表白心迹。

黎元洪所占地盘，有举足轻重，操纵南北之势。湖北军队虽多次裁减，但仍有 4 个师，约 6 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 6 万余人的军队如果能同南方国民党控制的几省兵力联合起来，对抗北洋军，其结果便殊难逆料了。再者，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汉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应假道，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

黎元洪完全投向袁世凯，他不但答应袁世凯假道武汉，而且“披肝沥血”，赌咒发愿，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在致袁的电报中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撑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袁世凯见电大喜，立即回电：“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这两封电报，稳定了武昌和北京的关系，给袁世凯放胆去打内战的决心。

要打内战，关键是北兵南进。北兵早在 1912 年秋天应黎元洪之邀，已开始陆续进入湖北，但数量尚小。1913 年 4 月 4 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鄂省不靖，请饬李钝派步兵 1 团到汉，以资镇慑。”5 月中旬以后，北洋军大批南下，至 5 月下旬，驻鄂北军已达 2 万余人。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此为基地进击江西、湖南，又可协助黎元洪镇慑湖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 30 里处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长江下游之咽喉，为武昌之门户，由陆军部及鄂省合建；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部办，其库存枪炮弹药除鄂省必须用者留备外，其余均运北方，供北洋军使用。

有人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黎元洪严词驳斥。此刻派人请见者皆行谢绝。

北军驻鄂后，无恶不作，霸占房屋，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骚扰闾阎，欺行霸市等罪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军虽在黎元洪



严密控制之下，然亦有南北观念，不少军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愤。甚至连黎元洪的心腹大将、第1师师长黎本唐也气愤不过，晋谒黎元洪，反对北兵南进，以致言语冲突、触黎之怒，报告袁世凯，免去黎本唐师长职务。

袁世凯出资促共和、民主、统一 3 党联合为进步党。担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被推举为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凯肯于出资促 3 党联合之用心，所以被选为理事长后，立即复电接受，并表示：“执鞭相从，实所深愿。” 3 党合并过程中，屡起纷争，黎元洪千方百计调和党务，目的是保住袁世凯的御用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

袁世凯收买分裂了国民党，对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又来个杀人灭口，矢口否认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胆对付不屈服的国民党人。

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近阅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各运兵赴宁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观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回殊。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听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

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此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

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秘密南下，第一军左司令李纯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师和第2师的1个混成旅，沿京汉铁路南下，已抵江西九江；第二军军长冯国璋率警卫军1个旅、直隶第1混成旅、外加两个旅1个团和张勋的辫子军，沿岸浦铁路南下，已逼近南京。海军方面也由郑汝成和汤芎铭率“应瑞”、“肇和”、“飞鹰”等兵舰沿长江南下，直插吴淞。

当时海军共有各种舰艇40艘，有22艘驻泊上海，其余18艘分泊于烟台与长江沿岸各埠。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同情革命，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以检阅名义，调各舰到烟台集中，并令参事挟资30万南下运动各司令听袁调遣。海军曾主动与革命党人联系，表示愿意宣布独立，孙中山极为支持，但黄兴、陈其美等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海军先发之计，结果海军在袁世凯策动下，于5月中旬北上。至此海军就为袁世凯所控制。

袁世凯在中南海海宴堂接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防害敌军之集中。”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

6月22日，袁世凯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

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寒，丝毫不滥。

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

当章太炎到京探听情况时，他对章说：“吾以清廷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袁世凯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和“和平天使”。他同弥勒有这么一段对话：弥勒问：“你主张何种政体？”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凯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袁笑答：“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袁世凯欺骗性的宣传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就连那博学的政活动家章太炎也确信袁世凯“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

“宋案”罪证公布和袁世凯违法大借款，使革命党人的反袁情绪更加激昂，他们当中的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国会选举后，宁调元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朱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广东都督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他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但军权在陈炯明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为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世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

皖督柏文蔚和赣督李烈钧积极备战。临淮关 1 旅和安庆省城军队，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

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何海鸣、张尧卿、韩恢、尹仲材、王宪章筹组铁血监视团，举何海鸣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党人纷纷致电本省都督与省议会，要求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系，宣布独立。湖南籍革命党人张通典、周可均、曾继梧、陆鸿逵、章勤士、宁调元、张孝准等，要求谭延闿拒绝承认大借款，驱逐在湖南境内所有袁世凯派遣的官吏；张尧卿、吴作霖、刘天猛、丁洪海、颜炳元、葛天民、熊仁等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浙江省的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陆惠生、张人杰等，要求浙江都督朱瑞拒绝承认违法借款，宣布与临时政府断绝关系，并

使各银行团知难而退；丁匡一、韩一飞、周维新、汪铁民等要求立即宣告独立，与万恶之临时政府断绝关系，为各省倡。国民党江西支部在5月2日发表通电主张各省协电国会，提出弹劾书，勒令袁世凯解职投案，否则，以武力为后盾，请各省联合组织护国军并特别国会解决一切。并说：“同人眷念国基，眷怀前路，愿糜身骨，共讨叛奴。”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

## 第四十章 广东内耗

革命党人起兵讨袁，那拥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他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但若靠广东一隅讨袁也不是长久之计。

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本讨袁坚决，只是受到陈炯明等人的制约，才持消极态度。

胡汉民、陈炯明入主广州，曾共同致力于广东军政府的建设。胡汉民是孙中山得力的助手，他长期流亡海外或香港，在广东商绅中影响不大，他又是一介书生，手中无一兵一卒，很需要实力派人物作后盾。而陈炯明在广东声誉鹊起，又是握有重兵的“党中同志”，其地位足以支撑艰巨。因此，对于当时的胡汉民来说，陈炯明是不可缺少的帮手。就陈炯明来说，他虽有一定声望和实力，但毕竟加入革命党不久，资历甚浅，要在革命阵营中营造自己的地盘，就必须凭借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这面旗帜，所以陈炯明对胡汉民也只能是支持和迁就。且胡汉民曾解饷10万，以济陈军。胡、陈入主广东时，他们之间是“同”多“异”少，“同”著“异”伏。在新生的广东军政府中，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廖仲恺、陈少白、蒋尊簋等人基本控制了财政、外交、军政各部；朱执信、胡毅生、姚雨平等，则是枢密处的主宰者。因此，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的大部分实权。

胡汉民、陈炯明携手在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法令，没收了满清官吏和反抗军政府之人的家产。广州和平光复时，旧军队并没有解除武装，龙济光军12营、李准军6营降卒，都原封不动地驻扎在广州城内；驻扎城内的各路民军，没有来得及进行整顿，广州城内军队林立，各不相属，以致司令遍地，政出多门。

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起了一些镇慑作用，但革命秩序一时尚未建立。

胡、陈为稳定局势，定计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对于陈炯明的循军军官钟鼎基、王肇基等委以重任，使军政府有军事实力对付龙济光部和其他旧军队。对民军逐步进行整顿，委任威望素著的黑旗军首领、原台湾“民主大将军”刘永福为民团总长，同盟会员何克夫副之，总摄各路民军。又把民军领袖们组成“广东军团协会”，作为水陆51军的自律团体，直隶于军政府，以陈炯明为会长，周之贞为副会长，高剑父、刘师复、李栖霞为干事员。

胡汉民竭力笼住李准和龙济光，使其不至危害新生革命政权。胡汉民

刚上任，就照会李准、龙济光等，饬令他们照旧统辖所部，所有城内衙门局所，均请妥为防护，共保治安，并表示饷项由军政府发给。胡、陈对李准、龙济光部厚发军饷，每人的军饷是民军的7倍。胡、陈的目的主要是在于缓和旧军队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采用收买办法稳住“济军”，使他们不致轻举妄动。待正式陆军组编完毕，民军实力已压过济军时，便把济军调往远离广州的高廉雷琼地区去。但是，胡汉民等未能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整编和彻底改造，使龙济光得以保存旧部，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鹰犬。

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坚邀胡汉民立即随他去南京。胡汉民分别致函陈炯明、朱执信等，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并饬令各军服从陈炯明。已筹备就绪的广东临时省议会致函陈炯明，推举陈正式接任都督，陈辞不受，向省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陈自己仅允暂任代理都督。但汪精卫对所举，以“功成身退”为词，辞不就任。陈辞汪不就，孙中山亲自出面，致电陈炯明，委任陈为广东都督；省议会也再次推陈为都督，但陈始终不接受。孙中山只好委任汪精卫督粤，在汪未到任前，由陈炯明代理，并申令：不可更辞，各界亦不可再举他人。

醉心于利禄的陈炯明推三阻四，辞不就都督职，有多种原因：其一，武昌起义不久，部分革命党以“功成身退”来自鸣清高，汪精卫几辞都督、刘师复高唱“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等。陈炯明受这些处世哲学和沽名钓誉的思想影响，且与这些人交往颇密，亦很重视个人声望；其二，广东时局混乱，棘手问题很多，而当时北伐声浪很高，陈炯明不愿坐守广东，而声言“素志北伐”。他请为北伐军总司令，以所部循军及他部改编，并把姚雨平已编定之北伐军合并为1军，乘机掌握军队，尔后地位、声誉将必更有凭借。但姚雨平不愿受陈节制，胡汉民与朱执信商量，北伐必须立即进行，而广东内部亦尚需陈炯明留粤整顿办理，所以，胡汉民等令姚雨平北伐，陈炯明虽未如愿，但他的循军却因编入北伐军序列而跻身于“政府军”行列（未出发北伐），后来裁撤民军时，这支军队也得以保留。广东北伐军由姚雨平率领，于广州誓师出发，后转战江北，为巩固南京临时政府作出了贡献；其三，孙中山由于同胡汉民、汪精卫共事时间长，了解比较多，因倚畀也比较重。广东是他的故乡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地，在择人任事的问题上也特别关注和慎重，所以，他主要寄望于胡汉民、汪精卫。只是因胡、汪或因北上需人，或因固辞不就，才再三拉陈炯明出来，而在陈辞不受之时，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党人还先后想捧出冯自由、朱执信、孙眉、何克夫、邓泽如、胡毅生等人供粤人抉择。广东的革命党人才济济，陈炯明不过是个乘时而起的革命后起人物，还不能唯一独尊。陈炯明对于这种局面不能无睹。他的固辞，实际上是谋求进一步掌握实力，待价而估，以退为进，伺机再起。

在1911年12月22日至1912年4月25日，陈炯明为广东代理都督，全权督理广东120余天。

南北和议告成，北伐中止。陈炯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改为广东陆军司令部，已经编成但没有出发的北伐部队，全部改为广东正式陆军。陆军数目，本来须设3师，然以经费无出，仅成立2师1旅。改编后的广东陆军，以陈炯明的循军为主，以反正新军为辅，这样，大多数官兵，都是陈炯明的老部下，如师长钟鼎基、旅长王肇基、叶举、团长洪兆麟等。这些军队名义上隶属于军政府，实际上带有军队私属的色彩，成为陈炯明在广东营建统治的凭

藉力量。

陈炯明在裁撤民军方面，错误地采用残暴镇压手段。广东民军对广东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广东光复后，云集在广州的民军 51 股计有 15 万人，这对反革命势力是一支强大的镇慑力量；但由于民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些是铤而走险的绿林，有些是游兵散勇转投过来，因而他们既具有小农的分散性，又具有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

虽然大部分民军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沉迷于嫖、赌、饮、吹的堕落腐化生活。胡汉民、陈炯明起初利用民军的声势，来对付清朝降军和防营；并成立“军团协会”来约束民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陈炯明以他的循军为主体的正式陆军组编工作完成后，不再需要民军。首任民团正副总长刘永福、何克夫治事一月，显得软弱无力；换上老同盟会员黄世仲，黄颇能操纵王和顺、关仁甫之属，而遭陈炯明之深忌。同时，民军首领居功骄傲，目无军政府，同大权在握、个人野心渐次萌发的陈炯明尖锐对立。一部分民军以武力要挟省议会，令举孙眉为都督，明显地流露出对代都督陈炯明的不信任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陈炯明为了排除异己力量，采取了残暴镇压手段。首当其冲的是石锦泉和他的“石字营”。

石锦泉绰号“石鬼仔”，广东独立前就倾向革命，为革命党人潜运武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竖起义旗，成为促进广东独立的一支武装，因此，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然而，石锦泉以桀骜不驯著称；入城后，更颇为骄恣，他曾手提土制炸弹，闯入都督府，气势汹汹，要胡汉民立即发饷。石本人还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多宝街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对于石锦泉这样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规劝和惩戒的。

但是，陈炯明却扩大了事态。虎门炮台截留了一批军械，这批军械是胡汉民主持军政府期间代民军购买的。陈炯明本来有裁撤民军的意图。他做了代理都督，当然不愿意这批军械落入民军之手，而想用来装备正式陆军。民军首领很不服气，石锦泉尤其按捺不住，竟直奔虎门，私自起用军械。这正好为陈炯明提供了解散“石字营”的借口。陈炯明接到报告后，马上通知魏邦平，派兵追赶石锦泉，将石拿获，未经审讯，即予枪决，并随即将“石字营”全部遣散。在布告中，给石锦泉加了许多罪名，如“屡抗命令”、“扰害治安，商民共愤”、“擅行缴械抢物，并敢隐匿实数，延抗不缴”等。

石锦泉事件发生后，其他民军首领已预测到陈炯明是杀鸡儆猴，尤其是王和顺。在 51 支民军中，王和顺的惠军实力最雄厚，对陈炯明的威胁最大。为了对付陈炯明的武力压迫，求得自存，王和顺与关仁甫的“仁字军”、杨万夫的“协字军”结成盟军，约定互相支援。

陈炯明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以重兵对王和顺的“惠军”形成包围，然后派出巡查队前往惠军驻扎的太平沙一带巡逻，故意寻衅闹事，挑起事端，惠军及其盟军“仁字军”、“协字军”被迫自卫，陈炯明乘机宣布惠、仁、协军“变叛”，派出整编正式陆军向他们猛烈进攻。在广州的惠、仁、协军失败，王和顺出走，这 3 支民军被缴械遣散。随后，陈炯明又先后派出军队攻占黄埔炮台、虎门，惠军被全部消灭。陈炯明在进攻民军时，竟调动了龙济光军和降将吴祥达的旧巡防营。

在镇压惠、仁、协军的过程中，陆兰清，李福林等民军首领、军团协会、演说会、各善堂负责人曾经到交火双方进行调解，但陈炯明既已得手，凯肯善罢干休。他召集各界代表会议，混淆黑白，硬说此举是出于万不得已，

进攻惠军是“政府命令”，并非内讧，要求各界不要出面调停。他又发出布告，把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和顺，要求“各军民人等，不可误信谣言，致淆乱实情，动摇心志”。

慑于陈炯明的声势，其他民军纷纷自请遣散。被裁民军达 9 万余人，只有李福林的 6 个营，因朱执信的斡旋，才得以保留。

陈炯明还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他派出冯国威的“威字营”围剿连阳的“复汉义军”。“复汉义军”因寡不敌众，尽行逃散；冯军乘胜追击，将民房烧毁，一村有民军一人，即指全村为匪。陈炯明又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 2800 人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

吴祥达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将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 3 人当场枪杀。惨案发生后，很多同盟会员为许雪秋等通电鸣冤，要求陈炯明惩办吴祥达。陈炯明自然不闻不问，吴祥达因而更加嚣张，又派人捕杀了光复大埔的有功人物、三合会首领温阿拱。

民军被裁撤后，遭遇极其悲惨。多数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又得不到陈炯明政府的妥善安置，于是再度沦为流民，或者混迹绿林、四处打家劫舍。后来这些人又流落入军阀队伍。

尽管民军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流是好的。一些民军将领还是革命元老，如王和顺、许雪秋等。王和顺是 1905 年广西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亡命香港，加入同盟会，筹划和参与反清起义，他领导的“惠军”即使在横遭陈炯明镇压时，还是举动文明，绝无乘机抢掠情事。许雪秋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 1907 年的黄冈起义。他们都是革命功臣而不是革命对立面，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严重损害了新政权的形象，使群众脱离新政权。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出走港澳后，组织“扶正同盟会”，他们推举孙眉为首领，并派人潜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只是由于孙中山及时制止，孙眉才拒绝加入，扶正同盟会才逐渐解体。但王和顺等人由于对陈炯明结怨，转而对革命丧失信心，投到袁世凯的怀抱，成了袁的走卒。

陈炯明镇压了民军、残杀同志，激起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有些人在都督府会议上公开为王和顺辩诬，大声疾呼：“今日之乱象，不是王和顺之罪过”，“比王和顺更坏而盘踞要津而无人敢过问者，触目皆是”。但陈炯明这时已控制了军队，有恃无恐，他凭借这支陆军，不仅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以陆军第 1 师出防惠潮嘉一带，以第 2 师出防北江及西江一带，加强对广州以外地区的控制。

镇压民军，又助长了陈炯明的专擅自为，更加露出他排除异己的私心。广东北伐出师时，陈炯明就和姚雨平为争夺北伐军统帅权而生嫌隙。后来姚雨平北伐军为捍卫江淮、巩固南京临时政府屡建功勋，而陈炯明却一反前态，在饷弹接济上诸多掣肘。南北议和达成后，姚雨平与胡汉民商定，拟将军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因陈炯明阻挠而中辍，只好被迫全军就地解散，仅留炮兵 1 营，调回广东。该营回抵广州虎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专擅自为的陈炯明，除了敬畏他的师尊朱执信而外，往往不恤人言，甚至于议会也积不相能。时人称广东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厅长陈景华，都是杀人魔王。二陈曾判决“扶正同盟会” 25 名会员死刑。

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续，抓到人，动辄就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黄世仲和陈听香被杀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黄世仲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青年时代就从事新闻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宣传革命，抨击保皇谬论，勋劳卓著。先后著有《廿载繁华梦》、《大骗》、《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长篇章回小说。因他同民军首领素有联络，所以胡汉民委派他接替刘永福，任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站在公正立场上，在裁撤军队问题上，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反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陈炯明甚为恼恨，派人将黄世仲逮捕，以“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的罪名，将黄枪决。与黄同时遇害的还有军械总局局长香益远，说他“擅将枪械发给民军”。

陈听香是当时报界风云人物，与民军首领交游颇多，所以他主持的陀城、公言两报，经常为民军说话，对王和顺更是多所赞赏。陈听香又很自负，常以民意代表和政府监督人的身份自居，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因而深遭陈炯明之忌。当《公言报》、《陀城独立报》、《国事报》、《人权报》等9家报纸先后刊登了广州燕塘新军“解散”的消息时，陈炯明便借口“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勒令《国事报》停刊，并传讯各报主笔，拘留陈听香和《人权报》主笔陈藻卿。陈听香不服，领衔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指控陈炯明干涉报纸之野蛮举动，“欲借报馆以逞其大威福”。陈炯明更恨之入骨，令法务局以“依附叛军，妨害军政”等罪名，将陈枪决。

黄世仲、陈听香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盟会员潘达徵写信给陈炯明，予以责备。省议会就黄、陈案提出讨论，并向陈炯明提出质询，要求他到议会解释。陈炯明视议员为卖弄狗皮膏的“假洋鬼子”，拒不出席会议，议员们大为不满，作出弹劾陈炯明的决议。陈炯明有军队做后盾，又有广东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给议会的咨文中，否认省议会对都督有“纠治权（即弹劾权）”，省议会力争纠治权，3次咨会陈炯明，但每次都被陈炯明毫不客气地驳回。议员们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控诉。陈炯明则使出杀手锏——辞职。

陈炯明这一着果然奏效。72商会、公安维持会等团体纷纷打电话给袁世凯政府，请求挽留陈炯明，粤省军界及省港商界更“力诋省议会弹劾陈督为非”。袁世凯复电照准，并竭力慰留陈炯明，弹劾案不了了之，陈炯明也就更踌躇满志，予智自雄了。

正当陈炯明春风得意、个人权利欲开始上升之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同胡汉民等一起南下，来到广州。

孙中山同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想把广东改造为“模范省”，主张由胡汉民继续出任都督。这对陈炯明来说，不啻冷水浇头。他既不好公开反对，又不愿屈居胡汉民之下。

权衡再三，只好一走了之。他在都督府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之后，立即出走香港。行前写信给胡汉民，“请”他代行都督职权；又写信给省议会，要求解除职务，回家“省亲”，建议省议会推举孙中山或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并告诫军人服从命令，拥戴新都督。

省议会按照孙中山意图，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表面上看来，都督易人，是在谦让中实现，而实际却出现复杂情况。陈炯明控制的广东陆军，非但不受胡汉民控制，且对胡很不服气，陆军部会议厅召开会议，议决挽留

陈炯明，并派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军部军需司陈竞杰去香港请陈炯明归省任事。港穗商人也拥陈反胡，弄得胡汉民处境十分尴尬。在种种压力下，胡汉民不得不派陈炯明的师尊朱执信到香港请陈炯明归省。

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任军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

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被迫解散了。

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

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

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时，陈炯明竟然一反“扩张党务，吸收人才”的主张，以所谓“军人不党”为借口，严禁部下加入。在陈炯明看来，如果部下入党，身为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胡汉民，必然趁机插手陆军，从而削弱他的势力。

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遭到南方各革命都督的强烈抵制，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军民合治”。陈炯明本应抛却个人权力之争，一致对付袁世凯，但是，他稍后便附和军民分治之说，并在行动上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企图使都督徒具虚名。袁世凯任命他为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也不推辞。这样陈炯明身兼数职，尤其是护军使职，同都督权限不清。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后，遂开府广州，设使署，仍自兼绥靖处督办，一时权倾都督。

袁世凯极力抬高陈炯明，推倒胡汉民，造成胡、陈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渔利。陈炯明亦有倚靠袁世凯来压胡汉民的念头。袁世凯政府的秘书梁士诒是广东人，梁是袁的心腹，称“智囊”。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挑拨胡陈交恶，多次派巨绅江孔殷当说客，竭力劝说陈炯明拥护袁世凯。陈炯明亦派心腹与梁交往。在陈炯明的默许下，梁士诒的亲信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赂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在李兼善的唆使下，《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平城报》等，遇事攻讦胡汉民，使胡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宋案发生后，梁士诒以“亲寿”为名，回到广州，亲自出马部署倒胡。梁贿买了许多粤军将领。

袁世凯于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胡汉民派秘书金章去京，而陈炯明加派官银钱局总理、国民党员邹鲁偕行。袁世凯认为邹鲁与陈炯明同乡同学，又曾同事，一定是陈炯明的心腹，所以对邹鲁很重视。除一般性接见外，还特别约见一次。袁问邹：“以陈代胡如何？”邹当即表示反对，并提议派陈



炯明去库伦处理外蒙独立事件，好把陈炯明调离广东，从而平息胡、陈之争。袁世凯不仅不肯答应，而且加紧进行以陈代胡的阴谋活动。

胡汉民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不习军事，未能掌握军队，性情狭隘，又是秀才造反、书生从政，缺乏足以应付时艰的实际斗争经验，习于纸上谈兵。他同省议会的关系紧张，省议会指控他“厉行军政，蹂躏法政”，甚至派温雄飞等人为代表，去北京控诉胡汉民，商界、报界对胡汉民也是一片嘲讽和叱骂之声。胡汉民原靠孙中山、孙中山已下野。胡汉民处于穷于应付的地位。

胡汉民在艰难的处境下，仍紧跟孙中山，他积极筹划了广东的反袁斗争。1913年5月初，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善后大借款”。他还多次提议扩编广东军队，以适应讨袁需要。在他主持下，广东制造局昼夜不停地赶造枪炮；大批粮食被购进广东，留充军粮之用。

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他和胡汉民一起参加省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胡汉民慷慨陈词，坚主讨袁，而独陈炯明一言不发。胡汉民禁不住问他：“公守口如瓶，外间必以公为否赞者，公宁忍坐视不相助为理耶？”陈无以答。为了加强广东军事力量，以准备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胡汉民多次提议，正式陆军再扩编1个师，以林震为师长。而陈炯明却不肯答应，议遂不行。广东的反袁运动，因而不能及时展开。胡汉民虽有心跟随孙中山，但手中无兵，亦无可奈何，只好一度暂主缓进。

胡汉民在犹豫一阵子后，还是坚持反袁。而陈炯明则不同，袁世凯尚不断赐给他恩典，而袁世凯又势焰方盛，因而态度犹豫，他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犹在，师出恐无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武装讨袁的准备，给袁世凯重金收买粤军将领留下空子。

## 第四十一章 “江西王”斗法

袁世凯在1913年6月14日下令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务，调充所谓“西藏布政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为民政长。如何回答袁世凯这一公开挑战，军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朱执信向胡、陈献策说：“此时欲讨袁必先简选革命之劲旅，今在粤之第1师为钟鼎基，第2师为苏慎初，第1兵中无革命党人，第2师之中虽有而不多。今若新编革命军1师，则第2师当然可互相提携，第1师亦不敢有所变化，此上策也；其次则余辞去一切名义中之职务，专选优秀同志在粤军各军中宣传革命之理论与讨袁之大义，以坚将士讨袁之心，此又一策也。”陈炯明曾高唱“军人不党”，使国民党在大难当头之时，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朱执信所献二策，都有“亡羊补牢”的深意，但陈炯明听不进去，不予采纳。胡汉民则无实权在手，茫然失措，灰心丧气。有人向胡建议，要求袁世凯收回成命，但胡已丧失斗争信心，去志甚坚，终于在6月20日弃职赴港。临行前，他不无沮丧地对陈炯明表示：他到上海后，将与叶夏声等人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

袁世凯以陈炯明取代胡汉民，其用心十分阴险毒辣，不但加剧了胡、陈之争，而且以都督为诱饵，将陈炯明收为己用。如果陈炯明不俯首听命，袁世凯则以龙济光为广东护军使，分割广东军政大权；以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分割民政大权。军政、民政大权旁落他人之手，“都督”也就徒具虚名了，陈炯明在龙济光、陈昭常的牵制之下，无所作为。袁世凯如此煞费苦心，其目的就在于控制陈炯明，进而控制广东全省，斩断国民党的退路。

广东远离全国政治中心，袁世凯对它鞭长莫及，只能实行间接控制。而国民党在广东却有深厚基础，所以广东可以成为武力讨袁的根据地。孙中山等决定武力讨袁，对广东自然特别重视。胡汉民被免职后，孙中山和黄兴力促陈炯明立即就职，保住广东这块地盘，以便据以反袁。但陈炯明始以“内部不一致，兵力还薄弱”为借口，拒绝参与。

孙中山亲自去澳门，约陈炯明在军舰上会面，促陈“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

陈炯明对都督职位早就梦寐以求，但此时接任，却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按照孙中山的意图，实行武力反袁，这就会招致袁世凯的军事镇压；或者不反袁，国民党人必不容他。因此，陈炯明煞费踌躇，举棋不定。

陈炯明举棋不定，引起同志们的疑虑。黄兴从上海一连发给陈炯明 3 个电报，请“接任都督，宣布独立讨袁”；希望他“联合讨袁，切勿再延”；最后一电更愤然指出：“再不接任都督，独立讨袁，党人将不能相谅。”袁世凯也逼着陈炯明表态，他通过他的秘书长梁士诒向陈炯明递交“最后通牒”，胁迫：如果 3 天内不就职，一周之后，将改派龙济光接任。袁世凯的部队已大举南下，江西、安徽、江苏奋起讨袁已如箭在弦上，形势非常迫人。陈炯明至此已别无选择，只好于 7 月 8 日宣布正式就职。

陈炯明不甘心听任袁世凯摆布，让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等人架空自己。他在就职前向袁世凯提出，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就职后，又一次要求袁世凯取消护军使的设置，从而垄断广东兵权。在陈炯明授意下，广东掀起一股拒陈风潮，吓得袁世凯派来的民政长陈昭常不敢南下。陈炯明趁机向袁世凯提出“暂时”兼任广东民政长，以 10 个月为限。袁世凯无奈，只好默认。于是袁世凯利用龙济光、陈昭常架空陈炯明的计划落空。

陈炯明就任都督后，并未下定决心讨袁。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仍然坚持己见：“广东兵力单薄，不能首先发难。”他还致电袁世凯政府，希望调停“北赣两军冲突”，“使赣军晓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铤而走险，贻患大局。”江西李烈钧反袁态度最为坚决。江西军队号称 2 师 1 旅。5 月中旬，当袁世凯的北洋军第 6 师进驻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随时准备向江西进攻时，李烈钧毫不示弱，立即在湖口、九江沿长江一线加强战备，将所属第 1 师、第 2 师及炮兵团、护卫军尽数开往九江、湖口、马当、关城、德安、沙河、江北瑞昌、武穴等处，沿长江布防，准备随时迎击袁军南犯。并断然拒绝袁世凯通过黎元洪要他“洁身引退，举贤自代”的劝告。李烈钧的态度虽很坚定，但江西 1 省毕竟兵力单薄，在缺乏其他各省配合的情况下，李的处境不免孤立。

李烈钧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是在江西民政长问题引起的。李烈钧是最早坚决反对“军民分治”的，自然被袁世凯视作眼中钉。他更针对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提出“地方集权”的口号。李烈钧的“地方集权”得到国

民党人的支持，国民党人马君武称李为本党主张的第一贤豪。袁世凯更加愤恨李烈钧。

共和党曾拉拢李烈钧入党，举李为共和党江西支部长，李辞不就，引起共和党人不满。后来共和党人在江西活动，同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府不断发生矛盾。李烈钧为了加强在江西的政权建设，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实行了革命的专政。诸如在禁烟、国民捐和筹饷等问题上，都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当地豪绅。这更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把他称为“江西王”，并从各方面帮助袁世凯铲除李烈钧。

1912年12月10日，在袁世凯指使下，由原江西第3旅旅长余鹤松在南昌发动兵变。余原为李烈钧的同学，和李关系甚好，由于李将余部编入其他军队，委余为省府顾问，余心不愿，遂跑到北京谒袁，辞令之间，对李颇露不满。袁知可利用，遂给以咨议名义，月支300元叫他到赣便宜行事，只要能够倒李，就任他为江西都督。于是，余返回南昌运动旧部，策动兵变。

在兵变发生前，李烈钧曾考虑缓和他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推荐前清候补道、署理江西按察使汪瑞闳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任前清武备学堂总监，与李烈钧有师生之谊。李派人同汪联系，汪表示同意。但这本是李的一种考虑，并未正式提出。

兵变发生后，李烈钧迫于形势，致电袁世凯，对兵变引咎自责，又在都督府会议上决定实行军民分治，并向袁世凯推汪瑞闳为江西民政长。

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报刚刚发出4个小时，就接到了袁世凯发布任命汪瑞闳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这种怪现象不能不引起李烈钧的怀疑。他本来是反对军民分治最积极的人，只是由于兵变的压力，才不得已把不久前设想让汪瑞闳出任民政长一事正式提出。

袁世凯这么异常任命汪瑞闳为民政长，袁、汪是否勾结？李本打算给汪以民政长虚职，如果袁、汪勾结起来，对李十分不利。

实际情况是：汪认为李既叫他任省长，江西方面已不成问题。惟闻袁和李极不睦，专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当，岂不更好。遂进京谒袁，述李荐他为省长固然好，但甚愿谓大总统径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这不是表示中国更统一么！

袁见汪主动上门，正可借他来牵制李，所以在李请简汪任民政长的电报后，立即给予任命。这时，李烈钧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但事已无可奈何，只好暗中布置抵制。

在李烈钧策动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历数汪瑞闳在前清时的种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国民党江西支部则以“省长简任须经民选”等理由，要求袁将简任民政长之成命收回。

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通令声称：“民政长一职由国家设置，汪瑞闳到任后能否任职，国家自有法令，功过原无所逃，该协会等种种指陈，无论虚实，既有溯及既往之谈，尤属党同伐异之见。至于所称誓不承认一语，查任官依照约法并无须某会承认之条，似此未免弃髦约法。”袁饬李烈钧“传知该协会等，嗣后务遵法律，各守范围，勿得自滋纷扰。”汪瑞闳由于有袁世凯撑腰，有恃无恐，便乘船到南昌上任，受到共和党人和当时共和党人占优势的江西省议会的欢迎。李烈钧表面上也表示欢迎，隆重接待，并在都督府政务会议上，表示将贯彻军民分治，但暗中则积极布置驱汪。

南昌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有人提出武力驱汪，也有人主张

“举代表告汪，速离省城，否则人民激于义愤而有暴动，我两界难负保护之责。”汪瑞闳即逃离行馆，于第二天函告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李烈钧表面派人挽留，汪在当天下午乘船离南昌，经九江，前往武汉。

袁世凯电准给汪病假 20 天，责令李烈钧从速筹划分治事宜，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以专责成而清权限，毋再延缓。李烈钧复电，表示将接受军民分治，但又说：“烈钧承乏江右，本由省议会所公举，大总统所任命，重以乡梓义务，未敢告劳。现在正式议会形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一俟正式国会、省议会成立后，即当呈请大总统分别简任贤能，以期共臻郅治。”他在这份电报中，实际上拒绝让汪瑞闳返任。

汪瑞闳被逐后，共和党人开展了更加猛烈的反对李烈钧的活动。共和党人派人在浔游说各界，逐日集议主张推翻李督，派谢熊赴汉联络汪瑞闳同谋进行。共和党人发动江西各团体以“李烈钧违法殃民”联合赴京请愿，并公布李烈钧的 14 条“罪状”。是时谣言四起，人心恐慌。舆论哄传有中央派兵送民政长重行至赣之说，又有派张勋或岑春煊为镇守使之说，形势颇为紧张。

此时恰好李烈钧从日本先前订购的步枪 700 支、子弹 300 万发，由英国商船运抵九江。

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命令参谋部和陆军部以这批军火未经陆军部批准为由，密令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克安扣留这批军火后，又害怕李烈钧以强硬手段进行报复，便致电陈宦、段祺瑞，要求调张勋部和海军兵舰到九江一带接济。不久，就传出从下游来军舰 8 艘停泊九江，2 艘停泊湖口，张怀芝将来江西镇抚的消息。

李烈钧通电陆、参二部，说明这批军火是经过合法手续的，要求发还。段祺瑞复电，诈称“此项枪弹已分给各水兵师军队”，拒绝李的要求。李当即通电再次坚决要求发还。

黎元洪的暗探程守箴、邓汉祥将在南昌了解的情况报告给黎，黎便向陆军部密报：“赣省刻下群情愤激，对于中央颇起恶感的原因，在于李督以中央之防赣省，几如寇敌，人情觉不能忍。”他主张陆军部将所扣军火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区区军火，亦何济事！窃视李督似非甘冒大不韪者。”至于所传中央有派张勋或岑春煊任江西镇抚之说，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

海军楚谦舰奉命提取枪械，赣军蔡锐霆部屯扎岸上，声言如敢装运，立即开炮还击。

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此时，黎元洪发的调解赣事通电到达，戈克安派人登舰请楚谦舰长王克熊上岸协商，由于王克熊电陆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结。”李烈钧的强硬立场，使袁世凯终于不敢强行提取这批军火。

黎元洪提出的调解条件是：发还军火，以平赣人之疑虑；迎回汪民政长，惩办生事之人，以重政府之威信，黎元洪想以政府放行军械的微小让步，来换取李烈钧对汪瑞闳回任民政长的同意，这自然对袁有利。

李烈钧通电拒绝了黎元洪所提出的撤兵、迎汪、惩凶三个条件，理由

是：“湖口设局征兵，属永久计划，汪公未来之前。即已实行；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确非少数人民意思；汪公当日去赣，并无个人胁迫之行为，即无从根究。”李烈钧愤然表示：“烈钧奔走国事将近 10 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见容于满清者，今共和告成，转不能见信于民国政府。”黎元洪调解未成，袁世凯不再让步，他发出通电，坚持“由都督、议会公派代表迎汪民政长莅职”，并强硬表示：“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在，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李烈钧也不退让，他多方布置，志极坚定。

正当李烈钧同袁世凯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江西省共和党籍参议员郭同等串通民主党人，用江西临时省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 5 团体的名义，在汉口密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共和党人梅光远也以江西公会名义，由上海致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威望素著大员为镇抚使，偕民政长莅省慰众庶之渴怀，宣中央之威信，正纲纪而戢奸谋。”郭同等在汉口用 5 团体名义发给袁世凯的那份要求武力解决江西问题的密电，被李烈钧派驻北京的俞应麓所探获，乃撮抄原电告李烈钧，请其饬各机关速电中央解释。于是，李烈钧乃将俞电油印数函分发省议会及各公团，附以最猛厉之辞，要求各团体自行再电中央取消前电。于是，江西各团体纷纷通电指责郭同的捏名窃发的行为。江西凡有血气者，闻请派镇抚使带兵来赣之电，莫不怒发冲冠。而商务总会、教育总会各公团被盗名尤属无辜受屈，经详细调查，确系郭同所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江西教育总会、商船总会、工商勇进会、铁道协会、国民会、社会党等 10 余团体，亦通电声明：“此次赣省反对汪瑞闾实出于各界公愤，并非一二怀私报怨者之所为，且非以中央简民政长而反对，实反对汪瑞闾不能任民政长，同人等宁可牺牲性命而决不能听汪瑞闾贻害江西。”南昌各团体召开江西公民联合会大会，反对汪瑞闾返赣及中央违法颁布省官制，有数千人参加大会。会议通电各省：“吾赣自不认汪瑞闾为民政长以来，一二怀私挟怨之不肖赣人，如郭同、李国珍、梅光远等，在京沪间散布谣言，构成疑窦，遂致外间腾喧沸之声，内部兆恐慌之象。而陆军部扣留江西军械，海军部派赴九江兵舰之事，亦因之前后发生。同人等窃为此惧。……而又适值临时省会已停，正式省会未立，机关不备，维系无人，爰于本月三号，集会全省各界，各公团并请李都督暨各司司长莅临开联合大会。

当经议决，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除电请袁大总统将江西民政长汪瑞闾成命收回，并祈命陆海军部掷还军械，退去兵舰，暨电请参议院提出质问外，尤不能不环告同胞。……再前月八号，大总统乘参议院休会期中，擅以命令颁布省制，以及各种文武官制，显系出于专制，实有背于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争，则约法几等弁髦，民国将成泡影，履霜坚冰，宜防其渐。伏冀共表同情，感伸公论，以维政体而巩民权。幸甚！”这份通电发出后，政治上拥袁的云、贵、川、桂四省都督，蔡锷、唐继尧、胡景伊、陆荣廷联名发出声讨“阴谋窃割”的通电，其电说：“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割，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缔造方新，岂堪再有破坏？万一见诸事实，则扰乱治安，即为国民公敌。吾辈责任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蹈危亡！”矛头直指李烈钧。

共和党籍参议员郭同、李国珍、陈国祥、籍忠寅等 24 人，在参议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质问书，列举李烈钧武力驱汪、越权调动军队、擅自扩大军队编制、下令征兵、私购军火等 5 大罪状，质问袁世凯政府为什么“任其帝

制自雄，不加追究”。旅居京、沪的江西籍共和党人梅光远、吴宗慈、陈三立、谢远涵等则联名通电，宣告李烈钧“罪状”，“痛陈李烈钧祸赣之实情。”一时，声讨李烈钧之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看到他不仅有共和党、民主党，而且有掌握实际军政权力的西南4省都督的支持，气焰更加嚣张。他阅4都督声讨电，益形愤慨，当即拟一长电，他致4都督及各省长官，表示“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绵力，殄此么魔。”接着，国务院传出大总统以除暴安良为天职的通电，表示“一息尚存，总以除暴安良为天职”，摆出一副即将出兵镇压的架势。

李烈钧面对袁世凯和拥袁势力，坚决进行反击。他用“江西全省公民联合会”名义发出通电，指责袁世凯简放汪瑞闳为民政长，是既无择贤之哲，又无体察民意之诚，不知共和国政府以人民为主。指责旅京、沪的江西绅耆的通电攻讦，是一小撮奸佞僻拗之人贪个人私利置地方于不顾，颠倒黑白，吹毛求疵，适于江西大多数人民公意相反；批评袁世凯扣留军械，派军舰驻扎九江等种种不当行为。李烈钧在军事上则加强吴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带的布置，严密监视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长江中的军舰对峙，形势日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柏文蔚、朱瑞、黄兴、谭延闳等纷纷出面调解，主张和平解决。这时袁世凯鉴于正值召开正式国会，选举大总统的前夕，而且还没有得到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发动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委任隶籍国民党并同南方军人有关系的王芝祥为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准备调李烈钧入京。但王芝祥立即识破袁世凯挑动国民党人内讧的阴谋，便以“不宜纯用手段，反启纷争”为由，拒绝上任。袁只得改派王芝祥为“查办使”，南下查办江西事件。

王芝祥离京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共和党人认为王是国民党人，必然偏向李烈钧，群起而反之。袁世凯看到共和党对王芝祥赴赣有所误会，赶忙电告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说：“铁珊（王芝祥字）此行不啻代表鄙人与赣中人士握手，掬诚相见，该省人民或不知中央之用意，不免又生误会，请贵处速派人员，前往开示此意，以释赣人之疑虑。”共和党人反对王芝祥到江西的活动方才停止。

袁世凯又派耿毅作为王芝祥的副手。耿是革命党人，曾任同盟会广西支部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耿到北京在总统府任职。袁见耿同南方军人关系较多，准备加以收买利用，耿虚与委蛇。耿同李烈均关系素来密切，就利用王芝祥赴江西前先到上海会晤黄兴的时机，先王芝祥到南昌，同李烈钧密议对付袁世凯的策略。

王芝祥到南昌后当即表示：“汪民政长决不再来，将来由李督兼署或另简人，此时未能预定。军械扣留案，陆军部嘱兄弟看江西枪弹是否足用，是用则归中央，不足则发还江西。”

此案政府已表示退让之意，当不难了结。”袁世凯发布了如数发还所扣江西军火和任命赵从蕃任江西民政长的命令。李烈钧通电表示欢迎。袁世凯退让，除因发动内战时机尚未成熟外，英商向袁氏政府行索取“耽延赔偿费”，每天索价200两，从1913年1月28日算起，这使袁政府在经济上有颇大压力。

因此，袁世凯令王芝祥解决赣事，“迅则妙”。

李烈钧并未就此罢休，江西省议会换届，使李烈钧在江西的处境改善，换届后的省议会不再是共和党人占优势，因此，省议会在李烈钧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出通话说：

本会前不承认汪民政长，纯为恪守约法起见。文电改委赵从蕃署江西民政长，窃地方官制未经参议院通过，民政长一职，在法律上无委署之依据，况正式国会成立在即，此次官制当俟议决践行。若于约法有效时期骤事变更，无论改委何人，赣民抵死不能承认。本会为人民代表，断难缄默。伏乞收回成命，以维约法而顺舆情。

省议会拒赵，袁世凯极为恼怒，立即致电黎元洪指责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莫此为甚”，扬言“该省会苟能幡然省误，自可勿庸置议；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大局。”江西省议会毫不后退，针对袁电发出通话说：“民政长为大总统命令官制中之一，吾人民既绝对不承认此代法律之命令，即当然不承认此命令官制中之民政长。本省拒汪一案，业经电中央查照，诂中央复简赵从蕃为赣民政长，命令官制必欲实行，专制进步一日千里。本会不敢冒昧服从，躬为祸首，谨就事实，聊布腹心。”李烈钧在接收了被袁世凯扣留两个多月的军械后，立即采取措施驱逐戈克安。他首先以“本省沿江炮台，共计6台，延长百余里，仅设总台官1员，指挥殊多不便”为由，下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委任陈廷训为上三台总台官。湖口东、西两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委任陈传曾为下三台总台官，均归“本都督直接指挥”。

并命令将戈克安所指挥的驻浔第9团编入第1师。这样就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完全剥夺了。同时，李烈钧又命令第1师师长欧阳武，在沙河没司令部，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准备以武力解决，戈克安一日数电向北京告急。

王芝祥闻讯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袁世凯只好下令：“戈克安着来京面询事件，其九江镇守使事务任命王芝祥暂行兼管。附近各军均归王芝祥节制调遣。”李烈钧宣布：“现已奉令调戈镇守使入京，浔事由王上将暂行兼理。地方安宁，人心大定。”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这也是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在许多问题上的斗争，赢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由于李烈钧有一省作为据点，手中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立场坚定，并在斗争中比较讲究策略。这是1912年底至1913年4月初的事。

## 第四十二章 恐怖武昌

袁世凯采取收买分裂革命党的策略，革命党人武力倒袁的主张一再受挫，法律解决的希望全属幻想，袁世凯的态度又日趋强硬起来，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起来。在革命党人中首先出来进行调停活动的是谭人凤。他于4月底到5月初和王芝祥一起在上海积极奔走，联络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的一些督抚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岑春煊、李经羲、伍廷芳、温宗尧等人出来主持公道。

岑春煊以恐其不听辞。谭人凤加以激励说：“公等与袁资望平等，听不

听由他，言与不言则视公等之爱国心如何也。若坐视南北决裂，不出赞一词，人将不蔑公等乎？”岑春煊、李经羲乃慨允。岑领衔，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温宗尧、王芝祥、高而谦、蓝建枢、杜锡圭、张其铨等 10 人签名致袁世凯和各界通电话：“政府与人民未能相见以诚，一事发生，是非各走极端，相持益急，纷扰日甚。祸机既伏，大局垂危，国事如斯，安忍坐视。”他们提出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交国会通过、政府不得干涉宪法的制定，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希望袁世凯能够采纳。

又有于右任到京，自称为孙中山、黄兴全权代表，谒见袁世凯，提出调和 3 条件：其一、宋案要求赵秉钧到案；其二，要求撤回派往军队；其三，组织国民党内阁。并谓此为国民党最后之忠告。

袁世凯回答道：“宋案尚未水落石出，究竟赵秉钧有无关系，并不能确定，自当保全赵之人格，无到案之理由。至于所派往军队，究何所指。如指张勋、倪嗣冲之兵，则张、倪两军本驻扎该处，并非派往，武胜关以南之军队，则系黎副总统电请派往，镇压地方，黎副总统未请撤回，中央不能卸责。惟政党内阁一层，毫无疑义，盖议会中谁党占多数，即以谁党组织内阁，实属当然之事。”显然，袁世凯的态度已十分蛮横。他又复电岑春煊等，断然拒绝他们所提出的调和条件，他说：“当宋君被刺之始，尚未获凶，即有人预设成心，诬指政府。继又凭影射之词，牵混之据，断章取义之电文，预侵法官独立职权，实为文明国所未有。即就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备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袁世凯对岑等电文所提出的借款、政府干涉制定宪法问题，逐条强辩。

那些拥袁的各省都督和北洋将领，紧密配合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开展猛烈抨击，并发出战争叫嚣。背叛同盟会的陕西都督张凤阁、山西都督阎锡山，联合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甘肃护都督张炳华等通电责骂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殄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断以借款冀逞阴谋。”声称：“自今以后，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定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与国民共弃之。”袁世凯对态度缓和的黄兴也不留情，他悍然发布命令，取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

谭人凤的调停活动仍在加紧进行。他和王芝祥进京会见袁世凯，袁态度极为强硬地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袁世凯痛诋黄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

谭人凤见难再多说，只得告辞。第二天谭人凤去武昌前向袁辞行。袁世凯和颜悦色地说：“先生此来甚好，民国疮痍未起，诚不愿再见动乱，兵队可否撤退，还清与黎副总统相商。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不然，我受国民付托，不得不以土匪目之矣。”谭人凤抱一线和平希望来到武昌，会见黎元洪，告诉他在京与袁所谈之事。黎断然说：“李烈钧跋扈桀骜，中央即允留，尚有 13 省都督不承认，势非撤不可。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袁世凯做好了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准备，便于 5 月 21 日召见梁士诒、



段芝贵、曾彝进时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4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4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

若彼等能力能代我，亦未尝不愿，但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袁世凯要求把他的话说给国民党人，并说这是他负责任的话。

袁世凯、黎元洪又加紧收买、分化李烈钧的部下，逼李自动下台。黎元洪密电驻守九江的赣军第1师师长欧阳武，暗示以推荐他代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要他退军撤防。第2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也先后被袁世凯收买，与袁私通款曲。

袁又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他弟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电李烈钧，要求撤退前沿部队，以利和平解决。

黎元洪派黄祖徽到南昌会见李烈钧协商调停办法。李烈钧迫于内外压力，不能不表示退让，他通过省议会提出双方将军队后撤，中央实行责任内阁制，省长民选，不得撤换赣督等4项妥协条件。

袁世凯和黎元洪不接受这些条件，黎元洪向李烈钧提出最后方案：“（1）请公开声明服从中央；（2）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3）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充任。”限李10日内答复。

李烈钧自然不会接收，他通过江西省议会加以拒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江西局势紧张的时候，5月29日凌晨，在上海发生了攻打制造局的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5月中旬，张尧卿、柳人环等到上海，以孟渊旅社为据点，用黄兴、陈其美的名义，运动混成第3旅下级军官，密谋起事。又联络上海籍工党领袖徐企文，由于徐熟悉上海情形，请他出面组织。张尧卿等在夜间摆花酒7台，号召本埠之军官赴宴密议。伪称张为黄兴代表，柳念陈其美代表。此事被第3旅旅长李英石知悉，电告程德全，程复电要求立即将张尧卿等人拿解南京究办。

赴宴之军官中有数人与陈其美相识，便去访问陈其美，曰：“昨夕曾蒙招饮，感谢之至。先生与张、柳诸君所议之事，我等大表同情，请随时指挥可也。”陈其美立即表示：“余并未摆酒议事，黄克强先生亦未有此举，请速关照昨夕赴宴之人及各营同志，万勿为他人所愚。

当此建设伊始，国民元气未复，我人须以大局为前提。”来人恍然而退。黄兴、陈其美得知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便派黄郛去南京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又告知制造局督理陈榘戒备。陈榘得知情报后，派间谍打入内部进行侦察，并做了周密的布置。

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榘。

29日凌晨1时，张尧卿自任总司令，会同徐企文、柳人环等率100余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分3批冒大雨进攻制造局，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除少数人被捕外，多数人逃散。

张尧卿等起事失败后，陈其美赴制造局，会见陈榘，并发表谈话，暗示此次事件系内务部勾结“南方败类”冒名捣乱。陈其美的这行径，受到激进分子何海鸣的谴责，何就此事说：“徐企文之失败，系前沪军都督告密所

致。事后，且诬柳人环、徐企文等为袁之侦探。自残同类，如此其剧。”柳人环失败后，带 10 多人跑到江西，想投靠反袁最为坚决的李烈钧。他们来到南昌求见李烈钧，不料遭到李烈钧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回电说：“张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办，以表白克强之心，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李烈钧派军警逮捕了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 13 人，准备将柳、文、卢等人解往江苏交程德全处理。当时担任李烈钧秘书的铁血监视团团团长何海鸣，向李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海鸣见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十分痛心，愤而离赣赴沪。

后来，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于 9 月 8 日，与徐企文等同日被处死。徐、柳等人表现得相当英勇。徐企文公开承认参与起事，“专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为目的。唐尧臣在被讯时声称：“因观时局艰难，刻下虽称共和，实与专制无异，是以此出。”临刑时，立而不跪，声称“起事之事，系我威逼士兵而去，兵士实出无意”。

反袁坚决的李烈钧也同样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了同类。但是，在他逮捕了柳人环等人 4 天后，袁世凯便把他免职了。

从欧洲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和蔡元培，仍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们同胡瑛通过赵凤昌请程德全、张謇致电袁世凯，进行调解，并要求袁世凯暂不撤换国民党都督。袁世凯不予理睬，于 6 月 9 日突然下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并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部下，贺国昌是李烈钧都督府的顾问。袁世凯企图利用他们来稳住江西，作为控制江西的过渡。

李烈钧决定同袁世凯斗争到底，有人问李烈钧反袁的结果如何？李回答说：“一定打仗。”问：“打仗胜负如何？”李答：“国民党一定失败。因为国民党虽有 5 省（江西、安徽、江苏、广东、湖南），但一盘散沙，互无联系，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孙、黄二人意见又不一致，孙中山的话很多人都不听。”问：“如果打败，都督又何以自处呢？”李说：“打不赢也要打，打败了就走路。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不是北洋派，我只有打，这是我的人格问题。”孙中山在袁世凯宣布解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后，决心不顾一切举兵讨袁。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去见孙中山和黄兴时，孙断然表示：“本人无论如何将以冒进主义一举去袁。”为了起兵讨袁，孙中山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马君武、白逾桓、邵元冲 4 人到南昌对李烈钧进行动员。

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

孙中山同时向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各军师、旅、发出通电：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当此存亡之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

对此袁世凯发表命令：捉到黄兴赏洋 10 万元，捉到陈其美赏洋 5 万元。

张继等人奉孙中山之命来到南昌，动员李烈钧起兵讨袁。

李烈钧并没立即举兵讨袁，而是通电下野。

李烈钧接到解职令，召集部下商讨对策，一些将领建议“即行通电否认此乱命”。

赵正平觉得事体重大献上一计：“不如先行电询湘、皖、粤诸省，再行决定。”并当即起草电稿，用密电急发，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督谭延闿主张从众意；皖督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督胡汉民且言他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督孙道仁也含糊。

李烈钧反袁的主张得不到同盟者的积极响应，因而有所顾虑，再者袁世凯收买了他的部下，他感到内部不稳。在京议员徐秀钧密电李烈钧：“赣省上级军官悉与中央通，多不足恃，须从速计划。”李闻之胆落。第2师刘师长等指天誓日，议决派张鲁藩、陈泽霖、周斌到浔游说欧阳师长，勿为中央毒计。那欧阳已被袁提为护军使，趋向已定，张、陈、周探知后电李，李乃悔用人不当，兵权旁落，且财政又极支绌，便打起退堂鼓，决定下野。

李烈钧宣布下野后，于6月15日离开南昌前往上海。路过湖口时，约见耿毅、李明扬、周璧阶、卓仁机等一群英俊青年军官，大家都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并说：“再延时日，袁定派大军压境，欧阳武为了清理内部，也会收拾我们。”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李烈钧途经安庆，同柏文蔚会晤后，由柏派军舰护送至南京，改乘火车到沪。这时，孙中山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港、澳，李烈钧便留滞上海。

欧阳武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即致电黎元洪报告筹划江西军政事务的打算，并表示：“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至死靡他。”接着，他就任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

欧阳武从九江前往南昌，道经湖口时，下令遣散李烈钧命水巡总监蔡锐霆将内河水巡炮船之兵调集湖口训练的调训团。他抵南昌接管了都督印信后，即着手破坏李烈钧的备战措施，将沿江部队撤回腹地，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使江西的防务受到削弱。

李烈钧、胡汉民相继被免职，使革命党人内部武力讨袁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坚持法律倒袁但也未放弃为讨袁做准备的黄兴，在李烈钧被免职的第3天，便着手规划讨袁的实际部署，并把重点首先放在湖北。

黄兴早在3月下旬就派田桐拿着他给湖北革命党人的信去武汉。田桐在武汉先与季雨霖晤面，又由季召集黄兴信中所致诸人，在武昌昙华林举行了秘密会议。经讨论，议决先以宴会方式召集各方面，以言语暗中打动，联络有志于反袁倒黎的同志。

季雨霖和田桐在汉南旅馆宴请各部队团以上、宪兵司令部营以上，以及政界人士，共约四五十人。宴罢，一部分人作了秘密商谈，决定组成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为宗旨；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推季雨霖为团长，设秘密机关于汉口碧秀里，武昌中瀛街、大朝街、抚院街、巡通岭、鸿翔巷等处。改进团的主要成员采用喝酒、叙旧情等方式，联络军队中的党人，以他们所掌握的部队为基本力量，酝酿起事。由于湖北军队大量裁减，属于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已经很少，改进团便广泛招纳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同时联络会党群众。旬日间达数万人。

改进团制订了几套打倒黎元洪的方案，其一是打算利用原季雨霖的1团和都督府的60名校尉队，通过召开军事会议，劫持黎元洪，铲除顽固派，

并宣布彼等造反，破坏革命，这样便从中取得实权，更利于以后行动。其二是先挑起吴醒汉所统之兵与蔡汉卿部下冲突，牵扯蔡部力量，并可乘混乱之机冲击都督府，推倒黎元洪。拟以蔡济民为都督，詹大悲为民政长。计划于4月6日起事。

3月28日，黎元洪侦悉改进团的活动，他发现改进团分送各军的宣言书，大为骇异，悬赏万元捕拿张统，熊自豪2首领。在大智门某旅馆内将2人捉获，立即斩决。

黎元洪将江南留鄂第1师黎天才部调入城内，负责各处巡哨查缉。为了捕获在租界活动的党人，黎又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1）租界内如有匪徒，经鄂政府查悉，鄂政府得直接派兵会同当地巡捕捕拿。（2）捕匪军队因为防范匪徒抗拒起见，得持械前往。

（3）捕获匪徒即照引渡犯人之规定，不必经捕房之审问，可直接带回鄂政府讯办。（4）如因捕匪，租界内受有损失，鄂政府担任赔偿。这样，黎元洪便无所顾忌地在武汉三镇，包括租界内外，大肆搜捕改进团党人，缇骑四出，军警密布，拿获之犯，日有所闻。

黎元洪乘改进团重要成员、碧秀里秘密机关负责人、第5旅中校参谋官容景芳等在汉口如寿里宴客联络时，派军警逮捕了在座人员，同时破获碧秀里机关。容景芳供出改进团发起人季雨霖、曾尚武，以及改进团活动计划。幸运的是，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詹大悲等主要成员已闻讯逃往上海。黎元洪下令通缉季、曾等，令以10日为限，自行回鄂投案对质。黎元洪还两次致电袁世凯，报告破案情形，要求袁飭令院部及各省都督、民政长、交涉使，通飭所属军警，悬赏缉拿，按律治罪。

季、熊、曾均为首义功臣，黎元洪发出告示：“能生获季雨霖赏银10万；生获熊秉坤、曾尚武各赏银5万。”这引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安徽都督柏文蔚发表通电，对黎元洪通缉季雨霖等提出抗议，责其轻听人言，误伤士类，要求黎立将佳电取销，并通告海内，以前此误听之故。

黎元洪气急败坏，发电痛驳柏文蔚，斥其诬毁个人名誉，贻误国家全局。袁世凯配合黎元洪的行动，发布大总统令，将陆军中将勋二位季雨霖、陆军少将勋五位熊秉坤、步兵中校曾尚武、容景芳一并先行停职，归案查办，季雨霖、熊秉坤并褫夺勋位，即由该省组织军法会审，分别惩办。

10日期满，黎元洪复又将期限延长10日。又10日满，黎元洪宣布将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3人实行缺席审判。同案被捕的容景芳，王子英、管心源被判绞刑。容景芳虽然叛节，亦不能免；另有王神斧在审讯中变节，具吐实情，仍被判绞刑。临行刑前，赣、湘、皖、粤4省都督李烈钧、谭延闿、柏文蔚、胡汉民所发抗议通电到鄂，电文曰：“湖北乃首义之区，彼辈皆系革命志士，拥公而建立民国，勿能杀戮。”黎迫于舆论，未敢即杀，但直到袁世凯死去，方予以释放。

在通缉季雨霖等人时，黎元洪对改进团党人进行残酷屠杀，大有血染长江之势。在3月25日至4月6日，10天内斩决共120名，拘禁未行刑者尚有百余人。这些还不包括军法局秘密斩决的数字。军法局秘密处决者已成一一大片血场，其中19人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人士。

6月，袁世凯解除李烈钧等人职务，决心发动全面内战。面对这种局势，黄兴再次指示湖北党人，立即起义，先发制人，打乱袁世凯以及湖北为根据地进攻江西的部署。季雨霖、詹大悲、宁调元，熊越山等率同志多人先后由

上海返回武汉，以季、詹、宁、熊住处以及汉口国民党交通部、《民国日报》社为机关，定名“临时鄂军机关部”，使用国民党的名义，决定联络军队及退伍士兵于6月25日夜发动起义，放火为号。

一切布置均已成熟。

可惜又事先被黎元洪探得讯息。24日，黎元洪即派军警会同法国巡捕包围《民国日报》馆，搜出文电、布告多件，内有通告湖北独立、组织北伐军，请各省协应，并起义宗旨、军人条例等语。25日又探悉秘密机关多处，拿获改进团党人50余人，均立即处决。

这时军队已处在黎元洪的严密控制之下，对反袁的二次革命，各部队官长为保全职位计，外表赞同，内实观望，内心抱定成功则从，事败则离的主意。有的看到形势不利，甚至杀掉前来联络发动的革命党人。如钟伸衡即因亲去发动驻汉口附近铁路沿线某团，而被该团杀掉。所以当6月25日夜预定起义时，武昌城内外仅有3处放火发难，但没有得到响应，很快被早有戒备的黎元洪镇压下去。26日，又在汉口德租界日本所开的富贵馆内将起义重要领导人宁调元、熊越山拿获，日租界松乃家、九原公馆以及法租界伊达医院等处机关亦先后被破获，季雨霖、蔡济民、吴醒汉、詹大悲、熊秉坤等领导人逃往上海，蒋翊武、杨王鹏、钟崎、温楚珩等逃往湖南。

驻天门县、岳口一带的章裕昆1营如期于6月25日发动，但很快失败。章只身逃走，黎元洪下令缉拿。驻沙洋之刘铁一团人迟于7月21日起兵，树“湖北讨袁军”旗帜，传檄各处，自称讨袁军鄂西总司令。黎元洪先后派出3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往剿，刘铁部仅五六百人，寡不敌众。刘铁逃跑，黎元洪悬赏3000元捉拿，后袁世凯下令悬赏1万元捉拿。

刘铁逃亡日本。

改进团第二次反袁倒黎起事至此全部失败，黎元洪再次进行血腥屠杀。自6月24日以后，日日擒斩，连续不绝，每日多则10余人，最多的1天杀了48人，少则二三人不等。革命党人机关被破获，亦无日无之。至7月上旬，为时满1旬，诛戮者已不下300余人，捕拿者尤众。7月下旬到9月初的40多天里，又杀了300余人，而军法监狱囚犯，由800余人增至1000余人，几无隙地。9月份黎元洪又杀了革命党近50人。时人称湖北省城为“暗无天日之湖北”，“恐怖时代之武昌”，“鬼哭人号之鄂垣”。革命党人报《民立报》抨击黎元洪“外假书生文饰，以盗宽仁之名，内则任用宵小，以行险残之实”，“叹黎元洪之残忍，殆为各都督冠”，“屠户之类名，赵尔丰不能独有矣。”在被杀的革命党人中，较著名的有宁调元、熊越山、蒋翊武等。宁、熊是被解至北京杀害的。蒋翊武在广西全州兴安县唐家冲被驻军统制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解桂林。黎元洪电袁世凯称：“蒋逆翊武……不予讯诛，终为巨患。可否飭陆都督从速执行，以昭显戮。出自钧裁。”袁世凯立即电陆荣廷，令其将蒋就地枪决。蒋翊武临刑前，从容不迫，仍向围观群众宣传革命。

首义功人王国栋、胡捷三，以及钟伸衡、罗云锦、彭志超等亦均同案被杀。参议员居正、胡秉珂，众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均以“照内乱罪”，革除其议员名义，有勋位及军职者，一律褫夺。谭人凤也被革去长江巡阅使职务。在逃的季雨霖、詹大悲、章裕昆等10余人也被袁世凯以大总统令通缉。

《民国日报》，《震旦民报》遭到迫害。《大汉报》编辑余慈航，是国民

党中坚分子，被捕枪决。

至此，湖北革命党人已被黎元洪摧残殆尽。

## 第一章 二次革命

袁世凯于6月30日又下令免去柏文蔚安徽都督的职务，改任柏为陕甘筹边使，同时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安徽革命党人张子刚、管鹏、王孟启、陈紫枫、孙师武、郑赞丞等都主张即时起义，拒绝孙多森来皖。但柏文蔚对革命党人内部在举兵讨袁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不满，认为大势已去，意志非常消沉。他以未奉孙、黄命令，不宜轻举妄动为托词，不赞成立即举义。他致电段祺瑞表示交卸省亲和拒绝接受新任。

柏文蔚于7月10日交卸都督后，由安庆赴南京，闭门谢客，借以休息。

孙中山不甘心不战而降，他同黄兴宴请李烈钧，动员李起兵发难。李于席间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

江西第1F旅旅长林虎派遣团长李思广到上海向李烈钧报告：“倘同志各省有意讨袁，我愿以本部首先发难，以报诸公持本部之苦衷。无论若何，总可望支持两星期，过此无援，亦可退湘边或粤边，再想办法。”李烈钧见江西部队士气旺盛，终于下定决心首先发难。他命李思广迅速回报林虎：“皖、宁、湘、粤，均倚戈待命，若吾赣发难，一星期间，各省即可响应，并出援军。”林虎得到回报，遂将情况分别通告江西其他将领方声涛、赵又新、耿毅、何子奇、蔡锐霆等人，密为准备。

但是，李烈钧的活动很快被已叛降袁世凯的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侦知。陈立即向袁世凯密报说：“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六台，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他要求袁世凯电商黎元洪，就近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以滋镇慑。

袁世凯向北洋军驻湖北的李纯部下达命令说：“严行戒备，一闻有警，立即驰援。”并告诉李纯，已电黎元洪副总统派队前往，并饬徐司令亲率各舰先驶至浔驻守，以防意外。实际上，李纯在此之前，已根据黎元洪的密令，派遣第12旅吴鸿昌的第23团附机关枪一连，由圻春开往九江。李纯随后率第11混成旅旅长马继增部继续向九江挺进，并进驻九江，占领了入赣的战略要地。

当李纯部前锋进入九江地区后，林虎便急电南昌，要求护军使指示作何对付方法，并表示本团现已实行防御。林虎已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并将前哨布防到沙河一线。

欧阳武虽然曾被袁世凯收买，但他得知北洋军李纯部入赣，大怒。他致电国务院抗议北洋军入赣，并提出辞职。他说：“伏念武奉大总统令为江西护军使，关于江西军事，应负完全责任。我在受事之初，当众宣布了副总统来电，决无北兵入境一步之语。今副总统即欲派兵来浔，亦当先询情形，与武接洽。今该军队到浔在先，副总统电到浔在后，虽有通告，已不及时。江西军队现有二师有余，万一因误会而生冲突，患不胜言。”欧阳武一面提出辞职，一面要求黎元洪速将军队调回。

黎元洪电令李纯撤兵，但李纯置之不理，更将前锋推进到沙河一线，同林虎的防地仅距数里之遥。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在这关键时刻，李烈钧乘小轮来到湖口，他一面筹组讨袁军司令部，一面电告欧阳武及江西各党政机关说：“鄙人免官赴沪养病，忽闻北军入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效力。”欧阳武对李烈钧的行动并不支持，他严词答复说：“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

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欧阳派三人到湖口劝李烈钧离境，表示愿出3万元作李出洋的旅游费。

李烈钧以生死以赴的坚决态度示意欧阳武不得阻挠起义。他对欧阳武的代表说：“烈钧亦知欧阳武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欧阳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欧阳武企图调动两团兵力进攻湖口。他致电袁世凯说：“李烈钧到湖口，确系实事。

9、10两团虽为所用，然此外非武之命不能调动者，似较该两团更强，现武调集南昌附近军队，竭力维持省垣外，并开两团往攻湖口。”但是，赣之军队毕竟是李烈钧的旧部，支持革命，欧阳武已经指挥不动了。这时，南昌的局面已为江西革命党人骨干分子俞应麓所控制。俞曾在李烈钧病假期间代理都督。

江西议会更是李烈钧的拥护者。欧阳武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召集各界领袖会议，宣布辞职。他声称：“护军使本系军官，今既无调遣军队之能力，武何颜任此重职。”李烈钧在湖口作了进攻九江的军事部署。他发布讨袁檄文，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并通飭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其一、誓诛民贼袁世凯；其二、巩固共和政体；其三、保障中外人民的生命财产。

江西省议会开大会宣布独立，公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江西首先举起了讨袁义旗，酝酿已久的二次革命终于在7月12日爆发。

但是，起义一开始，李烈钧便存在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问题。江西有陆军两个师和1个混成旅，共10个团的兵力。李烈钧在军队中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袁世凯收买分化，第1师师长欧阳武倒向袁世凯；第2师师长刘世钧在九江与袁世凯、黎元洪暗中通气，政治上已动摇不定。完全服从李烈钧领导的只有林虎的第1师第1旅（两个团），李明扬的第10团，周璧阶的第9团，卓仁机的机关枪大队，方声涛的新编旅（只有两个连兵力，营长陈铭枢、连长蒋光鼎）。

李烈钧自兼任正面军司令，命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第1师第1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并以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总司令参谋长。

7月12日拂晓，林虎兵分两路，一路向沙河镇挺进，一路出右翼袭击十里铺的北军。

北洋前线指挥官第6师师长李纯，一面命驻沙河镇的吴鸿昌团阻击，一面命驻十里铺的肖安团向沙河迂回前进，抄袭赣军后路。肖团于途中同林虎派出的部队发生遭遇战。

激战竟日，讨袁军初战获胜，占领沙河镇，迫使敌人退守瓜子岭。

当林虎部队在沙河一线投入战斗后，方声涛所指挥的部队从姑塘向九江城东侧进攻，因水路木船运输困难，行动阻滞，没能同林虎部同时发动进攻，到13日夜才进入阵地，士气激昂，一个个磨拳擦掌，打算入九江城吃

早饭。但通讯联络不畅，方声涛听沙河方面枪炮声已停止，误以为是攻不上去，便下令部队退回原地。部队接到退回原位的命令，士气沮丧，官兵都躺在路上睡觉了。严重影响战局的发展。

在九江城的赣军团长伍毓瑞、李定魁协谋趁北洋军增援部队未到前线之前，迅速消灭北洋军驻在城内的部队，然后率部开赴德安，从翼侧攻击九江以南的北洋军，配合林虎作战。但是由于李定魁违约按兵不动，伍毓瑞见事态暴露，情况突变，独自逃离九江前往湖口，所部 2 个营，1 个营转移湖口，1 个营投附赣军驻九江城内的第 2 师师长刘世钧。

李纯在沙河战役受挫后，急忙调整部署，集中大部分兵力向林虎部反扑，他集中 3 个团的兵力向沙河一线猛烈进攻。林虎率部奋勇抵抗，激战 9 个小时，不支，向蓝桥方面撤退。李纯因援军未到，后路空虚，浔城赣军时有袭击十里铺之警报，不得不令北洋军保持现状。这时驻德安的李定魁团 1 营营长郭懋修策动叛变，虽经林虎发觉，立予平定，但军心动摇，从此无力出攻。

黎元洪致电驻孝感的北洋军第 2 师师长王占元，要他迅速将该师驻湖北的各部开赴九江，进攻湖口，并配合李纯进攻德安。王占元立即派驻汉口附近的两个团开赴九江。第 2 师其余部队，拟等北洋军援军开到湖北接防后，再向九江集中。

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第 1 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统一指挥前线作战部队，段归黎元洪节制。

林虎左翼军进攻失败后，右翼军司令方声涛率第 9 团和机关枪两连，以及新从湖口前来增援的伍毓瑞团的两个营，右翼军共计 5000 余人，分左右两路，由姑塘向九江东南的金鸡坡炮台发起进攻。

在这场相当激烈的战斗中，赣军第 9 团团团长周璧阶身先士卒奋力冲杀，不幸阵亡。周璧阶阵亡后，军心有些动摇，已被戈克安、陈廷训收买的第 9 团营长龚星胜，于撤退途中，带领两个营及炮队、机关枪队，偷过六把桥、琵琶湖的赣军前哨绕道金鸡坡，向北洋军投降。方声涛的右翼军兵力大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

7 月 20 日，段芝贵率拱卫军 8 营抵达九江。海军次长汤芑铭也指挥舰队配合北洋军进攻。段芝贵以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命李纯一部驻守十里铺同林虎部相持，以掩护北军右翼安全外，其余各部会同海军舰队进攻湖口。

北洋军分 3 路向湖口一线进攻。一路由第 6 师 22 团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从金鸡坡出发，经新港、灰山、回峰矶，攻占西炮台。张部在新港遇赣军 3000 人极力抗拒，甚为强悍，经激烈战斗后将新港占领。尔后，张敬尧乘黑夜在灰山、回峰矶设伏。次日晨，张部经 4 个小时的激战，攻占了三面临水一面依山的灰山和回峰矶，接着占领了西炮台。

北洋军的另一路由第 2 师鲍贵卿旅为主力，于夜间乘船从官牌夹出发，沿长江东进，偷渡鄱阳湖口，利用浓雾于湖口以东抢滩登陆，在汤芑铭的四艘军舰配合下，向东炮台开炮轰击。赣军湖口守备司令何子奇指挥炮台守兵装弹开炮。但湖口炮台的射程不过六七千米，而敌舰的炮火射程却达万米以外。军舰摸清情况后，把军舰开至炮台射程以外，向炮台开炮。7 月 25 日，湖口终于被北洋军攻陷。李烈钧率守军从水路退守吴城。

驻守在姑塘一线的方声涛部，又遭到北洋军第三路王金镜旅的猛攻。



方部伍毓瑞所率领的第3营，同由南昌前来支援的独立营，以及一个连，同北军在狭市激战一昼夜。7月26日，方声涛放弃坚守多天的姑塘，率部退往吴城。

北洋军攻占湖口、姑塘后，段芝贵令李纯率第6师及第1师一部，向驻守在瑞昌、蓝城一线的赣军林虎部发动攻击。

林虎鉴于蓝桥地形开阔，易招敌迂回侧击，便稍加抵抗后撤离蓝桥，退守老黄门。

老黄门三面环山，一面山口险狭，铁路穿山而过，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林虎在此构筑阵地，组织防御。

北洋军两个团轮番向老黄门进攻。林虎指挥部队顽强抗击，使北洋军遭到沉重的打击。敌主力1连仅剩8人。李纯连夜休整后的22团乘火车来老黄门支援。北洋军分3路进攻赣军阵地。林虎旅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弃守老黄门，经德安退往建昌。

北洋军攻占老黄门后，又不战而下德安。8月7日起，北军以南昌为目标，分路前进，一路由陆路攻建昌，一路由水路攻吴城，然后合击南昌。

林虎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不待敌人进攻，即放弃建昌，退守山下渡，林虎本打算联络南昌守军，凭险力战，以待湘、粤援军，可是，南昌复失，友军无踪迹，回顾徘徊，只得经奉新退往湘赣边界。

李烈钧在吴城命方声涛整顿撤回部队，负责防务。

北洋军马继增部70余人化装成难民模样。乘民船数艘，利用夜雾大风直驶吴城东岸，驻守望夫亭的炮兵营长刘棱受其蒙蔽，没有发炮阻止。北军一跃登岸，发枪攻击，守军仓卒抵抗，陷于混乱。北洋军马继增部随后进抵吴城，赣军不支，吴城失陷，李烈钧退往南昌。

欧阳武见李烈钧失陷吴城，即将回到南昌，他便逃离南昌，赴青山，自称止戈和尚。

欧阳武的两营护兵为宪兵司令廖伯琅控制。廖伯琅和警察总监阎思荣有叛变企图。李烈钧到达南昌城，廖闭门不纳。李烈钧打电话责问廖伯琅，并命士兵越城而上，打开城门，始得入城。

李烈钧入都督府后，廖伯琅来见，被卫兵剥下衣服押着进来。李烈钧见到他，便叫人把军服、军刀交还给他，叫他穿好军服，并不责怪他，只是怪自己无用，打了败仗。

廖伯琅回去后自觉不安，逃往赣州。

李烈钧重整军队，任命伍毓瑞为南昌卫戍司令，在南昌东北20公里的樵舍、南昌北16公里的乐化一线，部署防线。在牛行附近选择据点，布置第二道防线，同时架设浮桥，以便交通。

李纯军进攻樵舍，伍毓瑞率领4、5营兵力，抵抗李纯1师之众，众寡悬殊，经过激烈战斗后，放弃樵舍，退守牛行防线。伍毓瑞又在南昌近郊与北洋军战斗，终不能敌。伍毓瑞率所部向进贤撤退。途中，将部队解散。伍经浙江、上海、转赴日本亡命。

李烈钧在南昌失陷前，看到李纯军势方张，湘粤援军久不至，赣苦战，弹尽力疲，难以继续坚持。湘督谭延又来电劝他赴湖南，部下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亦劝他去湘；伍毓瑞向他报告前线败退情况，劝他先行撤退。于是，李烈钧同何子奇等人乘坐两艘快轮，经樟树镇，向赣、湘边境撤退。

李烈钧到萍乡后，与唐蟒率领的湘军援赣部队会合。又在袁州同林虎

研究赣军的善后问题，然后带领少数亲信和随员，乘火车去长沙。

李烈钧 9 月 2 日到达长沙时，谭延闿虽然已经宣布湖南取消独立，但并不打算同革命党人断绝关系。他害怕公开接待李烈钧，被袁世凯知道抓住把柄，特安排一乘大轿，将李抬到日本驻长沙领事馆，在那里同李会晤。在他安排下，由日本领事馆掩护，经上海去日本。林虎所部则由谭延闿电请袁世凯同意，由湖南收缴枪械，按退伍的办法出资遣散。林虎本人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辗转流亡日本。

湖南也曾宣布过独立。

湖南自赣督李烈钧被免职，一批湘籍革命党人受黄兴等人派遣先后由沪、汉等地回省。

在湖南的国民党内部原同盟会派程潜、周震鳞、唐蟒等人，坚决表示与袁世凯誓不两立，而以谭延闿为首的原立宪派则动摇退缩，顾虑重重。谭延闿本不赞成同袁世凯作对，无奈身为都督，隶属国民党，不便同国民党人闹翻，但又怕附和袁世凯，将来万一失败无法开脱，于是施展两面派策略，明里极力强调独立困难，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借以拖延；暗中却与袁世凯、黎元洪等人私通款曲。

谭人凤由沪返湘，传达黄兴意旨，谓赣、苏、皖、闽、粤各省决计在 7 月间起义讨袁，湖南万不容坐视，要立即响应。李烈钧在湖口发难后，苏、皖、沪、粤相继响应，湖南革命党人急不待，日夕向谭延闿进言，要求宣布独立。谭延闿不得已，派人告诉黎元洪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黎元洪回信劝他说：“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数平。”谭得此方略，据以敷衍革命党人，尽力推迟宣布独立讨袁的日期。

谭延闿召开政务会议，讨论湖南去向。谭人凤带枪入场，道：“今日有不赞成独立者，即以此物相赠。”稳健派不敢出声。激进派相继发言。第二次会议规定不准带危险物，稳健派才发表反对湖南独立的言论。谭延闿当众宣布：“如必欲宣布独立，鄙人固不敢赞成，然亦无反对之能力，但请另举贤能，继此重任。如不许鄙人去职，鄙人惟有闭户深居，听诸君为所欲为而已。”是时，唐蟒、陈强、谭人凤等人极力辩驳，意气激昂，争论并无结果。

7 月 24 日，革命党人不由分说，起草独立宣言的通电，公推谭都督为讨袁军总司令。

在都督府悬挂讨袁军大旗，正式宣布独立。

谭延闿与黎元洪密商，设法采取消弭革命党人斗争锋芒、极力压制省内群众反袁热情，力争袁世凯谅解，伺机取消独立。谭延闿用调虎离山之计，借口援赣讨鄂讨袁，将省城拥护革命的军队由第 1 军司令程子楷、副司令赵恒惕率领，调赴岳州，又以蒋翊武为鄂豫招讨使、邹永成为湘鄂豫联军第 3 军军长，与蒋同驻岳州，部署对湖北的军事；派唐蟒率新兵援赣。

谭延闿将革命党掌握的军队调出省城，即以亲信余道南为省防守备队司令，又以童锡梁为新募 5 营管带，控制长沙城卫戍权。尔后下令防止会党活动，饬各属举办团练，负责地方治安，如有“聚众滋事”，扰害社会安宁者，一经拿获，从严究惩。私藏私造危险物者，散放飘布希图起事者斩，造谣生事煽动人心者斩，秘密集会者斩，私自招兵者斩。对于群众自发组织北伐敢死队、招募讨袁义军的，谭延闿都批驳取缔。

谭延闿请黎元洪为他在袁世凯面前转圈，希望得到袁的宽宥。黎元洪

对谭颇感同情，他对各军长官说：“湘鄂唇齿，谊若兄弟，其独立本属少数暴徒之主张，吾不忍湘民之涂炭，极力主和平。请中央不必征讨。令彼自行取消独立，所有援赣之师，概置不究。”谭延闓在通融之后密电袁世凯说：“湘事措置无方，咎在延鹄一人，惟维持操纵，实具苦衷，现情安谧，终当始终保持，不敢上烦荏忱。”当南方讨袁阵线开始全面崩溃时，谭延闓眼红面黑，大起恐慌。他和程潜密议说：“湖南在上月 25 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担保，可免生灵涂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程潜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辞去军事厅长职务，表示愿意担责任。这时，湖南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分化。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文斐等人站在谭延鹄一边，不仅主张取消独立，还打算牺牲几个同志，来保全自己；唐蟒、罗良干、刘承烈、柳聘农等人要求坚决同袁世凯斗争到底。他们在都督府特别会议上，拔剑舞刀，愿拚死一战，将来失败，我等须要同归于尽，决不令有一人得庆余生者。

湖南妥协空气占了上风，革命党人上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人凤、程子楷、陈强、周震麟、唐蟒等人先后潜往上海转赴日本。谭延闓遂于 8 月 13 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

谭延闓宣布湖南取消独立后，把许多革命党人送去上海，继续同革命党人结好。

革命党人中激进分子不甘心失败，力图作最后的抗争。李严翼、胡熙寿、柳杨谷等人运动先锋水师统领杨玉森率兵入城，谋再次独立，因谭延鹄有备，未能成事。党人刘崧衡、魏伯益、杨久明等率众进攻都督府，准备逐出谭延闓，宣布独立，事败被擒。这时谭延鹄则凶相毕露，遇犯即杀。他说：“我平日何尝杀人，越不杀人越不待结束。”他很快将刘、魏、杨 3 人杀害了。

## 第二章 兵败石头城

黄兴派赵正平去南京联络起义事宜。赵到南京后，致电在徐州的冷璫到南京，同章梓、洪承点几人密商。冷、章认为苏军的枪械弹药全靠上海制造局供给，袁世凯已派兵 1 团驻扎制造局，如果上海不供给枪械弹药，江苏军队实在危险，若先将上海拿在手中，南京通电响应就有办法。赵回上海向黄兴报告。

黄兴召集陈其美、钮永建、黄郛等商议上海起事计划问题。因上海方面没有军事力量起事，只得请南京方面先发动。

黄兴再派赵正平、何成浚赴宁，邀集驻宁的第 1、8 师高级将领、驻徐州的第 3 师师长冷敷、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开军事会议，决定 7 月 15 日宣布讨袁。冷劫的部队散在乡间剿匪，他匆匆北返徐州，调集四乡军队。

会议之后，第 8 师士兵和下级军官准备杀死师长，欢迎孙中山到南京主持讨袁。那第 8 师师长陈之骥和旅长王孝缜、黄恺元等，都认为第 8 师缺额尚多，不赞成马上出兵讨袁。

孙中山对他们极为不满，他为了起兵讨袁，竟派朱卓文从上海携款 2 万元，到南京运动 8 师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8 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黄恺元得消息，仓皇来沪，向黄兴报告说：“现在事已至此，虽准备未充分，也得树起讨袁的旗帜。希望您去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要求孙中山千万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宁，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去宁组织政府。

黄兴应允他们的要求，决定次晨动身去宁。他立即见孙中山，说明自己赴宁举兵讨袁，请孙中山在初举义时勿赴南京，等形势稳定后再去宁组织政府，孙中山点头同意后，王孝缜、黄恺元当夜赶回南京，布置起义。黄兴也于次日轻车简从，秘密地到了南京，当晚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的作战计划。

7 月 15 日，1 师师长章梓派人割断了都督府的电话，8 师士兵开入都督府。

尚在睡梦中的苏督程德全惊骇异常。赵正平急忙上前安慰说，请都督安心，克强先生就要来了，即要同都督商量。……赵的话声未落，黄兴以温蔼大度的态度，踱进来了，背后跟着各高级将领。大家坐下，黄兴说明讨袁大义，请求协助。若干高级将领，自 8 师师长起，纷纷跪下，语极诚恳。

程德全遂一变其惊骇颜色，表示附和独立讨袁，并留住和黄兴同来的章士钊，起草讨袁通电，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的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宣布江苏省独立，其电文是：

近日北军无端入赣，进逼德安，横排浔军，迫之使战。又复陈师沪渚，威逼吾苏。溯洎政府失政，狙害勋良，私借外款，暮夜签押。南方各省，稍或抗之，意挚词温，有何不法。政府乃借辞谴责，罢斥随之。各都督体恤时艰，不忍为抗，亦即相继谢职，静听后命矣。政府乃复于各军凝静之时，浮者甫息之会，耀兵江上，鞠旅海隅，逼迁我居民，蹂躏我秩序，谣诼复兴，军纪大乱。政府倒行逆施至此，实远出意料之外。吾苏力护中央，夙顾大局，今政府自作昏愤，激怒军心，致使吾苏形势，岌岌莫保。德全对于政府，实不能负保安地方之责，兹准各师之请，兴本日宣布独立，即由兴受任江苏讨袁军。

黄兴没有看诱程德全是黎元洪之类的人物，他本来完全可以自己打起讨袁的旗帜，但是他却要程德全做太上皇，由程德全任命他为江苏讨袁总司令。事后，柏文蔚密告黄兴说：“最好快刀斩乱麻，处程于死地，俾免后患。或为人道主义，即行拘禁，否则必坏大事。”黄兴未采纳柏文蔚的意见，放程德全托病离宁赴沪。程到上海后，即通电声明说：“驻宁第 8 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支持，本日来京调治。”黄兴着手组织讨袁军司令部。他委任章士钊为秘书长，黄恺元为参谋长，何成浚为副官长，赵正平为兵站总监。因第 1 师师长章梓为文人，不会打仗，即调任都督参谋长，任命洪承点为第 1 师师长，任命马锦春为要塞司令（未就任），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同时令冷遹率第 3 师向驻韩庄的北洋军立刻发动进攻；令第 8 师骑兵团团长刘建藩率该师第 29 团附机关枪连及骑、炮、工兵各 1 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 3 师；第 1 师第 1 旅旅长戡翼翹率该旅随后跟进；周应时率第 1 师第 2 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进攻北军倪嗣冲部；派洪承点进驻蚌埠，节制第 8 师的混成支队和开赴徐州、临淮关一带的第 1 师的部队，并负责组

织徐州以南沿铁路线的防御；第 1、8 师的其余部队，负责在南京四周的防御。

冷遹回到徐州，立即收拢部队。未待全师集中，就率部向徐州以北 30 公里的利国驿方向运动，并拆毁韩庄以南的铁路数处，占领徐州电报局，断绝南北交通和通讯。

北洋军第 5 师师长靳云鹏闻讯，立刻致电袁世凯说：“徐州军队既经叛变，应乘其尚未集中，迅速突击。第 5 师现经分扎，猝难集合。张勋军队聚驻铁路沿线，可否飭令星夜进攻。陆军集中后即行继进，以赴事机。再韩庄支队至今未见报告，焦甚！”袁世凯复电靳云鹏说：“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望向韩庄确探军情再夺。”冷遹的第 3 师冒雨向驻守韩庄的方玉普旅的两营北军发动进攻。方率部坚守待援，多次打退冷部的进攻。

张勋接到方玉普求援急电，不待袁世凯行令，立刻派他的义子武卫前军左路统领张文生，带步炮 3 营赴韩庄助战。张文生的 3 营辫子兵和从兖州开来的田中玉的巡防营，先后到达韩庄前线、加入战斗。冷遹部遭到北军左右夹击，被迫退守利国驿。北军团长潘鸿钧率部从济南冒雨赶到韩庄参战，炮团团团长郑士琦也从济南率步兵一营、炮兵一连赶到前线，将利国驿车站轰毁。冷遹部被迫撤出利国驿，退守徐州北 20 公里的柳泉。

8 师混成支队在刘建藩的率领下到达柳泉前线，从铁路两侧向敌猛攻，激战一昼夜，包围敌军右翼。敌军急调第 5 师的两个营投入战斗，才得突围后撤。讨袁军 1 师第 1 旅赶到前线，与 3 师、8 师刘建藩支队并力再度反攻，将北军赶回利国驿一线。讨袁军前锋一度追到运河。

在讨袁军节节取胜的时刻，黄兴听说驻扬州的徐宝珍的第 4 师叛变，将从六合进攻南京，急电刘建藩支队撤离前线，回守六合。刘队的撤回大大削弱了利国驿前线的兵力。

黄兴幻想利用张勋忠于清室、不满袁世凯愚弄旧朝的情绪，动员张勋倒戈。他致电张勋说：“兖州张军统鉴：江西、江苏先后独立，皆袁世凯自开衅端，过为已甚。……世凯本清室权奸，异常显诈。每得权势，即作奸慝。戊戌之变，说者成为寒心。前岁光复，世凯复愚弄旧朝，盗窃权位，继以寡妇可欺，孤儿可悔，假其名义，以御民军，旋乃取而代之。自入民国，世凯更无忌惮，阴谋满腹，贼及太后之身。贿赂塞途，转吝皇室之费。世凯不仅民国之大憨，且清室之贼臣，无论何人，皆得申讨。公久缩军符，威重于内。现冷军已在徐州方面，与袁军接仗，公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则袁氏丧胆，大局随定，国家再造，即由我公矣。”黄兴对张勋这个臭名昭著的封建余孽策反，无异与虎谋皮。张勋不仅不理，反而派出骑兵，绕道台儿庄经涧头集，配合新抵前线的袁军向讨袁军进攻。已被袁军收买的大土匪李扒子（李已被冷军击毙）余部，也抄袭冷军的后路，使冷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退回徐州。冷军刚退还徐州，又遭到受敌军收买的冷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骑兵的突然袭击，以致军心大乱，被迫退出徐州。

讨袁军撤出徐州后，高级将领斗志消沉，无意部署节节抵抗。不久，第 1 师被调回南京，第 3 师师长冷遹脱离部队回南京，3 师由旅长伍崇仁率领移驻凤阳。

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 2 军军长，负责统一指挥江苏方面的作战。冯国璋将北军主力集中在徐州一带，准备向南推进。

袁世凯命令张勋率全军由运河水路南下扬州，会合南京叛军徐宝珍的

第4师进攻镇江；命令冯国璋率第4、5两师沿津浦路南下，速取临淮关，再趋浦口，与张勋联合，会攻南京。同时要求冯国璋注意与安徽的倪嗣冲联络，配合作战。

袁世凯见程德全与革命党人离心离德，便下令恢复他和应德闳职务，他在通电中说：“该都督有治军守土之责，似此称病辞职，何以对江苏人民。姑念该都督从前保全地方，輿情尚多感戴，此次虽未力拒逆匪，面事起仓猝，与甘心附逆者迥不相侔。应德闳因事先期在沪，情亦可原。”袁世凯命令程德全、应德闳即在就近地方暂组军政、民政各机关行署，要程德全选择得力军警严守要隘，迅图恢复。

程德全见袁世凯不再追究他在南京独立问题上的责任，又看到讨袁军在徐州战役失败，就活跃起来。他通电声明说，南京独立的一切电文，都是黄兴假借他的名义搞的，并说黄兴跪泣哀求他宣布独立，他始终不允。程德全、应德闳密召苏属旧部水陆军警，策划配合袁世凯的活动。

7月26日，程德全通电黄兴，要求“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

如尚坚持成见，必以江苏之生命财产，为孤注一掷，即违全国公意，即系江苏公敌”。

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从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南京军界不但接到了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翥还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夜间乘日轮静冈丸离开南京，一走了之。何海鸣对黄兴的出走惋惜道：“南京之独立，即借此一追而成功，章梓犹不为功首也。彼等玩克强于股掌之上，一方欲胁其出走，一方又畏士兵之反对。乃思得一极妙之策，对克强则曰：‘事不可为矣，兵心悉变，卫队且将不利于公之身，公曷不速去，为明哲保身之计’。及克强已许离宁，乃又派出许多兵士云：‘护卫总司令出城有要公。’不使其知底细。江干一别，黄克强之要公乃办到东瀛去，真奇剧也。斯时克强如果以镇定处之，或与下级军官、兵士向无隔阂，侧彼等又何能售其奸。后各军官兵士多语予。若克强曾以此情告之，必能力卫克强，而直取奸人之颅。克强既不出此，而其身近又无一沉着之人与亲信之兵，徒恃一不招兵，不增加人民负担之文告，以取悦于人，究与实事奚盖。”黄兴离开南京后，章梓、洪承点、冷遯亦当即出走。

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8师师长陈之骥、代理1师师长周应时等当即宣布取消独立，连发两电与袁世凯联系，并派人到上海要求程德全迅速返回南京处理善后事宜。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1师师长职务。撤退到凤阳的3师也宣布取消独立。

何海鸣、韩恢等赴江北发动起义，道经镇江时得知黄兴已离南京，就星夜入宁，谋补救。是时8师已全部由阵地开回，1师悉数在城，即吴浩之卫戍团亦分扎下关各处。兵士对无端停战、克强等无端出走，南京取消独立，怀强烈不满。韩恢与1师士兵有广泛联系，所有1师及宪兵、巡警等非其同乡，即与同事，韩恢之名无人不识。于是，何海鸣、韩恢就从运动1师着手。

詹大悲、戴天仇也从上海到南京在8师中进行活动，但双方未通声气。

何海鸣、韩恢同1师的代表经过紧急会议，决定在是夜发难，并规定以富贵山信炮为号。但是，由于所放之炮系40磅之空炮，声响不巨，何、

韩所在的指挥所大观楼在门帘桥，耳不能闻，都督府附近则闻之，以致未能按时发动，但这声空炮却吓倒了程德全派任的1师师长杜淮川，使他仓皇出走，告急于浦口冯国璋军。

8师兵士闻空炮声，均跃跃欲试，何海鸣率100余人占领都督府，贴出布告，宣布独立。1师士兵全部拥护宣布独立，8师骑、炮队，29团已疏通意见，决不反对。反对者惟8师之陈之骥与1师中上级军官耳。

何海鸣为了争取陈之骥，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推举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派代表迎陈就职，陈开始不答应，后表示接受，并通知何海鸣来都督府办事。但到了晚间，陈却派参谋长袁华选带兵将何海鸣劫往8师司令部，将何囚禁起来，再次宣布取消独立。

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他虽然囚禁了何海鸣，但由于何得到8师29团的支持，却不敢加害于何。

陈之骥由于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部队，便通过英国驻南京领事馆联系，在宪兵司令茅乃封的陪同下，于夜间渡江到他岳父冯国璋军营，商谈和平解决方法。

陈、茅出城后，8师29团下级军官和士兵举行起义，击毙企图阻止起义的代理团长李浚，又与1师联合起来，拥入8师司令部，断绝陈之骥的归路。8师司令部士官纷纷卷行李而逸，军需外之款为此辈拐去不少。旅长王孝缜躲到船上电告陈之骥部队哗变。陈见大势已去，在日本领事馆参赞护送下，乘日本舰经上海流亡日本。

何海鸣再次宣布独立，其布告说：

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何为布告事。袁逆世凯，黄总司令兴宣布独立于前，为程贼德全破坏，本司令重行宣布于后，又为陈贼之骥推翻。人天共愤，万众不容。幸各军深明大义，于昨夜又行建树义旗。本司令承各军士推戴，仍任临时总司令。凡地方之安全、军队之接济，本司令当竭力维持，毋敢稍懈。仰商民人等，勿得自相惊惶，纷纷迁徙。以免匪徒乘间骚扰，自贻伊戚。至于各军士，幸敌忾同仇，志节高尚，深保秩序，遵从命令，为国家尽天职。本司令誓与各军士共患难生死，决不敢忽。

戴天仇在何海鸣被囚禁后，本想返回上海。但他在下关遇到8师参谋长袁华选，得知何海鸣再次宣布独立，就折回城内。29团营长王兆鸾将戴接到团部后，一般同志闻天仇来，亦莫不欣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先生代表也，天仇来，经济问题有着矣。”何海鸣恳求戴天仇留南京相助，并希望得至上海方面的支持。戴则说：“予须回沪一次力筹之，此间事项，以知兵之人为司令，钮永建可承其乏，尔可退贤让路也。”何表示同意，希望戴返沪尽快派人来支援。但事实上，戴返沪后，他和钮永建并未来南京，上海来的经济支援也十分有限。

由于师长及上级军官多逃去，军队漫无统率。何海鸣召集1、8师军官开军事会议，举出徐涛为1师师长，王兆鸾为8师师长。但举徐为1师师长，只不过二三个军官的意思。

熟悉1师情况的韩恢去上海未回。何不知1师何人可用，故暂时不能不以徐涛承其乏。徐握权后，反复无常，其结果亦不过如陈之骥而已。而经戴天仇推荐被举为8师师长的王兆鸾，竟于被举后的第2天，忽不别而去。何海鸣令8师再举，李可钧乘势而出，以师长自命，其党徒附和之，出入都督府，其势汹汹，8师中人鲜承认之者。

1、8 师虽然未获适当之人任师长，士兵们却战斗自觉性高，不待将校指挥，人自为战。军士每日荷枪巡行街衢，甚为严密。无论昼夜，处处皆见军服者徘徊在警备中间。

南京第 3 次宣布独立的第 2 天，即 8 月 12 日，张勋率部到达龙潭。他致电冯国璋，要求冯派兵自大胜关、三汊河渡江攻占雨花台，同时令所部武卫前军不待冯部协同作战，即会同徐宝珍师突袭并占领紫金山及天保城。旋为富贵山炮台所知，当即发炮轰击。8 师亦发起反攻，至中午夺回天保城，随即在天保城架炮轰击紫金山。张、徐两军不支，弃山逃走。徐军被击毙团、营、连长各 1 名，排长以下 55 人，旅长方更生重伤；张军被击毙营管带 1 名，伤管带 2 名，兵士死亡人数不少，叛降的张宗昌所派潜入下关的两营步兵，也为守军发现，歼灭大半，残部退入南京东北的幕府山。

冯国璋下令各军晚间渡江，向神策门、太平门、钟阜门一带进攻，未获成功，仅占领老虎山。张勋再度攻夺天保城、紫金山。在这紧要关头，徐涛、李可钧和卫戍团团长吴浩，联络南京地方维持会，勾结北军，图谋取消独立，献城叛变。

何海鸣派韩恢、钱通前往，向徐涛、吴浩做工作。徐不服，其意欲叛；吴劝之气稍平，然终必迫何海鸣等退出南京，念在同志，向商会筹 3 万元为贖。吴浩要何等于当日下午 2 时出城，否则，以炮队来攻。

何海鸣被迫躲入金陵医院，借宿一宵。8 师 29 团、1 师 3 团等部士兵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当夜围攻 8 师师部，镇压了徐涛和李可钧，但攻击卫戍团失利，吴浩仍出布告，取消独立。1、8 师官兵又联合击溃卫戍团，吴浩逃跑。

何海鸣出示宣布，举定张尧卿为临时都督，何海鸣兼 8 师师长，韩恢为 1 师师长。但张尧卿在军中并无基础。何海鸣为一文人，不懂军事。就连韩恢也说，何海鸣为总司令，不过儿戏而已。何海鸣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这次独立，凡不肖军官一律剪除尽净，无稍妨碍。从都督以至排长，皆系坚决果敢之士，万众一心。

保卫南京，主要依靠在天保城一线的 1 师 29 团，在雨花台一线的 1 师 3 团为主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士兵们凡一临敌，无须号令，即奋身前往。在阵前亦无须指挥，即向前攻击。

张勋再次发起猛烈攻击，经 4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重占天保城，并先后 3 次向太平门、洪武门一线发动进攻。

北军数千名猛扑该门，城上大队守军驾麦肯沁炮 2 尊，静以待敌，北军竟难进逼。是役炮声极为激烈，晚间北军复进扑该门，仍未得手。北军屡图冲入尧化门，惟均未得利。

8 师 29、32 团及炸弹队向天保城发起反攻。战斗异常剧烈。民军在枪林弹雨中毫不退却，奋力前扑，战绩甚微。但是，至第 2 天下午，终因寡不敌众，复为张勋所占。这时，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 1 营及宪兵共约 1000 多人来南京支援，给血战中的南京军民很大鼓舞。柏文蔚被推为江苏都督兼 8 师师长，领导南京的讨袁战斗。

在柏文蔚的指挥下，讨袁军再次向天保城发起反攻，但未能攻下。

张勋军与讨袁军在南京城外激烈争夺，冯国璋在隔岸观火。张勋在天保城站稳后，冯国璋才命令他的部队分别向神策门、太平门发起攻击。但他又下令说：“本军首次攻击，早迟必定成功，无须太着急。”他的本意是让张



勋为他火中取栗。

袁世凯担心南京久攻不下，他处再起，电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会合海陆各军迅速荡平，切勿延缓，致牵大局。陆军大队尚未渡江，望速设法护渡。”北军第7师由上海开抵镇江登陆，海军兵舰4艘，水雷艇2艘由镇江驶抵南京下游龙山附近，准备水陆四面围攻南京。

在兵临城下之时，张尧卿和柏文蔚、柏文蔚和何海鸣之间却出现不和。张尧卿原赞同让都督与柏文蔚以维持危局，但柏就都督职，而张又异常不悦；柏文蔚见何海鸣不得人望，内部矛盾甚多，强敌压境，前途无望，欲带8师出走，何和8师官兵坚决反对，柏的卫队多数也不愿随行。柏文蔚仅带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

柏文蔚原打算返芜湖后入徽州，经赴江西，同李烈钧联合。但所带卫队途中遇冯国璋军一击，逃散无余。结果只剩下柏文蔚和亲信祁耿寰，化装逃往上海，转赴日本亡命。

何海鸣又兼任江苏都督、8师师长等职，全权指挥。

刘冠雄命令海军海琛、应瑞、楚有3舰暗渡上游，直抵大胜关。不仅截断了南京与芜湖的联系，而且利用舰队炮火助陆军攻城，掩护北洋军从上游渡江。

8月26日，冯军全力攻城。张勋马队1营突入朝阳门，张宗昌部攻入神策门。张勋狂喜，电京告捷。但他的马队入城后，即遭到讨袁军预掘深沟的拦阻。向后撤退时，却被守军全部歼灭。张宗昌部也遭到守军城墙两侧火力的射击，被迫退出城外。失败后，冯国璋严饬南岸各营队，并约会海军，联合张军，协同作战，再也不敢轻率冒进了。

8师29团100余人，出敌不意，冲出仪凤门，攻占宝塔桥，一直冲到幕府山下江岸处，距北军第3师司令部仅四五百米。敌人拚死抵抗，伤亡40余名，司令部被迫后撤。但次日，北军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张勋、徐宝珍部攻朝阳门，北军第3师攻神策门、第5师攻太平门、第7师和第4师一部攻雨花台，第4师另一部扼守通向芜湖及秣陵关的要道。海军上游舰队不时攻清泉山、仪凤门暨城内西南部，下游舰队日夕攻狮子山东西岸暨城东北部，南京的形势顿时险恶起来。

何海鸣和韩恢在只有虚名的新编第三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时任1师师长的王宪章、5师（新编）师长钱通积极主张以攻为守。何海鸣主持决定：于8月31日晚分4路进攻。

即1师出雨花台，攻紫金山；新编5师出朝阳门，俟1师与敌接仗时，出而合攻；8师出太平门，突出天保城；新编6师出仪凤门，攻击幕府山。是时1师迟迟没有行动，5师至朝阳门，敌人炮火猛烈，不能出城。而8师亦因之不能直攻天保城。原定4路进攻计划完全落空。

9月1日早晨，北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讨袁军各师由于昨日晚的反攻计划未能实现，不仅打乱了守城的部署，而且天亮后纷纷转回休息，削弱了守城的兵力，在敌人总攻面前，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张勋部利用地道将朝阳门城垣轰崩两丈有余，蜂拥而入。太平门被北军用猛烈炮火击穿，北军冲入城内，分别占领了富贵山和骆驼山；徐宝珍部也由通济门拥入；神策门也被北军攻破。

何海鸣、韩恢、钱通、王宪章、参谋长廖培坤、护卫团1营营长张露、副官石俊卿、都督府办公厅厅长夏裕藩等率部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

楼等处与敌军进行激烈的巷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一部由清凉山撤出城外，一部退守雨花台。次日上午，何海鸣、韩恢等率卫队及 1 师 3 团、8 师 29 团残部在雨花台同北军进行了最后的一战，伤亡殆尽，队伍溃散。何海鸣同少数亲随潜行至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 第三章 讨袁再受挫

北军攻占南京后，大肆淫掠，几乎无兵不抢。冯国璋兵在下关抢，雷震春兵在南门抢，张勋兵在太平门抢。冯国璋且在下关纵火焚烧，全埠化为焦土。抢掠后所有赃物皆运往浦口，由火车直运天津、北京或运至上海。南京城被劫一空，虽家具什物，亦搬运全尽。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

南京在 7 月 15 日宣布独立后，上海因军事力量不足，未能及时发动。7 月 18 日，陈其美才宣布上海独立，由黄兴任命陈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上海宣布独立后，没能对据守在制造局的北军臧致平团立刻采取行动。陈其美幻想通过谈判使臧团能自动退出制造局。

上海商界十分害怕战争。上海商会、商团公会、教育会、救火联合会联合组织上海保卫团，推李平书为团长，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李平书赴制造局会见陈督理、郑汝成，要求和平解决。次日，李平书又特邀陈其美、郑汝成、臧致平、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在高昌庙自来水厂会谈。李提出：“将制造局军火一并封存，等南北大局定夺后，再行办理。”郑汝成声称：“我等奉袁氏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如果前来攻劫，我等只有抵御之法。”上海总商会见制造局方面态度生硬，便于次日致函南北两军说：“本日宣传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争，商民恐慌，要求设法维持。顷间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敌党。”显然，这封反战公函，貌似公平，实际上警告革命党人，如果进攻制造局，则视为“敌党”。

由于上海革命党人方面兵力不足，不得不向南京方面求援。镇江赵念伯部 1 个团的支援上海部队抵沪。原由上海调赴南京的刘福彪统领的福字营，也被调回上海。陈其美将刘部改为敢死队。陈其美得到这两支军队后，才向制造局发起进攻。

讨袁军 61 团、37 团攻击制造局西栅，福字营助攻；松军、镇军攻南望道桥制造局正门。战斗开始后，北军凭借预先设好的阵地死战，海军发巨炮压制讨袁军的火力。由于讨袁军炮兵营炮火对制造局威胁很大，臧致平遂与海军司令部李鼎新商定，由海军集中炮火先轰击讨袁炮兵营。

炮兵营被摧毁，讨袁军失去了攻坚的能力，进攻失败，死伤 100 人。

讨袁军向制造局发起第 2 次进攻，这次进攻由福字营充先锋，其他各军配合。但仍然被海军大炮击退，死伤 500 多人。

敌将郑汝成顿时猖狂起来，他威胁南市商团说：“如果陈其美不取消司令部，我就进攻南市。”陈其美被迫将司令部撤往闸北南海会馆。当天晚上，

陈其美又令讨袁军发动第3次进攻。钮永建所部松军2000名与北军500名在沪杭车站发生战斗，随后，松军佯败诱敌，向西撤退，北军追击，遭到松军接应部队的回击。讨袁军再次失败。

红十字会长沈仲礼、英国医生柯司在驻沪领事团支持下，向讨袁军运动停战，但谈判没有结果。

讨袁军向制造局发动第4次进攻，主攻力量为松军1500人。但在进军途中，为北军探照灯发现，遭到制造局与海军炮火轰击。讨袁军受探照灯电力射目，不能还击，殊难进攻，只能在外日晖附近沪杭铁路地方布阵，亦开快炮遥击。进攻再次失利。

驻沪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战，支持袁世凯。7月27日清晨，租界工部局以中国商民夏粹芳等人要求保护生命财产为借口，派遣总房巡捕头卜罗司带马队30余人至火车站北南海会馆，驱逐讨袁军驻沪总司令部。陈其美此时已往吴淞，驻守司令部的蒋介石所率61团一部207人讨袁，为英军缴械。上海租界工部局曾在此以前决定将黄兴、孙文、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缙云、王一亭、杨信之等8人逐出租界。这次公然越界到闸北来驱逐讨袁军司令部，是一次公开的侵略行为。

袁世凯命刘冠雄率领舰队，以及北军第4师师长李厚基部进攻吴淞。吴淞前线开始吃紧。

讨袁军对制造局作第5次进攻之后，即将主要兵力撤至吴淞，以加强吴淞的防守，讨袁司令部也迁往吴淞炮台江湾中国公学内。

7月31日，北军援兵全部到达制造局，倒向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派遣部队开赴上海支援北军。驻在龙华的松军被迫撤离龙华，辗转退集于吴淞一带。进攻制造局之役完全失败，困守在江湾、吴淞一带。

吴淞原为姜国梁率广军驻守。段祺瑞派人广军进行策反活动，广军动摇，偷走炮门，图谋叛变，姜国梁出走。陈其美委任白逾桓、居正率镇军平叛，并任命白逾桓、居正为讨袁军吴淞要塞总监和总司令，扼守炮台。海军进攻吴淞，白、居指挥炮台守军反击，联鲸舰投降，海圻各舰逃遁。后来刘冠雄抵达吴淞口，一再指挥海军进攻吴淞炮台，屡攻不克。这时，刘福彪部由南市撤守江湾，经程德全勾引，阴谋攻夺炮台策应海军。

但程德全给刘福彪的攻夺炮台命令为居正截获。居正率部对刘部先行围捕，将刘军击退。

但由于刘部的叛变，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炮台兵力，就更加薄弱了。钮永建率部到达吴淞，居正等推戴钮为总司令，镇压了通敌的水上警察，协同守卫吴淞。

8月11日，从上海开出的北军进抵江湾。当夜钮永建、居正率兵进袭北军，冀收九死一生之效。无奈夜间战斗，军队服装不一，辨敌不清，深恐误伤，有妨元气，故小挫敌军，仍回防御。次日，沪、松消息断绝，居正部各军官逃走一空。饷源无出，兵士愈慌，军心动摇。红十字会医生柯司往返炮台与海军联系，与双方协商和平解决。商定由柯率领救护队于8月13日接收吴淞炮台。

红十字会接收炮台，钮永建、居正等已率1000余人经罗店退往嘉定，至太仓将部队解散，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

安徽的胡万泰和孙多森勾结起来，搞了一幕假独立的丑剧，于7月17日宣布安徽独立，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以孙多森为民政长，胡万

泰自称都督。

芜湖革命党人对胡万泰、孙多森的“独立”甚为怀疑。张永正率部以援赣为名，沿江上溯，同胡部发生冲突，胡部不敌，退回安庆。胡、孙两人搞假独立，心中有鬼，以赴上海提款为名，同船逃往上海，但胡万泰途经南京时，上岸跑到柏文蔚处进行活动。

柏文蔚虽风闻胡万泰与袁世凯早有联系，但却认为孙多森、胡万泰都是他寿州同乡，且与胡的父亲胡殿甲关系甚好，因此对胡相当尊重，不疑有他。

孙、胡离开安庆后，柏文蔚的亲信、宪兵司令祁耿寰被推为都督。但 2 天后，与段祺瑞私通款曲的胡部旅长顾琢塘即发动兵变，围攻都督府，赶走了祁耿寰，与商团勾结推出正在安庆休假的保定军校教官刘国栋为都督兼民政长。

这时柏文蔚正在蚌埠调集皖北各军以抗击倪嗣冲，忽得安庆兵变消息，又接到黄兴要他速回南京的急电，遂遑返南京。

黄兴要柏文蔚速返安庆，处理安徽的问题。柏文蔚率部返皖，胡万泰随行。柏抵安庆，顾琢塘亲自出迎，刘国栋闻风逃逸，安庆形势平静。革命党人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龚维鑫、管鹏、范光启、郑芳荪、凌毅等相继回到安庆。柏任龚维鑫为参谋长，代行都督职务，管鹏为内务司长，代行民政长职务。

倪嗣冲率马、步、炮 8 营进逼正阳关、遭到皖军长淮水警处处长岳相如和第 2 旅参谋曾杰率兵在三沫河口截击。河水猛涨，进兵困难，双方隔河对峙。河南都督张镇芳派旅长王钰锦率一支队，由周口店出发，支援倪嗣冲。倪嗣冲部进攻正阳关。安徽讨袁军一支队司令张汇滔率部奋勇阻击，获小胜。敌军退向东窜，欲犯凤台。

讨袁军与倪军再战鲁口，失利。倪嗣冲在得到豫军支援后，将进攻正阳关事交给豫军，自己率主力向凤台转移，定下取道凤台，直捣寿县之计。

倪部向凤台外围阵地发起攻击。讨袁淮上军主力 5000 余人在凤台城外土山、古城优胜地势布防，严阵以待。倪军向讨袁军猛攻，讨袁军竭力抵御。从凌晨 3 时 30 分一直战斗到 10 点，倪军右翼以地势不利，猛突数次，智穷力竭，几几不保。倪军急调左路 5 营及机关枪队接战，直鏖战到 14 时，方才攻占古城要塞。讨袁军被迫退守凤台。16 时，又放弃凤台渡淮溃退。倪军向寿州进攻，冯国璋分兵 1 团助战。

寿州失守，张汇滔率部退往庐州，被驻军胡万泰部下营长夏永伦部包围，张仅率少数人突围逃亡。豫军占领正阳关，淮上军全部失败。

柏文蔚令胡万泰为一线，在太湖作战，令龚振鹏为二线，向西作战，令张孟介为北路作战主力。许多人认为胡万泰早有异谋。反对他为一线，一旦胡统兵外出，放虎归山，后患不堪设想。但柏文蔚认为，内部即行破裂，影响殊甚。其实，胡万泰为一线，是胡向柏的有意献策。胡请求分兵赴援马当。胡领兵出省城 20 里许停扎，当夜返回安庆，准备对柏文蔚采取行动。

胡万泰来到都督府，见柏文蔚，气色傲慢，腰怀实弹手枪。柏知其来意不善，持吴禄贞所赐军刀，锋锐异常，注意胡若取枪，刀即出鞘。胡未敢动手，始问柏言曰：克强已走知之否？柏答曰不知，并伪责胡曰：大势如此，我预备所有之实力，你可继续保存，你前天电骂倪氏，未免不留余地，刻下最好派人前往疏通，克强出走我已早知，即准备一切交你负责。胡至此释然，

恶意顿消。

胡万泰未敢当面对柏文蔚直接采取行动，但他和顾琢塘在城外集合部队，以团长柴宝山部为主力，分兵3路向城内发动进攻，获内应入城，围攻都督府。叛军步马兵力不满2营，尚无炮队。忠于柏文蔚的部队，则有步兵2营，炮兵1营，重炮1营，炸弹队1队，宪兵1营，机关枪队约1营，完全能够平叛。但柏文蔚失去信心，认为黄兴既从南京出走，中心实力不存，大势已去，再战徒苦生民。他一面在都督府坚持抵抗，一面命令城西狮子山炮兵发炮轰击叛军，迫其转移兵力攻击炮台，然后率部数百人乘机出南门，仓猝渡江经大通退往芜湖，与龚振鹏部会合。

胡万泰在叛乱的当天，即通电宣布取消独立，北洋军乘军舰从湖口开抵安庆，胡万泰迎接入城。安庆遂为北军控制。

柏文蔚退到芜湖后，又率领部队去南京。

龚振鹏守芜湖，安庆叛军和汤芑铭的海军，已开始向芜湖进攻。驻守在芜湖外围的龚部团长常守昆在荻港以西战死，敌人集中陆、海兵力进攻荻港。守军英勇抵抗，激战6小时之久，荻港终于失陷。

8月27日，芜湖下游要地西梁山与东梁山先后为庐州夏永伦部攻陷。芜湖外围要地尽失，难以久守。28日，倪嗣冲部也来芜湖助战，龚振鹏弃城出走，安徽讨袁军完全失败。

在二次革命中，福建都督孙道仁曾一度参加赣、皖、粤、湘、闽五省联盟，后因胆小怕事而退出。李烈钧湖口起事后，福建陆军14师师长许崇智同部分国民党人组成讨袁同盟，向孙道仁施加压力，要求宣布独立。孙道仁以“若不赞成，暴烈立见”发布通告说：“刻下赣、宁、皖、粤业已宣告独立，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心。道仁广征意见，并据军政绅商佥请，一律赞成，以保治安。又据英、荷属79埠华侨电请伸讨前来，大局所关，吾闽亦不得不府顺輿情，宣告与袁氏断绝关系，自修政治，力策进行。……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即可共享永久共和幸福。”胆小怕事，必然反复无常。孙道仁宣布同袁世凯断绝关系后，又密电在京的前福建14师师长杜持，要杜向袁世凯政府说明他：“事急情迫，勉从众意，暂称脱离，并未用独立字样，且通告有云：‘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此仆之一片苦心，为全闽人士所共口者也。”许崇智等本拟出兵援赣及北伐，但孙道仁以饷械缺乏，总以保守疆土为宗旨，拒绝许等的要求。孙道仁虽表面上佯附革命，但实际上他在旅长孙宝镕的支持下，在密电调集旧部来扼杀革命。许崇智主要是依靠新兵的支持，力量不足，各军借口枪械不精，粮饷太薄，相率不肯随许崇智出发。

许崇智看出孙道仁无意革命，企图把孙推倒。但孙有旧部支持，许不敢贸然发动。

许曾派人赴沪运动海军，但无结果。

7月25日，袁世凯下令革职拿办许崇智。许看到形势不利，出走香港。

许出走后，孙道仁派人将讨袁司令部门额摘除，又致电在北京的杜持，要他向袁密报闽省情形，并说：“须广东势衰，赣省肃清，闽省即可取消脱离字样。否则，粤军来攻，闽人仍不能免祸。”袁世凯得到密报，便发布要孙道仁平乱的命令：“前闻福建有独立之谣，当即飭员确切查明。兹据复称：‘都督孙道仁素明大义，倾向中央。惟师长许崇智纠合乱党，冒孙道仁之名，妄称独立’等情。……著孙道仁督飭所部迅平乱事，重悬赏格，将许崇智拿获及其私党严拿惩办，以申法纪，仍责成该都督维持地方秩序，勿稍疏忽。”

孙道仁得到袁世凯的谅解，又保留了都督的位置，但没敢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小心翼翼控制福建的局面。直到大局明朗，才正式发出通电，陈明“衷曲”，宣布取消脱离袁政府。

广东陈炯明对起兵反袁一直犹豫，胡汉民、汪精卫自香港至广州，力劝陈炯明立即响应李烈钧湖口起兵讨袁，陈仍不敢发难。随后几天，武装反袁风潮在东南飙然而起。

南京独立时，曾推举与袁世凯夙有怨嫌的前清官僚岑春煊为各省讨袁总司令。岑曾任两广总督，广西都督陆荣廷和广东的济军首领龙济光皆系其旧部，孙中山、黄兴想通过岑春煊促使两广独立。岑于南京独立后，即肩负此使命南下。陈炯明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抛弃对袁世凯的幻想，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耍弄手段，已日益取得瓦解军心、民心的效果，而把反袁力量消灭于无形之中，使讨袁陷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陈炯明召开军事会议，当时有两步兵团长首先赞成独立，余各军官则反对，因畏陈之威，莫敢反抗。要塞司令饶景华，以不宜过急宣布独立为请，当被严斥。粤军1师师长钟鼎基起来说，独立事关重大，应当慎重处理。陈炯明勃然大怒，又申斥了钟鼎基。当天，恰逢省议会开会，陈炯明出席宣布广东独立。省议会一致通过讨袁，反对者逃席。

议会推陈为广东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即日发表《粤省讨袁檄》，列举袁世凯12条罪状，宣告与袁世凯断绝关系，由陈炯明率粤军北上讨袁。

陈炯明还发出布告，要求：（1）广东省所属文武军警及有任职人员，应一律照旧办事，不得本都督命令，不得擅离职守防次，如违彻究。

（2）各属外国人所驻地及教堂教民并游历之外国人，应由各知事会同军警切实保护。

（3）此次系广东省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并非南北恶感，亦非党派竞争，所有本省人外省人，均应各自相安，并由各属严禁寻仇报复，如违立即严拿究治。

（4）各属钱粮税契杂款及各关卡一切收入，均应照旧征收报解，不得借词抗延。

（5）各属地方非得本都督命令，不得借名筹饷，向商民人等勒捐军需。

陈炯明讨袁，已成骑虎之势。一则，广东军队已被袁世凯收买，陈炯明对军队失去了控制力；二则，从广东逃出的黄士龙，已投靠袁世凯，企图借袁之力来推翻陈炯明。

他已奉袁世凯密令，回粤设立秘密机关，进行倒陈活动。钟鼎基、苏慎初、谭流钦、饶景华、张我权等粤军将领亦入其彀中。广东海军也被黄士龙收买，陈炯明成了光杆司令；三则，由于陈炯明对民军采取杀逐和强迫遣散的手段，部分民党转为绿林，一些民军领袖在暗地进行反对军政府的活动。一般人民也对陈炯明屠杀民军、解散北伐军产生怨言，对陈失望；四则，广东军政府领导层处于涣散状态，朱执信、廖仲恺、陈融、杜贡石、金章、张树棠等都曾留学日本，被称之为日本派。钱树芳、关景燊、伍籍磐、黄兆珪、罗文干、罗泮辉、钟荣光等则皆毕业于欧美，被称为欧美派。两派相互拆台；五则，反动的龙济光军移驻梧州后，虽然人数不多，但为自存计，而谋求扩充和提高。他们聘请新式军官教练，朝夕奋习。加上袁世凯、陆荣廷大量枪械的接济，因而济军的军事素质大有提高。而李耀汉、翟汪所部7营及汪道

源所部 10 艘军舰归附龙济光，更使济军战斗力倍增。

陈炯明对此种形势缺乏清醒的估计。对内，他过份相信自己的威信和号召力。他没有看到各军官虽在他的压力下发表一则讨袁通电，实际上却视他的号令如空文。陈炯明拟先派 1 旅，由林震、张我权统率，前往援助李烈钧；再以其余部队为第二支队，取道南雄北上。陈复召各师、旅长到署磋商，但钟鼎基不肯应召，他以缺粮饷为借口，公开拒绝发兵援赣。陈炯明发放弹药和军饷之后，各部队的军官仍然按兵不动。由于他们或明或暗的阻挠，援赣之师迟迟不能成行，陈仅以子弹数万发援救李烈钧。

袁世凯发布命令称：“陈炯明祸国、祸乡，竟敢通电各省，措词狂悖，罪不容诛。”“褫去广东都督官职，并撤销其陆军中将暨上将衔，着龙济光督饬各师旅长派兵声讨，悬赏拏办。”袁世凯委任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觐光为宣抚副使。

陈炯明对龙济光疏于防范，认为龙济光对自己很崇拜，断不会倒戈相向。他在报上辟“谣”说：“龙济光不日攻粤，此说亦属无稽。即或确有其事，济军为数只有 5000，决难为拥护袁氏之效力也。”于是，他拒不采纳朱执信等人的正确建议，陷后防于空虚。

不仅如此，他还幻想龙济光能为己助，打电报向龙征求讨袁意见。龙在回电则诓骗陈说：“如果能付给济军军饷，当即率部下健儿，追随鞭镫，共扞国贼。”但龙济光又密电袁世凯说：“今日陈炯明来电云，江西独立，苏、皖、湘皆响应，渠为粤省大都督，兼讨袁总司令，克日兴师北上，特电要约等情，狼子野心，早知叵测，今兹果然，业已复电拒斥。……粤人对于济光感情甚洽，荡平粤乱，责不容辞。”陈炯明不知是计，派陈任平到梧州与龙济光谈判。龙济光把子弹和军饷骗到手后，就翻脸不认人，把陈任平杀死。

岑春煊入穗，陈炯明指望岑能笼络住陆荣廷、龙济光这两个旧部属，免除后顾之忧。

岑下车伊始，就打电报给龙济光，要他顺天应人，宣布讨袁。但龙济光予以断然拒绝，并公然奉袁世凯命令，率领济军，由梧州顺流东下，进攻广东。

陈炯明因而腹背受敌，局势更为严重，为了阻止济军东进，陈炯明命令汪道源出任肇庆绥靖处督办，前往封川江口布防，还加派兵舰 10 艘，交汪道源调遣。但为时已晚，西江防线已在济军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海军背叛了陈炯明，效命龙济光。其他广州各舰，或托词至香港，入澳修理，或托词避风，纷纷远走。同时，陈炯明过去镇压民军的恶果也显示出来，遭到残酷镇压和强迫遣散的流落在东江、西江一带的民军，乘机蜂起，打出反陈旗号。

在龙济光攻肇庆，其军尚未到肇庆，绿林已先为布置，肇庆不战而下。汪道源率兵舰溯西江而上，穿越羚羊峡，抵达肇庆河面时，即为济军包围缴械。他带领的舰队，也全部投降龙济光。

陈炯明得到消息，极度震惊，不得不改变计划，命令援赣部队停止前进，防守广州。

但所谓防守已经有名无实。钟鼎基等拒不受命。陈炯明大怒，将钟鼎基革职，钟惧而逃之港。张我权心不自安，亦逃之港。陈炯明另委李根源接任 1 师师长。李见大事已去，不敢赴任。1 师和独立旅群龙无首，局势更加混乱。

陈炯明同岑春煊结成反袁联盟，其实，他们的合作缺乏诚意。陈炯明举行讨袁誓师大会，岑春煊作为元帅莅临视察，方知各军人表露不赞同意，且有诘者，吃了一惊。岑看到陆军军心动摇，陈炯明已经不足依靠，因而大失所望，在发表一通“鄙人始终抱一救国救民宗旨，誓以血泪救苍生”的慷慨激昂演说后，于当天就背信弃义，仓皇出走。

这使陈炯明陷入更加孤立境地。

陈炯明派邓泽如向李福林求援。李拥兵数千，如果见义勇为，加入反袁行列，陈炯明也许能多支撑几日，等到邓铿把驻守琼崖的部队调回广州，也许会有另一番局势。但李福林滑如泥鳅，从来见风使舵。此时见陈炯明地位动摇，也在一旁冷眼作壁上观。

2 师师长苏慎初对陈炯明宣布独立，本不赞成，但他却不露声色，表面上仍和陈炯明虚与周旋，暗中则与军民人等设谋取消独立。8月3日，济军攻占三水县城，打开了通往广州的门户，随即进扑广州。二次革命的失败几成定局。

苏慎初这时撕下面具，于8月4日上午10时命令2师由沙河出发，直至牛王庙一带布防，准备战斗。同时又以大炮多门，直指都督府，待一切布置就绪后，苏打电话威胁陈炯明，要他取消独立。陈炯明此时还抱有幻想，认为陆军既然迁怒于己，那就只有辞职出走，局势或可挽救，因此赶紧派人动员姚雨平接任都督。姚雨平不愿接下烂摊子，代人受过，所以一口回绝。中午时分，燕塘炮兵奉苏慎初命令，率先炮轰都督府，都督府卫队奉命出防，半路上哗变，并派出代表，与燕塘军联络，一致倒陈。陈炯明手中无一兵一卒，无可奈何，只好挟资百万和副官黄强一起，躲进广州石室天主教堂，然后在法国神父的保护下，秘密出走香港。

苏慎初被举为临时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即加苏慎初陆军上将衔并给勋三位。

8月5日，张我权又驱走苏慎初，自称都督，并发表取消广东独立电。11日，龙济光率部3000进驻广州，开始了长达3年的残暴军阀统治。

陈炯明出走后，委托邹鲁主持策反工作。邹派人去各地联络，定于8月15日晚上起义，以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为内应，不料事机不密，陈被龙济光设宴诱杀，起义流产，邹又派保定军校学生陈铭枢潜入广州，暗杀龙济光，同样没能得手。

琼崖镇守使邓铿回援广州，打算赴三水督率旧部叶举旅抵挡济军。邓到三水仅1日，苏慎初倒戈反陈，邓铿挽救广州的努力终归徒劳。

至此，二次革命完全失败。

## 第四章 流离日本海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离开上海，同胡汉民等人乘船去福州，打算从福州换乘去广州的轮船。轮船到达福州时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孙中山的朋友多贺宗之急匆匆登上船来。

孙中山有点诧异，心想：“他来干什么？他怎么知道我在这艘船上？”



他微笑着迎上去热情地伸出手，想同多贺宗之握手问安，多贺宗之却一挥手，抢先低声说了一句：“回舱房去！快！”多贺宗之说着一把夺过孙中山手上提着的皮箱，挽着孙中山的臂膀往回走。胡汉民惶惶地紧随其后。回到孙中山原来的头等舱房，多贺宗之随手把门关上，焦急不安地说：“孙先生，胡先生，你们不能下船！”孙中山惊讶地问：“怎么，出了什么事了？”“我为你们买到了到台湾去的船票还是这艘船，明日启航。今晚你们只好在船上，千万不能上岸。袁世凯已经下令追捕你们几位国民党领导人。”多贺说着，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盖有大印的布告，递给孙中山：“您看这个。”孙中山接过一看，果然是北京政府发出的通缉令。

孙中山怒目圆睁，愤愤地骂了声：“无耻！”尔后对多贺武官说：“感谢您的好意，多贺先生！袁世凯下通缉令的事，我们离开上海时就知道了。但是，我不去台湾，我要去广州，我要亲自指挥陈炯明的粤军，北上讨伐袁贼！”多贺宗之控制内心愤慨，镇静地说：“广东的局势已经逆转，龙济光与驻粤将领合谋附袁，陈炯明逃离广州，去向不明。袁世凯派出大批密探、刺客，布满了南方诸省。”“我先赴香港，再图讨袁大计。”多贺宗之不赞成地摇摇头。

孙中山惊愕问：“怎么，难道连香港也去不成吗？”多贺宗之轻轻地点了点头，又从公文包内取出一张命令：“这件事，您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孙中山慢慢地伸手去接过英国政府命令香港英督禁止孙文、黄兴等国民党要人入境的文告。孙中山看着，肝火往上冲，不禁放声骂道：“太卑鄙了，想不到英国当局竟公然与袁世凯勾结。”孙中山把纸递给胡汉民：“你看看，当年反清，同盟会党人尚可在香港设立机关，进行革命活动，现在香港当局为了讨好袁世凯，竟下令禁止我们入境。”胡汉民长叹了一口气：“先生，上海回不去，广州、香港去不成，只有先到台湾去了。”轮船到了台湾基隆港，孙中山和胡汉民夹在旅客中间走上码头。刚刚来到一个广场上，一队警察在一个挥着长刀的日本警官的带领下，向聚集在广场的人群冲去。人群惊惶四处逃散。胡汉民见状，喊了一声：“快步！”拉着孙中山朝广场外跑去。他们俩人刚跑出几步，身后忽然有人喊道：“快跟我来！”孙中山回头看去，原来是他的同乡、早年的革命同志杨心如。他惊喜万分，正欲喊，却被杨心如挥手制止。他们一路急走，拐进小巷，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旅店。杨心如把他们领到自己租的楼上房间内。没等孙中山开口，杨心如说：“好了，多年来各奔东西，历尽沧桑，今日偶然相逢，你我都有很多话要说，只是现在不是时候。”“怎么，这里不安全吗？”“袁世凯的密探早两天就上岛了，刚才广场上的事，就是他们勾结日本警官干的，他们要抓革命党人。……”楼下突然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杨心如忙收住话，朝孙中山投去一个眼色，急忙下楼去了。

孙中山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步，几次想把头伸出窗外去看个究竟，都被胡汉民拦阻回去。

不一会，杨心如神色慌张，一进门便说：“外面势头不对，日本宪兵和地方警察正在挨门挨房通知，要居民取下挂在厅堂上先生您的画像，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北京政府的通缉令，他们出20万大洋重赏捉拿你。”孙中山解开外衣纽扣，两手叉腰，怒目圆睁，注视窗外日本宪兵和当地警察在街道上来回穿梭，吆喝。胡汉民心情十分紧张，目光呆滞，不知所措。

“东渡日本，重聚力量，再举革命！”孙中山一拳打在桌子上。

杨心如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只身逃到台湾，在台北美时茶行当账房。曾与陈少白一起负责台北兴中会的工作。这次他到基隆是为茶行老板收账和接洽一笔生意，恰巧在广场上遇见孙中山和胡汉民。他很想留孙中山、胡汉民在旅店里住几天，好好叙谈叙谈，却又碰上大搜捕，只好同意孙中山东渡了。

夜里，日本“信浓丸”海轮启航回国。杨心如给孙中山和胡汉民买了头等舱船票，并把自己的两套唐装送给他们，给他们改扮一番，又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给了孙中山，尔后悄悄地送他们到码头。上船前，杨心如叮嘱孙中山：“先生，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说不定这条船上也有密探。”孙中山、胡汉民默默无语地同杨心如握手告别，踏上“信浓丸”甲板，走进舱房。

“信浓丸”在风浪中向前方驶去。孙中山、胡汉民各自躺在小床上。突然，舱外甲板上一阵骚动、叫嚷声、谩骂声由远而近。孙中山急忙下床，从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几个日本船员押着一个健壮的中国青年，前拉后推地朝船长室走去。因月光迷蒙，船灯昏暗，孙中山没看出那青年的面孔。

不久，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前一后走进来两个人来，前头的那人面向孙中山道：“高野先生，您好！”“高野”是孙中山的化名，是杨心如去购买船票时遵照孙中山吩咐改名的。

孙中山闻声转身看到身穿制服的人，便知是船长，后面跟着的那个却是普通水手打扮。

“我叫郡宽四郎。”船长自我介绍道。

“郡宽先生，您好！您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孙中山十分客气地说道。

“我的船是专门航行在日本——中国这条航线上，加上我们船上有几位中国船员，慢慢就学会了，不过写汉字还差些。”郡宽指着身后的水手又说：“这位就是中国人，在我上当水手，我很喜欢他。为了给您解闷，我特意让他来陪您下棋消遣，好吗？”“欢迎，欢迎。”孙中山这才发现水手的手里本拿一盒东西。可能就是象棋吧。他很感谢船长的关心。

“那好，你们玩吧，不过只准下一局，下完就休息。”郡宽船长说完，转身朝舱门走去。

“请留步，郡宽船长！”孙中山把船长喊住。

郡宽回身问道：“有事吗？”“刚才，你们抓了一个人？”“是的，是一个中国青年人。”“他犯了罪？”“因为他没有买票，是混在旅客中间登船的。”“就因为这个吗？”“是的，高野先生。”郡宽态度平静，但又有些疑惑地回答。

“哦，他对您说了吗，他要到哪里去？”孙中山得知青年人只是因为没票被抓，以为他也可能是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才逃亡日本的，心情松缓了些。

“他说，他要到日本去谋生。”“那就让他去吧，不要关押他，更不要把他交给公使馆。”孙中山从衣袋里掏出杨心如临别时给他的几百日元，“船票钱我付，给您。”“不不，高野先生。”“乘船不买票是不对的，我想，也许那青年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请您一定收下，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有责任帮助他。”郡宽微微一笑：“好吧，你们下棋吧。”把钱收下后，走出舱房。

被抓的那位中国青年是林寒梅，他到日本后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8月9日，“信浓丸”即将驶进日本神户港，船长郡宽收到通缉孙中山

的命令，急急忙忙来到孙中山的舱房，严肃地说：“二位先生，请马上跟我走！”“船长先生，要我们到哪儿去？”“神户水上警察署要搜捕你们，现在必须把你们隐藏起来。”“好，我们听从您的安排。”郡宽四郎把孙中山和胡汉民领进他的办公室里间的一个小房间，拉开舱壁上的一个不易发现的暗门：“请进去吧！”孙中山、胡汉民进去后，郡宽把门锁上。

郡宽四郎回到船长办公室，坐在帆布躺椅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通缉令，从头至尾地认真看了一遍。又把通缉令折叠好，站起身来，把通缉令压在桌子上乘客花名册的下面，在室内慢悠悠地踱起步来。副船长急冲冲地走进船长室，低声对郡宽四郎说：“神户水上警署的汽艇向我们这里开来了。”“不是说好了，等船抵神户港时，他们才上船检查吗？怎么变卦了呢？我刚才交代的事，赶快去办。还有，孙先生他们住的五号舱房要仔细整理一下，他的那些书要收藏好。”“是，你放心吧！”副船长转身退出船长室。郡宽四郎戴好帽子，整整服装，振作起精神，迈开大步，直出办公室，去迎接神户警察署的事务长和警官。

事务长和 4 名佩带金色肩章的警官被郡宽四郎请进船长室。事务长坐下后，用审视的目光盯着郡宽，说道：“内务省警察局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情报：中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可能乘你的船来日本。我们奉命前来搜捕。”“事务长先生，这位孙大总统我认识，几个月之前他以国宾身份来我们国家考察工业和铁路时，我在长崎见过他一面，自然他不认识我。请放心。如果孙中山确实在我船上，我是不会不加注意的，也一定会把他交给你们。”事务长不相信郡宽船长的话，他一边吸着烟，一边饮茶，那瘦长的脸上没有丝毫反映，而那对小眼却射出疑神疑鬼的狐光。

郡宽船长拿起桌上旅客花名册说道：“我看这样吧，这是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名册，请您先看看，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話，可以亲自搜查。”郡宽说完，把名册递给事务长。

事务长接过花名册：“好，就这么办，”他朝四位警官使了个眼色，又回过身来，对船长点点头：“船长先生，请勿介意，这是履行公务。请吧！先检查头等舱。”列队站在甲板上的十几名警察，在警官的指挥下，开始了大搜查。事务长检查头等舱，郡宽四郎一直跟随在他身后。

一个警官过来报告：“头等舱五号房的两名旅客不在房里。”这五号房正是孙中山、胡汉民的舱房。

事务长一扬眉，睁着鼠眼，望着郡宽船长：“噢！船长先生，五号房的两位旅客是……”“这两位旅客是台北美时茶行的经纪人，他们是到日本来接洽茶叶生意的。昨天我到他们房里闲谈时，他们还拿出几包茶叶给我。”郡宽十分镇静地回答道。

事务长边走边说：“是做茶叶生意的吗？”他显然不相信。来到五号房，果然见茶几上有两包茶叶。他拿起看看，包装纸上印着“美时茶行出品”字样，“人呢？都快到神户了，他们这时会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也许是在小餐厅里喝酒，也许是在船尾甲板上散步、聊天，或者是在别的舱房跟中国旅客谈茶叶的事吧。要不要去找找他们？”“不不，不必了，我们在房里等等他们吧。”事务长在帆布椅上坐下。

“也好。”郡宽船长只好坐在床上。

一高一矮。身穿长衫的两个中年人兴冲冲地走进五号舱房。高个子见到船长，笑着说道：“噢，船长先生在这里，实在对不起，我们到餐厅吃点

心去了。有事吗？是不是给我们美时茶行拉到了笔生意，介绍买主来了？”他故意瞟了一眼坐在帆布椅上的事务长，还向他点点头。

郡宽船长起身，正想说话，不料事务长抢先说道：“早就听说，美时茶行的茶叶声誉很高，今天郡宽船长特地领我来见见二位，我们神户水上警察署也想买些好茶叶。”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几张孙中山的照片，偷偷地对照眼前这两个中国人，审视一番，都不像，但又不放心。一对鼠眼转转，计上心来，漫不经心问道：“你们从事茶叶买卖多年，谅必对茶叶有很深的研究喽？”“谈不上研究，不过，做买卖嘛，总得知道一点茶叶上的事。”高个子笑着回答道。

事务长露出狡猾的笑容：“好好。我爱喝茶，还想知道支那人喝茶的历史和风俗习惯，你们能介绍介绍吗？”高个子一时语堵。事务长嘴角慢慢露出一丝冷笑，沉默一会后，突然睁开眼睛，正想发话，不料矮个子上前一步，客气地说：“长官，敝人虽说经营茶叶多年，但由于才疏学浅，对茶叶研究不深，如果长官不见笑话的话，我可以略说一二。我国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年浮梁买茶去’，可见既有人贩运茶叶，各地必有喜欢喝茶人。在中国，据文字记载，饮茶盛行乃始自晋朝南渡之后，不过，当时所用之茶叶，是碾成粉末制成饼状，而且还有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盐等合煮的。当时饮茶所用之器具，正像如今还保留在贵国‘茶道’里的那些。”这位事务长曾在日本驻清朝公使馆干过事，在北京呆过几年，算是半个中国通，一听矮子的回答，似懂非懂，似知非知，一副窘态：“噢噢，是这样，是这样。那这茶以哪种为上品呢？”矮个子不慌不忙地答道：“据《茶谱》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蕙、兰、橘、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但据我之经验，以茉莉花茶为上品，因为茉莉花晒干后，贮藏于干燥处，其花颜不褪，其香味不变。花茶乃是中国四川人发明。”“说得有理，说得好。”事务长见他对答如流，引经据典，全是行话，不仅解除了疑惑，而且表示恭敬，起身施礼道：“好了，公务在身，不能多谈，失陪了。买茶叶之事，到了神户再谈吧。”事务长随郡宽四郎回到船长室。一进门，郡宽对事务长说道：“我们接到这份通缉令，哪敢让孙中山在我的船上。”“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事务长带着恼怒的表情又说：“我们山本权兵卫内阁的态度变得也真快，半年前，视孙中山为国宾，热情接待，这阵子又把孙中山当作国事犯，拒绝他在日本登陆。真是令人难以捉摸呵！好了，我回去交差，你也准备进港吧！”神户水上警察署事务长带领警官、警察坐汽艇离去，一场虚惊过去，郡宽四郎急忙打开小房的门。

孙中山、胡汉民走出小黑房，孙中山紧紧搂抱着郡宽四郎，眼眶上挂着晶莹的泪花：“谢谢您，谢谢您的帮助和搭救！”“快别这么说，刚才若不是我们船上的一位中国厨工对答如流还险些出事呢！”郡宽就把刚才发生在五号房里的事说了一遍。

一高一矮的两个中国人在副船长带领下走进船长室。郡宽把他俩介绍给孙中山。原来这两个中国人都船工。高个子姓刘，是勤杂工，矮个子姓李，是厨工。

孙中山同他们一一握手：“谢谢你们！”海轮在神户码头靠岸。郡宽拿出望远镜朝码头望去，见码头出口处的警察很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还有几个像中国人在出口处游动。郡宽略为思索后轻声对孙中山说：“目前，你们不能上岸，码头上已布满了警察和密探。北京驻日使馆派有耳目在神户

和东京等地，就连我们船上旅客中也有袁世凯的密探。日本政府也不准许你上岸。为了防备万一，你们还必须在我这里躲藏，我派人上岸探听消息，秘密地同您的朋友联系，援救你们。”“谢谢！我相信您，听从您的命令！”郡宽四郎在下完旅客，卸完货后，立即将船驶离码头，停泊在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并派出副船长和刘、李船工上岸，根据孙中山提供的地址，秘密地与在神户、横滨、东京等地的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联系。

码头上的警察一直没有撤去，对旅客检查很严。街上贴了一些中日两国文字印的通缉令。松本副船长一直在日本奔走了两天，终于把孙中山的老朋友古岛一雄、萱野长知和菊池良一3人接到“信浓丸”号船上。

孙中山看到3位老朋友，惊喜若狂：“朋友，你们好！快请坐下，我真想念大家啊！”古岛一雄说：“袁世凯通令缉拿您和黄兴等人，山本内阁竟下令禁止您在日本登陆，并要逮捕您，大家都非常愤慨，也万分担心、焦急，因为我们估计您是一定要东渡的。

为此，官崎寅藏、犬养毅、头山满、梅屋庄吉，还有我们几个，几天前就商议要尽一切努力，让您能在日本停留。”“谢谢大家！我们中国有句俗语：‘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大家这样关心我，我一辈子都会牢记大家的友情的。”孙中山说着，眼角都湿润了。

萱野长知知道：“谢什么，孙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信浓丸’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头山满就去拜访军政界要人，如犬养木堂。他答应动身回东京与山本首相商谈。可是，就在这时候，‘信浓丸’到了神户，神户水上警察署派人上船搜查，我们几人吓坏了，急忙采取应急措施，古岛一雄雇了几只小船，在警察汽艇开出后，也一起驶向‘信浓丸’附近，乔装捕鱼，监视船上搜查。今天犬养木堂回电了，他说，山本已私下同意您上岸，但是必须绝对保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各地都有耳目。山本内阁目前还不敢公开保护您，他担心北京政府会对日本在华的利益和侨民造成威胁和损害。

接着，他们一起商量的秘密上岸的方案。第二天，孙中山、胡汉民穿上西装，系上领带，脸部作了化妆，乘坐一艘银白色的小汽艇，松本和萱野长知驾驶着汽艇在海上绕了个大圈后，才向神户讷访山附近一个僻静的小港湾靠岸。孙中山、胡汉民上岸后，跟随荒野翻过一座小山，来到松本幸次郎的别墅，并在那里暂时住下。

神户的一家报纸，把孙中山抵达神户的消息登出来，而且还说是乘“信浓丸”号船抵日的。北京政府驻日公使馆立即向山本内阁提出抗议，并派出一批密探到神户活动。

新闻记者根据“信浓丸”这几天既不装货，又不准船员上岸的迹象，推测孙中山是乘“信浓丸”来日本的。神户水上警察署只好派人再次搜查“信浓丸”海轮，还将船长郡宽传到警察署盘问许久。神户通往外地的水陆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严格检查进出车船。

神户市内气氛异常，大街小巷都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巡逻，宾馆旅店也有警察把门。夜里还进行了全市大搜查，抓去了几个日本居民和中国商人到警察署问话。紧接着，搜查范围又逐步扩大到郊外小镇。

古岛一雄、萱野长知立即安排孙中山、胡汉民转移到东京去。

这天晚上，萱野长知、古岛一雄陪着孙中山和胡汉民，秘密地下了讷访山，在小港叉里登上小汽艇。萱野长知亲自驾驶小汽艇，朝神奈川县方向

飞驶而去。

小汽艇在海里停停开开，直到次日下午 3 时，才靠上了神奈川县富冈海岸的一个小码头。码头上人来客往，十分热闹。在码头不远处，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在等候他们。这是萱野长知事先与东京方面联系安排的。

汽车在黑夜里亮着大灯，向东京方向奔驰而去。萱野长知同古岛轮换开车。第三天天未亮就来到了东京，在赤坂灵南坂 25 号头山满的住宅前停下。

头山满与孙中山见面，紧紧地抱在一起，两位异国朋友如同久别的亲兄弟，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头山满把孙中山安排在与他一墙之隔并有小门互通的房舍里。这所房子是海妻猪勇彦的住所，房子比较合适，屋宇轩昂，庭院宽敞，围墙高筑，前后有门，各通一街，又有侧门与头山满住所沟通，万一遇事，有地方躲藏，逃走也易。头山满从海妻猪勇彦那里租借几间给孙中山使用。海妻欣然应诺，主动把房间粉饰、布置一新，在院庭里移种了许多花草。

## 第五章 重整旗鼓

革命党人纷纷流亡日本。戴季陶随孙中山之后，化装成日本新闻记者，改名岛田政一，从大连乘轮船“台南丸”来到日本。

戴季陶又名戴天仇，他的祖籍是安徽休宁县，以后迁浙江湖州府吴兴县。清朝乾隆末年，戴季陶的高祖戴闻天只身流浪到四川。起初做帮工度日，以后几经辗转，在成都不远的汉州，靠一个浙江同乡的接济和帮助，做起瓷器生意来。他以质取胜，收项颇丰。

他的“昌泰瓷号”名声大噪。戴闻天在广汉定居下来，娶妻得子，建家立业。家业传到戴季陶的祖父戴廉手中。戴廉为人慷慨尚义，尊师重道，远近皆赞美其具有侠义之风。

他精绘画，却不善于理财，晚年由于商业不景气，干脆关闭了两家瓷号，闲居在家，沉溺于丹青之中，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他能画一手绝佳的海棠图，远近闻名，为时人所唱。

戴季陶的父亲戴小轩也精于绘画，但他受人秘传更擅长外科医术。戴小轩娶妻黄氏，受其指点，也精通治疗。他们夫妇医术精湛，远近闻名。黄夫人笃信佛教，虔诚之心莫有能比。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随母亲烧香敬佛，但他多出好奇之心，并不能深领其意。

戴小轩有四男三女，戴季陶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戴季陶排行最小，自然最受宠爱，吃喝玩乐都让戴季陶占尽。

戴季陶的祖父素具侠义之气，喜欢替人排忧解难，每遇有人发生纠纷，总是乐意居间作保。好人做多了，少不得会有得罪人的时候，赔钱受累且不说，生活日见困难。在广汉颇有声望的戴氏家业从此衰落。

戴季陶天资很高，他从小聪明异常，年仅 6 岁就能即景赋诗。一天，戴季陶随父亲及父亲的三位挚友到郊外散步，时值新麦方吐嫩穗，春光明媚。年幼的戴季陶在盎然春意中跑前跑后，欢跃如雀。戴小轩见儿子那聪颖的模

样，也得意万分，便命他即景赋诗，以为助兴。戴季陶果不负父望，迅速转动他那机灵的小脑瓜，面对大好风光，用稚嫩的童声一板一眼地吟诵出一首五言绝句来：“新麦出堤上，迎风如舞浪；极目不知远，江山皆在望。”戴季陶 10 岁跟随长兄读书。长兄戴传薪在汉州纯阳阁开设私塾，他对小弟要求非常严格，专门为他制订了学习计划。戴季陶读了许多书，眼界大开，学习进步很快，1901 年冬，年仅 11 岁的戴季陶随两个兄长一道去参加童子试，大哥戴传薪顺利地考取了生员，戴季陶在州试和府试中均名列前茅，偏偏院试时，《易经》试题是“为大赤”，以戴季陶的年龄及他所读过的书籍，实在是搞不懂“为大赤”的题意，不明题旨之所在，根本无从落笔，最后交了白卷，整个考试功亏一篑，戴季陶心中好不懊恼。

1902 年，戴季陶随长兄戴传薪到成都。戴传薪在东文学堂谋到了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送进东游预备学校读书。戴季陶在那里学习日语，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语。

一年以后，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同学之中多是举人和秀才，唯独戴季陶一人年仅 13 岁，远离弱冠之年。在这里，戴季陶受名师指教，学问大长。每每考试，年龄最小的戴季陶总是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受到客籍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

少年戴季陶并不顺利，倒霉的事接踵而至。一次体操运动时，他不慎栽倒在地，左脚关节骨折，经过治疗没有完全康复，以致终生走路都有些跛。而且步行过久或天气变化，都会隐隐作痛。在这之后不久，学堂里调来了一位为人很不公正的监督（校长），他在评定学生成绩时常常随其所欲，偏袒喜欢的学生。戴季陶一向名列前茅，校长很不公正对他，他在愤恨不平之际，奋起发难抨击。校长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对，竟然将戴季陶开除，并以师道尊严之词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学校，不得收录戴季陶入学。

戴季陶改名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华英学堂。入学不久便显出他的聪颖和功力，在学堂里大出风头。可是树大招风，仅三个月便被官府查出这个改名换姓的人物，立即勒令退学。这时，戴季陶的华英学堂老师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学聘为理科教师，他们几乎同时离开华英学堂。小西见戴季陶喜欢读书，能用一口流利日语和他交谈，更加偏爱他。

于是便主动介绍戴季陶到川北中学去做他的日语翻译。这样，15 岁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月薪 15 元。

小西三七是位很有远见的日本人，他认定倘若戴季陶今后还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将来必定难成大材，故极力鼓励戴季陶去日本留学。戴季陶雄心勃勃，经过学堂风波，对腐败的清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又接受了小西向他灌输的国外先进文化，特别是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情况，决心听从导师的指点，东渡日本，寻求新知识。

1905 年，年仅 16 岁的戴季陶，叩别亲人，挥泪踏上东渡日本的征途。戴季陶乘船顺江而下，来到汉口，他准备上岸找个客栈暂住几天，再行东下。

他随身携带七百块大洋分做两处存放，身上背五百，提篮里放二百。他本来左脚遗留旧伤，不便步行过久，加之码头上的大斜坡更是难上，他提着沉重的行李，吃力地在人群中穿行。突然一条大汉从他身后闪过，一把抢过戴季陶的提篮就冲进人群里。戴季陶知道自己遇上了强盗，惊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与戴季陶同行的是他的一位族兄，他在族兄的安慰和照料下，继续东

行而去。

戴季陶在日本东京，先后进师范学校、日本大学读书。他文采风流，辩才雄盛，为人又热情慷慨，在日本大学时间不长，就成为风头人物。他在二年级时，便同几位朋友，胡森、王用宾、谢健、杨子鸿、张伯烈等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被选为同学会会长。

戴季陶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他有着超人的才华、汹涌的激情、俊逸的丰采和豪放不羁的品性，赢得周围同学的尊敬和喜爱，也令不少异邦女子暗怀春心。一位李姓皇族公主的朝鲜女留学生同他一见钟情，哪知日本政府对朝鲜留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自由活动。戴季陶不畏强暴，决定公开自己的爱情，他和李小姐把各自的亲朋好友邀集在一起，举行宴会，宣布他们正式缔结婚约。郎才女貌，到场的友人无不衷心地为他们祝贺，俩人幸福至极。但婚宴后没几天，李小姐突然失踪，戴季陶的伊甸园被莫名其妙地拆毁，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回国，他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但是当他回到上海之时，身上只剩下四角钱，不足吃一餐饭，他毫无办法，只好在茫茫人海中无目的穿行，以期发现生的彼岸。就在他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结识了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张俊生。

张不仅慷慨解囊，并给他鼓励勸勉。

不久，戴季陶离开上海去江苏省城苏州，以毛遂自荐的勇气，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门，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担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

1910年春，戴季陶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当新闻记者。他先在上海日报社，后转入天铎报社。戴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工作，夙夜不懈，因而得到了天铎报社社长陈杞怀的赞赏。两个月后，便被破格提拔为《天铎报》总编辑。他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的笔名天仇也为人人皆知，“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

1911年，戴季陶刚刚完成新婚嘉礼，还未来得及度蜜月，清政府指名逮捕他。他闻风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长崎。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秘密潜回上海。哪知上海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他无法在上海立足，独自一人到了浙江省吴兴县，匿居于云巢山道观，过了一段闲云野鹤的出家人生活。

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轮，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在槟榔屿担任《光明日报》编辑。他在那里引起了革命党注意，由著名的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陈新政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于1911年10月20日回到武汉，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攻占汉口招商局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勇敢冲杀。武汉的形势逆转，戴季陶便从武汉来到上海。

他到上海后，立即协助陈其美筹划武装起义。并同陈其美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的起义。

上海光复后，戴季陶毅然离开繁华的上海滩，附轮北上，来到大连。他在大连同东北的革命党人领袖一起，筹划东北的武装起义。他试图一举铲除满清王朝的发源之地，使南军北伐时，清统治者援助无人，逋逃无处，只有束手归罪。他同商震、蒋春山、张光如等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戴季陶等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迅速任命蓝天蔚为东北主要负责人。孙中山接电后，即任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蓝就任后委任戴季陶为关外都督府



交通部长。

蓝天蔚率军北伐。因革命军缺乏枪械军火，戴季陶火速电告上海方面。上海的陈其美接电后，命令沪军将领刘基炎押运大批枪支弹药前往烟台。

刘基炎中途突起歹念，悄悄将这批军火改运登州，以图据为己有。戴季陶及时得知这个消息，他假托有事，邀请刘基炎到海容舰议事。

刘基炎对于文人戴季陶没有一点戒备，十分坦然地到海容舰上赴会。戴早有准备，待刘基炎得意洋洋地登上海容舰时，亮出手枪，对准他的胸口。刘大惊失色，退路全无，只好束手就擒。戴勒令他将吞没的军火交出来。一个武夫，却被文士制住，茫茫大海，逃走不能，反抗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允将吞下去的械弹吐出半数。

革命军跨海北伐，很快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反动清军望风披靡，革命军占领瓦房店，攻克庄河厅城。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只好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

他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创办《民权报》，并担任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一概抨击无余。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大有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之概。

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并终于不能容忍。袁世凯大权在握，急于清除异己，扫除复辟帝制道路上的障碍，于是，首先拿戴季陶开刀。

1912年5月22日，一伙租界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民权报》社戴季陶的办公室，出示拘票，上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

戴季陶当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辞地申辩：“拘票上写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这算是什么罪状？何况，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们凭什么抓我？”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么申辩，不仅逮捕了他，而且还想抓报馆里其他人，他们问报馆发行人是谁？戴季陶冷笑道：“你们是执法的，应该懂得法律，你们带来的这张拘票上，并没有列本报的发行人，怎么可以胡乱牵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呢？”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厉声质问领班：“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么关系？租界捕房是否有这个权力，代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捕房领班瞠目结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说什么。

由于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辩滔滔，也无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向自诩为“文明自由”的租界当局无法将他定罪，再加上朋友尽心营救，规定的羁押期限一到，捕房只好将他无罪开释。

戴季陶出狱后，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写文章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外，还发挥文学特长，编写剧本宣传革命。他坚持反袁斗争，虽然为此下狱，也在所不惧。他那意气纵横、声光逼人的文章，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警醒人们继续战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前，即1911年春，曾在槟榔屿为孙中山家当私人教师，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金琰和14岁的金琬讲授国文，这时

孙中山在欧美筹款。1911年12月底，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询问了戴季陶的姓名和个人的一般情况，孙中山这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两人开始成为忘年交。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担任了孙中山的专职记室，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很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他和黄兴召集1、8师各级军官、各单位主管军官会议，戴在会上宣布了袁世凯杀害元勋、毁弃约法、破坏宪政的罪行，号召大家起兵讨袁，广大军官都表示响应，少数袁党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藩鑑等表示反对，戴季陶和黄兴立即采取革命手段，当场将这几个反对军官逮捕，并毫不留情地杀掉。

为了保证黄兴的安全，戴季陶说服黄兴离开南京。黄兴和南军一些将领逃离南京后，戴季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动，受到士兵群众的欢迎，一般同志闻戴天仇来，亦莫不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危急情况下，采取了迅速筹款、整顿军队等措施。他和何海鸣等人一起领导了南京第二次起义。

南京陷落后，戴季陶没有外逃，坚持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了挽回败局，他联络了1、8师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图谋再举，但不幸消息泄露，没能成功，反革命军队到处捉拿戴季陶，城里一片白色恐怖。

一天，戴季陶办完事从外面回来，见北洋军已将他的住处，即由日本人经营的宾来馆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宾来馆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坦然前行。因为北洋军并不认识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戴季陶昂然进入宾来馆，然后携一名日本妓女，双双翩然而出，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险关。

戴季陶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袁世凯命令他的御用北京总检察厅，下令通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分“首魁”及“执重要事务”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

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革命斗志并没有低落，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到东北去重新聚集旧部，组成一支精悍的军队，从东北打进关内，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权。他从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连。

大连的革命党人宁武、刘纯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鱼等人欢迎戴季陶的到来，他们一起筹措经费，购买军火，发展党员，等时机一到，便拉起军队，公开反袁。但那时全国反袁斗争形势已经低落，戴季陶虽有宏图万里，也鼓翼难飞。

这时，他听说孙中山偕胡汉民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是，他决定去日本与孙中山合作，于1913年9月下旬来到日本东京。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严重迫害，军队溃散、党人星散，中国上空，封建帝制的阴云迅速凝聚。

在这严重关头，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加上生活困难，互相诟谇，20 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袁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其中少数党员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并没灰心丧气，也没有被袁世凯的嚣张气势所吓倒，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更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为了安置同志培养干部，以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办了两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前者研究军事，后者则学习政治、法律。

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触动，他花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意见之分歧，步骤凌乱，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特别责备黄兴，自辛亥革命后，许多作法违背他的意愿。正因为这些原因，革命才遭致失败，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规定：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有志于革命救国，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志，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无疑，这里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这套绝对服从领袖和打指模表忠心的办法，近乎专制和迷信，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孙中山旨在团结同志，加强党内统一，以便再接再厉，坚持讨袁斗争。

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得逞，其势力正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他们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抱反对态度，被称为“缓进派”。

孙中山则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既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党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黄兴等人认为，逃亡日本的党人，都是被袁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案时期对他们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反袁力量。黄兴等对党员入党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表示异议，认为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

入党要在誓约上按捺指模，是对党人人格之侮辱。

孙中山对党员必须服从党魁一人解释说：“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第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关于袁世凯受命为总统一事，

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

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其余建都南京，乃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生，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为了筹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 17 次召集会议，讨论建党方案和原则。黄兴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请人婉劝孙中山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孙中山意志异常坚决。

黄兴觉得这样相持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的力量，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游美，使孙中山行其所是。

1914 年 3 月，黄兴在孙中山直接安排下，携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唐月池、秘书石陶钧、李书城等人，乘日轮赴美。

李烈钧、谭人凤、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 第六章 刺客大搏杀

中华革命党从 1913 年 9 月下旬开始吸收党员，至 1914 年 4 月中旬，已发展党员 500 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廖仲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何香凝、邓仲元等等。

1914 年 6 月 22 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的有 8 省成员。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7 月 8 日，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孙中山就总理职，并宣读誓言：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政，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1）实行宗旨。

- （2）慎施命令。
- （3）尽忠职务。
- （4）严守秘密。
- （5）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孙文（指模）。

民国 3 年 7 月 8 日立。

会上，公布了孙中山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党的宗旨是：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会议选定党的领导机构，设协理一职，由黄兴和做过都督的国民党员担任，目的是团结不同意见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许崇清为军事部长，邓仲元为军事部副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杨庶堪为副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副部长。

9 月 1 日，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并通告美洲和南洋各地党组织，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都依《总章》第七条规定填写誓约，履行入党

手续。

中华革命党除设军事研习所和政法学校外，于5月创办机关刊物《民国杂志》，进行政治宣传。《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撰述人有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复声等。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更加紧了暗杀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活动。

袁世凯派他的私人保镖蒋自立去日本暗杀孙中山和黄兴。

袁世凯雇佣蒋自立为保镖还有一桩奇特有趣的事：袁世凯府上要增加几名保镖。消息传出，一日便有一名山东大汉蒋自立经旁人介绍来到袁府。袁世凯便先让手下人把蒋自立引到一间宽敞的客厅里坐等。这间客厅四周长台上整整齐齐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珍贵古董、名人字画，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金银珠玉，蒋自立独自坐在客厅正中的一张椅子上，老老实实一动不动地等候袁世凯的接见。不料，等了一会儿，不见袁世凯前来，便举目环顾，观赏宝物，过了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仍不见袁世凯的影子。

蒋自立便起身离座，走到长台旁，把台上的金镯子、金耗子、小金龟、田黄印、黄金塔、银链、银兔子、玉石、玛瑙、珊瑚雕刻件一件件拿在手中把玩不已，爱不释手，他左右环视一番，不见人影，又不闻声响，就把一个小金耗子和一块翡翠般的玉石偷偷地放在衣兜里，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情，坐回到原来的椅子上，慢悠悠地抽着烟。

袁世凯从客厅里走出来，几声笑后，连一句客套话没说。

劈头便问蒋自立：“还满意吧？嗯！”蒋自立被这冷不丁的问话吓怔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在犹豫时，不料袁世凯把手一挥，冷笑声突然变成“哈哈”大笑，大声说道：“很好！你被录用了！”蒋自立在袁世凯身边当了几年保镖。袁见他办事倒有能耐，便派他当密探队的小头目。蒋自立领着几个密探、刺客到上海监狱送药毒死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又将从狱中“保释”出来的宋案的直接指使者应桂馨，秘密处死在北上的火车上，给袁世凯策划的杀宋一案灭了口。

袁世凯派蒋自立暗杀黄兴，蒋自立因有日本人会坂西等的帮助，在袁世凯面前保证说：“黄兴这回是瓮中之鳖。”但是，黄兴从上海乘上“第四云海”号货轮安全地到达日本。袁世凯把蒋自立找来大骂了一顿：“你说，黄兴这回是瓮中之鳖，陆宗舆来电也说，黄兴这回是网中之鱼。现在怎么样了？瓮碎网破，鳖溜鱼飞。”停了一会儿，他又奔到蒋自立面前，举手抓住蒋自立胸口上的衣服，命令道：“我命令你明日起程去日本，与陆宗舆配合，把暗杀队组建好，尽快把孙文和黄兴除掉。”蒋自立“唰”地一声，抬头立正“是！”袁世凯的话缓和起来：“你可在东京买座寓所设个办事机关，多在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中活动，便可得知孙、黄的活动情况和他们的行踪。现在，我先授你个旅长军衔，命你为中华民国驻日特别队队长，事成归来，自当另有重赏！”“总统厚恩，没齿不忘。自立一定遵命，明日当启程赴东京。”蒋自立到了东京之后，便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头山满等为了对付“暗杀团”，便组织了一个“刺客击退团”，并派“刺客击退团”成员、年轻的平野等人担任孙中山的门卫。日本山本内阁虽然对孙中山居留日本默认，但他对蒋自立以中国驻日公使馆的名义组织“暗杀团”，不加干涉和制止。因此孙中山外出活动有一定危险。

一天，孙中山带着既懂剑术、又会打拳，腰间还有一支手枪的平野来

到中华革命党湖南会馆。会馆正厅空空荡荡，而边侧一排小房里，不时传出哀叹声。那里住着一些湖南籍革命党人，一些人在挨冻受饿。但有一间小房却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孙中山好生奇怪，他走近门边，听到里头的人正在议论着他的事，收住正欲迈进屋门的脚，立在门边细听：“孙先生这次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算是彻底失败了。”

“嗨！”“依我看，孙先生准是‘八字’不好，要不然怎么他的革命老是失败呢？连在握的总统大权竟白白地让给了袁世凯。可是，袁世凯一上台反过来又要捉他，要杀他，他又只好亡命东瀛了。听说现在他吃薯度日了，真是自作自受。这不是他的命不好又是什么？”“我会推算‘八字’，哪天有机会遇见孙先生，非得问问他的出生年月时辰，给他算算‘八字’如何，当真是‘八字’不好，还真不能再跟他干下去了。”“依我之见，诸位还是趁早离开他吧，不用算，他准没有好‘八字’。”一个公鸭嗓子的人说到这里，猛咳几声，吐了口痰，听得出这是个吸鸦片上瘾的人。他接着又说：“用不着看相算‘八字’，就凭孙中山办事的气魄就远比不上袁世凯。听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大总统就职大典，那场面，噶，气势真大。光是来参加典礼的人就有好几百，政府文官一律穿新制的燕尾服，武官一律着笔挺军礼服，还有众多的穿着各色西装的各国公使，穿长袍马褂的清皇室成员代表，名流绅士，可热闹啦。听说，那天袁大总统穿一套钴蓝色的、缀满金丝银线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乘坐八人抬的彩轿。轿子前头还有一队320名头戴全金线镶的军盔、身穿蓝色制服、腰佩军刀的卫士开路，在军乐声中登上太和殿。哼，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没有这种气魄。你们说说，跟着这种人干能有出头之日吗？依我之见，大家还是跟……”“周先生，你现在究竟是跟着谁干？”有人打断了公鸭嗓人的话问道。

孙中山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气，猛地推开门，一抬腿跨进房门，环视房里的几个坐在那里的人，那个公鸭嗓的人见是孙中山，仿佛挨雷轰似的，苍白的嘴唇蠕动了几下，发出虚弱的公鸭声：“啊！孙……”“败类！刚才你吹捧袁世凯的那番话，真是说得绘声绘色，神气十足。哼！你既然甘心认贼作父，就该有胆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躲躲闪闪，掩掩饰饰，倒像是一条癞皮狗。”孙中山说到这里，屋里的几个人已明白了几分，都瞪大眼盯着那人。忽见他心虚胆怯地把双手伸进长衫的口袋里，几个人警惕地一齐扑过去，抓住那人的双手，从他口袋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两叠印了字的白纸：国民党员自首誓约为华人，当爱中国，犯上作乱，天诛地灭。

自首人——众人看罢，七手八脚把纸撕碎，揉成团，愤怒地朝那人脸上掷去骂道：“无耻叛徒，原来你是想拉我们去投降自首！”此人姓周名鳌山，原是同盟会员，临时政府成立时，为谋求一官半职，曾到南京去了一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见过孙中山，后来通过一位湖南同乡的关系，派他到上海任个小职。“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周鳌山只好随着流亡日本的党人，逃到日本东京。在上海，此人吃喝惯了，又沾染上抽鸦片之恶习，到东京后过不惯亡命生活，哀声叹气，怨天尤人。这时正好袁世凯派蒋自立来东京，设立一个招降异党分子的机关。凡国民党员愿意投降自首者，只须在自首书上签名盖章，便可介绍回国做官，或发给留学官费。周鳌山闻得此消息，认为是个好机会，便悄悄四处打听，不久居然被他捷足先登，投到了蒋自立的门下，他在自首誓约上签了名，又自告奋勇为蒋自立当说客。他上午从蒋自立处领得一笔钱和一叠自首誓约书，到酒馆吃饱喝足

后，又吸足了鸦片烟，才到湖南会馆，利用老乡、朋友的关系，煽动几个意志薄弱的国民党员去投降袁世凯，不料偏巧遇上了孙中山，他招来了几个党人的怒斥和殴打，吓得双膝跪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认错，求饶，爬到门边，立起身来，仓皇逃出会馆。

孙中山对房内的几个革命党人说：“你们都宣过誓，参加革命党了，怎么还如此迷信？难道我的‘八字’不好，你们就不革命了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打倒军阀，继续革命’，这就是我的‘八字’！”这几个人承认错误，表示跟孙中山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这时湘省支部长覃振来到这里，孙中山从衣兜里掏出一叠日元，交给覃振：“这点钱留给你们湘省支部，以解燃眉之急。仲恺正终日奔走，多方筹集，一有钱款，我会给大家送来。”孙中山和平野从湖南会馆出来，冒着风雪，沿着僻静的小巷往回走。路过一座中国式的寺庙，庙门紧闭，有人蜷缩在门外墙角，听到脚步声，急忙抬起头来。孙中山一看，是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单薄、有点像是中国人的青年人，孙中山见周围无人，便问道：“你是中国人？”那青年微微点点头，孙中山又问：“也是流亡来的？”那青年顿时瞪起警惕的眼情，沉默不语。

孙中山立即解开和服，脱下里面的那件变成灰白色的旧西服，又从裤兜里掏出仅有的20日元，送给他，轻声地说道：“给你，青年人，快穿上吧，再去买点东西吃，找点工作做。……”平野怕耽搁久了出事，没等孙中山说完，拉着他便走：“快走！”两人一起回住所去了。

这位青年便是同孙中山一起乘“信浓丸”海轮来到日本的林寒梅。

不久，孙中山又增添了一位中国籍卫士，名叫马湘，是华侨后裔。

袁世凯一日数电，催促驻日公使陆宗輿和蒋自立火速缉拿孙文等革命党要人。

蒋自立虽然拼凑了一个“暗杀团”，可这帮人多是些只知吃喝、干不成大事的家伙，虽说他们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了几个人，可有的不是国民党员，有的是普通的国民党员。而“暗杀团”的人马却被“刺客击退团”击毙了不少。“暗杀团”活着的人中，有的吓得开了小差，溜回国去了；有的东藏西躲，要钱花时，净谎报战功，前来领赏。

花钱买来的一些国民党叛徒，虽然在自首书上签了名，立誓反水，可这些人领到钱，有的则找种种借口不肯卖命，有的则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做生意、学技术去了。蒋自立当然知道，他所进行的这种策反和暗杀，对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来说，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威胁不大，效果甚微。

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又组织了讨袁军队，蒋自立更觉得在东京暗杀孙中山是十分棘手的事。他不敢像在国内那样放胆去干，而是时刻提着心，终日惶惶不安，唯恐被革命党人拎走了他的脑袋。所以，他平日极少出门，整天躲在寓所里，连大门都不敢随便开。有人来访，总是先开门上小窗，看过名片，认准了人，才让佣人、情妇、姘头开门。

保镖出身的蒋自立虽然心虚胆惊，但他又认为自己探情报搞暗杀有一套，时刻幻想抓到孙文，返国在袁世凯面前报功领赏。

这一天，蒋自立从驻日公使馆回来。正想开门下车，忽见寓所门边蹲着一个人，因为路灯昏暗，看不清那人的面孔，心里发怵，以为又一个手下人被“刺客击退团”给结果了，前天就有两个“暗杀团”成员被杀死后，把尸首摆在大门两边。蒋自立不敢开车门，眼睁睁地望着那个人。片刻之后，

那蹲着的人，突然站起身子，急冲冲地朝小汽车奔来。蒋自立以为是“刺客击退团”的人，慌忙从腰间拔出手枪，正欲射击，忽儿认出那人乃是第一个登门自首的国民党叛徒周鳌山，蒋自立这才吁了一口气，开门下车。

蒋自立抖起精神，摆出架势，傲慢地说：“又来要钱，对吗？孙文近来常外出活动，你怎么事先一点消息没弄到？”周鳌山支支吾吾回答不出话来。

“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蒋自立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他，又说：“告诉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到孙文的行踪，及时来报告，等逮着孙文，我自然会给你一笔够你花一辈子的赏金。”说罢，头也不回地钻进家门，“砰”一声关上大门。

一天早上，周鳌山又没钱花了，只好再到小石川町找蒋自立领钱。而蒋自立刚好接到袁世凯的密电，说是宋庆龄小姐已从上海私奔日本，日内可抵东京，孙文一定会前往码头迎接，令蒋设法乘此机会将孙杀害，事成赏花红银 50 万。蒋自立正在寓所犯愁，因为暗杀团的人前两天刚发饷，谁也不登门了，他自己是绝对不敢亲自出马的，他已被刺客击退团吓得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正巧这时周鳌山上门来了。

蒋自立不把这事直接交给周去办，他要他到西久保去一趟，把这事交给住在那里的两个暗杀团的得力干将去执行。周鳌山听说事成之后有 50 万赏银，起了贪心，决定把这桩事拉过来，交给自己的好友去干。50 万赏银，不费吹灰之力，起码可以捞到 30 万。

周鳌山打着如意算盘，殊不知他的那两位朋友已在一个月之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他们一听周鳌山要他们去行刺党的总理孙中山，当场把他捆了起来，搜出手枪、子弹和一叠日元，连人带物一齐交给了中华革命党湘省支部长覃振。

覃振同他们一起商议对策，有人说：“我看，先把周鳌山毙了，再学刺客击退团那样，把周的尸首放在蒋自立的门前，警告警告那家伙。”覃振说：“周鳌山在我们手里，随时可以处决。可是蒋自立不除终归是个大祸害，对宋庆龄来东京一事威胁太大，何况孙总理还不明情况，万一去车站接宋小姐，很难保不出事。”大家同意覃振的看法。可是何人愿去把蒋自立除掉，却没有人敢答话。

突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

“谁？”覃振一惊，奔出去想逮那人，不料那人自己却泰然自若地走了进来。众人一看，是个青年，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灰白色西装，生得魁梧壮实。

“你是谁？为何躲在窗外窃听？”“我叫林寒梅。是来投靠孙中山先生的，前些日子我在码头上找到一份工作，在跟工人交谈中，得知孙先生有时到各会馆开会，今天我是来寻找孙先生的。”“那你何以狂笑？”覃振问道。

“我是笑你们胆小，你们连一个姓蒋的坏家伙都不敢去杀，还说要打倒袁世凯呢！”覃振心中暗喜：“看来你倒是个好汉，有勇气去行刺暗杀团头子蒋自立吗？”“怎么不敢！只是我想见到孙中山先生，听从孙中山的命令。”林寒梅答道。

“当务之急是除掉蒋自立，待事成之后，我们一定领你去见孙总理。”“那我先加入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林寒梅见覃振微皱眉头而不语，便道：“怎么，你们不相信我？……”林寒梅便把自己的身世向众人介绍一遍。原来，



这林寒梅是革命烈士之子，父亲在辛亥年保卫武昌的激战中牺牲。他也参加了革命，失败后从大陆逃到基隆，又从那里乘“信浓丸”海轮流落到日本，寻找孙中山先生。

“好，我们马上给你办手续。”覃振马上叫人拿来一张入党誓约书，叫林寒梅填写，按上手模，吸收他加入中华革命党。

覃振让人把从周鳌山身上搜出来的钱办一桌酒席，众人一起饱餐一顿。覃振又把蒋自立的住址、相貌口音等情况向林寒梅作了介绍，并给了他一张周鳌山的名片，最后又把从周鳌山身上搜缴的那支手枪交给他。

林寒梅吃罢便向小石川町蒋寓走去。

蒋自立的大门紧闭。林寒梅喊道：“开门！我是朽三派来送信的。”蒋自立听是自家人的暗语，又是周鳌山派人送信，准是与行刺孙文的事有关，便亲自出来，走到门边，问了声：“哪位周先生？”林寒梅便把名片从门缝里塞进去，并对着门缝往里瞧，见是一个彪形大汉，又操山东口音，断定此人是蒋自立，他一手握枪，两眼紧盯大门。等大门一开，林寒梅举枪对准蒋自立的胸膛“砰”的一枪，蒋自立即刻仰倒在地，林寒梅一个箭步奔到蒋自立跟前，对准蒋的脑袋又补了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

## 第七章 革命伴侣

1915年9月孙中山迁至青山原宿109号，这是日本朋友看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的工作日益繁忙，住房褊狭，不敷展布，才多方设法，为孙中山找到这处新居。

青山原宿，地区开阔，环境清幽，这里有苍翠的树木，青碧的草地。到了春天，不用去上野，就可以观赏到一丛丛、一层层，绚丽万顷、溢彩流光的樱花。

孙中山的新住宅房子比较宽敞，周围还有几间小房，可供刺客击退团的人住。日本朋友还在屋前的空地上围了一个小院子。这样既安全，又可种些花草。

10月24日，东京晨曦渐消，旭日初露，天高气爽，秋意正浓。新近落成的东京火车站，在湛蓝的秋日晴空下，显得十分巍峨。

日本陆上交通枢纽的东京火车站雄伟壮丽、色彩斑斓。车站前面的那一片宽敞的广场，使整个车站更气势开阔。和往常一样，随着旭日东升，车站内外，万头攒动，旅客匆匆进出，一片繁忙景象。

这一天清早，孙中山容光焕发，步履健朗，急步走进东京火车站，迎接从上海经神户来东京的宋庆龄。他站在月台上焦急地等待着从神户进站的列车。

列车终于来了。

宋庆龄穿着镶花边的西装和西式长裙，娟秀白皙的面庞，泛着红润，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她在广东同乡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的陪同下走出车厢，一眼就看到了孙中山。

他们亲切地见面了，当宋庆龄挽着孙中山的胳膊走出东京车站时，碧

空万里，阳光灿烂，真有点像是迎新娘的日子。

这天晚上，宋庆龄在慕菲雅陪同下，住在赤坂灵南坂 25 号头山满的家中。

翌日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牛込区袋町 5 号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举行婚礼，由和田瑞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1）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2）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3）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于见证人手中。”孙中山、宋庆龄又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

宋庆龄 1893 年 1 月 27 日生于上海，比孙中山小 27 岁。她的父亲宋嘉树，原名乔荪，字耀如。宋嘉树本姓韩，父亲叫韩鸿翼，生三子，宋嘉树是次子，原名韩教准，1863 年 2 月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由于家境贫寒，年仅 12 岁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舅父谋生。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韩教准被舅父收为养子，改姓宋，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NG）。

宋嘉树不甘心学徒经商而离家出走。他幸运得到了美国联邦海军军官查理·琼斯以及朱利叶斯·卡乐将军的青睐和帮助，终于进入美国高等学府的门坎。18 岁时迈进达勒姆附近的圣三一学院。以后又进入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1885 年 10 月毕业后被授予监理会见习牧师，并派往中国传道。他于次年 1 月回到上海，当上了一名“使灵光普照大地，让福音传遍人间”的传道牧师。

宋耀如于回国的第二年便与倪桂珍结婚。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到了父辈已经家道衰落，生活贫寒。宋耀如每月只有 15 元收入，无法赡养家庭，宋庆龄出生时家境仍然是清贫的。

后来宋耀如辞去了牧师职务，改营工商业，他成了上海第一个进口外国机械的代理商，他又学习安装这些机械（主要是面粉机、棉花机）。这样，他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转机，不仅在虹口盖了四开间的二层楼房（即后来的余杭路 628 号），又在西摩路等处置办了产业，形成了名震中外、影响深远的宋氏家族。

宋耀如不是一个唯利是图、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商人，他热爱祖国，富于理想，在清廷专制腐败、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他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渴望着献身革命。

他与牛尚周、温秉忠、陆皓东等人成立了一个以“尽心爱国”、“开通民智”为宗旨，为富国强民而奋斗的“自由之子”社。但是，这四个人的社团是成不了气候的，于是，宋耀如便通过陆皓东的介绍，结识了孙中山。

宋耀如同孙中山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成了莫逆之交，俩人亲如手足，宋耀如的家成为孙中山革命的秘密据点，孙中山流亡海外时，他的家也是孙中山的秘密通讯机关。

宋耀如不但在经济上积极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司

库”，宋耀如开办的美华印书馆，为孙中山秘密印制大量的革命宣传品，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宋庆龄从小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文静好学，善于思考，在学习功课、观察事物、文艺表演上都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她通过父辈们言谈活动的影响，从幼年开始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向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对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宋庆龄起了革命的启蒙作用，为她后来追随孙中山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宋耀如曾在美国生活、学习，受到西方进步思想影响，在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眼光远大，思想开通。他认为男女均应获得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并决心把他掌上的三颗明珠——三个女儿，都送到美国学习，把她们都培养成对国家有贡献的公民。

宋庆龄先在马克缔耶学校学习 8 年，尔后同妹妹宋美龄乘满州号轮船，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她先在新泽西州森密特城的一所私立补习学校学习，准备报考大学。她学习勤奋，从不贪玩，不但学好校内功课，而且博览群书。她是一位害羞、漂亮的姑娘，经常到市图书馆选择一些非常严肃的书来读。

1909 年，宋庆龄继姐姐宋霭龄之后，进入了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理公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世界上最早注册的女子学院。这所历史悠久、蜚声全球的女子学院，不但有一套很好的教育管理制度，而且环境幽美，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场所。

宋庆龄在这样好的学习环境中，努力汲取知识琼浆，博闻强记，使自己很快地成长。

她虽然学的是文学专业，但对历史、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书籍。她在作文中、在辩论中，经常提出富有哲理的深刻见解，使教授们都感到惊奇，并深为赞叹。

宋庆龄身居海外，心怀祖国，忧远思深，常从报纸上了解国内政治形势，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她急国所急，忧民所忧。当她看到祖国在昏庸的清王朝统治下，神州大地正被帝国主义鲸吞蚕食，瓜分豆剖，人民倒悬，遍地呻吟，多少爱国志士在悲愤地呼喊：“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她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对民族兴亡的关切，为国献赤忱的激情，一齐涌向心头。她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和该校文学杂志上发表，讴歌中国悠久的历史，歌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1913 年夏天，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她怀着报效祖国的瑰丽向往，抱着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坚定信念，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由于宋耀如是孙中山的挚友，孙中山被袁氏政府悬赏通缉，宋耀如怕受株连，只好全家出走东瀛。宋耀如长女宋霭龄在国内时，就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父亲来到日本后，仍然任孙中山的秘书。

8 月 29 日，宋庆龄在日本横滨登陆，父亲宋耀如、姐姐宋霭龄等亲人到码头迎接，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人，她多么高兴。

9 月，宋霭龄与孔子 75 代旁系裔孙出身山西富豪门第的孔祥熙结婚。宋耀如从 8 月中旬起，带病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他几乎每隔几天即到孙中山住处，有时待的时间很长。

宋庆龄的到来，正好接替抱病工作的父亲，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

9月16日，宋庆龄与孙中山会面，在短短的10天内，宋庆龄去看望孙中山八次。随后，宋庆龄便留下作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助手，从而使她多年来想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她在给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读书的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的快乐，我唯一的快乐是与孙先生在一起。”“我对他大有帮助——使全世界甚至全中国的人民了解革命。”孙中山与宋庆龄对祖国命运的共同关注，在伟大理想下互相吸引，战斗的考验，思想的交流，使他们在革命工作的朝夕相处中，默默地相爱了。

渐渐地宋庆龄产生和孙中山一起生活的强烈愿望，真切地感到：我可以帮助他，他是需要我的。她从对孙中山的崇敬中萌生爱意，坦率地向孙中山表达爱慕之情：“孙先生，我已仔细地想了好久，我知道没有别的比为你和为革命服务能使我更加快乐，我能帮助你做那种我已着手做过的工作，我能关心你，我喜欢这样从事于革命。

如果我没有为这个伟大事业而生活，那么人生是要无意义而无中心的。我不求什么，但愿委身革命，别的什么都不能满足我，只要我于你有用，便在你这里……”在孙中山看来，宋庆龄是这样的年轻、美丽、迷人，洋溢着永无休止的革命热情。

她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精神上的莫大慰藉，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伴侣，娶她做妻子对他事业是莫大的帮助，有她的温柔体贴，对他流亡的孤寂生活是多么大的幸福！但是他想到自己的年龄只比宋庆龄的父亲小3岁，且宋庆龄的父亲又是自己的挚友，他迟疑了。

宋庆龄勇敢地表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孙中山觉得这样大的事，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坚定地说：“你必须得到你父母的同意才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宋庆龄却反问道：“我们目前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下么？难道这种爱情我们还不能自己作主吗？”但是，宋庆龄为了顺从孙中山的意见，并取得父母谅解，她决定启程回上海。她的父母早已回到上海去了。

孙中山不拒绝宋庆龄向他求爱，是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表示要他另娶一个妻妾。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曾给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来了一封信，信中向何香凝倾吐了她对丈夫的思念，诉说了自己的苦衷，还希望香凝为她的丈夫在日本物色一位贤女。

对于妻子写给何香凝的信，孙中山思虑万千：“慕贞啊，你不该给香凝写这么一封信。你说，我们婚后你一直未能守在我身边照顾我，反而让我牵心挂肠，让我孤独一人在异国他乡四处奔波。你说，你常为自己没能力帮助我，而感到万分痛苦。是啊，我听乡亲们说过，说你常在日出或日落时，领着孩子们站在后山上，眺望经过后沙海面的军舰和轮船，期待着我返里归家；我也看见了，就在你到南京小住的时候，就在你同我一起游览沪杭和上北京的时候，你也因为过不惯政界的生活而感到十分苦恼，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在房里哭泣。我明白你的心，你和我母亲一样，不满我的职业，你们是希望我从医行善，救死扶伤，积善积德，可是，你们不理解我的信念和志趣，我立志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现三民主义。在南京的时候，在北上的时候，你曾两次对我提出，要我在外面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子，要我纳妾娶小，我当时就对你说，这是办不到的！”

我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怎能自食其言！当然，如此的家庭生活也给我带来痛苦，但我绝无责怪你之意，……”卢慕贞见丈夫不同意她的要求，便独自一人来到东京，当面和孙中山谈谈。

卢慕贞慢慢地对孙中山说道：“打从我 18 岁那年来到你们孙家后，你一直在外面奔波。今年二月，孙眉哥哥病逝，我只好带着女儿去澳门，帮助料理后事。在家我尽到了做媳妇的责任，可就是没有能尽到一份妻子的心，让你只身在外，受尽苦难。你快 50 的人啦，还是孤身一人在海外四处奔走，没过上一天安然的日子，我想让你找一个合适的女子。”孙中山打断妻子的话说：“我明白了，我已经对你说了，这件事我是万万不会同意的。”卢氏噙着泪水说道：“是的，当时你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应该可以娶妾了，自大哥去世后，家里的事更多了，我实在离不开家，不能久在你身边，再说我也没有能力帮你分担忧虑和辛劳，你又不肯去干别的事，何况现在你亡命日本，想做别的事也不容你了。你就依我的心意去办，也好了结我这桩心事。”“你就别再说这些了，我是不会依你的。30 年都这么过来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卢慕贞原以为，现在丈夫不当总统了，娶妾纳小不再会有人指责他了，况且，他又身处逆境，亡命异国他乡，他的党人中也有人娶了日本女子。现在宋二小姐在他身边当英文秘书，又是一个好女子，便向丈夫提出，要他娶宋二小姐为妾，但她没有料到，一提到这事，丈夫又是一百个不同意。她也曾想过，为了不拖累丈夫，为了让他安心地再娶，她情愿早早离开人世。但她又想，如果说出这些想法，他一定会责备她，其实她又何曾忍心去走那样的路呢！就连公开与丈夫离婚，她都难下决心，不忍开口。她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低声地对丈夫说：“家里事多，眉哥去世后，澳门嫂子那边的事还要我分担一份心，我决定在这里住两天就回去。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想跟宋二小姐谈谈，既然她已经回国了，也不是三五天就能来东京的，我就不等她了。”卢氏说到这里，从手提箱内拿出红绸小包，递给丈夫，接着说道：“等宋二小姐回东京来，请你把这送给她，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是我一份心意。”孙中山接过红绸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广东人结婚时用的绣着一对鸳鸯在荷花池嬉游的大红缎子被面，被面上放着一个精美的首饰匣子。这个匣子是孙中山同卢氏结婚时，哥哥孙眉送给卢氏的礼物，匣子内装有一条金项链和两个镶有蓝宝石的金戒指。孙中山把手上的东西慢慢地放在桌子上，径直走到窗前，背着双手，默默倚窗而立。他的思绪纷乱，沉默了好一阵后，才转过身来，对妻子说道：“慕贞，你怎么还是这样想呢？你真不应该这样想。你要知道，宋小姐少年时就立志献身于改造中国，变革社会的事业。她大学毕业后，只身从美国来到日本，来到我身边工作，正是为了实现她为中国几百万民众效力的远大抱负。再说，宋庆龄年纪还轻，而我已年近半百，膝下有儿有女，更何况如今我是亡命之中，袁世凯拿着 50 万元赏金四处缉捕我，买我的头，她怎么会委身于我呢！”“不不，宋二小姐不同一般女子的见识，她是非常希望在你身边工作的。在南京时，我没敢叫你休我，只是劝你娶个小的，那一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二是因为那时你母亲和眉哥健在，我怕他们为此事想不开，怕伤他们的心。我这次来东京，就是想让你另娶一房。不过，你一再表示不愿娶二房，我也不强迫你。我想，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咱们分手吧！你的生活和你工作，都是非常需要像宋二小姐这样贤慧、能干的女子，在你身边帮助你。宋二小姐也十分乐意在你身边工作，如果我们不离婚，你

和宋二小姐长期在一起也多有不便，外边人也会有许多闲言碎语，这对你、对宋二小姐都不好，就是对我也不好啊！我想过了，为了你的生活和事业，为了宋二小姐，也是为了我，我必须这样做，你答应我吧！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也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里过日子，把家维持好。”孙中山呆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

宋庆龄回到上海，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遭到父亲，特别是母亲的坚决反对。

由于宋庆龄聪明、美丽、听话，母亲从宋庆龄小时就最疼爱她，没想到在终身大事问题上，这个最受疼爱的女儿出了这么个大难题。母亲非常生气，坚决地说：“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两倍于你的年龄，是你爸爸的同辈人，又是你爸爸的朋友，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宋庆龄的态度也同样是坚定的，她一再说明她已倾向革命，与孙中山结合是为了革命事业，恳求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倪桂珍脸色阴沉，语气坚定地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话陷于僵局。父亲为了缓和一下，就说：“庆龄，此事得等待一下，让我们再考虑考虑。”宋庆龄只好等待，一等就是三个月。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写信给孙中山说：“你看！你叫我先告诉父母，后加以决定的办法，是得到了怎样的结果，……我现在只是为了父亲，才留在这里，你是认识他的。同时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待，那是我不得等等的，但是等可是苦事，是非常苦的事，如果讲到我母亲的见解，那么等待完全是白费功夫。”当宋庆龄得知父亲的态度已有一些弹性，特别是知道孙中山的态度变得坚定，已与卢慕贞办了离婚协议书之后，她采取了果断的态度，冲破父母的“软禁”，离家出走。

她在离家出走前，给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在前几封信上，你大概已经知道，我早就希望回到日本去，而父母却表示反对的事了，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反对孙先生，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详细地考虑而要我得到相当的把握！我已经等了好久，可是母亲的意志，仍旧不会改变。

而父亲的心，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后，早已同意了。……美龄！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到了日本，而和孙先生在一起。我走时是那样的迅速、秘密而又不会通知任何人。”宋庆龄在上海的房子又大又好，拥有许多现代化设备，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

她决定离开富贵、文明、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选择革命道路，以双十初度的芳龄，自愿嫁给年龄比自己大一倍多、已结过婚、正在过着艰苦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这绝不是美人一时冲动爱英雄，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共同革命信念思想基础上的纯真爱情。

性格倔强、作事果断的宋庆龄在朱卓文、慕菲雅的陪同下，偷偷离开了家门，离开上海，东渡扶桑，到东京的第二天便与孙中山结婚。

## 第八章 强任大总统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在1913年7至12月，先后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

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芑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除了川、黔、滇、桂四省，他基本上占据了南部，使自己走向了统治的顶峰。

袁世凯为了让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还暂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

议员的年俸为 5000 元，于是，这批国民党员贪恋着议员的地位，仍然留在北京，与进步党合作议订宪法。国民党议员中虽然也有人主张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而有不少国民党议员，已被袁世凯收买。

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对那些有反袁情绪和反袁嫌疑的国民党议员，开始了血腥镇压。他授意军政执法处，以“串通乱党”为词，逮捕 8 名国民党议员，即参议院议员朱念祖、丁象谦、张我华、高荫藻、赵世钰，众议院议员刘恩格、褚辅成、常恒芳。

这 8 名议员多半是皖籍议员，而且都与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相识，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兼宪革会委员。国民党不仅少了 8 名议员、宪革会 4 席，而且在大捉大捕压力下，一夜之间，袁世凯又用重金拉走了 10 余名国民党参议院议员，为他竞选大总统，铲平道路。

军政执法处直接受袁世凯领导，由袁的心腹陆建章任处长、霍占一任侦探长。军政执法处设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附近，为北京著名“四大山宅”之一。

军政执法处的职权没有限制，也不受法律约束，捉多少人，杀多少人，捉谁，杀谁，均不呈报，将人秘密处死，也不通知死者家属。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议员监视、逮捕、禁闭、杀戮，无所不干。所以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一提起军政执法处，一提起处长陆建章，就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国会议员们视军政执法处为罗刹鬼国。

一日，陆建章饮酒正酣，监狱看守忽来报告：天热牢窄，囚徒很挤，怎么办？陆建章听了，命令把花名册拿来，然后用红笔圈了几页，交给执法处进行枪决。

有一个叫王剑魂的人，自南方来到北京，遭到逮捕，由陆建章亲自审讯，照例先问人犯姓名、年龄、籍贯。王答名“剑魂”，陆建章听了，立即拍案大喝道：“不用再问了，拉出去枪毙，凭你这个名字，就该枪毙！”在袁世凯的淫威下，众议院提议先选总统，后制宪法，以 213 票对 126 票通过这项法案，参议院也照样通过了。于是，宪革会便先制出大总统选举法，作为将来宪法内容之一部分，提前公布，以便大选之进行。

袁世凯仍然不放心，特用金钱收买，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公民党”，充当威逼国会选举总统的打手。那黎元洪积极配合，会同 19 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参、众两院，胁迫其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同心协力，编制宪法，先订总统选举之一则，即从选举总统入手。同时指挥进步党与公民党相配合，压迫国民党议员接受先选举总统后订宪法的方案。黎元洪致电进步党负责人梁启超、汤化龙，明确表示：“揆察现状，似须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公意如以为然，即请急力主持。”他又致电参、众两院，催促快速选举总统，甚至指名推举，属意于袁世凯，盛赞袁“雄才伟略，卓绝一时。再造共和，易如反掌。岂惟元洪信仰，即环球各国当无异词”，要求两院“速定大计，举行盛典，浹旬之间，期于竣事”，表白自己已急切得“终日绕床，觉总统一日未定，俨若祸在眉睫者”。

10月6日，举行大总统选举，选举前，袁世凯顾虑重重，根据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须“以选举人总数2A3以上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3A4者为当选”。

这次选举，国民党籍议员至少有350人以上，他们大都是坚持不选袁世凯。万一第一次、第二次得票不满法定数，以致会议延期，国民党议员就有可能以不出席相抵制，使选举会一再延期，不但夜长梦多，而且对袁世凯来说，也有失体面。

就在袁世凯为难的时候，梁士诒来到总统府，袁世凯忙问：“公民党人怎么样？”“大总统放心，我皆个别授意，他们都心领神会。”“我担心进步党人也靠不住。”袁世凯又提出疑问。

梁士诒道：“进步党也没有问题，最棘手的是国民党人，而且国会里国民党人也最多！为了预防万一国民党人发难，我已做了安排，大选之日自有公民团在选举会场外面助选！”袁世凯听到这里，脸上始有了笑意，他赞许地点了点头，抬起手搔了搔头，连声道：“很好，很好！”6日清晨，宣武门内外，添了许多岗哨，而且都是双岗，还有军队荷枪实弹，往来逡巡。选举会场在众议院会场。几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帜，把选举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喊：“今日非将公民所瞩目的总统选出来，否则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许出议场一步！”众议院院长汤化龙主持选举会议。各党派议员，到会选举人为759人，超过2A3法定人数很多。以投票人数的3A4计算，得票为570票者才能当选。

汤化龙预料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填票、投票、开票、唱票一次约需要4个小时，三次投票共需要12个小时，所以，一天的功夫是完不成的，至少需要两天。可是，众议院外有几千人“公民团”守候着，从上午8时起，重重包围会场，许进不许出，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

选举开始后，院外任何人不准进去。院内的议员们想跨出大门，即遭到呵斥逼令退回，有顽强者硬要出去的，轻则遭受到“公民团”的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使议员们抱头跑回选举会场。

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刚过半数，离法定票额相差太远。这时已中午时分，主席宣布休息后再继续投票。

这时，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议员，嗜吸大烟，瘾发了，涕泪满面，哈欠连天，想出门去吸几口，然而守门的“公民”不准。这些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洋相百出。

进步党本部派人送来两担面包点心，守门的“公民”们大声喝道：“干什么的？”“送饭的！”“不行，快滚回去！不选出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我们是进步党！”“进步党？什么党也不行！”“进步党是拥护袁总统的！”送饭人道。

“那就进去吧！”于是，“公民”们这才放行。

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品，守门的“公民”们听说是给国民党议员送饭，便破口大骂道：“饿死也是活该！三天选不出袁大总统，就饿他三天！”于是，国民党议员们挨着饿又继续投票选举。

第二次计票，袁世凯得票较第一次多了若干票，但还是不到法定票额。这时，天已经黑了，又不能散会，于是，主席汤化龙宣布，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



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之规定，请大家就得票较多的袁世凯、黎元洪二人投选其一，此外投选任何人，以废票论，不唱被选人姓名。

这个限制被选人的办法，使袁世凯和黎元洪并列起来，虽然贬低了袁世凯的身价，但是，国民党议员本不愿选，又不得不选，因为另选别人，选票不起作用。于是会场中响着嗡嗡的窃窃私语。

国民党议员们，一天没吃一点东西，饿得头昏眼花，手脚发软，胃里一阵阵痉挛，心里一阵阵发慌。有的人意志仍然非常顽强，私下议论说：投黎元洪！饿死也不选袁世凯！也有的人的意志开始软弱下来。而且会场外的“公民团”的叫喊声一阵又一阵地传进会场：“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睡觉！”议员们听到外面的叫喊声，一阵阵心烦意乱。尤其是那些烟徒们，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痛苦百般地在会场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在国民党议员面前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的信念，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地散会。烟徒们又是拱手，又是敬礼，向国民党议员乞求。而国民党议员们饥饿、疲惫，也打起哈欠、流涕泪、神色近似麻木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了晚上 10 点钟才得出第三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于是，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代表们鼓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国民党议员们不鼓掌，进步党中的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了。

会场外的“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也不欢呼万岁，而是一轰而散，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次日继续选举副总统，因为昨夜折腾得很晚，有许多人病倒在床，出席的人少了许多，又因议员们吸取了昨天挨饿的教训，不想再折腾 12 小时才出结果，一次投票黎元洪便被选为副总统。

1913 年 10 月 10 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就职宣誓仪式与开国纪念同日举行。

袁世凯宣誓就职，效仿前朝做法，选择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上午举行就职典礼，晚上 9 时 30 分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大楼举行茶舞会。规定参加典礼的文官，一律穿燕尾服；武官将军，一律穿军礼服；参加舞会时，一律穿晚礼服。

上午 10 时，320 名卫士列队走入大殿，他们戴全金线军盔，穿蓝色军服，佩带军刀，分两排站在距东西席前约十数步处，形成了一个警卫的胡同。

两文两武四位官员分别乘坐四座 4 人抬彩舆，彩舆至大殿前落地后，走出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这两位文官皆穿燕尾服；侍从武官长荫昌、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这两位武官皆穿钴蓝色军礼服，戴叠羽帽，佩参谋带。

接着，袁世凯乘着 8 人抬彩轿至。袁世凯身穿钴蓝色陆海军大元帅礼服，下轿后，由梁士诒、夏寿田、荫昌、唐在礼文武四官拥护前行，他那大元帅礼服上的金线装饰熠熠闪光。

袁世凯登上主席台入座后，赞礼官程克引吭赞礼。

袁世凯应声而起，面向议长议员席宣誓：“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谨誓。”誓毕，向议长议员席鞠躬。

文武百官高呼“万岁”，袁世凯脸上挂着笑意，沉醉迷恋的神色，舞于眉间。

赞礼官继续唱礼，由大礼官黄开文呈上就职宣言书，袁世凯又重行起立，宣读，宣读声激烈、低沉有致。读完，再行礼，礼毕，开始接见各国公使以及清皇室代表。其余一千人等，则由招待人员引至武英殿茶点。

袁世凯午睡后，乘二人肩舆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等大员陪同参加阅兵仪式。

2万余人军队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将军们结队登上天安门城楼谒见袁世凯，汇报受阅军队情况。袁世凯向将军们训话，尔后将军们下城楼归队，分别传达袁世凯的训辞。

阅兵仪式开始。由于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袁世凯没看几眼阅兵仪式，便回去休息，陪官们也一轰而散。开国纪念阅兵仪式的阅兵台上，空寂无人，但士兵们仍然冒雨按照程序行走着。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过河拆桥，解散国民党和国会。

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占去一半多，如果不把国民党和国会搞掉，不仅袁世凯复辟帝制很难通过，就连他巩固大总统的位置也十分困难。怎样搞掉国民党和国会？袁世凯想来想去，想起了他所操纵的熊氏内阁。原准没有好‘八字’。”一个公鸭嗓子的人说到这里，猛咳几声，吐了口痰，听得出这是请他来京组阁。因为张謇认为国家前途黯淡，予以婉辞。袁世凯仍然敦促，张謇不得已，就推荐熊希龄担任内阁总理。张謇认为，熊希龄在唐绍仪内阁任财政总长时，办理大借款，颇得袁世凯赏识，认为一荐即准。

袁世凯对熊希龄，本来是很器重的。唐阁变更，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熊希龄到热河就任，扔下都统公署旧址，迁入珍宝堆积、美女如云的承德避暑山庄里办公和居住。

熊希龄住进避暑山庄后，就安排他的心腹与同乡杨显曾任公署总务科长，委托他清点庄内的宝物，并把这些宝物收为己用。熊希龄不但自己受用这些宝物，还随意送人。

一日，姜桂题来访，酒足饭饱之后，总不免带着姜桂题去观瞻他那些珍宝，临别时，将一把乾隆皇帝喜用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

姜桂题也是袁世凯的心腹，历来忠于袁世凯，他为了进一步讨好袁世凯，以表忠心，就暗中将这个古物转交给袁世凯，作为密报，以待立功。

袁世凯顺水推舟，事先没有征求熊希龄的意见，便发表了由熊氏组阁。

熊希龄在避暑山庄悠哉乐哉，突然得到由他组阁的消息，已是措手不及，无可奈何，惆怅入京，他感到前途黯淡，不愿上任，但命令已经下达。袁世凯多次敦促他组阁，他都一再拖延。当他知道是张謇推荐他为国务总理，便向袁世凯提出，非张謇入阁而不组阁。他猜想，既然张謇不干国务总理，也决不会干什么总长，张謇若不入阁，他也就能辞掉国务总理，回承德去尽享富贵去了。

袁世凯为了达到让熊希龄组阁，就派专舰迎张謇入京。张謇觉得既然力辞了国务总理，就不便再让袁世凯下不来台，于是，随舰入京。张謇在江北经营了许多农业和工业，与袁世凯讨价还价，答应任农工商总长一职。他任这个职务，一箭双雕，既遂了袁世凯的愿，又能利用职权，发展他在江北的工农业。

张謇入阁，熊希龄于9月11日发表组阁。

袁世凯表面上重用熊希龄，暗地里派前司法总长许世英赴热河，查办

避暑山庄失宝案。许世英明查暗访，搜集材料，汇成文书，呈报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便布下挟制熊希龄去解散国民党、破坏国会的圈套。

袁世凯把熊希龄约到总统府，与他寒暄两句，便去接见外国公使，让熊希龄在他的办公室稍候片刻，说是应酬一下洋人就来。

熊希龄独自一人在袁世凯办公室内踱步，突然看到袁世凯办公桌上，放着许世英查报的避暑山庄盗宝案卷。因为他刚从避暑山庄来京，不由自主地向前跨进一步，翻开案卷，看见“熊希龄盗宝”几个字，双腿瘫软，脸色煞白，冷汗如雨。又往下看行文里皆是熊希龄这个，熊希龄那个，他的脑袋立刻胀大，再也看不进去，惊慌失措地合上案卷，踉跄地倒回到沙发前，跌坐在沙发上。

袁世凯见过外国公使，传熊希龄到外间谈话，熊希龄仿佛腾云驾雾地来到会客室。

袁世凯见熊希龄形态，知他已入圈套，便用亲切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因公务没有睡好觉吧？不然，为什么面色这样难看？”熊希龄支支吾吾，不能对答。

袁世凯严词厉色地道：“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气愤。我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除掉，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不可，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秉三，你看如何？”熊希龄早已恐惧万分，见袁世凯一再指责国民党，对他的事一字不提，便明白了袁世凯要他戴罪立功之意，于是，他便听由袁世凯摆布。见袁世凯发问，忙不叠地点头道：“应该如此，早应如此！”袁世凯即将已准备好的命令，让熊希龄签署。熊签署完毕，袁世凯立即传令，让等候在邻室的其他阁员们进来，顺序副署。

命令借口在南昌李烈钧官署查获国民党议员与李往来密电数十件，而解散国民党。

令既出，袁世凯派出军警 300 余人，包围了广安门内大街国民党北京支部，令代理事长吴景濂不得外出，闹了整整一天。晚上，又闯入每个国民党籍议员家里，搜缴议员证章、证书，得 300 余件，接着又搜缴了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尔后脱离组织并参加了其他党派的议员们的证章和证书，共计 438 件，这样一来，因议会人数不足，造成国会瘫痪。

残余的议员们对此非常气愤，并提出质问，熊希龄因有把柄握在袁世凯手中，只好为袁世凯辩护。袁世凯又下令宣布国会完全解散。这个国会自 4 月召集，完成了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的任务后，到 12 月份被解散，只存在了 9 个月。

袁世凯、黎元洪当选为正副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电邀黎元洪进京，但黎元洪深知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所以一再推拖，不肯离鄂一步。袁世凯电邀他到京参加大总统就职典礼，他回电拒绝。

袁世凯除自己直接电邀外，还拉拢黎元洪身边的人为他作说客。黎元洪对饶汉祥言听计从，袁世凯便极力拉拢饶汉祥去说服黎元洪进京，但黎却抱定了老主意，坚决不肯去京。饶再劝他，他索性令饶代表自己进京，与袁面议一切。袁见黎不肯就范，决定破釜沉舟，一面把饶汉祥打发回鄂，转达他的盛意，仍欲黎公亲自到京；另一方面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办法，特派心腹大将段祺瑞到武汉劝驾，露出武力胁迫的象征。

12月8日，段祺瑞到鄂。黎元洪邀集少数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以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行都督职，作早日回鄂的准备。在段祺瑞的催促下，黎元洪匆忙地对参谋长金永炎作临行前的部署，即于9日晚乘专车赴京，随行人员有饶汉祥等十数人。

段祺瑞到鄂并不公布来意。黎离鄂时，对下属公布段北归。段和黎一起上了火车，段反下车，黎遂北上。黎的亲随想上车送行，被陈宦所派人“持令不准入”。

10日，任命段祺瑞署湖北都督的大总统令下，此时黎元洪还在路上。时人讥评此事谓：“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饶汉祥、陈宦把黎元洪卖了二百万元。”11日晨，黎元洪一行人到达北京。事先，袁世凯派文武大员二人赴保定迎接。到京时，总统府军事处总、次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全体国务员及各部8名部员到车站迎接；车站周围200步以内派军警守护，不准闲人入内；又派拱卫军一营列队迎候，极为隆重。

黎先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黎戎服佩剑，行最肃之军礼，态度极为谦逊。袁则殷勤特甚，仿佛极尊严之长辈见一极可敬之少年，两人久久未语，隐含着袁、黎原非一家，貌合神离。袁告黎以段督鄂之令已下达。黎唯唯。

中午，袁大摆筵宴，招待黎元洪，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全体国务员作陪。宴罢，黎被引至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为避嫌，更名为“小蓬莱”。黎的随行人员则被安置在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下榻。

黎元洪离鄂赴京，大有失魂落魄之感。他在《致鄂中父老》的电文中，承认了自己作为袁世凯政治俘虏的地位。一种哀怨凄惋之情敲击心扉，流露于字里行间，发出“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悲叹。

黎元洪到北京后，家眷亦于12月11日起程来京，均住在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东北部，四面环水，非舟楫不能通过，实在是软禁政治傀儡的理想处所。黎元洪感到自己处境的危殆，整日忧形于色。而袁世凯对黎内行羁縻而外示怀柔，表现出一副亲密无间的姿态。黎居方数日，袁世凯便托人说亲，要与黎氏结秦晋之好，结果议定黎之次女绍芳配给袁之九子克玖为妻。又规定给黎月俸1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黎每日除散步、读书、阅报、写字外，无公可办，这一笔俸金算是够充裕的了。黎成了名副其实的寓公。袁世凯为了监视黎的一言一行，经常派唐在礼到瀛台探望。

## 第九章 帝制复辟

国民党被解散，在党议员资格被褫夺，国会解散。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关。

政治会议由80名官吏组成，其中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

这些人大多是旧官僚或者封建名流如杨度、杨士琦等，还有革命党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等，袁世凯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

熊希龄在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之后，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被袁世凯抛弃。袁世凯不再需要这个进步党总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阁来供使用和点缀。熊氏内阁仅存在五个月，就寿终正寝。

袁世凯曾企图把政治会议直接变为造法工具，但作为咨询机关的政治会议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便建议袁另组造法机关，定名为“约法会议”。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约法会议便由此产生。从此，约法会议即本“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的原则，成为推翻《临时约法》，重新炮制袁氏独裁所需新约法的专门机构。

约法会议组成后，很快按照“隆大总统之权”的原则，一部给袁世凯以独裁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在袁的授意下，公布施行。

袁世凯撤销了国务院，设立政事堂，选任前清遗臣徐世昌为国务卿。国务卿以下，设左丞、右丞。左丞是杨士琦，右丞是钱能训。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把他的公馆搬进中南海居仁堂。总统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都设在中南海。

袁世凯又成立了参议院，解散政治会议。参议院73个成员，均由袁世凯亲自指定。

尔后袁世凯又公布了官秩令，把政府官员分为九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都督改称为将军，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并且规定各省将军传人改用令箭，求见者需递手本，新任大员要行觐见礼等等，一切又都恢复了前朝制度。

约法会议于12月28日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人名写在嘉禾金简上，藏于金匱石室。选举总统时，拿出来唱和一下，就算通过。金匱石室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右侧。

经过1914年袁记新约法的公布和实施，特别是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公布，使袁无论在事实上和形式上，已成为终身制之独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成立了筹安会。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大造恢复帝制的舆论。8月下旬，由于筹安会的鼓动，全国已有8个省以“公民代表”名义，向参议院投递了改革国体的请愿书。

9月19日，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发起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更大声势的改革国体请愿。

这伙人所鼓吹的“改革”，就是复辟。

正当袁世凯策划的帝制运动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际，袁氏营垒中开始有人产生异议。

一日，袁世凯试探黎元洪道：“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帝制运动高涨后，杨士琦等帝制派官僚密谏袁世凯道：“中华议改帝国，副总统黎元洪驻瀛台，观感有碍。”建议令黎迁出南海，袁从其言。于是，袁身边之人大肆散布“新皇移居内，三海将来须让归宣统居住”等语。黎闻言，即以夫人多病，医嘱“须择幽畅和暖地区居住，庶几病体可以挽回”为由，要求迁出南海。于是，袁世凯花10万元购买东城东厂胡同一座宅院赠黎。此宅为明太监魏忠贤之遗园、清中堂荣禄故第，民国后改为将校俱乐部。黎携家眷迁于此宅。此后，

黎元洪闭户养病，有宾客谒见者，概行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予闻问。外界甚至传言：“黎副总统欲入佛教会，安心研求经典”。

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黎元洪装聋做哑，以为韬晦之术，一以避祸，二作消极抵制。

10月28日，全国各省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部“赞成”君宪制。黎元洪不得不提出辞副总统、参政院长、参谋总长全部职务。社会上对黎元洪将来的出路作种种猜测，黎元洪也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危殆，惶惶不可终日。孙武来京谒见时，黎竟与其相抱痛哭。

黎元洪还暗中派人到湖北察看，打算购买宅第，准备还乡隐居。

袁世凯为了稳定人心，一再笼络、慰藉黎元洪，在袁的诞辰日前，对百余名官员奖以嘉禾章，唯黎元洪一人获一等嘉禾章，又扬言在武昌给黎建铜像，以嘉其光复时之功绩。还特派内史监阮忠枢及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前去黎府慰留，以国体即有变更，仍请其担任政务，以济时艰，决不可遽萌退志。

袁世凯对心腹大将冯国璋更加施恩惠。袁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冯带着一大帮北洋军去镇守南京。袁世凯便把家庭女教师介绍给冯国璋作继室。

女教师姓周名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士，其父曾任前清内阁学士。周道如自幼随父入京，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不幸父亲早逝，因母亲无傍，她便发誓终身事母不嫁，不觉过了韶华年纪，可是家中不裕，又有一幼弟待养，只得给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以为养家之策。周道如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而且爱读兵书，与三国时孙夫人相仿佛。

袁世凯听了周道如这女才子的名，便派人把她请来当女教头，教习袁世凯十几个煮不熟熬不烂的女儿，几个年轻的姨太太也乘便求书问字，其中三姨太金氏与周道如要好，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一天便说到周道如身事，三姨太笑道：“姐姐你虽然30出头，可看起来亦不过20来岁，又是有红有白的容颜，为啥甘心辜负了这副美貌一辈子寂寞呢？”“以前为了老母亲和幼弟，我是不暇问此，如今母亲已经过世，我却也老了，还想什么婚嫁呢？”“这话有点不对了，男婚女嫁自古皆然，况且太夫人已经过世，姐姐你孑然一身，将来依靠什么呢？”周道如叹息一声，脸色微红，便低了头。三姨太知说中心事，便道：“咱俩有如姐妹一般，我当替你留心。”金氏便把话转告袁世凯，袁大笑道：“你倒会做好人！”袁世凯答应留心，有了合适的便作介绍。但急切没有对象，便放下了。可巧冯国璋从江苏都督任上进京述职，在总统府偶然瞥见这白嫩且丰满的周教师，不觉眼睛盯住了她，袁世凯猛然想起一件妙事，便道：“这是宜兴周女士，在我这里教导孩子们，却也是个女才子，老弟丧偶有年，我给你做个媒人如何？”冯国璋欠身道：“总统的好意，国璋很是感激，只是我正室虽丧，还有几位小妾，儿子也长大了，我也年将半百，恐怕委曲了人家。”袁世凯捋着胡子笑道：“这周女士也快40岁了，你俩相差不大，你有这个态度，我就去让内人跟她商量，再作计较。”冯国璋走后，袁世凯让三姨太去问周道如，如此这般的将一个上将，你愿意否？周道如无话，三姨太便报袁世凯妥了妥了。袁世凯即致函冯国璋，请其践约。冯国璋大喜，返报如命，且择定良辰，筹备婚礼。

袁世凯即派长子袁克定及三姨太率领周家近亲，还有主婚人等，送周道如南下成亲，是嫁女儿的格局。江宁铁路特备花车迎接，沿路排列兵士，过江轮渡码头，悬灯结彩，扎有松柏牌楼，上悬一匾：“大家风范”，两旁分

列楹联，上联是“天上神仙，金相玉质”，下联是“女中豪杰，说礼明诗”。渡过江去，各乘大轿，进入南京，却以鼓楼前交涉局为坤宅，门前亦有松枝牌楼，五色灯泡，亮出“福共天来”。宅中陈设很是富丽，环列武装士兵，室外又有警察布篷岗位几十个，进进出出的侍者，亦是军服，与那当年东吴招婿孙夫人的武装一般。

时当吉辰，冯国璋着上将礼服，佩挂勋章，摆开全副仪仗，由迎亲人等与袁世凯代表同至坤宅，行迎亲礼。过一小时，便由送亲人等陪着花车到都督府。司礼员高歌赞歌，请冯都督出来，又请新娘降车，便见一位盛装丽人缓缓而前，身披丈许粉红婚纱，还有少女两人曳着纱角，进入礼堂，与冯国璋并肩，听袁世凯的代表致颂词，照结婚仪式行礼，夫妇礼成，管乐齐鸣，送新人入洞房，宾朋至客厅欢宴。冯国璋与周道如煞是欢爱，对袁大总统感激不尽。

袁世凯分批电召各省将军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恢复帝制的态度。冯国璋首先应召进京，袁见他帝制似有微词，便另作表演。

冯国璋道：“外面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予为秘示，以便着手布置。”袁世凯拍着冯的肩膀回道：“华甫，你我这么多年，难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一则，外国人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二则，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是改革国体之先声，想那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这种权利？那是些无中生有之词。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了子孙计算。可是我那大儿子克定身有残疾，二儿子克文想做名士，其余则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有理，便道：“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世凯立即瞪起眼睛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到那里去定居，从此不问国事。”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即已听说，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在京宣告成立，冯国璋气得直跳：“老头子真会做戏！这哪里是把我当作自己人！”筹安会是杨度发起成立。杨度是袁克定的太子党，与袁克定早就在谋划帝制。一日，总统府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告杨度说，上头打算让你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马上一腔热血冲上来，便与夏寿田去见袁大总统，即谈君宪。杨度道，拟组织一个机关研究君宪，并反复陈词，袁世凯道：“你可与孙毓筠等谈谈。”杨度退出总统府，即赶忙联络孙毓筠，策划建立筹安会组织。这筹安会必得找几个名流列名发起，杨度找梁启超不成，便设谋拉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加孙毓筠和他自己，共六人，时人称为“六君子”，其中孙、李、胡、刘皆是同盟会变节分子；杨度曾留学日本，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依附袁世凯，并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参议院参政。杨度虽然为袁世凯恢复帝制策划，但袁死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并投向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以后又帮助和掩护共产党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严复此人政治上的变化似乎与杨度相反。即前期进步，后期反动。严在187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至

辛亥革命前，较有系统地翻译、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晚年反对民主，厌倦科学，诋毁五四运动。

这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不惜大声疾呼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安。”接着，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又连续作文鼓吹帝制。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道：“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且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此文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交徐世昌、梁士诒等传阅，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大匾一方送给杨度。又把杨度的奇文寄给段芝贵，叫他在湖北秘密印出，分发给各省军民长官看阅。

“六君子”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京，共商国体。杨度等决意为天下先，即在 15 天内正式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杨度等亮相，等于是袁氏父子亮相，多半派出代表入京，且填写志愿书加入筹安会。加入筹安会自然都是些主张君宪制的人，于是筹安会发表了第二次宣言，道：“中国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是以求治，中国而行今日之伪共和，更不足以求治。

计惟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乃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如此猖狂的筹安会引起举国舆论抨击，肃政厅也觉不安，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世凯对筹安会不仅不予取缔，而且悉心保护，派出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私宅守口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袁世凯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等，则设法不准立案。

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通电全国；各省及各团体代表已经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又张罗“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且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联络。筹安会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团体，它是道道地地的政治机关。

此番劝袁称帝，倒叫杨度占先，一旁急坏了梁士诒，再不动手，便要 与帝制大业无干了。此时梁士诒所领之交通系正遭大祸，再不振作，形势不妙。原来数月前，都肃政史庄蕴宽等提出弹劾案，弹劾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贪污舞弊，袁见交通系尤其是梁士诒恃功而骄，自立门户，便想警告他们一下，令赵停职交平政院审讯，平政院院长周树模立即呈复，此案与交通次长叶恭绰有关，袁又令叶停职待审。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与叶恭绰皆是交通系首领，又牵涉下面五大铁路局长。袁召梁见面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划去了。”梁士诒遂醍醐灌顶，幡然有悟，明白自己是戴罪立功之人，然所长仍在筹集帝制用费方面，其中一大财源便是烟土，遂着人去上海，把沪粤关栈存鸦片 6000 箱卖出，共得 2700 余万元，悉数供为帝制经费，收买各方，策动各色请愿团，一夜之间便冒出“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花样，皆向参政院递交请愿帝制书。



梁士诒推进帝制有功，深合袁世凯心意，果然把那五路大参案化大为小，不了了之。

杨度等“六君子”也甚急切，以为君主国体既定，必须推行宪政，遂改组筹安会为“宪政促进会”，以为再次争先夺魁之举。

梁士诒手快，立即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凑成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需为会长，张锦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且向参议院再呈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议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世凯于年内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之妥善方法。”袁咨复道：“国民会议议员复选，定于11月20日举行，俟各地方复选报竣，当即召开会议，以征求正确之民意。”梁士诒认为，袁世凯称帝，以1916年元旦为开国登基典礼为佳，时间紧迫，所以他即让“全国请愿联合会”的代表再向参议院请愿，要求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解决国体。梁士诒又以参政资格，联合一批参政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参议院通过，咨请政府予以公布，袁世凯即批示公布。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一经公布，便有许多省份雷厉风行，把代表选了出来，当然，这些代表都是清一色的袁党人物。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13人，全体投票赞同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又发出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基，传之万世。”参议院于12月11日向袁世凯恭上“总推戴书”，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折，请“我皇上”上登一步，万世不易也。

袁世凯于当天下午将推戴书发还，在回文中摆开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架势。谓“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这是袁想当婊子的言词，即他同意当皇帝。但他又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可无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这是袁要立牌坊了。

但这却也难不倒筹备帝制诸人。参议院于当日下午5时再次开会，讨论回文，孙毓筠建议再写一篇推戴书，全体赞成。参议院立即把26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送出。此篇推戴长文称颂袁经武（编练新军）、匡国（杀灭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平灭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与日本办外交）五大功烈。歌颂之词，无以复加。对于袁世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疑虑，写道：“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霖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当初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仪式之一，今日国体已变，民国元首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推戴书把袁世凯为难之处一概洗尽。

袁世凯阅后焉得不悦，便于次日发布告示，引述推戴书全文之后，便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极，登极之前，大批授爵封王，先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命陆征祥率文武官员去黎宅道贺。黎元洪道一声：“无功不敢受爵”，众人鞠躬而退。

当天下午，袁又命人将一套王服送去，黎亦拒不接受，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袁封清室逊皇溥仪为懿德亲王，位在诸侯王上，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以代黎元洪，并赏食亲王全俸。

袁发表“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的命令”，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 7 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4 人；耆硕王闾运、马相伯两人均免称臣。

新朝用五色国旗，上端加绘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原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又准备御座御案、龙袍、平天冠等，玉玺金印也即治好，仅此数项，花费 2000 万元。

12 月 21 日，袁世凯下令大封文武：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芑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室、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鸾、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思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余为子、男，共 128 人。其余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 70 余人。

正当袁世凯大批授爵封王之际，大批对复辟帝制不满的官员辞职或请假离京。袁怕这些人出京将有不利，即令军警便衣去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员擅自出京。

使袁世凯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2 月 23 日平地一声巨雷，云南护国军起义了。

## 第十章 秀才光气

在亡命日本的人流中，有位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他于 1914 年 7 月来到东京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原名庆同，考秀才时叫乾生。后来写文章、办报纸时，取故乡的独秀山名为名，安徽安庆人，1879 年 10 月 9 日生。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生有异姿，束发受书，天性最厚，亲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一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1881 年 10 月 7 日，陈衍中在苏州教书时死于疫疾，是时陈独秀还不满 2 周岁。

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但往往又包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她常常教育子女，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她教育子女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

陈独秀兄弟姐妹 4 人，他排行第四，有兄长和两个姐姐。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长陈独秀 8 岁，府学贡生。

陈独秀 5 岁时，便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做嗣子。叔父陈衍庶妻子早亡未生育，续娶谢氏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陈衍庶便当了陈独秀的继父。

陈衍庶于 1875 年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而步步高升，由

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真是官运亨通，一路顺风。他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做官时，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东北和朝鲜，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起来。战争的双方都需要马匹，中国商人乘机贩运以获取暴利。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地，他便抽牲口税。这种临时性的税收，勿需上缴国库，谁收谁得，自然是大部分都落入了他的腰包。到 1908 年前后，他觉得腰包里有了以万计的银两，又看到天下乱哄哄的，大清江山靠不住了，便挂冠而归故里。

陈衍庶在安庆有市房铺面近 10 家，在城里南水关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有五进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两个中院和一个后院，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大门楼有一丈多宽，高悬魏体字“寰宅”木牌。陈衍庶在北京开设崇古斋古玩铺，投资白银 1 万两，在奉天还设有分店，又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 200 余亩，在安徽贵池县置地 800 亩。

自此，陈家由一个小户人家一跃而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

陈独秀自幼由祖父陈章旭教他读书。陈章旭是候补知县。他精明强干，学问极其深醇，为人亦极其慷慨。陈章旭对后辈极严厉，他有个绰号，叫“白胡子爹爹”。当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子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子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

陈章旭恨不得要陈独秀一年之内把四书五经都读完。陈独秀背书背不出，祖父便气得怒目切齿地，动手打他。幼小的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母亲为陈独秀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她总是用好言劝独秀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陈独秀见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他揩眼泪，一面责备他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是叫他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一次，白胡子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祖父越打越有气，孙子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自幼便形成了不畏强暴的个性。他的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既刚烈又温情，既包含了祖父的个性，又包含了母亲的个性。他嫉恶如仇，却又不尽然如是，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凡是认准了的目标，就执着不放，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

陈独秀的个性不适合搞政治，但历史却把他推向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因而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却又不通政治谋略。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

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

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若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他从不耍阴谋诡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语道破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

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逝世。此后，家里给陈独秀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满意。

到十二三岁，陈独秀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大哥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

他了解弟弟的脾气和爱好，知道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除教他研习经书外，就教他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

但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唯一的“正道”是走科举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和学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

由于母亲严命不喜欢八股文的陈独秀学习八股文，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直到陈独秀17岁时，在县考前的一两个月，大哥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可是弟弟心里想的还是《昭明文选》。大哥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

县考，府考陈独秀都通过了，但名次都考得很低，剩下最后一关是院考，院考及格以后才是秀才。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要去考同他格格不入的四书，还要做一篇他看不起的八股文，本来想必将是名落孙山，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到院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的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小时一声不响。他看见大哥这种失望的情形，才觉得有点难受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他中了第一名秀才。

他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便着实准备乡试，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一番。

18岁的陈独秀同大哥一起离开母亲，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这时正值夏日炎炎。

乡试共3场9天，陈独秀在大哥带领下，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竭尽气力，从人丛中挤进考棚。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10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

小仿佛警察的岗棚大小，棚顶很低，高个子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科举出身的人都要尝尝“矮屋”的滋味。“矮屋”的三面砖墙砌得七齐八不齐，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的，考生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晚上睡觉也在那里。这年南京奇热，大家都把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

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空气不流通，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

有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呆看了一两个钟头。陈独秀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象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发表的文章有些道理。这一连串的联想便使陈独秀的立场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方面去。

这次乡试，陈独秀名落孙山，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

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梁辩护，乡里耆儒，以此指斥陈独秀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自此，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陈独秀关心国家大事，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陈独秀的这篇文章7000余字，他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渚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陈独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热爱祖国之心。

许多富户人家托人说媒。安庆统领高登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高晓岚，小女儿高君曼。将长女晓岚许给陈独秀。1897年冬，18岁的陈独秀和21岁的高晓岚结婚。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

高晓岚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于乔年，三子松年。

陈独秀和高晓岚本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们婚后有一段时间的爱情的话，而过了这段时光便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后来陈独秀东渡日本留学时，欲借夫人10两重钗作为游资，夫人坚决不肯，故此时常吵嘴。

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即 1898 年，就被嗣父陈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899 年，陈独秀得知生母生病，便同大哥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

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

1901 年，陈独秀到达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

陈独秀一到东京，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当时留学生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治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陈独秀是很爱读这些名著的。

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励志社的社员分为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即革命党。陈独秀和张继等参加了励志社，但不久便脱离了。

1902 年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安庆。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日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

一时风声所传，闻者兴起，陈独秀是演说的首倡者，为当局所忌恨，他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1902 年 9 月，陈独秀到达日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学习陆军。这年冬天，陈独秀和秦力山、张继、苏曼殊等人发起成立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

陈独秀这时已由康梁派转向革命派。1903 年 3 月的某日晚，他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人，闯入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学监姚惕的住宅，他们对姚阻挠留学生学习军事不满，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

他们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事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 3 人于 4 月间被迫返国。

陈独秀同潘赞化回到安庆后，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人，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革命运动。陈独秀在演说会上高声说道：“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参加演说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约 300 余人。演说会群情踊跃，气象万千。陈独秀提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

定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7人立时起草社章。

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126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社员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为一家等等。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得有了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袭。

演说会举办一周后，安庆知府桂英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蛊惑人心”。陈独秀等则不予理睬，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多，参加演讲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10余人，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缉槩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往上海。

这时章士钊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陈独秀便协助章士钊办报。陈独秀和章士钊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他们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也不浣。后来，章士钊回忆他和陈独秀这段往事。赋诗一首：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

《国民日报》所刊载的文字有时论、学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现象。为了作者人身安全的缘故，时论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

清政府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国民日报》，致使报社经费困难，出版了3个月23天后，不得不停刊。

1904年初，陈独秀从上海潜回安庆，初到故乡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同校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他们3人便商定创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由陈独秀自任之。

《安徽俗话报》于3月31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科学图书社。不久，陈独秀独自一人来到芜湖，住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办起报来。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陈独秀在那里默默地做着工作。

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安徽人听听，免得众人蒙在鼓里；其二是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

11月，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去上海。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该协会的革命计划是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陈独秀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爱国协会，天天同杨笃生、钟宪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在试验室练习和聚谈。

11月19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被查抄，上海的一些革命志

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于1905年返回芜湖。

万福华行刺失败后，革命党人在北方的暗杀活动仍在继续进行。陈独秀参与了密谋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的事件。

1905年9月，陈独秀决定到安徽公学任教，《安徽俗话报》自动停刊。

安徽公学是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名者，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发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担任教授的，皆为革命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还有刘申叔、陶成章、周震麟、柏文蔚、张伯纯、苏曼殊、冷、谢无量、江彤侯等。一时各地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长江流域中部的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长江流域中部地区的文化运动的总汇，大江南北志士几无不与芜湖互通声息。

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与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游历皖北各地，遍访江湖侠为之士。

陈独秀同柏文蔚以及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于1905年夏发起建立岳王会。岳王会总部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不久又在南京和安庆设立分部，柏文蔚任南京分部部长，常恒芳任安庆分部长。

1906年暑期，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去日本，暑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培等。不久，苏曼殊也来皖江执教。

陈独秀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

陈独秀在学习期间加入亚洲和亲会。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印在东京的革命志士联合组织的团体，中国人加入和亲会的除独秀之外，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等等，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的宗旨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1909年9月间，陈独秀回国，居杭州，于次年初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这时，他与江南著名文人刘季平（刘三）、沈尹默（沈二）结识，他们在杭州时常做诗，互相观摩。陈独秀除做诗，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还研究甲骨文。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过《说文引申》一文，这是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 第十一章 钊钊相知

1911年春，陈独秀又同妻妹高君曼结婚。高君曼略识文字，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他俩人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大门。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和高君曼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

陈独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将近5年时间内，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写了许多篇



古体诗，有不少诗在报刊上发表。

1911年12月，安徽临时议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返回安庆。

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内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

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没能施展。

1912年4月，陈独秀主动辞去秘书长职务。他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后因陈独秀再次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便聘马其昶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次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由于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陈独秀于1912年6月去浦口，劝柏文蔚回安徽。

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他们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多森共事，在孙来上任之前即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

7月中旬，陈独秀离开安庆去上海。

几天之后，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并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也由上海返回安庆，再任都督府秘书长。

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龚振鹏，均被龚绳绑，拟即枪决。陈独秀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缉令，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陈独秀旋即逃往上海。

陈独秀逃往上海，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逃至乡间躲避。军警便抓走了陈独秀的侄子陈永年，并抄了他的家。

陈独秀逃到上海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但书业销路不景气。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之计，写信给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191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

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更是学术专著的冷门货，这两本书所得的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

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进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然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亡命东京的革命党人章士钊、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愿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1914年8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参加该会的还有李烈钧、胡瑛、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张耀曾、柏文蔚等，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产生了很大影响。

《甲寅杂志》的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 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陈独秀外，还有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

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李大钊又成为同陈独秀齐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寿昌。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里是广阔的冀东平原的东端，濒临着浪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李大钊家的住宅座落在村子中间的高地上，远眺着一望无垠的田野。

李大钊的父亲是一位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23岁就去世了，留下怀孕的妻子。李大钊的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以后不到16个月，也相继逝世。李大钊自小孤苦伶仃，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无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有90多亩地，因为没有儿子，将侄儿任荣，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嗣子。李大钊出生时。

他已经70多岁了，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他对孙儿既十分宠爱，又管教非常严厉，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

在祖父的督促和教育下，李大钊从3岁起，就学着认字，祖父白天教，晚上问。四五岁时，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李大钊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学习见长，幼儿时代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著称于乡里。

李大钊7岁时，祖父送他到本村谷家的学塾跟单子鳌读书。李大钊跳过了蒙学阶段，直接读“四书”。

李大钊读了3年书后，单子鳌便向他的祖父提出：“这孩子学业优良，我已经教不了他，请另请明师吧！”祖父便把李大钊送到本村赵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读书，又转至井家坨的举人宋家读书。

李大钊10岁那年，祖父给他完了婚，妻子叫赵纫兰，长李大钊6岁，以大姐的身份操持家务，看管大钊读书。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他原是报考秀才的，赶上清朝政府改良教育，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他便上了新学。

李大钊在永平府上了两年学，祖父去世了，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他本打算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但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又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井家坨宋举人见他将来必有大造化，表示愿资助他到外埠深造。但李大钊见宋举人因做官而得到不义之财，断然拒绝他的帮助。

妻子赵纫兰辛苦艰难，典当挪借，支持李大钊上学。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上了6年学。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举办人是汤化龙、孙洪伊。在教师中有革命党人，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是史地教员白亚雨。白亚雨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重要成员。他学识渊博，待人热情诚恳。他认为，一些立宪派人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每慷慨陈辞，歌荆轲易水之歌，其声郁抑苍凉，听者皆涕泣相向。他的革命思想不但影响了李大钊，也团结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京津和滦州、张家口一带奔走，从事运送军火、联络新军等活动，终于发动了滦州起义。他领导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就义前义正辞严地说：“我死不足惜，倒是你们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隶，明天要做外人的牛马，难道不觉得痛心吗？”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李大钊深受感染，立意革命。为求索新的救国之途，他于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谈，毅然加入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天津支部，为中国社会党评议员。

李大钊在学校里担任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他在《言治》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哀篇》中，感慨激愤地抨击袁氏政府的“共和”，仍旧是“以暴易暴，传袭至今，敲吾骨，吸吾髓；北洋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民之受其患也重矣。

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袁世凯当时疯狂地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了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

他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儿女葆华和星华，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李大钊在东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在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大钊发起，成立了中华学会，学会既是学术组织，又是政治团体。

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级留日学生司徒复兴结为好友，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谈兴不衰，司徒复兴向李大钊感慨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近况。

司徒复兴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会后，他秘密地向李大钊宣讲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

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的党章，并征询其愿否入党。李大钊以先深研各国政情、求索各种主义，后决定救国之途为词婉言谢绝了。

李大钊在日本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自从 20 世纪初叶，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李大钊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党，已接触了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文虎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不相信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李大钊已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他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从图书馆内借来了幸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攻读。

李大钊又通过司徒复兴的介绍，认识了早稻田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村夫。

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多年来，他和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宫崎寅藏相交素笃，并与黄兴、宋教仁为挚友。他在教学之余，支持宫崎寅藏创办的《革命评论》，配合同盟会机关报大造舆论。清廷退位之后，他被宫崎寅藏不惜倾家荡产，为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筹募经费、招聘人员购进武器的义举所感动，自己主动为孙中山讨袁从日方刺探有关情报，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民族革命。

河上村夫同样热情地接待李大钊。他握住李大钊的手，兴致勃勃地说：“欢迎，欢迎！我真诚地欢迎中国第一个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来做客。”河上村夫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已经知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不甚了了，需要给以启蒙式的帮助。当李大钊把读《共产党宣言》记下的疑难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发出提问时，他又感到这位初次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态度严谨，不是仅仅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崇尚空谈的书呆子，而是一位学以应用，时时、事事联系中国实际的人。

几经交谈，河上村夫教授喜欢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他断定：李大钊将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送给李大钊阅读。

袁世凯敲响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之后，在留学日本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反对复辟帝制的留学生义愤填膺，公开串联，主张在留学生中间发起一场革命行动。他们为了唤醒中华民族的魂灵，主张写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复兴对发起革命行动有兴趣，他也很有组织能力。李大钊则赞成河上村夫的见解，他赶写了一篇富有政治远见的讨袁檄文——《国情》，并投寄给《甲寅杂志》。

《甲寅杂志》主笔章士钊从邮件中突接这篇论文，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其来见。

章士钊寓居东京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书斋兼卧室，如有亲朋相访，自然又要充做会客之地。室中布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静。章士钊的妻子叫吴弱男，出生于望门大户，清末民初的上层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凯而后的历届北洋政府的阁僚，几乎无人不和她家有瓜葛。其父吴保初，与谭嗣同等人齐称海内四公子；其叔父吴长庆曾官至广东水师提督之职，

在率部庆军渡海驻朝鲜之际，曾一手提携事后成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吴弱男长于名门望族之室，自幼在三从四德的桎梏下长大，虽精于文墨，且又和反清的名士联姻，但仍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终于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者。

这天，陈独秀不宣便直进章士钊的寓所。章士钊匆忙起身，热情地请陈独秀落座。

他们两人一见面便谈起孙中山发动讨袁“三次革命”，陈独秀冷然作笑，说：“中山先生书生气十足！起初，双手把辛亥革命果实奉献给袁大头，现在又想把这个独夫民贼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下来谈何容易？这不正应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俗话了吗？”章士钊表示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他顺手把李大钊的《国情》一文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仅仅看了标题《国情》二字，便抬起头淡然地问：“是写何国之情？”章士钊旋即把《国情》一文的内容概述一遍，并表明自己赞同《国情》一文中的观点。陈独秀沉痛地说：“打倒了皇帝，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了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陈独秀把《国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绪低沉、颇有些悲观地说：“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说句极而言之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辞，快快不快地离去了。

陈独秀刚刚离去，李大钊便轻轻地叩门。

章士钊把李大钊迎进门来，客气地问道：“先生，您是……”“李守常。”李大钊谦虚地答道。

章士钊十分高兴地请李大钊落座，并向李大钊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吴弱男。历经短暂的交谈，双方都打消了初见时的拘束感，很快就进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谈。

当章士钊知道“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问：“《国情》一文，你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李大钊听后面带难色，他看到章士钊那种诚挚神态，方说出真情：“先生名曰士钊，我投文《甲寅杂志》，何敢与先生钊钊齐名。”章士钊见李大钊敦厚、纯朴，又有着真知灼见，更加有了好感。他称赞《国情》一文的观点，说李大钊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国情》文中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灼识，说到此文结束处：“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他有些兴奋地说：“这就把美国人古德、日本人贺氏著文的本意，袁大头复辟称帝的野心昭然于天下了！”李大钊有些惶恐不安，他十分谦和地说：“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我只不过是痛感国情之危难，民族之厄运，说了几句坚持共和，反对帝制，以及唤醒国民，共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话而已。”“这就很了不起！因为你是首次撰著论文，向国人发出警告的有志之士。”章士钊又问：“守常先生，昔日，你是同盟会会员吗？”“不是！但一直在追求孙中山先生所践行的革命理想。”“在这个问题上，你我是不谋而合的！”章士钊讲了自己虽和孙中山先生情好极笃，但因个性持重，不适于从事群众运动，未曾参加同盟会。章士钊接着说：“最近，中山先生提出谨防日本政府趁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侵占我国的领土主权。对此，你以为然否？”“我赞成中山先生之说，但是我认为更要提醒国民，防止袁世凯借机卖国，达到他复辟帝制的目的！”“所见极是，令人顿开茅塞，望你余暇多多为《甲寅杂志》写稿。”“先生过谦了！为国为民，我自

当尽力。”“先生心胸豁达、敏捷，今后希望常来舍下叙谈救国大事。”从此，李大钊同章士钊建立了友谊，李大钊也成了《甲寅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 第十二章 狂人求师

李大钊在读书之余，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新主义。一年多以来，他在河上村夫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一块磁铁牢牢地吸着他那颗救国救民的心。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济南和胶济铁路一带地方，日本侵略者还向袁世凯政府提出 21 条款，作为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交换条件。李大钊奔走呼号，愤笔疾书，积极组织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企图灭亡中国的 21 条。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了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选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讨袁、反对复辟帝制的战斗檄文。李大钊强烈地呼吁国人团结一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危亡中的祖国。

正在这时，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窗挚友、同盟会会员俞德也亡命东京，同李大钊会面，向李大钊全面地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李大钊将留日学生总会委他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递给俞德征求意见。俞德一面仔细地阅读，一面又不时地发出几句评论：“好！这几句尤为深刻：中国等于自缚之春蚕，列强如争食之饥虎。……”俞德到达东京之后，矢志不渝，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他除学习外，天天忙于筹借讨袁经费，暗自购买讨袁军火。

1914 年 11 月 10 日，《甲寅杂志》发表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这篇文章约 4000 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那么，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了些什么呢？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这些话自然能被一般读者所理解。关键是陈独秀对爱国心和自觉心的分析和阐述，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

陈独秀说，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的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

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是时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

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

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国家进行了分析，对中国腐败的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撻之后，得出结论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他不赞成“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子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固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自觉心所排而去尔。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李大钊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便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论调，李大钊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认为“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

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他还给《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写了封信，希望能约见陈独秀面谈。

章士钊收到李大钊的文章《厌世心与自觉心》，忐忑不安地说：“这位少年气壮的李大钊，竟然批评起一代狂人陈独秀来了。”陈独秀看见李大钊的文稿，刚刚阅读了个开篇，漠然地问：“李大钊系何人？”“就是写《国情》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学生，这是他写给我的信，想约见你谈谈。”章士钊把李大钊的信递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信，连同李大钊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里，笑了笑说：“嚯！著文相讥不够，还要打上门来当面训斥，好！

有胆识，我要带回去仔细地研究研究。”陈独秀通过章士钊约定时间，同李大钊面谈。

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 10 岁。他见到李大钊，趋步近前，望着面带拘谨神色的李大钊，主动地伸出双手，用力握住李大钊的双手，有些激动地说：“您就是李大钊，真是文如其人啊！”李大钊不善辞令，更不习惯表现自己，一时不知该对这位在政坛早已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说些什么，只好被动地点头称是。

陈独秀落座之后，感慨地说：“大钊先生！我从你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很有文才的年轻人，为师者不在年高，你就是一位比我年少的师者。”李大钊有些惶恐地说：“独秀先生过谦了，钊实不敢当，实不敢当。”“不，你是受之无愧的。我感谢你那篇文章，使我丢弃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它使我茅塞顿开，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坦途。今天，我是为求教而来的，望先生多多教我。”李大钊无限感慨地说：“独秀先生真是一位十分豁达、开明的有志之士。我们知己相见，倍感亲切。”他们初交，简单地谈过文字之争的是非后，李大钊便介绍了他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体

会，建议陈独秀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尔后李大钊很有礼貌地说：“仲甫先生，您对救国教民有何宏论高见？”“当今的中国黑暗到了极点，我思之良久，惟有科学、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独裁和愚昧！”李大钊赞成陈独秀的观点：“如果 4 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帝制的思想！”“我准备近日回国，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办一个杂志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乃是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和阻碍中国的革命！要用民主与科学唤醒青年，让青年自觉地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仲甫先生，不知您回国以后，准备开创一个怎样的提倡民主、科学的杂志？”“我想创办一种新型的杂志，名字暂定为《青年》。大钊先生，届时，你可要撰文支持噢！”李大钊应允。章士钊提醒李大钊说：“守常先生，你那篇文章是否要发表？”陈独秀抢先回答说：“要发！我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应刊载大钊先生的批驳文章以正视听。我想这样做是民主的，也符合科学的精神，更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友谊。你说对吗？大钊先生。”李大钊被陈独秀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感动了，很是动感情地说：“我赞成你的做法。”

文字的论争和私人的友谊是两码事，我一向反对因观点的争论而伤其私谊。”1915 年 6 月，陈独秀和易白沙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 21 号一楼砖木结构的楼房内。他立即着手创办杂志，通过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介绍，杂志由群益书社的开办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承担印刷和发行，每月出一期，编辑和稿费 200 元。

9 月 15 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号正式发行。次年 9 月，《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杂志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周报《上海青年》，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期约 100 页。《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青年人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一场思想大革命由《新青年》引发出来。

李大钊仍然在东京留学。他的思想飞速转变，迅然地从旧民主主义者，朝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演化；从进化论的观点，逐渐地朝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转化。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形势，他不像他的朋友司徒复兴和俞德那样愤然而不知所措。相反，他却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思索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以及预测着未来中国的革命前途。

司徒复兴和俞德只知报国，不知主义，他们被袁世凯称帝所激怒。驻日公使陆宗輿又发出警告：对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留学生，即日起停放官费留学生金，并用武力押解回国。有部分留学生在这种压力下，倒戈过去。司徒复兴和俞德立意用热血擦亮这部分留学生的眼睛，洗掉他们心灵上的污秽。

他们在留学生会上发表演说。司徒复兴慷慨激昂地说：“同胞们！我们



的祖国，我们的人民，被专制的皇帝，被腐败的官吏，被这些留着真辫子、假辫子的奴才们害苦了！辛亥革命的鲜血，换来了共和制的民国。可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呢？又被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窃夺去了！他为了登上龙廷宝座，与日本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21 条，取得了洋爸爸在身后撑腰，实现了他甘心做儿皇帝的美梦！而神州大地变色，4 万万同胞受苦。你们说我们能答应吗？”因集会内有陆宗輿派来的武装打手，留学生们惶恐不安，面面相觑。

俞德猛地举起手枪，对着天空“啪，啪”放了两枪。接着，他又愤怒地大声问：“你们都必须回答！在场的留学生，谁想做袁大头的奴才、做中华民族的败类，我就当场打死谁！”留学生吓得心慌意乱，全身抖颤不已，小声地答道：“不，不答应。”司徒复兴无比悲痛地大声疾呼：“同胞们，一个人的生死荣辱是无关重要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兴亡，则联系着每一个庶民百姓。10 年前，也是在日本东京，曾经出现了一个愤而蹈海的民族英雄陈天华。

他在《绝命辞》中，曾经谆谆告诫留日学生，为了中华必须奋起抗争！今天，我也想告诫诸位同胞：一个失掉灵魂的民族，决不会有富强的祖国的！若想建立真正的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必须奋起斗争！振奋中华民族的灵魂！同胞们，我要用满腔的热血，擦亮你们迷失方向的双眼；我要用年轻的生命，唤醒中华民族每一个昏睡的灵魂！”司徒复兴说到这里，抓着自己的衣扣，奋力一撕，“嚓”的一声撕开了黑色的内衣，露出胸脯，旋即举起手中的匕首，向腹部刺去。

俞德欲步司徒复兴之后，举枪自杀，恰巧李大钊飞身向前，抓住俞德的手腕，“啪”的一声，子弹飞向长空。

袁世凯复辟称帝，司徒复兴欲自杀殉国，极大地撼动了留日学生的灵魂。李大钊和俞德等人四处奔走，八方演说，终于又把动摇不定的留日学生，从袁世凯的走狗——陆宗輿那里拉回来，团结在留日学生总会周围。

李大钊以中华学会负责人的名义，同乙卯学会负责人易象商量，将两会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中华学会和乙卯学会都是著名的革命团体，对入会的资格规定都比较严格。

1916 年 1 月 30 日，神州学会正式宣布成立，拥有会员 100 多人，设干事部，下设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工商科。另设总评议会，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原是乙卯学会成员，在合并工作中，活动积极，被推选为干事部干事。他们俩从此建立了友谊。

神州学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一些学术讲演和出版刊物。李大钊讲演了《联邦与邦联》、《颜之学说大旨及其劳农主义》等；易象讲演了《礼运·大同篇》。会员集资印行，办起了《神州学丛》会刊。频繁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探讨，提高了会员的思想水平。

李大钊闻讯蔡锷首先由云南起事讨袁后，立即召开留学生总会紧急会议，一致决定为护国军筹募军饷，并选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主任，在东京开展宣传活动。李大钊为联络反袁活动，返回上海。他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可谓是畅谈不厌，万言嫌少。

陈独秀询问李大钊何时毕业回国，李大钊沉思片刻说：“还有一年，写出学位论文，答辩一结束，即可回国参战。”陈独秀深感孤军作战，力不从心，他多么想请李大钊和他共同出版《新青年》杂志，但他又不便直接说出，

沉吟有顷，以商量的口吻说：“你在写作学位论文的同时，可否对国内思想疆场上的战斗策应一下？”“可以，我想为青春中华的诞生高声呐喊，策应您所开创、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回到东京之后，就开始构思划时代的雄文《青春》，为了这篇文章早些时间脱稿，他决定从青年学会公寓搬出，迁到东京郊外幽静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那里舍外是荒芜的小园，后面有凭假山而建的古刹，假山前池塘边，错落地种着梅花和樱花。

李大钊在那里终于完成了《青春》的写作。

李大钊的一些友人陆续地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了，李大钊在送友人林伯渠等人回国时，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河上村夫教授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中国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士，他又把厚厚一摞不同版本的书籍交给李大钊，兴奋地说：“大钊同学，这是我给你找来的参考书，你带回去用心阅读，我坚信不疑地认为，你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理想的学位头衔的。”李大钊回答道：“谢谢恩师的关心，我不准备参加学位考试了。”河上村夫惊愕不解地问：“为什么？”“我想回国。我的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正在危难之中，列强们正在瓜分我的祖国，压迫我的同胞，灾难更加深重。”“祖国解放是漫长的，个人取得学位是短暂的。放弃就要取得的学位，而去追求漫长的祖国解放，我是不能理解的。”“我东渡求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不是为了考取学位。祖国被列强们瓜分了，灭亡了，我考取了学位又有何益呢？”李大钊深切地思念着祖国和人民，写下了诗句：

斯民正憔悴，吾辈尚磋跎。

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

作为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河上村夫，他希望能早一天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去，他不止一次为李大钊绘制学业上的蓝图，也曾设想通过李大钊回国后如何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李大钊突然废弃学业，他不去准备写论文，而是把课下写的《青春》拿来请他批阅，他无可奈何地把他精心为李大钊挑选的参考书，分门别类地放回书橱里。

当河上村夫读完李大钊的《青春》全文，情不自禁地连声赞曰：“妙文神笔，好，好，好！”他不由自主地读起《青春》中自己特别喜爱的文字：

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李大钊在河上村夫的赞同下，将《青春》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

河上村夫教授终于同意李大钊回国了。他希望李大钊回国后做一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并赠送给李大钊一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 第十三章 携手赴国难

1916年春，李大钊乘海轮返回上海，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林伯渠早李大钊两个多月回国，他们两人分别后保持书信往来，建立了革命友情。

林伯渠，名祖涵，湖南临澧凉水井村人，1886年生。父亲林鸿仪是前清副贡生，但终生未曾入宦，一直赋闲乡里。尽管家中尚有祖上留下的几石薄产，也常常是入不敷出。

于是只得像当时多数落第文人一样，很早便开始了教书生涯。他先是在本地乡塾教书，后被聘至澧州城中执教，不久便颇有名声，于是被召回本县县城道水书院任山长。

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略通文墨。林伯渠童年体弱，在10岁之前，一直没有正式入学，由母亲教他识字，《三字经》、《百家姓》，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林伯渠有一位比他大6岁的隔壁堂兄林修梅，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1921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这小兄弟俩很要好。林修梅从小爱读书，并酷爱习武，林伯渠常向他问这问那。一天，兄弟俩走进村口乐二庵，将菩萨推翻，闯了大祸。

父亲得到消息，急忙赶回家来，将儿子责打一顿，向村中父老陪情，并和林修梅家立即请人塑了一个观音金身。

父亲决定让他上学，先是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林伯渠生性颖异，学习进步特快，不到两年，四书五经，便已授完。父亲把他带到身边，亲手编成一套《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励志曲选》，严加教授。他要求林伯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得有半点差池。

林鸿仪治学，素以严谨著称。对儿子更是毫不放松。每每夜阑人静，他总是秉烛临案，反复讲授“三统”、“三世”的理论。

1902年，16岁的林伯渠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德西路师范。林伯渠在常德读书期间，结识了常德府中学堂学生覃振。由于覃振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被学校开除。覃振被开除后，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死里求生》，同学们争相传抄，并且张贴在大街小巷，吸引了不少读者，覃振在常德名声为之大振。林伯渠支持覃振的活动。俩人友谊日趋加深，后来覃振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

林伯渠还支持同学蒋翊武的革命活动。后来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并遭到通缉。林伯渠暗中邀集同学，秘密捐资，帮助蒋翊武潜往上海。

父亲不幸早逝，母亲为了家中有个帮手，要林伯渠提前结婚。

林伯渠的这桩婚事，本是指腹为婚。父亲林鸿仪在澧州城教书的时候，城里人有个名叫司马瀚的同窗学友，两人一向友善。司马瀚新近中了举人，被朝廷选了四川浦江县令。司马瀚比林鸿仪稍长，而两人几乎是同时婚娶。一日，司马瀚邀林鸿仪饮酒，席间，司马夫人一旁作陪。酒过三巡，林鸿仪看了一眼身怀有孕的嫂夫人，笑着对司马瀚说：“辛砚兄今年真的是双喜临门，又是黄金甲第，又要新添贵子，可喜可贺！”司马夫人嗔笑着瞪他一眼，回敬道：“小仙兄过奖了，尊夫人不也是有了么？”司马瀚接过话头：“当真？”林鸿仪不语，表示默认。

于是，司说来，直是上苍有眼。小仙兄若不嫌弃，倒不如咱们兄弟两个结个亲家，亲上加亲。贱内如果生个女儿，将来就是你林家的；尊夫人如果生下个女儿，那就是我司马家的人！如何？”林鸿仪推说不敢高攀，后见

司马夫妇如此诚意，也便欣然应允下来。

不巧，司马家生了个女儿，林家也生了个女儿，但林家的女儿不到周年就夭折了。

司马家的女儿细凤 5 岁时，林家伯渠出生了。那时当地有句俗语：“女大两，黄金日日长，女大三，黄金堆成山。”女比男年长 5 岁的婚姻也是有的。于是，司马和林家这桩婚事也就这样铁定了。

细凤和林伯渠结婚，司马家备上一份十分体面的嫁妆。林家六口，全靠几石薄产过活，常是入不敷出，细凤日夜操劳，家境也难改善。

林伯渠在校刻苦学习，报考官费留学，名列第一。校长熊希龄见林伯渠不仅学识渊博、谈吐不凡，而且有爱国之心，竭力推荐，林伯渠才得以东渡日本留学。

1904 年，林伯渠进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

覃振亡命日本，林伯渠同他异国相逢，格外高兴。覃振与黄兴、宋教仁等关系密切，经覃振介绍，林伯渠很快同黄、宋熟识起来。

1905 年 8 月，林伯渠应黄兴邀请，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后，他请求黄兴和宋教仁带他去见孙中山，要求参加同盟会。

孙中山当即表示：“我代表同盟会总部，接纳林君入会。”林伯渠填写了同盟会盟书，黄兴主盟，宋教仁、覃振介绍，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

1906 年初，林伯渠和刘道一、秋瑾、姚鸿业等人一起回国。林伯渠抵达上海后，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长沙，负责同盟会秘密刊物《民报》的发行工作。

为了掩护身份，林伯渠一回到长沙，便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学堂主要用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规模不大。

这年秋天，刘道一、蔡绍南策划萍醴浏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认为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暂时面临困难，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林伯渠被派往东三省调查边疆，联络绿林。

林伯渠通过一位亲戚介绍，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他在东北发展了关显庭、陈仙舟、林武等 10 多人为同盟会会员。

1909 年，同盟会派廖仲恺和林伯渠同东北“马贼”建立联系。这支“马贼”拥有四五千支枪，在延吉和桦甸县间的南山沟子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自治政权，其势力范围南北约百里，东西约 300 里，引起同盟会注目，认为这支“马贼”可以作为革命的盟友。最初由宋教仁带领几名同志前往，不料立足未稳，被清军发觉，使命受挫，只好撤回东京。

在林伯渠、廖仲恺的争取下，东北“马贼”终于成为同盟会的盟友。

林伯渠的妻子在湖南家乡去世。林伯渠在精神上蒙此巨大不幸，使他悲痛欲绝。

林伯渠担任劝学总所会办，积极兴办新学，名声大振。因为常到各处查学，1909 年，他认识了吉林女子小学新来的年轻女教员伍崇贤，俩人一见钟情，又有提学使吴鲁说媒，便于 1910 年春结婚。

1911 年 8 月，林伯渠应中部同盟会之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派他到湖南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

林伯渠带着妻子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把妻子、女儿安顿好，便前往常德。

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林伯渠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林伯渠

原来在常德西路师范的同学，多在新军 25 混成协 50 标三营中任职，因此，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三营上。

在武昌首义前，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

10 月 23 日，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余昭常为总参谋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余昭常等抵常德时，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遂告光复。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

焦达峰被杀，谭延 任都督，谭密令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捕杀杨任等人。在湘西一带活动的林伯渠，惊闻两路招抚使杨任等人被杀惨案，异常愤慨，决定偕数位同志立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

林伯渠来到上海，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他和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一起，热烈欢迎孙中山归来，并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湖南宣布独立，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要塞司令是他的堂兄林修梅。

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林修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祖国，亡命日本。

林伯渠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去追求新的知识，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外，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他坚信“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一刻不肯虚度时光。

林伯渠在读书期间，不忘革命，他在一首诗中说：

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列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

1914 年 7 月 8 日，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林伯渠和林修梅准时来到会场。会上革命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他站起身来说道：“诸位，我来讲几句！”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微微吃了一惊，都静听着他用湘西北口音说话：“当然，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作为革命党，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要么是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要么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成为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人，后来竟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竟和立宪党人流瀝一气，反对孙先生，支持袁世凯。我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打手印宣誓，总比乌合之众好。我愿跟孙先生革命！”说罢，在誓约上签名，打手印。

林修梅紧接着说：“我宣誓服从孙总理，共图拯救中华大业！”同样在誓约上签字、打手印。

孙中山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1916 年 2 月 28 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斗争。

他赶回上海，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活动。

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

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他还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孙中山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

黄兴、李烈钧、张继、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革命得逞，其势力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被称为缓进派。其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是抱反对态度的。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曾指令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区慎刚等南洋同志，向李烈钧、陈炯明等进行规劝，但李烈钧仍发出布告各埠同志书，陈炯明则亲往南洋各埠联络，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为了贯彻反袁缓进主张，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以救济广东水灾为名，于1914年创办了水利公司，派员赴各埠筹款，声言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

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声言：他们只是不赞成以中华革命党来取代国民党。现在惟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目的达到，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他们还说：他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欧事研究会”，假借世运，掩饰内讧，另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抗。1915年1月，林虎、熊克武等欧事研究会部分成员通电，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判二十一条辟谣。2月，黄兴、陈炯明领衔通电，再次辟谣，该电以停止讨袁、一致对外为基调，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示：“癸丑7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尚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死，又何足惜？”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他们声明：“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二十一条签订后，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黄兴等17人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外交失败，丧权蹙国”，“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此后，欧事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革命党。孙、黄趋于一致。

孙中山于1915年2月委任陈其美、居正、许崇清、胡汉民、张静江分别担任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各部部长，廖仲恺、邓铿、杨庶堪分别为财政、军务、政治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执信、苏曼殊、邹鲁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辛亥、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勿视北方，覆辙孙中山听从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进行“培养根基”的工作，他们的直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

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党人的机关、团体几乎被破坏殆尽，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

业以自给，或任教授以糊口，或为谋生活计，于国事竟不闻问。

陈其美、戴季陶到大连后，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向他们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坚持斗争的情况，鼓起他们的勇气。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很快恢复了旧时的机关、团体。

随后，又继续发展，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 30 个革命团体。

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

其时，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自动回粤，与邓铿通力合作，共策讨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韶州、增城、龙门四路，加上江门、香山，由邓铿负责；西南方面，分为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思平、开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在朱执信、邓铿的周密策划下，广东反龙力量呈迅速聚合之势，为大规模的反袁讨龙的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

1915 年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命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分别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总司令，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建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司令部。孙中山还陆续委派了各省的司令长官。大批革命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陆续回国。

居正在回国之前，孙中山找他秘密面谈，孙中山建议东北军总司令部设在青岛八幡町的一座坚固的大楼内，那里原是德国驻青岛总督的住宅，现在是日本人的战利品。萱野长知通过他的军队内的朋友，把这座大楼让给中华革命党使用。

孙中山说：“我们必须火速将革命军组织好，发展壮大起来。中华革命军讨袁，你们东北军应做讨袁先锋。东北军现在实力较为雄厚，基础不错，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壮大，虽有困难，也可取胜。你到山东后，一定要设法会见刘廷汉，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如果他能率团起义，那对敌人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居正提出：“东北军在武器补充方面，还有困难。”孙中山说：“我与萱野长知研究过，他同意担任东北军顾问。他答应在日本给你们买几门大炮和一些炮弹。萱野长知还有一个好办法解决武器问题：在山东有一批会制造武器的日本人，那是 1897 年日本为了和德国争夺胶东半岛的控制权，有计划地组织了许多日本浪人改换姓名，留起辫子，化装成中国老百姓，潜伏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以便待机乘隙而出。这些浪人都是军工人员，萱野长知准备去动员这帮人为革命军制造武器。”孙中山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几十名留学生随居正回国，参加组建中华革命军。又命许崇清为东北军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居正、许崇清等人回国后，在胶东半岛建立了革命军东北军 2 师 1 旅的正规军，是革命军中力量较强的一支武装队伍，占据墨县、寿光、高密、潍县、青岛等地，司令部设在潍县。孙中山命令东北军攻占济南。

孙中山把一批革命党人派回国之后，他和廖仲恺等人在东京为革命军筹集资金，购买军械、药品，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们多次购置大批枪械子弹等物资，运回国内。

黄兴在美国也积极发动讨袁斗争，他派儿子黄一欧到东京与孙中山联络。

孙中山见到黄一欧，喜出望外。黄一欧向孙中山交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和一些礼物。

孙中山双手捧着信，慢慢地念着，那苍劲有力的字，流露出真挚炽烈

的感情，孙中山顿时觉得全身热血沸腾，热泪涌出眼眶。

黄兴的信，向孙中山报告了他在美国的生活，表示了他反对丧权辱国之祸首袁世凯的决心：“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他告诉孙中山，他与云南蔡锷有密电往来，并已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协助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另外，他在美国正继续为讨袁之“三次革命”募集经费。

1915年9月，陈炯明由消极反袁转到积极倒袁，派马育航等人到香港与邹鲁密商，在香港成立了工作机构，随后又亲自前往香港，召开会议。陈决定返回广东，发动讨袁战争，根据与会者各自的籍贯和地位，作了分工：陈炯明负责东江地区，苏慎初负责高、廉、雷、钦地区，姚雨平负责广惠地区，邹鲁负责潮梅地区。

部署既定，陈炯明于1915年冬潜回惠阳、博罗一带招集旧部，组织讨逆共和军，计划10路同时起兵。

1916年1月6日，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并以“广东都督兼讨逆共和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宣称要“征讨逆贼，传檄中原，饮马沅湘，会师吴楚，直捣燕蓟，擒治元凶，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朱执信、陆领等领导南海、顺德的绿林揭竿而起，向佛山进军，迎头痛击前来的龙军。

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马队起义；湖南革命党人杨玉鹏等率讨袁军在长沙袭击将军署；陈其美等人率革命军进攻制造局。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秘密离开东京，“直挂云帆济苍海”，返回上海，指导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

孙中山约黄兴在沪相见。黄兴于4月22日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达东京，7月8日由日本启程回国。他和孙中山在上海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

## 第十四章 蔡锷反袁

在反对复辟帝制的大联合阵线内，有两个小联合：一个是以进步党、西南实力派为主的联合，称护国军；一个是以中华革命党和原国民党为主的联合，称中华革命军、讨逆共和军。两者在反袁大目标上是一致的。

南方各省都督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两种结局，一是被袁世凯取消都督职，通电缉拿，如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二是继续留都督职，袁世凯待他的势力能够控制这些地区后，便把他们撤职调离、监视或逮捕。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称为安徽都督胡万泰、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闿、云南都督蔡锷、浙江都督朱瑞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些都督自动取消独立后，袁世凯开始表示宽大为怀，只要他们能够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是可以不加任何处分的。但当北洋军或其附属军的力量达到这些省区的时候，袁世凯就违反了诺言，把这些风吹两边倒的角色逐出了政治舞台。

程德全始终不敢回南京。胡万泰被调任一个不重要的位子，不久就被



打入冷宫。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第4师第7旅旅长李厚基的部队，由海道开到福州，以编遣为名解散了湘军，随即在旧藩台衙放了一把火，把孙道仁吓跑了。

袁世凯派海军次长汤芑铭率领楚有等舰开到岳州，袁的虎将曹锟的第3师也奉命开到岳州，湖南已成瓮中之鳖。袁又用“借刀杀人”和“调虎离山”老计策，请黎元洪兼领湖南都督。黎“敬谢不敏”，袁又送他一个顺水人情，请他“荐贤自代”。黎元洪知道汤芑铭是袁身边的一个红人。这个加入同盟会最早，而后来又出卖过同盟会，与国民党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的“中将汤”，就是湖北名流汤化龙的亲兄弟。黎元洪要迎合袁的意旨，就推荐汤芑铭任湖南都督。

袁世凯发布了汤芑铭为湖南都督、王瑚为湖南民政长的命令，并令谭延闓“入京待罪”，又将湘军师长赵恒惕押解到北京问罪。

谭到北京后，陆军部判处他四年有期徒刑。黎与谭有相当的历史渊源，又揣想袁对谭没有很深的恶感，因此便为谭说项，袁世凯便下令特赦。赵恒惕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由于蔡锷等具保，不久也得到特赦。

袁世凯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个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同时打电报要浙江都督朱瑞到北京接洽要公。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喚。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被承启官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衣镜照了一下，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像是量着他的身材裁剪一样。

朱瑞在承启官的引导下来到居仁堂，见到春风满面的袁世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袁世凯像熟人一样，请他坐下，海阔天空地同他谈话。

袁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意思？”朱瑞曾担任过新军标统和江浙联军司令，他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朱瑞隔了几天仍穿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辞行。总统府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他走进居仁堂，见袁世凯身穿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未等朱瑞开口，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口气非常严厉，吓得朱瑞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淌着大汗。

这就是袁世凯惯用的“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他发明的。

他只是把从古以来的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来表演一番。

蔡锷在离开云南之前，将印信交给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同他出境。过去袁世凯对云南鞭长莫及，此时他已统一了全国，就不怕云南一隅之地抗命造反了。

蔡锷来到北京，袁世凯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但那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蔡锷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袁发现这个瘦小个子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便不放他回去，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于死地。

袁世凯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被袁骗到北京加以监视起来后，经常同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来往。

杨度早已看出袁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于是，与夏寿田里应外合地推荐蔡锷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袁认为如果蔡拥兵在外，对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不可怕了。

但袁世凯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人，而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又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度向袁世凯劝道：“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启超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锷必然乐为总统所用。”袁世凯向来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杨度这番话正与他的见解相符合。袁向夏寿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蔡锷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同乡，又是同学，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度推荐的。袁世凯用人从来就是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是总统府内史中的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袁用人惯于采取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监视蔡的一种做法。

袁世凯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蔡任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蔡锷同意了这个计划。

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些都是袁世凯“结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凯身边有一个策士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向袁进言说：“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这个意见又恰恰打中了袁世凯多疑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袁世凯便用王士珍代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是个刚愎自用之人，他没有掌握中枢大权之前，对袁百依百顺。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的恭顺态度日益减退，不甘心自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袁疑心他日益揽权是想在北洋派内组成一个小集团，进而篡夺他的兵权和政权。袁段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以致启用北洋“三杰”中不问国事回原籍的王士珍为陆军总长，解除段的陆军总长职务。

袁世凯一生从不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作伪可以欺骗朋友，欺骗部下，乃至欺骗全国人民。可是受到欺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触到的都是些寡廉鲜耻、阿谀争宠的私党，看不

见一个真人，听不到一句真话。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用奉承话对付他。

袁世凯称帝后，即使是妥协派梁启超之流，也鼓起勇气来发动讨袁事业。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杨度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同梁接洽。他们会见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给他们看。梁启超道：“我在动笔写文之前，写出了题目后，好几天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我不能不顾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进步党人会受到袁的迫害，像以前国民党人被袁乱砍乱杀一样。正在狐疑不决的时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来，赠给我 20 万元，以 10 万元补祝我父亲的七旬大寿，以 10 万元作为我出国的旅费，因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就非写不可了。”汤、蹇看了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认为这对袁是一颗政治炸弹，同时对进步党也是一道催命符。

梁启超把文章的语气修改得和缓一些，并托汤蹇带去一封给杨度的绝交信：“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这一天，蔡锷也从北京来到天津拜访老师梁启超，他们在密谈中决定了发动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

蔡在去天津之前，杨度劝他加入筹安会作为发起人之一，蔡借词推脱。蔡到天津时，杨请他以师生关系劝梁不要发表反帝制的议论。蔡回北京后，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的话来回答。

蔡锷为了避免袁党的猜疑，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他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挑选云吉班妓女小凤仙作为他的冶游对象，因此，袁党渐渐地不把他当作一个有志气的人物。到了这时，蔡锷才开始布置军事反袁。

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来京。戴与贵州人王伯群到北京后，即成为蔡与云贵将领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带密函先到昆明。蔡和戴戡、陈敬铭两人着大礼服共摄一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纪念。

蔡锷又与黄兴取得联络，亡命东京的蔡的士官同学张孝准成了中间联络人。张孝准派了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将密电码一本交蔡收执。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密函到北京，商量讨袁计划。

蔡锷的住宅常有南方人往来，引起了侦探们的注意。一天，蔡刚起床，便听见门外大吵大闹，他的看门人说，这是蔡将军的住宅，不许你们检查；一个人粗暴地回答说，不管什么将军，我们一定要执行检查。随后一个北洋军的刘排长带领七八个如狼似虎的士兵冲进蔡的住宅，在各个房间里翻箱倒篋地搜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搜查到。直到他们呼啸而去，蔡才打电话找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讲话，雷未起床。等到下午，雷才回电话说：“这是一场误会，真是岂有此理！”后来雷向蔡说，他把刘排长枪毙了。但雷所说枪毙的刘排长，其实是一个名叫吴宝的犯人。那位刘排长安然无恙。

袁从蔡那里搜不到任何证据，因而放松了对他的侦察。蔡从此经常请病假，不久借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车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作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订好的房间下榻。

黄兴派张孝准来天津掩护蔡锷脱险。张、蔡两人乘轮船赴日本神户。

蔡锷派戴戡由天津启程到香港，为他作开路先锋。

蔡锷变得像个戏剧性人物，他到了神户，用恭顺的言词写信向袁请病假，并说明东渡就医情况。他又写好了一张张明信片，请张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地就给袁发出一张明信片，借以哄骗袁相信他仍在日本各地游览。蔡则经过上海、香港、河内回到云南去了。

蔡擅自到日本就医，不能不使袁动疑。袁这个老奸从来就是会做戏的，他一面派人代理蔡的职务，一面在给蔡的信上批准给假，盼望他早日痊愈回京供职。

云南 2 师 1 旅和警备队 40 营的中级军官邓泰中、杨蓁、董鸿猷、黄永祉等，劝云南将军唐继尧发动讨袁，唐假口各方情况不明，极力劝他们不要操之过急。

黄兴派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龚振鹏等早些时日到达昆明。蔡锷偕同戴戡、殷承、刘云峰等来到昆明，王伯君早 3 天到达。

早在蔡到达香港时，袁世凯已接到密报。袁立即用参谋部名义致电唐继尧，如果蔡到云南，请即予扣留。两天后，袁直接电唐，如果蔡锷、戴戡来滇，可以便宜行事，就地正法。唐回电说，蔡在云南的旧部虽很多，但已妥为移置，中下级军官都是服从本人的，不致被人煽惑。蔡化装由滇越路经过阿迷州投宿旅店时，知事张一鹄想下毒手暗杀他，幸而得到铁路警察救护，没有遭到毒手。

蔡到昆明，使云南人心更加振奋，但唐继尧对云南军与北洋军的力量对比存有很大顾虑。蔡向他谈了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都反对袁世凯，大大消除了唐的顾虑。

唐继尧于 1915 年 12 月 22 日召集军事会议。蔡锷在会议上发表沉痛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他说：“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我们所争者，不是个人的权利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参加会议者一致慷慨激昂地表示，愿意断头而死，不可屈膝而生。唐继尧建议“先礼后兵”，首先劝告袁取消帝制，如拒不接受，然后通电讨袁，众人不便反对。会议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后方；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进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进攻广西。云南军改称为护国军。

次日，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通电劝袁取消帝制。25 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联名通电宣告独立。

袁世凯顿足大怒，先是电责蔡锷“潜行至滇，胁诱唐任”，后又下令褫夺唐继尧等人的官职，并派云南军第 1 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 2 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要他们押解蔡、唐等人到北京治罪。这些命令由英国公使朱尔典令云南领事转交给刘祖武和张子贞，刘祖武据实上报未受处分，张子贞隐匿未报被撤职。袁的离间计没有得逞。

讨袁战争开始时，与蔡锷正面作战的，是与他有结盟关系的陈焜。蔡陈在北京时经常相互来往。陈邕由北京往四川时，蔡介绍三个湖南人雷飙、马贻生、王某做他的属员，陈就任命雷飙到川军第 2 师担任旅长，马贻生为军需科长，王某为军务科长。

袁世凯派陈邕督理四川军务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同陈邕入川。陈在启程赴任前，曾到总统府请袁面授机宜。袁说：“我想，四川自古以来称为天府之国，明朝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去很好地把它修葺一下，也许我将来叫克定到四川来，你去和克定一谈，你

们当自己弟兄看待。也许我将来叫你负更大的责任。”不料袁克定这位皇太子的眼睛生在额角上，陈邕去看他，十分扫兴地想要退出来，忽然看到袁的一个老家人飞步跑进来，向袁克定说：“总统传下话来，叫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袁克定便立即改口称陈邕为二哥，并且换了一副极其亲热的样子，请他坐下密谈。

陈问到袁克定的兄弟们，他皱着眉头说：“别提他们了，都不是好东西！”陈邕启程的那天，北京文武长官纷纷到车站送行，汽车排成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密布，铁路两旁和月台上人山人海。陈邕乘坐的火车到了武汉大智门时，湖北文武官员排队到站欢迎。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的段芝贵和帮办湖北军务的王占元，特备大红请帖把陈和他的随员都接过江去飨以极其丰盛的筵宴。陈换船过沙市、宜昌时，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陈到成都后，每天忙于督修皇城，仿照北京宫殿式，朱甍画栋，壮丽夺目。有人问他为何重视这个不急之务，他说：“我是替袁总统的老大当差的，老头子有立爱不立长的意思，我想老五袁克权最有希望。”那人又问：“太子到四川，将军将往何处去？”他答道：“我以前由四川到云南，我想我会走上这条老路线。我的任务是做他们的开路先锋。”陈邕是袁的重要爪牙之一，但他与袁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当他出京时，袁曾面许将川、滇、黔三省军事交他全权办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张联芬做他的参谋长，陈知道这个新参谋长是派来监视他的。云南起事后，袁世凯派曹錕督师入川，事先并未征求陈的意见，陈知道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必然落入他人之手。这些不满和不安情绪，使陈对战事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蔡锷曾电劝他响应独立，他用“事权不一，环境困难”为由拒不接受，但他在电文中从来不骂蔡，对蔡始终保持有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模式态度。

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下设 3 个梯团，梯团司令由刘云峰、赵复祥、赵锺岳分别担任。

蔡的作战计划是：他自己率领第一梯团由昭通直趋叙州，这是进攻四川的主力；第二梯团向贵州毕节出发，到毕节后，或者北向进攻泸州，或者东下贵阳而将矛头指向湘西；第三梯团作为入川的后续部队，预计一个半月以后，再集中开到四川。

陈邕把川北的伍祥祯旅调到叙州布防，守泸州的是川军第 2 师熊祥生旅，第 2 师师长刘存厚和第 2 师的另 1 个旅长雷飙则驻泸州前方的纳溪县。冯玉祥旅驻内江作为叙、泸之间的策应队。伍祥祯、雷飙都是蔡锷的旧将，与蔡的关系很深。熊祥生专为个人的权利地位打算。冯玉祥既不愿效忠袁，又不肯为陈邕卖力，他想等待机会把队伍拖到陕西去，他的舅父陆建章为陕西将军。蔡的前敌司令韩凤楼又是陈邕的得意门生。

护国军进入叙州城外时，伍旅仅仅表面上作了些不重要的抵抗就撤走了，护国军便占领了叙州。

蔡锷派戴戡率部经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王伯群则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络当地黔军。这两人都是有声望的贵州人，又是跟随蔡奔走反袁的活动家。蔡锷、唐继尧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采取一致行动。刘是个保守持重的地方军阀，他既不满意袁的不平待遇，又惧于北洋军力量的强大，很想保持中立。

但是，贵州军团长王文华、熊其勋等劝刘下决心讨袁。王文华就是王伯群的兄弟。

由于贵州的兵额很少，团长一级的倾向具有很大影响，而且贵州人民反袁情绪高涨。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是袁派来监视刘显世的。他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反袁情绪，电请袁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回电驳斥，并令他离职进京。袁为了讨好刘显世，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化装逃走。

刘显世等袁汇军饷 30 万元后宣布贵州独立，这时戴戡已率云南军一营抵贵阳。

袁世凯下令查办刘显世，派贵州军团长唐尔锷继任贵州护军使，这个分化政策未有效果。

## 第十五章 四面楚歌

贵州独立后，戴戡率领贵州军 8 个营的兵力由遵义向四川方向出发。贵军进入四川后，蔡锷将护国军第一军分为左右两翼，自己兼任总司令，不久改派参谋长罗佩金继任，派戴戡为右翼总司令。戴又派王文华为右翼军东路司令，率领临时编成的十三营向湘西出发，这是护国军开辟的湖南方面的战线。

护国军第 1 军第 2 梯团由毕节通过永宁进攻泸州。在进攻之前，约驻纳溪的旅长雷飙起义响应，并且使用反间计授意四川反袁派人士李宪文向师长刘存厚投递一封匿名信说：“我是四川人，我是成都将军署的一个职员。我从北京方面得来一个秘密消息，袁世凯疑心你暗通蔡锷，将指使你的部下对你进行暗杀。”刘存厚接到信后，即于第 3 天通电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由于熊祥生愿为袁效力，刘存厚便率领自己的 1 旅（雷飙旅）去打自己的另外 1 旅（熊祥生旅）。熊祥生撤走，护国军占领泸州，贵州军熊其勋部攻占了綦江，重庆大受威胁。

袁世凯派 3 路人马合攻护国军，第一路由第 6 师师长马继增统率，计有第 6 师、第 8 师 1 旅和河南唐天喜的第 7 混成旅，共 2 万人。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第二路由张敬尧担任司令，计有第 3 师、第 7 师和第 8 师 1 旅，加上冯玉祥的第 16 混成旅，计约 2 万人，攻打川南的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的总司令是虎威将军曹锟。第三路由广东将军龙济光派兵假道广西进攻云南。

最使袁感到困扰的是，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将替他主持征伐护国军。他不得不把打入冷宫的段祺瑞请出来为他分劳，他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实在太忙。为了讨好段祺瑞，他又把段的亲信、自己最讨厌的徐树铮提拔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但段还是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

袁世凯又想到了冯国璋，想把冯调到北京来，任以总参谋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冯也装病不出。袁派蒋雁行以探病为名到南京，冯实没病，他抓住蒋的手痛哭流涕地道：“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了！”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所患的是政治病，便又走马灯似的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到南京疏通，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引江

宁镇守使王廷楨就近篡冯位，王廷楨却不上当，原原本本告诉冯国璋，冯亦恨袁。袁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的督理江苏军务一职，以泄心头之恨。尚未发出，消息已传遍，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联名发电，请留冯坐镇东南，切勿轻予调动，袁只得作罢。

袁世凯还想起张勋，打算组织辫子军十营作为第二批征滇军，便叫阮忠枢到徐州探张口气，然见面阮尚未开口，张勋便道，全国局势紧张，他的兵力不够，请转达总统，准其招兵十营。阮无法，返京归报老袁，老袁又沉不住气，即令马龙标以帮办军务名义去徐州，分张之兵权，张勋亦毫不客气拒绝此令。袁世凯才知道北洋军已非昔日之北洋军，心里惶急得不行。

北洋军到了这个地步，实是袁世凯所至。一天，张勋和冯国璋在南京碰头，张勋多喝了几杯老酒，忽然情不自禁地向冯说：“老头子打了一个密电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冯听了并不惊异，也从身上拿出一个电报给张看，并说：“我也接到老头子的电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袁世凯疑人之深，在派员监视之外，又采取了一种互相监视的办法，真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

1916年2月下旬，北洋军陆续开到四川和湖南前线。开到四川的北洋军主力集中在泸州一线，计有第3师吴佩孚旅、第7师张敬尧部，此外还有四川军周骏之一部、熊祥生旅；蔡锷所属护国军3个梯团约3000多人，刘存厚部队号称4000人，临阵却不见一人。由于众寡悬殊，蔡锷主张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由綦江直冲重庆，以断北洋军的后路，而在泸州、纳溪一线采取守势。但部下都不以孤军深入为然。

蔡锷请唐继尧每月补充兵力500到1000人，声称如果这样，逆援虽众，不足平也。但唐始终没有满意的回答，军饷也同样得不到接济，护国军衣不蔽体，食无宿粮，只得向地方人民有息借款。由于战线长达200里，后面没有预备队，兵力实在不够分配，只得退出泸州，在纳溪与北洋军隔江相峙。

2月下旬到3月初，护国军与北洋军进行20天的激烈战斗，张敬尧的9000兵只剩下5000兵，吓得北洋军躲在战壕里不敢出击。但由于护国军兵力太少和饷械两绌，也只能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然后分头击破之。由于北洋军的援军第8师王汝贤旅开到，刘存厚的部队首先溃败下来，影响到全军士气，蔡锷还咬紧牙关主张坚守阵地，但罗佩金、刘存厚等都认为弹竭兵疲，主张退守，终于不得不退出纳溪。

冯玉祥见熊祥生夺回泸州，他便乘势由内江开到前线，攻入纳溪。袁世凯破格封熊祥生为二等男爵，冯玉祥为三等男爵；又加张敬尧为陆军上将，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为陆军中将。

护国军右翼退出綦江，广西方面龙觐光军攻占剥隘，湖南方面北洋军周文炳师攻占麻阳。特别使袁世凯喜出望外的是，还有一支攻入云南境内的奇兵，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队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鲊，由江驿过江进抵芝麻口。袁授给他勋五位，发表命令盛赞他“出奇制胜，深入滇境，占领要隘，骁勇绝伦”。

袁世凯为了鼓励前方士气，采办大批咸牛肉、咸猪肉、罐头食物、绍酒、彩缎、贡绸、金银用具、時計、衣帽、刀剑、古玩字画、碑帖、相片、磁器送往前线，分别慰劳将士，对立功将领给以一至五等荣光宝星章，得到勋章的人，每年可领取年俸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250元不等。

北洋军在四川和湖南打了几次胜仗，而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越来越大，

湘西护国军在人民的支持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各条战线上的北洋军越发处于四面皆敌的孤立地位，除了保守几个据点外，在战区附近的广大地区内，到处受到人民武装的袭击，或者遇到人民的消极抵抗，使他们在物资供应和军事运输上，感受严重困难。于是他们就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报复人民，到处滥捕滥杀、强派捐税、勒索物资、拉走壮丁、奸淫抢劫、杀人放火，犯下无数滔天罪行。

张敬尧是北洋军内替袁最卖力者，他的第 7 师蹂躏人民最为凶恶。蔡锷写信谴责他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苟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护国军退出纳溪后，经过十几天整顿，又于 3 月 17 日开始反攻。仅有几天内，势如破竹地占领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泸州。这时广西陆荣廷又宣布独立反袁。

陆荣廷对袁世凯早已不满。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原来都是一省提督，而袁世凯却任命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命陆为宁武将军，已引起陆的厚彼薄此之感。后袁虽晋授陆为耀武上将军，但又封龙为一等公爵，进而晋封郡王，陆则仅得侯爵，陆大为不满，他不许属员向他道贺。袁世凯派出高等特务王祖同任广西巡按使，并加上一个“会办广西军务”的头衔，王祖同到广西就任时，陆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待，便向袁请假以示反抗。袁对各省军阀采取了以子为质的办法，使他们不敢跳出他的手掌心。这些作为人质的小将军们，大多被袁任为公府武官，表面说让他们有学习军事和学习公府仪节的机会，以便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但当陆荣廷托病请假，并以侍疾为由打电报召回在京为质的儿子陆裕勋时，袁世凯则派人将途经武汉的陆裕勋毒死。陆对袁的仇恨更大，但他并不形诸词色，而袁也装出十分悼惜的样子，派员照料丧事，双方都唱起骗人的假戏。

国民党军人派的偶像首领、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极力劝陆荣廷参加讨袁，陆又是岑提拔起来的。陆素来仰慕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而梁也一再函劝陆树起讨袁的旗帜来，陆荣廷便决定倒袁。

1916 年 1 月，陆荣廷派唐伯珊、陈协五两人到上海邀请梁启超到广西协商讨袁计划。

梁启超在送走蔡锷之后也偷偷离开天津来到上海。他接见了陆派来的密使，接受陆的邀请，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黄滨丸”到香港。然后换乘“妙义山丸”到越南的海防，沿途自有人妥为照料。他白天躲在舱位下层锅炉旁，等到夜深人静才敢偷上甲板透一口气。

3 月 15 日，日本三井洋行的运煤船“妙义山丸”抵达海防附近产煤地洪屋时，又有日本友人横山携带两个日本妇女预先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偷偷上了小艇。为了避免关吏的检查，这支小艇通过曲折迂回的水路，于 16 日夜间 8 时到达海防。梁由此偷过镇南关进入广西。梁启超经过曲折离奇的冒险旅行，躲过了袁世凯密探的眼睛，来到广西。

袁世凯派遣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陆荣廷利用广西人民团体抗议北洋军假道广西。袁便劝陆派兵打云南，陆又以广西军饷械两绌为由加以谢绝。后来袁世凯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命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领军队假道广西进攻云南。龙觐光与陆荣廷是儿女亲家，龙的儿子龙运乾是陆的女婿，由至亲来假道，不会引起陆的猜疑。

陆荣廷果然不拒绝龙觐光父子假道广西，他电请龙觐光多带军械、少



带士兵，行军沿途可招募新兵。刚好龙济光忙于对付广东境内陈炯明、朱执信的中华革命军，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仅仅抽调 4000 兵，打算在沿途招募 4000 新兵。

龙觐光至陆荣廷的老家武鸣访陆，陆正在老家装病请假。两个亲家见面，一个热情到极点，一个却冷淡到极点，陆表示什么事都懒得过问，甚至官也懒得再做下去。两人当然谈不出个所以然来。

袁世凯电请陆荣廷派兵协助龙军进攻云南，陆出人意外地毫不推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队前往协助龙军。陆对袁的态度也变得日益恭顺，经常对他的将领称赞袁的许多好处，这些消息传到北京袁的耳朵里。袁虽是老奸巨滑，但认为陆荣廷态度的改变，多少受了龙觐光到广西以后的影响，北洋军在四川又打了胜仗，陆见风使舵也是人情之常。

因此，袁又请陆进兵贵州，开辟对云贵两省的另外一道战线。

陆荣廷也不推辞，他要求拨发步枪 5000 支和军饷 100 万元，以便动员出发。袁思虑再三终于分批照发。

袁任陆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第 1 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袁又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的行动，如果发现有可疑之点，可在陆离开南宁后取而代之。陆又向袁索饷 100 万元。

陆荣廷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就与梁启超及广西军将领联名通电劝袁辞职，限于 24 小时以内答复。

3 月 15 日，陆荣廷在柳州行营通电宣布广西独立，自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长。

在此之前，龙觐光已把司令部移驻百色，龙军已占领剥隘，龙觐光的另一个儿子龙体乾也在云南境内发动了地方团队的三路暴动，进攻个旧、蒙自、临安。龙军前锋李文富团已进入到土富州附近。龙觐光没有料到，陆荣廷派来协助他的陆裕光却忽然从内部动起手来，把他的全军缴了械，并把他的儿子龙运乾扣留起来。

龙运乾不敢直接和丈人通电，就打电报哀求岳母谭氏放他们父子一条生路。回电说，政见虽不同，亲戚究竟还是亲戚，请龙觐光电劝他的兄弟龙济光响应独立。龙觐光不敢不从。龙体乾所发动的三路暴动，也被驻蒙自的刘祖武师扑灭。

四川督军陈炯派代表胡鄂公到南京与冯国璋联系，胡在冯的女婿陈之骥的陪同下去见冯，表示：“陈炯完全唯上将军之马首是瞻，如果上将军同意四川宣布独立，我在这里发去一个密电，他就宣布独立。”冯国璋开始并不表态，过了一段时间，他情不自禁地说：“老头子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他的手下都是些狐群狗党。老头子不到几个月就要完了，癞虾蟆难过端午节。你的电报拿来，我照发好了。”冯国璋又发密电给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联名发出一个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芑铭回电愿意列名。冯觉得五人联名声势不够大，便用五个人联名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将军列名。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向袁告密，袁看到这个密电，吓得几乎晕倒过去。

袁世凯把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劝道：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袁世凯合眼长叹，罢了，罢了。

袁世凯召开公府紧急会议，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出席；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铃、梁士诒、倪嗣冲等参加。袁世凯向众人说要取消帝制，众

人也表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独那倪嗣冲圆睁双眼：“君主政体中国几千年都是，什么人敢以取消要挟大皇帝，臣嗣冲誓死扫荡而后已！”袁世凯忙劝止说：“丹忱，你看”，把冯国璋等五将军密电拿给他看，倪当即无话。

袁请徐世昌再任国务卿主持对南议和，徐推三阻四不肯。袁又说了一套“老朋友不肯帮忙谁来帮忙”的话，徐勉强应下。

会议决定：(1) 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

(2) 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

(3) 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请他仍任外交总长。

(4) 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5) 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以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为优待条件，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次日，袁世凯申令撤消承认帝制案。隔一天，又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乃以本年为中华民国5年。袁世凯从称帝起至取消帝制，总共只有83天，是个短命的皇帝。

但他又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西南护国军拟推岑春煊为总统，北军全体将领将被撤职的谣言，以诱骗他们继续替他出力卖命。密谕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袁又用黎、徐、段三人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袁又用黎、徐、段三人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6项：(1) 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2) 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3) 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4) 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5) 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军交战。

(6) 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护国军见此口吻真是逼降，便亦提6项议和条件：(1) 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2) 诛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

(3) 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6000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13人的财产赔偿之。

(4) 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5) 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6) 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孙中山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朱执信及其副手邓铿，在澳门设立指挥机关，中华革命军在广州附近十几个县，或沟通军队、或联络土人，此仆彼继，再接再厉。

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第二军开始向广东进发，3月9日抵达广南。陈炯明的共和军已占领数县，他还收编了东江地区的部分民军，有部队1万余人。徐勤的广东护国军以及林虎、魏邦平等人组织的反袁部队、李福林的民军等各种反袁力量遍布广东，龙济光已成瓮中之鳖。

陆荣廷又率桂军向广东杀将而来。龙济光陷于四面楚歌，迫不得已于4月6日，在得到袁世凯“独立拥护中央”的密电后，宣布广东“独立”。

5月18日，护国军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等为抚军。

发表宣言，否认袁世凯总统资格，主张依民元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因“黎公今方陷贼围”，所以组织此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能，指挥全国军政。

浙江军队各部酝酿联合反袁。驻省旅长童保暄劝浙江将军朱瑞宣布独立，朱是个畏袁如虎的懦夫。外间纷纷传说，朱拟诱杀童以除心腹之患。童遂于4月11日先动手进攻将军署，朱瑞这个在浙江搜括多年、宦囊已饱的骑墙将军从后门溜走了。

第二天，童保暄召集省城各界代表推举浙江都督，袁世凯所派的高等政治侦探、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被推选为都督。屈宣布浙江独立。

屈宣布独立，并不讨袁，外间传言“粤浙二光两面光”的讽刺话，意思是说龙济光和屈映光都是假独立。

屈给袁世凯发密电：“突有军民拥至军署，将军失踪。次早，强迫映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固辞不获，始行承诺。”袁世凯将这份电报全文公布出来，对屈大加称赞，使他露出马脚。浙江各界纷纷通电痛数屈称臣劝进和首鼠两端的罪行。不久，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到杭州，屈被迫辞职，吕公望继任浙江都督。

## 第十六章 魂断“皇帝”梦

陕西在此气氛下，民军纷纷起义反袁，陕军旅长陈树藩与各路民军暗中联络，曾引起陕西将军陆建章的猜疑，把他由陕北调往陕南。陈在三原宣布独立。陆建章的长子陕军第1旅旅长陆承武自告奋勇，率部向三原进击，在富平一役被陈部营长胡景翼生擒，陈把他当作人质，要挟陆建章宣布独立，否则请他自动离开陕西。

陆建章曾做过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是个屠杀人民血债累累的大刽子手，他既要保全儿子的性命，又怕人民清算他的血债，因此愿意离开陕西。陈树藩率部队和平开进西安。陕西独立，陈树藩任陕西都督，让陆承武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

陆建章离开西安时，把他在陕西搜刮的民脂民膏，装在几十箱内带走，走出城外，就被陈树藩的部队拦路劫去。后来陈树藩替他追回了一部分，并派兵护送出境。

冯国璋自五将军密电泄露后，又发一电报给袁，表示对袁的政策不满。那些北方军阀中见这面旗帜已经竖起，便有不少人通电劝袁退位，袁的火气闷在肚里，装着不知冯已有异心，却派阮忠枢南下，请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联名发出一个拥护定居总统的通电，以加强北洋军的团结。袁又去电叫冯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冯国璋默筹甚久，自道不若将计就计，即

准备联合未独立各省在南京举行会议，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完成南北统一，召开正式国会，产生正式总统，他冯国璋再以东道主与盟主身份把总统争过来。

冯国璋便打电报给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派遣代表参加。

张勋立志复辟清室，从未更改主张；那倪嗣冲打算对袁效忠到底，三人各怀异志，凑在一起，自然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

全国各方面都提出以袁退位为解决时局办法。到沪国会议员 256 人联名通电，声明背叛国家的人没有与西南议和的资格。唐绍仪通电骂袁丧尽廉耻。张謇写信给徐世昌，叫他劝袁退位以平民忿。伍廷芳劝袁退位以求灵魂的安乐。除了极少数帝制派和主战分子外，甚至北洋军阀也纷纷电请退位。袁只能借口保持国家安全，先筹善后办法，退位与善后则到南京会议上去解决。

参加南京会议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 15 省区和上海、徐州、蚌埠等地区的军阀代表 20 余人。山东代表丁世峰在会议上首先提出袁氏必须退位，冯国璋暗中支持，河南代表陈裔时首先附和，各省代表都没有相反意见，虽未提付表决，但已占有极大优势。

不料倪嗣冲当天晚上忽然带领卫队三营赶到南京，他奉袁世凯密令来监视会议。次日，倪出席会议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峰表示反对，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国璋、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都站在丁的一边。

倪回过头来问丁：“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却私通南方？”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君子爱人以德。”冯夔、何恩溥也都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总统，而是为袁总统着想。”倪嗣冲气得脸上青筋暴起，和他们争吵起来。张勋的代表万绳栻也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因此，以前同意袁退位的代表都不敢发言。冯国璋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大家一致赞成。

关于备战问题，倪和万绳栻询问各省能出多少兵，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发言，同样无法作出决定。

当南京会议发生争吵的时候，四川将军陈 宣布独立。

四川的北洋军将领都不肯替袁卖命，因而士气异常低落。冯玉祥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响应起义，愿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倒袁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他先劝陈 宣布独立。张敬尧有信给蔡，表示他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

蔡同样劝他宣布独立。

袁授意陈 与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陈见冯国璋态度日趋明朗，曾公开打电报要袁退位。蔡锷又一再劝他宣布独立，以取得护国军与民军谅解，形势逼人，陈叫秘书起草独立电报，一连换了三个秘书，起草了三份电报稿，总觉不当己意，不肯发出。不料四川民军已等不及，联络 18 路人马进攻成都，枪声震耳，陈 才取出最后那份电稿，亲笔加了一句，发了出去。电文道：“项城先自绝于川，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始，四川人民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陈 入川之前抱住袁氏之腿，恳请

早登大位，当时就有人道，陈 此举正是与袁有异心，抱腿属非常之举，正要结袁氏欢心，使他不疑，他日陈 必反。固陈邕无耻，亦是袁世凯待人以奸，人以待袁以诈，不得不然耳。

袁世凯接到陈邕电报，竟然气得晕了过去，待醒来时，脸色涨紫，两眼热泪盈眶，万般悲痛，口中低沉无力地频频吐着：“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四字。

袁氏发一道申令痛骂陈邕，怒骂陈 背信弃义，又令陈 入京，以重庆镇守使、川军第1师师长周骏为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曹錕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加将军衔，帮办四川军务。却是想叫四川军人赶走陈，而以在四川的北洋军为监督。后来周骏果然打着崇武将军的旗号进攻成都，护国军救援不急，陈邕弃城而逃。

时隔数日，湖南将军汤芑铭依样宣布独立。湖南民军纷纷而起在各县暴动。陆荣廷电劝汤芑铭独立，汤长兄汤化龙亦从上海派人去长沙劝其起义，反戈一击立功自赎。汤惧湘西有北洋军4师之众，那倪嗣冲的弟弟倪毓芬又率安武军15营到达岳州。汤能指挥的北洋军只有一个混成旅，一旦宣布独立，必成俎肉，遂观望不定。后广西护国军向湘边移动，永市镇守使望云亭不能支，向汤请示，汤即示以“独立求自保”，望云亭遂改所部为湘南护国军，宣布永州独立。

广西护国军继续向衡州移动，湖南民军声势更大。汤芑铭请袁撤退湖南境内北洋军，首先撤退岳州的安武军，才能避免南北两军在湘作战，湖南以中立姿态出现，可作缓冲地带，对北方有利。汤暗示陆荣廷，北洋军一撤，即宣布独立，请勿进兵过速。

袁世凯果然令安武军撤走。此时，汤化龙通过谭延与国民党军人派取得联络；国民党承认乃弟汤芑铭为湖南都督，保证不算旧帐，由国民党军人协助汤芑铭收编民军，改成湘军3师。

汤芑铭见有了保障，遂通电宣布独立，汤不好意思痛骂袁氏，措词温柔，引起护国军不满，疑其为假独立，真拥袁，汤又补发一电，道：“公即取消帝制，不负为国法之罪人，芑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云云。

袁接汤此电，气得语不成声，原就病累不堪，遂卧床不起，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榻前会议，令公布“帝制始末案”，道：“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袁又召蔡廷干道：“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者将要辞职？”蔡见老袁面容黯淡无光，惟眼中一点火星尚未熄灭，便委婉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息，政府财政前景非常不好，困难与日俱增。”一位法国医生和一位中医负责为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已经不能排尿，遂决定从后背导尿，但只导出一滩血水，在场诸人一阵惊惶，老袁亦知病情严重，即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至榻前，对诸人略作点头，却已无力，只道得：“约法”两字。

守在一旁的袁克定忙补了一句：“金匱石室。”法国医生给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慢慢醒过来，微有叹息之声，道：“他害了我。”说完气绝身亡。

有人说，袁最后服了一帖“二陈汤”以致送命，二陈是指陈树藩、陈，汤是指汤芑铭。

袁死后，众人打开“金匱石室”一看，总统继承人写着黎元洪、徐世

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

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便讨论谁继任总统。众人无法开口，都推徐世昌表态，徐世昌道：“据约法，该以副总统继任。”徐世昌这个老官僚的精明之处，不言新旧约法，因为新约法是西南护国军所反对的，旧约法又是北洋派所不满的，但言约法，就能够做到两面讨好。无论根据新约法或者是旧约法，黎元洪都有资格继任总统，利用黎来收拾残局，利用这个政治俘虏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当时最好的打算。徐怕他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于是瞟了段一眼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还是总理决定。”段祺瑞左手端着烟斗，右手往身后一背，心想，如果我当总统，不仅西南护国军不会答应，就是冯国璋也不会同意。冯在反对袁世凯帝制活动中，形成了在袁与护国军之间的第三种势力。如果让徐世昌当总统，他是袁的金兰密友，而且是北洋军阀“团体精神”的主要塑造者，和袁两人共同造就了北洋军阀，而且此人足智多谋，是不好驾驭的。

想来想去，只有让黎元洪出任总统才比较妥当。一来让黎出任总统，名正言顺，能摆平多方关系；二来黎手里没有兵权。就让黎元洪当一个傀儡总统，大权仍操在我责任内阁总理手里，岂不更妙！

段祺瑞沉默良久，便道：“很好！”黎元洪继任总统遂定。

梁启超早已提出以黎代表的主张，而且得到护国军的赞同，那老袁在未死之前，对护国军公开提出由黎继任大总统，对黎是否会公开倒向护国军方面，十分担心，对黎防范甚严。他特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黎的行动，江密令黎私邸之守卫队长：“无论如何不可使黎出东厂胡同一步。”黎元洪不顾一切，竟在宅中放置一口空棺，以示其处境之险恶。黎的左右亲信都认为，黎居虎穴，长此以往，实难保证安全。于是秘书瞿瀛、郭泰祺等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北京社长井上一叶，同日本公使小幡西吉，策划了一个协助黎元洪出京到南方行使大总统职权的计划。办法是：黎宅与刘钟秀宅一墙之隔，将墙凿穿，让黎易服钻洞入刘宅，再由日人一叶驾同仁医院病车，扬言刘有急症，须送医院，遂驰车送黎疾驰东交民巷。即由小幡从东交民巷使馆陪同黎元洪乘专车出京去天津，再由天津上船南下。

黎元洪同意这个计划。不料出走前消息走漏，东厂胡同黎宅附近军警密布，出走计划告吹。

黎出走的消息，是他的家人向袁克定告密的。黎向妾危文绣流露将要出京之意，危文绣诘问何往，元洪未明答，只说：“将来再派人接你。”危文绣早已受袁克定收买，因她与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胡朝栋之妻为“手帕姊妹”，胡又与杨士琦过从甚密，从而接近袁克定，袁克定知胡妻常到黎家，特托付胡妻持价值2万元的珍珠赠黎妾危文绣，使探黎动静。危文绣得知黎元洪欲出京消息后，即告胡朝栋，胡又告杨士琦、袁克定。黎元洪出走不成，并不十分懊恼，反而说：“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洞，岂不失了体统！”袁世凯气绝后，段祺瑞三往黎宅，劝黎根据约法代理总统。黎初闻袁死，将信将疑，先派长女绍芬去袁家探视，绍芬回报后，方信袁死。他对段祺瑞说：“项城聪明一世，不意竟有今日。”遂从私人存款中拿出10万元赠袁家属，为袁治丧。袁曾以10万元购买东厂胡同宅邸赠黎，黎以这种方式归还。

对于接任总统一事，黎最初推辞不就，继而又表示无力维持秩序。段毅然道：“公为副总统，当然继任。公出，北京秩序，祺瑞当一人负责。”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前宣誓就职。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即要求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把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恢复起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也于6月10日通电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民国约法，召集旧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将抵制护国军之军队撤回原地，召集军事善后会议等4项条件，声明北方如同意此条件，即可撤销军务院和取消西南各省独立，云云。

段祺瑞对孙中山及西南护国军的要求偏偏不理。又有国会议员孙洪伊、谷钟秀等，在上海自行召集议员250多人，联电致段祺瑞，要求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接此电报后，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与幕僚们研究对策，几天来都拿不出应付的办法。作为总理，他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的新约法的主要内容则为总统制，与他的愿望相背；旧约法的主要内容则是责任内阁制，对他甚是有利。但恢复旧约法，国会也将随之恢复。老袁非法废止旧约法，非法解散了国会，国会问题同约法问题，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要责任内阁制，就要旧约法和国会，国会之中，国民党人占多数，一旦恢复，他想个人军事独裁便行不通。

在南北双方就新旧约法问题之争陷入僵局时，不料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海军宣告独立，声明如不恢复《临时约法》，不恢复国会，不新组织责任内阁，海军就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此时北洋集团内部中，江苏将军冯国璋、河南将军赵倜等也主张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大压力，感到有点难以支持，不得不于6月29日接受南方条件。

于是，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说：“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3年1月10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至开国5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黎元洪还发布命令，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并下令裁撤参议院、肃政厅、北京军政执法处等机关。

关于约法问题和国会问题，段祺瑞虽然被迫屈服，但是惩办帝制祸首问题，段又与西南各省争执。

西南方面提出惩办的帝制祸首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的“六君子”，和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所谓的“七凶”，合起来称为十三太保。事实上，参加帝制活动的岂止“十三太保”，除了不计其数的政治流氓称臣劝进的而外，还有为袁家皇帝摇旗呐喊的各省北洋军阀在内。

西南方面，认为如果牵涉面过广，可能会影响与北方的和平解决，因而只提出这些人，其余不究，希望北京政府惩办，以便对全国人民有所交待。所谓的十三太保，不但是护国军所指出的“内乱重要罪犯”，应当“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而且也是通国皆知的洪宪王朝的罪魁祸首，应说是绝对没有逃避罪行的余地。

但是，段祺瑞等与不少帝制祸首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就替他们说话。北京政府在研究这批祸首名单时，首先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为雷震春、张镇芳乞情，这两个人就从名单中剔出；随后冯国璋为段芝贵乞情，李经羲又力保严复和刘师培，说他们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上又剔出了这三个人；黎元洪认为李燮和、胡瑛都是老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

善意，通缉祸首的名单中不宜罗列与国民党有关的人物，因此这两个国民党变节分子也可逍遥法外了；袁乃宽因与袁世凯有同族之谊，段也把他的名字剔出了。这样，“六君子”剩下“两君子”，“七凶”剩下“三凶”，合起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了“五太保”。还有人替梁士诒乞情，说他与银行界具有深切关系，留着替他替政府筹款也是好的。但黎元洪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么，我们不下这道命令倒还好些。”因此梁“财神”仍然榜上有名。

由于祸首的人数越研究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得交代不下，才又补进了并非首要分子的顾颉、夏寿田、薛大可三人，于7月14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将这八人“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北京政府在惩办令发表之前，预先示意榜上有名的人赶快离开北京，因此，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从容不迫地由北京搬到天津，又由天津南下到上海、香港一带，有的则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北京法庭自然也就没有捉到一个祸首。

虽如此，西南护国军也就满足了。7月14日，护国军抚军长唐继尧、副军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南方各省诸首领，联名通电，撤销军务院，取消独立。至此，南北实现了统一。

北京政府在下令恢复旧约法的那一天，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发表：

唐绍仪为外交总长	许世英为内务总长
陈锦涛为财政总长	段祺瑞为陆军总长
程璧光为海军总长	张耀曾为司法总长
孙洪伊为教育总长	张国淦为农商总长
江大燮为交通总长	

唐绍仪未到任前，派陈锦涛代外交总长。7月12日调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7月31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

8月1日，国会议员们重集北京，召开了国会。汤化龙、陈国祥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黎元洪向国会宣誓就任总统。

北京政府又发布命令，各省将军、巡按使改名为督军、省长，任命名单如下：

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	
吉林督军 孟恩远	省长 郭宗熙
山东督军 张怀芝	省长 孙发绪
河南督军 赵 倜	省长 田文烈
山西督军 阎锡山	省长 沈铭昌
江苏督军 冯国璋	省长 齐耀琳
安徽督军 张 勋	省长 倪嗣冲
江西督军 李 纯	省长 戚 扬
福建督军 李厚基	省长 胡瑞霖
浙江督军 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	
湖北督军 王占元	省长 范守佑
湖南督军 陈 鬯兼署湖南省长	



陕西督军 陈树藩兼陕西省长  
四川督军 蔡锷兼四川省长  
广东督军 陆荣廷 省长 朱庆澜  
广西督军 陈炳焜 省长 罗佩金  
云南督军 唐继尧 省长 任可澄  
贵州督军 刘显世 省长 戴 戡  
直隶省长 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  
黑龙江省长 毕桂芳兼黑龙江督军  
甘肃省长 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  
新疆省长 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

又任命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汤芑铭为广东查办使，李烈钧授以勋二位和陆军上将衔，着即来京另候任用。

## 第十七章 府、院相争

陈邕被川军师长周骏困在成都时，蔡锷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一面派护国军往成都。陈邕因力不支而逃离成都，后被黎元洪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署湖南省长。川军师长周骏喊着“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用以诱惑护国军方面的将领熊克武、刘存厚等，熊克武等并未受到诱惑。当蔡锷动员打周时，刘自告奋勇愿为前驱，周部团长刘湘等也都弃周而加入护国军。刘存厚师进入成都，周骏逃走。蔡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后又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患有严重的喉结核病，又是个事必躬亲的人。在艰苦作战时期，他不但忙于指挥军事，还要亲理文书，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服药后毫不见效，肿痛更甚，饮食难进，体温高达 39 度。他接到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公报后，通过梁启超请求北京政府负责偿还半年内护国军欠资 200 万元，同时请求卸职养病。

但军中会议力加阻止，四川各方面也纷纷欢迎他赴任。蔡认为这是“恶作剧”，使他“失却自由之身”。他不止一次电请梁启超传达北京政府准其辞职。他又电告唐继尧说：“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愿所劫动，实为公私两济。”他除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外，还讽示唐继尧不要听信那些狗头军师们的鬼话，想把四川纳入云南的势力范围。

北京政府接到蔡的辞职电，认为是一种表面文章，只批准给假一月，叫他就近调养。

蔡锷想改造北洋军，他认为北洋军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北方人朴实忠勇而又具有强健的体格，只是由于袁世凯自私自利，把北洋军造成他的个人军队和政治资本，因此北洋军对国家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起着破坏作用。现在袁死了，应该是化私为公改造北洋军的良好时机。但是，袁氏虽死，袁的化身依然遵循着袁的轨道，把北洋军作为争夺个人权力的工具，蔡的心

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蔡颇受各方面重视。梁启超想留他在四川建立进步党的武装力量；一部分湖南籍的进步党人想请他到湖南“为桑梓服务”。蔡既不愿留四川，也不愿调往湖南，希望有一个较长时间医治疾病。他继续向北京政府请假辞职，北京政府给他两个月假。在重庆主持收编各路民军的戴戡，邀请他到重庆疗养，他没同意。他偕同蒋百里等由成都出发，经过重庆稍作逗留，即换轮船下驶。

蔡到宜昌时接到一个注明“沿途探送”的急电，是梁启超从上海发来的，电文仅有一句话：“此间破获贩毒巨案，涉及某公之贵介弟。”老师无端打来的这个无头无尾的电报，引起蔡的注意。

蔡在宜昌会见了从四川逃出来的陈邕。

陈邕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准备带 1 师北洋军入湘，但这道命令立刻引起湖南军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民刚刚赶走了北洋军阀汤芑铭，断然不能容许第二个北洋军阀接踵而来。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刘曾做过广西藩台，与桂系军阀陆荣廷颇有渊源。刘通过陆荣廷，请桂军协助，共同抗拒北军，陆立刻表示予以支援，滇系军阀唐继尧也给予坚决支持。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北洋军再度入湘。

部分进步党人希望调蔡锷回湖南，国民党人则希望黄兴继任湖南督军，但黄、蔡两人都无此意。黄兴推荐谭延闿自代。谭是个介乎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人物，所以进步党也不反对。陈邕得知湖南的风势不对，表示不就新职。

段祺瑞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北洋军 3 旅接防岳州，并内定吴为湖南督军。消息泄露，湖南军民和西南军阀又一次表示激烈反对。北京政府不得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

陈邕在宜昌把他所率领的一个师的北洋军解散了。他的这一举动受到总统黎元洪的赞同，黎正在提倡裁兵。但陈邕不清楚，黎与段祺瑞交恶，大权已由总统移于总理之手，他没有得到北洋派领袖段祺瑞同意，擅自把北洋军解散，是段痛恨的事。段决定等他到京，组织军事法庭审讯他，从他的头颅为自己立威。

蔡邀请陈邕同轮往汉口。陈自己感觉到与蔡同行，一荣一辱，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便婉言谢绝了。

蔡乘大轮到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迎接，王又乘楚材舰来迎接，各机关、各团体也乘各种船只来迎接，武汉江面上布满了欢迎者的船只。

蔡乘的大轮周围，被难以数计的欢迎船只从四面八方蜂拥包围。王占元热情地请蔡锷在武汉多停留几天，蔡坚辞谢，王只得在楚材舰上大张宴会，款待蔡及其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晚换乘江裕轮下驶。

事后得知，这是北洋派摆下的“鸿门宴”。原来长江上游经常有一些武装军人私带烟土。蔡来自成都，北洋军阀估计在他的随从一定有人私带烟土，因此，王占元奉命假欢迎之名，用许多船只把蔡所乘大轮包围起来，如果在船中发现烟土，就借此毁灭蔡的盛名。蔡在北洋军阀眼中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梁启超给蔡锷发急电，是因为上海海关破获了一件贩毒案，北洋军阀无中生有地把案件牵扯到张耀曾的头上，梁暗示蔡防备北洋军的暗害。

蔡到上海，把自己隐藏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相对歛歛，互道劳苦”。

蔡又一次向北京政府辞职，请求东渡养病。段祺瑞请梁启超转劝他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忘记以前袁世凯电召他到北京养病，从此成为袁的政治俘虏的往事。

他推托说，北京繁嚣，不宜养病，段给假三个月。

陈甬迟蔡一天到汉口，王占元开始对他还有些礼貌，随即派密探监视他的行动。随同陈到汉口的前四川军署参谋长刘一清，因私带手枪被捕。陈吓得躲在汉口租界不敢出来。

蔡在上海看望了黄兴，于9月8日动身到日本，在九州福冈医院治病，11月8日逝世，年仅35岁。他生前吩咐蒋百里录写他的遗电：“国会、大总统钧鉴：锸病恐不起。谨口授随员等以遗电陈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取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人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锸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行薄葬。”北京政府下令褒扬他再造共和的功绩，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照料身后事，并给予治丧费2万元。

黄兴也于10月10日旧疾复发。他奔走国事，操劳过度，饮食无节，曾患胃出血症。

北京政府授黄勋一位，黎元洪聘他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湖南省议会举为湖南督军。富贵功名逼人而来，黄均坚辞不受。31日，黄兴在上海福开森路逝世，年仅42岁。

12月22日，北京政府公布了国会关于国葬黄兴、蔡锷两人的决议案，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黄蔡二公追悼大会”。

中华革命军淞沪司令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成为要人，此是后话。

黎元洪就任总统后，调任农商总长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秘书有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郭泰祺8人；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4人。军事幕僚经常建议总统必须掌握兵权，他们认为：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而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黎元洪也觉袁世凯做总统何等威风，我这个总统虽然不集权，毕竟还是个总统，不能不管军事。

但向有“段虎”之称、骄横跋扈的段祺瑞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他认为在前清时期，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袁世凯当权时，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袁世凯死后，是他把黎“提拔”到总统地位的。段要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掌握全国政权，以陆军总长的地位掌握全国军权。

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总统，不愿做北洋军阀掌上的玩物，被人吆三喝四，只做一个盖印机器，于是，总统府和国务院无端生出许多事情来，这便是府院之争风波。

黎元洪经常与孙中山、黄兴、岑春煊、唐绍仪等文电往来，段对此大为不满：“原来这些反对我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黎元洪指使幕僚，越过陆军部，直接给各省督军打电报，传达总统命令。段祺瑞指责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

段祺瑞的蛮横专制，不仅是黎元洪不能忍受，国会内许多议员也极为不满。国会中有一位反段的议员孙洪伊提出了“以冯制段”的策略来，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牵制段祺瑞。冯国璋原想取袁而代之，但没有做成总统，心想退一步得一副总统走着瞧倒也不错。段祺瑞也有他的小算盘：如果冯国璋到北京来做副总统，离开了他的地盘，反倒便于控制，这样北洋派的领袖就非自己莫属了。

冯国璋在 10 月 30 日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向有“冯狗”之称，善于观测风向，他顶着副总统的头衔，依然呆在南京，静观政潮变幻。

黎元洪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总统职权，但他手无实力，所能依恃的只有与他继任总统地位俱来的国会，而国会并不统一，党派政争极为激烈。原进步党一面高唱“不党主义”，一面组成两个团体，一为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一为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不久又合二为一，统称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国民党方面，有张继以国民党领袖资格出组宪政商榷会。内中又分客庐系、丙辰俱乐部、韬园系三系，后又由三系演变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四派。不久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合并为民友社。研究系完全支持段内阁；商榷会的右翼因为谷钟秀、张耀曾为内阁阁员，也倾向于维持段内阁；民友社和益友社算是“商榷会”的左翼，主张倒段，当时左翼占据国会优势。这样的情况决定了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冲突的根本性质，是政治权势之争，却也反映了国民党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抗争。

段祺瑞的左右对黎也毫不尊重，只知有总理，不知有总统。特别是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依恃段公然蔑视总统。他又专断越权，引起府方人员和许多阁员不满。

府院之争多发生在任免官吏问题上，黎、段在用人路线上有分歧，一般说来，黎倾向用新派人物，对帝制派分子坚决不用。而段祺瑞则乐于用旧派人物，排斥新派人物。

时人评说：“府为新派所依恃，院为旧派之护符。”一日，徐树铮不顾国务院调解龙济光部与李烈钧部武装冲突的决议，擅拟粤、闽、湘、赣四省讨伐李烈钧部的命令，到总统府盖印，遭到黎元洪拒绝。徐胆大妄为，径直以国务院名义电令四省会剿李烈钧部。及至江西督军李纯复电“无兵可调”，只能担任防守赣、粤边境等语，阁员们才知道徐竟私自擅发军事命令。内务总长孙洪伊当面指责徐越权，徐仍强辩。

孙、徐二人经常在国务院会议上短兵相接，几乎无事无时不冲突，致使孙愤而提出辞职。

黎元洪得知孙洪伊被迫辞职，异常气愤，特将孙召进总统府，温语慰留。孙洪伊得到总统支持，气势更盛。徐树铮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本来发生在徐、孙之间的争执，发展到内务部与国务院的冲突，又演变至府院冲突。双方冲突多日无结果，院方索性破釜沉舟，拟就“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由段祺瑞单衔副署，徐树铮送府盖印。黎见命令，不禁震怒，咆哮道：“你们说的话算话，我说的便不是话么！”段祺瑞亲到公府，请黎在免孙的命令上盖印，黎仍拒绝。

段愤然宣称，如再不肯免孙职，即请总统免我职。

孙洪伊是“韬园派”首领。“韬园派”议员数十人在国会提出办徐树铮案，列举徐“蒙蔽总理”、“侮蔑元首”、“伪造文书”、“擅发院令”、“擅专军

令”等七大罪状，还酝酿对内阁总理段祺瑞提出弹劾。

政局出现一片混乱。最后由徐世昌等人出面调解。结果以孙、徐去职结束。

黎元洪和段祺瑞之政争终于在 1917 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程度。

1914 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 1917 年春已进入最后阶段。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强侵略中国，迄未参战的美国力图与日本在侵华中展开竞争，英、法、俄等协约国曾诱使中国参战，因日本反对而作罢。现在美国企图抢先一步拉中国步其后尘，对德绝交，以便使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2 月 4 日，美国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表示愿意借款给中国作参战经费。段祺瑞也力主对德宣战，他想利用对德宣战之机，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段向日本政府表示均以“诚意”相接，日本政府对段深表满意。

黎元洪对美国素有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黎、段是反映美、日帝国主义不同利益的代理人。美国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段祺瑞率领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由绝交而宣战，再行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认为绝交、宣战，尚非其时。于是，段与黎展开了一场舌战。段以不耐烦的口气告诉总统说：“内阁已通过了对德断交一案。”黎声色俱厉地说：“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段冷笑一声：“总统既不要我负责，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样的总理我没法干下去了！”说罢扬长而去，当晚出走天津。

黎元洪只得让步，他请冯国璋出面调解，并表示说：“外交问题，就听段祺瑞的，但以国会的意见为准。”段回到国务院办公后，国会又以多数票通过与德国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黎元洪对外交问题态度消极，抱定主意，依恃国会，冷眼旁观，一旦时机来临，即推翻内阁，段内阁一倒，对德问题即好解决。他设下“隔岸观火”计。

段祺瑞在对德绝交案通过后，积极推行对德宣战政策，但不久便遭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孙中山等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国会议员马君武等 3 人通电各省，反对对德绝交、宣战。社会各流康有为等也通电反对。

协约国开始时承认中国参战的权利，但中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中国提出的要求全成画饼。各国除同意中国停付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外，其他要求均遭否决。

由于上述情况，国会对段内阁逐渐失去信任，对德宣战案难以在国会通过。段祺瑞一意孤行，他把各省督军召到北京来开会，会议议定，同意对德宣战。此次会议被称为“督军团”。段决定用督军团来压迫反对对德宣战者。

1917 年 5 月 1 日，段用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参战案。段又急不可待地要总统黎元洪在参战案上盖印。谁知国务员程璧光向黎直言督军团倪嗣冲、张怀芝、李厚基、孟恩远数人闯进国务会议厅，疾言厉色地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参战案。黎元洪对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十分不满，令段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通过。

段祺瑞便模仿四年前袁世凯竞选总统时以公民团包围国会议院的办

法，暗地里命令部下组织公民团。

5月10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数千名自称“公民团”的光怪陆离的队伍将众议院层层包围，他们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有的议员因不肯接受他们的“传单”，当场被打，田桐、邹鲁等十余人被打伤。议长打电话给总统府和国务院求救，黎元洪听了，气愤地说：“应该由内阁负责。”段祺瑞不得不于晚7时半乘汽车来到议场，“公民”立即闪开通道，并向段摇旗欢呼，掌声雷动。议员们纷纷愤怒质问段祺瑞，并把段留在院，以为自卫之计。于是形成“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则围困总理于休息室之奇观。

最后，因“公民”用瓦块袭击议场，一名日本记者被击伤，从而段祺瑞不得不派马队驱散“公民”。这些“公民”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根据段祺瑞的意见，花钱雇来的流氓、乞丐和无业游民，段祺瑞的亲信陈绍唐、靳云鹏、段芝贵等均到场指挥。

## 第十八章 辫子军闹剧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均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暴徒。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等在阁议席上提议内阁全体辞职，段祺瑞置若罔闻。于是，阁员自行辞职。内阁原来人就不齐，这下就剩下段祺瑞和范源濂两人，而范又一直请假，实际上只有段一人在国务院办公。其实无公可办，北京政府陷于瘫痪，国会拒不议事，惟督军团大为活跃，大有包揽一切之势。

冯国璋致电北京政府，对“公民团”包围国会事件不满，斥其为法律外之行动，这是北洋派内冯氏直系军阀第一次与段氏皖系军阀不合作的表现。冯国璋和西南各省把督军团内的代表撤回。

督军团一看国会拒不通过对德宣战，便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大怒，斥道：“简直是军人乱国。”恰巧国会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职务。于是，黎元洪便通电各省，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以伍廷芳为代总理；任命王士珍暂代陆军总长。

段祺瑞和督军团岂肯罢休？经过一番密议，决定前往天津进行活动。不但要解散国会，还要驱走黎元洪。段发表通电称：总统发布命令，按约法规定，必须有总理副署方可生效。而黎元洪的命令，我段某未签署，因而无效。

段祺瑞的通电发表后，倪嗣冲立即宣布安徽独立。接着，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也纷纷宣告独立。不承认黎元洪免段祺瑞的命令。段祺瑞在天津成立了独立各省总统参谋处，以帝制要犯雷振春为总参谋长。

形势陡变，吓得黎元洪惶惶不可终日。他没有什么新招数，仍是一味地恳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出来组阁，圆滑的徐世昌却坚辞不就。黎元洪又找王士珍，王则以曾劝黎辞职为嫌回绝。黎又请李经羲出来组阁，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

黎元洪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表示愿进京调停。

黎元洪喜出望外，立即复电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勋。

黎元洪没有料到，张勋是以进京调停为名，要清室复辟。他接到复电，哈哈大笑。

心想，黎元洪既然已经撤了段祺瑞，我再利用督军团赶走黎元洪，岂不可以在北京扶幼主登基，恢复大清朝了吗？6月6日，张勋立刻带领5000辫子军，坐火车直奔天津。黎元洪听到这个消息，莫名其妙：我让他来调停，他怎么带着大队人马来了？黎元洪立即派秘书长夏寿康到天津拜会张勋，弄清原委。

夏寿康来到天津和张勋见面后，说：“我奉总统之命，前来接您。但是总统一再嘱咐，请你简从入京。”张勋听罢，一拍桌案：“简从入京？哼！你回去告诉黎大总统，我进京调停的条件是：限3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休怪我不负调停之责。”西南六省纷纷表示反对倪嗣冲等独立各省军阀。孙中山于6月6日与章太炎发表联合通电，指斥倪嗣冲宣布独立为“叛逆”行为，并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岑春煊与李烈钧自沪电粤，请即发兵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通电各省取消独立，又与海军上将萨镇冰联名电告黎元洪：“海军全体拥护中央，惟总统之命是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联络滇、黔、粤、桂四省，共谋防卫，保障东南，拥护中央。李烈钧自上海来到广东，拟联合西南各省，出师北伐，保障共和。李烈钧又与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发表通电，发起西南六省联盟，倡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保卫约法，拥护共和，表示“一息尚存，决难坐视，只有效命，以求最后之解决”。在李烈钧的推动下，粤省已经制定了分三路北伐的计划。云南督军唐继尧也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

但西南六省军阀，只限于口诛笔伐，并不打算真的出兵北伐，只有李烈钧和少数军官是真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誓师北伐，保卫共和制度。他们人少力单，左右不了西南大局。

黎元洪决定解散国会，拟好命令，邀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入公府副署。伍坚决不肯，道：“余法学士也，余未见宪法许总统解散国会。余决不与闻此举，宁死不从！”黎派人去天津请李经羲副署，李答道：“我既未就职，更说不到副署。”再谦请段祺瑞副署，段拒不接见。

张勋的辫子军的先头部队已开进了北京的天坛和先农坛。张勋所限3日已快到。王士珍见解散国会命令无人副署，张勋一旦翻脸，岂不大祸临头！于是收拾行装拟逃出北京。

黎元洪闻讯，立即派江朝宗等奔赴王宅劝阻，王才未能脱身。

黎见距张勋所给时限还剩下几个小时，立即连夜召集会议。公府中空气凝固得似乎就要爆炸，忽有一人提议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江根本不是国务员，无人异议，江竟义形于色地慨然允诺，道：“我牺牲一身，替大总统担些干系吧！”于是，黎元洪绝处逢生，一连发了准免伍廷芳代国务总理职、任命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解散国会三道命令。

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他们联名通电话说：“解散国会之命令，既总统、总理自认违法，当然无效。”6月14日，张勋带着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万绳权从天津乘火车直达北京。

张勋率兵入京后，以北京政府“新主人”的姿态劝各省取消独立。6月

16日，张勋换上清朝全套官服，陛见清室。

清皇帝仍居住在紫禁城内，保留着小朝廷的格局。13岁的逊帝溥仪听说张求见，师傅陈宝琛给他换上朝服，并把他引到养心殿，他在那里召见了张勋。

张勋诚惶诚恐地行跪拜大礼，赞颂溥仪如何圣明。溥仪大大地夸奖了张勋几句，赐给张勋不少珍藏的古玩字画。张勋跪拜出宫。

康有为从上海化装进京。张勋赶紧上前连连施礼：“康老夫子，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康有为是维新之后的保皇党领袖，念念不忘皇恩浩荡。张勋和康有为可谓臭味相投，他们的联系也是由来已久。张勋在徐州时就已经让万绳栻通知在上海的康有为，要他准备溥仪复辟的诏书。

康有为把写好的诏书交给张勋，俩人又密谈了良久。

诸事安排停当，张勋、陈宝琛、刘廷琛、张镇芳、雷震春等人于6月30日晚，鼠窃狗偷般溜进清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深夜，张勋派辫子军占据车站、邮局等要地。

7月1日凌晨4时，张勋指派梁鼎芬为清室代表，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李庆璋为张勋个人代表，同到公府逼迫黎元洪退位，令其在已拟好的“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印。

黎元洪震怒，眼睛直视王士珍骂道：“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厉声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一直交涉了两个小时，黎誓死不从，6时许，梁鼎芬等出公府。15时，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3人再入公府，要求总统退位，还政清室。黎元洪正颜厉色道：“当问国民，余不能私相受授”。

这一天，张勋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员300余人拥入清宫，跪奏自己“代表22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溥仪按照师傅的嘱咐，先推辞一番：“不行不行。我年纪尚轻，无才无德，难当大任。”张勋领着众人一再磕头恳求，溥仪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溥仪被捧上皇位，即发布复辟诏书。

张勋和康有为文武两圣以宣统名义，张勋副署，盖上“御玺”一连发了19道伪谕，宣布废除民国纪年，改用宣统年号，捏造黎元洪“奏还大政”之奏折，并大肆封赏，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黎为一等公等。整个北京一律悬挂龙旗。

黎元洪坚决反对张勋复辟，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又电请冯国璋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

张勋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复辟清室，只有短短的12天，终于成为历史小丑。

段祺瑞在天津接到黎元洪重新任命他为国务院总理的命令后，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他立即策动驻天津马厂的第8师师长李长泰和驻廊坊的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及驻保定的曹锟等部组织讨逆军，自称讨逆总司令。

可巧，前司法部长梁启超也来到天津，运动段祺瑞讨逆，两人一拍即合。段祺瑞与众位将领商定进兵事宜后，又嘱梁启超代拟讨逆檄文。这时，冯国璋发来电报，愿与段祺瑞联合讨逆。于是，两人共同署名，发一通电，



数张勋八大罪状。

段祺瑞设讨逆军总司令部于天津造币厂，任命曹锟为东路讨逆军司令，段芝贵为西路讨逆军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冯国璋又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下令褫夺了张勋两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职务。

讨逆军兵分三路攻京城。张勋决心要背城一战，可是那些复辟派大臣却都担心害怕。

他们知道张勋的辫子兵只有 5000 人，而且战斗力差，不堪一击。张镇芳、雷震春、冯德麟 3 人见此，出京逃生，统统被讨逆军截住拿下，就是康有为、万绳鲂也准备逃走，背张勋而去。

7 月 12 日凌晨，只听见北京城外“轰轰轰”，炮声连天。炮声响，辫子军闻风丧胆。

张勋指挥 3000 辫子兵集结在天坛一带，讨逆军攻进城后，在天坛一带和辫子兵交战。张军寡不敌众，双方刚一交锋，辫子兵立刻就土崩瓦解、举旗投降。张勋一看大事不好，骑上一匹快马，直奔南河沿自己的公馆，带着家眷跑到荷兰使馆，自己躲了起来，托人把家眷送进德国医院。

至此，讨逆战争结束，从 7 月 6 日至 12 日，历时 6 天，辫子军被打死者仅 70 余人，讨逆军战死 20 余人。

溥仪于 7 月 12 日宣布退位，复辟闹剧就此收场。

7 月 14 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北京欢迎总理者，何等火炽！

段一进北京，立即谒见黎元洪，表示慰问，并下令缉拿民国叛逆张勋、康有为、万绳栻等人。

黎元洪立即发表通电宣布自己要去天津养病，从此以后，隐居家园，不再过问政治。

黎元洪去职，冯国璋带领 1 师兵力任代理大总统。冯任命亲信将领李纯调任江苏督军，陈光远调任江西督军，作为树援。段祺瑞提出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请冯任命。傅乃段氏弟子，使他督湘，一是据住长江中枢，抵制李陈；二是控制岭南一带，抵制滇粤。冯为直隶人，称直系军阀，段是安徽人，称皖系军阀。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

段祺瑞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国务院顺利地通过了对德宣战。所谓对德宣战，并不是要真的出兵参战，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用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武装统一。

财政总长梁启超颇为段祺瑞卖力，他见段对旧国会耿耿于怀，深不愿旧国会之恢复，在旧国会已解散、新国会尚未成立之际，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这个建议深合段意。于是，国务院在致各省的敬电中说，国会业经解散，断无重新召集之理，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那无异于国会之存在。

段祺瑞不以民主选举而由地方当局指定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手段，造成一个由他个人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这一做法，受到孙中山和西南各省军阀的反对，形成了护法斗争。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与段祺瑞合作，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他分别致电山东的

居正和广东的朱执信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孙中山确定了“召开国会”、“息纷争，事建设”、“固国体”的方针。

国会在北京恢复后，黎元洪电请孙中山北上，并聘请孙中山为高等顾问，孙辞谢。

孙中山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曰：“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其责任有不容透避者。”当时，中华革命军分布在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有一定的实力。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事反袁的华侨，对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队持有异议。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于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 10 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许崇清、蒋介石等人从上海乘轮船赴山东潍县，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传达孙中山“罢兵”之意，与居正等人面商军队收束各事。孙中山命夏重民率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从山东潍县撤往上海徐园。孙中山亲往徐园慰问华侨敢死先锋队全体同志，发表演说，并设宴为归国从军华侨洗尘，以表中华革命党酬谢诸君之热心。

几百名敢死先锋队员需要一笔遣散费，而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又缺款。孙中山命廖仲恺向各方筹借款项，得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捐助 3 万元，孙中山又卖掉了自己的那部小汽车，才凑足此数，每人发 300 元遣散旅费。廖仲恺将加拿大的华侨讨袁敢死队员马湘荐给孙中山作卫士。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不久，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

在广东，中华革命军有 3 个军，数万人。孙中山多次致电朱执信遣散军队。数月间，广东的中华革命军烟消云散，想留在军中学习军事的华侨同志，也被孙中山劝回南洋各埠。

陈炯明的讨逆共和军也被编遣。但陈炯明提出：“个人放弃兵权，部队不能遣散。”他是个久掌军权的人，深知保重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交出军队时，谋取隐保军队之策，希望时机到来，再把军队拉出来，树旗立寨。

陈炯明派亲信马育航、钟景棠等人去广州，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谈判，以“军中多属粤省退伍军官，略事改编，即成劲旅，较重新征募训练，事半功倍”为理由，要求把讨逆共和军全部改编为正式陆军。朱是北洋派官僚，与桂系军阀素无交往，和南方国民党人却有些交情。而且他初到广东，毫无基础，需要拉拢地方势力，收编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陈炯明的要求正好迎合了他的需要。

朱庆澜将讨逆共和军汰弱留强，编为省警卫军 20 营，归朱庆澜管辖，分兵驻守东江各属。这样，陈炯明部队就借“警卫军”这一合法外衣保存下来，这支部队基本上仍在陈炯明的老部下洪兆麟、罗绍雄、熊略等人的控制下。到后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时，这支部队成为援闽粤军的基本力量。

在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

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活动。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部发出通告，宣布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孙中山认为执法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孙中山为了向国人表示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宣布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这和当时进步党人、国民党稳健派标榜的“不党主义”相仿。

孙中山为了表示与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他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他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

国会议员北上后，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的这一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并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所谓地方自治，只能是地方军阀割据和专政。

孙中山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以及张勋复辟的表演，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翬、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他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欢迎，汪精卫则驻沪招待南下议员。孙中山曾一度考虑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集中之地，外交问题十分棘手；那里的政学会分子又是非不辨，不愿与他合作共事，复辟势力的暗流或隐或现，蠢蠢欲动；护法力量很难发展。因此，他毅然放弃上海而选择广东为护法根据地。孙中山在上海几次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行列。

程璧光原是孙中山的朋友，老兴中会会员，即表示愿同孙中山一起护法。

程璧光在6月5日离开北京前，夜访伍廷芳，探询他对时局的看法。伍回答说：“国事至此，若图挽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三君虽在野，未尝一日忘国事，现皆居沪。君抵沪，必与计议，国事可为也。”程璧光于6月9日抵沪，拜会孙中山。孙中山促其即行出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2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宴请程璧光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27日，孙中山派人送银行支票30万元给程，以作护法军饷之用。7月4日，程璧光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孙中山即在上海召集重要会议，决定率领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孙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国干净土”，认为“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张勋在北京复辟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邀请孙中山组织军政府，而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也通电主张迁都广州，认为“国都既陷，政无所出。

维今大计，速迁政府，设置地点，广州为宜”。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事斗争结束后，已停止在华侨中筹款，孙中山决定

南下护法时，经济上极为困绌，为了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于 1917 年 6 月 19 日以总理名义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就地恢复筹助军饷等工作。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及上海德国犹太人、富商哈同借款 140 万元，解决南下广州护法的燃眉之急。

7 月 6 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 10 日抵汕头，13 日，孙中山派章太炎先到广州接洽。

7 月 17 日，孙中山等到达虎门，旋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

## 第十九章 护法军起兵

孙中山等到达黄埔，陈炳焜、朱庆澜在黄埔公园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揭穿了张勋复辟是北洋军阀所布置的政治圈套，他十分激动地说：“段祺瑞起用段芝贵、倪嗣冲这些复辟派做讨逆军统帅，以逆讨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国，不是复辟与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今天真复辟者少，假共和者多。”他指出，中国共和垂 6 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是因为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希望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他号召各界同心合力，奋起护法。

7 月 19 日，孙中山出席广东省议会欢迎会，与陈炳焜、朱庆澜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粤，以便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孙中山提议以省议会名义，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定大计。如果法定人数不足，可召开紧急非常会议，以决要政。

朱庆澜表示赞成，陈炳焜态度暧昧，他以南方力薄、经济困难为辞加以推托。孙中山逐一解释，并希敦促陆荣廷东下合作。陈炳焜勉强同意。

孙中山即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他又致电程璧光，要他率海军舰队南下。

7 月 21 日，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舰队自吴淞口开往广东，有海圻、海琛、飞鹰、永丰、舞凤、同安、永翔、楚豫，过象山时又增加福安、豫章两舰，共 10 舰。

唐绍仪、汪精卫等与程璧光同行。

8 月 5 日，海军舰队全部抵黄埔，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集会欢迎海军南下，到会者数逾数万，盛况空前。各界代表争先发表演说，淋漓慷慨，闻者咸为动容。

国会议员应孙中山电邀，先后到达广州者 150 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8 月 18 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事宜。与会者认为，北京政府既已毁废约法，向护法各省用兵，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为了对内团结护法各省，对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南方另行组织政府，议员人数不足法定，可采取法国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

次日，国会议员举行谈话会，讨论召开国会及组织政府问题，决定采

用“国会非常会议”名称，定于8月25日召开非常会议，并推举吕志伊、王有兰等7人为军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并通电东南各省，召开非常国会，“以谋统一，以图应变”。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开幕，国会议员150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孙中山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到会祝贺。粤督陈炳焜仅派代表列席。

会议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到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

国会非常会议又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原预定选程璧光为元帅，但程派代表表示不愿居此名义，会议乃从缓议。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率议员数十人，乘舞凤舰到黄埔，举行大元帅授印仪式。吴景濂在致大元帅颂词中道：

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赉致证书，登坛授受。愆忱未尽，复申是言。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继，不胜郑重期望之至。

旋由王正廷代表授印。孙中山致答词道：

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梟雄畔换，频繁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愤倡议之时也。而迁延数月，大兵未举，政府未立，内无以攘寇乱，外不足以示友邦。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

经孙中山提议，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任命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	伍廷芳	次长	王正廷
财政总长	唐绍仪	陆军总长	张开儒
海军总长	程璧光		
内政总长	孙洪伊	次长	居正
交通总长	胡汉民		

军政府若干军政长官名单如下：

军政府秘书长	章太炎
军政府总参谋长	李烈钧
军政府海军总司令	林葆懌
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	李福林
大元帅府参军长	许崇清
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	陈炯明
大元帅高等顾问	吴景濂
川滇劳军使	王
湘湖南劳军使	林伯渠
军政府卫戍总司令	方声涛
大元帅府筹饷总办	李耀汉

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

的力量，护法运动的高潮随即到来。

在四川先后宣布独立护法的有：1917年11月1日，四川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告独立，并致电大元帅孙中山，表示“拥护真正之共和，扫除非法之政府，爱举十邑之地，卅营之众，遥承军府，近联滇黔，为国讨贼，虽死不避。”唐继尧将该部编为靖国军第7军，任张煦为总司令。

11月3日，颜德基以“四川靖国军临时司令”名义，在绥定通电独立。

12月14日，陈凤石在大竹县宣布独立，自任“四川靖国军招讨司令”。

12月18日，川军第1师第2混成旅旅长王椅在合川通电护法，军政府任命他为四川靖国军联军川北总司令。

1918年2月16日，川军第2师所属刘成勋、陈洪范两旅在乐山宣布拥护西南护法军。

2月17日，川军1、3两师全体军官联名致电李烈钧，表示加入西南护法军。次日，川军1、3两师及刘成勋、陈洪范、汪可杰、舒荣衢各旅再次联名宣布与西南靖国、护法各军一致，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在湖北，拥护护法的有：1917年12月1日，鄂军第1师师长石星川在荆门宣告自主，组织湖北靖国军，电请襄阳镇守使黎天才，一致行动。电致孙中山，表示愿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孙中山复电祝贺，并派张伯烈、蒋文汉前往犒师慰问。

同时，原鄂军第3师师长王安澜率旧部于鄂豫边境宣布独立。

12月6日，鄂军第1师1团在黄州宣布自主。

12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率民军攻克广济，次日占领黄梅，自称鄂军总司令。

随后攻占施南、利川、咸丰、来凤等县。

12月16日，黎天才通电宣告自主，就任湖北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决心跟石星川“誓同生死”。孙中山复电祝贺。

陕西的护法运动发展广泛：1917年11月25日，焦子静等在白水通电宣布自主，筹建陕西护法军。

12月4日，陕西龙驹寨驻军王明敏等以护法军名义，占据商县、洛南一带。

12月11日，陕西警备军分统领耿直在西安发动政变，赶走陈树藩。

12月21日，郭坚在凤翔通电宣布独立，就任陕西护法军西路总司令。

1918年1月25日，胡景翼部营长张义安在三原独立。两天后，胡景翼、曹世英赴三原，组织陕西靖国军。胡景翼、曹世英为陕西靖国军左右翼总司令。

2月17日，陕西靖国军占领西安。

安徽的护法运动也有一定规模：1917年11月22日，程萌等宣布成立皖北讨逆军，次日攻占寿县。

1918年3月12日，李雨春在含山县举义，攻占县城，释放政治犯。

浙江的护法运动，又是一番新气象。

1917年11月26日，宁波驻军通电独立，组成宁波独立军，推前督蒋尊簋为浙江军总司令，宣称“誓必荡除叛逆，兴复约法，还我国会，厉行自治。”同日，温州、处州、绍兴、台州、严州等地宣布独立。

湖南的护法运动开展得最早。

1917年8月，段祺瑞命傅良佐任湖南督军，原湖南省督军兼湖南省长

谭延闿回茶陵原籍“省亲”，并通电辞职，并悄悄化装后离开湖南。

谭延闿在辞职前调湘军第1师第2旅旅长林修梅部移防衡山，并派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用意是集中力量，退守湘南，待时反攻。

9月18日，林修梅在衡山、刘建藩在零陵同时宣布独立，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

10月2日，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5师3团团团长宋鹤庚联衔通电宣告自主，声讨湘督傅良佐标榜实行“以湘治湘”的祸湘计划。

11月9日，宁乡数百名护国军占领县署，宣布独立。

此外，山东靖国军、福建靖国军、河南自主军相继起事。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的烽火遍及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中华民国军政府为名。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派胡汉民、汪精卫与广东省长朱庆澜多次密谈，希望朱庆澜把他过去收编的陈炯明部队20营警卫军移交给军政府。朱不仅曾收编了陈炯明20营，而且还收编了李福林的10多个营，以及未去海南岛而留在广州的龙济光部队。朱庆澜与桂系军阀陈炳焜有矛盾，桂系要求把省长节制下的40营警卫军交给督军统率，逼使朱庆澜交出兵权，并打出“省长民选”、“粤人治粤”的法宝，把朱庆澜挤出广东去。

朱庆澜同意将20营警卫军交给孙中山，并提议由陈炯明担任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同意下，接受了朱庆澜的委派，朱庆澜把王德庆、李次皋、熊略等人的警卫军共20营，全部拨给陈炯明。

可是，移交警卫军一事，遭到桂系军阀的粗暴干涉。陈炳焜竟然出动部队，包围了陈炯明的司令部，缴去关印，迫使陈炯明匆匆出走香港。桂系军阀头领陆荣廷亲自出马，导演了省议会的省长选举，陆保荐的李耀汉当选省长。朱庆澜无法与桂系抗衡，只好交出大印，弃职北上。陈炳焜轻而易举地把省长辖下的40营警卫军，全部收为己有。

孙中山多次派人与陈炳焜交涉，要他把陈炯明的20营交出来，陆荣廷也打电报给陈炳焜，要他把20营亲军交出来，陈拖延敷衍，实际上按兵不动。陈炯明回到广州，只好赋闲家中。

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段祺瑞令傅良佐率两营精兵进入湖南，命吴光新出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重兵进驻四川。又命冯玉祥部队开往福建，威胁广东。

段氏武力统一西南各省的声势，越来越咄咄逼人。

桂系不得不缓和南方内部矛盾，以免后院起火。陆荣廷在梧州召集包括有孙中山代表胡汉民参加的各方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把与广东某些方面势成水火的广东督军陈炳焜调离，由陆荣廷自兼广东督军，并由桂系的广东将领莫荣新代理。会议还决定：程璧光以海军总长兼任讨闽军陆海联军总司令。讨闽军以林葆懌为海军总司令，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方声涛为滇军总司令，共同进攻福建。这样，陈炯明才接受了20营亲军。

孙中山计划把各地分散的护法力量纳入军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具体方案是：由唐继尧统一滇、黔、川三省兵力，攻取四川，顺江东下；陆荣廷统一粤、桂及驻粤滇军援湘，协同程潜、刘建藩、林修梅夺取湘南，直趋江汉；黎天才、蔡济民攻占湖北，挥师北指；陈炯明、李烈钧率粤军攻闽袭赣，西上武汉；黄复生、熊克武北击祁山，东进荆襄；然后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统一中国。

1917年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决定：（1）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的计划。

（2）以滇军第3师援湘。

（3）以滇军第4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

（4）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

（5）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

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了两广援湘军事会议，决定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孙中山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陈继祖为参谋长；组成5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为一至五军司令。

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约有40营兵力，1.5万人。孙中山派程潜来衡阳指挥，成立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程潜为总司令。

开进湘南作战的是北洋军第8师和20师。傅良佐任命第8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20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

护法军的进军路线是：第四军（粤军）司令马济出韶关，经湖南耒阳向攸县、醴陵、长沙进攻，是为右翼；第一军（桂军）司令韦荣昌出三江，经新宁逼宝庆；第三军（桂军）司令陆裕光和第二军（桂军）司令林俊廷出全州，以永州、祁阳、衡阳攻长沙，窥岳州，由谭浩明指挥，是为中部；湘军由湘南总司令程潜、第1师师长赵恒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以及林修梅等人指挥，自宝庆北上，是为左翼。三路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

正当南北军在湘南鏖战之际，北洋军开进湘南的主力第8师师长王汝贤和第20师师长范国璋发表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四督”通电响应。赣督陈光远还发表宣言，宣布保境息民，拒绝北洋军假道江西开往湖南，要求停止川、湘两省的战争。

王汝贤、范国璋在发表主和通电的当天，便从衡山撤兵。傅良佐急电朱泽黄部和李传业部回援长沙。但不待两路军队赶到，傅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就在当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湖南人民发出“赶走北兵狼子”的怒吼，北军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长沙一片混乱。

护法军在北军撤出衡山后，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州，直趋长沙。北军节节败退，王、范被迫逃往岳阳。

湘军第1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湘军总司令程潜随之赶到长沙。次日，湖南各界公推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

1917年11月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职，但桂系谭浩明立即反对，程不得不解省长兼职。12月12日，谭到长沙，宣布自己“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护法联军占领长沙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坚持响应“四督”停战主和的号召，反对进攻岳州，力求与北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前线陷于停顿状态，出现了不战不和、不进不退的微妙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主张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

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从主和变为主战，北洋军阀开始向鄂西的荆、襄宣布独立的鄂军石星川师和黎天才师进攻。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

1918年1月上旬，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拟订攻



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3旅进攻托坝、西塘，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箠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恒惕的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为总预备队。定于1月16日分兵进攻岳州。

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1月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后唐，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箠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2师、李奎元的第11师、王汝贤的第8师、范国璋的第20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

24日，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包围乌江桥，26日攻康王桥。北军不支，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1月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1300余人。

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湖北第1师师长石星川、襄阳镇守使黎天才、第3师师长王安澜宣布独立护法后，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军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当时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同黎天才起义军大战，武汉空虚。如果南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和平会议，谭浩明下命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

桂系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听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后来更发展到公开进行破坏。广东代督莫荣新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金国治，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的连排长及卫士多人，任意枪杀。孙中山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莫荣新得到消息，通令各县指这些招兵人员为土匪，一律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69个招兵人员被杀。孙中山在困难的环境下，想另求发展，准备自己带兵打福建，桂系又不肯给以物质支援。广州又有两个招兵人员被捕，孙中山立刻写信要求保释，莫荣新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两个人枪决了。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不顾一切和桂系硬拚一下，把莫荣新赶出广州。

## 第二十章 炮轰观音山

1918年1月3日晚，孙中山率领亲信将领及少数警卫部队，亲登同安、豫章两舰，驶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轰击，同时命令朱执信促李耀汉、李福林等同时发难，许崇清、邓铿、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续发70余发。除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陆上部队全无响应。陈炯明认为此举“冒险”、“轻

率”，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滇军虽经大元帅参议刘德泽运动，但因第 4 师师长方声涛、旅长朱培德、张维新等极力反对，亦不能行动。其他部队则表示中立，徘徊观望。莫荣新先得密报，接受其参谋长郭椿森的献计，采取“不理睬”政策，电令熄灭灯火，不许还击，同时打电话到海珠的海军总长办公室，请程璧光迅速进行调处。

程璧光一向反对广东内部破裂，他不同意炮击观音山。他接到莫的电话后，急忙派海琛舰向豫章舰、同安舰传达“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的紧急命令。这两艘军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的响应，势孤力薄，又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只得开回省城。

炮击观音山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国民党一些元老们，对这一事件主张进行调解。

孙中山向桂系提出 5 个条件：(1) 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

(2) 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

(3) 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

(4) 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

(5) 广东外交人员由政府任命。

莫荣新表示，1 至 3 条须向陆荣廷请示；其余两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同意”。这等于一条也不接受，但是，莫荣新故作姿态，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亲自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问疾，并答应接济元帅府卫兵月饷 2 万元，又循孙中山之意，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

1 月 9 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观音山的事实经过，揭露桂系的真面目，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致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战机。他表示这次炮击观音山，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

时人称孙中山炮击观音山为“炮打莫荣新”，既打击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军政府的威望。

但是，军政府越来越陷入困难境地。陆荣廷和唐继尧采取“虚与委蛇，敷衍中央”手段，不愿就任元帅职务，以便把孙中山架空，让孙中山在广州有府无军，有政无权，当一个光杆大元帅，使军政府形同虚设；继而密谋策划另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分庭抗礼。

1 月 15 日，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推岑春煊为议和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20 日，莫荣新等 13 人联衔通电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

孙中山开始对陆荣廷、唐继尧等成立西南联合会议的目的并不清楚，后来才得知西南联合会议的幕后操纵者是蛰居上海的岑春煊。岑暗与冯国璋勾结，不仅插手南北和谈，而且暗以西南联合会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形。有了这个西南联合会，他就可以排斥孙中山而充当西南各省的盟主。李烈钧也密电唐继尧透露说：“岑意只好由联合会议推为军事总代表，将军政府无形取消。”这个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终于使孙中山逐渐清醒，表示反对。

孙公开宣称联合会议于约法无根据，为“督军团”之第二。章太炎也通电怒斥岑春煊等为“倪嗣冲第二”。忠于孙中山的滇军第 3 师师长张开儒

也指出：“组织名虽为联合会议，其内容实为合议政府。”由于孙、章等人的及时揭露，各省代表、非常国会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加上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职，西南联合会议终于流产了。

西南联合会议刚收场，改组军政府之议又起。在岑春煊的策划下，政学会国会议员杨永泰、郭椿森、汤漪等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联合吴景濂、褚辅成等倡议改组军政府。

程璧光不明真相，表示赞同，并以调解人身份，在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极力疏通。但是，程璧光又被孙中山说服。

陆荣廷看到，孙中山有海军总长的支持，想挤走他不易，于是密令莫荣新设法除掉程璧光。2月26日这天，正是龙灯会，程璧光在广州海珠码头被刺杀。

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者60余人，由于桂系和政学会会议员运动的结果，赞成改组军政府组织案的达40余人。居正、邹鲁、马君武等反对改组，屡欲起立发言，均遭无理禁止。田桐在沪上书孙中山，报告在沪议员反对改组军政府，联名致电非常国会，提出挽留大元帅。

次日，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至军政府，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表示：“今日我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召开，出席议员80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者40余人，超过半数4票通过。孙中山当即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职。

5月7日，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田桐等27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不许其辞职，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但留粤国会非常会议竟于18日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法12条，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

20日下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出席议员120余人，选举结果，孙中山及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懌、陆荣廷、岑春煊7人当选。随后，陆荣廷、唐继尧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孙中山眼见军政府实权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遂于21日在胡汉民、朱执信等人的陪同下离广州赴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孙中山在赴上海途中，特意前往大埔三河坝粤军总司令部视察。

孙中山寄望于陈炯明的援闽粤军。陈炯明率领20营粤军开到汕头后，便抓紧时机，招兵买马。对20营进行整顿，补充青壮，裁撤老弱病残，又收编了一些地方团队。孙中山派许崇清、蒋介石、吴忠信、蒋国宾等中华革命党骨干到该部任职，并绞尽脑汁地设法为部队筹款。经过三个多月的苦心经营，援闽粤军扩充为5个支队，2个预备队，共1万余人。在孙中山看来，在南方，唯一的出路是粤军在福建谋一立足之地，保留并壮大这一支护法军队。5月中旬，粤军进攻闽南，已迭获战果，攻占了闽南武平等地。孙中山甚为欣慰。

孙中山对陈炯明面授机宜，劝他冒险进攻。粤军的主要军事负责人都从前方赶回司令部，听取孙中山的指示。孙中山还不辞辛劳，亲自去松口、梅县、潮安等地巡视慰问，勉励粤军将士牢记护法职责，奋勇杀敌，以完成革命事业。

5月31日，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与谭人凤相遇于三河坝，适有捷音报到，永定已被攻下，汀州望风而降，下洋亦经占领，所得子弹甚多，同拍掌称快。

孙中山到上海后派徐谦在广州代表他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唐绍仪也因不在广州而派陈策代表出席。岑春煊任主席总裁，实际上实现了以岑代孙的计划。岑春煊是桂系的代理人，改组后的军政府成为桂系操纵的傀儡机关。

桂系不但要推翻孙中山的地位，而且要消灭在他的旗帜下的粤军和滇军。粤军远在潮汕一带，桂系一时无从下手，首先想解决在北江的滇军师长张开儒。张开儒任军政府陆军总长，曾以陆军总长名义在各县设立招兵机关，招收民军开进省城，编为陆军部警备队，桂系早已视为眼中钉。紧接着军政府改组案成立以后，莫荣新突然发表命令，解散陆军部警备队，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招兵机关，并且诱骗张开儒来省接洽公务。

张开儒在西村车站被捕。同一天，张开儒的秘书长兼陆军次长崔文藻也在西濠酒店被捕。

当天张、崔就被枪决了。

莫荣新胆敢枪决张开儒，也因为唐继尧有密电。唐曾经电调张开儒率军回滇，张开儒拒不奉命，唐继尧改派郑开文接任师长，张开儒又拒不交卸。

国民党左翼议员在非常会议提出动议，指出广东督军莫荣新无权捕杀陆军总长张开儒。但另外一部分议员认为，督军有权惩办镇守使、师长。张兼任南韶连镇守使和滇军第3师师长。国民党左翼议员的动议不能成立。

南军据岳州后，连扰郟阳、通城、蒲沂等处，声势甚盛，亟待援师。而此前，滇、黔、川护法联军占领重庆，赶走了四川督军周道刚和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北洋军阀决定命直系“虎变将军”曹锟为攻湘军总司令，皖系将军张敬尧为攻湘军副司令，率三路大军杀向湖南。曹锟又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

吴佩孚系山东蓬莱人，原是前清蓬莱秀才，流落京华，穷途末路之时投靠了北洋，依附曹锟，辛亥革命时已官升为标统。张勋复辟时，受命“讨逆”，任前敌总司令。这次南征之前，被曹锟任命为第3师师长。吴佩孚已露头角，他在未来10年内，对中国历史有较大影响。

吴佩孚率领大军，所向披靡，一直攻下长沙。这次战争，皖系将领作战时屡遭失败，全赖吴佩孚一路向南挺进，若论功行赏，头功应归吴佩孚。可是段祺瑞竟任命了在征南战争中没有寸功的皖系将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时人称“直系打仗，皖系做官”。吴佩孚十分不满，攻克衡阳后，突然勒兵不前，第3师全体军官一齐向中央请假。

曹锟本是直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偏又是个“两栖动物”，他虽属直系又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他先前领衔与长江三督军联电停战主和，但后经皖系大将徐树铮的拉拢，并许以“副总统”尊位，他便一下子由主和派变成了主战派，并充当盟主，在天津曹家花园，与倪嗣冲、张怀芝共同主持了督军团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攻湖南的计划。

曹锟在会上表示：“我愿战至最后一个！”时人嘲讽曹锟，说他大人虎变，赠他一个雅号，名曰“虎变将军”。

曹锟先前与冯国璋有秘约，待打下长沙，杀杀南军的威风后，即停战议和，而皖系允诺他做副总统之约，又成泡影。他攻克长沙后，向段祺瑞索饷。段祺瑞只好派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大借外债，又与日本签了12条军事秘约，出卖国家主权，允许日本军队进驻我国东北地区。

曹锟拿了钱，按兵不动。徐树铮认为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是无足轻重的，

只要拉拢好吴佩孚，就不愁进兵了。1918年5月27日，徐树铮跑到衡阳拜会吴秀才。吴巧与周旋，并答道：“我是军人，上面如有命令，但有‘服从’二字。”徐树铮兴冲冲回北京向段祺瑞报告。段听了很高兴，为了拉拢吴佩孚，忙任命吴为“孚威将军”，与督军官阶相等。

曹锴听说他的直隶督军一职奖励给徐树铮，便称病回天津调养。他在天津老站刚下车，便遇见了炳威将军陆建章。陆奔走赣、鄂，运动议和，他建议曹锴召集各省督军在天津开会，讨论西南和战问题。

曹锴通电请各省督军到津会议。几乎所有主和派政客麇集天津，反对南北战争的呼声甚嚣尘上。

徐树铮回到天津，发现陆建章在幕后活动，大怒：“如果我不让这个屠夫闭上臭嘴，不久，所有的督军都会起来反对我们了。”徐树铮约陆建章到奉军驻津司令部谈军事情况，却暗中埋伏武弁，及待陆建章入内，用手枪当场把他打死。

段祺瑞得知徐树铮擅将陆建章枪毙，且惊且喜，便下一道令，说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现已被徐树铮拿获枪决，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

这边却恼怒了一代名将冯玉祥，冯乃陆建章外甥，听得舅父遇害不禁呜咽道：“舅父屈死在小徐手中，殊不甘心。小徐靠了老段，横行不法，暴戾恣睢，我若不为舅父报仇，如何对得住姻戚？但眼下我部下不过数千人，尚难轻动，不如从缓为是。”段祺瑞为促使曹锴出兵南征，任命曹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但是，吴佩孚已在衡阳与南军将领暗中往来。9月26日，湖南战线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锠、林俊廷、陆裕光、赴恒惕、林修梅、贲克昭、马璠、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发出联名通电主和。

直系头子冯国璋代总统任期一年已满，理应卸职另选。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合法倒冯”闹剧便又紧锣密鼓。大总统改选之前，为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派徐树铮与政客王揖唐共商组织安福俱乐部，并取款80万给王做活动经费。不久，皖系一手经办的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在北京开幕。安福国会以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接近安福系的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

冯国璋感到欲连任总统不可能，但他也不愿让段祺瑞登上总统宝座，便暗中嘱咐同党设法阻段。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及吴佩孚，隐承冯意，一再通电主和斥战，南方政府通电支持。

段祺瑞感到南方未平，而北洋派内部又如此分裂，若把冯国璋逼下台，岂肯甘休？于是他决定不谋下届总统职位。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让比较超脱的徐世昌出来任总统，冯、段两人愿一起下野。

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职，便按照冯、段预约，下令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任命旧僚属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冯、段同时下野。冯国璋在与段祺瑞的斗法中，是个失败者，从此，冯回到老家河间，不再出山，不久病亡；段祺瑞名义上不做总理，当个参战督办，但照旧在幕后操纵政局。直系中的曹锴、吴佩孚逐渐成为代表人物，直皖斗争仍在激烈进行。

徐世昌不甘心做个傀儡，他上台后，即以“文治”标榜，除了任用自己的一帮“文人”外，就是主张南北议和。英、美、日、法、意五国也出面“和平劝告”。10月23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庆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麟、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峰、王芝祥、王克敏、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启甫、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徐世昌是个善于用谋的军阀政客，他审时度势，乐得顺应国人所愿，以总统名义下了和平令。

几经周折，终于在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北方代表有：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10人，以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代表有：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等11人，以唐绍仪为总代表。

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又挂着参战督办的头衔，掌握着军事大权。北方议和代表们多系安福系人，他们出发时，段就嘱咐说：“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南方代表团提出停止参战借款、陕西战事，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

由于北方缺乏诚意，南方代表团遂宣布从26日起停止正式会议，改为谈话会。28日，唐绍仪向北方代表团提出要求陕西停战及撤换陈树藩等三项质询，限48小时答复。北方代表团致电北京政府请示，未得回答，于是于3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会议中断。

吴佩孚与长江三督呼吁重开和谈，全国也出现了抢救和平之声。美、英、法、意四国公使，也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北京政府只好回电慰留北方和谈代表。4月1日，陕西停战。4月7日，南北和谈重又恢复。

重开和谈，争论的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北方代表则要维持安福国会，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认安福国会，于是北方代表从4月29日起，装病不到会。

就在这时，国内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领导“五四”运动的领袖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 第二十一章 “三大主义”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楼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原因。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他“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6项标准，

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 6 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所谓民主，它的对立面便是封建专制，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1916 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

胡适名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 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博士学位。

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来往，便成了好朋友。

陈独秀同胡适建立联系，是通过老朋友汪孟邹的帮助。汪与胡是同乡，1915 年 10 月 6 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 月 13 日，汪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 年 2 月 3 日，胡适写信给比他大 12 岁的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认为，国语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则是一种活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为大能事。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课余之暇，为《新青年》多译那些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1916 年 10 月 1 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这封信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 8 条意见。陈独秀虽然表示赞同，但觉得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不够坚决。因此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

胡适接信后，对 8 条意见略加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从此便成为全国文学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 年 1 月，陈独秀进京，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个偶尔的机会，去年 11 月 26 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同汪孟邹同车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馆。他在琉璃厂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入北大任职。

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 1905 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

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的 10 余本《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为 300 元，允许他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来看他，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而陈只是个秀才，蔡礼贤下士风度诚然令人敬佩。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当他看到蔡是那样的诚恳待他，又答应把《新青年》搬到北大办，便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北京。

陈独秀在携眷去北京之前，对原岳王会友人岳相如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 3 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1917 年 1 月 13 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驳斥有力。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陈独秀就职后，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 9 号，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同年 7 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经蔡元培同意，9 月 10 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

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

李大钊在 1916 年 5 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运动。8 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报》。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为世人所不耻，后来才转变了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化龙邀请他去京创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

《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公开申明《晨钟报》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晨钟报》刚刚出版 22 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汤化龙对此不满，说李大钊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要求李大钊改弦更



张。

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便扬长而去。

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弊。

1917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出任编辑。

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是老友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便问章士钊：“行严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击腐败的时政？向甚嚣尘上的孔家店投枪？”章士钊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复辟，我赞成；对于政府的黑暗之处，官僚们的私下争斗，我也是深恶痛绝。”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终于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马上任！”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章士钊怕李大钊激进的文章惹麻烦，建议他改写国际问题的论文。李大钊便写国际述评，向读者介绍俄国革命，并指出：“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我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的文章，暗示中国先进分子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学习。

北洋政府要缉拿宣传革命的李大钊，章士钊立即掩护李大钊逃离北京。

李大钊仓皇出京，南来上海，寄住友人家中。旧地重游，万端思绪一齐涌上心头，便作诗一首：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别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李大钊在上海继续研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1917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夏元璠作理科学长。胡适、李大钊、李四光、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陈独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1年。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

陈独秀上任后，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于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

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陈独秀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 4 件大事：(1) 扩充文科，增设德、法、俄语新系，并在哲学、中文、英文系设立研究所。

(2) 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

(3) 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是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4) 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为了约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进德会，作甲种会员。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 3 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 3 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议员 2 戒；丙种会员除以上 5 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 3 戒。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随便，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

这在当时虽不足为奇，但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加入进德会后，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北大的改革、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对学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

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青年学生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李大钊又于 1918 年冬组织起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传播。

原由陈独秀 1 人主编的《新青年》，于 1918 年 1 月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 7 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编委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其中钱玄同又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周树人）曾参加光复会，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他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时遇钱玄同组稿，便于《新青年》发生了关系。受《新青年》的启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和译文等。

陈独秀对鲁迅很敬重，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并一回一回的催。1918 年 5 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这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

《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 1000 份，到 1917 年猛增到 1.6 万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但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议创《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适等在北大文科学长室开会，讨论创办《每周评论》问题，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设在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12个专栏。《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封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最为猖獗。于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复王敬轩书》。通过这出“双簧戏”对复古思想、以及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3年来所作的宣传，做了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便在《每周评论》上进行。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安福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否则国会将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特辑了全国14家报纸上的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论》上。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

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看透了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上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等驱逐出北大。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

那更是卑劣无耻了！”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4人被驱逐北大的消息。这些谣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育长。为封建恶势力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 第二十二章 五四圣火

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这时他的思想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前面说过，李大钊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是第1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赞扬马克思、列宁的业绩。

李大钊、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的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或译文，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一是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二是摘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三是报道国内劳动状况，如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虽然比李大钊晚半年多，但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更大。

陈独秀、李大钊不仅通过办刊物来宣传革命，而且还在实践活动方面，积极组织青年人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在北大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为园地，吸收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朱务善、赵尔康、秦君等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参加，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北大学生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疑等，成立了《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顾问。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便宣告成立，并创办《新潮》月刊。

《新潮》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杂志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学生，它的宗旨是“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它的发行数量大，影响面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每周评论》又是青年人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以上几种刊物，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指导作用。

1918年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2000余人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活动。

这次游行请愿活动虽然没有结果，但学生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于是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并派出许德珩、易克疑等人南下联络。他们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工专学生马千里、张传琦、马骏、郭隆真（女）、谌志笃，武汉的恽代英，九江的方志敏，南京的林祖烈，上海的张闻天等爱国学生建立联系。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1919年3月，邓中夏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39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巴黎和谈。

1918年11月，大战结束，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

中国曾经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也属战胜国之一，北京政府遂派外交总长陆征祥及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5人为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谬无理要求：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及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无条件让给日本。袁世凯曾以日本支持他称帝为条件，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便有山东问题。段祺瑞为了武力统一全国，大量向日本借款，派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中日军事秘密换文”。日本代表在和会上便以“二十一条”和“中日军事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无理要求。英、法、美等国首脑不顾中国代表的请求，答应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中去。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国人大为震惊，全国上下奔走呼号，沸沸扬扬。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陈独秀分析了巴黎和会后，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言论非常符合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疑、匡互生、罗章龙、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等各院校青年学生，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

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9年5月2日，北大2000余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巴黎和会。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说国内的南北和谈会议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和会各帝国主义重在本国的权利，这是两个分赃的会议，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为解决山东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150多个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30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

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3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170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是北大学生。4日，又有700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文章虽不满100字，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且富有哲理。其文曰：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便像普通的战士一样，直接行动起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北京市民宣言》印在一页纸上，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即：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 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6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 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 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 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陈独秀提出罢免官职的那6个人，其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是卖国贼，曹曾任外交次长、总长，时任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签约的代表；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陆宗舆时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他是驻日公使，也是日本人的一条忠实走狗。学生在五四游行时，队伍冲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帐。正巧，曹汝霖、章宗祥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曹汝霖越墙逃走，章宗祥被学生捉住打得鼻青脸肿，趴在地上苦苦求饶。学生们未抓到曹贼，心头怒火难消，便纵火烧了曹宅赵家楼。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3个人都操有重兵，是段氏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

罢免这3个人，对皖系军阀，便是釜底抽薪。

《宣言》印好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他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吃茶的人到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陈独秀又约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等北大教员，分别到香厂

新世界附近和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

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衣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捕。

当晚 12 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四处搜检，拿去信札多件。

陈独秀被提讯时，他编造了一套供词，使案件成为无头案，警方无法再去捕人。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6 月 13 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相继报道，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

孙中山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便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他做了好事，国人足以相信他。你们不敢把他杀死，死了 1 个，就会增加 50 个、100 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活动的有各阶层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其中包括旧派人物如刘师培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以及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

政府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先是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又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国务总理钱能训也被迫辞职。在陈独秀被关押了 98 天后，将其释放。

陈独秀获释后，北大学生为他举行了慰问欢迎会。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陈独秀还出席了国民杂志社的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并说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不可与党派同日而语。98 天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磨炼得更加刚健了。

钱能训辞职后，总统徐世昌本想让他的旧僚周树模继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欲让安福系幕后人王揖唐出组新阁。双方争持不下，最后任命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作为过渡。徐世昌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推荐陆军总长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是皖系要员，又是徐世昌的门生，还是羽毛已经丰满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也是直系头子曹锟的换帖兄弟。参众两院立即通过靳内阁案。10 月，靳云鹏出组内阁。

南北议和破裂后，段祺瑞清楚地看到，直桂两系在湖南战场上已结为同盟。他为了同直系争斗，便寻求与国民党合作的途径，改派王揖唐为南北议和代表，接替朱启钤，到上海和孙中山直接谈判。吴佩孚对此深为憎恶，立即打电报反对，从而使直皖两系的冲突完全公开化，吴佩孚便酝酿了一个重大计划。

吴佩孚把他的“四大金刚”萧耀南、王承斌、董政国、张福来找来，道：“湖南向来是是非之地，以袁世凯的雄才大略，尚不能制服，何况段合肥？现在，北洋集团眼见得土崩瓦解，将来要重振北洋声威，就得靠我们这点力量，因此军事上应适可而止，不可把精力耗在这种徒劳无益的战争上

面。”萧耀南吃惊地问：“师长是否有北撤之意？”吴佩孚坚定地说：“现在徐世昌为了箝制皖系，让靳云鹏组阁。靳表面上是段派中人，但因为和徐树铮不和，近来与老段也日渐疏远。现在他组阁，可以作为我们北撤的内应。”1920年1月，吴佩孚要求班师的电报飞向北京，电报结尾道：“战死者既作泉下游魂，生存者又为他乡之饿殍。”段祺瑞接到吴佩孚的电报，问计于徐树铮，徐道：“除非我们把他死死地堵在湖南，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段祺瑞紧蹙双眉：“怎么堵？靠张敬尧的军队吗？”张敬尧督湘不到两年，把湖南搞得一团糟，他敲削脂膏，弄得老百姓一贫如洗。他的第7师纪律极坏，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所不为。湖南人冤声震天，把张督军称为“张毒菌”。

徐树铮也知张敬尧无力阻挡吴佩孚北归，便道：“可借口河南督军赵倜纵容其弟赵杰卖官鬻爵，改派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把吴佩孚的去路堵死。”河南是吴军北归的必由之路，而赵倜是淮军系统，不听段的指挥。于是段祺瑞点头赞成。

内阁成员多数是安福系骨干分子，国务会议果然通过了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命令。靳云鹏作为总理，未能阻止这项任命，非常气恼，他决心运用手中的权力，与总统徐世昌共同阻挠。

徐世昌与靳云鹏意见一致，道：“张敬尧摧残湘民，天怒人怨，我这里要查办他的电报就有100多件，他们为什么不去撤换呢？你去对段合肥说，河南易督之事，万万不可！”靳云鹏驱车到府学胡同向段祺瑞转告了总统的意见，并谨慎地解释道：“徐总统也是顾全民生，担心北洋集团分裂，希望各派力量不要存有意见，共同维持和平。”段祺瑞把靳的这一行为看作是背叛，他不直接回答靳的话，十分蔑视地说：“在我看来，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是不适宜当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吃惊地注视着段祺瑞，过了许久，才低声地说：“既然督办认为我不能做总理，我马上辞职就是了。”靳云鹏向徐世昌递交了辞呈。徐世昌拍拍他的肩头：“你别走，我准你10天假，休息后回来再干。”段祺瑞也料定公府不会批准靳云鹏辞职，他和徐树铮密谋后，打密电给王揖唐，要他赶回北京主持倒阁运动。安福系阁员在王揖唐的纵使下，果然同时拒绝出席国务会议，并提出辞职，出现了内阁危机。

吴佩孚闻讯，立即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说：“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措施，莫不违反民意！全国痛绝者保障之，全国景慕者排挤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矛头直指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

吴佩孚得到广州军政府60万元经费的援助，遂与军政府相约，吴军开拔时，湘军立刻来接收吴军的防地。吴佩孚又与南军密谋一个重要计划：共同组织“救国同盟军”，在推倒皖系以后召开国民大会，另组南北统一政府。

5月20日，吴佩孚下令部队撤出防地。他率领第3师自衡阳北上长沙，序以每旅距离30里，水陆兼行，水上船舫相接，陆上列兵阵阵，好不壮观。吴佩孚又作“回防途”诗一首，令军士谱成歌，齐声高唱，以壮行姿：行行复行行，日归复日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我今定归期，天下一絨衣，船舫连千里，旌旗蔽四周……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段祺瑞闻吴佩孚擅自撤兵北归，一面密电张敬尧，让他迎头截击；一面电令长江上游司令、其妻弟吴光新星夜南下，将长江上游军队集



中在岳州，准备将吴佩孚消灭在洞庭湖中。

但直系早有准备，湖北督军王占元已把他的北洋军两个师和鄂军两个旅的兵力，沿长江两岸和襄樊一带层层布防，使吴光新的部队受阻。张敬尧虽做了截击的准备，然而没有吴光新的部队支援，他不敢行动，却眼睁睁地看着吴佩孚的军队从他们的枪口下开过。

吴佩孚的第3师到达武汉，受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欢迎。王占元同吴谈了一个通宵，他发现吴确实是个栋梁之材，便慷慨地赠送给他60万元，其中40万元是王的个人财产。

6月中旬，吴佩孚把他的全部军队带回了中原。吴佩孚回到保定，同曹锟密议，拟定对皖系的方针。

直军撤防，湘军在谭延闿、赵恒惕率领下，立即占领祁阳、莱阳、衡州、宝庆等地。

几乎像是南北两军的一场足力赛跑，湘军兼程推进，北军退得更快。

湖南人民久处张敬尧的暴力统治之下，几年来呼号奔走，请愿驱张，都没有取得效果。湖南人民还提“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决心一定要把张敬尧打倒。

张敬尧曾是北洋派著名的骁将，他手下的北军已有7万人，但自己不敢身临前线，只得派他的弟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并任命他为第7师师长。张敬汤坐着八抬绿呢大轿出发，到了湘潭，听得一些风声，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就豕突狼奔地逃回长沙。

6月11日，湘军又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晚上10时许，张敬尧下令将军火库放火焚烧，长沙城内顿时腾起一片火光，轰轰烈烈地响起了炮弹爆炸声。张敬尧在火光和炮声中逃走。

赵恒惕、谭延闿先后来到长沙，在此后的20多天内，湘军把北军完全驱出湘境。

北军在逃跑途中，一路抢劫财物，逢人便杀，轮奸妇女，妇女被奸后还被断头剖腹。

张敬尧和张敬汤逃到湖北。王占元逮捕了张敬汤，处以死刑。张敬尧见势不妙，从汉口逃走。

## 第二十三章 直皖烽烟

皖系军阀段祺瑞虽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内有各省皖系军阀为其政治资本，但由于他采取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的政策不得人心，他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府早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直系军阀自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新直系的领袖，又有“后起之秀”吴佩孚在直系阵营中忽然崛起，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都唯曹锟的马首是瞻。因此，直、苏、鄂、赣4省是直系的势力范围。羽毛丰满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结盟共同反对皖系，奉系有东北三省地盘；河南督军赵倜完全倒向直系一边，曹、张向他许下河南不易督的诺言，他更是有恃无恐了。这样直奉便有8省同盟。徐世昌也因为和段的矛盾，不满徐树铮，而成为8

省联盟的支持者。

吴佩孚回到保定与曹锟一起，同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举行军事秘密会议。

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徐世昌想找出一条避免战争的妙计，电告曹锟、张作霖和江苏督军李纯进京商议。李纯称病不到，曹锟借口直军回防须加布置，无法分身。

只有张作霖以“调人”姿态单独应召来京。

张下车后，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满面春风地表示此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来说几句公道话。其实，张作霖兵精粮足，早有凯觎关内的心事。他提出以靳云鹏复职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为调停方案，徐世昌请他到保定征求曹锟意见。

张作霖偕同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思溥、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及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到保定。当天举行会议，提出5项条件，请张带回北京：（1）解散安福系。

（2）靳云鹏复职。

（3）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

（4）罢免安福系三总长。

（5）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罢免徐树铮。

张作霖带着保定方面的条件，来见段祺瑞。段对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认为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却可以商量。张同他一连谈了3天，段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让步。

徐世昌知道直皖火并已迫在眉睫，决心促成这场战争，用战争根除皖系在中央的势力。6月27日，他在公府召见段祺瑞和张作霖，提出一个调停方案：请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免去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委为远威将军。内阁由周树模担任总理，靳云鹏继续留任陆军总长。段说话最少，对这个方案没有表示反对。

段祺瑞回去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徐世昌的方案，徐树铮认为不应过分示弱，否则，我辈今后就抬不起头来。段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听了这番话，就气鼓鼓地说：“对，我们不能再让一步！”段祺瑞便向张作霖表示：“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你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7月1日，曹锟、吴佩孚发表《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声明要铲除徐树铮和安福系。3日，曹锟、张作霖、李纯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宣布其6大罪状，斥他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权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

7月4日，徐世昌不顾段祺瑞反对，直接下令裁撤边防军总司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调任他为远威将军，今其留京供职，所部归陆军部接收管辖。

徐树铮再也忍耐不住，他带着卫队，入逼公府，迫令徐世昌罢斥曹、吴。徐世昌没有办法，被迫罢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曹锟褫职留用。

7月5日，段祺瑞下令边防军总动员，并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命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8日，段由团河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会后给徐世昌一份呈文，声讨曹吴的罪行：“曹锟逍遥津、保，嗾使吴佩孚叛变，一则要请经略4省，

再则恳求增兵 4 旅，挟势邀常，不获不休。”“吴佩孚驻守衡州，暗与敌通，受贿 60 万元，沿途使用广东毫洋，证据确凿，无可讳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曹锟勾结陆荣廷诱惑元首，屡请起用复辟罪魁之张勋。”曹锟宣布讨伐段、徐，将直系军队称为讨逆军。曹锟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7 月 13 日，吴佩孚通电斥段祺瑞为卖国汉奸。

张作霖由京城回到沈阳，先致电段祺瑞：“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作霖忍无可忍，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后致电曹锟：“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遂将奉军第 27 师、28 师开进关内天津北仓一带。

直皖两军在京汉、固安、京奉三线相互对峙。7 月 14 日，直皖大战终于在京汉线上爆发。

开战后，吴佩孚设下诱敌之计，令部队稍加抵抗便后退，部队退出高碑店后，他率一部分直军绕到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设下地雷阵。定国军第 1 师师长曲同丰率部猛袭吴佩孚的军队，一举攻陷涿州、定兴，直军退出高碑店，皖军立即占领，大有鲸吞保定之势。但当这路大军进到松林店，地雷齐鸣，皖军被炸得血肉横飞，直军乘胜追杀，皖军伤亡惨重。直军北逼到涿州、琉璃河一线，便将曲同丰及其司令部高级官员全部俘获。

皖军徐树铮部追赶直军到北仓、李家嘴一带，奉军突然杀出，直奉两军合力，打得皖军人仰马翻。7 月 20 日，徐树铮等少数人化装逃回北京。

曲同丰被俘后，在保定光园向曹锟举行献刀典礼，通电皖军反戈。南方护法军政府又发出讨段檄文，支持直系。

段祺瑞四面楚歌，厚着脸皮去见徐世昌，自请罢免官职，并撤销定国军。7 月 23 日，直奉两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这场酝酿了将近 2 年的直皖战争，只消几天工夫就结束了北京政府重新作了调整后，立即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缉徐树铮、王揖唐、段芝贵等十大祸首。并明令罢免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湖北督军王占元未等这道命令到达，便把吴光新逮捕判刑。虽然徐树铮等逃往日本，但皖系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直皖战争后，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吴不注重虚名，他认为，一切都得靠军事实力，他率领第 3 师进驻洛阳，成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署。他在那里潜心练兵，韬光养晦，准备有朝一日争夺天下霸权。

直皖战争后的北洋政府，表面上是徐世昌为总统，靳云鹏为国务总理，但实权在曹锟、张作霖手里。直奉两系的矛盾又渐渐显露出来，中国大地上酝酿着直奉战争。

孙中山由广州回到上海，他心情虽然十分痛苦，但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而是发愤闭门著书，总结奔走国事 30 余年的经验，以此来启发国民，唤起新社会，到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

五四运动发生后，孙中山深受鼓舞，他指示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邵力子、廖仲恺等人负责创办理论宣传刊物《星期评论》、《建设》杂志和《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以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这 3 个理论宣传刊物分别于 1919 年 6 月 8 日和 8 月 1 日创刊出版。

3 个刊物除了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外，还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或用

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文章。孙中山较早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并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可举政治革命。朱执信较早地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一些介绍，1906年他曾在《民报》上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

孙中山曾经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撰写《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原来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使孙中山认识到，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戴季陶和胡汉民都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戴季陶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胡汉民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俩都发表过不少文章，在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孙中山为了更好的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以便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便于1919年10月10日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了“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革命原则。

陈独秀出狱之后，主持《新青年》编委会议，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问题，并发表《本志宣言》，目的是统一同人的意见。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是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发表文章说，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李大钊立即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他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就此开始分化。陈独秀的《本志宣言》，标明《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开始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1月，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函邀，秘密离京南下上海，同他们一起筹办西南大学，广东军政府拨款100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经费。陈独秀刚到上海，又接到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去武昌参加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

陈独秀于2月2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他到达汉口时，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这位名震国内的革命者。

陈独秀来鄂的消息传出后，武汉人士盼望一睹陈独秀的风采言论，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他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文华大学第4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了《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讲演。又应汉口青年会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了《新教育之精神》讲演，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

接着他又到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到会数百人。除此之外，陈独秀还应邀参加了几个小型座谈会。

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4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报》美誉陈独秀的演说“卓识说论”、“颇受学生所欢迎”。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所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

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8月乘车北上返京。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离京讲演，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陈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中，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

(1) 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虚荣心。

(2) 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者苦，有产的安享。

(3) 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北京警察厅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派警察在陈的北池子寓所门前站岗。

高一涵得知这个消息，便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京。

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由他护送，万无一失。

阴历年底，正是北京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李大钊便雇了一辆骡车，陈独秀脱去西服，穿上王星拱家里厨师的衣服，油迹满衣，光着发亮，头戴毡帽，坐在骡车里。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从朝阳门出走南下。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出口，恐怕漏出南方的口音。他们一路上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畅谈了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他们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

李大钊怕火车站有警察“恭候”，便让陈独秀换上西服，摆出教授派头，送他上外国轮船。

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陈独秀踏上外轮，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俨然是一位高等华人。他在2月19日到达上海，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不醒目的惠中旅店。

由于连日奔波，他受了风寒，休息五六日，便朝五马路踱去。他来到亚东图书馆，老友汪孟邹一见到他突然出现在面前，惊叫一声：“仲甫兄！”俩人立即上楼细谈。

陈独秀从惠中旅店搬到亚东图书馆楼上居住。北京警方似乎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他便在上海搞起政治活动。

2月27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该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3月20日，陈独秀在青年会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说。29日，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的千余人。4月21日，在中国公学讲演《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陈独秀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邀请他发表演说。但不久，他的演说对象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劳苦工人。

陈独秀仓惶离京，家眷尚在北京，他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住所，接来家眷同住，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北京迁来。汪孟邹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和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那里去？“于是，陈独秀便在4月份搬进了座

落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的柏公馆。这是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 4 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 4 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 3 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 140 平方米。这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

陈独秀积极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他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4 月 2 日，他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16 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18 日，他参加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 7 团体召开的联席会议，演说劳工要旨。被推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五一劳动节编辑了《劳动节纪念号》，共 400 页，内容丰富新颖，有孙中山、蔡元培等 16 人题字。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了实现 8 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2A3 的篇幅是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另外有美国、英国、日本劳动运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以及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日本、协约国各国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5 月 1 日，陈独秀组织了规模较大的五一庆祝活动。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

## 第二十四章 南陈北李

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 5 号，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文友”。

住在三益里 17 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 9 岁的李汉

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每期必读，现在也是陈家常客。《星期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沈玄庐，曾担任过清朝云南知县、知州、省巡警总办，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无法在国内立足，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916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不久便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又为《新青年》撰稿，是陈独秀的好友。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10条纲领。然而，《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他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

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人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

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

-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年，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报告，成立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杨明斋在中国长大，既会中文，又会俄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被选入代表团。

5位代表团成员都带着《生活报》记者证，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请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开始在陈独秀的家里，后来便在戴季陶的家里。通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 716 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首先吓跑了张东荪。张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要他参加共产党，便是介入了政治活动，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系是“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

张东荪退出后，便有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俞秀松和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即陈望道的门生，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浙江新潮》，主编是俞秀松。这个刊物刚出版两期便被警察查封。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禁后。于 1919 年底来到北京大学，见到陈独秀，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1920 年 3 月 27 日，他离京回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施存统也来到上海。

在讨论起草党纲时，决走由戴季陶起草。戴很快动手写好纲领草案，交给陈独秀，由陈独秀拿给大家讨论。这时戴季陶宣布退出，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党。”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需要戴季陶协助他工作，反对戴季陶参加组织共产党。戴季陶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戴季陶从新渔阳里 6 号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所房子，搬了进来，这里便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不久，座谈会又增加了一员，即从日本归来的李达。

李达，号鹤鸣，是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儿子，在 1913 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他在留日学生中，是留学生救国团领袖人物之一，曾在 1918 年 5 月率 100 多人回国抵达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向政府示威请愿。

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李达回到日本之后，便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译出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计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他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李达回国后同陈独秀见过一次面，陈独秀便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帮助他编辑《新青年》。

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由于在起草党章草案时有些问题需要讨论决定，陈独秀便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申府说：“这种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6 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 月 19 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 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

但是有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之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去日本继续留学；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求学，李季稍后又去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庐到了广州。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维经斯基作为苏共（布）远东局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他们吸收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

9月1日，《新青年》便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李汉俊译的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柯卡普：《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等。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

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作为发刊词。《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暑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干部。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王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思想十分进步；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小组前后，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主要撰稿人

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

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伙友》（周刊），主编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十分红火；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

7月中旬，张国焘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托去南洋募捐，路过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 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陈独秀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9月间，张申府因迎接罗素而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张申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决定立即发展党员。这时，女学生刘清扬同张国焘去南洋募捐刚回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想立即参加。

于是便吸收了张国焘入党。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10月，张申府离开北京，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党组织由3人变成了2人。李大钊便做黄凌霜的工作，黄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6人加入了北京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小组，扩大为10人小组。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罗章龙来自湖南，刘仁静来自湖北，他们又是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会的成员。

6名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不久便发生分歧，11月间退出北京小组，他们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办。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之后，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北京党组织，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除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外，其他人都是北大学生。

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 第二十五章 驱桂定粤

陈炯明率领粤军，经过浴血奋斗，夺取了闽南26县，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粤军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从而暂时避开了桂系

的锋芒，有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粤军从广东出发时，仅有警卫军 20 营，兵额不过 5000，枪支仅 3000 余，经过各战役，缴获北军大批械弹，沿途又添招士兵。粤军迅速增加到 2 万余人，拥有马步枪 4500 杆、各式炮 3000 门、机关枪 22 挺。陈炯明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粤军编成两个军，自任总司令兼第 1 军军长，以许崇清为第 2 军军长，邓铿为总参谋长。

陈炯明在闽南致力于“刷新政治”计划，兴办学校，提倡新学，聘请广州文化名人梁冰弦到漳州，担任教育局长，提出“一乡一校”口号，极力推行普及教育。又设立了闽南师范学校，创办女子简易师范，培养师资。还开办了商业学校、外国语学校、工读学校、平民夜校、航空学校、妇女政治讲习所、公路讲习所等，并挑选一批优秀学生赴法、美、日、英等国留学。

陈炯明推广新文化，开办“新闻学书局”，采办国内出版物数十种之多，《新青年》、《新潮》、《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通过新闻学书局在闽南传播。还设立了自明书社、儿童图书馆等，提供传播新文化的场所。又先后创办了《闽星》半月刊、《闽星日刊》、《闽锋周刊》、《闽南新报》等报刊，致力于新文化的传播，宣传社会主义。

陈炯明还主办演讲会，促进学术交流。许多名流学者纷纷慕名而至，如林森、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吴稚晖、李石曾、邹鲁、陈嘉庚等，都先后访问过漳州，发表演说。

孙中山给陈炯明极大的支持和赞助，先后派朱执信、廖仲恺、许崇清、戴季陶等，前往漳州，协助陈炯明工作。尤其是朱执信，多次赴闽，与陈炯明等高级将领讨论学术，注意新思想的发展，还经常对学生和士兵演讲。新政的许多措施，如开书局、办报纸、刷新教育、聘用新潮人物等，都是朱执信建议的结果。

孙中山还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援助，不仅筹拨盐款，以充粤军之需，甚至连在上海的房子，也先后两次由廖仲恺经手抵押，所得款限全部支援驻闽粤军。广大华侨从人力、物力上给漳州建设以无私的援助。陈炯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闽南经济。

陈炯明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使其“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顿时，僻居一隅的漳州，名声大震，俨然成为国民党政治、军事的中心。而陈炯明本人也由此获得“社会主义将军”的桂冠，跃居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

戴季陶声称：“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漳州创办，闽南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考察漳州新政后声称：“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美国公使在提交政府的报告中说：“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英国驻香港陆军参谋高罗氏，参观漳州后，称陈“真不愧为中国革新人物”。

1920 年 4 月 29 日，俄国波达夫波夫将军在上海会晤孙中山之后，带着列宁的亲笔信抵达漳州。列宁给陈炯明鼓励，希望他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如果需要的话，拟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

朱执信代陈炯明给列宁写了回信，赞扬列宁为了全人类的解放，用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来消灭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陈炯明好谈社会主义，动辄以打破私有制度相号召，但陈炯明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以社会伦理为中心，以中国

固有之文明为基础的适合于礼运小康之治，是一种带有封建纹记的社会主义。陈炯明提倡社会主义，欲以供其利用也，非以图社会主义自身之发展，故阳奉之而阴违之，其结果必至惹起反动，而自身乃见弃于社会。陈炯明后来的实践，便充分暴露了他的假社会主义面目。

1920年初，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兵权而发生内讧，两军大战于粤北，桂军的巢穴十分空虚，孙中山一面致电唐继尧、李烈钧、刘显世，号召出兵讨桂，一面希望陈炯明能早日决心率粤军回粤，以收渔人之利。孙中山派徐绍楨为讨贼军总司令，回粤主持讨伐桂系，又派朱执信、廖仲恺、蒋介石、邹鲁等到漳州，敦促陈炯明回师驱桂，并答应饷源接济可由上海国民党本部承担。但陈畏首畏尾，朱执信虽为陈炯明的“师尊”，他的话陈炯明也不听了，结果坐失良机。

7月，与桂系有勾结的直系战胜皖系，助长了桂军的嚣张气焰，加上林葆懌所属海军又与桂系合作，内外形势都对桂系有利。于是，陆荣廷便决定，以军政府名义下令进攻闽南粤军。8月11日，陆荣廷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兵3路，以桂军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林葆懌率领海军前往诏安配合作战。

陈炯明不得不回师驱桂，以寻求生路。此时福建督军李厚基因皖系失败，桂系紧逼，亦感到自身地位岌岌可危。若不联合陈炯明共同抵御桂系，将有唇亡齿寒之虞。于是李厚基按段祺瑞的指示，提供粤军军费50万元，子弹600万发。

陈炯明既充实了饷械，又免去后顾之忧。

此时孙中山在桂军后方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在他的精心部署下，7月中旬，李绮庵、陈策、徐绍楨、周之贞、何克夫等在江门、新会一带举行武装起义，组织救粤军。

广东省河江防舰队江大、江固两舰逃出广州，加入讨桂行列。前省长李耀汉、潮梅镇守使莫擎宇也策动旧部响应、拟与陈炯明粤军里应外合，讨伐桂军，从而揭开了驱桂战争的序幕。

在这种形势下，陈炯明于8月12日率领粤军在漳州举行回粤誓师，兵分3路，向广州方面挺进。

左路军由邓铿指挥，以洪兆麟、丘耀西等部组成，自诏安直趋韩江下游，以完全占领丰顺、潮安、汕头为目标。

中路军由陈炯明率领，以李炳荣、熊略、梁鸿楷、杨坤如等部组成，由小溪、平和，进攻饶平、平原而出高陂。

右路军由许崇清第二军全部组成，由永定、上杭、武平，进攻大埔、松口、蕉岭、平远，以完全肃清韩江上游，占领梅县、兴宁为目标。

又以张艷村为兵站总监，留守漳州，担任后方勤务；而邹鲁、姚雨平等，则以义勇军名义，在潮汕应援，运动潮梅镇守使刘志陆的饶光、罗兼柔、余鹰扬等部内应。

粤军士兵久驻闽南，屡受桂军挫抑，思乡心切，积愤在胸，广大士兵都以破釜沉舟之志，作背水一战。因此，攻势凌厉，战斗力很强。

左路军自诏安出发，直奔黄冈、澄海，桂军抵御不了粤军的强大攻势，纷纷溃退。

刘志陆属下卫队发生哗变，要求汕头独立，以抗莫荣新。刘部炮兵营长余鹰扬，早受粤军运动，也乘机宣布独立。刘志陆见势不妙，仓皇逃往海

圻兵舰，赶返广州。邓铿率左路军攻占汕头，驻汕头方面的桂军统领周辉甫、魏耀奎各率所部，投降受编。

许崇清率左路军由永定向大埔、三河坝方向进击。先后攻克大埔、蕉岭、梅县、兴宁，锋芒直指尤川、河源、兴梅，刘达庆部纷纷向龙川的黄田、义合撤退。

陈炯明指挥的中路军，先后攻克梅子岭、饶平，进至高陂、丰顺一带，但遭到桂军卓廷贵部六七千人的顽强抵抗，激战数天。后因桂军伤亡惨重，而潮汕已下、韩江上游也为粤军攻占，卓廷贵部始溃退。接着，中路军进占潮安，旋准备向紫金进击。

广东督军莫荣新惊闻丧师失地，忙从后方调拨马济第一军全部、林虎第二军大部、沈鸿英第三军一部、李根源海疆军一旅等大队兵马，直赴惠阳、河源前线，图作孤注一掷。

陈炯明除留了 30 余营留守潮梅一带外，其余兵力均集中向惠州方向追击。

许崇清率领的右路军一马当先，首先向老隆出击。老隆为龙川重镇，南抵河源、惠州，北达连平、翁源，地势十分重要。若老隆失守，将危及河源，威胁惠州。因此，桂军投下了不下 30 营的兵力死守老隆。8 月底，两军交战。许崇清军虽然人数少，但士兵们士气高昂，英勇善战，激战数天，桂军终于抵挡不住，落荒而逃。许军占领老隆，旋下龙川，指向河源。

莫荣新抽调驻琼崖的李根源部，开赴河源。但是，李根源的海疆军早受粤军运动，加上士兵对欠饷积怨甚深。因此在粤军的凌厉攻势面前，顷刻溃不成军，许崇清军攻克河源。

败退的桂军旋又纠合增援的马济、林虎部的 10 营兵力，向河源反攻。许军未及布阵，于是便在城廓遍布地雷后，诈败后退。桂军不知是计，直冲城内，引起地雷爆炸，伤亡无数。许军乘机反攻，复占河源。

中路军和左路军也先后攻克永安、相铺、蓝塘、横沥、三多祝。战局重心移到惠州。

莫荣新集中了 40 营兵力，企图凭借天险，死守惠州。

陈炯明以蒋介石代替染病的许崇清，率领右路军，并集中左路军邓铿部和中路军熊略部等，合围惠州城。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终于在 10 月 22 日，攻克惠州城。

粤军节节取胜，离不开孙中山直接领导和帮助。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滇军唐继尧、湘军谭延闿、赵恒惕都从军事上给予粤军以有力的支援，唐继尧、谭延闿与陈炯明彼此通电，订结盟约，以期三方并进，攻取两广。朱培德、张怀信、杨益谦、鲁子材各部滇军，奉唐继尧命令，进袭桂边，侵扰全县的黄河河，牵制了桂军的部分兵力，桂军惊闻后院起火，惊慌失措，忙抽调贲克昭旅率师前往防守。谭延闿部也在孙中山的催促下，在北江一带寻机出击。

皖系军阀也暗中予粤军援助，10 月间，徐树铮将 25 万元汇至上海银行，兑付给陈炯明，以补充军费。两广周围诸省，除江西的陈光远保持中立外，都站在粤军一边。

桂系军阀以奉直系为靠山，但是两广地处西南，鞭长莫及，难以调兵支援桂系，且供应饷械的许诺，由于多方的截留、阻难，而难以兑现。一度投靠桂系的方声涛、林葆懌、陈肇英诸部，战争伊始，竟不战而退。

孙中山派朱执信等人到广东策动民军起义。9月11日，救国军第四军总司令黄明堂，召集旧部，在雷州起义，各路民军纷纷响应，声势浩大。驻香山的魏邦平部第五军副司令郑润琦，举兵起义。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也在朱执信的策动下，起义反正。五邑清乡督办兼护国军第二军副司令陈德春，也宣告独立。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在广州珠江南岸率部独立，共同致函莫荣新，促其解除军权，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率师回桂，俾息兵祸。

但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嫉恶如仇的革命战士朱执信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9月21日，朱执信为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在虎门遇难，年仅35岁。陈独秀对朱执信的去世，有挽联曰：“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各地的起义，为粤军攻克广州，创造了条件。10月23日，陈炯明在惠州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攻广州的战略：右路军扫除增城之敌，向龙门埔前进，至南村附近集中，进攻广州西北；中路军扫除石龙之敌，沿广九路右方前进，集中龙眼洞附近，进攻广州之东；左路军扫除东莞之敌，沿广九路左方前进，至东陂、东圃附近集中，进攻广州东南。

10月26日，虎门要塞派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示威，并在观音山投下几颗炸弹，负责卫戍的李根源立即逃走。次日，飞机又去示威投弹，岑春煊离开了广州，莫荣新也在半夜里狼狈出走。留下来的马济、林虎两员大将，也于28日率部队逃走。

11月2日，粤军进入广州，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1月22日，在上海的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举行会议，3人决定偕同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他们于25日由上海动身，28日到达广州，邓铿、许崇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等到码头迎接。当天晚上，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和粤军高级将领许崇清、邓铿、魏邦平、李福林等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为孙中山等人接风洗尘。陈炯明野心勃勃，孙中山南下，打破了他独霸广东的计划，他曾极力阻止孙中山南下。现在孙中山等抵达广州，他托病不出。

宴会上，十几名报馆的新闻记者围着孙中山，争先采访。一位记者问：“孙先生，吾国必须统一，您将如何统一全国？”孙中山沉思片刻，道：“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此次归来，即本斯旨，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统一全国之基础。”另一位记者问：“孙先生，听说你这两年在上海研究过苏俄革命，请问您对此有何种看法？”孙中山毅然答道：“俄国革命，实行社会主义，遂酿成一种良好风气，而此种风气传到欧洲，欧洲各国竟莫能抗。苏俄革命在我之后，而成功在我之上，其中经验，值得借鉴。”次日，孙中山举行第一次会议，重建军政府。会上推定各部部长：

孙中山兼内务部长	唐绍仪兼财政部长
伍廷芳兼外交部长	唐继尧兼交通部长
陈炯明兼陆军部长	李烈钧为参谋部长
汤廷光为海军部长	徐谦为司法部长
马君武为秘书长	

当天，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军政府 4 总裁联名发表宣言，

宣布护法军政府继续执行职务。

孙中山南下广州时，一些国会议员随着来到广州。

护法军政府原来的 7 总裁，现在只剩下 4 个，继续支撑护法军政府的门面，有很大困难。孙中山看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要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靠护法的旗帜，断断不行。他在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政府。这个决定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1921 年 1 月上旬，孙洪伊在非常国会首先动议选举总统。陈炯明闻讯后，除即唆使军警袍社社长魏邦平、副社长洪兆麟反对外，自己也直接出面反对，借口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 2/3 以上出席，才能进行总统选举，而现在到广东的国会议员仅有 220 余人，不足法定人数，护法者不能自身陷于违法的地步。

2 月 10 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孙中山主张成立正式政府，又遭到陈炯明的反对，他声称：“但要自己内力充实，外人之承认与否，不必过问。”陈炯明又找议员谈话：“我不忍见孙先生失败，故不赞成速选总统。因现下时机未熟，如广东选出总统，北方必要藉口来打，是真自树目标，使人攻击。”孙中山决心一定，他对汪精卫、张继说：“革命工作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我今后干革命工作不要军人，不要假革命！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了权和力了。我限陈炯明在一个月內筹足北伐军费 200 万元，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粤军共有两个军，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兼任第 1 军军长，许崇清为第 2 军军长。陈以前属国民党派军人，并未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许则为中华革命党员，因此，许被称为孙中山的嫡系将领。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改任许崇清为国防第 1 军军长，委任黄大伟为国防第 2 军军长，这两个军都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陈炯明的粤军第一军所辖原有第 1 师师长邓铿、第 2 师师长洪兆麟，陈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 3 师师长。

因此陈炯明的军事实力大。孙中山为了扩充实力，设立了不少招兵机构，这些机构常被陈炯明解散。

陈炯明兼任陆军总长，却从不出席军政府政务会议。他以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的名义发号施令，不把军政府放在眼里。孙中山为了削减他的实权，划广州为直辖市，任命孙科为市政厅厅长，不受省长的管辖。

为早日成立民国政府，4 月 4 日，孙中山在宴请国会议员时，发表演说，指出：外交团不肯交付关余给军政府，北方徐世昌又假总统名义行使职权向外借款。因此力主广东应迅速成立正式政府，选出总统，以谋对抗。如果国会不同意，我将离开广州。

4 月 7 日，非常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议，由参议院院长林森主持，会议通过了周震麟提出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1) 大总统依本大纲行使职权。

- (2) 总统应由国会非常会议选出，须得选举之半数始得膺选。
- (3) 总统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率海陆军，任免文武官吏。
- (4) 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 (5) 设各部分掌部务，由总统任免。
- (6) 本大纲自宣布日起生效。
- (7) 本大纲施行之日，军政府组织大纲废止。



接着进行大总统选举，出席会议的议员 222 人，孙中山以 218 票当选。陈炯明并不甘心，他集合部下秘密会议，议决劝孙文勿即日就职，甚至唆使洪兆麟部，拆毁庆祝彩棚数次。

但是，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毕竟反映了民心所归，国内各阶层人民热烈拥护。海外华侨悉孙中山当选总统，纷纷来电祝贺。孙中山在 4 天内就收到纽约、加拿大等地华侨团体的贺电 200 余封。

孙中山于 5 月 5 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发布对内、对外宣言，宣布施政纲领，随后又任命了正式政府军政要职：

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	汤廷光为海军总长
唐绍仪为财政总长	李烈钧为参谋总长
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	徐绍楨为总统府参军长
徐谦为大理院院长	

孙中山对陈炯明仍然采取妥协态度，不但没有削减他的权力，反而增加了他的职权，他一身而兼 4 职：陆军总长、内务总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在孙中山的说服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被任命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

## 第二十六章 共产党人

孙中山建立南方革命政府，对北洋军阀政权统治是一个沉重打击。北洋政府利用桂系军阀，充当其急先锋，于 5 月 20 日下讨伐南方令，命令陆荣廷为两广边防督办，出兵攻粤。陆荣廷公开宣布取消独立，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设署梧州，以“先入粤者任粤督”为诱饵，鼓动桂军向粤桂边境进袭。同时催请北洋政府 3 路出兵，支援桂军。

6 月 13 日，陆荣廷正式下令攻粤，以陈炳焜出梧州，进窥郁南、罗定；以沈鸿英由怀集袭粤北；由申葆藩攻高、廉。同时派杨永泰在高雷、钦廉一带，策动粤军改编的桂军残部起事，以配合桂军的进攻。

孙中山来广州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消灭桂系的残余势力，以免留后患。陈炯明顾虑自己出兵广西，广东将归他人所有，因而得不偿失，不愿进攻广西。孙中山曾经打算身加“大元帅”头衔，自己带兵打广西。但陈炯明又顾虑到孙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仍须由广东负担，对他有害无利，加以阻挠。孙忿怒之下，几次想要削减陈的权力，或解除其省长兼职，使之不能继续掌握财权（财政厅由省长管辖），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但是汪精卫之流又从旁劝阻，孙才放弃自己的主张。

现在在桂军的猖狂攻势面前，陈炯明才不得不进行反击。

孙中山和他讨论讨伐桂系问题，才暂趋一致。

粤军以陈炯明为总指挥，兵分 3 路，迎战桂军。

中路由叶举指挥，下辖警备游击第一路杨坤如部 18 营，陆军第 3 师魏邦平部 6 营，陆军第二独立旅熊略部 6 营，江防司令魏邦平部舰艇 30 余艘，水兵 1000 余人，由肇庆进击梧州。

左路由翁式亮指挥，下辖陆军第一独立旅翁式亮部 8 营，警备游击第

一路丘耀西部4营，警备游击第六路余六吉部3营，警备游击第七路罗绍雄4营，陆军独立团黎生部3营，由高州南路出发。

右路由许崇清指挥，下辖许济、谢文炳部16营，陆军第1师邓铿部10营为总预备队，集中四会、广宁进攻贺县、平乐、桂林。

在粤军的进攻面前，桂军节节溃退。23日，三路部队齐临梧州，25日粤军占领梧州城外的金鸡炮台。在兵临城下之际，桂军心惊胆颤，陈炳焜部的刘震寰却通款粤军，率部反正。刘震寰一面亲率一旅，由双木袭取梧州，一面用电话伪报军情，假称粤军多路袭围梧州，使桂军韦荣昌四面迎敌。刘震寰乘机率部队攻入梧州。桂军阵脚大乱，全军尽散，陈炳焜仓皇逃往浔州。粤军占领梧州后，陈炯明将总司令部移至梧州。

陆荣廷危急令沈鸿英部进攻英德、三水；黄业兴部由高州北进，既威胁广州，且断梧州粤军后路。但沈鸿英见形势对自己不利，便不战而退，自任“救桂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与陆荣廷脱离关系。黄业兴部在高州抵御不了粤军，退向郁林。

粤军由梧州出击，6月28日围攻浔州。驻守浔州的刘达庆见桂军元气大伤，军心涣散，陆荣廷又派其子陆裕光赴浔实行监视，引起刘达庆反感，刘遂宣布独立，与陆荣廷脱离关系。粤军占领浔州后，迅即拿下贵县，向南宁追击。此时桂军将领贲克昭、秦步衢、韦荣昌、韩采凤、黄培桂等纷纷倒戈。

翁式亮左路军一下郁林，再下永淳。旋会合中路军，向南宁挺进。

陆荣廷迫于形势，不得不通电解职，8月4日，陆荣廷、谭浩明等由南宁逃往龙州。

次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

许崇清右路军先后攻克怀集、贺县、平乐，锋芒直指桂北重镇桂林。已宣布“反正”的沈鸿英又勾结桂林守将秦步衢，企图借桂林以抵抗。

与此同时，唐继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广西，贵州卢焘的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

为了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军队拨给李烈钧指挥，因此李号称“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向桂林、柳州方面进军。

联军和许崇清部相互配合，向桂林展开猛烈攻势，8月13日，桂军被逐出桂林，逃往全州，并向湘东逃窜。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随后即向南宁退走。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全权办理广西军事善后事宜。8月8日，陈炯明到达南宁，成立了广西全省善后处，以降将韦荣昌、黄培桂为军事善后督、会办，同时组织以马君武为省长的省政府。

陆荣廷还在龙州收集残兵败将，幻想北方直系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们。北洋政府当权人物靳云鹏等无法出兵援助，只能接济一批军火。但这批军火由小山丸装载出口，不料还没有开出上海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皖系扣留。这是皖系同国民党合作的又一次具体行动。陆荣廷、谭浩明等在粤军的攻势下，于10月1日向越南河内逃走。

粤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又准备派他兼任广西总司令。

陈炯明认为这是调虎离山计，拒不接受。

陈炯明在李烈钧、唐继尧、卢焘等赣、滇、黔联军的配合下，在孙中山的督促下，率领粤军顺利地占领了广西。但是，陈炯明采取了报复主义手法，给无辜的广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陆荣廷是武鸣人，陈炯明率粤军一入武鸣，照例先把东西抢得干干净净，然后纵火大焚，把城厢内外数千家，烧成一片焦土。居民多半是被火烧死，有从火中逃出的，亦即予枪毙，虽 90 老翁，也不能幸免。他杀小孩的办法，尤为新奇特异，不用枪打，不用刀割，只把棍子削尖，由肛门插进去然后排列地上，好像学生站队一样。

被刑的幼孩，有的即死，也有号哭数小时，犹死不了。

粤军贩毒包赌，滋事扰民，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这些已经暴露了陈炯明正在蜕化为军阀的面孔。

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之后，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也先后建立了党组织。

长沙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人，父亲是位普通农民。

毛泽东从 9 岁起在偏僻的山村读私塾，13 岁时便辍学务农，一直到 17 岁，他终于说服了父亲让他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他给父亲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日必看的帐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不到一年，便转往长沙，先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了半年书，辛亥革命爆发，他决心参加革命，当了兵。半年后，毛泽东从新军退出，到湖南省一中读书。半年后，他觉得自学更能增加知识，便退学，在定王台下的湖南省图书馆自学。

半年后由于父亲的干涉，他进入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并入第一师范，一直在第一师范学习到毕业。

1918 年上学期，是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已是 25 岁的青年，有着浓厚的爱国热情，为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共同活动，他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有同学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 21 人参加。

早在 1915 年，毛泽东就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他在这年暑假过后，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向长沙各学校散发《征友启事》，应者虽寥寥无几，但其中的罗章龙和李立三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新民学会会员从学校毕业了，出路何在，毛泽东立志向外发展。1918 年 8 月，毛泽东去北京，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他通过不久前调往北京大学任教的原湖南一师老师杨济昌的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因而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相识，并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19 年 3 月，他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赴法勤工俭学学员从上海坐轮船去法国后，毛泽东返回长沙。他一面在长沙修业小学当教员，一面创办《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

1919 年 12 月，毛泽东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他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掀起驱张运动。并在 1920 年 1 月 28 日，在京组织示威游行，到总理府请愿。他当着靳云鹏的面，慷慨陈述张敬尧祸湘的数十罪状。

他在北京期间，同李大钊有着密切的联系。

5 月 5 日，毛泽东由北京到达上海，并在上海活动了将近 3 个月，这时

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正着手筹建共产党，毛泽东同陈独秀等多次会晤，除了讨论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外，还讨论了在湖南建立党组织的计划。

毛泽东回长沙后，立即办起“文化书社”，代售《新青年》和其他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研究十月革命。

1919年至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有蔡和森、肖子升、李维汉、蔡畅、向警予等18人。蔡和森到法国后大量阅读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心胸豁然开朗。

1920年8月中旬，毛泽东刚刚从上海回到长沙便接到蔡和森的来信，蔡在信中明确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见，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此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刚刚诞生。

毛泽东收到蔡和森的信立即拿给比他大17岁的一师同学何叔衡看。

何叔衡是湖南宁乡人，他虽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母仍挤出一点钱来供他上学。何叔衡学习十分努力，在26岁那年考中秀才。他不设法去衙门做事，而是在家乡当私塾教师。37岁那年，他居然去报考湖南第四师范，因此是毛泽东年长的同学。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何叔衡与毛泽东相知日深。何叔衡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相互影响，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何叔衡看到蔡和森的信后，赞成建立共产党组织，他们召集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会议，讨论用社会主义改造祖国问题，赞成者12人，不赞成者6人。

陈独秀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之后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成立共产党小组。于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便在长沙建立了共产党小组，起初只有6人，后来发展到10人。党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易礼容、夏曦、陈昌等。

陈独秀在1920年秋让共产党员刘伯垂回湖北，找董必武、张国恩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刘伯垂是湖北鄂城县人，在清末年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陈独秀在日本与他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从广州回湖北途经上海时，被陈独秀发展为共产党员。

刘伯垂带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文件回到武汉，约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陈独秀的意见。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斋，号璧伍，湖北黄安县人。他17岁那年考中秀才，28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加入同盟会，见到孙中山。

董必武从日本回国后，即开始革命活动，1918年3月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次年春天，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枪杀。董必武逃往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

此时，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南租了一处房子作会址，并邀请董必武、张国恩主持会务。董必武、张国恩便在这所房子内住下。

张国恩（又名张眉宣）是董必武的同乡好友，和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

一起加入同盟会，一起从鄂西来到上海，在上海，他们遇见了詹大悲，詹大悲住在他们斜对面，詹与他们早就相熟了。

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同在渔阳里居住的李汉俊。他们一见如故，谈马克思主义，谈列宁，谈十月革命，谈社会主义。董必武从此也读起马克思主义著作来，并转向社会主义。

1919 年秋，董必武和张国恩回到武汉，准备办报，因资金困难未成。董必武遂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址，办起了武汉中学。武汉中学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

张国恩回武汉后，担任了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监，他以前曾在该校当过教师。张有律师资格，又在武昌抚院街开了律师事务所。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在茶馆相会后，便着手建立党组织。

董必武、张国恩在当年夏天曾接到李汉俊来信，希望武汉建立共产党小组。两人建立小组，人数太少，董必武便介绍了陈潭秋，张国恩介绍了包惠僧。

陈潭秋曾积极支持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并被董聘为英语教师，担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是董必武的密友。

陈潭秋是湖北黄冈县人，祖父是清朝举人，16 岁考入湖北第一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9 年毕业后，他通过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认识了董必武，倪是董的同乡。

包惠僧也是湖北黄冈县人，湖北第一师范毕业生，是张国恩的学生。他在 1917 年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于是他改行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到过上海、广州、北京。陈独秀在 1920 年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向陈独秀进行采访，作过一些交谈，因而相识。

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参加。他们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接着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研究了武汉建立党组织后的活动计划，最后，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担任武汉共产党支部书记，众人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了张国恩负责管理财务，陈潭秋负责组织。

刘伯垂有律师资格，他为了掩护党的秘密活动，索性在“老虎口”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 5 号，设立党的机关，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不久，便发展了湖北一师学生赵子健、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员刘子通和黄负生等人入党。

张国恩由于忙碌于律师工作，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党组织成立 3 个月后退出了。

1921 年春，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离开武汉去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加之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与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他在离开武汉时，党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陈潭秋、董必武等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并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在武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恽代英，他从五四运动直到武汉党支部成立，一直是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他

发起组织了“互助社”等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1920年初又在武昌横街创办了著名的利群书社，该社致力于介绍新文化，推销进步书报杂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利群书社的工作人员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对中华大学学生有很大影响。

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文章。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李汉俊、袁振英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马耶夫都曾先后到过利群书社，想同恽代英以及利群书社成员林育南、项英（项德隆）、李书渠、李求实、卢斌、施洋等，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使他们早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武汉党支部的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也曾同恽代英交换过意见。1921年夏，利群书社召开大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共存社。1921年冬至1922年春，恽代英、林育南、卢斌、项英、李求实等大多数共存社成员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山东济南最早传播新文化的是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山东比较活跃的人物，曾代表山东省议会前往上海，吁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1919年冬，王乐平开办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传播马克思主义。

王乐平是山东政界和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与陈独秀相识，彼此保持密切的联系，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发起组后，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却不愿加入共产党，他把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任务让给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的一位佃家的儿子，12岁才进私塾读书，20岁来到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刚刚来到济南不久，便遇到了五四运动，他代表山东学生会去北京，认识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对外联系的罗章龙，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成为该会的通讯员。这使王尽美的思想发了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9月，王尽美在济南教育会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最初10人，后来发展到50余人。山东省一中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都是积极分子。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人，是水族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他6岁进私塾，10岁入荔泉书院，16岁离开贵州来到济南。他从西南来到山东，依仗叔父的帮助。他的叔父是清朝进士，在山东做县令，写信要他来济南读书。

这样，邓恩铭于1917年10月来到济南，进一中学习。五四运动中，邓恩铭被推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与一师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

王翔千比王尽美大10岁，是山东诸城人，是王尽美的远亲，因而相识。

王尽美、邓恩铭等又组织了励新学会。这是一个学术团体，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是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学术讲坛活动，并以《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会员发展到60余人。

王尽美、邓恩铭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1920年冬，李大钊派人来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共产党组织。次年初，济南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铭吸收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励新学会的进步分子参加。最初的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甫等。

## 第二十七章 南湖船头

广东是新思潮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1919年春，一个叫郑苍生的人在广州建立了“共和工党”，出版《共和工党》月刊，虽然这个组织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动，但其主要成员后来参加了广东党的早期活动，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组织了学联和进步团社，出版进步书刊，涌现出一些群众领袖，如彭湃、杨匏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杨匏安是广州香山县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由于揭发校长贪污学款，遭到校长忌恨，而被诬入狱。他出狱后为寻求真理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

回国后在澳门教书，不久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从北京经上海回到广州，他们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因参加反清活动于1907年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方面的训练，擅长写作、武术、骑马，身强力壮。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在父亲入狱后，他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父亲担任省议会议员时，陈公博刚刚20岁，居然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同父亲一荣俱荣。但是，父亲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学，他便在父亲去世后担任两年教员，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同陈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广东老乡谭平山，比陈公博年长4岁，俩人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谭平山看上去比较老练，且具有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

谭植棠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7岁。他朴实无华，忠诚待人，也是191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

这3人回到广州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取得联系，创办了广东《群报》，并把《群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回广州的十几天以前，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大学找李

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来，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鹄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 7 人与他们见面，俄国人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欢迎俄国人帮助他们搞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且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由 7 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他们认为：这个广东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 年，广州好戏连台。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民国政府，担任省长的陈炯明于 11 月写信给陈独秀，邀请他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去广州的问题。李大钊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1) 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2) 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

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希望，认为广东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很想去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陈炯明提出去广州任职的 3 项条件：(1)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 以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 1/10 拨充教育经费；(3) 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陈炯明答应陈独秀的条件，并电促他来粤。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前，把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代理，于 12 月 17 日乘船去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

12 月 25 日，陈独秀等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他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同梁冰弦、区声白等 7 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会，研究党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讨论，7 位无政府主义者见内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表示不愿接受。虽经陈独秀再三说明，他们仍然反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开，各走各的路好。

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北京、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党组织。

已在广州的 3 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陈独秀出现在大东酒店时，便赶来欢迎。陈独秀对他们办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不久，他们重新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陈独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 11 号楼 2 楼，他在门口贴着上书“看云楼”的白纸。陈独秀在“看云楼”安营扎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推荐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委托陈公博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骨干。宣传员养成所不久改为宣传员学校，陈公博任校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是一所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广州党组织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外，从上海来



到广州的原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等也参加了广州支部的活动。1921年5月，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暂时留在广州，参加支部的活动。

在留洋学生中，除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组外，张申府在留法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间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萧三、陈延年、陈乔年等等。

张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来到法国。张应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聘请担任逻辑学教授。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妻。张申府、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入党。

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周殿魁因为当师爷，由绍兴来到苏北淮安，晚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做过知县。周恩来出生于淮安。他刚1岁时，父母将他过继给病危的叔叔当养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5岁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亲、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1907年夏，母亲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两个母亲去世，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去湖北谋事，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尽管他只有10岁，却不得不管理家务，因为他的另一位叔父从年轻时就偏瘫在床，家里的事都要周恩来出头。周恩来不但承担了这一切，还到东门附近表舅家的家塾里读书。

周恩来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他没有子女，又十分喜爱周恩来。

1913年，伯父调往天津工作，周恩来也随着来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读书。4年后毕业，前往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回到天津，组织了觉悟社，与李达联系，成为天津学生领袖。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去法国留学。

1921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5人组成，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

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

1920年8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经斯基已回俄国。

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

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

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

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

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毛泽东、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

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陈独秀要他去上海开会，正中下怀。

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

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各地代表于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

行动方便，博文女校师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17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中间。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其次是马林，38岁，董必武35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31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周佛海、张国焘24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

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

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法国总巡得知这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他们的活动证据，气氛缓和起来。

总巡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说完，便带着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 2 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渔阳里 2 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众人赞同。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开会，他曾在那里住过，愿作向导。但众人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李达的妻子王会悟道：“我有一个主意：我是浙江桐乡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湖上有游船可以租，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众人称善。当即决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当晚，王会悟去上海车站，了解次日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

## 第二十八章 叛逆之谋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了上海车站。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为过于引人注目，不便去嘉兴，李汉俊因受到监视，也就留在上海。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睡下，次日黎明，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把他夫妇吓得魂不附体。

早上5点多钟，陈公博从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个女人凄厉悲惨的呼叫。被谋毙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但那杀人凶手早已远颺。

7月31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日晨又发生了大东旅社杀人案。

一夜之间两次受惊，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去杭州。

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南湖会议。

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了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湖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让众人洗脸，吃粽子，暂且歇息。她托旅馆帐房先生代租画舫。

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安全，众人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湖有龙井绿茶，将麻将牌摆在八仙桌上，若有别的画舫从近处经过，众人便拿起麻将。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

号召力要大点。

下午 6 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沪任总书记，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在广州还同汪精卫、戴季陶等人一起兼任政务员职务。他南来广州，目的是推进广东革命事业，现在需要他回上海，他立即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职务。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陈独秀：“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陈独秀辞职不获，只得借口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9 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仍住在渔阳里 2 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谋生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党组织只能发给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每月 30—40 元生活费，这点钱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的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但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我的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最后确定：陈独秀月薪为 300 元。但不久，陈独秀因党内事务而辞去名誉编辑。他经济上常常发生困难。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成。

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出人意料地一拍桌子，道：“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罢，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平时和同志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

他的作风生硬粗暴的老毛病，在担任中共总书记后，时常爆发。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李达的批评未免偏颇，但陈独秀的粗暴作风，确是一大缺点。

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 3 人，别无工作人员。3 人聚会常在陈独秀的住所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他们商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 15 种共产主义读物。

10 月 4 日下午 2 时许，有 3 位“白相人”突然从陈独秀的前门闯了进来。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加以阻拦，那 3 人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

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甚是惊疑，想从后门出去，但见后门已

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来了两部汽车，随车来的巡捕把陈独秀、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共 5 人逮捕，《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来到法租界巡捕房后，陈独秀报了假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名。

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巡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在就拉住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们拉到这儿来了。”这下陈独秀暴露了身份。巡捕房查清邵力子、褚辅成的身份后，即释放。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惠僧等 4 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与客人无关。”法庭将高君曼释放，其他 4 人仍关押在狱中。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李达为了营救陈独秀，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

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各大报纷纷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10 月 7 日，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但得随传随到。

10 月 9 日，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也被保释出来。

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10 月 19 日，法庭判决：除陈独秀外都获释。

26 日，法庭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 100 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 5 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马林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使陈独秀这位很重感情的人，顿时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以前的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陈独秀加大马力工作，他签发《中央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各区，到明年 7 月以前发展党员 30 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 2000 名，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 20 种以上；全力组织全国工会。

上海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后不久，即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山东设立了分部，分部负责人分别是罗章龙、邓培（北京），包惠僧、林育南（武汉），毛泽东（湖南），谭平山、冯菊城（广州），王尽美（山东）。

1921 年底，蔡和森、李立三等从法国回到上海，立即被批准吸收为党员。陈独秀留蔡和森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

孙中山在平定广西后，为了北伐大计，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他自己于 1921 年 10 月 17 日乘军舰出巡广西，来到梧州。他在梧州接连召开了几个军事会议，并召驻节广西首府南宁的陈炯明来梧州商讨北伐事宜。但陈炯明竟托词拒召，使孙中山出巡广西之行，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孙中山委曲求全，立即亲赴南宁，与陈炯明会商北伐问题，要求陈调粤军 40 营参加北伐，并供应北伐军饷。陈既不敢公开抗命，也不作明确承诺。孙中山对陈耐心开导，提出或者派陈为北伐主帅，自己留守后方作支援

北伐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率军北伐，陈炯明留守后方支援北伐。陈炯明表示愿意留守后方，每月接济北伐军 50 万元。

孙中山返回梧州决定先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然后取道湖南大举北伐。陈炯明则回广州主持广东政务。

孙中山于 12 月 4 日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与马林先后会谈了 3 次，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红军的政治训练等情况，并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他当时只想同苏俄建立非正式的联系，但这次会见增强了他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了解。会见后，孙打电报给广州的廖仲恺等人，说他见过马林，心里非常高兴。孙中山又介绍马林到广州同廖仲恺等人会面。

送走了马林，孙中山倾全力于北伐的准备工作，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饬云集在桂林的 5 万大军。1922 年 2 月 3 日，孙中山下令北伐，以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兵分两路；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进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清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出湖南，直攻武汉。

陈炯明却勾结吴佩孚，反对北伐，又联合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止北伐军入湘。他在“库储支绌，亟须统筹收束”的借口下，一次裁兵达 20 营之多，这对北伐无异于釜底抽薪。陈对于接济北伐的承诺，以两面派的手法，加以抵制。时近半年，汇至桂林的款不足 10 万，子弹未送一颗。

粤军参谋长兼 1 师师长邓铿，早已倾心孙中山，北伐军的军饷全靠他和廖仲恺合力筹解。陈炯明对邓十分恼怒，3 月 21 日，他派人去广州火车站暗杀了邓铿。

邓铿被害，风云突变，波澜迭起。孙中山立刻召开大本营紧急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计划，下令在桂各军改道江西，为避免陈炯明的阻挠，秘密返粤，继续北伐。

不料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接到命令，却派人向陈炯明告密。陈炯明秘密调去驻潯州一带的叶举、杨坤如部 50 余营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 1、2 师加强戒备，企图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粤。

4 月 9 日，北伐军行抵濠江，即遭到防守该地的陈炯明部的阻拦。孙中山下令不得阻止北伐军的行程，否则武力对待。

陈军因兵力尚未集中，只好作罢。

孙中山率北伐军抵达梧州，电召陈炯明来梧面商北伐问题，却遭陈炯明的拒绝。孙中山再派廖仲恺到广州力劝陈炯明赴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陈炯明不但拒绝前往，而且以电辞本兼各职相要挟。

孙中山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之职，保留其陆军总长一职，令其先返海丰家中休养，以示警告。

陈炯明即调动部队，令叶举、熊略、翁式亮诸将抛弃广西，尽调率所部回粤，又令省垣各将积极备战，力拒北伐军东下。但是，广州城的部队为 1、2 师，1 师师长梁鸿楷以邓铿死事可疑，2 师将士以师长洪兆麟在沪态度不明，都拒绝陈炯明的调遣，3 师师长魏邦平则倾向孙中山。叶、熊、翁诸部在桂又为驻梧北伐军所拒守，难以返粤。陈炯明无力抵抗，遂于 4 月 12



日深夜退走惠州。

蒋介石等力主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然后回师广西消灭叶举所部。他向孙中山说：“先生，如果不彻底解决陈家军问题，将来后患无穷，我也只有辞职而去。”孙中山以陈炯明叛迹未彰，粤军在桂奋斗数年，尤须保之，对蒋介石的意见未加接纳。他主张对陈炯明施以殊恩，当能感奋。蒋介石便回浙江奉化给母亲守制去了。他在离开广东时给陈炯明写一封信，劝曰：

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勿堕宵小之计，服从总理，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待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

4月23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即委任陈炯明为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并向陈炯明表示：“不生异词，必当倚任如前。”他又派伍朝枢、古应芬、居正、廖仲恺、马君武、汪精卫、程潜等到惠州、敦促陈炯明回省城。许崇清、魏邦平、梁鸿楷、李福林、黄大伟、李云复、徐军雁等粤军将领，致电陈炯明，劝其返穗。

但陈炯明拒绝出任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声称“自今后，息影田庐，躬耕养母。”孙中山以极其恳挚的言辞，给陈炯明发去了电报：“革命既无半途而废之理，十年患难道义之交，一旦相弃，纵弟不求谅于人，兄则何忍为之。望兄速取消退隐之志，投袂而兴，终始国事，庶几执信、仲元得以瞑目。”陈炯明表面上造成放刀成佛、卖剑买牛的假象，暗地里却积极筹兵备械，图谋不轨，设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诡计。他从广州退回惠州时，就从广州兵工厂、永济火药库及汕尾兵工厂带走大批枪支弹药，并在一个月内，添募40余营新兵，为发动叛乱积极作准备。

孙中山对北伐抱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精神，于5月6日从广州赴韶关督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他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发布总进攻令，北伐军分3路6防线，向江西发起进攻：李烈钧任中路总指挥，以滇军朱培德三旅、黔军谷正伦三旅、赣军李明扬一旅为中路第一线，曾昭所部滇赣联军10营为中路第二线，进攻大庾、南康；黄大伟任右翼总指挥，以本部一旅，李福林8营、赖世璜一旅为右翼第一线，又以梁鸿楷所部全军为右翼第二线，进攻三南、信丰；许崇清任左翼总指挥，以粤军关国雄、吴忠信等二旅为左翼第一线，又以边支炳所部全军为左翼第二线，联络湘军，攻仁化、汝城等。

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弃城而逃。

随后，北伐军进据吉安，直逼南昌。

正当北伐军跃马挥戈、节节胜利之时，陈炯明发动了反革命叛乱。陈炯明部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于5月18日率部进入广州，设总指挥部于白云山郑仙祠。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各职，并罢免伍朝枢、胡汉民、蒋尊簋、廖仲恺、谢慧生、程天斗等人之职，革除许崇清军长职务，粤军全部归陈炯明管辖，否则即以武力解决。

孙中山始终动以至诚，采纳汪精卫的建议，任命陈炯明为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仍以两面派的手法对付孙中山，表示：“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倘有不听吾命令而反对中山者，吾惟有自杀以谢国人”，暗地里却加紧筹饷，并密令叶举诸部接收兵工厂，占领石井军火药库。在粤汉铁路沿线布防，在新街铁路站以南一带抢修碉堡和战壕。

叶举诸部盘踞广州，向财政部闹索饷风潮。孙中山令廖仲恺筹款清还军饷。他们领取军饷后，又故意向省银行强迫兑现，造成挤兑风潮，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乱云飞渡，形势日益险恶。廖仲恺为了稳定广州局势，电请孙中山返穗坐镇，震慑邪气。6月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致电陈炯明速来省共商大计，陈炯明拒不应命。

陈炯明加紧与吴佩孚勾结。

北洋政府自直皖战争结束之后，形成了直奉两系联合执掌政权的局面。但是，由于靳云鹏内阁倒向直系，奉系则暗中联络皖系的残余势力，并与反直各派力量结成联盟，总统徐世昌亦对直系的专横不满，意欲引奉系为己援，遂应张作霖要求，准靳云鹏辞去内阁总理之职，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反对梁士诒，而吴佩孚这时已成天之骄子，他通电痛诋梁士诒媚日卖国。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请假去天津，张作霖则通电为梁氏辩护。吴佩孚发出反奉通电：“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梁士诒出走后，国务总理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

1922年4月初，吴佩孚偷偷地派人去广东，与陈炯明联系，要陈炯明武力反对孙中山北伐。

4月中旬，奉、直双方都布好了阵，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奉军号称镇威军，设总司令部于落堡，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分3路出兵。

4月29日，直、奉大战爆发，双方在东路马厂、中路固安、西路长辛店展开猛烈战斗。

这次战争只打了6天，奉军损失惨重，死伤3万多人，被俘4万多人，可谓损兵折将。

老官僚徐世昌自觉失算，他没料到奉军会败得这么快，只好下令通缉战争祸首梁士诒、叶恭绰（梁、叶已逃往日本）。吴佩孚对此不以为然，对记者说：“不惩办张作霖，誓不罢休。”徐世昌不得不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尚有东三省地盘，遂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此时，吴佩孚又秘密派人与陈炯明密约，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然后南陈北吴携手，吴为总统，陈为副总统，共同主宰中国政局。其步骤是：以黎元洪复位为第一步，藉黎之昏懦，利用废督裁兵，打倒曹锟以下各省督军，不成，则黎受其祸，再利用国会，急选总统，有机会则吴、陈出场，机会未熟则或举伍廷芳、蔡元培文人为正副总统，为吴、陈暂时之过渡。

曹锟也想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一统南北，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他和吴佩孚在铲除徐世昌问题有着共同的目标。于是，他们用“恢复法统”之名，恢复旧国会，让黎元洪复位。暂时过渡一下，然后再由旧国会把他们捧上台。

吴佩孚发出恢复旧国会的通电，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等立即在天津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5月24日，又成立了“正式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一些直系军阀根据曹锟、吴佩孚的旨意，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北南两总统同时退位。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203人于5月31日发

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国会职权，取消南北政府，另组合法政府。

徐世昌见大势已去，决意辞职，于6月2日下令，由国务院摄行职务，自己乘车去天津。

吴佩孚不失时机地发出通电，曹锟也领衔10省督军、省长联名发表通电，称徐氏既退，请黎元洪复职。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下，于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次日，黎元洪宣布了第一道命令，即改组内阁，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

在谭延闿未到任前，由张国淦兼代；黄炎培未到任前，由高恩洪兼代。

黎元洪一上台，陈炯明便履约配合吴佩孚，加紧策划推翻孙中山的活动。

## 第二十九章 祸生肘腋

黎元洪一上台，立即下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电邀孙中山入京筹商国事；内阁组成后，黎元洪和一些内阁成员分别发电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并电邀唐绍仪、陈炯明、岑春煊、谭延闿等来京共商大计；与此同时，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除要求孙中山下野外，也分别电请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等北上共谋国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造成“全国统一”的气氛。

南方人士已看出这是虚伪的表示，加以拒绝，被邀人士无一北上。其中，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职，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职。伍廷芳发出通电，认为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李烈钧态度更为强硬，联名发表通电，斥骂黎元洪叛国，说他和旧国会都是直系军阀的傀儡。结果，黎元洪拉拢西南人物入阁的计划落空。

陈炯明秘密策划推倒孙中山，但他的兵力不足，北伐军兵力逾4万人以上，他的兵力不满1.3万人。利令智昏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13日跨出了最后的一步，召集叶举等人在石龙秘密召集会议，讨论叛乱军事部署。他们认为，要阻止孙中山北伐，就要断其财源，拘捕廖仲恺，锁住“孙大炮的荷包”。

6月14日，陈炯明给廖仲恺打来一封电报，假称请廖到惠州领款及协商要事。廖虽然感到陈炯明居心叵测，但为了争取陈炯明悬崖勒马，于15日如约前往惠州。他刚抵石龙，陈炯明就密电将廖仲恺扣留，旋将廖囚禁在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

同日，叶举在白云山调动部队，作好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和粤秀楼的准备。孙中山接二连三接到报告：“陈家军将谋不轨，请暂作回避。”但孙中山认为，“竞存恶劣当不至此”。直到16日晨2时，又有一军官向孙中山报告：“粤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2时出发，并声言备足20万，以为谋害总统之赏金，且言事成，准各营兵士，大放假3日。”16日3时，总统府的粤秀楼上已听到敌人出发的号音，于是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辎重队长陆志

云催促孙中山立即离开。孙中山才化装成医生，出粤秀楼，几经周折，到达海珠海军司令部，旋乘小艇到白鹅潭，登上楚豫舰。

叶举指挥陈家军分兵 3 路向总统府和粤秀楼发起进攻，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敌人一面用步枪、机关枪、大炮向总统府和粤秀楼狂轰乱射，用煤油烧毁粤秀楼到总统府的栈桥，以断孙中山的退路；一面派兵埋伏于总统府四周民房内，以便孙中山乘车出总统府时，加以狙击，企图置孙中山及总统府警卫队于死地。

50 多名总统府警卫队员在团长陈可钰、营长叶挺、薛岳、卫士队队长姚观顺等人的带领下，对敌人的围攻，展开了顽强的反击，多次击退叛军的轮番进攻。上午 10 时左右，警卫队伤亡过多，被迫放弃粤秀楼。叛军放火焚烧粤秀楼，孙中山的著作手稿及珍贵藏书，都被大火吞没。

警卫队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孙中山脱险，同敌人激战，到下午 3 时，叛军仍然无法攻克总统府。4 时，叶举请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出军使马毓藩与警卫队团长陈可钰讲和。正在谈判间，叛军乘警卫队毫无戒备，不顾信义地冲开总统府前面的两层铁门，一轰而进，大肆抢掠总统府的枪弹、财物。

警卫队只好撤退出总统府，为掩护孙中山而留守在总统府的宋庆龄，也在叶挺和孙中山的副官马湘、黄惠龙等人的护送下，脱离险境。

孙中山脱险后，率领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等 7 舰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叛军据点发炮轰击。叛军巡河兵舰也向军舰炮击，静谧的白鹅潭，硝烟弥漫、恶浪滔天。双方激战多时，孙中山才因陆上没有支援，只好率舰退回黄埔。

6 月 18 日，孙中山电告在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26 日，蒋介石风尘仆仆地赶到黄埔，一见孙中山单膝跪下说：“先生，我来迟了！”孙中山连忙扶起他，感慨万端：“难得你这样忠诚，不畏艰险。当初，你因为我不肯讨伐陈炯明，便弃我而走，现在想来，倒是你有先见之明。”遂将海上指挥大权交给了蒋介石。

陈炯明见武力威胁未逞，便指使亲信利用省议会名义，强迫各社团，联名电促孙中山下野。他又致电伍廷芳：“切劝孙公，敝履尊号，示天下无私。”伍廷芳不为所动，以总统府外交总长的身份，照会驻粤各国领事，严守中立，勿助叛军。

7 月 1 日，陈炯明派钟荣光持函到永丰舰虚伪地向孙中山表示：“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但他最后仍要孙中山下野，离开广州。

孙中山对陈炯明严词痛斥。

陈炯明不惜重金，诱贿海军，以分化拥护孙中山的海军力量。心怀异志的海军司令温树德在陈炯明的诱迫下，秘密地与叛军签订了议和条件。他在 7 月 8 日晚接受了陈炯明的 26 万元贿赂后，擅自率领海圻、海琛、肇和 3 大舰息灯起锚，离开黄埔，驶出莲花山河面。

叛军以为 3 大舰离开黄埔后，孙中山的座舰永丰舰等就完全暴露在鱼珠炮台的火力监视之下，黄埔后方的海心岗水深仅有 6 尺，军舰难以通过，后路已绝。鱼珠炮台封锁前路，永丰舰等或困死于黄埔，或葬身炮火之中。

但孙中山早有准备，他事先派人测得新的航道，永丰舰等从容地摆脱敌人炮火封锁，移碇新造村河面与马伯麟驻守的长洲要塞互为犄角，陈炯明

谋害孙中山的阴谋再次破产。

不料，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率部反戈，7月9日长洲炮台为敌人占据，停泊在新造河面的永丰舰等，顿失屏障，处境险恶。

孙中山于10日拂晓，率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璧等舰，开足马力，驶向白鹅潭。沿途遭到叛军猛烈的炮击，永丰舰连重6弹。孙中山命令各舰还击，迅速压制叛军的炮火，舰队终于冒着纷飞的炮火，穿过叛军的层层封锁，驶入白鹅潭。

白鹅潭紧连沙面租界，叛军不敢向舰队开炮。但英国粤海关税务司却派人到永丰舰，以白鹅潭为通商港口和毗邻沙面租界为借口，无理要求孙中山撤离白鹅潭。孙中山严词痛斥：“此为我之领土，我可往来自由。决不受无理之干涉。”陈炯明再次图谋谋害孙中山，派人在永丰舰下布下水雷，幸好潮水退落，永丰舰刚刚掉转船头，未造成伤亡。

陈炯明一计不成，又设一计，他派人在江门装修钢板小轮船32艘，招募敢死队300名，偷袭舰队。又计划购买孙中山舰队士兵，发炮轰击沙面租界，造成纠纷，嫁祸于孙中山。

孙中山曾在陈炯明叛乱的第3天电令李烈钧、许崇清等北伐军回师广东，讨平叛逆。

6月23日，北伐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回粤靖难。26日，粤军第二军、滇军、福军之全部及粤军一师回师广东，李烈钧等部留守赣境，以作后援，但是，粤军一师梁鸿楷在回师途中率部擅自脱离队伍。

7月2日，北伐军到达粤境，决定兵分数路向韶关、翁源叛军发起进攻。陈炯明抽调叛军翁式亮、杨坤如等几十营兵力，并利用有利地形，密布铁丝网，构筑防御工事，布置2道防线。

7月10日，双方展开正面交锋。由于叛军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双方鏖战多日，成相持局面。7月17日、18日，北伐军向翁源展开猛烈进攻，叛军虽然死命防守，终究抵挡不住北伐军的锐利攻势。北伐军遂于18日进占翁源城外诸高山，翁源城内4000余叛军退出城外，埋伏在战壕里，当北伐军乘胜攻城时，伏军突起。于是，两军在城外展开血肉相搏战。深夜，北伐军派出飞机在英德附近沙口地方，抛下炸弹。翁源叛军恐后方被包抄，赶紧退却，北伐军占据翁源。是役，双方阵亡不下千人。

陈炯明要求吴佩孚派兵夹击北伐军。吴佩孚调沈鸿英部由湘南配合蔡成勋部，会攻留赣的北伐军。李烈钧部被迫退回粤境。

陈炯明调动叛军多部增援翁源。两军在翁源苦战多日，直到7月26日，叛军锐气渐挫，全线开始向韶关退却。北伐军一直追击逼近马坝车站和韶关车站。不料，投敌的梁鸿楷师于28日赶来，与连续苦战的北伐军作战。北伐军已疲惫不堪，遂退回火山一线，在以后的几天内，继续后退。

8月3日，北伐军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东西两路撤退。许崇清、李福林等部经江西入福建，李烈钧、李明扬、赖世璜等部经湘南进广西，继续讨逆。

8月9日，坚守在白鹅潭的孙中山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他已是孤军无援，决定离粤赴沪。下午3时，他乘英舰“摩轩号”到香港，次日，改坐“俄国皇后号”赴沪。

陈炯明对与孙中山有联系的国民党人，下令“剪草除根”。于是广州叛军，对于民党党员，大行屠杀，凡与民党稍有关系者，格杀无论。李烈钧、

许崇清、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等在广州的居处财产，也被叛军洗劫殆尽。孙中山的家乡香山也遭叛军洗劫。

叛军在香山的残暴凶淫，有史未见。

8月15日，陈炯明由惠州回到广州，僭任粤军总司令。

8月18日，何香凝来到白云山找陈炯明，要他释放廖仲恺，并说：“仲恺有什么对不起你？你们说仲恺帮孙先生筹款，难道仲恺没有帮助过你吗？你在漳州两年多，帮助你的不是仲恺吗？”陈炯明考虑到贸然公开杀害廖仲恺，于己不利，便下手令释放廖仲恺。

何香凝估计陈炯明要派人暗杀廖仲恺，动员廖仲恺立即离开广州。19日凌晨3时，廖仲恺同何香凝坐小船到白鹅潭，再转大轮赴香港，然后赴上海。

上午10时，陈炯明派士兵去抓廖仲恺，结果扑了个空。

退往上海的孙中山发表讨伐陈炯明的宣言，历数陈炯明的罪行。为了集中力量消灭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决定利用直系与皖系的矛盾，与皖系合作，利用段祺瑞的势力驱逐投直的福建军阀李厚基。

10月，孙中山将驻扎福建的北伐军改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清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黄大伟、李福林为第1、3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讨贼军在驻闽皖军王永泉的配合下，多次打败了李厚基及增援的直军唐谟部，迅速占领了福州，并计划取道闽南进攻潮汕。

孙中山又派邹鲁以特派员名义驻香港，负责策划与驻广西的滇、桂军及驻西江的粤军联系，组织滇、桂、粤军联合的西路讨贼军，东下讨贼。林直勉、邓泽如、廖湘芸等，也奉命入桂，进行策反工作。

陈炯明对孙中山无日不在戒备之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的讨贼军，派叛军尹骥、李云复、黄风伦、翁式亮、钟景棠各部，配合直军进攻北伐军。叛军在闽南肆意抢劫财物，污辱妇女，被暴军强奸致死的良家妇女，竟以数百计，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崇清讨贼军迅速地击溃了叛军，叛军溃退潮汕。人怨甚深的李厚基和直军，同样在惨败之余，退出闽境。

陈炯明把广西方面交给桂军名将林虎，指令桂军第1师刘震寰部和粤军四师归林虎管辖。刘震寰久想取得广西总司令的地位，因而对陈炯明不满，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香港同邹鲁密谈，表示加入讨陈队伍，孙中山委任刘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最有势力的沈鸿英部，也不满于陈炯明扶植林虎的作法。孙中山通过岑春煊的关系，将沈鸿英争取过来，委任他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中山又把滇军张开儒部争取过来，委任掌握实权的张开儒部将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

12月26日，受孙中山委任的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及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等各派代表，在广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会商讨陈战略和合作问题。

白马会盟后，讨贼军迅速向陈军发起进攻。驻守梧州的粤军中级军官莫雄、陈济棠、邓演达等，早与西路讨贼军秘密联系，约定与讨贼军里应外合，因此，讨贼军未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梧州。尔后西路讨贼军兵分3路，长驱直入，挺进粤境。

陈军兵败如山倒。1923年1月14日，陈军1师师长梁鸿楷、3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次日，洪兆麟在汕头宣布脱离陈炯明，拥护孙中山回粤。

陈炯明只好于1月15日通电下野，率叶举、熊略等残部，败退惠州。

次日，西路讨贼军进入广州。20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清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并以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清、魏邦平、邹鲁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

2月15日，孙中山偕同谭延回到广州，3月1日，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以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分别任财政、外交、内务部长，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朱培德为参军长。

孙中山回到广州，没有一时安稳的日子，陈炯明在东江虎视眈眈，已归顺孙中山的桂滇军阀也是靠不住的。4月，桂系军阀沈鸿英重演陈炯明的故伎，他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广东督理一职，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一场新的叛乱开始了。孙中山亲自督战平叛，很快把沈鸿英叛军平定了。沈只身逃往香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炯明乘沈鸿英反叛之机，又来攻击孙中山部。孙中山知道陈炯明不去大患未除，便命各路军队围攻惠州。这一仗，称为东江之战，反反复复，扑朔迷离，东起厦门，西至广州，共打了4个多月，未分胜败。孙中山见陈炯明的势力一时难除，战争给广东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痛苦，若要死战，徒苦军民，便暂且保守地界，休息一阵子。

孙中山感到赶走一个军阀，又来了一个军阀，终不是办法，他接受苏俄代表的建议：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黎元洪上台后，局势不稳，内阁屡变。黎元洪一直是想请南方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阁，以便促成南北统一。他先准备恢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因曹锟、吴佩孚反对，又改为任颜惠庆组阁。由于许多阁员不肯出任，又请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1922年7月下旬，黎想让南方名流唐绍仪组阁，便派人去保定、洛阳分别征求曹锟、吴佩孚的意见。曹、吴分别提出要自己的亲信高凌霨、汪士元、张绍曾、高恩洪为阁员，内阁总理由总统选派。8月15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唐绍仪组阁令。

唐绍仪答允出任内阁总理，但他深知北京政府为直系军阀所左右，各种矛盾相当复杂，他不急于就任，先让亲信卢信入阁，自己北上天津，以探听信息。

唐绍仪欲走马上任。不料，曹、吴提出异议，说唐虽北洋出身，但投向革命党，出卖北洋，唐组阁对北洋不利，公开表示反对。唐绍仪面对直系军阀的干涉，束手无策，只好放弃内阁总理一职，自天津匆匆南返。

王宠惠自觉长期代理内阁总理名不正言不顺，遂于9月14日提出辞职。黎元洪不得不正式任命王宠惠为内阁总理。

直系内部，曹锟与吴佩孚的想法不同。前面说过，吴佩孚与陈炯明携手，计划以黎元洪作为过渡，北倒曹锟，南倒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为正副总统。曹锟的想法，也是让黎元洪为过渡阶梯，然后自己担任总统。曹、吴的出发点不同，分歧也就越来越明显，发生利害冲突。吴反对曹过早地做总统，曹则怕吴威望过高，势力太大，抢了他的总统位子。曹、吴各拉山头，形成两派。因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其弟曹锐以直隶省长驻天津，故称为“津保”派；而吴以副巡阅使驻洛阳，故称“洛阳”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内阁问题，黎元洪在两派之间受夹板气。

王宠惠内阁被人称为“洛派内阁”，因为内阁中的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和忠实亲信，陆军总长

张绍曾 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总理王宠惠和财政总长罗文干明显地站在吴佩孚方面。曹锟大怒，认为吴佩孚在发展个人势力，于是暗使众议院正副院长吴景濂、张伯烈反对“洛派内阁”，王宠惠于 11 月 25 日提出辞职。

黎元洪面对洛派与津保派的争斗，一时被弄得晕头转向，无所措手足，赶忙派人分头去约请靳云鹏、顾维钧、周树模等人暂时代理内阁总理。但这几个，谁也不肯代理，一时间，北京政府成了无政府状态。

11 月 29 日，黎元洪提出由汪大燮组阁。汪声明维持 10 日，10 日期满去职。

黎元洪又提出张绍曾组阁，黎以为张倾向津保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让他组阁也许可以两边都不得罪，可是津保派对张绍曾并不放心，曹锟也希望无人组阁，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以便逼黎元洪下台。于是，张绍曾内阁一时难产。黎元洪只好托外交总长王正廷代理总理，王提出代理期限为 10 日。

1923 年 1 月 4 日，黎元洪总算正式任命了张绍曾内阁。张绍曾一上台，即标榜南北和平统一，这与黎元洪的政治夙愿暗合，但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相冲突。曹锟、吴佩孚要求内阁任命沈鸿英、孙传芳为南方政府控制地盘的广东、福建省督理，张绍曾认为此举有背于和平统一，严加拒绝，并愤然提出辞职，黎元洪极力挽留。

### 第三十章 贿选大总统

曹锟急于谋选总统，他计划推倒张阁，以其私党高凌霨组阁，以便进行大选，若黎元洪不允，则迫其退位。为此，1923 年 5 月，津保派先发动倒阁，张绍曾内阁只好被迫辞职。6 月 8 日，曹锟利用流氓组成的“公民团”，到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

接着，又唆使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组织军警联合会 300 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冯玉祥也带兵入京驱赶黎元洪。

黎元洪一向以暗弱著称，这次却表现得十分强硬。大抵人在经过一次忧患之后，再遇到同类困境，总要比前次胆大，以为事情不过如此。他致电曹、吴说：“本日又有军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二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弟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

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喙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此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而军警、公民团仍包围黎元洪住宅不散。黎元洪知大势已去，无可恋栈，便同幕僚策划辞职赴津。此时，黎元洪又接到报告，谓王怀庆和冯玉祥下午 2 时将率兵到东厂胡同，强使总统下台，否则将发生莫大危险。黎元洪听罢，决定立即出京去天津。

6 月 13 日 13 时 20 分，黎元洪身着青色西服，在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以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等 10 余人的陪同下，由荷枪实弹的总统府亲信卫队保护，从东厂胡同坐自用汽车开往东车站。政界要人、社会名流顾维钧、颜惠庆等人闻讯后赴车站，为黎



送行。

曹锟得报黎元洪携印去天津，即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留黎所乘专车，索取印信。王立即率天津警务处长杨以德等人，派出全副武装军警数千人，将黎的专车截拦在天津北站，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黎元洪预定将火车开到天津东站，以便就近下车回宅邸。

王承斌登上黎元洪的专车，道：“总统既出京，印信已无用处，何以携来天津？”黎答：“印在北京，并未携来。”王承斌不信，与之争辩良久。黎元洪怒气冲冲地对王说：“看尔等将我怎么处置，我决不能将印信交给尔等。”王承斌回敬道：“总统既不交印，请仍回北京！”黎之长子绍基急忙赶赴北站探视其父，但被军警阻止，不让会见，黎元洪得此信息，一时愤极，欲举枪自杀，而为其左右劝止。

黎元洪被逼无奈，乃据实说明总统印玺由秘书随眷属携往北京法国医院，并挂电话通知其夫人危文绣将印信交与国会。

曹锟的津保派爪牙将大小 15 颗总统印玺索回，又逼令黎元洪签名发表辞职通电。

驱逐黎元洪后，曹锟要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京，选举无法进行。

津保派政客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但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他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的意见。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即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折衷磋商，采取 3 项措施。

- (1) 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
- (2) 充实内阁阵容。
- (3) 设法吸引议员回京。

对于第 1 项，曹锟通过孙洪伊拉拢孙中山。孙中山不但不上钩，反而历举直系军阀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事实。一些国民党大骂孙洪伊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曾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向曹锟建议迎孙北上主政。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通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

曹锟诱惑奉皖的阴谋，也未得逞。

对于第 2 项，津保派决定由高凌霨主持摄政内阁。这一做法虽然遭到不少人反对，但终于组织了个残缺不全的内阁。

对于第 3 项，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以转移目标，骗诱离京议员回京。曹锟急于要上台过总统的瘾，对此大为不满，经吴解释，才同意。

吴景濂摆的“先宪后选”的迷魂阵，不少离京议员将信将疑，有的根本反对。为了加强欺骗作用，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为曹锟拟好了一份电报，但曹锟拒绝签发，经吴景濂一再解释，并将“本人无意竞选总统”一句，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争”，曹才勉强同意。

吴景濂的另一“锦囊妙计”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可是曹锟是个著名的吝啬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钞，这笔款必须另筹。于是，津保派责成各省摊派，但也所筹无几。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了个“捉财神”的办法；

逮捕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令其余人等缴纳数千到数万元予以释放。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 170 个县，每县筹借 1 万元到 3 万元。

筹足贿选经费后，曹锟便设立竞选班子，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大选的机关，规定在京议员有出席费，每月有 600 元油水，而在沪议员每月只有 300 元。这种收买议员的政策却有效果，回京的议员络绎不绝。

曹的竞选班子在讨论大选问题时，规定每张票价 5000 元，但他们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不付款。

王承斌最后提出解决办法；在选举前发给每票 5000 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支票兑现。

9 月中旬，保定传下话来，“老师”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总统选举预备会召开，出席者 431 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 436 人，会议才达到法定人数。

9 月 23 日，在京议员已 600 余人，至此，大选问题人款两足。此时，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以及奉、皖和西南各省军阀，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

10 月 1 日，甘石桥大选机关发出支票 573 张，除普通票每张 5000 元外，还有 1 万元及 1 万元以上的特殊票。

直系公开贿选总统，铜臭熏天，通国皆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霨、吴景濂等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直系在铁证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不得不往上海避难。

大选定在 10 月 5 日。4 日晚，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门前停放汽车几百辆。

拆台派在六国饭店设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 8000 元，共收买 40 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失败。在这 40 人中，还发现有人两边都拿了钱。

5 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到宣外大街，布置了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逡巡。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准通过。无论国会议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搜身，女宾由女侦探搜查。

原规定 10 时开选，但到了 11 时 40 分签到者不过 400 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遂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甘石桥派出汽车 180 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 5000 元支票。一直到下午 1 时 20 分，签到者有 593 人，才摇铃开会投票，曹锟以 480 票当选。

10 月 10 日，曹锟到北京就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奉皖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各城市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曹示威游行。

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之后，一方面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为了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有张国焘、邓中夏等

人，在劳动组合书记处工作的还有包惠僧、李启汉等人，机关设在上海。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方组织是分部。在北京设立的北方分部，负责人是罗章龙、王尽美等。北方分部向各条铁路、重要厂矿和城市派遣了特派员；武汉分部的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项英以及陈潭秋等。武汉分部的工作重点是京汉路的两岸车站，先后派到那里的有项英、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施洋等；湖南分部的负责人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也曾在湖南分部工作过，后到安源路矿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广东分部负责人是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2个城市的173人，他们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京汉铁路工会代表邓中夏，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陈炳生、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代表朱宝庭，广东机器工会代表黄焕庭等。大会通过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

《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以及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即刻联合起来，组成坚固的紧密的阵线，与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之后，劳动书记部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并拟定了劳动立法4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作为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全国各地普遍掀起罢工运动。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便公开地领导着工人运动。

李大钊除了领导北方党的活动外，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党中央决定让他多进行公开的活动。为此，李大钊辞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职，改任校长室秘书。这样，他便有了空闲时间到处讲演、发表文章，在许多高等学校兼课，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名声大振。

一日，李大钊旧时天津同窗好友白坚武手持吴佩孚的亲笔信，直奔李大钊的住宅。

白坚武已成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腹谋士，吴佩孚想借用李大钊的声望，达到他位居洛阳遥控中央政权的目的。白坚武见到李大钊，便追述同窗之谊，畅谈别后的经历。李大钊从白坚武的谈吐中，感到和这位同窗好友已没有共同语言了，从而内心生起厌恶的感情。白坚武取出吴佩孚的亲笔信，笑着道：“守常兄，弟此次进京，专为迎候兄南下洛阳。”白坚武走后，李大钊独自一人在室内缓缓踱步，思考是否去洛阳的问题。吴佩孚曾利用五四运动，摧毁了亲日的皖系军阀。吴佩孚伪装同情劳工，蒙蔽了不少工人、农民。

在直奉战争中，他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把奉军赶出关外，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御用内阁。目前吴佩孚在洛阳手握兵权，遥控北京，以华北为基地，称雄平原，进而武力统一全国。李大钊分析了吴佩孚邀他去洛阳的真实目的，认为吴佩孚企图借助革命潮流，达到他统一全国的目的。吴既然伪装进步，必然做出进步姿态，不如将计就计，去洛阳与他会谈，为劳工争得一些福利。他决定去洛阳。

李大钊去洛阳之前，召集北京党组织会议，征求党内对他去洛阳与吴佩孚会谈问题的意见，邓中夏、何孟雄赞同李大钊去洛阳；张国焘反对说：“我们党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打倒军阀。像大钊同志这样有威望的共产党人，去洛阳见吴佩孚，必然会有毁于党的声誉！”李大钊解释说：“我去洛阳，一是利用吴佩孚拥护劳工的假象，达到保护劳工、深入开展工人运

动的目的；二是利用直系军阀和亲日派交通系的矛盾，把我们的同志派到铁路上去，以铁路工人运动为先导，更加广泛地开展全国的工人运动。”张国焘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决定南下洛阳。白坚武喜出望外，立即把李大钊请进了高级包厢，急驰洛阳。在洛阳火车站，吴佩孚已派专用汽车迎候，把李大钊迎送到迎宾馆，住进豪华的下榻处。

当天晚上，吴佩孚在白坚武的陪同下来见李大钊。李大钊以不变应万变的决心，和吴佩孚会谈，终于达成了一项包括保护劳工的4大政治主张的联合声明。

吴佩孚深知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雄厚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是铁路上的新兴势力，他想利用共产党，打着“保护劳工”的招牌，要清除交通系，把铁路的大权稳操在自己手里。他希望李大钊同他合作，要李大钊派出密查员，赴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铁路干线，调查亲日派交通系贪赃枉法的罪行。吴佩孚通过白坚武同李大钊具体商谈派密查员的问题。

李大钊考虑到派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即交通部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主要铁路干线上，对工人运动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但是，交通系苦心经营数十年，在铁路上的关系盘根错节，派出的同志一旦和交通系人物发生纠葛，安全便成了问题。白坚武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包在我的身上！”于是，李大钊便介绍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包惠僧、袁子贞等6名共产党员去担任密查员。交通部分派张昆弟在津浦路，何孟雄在京绥路，包惠僧在京汉路，安体诚在京奉路，陈为人在正太路，袁子贞在陇海路。

这些密查员在交通部接受调查交通系骨干人物活动的任务，每人领取百元以上的薪水，除生活费外，其余交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而他们实际却是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人运动的秘密特派员。密查员可以免费来往坐车不花经费。交通部虽然有6位密查员的名字，但出发各路可以换别的人。共产党员有密查员作护符，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他们不仅不怕铁路上的任何人，而且使人怕他们。不到半年时间，劳动组合书记部在6条铁路上，建立了相当的工人组织，仅京汉铁路沿线，就成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成了工人运动的指挥机关。1922年6月，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和高君宇一起向李大钊报告：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根据工人的迫切要求，向北京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递交了革除欺压工人的火车房总领班郭福祥、电务科段长黄绵绵等5人的职务，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8项要求的呈文。赵继贤一直不予理睬，问题拖了一个多月。李大钊沉思片刻，说道：“待我做些实地调查后再定。”李大钊亲自到长辛店做了实地调查，经过和工人多次座谈，深深地感到北方以组织工会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必须立即转到向反动统治阶级开展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于是，他断然作出决定：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就举行罢工。

8月23日，邓中夏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前往长辛店领导罢工斗争。他在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24日早晨7时起正式罢工，会上通过了罢工宣言，并组织了纠察部和调查部。

24日上午7时，长辛店3000多工人，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等字样。涌向娘娘宫，举行罢工誓师大会。

赵继贤与直系军阀王怀庆密商后，决定立即派兵南下，武力镇压罢工

工人。兵车开到长辛店，工人并不畏缩，一闻兵到，即全队拥列车站，询问来由，并大声长呼：“如是来镇压罢工，请开枪，愿求一死。”兵士见此景象，气为之夺，乃改口说：“恐土匪乘机而起，我们是前来保护诸位工友和长辛店居民的。”工人与兵车对峙约 3 个小时后，兵车奉命开回北京，工人则扬旗游街、示威。

赵继贤见武力镇压不能奏效，只好派代表同工人代表谈判。此时，郑州铁路工人发动了同情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江岸铁路工人也正酝酿同情罢工，南北交通完全中断。京绥、京奉、正太铁路工人，都派代表到达长辛店进行慰问，又有陇海、津浦铁路工人拍来电报声援。

赵继贤害怕罢工风潮扩大到全路，造成更大损失，不得不作出让步。

罢工胜利后，长辛店 3000 多工人召开了庆祝罢工胜利大会。俱乐部在复工后第一辆开往武汉的火车头上，插上上书“庆祝长辛店罢工胜利”的红旗。

以长辛店工人罢工为起点，紧接着，李大钊派王尽美领导了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派邓培领导了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派何孟雄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派张昆弟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罢工，派邓中夏、罗章龙、邓培领导了开滦五矿大罢工；中共北方区委还领导了陇海、津浦、粤汉、京汉等铁路的大罢工，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

工人运动直接打击了军阀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仅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工人每月增加 3 元工资，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 2 万人，每月须多开支工资 6 万元，全年七八十万元。由于京汉铁路是联结北方首都，河南英国厂矿，保定、洛阳军事要地，以及华中政治经济中心武汉之间的交通枢纽，它对吴佩孚以及与铁路关系密切的英国资本家，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他们不容忍京汉铁路工人发动政治运动。为驱逐亲日的交通系曾经暂时支持共产党人的吴佩孚，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像个凶神恶煞似地对白坚武说：“铁路，是我吴某人赖以生存的摇钱树！全线罢工，就等于刨了我的摇钱树，断了我的一半军饷，我向谁诉苦去，这一切都出在保护劳工的政策上。我要收回这个政策，把穷鬼们再关进笼子里去！”白坚武道：“大帅，审时度势是兵家求胜的秘诀，纵观全国大局，采取高压之道，尚不成熟，如果奉系乘机挥师入关怎么办？孙大炮誓师北伐又怎么办？”吴佩孚愕然地睁着大眼，他最怕的还是这两件事。于是，他在公开场合仍然保留着“保护劳工”的幌子，而背地里却积极准备对付工人运动。他下令组织“学兵队”，要他们学习驾驶机车，以便在必要时取代工人。又令南段段长冯沅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群众，竭力抵消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

李大钊在铁路、矿山工人运动胜利的时候，同邓中夏商议，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议，总结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教训，拟定今后斗争的方向。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各铁路干线上的密查员都参加了会议。李大钊听取了汇报后，提出：鉴于罢工风潮多偏于经济斗争，要求各矿山、铁路在今后要组织政治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把罢工运动提到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同时成立各业工会，再联合成立各城市工团联合会，然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

大会，谋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

### 第三十一章 血洗京汉线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草拟了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呈文报告。赵是个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上同意工人成立总工会，并给北段代表以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又将1月18日的星期例假移到2月1日，以方便代表赴郑州开会，暗地里他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吴佩孚此时始看清工人群众的团结，并不只是为加薪及减短做工时间，而还有政治方面的目的，于是，他便抛弃其伪政策，骤然施展其凶残毒辣的手段，禁止工人在郑州集会。吴佩孚看到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于是，他下令驻郑州的第14师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于1月28日到总工会筹备会，声称奉吴佩孚命令，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备会感到意外，说明召开成立大会，已经路局允许，军事当局不应无故干涉。

1月30日，吴佩孚电召工人代表赴洛阳去见他。筹备会派杨德甫、李震瀛、凌楚藩、史文彬、李焕章5人前往洛阳交涉。他们当日赶到洛阳，吴佩孚避而不见。

次日，吴佩孚会见代表，狡猾地说道：“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的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代表们提出，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保护劳工”的通电是吴的政治主张，不应出尔反尔；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局局长同意，各地代表已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

吴佩孚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冷笑几声，扬长而去。

入夜，身着戎装的吴佩孚在官邸召见谋士白坚武。他嘴上两撇八字胡修得整整齐齐，厚厚的下嘴唇微微颤动，背着手在室内缓缓踱步，听白坚武讲述着各方情报。他突然收住步，摆出儒将的风度，不慌不忙地问：“罢工风潮，越闹越大，京汉路成立总工会，乃是得寸进尺之举，依你之见，如何是好？”白坚武道：“必要时就开杀戒！”“好！只要我吴某人说句话，京汉铁路就得变个样！”白坚武又道：“兵家之道，先礼后兵。只要能化干戈为玉帛，就不要轻开杀戒。这样可以免得被孙大炮借此做文章。”“何为先礼？”吴佩孚诧异地问道。

“今夜，我差人进京，向李守常转达大帅此意，并晓以利害。解铃还是系铃人，希望守常能出面斡旋，平息这次风潮。”“假如他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呢？”“大帅就血染京汉线！”白坚武派往北京的说客，带上礼品去见李大钊，转告白坚武的话：“希望京汉线上的工人不要成立总工会，否则，吴大帅就要武力解决。白坚武不愿发生军人和工人冲突的不幸事件，他思之良久，无能为力，认为只有你才能避免这场流血事件！”李大钊听完说客的话，站起身来，愤然地说：“请坚武转告他的吴大帅，我李大钊没有这样的权利，请他们去问京汉线上的几万名工人吧！”李大钊令说客带回礼物，回去报告白坚武，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此时来到郑州的代表有京汉路代表 65 人，京奉、津浦、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来宾 60 余人，武汉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武汉电话工会等 30 余团体来宾 130 余人，北京、武汉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人士 30 余人，总计到会人数近 300 人。

31 日晚，赴洛阳人员向云集在郑州的代表们报告了与吴佩孚交涉经过。在讨论对策时，有 3 种意见：杨德甫等人认为：成立大会的节目变少点，时间缩短点，早开早散，以便息事宁人；凌楚藩等人主张：不如改期开会，再派代表分别去请愿和交涉；项英等人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那些人是压迫我们的人，是我们解放的障碍，如果成立工会要他们批准，那只有不开了。因此，要坚持斗争，如期开会，项英大声疾呼：“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与会代表群情激昂，一致同意项英等人的意见，坚决主张向军阀进行斗争，当场议决次日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如期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2 月 1 日清晨，驻郑州第 14 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鄂、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根据吴佩孚的电令，在郑州城内外紧急戒严，郑州城内沿街布置军警，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如临大敌。

代表和来宾们毫不畏惧，都说：“必须开会，不为武力所屈。”上午 8 时，各路各站工人代表和各铁路各地区工团代表齐集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队伍以军乐队为前导，手持各地所赠匾、贺联的青年工人随行。代表手持红旗，与来宾们在军乐和口号声中，顺序前进，气魄雄伟。郑州铁路工人也向会场聚集。

队伍行至会场不远的钱塘里时，被军警拦住，举枪恐吓，阻止前进。全体代表鹄立街心约 2 个小时，群情激愤，奋勇拚死冲破防线，蜂拥至会场，破门而入。会议主席宣布组织宗旨，遂群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会场周围已被武装军警包围。与会代表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

黄殿辰赶到会场，限令大会于 5 分钟内自行解散，否则以军法从事。工人们纷纷怒斥，仍坚持开会。下午 4 时，宣布散会，代表们始冲出重围。

当天下午，军警们又包围了代表及来宾所住各旅馆，不许工人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预订的饭菜，不准开售。代表及来宾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

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尽被摔毁，弃置道旁。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计物，捣毁一空。工人问兵士何以如此强暴？兵士回道：“是奉大帅命令……。”工人代表及来宾无不愿舍死拼

护神圣之总工会，奋力争夺获而复失之自由，虽死亦无余恨。当日晚上，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并发布罢工决议说：“此次横遭压迫，不仅我京汉工人的奇耻大辱，实我劳动阶级全体的奇耻大辱，我们为抗争人格与自由起见，谨决于4日午刻宣布京汉全路总同盟罢工；……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总工会决定移江岸办公，并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推选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杨德甫，副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总干事项英；郑州罢工负责人高彬、姜海士，江岸罢工负责人林祥谦、曾玉良，长辛店罢工负责人吴汝铭、史文彬；传达罢工命令负责人彭占元。

总工会为保证代表的安全，作出决定，各地代表从速离开郑州。各地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他们说道：“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助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2月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工人本着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于是，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月4日，遵照总工会规定的罢工时间；郑州从上午9时起，江岸从10时起，长辛店从11时起，先后宣布罢工。京汉铁路长达2000多里的所有客车、货车、军车、桥梁、工厂、道棚一律停止工作。

2月5日，郑州的靳云鹗逮捕了郑州分会的高彬、姜海士等5人，施以重刑，强迫他们下令复工。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吴佩孚从保定、琉璃河方面调集军队，包围长辛店，沿路布满岗哨，禁止工人走动。

工人们仍冒险示威，并向军队散发传单，向军队士兵说明：“兵士、警察和工人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相帮助，不应该进行残害。”兵士们听了，均为之感动。

湖北督军肖耀南和参谋长张厚生调集军队包围江岸工会机关，威胁工会交出京汉路总工会和江岸分会负责人杨德甫、林祥谦、罗海澄、朱兰田、张廉光等人，工人以强硬态度严词拒绝。张厚生又调集军队占领车站机厂，在工人家中捕去火车司机2人，强迫开车。江岸分会闻讯，即派纠察团救援，约2000余工人，冲开军警防线，将2工友夺回。肖耀南、张厚生又派军警逮捕了纠察团的几名工人，扬言要把他们枪毙、斩首。数千名工人根本不怕威胁，坚决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几个被捕工人终于获释。

2月6日，因总工会没有掌握电讯机关，断绝了与各地分会的联系，斗争形势开始对工人不利。赵继贤在长辛店指挥全副武装军警挨户搜查工人住宅，匿住在工人家中的分会委员和工人史文彬、洪尹福、吴汝铭、陈励茂、吴珍、李玉、吴春雪、康定新、张宝和、高顺田等11人被捕走。时值寒冬，被捕的11人，都被剥去衣履，送往旅部，准备次日天明解往保定。

靳云鹗在郑州，将前一天捕去的高彬、姜海士等5人，押至郑州车站，剥去上身衣服，绑在电杆上。天气寒冷，积雪半尺厚，军阀企图强迫高、姜等人屈服。但高、姜等人斗志昂扬，毫不动摇，高声责骂。工人和居民，深受感动，泪落不止。

李大钊以南下讲演为名，来到武汉，秘密地领导罢工斗争。他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以及江岸分会领导人施洋、林祥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京汉路总工会，于2月6日在江岸举行盛



大集会，有 1 万多人参加，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等人相继发表演说，言词感人，群众纷纷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2 月 7 日，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开始血腥屠杀。

7 日黎明，长辛店 3000 多名工人为了营救被捕的工友，在纠察队长葛树贵、副队长郭连登的带领下，扛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的大旗，奔赴第 14 混成旅旅部示威。工人们愤怒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第 14 混成旅旅长命令军警向工人冲杀，一时弹如雨下，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队践踏。

可怜数千工人，中弹者纷纷倒地。葛树贵等 5 人当场牺牲，重伤 30 余人，被捕 30 余人。军警屠杀工人以后，又闯进工人住宅进行抢劫。

在武汉，肖耀南命张厚生率领 2 营全副武装的兵士，分 3 路包围江岸总工会，并向守卫在总工会门前的数百名工人开枪射击，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 32 人牺牲，伤者 200 余人，江岸分会委员、共产党员林祥谦等 60 余人被捕。反动军队在进行屠杀之后，又进行了疯狂的抢劫。工人聚居的福建路一夜间连劫 3 次，官兵惨无人道地殴打、强奸工人的妻女，工人家中所有衣物被劫掠一空。

林祥谦等被捆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张厚生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威武不屈，严词拒绝，张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祥谦抗声回答：“不上！”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张复命砍一刀，林鲜血溅地，晕了过去，醒来时，张狞笑道：“现在怎么样？”林祥谦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张大怒，立命枭首示众。林祥谦慷慨就义。

当晚，肖耀南奉吴佩孚之命，非法逮捕了“二七”斗争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施洋。

施是律师，1920 年他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多年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抨击军阀暴行，深得工人群众信仰，被武汉工团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肖耀南加以“煽动工潮”的罪名，于 2 月 15 日晨 6 时，将施洋杀害于武昌。施洋就义前，军法吏问他家庭方面的遗命，他说：“无产阶级便是我的家庭。”身中 3 弹，犹引吭 3 呼“劳工万岁！”吴佩孚下令逮捕在武汉的李大钊，当地党组织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把他转移到较为隐蔽的旅馆。

“二七”惨案后，党组织派人通知李大钊，要他尽快离开武汉，绝对不能落到军阀的手里。李大钊刚刚离开旅馆，10 多名军警乘坐警车嘶叫而来，结果捕了个空。

李大钊回到北京之后，于 3 月 20 日组织 5000 多人示威游行，在总统府前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之后，又经广州等地于 1922 年 3 月 29 日回到上海。马林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提出发，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陈独秀等反对，在 4 月 6 日给维经斯基写信说：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

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 6 条意见为荷。

马林的建议被中共拒绝后，于 4 月 24 日离沪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马林在报告中叙述了他在中国南方考察的情况，认为国民党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

马林的报告显然有许多不妥之处，完全忽视了国民党里还有军阀和官僚这一重要事实，国民党是个成员复杂的松散团体，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过高地评价了国民党。

马林对共产党提出了不切实的批评和要求，指斥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甚至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

马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于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作出指示。

在马林对中国南方考察之际，中共收到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选派代表参加会议的通知。中共中央立即分派包惠僧赴广东、周佛海赴长江一带、刘仁静到北方各主要城市物色，选派代表赴会。

代表们分别从上海、北京、汉口、广州、唐山等地秘密出发，经山海关、奉天、哈尔滨，由满州里越过边界，历经艰险，到达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聚齐后，乘专列到达莫斯科。

1922 年元月 21 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外蒙古的代表共 178 人。中国代表团共 39 人，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国民党的代表、工人代表、学生和文化团体代表，妇女代表、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妇女代表是黄碧魂。共产党的代表还有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等 14 人。大会贯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号召“全世界远东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

在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处的会客室内，列宁亲切地接见他们，在愉快

的气氛中，张秋白请列宁对中国革命予以指教。列宁回答说，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

列宁在谈话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革命中的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他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回答：“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列宁转而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并希望张国焘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

中国共产党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

列宁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告辞时，列宁紧紧握着邓培的手，勉励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明了大会确定的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中国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人民长期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具有光荣的反帝斗争传统，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

## 第三十二章 中山越飞宣言

4月底5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在广州的党、团负责干部，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党对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以及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时。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谭平山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陈独秀报告了劳动和青年两个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在讨论党对孙中山同陈炯明的矛盾的态度问题时，引起热烈的争论，林伯渠主张支持孙中山。林伯渠是当时兼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党籍的人，1919年10月他协助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1月，他经好友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加入共产党后，仍协助孙中山工作，因此，他对孙中山比较了解和信任，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

谭平山等人在陈炯明的广东省政府任职，要求支持陈炯明。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认为孙、陈不和，是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人的排挤。

陈独秀在作结论时，主张党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会议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达林发言要求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结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张太雷等也认为，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

必要的。张国焘此时思想有些变化，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人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决议，会议决定会后继续讨论。

会议之后党积极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陈独秀受党的委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经中央批准，发表在《先驱》上。

1922年7月16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共中央局提名或协商确定。中央局提出请李大钊出席会议，李大钊因北大校务繁忙，委托邓中夏和高君宇出席。“二大”代表计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项英、邓中夏、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施存统等12人，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

“二大”正式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决议规定：“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并提出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当地点开一次代表会议，会商建立联合战线问题。

“二大”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关于联合的方式，仍然坚持两党平行联合，不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行联合，因此，国共合作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二大”刚刚闭幕，上海法租界当局又逮捕了陈独秀。这次逮捕陈独秀，与“二大”会议有一定的关系。虽然“二大”接受了“一大”开会期间法国巡捕闯进会场搜查的教训，多次改变会议地点，并少开大会，多开小组会议，敌人暗探没能摸清底细，“二大”会议便已结束。但敌人暗探杨某利用造谣中伤手法，说陈独秀得了俄罗斯的巨款，向陈独秀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陈独秀十分贫困，无钱被敲，只好挺身就捕。

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10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

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

8月18日下午，被关押10天的陈独秀获释出狱。陈独秀出狱不久，便隐蔽起来。

“二大”以后不久，马林在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时，苏俄政府决定派著名的外交家、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访问中国，于是，马林便同越飞一起返回中国，于8月21日到达北京。马林立即从北京转赴上海。

马林从中共中央那里了解到“二大”通过的各项决定后，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的、不能实现的左倾思想。他说，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里去；共产国际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这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

此时，李大钊由北京到达上海，由于他和马林没有参加“二大”，现在

马林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央决定在杭州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8月29日，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翻译张太雷7人，来到杭州西湖。中央特别会议在书记陈独秀主持下开会。马林提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

5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马林的提案，他们说，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马林没有一个支持者，便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用共产国际压制中共中央。致使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于是作出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此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离开广州，住在上海。这次严重的失败，使他陷入极大的苦闷和绝望之中。陈独秀向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负责人张继表示：陈炯明现已背叛革命，共产党即与他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共产党将不因孙先生受到暂时挫折而改变同他合作的立场，反而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广东方面个别党员支持陈炯明的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他重新振作起来。孙中山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伟大的转变。

中共中央致函广州支部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但广州一些共产党人，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央再次去信对他们进行严厉指责，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2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着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陈独秀、李大钊的这3位学生，没有完全执行他们的老师、中央领导人的提示，谭植棠终于被开除出党，陈公博在受到严重警告后，也退出共产党，谭平山则被撤销了广州党的负责人职务。

中央委员蔡和森在共产党的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陈炯明，他说：“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可是现在不但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应与他合作，就是一切民主主义者和全国人民再没有一个可与他合作的。”孙中山在上海经常看《向导》周报，他对蔡和森的文章极感兴趣，特别是对蔡和森不久前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赞叹不已。他反复阅读文章中的那段话：

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30年以来的民国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高涨，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

孙中山此时虽然不认识蔡和森，但他对共产党内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而兴奋不已。

中共杭州西湖特别会议散会之后，李大钊同陈独秀等立即回上海。孙中山曾通过林伯渠传达他迫切希望会见李大钊这位共产党的大理论家，他说：“昔日大钊先生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我相见，提出一是要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要办军官学校，是非常中肯之见。我翻阅了不少时人的论著，尤其对大钊先生的政见颇感兴趣，并迫切和他面谈。”现在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会见孙中山的时机完全成熟，他们一回到上海，立即通知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党员的林伯渠，安排李大钊同孙中山会面。

林伯渠接到指示后，戴着一副博士眼镜走进孙中山的住宅，微笑着对他说道：“仲甫先生通知我，说守常先生来到上海。问您何时安排和他见面？”孙中山激动地说：“你立即坐上我的轿车去把李先生请来。”孙中山平时很少坐那辆华侨赠送给他的黑色轿车。现在让司机开车，请林伯渠一同去陈独秀住所迎接李大钊。

李大钊在林伯渠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将李大钊迎进楼上的小会客厅，让李大钊坐下，便说：“久闻守常先生大名，今日请你到寒舍来，就国事问题向您请教。”“先生乃革命元勋！你的功德已载入史册，所倡导三民主义逐渐深入人心，既然承蒙先生的厚爱，我自当推心置腹。”李大钊谦诚地回道。

“我为复兴中华民国，奔波已有 30 余载，路途坎坷，险滩百座，至今未达目的。今天，很想听听大钊先生高见。”李大钊简单地分析了全国军阀割据，祖国不能统一之后，旋即说：“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主张。欲达革命胜利之目的，首先要建立一个有坚实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其次在采取革命手段上，必须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深沉地说：“先生所见，洞若观火，也击中我的心病，快翔实地谈谈。”李大钊直言道：“政党是执行革命任务的中坚力量，纵观先生组建国民党的历史，及其成分，不能充当此任！容我直言：在民国成立前，先生的党曾领导了辛亥革命，表现出一个向上发展时期革命党的朝气。但是由于这个党本身的弱点，当时也无法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辛亥革命后，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一再受挫，而一批官僚、政客和军阀混入了国民党，原来的党员也有发生蜕变的。不少人入党只是为做官发财，无视党纪，组织系统形同虚设，几乎是一盘散沙……”李大钊侃侃而谈，孙中山觉得不无道理，迫不及待地问：“守常先生对本党的弊病看得如此清楚，谅必也有医治之良方？”李大钊说：“孙先生的国民党必须经过彻底改造。没有这个改造，国民党不仅不可能继续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而且本身也会因为内部的各种腐败因素的膨胀而死亡。”“我未尝不想迅速改变自己领导的党的这种状况。早在 1914 年，我在日本东京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 年，我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了规约 32 条，还创办了《建设》杂志，其目的都是想振奋本党的革命精神。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产生过效果。”“孙先生依靠的依然是国民党的那批旧人，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也不十分明确。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国民党要担当革命任务，必须要加进新的血液。”孙中山对这一新的提法，很感兴趣：“何谓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国民党要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孙中山望着李大钊问：“联合共产党？”“对，联合共产党。”李大钊接着谈了中共“二大”和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关于建立

国共联合战线的意见。

孙中山走过来，热忱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守常先生，我诚恳地希望您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不瞒您说，国民党内像您这样的人才，我一个也没有发现。”“我是个教书的，承蒙孙先生器重，我愿以共产党人的立场，与孙先生合作，共同革命。”李大钊有些激动地说。

孙中山顿时非常高兴，道：“好！守常先生，我现在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身分，邀请您加入本党。”“谢谢孙先生！不过，我已经是第三国际的一名共产党员了，党籍是不能脱掉的。”“这不打紧，您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来实现中国革命大业，我们携手合作，并肩奋斗。”李大钊严肃地说：“我感谢孙先生的信任，但不知加入国民党需要履行什么手续？”“手续简单，由我主盟，你的同乡张继作介绍，填写一张入党志愿书就行了！”“好吧。我同意加入先生的国民党，做一名跨党的国民党党员。”于是，李大钊当即便加入了国民党。

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俞秀松等等也相继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常在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他们有时连续数小时，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马林也以苏联特使越飞的代表身份多次访问孙中山，同他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并研究中苏合作的具体方式。孙中山欢迎苏联对他的帮助，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不但积极采取联合苏俄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步伐。

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党员张继等53人开会，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座谈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在会上解释了联俄联共的政策，与会者一致赞成国民党的改组计划。

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芬、覃振、陈独秀、陈树人、茅祖权、张秋白、田桐、吕志伊、管鹏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工作，起草委员会拟定了国民党的党纲和总章草案，经过孙中山修正定稿。

11月15日和12月16日，孙中山连续两次召集有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议草拟的党纲、党章和由胡汉民、汪精卫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于1923年元旦正式发表。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国民党总部又召集在沪党员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召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

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其力量不但及于国内，并且推及国外。

会议根据孙中山的要求，推荐了改进后的党中央干部人员，共产党人陈独秀被委任为参议，林伯渠被委任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担任宣传部干事。

陈独秀正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同刘仁静等一起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1月8日到达莫斯科。会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发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指责。他警告中国同志：“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

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拉狄克的指责不符合实际，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十分注意工人运动。

拉狄克的发言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意见，来自在中国活动的马林。

马林和越飞联合起草了《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的提纲，由马林带往莫斯科向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他们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使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苏俄的帮助只能给予国民党。

苏共理论家布哈林根据马林和越飞的报告起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经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布哈林起草的这个《决议》接受了马林和越飞的大部分意见，但强调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很不彻底地纠正了马林、越飞等人的某些错误。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之后，同翟秋白一起回国，1923年1月10日抵达北京，2月20日回到上海。

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同上海的孙中山的代表，互相访问和交换书信。孙中山曾派张继去会见越飞。经过张继的联系，1923年1月17日，越飞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去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孙中山会面，倾谈颇久。此后，双方经过几次会谈，于1月26日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1月27日，越飞即以疗养为名，乘轮渡日。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



双方在日本热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 第三十三章 蒋介石出山

中共中央虽然尊重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而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组织，却十分怀疑。直到1923年初，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变。这年2月，北京地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

因而不愿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设立大本营。1923年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马林说：“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现在就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是一种梦想，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中去”的口号。

陈独秀在报告中，在批评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自己很容易激动。他说中共中央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

张国焘不同意马林和陈独秀的意见，他说：“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它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而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

马林则坚持：“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认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即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性？他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的党员，和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人运动职务的党员，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做实际工作。

张国焘还声称：“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工人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马林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是考虑到可用这种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阶级利益，才去加入的。既然共产党人可以跨党，为什么工人、商人就该在国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凭这个策略，我们能取胜。”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各有偏颇。于是，与会者的多数，既反对张国焘等人的左倾观点，又不全盘接受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

毛泽东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的局面。

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代表中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最后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以 21 票赞成、16 票反对被通过。

《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旧保存共产党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共产党组织，谨严党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党革命之需要。

由于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时，他落选了。会议选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等 5 人为候

补委员。

共产党再次作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对国共合作是个很大的促进。

再说越飞和廖仲恺在日本热海会谈。越飞说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这话使廖仲恺放心去做三民主义者。要做好三民主义者，必须交个好朋友，共产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的好朋友。

越飞还告诉廖仲恺说：“以往中国的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

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廖仲恺甚以为然。经过会谈，廖仲恺与越飞达成协议，苏联政府每年向国民党提供 200 万元的援助，其中 70 万元是军官学校的费用。苏联将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并参照托洛茨基所订立的红军制度，拟定一项创设军官学校的计划。

廖仲恺由日本回国后，即大力协助孙中山做联俄的工作。孙中山和苏俄的关系日深一日。马林同孙中山保持每周会面三四次。5 月初，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表示准备给中国必要的帮助，即派第一批军事顾问 5 人，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克尔带领来到中国。

孙中山决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革命经验。团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代表团在苏联 3 个月。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拜会了托洛茨基以及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总司令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等。还考察了红军的训练情况，参观了一些军事学校，访问了一些工矿企业。

在代表团访问苏联之际，孙中山决定创办军官学校，军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命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恺负责军校筹备工作。当时广东各实力派人物，看到军校校长是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不同意由蒋介石担任校长。孙中山当即表示：“新办的军校，如果不叫蒋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孙中山视蒋介石为“如身之臂，如骖之靳”。他说蒋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蒋介石乃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其父蒋肃庵在溪口镇上开设玉泰盐铺，经营盐、酒、石灰为主，有薄田 30 余亩，是一户中产人家。蒋肃庵前后娶过妻室 3 位，元配徐氏、继配孙氏、再继配王氏，蒋介石为王氏所生。王氏名叫王采玉，与蒋介石的父亲结婚是第二次嫁人。原来嫁给溪口曹家姓俞的，那姓俞的 36 岁去世后，王采玉回到娘家居住，曾在葛溪一个庵里守节，后经在蒋肃庵店铺任帐房的堂兄王贤栋的介绍，再嫁给了丧妻的蒋肃庵。蒋肃庵 1895 年死于时疫，当时蒋介石只有 8 岁。

王采玉在其夫病死后，茹痛抚孤，勤劳特甚，1921 年，王采玉因患心脏病而死。蒋介石是个孝子，他将其母葬在白崖鱼鳞埭中塋。孙中山为其写了祭文，并在坟墓的墓碑上手书“蒋母之墓”。张静江为其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是“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蒋介石写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蒋介石前后娶过妻室 4 位。第一个妻子叫毛福美，1901 年同蒋介石结

婚。她比蒋介石大 5 岁，给蒋介石生了个儿子蒋经国。1913 年蒋介石娶姚冶诚为侧室，姚氏生了蒋纬国。

但也有一种说法，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由姚氏抚养大的。蒋介石的第三个妻子叫陈洁如。陈氏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的第四个妻子是宋美龄。蒋同宋结婚时在上海报纸登了结婚照片，写着“中美合作”，即蒋正中的“中”字，和宋美龄的“美”字。

蒋介石从小读过一些古书，16 岁时考过秀才，未中。17 岁到奉化城里进凤麓学堂，以后又到箭金学堂，19 岁转入龙津中学读书。20 岁这年，曾赴日本学习，未能如愿。返国后不久考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次年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蒋在振武学堂学习期间，曾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1910 年，24 岁的蒋介石离开振武学堂以后，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潟县高田田野炮兵第 13 师团第 19 联队充当二等兵，以后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蒋介石平常很少讲话，但他是留学生。

1907 年，蒋介石同陈其美一见如故，即与订交。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入同盟会，并引他见了孙中山。

1911 年夏，蒋介石接到已经回到上海的陈其美的电报，托故请假归国。他临行前，曾送给师团长冈外史一块匾，手书“不负师教”4 字。蒋回上海参与陈其美“密商举义计划”，虽然假期不多，他还是参加了营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后因假期结束，返回日本。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电催蒋介石回国。蒋介石再次请假回上海。他回沪后，陈其美多次派他到杭州参加领导起义。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其美派蒋介石为沪军第 5 团团长。

1912 年初，蒋介石受陈其美派遣去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同另一名刺客王竹卿于夜间 2 时许，撬开陶成章的住所的大门而入，守门者觉，询以何为？蒋回道“来看陶先生。”旋登楼，入陶成章卧室，蒋又呼曰：“陶先生！”即出手枪击之，子弹从陶左额入，斜穿胸部，陶成章不明不白地死去。

蒋介石杀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办了《军声》杂志。他在《发刊词》中写道：“本社同人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缪之计者。”1912 年底，蒋介石返回中国，次年 7 月，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劝说下，跟随陈其美在上海开展反袁斗争，躬赴火线，往来指挥。此时，蒋介石已成为陆军少将。

1913 年 9 月，蒋介石赴日本，在黄兴主办的东京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后受陈其美指派赴东北活动。蒋介石又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向孙中山呈上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

1915 年 2 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斗争，派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蒋介石在送陈其美回国时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年 10 月，担任淞沪司令长官的陈其美，要蒋介石回上海参与反袁活动。蒋介石回上海后，协助陈其美从事反袁的军事斗争。1916 年 5 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杀害，蒋介石在祭文中说：“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

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丙午以来，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陈其美死后，富有的古董商和早期革命的财政家张静江（张人杰）很赏识蒋介石，用钱来支援他。于是蒋在黄金交易所大事投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不到1年就发了财。

当时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个国际都市的市场上，从事交易买卖是极冒险的事业，在买卖供求中，充满着赌博、投机、欺骗、诱惑、冒险、凶残等，一人的发财建立在多数人的倾家荡产上。

1917年，张静江和经济非常拮据的蒋介石、戴季陶，共谋生财之道，乃和日本某企业代表协商开办交易所，在上海组织了“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又和浙江同乡虞洽卿等拉拢，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振武学堂相识，此时又走到一起，在饱尝经营的甜酸苦辣中结成了知己，互相间称兄道弟，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称蒋介石为“三伯伯”，这种亲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在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陈果夫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一团，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为今后的权势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原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他对张静江说：“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张静江为蒋介石在交易所认股4股，每股1000元。蒋在交易所里担任了经纪人，其牌号叫“恒泰号”。半年后，蒋介石获得50多万元。

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交易所获利越来越多，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便将股票价格越抬越高。由于交易所得利这么快这么多，搞交易所的人纷纷而起。交易所的价格，时时飞涨，到了1921年夏秋，交易所竟至过盛时期，终于酿成绝大风潮，各交易所先后停闭歇业，蒋介石、戴季陶等也陷于破产，从买空卖空的巅峰上一下子跌落下来。蒋介石欠了一屁股债务。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虞洽卿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仗义援助，给蒋4万多元，年老的张静江给蒋介石还了3万多元的债。

蒋介石虽然做投机生意失败，但他在生意场上交结了张静江、虞洽卿等江浙财团，后来江浙财团扶持蒋介石爬上政治舞台，此是后话。

蒋介石在陈其美死后，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蒋介石写了《对北军作战计划》，10月又写了《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送给孙中山。1918年春，蒋介石南下广州后，参加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这年3月，蒋介石向孙中山呈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7月又呈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由于蒋介石同陈炯明有矛盾，几度辞去军职。而孙中山对蒋介石越来越信任，尤其在军事上，孙中山于1920年10月29日给蒋介石的信说：“执信忽然殒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

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1921年1月12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去电说：“援桂尅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延迟为幸。”3月29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去电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军事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4月之后，孙中山5次致电蒋介石：“速来相助”；“节哀速来，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来商榷”。1922年6月2日和6月16日，孙中山2次致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事紧急盼速来”。6月29日，蒋介石由沪来粤，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2万援军。”孙中山渡过难关，蒋介石著书《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了孙中山从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的各方面活动情况。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又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尽管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并命他为新办的军校校长，但蒋介石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开始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对孙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极态度。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并不立即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却于当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在廖仲恺的一再去电催促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动身去广州。

### 第三十四章 国、共携手

1923年9月，苏联应孙中山的邀请，派出老布尔什维克鲍罗廷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

鲍罗廷由莫斯科来到北京，同李大钊会面后来到上海，同陈独秀探讨国共合作问题后，赴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极力提高鲍的威望，并赋予他广泛的权力，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让他出席所有最重要会议，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孙中山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把鲍罗廷介绍给自己的拥护者，尽力使鲍罗廷在听众心目中享有最大的威望。

鲍罗廷在10月9日的招待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介绍了苏联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鲍罗廷分别同国共两党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倾听了两党领导人的意见后，提出国民党改组的5点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国民党召开了恳亲大会。孙中山又指定林森、谢英伯等人召集国民党广东支部科长以上职员及海内外各总支分部代表，举行党务讨论会，商讨党务之应兴应革事项。

10月1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本部的改组事宜。

戴季陶是个怪人，他大哭一场离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虽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和社会主义的学说还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日益腐朽，亦激起了包括戴季陶在内的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的愤怒，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戴季陶认识到这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力量。加之各种社会新思想的流行，戴季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以他加入到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中来，使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把戴季陶视为同路人，一段时期内，密切交往，结为同志。但是，戴季陶又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歪曲地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流血、屠杀以及国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孙中山还在谋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难能两就，思想上处在无比复杂的矛盾之中。他回到广州，归依在孙中山手下工作。但在广州，也是心猿意马，不能安下心来。不久，就称身体有病，回浙江吴兴休养，把自己的住宅起名“潜园”，过起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来。

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的武力逼迫下从广州回到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从吴兴赶到上海，同孙中山住在一起。

9月，四川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向育仁来到上海，带来了四川各将领向孙中山表示慰问之意的信函，并欢迎戴季陶回四川制定省宪。孙中山把四川的同乡、各党派统统请到自己的公馆里吃饭，说明他要特派戴季陶为代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回四川，劝告川军各将领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资源发展实业，让四川的经济走在全国前头，带动全国的实业发展，完成全国统一之大业。孙中山把这些人召来，目的是扩大戴季陶入川的影响，让国人都来声援这一计划。

戴季陶本来就想回四川一趟，为老母70大寿祝贺，这次他终得良机，为此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他原本是一个好激动的情绪型的人，当他踏上返川的旅途后，过度的兴奋使心力剧衰，本来就是久病未愈，过度劳累，神经衰弱更加严重。

戴季陶在他的秘书陈鸣谦、毛副官、当差以及向育仁的陪同下，登上轮船，逆流而上。戴季陶整日沉闷寡语，情绪不高，沉入对往事的反思之中。从离开上海那一天起，他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过去自己行为的缺点罪恶的影子，通通涌上心头。

来到汉口，上岸作短暂休息。他们刚在旅馆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几日的报纸找来，他翻开《申报》，一眼就看到一条震惊的消息：“杨森在汉厂购步枪2000支，弹50万发。”戴季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森不久前在川战中败退鄂西，现在购枪弹意味着什么？戴季陶正在惊讶之余，向育仁过来告诉他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他在旅馆遇到几个四川同乡，都是川军各帮派的代表，这些人躲到汉口，策划再开四川内战。

戴顿时惊呆了，假使川战重开，整个川省人民又将沦入火与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了母亲和亲人。戴季陶愤怒无比，立即和向育仁去见那些人，苦口婆心地劝他们放弃川战计划，千万不可再播战祸，但那些人根本不理睬。

戴季陶心急如火，他和同伴立即登上招商局的快利船，星夜赶向四川。戴季陶心情坏到极点，苦痛之极，种种魔障缠绕，落到了一切假象当中，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段。再加上他看见四川战祸迫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烟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罪恶，什么政治实业教育问题，决不能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戴季陶陷入了苦闷和胡思乱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同他谈话，他

一句都没听见，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云飘过，他表情麻木，一副痴呆相。早上不起床，甚至连午饭都不吃。

同行的人发现了戴季陶的反常现象，恐怕出事，一步也不敢离开他。向育仁劝他：“大丈夫做人，当光明磊落，可做即做，不作即止。要做就要大刀阔斧去作，不做便放下来，万事通通不要去问他。忧愁烦闷是最无价值的。人非生即死，生死皆有价值，惟独忧愁烦闷，没有一点价值。”这番没疼没痒的话，自然没有说进戴季陶的心坎，他倒是把事业、生命一切都抛在一边，听得明明白白，他只觉得自己万念俱空，仿佛要超然于世，只渴望以死来解脱一切忧愁和烦恼。他强打精神冲向育仁笑笑，便默默不语。向育仁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对戴季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以为戴的情绪好了一些，就离开了他的房间。

戴季陶的主意一定，反觉格外轻松，他整个下午面容一改往日那种愁闷的气色，甚至显得有些激动。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陈鸣谦在舱房里谈天说地，一直到11点多钟才散去。

向、陈回房睡觉。

戴季陶在向育仁离去后，感到心里一阵阵躁动，便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走到船尾，凭栏浴风。偶尔的汽笛声给幽静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诱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舱灯光照亮的翻着的江水似乎给他一种启迪，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召唤着他，他扶持着冰冷的铁栏杆，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江中。

第二天天亮后，向育仁、陈鸣谦发现戴季陶不见了，于是满船寻找，没见一丝踪影。

向育仁分析了戴季陶从上海起程后的精神状态，知道大事不妙，便逐个询问乘客及服务人员，终于有个乘客支支吾吾地说：昨晚看见有人投江，因为信迷信，害怕落水鬼来找他，所以没敢声张，也没告诉任何人就回舱睡了。

向、陈二人听了，如雷灌耳。他们急忙向船上的水手寻问此段江水方面的情况，推测戴季陶投江地段大概在宜都境内。从枝江到沙市，长江渐渐进入平原地区，水流逐趋平缓，素有“九曲回肠”之称的荆江河道，有个大回水湾，凡是上游漂下之物，必定要在这个回水湾浮起，因而俗称“收尸湾”。于是，向育仁等人在宜昌上了岸，向派陈鸣谦以及毛副官、当差等人，沿江面而下，到枝江去寻找戴季陶的尸体，又托宜昌官厅通电沙市团防军警沿途寻访，自己则住在宜昌，一面准备为戴季陶办理后事，一面电告上海、成都、重庆。

戴季陶投江沉下水去，又浮上水来，喝饱了江水。但他冻僵后，不久就遇救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乡民的天井里，有十几个男女围着他，身下垫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身上盖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个老翁喂给他一碗酒，让他暖暖身子，并且在周围烧着稻草为他取暖。

戴季陶心里明白自己被他们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点劲也没有，没说一句话又昏睡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点钟才彻底苏醒过来。救他的是位慈祥可亲的老人，这位老人款待了戴季陶午饭后，把他送到枝江县城一位亲戚家里。老人的亲戚热情接待了身着花缎薄袍的戴季陶，递给他一张像是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红名片。戴季陶便知这位颇有派头的人名叫杨开程，是当地码头颇有势力的当家人。

当晚，戴季陶在杨开程家住下，第二天下午1时，杨开程送戴季陶乘



开往沙市的轮船，突然发现戴季陶的秘书和副官从这艘船上岸，戴忙与他们相见，方得知他们是来寻找他的尸首的，双方不由得惊喜交集。

戴季陶投江自杀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国民党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伤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孙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更是悲痛欲绝。当得到戴被救生还的消息，又惊喜万分，纷纷举怀庆贺。《申报》、《大公报》等国内大报也纷纷连续报道了戴季陶报江自尽继而生还的消息。有的知名人士还为戴季陶写了悼诗和贺诗。

事后，戴季陶得知，特地将悼诗和贺诗全部讨去，专门装裱成幅屏条，挂在屋内，以示不忘此事。

戴季陶在成都八方游说，希望军阀们以民为重，以国之大业为重，遵从中山先生的意愿，尽早停止战争，让人民安居乐业。一连数月，他讲得口干舌燥，军阀们依然故我，根本不把戴季陶的劝说放在眼里。他们总是客客气气地迎入戴季陶，一番许诺后远送客人。待戴季陶刚一转身，他们又一头扎进密室，谋划起新的战争灾祸来，到后来，他们几乎讨厌见戴季陶了。他几个月的游说付诸东流，兵匪战祸，烧杀奸淫掠抢，日日月月连绵不绝，川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孙中山没有忘记远在成都的戴季陶，他把戴季陶列为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参议员，希望自己的得力助手仍如往日一般在他左右出谋划策，又指定戴季陶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 5 委员之一。

戴季陶回到上海，得知早已和他分道扬镳的一些共产党人已被孙中山吸收加入国民党，其中有些人如陈独秀等曾是和他交往很深的朋友，心中很不是滋味。与共产党合作，是孙中山的决心，戴季陶不能违背。

孙中山于 192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宣布特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接着又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的章程。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11 月 29 日，邓泽如、林直勉等 11 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要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藏阴谋，并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

孙中山见此上书，大怒，立作批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

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不顾孙中山的批评，反而趁国民党海外代表齐集广州开会的机会，发起组成一会，改变孙中山的决定，指定由邓泽如、谢良牧、林直勉等人起草国民党章程。

孙中山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邓泽如召集海外代表到他家里，严加责备，才使此事停止进行。

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态度十分坚决。在一次会议上，冯自由站起来对孙中山说：“总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发言，希望总理尊重我的自由！”孙中山看了看冯自由，点头道：“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冯自由鼓足勇气，说道：“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改组成中国的第二个共产党，把中华民国统一成第

二个苏维埃，这样的革命即使成功，我们也不希望！”孙中山回答说：“啊，冯自由，这就是你的自由呀？放心好了，我可以尊重你的自由。你们若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这是你们的自由啊！”孙中山停了一会，又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若不赞成改组，又不愿退出国民党，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这也是我的自由！”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激烈地反对改组，并无理取闹。孙中山要开除他的党籍，还让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

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廖仲恺说：“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明是党的组织问题。

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既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恤。”孙中山把改组国民党的大任交给廖仲恺。孙中山致函国民党全体党员说：“兹委廖君仲恺、邓君泽如召集本党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本总理有厚望焉！”廖仲恺不辜负孙中山的期望与重托，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廖的主持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首先在广州、上海等一些党员较多的地区，进行了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

到1924年1月中，除广州、上海以外，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湖南、湖北、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旅欧的勤工俭学青年中，也先后开始了筹建国民党的工作。国内各省和海外华侨的新老国民党员，都按规定人数陆续推选了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大会准备的宣言和党章草案已经起草出来，宣言是由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宣言和党章草案在广州、上海等地组织讨论和修改。

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17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由孙中山提名的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5人为大会主席团，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接着由孙中山致词，他激动地说：“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30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新纪元。”下午，孙中山又发表了题为《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演说，他总结了辛亥革命后13年来，国民党屡遭失败的深刻教训，又以坚定宏亮的声音说：“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13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孙中山又向大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并说：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

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大会顺利地通过了这个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大会在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发生了争论。会议通过由谢持、谭平山、廖仲恺、孙科、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毛泽东等 19 人组成的章程审查委员会，对章程草案进行了审查。28 日上午的大会，由胡汉民担任大会主席，汪精卫代表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审查结果。报告完毕，开始大会讨论，戴季陶首先发言，对报告表示满意，但是，广州代表方瑞麟乘孙中山未出席大会的机会，提出章程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个意见很明显地是针对共产党跨党而言的。

李大钊立即就共产党员跨党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图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再在加以防制。

倘认为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李大钊的发言感动了许多人，使众人为之动容，情绪大变，相继发言者绝大多数反对方瑞麟的提案。廖仲恺发言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此次彼等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汪精卫发言道：“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们，这是什么道理？”主持会议的胡汉民生怕反对跨党案被通过，无法对孙中山交待，忙说：“现在纪律已订有专章，似可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大会经过一场辩论后，毛泽东提议：“请付表决。”会议主席同意，随即表决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方瑞麟等右派分子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的企图被挫败。

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领导机关的选举。大会决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前提下，实行委员制，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 24 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7 人。

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

汪精卫	张静江	廖仲恺	李烈钧	
居正	戴季陶	林森	柏文蔚	丁惟汾
石瑛	邹鲁	谭延闿	覃政	谭平出
石青阳	熊克武	李大钊	思克巴图	王法勤
于右任	杨希闵	叶楚傖	于树德候	
补中央执行委员				
邵元冲	邓家彦	沈定一	林伯渠	茅祖泉

李宗黄    白云梯    张知本    彭素民    毛泽东  
傅汝霖    于方舟    张苇村    翟秋白    张秋白  
韩麟符    张国焘

其中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毛泽东、沈定一、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为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 8 个部和秘书处。即：

秘书处：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  
组织部部长：谭平山    秘书：杨匏安  
宣传部部长：戴季陶    秘书：刘芦隐  
工人部部长：廖仲恺    秘书：冯菊坡  
农民部部长：林伯渠    秘书：彭  湃  
青年部部长：邹  鲁    秘书：孙  陶  
妇女部部长：曾  醒  
军事部部长：许崇清  
海外部部长：林  森

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于偏处广州，指挥各处党务有鞭长莫及之感，又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设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党务之进行。

## 第三十五章 夹缝中发展

曹锟导演了贿选总统丑剧，企图控制全国，直系军阀名噪一时，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一支军阀。中国共产党人本来就对造制“二七”惨案的直系军阀极其不满，便掀起了一个以反对曹锟贿选为中心、继而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奉系、皖系军阀也借机反对直系，皖系督军卢永祥曾通电反对曹锟贿选，秘密派人与广州的孙中山和东北的张作霖联络。于是，由孙中山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张作霖之子张学良 3 人，分别为三方代表，于 1924 年八九月间在奉天举行会议，时称“三公子会议”，建立三角联盟。

直系内部也有反对曹锟、吴佩孚的派别，为首者是爱国名将冯玉祥。冯玉祥居然发动了北京政变，迎接孙中山进京。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西北乡竹柯村人。其父冯有茂青年时代在家种田，还学了泥瓦匠手艺，后来为避兵灾，举家北逃，饱尝风霜，历尽磨难。冯有茂又考入武学堂，并以此为从军的跳板，投身于淮军将领刘铭传的军队中，转战各地，升为哨长。

后在山东济宁与一游姓女子成婚，生下 7 个儿子，仅成活 2 人：长子冯基道，次子冯玉祥。

冯玉祥 3 岁时，全家迁居保定城东的康格庄。冯玉祥在此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冯玉祥不满 10 岁那年，父亲为了维持生活，托朋友为冯玉祥在兵营中补个名额，以便领几两银子。

冯玉祥入伍前，勉强受了两年零3个月的学塾教育。

冯玉祥11岁那年，母亲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使他悲痛万分。从此开始，他到军营中练习步枪打靶。这年7月，冯玉祥和他的父亲随部队开赴大沽，准备同侵华日军作战。

冯玉祥亲眼目睹了日本军舰的挑衅，激起了他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部队奉命修筑大沽炮台，冯玉祥因年龄小，抬不动土，白天除做些杂务外，就帮着扫扫地，夜间随同父亲巡营，整天过的都是军队生活，一年后，部队开回保定，不久又移防安肃县。

冯玉祥年满15岁，正式入营当兵，参加军事操练。当时他长得魁梧健壮，特别是身高超过常人，军中称他为“冯大个子”。父亲既是他的严父，又是他的长官，由于能得到父亲的指教和管束，比较容易接受军事生活和懂得各种规矩，也避免沾上军营中喝酒、赌博等败风恶俗。冯玉祥也认为，今后要有点出息，就不能整天瞎混，应当读书，于是他开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在他人的指导下，冯玉祥普通的文字颇能粗识一些，于是便看《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等书籍。

他的父亲在一年内发生两次不幸，先是骑马经过城门洞时，马前蹄被冰滑倒，人仰马翻，右脚被压成重伤，不久后化脓，养了3个月方才痊愈。祸不单行，军营裁减兵额，冯父虽立过不少战功，但已年老体衰，遂被裁职。冯兄从军在外，冯父只身返回安徽巢县家乡谋生。

冯玉祥自少年时期就酷爱各种武术，打拳、踢腿、摔跤、举石头等等都下苦工夫练过，又在军中学到了刀枪剑戟各种武艺。他本来就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经过苦练武术，身体更加强壮。他又力求上进，阅读兵书，《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读得十分刻苦，有时彻夜不眠。

冯玉祥看到淮军暮气沉沉，遂于1902年2月脱离淮军，投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3营左队右哨6棚，为正兵。

1903年4月，他被升为正目。冯玉祥读书和操练都很勤奋，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因而被保荐立六品军功，这年年底升为哨长。

1905年3月，武卫军右军移驻南苑，并改为第6镇，冯玉祥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排长。到了8月，冯玉祥通过考试，名列第一，升为队官（连长）。

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对冯玉祥很器重。陆建章有位由他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刘德贞，经王化东作介绍人，许配给冯玉祥，这样一来，冯玉祥便成了陆建章的内侄女婿，以后冯得到了陆建章的提拔和帮助。

1909年的一天，从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孙谏声，到冯玉祥的住所来玩，看到冯在专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孙谏声问道：“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冯反诘道：“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孙道：“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孙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郑重地对冯玉祥说：“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冯玉祥看完了这两本书，才知道满洲贵族率兵入关后屠杀汉人的惨状，不由自主地咬牙切齿，誓死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他和青年军官中的几位挚友秘密地组织了“武学研究会”（简称“武学社”）团体。最初只有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6人。武学社以读书会的形式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冯玉祥任会长。

读书材料由革命党人蓝天蔚、刘一清、孙谏声、戴锡九等人供给。

武学社不久发展了 100 多位青年军官参加，同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接近的 1500 余名学兵也参加了武学社。

1910 年 9 月，新编第 20 镇建立，冯玉祥因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提为管带。部队里派来了一批满族权贵，这些人吃喝嫖赌，作风凶横霸道，十分狂妄，引起武学社的不满，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张秉贤首先剃去发辫，以表示革命决心。韩复榘等人随后也剃了发辫。

武学社风声过大。为了转移人们的视听，另设山东同乡会，推协统潘榘榘为会长。

会长只是虚名，目的是利用潘做招牌，会务均由干事掌握，干事都是武学会骨干分子。

武学社派人潜赴奉天、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假山东同乡会之名，建立革命机关，又派人分赴各省运动军队。并以救济同乡和开垦东北为名，筹集巨款，购办弹药，预备起义时用。

1911 年 2 月，张绍曾接任第 20 镇统制，武学社得到张的庇护，活动大有进展，辛亥革命后，冯玉祥等人积极准备响应，分头秘密串连鼓动。他们将革命军胜利的消息和一些鼓动革命的文章摘录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为此，冯玉祥将营中公用的油印机搬回家中使用。他们还在彭家珍的帮助下，截留了一大批清政府急需运往前线的军火，支援武汉革命军。

清廷视张绍曾为危险人物，调他任长江宣抚使，20 镇统制由保皇派潘榘榘继任。张认为自己的兵力难与袁世凯对抗，便宣告引退，解甲归田。冯玉祥等在滦州车站举行会议，决定请张不要听从政府命令，又电请政府收回成命，但始终未见复电。

冯玉祥的行动引起军队中保皇派的注意，不久便把冯所在的部队调海阳镇驻守，有意将冯玉祥同王金铭、施从云等分开。1911 年 11 月，同盟会员白亚雨从天津赴滦州，联络王金铭等，又派人赴海阳镇向冯玉祥报信，决定宣布成立北方军政府，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亚雨为参谋长，并由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署名发出通电。

王、施决定率起义军直袭京津，但由于管带张建功玩弄两面派手法，私下向标统范国璋及总兵王怀庆告密。袁世凯立即派军队把起义部队严密监视起来。王金铭、施从云等发动起义后，于 1912 年 1 月 3 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冯玉祥在海阳被拘禁起来，失去自由，因而未能响应起义。

起义军因张建功率领的那个营叛变，遭到突然袭击，损失严重。王金铭等率起义军约七八百人撤离滦州，乘火车西上攻打北京。因铁路被毁，至雷庄 5 里处下车，与王怀庆军交锋，王怀庆部支持不住，即邀请王金铭等人往雷庄议和。王带百余人前往谈判时，被王怀庆伏兵袭击，一一被捕，王金铭等 50 余人壮烈牺牲。

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后，本来要将冯玉祥杀掉，但由于冯在队伍中人缘甚好，有许多人前来营救，冯又与北洋高级将领陆建章有亲属关系，因而冯仅被押回原籍。他路过北京时，被陆建章搭救。

不久，清朝垮台，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1913 年 8 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升为团长。

冯玉祥搞军事训练十分认真，除按陆军正式训练外，又增设铁杠、木马、栏阻等器械，并专门成立拳击技术排和器械体操排，以提高兵士的军事素质，还编写了教材和军歌，又编写了 800 字浅显识字课本。他认为治军最

重要的是要得兵心，特立下了对士兵“八不打”戒条。即：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实行八不打后，逃兵大大减少。

1914年，冯玉祥随陆建章赴陕，陆将冯部作为亲信和主力，冯团出北京时扩编为旅，冯玉祥任旅长。到陕西后，冯玉祥部因战功扩编为中央第16混成旅。冯旅在军界有一定的独立性，于是，冯便把滦州时期的革命朋友集合在自己的部队里，为他后来建立庞大的武装力量，准备了骨干。他成立了一个模范连，李鸣钟为连长，宋之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过之纲等为排长，石友三、葛金章等为班长，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是士兵。这些人后来成为著名将领。

1915年，冯玉祥奉命入川。冯玉祥在四川一面同护国军议和，一面致电曹锟等方面告捷。和议成功后，冯玉祥劝陈炯联合护国军反对袁世凯。陈炯任命冯玉祥为护国军第5师师长。在冯玉祥的劝说下，陈炯宣布四川独立。

1916年秋。冯部恢复原本16混成旅编制，并奉命调回北京东南的廊坊。段祺瑞认为冯玉祥在四川的表现，是对北洋集团的不忠，甚至有叛逆行为，为段所忌恨。

1917年4月，段祺瑞下令免去冯玉祥旅长职务，调冯任正定府第6路巡防营统领。全旅官长几次发出通电，表示坚决不让冯玉祥调走，宁愿全旅解散。后经陆建章劝说，全体官兵才挥泪为冯送行。

7月，张勋复辟。16混成旅的鹿钟麟、张之江等人派人请冯玉祥主持大计、恰巧这时冯玉祥派人给16旅将领们送信，要他们速安排眷属回原籍，准备出师讨伐张勋。

冯玉祥赴天津，会见了陆建章、张绍曾，商议讨伐张勋问题。尔后冯玉祥回廊坊，重任16混成旅长。他派出侦探队了解敌情，并率部将5000人的张勋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段祺瑞命冯玉祥为第一梯队司令，拨段芝贵部的一个混成旅归冯指挥。

反张勋复辟之役，冯玉祥立了大功。当时《申报》发表文章称：“实则英雄乃冯玉祥也。”但是，段祺瑞的嫡系将领都得到了提拔，唯有冯玉祥被冷落在一边。

段祺瑞调冯玉祥部南下福建，援助李厚基。冯同情孙中山，但又不敢公开反抗段之所为，只得将计就计。他以劳师远征、兵力不足为由，要求补充一个团，马上得到准许，即派李鸣钟到河南招募新兵3000人。冯率部到达浦口后，并不继续南下，而是就地练兵。

段派人催冯迅速南下，冯则不断致电陆军部索取薪饷。冯虽摆出愿率部赴闽架式，实际上并不准备赴闽。后因形势变化，段改调冯部溯江西上援湘。

冯致电北京、保定，要求拨给步枪2700支，子弹135万发，又要求车辆、手枪和开拔费。拖至1918年2月，实在无法再拖，才率部乘江轮溯江西上。不料部队刚出发，旅部一位书记杨道洙误以为冯真的要去对南方作战，愤而投江自杀，影响全旅官兵情绪，冯也对此不胜感慨，部队到达武穴，冯决定在这里驻下，并发表主和通电。

冯玉祥的通电震动全国。孙中山写信给冯玉祥，热情赞扬他，但却激

怒了段祺瑞。

段下令免去冯的旅长之职，并调兵将冯部四面包围，派曹锟查办。听到冯因主和被撤职的消息，武穴商民连电政府请求收回成命。16混成旅全体官佐通电质问冯国璋和段祺瑞，强烈要求收回成命。段命张之江代替冯的职务，张忠于冯，不肯接任。曹锟奉令查办冯玉祥，乘机卖个人情，请准冯玉祥免职留任，戴罪立功，归其节制。段感到冯部全体拥护冯，难以对付，也乘机向曹锟送个人情，准许曹的要求，遂由大总统下令，宣布将冯玉祥褫夺陆军中将军衔，原官暂准留任。从此冯玉祥倒向直系一边。

冯玉祥不得不于3月下旬离开武穴，开往湘西，并占领常德。6月，北洋军阀为嘉奖冯的战功，取消对冯的革职处分，任命他为湘西镇守使。冯在湘西二年，一面加强部队的建设和训练，一面在地方上兴利去弊，作出不少成绩。他同孙中山常有往来，孙中山曾派徐谦、钮永建等人同冯见面。

1920年11月，冯玉祥奉命率部移驻河南信阳。

1921年5月，冯玉祥奉命进兵陕西。直皖战争后，陕西督军陈树藩因属皖系而被撤职，但陈拥兵自卫。北京政府命直系第20师师长阎相文率兵入陕，武装驱陈。阎深知冯旅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令冯旅作为先头部队。冯部长驱直入，猛攻猛打，陈部溃不成军，除一部由胡景翼收编外，其余残部逃入陕南山中，冯部进驻西安、咸阳。

阎相文到西安任陕西督军，决心提拔冯玉祥为师长。阎连电请求曹锟、吴佩孚将冯旅扩编为师。吴佩孚均未理睬，后又经阎苦苦相求，才在不加餉不增械的附加条件下，将冯旅改为陆军第11师，冯任师长。

阎相文做了督军，却面临重重困难。陕西境内驻军太多，餉项和粮秣严重不足；曹锟、吴佩孚又将一些退职军人、失意政客，以及他们的亲戚故旧之类的人，共200余名交阎优先录用。这些人又带来了不少亲故，总数达800多人，每天要开15桌酒席应酬，使阎相文愁眉不展，心绪不宁，加上在处死郭坚的事件上，受到吴佩孚的斥责，致使他走上自杀的绝路。

阎相文死后，北洋政府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冯起初不肯就任，并推荐张绍曾继任，张表示坚决不就任，北洋政府仍任命冯玉祥，冯玉祥就任陕西督军，有了一大块地盘和施展抱负的机会。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却令战斗力弱的陕西省任刘镇华部开赴前线，冯玉祥受令坐镇陕西。刘一向具有送礼、奉迎的看家本领。吴佩孚在洛阳做50大寿时，刘送了80多把万民伞和许多金银古董；而冯玉祥的礼物却是一罐冷水。吴为人刚愎自用，且心胸狭隘，收下这份礼物，犹如被冯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可是，擅长送礼奉迎的伎俩，却代替不了打仗的真本事。前线吃紧的时候，吴佩孚不得不改变初衷，令刘坐守陕西，而急电请冯出兵。

冯率领第11师全部、陕西督署卫队团、中央第4旅、陕西暂编陆军第1师、陆军第1和第3两个混成旅出陕西。冯为了激励士气，每个官兵臂上都写有“害民贼，瞄准打”的醒目字样，冯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击溃超过冯军数倍兵力的赵倜军，一举占领开封。

奉系军队以失败而告终，冯玉祥因战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

冯任河南督军，吴佩孚要在河南督署安插自己的亲信，但冯调换成自己在陕西督署中的全班人马；吴派宝德全监视冯的行动，又被冯枪毙，两人矛盾日益加深。



冯玉祥要扩大军队，遭吴佩孚的严厉限制。冯通过在吴佩孚任军事参赞的张绍程疏通，得到批准在汉阳兵工厂无限制地购买军火。于是，冯在短期内不但补充了军火缺额，而且背着吴佩孚又招募了3个混成旅的军队。冯又通过陆军部长张绍曾，获准新建3个混成旅的番号。

吴佩孚得知冯私自扩充3个旅军队，对冯更加忌恨，准备待机消灭冯军。但陆军部长张绍曾既和冯有老关系，又同吴交情颇深，经他与吴商洽，特设“陆军检阅使”，以此安排冯。1922年10月31日，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之职，并授予扬武上将军名义。

在冯玉祥离开河南之前，上海一家英文周刊举行中国当代名人选举，3.5万人有知之之士投票，选出“最伟大的中国人”12名，孙中山名列第一，冯玉祥获第二名。消息传出后，更引起吴佩孚的嫉恨。

冯失去河南地盘，是一大挫折，但他率部到北京南苑任陆军检阅使，大力练兵，在两年内练就3万能攻善战、纪律严明、具有爱国精神的精兵。

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同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孙中山建立了倒直的“三角同盟”，终于爆发了齐卢之战。齐卢之战是直系军阀齐燮元和皖系卢永祥，以及何丰林浙沪联军之间的战争。

吴佩孚的亲信、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一直窥视着卢永祥的地盘，特别是上海这块肥肉不能染指，一直耿耿于怀。他数次向吴佩孚献计，要把上海夺过去。但遭到吴佩孚反对，齐为此对吴很不满，但又不敢和吴公开对抗。吴佩孚并不是不想让直系占领上海，只是企图用宽厚的策略拉拢卢永祥，使他归顺直系。

曹錕贿选后，卢永祥通电反对，并停止了与北京政府往来，反直系的政客和未参加贿选的议员麇集于杭州、上海，浙沪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终于使吴佩孚下决心消灭卢永祥。

吴佩孚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另以周荫人代孙传芳为福建督理，要孙传芳同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但广东的地盘不易深入，而福建一省难容纳孙传芳、周荫人二军阀，孙传芳亟谋向浙江扩张势力。吴佩孚给曹錕发电，主张用鄂、赣、苏、闽几省兵力，围攻浙江、上海，由齐燮元和孙传芳主其事。

不料，吴佩孚的电报，被段祺瑞收买的曹錕的译电员弄到手，立即派人送给卢永祥。

卢永祥得到消息，决定同直军决一死战，又派人到奉天，要求张作霖在北方发动军事攻势，使直军首尾不易兼顾。张作霖很快答应了卢的要求。

齐燮元和孙传芳得到吴佩孚的支持，便联合皖、赣、苏、闽4省直系军队，分4路攻守。第一路攻上海，由宫邦铎任之；第二路驻守宜兴，由陈调元任之；第三路攻广德，由王普任之。一二三路由齐燮元任总司令，第四路攻仙霞岭，由孙传芳任总司令。

皖系军阀方面，则以浙、沪和从福建退入浙江的军队组成浙沪联军，分3路攻守，由卢永祥任总司令。第一路以何丰林、臧致平守上海；第二路以陈乐山、杨化昭攻长兴；第三路以张载杨、潘国纲守江山。

1924年8月24日，齐卢之战打响，但遇上连续阴雨天气，战壕里积满了水，官兵们仍蹲在水里打枪，浑身是泥水，双方打打停停，打过来打过去，形成拉锯之势，一直连续40多天，最后以卢永祥的失败而告终。卢永祥通电下野，偕同何丰林乘轮船赴日本。

## 第三十六章 北京政变

孙中山在卢、孙、张倒直三角同盟形成时，便派徐谦将三角同盟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敦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不久，孙中山又派徐谦见冯，将自己的《建国大纲》交给他，此后孔祥熙又奉孙中山之命，将其亲书的《建国大纲》交给冯，并进一步劝冯倒直。

国民党人徐谦、钮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奉孙中山之命，时常同冯联系，劝冯采取联合奉、皖，将直系军阀吴佩孚推翻。冯受到感动，决心倒直。

奉系首领张作霖也派来马炳南到北京与冯玉祥取得联系。马既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又同冯玉祥有旧交，他们在 20 镇时相识。马还代表张学良趁冯玉祥同李德全结婚的时机，前来贺喜。

冯的元配妻子刘德贞患产科病去世。冯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结识，李为北京惠文女子中学的教师，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学识出众，思想开明，精明能干，生活俭朴。冯与李恋爱之前，大总统曹锟拟将其女嫁给冯玉祥为妻，托人向冯说媒，冯不为大总统的权势和曹小姐的显贵所动，婉言加以谢绝。

马炳南的不断往返，奉军又秘密接济了冯军一些补给。奉方又派郭瀛洲为代表和冯联系倒直问题，冯表示赞同联合。双方约定，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共同反直。

居住在天津的段祺瑞与山东督军、皖系军阀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联络反直活动。

冯玉祥派遣参议刘之龙赴天津与段祺瑞洽谈，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冯玉祥积极争取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秘密联盟。

15 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

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

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在冯玉祥督陕时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 1 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胡素有革命思想，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

冯玉祥再与黄郛建立联系。黄郛是志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上海光复，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冯经张绍曾认识黄郛，黄是 1923

年入北洋政府内阁的，先后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冯、黄经过交谈，彼此有许多共同的见解。冯每星期都请黄到南苑兵营讲述军事政治学，讲救国救民之道，为冯部参谋将士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每次演讲约两个小时，冯亲自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一同听讲。黄利用职务为冯探听政界消息。

1924年9月5日，孙中山移师北伐，为了配合卢永祥，准备攻取江西，孙中山密约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早日行动。

因事前卢永祥、张作霖、孙中山倒直三角同盟约定共同出兵，齐卢之战爆发，张作霖的奉军分6军，即以姜登选为第一军司令，出兵山海关；李锦林为第二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张学良为第三军司令，出兵山海关；张作相为第四军司令，作援军；吴俊升为第五军司令，作援军；许兰洲为第六军司令，由开鲁攻赤峰。张作霖自任总司令。

曹锟一日三惊，连连给吴佩孚发电报，又接连派出使者，恳求吴佩孚速速进京。9月17日，吴佩孚来到北京，曹锟在总统府设宴为吴佩孚洗尘。吴佩孚即席作诗：

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  
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  
周公徂山东，忧谗亦畏讥。  
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  
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机。  
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  
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

曹锟请吴佩孚摄行陆海军大元帅职，吴佩孚便在中南海四照堂召集“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吴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省后方警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出发，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北古口，趋赤峰；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组织直、鲁、豫、鄂、陕、川等10路援军。

吴佩孚表面上派冯玉祥担任这一路总司令，并说：此路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上是想置冯于死地。这一路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山脉横亘，道路崎岖，行军极困难，赤峰东北复有沙漠处，人烟稀少。北方气候寒冷，冯军只有单衣，吴又规定行军沿途，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军随地筹办。冯部所经各地十分荒僻，往往百里之内不见人烟，根本谈不上就地筹粮，况且冯一向不愿搜刮地方。吴企图借刀杀人，即借奉军之手消灭冯军。万一不被奉军消灭，也将以战败的罪名惩办冯。

吴佩孚令胡景翼率部跟随冯玉祥，并嘱咐道，如果冯有什么异动，就近解决。可吴哪想到，胡和冯已有密约。胡把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冯，更增加了冯倒戈的决心。

吴佩孚倒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冯玉祥在吴佩孚发布作战命令后，在北京城内布置倒直的军事内应，向曹锟建议：将王怀庆的13师开赴前线，孙岳的15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锟同意这一建议，即调孙率部到京，任命孙为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

冯向来主张兵贵神速，这次却迟迟按兵不动，经吴佩孚再三催促，才于9月21日开出先头部队。冯令部队每日行程二三十里，司令部也慢慢移动。冯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借筹措给养为名，停留下来。一面督饬沿途

各县修路作回师准备，一面令鹿钟麟部每日从驻地向北京方向练习行军，或 50 里，或 60 里折回，其意图不仅是作为急行军回师的准备，而且使沿途人们对其行军动作习为常见，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间的注意。

直军第一二军同奉军作战，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是个庸懦腐朽之人。他采用旧式战法，即一个人扛着大旗前面开路，密集的大队形随大旗行动。奉军看到直军如此无能，非常高兴，立即拉开散兵线，一下子把王怀庆的 13 师的两个营包围起来，并迅速把他们消灭。王怀庆全军顿时溃不成军，败退下来。气得吴佩孚撤掉王怀庆的职务，急派亲信张福来赴前线接替。

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是直军中有名的勇将，但副总司令冯玉荣既无勇猛拼搏精神，又无随机应变之能力，他率部守九门口，奉军发动进攻之后，未交几合，即弃关后撤。

奉军占领了九门口，西可攻下石门寨，南可威胁山海关正面阵地。

吴佩孚得知九门口失守，大惊失色，命彭寿莘立即将冯玉荣阵前正法。彭即率部阻冯败退。冯玉荣进退不得，遂服毒自杀。直军的阵脚已乱，彭告急的电报频频飞向北京。

吴佩孚于 10 月 10 日乘火车到前线督战，把总司令部放在秦皇岛。吴佩孚所到之处，奉军炮弹跟踪而至，因有人向奉军暗通消息。吴佩孚只好在火车上办公。

皖系领袖段祺瑞令国务院参议袁良带上他致黄郛的亲笔信，建议：“当吴佩孚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又要求冯玉祥在行动上，宜早勿迟，迟了害处大，请黄善为指导之。

冯玉祥的指挥部到达古北口时，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又来见冯，递交了张作霖的信：“只要推翻曹、吴，奉方的目的即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同马炳南约定，如果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

冯玉祥从古北进抵滦平后，派刘治洲等人到通州与胡景翼秘密联系，要胡暂缓开拔，并商讨班师日期。刘治洲又与段祺瑞接洽合作办法，段说已同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

吴佩孚又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督促冯部向赤峰前进。王承斌原是 23 师师长，善于打仗，但吴佩孚认为他是奉天人，总怀疑他与张作霖有联系，处处防备他，先是撤掉了 23 师师长职务，因王是亲曹锟派，后来虽任命为讨逆军副总司令，并没有实权。冯知道王对吴心怀怨恨，故将倒直的计划告诉了他。王表示同情，但既不参与冯的行动，又不向吴告密。

张作霖因与冯有协议，即将进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吴佩孚亲自统率的直军第一军的压力，吴佩孚十分气愤，被迫抽出 3 个师的兵力到赤峰方面作战，但尚未到达地点，北京发生了政变，3 个师被奉军收编。

冯玉祥早已布置留守北京的蒋鸿遇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吴佩孚的情报，以便及时报告。总统府内的机要人员，有许多人与冯取得联系，暗通消息。

冯得知吴在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为进一步证实，给吴发去电报，探询山海关战况。

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复电：“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冯又接到蒋鸿遇的电报：“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 3 师悉数调往前线增援。”第 3 师是吴的看家兵力。蒋鸿遇曾告诉冯，

一定要等吴的精锐部队第3师从丰台调赴由海关前线，班师回京的时机才算成熟。

冯为了慎重起见，密派刘之龙返京，和黄郛商量。冯曾给黄郛密电一册，与黄约定互通消息，来往密电由黄夫人亲译。虽然通电频繁，外人却无法察觉。黄以亲笔复信托刘带给冯，并致电冯：“立志救国，在此一举。”冯玉祥遂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军事会议，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赶来参加会议。冯试探了将领们的意向，然后郑重宣布班师回京和政变计划，将领们表示一致拥护。会议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北京政变迎孙中山北上，拥护孙中山主义，孙中山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冯玉祥也把自己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

冯玉祥命令胡景翼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部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佩孚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意外。同时又下令封锁京热大道，扣留有关人员，以防走漏消息。

冯玉祥动员之后，部队开始行动，徒步以每日行程200里左右的速度返回北京，3日内行程六七百里，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状如流水。鹿钟麟首先于22日到达北苑。

鹿与蒋鸿遇会商后，即将各部队分配战斗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皆藏在大车内，当晚8时由北苑出发，12时抵安定门。孙岳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徐永昌城防军守城门卫兵大开城门，迎入城内。

鹿钟麟首先指挥部队接收了全城的防务，又把全城电话线割断，封锁曹锟与外界的联络。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缴械，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间接触。

鹿钟麟的指挥部设在太庙，一切急需做的事情都在一夜之中办好了。次日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满了国民军岗哨，站岗的士兵臂上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的白色袖章。

次日，冯玉祥来到北苑，发出主和通电，提出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请全国贤达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同时，冯部国民军颁布文告，指责吴佩孚不顾人民的痛苦，兴无名之师为孤注之掷。又宣布，首都重地，使馆林立，商务云集，国民军将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

冯玉祥邀集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王芝祥、鹿钟麟、刘骥、张之江等在北苑开会商议正式改组军队的事宜。会上推冯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二人为副司令，分别任第2第3军军长，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曹锟贿选祸国，强令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曹本人自动退位。

会后，冯玉祥等通电全国，并公布《建国大纲》。

冯玉祥于10月23日下令逮捕原财政总长王克敏和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等贪官污吏。

王闻讯逃入租界，李拒绝交出赃款，遂被枪决，对此人们拍手称快。随后，冯又将大贪污犯曹锟之弟曹锐押解到案，令曹锐交出赃款，曹锐畏罪吞服鸦片自杀。

冯玉祥又接受张绍曾的建议，成立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总统和总理的职权，由黄郛一人兼任，黄还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王正廷兼任外交、败政两部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黄郛、王正廷都是冯军回师举行政变的内幕人物，因此，这个内阁是以冯系为核心。

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劝曹锟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劫车夺印捧他上台的王承斌，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难受。

吴佩孚接到冯玉祥的10月23日通电，虽然大吃一惊，但又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电报。他查明属实后，又怀疑胡景翼未必加入冯军，即命胡为第三军总司令以代冯，叫张敬尧去胡部传达命令。胡把这个倒霉使者扣留起来。

一切真相大白，吴佩孚才心慌意乱地把前方作战的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精兵七八千人回救北京。吴急电南方直系将领率兵北援，不料京汉、津浦两线受阻，无法应援。

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已开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张绍曾为避免战祸，出面调停，劝吴佩孚接受“和平救国大纲”。吴的态度仍然十分倔强，不肯罢休。双方军队在杨村一带开战。此时阴雨连绵，杨村一带除铁路两旁及永定河堤等高地外，尽是一片汪洋，作战十分艰难。开战后，双方相持一天，不分胜负。冯派刘郁芬、蒋鸿遇两旅，迂回到吴军后方，从吴军背后进攻，又派李鸣钟由丰台抽调部队，协助正面进攻。张之江、石友三、谷良友部，协助李云龙旅，一致向吴军摆出攻势。此战生俘了吴部的旅长潘鸿钧以下数千人并乘胜进击。11月3日上午，冯军占领了津浦铁路沿线的天津附近的北仓，随后占领天津。

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吴佩孚仍作困兽之斗，把司令部移驻军粮城。胡景翼军如果向前推进，和奉军两头一挤，吴佩孚即无处可逃。但冯玉祥、胡景翼接受了张绍曾的劝告，给吴佩孚放一条生路。

吴军残部在军粮城两头被包围。吴看到只有从海上逃跑一条路，大哭一场，在英国军舰掩护下，由大沽乘海军运输舰南逃。经上海转武汉，后又回到河南重整旗鼓。但吴从此元气大伤，未能再抖起昔日的“威风”。

冯玉祥一贯痛恨封建帝制，北京政变后，决心以全力，行其素志，把溥仪逐出宫去。

11月5日，摄政内阁作出修正优待清室条件，永远废除皇帝专号，将故宫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冯玉祥当天就令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执行，将宫内太监470余人、宫女百余人分别给资遣散，又用汽车5辆，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馆，不久，又从日本公使馆逃往天津日租界。

11月6日，冯玉祥电请段祺瑞出山，称：国民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的摄政内阁

遂告结束。段任临时执政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联袂入京，政局急转直下。奉系军阀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以图乘机扩大地盘，觊觎北京。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认识到拥段出山是个错误，称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十分懊悔，表现为万分消极。

冯玉祥感到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国民军第二军将领岳维峻、邓宝珊向冯玉祥献上一计：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只带少数卫队在北京之机，举行暴动，把他们父子俩捉住枪毙，以快人心，而戡祸乱！

冯认为这样做会激起奉军异动，酿成混战之局，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不同意此计。

皖系卢永祥企图恢复江苏地盘，怂恿奉军南下，而吴佩孚又企图北上实行报复。冯面临着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决定辞职下野回避矛盾。

冯对张作霖说自己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张作霖故意跳起来说：“你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冯玉祥便避入北京西郊天台山去，在天台山隐居。鹿钟麟等来请示今后如何办？冯玉祥说：“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多和李大钊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景翼、孙岳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在一起。这3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了。”段祺瑞一方面借助张作霖的军事力量扼制冯玉祥，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没有冯的军事力量，自己就会受奉张摆布。因此，他对冯的辞职坚决挽留，并对冯部略施抚慰手腕，于1925年元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

段祺瑞一方面拉拢冯，不让冯下野，另一方面怂恿奉系的李景林以督办直隶军务的名义，迫使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让出保定、大名等地，将冯与孙岳的联系切断。又命令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率师南下攻击吴佩孚；同时密令刘镇华的镇嵩军憨玉琨入豫，以牵制国民军第二第三军。

胡景翼部队打败吴佩孚部队后，又在孙岳的帮助下，打败了憨部。冯玉祥保荐孙岳督陕，胡景翼部收编了吴佩孚部的王为蔚、陈交钊、田维勤等。

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冯本来就任陆军检阅使并兼有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现在无形中失去了检阅使名义。

冯玉祥经过国民党人徐谦的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政变后，便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革命策略。

李大钊、徐谦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

李大钊设法使冯玉祥振作起来，劝他不要消极。苏联方面也认为，只有冯玉祥振作起来，国民军才有可能形成中国北方一支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国民军也感到必须有老冯出山支撑着局面，才能争取到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

通过李大钊、徐谦和加拉罕的协商，由冯军和胡景翼军、孙岳军各选派25名青年军官到苏联军多学院学习。冯又从学兵团挑选15名优秀连排长，进入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之后，冯玉祥又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

冯玉祥又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向苏联政府请求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1925年3月，苏联派来了两个军事顾问组，共约三四十位顾问，各类专门人才具备，到国民军担任教官。

冯玉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丰镇厅建立了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又在张家口建立了机枪学校、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讯学校、小型工兵学校。苏联顾问还帮助国民军建立了军械工厂，装备了修理厂，建造了弹药生产设备，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技师，提供图纸，并具体指导建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苏联援助国民军大批军火和装备，其中有步枪、子弹、马刀、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火焰喷射器、以及飞机等。

冯玉祥还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基地。冯玉祥委托李大钊、徐谦负责领导国民军的政治工作。12名国民党员和苏联顾问在俱乐部内讲课。

冯玉祥在拥护段祺瑞出山的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孙中山是反直三角同盟中的一员，段祺瑞、张作霖也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问题。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关于乘机宣传革命的建议，决定北上。

## 第三十七章 国父逝世

蒋介石在广州筹建军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理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并让他的英文秘书王登云召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马上就发给每人遣散费。”邓演达和叶剑英坚决反对散伙，还有一些人表示怀疑。邓演达和叶剑英去请示廖仲恺，廖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应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蒋介石还是擅自离开广州，悄悄地去了上海。

孙中山对蒋辞职一事批示：“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难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蒋介石辞呈中所说“办事多遭掣肘”，实际上是他反对联俄联共，反对革命。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到上海后给廖仲恺写信说：

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力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



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蒋介石的离去引起众人议论，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则说：“蒋介石担心，在广州的军阀，其中包括滇系军阀，不赞成创办黄埔军校，因而会解除军校学生的武装，最后会跟他算账。”方鼎英说：“滇军第3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说：“这个胆小鬼是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蒋介石为了躲避风险，总是逃跑，躲到一个安全地方。这次他逃跑了，下次他还照样逃跑。不能依靠他。”蒋介石逃跑后，孙中山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经廖仲恺的一再催促，经孙中山派去的许崇清的劝说，蒋介石终于在4月下旬返回广州。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张申府为副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周骏彦为军需部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陈适为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

不久，戴季陶、张申府相继离职，邵元冲继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后，便由周恩来继任。周恩来于当年8月初自法国返回，到达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还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廖仲恺、戴季陶就希望张申府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张申府是由李大钊介绍，来广州拟担任广东大学图书馆长的。

他一次就开了周恩来、周佛海等12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廖先是聘请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态度和蔼热情，工作细致周详。

从黄埔军校于1924年10月建立教导团开始，蒋介石逐渐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委托陈果夫等在江、浙、沪招募新兵。又在广州招考学兵队，培养教导团下级干部。

教导团1团团长为何应钦，2团团长为王柏龄。不久，教导团改编为党军第一旅，归蒋介石节制调遣。

在军校教导团成立的同时，又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了另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这支革命武装是由周恩来领导建立起来的，全队150人左右，正副队长徐成章、周士第、以及军事教官赵自选，党代表廖乾五、政治教官曹汝谦均为共产党员。后来铁甲车队再扩充一部分黄埔军校学员，建成叶挺独立团。叶挺曾担任孙中山卫队团营长。

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学习一年多，他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后便担任团长。

广州是革命力量同反动力量决斗的中心。广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1924年5月开始酝酿叛乱。英帝国主义分子对商团团长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于5月27日主持召开“商团乡团会议”，宣布要在8月14日推翻大元帅府取而代之。

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8月9日晚，孙中山命长洲要塞

司令蒋介石扣留商团购买的长短枪 9800 支，子弹 300 多万发。广州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

8 月 12 日，商团 1000 多人列队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的枪械，并以罢市相威胁。孙中山揭露了陈廉伯运动商团策划叛乱的阴谋，要求商团自行检举陈廉伯的罪行。

商团竟不服从，25 日，广州商人总罢市。

孙中山、廖仲恺一面派出湘、滇、桂、豫各军 1000 多人，进驻佛山市区和铁路沿线，预为防范；一面电告各地商会，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劝其复业，不要附逆作乱。

不料，那些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军阀头目暗中同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粤军总司令许崇清、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福军总司令李福林等，以调停为名，向商团暗通款曲，给孙中山施加压力。尤其是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竟以“不欲驻地糜烂”为借口，要孙中山缓行军事处分，他们私下同商团密议，提出 6 项条件，要孙中山接受，即：政府交出所扣枪械；商团交纳军费 50 万元；陈廉伯、陈恭受发表通电拥护孙中山政府。孙中山几次向范石生、廖行超晓以大义，明以利害，要他们站在政府立场上，一致对付商团。

范、廖本性难移，就是不听。孙中山大怒，他召集商团头目和范、廖等人座谈，范、廖 2 人分座在孙中山左右两侧。孙中山指着范、廖道：“我不怕商团联合左右两只老虎向我反噬。”范威胁孙道：“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此两三日内，无论若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孙中山闻言，颜色立变，但身受扼制，也无可如何。范石生还以撤廖仲恺职为条件，要廖仲恺去职。

在右派的压力下，廖仲恺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由胡汉民继任，广州市长和公安局长也换成了同情商团的人，并交还了所扣枪械，广东的人事发生了变化，商团的反动气焰重趋高涨。

10 月 10 日，广州各界举行庆祝双十节大会。30 多个爱国团体和学生、市民三四万人举行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实行国民革命”、“复活辛亥革命精神”等口号。游行队伍在太平路至西豪口之间，与全副武装的商团军相遇，商团团丁先是不准游行队伍通过，继而开枪，当场打死 20 多人，受伤 10 多人，被捕 10 多人。团丁将打死的，刨肝剖肺、割头断脚，把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次日，商团军封锁市区，迫令商店罢市，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野”的反动标语。

广东政府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为会长，廖仲恺、许崇清、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陈友仁为委员，作为平定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

孙中山又任命蒋介石为指挥，廖仲恺、谭平山为正副监察，负责平乱。孙中山限令在 24 小时内，务必解除商团武装。孙中山下令由黄埔军校、铁甲车队、工团军、飞机队、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吴铁城的警察部队参加平叛战斗。

10 月 14 日黄昏时分，政府军向商团军发起进攻，商团军在西关一带架设天桥、炮台、构筑街垒，厚建竹木栅，进行顽抗。政府军采用火攻，由消防队救火车载煤油喷射连接各马路的竹栅，引火燃烧。顿时烈焰冲天，西关

一带化为火海，街垒路堡，立成灰烬，有 1000 多家商店也悉数被焚，商团军不堪火攻，迅即溃散，或缴械投诚，或弃甲而走。

陈廉伯在沙面租界内指挥，眼看大势已去，窜上了英舰，商团副团长李颂韶纳械请降。另一商团头目陈恭受用巨款收买滇军，逃往香港。至此，商团叛乱被平息。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感到曹吴倒台，废帝被逐，确实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他本着和平统一全国的初衷，认为，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因此，他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他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以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主持北伐。

11 月 13 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以及随行人员汪精卫、李烈钧、陈友仁、邵元冲等 30 多人，乘永丰舰离粤北上。抵香港后，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赴上海。

孙中山一行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 1 万多人的热烈欢迎。但当上海群众涌上街头欢迎孙中山时，法租界当局竟出动巡捕驱散群众，捕去指挥者数人，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孙中山发表声明说：“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不能干涉。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飞扬跋扈，要不惜一切努力收回租界。”孙中山等离沪继续北上，因津浦路受战争影响不通车，上海至天津的客轮头等舱客票已售完，他们便取道日本乘日轮赴天津。在途经日本的长崎、神户、门司等地时，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旅日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对时局的主张。

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时，国民党举行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阻挠，法捕房拘捕了国民党发传单的人，国民党的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被法捕房查抄，禁止孙中山出席在国民饭店的宴会，但天津人民热烈欢迎孙中山的来临。共产党北方党组织派赵世炎专程赴天津迎接。中共天津地委联络天津各团体，发起成立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筹备会，孙中山抵达天津码头时，50 多个团体 2 万多群众前往欢迎。市民自动张灯结彩，燃放鞭炮。当晚又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茶会，孙中山因病不能赴会，派代表出席。

马千里、邓颖超等赴孙中山住所张家花园向孙表示慰问。

孙中山抵津，首先对张作霖作礼貌上的访问。次日，张作霖到张家花园回拜，孙中山正在静卧中，孙科表示谢绝客人。张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张作霖关起门来同孙中山密谈，劝孙放弃联俄、联共政策，说这是外国公使反对的，而外国人是不好惹的；他愿代孙疏通外国人的感情，又保证说：“这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段祺瑞派叶恭绰、许世英来天津名为欢迎孙中山，实则要劝说孙中山不要“过于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叶、许。许世英向孙中山报告了段祺瑞所谓“外崇国信”的声明和善后会议条例。孙中山大怒，厉声问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地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孙中山这次震怒，使他的肝病加剧。孙中山因为直系军阀还在兴风作浪，不

愿授人以隙，所以仍然扶病入京，打算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以改变直系倒台后的“换汤不换药”的局面。

北京前门车站 10 余万群众热烈欢迎孙中山。中共北京地委在孙中山下榻的北京饭店门前，组织群众举行欢迎会，表达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欢迎和爱戴之忧。孙中山因病情况重，无法直接向群众讲演，发表了书面谈话和《入京宣言》。

冯玉祥让夫人李德全持亲笔信去看望孙中山。孙将 6000 本《三民主义》、1000 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由李德全带回，冯将这些书作为国民军官兵的教材。

孙中山患的是不治之症——肝癌。他在重病中仍然领导国民党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仅汪精卫一人在京，孙中山决定加派于右任、李大钊、陈友仁、吴稚晖、李石曾 5 人为委员，并手谕设立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1925 年 2 月 24 日，孙中山口授遗嘱及家事遗嘱，由汪精卫笔记，并以英语口授致苏联遗书，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笔记。

3 月 11 日，孙中山在遗嘱及遗书上签字，随后又对周围的人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人软化。”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3 月 12 日 9 时 30 分，孙中山与世长辞，终年 59 岁。

孙中山的《遗嘱》是：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 40 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 40 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北京 75 万人先后在孙中山灵堂前致祭。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参加了守灵和执拂。

4 月 2 日，孙中山灵柩移奉西山碧云寺，参加送灵的达 30 余万人，并有 2 万多名学生。

学生、军人和工人等沿途散发宣传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传单，并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北京和全国各地群众悼念孙中山的活动，形成了一次广泛强大的政治宣传运动。

广东革命政府在不平定商团叛乱后，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粤军总司令”，下令进攻广州，在陈炯明的指挥下，叶举、洪兆麟部集中惠阳、平山，向石滩进犯，谋窥广州；林虎一部向龙门、增城北面进扰，以策应叶举部而夹击广州；林虎另一部则向赣边之南聚集，企图切断北伐军之后路。

1925 年 1 月 25 日，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讨伐陈炯明，遂将许崇清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谭延 的建国湘军及黄埔军校学生队、两个教导团，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

东征联军分左、中、右 3 路。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右路军由粤军和黄埔军校组成，由许崇清统率，肃清广九铁路沿线的敌军，然后向

淡水、平山、海丰、汕头一线进攻；左路军由杨希闵的滇军担任，向河源、五华、兴华一线推进；中路军由刘震寰的桂军担任，攻占惠州城并策应两翼。

2月10日前，右路军完全占领广九铁路，接着便攻取淡水。右路军决心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争取惠州敌援军尚未赶到之前占领淡水，并以黄埔教导团为攻城主力，攻淡水之东南，粤军第2师攻城之西北，拦截北面增援之敌，粤军独立第7旅攻城之东北。

黄埔校军由蒋介石以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名义统率，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苏联顾问斯捷潘诺夫、什涅伊杰尔参加指挥作战。周恩来指示铁甲车队一部参加东征。周恩来还组织了由共产党员参加的宣传队，将50万份致士兵的传单、10万份致农民的传单，5万份革命歌曲带到前线散发。粤军张民达的第2师以及第7独立旅，亦纳入校军。

2月14日，校军教导团组织敢死队，由8名共产党员学员和2名国民党军官及100名士兵组成。次日清晨，在炮兵及步机枪猛烈火力掩护下，用云梯攀登入城，进入淡水城内和敌军巷战肉搏，全歼守敌。

敌援军洪兆麟部赶到，在淡水城东北同粤军第7独立旅、教导团一部展开激战，教导二团团团长王柏龄临阵走脱，共产党员陈赓等主动率学生军迎击敌人。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率粤军第2师及第7独立旅配合作战，激战至傍晚，敌援军退去。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免去王柏龄团长职务，由沈应时接任，沈负伤后，由钱大钧代理。

右路军兵分两路攻击海丰。共产党员彭湃领导农民群众，立即将过去埋藏地下的土枪、土炮等武器挖出来加以修理。农民群众踊跃担任运输、向导、侦探以至帮助挖筑战壕，袭击小股敌军，直接参战。

3月1日，右路军在农民群众的配合下，顺利拿下海丰，又在以后的几天内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

由于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同陈炯明、林虎早有密约，东征联军之左路军和中路军始终按兵不动，致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其主力2万多人，从兴宁、梅县等地南下，阴谋一举将右路军歼灭于揭阳、潮汕之间。林虎军素以强悍著称，是陈炯明主力。3月13日，双方在棉湖遭遇，展开一场激战。参加右路军作战的，除粤军许济旅、黄埔教导团外，还有陈铭枢旅、吴铁城旅。张民达师留守潮汕。

这是一场恶战。黄埔教导团团团长何应钦亲自率领卫士队手机枪排，把冲入阵地之敌打退，卫士死伤多人，情势极其危险。蒋介石眼见这种情况，颇感忧虑，对何应钦说：“何团长，你要坚持，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得遭到严重挫折。”蒋介石转过去询问炮兵连长陈诚说：“为什么6门大炮都打不响了，能不能再试一试。”随即，蒋介石及苏联顾问跟着陈诚来到炮兵阵地。

陈诚把一门山炮加以调整，装上炮弹，对准正聚集在前方小河对岸的几百敌军，亲自拉火，事有凑巧，果然一炮打响了，炮弹正落在这群敌人中间爆炸，打死了几十个敌人，敌人一哄而散，向后奔逃。接着几门炮都打响了，且打中目标，几处敌人纷纷后退。

黄埔军官兵突然士气大振，奋勇反攻。

黄埔教导二团进击鲤湖附近，等待蒋介石的命令，久候不得，虽然听到一团剧烈的枪炮声，但团长钱大钧不知当机立断，坐失良机，后来营长刘

尧宸实在忍耐不住，独自率领本营前进，同林虎的总预备队展开战斗。钱大钧听到刘营战斗的枪声，才命令全团迅速加入战斗，实行猛攻。林虎没有想到侧后方会遭到如此猛烈袭击，事出意外，手足无措，只好后退。林军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全线溃退。

3月19日，黄埔教导团二团及陈铭枢旅经五华冒雨进攻兴宁，首先击败城外守敌，然后发起攻城，教导一团亦从五华赶到，协同作战。经过激烈战斗，重创敌军，林虎率残部向东逃窜，右路军乘胜向梅县追击，林虎军弃梅县县城落荒而逃。

陈炯明残部先后退出东江地区，向闽赣边境逃窜，困守惠州的陈军杨坤如部，经廖仲恺派员劝降，杨坤如被迫宣布下野，杨部被改编为滇军第8、9两师。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陈炯明再度逃到香港。

### 第三十八章 血荐轩辕

广州革命政府以蒋介石为潮汕督办，张民达为梅属绥靖督办，罗翼群为东江剿匪督办，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

他的任务是稳定地方秩序，防止逃窜闽赣边境的陈炯明残部的侵扰。

当东江战事甫告结束，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又在广州发动了叛乱。

在东征期间，右路军攻破林虎巢穴兴宁时，蒋先云等从林虎总部搜获的电报中，发现了杨希闵、刘震寰通敌谋叛的阴谋。在国民党“一大”上，杨希闵虽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刘震寰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但他们占驻广州以后，和陈炯明占驻广州一样，赌场、鸦片烟馆、娼寮星罗棋布，军人横行，盗匪充斥，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滇桂军阀盘踞3年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连以上的军官都是腰缠万贯，姬妾成群。杨、刘不听孙中山的号令，霸占税收机关。财政部长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筹款，还要常常夜间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旁，请杨签字。

刘震寰、杨希闵还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图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杨希闵、刘震寰常常潜赴香港，同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的代表，以及陈廉伯密谈，并取得港英政府的军火支援。

杨希闵的部队于4月26日包围和占领了广州石井兵工厂，滇桂军开始移防，广州顿呈紧张气氛。

广州政府接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讨伐叛军的建议，于5月13日在汕头举行会议，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清、蒋介石、朱培德、谭延闿及苏联顾问加伦参加了会议。会上研究了加伦提出的讨伐杨刘的计划，推举蒋介石为讨逆军总指挥，克日率粤军、党军回师平叛。蒋介石此时表面上拥护联俄联共政策，大力赞同共产主义，主张学习苏联，人称他“好话为先生说尽”。

6月4日，叛军公然占领广东省长公署、财政厅、市公安局及电报局、电话局等机关，杨希闵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发表通电，诬指广州革命政府勾结俄人，实行共产，声称“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

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

次日，广州革命政府下令免去杨希闵的建国滇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建国桂军总司令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接着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职权名义发表通电，揭露杨刘通敌，勾结唐、段，密谋颠覆革命政府，发动叛乱的罪状。国民党中央总部发表告滇桂军士兵书，号召滇桂军士兵反对叛乱的官长，服从革命政府领导。谭延、许崇清、朱培德、程潜等将领也联衔通电，声讨杨刘叛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滇桂军中进行了分化瓦解的政治宣传工作。

6月6日起，东征军开始了平叛的军事行动，滇桂军平时胡作非为，恣意掠取，居民早已恨之入骨，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配合东征军杀伤敌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铁路工人断绝滇桂军的交通，各地农民协会踊跃参战，叛军四面楚歌。革命军经过几天战斗，平定了叛敌，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杨希闵、刘震寰逃匿沙面租界，托庇于英帝国主义。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改组大元帅府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建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案。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以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谭延、徐谦、许崇清、伍朝枢、于右任、张静江、张继、程潜、朱培德、林森、戴季陶、孙科、古应芬等16人为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清、林森等5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主席。下设5个部，以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清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以李文范为国民政府秘书长。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任命了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古应芬为民政厅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许崇清为军事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长，孙科为建设厅长，宋子文为商务厅长，陈公博为农工厅长。以许崇清为省政府主席。

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清、蒋介石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

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地方军的名称。将党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为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福字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援鄂军和吴铁城部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各军先后建立了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

国民政府又先后成立了惩吏院和监察院。惩吏院以徐谦、邓泽如、林翔、邹鲁、林云陔为委员；监察院以林伯渠、黄昌谷、陈秋霖、甘乃光为委员。

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早就因廖仲恺竭力奉行与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政府成立后，廖仲恺统一财政、军政，更招来军阀政客之痛恨，尤其是占有防地税收的军阀魏邦平、梁鸿楷等，失意右派政客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特别忌恨廖仲恺。

朱卓文担任中山县县长时，因办事不力，受到廖省长的批评与处分；胡毅生在胡汉民支持下，在参加广州市长竞选时舞弊，又被廖仲恺奉命查办。朱、胡失意之余，转靠包揽捐务、沙田等自肥，牟取暴利供平日挥霍，廖仲恺又取消了他们的特权，不徇私情，废私包改为公投，朱、胡大为恼怒，欲置廖于死地而后快。

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他的寓所成为右派集会策划对付廖仲恺的秘密据点之一。

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邹鲁、邓泽如等十几人，常在胡宅开会攻击、诬蔑廖仲恺，叫嚷要让廖倒台，谋驱逐仲恺之办法。胡汉民对黄季陆授计说：“在第一届中央委员里，我们还是多数。你赶快到上海去见季陶、右任等人，叫他们赶快到广州来，我们召开一次一届四中全会，再商量出一个办法。”胡汉民一连写了十几封信要黄季陆带往上海、北京等地右派中央委员。胡汉民的这一阴谋被廖仲恺发觉而破产。

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组织了文华堂俱乐部，到处劝反对共产党的人参加。又办了《国民新闻》日报，公开攻击廖仲恺“年将50，兼职10余，……对于政府、党务用个人包办”等等。

右派政客及军阀认为要推翻三大政策，首先要将亲共的廖仲恺除掉。被他们列入黑名单的还有共产党员谭平山，以及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他们故意将暗杀计划张扬出去，企图恐吓廖仲恺洗手不干。何香凝听到风声，劝丈夫说：“既然有人谋算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廖不以为然地回答道：“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挡住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团体去开会或演说，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刺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预防那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廖仲恺甚至对朋友开玩笑说：“听说他们暗杀用的家伙，不是用手枪，是用盒子枪、手提式机关枪。我倒要尝尝它的滋味呢！”有人向廖仲恺通报敌人要暗杀他的消息，他说：“余无负于国，无负于党，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恤！”他向汪精卫表示：“我们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右派加紧了谋杀活动。朱卓文收买了一群亡命之徒，密勘东山百子路鲍罗廷公馆地形，计划趁廖仲恺、汪精卫、加伦等在鲍罗廷家开会时，密遣死士以炸弹机枪袭击之，而使众人同归于尽，后事为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获悉，他要朱卓文顾全大局，切勿使他为难，但并不追究责任。

此计不成，朱卓文等便决定伺机刺杀防卫不严的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廖仲恺、何香凝乘上103自备汽车，赶赴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参加例会，路上遇见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廖叫他上车一同前往。一路跟踪廖仲恺的刺客有40余人，他们布置在整条街上，躲在巷子里。在惠州会馆门内，也有数人在窥望，等待廖仲恺、何香凝的到来。

廖仲恺的汽车在惠州会馆门前停下，他们下车后，何香凝被妇女部的一女同志叫住，廖仲恺同陈秋霖即向会场走去，廖的4名卫士首先登台阶入内。廖仲恺刚举步上头门石阶，突然有凶手5人，2人预伏两旁，3人在廖之后用左轮手枪，向廖袭击。廖先受两枪即倒地，尚以手撑石级，作欲起势，凶徒复发2枪，遂不能起。陈秋霖痛苦地挨了两步，也倒了下去，卫兵也倒下了。

正在与人谈话的何香凝听到枪声，忙转过脸去，看见廖先生已倒在地上，意识到有人行刺，急忙大喊：“救命！救命！”“抓人！抓人！”她边喊边俯身抚着廖先生，问伤在那里？又是一阵枪响，子弹从她头上嗖嗖飞过，随



后凶手逃之夭夭，只有一名重伤倒在地上。

何香凝和那位女同志将廖先生架起，只见满地殷红！他的衣服上也是一片片鲜血，还往下滴着。她们将廖抬上汽车，叫司机赶快向公立医院开去。廖身中4枪，皆是要害处。

当汽车到达医院，才发现他大概在路上已绝了气。

廖仲恺逝世后，国民政府公布廖遇刺殉国情况。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提议下，成立了由汪精卫、许崇清、蒋介石3人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时局。

随后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委员长，李福林、吴铁城、周恩来、陈树人、甘乃光、杨匏安、陈公博等9人为委员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在缉凶过程中，先后捕押了凶手陈顺、梁博及其他有关案犯林直勉、郭敏卿、梅光培、赵士伟和粤军将校梁鸿楷、杨锦龙、邵桂章、梁士锋、谭启秀、张国桢等50余人。胡汉民闻风逃往汪精卫处，适汪外出未归，便与汪妻陈璧君同乘汽车去找许崇清，也被扣留，随即解往长洲要塞司令部予以看管。

从凶手的口供和遗下的实物罪证中，很快查清了参加暗杀案的人及与案件有牵连的很多人。凶手除在押的陈顺和梁博外，还有冯灿、吴培、陈细、黄基、冯允财、陈瑞、黄福芝等9人已逃往香港等地。暗杀的主谋是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以及胡汉民。胡毅生、魏邦平接受香港200万金贿赂，网罗粤军右派将校及亡命之徒进行暗杀活动。胡汉民要拔掉廖仲恺“这个眼中钉”，先找“铁血团有名的枪手”陈世来，不料陈世来不干。

胡汉民改找朱卓文，朱又通过郭敏卿物色到冯允财行刺廖仲恺。事后，胡汉民为冯办好护照，让他逃往南洋去了，通谋刺杀廖先生者有伍朝枢、吴铁城、傅秉常、陈其璵等人。

但是，由于3人特别委员会中的许崇清，平时因统一财政事对廖不满，而对缉凶态度消极；蒋介石并不关心追查凶犯；汪精卫担心政局因缉凶而不稳，危害自己既得利益与权位。特别委员会迟迟才发出搜捕令，致使暗杀主谋与大部分凶手逃出广州，逍遥法外。

甚至连已捕获归案的林直勉、梁鸿楷等人也越狱潜匿。检察委员会内又有吴铁城等人，给办案以诸多阻碍。对干涉及廖案的胡汉民等党政要员，汪精卫总以“说出去恐将摇动政府”为辞，不予究办。胡汉民也以养病为名得到释放。汪精卫叫他辞职离粤，拟派他为外交委员团主任委员，到京接洽外交事务，胡表示不就，汪派舰护送他去苏联游历，他去了莫斯科。

国民政府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分别解散收编了参与密谋的各部粤军，许崇清的老部下参与了廖案密谋，许遭到指责，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辞去总司令职务，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正在国民政府处理廖案之际，陈炯明残部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重新占据东江，计划进攻广州。香港政府给陈炯明30万发子弹和100多万现金支援，段政府助陈军30万元，并派海筹、永绩战舰和福建的张毅部助战。陈炯明与广东南部的邓本殷部，北江的熊克武川军勾结，企图三面夹击广州。

广东省人民迫切要求彻底肃清陈炯明等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广州军政学商工农各界1000多个团体10余万人举行集会，林伯渠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持大会，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陈公博代表省政府、冯芝荪代表总商会、谭植棠代表对外协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各阶

级要在共同目标下团结一致，扫除一切障碍，达到广东的统一。

9月21日，国民政府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罗加觉夫为军事顾问。东征军编成3个纵队，一纵队队长何应钦，二纵队队长李济深，三纵队队长程潜。10月6日，各纵队开赴前线。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东征出发前，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

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

五、保护百姓（不拉伕，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

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

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退却是军人一生无上之耻辱。

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5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

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

此次东征，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总部3500人组成运输队，随军东征；东江农民军，奋勇配合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东征军歼灭了陈炯明残部1万多人，完全收复了东江地区。盘踞东江多年的陈炯明军阀势力，归于覆没。身陷困境的陈炯明，只身逃往香港。

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行政委员，管辖惠、潮、梅各属。

粤南军阀邓本殷乘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调集大批军队，由阳江出动，向四邑进犯。陈铭枢率部奋起抵抗，双方激战3昼夜，但敌我力量悬殊，国民政府急调国民革命第三军和第二军一部增援。并任命朱培德为南路军总指挥，共产党员朱克靖为政治部主任。

南征军分4路进击，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会攻南阳，以期一举将敌歼灭。11月7日，攻占阳江。23日，攻占廉江。邓本殷率残部退到琼州。这时蒋介石又命李济深率部肃清琼州之敌。

1926年1月15日，李部开始渡海，至2月间，消灭了邓本殷残部，琼州大定。

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实现了统一。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湫头村人。祖父是位名医，好宾客，喜游览，以结交各方豪杰为人生乐事，父亲雅重实学，澹视虚名，以设教自娱，平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瘁心公益乡里，每有义举，无不参与。李家因人口逐渐增多，家用日感拮据。李父设馆不能劳作，收入又不足以敷家用，李母便一肩挑起家庭生活重担。

李宗仁兄弟 5 人从小便下田助母劳作，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舂米、织席，甚至清除牛栏，无事不做，皮肤晒得黝黑，身体十分健壮。由于经常赤足下田，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行走，亦如履平地。

李宗仁 6 岁时，父亲要他开蒙入塾读书，父亲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诗》，以后又教四书五经。但李宗仁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受苦，虽有严父督促，学业上终无突出表现。自谓“读书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父亲后来应募出洋，李宗仁被其父的一位至友带到省城桂林的高等小学读了 1 年书，但每学期终了，榜上都是最末一名，受到同学讥笑，遂辍学回家。

李宗仁学文的不行，习武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邻村拳师李植甫武艺高强，为人豪爽，李宗仁跟他学得了好几手拳脚功夫和舞枪弄棍的本领。然而舞枪弄棍不能当饭吃，15 岁那年，他进了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半年后回到家中，父母专门为他买了一部新式木机，让他从事织布。谁知，他在习艺厂学到的技术仅为一些皮毛，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以后虽几番操此手艺，都未成功。读书上断了希望，从业又如此艰难，使他怅然无着。

1907 年，李宗仁闻知桂林的陆军小学招生，陆军小学学生入学后，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还发有津贴。正在从业无着的李宗仁感到，自己天性好动，并能冒险，家中又无财力供他自费求学，便去报考了陆军小学。他虽未入正榜，但以备取第一名获得入学资格。不料，李宗仁在入学时迟到了 10 多分钟，失去了机会，沮丧而回。

1908 年，陆军小学招考第三期学员，17 岁的李宗仁被正式录取。

在陆军小学任职的，有不少是出类拔萃的同盟会党人，如李书城、冷遹等人，李宗仁个性向来持重，他的抱负是当一名合格军人，未加入同盟会。但他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学，如黄绍竑、夏威、陈雄、尹承纲等，日后这些人成了他的支持者。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小学学生一大半北上援鄂，学校因之停办。陆荣廷将陆军小学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便入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被陆荣廷选派到南宁的广西将校讲习所供职。

李宗仁在将校讲习所仅为准尉助教，他十分满足，工作十分勤勉。但讲习所开办不到一年，便停办了，李宗仁等候派遣毫无结果，只得郁郁返回乡里，在家中务农。此时他已结婚，妻子是邻村的李秀文。

李宗仁从南宁讲习所回到乡间，村里人多所不解，难免有絮絮闲言。家中经济又入不敷出，迫使李宗仁跑到桂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省立模范小学谋得一体育教员的差事。当体育教员很辛苦，月薪又低，为了多挣钱，他又设法在另一学校兼了体操课。尽管十分劳累，总算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

李宗仁感到用非所学，前途渺茫，心中郁郁不乐。

1916 年复，李宗仁突然接到一位在广西将校讲习所一起供职的同事来信，这位同事已在李烈钧护国军中当上了营长，热情地来信邀他前往共事。朋友的邀约，正合李心，他立即辞去学校职务，应召去南宁投军。

李宗仁乘船来到梧州，准备再搭船去南宁时，却被几位熟悉的军校朋友留了下来，碍于同窗之谊和朋友的热心，李便留在梧州在护国第二军充任了排长。

但护国第二军是滇军部队，李宗仁乃一广西人，虽有同学提携，在滇军中也难有发展。于是，李宗仁由同乡兼同学托人介绍，改投护国第六军桂

军林虎部。林虎乃有名的“彪虎将军”，李在林部第13团任排长。

不久，部队奉命向肇庆开拔，接着开赴北江地区。在粤汉路南段沿线与龙济光军发生激烈战斗。连长李其昭临阵胆怯佯称肚痛，不肯上前线，把部队交李宗仁代行指挥。

战斗打响后，士兵畏葸不前，李宗仁情急之下，举起连旗，带头冲锋，不料一颗子弹飞来，由右颊射入上腭骨，立时满嘴碎牙，血流如注。李宗仁将碎牙吐出，继续指挥战斗，最后支撑不住，被送往后方包扎。李伤愈出院后，因战功而被升为连长。

### 第三十九章 桂系崛起

1917年秋，李宗仁所在的部队改为护法军，开赴湖南安仁县，同北洋军作战。部队进入阵地后不久，营长因突发高烧，转送后方治疗，李宗仁奉命代理营长。次日晨，敌军在一阵猛烈炮火后，蜂涌而来，友军阵地被突破，为遏制溃势，李宗仁令营部号兵吹冲锋号向敌逆袭，不料竟无一兵一官向前跃进。李宗仁见情势危急，乃奋不顾身，跃出战壕，拿起营旗冲向敌阵。全营士兵见营长带头冲锋，也蚁附而前。李冲入敌阵后横冲直撞，异常剽悍，全营士气因之复振，喊杀声震天动地，顷刻间当面之敌被击退。李宗仁赶紧指挥全营占领阵地，不料在观察敌势时，被敌一排机枪打中胯下，李虽倒地，仍不忘指挥战斗，大呼冲锋不止，全营乘胜追歼溃敌。战斗结束，李宗仁因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得一“李铁牛”的诨名，骁勇善战之名在军中渐渐传开，李也因作战勇敢，指挥得当，被升为营长。

年底，陆荣廷与北洋直系军阀通款言和，李宗仁营奉命开往广东新会驻防。按惯例，每次部队开拔，长官莫不腰缠万贯而去。李宗仁为新进长官，虽厕身旧军之中，对军队扰政害民、军纪废弛很是反感，早存改革意愿，故在当上营长后，极为注意整肃军纪。

李营驻防新会，李宗仁决心从自身做起，拒受贿金，不徇私情，严令所部恪守军纪，爱惜名誉，颇得当地士绅和百姓称赞，上司也很满意。

1920年10月，在粤桂军为陈炯明击溃，桂军离粤向桂境撤退。桂军军纪向来废弛，素来不得人心，此番败退，广东军民纷起而堵截，粤民自动起而助战，沿途不是闭栅放炮，就是空室清野，桂军只好一路以抢掠为生，军纪愈发废弛。李宗仁所在部队担任撤退大军的后卫，一路所见尽是奸淫烧杀，落伍败兵为害百姓的惨状。名义上担任后卫的部队有制止士兵扰民之责，但李宗仁的上司就公开以抢劫提高士气。李目之不寒而栗，深感痛心，自思：“这种军队若不消灭，实无天理。”桂军1万多人一路上人马杂沓，狼奔豕突，部队撤至莲塘口，与粤军李福林、魏邦平部隘路相逢，又逢连宵大雨，桂军陈兵路侧，一筹莫展。林虎、马济深知此刻全军面临危境，认为已到最后一关头，只有实行中央突破，抢关夺隘，方可为大军夺得一条回桂的生路。恰于此时李宗仁率后卫一营赶到，自告奋勇前来请战。

林、马在关键时候，得一虎将，大喜过望，立即下达抢关命令。李宗仁即令全营进发，为激励士气，自己带号兵、掌旗兵走在最前面。在进入敌

射程后，即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敌阵，敌猝不及防，便以炮火猛击，李身边的掌旗兵和号兵纷纷中弹倒地，但李营在李宗仁指挥下已冲了上来，一阵殊死搏杀后，敌中央阵地被突破，全线动摇。这时接应部队蜂拥而上，莲塘口之敌遂被肃清。天险即下，峡口大开，全军万把人得平安通过，李宗仁之勇武过人也由此更加闻名。

桂军退回广西后，林虎因与陆荣廷不和，愤而出走，林部交由李宗仁上司黄业兴指挥。黄率部开往玉林驻防。

1921年6月，粤、桂重开战。粤军士气旺盛，桂军连连败北，陆荣廷见军心涣散，通电辞职。时李宗仁所在的黄业兴部正在攻打高州，闻梧州失守，陆帅下野，便主动放弃了攻击，急向玉林原防撤退。恰逢雨后山洪暴发，河水高涨，溃军在粤军追击下，群集河岸，草搭浮桥过河，全军半渡，浮桥突断，而岸上的人并不知情，一窝蜂向前挤，桥上人纷纷挤落水，被江涛卷走，李宗仁也被挤落水中，幸赖水性好，得抢游上岸。黄业兴收拾残兵，不分日夜退到玉林。几日后，闻粤军已攻陷南宁，黄又率部向钦、廉方向继续退却。

黄业兴是广东人，几日来，黄率残部不停地向粤境退却，其意何在？这使广西籍军官陡生疑虑和不安。李宗仁怕部队随黄入粤必然被粤军收编或遣散，他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拥有的这点“家当”，不是将被人夺去，就是将化为乌有。想到这里，他惕然心惊，赶紧去找人打探。

黄业兴的参谋长梁史是李宗仁陆小时的学长，与李有师生之谊。李便乘途中晚间休息，前往梁处打听。梁以实相告，道：“陆已下野，赴邕无前途，黄司令原籍钦州，官兵又多钦、廉人，故有将队伍带回广东，以备收编之意。”李表示：“所部桂人为多，尚不愿随往，如何？”梁道：“那只好由你自己酌裁了。”李宗仁回到驻地后，即先召集本营4个广西籍连长商量。众人议定，乘大队人马向钦廉方向匆促退却之机，率所部4个连，并尽可能多联络些其他连广西籍军官，伺机脱离黄部，暂时避入六万大山，静观局势演变，再定日后大计。当晚分头行事，秘密与其他营的几个广西籍连长联络。因利害相同，平素关系也较好，自然一说即合。他们都表示愿意服从李宗仁节制，李宗仁原来的4个连，加上活动来的7个连，合起来已有11个连的兵力，李遂与11个连长一起商定相机行事的计划。

次日，队伍开拔，李宗仁有意将所部调在后面移动，行进中又几次借口“休息”，让别的队伍先行。在部队走近六万大山边缘的城隍圩时，李宗仁见离大队人马已有一段距离，便令所部停止前进，召集各长官会议，向士兵宣布将部队开入附近山区的意向，谋一条出路，上下官兵一致同意。李马上下令各连掉转队伍，向山区开进。

前面部队见李部久未跟上，派一参谋赶来，李宗仁以实情相告。黄业兴部下有人主张派兵回来强迫李部一起前进的，但黄未予采纳，道：“现在大局已变，人各有志，不能勉强，陡然引起自家火并，不如各奔前程为是。”李把部队拉入山中，千余人在山上搭起棚帐或茅庐，觅地住宿，官兵心理上都有异样感觉。次日晨，便有两连人马不愿留在六万大山，乘夜幕逃去。

李宗仁部在玉林驻防时，与当地士绅有过交往，相处甚洽。他便派员分访，请求接济。士绅即刻组织起来，为之筹划，千把人的粮饷暂有着落。

其他部队的一些散兵游勇不断进得山来，特别是莫荣新部的一个营，在营长陆超率领下，因兵荒马乱，无处容身，愿同李部合伙，李欣然容之，

在几日内李部人马已达近 2000 人。李宗仁靠这支人马，称雄一方已没有问题。于是，李宗仁决定以玉林地区和六万大山为创业基地，整军经武，养精蓄锐，以待日后大举。

李宗仁默察形势，认为手上这支力量弱小，与入境粤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在山中单靠地方接济粮饷，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随机应变，暂且归附粤方。于是派人到玉林去与陈炯明接洽，表示愿意接受归编，但要求划玉林地区给李部驻防，负责维持五属治安。并提出部队直属于粤军总部，为一独立单位，兼有两省头衔，防止被乱行调动，无故缴械，陈炯明见桂局未平，李宗仁部人枪齐全，若不答应，恐怕对粤军不利，便接受了李的条件，委李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命部队开往玉林以东的北流驻防。

李宗仁抱定中立宗旨，对粤方不即不离，虚与委蛇。其时，马君武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省长，在南宁组织政府。李宗仁遂以马君武是桂林同乡关系，到南宁活动。从马君武处谋了个“玉林警备司令”的正式名号。

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叛乱，尽撤在桂粤军回粤。在玉林静观局势的李宗仁赶紧宣布与粤军脱离关系，宣布就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并趁机扩大了 7 个县的地盘。

此时，广西全境一片混乱，进入所谓“自治军时代”。广西有民谣形容当时情景：“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狗，杀人兼越货，无日不干戈。”百姓因此横遭劫掠，村落墟户洗劫一空，几近“鸡犬无声，非复人境之象”。

各路自治军司令纷纷向北京政府表示效命，北京军阀分别加以册封。李宗仁得任桂林镇守使。

受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各路英雄”，联合向南宁进军，并在南宁相约召开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会议，李宗仁也被邀参加。李宗仁因年龄、资格、经历比不上那些旧式军人，故表示：“凡是诸位的决定，我一概无成见。”但他实际上却看不起那些行为粗俗、胸无点墨的“草头王”，决心收拾广西局面，统一八桂。

会上推出林俊廷为全省自治军总司令。开会结果报北京政府核准，北京政府也照准不误。林俊廷被任为广西绥靖督办，蒙仁潜为省长，陆云高为财政厅厅长。但是林未就职，蒙徒有“省长”空衔，号令不出郭门，陆的财政厅也只有南宁一带自己原防地收收税罢了，一切仍是旧时模样。

李宗仁来南宁，主要是察看风向，见局势依然混乱，乃回玉林。

北京政府又挟持陆荣廷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陆在武鸣召集旧部各自治军首领开会，要求取消自治军名目，改编各部队番号，李宗仁的玉林部队被改编为广西陆军第 5 独立旅。

李对陆的任命既不当面拒绝，也不正式就职。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手，什么师长也好，旅长也好，镇守使也罢，都可以接受，这叫做“以不变应万变”。他抱定的宗旨是：顺应时势，和缓各方，守境自保，待机而动。这一韬晦策略实乃明智之举。

李宗仁在玉林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实力。他的陆小同学黄绍竑带着一营兵力并入李部。

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山嘴村人。黄家是容县有名的望族，黄在陆小加入学生军敢死队，随部队开赴湖北。1912 年，入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继续学习，1914 年结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6 年毕业后回广西百色，在马晓军的陆军模范营当连副。以后升为连长，模范营扩编为

团时，黄任营长。后马晓军被粤军改编，马被任命为田南警备司令，不久，粤军回粤，桂局崩溃，马晓军部调往南宁驻防，马晓军知南宁难以久守，便率部撤往广东。然而沿途遭到自治军的拦截，马晓军对前途感到彷徨，将部队交给黄绍竑，自己借故离队。

黄绍竑便将部队拉到自己的家乡容县，图后区处。李宗仁对模范营一帮青年军人久有联络之意，便亲自去容县找到了黄绍竑的胞兄黄天泽，表示：“都是同学，一切问题好商量。”不久，李宗仁又派夏威带着委任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的任命状和军饷，找到疲惫不堪的黄绍竑。黄遂同意与李合作，率部来到玉林。

李宗仁部的人马由原来的 2000 多人，扩大为 3000 多人，2 个支队增为 3 个支队，李宗仁玉林集团如虎添翼。

李宗仁又罗致人才，设法把黄旭初从蒙仁潜部保释出来。

黄旭初是广西容县人，1913 年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因学业优异，同年冬又考进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桂，也曾在马晓军模范营任连长、营长等职，后调任广西督军署中校参谋、省长公署军政处总务科长。黄为人沉毅敬谨，文质彬彬，恬淡自守，为幕僚的最佳人选。李宗仁素慕其名。

粤军从南宁撤退后，黄旭初被自治军蒙仁潜部扣留，指为“通敌有据”，险遭杀害。

时李宗仁正好在南宁与各自治军首领接洽善后。知黄在押，即向蒙力争，将黄保释出来，并和他一同回玉林，派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黄旭初为李宗仁主持戎幕，运筹帷幄，全军赖其辅导，上、下归心。

由于李宗仁推诚结纳军校同学，散处广西各处的军校生闻之，相率来归，一时人才云集，声势大振。在李部的 3 个支队中，营以上干部军校出身的占大半数。

李宗仁不仅积极罗致军校生担任部队的中上级长官，对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也十分注意培训。他特意创办了“玉林干部教练所”，专调本军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受训。另设教导大队，对军内班长及准备充任班长的上等兵施以严格训练，为部队培训了大批基层骨干，部队素质和作战能力大为提高。

黄绍竑是个受过较高军事教育的人，所部又是模范营底子，官佐士兵思想活跃新颖。

黄绍竑接受李宗仁委任，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本意仍然想与粤方联络，将来方可求得发展。黄来玉林后，虽受到李宗仁厚遇，不仅人枪原封未动，还专门划定两县地盘给黄管辖。但所部偏处玉林一隅，顶着自治军的牌子，总感耳目闭塞，形同草寇，终非善策。闻得孙中山已击败陈炯明，在广州再次组府，并又派兵西上，准备入桂收拾沈鸿英，黄顿感机会来临，准备向梧州发展，若能拿下梧州作为自己日后进取的根据地，不仅可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增厚财力，而且就此走出玉林，争取新的发展。

于是，黄绍竑私下派出所部参谋陈雄到广州去打探消息，与其时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取得联系，令陈、白相机同广州革命政府联络，表明意图。

白崇禧，字健行，广西临桂县南乡会仙圩山尾村人。1907 年考入陆小第一期，因病中途退学，后转入桂林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就读。1911 年参加学生军北上，1912 年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三预备学校，1914 年入保定军校，1916 年同黄绍竑一起毕业回桂，又同在马晓军模范营任连副，后升为连长、营长。1922 年，马部在百色被自治军刘日福部袭击，白崇禧率兵一部逃至贵州，

后又率部返回百色，途中巡哨时跌伤左脚，赴广州就医。

陈雄同白崇禧会面后，即积极活动，不久便在朱培德、廖仲恺引见下，晋谒了孙中山。向孙汇报了黄部情况，表达了参加革命的愿望，得到孙中山的赞许，孙命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1军军长。并命令在江西的粤军魏邦平、李济深部策应黄部起义。

黄绍竑取得孙中山的支持后，便以“假受编”的方式，利用族兄黄绍竑在沈鸿英部下邓瑞征部当秘书的关系，表示愿率部投奔，骗得沈军委任“桂军第八旅”旅长头衔，获准率部进驻戎圩一带。他在行动之前，将计划向李宗仁和盘托出。

李宗仁深知黄勇敢、精敏，是个不受羁縻的人才，事已至此，挽留也难，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黄向李表示：“日后倘能成功，还将拥戴李为首领，绝不独树一帜。”李宗仁答应了黄绍竑的请求，在黄未取得梧州前，一切费用仍然照拨。万一黄部失败，便设法收容。但黄部在开拔时，不仅带走了自己的部队，还带走了前去接防的李部两营。此事不仅令李宗仁大为不快，也激起了玉林集团其他将官的愤慨。李宗仁虽然十分恼火，却竭力平息众怒，与黄部保持了互相呼应，暗中支持的关系。对此，黄绍竑十分感动，说李宗仁气量宽大，能忍人所不能忍。从此甘居李下。

黄绍竑率部驻戎圩，白崇禧、陈雄也从广州返回。他们把举事日期定为7月中旬后，火速派陈雄去广州呈报，又与江西的魏邦平、李济深取得了联系。白崇禧亲往玉林同李宗仁通气。

白崇禧同李宗仁彻夜开诚倾谈，论列两粤全盘局势。白对李说：“此举若成，功劳岂仅在于广西。”李然其言，慨然答应拨兵相助。李提出，梧州事成后，李、黄两部还应佯作分道扬镳，黄在梧州联络粤中革命力量，李则仍在玉林与自治各军势力虚与委蛇，此乃“内刚外柔”策略。经此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

李的意图得到白的赞同。李、白此次会面，双方推心置腹，彼此倾慕，相约患难与共，由此奠定李、白此后20余年合作的基础。

7月中旬，黄绍竑部突然向退到戎圩的沈军一部八九百人围攻，将该部缴械，亮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旗帜。尔后黄绍竑、白崇禧率部向梧州进发，与粤军夹击梧州。

驻梧州的沈部旅长冯葆初，见前后受敌，无路可退，也就改换旗帜，欢迎粤军。黄绍竑部与粤军李济深部胜利会师梧州。李济深部中的大部分干部同黄部中的主要干部，同为保定军校同学，感情融洽，意气相投，梧州会师成了两广学生集团的大会合。

李济深打算把梧州的防务交给黄绍竑，于是指示团长兼梧州军警处处长的邓演达助黄，在抚河花艇上设下鸿门宴，用计擒杀了冯葆初。

李济深、邓演达均向孙中山推荐黄绍竑主持梧州军政事务，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于是黄绍就便在梧州正式成立了“讨贼军总指挥部”。黄部又在粤军帮助下，攻下藤县，收编了该地自治军和散兵民团，在短短的两个月中，部队由1000人扩至4000人，军威震动全省。

李宗仁从黄绍竑出师大捷，深深感到：自己如继续据守玉林一隅，面对革命潮流无鲜明立场，势难得到部下和民众之同情。他的部下认为，无论如何李宗仁在名义上不能摆在黄绍竑之下，一致要求把部队改称“定桂军”。



恰巧此时黄绍竑派副官吕竟存、团长伍廷飏到玉林来与李进一步相商此后合作问题。于是两军商定下步作战计划：先协力肃清贵县、桂平、江口、平南的自治军，解除心腹之患，占领梧州到贵县的水路交通线，然后伺机再向柳州发展。

两军分头行事。黄部讨贼军首先溯江而上，进攻平南、江口，李宗仁的定桂军则袭取贵县，并疾趋桂平。平南、桂平、江口一带是陆廷荣所部陆云高，张希栻、刘权中等部的防地。陆云高部受到李、黄军夹击，仓皇向蒙山、武宣方向败走，其他部队残兵败将纷纷投诚。这样，广西最富庶的梧州、浔州、玉林 3 个地区统落李、黄之手。

在粤桂军刘震寰命桂军陈天泰师调集都城一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谋取梧州。

黄绍竑当即与李宗仁商量，决心以武力先发制人，解决陈天泰部，此议得到粤军李济深支持，并通力合作，将陈天泰师击溃，集体缴械。

李宗仁自出玉林后，初试锋芒，便连连告捷，大有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概。定桂军的司令部遂由玉林迁到桂平，在这里娶了一位年方 17 的貌美新妇郭德洁。

李、黄“定桂”、“讨贼”军的崛起，使广西成为三雄鼎立的局面，即：沈鸿英部在抚河、昭平以上至桂林一带；陆荣廷部在横县、武定以上，柳州、南宁、左右江一带；李、黄部在梧州、玉林、浔江一带。陆、沈两部各有 2 万多人枪，李、黄两部合起来则不到 1 万人。

李、黄共同计划向上游发展，以驾驭广西全局。他们密议利用陆、沈同床异梦的矛盾，挑起两个强敌间的战事，尔后各个击破。然而在先讨陆还是先讨沈的问题，李与黄、白间意见分歧。李认为，沈特凶悍，为人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言，久为两粤人民所共弃，先行讨沈，定可一快人心。而对陆兴师问罪，李则有恻隐之心，心头难免不安。黄、白认为李的“联陆讨沈”之策，出于对陆“不忍”，对于平定广西之大略实为不智，故不赞成。他们提出“先联沈讨陆”。认为此是“联弱攻强，避实击虚”，这样对陆方胜券可操，沈部也易翦灭。

李宗仁斟酌再三，接受了他们的方案。当时陆、沈两部在北京政府调解下，已有讲和息兵、合而谋取梧州的动向。李、黄遂决定先发制人，乘陆、沈未合作，先派人与沈鸿英联系，诱之以利，答应在倒陆后，将来地盘分配，桂林、平乐、柳州尽归沈有。沈为一枭雄人物，对李、黄的话当然也未尽信，但在盱衡全局后，认为陆荣廷势大，是自己称王广西的主要对手；李、黄部乃初出茅庐，不足以惧，于是承诺与李、黄合作，倒陆后再作后图。

李、黄乘陆、沈在桂林对峙，迅速集中两部兵力于贵县，而后分左、右两路：左路由李宗仁亲率，指挥讨贼军伍廷飏、夏威、蔡振云 3 部和定桂军李石愚支队，沿邕江而上，直取南宁；右路由白崇禧率领，下辖定桂军何武、钟祖培部和讨贼军俞作柏团，攻打宾阳、迁江、上林，再转武鸣，对南宁作迂回包围。黄绍竑则指挥剩余部队留驻梧州，策划各方补充、策应。

李宗仁的左路军在击退陆部韩彩凤军后，很快进至南宁，在南宁附近与陆部蒙仁潜、林俊廷的部队展开血战。右路白崇禧的部队，连下柳州、庆远，也奔南宁而来。在这种夹击攻势下，南宁守将林俊廷不敢抵抗，率部窜逃，省长张其也从南宁仓皇出逃。李、黄军遂于 1924 年 6 月 25 日占领南宁，两部会师，首战告捷。

南宁的克复，使李、黄军两部士气大振。然值此大战初胜，尚待一鼓作气，继续进取之时，李、黄两个系统的部队都混集在一起，双方部属为分夺权利，几起争执，互不相让，嫌隙已见。两部将领中有彼此不服、欲争高低之人，几临火并边缘。

李宗仁、白崇禧见情形严重，大局未定，众敌环伺，若内部为权为利，先起争执，必定复蹈昔日太平军诸王内讧、瓦解失败的覆辙。于是李、白商量后，立即联名打电报给在梧州的黄绍竑，要其克日来邕，并有“你如迟日不来，危险就会发生”等语。

黄绍竑接电后，知情形紧急，乃昼夜不停，赶至南宁。李、黄、白 3 首领见面后，白即对黄晓以利害，白道：“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留着大胡子的黄也深明大义，回道：“决不能这样做，一切以团体为重，恪守前约，推李为首。”3 人达成默契。李、黄将两支部队中营长以上干部召来会宴，席间黄起立致词，提议：“立即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指挥部，拥护李宗仁当联军总指挥，本人副之。”言毕，黄举杯率在席诸将领向李宗仁敬酒，大家共干一杯。饮干后，黄擎杯在手，向诸将宣誓说：“今后我们将领，誓为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两意的，当如此杯！”说完将酒杯猛掷于地，跌得粉碎，全场空气肃穆，众将为之动容，纷纷表示：“既然胡须老都这样做，还有什么可说。”于是，两军将领尽弃前嫌，握手言欢。

联军总指挥部随即成立。李、黄为正、副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黄旭初为副参谋长，吕竟存为副官长，黄钟岳为秘书长，联军属下各纵队将领也作了统一调派。新桂系此后长期实行李、黄、白三巨头领导体制，李、黄两部由分而合，一致合作，共举定桂大业。李以仁厚、坦白、公正、诚恳待人，不念以往之瑕疵，力求事后之改进，尤其严禁任用私人，对自己原部之陈旧落伍分子尽力淘汰，毫不徇私，从而使这一新的团体进一步摒除了派别歧见。

## 第四十章 南北大惨案

陆、沈在桂林的战事正打得难分难舍，陆“老师”被围在桂林城内，对南宁方面无暇顾及，李宗仁乃兵分 3 路：右路白崇禧指挥，左路胡宗铎指挥，中路俞作柏指挥。3 路中以白崇禧右路为主攻方向，白崇禧率部乘胜一鼓而下，拿下柳州后，即掉兵转向上雷、庆远方向追击，与陆之骁将韩彩凤大战于上雷、大茂桥。李宗仁也亲率援兵援白，韩部全线崩溃，落荒而逃，窜入黔湘边境。右路大胜，中、左路也进展颇顺。左右江至南宁以北，尽为李、黄据。

陆荣廷见大势已去，无心再战，放弃桂林，退入湖南。于 9 月 23 日通电下野，赴苏州做寓公，结束了陆氏统治广西 40 余年的历史。广西由三强鼎足之势变为李、黄联军与沈鸿英两强对峙的局面。

沈鸿英窥伺到李、黄联军不可小觑的实力。知再不动手，其势更不可

逼，乃在讨陆战事稍平后，立即在桂林打出广西建国军总司令的旗号，并以“出巡”为名，檄调大军分3路向李、黄部占据的浔、梧一带进发，实现其独占广西的美梦。

沈鸿英的动向，早在李、黄等意料之中，在讨陆战事接近尾声时，李宗仁已密将所部主力由南宁调赴浔、梧一带备战。

李宗仁急需粤军为助，乃于11月间正式就任广东革命政府任命的“广西绥靖督办”职，并在就职后，在梧州由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定桂、讨贼联军也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军、第二军，李兼第1军军长，黄为第2军军长，白为督办公署参谋长。

李济深派出所部陈济棠旅归李、黄节制，参加讨沈。

1925年2月1日，李宗仁发出讨沈通电。白崇禧当日率精兵赶至武宣，先敌一步占据有利地形，将敌侦察前哨击溃。次日，敌大军蜂拥而至，白率兵退入武宣城中，固守待援。

李宗仁率援兵赶到，双方大军在武宣一线摆开阵势，展开了激烈争夺，李宗仁亲冒炮火，上阵督战，再振“铁牛”威风。经两昼夜鏖战，敌始有不支之势。李部李石愚部从贵县赶到。李宗仁乘机指挥部队猛攻，敌崩溃，纷向桂林、良丰方向逃窜，李部乘胜追击。派往贺县和平乐方向的粤军陈济棠部和桂军俞作柏部也在迎战沈军其他两路后，一一得手，及此3路会合，进击桂林。2月13日，桂林告克复。敌首沈鸿英哀叹：“我沈鸿英10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粤、赣，谁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桂林克复后，李宗仁不稍懈怠，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率各部乘胜追击沈军残部，扫荡沈氏残余。沈鸿英知大局已定，在主力被歼的情况下，只好暂作藏匿，以后化装逃跑，避居香港当了寓公。

李、黄、白正收拾桂局时，不料，滇桂边界又开来了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浩荡大军。

3月初，唐军由龙云、胡若愚率领的一路已逼近南宁。李、黄部因桂柳方面对沈战事尚未结束，粤方援军也未抵达，故先避其锋芒，弃守南宁。唐军不战而入邕，更加趾高气扬，以为广西指日可下，于是前锋越过昆仑关，直逼宾阳。而另一路由唐继虞率领的军队，却迟至5月才取道贵州进入桂境。两路滇军东、西距离很远，加上滇军的骄横，给李、黄运用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战机。

5月上旬，粤方派来了原滇军顾品珍部下范石生部约1万人开至贵县。李、黄、白、范4人聚首，拟定了作战计划，并通电讨唐。

李集结兵力，挫唐前锋，夺回昆仑关，回攻南宁，唐军突遭主力迎击，猝不及防，退守高田，又遭李部夹击，弃关而逃，缩回南宁，重新布置防御。李部围攻南宁，因城墙坚实，敌军抵抗顽强，城垣费时半月不破。

唐继虞部从另一路由黔边长驱直下，向柳州逼近。桂境内陆、沈残部乘滇军入侵，蠢蠢欲动，勾结滇军向李、黄部反攻，柳州告急。李宗仁将南宁围城任务交黄绍竑、范石生担任，自己退驻八塘，部署援柳事宜。

柳州方面的主将李石愚在前线指挥时阵亡。李宗仁闻讯分身不得，急电黄、白赴柳州坐镇指挥。

黄绍竑带病赶至柳州前线，先行率领从南宁方面调来的两纵队主力对滇军展开进攻，击败唐军前锋吴学显。又向围攻柳州的滇军进行突袭，解了柳州之围。白崇禧也率部从桂林赶到，向滇军展开全线反攻，滇军大溃，逃

至沙浦，黄、白紧追不舍，两军在沙浦对垒，双主帅都亲自上阵督战，动用兵力数万以上，直打得昏天黑地，浮尸满江，最后滇军不支，开始向南宁方面退却，不料途中又遭截击，死伤无数，唐继虞也受重伤，不得不放弃与南宁滇军会合的希望，从西面狼狈窜回云南。

滇军沙浦败讯传到南宁，守城敌军无心作战，加上城中患疫，士兵死者上千，云龙、胡若愚率余者弃城而去，南宁城头变幻霸王旗。

至此，干戈扰攘近 5 年的广西战事终于平歇，李、黄、白成为广西一统天下的新主人。

李宗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第 7 军军长，黄绍竑为第七军党代表和广西省省长。至此，两广实现了统一。

北京政变后成立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实际上是受奉系张作霖势力的控制，就连原来扶植它起来的国民军也遭到了排挤。

1925 年 11 月，当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国民军宋哲元部即乘机占领了热河，12 月初，国民军又向直隶督办李景林提出假道天津出关援助郭松龄的要求。李景林在郭松龄发难时双方有过联合倒张的密约，后来李景林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拉拢下，背弃了前约，他为阻止国民军进兵，宣布与山东军阀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并通电讨伐冯玉祥。于是，冯、李两军在杨村等地展开激战，双方经过半个多月的争夺，李景林部于 12 月 24 日败退山东。

国民军进驻天津，从而占有了直隶全境。这时国民军拥有 40 余万人马，据有京、津、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察哈尔、绥远等地，控制有京奉、津浦、京汉等交通干线。

在国民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军势力的扩大，日益引起帝国主义和奉、直系军阀的恐慌，它们便进一步勾结起来对付革命势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的代表向张作霖提出履行“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地位的条款，作为出兵援助张的条件。张作霖卖国求援，接受了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悍然出兵直接援助了张作霖，导致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奉系军阀的统治重新得到巩固。随后，日、英又策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使他们在“讨赤”的名义下，于 1926 年 1 月初达成了“谅解”，一致对付革命势力。它们的矛头，首先指向倾向革命的国民军。

张作霖立即策动直系吴佩孚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对国民军实行三面夹击。

张作霖以追击郭松龄残部为借口，进犯关内，占领了山海关。

吴佩孚在英国人的援助下，分 3 路出兵进攻河南岳维峻、邓宝珊的国民军二军。命靳云鹏由鲁西进攻豫东，寇英杰由鄂北进豫南，刘镇华、张治公由陕北东部进攻豫西，并勾结晋系军阀阎锡山出兵娘子关向北进犯。直军相继攻占了开封、郑州、洛阳、河南，国民二军被击溃。直鲁联军也开始了直隶进犯，先后抢占了沧州、献县等地，并突破马厂，逼近天津，使国民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冯玉祥被迫于 1926 年 1 月通电下野，由张之江署理西北边防督办职务，统率部队。冯玉祥抱着满怀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张之江为使国民军摆脱危困的境地，又采取了迎合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

3 月 12 日下午，日本出动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

现这一非常情况后，即以旗语令其停止前进，日舰置之不理，炮台守军遂发空炮警告，日舰竟以机枪射击。中国守军猝不及防，死伤 10 余名，国民军被迫予以回击，将日舰驱出大沽口。

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抗议，颠倒黑白，诬称国民军首先开炮，并纠集英、美、法意、荷、西、比等 8 国公使，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 5 条无理要求，限 48 小时内答复，并声称如得不到满意的保障，各国将采取必要之手段。

日本还要求中国政府严惩大沽口守军军官，并索取 5 万元赔偿费。各国声言以“保护侨民”为名，共派遣 20 多艘军舰，云集在大沽口。日本声言还将派 15 艘军舰开往大沽口；各国海军司令官决定将采取自由行动，“有反抗行为，即行炮击”，侵略气焰极为嚣张。

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慨。3 月 14 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大规模的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群呼打倒助奉日人，声气壮烈。

大会向日本提出 7 条抗议。次日，天津总工会等 70 余团体召开国民反日紧急群众大会，要求严惩侵略者。上海总工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沉痛陈言：“似此横暴，凌我国权，侮我人民，于斯已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切望全国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雪国耻。”16 日，中共北京地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李大钊、刘伯庄、陈乔年、陈为人、邓洁、陈毅等 100 多人出席会议，李大钊发表了演说，提出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的战斗任务。

17 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 200 多个团体在北京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定驱逐 8 国公使出京等 5 条决议。会议派出陈毅等代表赴国务院，王一飞等代表赴外交部请愿。陈毅等人赴国务院请愿时，竟有 6 人被卫兵用刺刀刺成重伤，10 人为轻伤，造成流血事件。

两路代表返回后，一致认为段祺瑞政府毫无接纳人民意见的诚意，决定次日全力召开国民大会。

3 月 18 日上午，北京大学等 80 余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和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 140 余团体，2 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场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撤退外国兵舰”等标语和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 个大字。徐谦、李大钊、顾孟余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通过了《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以及 8 项决议案。

会后，由 2000 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游行。

段祺瑞军阀政府采用“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做法，一面派代表到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对 17 日卫队行凶事件表示歉意，一面在执政府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队，附近街道胡同里埋伏了暗藏凶器的便衣侦探，准备对游行请愿群众下毒手。下午 1 时许，游行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代表安体诚等 5 人人内，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遭到卫队拒绝。

代表们出来向众人报告交涉情况，群情激愤，要求去吉祥胡同段宅去。正当整队出发之际，执政府门楼内响起了信号枪，在卫队旅长指挥下，一时警笛狂鸣，大门外卫队同时举枪向群众队伍平射，一批批手无寸铁的群众倒

在血泊之中。凶残的卫队官兵到处追击追杀，周围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铁棍随意乱砍乱打。群众相互救援，拼力反抗，女子师范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身负重伤，仍然顽强地挺起身子，万恶的刽子手竟继续用大刀向她乱砍，终惨遭毒手。

在这场持续半小时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共死难 47 人，伤 200 多人。在惨案发生时，李大钊面对敌人的屠杀，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退却，曾一度被捕，幸其回答机警，得以脱险，陈乔年在斗争中英勇负伤。这一惨案，历史上称为“3·18”惨案。

当晚，李大钊召开党的北方区委、青年团北方区委联席会议，决定领导群众继续斗争。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 150 余个团体，也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并由陈毅负责，领导各界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4 月 20 日，段祺瑞终于通电下野。

但是，人民从前院驱出了虎，后院来了狼。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冤家来到北京相会，他们在联合反对国民军时重新和好，于是在北京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换兰谱，结为兄弟，北京由直奉两系把持。但是，苏、闽、浙、赣、皖“五省联帅”孙传芳，忽又改变了对吴佩孚的态度，仍然执礼甚恭。他通电主张颜惠庆内阁复职，摄行总统职权。又有北京治安维持会领袖王士珍、赵尔巽赞同，张林霖不得不表同意。

5 月 12 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13 日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杨文愷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看起来是奉、吴、孙 3 方面的混合内阁，但是属于吴系的外交“名流”共占 4 席（颜、顾、施、王），实质上是以吴系为核心的亲西方内阁。

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邹鲁受国民政府派遣去北京支援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于 1925 年 9 月离开广东，先到上海进行阴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与谢持、戴季陶、叶楚傖、邵元冲等一伙右派会晤，共商到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决定在分途去北京的途中，联络各地有派分子去参加北京会议。

他们到达北京后，即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名义召集会议，不料却遭到以李大钊、于树德为首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抵制。10 月 25、26 日，邹鲁、林森、谢持等纠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一小撮反动分子，手持铁棍，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寻衅闹事，几个人把守大门，一伙人冲进房门，翻箱倒柜，连墙角厕所等处也进行搜查，一若强盗入室，结果挑起双方武斗，抢去执行部小印一方，簿册若干种。

在北京开会不成，又拟改在冯玉祥国民军驻地张家口举行，但遭到冯玉祥的拒绝。

这伙右派走投无着，骑虎难下，遂决定仍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会议。11 月 18 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吴稚晖不赞成立即与共产党分裂，主张此事从缓进行，这个意见得到戴季陶、沈定一的承认。

关于暂缓反共的消息一传出，右派团伙立即大哗。因戴季陶、沈定一曾参与发起筹建共产党的活动，以冯自由、马素为首竟误认为预备会议是共产党会议，是戴季陶、沈定一在为共产党活动。于是，他们雇佣了一伙流氓，涌向西山香云旅社，将戴季陶、沈定一绑架，进行凌辱。戴季陶受此“奇冤”，

羞愤不已，乃离京南下。

出席西山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叶楚傖等 8 人，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 2 人，监察委员张继、谢持 2 人，共 12 人，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 24 人，候补执行委员 17 人，中央监察委员 5 人，计 46 人，不足一半。这是一次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

西山会议为期一个月，至 1926 年 1 月 4 日收场，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

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10 人，要开除共产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9 人，即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是荒唐之举，激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分子的强烈反对。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西山会议表示决不承认的态度，遂于 1925 年 12 月，在广州正式召开了第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 9 人是无效的。

1926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陈延年与鲍罗廷共向商议，计划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对西山会议派的批判，狠狠打击右派，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以进一步巩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 1/3，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优势。

但是，这个正确的计划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坚决反对。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曾义正词严地批驳右派，而内心世界相当复杂。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融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这种困惑的心情迫使他在与国民党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或者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或者是主张退出国民党。

1925 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并由这 5 人组成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李大钊、项英、谭平山、李维汉。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于 5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66 个工会的 281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工人 54 万余人。大会选出林伟民、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正副秘书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大会闭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国大风暴的五卅运动。

5 月 7 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

5 月 10 日之后的几天内，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

人还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时，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我们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

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举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队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看见已有好几个工人被打伤，他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啦！”并带领众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为反击的武器。

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来到门口，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他毫不畏怯，忍着疼痛，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川村又接连向他的腹部、头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于卧倒在血泊之中，虽经工友们送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0岁。

这次血案还有11人受重伤，几十人受轻伤。

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多次签发中共中央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闸北潭子湾工人俱乐部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但是，上海工人、学生因为募捐活动和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结队去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

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决定分头向各学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于5月30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

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听众十分激愤。下午，身高虬髯的巡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声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和听众睹此惨状，个个义愤填膺。

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籍，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

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



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 第四十一章 中山舰阴谋

陈独秀在 1925 年 10 月，共产党北京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

陈独秀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一直以客卿自居，国民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退出国民党，他和戴季陶的出发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们的一致反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其精神是积极的，但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其中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这个规定当然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北方政治形势的恶化，使陈独秀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他片面地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并与吴佩孚勾结起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处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表明革命低潮到来了，一味主张在革命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

于是，陈独秀同张国焘一起代表中共中央，约请参与过西山会议派活动的叶楚傖、邵元冲、孙科在上海，就国共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向他们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还邀请他们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会谈中双方就继续合作达成了几点协议。

陈独秀又急不可耐地给中共广东党组织写信，要他们欢迎这些右派回广东参加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要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罗进去，说这样可以团结国民党。陈独秀提出的国民党中央委候选人名单，有很多人都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陈独秀还把完全附和他的张国焘派到广州，担任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团书记，指导中共在大会的活动。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和鲍罗廷开会，要求贯彻执行陈独秀的退让政策，鲍罗廷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广东区委赞成鲍罗廷的意见，反对同孙科、邹鲁、叶楚傖等人的协议。鲍罗廷气愤地质问张国焘：“为甚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你们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张国焘回答说：“孙科等人是中派，中央既已与他们有协议，自不能

中途变更。这不是退让政策，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张国焘还向汪精卫表示，在选举国民党中央中委时，可以减少中共的名额。

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共 278 人，其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 168 人，中派代表 65 人，右派代表 45 人。大会主席团由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谭平山、恩克巴图、丁惟汾、宋庆龄等 7 人组成，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吴玉章。

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多数，他们参加了大会的各个主要机构。在大会上，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林伯渠作了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报告，谭平山作了党务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宣传工作报告，邓颖超受何香凝委托作了妇女运动报告，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作了大会发言。

大会对西山会议派表示强烈愤慨，但蒋介石和孙科却秘密策划阻挠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他们看到这个企图不能得逞时，就把出席大会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部分代表召集起来，让汪精卫出面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代表名义，向大会提出，对西山派尽量从宽处理，但却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和批判。

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给予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傖、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 12 人警告处分，责其改正错误，限其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有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即开除其党籍。唯念戴季陶为党奋斗有年，翊赞总理，改组本党，颇有功劳，大会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还通过决议，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顾问。并赠送鲍罗廷银鼎一座，上镌刻“共同奋斗”4 字。

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时，由于张国焘坚持对右派的妥协退让，新当选的 36 名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只有 7 人，即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杨匏安、恽代英、吴玉章、朱季恂，加上国民党左派朱培德、谭延闿等人在内，只有 14 人；国民党右派、中派则有 15 人，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等右派都当选了。12 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只有高语罕一人。

在这次选举中，原来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的新右派头目蒋介石，竟一跃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接着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共 9 人：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

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伪装左派，浪得不少声誉；他作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拥有一部分军权，取得东征的胜利，在大会上备受礼遇。他又以军事领袖自居，在大会上作了各种引人注目的表演。

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与陈独秀多次吹捧蒋介石有关。1925 年 10 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蒋介石手创有力的党军，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功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12 月，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先后发表了两篇吹捧蒋介石

石的文章，把蒋介石列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队伍，并把蒋排在汪精卫之后，称他是第二号左派领袖。苏联派遣来的军事顾问亚·伊·列潘诺夫，也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

历史上称此时的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的私人生活也开始放荡不羁，他和妻子高君曼感情破裂，高君曼去了南京，陈独秀另有新欢。

陈独秀在上海隐蔽起来，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什么地方，他每次到中央机关看文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大家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陈独秀同女医生施芝英同居。

1926年1至2月，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

眼泪汪汪的张国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到这个下场。”陈独秀“失踪”一个多月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几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

本来就支持国民党的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吹捧蒋介石尤其注意。

2月上旬，联共（布）派遣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等10余人来华。布勃诺夫在北京会见俄国顾问，听取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汇报，然后同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

布勃诺夫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

在布勃诺夫同冯玉祥会面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有40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国民党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参加国际，并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共产国际会议闭会后的第5天，即3月20日，这位“名誉委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3·20”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原本不赞成国共合作，曾对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表示异议，但由于个人野心，又隐忍下来。为了表示对孙中山个人的服从与忠顺，他又竭力装出完全拥护的样子，借以骗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捞获政治资本。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使他的地位迭迭上升，权力不断扩大。他兼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重要职务，与国民党领袖相比，在军事方面，蒋介石比汪精卫强，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比李济深、程潜等人强，享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野心谋求权力，权力助长野心，并以既得权力为杠杆，谋求更大更多的野心，这就是蒋介石发迹的法窍。

1926年2月，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偕谭平山暂时离开广州，去了北方，

鲍的职务由另一名苏俄顾问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对蒋介石的阴暗反共心理有所察觉，对蒋的独裁擅权行为不满，竭力拉拢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对蒋进行抑制，这就加深了蒋介石的疑忌。右派头目伍朝枢、古应芬、王柏龄等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俄顾问和中共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蒋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础，已有疑忌之心。右派分子的挑拨煽动，使他有了机会发动政变。

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

广州商团叛乱后，黄埔军校革命学生为帮助政府及时平定叛乱，联络广州其他各军校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不久，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蒋先云等决定将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其主要负责人有黄埔军校学生蒋先云、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等，在教职员有金佛庄、鲁易、胡公冕等，大都是共产党员。联合会在其存在的 18 个月中，会员发展到 2 万多人，成为革命军人中有明确宗旨、严密的组织、严明纪律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革命团体。

黄埔军校右派分子王柏龄等为了与联合会相对抗，组织了“中山主义学会”。这些人打着研究中山主义的旗号，把右派分子集中起来。几个月之后，王以中山主义学会为基础，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王柏龄说：“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就是要和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都是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贺衷寒、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胡宗南、吴铁城、缪斌、冷欣、曾扩情、酆悌、桂永清、欧阳格、刘峙、陈肇英等。它是蒋介石豢养的反共反革命的团体。

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员的行动，盗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放出种种污蔑中伤共产党员的滥言，甚至挑起冲突，大打出手，酿成武斗惨剧。孙文主义学会会员、黄埔军校官佐林振雄同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枪向李开了一枪，幸未打中，当时引起大风潮。军校进步师生同声抗议林振雄枪击李汉藩事件。

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貌似公允，暗中却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竭力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控制。

1926 年 2 月 2 日，蒋介石装作协调两会关系，召集两会负责人开会，议定 4 条办法，利用孙文主义学会以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监视，把联合会摆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庇护右派，打击左派。

蒋介石操纵孙文主义学会，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它原是由永丰舰改名的，孙中山曾在永丰舰上避难，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中山舰”。

蒋介石同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多次策划，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蒋介石精心策划之后，于 1926 年 3 月 18 日，令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即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但 19 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山舰调回，19 日下午 6 时兵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露械外出，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

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命令陈肇英、王柏龄、陈策、欧阳格、吴铁城等人，率武装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逮捕李之龙，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就以第2师、新编第1师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他们还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

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20日下午，释放了许多被扣押的共产党员。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到报纸上披露中山舰事件的消息，感到莫名其妙。因为通讯联系不便，无法了解事件的真相。

受到软禁的苏联使团布勃诺夫等人不能不表态。22日，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介石会晤，问蒋：“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回答道：“对人不对俄，希望鲍罗廷速回俄。”领事馆代表随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布勃诺夫立即将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和其他顾问组成员10余名遣返回国。

事变之后，蒋介石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如果共产党人进行反击，蒋介石的地位就会处在危险之中。当时周恩来、毛泽东等都主张反击，当时的革命力量很强，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有10多万人，工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已有许多农民加入农会，并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4期2000多学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力量，6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五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件，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等人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第2军军长谭延闿对人说，蒋介石的位置提得太高了；第3军军长朱培德不愿受蒋介石指挥；第4军军长李济深、第6军军长程潜都对蒋介石不满；第5军军长李福林同蒋介石也有矛盾。如果当时提出把蒋介石搞掉，这几个军都会赞成。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在该军中有较大影响，对蒋介石把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去很不满。因此，搞掉蒋介石，不会有更大的困难。

但是苏联使团布勃诺夫给蒋介石频送秋波。蒋介石又演出虚假的自请处分的闹剧。

3月23日，蒋介石煞有其事地呈文政府，说：“此次事起仓猝，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应自请从严处分。”同日，汪精卫托词“因患晕眩”，请假治疗。汪精卫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矛盾。蒋介石阴谋发动政变，包围了汪的住宅，使挂着国民党政府主席和国民党革命军总代表名义的汪精卫感到十分难堪，如同受了一记耳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蒋介石自请处分的呈文，通过决议：“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留给汪精卫的只有羞愤出走了，他借口养病，隐匿下来，不久就动身去了法国。

蒋介石把自己装扮成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3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演讲，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但实际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的有250多名。中山舰的军权被

夺取，舰长换成了欧阳格，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被取消，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解散，所有会员被迫退出黄埔学生军。

蒋介石利用右派打击了左派，又回过头来“惩办”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了王柏龄的第一军第1师师长职务、陈肇英虎门司令职务，“软禁”了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还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但是，不久，他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他不仅使孙文主义学会借尸还魂，还进一步扩充了他的反动力量。

蒋介石居心叵测，行动敏捷，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他通过中山舰事件，打开了夺取权力的大门，在这个事件之后，苏联使团布勃诺夫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布勃诺夫在给苏联顾问作报告中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5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布勃诺夫要顾问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

## 第四十二章 挥师北伐

苏联使团布勃诺夫写信给在莫斯科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中共广东区委也不得不听从布勃诺夫的意见。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从广州回国路过上海时，向中共中央说：“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陈独秀一面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一面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罗们指控为罪魁祸首。“柱石”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当蒋介石于4月7日假惺惺地发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虞电以后，陈独秀劝说蒋介石，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陈独秀紧步布勃诺夫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就是劝蒋介石不要辞职。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

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广州，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

斯大林主张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对策，自然是着重检讨中共本身的错误，迁就蒋介石，而不是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独秀派出张国焘来到广州，采取退让妥协政策。他们认为，不管事件发生的原因如何，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蒋介石既已“先发制人”，共产党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张国焘和蒋介石大开谈判，对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中山舰事件遂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通过阴谋策计中山舰事件，在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击得逞后，又步步逼进，于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建议，要求在一个月內召集中央全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4月6日，他正式提出一个提案，说：“近来国内政治现状，瞬息变化，本党对于时局问题，亟应确定方针，以资应付。……自前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外间因误会而发生种种谣言，故对内对外均应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必要。”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案。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选举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为主席团。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共8点，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1/3，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

这显然是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防范。

《整理党务案》还规定成立处理两党纠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代表5人，共产党代表3人组成。这个联席会议显然是蒋介石用以限共、反共的一个工具。因为国民党代表比共产党代表多2人，国民党推选的代表是：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吴敬恒、顾孟余，而共产党的代表迟迟未能选出。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是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3人讨论商定。鲍罗廷会前已知道了《整理党务案》的大概内容，他害怕苏联顾问会被驱逐出广州，为了稳定局势，寻求同蒋介石继续合作，他曾要张国焘、谭平山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案》决不反对。蒋介石听后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

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国民党二中全会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在讨论时，有人提出意见，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讨论了7天，毫无结果。张国焘把他的退让妥协意见拿来，用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结果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

在通过《整理党务案》时，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旗帜鲜明地持反对立场。何香凝义愤填膺，拍案顿足，几乎把地板跺裂，她含泪说：“中山先生去世不到15个月，尸骨未寒，这一伙不肖之党徒为达到其利己主义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反共、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柳亚子为何香凝鼓掌助威，表示赞同。他怒火满胸膛，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整理党务案》通过时，彭泽民气得手脚发抖，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最后跑到中山先生的遗像前，痛哭一场，表示愤慨之情。

蒋介石等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在 25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伯渠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中央财政委员、农民部长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组织部长职，另选继任。

由于汪精卫已离职出国，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会议推选“八面观音”谭延闿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推选半身不遂的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则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即把组织部长一职让给了他的义侄陈果夫，又让老政客顾孟余当了中央宣传部长，叶楚傖当了中央党部的秘书长。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不论党的还是政府的实权，都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6 月 5 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军队的控制权、指挥权拿到手里。7 月 6 日，又担任了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实现了把国民党的党权、军权、政权集中于一身的目标，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怎样？6 月 4 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给蒋介石的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 3 月 20 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其实，哪里是没有关系，不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 3 次大胜利，但当时的革命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 6 个师。总共 8 个军中，他只占 1 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但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气得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北伐出师前，苏联顾问加伦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陈独秀当时住在医院里，采取了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又指定了张国焘代理他的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开会研究，也没有真正讨论。张国焘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这个提案遭到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多数人的反对。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 2 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



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

自李宗仁、黄绍竑合力平定广西后，李宗仁虽是坐了第一把交椅，但李、黄部队因两个系统合并而来，军中门户歧见不易消除。尤其在广西统一后，举凡省内党务、军事、政治、经济、财政等方方面面的职位、权利，两军中争之不已。李、黄因尚能推诚相见，但也囿于一山不容二虎的旧规，在任用人事上不免磕碰。对此，李、黄深以为虑，认为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共同目标，就会弄到各走各的路，而把团体的力量渐渐分散开来，甚至造成不幸事件。李、黄、白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协调内部的基础上，必须寻机向外发展，而北伐正是提供这样的机会。

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竑主持广西省务。李、黄部队已发展到4万人，李、黄决定将军队一分为二，一半由李宗仁率领，准备随时北伐出征，称“前方第七军”，一半由黄绍竑统领，驻守广西，巩固后方，为“后方第七军”。

正当广西秣马厉兵，积极为北伐出师作准备之时，广西邻省湖南的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与第3师师长叶开鑫发生战斗。唐、叶同为湖军阀赵恒惕的部下。赵恒惕执掌湘省大权后，名义上附北，但又打起联省自治招牌，南抗北拒，因此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北方奉、直军阀为讨伐“南北二赤”，已握手言欢。吴佩孚为便于自己插手湘局，暗中扶植唐生智势力，对赵恒惕进行牵制。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校，一向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在自己的第4师实力发展起来后，便有在湘取赵而代之之心。1926年初，湖南民众发起驱赵运动，唐生智见有机可乘，乃于3月中旬发起驱赵运动，赵恒惕知势已难容，通电辞职，唐继赵宣布就任湖南代理省长。

忠于赵的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坚决抗唐，率部退至湘鄂边界向吴佩孚求援，吴便以“助叶讨唐”为名发兵入湘。吴军久经沙场，精锐无比，一经接触，唐军立溃。吴军攻下岳州后，大军直逼长沙，唐生智情急之下，乃以同学私谊急电广西李、黄、白，请求支援，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只要能得到援助，即愿率所部投效革命政权，充当北伐前驱。

李宗仁接到唐电后，立即与黄、白等人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北伐既为既定方针，出师也就势在必行。现在吴军正大举南下，若不先发制人，吴军一旦拿下湖南，便直接威胁两广，到时，革命方面就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危境。唐军一旦溃入广西，北军尾追入桂，广西统一局面也万难保全。若给唐军以支援，一可助人于危难之际，二则先行出师，以后北伐事成，广西当居首功，于人于己均不失两全之策。况且，唐入主长沙后，白崇禧偕陈铭枢以广东革命政府的正式名义去湖南，对唐表示声援，现在到履行诺言的时候了，广西不能失信于人。于是李、黄在来不及报告广东方面的情况下，当机立断，作出援唐决定，并当即命令钟祖培旅作入湘作战准备，先以尹承纲团为钟旅先锋，兼程开赴衡阳前线，同时急电国民党中央，告之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望中央速定大计。

几日后，中央复电：“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伐问题，关系重大，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李宗仁偕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同往广州。李宗仁向各方面活动后发现，苏联和中共因虑及工农尚未充分发动，担心北伐会搞成仅由少数军事领袖控制的单纯军

事行动，对北伐态度谨慎；蒋介石倒是主张北伐，但其在党、政、军地位未确定，态度暧昧；其他各军政干要，均在观察动向，以定行止，对北伐也不甚积极，只有第4军军长李济深，因与广西方面有特殊关系以及与非粤系军队的矛盾，希望通过北伐使“在粤就食”的客籍各军包括蒋介石的黄埔军，早日不驱自走，故对李来粤呼吁北代表现了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为此，二李多次作“竟夕谈”，最后商定了一个促成中央早定大计的做法。

5月25日，中央政治会议召开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李宗仁首先充分陈述克日北伐的理由。李宗仁话毕，李济深立即起身响应，并主动请缨，表示愿抽调所部精锐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北上赴湘援唐，四军在广州城郊之叶挺独立团可立即出发。李之第四军为广东部队，今既自告奋勇，愿作前驱，其他各军原系客军，胜固有利大家，败也与己无关，落得赞成。于是，李宗仁的北伐之议竟然在会上一举通过。政治会议还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

5月底，李济深部叶挺独立团先行从广州出发，开抵湖南安仁、淅田拒敌，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也自南路和琼崖北调，驰援入湘。由于两广生力军的加入，原已不支的唐军声势复振，吴军攻势被遏，湖南战局暂时得到稳定。

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吴佩孚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若吴佩孚。……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鹬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

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力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3支军阀总兵力70多万，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为10万多，据此，国民革命军策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孚，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又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

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久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同心，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入，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入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6月中旬，广西第七军第2批入湘援唐部队开赴湖南，会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叶挺独立团、唐生智的第八军，向叶开鑫部和助叶之吴军发动了大举反攻。17日，李宗仁率第七军后续部队进抵长沙，唐生智发出定湘通电，长沙城里到处飘起了青天白日旗。

湘中战事旗开得胜，北伐军声威大震。至此，吴佩孚方感到此次南军出师与孙中山昔日之北伐不可同日而语，遂亲作部署，负隅顽抗。

8月12日，蒋介石偕同北伐司令部主要成员，包括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总军事顾问加伦一行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下一步作战方略，决定采纳李宗仁等几个军长的意见，仍以两湖为主战场，前进目标是占领武汉，消灭吴佩孚。得手后，再挥戈东南，进兵江西，扫荡孙传芳。

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布作战部署：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为中央军，担任两湖的主攻任务。中央军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第八

军为左纵队。另以四、七两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统一指挥，下分两路，一路由李宗仁亲自督率第七军，一路由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指挥，各路人分途进击，最后会攻武昌；右翼军总指挥为朱培德，统领第二、三两军，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主力军之右侧翼；以第一、六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十军，进取沙市、宜昌。

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中央军陈可钰部进展神速，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清了盘据平江、通城之前面之敌。敌主将陆某在通城北门楼司令部自杀。接着陈可钰又与敌血战两日，叶挺独立团表现了惊人的英勇气概，吴军大刀队虽然接连砍下临阵退缩的团、营长9颗血淋淋的人头，还是无法把阵地稳定下来，叶挺的铁军一举攻陷汀泗桥。

至8月28日，已乘胜追敌至贺胜桥。与此同时，李宗仁统率之第七军也向敌人展开了凌厉攻势。肃清了将军山，强渡汨罗河，不给新败之敌喘息之机。李宗仁率部随向导出发，在丛山峻岭羊肠小道上而行，幸第七军官兵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故只一日行军，便进抵岳州城前10里处。李宗仁当即指挥部队，乘敌不备发起猛攻，敌军惊为天降，慌不择路，向六溪、五里牌、羊楼司一带四散溃逃。第七军脚尾穷追逃敌，不日克复岳州，缴获无数。尔后进抵大沙坪，迅向贺胜桥急进，会合第四军，作攻打贺胜桥的准备。

## 第四十三章 钢铁之军

吴佩孚亲率精锐部队刘玉春、张占鳌、靳云鹗等师，兼程南下增援湘中。不料才到武汉不久，汀泗桥败讯已至，吴大帅席不暇暖，立即从武汉南下，赶至贺胜桥亲自部署。

他坚信自己的部署万无一失，向部下自诩说：“昔以汀泗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当这位吴大帅在贺胜桥紧急布防时，北伐中央军第四、七、八军前方高级指挥官也已齐集咸宁，共商进攻贺胜桥的计划，会议决定：攻打贺胜桥的战役由李宗仁任总指挥，指挥四、七两军为攻桥主力，唐生智的第八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八军的何键、夏斗寅部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以拊吴军之背。计划既定，李宗仁遂于8月29日令第四军仍沿铁路前进，进逼贺胜桥正面，第七军则出咸宁东北，自王立本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此时，吴部大军也已在贺胜桥严阵以待，双方主力云集，不惜倾全力作决定胜负的一搏。

30日拂晓，一场恶仗打响了。李宗仁率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亲临前线督战。国民革命军前线官兵个个奋勇争先，如万只猛虎向敌人同时进袭。敌方也恃险顽抗，重机枪、山野炮乱施淫威，战场上刹时成了一片火海。然而敌人的火力封锁挡不住北伐军将士的迅猛进攻，敌之一、二道防线相继被突破。四、七军劲旅全力向贺胜桥敌军正面冲锋前进，其势锐不可挡。敌阵动摇，败兵潮水般向贺胜桥溃退。吴佩孚亲上贺胜桥头督战，以机关枪、大刀队排列桥上，凡畏葸退却的，立被射杀。吴并手刃退却旅、

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

在吴佩孚亲自督阵下，敌军抵抗复又顽强，机关枪扫射，疾如飙风骤雨。所赖北伐军将士士气极旺，喊杀连天，李宗仁等高级指挥官也浴身火海，现场指挥，敌终不支，不顾大刀队阻遏，慌不择路，落水而逃，一时河中尸体塞流。数万名兵士因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吴佩孚见大势已去，夺路乘火车逃命，数千兵士不及避开，被火车压死。主帅既遁，敌军溃败更速。北伐军将士乘敌混乱，冲过铁桥，于当日 12 时攻占贺胜桥阵地。

李宗仁未作稍息，率军乘胜追击，于 31 日黄昏进抵武昌城下。吴军败兵纷纷从前线溃退下来，赵荣华命令督战队挥舞大刀乱砍乱杀，杀得那些兵士们火性大发，有的竟然开枪向大帅专车射击，打死副官 1 人，伤了卫士 2 人。到了这个时候，吴才被迫允许败兵通过。北伐军将城团团围住，李宗仁拟乘敌喘息未定，一举而下武昌，于是由自己担任攻城总指挥，陈可钰副之，连续组织 3 次攻城。无奈武昌城垣高而坚，护城壕沟又水深没顶，加上守城敌军已有准备，闭城死守，抵抗顽强，城垣一时难下。几次攻城不克后，为减少伤亡，改硬攻为长期围困，待敌弹尽粮绝后，再行夺城。蒋介石因江西战事，调李宗仁率第七军赴赣，北伐军攻城司令为邓演达。

第八军何键、夏斗寅部在嘉鱼北渡长江，9 月 6 日攻克汉阳，7 日续占汉口，第四军攻围武昌，血战 40 天，于 10 月 10 日全胜攻克。吴佩孚率残部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踪进据武胜关。叶挺独立团及其所在的第四军，在湖北战场英勇杀敌，为北伐大业屡建奇功，“铁军”之称威名大振。邓演达任北伐军武汉行营主任。

吴佩孚逃到信阳后，他手下的心腹大将靳云鹗又联合国民军向他进逼，他不得不退回郑州。这时，奉军又以援鄂为名，派大军杀向中州，显然要夺他的地盘。吴佩孚这位显赫一时的孚威将军，终于把家底全输掉了，他不得不放弃郑州，向四川逃走。

当北伐军在两湖与吴佩孚主力作殊死战时，吴曾檄调 5 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入湘应援。

但孙传芳其时正打着“壁上观”的主意，企图让吴军与北伐军先混战一场，由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不料，北伐雄师长驱北进，两湖转眼而定，孙方如梦初醒，急调主力防守江西，另以一路进攻湘鄂，期捣北伐军侧后，进而囊括两湖。然而，北伐军对进攻赣省早有准备，不待敌动，先发制人，在两湖大局初定后，便提前实行占领赣、皖、苏、浙、闽，以消灭孙传芳的计划。于是北伐军第一、二、三、六军成为攻赣主力，由蒋介石亲自率领，分 3 路向江西进攻，同时于 9 月初檄调围攻武昌的李宗仁第七军赴赣，充作江西战场左翼，沿长江左岸东下，进驻阳新，控制长江下游，巩固武汉，相机进取赣北。

北伐军右翼军分自赣江两岸及赣西地区，向南昌进攻。9 月 19 日，程潜所部的第六军和王柏龄所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南昌城内的省署警备队和工人、学生的配合下，一举攻下了江西省会南昌。

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后，大为震惊，立即命精锐部队第一、二、十方面军从南北反攻南昌。9 月 22 日，双方在南昌展开激烈争夺战，北伐军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南昌。

9 月 23 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

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24日，蒋介石下达了各部之攻击命令。

李宗仁率第七军主力进抵横港，本应由此往武宁与程潜之第六军会合，不料得报第六军已不在武宁，该处已有敌军把守。前面情况不明，后退之路已断，友军不知去向，李宗仁恐再前进，地势于己不利，乃决计放弃进攻九江，改道南下，寻找第六军。于是全军舍东而南，翻越羊肠山，向箬溪前进。

李宗仁已探知箬溪有敌军精锐谢鸿勋部2万多人驻守，故采“先发制人”战术，过山后即主动向箬溪之敌展开进攻。敌顽强抵抗，激战一天，战况无进展。李宗仁即派预备队李明瑞部取迂回战术，自左翼隐蔽地带向敌阵地右翼逼近，李明瑞部突然出现在敌右后方，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敌阵，敌全线动摇，七军将士乘机呐喊冲杀而上，敌军全面崩溃，分向修水、德安逃窜，七军将士奋勇追击，俘获近万人，敌主将谢鸿勋重伤后侥幸逃脱，后因伤重，治疗无效而毙命。

李宗仁从缴获敌人文件中发现江西友军战况：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曾攻取南昌，得而复失。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弃职潜逃，第一、六两军已西撤，孙传芳军正在分途追击中。

李宗仁当机立断，决冒孤军深入的危险，继续率部东进。

10月3日拂晓，第七军到达德安郊外。德安城南有九仙岭、金鸡山拱卫，城西北有一列岗峦可资防守，地形险要，据守条件十分有利。德安守敌为孙传芳另一精锐卢香亭部，有近4万人。卢闻谢部全军覆没，即加固了工事，配有铁甲车数辆，载野炮十余尊，往来巡梭，布防十分严密。

李宗仁不惜一切代价，决心一战。指挥7军向德安县城发起攻击。卢部使用山炮、野炮、机关枪等各种武器，居高临下，向李宗仁的进攻部队猛烈射击，枪声的密集，炮火的猛烈，较之贺胜桥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7军将士无一退缩，李宗仁亲自上阵督战。从拂晓至下午2时，七军官兵伤亡已达2000余人，第9团团长陆受祺阵亡，全团打得仅剩副团长、连长、排长各一人。7军将士仍然前赴后继，攻势未曾稍减。下午6时，7军左翼之陶钧团在与敌数次肉搏后，冲破敌左翼，占据了南浔铁路桥，并迅速扩大战果，自铁路桥南下，向敌纵深阵地冲击，敌阵线大乱。李宗仁立即指挥所部再次向正面之敌发起猛攻，敌不支，弃阵而逃，渡河溺死者数百，未得逃跑被俘或投降的达数千人，德安落入七军手中。

南浔铁路被李军截为两段，致使南昌之敌与九江之敌断了联络，赣南之敌失却归路。

孙传芳急调九江、南昌守军反攻德安，已进入鄂东南的敌军也被迫回援，这样李宗仁的第七军不仅在德安予孙军卢香亭部以重创，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友军，挫败了孙传芳在北路、中路的图谋，对九江和南昌的克复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李宗仁在德安战役后，果断决定迅速撤离德安，寻找最近之敌，迅速歼灭之。当他得知敌军陈调元、王普两师抵达箬溪10余里的王家铺，陈、王两师是孙传芳军劲旅，两师计有近3万人，而第七军因连日苦战，亦进亦退，将士已极度疲乏，兵员也仅存7000余人。面对强敌，李宗仁再次下定死中求生、坚决歼灭敌人的决心，激励七军官兵连续作战，以快捷、猛烈的

行动向王家铺之敌主动发起进攻。双方激战多时，均无法得手，战至午后，程潜部赶到，合力将敌击溃。

10月12日，蒋介石亲赴南昌南门外，组织围攻南昌，但连攻3日不克，各军牺牲重大，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暂撤南昌之围，撤退到高安县城设立司令部，命全军暂行休息，以检讨江西战场第一期作战得失。15日，蒋介石制定了《肃清江西计划》。将江西的北伐军编为左、中、右3路，自己亲任总指挥。左路指挥官为李宗仁，并从武汉调第四军张发奎师和贺耀祖部湘军独立二师统归李宗仁指挥。右路军指挥官为第3军军长朱培德，中路指挥官为程潜。第一军第一、二两师作总预备队，由刘峙任指挥官。

11月1日，北伐军在江西开始第2期作战。2日，左路军向赣北进攻，再次攻克德安，然后转向攻取九江。中路军进攻奉新、安义，肃清了南昌的西南守敌。右路军肃清了南昌外围敌军。随后，左、中、右3路大军会攻南昌，8日占领了南昌。孙传芳见败局无可挽回，他急急忙忙逃回南京去了。

11月9日，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往南昌，命各军追敌。李宗仁左路军担任肃赣北任务。

占领湖口、武穴的贺耀祖师向窜往赣东之逃敌追击，张发奎部直趋黄梅，截击陈调元、王普残部，主力则由白崇禧指挥，在徐槎、马口两地截敌，俘获近3万人，枪械不计其数。

至此，孙传芳在江西的10万主力几乎全部被歼，赣境内残敌全部扫清。第七军在江西战场上屡建战功，“钢军”之称名闻遐迩，李宗仁也成了蜚声中外的北伐名将。

冯玉祥一行分乘汽车19辆，随行百名卫兵，沿张家口至达库伦大道，于1926年3月22日到达库伦。

鲍罗廷领着于右任、陈友仁、顾孟余、徐谦、陈启修等30余人于4月3日到达库伦，与冯玉祥讨论国民党和国民军合作的细节问题，鲍罗廷对冯玉祥说：“您拥有中国最刚毅的军队，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开国民党来助您；假设您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并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冯回道：“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只知道要革命。”冯玉祥本无参加国民党的愿望，经鲍罗廷这么一说，面临抉择问题，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加入国民党。

冯玉祥由库伦抵达莫斯科，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四五百名学生的热烈欢迎，使冯深受感动。

苏联政府把冯玉祥一行安排在富丽堂皇的欧罗巴旅馆。冯从未住过如此豪华的大厦，心里老觉不安，要求换一家较小的旅馆，未得许可。冯想到国内的战友正在艰苦地战斗，面对美肴佳饌，无法下咽，于是自己上街买了些萝卜、大葱回来佐膳。

冯玉祥拜会了许多重要的苏联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托洛茨基、拉狄克、伏罗希洛夫等。斯大林其时住在黑海养病，他给冯玉祥写信说，等他病愈后再行约会。

冯感到苏维埃主席加里宁没有一点官架子，完全像一位朴实的农民。冯玉祥与拉狄克作了长谈，他请拉狄克给他讲了列宁主义。冯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好感，将本来在德国读书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入中山大学读书，二女儿冯弗伐入飞机制造厂当学徒工，半工半读。冯玉祥身边的人也去基辅

和莫斯科的学校学习。

冯玉祥在苏联期间，先后派刘骥、李鸣钟、徐谦去广州，报告冯玉祥已在苏联率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刘骥同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人，协商了冯部和广东国民政府今后的关系，确定了冯部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国民政府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冯玉祥完全同意。

冯玉祥心情激动，难以成眠，拟订了一份颇具有革命色彩的中国政治改革《计划大纲》：改善人民生活，由国家尽力辅助，使每家最少有 1 万元之财产；凡有百万元以上之产业，百万元归其所有，其余则全移归国家或地方，自愿将百万元以上之数呈国家或地方者，奖励之；其有逃匿国外或将款私存外国银行者，则取消其目标或处罚之；铲除资本教育制度；建设须积极向科学化、机器化、电气化。

苏联答应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 40 万军队的军事装备。冯满怀信心地对人说：“现在有了办法。”冯玉祥在苏期间，每周有两个下午请朱务善、周达文讲有关中国革命问题，请蔡和森讲国共合作、三大政策等问题。冯颇受启发，向蔡提出，请蔡做他的老师，同他一起回国，帮助他做政治工作。蔡因在莫斯科另有工作任务，不便离开，即向冯介绍了刘伯承到冯部做政治工作。冯玉祥一再要求共产国际委派刘伯承随同他一起回到国民军内，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共产国际同意了冯的要求。

7 月 26 日，冯玉祥离开莫斯科返回。随冯同行者除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承外，还有中共党员蒋挺松、曾晓园、穆济波等，他们本是留法学生，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

冯玉祥在途经库伦逗留时，得知国民军已与国民党发表联合宣言，很高兴。国民党中央任命冯为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及国民党军委会委员。

9 月 16 日，冯玉祥到达五原。五原是个人烟稀少、荒凉冷落的城镇。冯玉祥同国民军将领鹿钟麟、邓哲熙、过之翰、孙岳、方振武、弓富魁、邓宝珊等一一相见。国民军此时除原驻甘肃之外的武装力量，尚不满 5 万人，驻在五原的队伍仅有张凌云、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冯治安等部。刘汝明、孙连仲两部在南口作战时，伤亡惨重，国民一军的精锐部队基本上为韩复榘、石友三带走。方振武所率领的国民五军还较完整地保存了实力。韩复榘、石友三等将领因率部队西撤，给养困难，乃投靠了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抵五原后，国民军各部闻讯纷纷向五原集中，韩复榘、石友三等部也相继归来。

9 月 17 日上午，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遂于中午 12 时，在五原举行就职誓师受旗典礼，接受党旗，宣誓就职，并发表“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即《五原誓师宣言》。这在历史上便是著名的“五原誓师”，冯在誓师大会上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并正式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当场宣读了誓词：“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国民党旗，并宣布接受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

五原本是小小县城，冯部大军云集，饷精浩繁，给养维艰，枪械弹药，

补充不易。张作霖将国民军通向内地的交通断绝，切断各种物质供应，使冯军更加缺吃少穿。部队因从南口战役败退下来，东零西散，但冯亲自检点整顿各部人数、枪数，3日之中即整顿就绪，全军井然有序，皆大欢喜。顾问乌斯马诺夫翘着大拇指，称赞冯是天才组织家。

刘伯承、邓小平、宣侠父、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又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国民军开始改变愚兵政策，部队规模和战斗力显著增强。

冯玉祥决定取道甘肃，出援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分兵10路援陕。

国民二军李虎臣和国民三军杨虎城部，自1926年2月起被吴佩孚支持的刘镇华的镇嵩军10万余众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西安城内饿毙者暴尸于市巷，甚至发生了以死尸充饥的现象，实到了易子而食、折骸而炊的绝境。

吴佩孚支持西北军阀张兆钾、孔繁锦、吴新田举兵进攻驻甘肃的国民军，企图抄冯军后路。国民军刘郁芬、蒋鸿遇坚决抵抗，猛将孙良诚和足智多谋的张维玺等奋力作战，一举歼灭了张、孔、吴等部，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及储藏的粮食与现金，解决了部分军需，打通了东进的通道。前锋孙良诚师抵达咸阳，刘镇华军弃城逃走，孙军不战而取咸阳。

孙良诚下令渡渭河，遂打败小股敌军，到达未央宫附近的猴儿寨。孙军仅1万余人，孤军深入，后续部队一时难以到达，而所面临的强敌刘镇华镇嵩军有10万之众，双方实力悬殊，与刘军相持多日，未有成果。时遇连阴雨，数日不停，孙军官兵淋雨数日，以水泡生玉米充饥，孙良诚放声大哭，并准备退却，但随军的苏联顾问坚决反对退却，孙良诚只好坚持继续进攻。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冯玉祥派的后援部队赶到。经一昼夜激战，敌方因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别向潼关、同州、武关等处溃退。

11月27日，西安之围被解，孙良诚告捷，冯军乘胜前进。

在西安城被围期间，守将杨虎城对李虎臣说：“如果城破了，我们弟兄俩只有在钟鼓楼上一同上吊。”冯部将领吉鸿昌率部进城时，令所部官兵将随身带的干粮救济“二虎”的士兵，“二虎”的士兵感动得泪流满面。被困在城内8个月中，城内冻饿而死的军民5万人之多。

西安解围后，“二虎”举行革命大祭会，杨虎城献上挽联一幅：“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西安保卫战吸引了10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这一胜利，使冯部国民军士气大振，扭转了被动局面，在甘陕两省站稳了脚跟。冯玉祥满怀豪情抒诗：“拼命流血求解放，一往直前不回头。重层压迫均推倒，要使平等现五洲。”冯玉祥同刘伯承及乌斯马诺夫等于1927年1月26日抵达西安。西安已由于右任改名为“红城”。冯玉祥视察西安城后，采纳苏联顾问动员民众打掃除的建议，冯和于右任亲自出动，同抬垃圾筐，满街清理。

冯到西安之前，杨虎城、李虎臣面对白骨垒垒、疮痍满目的惨状和“和平期待会”分子的攻击，心灰意懒，决心从此离开军界。冯到西安后，以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为副司令。许多善后事宜，需要杨虎城协助办理。冯托杨的赵副官带信给杨，信中说：“惟陕局救平，百端待理，务请为党为乡，勿遽离省，以助右任同志早拯陕西民众，而利吾党大计之进行，是所至盼。”于右任、邓宝珊又都是杨在靖国军时的老友，更急于请杨



回来。冯玉祥又派姚维藩持函赴渭北找杨，信中高度赞扬杨虎城的功劳，再次恳切地请杨出山，以助革命大业。

此后，冯玉祥、于右任又派张之江和共产党员史可轩等人去三原催促，杨虎城才回到西安。

杨虎城回西安同冯玉祥见面，仍请求“允许其解甲归田”。经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几度敦劝，杨终于接受了冯玉祥委任的国民军联军第10路总司令司职，杨虎城的旅改为军。

冯玉祥在战斗中收编了不少队伍，全军的数额已近20万人。国民党政府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地盘，遂将协助饷项由每月100万元减为30万元，因而饷械相当困难。

## 第四十四章 歧路关头

共产党人帮助冯玉祥及时地在甘陕等地颁布了治理条例，改革了地方行政机关，扶助了工农运动。共产党员在陕西省的政府机构、教育部门和群众组织中占了很大比重，中共中央、北方区委、粤区党委也先后派来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刘伯承在国民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国民军中流传着两句话：“听过刘伯承演一次讲，当得关过3个月的饷。”冯玉祥称赞刘伯承“办事极有精神，每日工作18小时，整日孜孜不倦，……我即无法不钦佩他。”共产党人宣侠父先后在刘郁芬、孙良诚、吉鸿昌部担任政治部领导工作；陶新畚、刘志丹、方廷祯分别担任孙连仲、马鸿逵、石友三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邓小平担任中山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王一飞、萧明等人，随军担任军事政治工作，为培养高级军事干部，作出了艰苦的工作。

国民军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在共产党人主持下进行的。李大钊派共产党员蒋听松去包头为国民军办《西北日报》。后改为《中山日报》，中共北方区委又派贾午担任报社领导人。

北伐军肃清江西之敌后，蒋介石立即命令驻守汕头的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第3师和第10师的东路北伐军，沿东海沿岸进攻福建。由于孙传芳将主力部队全部投入江西战场，福建空虚，东路军未经激烈战斗，便先后占领了永定、漳州等地。1926年12月18日，何应钦兵不血刃进驻福州，占领了福建全省。

在北伐军接连取胜的时候，张作霖于1926年11月14日在天津蔡园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奉鲁军阀将领们会集在天津。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以及孙传芳的代表都出席了。

张作霖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当前的问题是团结北洋派，先军事后政治。会场气氛相当沉闷。张作霖问孙传芳的代表：“你们那里还有多少军队？”他得到回答说：“还有5万以上。”这显然是骗人的鬼话，张作霖很不愉快。

孙传芳了解到会议的情况，急急忙忙从南京来到天津，直接闯进会场。张作霖吃了一惊，孙传芳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我对不起大帅了。”张作

霖邀请他坐到自己的旁边。孙传芳向会场抱拳致礼，诚恳地说：“过去我们有什么误会，那都是兄弟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赔礼道歉。我们北洋派现在应该重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赤党。”他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孙传芳又表示，他决心不回任了，把浙江、江苏和安徽都交给部下去料理。

张作霖一拍大腿，大声道：“大丈夫处世光明磊落，岂肯乘人之危夺人地盘！”孙传芳又道：“事到如今，就别再说什么地盘不地盘了，我情愿回浙江，让出江苏来请鲁军接防，鲁军总部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张宗昌十分激动，大吼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不要把我张宗昌当成是不讲义气的小人，我的军队开到浦口后，换乘轮船前往前线，决不经过南京。”“这是各位看得起我孙某人，不过，为了统一指挥起见，目前应组织一个讨贼军统率办事处，推举雨帅为全国讨赤总司令，本人愿听候调遣。”孙传芳说罢，目光扫射各位将领。

众人赞同孙传芳的建议，会场气氛顿时变得极为活跃。会议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联军总参谋长。

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总司令部，并把总司令部迁到北京，改称大元帅，又重新组织了内阁。

张作霖为了拉拢阎锡山，任阎的驻京代表田应璜为内务总长，又派人将副元帅印信送到太原。

此时的阎锡山已看到国民党营垒的强大，由联合直奉军阀转而联合国民党。奉系军阀对此深为不安，曾多次压迫，要阎协同继续对冯玉祥作战。冯玉祥已公开投入国民党阵营，阎锡山认为对冯作战，无异作茧自缚。于是他玩弄两手政策：一方面极为敷衍张作霖，一方面迅速与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人挂钩。阎派代表与冯玉祥多次磋商，终于在山西赵村成立了国民军与晋军的联合办事处。

1926年11月30日，阎锡山致电张作霖，推戴他为安国军总司令。

阎锡山派赵戴文去广州，1927年1月底，蒋介石提请广东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6月，阎锡山改换青天白日旗，晋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举行联席会议，对国共合作的形势及政策、策略作了研究，认为要发展农民运动，就不能再维持广东中派政权。不维持中派政权有3条路可走：一是迎汪倒蒋；二是汪蒋合作；三是使蒋成为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蒋，恐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个办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接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汪蒋合作。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眼睛紧紧地盯住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完全忽视共产党自身的力量，及国民党左派和工农武装力量。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到上海见陈独秀，请C.P勿赞成汪回，汪回国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蒋捣乱，陈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3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是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

陈独秀主张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而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必须立足于在野党地位。”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个政策在共产党里得到贯彻。中共中央要求江西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

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不仅国民党左派拥护，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也乐于接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陈独秀的迎汪复职，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因为共产党没有军权、政权和党权，共产党夹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当均势一旦破裂，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并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吴玉章、王法勤等60余人，先到武汉筹备。

12月2日，宋庆龄、鲍罗廷等一行60多人乘船途经南昌，蒋介石身着戎装，满面笑容地前来迎接，他显得非常谦恭、热情，和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但实际上，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竭力主张迁都南昌，他提出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对每一个到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都积极做工作，并试探他们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同意自己的意见。

其时南昌的局势并不稳定，商店因拒收蒋介石滥发的“军用钞票”而关门，并宣布罢市，组织抗议游行，原来准备在南昌召开的中央军政会议不得不转移到庐山举行。

12月7日在庐山开会，鲍罗廷、宋庆龄、邓演达等坚持加强团结，巩固后方，开展工农运动，进行社会改革和从政治上改组军队等革命主张。蒋介石和一些右派对此根本不感兴趣，蒋感兴趣的是增加军费，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等。会上通过了尽快召回寄居海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决定。尽管蒋对迎汪复职不满，但他见众人意决，便不露锋芒，顺从大家的意见。

先遣人员到达武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未迁到武汉之前，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鲍罗廷、孙科、宋子文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徐谦、宋庆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骥、董必武等13人为委员。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

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利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及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途经南昌之机，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并截留经过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擅自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移南昌，企图挟天子令诸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蒋介石则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成。宋庆龄、陈友仁、蒋作

宾、唐生智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说：

初列鄂都，时局颇困难，但因人民政府之信用，得将时局改造日趋稳定，外交地位顺利，军事消息日升，财政大有起色，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务希坚持到底，不独战争必须身先士卒，政治亦然。

中央领袖必须亲临政治冲激之地，始能战胜敌人。

蒋在宋庆龄等人的敦促下，同时也为了来武汉窥探虚实，伺机达到其迁都南昌的目的，于1月12日来到武汉。

鲍罗廷对蒋说道：“蒋介石同志，我们3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蒋介石见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只得表示拥护。蒋介石不能如愿，稍留即去。

蒋介石回到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迁鄂大会上讲话，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迁都武汉，出乎蒋介石的无奈，他深知起主导作用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排斥出去，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民运动特训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农民运动。还收买流氓、地主及一切反对派，组织AB团（反共团体），作为反革命活动的骨干。

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趋向日益明显，他一面通过宋子文、王正廷、吴稚晖、李石曾等勾结西方帝国主义，一面派黄郛、戴季陶、张群等进行勾结日本的活动。2月11日，戴季陶由汉口秘密到了上海，15日化装为日本人，用日本人的假姓名，鬼鬼祟祟地溜到日本。

各帝国主义却也看中了蒋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新工具，便派大买办虞洽卿秘密到南昌，准备用借款6000万元收买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的大刽子手。戴季陶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

蒋介石秘密命令北伐军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作出同帝国主义和好的姿态。

2月20日，蒋介石成立了以西山会议派李烈钧为主席的江西省政府。3月6日，蒋介石密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7日，在九江收买手执刀械的流氓数百人，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干部3人、总工会干部1人，重伤第六军政治部干部9人。工人纠察队捕获行凶流氓数十人，复被蒋介石的卫兵全部劫去。

在蒋介石的指使下，AB团纠集流氓打手组织了暗杀机关，西山会议派、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横行一时。

蒋介石借总理纪念周之机，多次在南昌总部会议上发表反共演说，道：“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如果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武汉国民党左派领袖举行高级干部

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并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对这些问题作彻底的解决，并决定由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孙科、顾孟余等 5 人组成行动委员会。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本订于 3 月 7 日召开，蒋介石托由南昌来武汉的谭延闿、陈公博带来口信，要求把会期改到 12 日，他才能到会。但大家认为法定人数已足，不能大家等一人，为了给蒋介石一个机会，把 7 日的会改为预备会，正式会议改为 10 日召开。蒋介石见形势对己不利，始终没有到会。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 33 人，有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谭延闿、徐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于树德等 18 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等 11 人，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等 4 人，会议选出谭延闿、宋庆龄、徐谦、孙科、顾孟余等 5 人为主席团。会议通过《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对全体党员的训令》、《对全国民众宣言》等，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和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

全会斥责了蒋介石搞个人军事独裁的错误，批评了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倾向。决定将一切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确立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取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的设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常务委员会领导。并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裁撤中央军人部。这次全会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 9 人常委会，汪还兼任组织部部长，汪未到任前，由吴玉章代理。

这次全会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部长职务。同时任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为劳工部部长，谭平山为农政部部长，宋庆龄为卫生部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部长，顾孟余为教育部总长。

4 月 6 日，武汉国民政府分别任命蒋介石、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第一集团军下设立 4 个方面军，以何应钦、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总指挥，以限制蒋介石滥用总司令职权。

在汉、浔对立中，蒋介石变本加厉，磨刀霍霍，加快了公开叛变革命的步伐。但其时蒋介石的实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军事方面，能由他支配的仅第一军和一些杂乱的反正部队，而汉方却拥有除蒋介石以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的主力。

李济深的第四军是一支在训练、装备、军纪各方面都堪与黄埔军媲美的粤系部队，其将官又多为军校毕业生，李济深因与胡汉民有师生之谊，被认为是胡的人，李对蒋介石以“党军”自居、地位权力上升过快而不满，便在国民革命军中以陆大、保定、陆中、陆小 4 校同学的名义，互相联络，壮大声势，以期在军界结成一个可与蒋的黄埔军相匹的势力。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与李济深私交甚厚，所部又多为 4 校生，与四军的将官有着同窗、学友、师生之谊，也有意依靠 4 校同学发展自己的势力，故一拍即合。广东军界便产生了一个以粤、桂两系军人为主，称作“四校同学会”的组织，因该会多保定生，也称为“保定帮”。该组织在军界影响迅速扩大，及至唐生智投归广东，使保定帮的实力更为加强了。

蒋介石为了拉拢李、黄、白广西军人，下了一番功夫。他对李宗仁恭

维备至，礼遇甚重，不但在军火和军费上给李宗仁大力援助，并逾格擢任白崇禧为北伐军前线代总参谋长，更施出与李宗仁“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的手段。蒋给李的帖子上写着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李宗仁也逢场作戏，依样画葫芦，照样手书一帖奉还。

武汉克复后，李济深部开始分化，以第四军第十师为基础，新编了第十一军，原师长陈铭枢为军长。前方第4军军长陈可钰去日治病，由张发奎继任军长，由于陈铭枢与蒋接近，又被武汉国民政府去职，第11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张发奎视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所部被视为“左”派依靠的基本军事力量，已明显有脱离李济深部的倾向。

唐生智最初投归广东时，因得四、七两军之助，唐部势力借重北伐在两湖得到迅猛扩大，唐部第八军不到半年，便扩至第八、十二、十七、三十五、三十六计5个军。这使唐生智感到无须再与四、七两军拍挡也可独立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两湖独占鳌头，实现他做“两湖王”的美梦，故对同为保定帮的四、七两军势力都有意加以排除。

在蒋介石发起迁都之争时，唐生智、张发奎其时均戴上“左派军人领袖”桂冠，其他军人领袖，如程潜、朱培德等，由于对蒋介石权诈专横、私心自用不满，其时也都站在汉方一边，声讨蒋以军驭党，以军控政的独裁行径。在宋庆龄领衔，发出致蒋电反对迁都南昌主张时，国民革命军的几位军长都列名其中，李宗仁态度虽然不十分明朗，但也挂名其后，同时又私下给南昌的蒋介石拍去一电，劝蒋在迁都问题上让步，暗示蒋：“党务问题上，一埃军事告一段落，再行严密整理。”李与蒋通契，表示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一致。

## 第四十五章 上海恐怖

3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兵分4路大举东下，进略长江下游。蒋介石为掌握江、浙两省军事，并表示对白崇禧的信任，将嫡系部队由何应钦交白崇禧指挥，何、白公任东路军总指挥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6个纵队，由闽、赣分途入浙，直捣杭、沪。蒋介石则任中路军总指挥，下辖左、右两路军：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率七军全部和黔军王天培部，沿长江左岸东下，夺取合肥、蚌埠，截敌归路；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率六军并独立师贺耀祖等部，沿江右而东，进取金陵。唐生智任西路军总指挥，统率4个纵队，以一部巩固武汉，主力进入豫南，策应江左军之作战，并与陕之冯玉祥部连接，相机进取豫中。

此番东征，敌军慑于北伐军声威，纷纷倒戈归顺。江左军由鄂东进击皖西后，盘踞安庆附近之敌陈调元、王普等输诚，安徽传檄而定；江右军于3月6日即进克芜湖，续克当涂，攻克南京；东路军击破龙游附近之敌，进占金华、兰溪，尔后连续驱逐桐庐、富阳之敌，乘胜攻占杭州，又分两路续向淞、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堵、戴埠一带之敌，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北伐军完全切断；右翼连克松江、苏州、上海。

北伐军迅速消灭了孙传芳的部队。直鲁系军阀张宗昌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都退到徐州一线防守。至此，北伐战争北捣黄河，立马长江，西克开封，东卷沪宁，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的配合作战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在江西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又制造了安庆惨案，他从江西杀起，走一路杀一路，一直杀到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责人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地位，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保卫团，虞便极力联络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人。

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张建立从资产阶级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发动民众暴动，但他们又看不起自己所领导的无产阶级，说：“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来领导，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即使起义成功，工人可不参加政权，“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不要奢望。”共产党的领袖们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于1926年10月发动了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结果失败了。

这次起义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首先是罗亦农的思想开始转变，提出从今以后要自己为主体，资产阶级当配角，工人阶级争主角的意见。但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正确意见，仍然主张：“我们现在可以有两个领袖，钮永建是军事的，虞洽卿是民众领袖。”1927年2月，共产党又发动了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之前，陈独秀已经看到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因此，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武装起义总方针时提出：“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又提出，只能在口头上宣传，文字上不要提蒋介石的名字。这次起义纠正了第一次起义时以商人为主体的思想，和起义后幻想钮永建做军事领袖、虞洽卿做民众领袖，而主张中共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起义的口号是“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但是没有向工人宣传夺取政权，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思。这次起义除闸北和南市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零星的战斗外，其他地区没有发动起来，起义又失败了。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于1927年2月23日开始积极准备第3次起义，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彭述之、周恩来、尹宽、萧子璋等8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5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随后确定周恩来为武装起义总指挥。

特别委员会是个十分精悍的领导班子，他们有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每天下午开会，晚上作出决议，第二天就能传达到活动分子中去。工作千头万绪，却有条不紊。他们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力和高效率。

陈独秀在这次起义中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3月4日，陈独秀根据集体讨论的意见，做出决议：罢工以后，工人立即冲上街头，

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与此同时召开市民代表大会，为建立市政权做准备。

怎样选择起义的时机？陈独秀提出：“不要太早。有 2 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然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必可发动。”陈独秀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3 月 20 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参加罢工工人不下 80 万。

22 日上午，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在激烈的巷战中召开，千余团体，4000 名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市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 19 人，其中有共产党员罗亦农、汪寿华等 9 人，还有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

当天下午 6 时，上海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28 小时的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5000 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只有 150 支破旧枪枝和少量手榴弹，打败了 5000 反动军警，前后缴获步枪 3000 多支。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

陈独秀在活动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我们要准备继续的争斗，我们要看清这个开始的序幕。在全国我们争斗的目标一是帝国主义，二是军阀右派。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陈独秀讲完之后，罗亦农、尹宽先后发言，表示拥护陈独秀的报告。他们提出陈独秀是中国革命领袖，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大会在众人的掌声中结束。

陈独秀不免仰首伸眉，踌躇满志，但为时不久，他就变得忧郁、恼怒而踌躇不前了。

被选入临时市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钮永建、虞洽卿等人开始捣乱。陈独秀通过市民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的办法，一开始便碰壁了。钮永建及资产阶级代表 6 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有杨杏佛那样的进步人士。这表明，在推翻军阀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突出了。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 C.P 的，蒋介石反对；上总被白崇禧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

上海滩阴风飏飏，寒气袭人。

3 月 26 日，蒋介石来到上海，他向帝国主义者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当时，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蒋介石对沪上商界说：“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

至于工人纠察队，蒋介石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陈独秀想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能常驻上海，但机灵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

陈独秀又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而市政府委员们已是终夜徨徨，莫知所适。

蒋介石像个鬼魂似的纠缠着共产党人，陈独秀和特别委员会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得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



因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仍然是旧军阀，同时又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但却没有公开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动群众向他作坚决斗争。陈独秀又害怕公开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陈独秀面前是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策。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万里之外共产国际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共“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

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

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隐藏起来，可数千名纠察队员藏到哪里去？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这是自杀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邓泽如、吴稚晖、钮永建、张静江、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起来，并连日举行会议。蒋介石等提出两件事，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他们甚至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原本是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在孤身一人在沪，不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因此他表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辩护。

会上发生争论，吴稚晖竟向汪精卫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汪精卫给弄得措手不及，毫无办法，连忙逃避，退上楼梯，嘴里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的人为之啼笑皆非。

4月3日，蒋介石发表通电，扬言“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他又向工人纠察队表示“断无缴械之理”，并向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蒋介石设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

然而蒋介石的通电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与汪，军权交与蒋。处于困境的陈独秀本来就希望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现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当汪精卫同他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

陈独秀把宣言起草成之后，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并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汪陈联合宣言》于5日见报。吴稚晖当面讽刺汪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众人不欢而散。汪精卫于6日秘密离沪赴武汉。

蒋介石所以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是因为情况对蒋并不利，除上海工人武装悉数被共产党控制外，国民革命2、4、6、8军等武装力量均已明确表态站在武汉政府方面，即便是蒋介石的心腹第一军中，也出现了严重“动摇”，第1师师长薛岳、第21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而且军中不少

中下级军官更是不服从调遣，甚至一些毕业于黄埔的军官，也成群结队来沪向“校长”质询，要求对发生的反共反工农行为作出解释，对此，蒋介石殊感沮丧，吴稚晖、张静江等相对歉疚。蒋介石若得不到李宗仁以第七军武力作全力支持，他要“清党”，就会激起剧变，不仅他的整个反革命计划难以实现，蒋的个人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李宗仁自打以“四校同学”结帮，自立门户的算盘落空后，唐生智越来越以两湖主人自居，根本不把李的第七军放在眼里。加上李宗仁在汉、浔之争中被视作“中间偏右”的立场，在当时武汉军政各界领袖争相表态的高涨革命氛围中，难免显得不大和谐。尽管当时武汉方面的一些要人，如邓演达、顾孟余、徐谦，乃至苏联顾问鲍罗廷都曾亲自到7军军部，与李宗仁恳谈，但李宗仁经再三权衡之后，决意不再徜徉。

李宗仁班底的重要成员，包括与其拍手搭档的黄绍竑，家中都是有名的封建大族。

李宗仁要是倾向于共产党，跟穷人站在一起，就会被他的团体成员视为不仁不义。北伐出征前，国民党中央派到七军的政治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李宗仁把黄留在后方，另行推荐了与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均有私谊的麦焕章担任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李宗仁反对在七军设基层党代表和政治部，除军党代表由黄绍竑自任外，只在军部设了个象征性的政治部。北伐出师后，黄绍竑党代表的印章干脆由李宗仁带着。

李宗仁早有反共的意图，但他单凭自身的力量，绝非共产党的对手，更不足以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蒋介石在南昌已频频向李宗仁招手。为了使李不倒向武汉方面，蒋介石数度请白崇禧打电话给正在“迟疑”的李宗仁；“请德邻来！”又从江西大笔一挥，特拨款项20万元给七军作军饷，这笔厚饷无疑在李宗仁已经向右倾斜的天平上又添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3月18日，李宗仁由武汉乘轮东下，抵达安庆。次日，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郭沫若、朱克靖便也接踵而至，并随身携来了委任状与大印一颗，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委李宗仁以第7军军长身份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但李宗仁以“政治非我所长”为借口，谢绝了武汉政府的此一任命。

郭沫若等离去不久，蒋介石亲自从九江乘军舰来到安庆，同样带去任命李为“安徽省主席”的手令。当蒋得知李拒绝了武汉方面的委任后，大为满意，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任命，我现在来委你做安徽省主席吧。”李宗仁先是故作推辞，蒋窥出李意，连声道：“做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个人暂行代理。”言下之意，安徽地区从此可以由李任意支配。如此这般，一笔交易达成。

3月27日，李宗仁应蒋亲邀，将所部暂托夏威、胡宗铎指挥，自己则乘轮东下，由南京悄赴上海。

李宗仁来到上海，首先来到东路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的龙华指挥部。

白崇禧此时已下决心剿共，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暂且忍耐。故见李宗仁到沪，十分欢愉，两人立即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都认为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两人当即一起去见蒋。

蒋介石急于得到李、白相助的承诺，他一再问李“你看怎么样”。

李对此心照不宣，乃主动献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并当场表示：“愿将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不稳部队，使其不

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刘峙将该师整理就绪，再将其调至沪宁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蒋见李有如此表示，如释重负，当即照办，并请李、白致电两广，将黄绍竑、李济深邀至上海，共筹对策。

4月2日李济深、黄绍竑联袂到沪。是日，蒋介石、吴稚晖、何应钦、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等加上李、黄、白广西三巨头，一起在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臭名昭著的“龙华反共会议”，决定了“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会上通过了吴稚晖、李宗仁等所谓“国民党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

他们在4月4日，又联名发出反共的“护党救国”通电，为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与此同时，李宗仁已饬令第七军于3天内赶赴芜湖、江宁，担负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侵扰南京和解除南京附共部队武装的任务。于是被认为具有“亲共色彩”之第二军被令渡江至浦口，抵御直鲁军。程潜的第六军第19师被认为是附共部队，被全部缴械。

蒋介石下令将刚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来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

上海方面，也由白崇禧先与沪上各国公使秘密交涉，以便在动手时，准许白的便衣队通过租界。

4月8日，一切准备就绪，蒋介石在行情召集了重要军事会议，会后以上海为后防要地为名，宣布全市戒严，白崇禧、周凤岐任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蒋介石本是上海青红帮流氓出身，蒋已与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通气。

蒋介石以前方军事吃紧为名，于9日乘车前往南京，上海交由白崇禧全权包揽、坐镇指挥。

蓄谋已久的屠杀案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新调进上海的周凤岐26军，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局势表面上仿佛松弛下来。上海总工会的纠察队总数共有2700人，分驻在闸北、吴淞、浦东、南市4地。4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突然有上海青红帮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冲锋放枪，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英勇还击。

正在这时，大批26军部队开到。先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并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26军迎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变色道：“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其时26军已把机关枪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其他几处工人纠察队的情况，大同小异。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指挥周恩来在11日晚被26军2师师长斯烈骗去。斯烈的胞弟斯勖是黄埔军校学生，即周恩来的学生。斯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周去谈一谈，周恩来也想去作26军的工作，便同副指挥到了斯烈的师部。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

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刻要同26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黄同赵一起来到2师司令部，房间的桌椅已被周恩来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周恩来双眼怒视斯烈，大声斥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

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低头说道：“我也是奉命的。”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后，斯烈改变了主意，向周恩来说道：“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不要误会，我向您表示歉意。”周恩来根本不理睬他，转身同黄澄镜等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办公处。此时各外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

4月12日清晨，工人们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数万工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被26军占领的上海总工会会所。上海总工会派人和白崇禧交涉，但他们吃了个闭门羹。怒不可遏的总工会当即下令举行同盟罢工。下午，20多万民众包围了26军龙华总部，白崇禧依然不肯露面。

4月13日，大雨倾盆。10万多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开完大会后举行游行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2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群众一起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的26军士兵突然发了疯似的奔出来，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顿时，惊呼声、惨号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宝山路立时变成了血海，人们争向奔逃。因大队拥挤，无法退避，当场被打死的有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这便是惨绝人寰的上海“四·一二”血案。

次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14日下午，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军警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几天之内，又有共产党人1000多名被拘捕。随后不久，陈延年、赵世炎等著名共产党员被捕后又秘密地用排枪杀害。

恐怖在蔓延，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在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安徽，大规模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陈尸街头。广州被捕者近千人，死伤者数百人。

## 第一章 三权鼎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出，武汉怒吼，全国震惊。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严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宣布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下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将蒋捕获归案，按反革命罪惩治，所部第一集团军改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湖北省党部、汉口市特别党部、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界民众团体都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国民党政府拿办蒋介石之命令。4月22日，宋庆龄、吴玉章、林伯渠、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何香凝、徐谦、汪精卫、朱培德、顾孟余、谭平山、于树德、经亨颐、恽代英、彭泽民、孙科等共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名义，发表了《讨蒋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贼。4月23日，30万人在武汉召开大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高潮。

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南京，又开始酝酿下一步的反革命计划，把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召来南京。张静江、白崇禧、蔡元培、吴稚晖等均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来到南京。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谈话会，决定全面清党和奠都南京。

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府，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队的总司令。

国民党宁、汉对立的局面终于形成。从此，中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中央政府，出现了3权鼎立的局面。

蒋介石暗中加紧同英、美、日帝国主义勾结，并通过帝国主义谋求与张作霖的联合，双方互派代表，共同进行协商，联合起来反共反苏。南方的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亦不甘落后。3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布朗乘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由汉口经过浦口时，与同行的苏联通讯员3人被直鲁军捕去，尔后解往北京审理。张作霖在北方开始捕杀共产党人。

4月初，李大钊避居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经常在夜间写文章，作报告，被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并通过法国使馆与日本使馆取得联系，通知张作霖。4月6日，张作霖指使奉军、警察厅出动数百人，强行搜查苏联大使馆及俄国兵营，捕去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革命人士35人，李大钊也被逮捕。除苏联大使馆外，中东路局驻京办事处及远东银行也被搜查，奉军乘机劫走了一些生活用品。奉系军阀和教唆者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再谈国际公法、“条约神圣”、“使馆界不可侵犯”的鬼话。许多洋人围观称快，有的摄取镜头。

搜查俄使馆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和苏联代办提出抗议，对此，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敷衍道：“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这句话传到北京，生平最忌别人提“土匪”的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不由得暴跳如雷地大骂：“外交人员怎么如此混蛋！”吓得内阁总理顾维钧急忙发电严斥郑延禧：“何得不问情由，擅发荒谬议论。”张作霖本要撤换大发谬论的郑延禧，但又怕苏联乘此承认南方政府而不再承认北京政府，因此这一“外交官失言案”便不了了之。苏联代办切爱尔尼克率全体大使馆官员30余人回国。

张作霖在法、日帝国主义的怂恿下，组织了一个军事特别法庭，派何丰林为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为主席法官，4月28日判处李大钊、谭祖尧、谢伯俞、邓文辉、郑培明、莫同荣、李昆、姚彦、张伯华、阎振三、杨景山、范鸿、谢承常、路友于、莫华、吴平地、陶永立、方伯务、李银莲（女）、张挹兰（女）24人以绞刑，即日执行。另有4人被判处12年徒刑，6人被判处2年徒刑。李大钊临刑神色不变，和他一同牺牲的同志也都表现了舍身成仁的伟大气节。

李大钊等20余人遇难的消息传到潼关，在潼关督师的冯玉祥放声大哭，他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追悼活动，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左臂带黑纱一周。冯在电文中说：“李同志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冯玉祥在电报中号召全军继承李大钊等革命者未完成的事业：“讨伐张作霖即是实行李大钊等20位同志未竟的志愿”，“继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奋斗！”冯在潼关为李大钊等

20 位遇难者树立一纪念碑，用诗歌形式撰写碑文。

冯玉祥在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时曾通电营救：“本总司令对于张作霖此项稟承帝国主义意旨所出之空前横野行为，殊为愤慨。李大钊系国民党党员，本总司令所辖之第二集团军系国民党党军，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30 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武汉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处于奉系军阀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两面夹攻之中，蒋介石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湖北。武汉政府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四川军阀杨森。在经济上蒋介石和各国帝国主义对武汉地区采取了物资封锁政策，国内的资产阶级也采取了现金逃避的手段。武汉政府被迫颁布了“现金集中”命令，禁止现洋、现银出口，试图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武汉地区金融阻滞，汇兑不通。商业纷纷停闭，物价疯狂上涨，日用品缺乏，失业工人人数骤增，5 月间，武汉市失业工人达 12 万人。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农民，已开始自动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

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便离沪去汉，于 4 月 15 日到达汉口。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连电催陈独秀去武汉。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都已在汉口，陈独秀是最后一个到汉口的。

陈独秀到达武汉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面临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机关在汉口四民街 61 号临街的一幢三层楼洋房内，中央 5 位常委都住在那里，陈独秀的办公室由任作民、任秀兰和黄文容 3 人组成。任作民、任秀兰是任弼时的弟弟和妹妹。

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苏联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们苦心焦虑，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生争论。

4 月 2 日，罗易来到武汉，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举行会谈，讨论革命形势问题。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陈独秀到达汉口后，由陈独秀主持。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应采取的革命策略问题，发生了争论。有 4 种意见：(1) 东征讨蒋；(2) 南下重建广州政府；(3) 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 2 期北伐；(4) 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

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东征讨蒋，而主张北伐，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国主义再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

北伐可以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联通道。罗易则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

鲍罗廷说：“如果你们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鲍氏不惜以掬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加上国民党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也力主北伐，反对东征，这样，立即东征的主张被放弃了。

武汉政府于 4 月 19 日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准备由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和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

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国民党中央于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到5月6日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常委、一些军事将领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与此同时，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在汉口召开，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上作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土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以不没收等等。

共产党内部已出现了对陈独秀批评的态度，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不得不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主要是退出国民党，对北伐态度消极等，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陈独秀对一些有争议的策略上的错误，谈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对中山舰事件，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上海武装起义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是必要的等等。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说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军队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应把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陈独秀没有提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的任务，没有夺取部队领导权的近期方案，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切实步骤。作为总书记，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已显得不称职。

陈独秀在“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五大”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内，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某些右倾错误，他思想很苦恼，心情不安得很。

陈独秀是这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心情也不轻松，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但对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和国民革命军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势力，仍抱有幻想。国民党中央否决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时，也没有进行坚决斗争。

对国共两党关系不久破裂，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因而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

“五大”选出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一次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等4人。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组成，陈独秀任总书记。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极敏感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在5月9日和12日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国民党的主要头领们，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之后，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在表决时，只有共产党人林伯渠、吴玉章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举手赞成，但他们是少数，《草案》被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

5月13日，唐生智节制的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发出反共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夏斗寅率领叛军，乘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北伐，武

汉空虚之际，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日，直逼武汉附近的纸坊、土地塘一带。

武汉危急，国民政府派由共产党员叶挺所部第24师，以及由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独立第11师，前往镇压叛乱。叶挺的铁军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又一次显示了战无不克的威力，夏斗寅的部队留下几百具尸体而溃散。

李立三和蔡和森提议：由叶挺率本部及中央军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铁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并开赴前线助战，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但他们的建议没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通过。罗易和瞿秋白都认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搞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陈独秀和鲍罗廷都同意这个意见。蔡和森和李立三也就没坚持自己的主张。

夏斗寅师由纸坊沿粤汉路南退后，蒋介石即收编为新编第10军。

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

美其名曰“制裁工农越轨行动”，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即无异反革命”。

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刚刚发表，何键的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武装叛乱，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

35军大部分军官都是湖南人，从军长何键到参谋长、秘书长、参谋处长全是醴陵的阀阅世家。当农民起来革命时，他们的家庭首当其冲。

何键曾在中央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同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冲突，毛泽东赞扬农会，他热情洋溢地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之下的，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何键却愤怒地把农民政权斥为痞子政权，他说：“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下，湖南农民也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反驳说：“恰恰相反，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喘不过气来。”何键咆哮如雷：“革命军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了，革命军的家属被农会抓去戴高帽游街了，再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军队就没办法控制了，他们只有造反了！”何键决定让他驻在湖南的5个团长：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歃血为盟，发动叛乱。33团团团长许克祥是行伍出身，性格粗犷，他的妻子是脱籍妓女，靠和川、黔、滇的贩土客商分利置了几百亩田地，许克祥早就对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不满，他得到何键的旨意后说：“什么共产党，什么农协会，我许克祥不怕，我杀他个鸡犬不留！”5月21日深夜，大雨纷纷，许克祥部以白袖章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连续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达7天之久，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4日会议，再次发生争论，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讲，说：“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罗易发表演讲，反对鲍罗廷，他说：“蒋介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内，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他们否定土地



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蔡和森接着发言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咒骂民众运动的人，这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

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接下是瞿秋白发言，他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其实老鲍与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两个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分别对他们提出批评，但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对两个外国人进行调和，并反驳蔡和森。

陈独秀再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廷回答陈独秀说“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而陈独秀并没说退出国民党以后，该怎么办，会议以沉默态度答复了他的发言。中共中央已陷入了政治危机。

共产国际于5月下旬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历史上称为“5月紧急指示”。6月1日，罗易收到这份电报。《指示》要求中共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等。

但是，这个要中共建立军队的《指示》来得太晚，6月6日，本来以左派面孔出现的朱培德在江西宣布了“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这一天，陈独秀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他提出许多疑问：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建立军队之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陈独秀认为，国际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

政治局经过讨论，作出对国际“5月紧急指示”的答复：“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把《指示》交给汪精卫，并以“开诚”相见的态度，劝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汪精卫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6月13日，汪召集国民党将领，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要求军队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

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幻想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东征讨蒋，不惜作出最大让步，于6月28日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把部分枪支交给国民党，部分枪支转移和隐藏起来。

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问陈独秀：“报上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这件事你晓得吧？”陈独秀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陈独秀虽是这么说，他心里也很难受，常一个人在房里自言自语：“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他陷入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6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11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当然的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是个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把共产党仅有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交给了国民党。

7月中旬，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精神，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同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政治局兼常委。

陈独秀不愿去苏联，并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说辞职的主要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 第二章 “八一”战旗红

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逐条地宣读《5月紧急指示》，并大肆渲染、歪曲、蛊惑。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宣布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背叛革命。武汉政府便以血腥屠杀对付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

在反共的大合唱中，阎锡山、冯玉祥采取了一致行动。阎锡山在山西“清党”反共，先后有共产党人王瀛、朱志翰、张勋、王世益、赵秉彝、郭骤才、郭惠卿、王达成、王德茂、袁致和、侯丰利、聂馨远、李卓然、郝耀宗等人被逮捕或杀害。

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击败奉军张学良部，6月1日同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历史上称为“中原会师”。北伐军贺龙部于6月2日进占开封。武汉政府决定和冯举行郑州会议。

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电请武汉党政负责人赴前方“指导军事政治”，于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5人赴郑州，冯玉祥也由洛阳抵郑州。冯到郑州时，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欢迎他的政府成员、军事将领、铁路员工和闲逛的人群。冯检阅了仪仗队，以谭延闿为首的政府成员想走近他，但兴高采烈的铁路工人把政府成员挤到了一边，把冯抬起来，送进了轿车。

6月10日，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举会了郑州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

汪精卫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拉冯”、“讨蒋、分共”。何键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30个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冯对陕、甘地区工农运动本原就有不满情绪，农民抗完粮、抗纳税、抗差役等等，因而影响到国民军的

军用征收，他又得知农民协会抗征兵、抗征粮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西安《新秦日报》社长、共产党员蒋听松又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冯气愤地说：“我和你们合作，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现在又听了何键的话，对工农运动更加反感，因而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武汉方面“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会议决定在开封设立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 3 省党务，以冯玉祥任政治分会主席，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刘伯承、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并聘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冯虽然同意分共，但在政治分会成员中仍要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参加。会议还决定在河南的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归由冯严行编组，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负责肃清，而所有在河南的武汉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则一律撤回武汉整顿，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既是为了镇压工农运动，也是为了东征讨蒋，原定打到北京的计划，半途而废。冯之第二集团军扩编为 7 个方面军，其总指挥分别是：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北伐军以 1.4 万人的代价换取的“中原会师”的胜利果实，都落到了冯的手中。

冯玉祥还准备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但汪精卫收到陈某拍给他的电报：“冯已与蒋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你们。”汪便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其实，冯、蒋当时还未有那样密切的关系。

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故意把蒋拉拢他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并骂蒋是“狼心狗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郑州会议刚过，蒋急于了解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

冯回电要蒋另约地点相会。经过来往电函多次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此时，蒋介石的北伐军已占领徐州多时。蒋介石邀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专车来徐，共商一切。

冯玉祥从郑州赴徐州的行动十分秘密，火车先由郑州向西开了两三站，再回头向东开。当冯的列车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介石专车前来迎接。当冯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蒋介石率领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然而出人意料，“花车”车厢内并没有冯玉祥，而在“花车”后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门口，站着一位衣敝履的关东大汉，向欢迎者招手，众人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冯身着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那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冯、蒋相见互相拥抱，还落了眼泪。

当晚蒋便设宴招待，在徐州各将领作陪。

6 月 20 日，在花园饭店召开“徐州会议”，吴稚晖担任会议主席。双方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蒋介石企图拉冯“反汪”和“反共”。但是，冯力主调解宁汉争端，并说明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还说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要求冯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为冯婉言拒绝。蒋介石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吴稚晖代冯拟了《劝汪谭诸氏速决大计电》，经冯再三修改后署名发出。电报的内容是：反对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加速“分共”；宁汉合作；继续北伐。

6 月 21 日，冯向蒋辞行，乘火车前往开封。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清党”。他

将军队中的共产党 200 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 40 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承 1000 元，科长以上的每人 100 元，其余每人 50 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 240 余人一下子拖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又到西北去了。

冯玉祥又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指示其关于“清党”的措施。

但是，苏联驻华总顾问鲍罗廷被迫离开武汉回国，途经郑州时，汪精卫秘电冯玉祥，要冯将鲍罗廷杀害。冯不仅对鲍不加杀害，反而仍以礼待之。当鲍罗廷乘火车离郑州西去时，冯率高级官员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鲍罗廷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送上大红绸纱一匹，算是冯的“薄礼”。军乐大作，各人一一同鲍罗廷握手道别。冯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同鲍罗廷一起回国。冯玉祥派了高级官员 2 人一直把鲍罗廷一行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们平平安安地返回苏联。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在 1926 年 7 月以前，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军火有：苏联步枪 5 万支以上，日本步枪近 2 万支，德国子弹 2000 多万发以上，7.6 毫米口径步枪子弹近 5000 万发，大炮 50 门以上，山炮 12 门，迫击炮 18 门，炮弹 1 万发，机枪 300 挺以上，掷弹筒 1 万枚，手榴弹 1 万枚以上等等，总援助费用达八九百万卢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对广东政府还没有投入那么大的军事援助，而对中国共产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援助。

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他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部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

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屈武等 22 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汪精卫把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调往江西，作为江南东征讨蒋的部队。张发奎此时对东征、北伐毫无兴趣，他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去，盘据在广州的是李济深的部队。

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掌握的力量较强。第二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二十军，叶剑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 25 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叶挺担任第十一军 24 师师长；当时还未加入共产党的贺龙担任第 20 军军长。

另外，朱德担任第 3 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云集在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达 2 万人以上。这是共产党能够控制的仅有的革命武装力量。汪精卫集团“分共”后，调动第三、六、九军对这些革命力量取包围之势，张发奎已有让第二方面军的 C.P. 高级军官退出或脱离的表示。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指挥。周恩来派聂荣臻赶到九江，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7 月 20 日，聂荣臻同转移到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李立三、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以及叶挺等举行谈话会，商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

南昌，实行南昌暴动，解决 3、6、9 军在南昌之武装；提出建立新的政府的口号，并将这个意见报向中央。

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此时共产国际又派罗米那兹来到武汉。

7 月 24 日，罗米那兹、加伦、周恩来、张国焘开会，会议根据周恩来和加伦的提议，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会后，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召集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会商，又决定起义后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贺龙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他早在 6 月即向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当谭平山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他，他立刻热情拥护。

周恩来等从九江秘密来到国民党控制的南昌，于 7 月 27 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 4 人组成，并决定在 30 日晚举行起义。

不久，谭平山、张国焘也参加了前委的会议。

28 日，周恩来到 20 军指挥部去看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样干。”贺龙、叶挺当日接到张发奎从庐山拍来的电报，请他们上庐山，实际上是汪精卫强迫张发奎要解决贺、叶的部队。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其时也在庐山，他立即连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烟水亭 20 军司令部，建议贺龙、叶挺不要上山，将部队开往南昌城内。

30 日早晨，张国焘来到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说：“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李立三一听大怒：“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周恩来接着说：“还是干！”其他前委成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亮出底牌，说道：“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拍着桌子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会议不能用举手表决办法进行。

谭平山十分气愤，会后建议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31 日早晨再开会，又辩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屈服了，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决定在次日晨行动。

下午，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传达了战斗任务，不料发生了意外情况，20 军 1 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这一情况被 20 军一个士兵发现，立刻向贺龙报告。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把起义提前 2 小时发动。

8 月 1 日凌晨，枪声划破了长夜的寂静。激烈的战斗进行到清晨。早上 6 时，城内的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 3000 余人，缴获 5000 多枪支，子弹 70 余万发，还有大炮数门。起义成功了。

上午 9 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召开了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了起义

经过，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彭湃、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 25 人组成。在讨论名单时，周恩来、李立三不同意张发奎列入其中，但由于张国焘、谭平山坚持，张发奎也成了革命委员会委员。

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 20 军军长，廖乾五为 20 军党代表，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 11 军军长，聂荣臻为 11 军党代表，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

8 月 2 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 25 师的两个团 3000 余人赶到南昌。加上临时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的第 11 军第 10 师，起义的兵力达 2 万多人。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东，取海口，以求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

起义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息和整顿，也来不及等待一些赶来的部队到达，即于 8 月 3 日匆忙地从南昌出发。

周恩来和前委在 8 月 5 日前后从南昌出发，从此以后，前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意外的艰难和挫折相继而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部第 10 师，在进贤突然脱离起义部队，折往浙江，一下拉走了全军将近 1A4 的兵力。8 月的江西，酷暑笼罩，天气热得使人难以忍受。起义军南下后走的多是山路，每人身背子弹 300 发，还要扛机枪、大炮，途经各地的居民大多逃散，连食物和茶水也难以买到，许多战士得上赤痢，病倒、脱队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行军 3 日，人困马乏，实力损耗近 1A3。武装弹药，因运输困难，多数被抛弃。

留下来的官兵，士气高昂，有顽强的斗争意志。部队在抚州休整了几日，尔后进抵宜黄。是时，曾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共产党党委书记陈毅和特务连连长肖劲赶了上来，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

起义军在途中经瑞金、会昌时，同蒋介石的嫡系钱大钧部和黄绍竑的 5 个团打了两仗，均击溃敌军。敌人仅在会昌战役中伤亡、被俘、逃散的达 6000 人，余下的 3000 人退走。

但起义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达 1000 余人。

会昌战役后，贺龙、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9 月 5 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长汀，并由长汀、上杭入东江。部队在广东境内的三河坝实行了分兵，朱德率领的第 11 军 25 师等部留守三河坝，这支部队后来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转入湘南，并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湘南大起义，随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率领第 20 军和第 11 军 24 师直下潮汕。

这支起义部队占领汕头和潮州后不久，被李济深和黄绍竑的部队包围，起义军同敌军苦战数日，终因众寡悬殊，而退出汕头和潮州。24 师 1200 余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到达海丰，同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他们树起苏维埃的旗帜，创立海陆丰红色政权。

在起义部队撤退到普宁县流沙时，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以及从广州赶来的人，计二三十人，开了一次决策性会议。张太雷传达了“八

七”会议精神。由于中央命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等人离开部队，周恩来要求大家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 第三章 毛泽东上山

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历史上称为八七会议，因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政治报告，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党的主要方针：一是更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是纠正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是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会议还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瞿秋白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它结束了党中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党拯救了出来。中共“五大”时全国有党员近6万人，至八七会议前只剩下万名党员，而且北方党员说，假若中央迟改变策略和方针一个月，我们都散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和独立自主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方针，鼓舞了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米那兹来到汉口，当天晚上就同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张国焘以及瞿秋白晤谈，张国焘同罗米那兹发生了争吵，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进行调解。事后，罗米那兹同瞿秋白进行了一次长谈，瞿秋白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以及当前正在紧急商议的挽救革命的计划。次日，他们三人继续晤谈，商议南昌起义，召开紧急会议问题。随后瞿秋白受临时中央政治局委托，负责八七会议准备工作，他同李维汉、张太雷、罗米那兹一起，做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其他会议文件。

瞿秋白是江南名城常州市人，1899年1月出生，其父能诗善画，精通医道，但却长期没有工作和收入，瞿家这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家庭很快破落下来，依靠亲戚的接济和典卖过日子。瞿秋白幼儿时就接受母亲的文化教育。6岁时就能背诵许多诗词。7岁时上小学，老师是一位老举人。12岁时小学未毕业，便考进了常州中学，他的同窗好友便是张太雷，两人在一起阅读书报，议论国家大事。瞿秋白14岁时开始作诗。

同时向父亲学习绘画、篆刻，颇得父亲的神韵。

瞿秋白16岁时，已是少年老成，性格坚毅，很有主见。他在常州中学毕业后即到无锡乡间江坡小学教书，过着清贫的生活，从微薄的薪水中省下一点钱，接济家中的生活或购买书籍。任职半年便辞职去武昌，在堂兄瞿纯白的帮助下进入武昌外语专科学校学习了几个月英语。1917年春，瞿纯白调往北洋政府外交部当科长，接瞿秋白去北京。

瞿秋白在北京大学旁听了一学期，尔后考入免费的国立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学习非常刻苦认真，主要学习俄文，还学英语、法文。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多次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很受启发，便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见李大钊，

开始研究马列主义。五四运动期间，瞿秋白是位积极分子，组织讲演小分队到街头讲演。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先后同他人一起创办《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等，自1919年7月至1920年10月，共发表30多篇政论、杂感、诗歌和译文。1920年9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派记者，赴苏俄。

瞿秋白等3位特派记者同3位外交官一起，于10月中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途经各地因受白匪阻扰，历尽艰险，花了3个多月，才抵达莫斯科。

瞿秋白在苏联写了大量的通讯，仅在1921年至1922年11月北京《晨报》上发表就有25篇，16万多字，另有20多篇在邮寄途中丢失。瞿秋白在苏联还写了4本书：第一本是《俄乡纪程》，第二本是《赤都心史》，第三本是《俄国文学史》，第四本是《俄罗斯革命论》。他的这些丰硕成果，是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完成的，他以坚毅的意志战胜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时间，辛勤工作。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赤潮曲》：赤潮澎湃，晓霞飞涌，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

光华万丈涌。

1922年12日，瞿秋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带着几箱书籍，坐火车离开莫斯科，于次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

瞿秋白回到北京后，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即译配《国际歌》词曲，他以俄文为主，对照法文翻译，一边用风琴弹着曲谱，一边用适当的中文词汇译配歌词，终于译配好了《国际歌》，并将它刊在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瞿秋白在北京稍作停留，便奔赴上海，在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办的一所大学，教师中有著名共产党员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肖楚女、沈雁冰等。

瞿秋白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共产党员人数由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同时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是以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领导人也有严重失误，存在着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仇恨和对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投降主义的愤怒而滋长的革命急性病，没有认识革命已处于低潮，因而没有组织正确的退却和进攻，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情绪，进而发展为盲动主义的严重错误。

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在湘鄂赣粤4省边界发动秋收起义问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不同意湘南工农武装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取粤的意见，他认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强，所缺的是武装。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发展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回答道：“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



朋友。”毛泽东是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他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年之后，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由于蒋介石叛变，他才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职。

8月12日，毛泽东由武昌搭乘货车，连夜起程赶回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的身份，多次参加湖南省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安源等地区组织武装起义，毛泽东到浏阳、平江农民中去当师长，并组织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担任前委书记。

而后毛泽东到株洲、安源，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起义计划。在安源党组织的会议上，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介绍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平江农民自卫军的情况；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汇报了宁冈、永新、莲花、安福农民自卫军7月攻打永新城的战斗，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在茅坪、茨坪的情况。毛泽东产生了以后上井冈山的念头。会议确定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受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任党代表，从中央返回的卢德铭任总指挥。

卢德铭是四川人，19岁便去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并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警卫团任团长。南昌起义时，卢德铭率领警卫团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修水县暂驻。毛泽东正需要正规部队参加起义，毛、卢一拍即合。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师长由余洒度担任，副师任余贲民。师下属3个团：1团团长钟文璋；2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张明山；3团团长苏先骏，党代表潘心源，参谋长何坚。

3个团的武装力量分别以驻修水、安源、铜鼓的工农革命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共计5000人左右。3个团分3路，在各地工农武装的配合下，以不同的路线攻克长沙。

湖南省委准备发动长沙近郊和粤汉路的暴动队伍，里应外合，相机夺取长沙。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在潘心源等人陪同下，去铜鼓县城第三团领导起义，不料在途经张家坊时，被民团逮捕，要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他的人释放他。民团士兵是雇佣兵，同意释放毛泽东，而民团队长不允许，于是，毛泽东便决定死里逃生。他趁人不注意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在一个长了很高草的水塘旁躲到太阳落山。

民团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几乎要碰到毛泽东，民团最终放弃了搜寻。毛泽东立即翻山越岭，连夜赶路。他丢失了鞋，脚受了伤，不得不在途中买了双鞋、雨伞和吃的，到达农民赤卫队驻地时，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9日，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师长余洒度率领第一团从修水出发。余洒度在起义前收编了邱国轩部为第四团，但第四团在途中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

第二团从安源出发，12日攻克醴陵县城，16日攻克浏阳，但因麻痹轻敌而陷敌重围，突围中全团散乱，团长王新亚牺牲。

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先取白沙，后占东门市，14日敌人向东门市反扑，毛泽东决定兵分3路向上坪方向转移，经过一场恶战，于当日下午部队先后来到上坪。

毛泽东要求部队严明纪律，买卖公平。部队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毛泽东接到一团通讯员关于一团失利的报告，果断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

他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一团和二团迅速赶到浏阳文家市会师，并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长沙暴动。

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团到达文家市，与第一、二团胜利会师。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师、团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研究起义部队的去向问题。具有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本领的毛泽东，考虑到革命处在低潮的政治形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去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当机立断地作出战略退却的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到湘赣边界的大山上去。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师长余洒度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到山上去就是当山大王。毛泽东不厌其详地说明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旧时的山大王不同，而且战略退却是暂时的，将来革命形势好转时就下山。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

会后，毛泽东对1000多名战士发表演说，讲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指出建立工农武装的重要性，说明起义后受到挫折是“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随后，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军。在芦溪镇突然遭到敌人袭击，经过激烈战斗突破敌人重围，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牺牲。

9月26日，起义部队一举攻克了莲花县城，从敌人监狱里救出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尔后从县城出发。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的3个团缩编为1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计有7个连，一个军官队、一个卫生队。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宣布说：“愿留则留，愿走则走。凡自愿离队者，开具证明，发给路费。”改编后的部队，连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会，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5—7人，均由全体官兵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既是民主组织，又是监察机关，有权召集全体官兵讨论重大问题。部队实行官兵一致，经济公开。改编后的部队不足1000人，但部队密切了官兵关系，提高了战斗力，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带领这支队伍前往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和井冈山农民自卫军汇合。井冈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所拥有的部队名义上有第 1、7、10、14、16、17、19、27、32、33、37、40、44 等十数军，但其中真正能作战的，仅 1、7 两军而已，余皆收编不久的杂牌军。这些军队不仅兵质恶劣，而且须重金羁縻，耗费巨大，靠这些部队作战，只能是徒致战事延长，兵力疲敝。

蒋介石已处在内外夹击之中。

内是李宗仁、白崇禧拥有桂系军事力量即第七军，其在北伐中屡建战功，而这时同蒋介石貌合神离，甚至连何应钦也站在李、白一边。蒋介石在南京丁家花园召集将领会议，冀可激励袍泽，共有始终。而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蒋介石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力求与武汉合作，高唱“宁、汉既已殊途同归，就应捐除成见，恢复合作”的调子，并讽蒋“不宜固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蒋介石顾何应钦，何默不作声，蒋介石怒极，不待散会，拂袖而去。蒋因无时不怵于李宗仁及其党徒之跃跃欲试，密使其嫡系第一军何应钦安排一场兵变，将不守法之桂军一部缴械，何应钦已受李、白拉拢，加上对蒋此行不满，便谓动手把握不大，拒绝执行。蒋画虎不成反类犬，蒋、李积怨更深。第一军、第七军是蒋介石赖以建立南京政权的武装支柱，而现在何、李都不支持蒋。

外是，不仅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厉兵秣马，并作沿江东下的部署，其精锐部队确已向下游移动；北方奉张集团已乘机大举南下，进逼蚌埠、淮阴。孙传芳为报江西之仇，这次南攻，亲率兵作殊死战，津浦线上连连得手。

蒋介石在得不到桂军帮助的情况下，决定亲赴津浦前线督战，以此来缓和各方面对他的攻击，达到恋栈的目的，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产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介石出发前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蒋介石指挥第 10、27、32、40 各军，另加第一军两个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指挥的第 37、44 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佯作退却，蒋介石的部队进展极速。到了逼近徐州，北洋军阀的军队进行顽强的抵抗。蒋介石认为徐州到手已是指顾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北洋军阀的军队突由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蒋介石部队的左翼包抄袭击，蒋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军乘胜势出击，蒋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蒋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蒋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的。8 月 6 日，蒋介石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

蒋介石这次败北南京后，既羞又愤，就找了一只替罪羊，把战败的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第 10 军军长王天培，并将他扣押送到杭州交给蒋鼎文，将其杀害于杭州拱宸桥。

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不仅怨蒋无能，而且对蒋无故杀王天培深为不满。

其时，汪精卫已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下东征讨蒋，分兵 3 路大举东下，陈兵湖口。

孤立无援的蒋介石面临北军和武汉两方的汹汹攻势，已无招架之力，陷入一筹莫展之中，只好厚颜以求李、白，请其出兵帮助御敌，李宗仁见挫蒋时机已趋成熟，乃正式以“对汉宜先礼后兵”为辞加以拒绝。同时，李宗仁致电冯玉祥，公开呼应冯之“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

行合作”的建议，又写信给汉方唐生智，表示“只欲武汉反共，予愿已足”，并隐约责蒋。李宗仁又领衔发出为武汉分共愿与武汉合作电。

蒋介石是靠军事手段和实力政策起家的，现在李、白纷起效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自食其果，莫之奈何。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只好以迟疑的口气向李、白试探说：“我想趁此休息一下。”白崇禧未等蒋话毕，便接上话茬，说：“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李宗仁则更为干脆地请蒋：“自决出处。”蒋十分难堪，答道：“余唯以中央执监委员会主张为依归。”言罢，拂袖而去。

蒋介石指使吴稚晖出面，召集宁方要员开会，讨论南京政府局势。会上吴是蒋的御用“长衫佬”摇唇鼓舌，力主蒋留任，但到会军人态度则不同。李宗仁付之一笑，不作任何表示，连何应钦也一言不发。

蒋见况自感无奈，只得再作“愿休息一下”表示。白崇禧立即赞同说：“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行，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李、何等军人随声附和。蒋既然到了这步境地，只得以“深念党国前途”为名，宣布辞职下野。于是报刊上披露：“8月12日下午，南京召集重要会议，蒋总司令、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均列席该会。蒋以宁、汉相持，北伐军事难发展，武汉方面有一切均可磋商，对蒋个人绝对不能相谅之语，故愤自牺牲，提出辞职。何、白、李以战事日亟，亦欲速决意争，遂决退让，蒋即自动下野。”8月13日，蒋介石在张静江等人陪同下，秘密到沪，即入租界，行动诡秘。两天后，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李宗仁即继蒋正式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就此演成民国史上第一次蒋去李来之局。

## 第四章 党争迭起

蒋介石下野之际，正是国民党内“党统”争夺趋向高潮之时，除宁、汉两方各以“正统”自诩，指称对方为“非法”外，原从国民党中央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也以“反共先党”自居，在上海租界里，打起了“沪二届正统”的旗号。于是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的区域里，出现了一国二国民政府（南京、武汉）三中央党部（宁、汉、沪）的光怪陆离现象。

宁方党中要人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表示要同蒋“共沉浮”，继蒋之后宣布辞职。李宗仁、白崇禧桂派军人在党内毕竟资历过浅，且胡、吴等在辞职通电中以“貌和神离，惟领袖自竞”等语责备李、白，李颇感缺憾之处。然而，李宗仁不愧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为增强自身在党争中的竞争地位，他首先向在沪的西山会议派人士频送秋波，愿意携手，西山派圈子中本不乏“党中元老”，憾无实力作后盾。桂系有意与诸老交欢，西山派人士也格外对李表示好感。

李宗仁、白崇禧又向汉方发出一电，力言统一国府之必要，主动请示今后方针，明确表示仍以武汉中央为正统，并派出手下湖北籍大将胡宗铎前往武汉，与汪等汉方人士接洽。汪精卫见蒋已下野，李宗仁又有如此表示，乃发表声明称：“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

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汪的声明盛气凌人，李宗仁等虽十分不满，但为救燃眉之急，也不得不先退一步，对汪等来宁柄政表示欢迎，并亲往江西庐山与汉方诸要会晤，洽谈武汉政府迁宁具体事项。李宗仁因有求于汉，态度极为谦恭。汪精卫一心想借机统驭全局，恢复其党中最高领袖地位，表示武汉政府于9月3日前迁往南京，在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即派出谭延闿、孙科作汉方代表，先行赴宁。双方决定第七军完全负南京卫戍，汉方程潜之第六军全部东开，唐生智部开往芜湖，助宁打孙传芳。

李宗仁乘坐舰艇回南京时，已发现北岸孙传芳部作蠢动。原来孙传芳闻南京内讧，乘宁、汉尚未妥协，倾其“五省联军”全部剩余力量，加上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号称“雄兵10万”，卷土重来。李尚未抵宁时，已有部分北军渡过长江，潜向乌龙山、燕子矶等处，随后又迅即占领了龙潭、栖霞、高资、下蜀一带，掩护后续主力南侵。

李宗仁立即调兵遣将，作出应战部署。南京可调之兵除桂军外，便是蒋介石的第一军。而第一军在蒋下野时即接到指令，逐步撤至江浙边界沪杭路一带，以保存实力。海军部队对北军越过天堑负有重大责任，此时也意存观望。蒋介石下野前就预料到孙军南犯，当在指顾间，有意陷桂军以孤军作战的境地，收借刀杀人之效。李宗仁一面命夏威先率第七军驰栖霞，堵住从龙潭等地渡江的孙军主力，夺回被1军弃撤的乌龙山、栖霞防地；一面亲自赶往第一军总指挥部，找到何应钦。

何应钦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开拔。李乃告何：“首都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何在迟疑不决，李突改以辞色俱厉告何：“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何应钦也感到事态严重，同意与7军协力御敌，并立即通令第一军停止退却，准备反攻。

孙传芳这次南犯为孤注一掷之举，决定背水一战，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统由长江北岸的大刀队看管，以示有进无退。李宗仁也横下一条心，拼死力与敌决战。

龙潭战役开战后，双方均以主力拼杀，崖裂土翻，天日变色，血战3昼夜，打得难解难分。

第4日，孙军身后突遭京沪路东段生力军的进攻。原来在上海与各方交涉并筹款的白崇禧在事毕后返宁，途至无锡时，前行之快车倾覆，铁路遭破坏。白当机立断，赶赴镇江，坐地指挥，严令驻京沪线东段之第一军第14师师长卫立煌就近率部向龙潭反攻，令正从常州向杭州开拔的第一军第2师师长刘峙部回师往援，同时檄调后方一切能调之兵，主要为驻沪第一军第1、3、21等师以及桂军新编部队，星夜驰援南京。白又打电话给海军司令杨树庄，命他开出舰队，守住渡江口，切敌后援，并说：“孙之势力终必被歼，海军如不努力，将来一定要追究责任。”杨树庄不得不派出通济舰至镇江，但作战仍不积极。白崇禧便派潘宜之在镇江带了一班宪兵登舰，押了舰长李世甲向龙潭开去，从背后炮击敌人。其他军舰见通济舰出击，也纷纷行动起来，孙部的后援被截断。

白崇禧由东而来的增援同李宗仁、何应钦指挥所部对龙潭的反攻成夹击之势，孙军虽据险顽抗，但经数日鏖战，终感不支。8月30日晨，孙军作了最后一次凶猛反扑后，因死伤惨重，有退却企图。但被来自东、西两面军队合力进逼，压至长江边，孙传芳仓皇登上小汽艇逃命，所部10万大军

除少部得保残命，逃到北岸外，大部被歼、被俘。降兵押解南京时，分4路纵队前进，排头已抵南京城郊，排尾尚在龙潭。孙传芳经此打击，从此绝无再起可能。

李宗仁见局势大变，阵脚站稳，愈发雄心勃勃。其时汪精卫等如约来宁柄政，李宗仁却已不甘心轻以政柄拱手相让，他表面做着迎汪的准备，暗中积极筹划对付办法。宁方在沪的中执监委胡汉民等以及西山派人士激烈反汪，他们一致借口武汉“联共”，要求以“叛逆罪”对汪派进行审判。胡等反汪，正中李宗仁下怀，被李作排斥汪的挡箭牌。

李宗仁在与汉方代表谭延闿、孙科交换意见时，提出要举行四中全会及组织政府必经邀请宁方离职赴沪之中执监委参加，方符宁汉合作之旨。

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一行抵宁，一下轮便觉察气氛不对，城中竟贴出不少反汪标语。汪等见势有异，立即装出十分诚恳之状，主动对自己防共过迟表示无限疚心，表白自己非图恋栈，实以负过太重，不能一走了事，拟促成南京四中全会，藉以补过。

李宗仁不动声色。

9月8日，李宗仁、汪精卫开了个特别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到上海劝胡汉民来出席四中全会。汪明知是桂系出难题，也只好勉力去行。

李宗仁、汪精卫、朱培德、谭延闿、孙科、甘乃光一行抵沪。在沪报上公开表示：“尽可效法廉蔣，以诚意纠正既往，救济现在与将来。”并一再登门求见胡汉民。不料，3次访胡均被拒之门外。汪无奈，只好求助于李宗仁。

李见时机已到，乃由蔡元培出面，代表宁方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放弃法统观，不用第4次字样，混称执监联席会议，开创新局面；二是彻底清党，不许带共产色彩分子与会，尤对徐谦、陈公博、顾孟余为然。

汪对第一点表容纳，对第二点，汪辩护道：“顾陈对此次清党颇有助力，实属有功。”但汉方谭延闿、孙科等自随李宗仁来宁后，早已同宁方打得火热，不再以汉方使命为然，对汪不作同情表示。汪四顾无援，勉强同意由谭延闿、孙科提出建议：宁、汉、沪各自推举其执监委员6人，候补委员3人，另三方共推出委员14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为临时最高中央权力机构，以统一党务。

这样便产生了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和候补委员9人，这个机构明显的是桂系人物和西山派占了优势，蒋、胡只是挂名委员而已，汪派干将陈公博、顾孟余等只能叨陪末座，当个候补生，即便如此，西山派人士仍未解恨，一再坚持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之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

汪精卫方感一无油水可捞，非去不成局。乃以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引咎自责，同时以“患病”为托辞，同陈、顾等人一起悄然返汉。汪等一走，特委会中桂系和西山派声势更壮。

9月15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同时由特委会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名义上国民政府有46人组成，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精卫、于右任等人任常务委员会，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有66人组成，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而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都只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

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3个常务虽然把程潜放在首位，但因程潜

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程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虽然在蒋介石下野后拼命扩张实力，把第一军改编为第一、第九军两个军，提拔刘峙、顾祝同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介石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21师师长实权，以消后患，但何应钦还是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力与桂系抗衡，也无权过问军事委员会的事。

李宗仁利用宁、汉、沪3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头角崭露，不仅使蒋、汪均钝其锐，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一词由是而起，声势日张，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汪精卫返回武汉后，即伙同拥有两湖军事实力的唐生智，打起“反对非法特委会”的旗号。唐生智拥有5个军的力量，在汪等去宁期间，他首先在两湖境内扫清了仅存的几支非唐系武装，而后向长江下游发展。当龙潭大战时，唐生智乘虚而入，以第35军军长为江左军指挥，36军军长为江右军指挥，率部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将桂系驻皖军压迫出境。这样，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和安徽3省。汪精卫与特委会破裂，正中唐生智下怀。唐乃拥汪自重，宣布“不受南京节制”，公然与特委会唱对台戏。

李、白对唐生智偷夺了“俎土肉”的安徽和拥汪自重，极为不满，必欲拔之而后快。

但是，要对付手握10万重兵、且蓄意同自己一决雌雄的唐生智，须有一定的把握才行。

于是，李宗仁利用特委会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酝酿对唐生智的武力讨伐，并设法在湘系军队中寻找反唐同盟军，除启用赵恒惕旧属叶开鑫、贺耀组两部外，主要着力于争取颇有一定实力的谭延闿、程潜对讨唐的支持。

谭、程与唐素来不睦，谭此时又是特委会的要角，正要仰仗桂系鼎助，故愿主动为李宗仁与程潜合作牵线。程潜曾受唐生智排挤。他在汉重建为蒋拆散的第六军时，又受到唐的多方阻挠，一直积怨在心。程部兵士以湘籍为多，久存返归故里，以稳根基之心。

李宗仁助程返湘，以主持湘政相许，颇使程潜动心。但程因在宁、汉分裂时所部曾被桂系部队缴械，对蒋、李都不能释怀。李宗仁看透了程的心思，向程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程遂慨然答应与桂系联手讨唐。

李宗仁为使出师有名，施出先礼后兵的手腕，先由谭延闿、孙科出面，向武汉发起谈判攻势，对汪、唐提出合作诸条件，遭唐坚决反对，谈判破裂。李便以特委会名义颁布了《中国国民党为讨伐唐生智告湘鄂皖民众书》，同时由军委会正式下达了“讨唐令”，西征军在李宗仁、程潜率领下，分左、右两路，沿长江南北岸向皖、鄂两地的唐军出击。

唐军在来势汹汹的西征军的攻击下，加上内有叛将，10余万大军不堪一击，一败再败。唐生智为保存实力，乃以“休息”为名，通电下野，并逃往日本，所部由何键、李品仙等率领，撤入湘境，相机行事。

李宗仁为取得讨唐全胜，率军向湘境进逼，白崇禧也赴湘挂帅，加上程潜、朱培德等部配合，退据湖南常德、沅陵之唐部复被压迫，势穷力蹙，败退衡州一线。李、白利用与唐部军人的老关系，多次派人去唐部军中接洽和平收编。唐部李品仙、刘兴、周斓在李保证留原建制，不予编散的条件下，联名发出“求和通电”。于是，李、白如愿以偿，唐部5个军全数收编，西

征大获全胜。南京政府下令解散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

新桂系锋芒毕露，觊觎中枢的其他派系领袖心生不满。于是他们逐渐把攻击目标从蒋、汪等身上转向了李、白以及特委会。

汪精卫在唐生智败北时应张发奎邀请，从武汉到了广州。

张发奎向来奉汪为政治领袖。张部在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时受损严重，在汉又受唐生智排挤，被迫将武汉方面的第二方面军改为第4军，以追剿叶、贺部为名，离开江西，沿赣南下，驱返广东。

广东为李济深天下，李既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又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八路军由原第四军留守部队扩编。张发奎、黄琪翔等第四军将官为李济深多年部下，李对他们回粤不便拒绝，且存有重新收张部的打算，故在张部回粤之初李济深表示欢迎，并派陈可钰携款40万元前往接济。

不料，张部来粤后不服李的节制，不仅拒绝李要其出兵与黄绍竑、陈济棠部协同，阻截来粤中共起义部队的要求，反而要李济深疏远桂系，反对特委会。李济深同李宗仁等新桂系派领袖交谊素笃，有“半个桂系”之称。张发奎专以桂系为攻击对象，不免使李济深十分尴尬。加上张部根本不把李济深这个老长官放在眼里，军事、财政、人事上的冲突不断发生。李济深唯恐鹊巢鸠占，失去了广东地盘，乃以老上司的身份主动提出，愿给张发奎港币5万元，要张出洋远游，同时制造礼送汪派出粤的舆论。李济深又将反对汪派最烈、与张发奎又有所不合的陈铭枢由日本邀请回国，到福州再统军队，还特地电陈，邀其“回粤休养”。这一来，张发奎与李济深的关系陡然紧张。

正当李、张不睦加深之时，蒋介石于11月1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

蒋介石下野之后，在上海、溪口各住了一段时间，并进行了频繁的活动，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答记者问、发表《谢客启事》、《告别黄埔同学书》等等，他们自己说成是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的英雄。“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梓升平，诸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余以为英雄者也，常以失败而终。大凡英雄与革命家，似皆以失败而成其价值。一经成功，则为平凡无奇。但使正气存留，则雄图虽归失败，亦无所怨，吾固常作是想者也。”蒋介石还透露他将规划同宋美龄结婚之事，为此已同元配正式离婚。

9月29日，蒋介石携带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机要秘书陈舜耕等离开上海去日本。蒋宣称：“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闲暇之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与日本诸名流相晋接。”蒋介石在日本周游各地，并研究了日本国情及对华政策，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中日亲善：“吾人今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将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蒋介石为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助他重新上台，便通过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

田中义一向蒋介石提出先决条件：一为蒋必须反共；二为蒋必须不牺牲日本在华之权利；三为蒋先行巩固南方。蒋介石一一答应，并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日本借予蒋介石4000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



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蒋介石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蒋介石在日本活动期间，张静江、李石曾一再从国内去电促请回国，汪精卫也专电请蒋即刻归国。蒋在复汪精卫函中表示：“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弟虽远游，而实神驰党国。凡能与党国有益，则弟无论在何地何时，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蒋介石自日本回到上海，即开始为复职四下活动。蒋之嫡系也因受桂系压抑，急不可耐地盼蒋复出。北方冯玉祥、阎锡山连连发电，呼吁要蒋复出，甚至有些原来对蒋下台弹冠相庆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也一转其反蒋姿态。谭延闿、孙科等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发表通电称蒋：“受命北伐以来，身经百战，卓著奇勋，不以逆亿纷来，而稍丧其护党之心。”谓“党部政府一致决议，派员敦促其返旆。”蒋下野还不到半年，局势几乎翻了个个，蒋原来受各方攻击，现在却是颂扬声一片。促蒋复职之官电，满载于上海各报，恍如北方军阀出山之故事。

蒋介石复职的大障碍是桂系和西山派控制的特别委员会。于是，蒋便动手推倒特别委员会，他派妻弟宋子文去广州与汪精卫会晤，宋告汪：“蒋等不忍坐视党之紊乱，故托其携亲函、劝公共出维持。”汪、蒋在宁、汉对立时不共戴天之仇敌，如今因遭桂系排斥，被迫在野，同病相怜，竟携起手来，决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

汪精卫邀李济深一起去上海参加会议。李济深虽对离粤不甚放心，却也想乘此机会把汪精卫等支出广州。他想将粤省军政要务临时托付给黄绍竑，便急电在桂的黄绍竑来粤。由于汪等催促很急，黄赶来与李匆匆一面，未及多谈而别。

汪、李启程去沪，逗留在港的张发奎悄悄潜回广州，是夜，在张的指挥下，黄琪翔、薛岳等部包围了黄绍竑在广州吉祥路的寓所。幸黄绍竑在事发前得到密报，只身潜逃，但广州附近虎门、江门等处的桂军悉被缴械。次日晨，广州街头到处张贴出“打倒桂系军阀！”“欢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委会”“拥护汪精卫”等大标语。

张发奎又以广州军委代理主席名义，任命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代理主席，还通电谴责桂系军阀，要求解除李济深一切军事职务，推翻和惩办广西将领李宗仁等。

此事变一出，宁、沪大哗。李济深知道受骗，恨恨不已。

12月3日，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李宗仁等便在会上提出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案，指控他们对广州事变有主使嫌疑。汪精卫等则指责桂系把持特委会，蒋介石恐趋于决裂，发出洋洋长篇“致各委员书”。汪派为保存自己，急不可耐地抢先抛出《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在预备会期间，蒋、李、汪施展三角斗法。但李宗仁力不能逮，《请蒋复职案》获得正式通过，并决定取消特委会和军事常委会。但蒋介石又同意李宗仁等《关于处分汪等九委员提案》，并同意四中全会将在宁召开。

## 第五章 再度北伐

李济深、黄绍竑不甘心失败，暗中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夹击广州。张发奎、黄琪翔把第四军主力调至东、西两江，以图一鼓作气戡平广西。张、黄主力西调，造成了广州城的空虚。第4军军长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托给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让他代行其事。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共产党趁广州防务空虚，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在西江前线的张发奎猝不及防。

原来那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组建的，内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8月4日，教导团奉命从武汉抵达九江。张发奎突然下令要全团缴械，进行“清党”。许多学员怕遭到屠杀，纷纷离队。叶剑英利用同张发奎、黄琪翔的老交情，兼任了教导团团长，教导团改称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亲率这支革命武装力量，沿赣江南下，9月中旬教导团进到广东南雄时，叶剑英先往广州。

叶剑英来到广州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动广州起义，是时，周恩来、叶挺、恽代英、张太雷、聂荣臻等相继转往香港，策划广州起义。随后，周恩来去上海党中央工作，其他人留下负责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应召秘密去香港同恽代英等见面，回广州后便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较场四标营。为了避免他人疑忌，叶剑英辞去了教导团团长职务，并向张发奎建议由杨树淞代理团长。教导团地下党组织吸收了100多人入党，全团1300余人，绝大部分倾向革命，其中有共产党员200多人，3个营长都是共产党员。

中共广东省委要叶剑英设法把第四军警卫团拉入起义队伍，新编警卫团只有少数人是地下党员。叶剑英以广州城防空虚为由，向张发奎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正中张发奎下怀，张便问：“谁来当团长？”叶回答道：“听说有个琼州人姓梁，北伐打仗很勇敢，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张发奎立即说：“是梁秉枢吧！这个人我认识，就把他调来当团长。”这样，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便当上了警卫团团长。随后，共产党员张诗教、陶铸等也被安排在警卫团担任领导职务，还吸收了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300多人。

11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由香港秘密到达广州，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12月4日，张太雷在黄花冈召集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等的200余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7日，又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发动起义。

不料，工人赤卫队设在小北街的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得到报告后，连夜派其妻陈璧君回粤，面告张发奎立即镇压暴动。汪精卫又连发3电，要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共产党已组织广州工人赤卫队3000余名队员准备参加起义。

12月9日，黄琪翔匆忙从前线返回广州，参与策划武装镇压起义军。公安局长朱晖日主张大施屠杀，叶剑英极力反对，担保教导团没有赤化；黄琪翔也不赞成屠杀主张。张发奎虽然没立即动手，但他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赶回，准备镇压广州起义。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派叶挺来广州负责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在12月10日从香港来到广州，当晚即投入紧张的起义部署。领导广州起义的领导班子成员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

12月11日凌晨3时半，沉睡的羊城被枪声惊醒。教导团分3路出动：东路由叶挺亲自率领第二营，乘坐汽车直扑沙河镇、燕塘，解决步兵团、炮兵团部，又回师黄华路，攻击造币厂和文德路上的敌第12师后方留守处；北路教导团第三营，攻击观音山和省长公署；中路由徐光英率领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攻击东较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警卫团首先处决了参谋长唐继元和两个反动连长，以第三营主攻，分头攻打驻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司令部、仰忠街第4军军械库。黄埔军校特务营在王侃予率领下，处决了几名反动军官，从黄埔岛乘渡船过江，去攻占鱼珠炮台。埋伏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附近的各路工人赤卫队向攻击目标出动，徐向前指挥第6联队首先冲进警察局，把睡梦中的一个班全部缴械后，再冲向下一个进攻目标。

起义军占领观音山下的公安局后，便在那里设立军事委员会指挥部，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工人赤卫队为第一军；海丰农民军为第二军；教导团、警卫团为第三军。

叶挺为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徐光英为参谋长。

武装起义的枪声驱散了羊城的黑暗，迎来了新的黎明。工农红军占领全城，立即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即“广州公社”，推选苏兆征为主席（张太雷代），黄平为内务兼外交委员，杨殷为肃反委员，周文雍为劳动委员，彭湃为土地委员（赵自选代），陈郁为司法委员，何来为经济委员，张太雷为海陆军委员，恽代英为秘书长。

逃到珠江南岸的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朱晖日等，匆忙赶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集军队，开始反扑，逐渐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张发奎乘坐“宝璧号”军舰，黄琪翔乘坐“江大号”军舰，指挥海军炮击长堤。英国军舰“摩轩号”、“莫丽翁号”，美国军舰“沙克拉号”，都派出陆战队登岸，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在西堤强行登岸。英军又调水兵2000人，法军调水兵400人，日军调水兵300人，共守沙面。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围攻起义军。

12日上午，敌人攻占了观音山的一些山头。张太雷由西瓜园返回的途中，不幸中弹牺牲。李福林的第五军也从珠江南岸进犯江北市区。傍晚，敌人已抢占了市内的主要据点，市内的反动分子乘机抢劫、放火，一时火光冲天，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分散转移，有的去了香港、九龙，有的从香港转赴上海党中央，有的奔向东江。

一部分武装连夜撤退到广州以北的花县。张发奎、李福林等对起义者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市内和河南前后被杀者达七八千人，汪精卫打电报来说：“去共务尽。”宁可错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

撤退到花县的1000余人，改编成红四师，选叶镛为师长、袁国平为党代表、唐澍为党委书记、王侃予为政治部主任。这支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转战，于1928年元月来到海丰县城，同红二师会合。

广州起义失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桂系派兵搜查了汉口苏联领事馆，大捕共产党人，武汉大学也被搜查，前财政厅长詹大悲、教育厅长李汉俊被枪决。各地苏联领事纷纷下旗回国，工人罢工和民众集合游行均被禁止。

国民党右派和桂系利用广州起义，向汪精卫集团发起攻击，称此为“汪派与中共合演的双簧戏法”。吴稚晖等借题发挥，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委邓泽如提出拿办汪精卫集团的主张。汪精卫见势不妙，即避往医院，

拒不见客，白崇禧亲往法租界联系，部署捕杀汪精卫等，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等的住处受到搜查，各省在右派主持下的国民党省党部，也涌现出一片反汪和讨伐张、黄的声浪。

汪精卫集团势孤力薄，处境非常尴尬，不惜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用广州分会的名义免去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职务，改任缪培南为第4军军长。汪精卫自知站脚不住，离沪赴法。黄琪翔也引咎下台，离粤赴法。

张发奎电蒋介石，表示拥蒋，愿以党员资格补过将来。李济深和桂系的目的是夺取广东地盘。在西江的黄绍竑、东江的陈铭枢、陈济棠两路进兵广州。这样一来，北伐中两支声名赫赫的劲旅——“铁军”和“钢军”，在五华、岐岭等地杀得天昏地暗，双方伤亡均以万人以上。桂军虽胜，元气大损。张部被击败后，退入江西，被蒋派人收容，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公博、张发奎不得不离开广州，桂军重回广州，李福林解职赴沪。黄绍竑到广州后，仍用代理分会主席及代理第八路军总指挥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陈公博等。

桂系想抬出胡汉民出山，与蒋抗衡，南京一时拥胡之声大起。蒋便庇护汪精卫集团，扩张自己的力量。关于处分粤委一案，决定接受中央监委意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4委员停止出席四中全会，留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处分；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委员照常行使职权。蒋介石左袒粤委，引起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与蒋介石之间的极大矛盾。胡乃一偏狭之人，一方面对蒋袒汪不满，一方面也不愿为桂系所用出面抗蒋。故以“出国考察”为名，与孙科、伍朝枢等一起去了土耳其。

西山派元老许崇清、张继、谢持、居正等也发表了对蒋愤愤不满的宣言后，相偕去了日本，转赴欧洲游历。

蒋介石的两个政敌汪精卫和胡汉民相继退出政坛，李宗仁不便再独自与蒋对着干。

四中全会要在南京召开，在宁的驻军是亲桂的周凤岐部。李、白料想蒋介石等未必敢贸然入宁。不料，蒋早有胜算，命贺耀组部开回南京，把驻南京的桂军全部赶往汉口。

蒋介石随即由沪抵宁。并于1928年1月9日发出复职通电，谓“自8月退职后，纠纷益盛，不容计私人得失，继续旧职”；全体将士要“勿口诵心违，弃党携贰。”李宗仁心纵不悦，也雅不愿作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而白崇禧仍不甘休，与程潜一起在武汉发出通电，以反对粤委员出席会议为名，抵制四中全会召开。李宗仁以“调和”姿态，致电武汉的白崇禧、程潜：“如大众赞成粤委员参加，彼不反对，于蒋绝对服从。”李、白用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办法息事宁人。

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开张，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党权和军权重新落入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内容是停止各省省党部的一切活动，由中央派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进行整理，结束联苏政策，停止民众活动，严厉取缔工农武装。

表明蒋介石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彻底走上反革命道路。

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李宗仁等提出“分治合作”主张，蒋介石采取“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手法，以中政会主席的名义给各主要军事实力派领袖以政治分会主席名位，除划定江浙一带为中央区外，国民政府统辖的其余地区分为四块，即广西、广东属广州分会，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湖南、湖北为武汉分会，分会主席为李宗仁；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分会主席为阎锡山，同时确定政治分会在所辖区域有权处理党政军一应事务。这样就满足了各实力派领袖据有地盘的欲望，这实际是暂时保留军阀割据的局面。

蒋介石到徐州以布置北伐为名，一脚踢开了何应钦，调为有名无实的总部参谋长，而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设3个纵队，自兼集团军总司令，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分任第一至第三纵队总指挥。下级军官已被蒋拉拢，何应钦不敢抵抗，只得遵令交卸。

蒋电邀冯、阎2人到徐州举行军事会议，冯、阎均托故不到，仅派代表参加。蒋感到拉拢冯最首要，屈驾前往开封与冯相会，先是检阅了冯部军队，又由老将马福祥建议，蒋、冯交换兰谱，“义结金兰”。蒋写给冯的“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冯写给蒋的帖子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蒋介石回南京后，军事委员会补任蒋、冯、阎3人为第一至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蒋初有意让谭延闿担任，但谭手中只有鲁涤平一个军的实力，根本无力驾驭桂军。“八面玲珑”之人谭延闿，向以“文甘草”著称，深知担任此职定为桂系所不容，坚辞不就。蒋也顾虑到此举激怒桂系会引起不良后果，还须借重桂军出兵完成“二次北伐”，尚须竭力避免与李、白冲突，乃将此职给予了李宗仁。然而李宗仁已窥破蒋的心思，对蒋并不买账，迟迟不就任第四集团军司令职，目的是欲取其时尚由程潜控制着的湖南。

湖南位于桂、鄂之间，为新桂系连接桂、鄂之通道，是桂系垂涎之地。湘省大权因讨唐生智时与程潜有约在先，程潜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控制湖南。程潜为国民党资历深长的元老，为人恃才傲物，对李、白决不会俯首贴耳，因此湘、鄂两省矛盾不断发生。照说程满身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有权过问鄂省党务诸事。然而，湖北派桂系鄂籍大将胡宗铎、陶钧却不经程潜同意，在鄂自设整理党务委员会，驱赶前来改组湖北的党务委员会党务委员，并假借名义向程潜请愿。程潜为避矛盾，一再退避三舍，表示“余对党务毫无成见也，鄂民众既热烈拥护党务整理委员会，可立即前往接受。”但内心对桂系之跋扈已十分不满。李宗仁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主持两湖善后，程潜对此二任命皆有不满意。程潜主湘也成了桂系的一块心病。

程与桂系的矛盾虽为蒋所察，蒋固不愿让湘省落入桂系手中，但对主湘的程潜同样极不相信。倘若借桂系之手，先整垮程潜和他在湘的第六军，又能换取桂系出兵，对蒋显然有利，于是蒋对桂、程矛盾故意不作表示，暗中却为扩大矛盾推波助澜，桂系因之更加有恃无恐。

5月19日，李宗仁设下圈套，通知程潜来汉开会，并让白崇禧偕程由长沙赴武汉。当时程的左右因程潜与桂系不睦，要程对此行加以提防，程未介意。21日，程潜出席李宗仁召开的武汉政治分会会议。席间休息，李宗仁将程请至4楼，在程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程扣押，而后即以武汉政治分

会名义致电南京，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决将程潜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蒋介石接电后，即同意免除程潜本兼各职，撤消湘鄂临时政委会，并着程潜听候查办。对湘省权位的空缺，蒋介石提出由谭延闿之亲信鲁涤平接充。李宗仁扣程后本就心虚，又担心拒鲁引起湘人反感，未便马上反对，只得暂且容纳。但李宗仁便将自己的势力大肆向湘省渗透。程潜在湘势力，在蒋、桂西方面的压力下，遣散的遣散，收编的收编，第六军再度被肢解，从此未能再起。

湘省问题解决后，李、白向蒋提出，拟以由原唐生智部新编的3个军为主力，桂军第十三、第七军各抽1个师，由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统一率领北上。同时又提出河南杂色部队移防豫西，腾出郑、汉路线，由桂军北上部队接管，蒋为桂军早日北上效命，一一应允。

蒋介石北伐，他的对手便是奉、直、鲁联军，统称为“安国军”，以张作霖为大元帅，下辖7个方面军，共40万人，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分别担任军团长。张作霖做作战迎敌总动员，号召全体将士各呈虎威，奋勇向前，一举打垮蒋介石。

蒋介石发布了北伐全军总方略：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二、三集团军各部队，于4月某日开始攻击。

3月31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1日，蒋介石进驻徐州。4月7日，蒋介石发表《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说：“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

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救民，毋负民众期望，慰我总理及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蒋介石审度当时敌我态势，北伐全军战线，右自海州经徐州、曹州、大名、彰德，遥接井陘、龙泉、繁峙、雁门之线，不下两千公里，自东南直至西北，各地战况不一。

蒋介石对于北军和各省杂牌军仍然采取见官升一级的招降办法，不论枪支多少，一律封官鼓励，因此各军有名为一军而实力不足一旅的，浮报名额、侵吞军饷的情况普遍存在，和北洋军阀毫无二致。由于政权财权并未统一，兵额扩充过多，南京政府面临入不敷出和军饷困难的问题，于是发行流通券1600万元，军需公债1000万元，此外还有军政人员减薪以及硬性摊派二五库券等问题发生。国民党卸下革命外衣，抛弃反帝、反封建任务，北伐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南北新旧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

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是：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驱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作战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三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为第三集团军的后援，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

北伐军采取“声西击东”之计，国民党北伐军全部兵力约70万人，在津浦线上的张宗昌的鲁军，早在冯玉祥部进行的豫东、豫北战役中挫伤了锐气，精锐部队基本上已被冯军歼灭，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因此，与蒋军作战只一天多时间，即4月12日，全线撤退。蒋军轻易取胜，沿铁路追击前

进。

## 第六章 京津换主

冯部孙良诚指挥部队与孙传芳军在鲁西南一带对阵。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素称“治军有方”，全部兵力9万多人，主力部队仍有6万人，作战勇猛。而孙良诚是冯部有名的骁将，二孙部队接触后，杀声连天，战况异常激烈。

孙传芳不知张宗昌部已退，为配合张部，从鲁西侧击蒋军。连破蒋军阵地，连克丰县、沛县，直逼徐州。

蒋介石看到徐州危机，连忙致电冯玉祥告急，尽快派后备部队支援。冯令石友三率全体预备队约1.5万人火急应援，猛击孙军右侧。石友三也是冯部骁将之一，在石军猛攻下，孙传芳军被迫后退，解了徐州之危。又经冯部孙良诚骑兵部队冲击孙军背后，并截断了孙军退路，孙军才连忙后撤。孙良诚、石友三等部乘胜追击。石军攻丰县，击毙孙部军长袁家骥，又在渔台大败孙军。同时，方振武、孙良诚等部也取得胜利，席掖池骑兵部队攻占兖州。孙良诚、石友三、马鸿逵等部攻克济宁。从此，孙传芳部溃不成军，无力应战。4月22日，冯、蒋两军在泰安会师，一周内攻克了泰安。张宗昌悄悄地乘早已准备好的从德国购来的“义威号”铁甲车逃走，孙传芳也被迫离济南北撤。5月1日上午，蒋军刘峙、陈调元、顾祝同等部进占济南。

在这次战斗中，充分表明蒋军的战斗力不如冯军，鲁军的战斗力不如孙军。张宗昌的鲁军大多数由收编土匪而来，部队不听指挥，士兵经常逃散，逃散士兵再回到山上落草为寇。因此有人讥讽张宗昌扩军是化匪为兵，打仗时是化兵为匪。北军孙传芳部经过此次与冯军战斗，也就一蹶不振了。

在京汉路方面，奉军一开始就对山西猛攻，并企图以全力击破冯部在河北作战之部队。奉军与冯军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激烈战争。鹿钟麟急调刘骥、刘汝明等部北上，加强彰德防线。当战况紧急时，冯玉祥电武汉，由李宗仁派兵到河南接防。于是，将驻豫中的韩复榘部火速调往前线。

冯玉祥为实现“声西击东”的计划，令部队白天浩浩荡荡北进，故意使奉方侦察飞机侦探看到，而夜间却再令部队稍稍南撤。奉方上了当，以为南方北伐军主攻兵力集结于西线，于是，只以张宗昌、孙传芳残部御东线，而将奉军主力集结西线，集中兵力猛攻彰德，施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冯军据壕死守，沉着应战。韩复榘部有师长3人受伤，旅长2人受伤。韩本人也受伤。

东线直鲁军和孙传芳军败退，影响到西线战局。冯军由彰德方面全线反对。5月1日夜，奉军因东线济南失守，惟恐被截后路，才全线退却。冯当夜下令，全线追击，3日攻克顺德，5日进占大名，各路奋勇追击，势如破竹。

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于5月1日进入济南，日本军第6师团于次日侵入济南，设立司令部，对国民党北伐军肆意武装挑衅。日军向蒋军的两个营发动攻击，蒋军1个营被消灭，另1个营也损失惨重。蒋军被迫还击，压倒了

日军的气焰。但日军师团长福田，逼迫蒋介石下了停战令。3日夜，蒋又严令驻在商埠的军队全部撤退，同时派外交部长黄郛和日方和谈，蒋又遵照日方要求，严令蒋军不许还击。于是日军乘机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奸淫劫掠，并将蒋介石的战地政委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割耳、割鼻、挖眼。随时聚市民刺杀取乐，并不准市民关门，以便日军入宅强奸妇女。市内军民死伤近万。蒋军将士群情激愤，士兵寻杀日军，几位军、师长请战，要求全歼此股日军。蒋介石迅即召开军长以上军官会议，严禁还击，取“忍辱负重”方略，命令部队绕道渡黄河，继续北伐。

5月5日晚间，蒋介石仓皇逃出济南城。6日，蒋介石与黄郛乘马绕道逃到党家庄车站。

冯玉祥也从河南前线赶到这里。蒋、冯在清真寺中举行会议，黄郛、王正廷、蒋作宾、杨杰、杨永泰等参加会议。蒋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分“南北朝”。多数人反对这项主张，而冯玉祥反对放弃北伐最烈。会议决定济南问题以外交方式办理，蒋暂返南京主持一切，军事由冯指挥，绕开济南，继续北伐。

5月10日，南京政府推谭延闿乘车北上，阻蒋南行。南京政府认为，奉鲁军已经无力继续作战，张作霖于9日下了停战撤兵的命令，北伐任务很快就可完成。如果北伐军退回南京，必然会引起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更大变化，南京政府将因此而全盘瓦解，连江南半壁苟安的局面也不可能维持下去。谭延闿和蒋介石在兖州举行了重要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对日妥协，绕道北伐。

兖州会议后，国民党军绕道渡过黄河北进。蒋介石有意将冯、桂、阎3部都推上北进的第一线，既限制冯的指挥权，又可造成三者之间的矛盾，以便由蒋从中控制。

5月21日，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等在郑州会商军事，决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由津浦路以西、京汉路以东地区北进；第三集团军，北面沿京绥路向东、南面沿正太路向东，转京汉路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冯、阎、桂集团军首领都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打算。

冯、阎本来商定两军并肩前进。当阎军打到离保定不远的方顺桥车站附近时，战事进入紧张阶段。阎军伤亡惨重，要求冯军韩复榘部向前推进，以牵制敌军，解阎部之危局。但韩忽然接冯密令，率部撤向石家庄，使阎军右侧背受到敌军威胁。阎军告急时，冯却按兵不救。这实际上是冯对阎在南口战役对冯恩将仇报的报复。桂军开上去解救了阎部之危局。

但冯部的这一部署，却给了阎后来独霸河北和京、津两市的大好机会。韩复榘奉命后撤后，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也进至石家庄。冯见阎军占保定后欲进取京、津，急忙又命韩复榘部急速北进，企图抢先占领北京。冯为了鼓励士气，迅速进军，曾效法管仲作歌要士兵唱着进军。

奉军于5月19日放弃张家口。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即日下总退却令，第一步放弃保定退守琉璃河，并请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王士珍等电请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避免继续用兵。

6月1日，张作霖在居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传见北京商会会长，告以本人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北京秩序请王士珍负责维持。

次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借口内战牵动外交，而历年来全国人民饱尝内战之苦，因此即日率部退出北京，政务交国务院摄行，军事由各军团长负



责，此后政治问题，仍请国民公决。

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个傀儡，当时主子一见奴才不肯继续为其效劳，便决心除掉他。张作霖对日本也产生了怀疑，为了保障安全，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不平，张难受颠簸之苦，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军队严密设防，不致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到沈阳一段的安全。因此，张作霖决定仍乘火车回奉。

张作霖又布下疑阵，宣称 6 月 1 日出京，京奉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 2 日启程，而 2 日仍留在北京未走。3 日上午，他才人不知鬼不觉地上了火车，留杨宇霆、张学良在北京与阎锡山的代表接洽，等待晋军和平入城接收。

4 日 5 时半，张作霖所乘专车行到沈阳西北六里皇姑屯站，突然炸弹爆炸，南满路铁路桥被炸坍塌下来，专车从 4 号到 7 号炸成粉碎，张作霖受重伤未死，同车的吴俊升则登时气绝毙命，吴俊升被炸得腹破肠出，脑浆迸流。血肉模糊的张作霖被人从破轮碎铁中抬出来，又被抱上汽车开回沈阳，已经昏迷不醒，当日 16 时身死。

事件发生后，日方采取一切措施掩盖炸车案真相。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于当日夜晚将溥仪严密保护，携他由天津潜往大连，准备用他代替奉系军阀，使东三省脱离中国版图，而另建傀儡王国。

蒋介石背着冯玉祥、李宗仁等于 5 月 30 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与阎秘密达成政治交易，即蒋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以换取阎对蒋的统一领导的支持。6 月 2 日，蒋又返回新乡与冯会晤，借口列强各国对冯无好感对阎有好感，宜由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上同意蒋的安排，但内心颇不愉快。

虽然蒋已任命阎接收北京、天津，但冯却以为，自古以来攻城掠地总以“先入关者为王”。因此，冯令急先锋韩复榘自彰德率 2 万余人，兼程追击敌军，仅 3 昼夜，徒步行程 800 里，真乃急行如飞。

当韩复榘部到达南苑时，阎锡山的先锋部队徐永昌部尚未抵卢沟桥。韩复榘不失时机地选拔 300 余精干人员，乘汽车抢先入北京。但是，王士珍却以蒋介石已指令阎部接收北京为由，拒绝韩部接收北京，韩部 300 余人只得撤回南苑。韩愤愤不平。

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已向北京上层社会和洋人打通了关节。阎锡山与日本驻屯军进行勾结，日军驻屯军司令新井担保阎军进北京、天津不用再外一枪，垂手可得。

6 月 8 日，阎锡山部商震、张阴梧军开进北京城。北京改为北平。同一天，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职，阎命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张阴梧为北平卫戍司令，赴戴文为察哈尔都统，徐永昌为绥远都统。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扩张为晋、冀、察、绥 4 个省区及平、津两大城市。

在蒋、冯、阎、桂 4 派联合打败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冯军最强，付出的代价也最大，起了主力军作用。阎部最弱，而桂系投入战场较迟，投入的军队数量也少。若论功行赏，冯部应得到最多的奖赏。但是，蒋介石却把接收北京、天津的任务给了阎锡山。冯部经五原誓师，转战万里，历尽艰苦，才打到北京城下，却被拒之北京城外，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制止冯部力量的增长，而采取以阎抑冯的手法，即将北方大权都交给阎，以制止冯部实力的

发展。

冯玉祥仅分得北京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 20 万元，但这个数目对于拥有 40 多万军队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冯不能不耿耿于怀，表示沉默反抗。

阎锡山一时得意洋洋，在封官晋级的同时，连日大宴宾客，并登报宣扬。而蒋介石的门徒们则大肆鼓吹这位蒋总司令的功勋，为其独裁造舆论。白崇禧率部进至京津后，本也打着足足捞一把的主意，不料冯阎为争地盘已起争执，蒋又只给白在新设立的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中一个委员的空名，京津肥缺一无所得，甚至连个正当立脚的地盘也没有，不免使白心生怨愤。而蒋则乘冯、阎桂之间不睦加深，不失时机地开始推行其蓄谋已久的“强于弱枝”政策。

蒋介石为了以退为进，当北平、天津接收工作就绪后，于 6 月 9 日，自导自唱了好几天辞职表演，表示要把军权奉还政府，请辞北伐总司令职、军委主席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随之，国民党和政府中的一批人也纷纷要求辞职，在一股辞职风席卷而来的时候，冯玉祥首先出来对蒋表示挽留。冯在挽留的电报中，要蒋效法先贤，以诸葛亮为样子：“昔武侯鞠躬尽瘁，江陵任劳任怨，绝不闻其中道求去。我弟此时，应法先贤。”随后挽留蒋的电文由四面八方纷飞而来。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纷纷通电挽留蒋介石。挽留呼声愈高，蒋的辞意似乎愈坚。终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看火候已到，于 6 月 17 日声言，他已打消辞意，仍将军事负责到底。

蒋介石便开始进攻，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决定由何成浚接收北平军事机关，由易培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以李石曾为北平政治分会主席。这就大大限制了阎锡山的实权，因此引起阎的不满。阎提出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之职，以示反抗。

蒋介石准备在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冯玉祥托病复电不来参加。蒋请李宗仁居中调处。

李宗仁派人劝冯“顾全大局，扶病北上”。蒋又绕道武汉同李宗仁一起经郑州，邀冯一起去北平参加善后会议，冯仍婉拒。蒋到北平后又派张群等人迎接冯玉祥，冯才于 7 月 6 日抵北平。

蒋介石决定玩弄祭灵花招，举行 4 总司令祭灵盛典，一方面想利用祭典，树立起自身作为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形象，一方面想借此将冯、阎、李邀集一起，以会商善后为名，讨论裁兵。

蒋、冯、阎、李以及南京政府的一批党政要员前往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介石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当瞻仰孙总理遗容时，蒋介石抚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 2 襄祭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蒋一直哭个不停，当冯走上去劝慰时，越劝，他越哭得悲痛。大家等得不耐烦了，有人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蒋介石听到此话，才连忙止住哭，盖棺散会。

当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烈钧、戴季陶等人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开谈话会，又称汤山军事善后会议。

会上讨论了地盘分配问题，既承认各集团军原有地盘，又根据北伐胜利所取得的原北洋军阀的地盘，作了新的分配，决定蒋之第一集团军占有华东、东南等地区；冯之第二集团军占有鲁、豫、陕、宁、青、甘；阎之第三

集团军占有晋、冀、察、绥、及平、津；李之第四集团军占有桂、湘、鄂及武汉市。第一集团军显然所占地区是中国最为富饶，交通也最便利。而桂系感到地盘太小，又无海口，甚不满意。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河北地盘，也不满意，但因北伐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开争夺，暂时隐忍相安。

蒋介石又抛出筹谋已久的《军事善后案》。冯、李、阎等已看透了蒋的把戏，想好了应付办法，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会议开了4天，毫无结果。蒋见一时意见难统一，又让吴稚晖出面，力主各军事领袖另择一僻静地点作长时间商讨，以决军事善后大计。

7月10日晚的会议谓“交换意见”，仍无新的气氛，连吴稚晖也感到不耐烦，讥之“国民党好开会，开会又好议而不决”。李宗仁则干脆直言告蒋：“当此军事结束，建设开始，若不开诚布公，协调内部，刷新政治，以慰全国人民望治之殷切，则恐中华民国，将为本党所牺牲，而我辈亦将为千秋万世的罪人。”蒋介石听了面露不愉之色，但也情知一时难使这几位集团军司令就范，只得把“裁兵”之议暂且收起。

蒋介石自北平南返后，每晚必与其亲信、谋士聚会共商对付方略。桂、冯、阎各霸一方，桂系在第2次北伐后，从两广、两湖伸展到平津。李宗仁坐镇武汉，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之衔驻节津、沽，广西黄绍竑雄踞八桂，另有广东李济深为之呼应，华南、华中、华北南北伸张，成一字长蛇排开，直接威胁华东蒋的统治腹地，气焰更在冯、阎之上，有“势力半天”之称。蒋之谋士、政学系政客杨永泰引用唐朝柳宗元、王叔文向唐顺宗献策削藩的典故，要蒋效法。其办法是：将各实力派领袖调到中央做官，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路“诸侯”赖以活动的资本。蒋欣然接受，视为“安邦治国”的妙策。准备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照计行事。

8月8日至15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在会上抛出两个方案：一是《政治分会存废案》，一是《军事整理案》。然而冯、李、阎均政坛高手，决不会轻易入彀。两个方案抛出后，即刻受到他们齐声反对。对于第一个方案，冯玉祥、李济深搬出两条和蒋对抗的理由：（1）现在取消政治分会，违反四中全会决议；（2）取消政治分会，就会削弱“剿共”力量。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则搬出总理遗教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均权，主张暂时保留政治分会，蒋介石无言以对，政治分会只好延期裁撤。至于第二个方案，更为众人反对，蒋只好收回提议，表示将另开编遣会议以贯彻裁兵。

蒋会前精心准备的“削藩策”不仅未能收效，反而惹得各实力派领袖怒气冲天，蒋不免大失所望。

五中全会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

五院院长为：

行政院院长	谭延竑	副院长	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	副院长	林森
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	副院长	张继
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	副院长	孙科
监察院院长	蔡元培	副院长	陈果夫
参谋总长	李济深		
军事参议院院长	李宗仁		
训练总监	何应钦		

行政院（相当于国务院）下设十部：

内政部长	阎锡山	外交部长	王正廷
军政部长	冯玉祥	财政部长	宋子文
农矿部长	易培基	工商部长	孔祥熙
教育部长	蒋梦麟	交通部长	王伯群
铁道部长	孙科	卫生部长	薛笃弼

五中全会之后，冯、李、阎对蒋的“削藩”已深具戒心，不甘俯首听命，只派个代表到京畿塞职。本人却都返回到自己的基地，蹲在那里作军事备战。

蒋介石知道冯玉祥喜欢受人吹捧，于是就投其所好地说：“希望大哥首创入京供职，以后中央的事务，我当一切听大哥的。只有大哥先到了南京，接受了中央的职务，阎、李他们便不敢不来，大一统的新中国等于是大哥造成了……大哥只要到了中央，绝对办到一律平等待遇，第一集团军吃什么，第二集团军也吃什么！”蒋介石随即补助冯部一部分军饷。所以冯部从7月份起，每月将官可领到60元、校官40元、尉官20元。蒋的甜言密语加上补助军饷，使冯就范了。他一面要属下将领不要只重视地盘，一面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的职务，并到南京供职。蒋把冯骗到南京后，却不肯实现军队待遇“一律平等”的诺言。冯为军政部长，却连查看军需署帐目的权力也没有。

冯玉祥既要防范蒋介石消灭异己，又幻想能够和蒋合作共事。但是，尽管他采取捧、拉蒋的办法，结果都无济无事。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军阀一直封锁这一死讯。这一天，张学良化装成士兵从邯郸前线秘密回到沈阳。

## 第七章 东北易帜

张学良返沈后，并没有立即为其父举办丧事。为了掩人耳目，以张作霖名义发出“奉天省长公署令特派交涉员”电，电报发出后，使内外不知详情的人，都认为张作霖还没有死，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人员也都摸不清底细，满腹狐疑，如坠十里雾中。

对于张作霖的继承人问题，奉系军阀的“老班底”和旧派军人都认为张学良过于年青，缺少统治经验，难以驾驭，因此，一致推让张作相为“东北王”；但是另外一派，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一些军官，都拥护野心早已锋芒毕露的杨宇霆接班。双方几争不下，最后还是素称稳健的张作相，看在过去同张作霖相处的面子上，认为继承张作霖的最合适人选是张学良。他说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这样做可以理服人，可以团结东北的各方面人士，以应付当前比较困难的内外局面。他坚决辞去了让他接任张作霖的请求，力推张学良承担重任，并表示愿意竭诚辅政。同时，他还主动说服了旧派军人同意自己的主张，使认为接替张作霖非自己莫属的杨宇霆，也只好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张学良在6月20日发出“张学良任奉天军务督办就职通电”后，

于次日，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公布张作霖因伤重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并为张作霖发丧。

7月2日，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当天，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

张学良于1901年生于辽宁台安县，是张作霖长子。自幼在家乡学习“四书五经”，受过封建伦理教育。其后，进入洋学堂学习历史、地理和英语等知识，开始接受一些资本主义思想。1915年，其父升任27师师长驻沈阳，他亦随之赴沈。不久便同于凤至女士结婚。1919年3月，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同年7月毕业，晋升炮兵上校。从此后，他一直活动于东北军中，经历和参与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张学良出身于纨绔，青年时也沾染上鸦片嗜好，但在长期戎马生涯中，特别是在与挚友郭松龄相处的日子里，深受其影响，改掉了吸鸦片的恶习，并振作起来。

冯玉祥、李宗仁等在张作霖被炸死之际，曾主张即刻挥师出关，乘胜追击，彻底解决奉军，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日本人久欲侵入东北，一旦战事爆发，必不可收拾，济南事变可为前鉴。又认为张学良非张作霖，他早有厌恶战争、统一国家之思想，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东北问题。于是蒋介石便派方本仁、白崇禧派何千里去沈阳，一是代表国民革命军吊唁张作霖之丧，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表示无进军东北之意；二是谋求和平统一途经，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换旗，亦应使双方军队不致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并设法先行恢复平奉铁路交通；三是希望奉方让出热河地盘，由方振武去任该省主席。

张学良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条件。

日本方面期望能在东北找出一个同他们合作的代理人，这个人可以是杨宇霆，也可以是溥仪。他们在沈阳制造暴乱事件，以此作为借口，实行武装占领东北，同时鼓动张学良在东北宣布独立。日本派前驻英大使林权助去奉天，会同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名为吊唁，实则设法对张学良施加压力，阻挠东北和南方谋合。张学良同他们谈话时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为。”张学良把同日本谈话的情况及时告诉方本仁、何千里，并表示忿懣难堪之状。他激动地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吊总司令了。”随之以手支额，泪涔涔而下。

方、何亦为之动容，对张深表同情，并认为日本对东北的野心难测，易帜之事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张愤以拳击桌说：“我没可说的。你们相信我张学良不会甘当亡国奴的。”张宗昌、褚玉璞与日本人勾结，他们率领的直鲁军于津浦线溃退后，张宗昌向张学良提出班师回奉、整顿军队的要求，并要求为他划出永久驻防区，企图强占东北。同时，他还伪称，要将部队开出关外，为张作霖报仇。

张学良对张宗昌、褚玉璞等人的蓄有贰志，早有察觉。当张宗昌、褚玉璞于8月3日率部向东北军发起进攻时，东北军立即奋起反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张、褚所部的直鲁联军。张宗昌狼狈地乘飞机逃往大连。

杨宇霆在滦州于8、10月间两次同白崇禧相见。2人密谋推翻张学良，以杨取而代之。

事后白崇禧将此事密报蒋介石。不料，此时蒋正积极争取张学良实行

东北易帜，便将此事转告张学良。此事当然引起张学良对杨宇霆不满，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日本政府拟拨款 6000 万元，借给张学良以整理奉票，试图以此为诱饵，拉拢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张学良很气愤，他在大元帅府中愤恨地说：“日方欺我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10 月 28 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易帜和裁军问题。决定以先不在东北设国民党部为条件而易帜。张学良已把北伐战争中截获的客货列车 200 辆，车头 10 个交给国民政府。11 月 12 日，平奉铁路开始通车。

东北人民对于易帜一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举行活动，强烈要求张学良早日实现易帜。

12 月中旬，国民党政府派张群、吴铁城、李石曾，方本仁到沈阳，送来旗帜和任命状。12 月 29 日，张学良举行易帜典礼，宣布易帜。东三省在 29 日夜改悬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向全国发出“易帜通电”，说：“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12 月 31 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常荫槐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

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全国表面的统一得以完成。

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蒋介石提出全国共编 50 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供大家讨论。在第一次非正式的编遣会议上，冯玉祥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冯的第二集团军应编的标准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占少数。

何应钦问冯：“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应道：“多少还不敢说，在 4 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在第二次非常正式会议上，冯提出了一个方案，倒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即第一、二集团军各编 12 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 8 个师，杂牌军编 8 个师。然而冯案一出，李宗仁、阎锡山就齐声反对。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李宗仁讥冯说：“当了军政部长便洋洋得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可笑不可笑。”其实，冯案被否决早在蒋预料之中，蒋之怂恿冯提出方案，只是为瓦解冯、阎、李阵线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而已。现在李、阎既不同意冯的方案，蒋便示意阎再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讨论。何应钦向阎转达蒋的意见说：“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蒋先生意思希望在 4 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 1 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阎召集部下，几经研究，便搞了一个方案，写成书面文字，交给何应钦，即第一、二集团军各编 10 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 8 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 6—8 个师，其余 6—8 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 年 1 月，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孙科，以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

总指挥共 60 余人参加会议。

所有出席列席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站在主席台上，邵力子坐在台上小桌的左侧、杨杰坐在右侧。

会上，蒋让众人就阎案表态，其时 4 个集团军中，冯部人数最多，有 40 余万，蒋部近 40 万，李部桂军约 20 万人，而阎部尚不足 20 万。因此，按照阎的提案，冯部裁减得最多，阎部裁减得最少，而由中央处理的 6—8 个师编制，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事编制。这个方案是抑冯、拥蒋、利阎的方案。

李宗仁既已对冯案作了否决，倘对阎案再表示反对，自己必成众矢之的，李窥破蒋的用心，于是装聋作哑，在会上发困打盹，不作一辞，最后干脆提出：“早点休息，免得大家在路上过大年。”冯因自己的提案被否定，就提议暂缓编遣。蒋哼了两声，提议成立编遣委员会，内设一个经理组，由阎锡山任组长。冯玉祥怒气冲冲地走出会场，从此称病请假，派代表出席，蒋提出各集团军分别设一个编遣区，指定第一集团军的主任为何应钦。并要求其他各集团军决定人选。于是，当场决定第二集团军为鹿钟麟，第三集团军为周玘，第四集团军为白崇禧。

冯的代表针对蒋说募兵制募来的都是些无赖、流氓、土匪，大谈第二集团军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所以决不是土匪、游民、无赖等语。说得蒋当场难堪，会议冷场。

此后休会两天。

冯称病请假。蒋介石先派孔祥熙前来慰问，孔走到院里，听见冯正大声和许多人说话，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也去冯住所探病。只见冯卧房里炭火熊熊，冯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床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像有大病的样子。蒋介石两次偕宋美龄亲往冯处探视慰问，并嘱他好好静养。冯谓：“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者云，系神经衰弱症。”马拉松式的编遣会议，在蒋的主持下，开了近 1 个月，最后制定了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并将由南京政府下令，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各集团军司令方才醒悟，他们都中了蒋的圈套，立即由互相猜疑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设法作最后努力以抵制蒋的编遣计划。冯玉祥首先提出动议，称“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李、阎一致附和，而后嚷嚷要求散会，会议通过的大纲成了一纸空文。

编遣会议收场后，冯、李、阎都认识到蒋不把他们搞垮，不会罢休，他们岂肯束手待毙？于是回到基地后，更加厉兵秣马，准备与蒋一争高低。蒋见“削藩策”有夭折危险，也定下决不中辍之心，顾虑到四面出击力量不足，转而采取各个击破的惯技，拟收杀一儆百之效。

蒋介石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拉阎、冯，把矛头指向与其矛盾由来已久的桂系。然而，冯已同情桂系，他曾对方振武说：“4 个集团军总司令除桂军外，均有要职，连张学良也一样，独有第四集团军的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天下事不平则鸣，蒋处置问题如此不平，为时局前途之隐忧。”桂系派温乔生到辉县百泉村和冯联络，争取联冯反蒋。冯表示愿与桂系合作。他说：“我一定也打蒋，但布置军队需要时间，希望李、白发动后，能够撑持两个星期，到时我一定响应。”蒋介石派邵力子、刘治

洲偕已投蒋的冯之老部属马福祥携带重金奔往华山，极力向冯讨好，要求冯从河南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冯道：“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难，我方可出兵 20 万，留 14 万维持地方安宁。”但冯又表示对蒋不满，谓：“蒋如不改变其专制独裁，纵能战胜桂系，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冯玉祥召集部属将领说：“邵力子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我出兵讨桂，以保证我担任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并答应济南问题解决后，将山东全部交给孙良诚。但我做事以国家为前提，如果有利于国家，我决不计及私人利害。如果以权位相饵，而陷国家于不可救药之境地，此市井无赖之所为，这决不是我老冯所能干的。北方人多爽直义侠，而南方人轻佻浮躁，易合易离，最终收拾大局者往往为北方人。”冯玉祥致电蒋介石，表示出兵 13 万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冯令部队进驻武胜关后，按兵不动，坐观形势变化。其实，冯使用两面开弓的手腕，一面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势力；一面利用蒋、桂交战，夺取武汉，把湖北拿到手里，使河南和湖北连结起来，既能控制长江形势，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阎锡山受蒋拉拢，却发出了拥蒋讨桂通电。

编遣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便酝酿反蒋。蒋、桂的力量不相上下，但桂系势力纵贯大半个中国，军事上缺乏纵深配备，极易遭截击，一旦有事，首尾不能相顾，实为兵家所忌。李宗仁急欲完全控制要冲地的湖南，祛除内部隐患。湖南主席鲁涤平原为谭延闿的第二军副军长，以后升为第 3 军军长，为谭之嫡系。谭、蒋勾结得很紧，鲁就是楔入两湖的一个亲蒋卒子。卧榻之侧，难容他人酣睡，桂系驱鲁已刻不容缓。

李宗仁接到何键密报：“蒋介石秘密运了二三百发子弹绕道江西接济鲁涤平。”李宗仁便秘密指示在武汉主持局面的第 18 军军长胡宗铎，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作出罢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罢免谭道源 50 师师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宣布以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并派了有力部队，星夜进兵长沙。鲁涤平猝不及防，仓皇逃离，所部撤入江西，桂军控制了湖南。

湘变发生后，李宗仁以目疾加重为词，悄然离开南京，住进上海法租界，他佯装对事变毫不知情，发出通电为事变辩解，责备鲁涤平，要求中央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

又于 3 月 8 日表示要辞去国府委员职，以示引咎，期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蒋介石在事化得悉湘变消息后，即返回南京，聆听鲁涤平陈情，心中忿恨无已，但由于讨桂尚未部署就绪，为避免打草惊蛇，对李、白不动声色，并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命何键代行湘省主席，将胡宗铎、张知本、张华辅 3 位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免职、交中央监委议处，对李宗仁则表示安慰。蒋致函李宗仁说：“惟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权，而兄之命令也不能有效，此显而易见之事实，至今也无可讳言。”胡宗铎等 3 人致电中央，表示服从，看来事态趋于平静。而事情远非如此。蒋介石为寻找讨桂借口而绞尽脑汁，一时的隐忍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而李、白知蒋决不肯善罢甘休，暗中开始调兵遣将。

桂军李、白自知兵力分散，战线太长，自编遣会后，白便以“天气渐冷，所部单衣草鞋，痛苦不堪”为名，屡电中央，请求班师。蒋介石也看破了桂系布防上的弱点，正欲由此下手，将桂系这条“长蛇”，分别砍头、击腹、切尾。他便一再命令，要白勿遽班师回南，仍宜继续暂留北方。



“立唐倒白”，便是蒋之“灭桂策”中首先实施的“砍头”招。驻津沽的白崇禧部绝大多数为桂系西征时收编的唐生智旧部。唐为桂军所败后，避走日本，是年初已由日本返国，蛰居上海。蒋闻之后即派唐的老搭档、此时已为蒋之政客刘文岛赴沪接洽，请唐出马，抓回时为白崇禧指挥的旧部。蒋又亲自去沪，央请陈公博为其找到原唐生智部军长刘兴，要刘替唐先行潜往天津，并嘱“如可以把白健生捉住，便杀了他，所需军费，找子文商量”。蒋还派出亲信，充实北平行营各机构，一时间，平、津、唐等桂军驻扎地传遍了唐生智要复职的消息。军队中也出现了“打倒桂系！”“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的标语。

白崇禧素来精细，闻见风声不对，不敢再住北平，乃潜赴 53 师师长廖磊住所。廖是广西人，虽也是唐旧部，他为人讲义气，与白关系素笃，廖为安全计，亲自护送白，白由塘沽搭英轮，化装南逃。

说来也巧，白所搭英轮载走的是白崇禧，送来的是唐生智。唐抵塘沽，其旧部绝大多数重要将领均到码头迎接，幸白抢先一步逃脱，否则必入罗网无疑。

白崇禧从塘沽脱身后，因风声走漏，蒋介石探得白的行踪，当即决定，俟白所搭之轮驶入吴淞口时，即派员登轮搜捕，务必将白拘捕解京，并示意吴淞炮台：如英轮不服检查，即行开炮，将该轮击沉，宁愿事后与英方办理外交赔偿交涉任何损失，在所不计。

白蜷伏轮上，毫不知情，一心盼望早日抵沪，与李宗仁面商一切。

事又有凑巧，蒋在上海的布署为一对白钦仰的特工人员所泄，往报李宗仁，李情急之下，往请时居上海的军界耆宿许崇智鼎力相救。许乃通过其与日本驻沪领事以及关东军司令在日士官学校的同学关系，花 10 万块钱雇了一艘日轮，高速行驶，赶上白所搭之英轮，接白过轮，直驶香港，白方得幸免于难。

白虽从北方逃脱，但唐生智已抓回旧部，正式就任讨伐桂逆的第五路军总指挥。蒋介石不动一兵一卒，一夜之间把河北 10 万反蒋军改编为“拥蒋军”，“灭桂”第一招顺利告成。

## 第八章 翦除桂系

蒋介石灭桂的第二招是“切尾”。

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素有“半个桂系”之称，早为蒋所忌恨。为削弱李在粤的地位，蒋有意识地将李手下之握有兵权的陈铭枢、陈济棠擢升为广东省主席和广东编遣区主任。蒋又以“调停湘案”为名，电请李济深北上秉公拟查且复。实则为调虎离山计，将李济深骗离广东。李济深不知是计，欲助李宗仁、白崇禧大事化小，故离粤赴沪。

滞留在上海的李宗仁知蒋不安好心，劝李济深切勿进京，去了凶多吉少。李济深初以为然，决计不再去南京。不料，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 4 老随即啣蒋命联袂来沪，坚邀二李入京。吴稚晖并赌咒发誓以人格担保二李安全。李宗仁讥吴“人格担保渺茫得很”。而李济深则转认为：“我

在广东有部队，要对我怎样，自会有人在我背后讲话。”他打定主意，看老面上贸然进京。

李济深一到南京，果然被蒋介石派人监视起来，再想脱身已无计可施。李济深被扣，广东内部即起分化，在蒋收买下，陈铭枢、陈济棠联合发出拥蒋反李通电。拥李济深的部将主张兵谏，遭到压制，被剥夺兵权。粤、桂联盟至此完结。

蒋之灭桂策进行得十分得心应手，桂系败象已显。余下则是翦除桂系第四集团军精华，挫败在汉桂系主力。而这一着蒋也有了对付手段。他派人游说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不料被胡、陶据实告诉李宗仁，使蒋十分被动。蒋又探得武汉内部主要纠葛在于桂籍将领对胡、陶不满，因李宗仁过分重用了胡、陶，战功卓著的桂军将领，如李明瑞、钟祖培等反受冷落。而胡、陶主鄂后，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军中待遇不公，桂籍军人因而常出“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怨言。于是蒋派出忠实谋士杨永泰赴香港，通过李明瑞姑表兄弟俞作柏，策动不满胡、陶的桂系将领倒戈，允诺事成之后，委俞为广西省主席，又当场授俞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衔。

俞作柏奉旨，携蒋巨款，由沪潜赴武汉，煽动李明瑞反桂。联络告成后，俞即返沪复命。至此，蒋向桂系进攻的时机完全成熟。

蒋介石撕下“宽容”面具，对李、白桂系明令讨伐。1929年3月25日，蒋桂正式开战。

27日，蒋介石发出《讨逆时告将士文》，说桂系“最大者厥有五项：(1)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2)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3)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4)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5)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同日国民党三大作出决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除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蒋介石又发表《告湖北文武官员文》、《告原隶4集团各将士文》，收买湖北民众人心，分化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

说讨逆的目的，既是保障国家的统一，又是铲除压迫湖北人民的军阀，以解除湖北人民的痛苦。他提出刷新吏治、铲除弊端的3点意见：(1)绝对禁止贪污贿赂，努力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2)绝对禁止挟嫌报复；(3)绝对禁止分派别植私权。

李宗仁事先作了安排，他曾电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令其委派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任第一、二、三、四、五路军司令，分别率部在黄陂至武穴一线严阵待敌，在不得已时，缩短战线，以退为进，撤入湖南，联络两广，待机取北伐进军江南路线，再向南京进兵。然而，由于李不在汉，部队军心离散。第7军军长夏威住院，部队交李明瑞指挥。李明瑞即调动所部3个团与其相约共同行动的杨腾辉旅，秘密集结，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移动，次日拂晓抵达孝感、花园一带，随即四处张贴反胡、陶标语，继而发出布告，反对李、白。

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的两手攻势下，桂系很快支撑不住。湖南何键也在军事压力下向蒋投诚，桂军退路被截。4月4日，胡宗铎等率部向鄂西撤退。当晚，武汉弃守，蒋介石未费一枪一弹，重镇唾手而得。次日，蒋抵汉口慰问桂系倒戈部队，并派兵分头追歼逃往鄂西的桂军。

桂军军心离散，无法再战。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为保全部队，于4月15日联名电蒋：“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

矣。”胡、陶、夏 3 人通电离军出国，遂离开部队，搭轮赴香港，所部桂军由张发奎、朱绍良包围缴械。

桂系 20 余万大军，至此只剩下黄绍竑统领的桂省 3 个师的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分别由上海、香港来到广西。李、白、黄 3 巨头在梧州聚首，他们望蒋不为己甚，就此休兵，给桂省留下一丝血脉，尚有日后再起之希望。

恰好此时在宁被扣的李济深遵蒋命给李、白写来一函，除自责、罪己外，示意李等早日行赴海外。于是，李宗仁便让黄绍竑出面，通过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与蒋交涉，并提出要蒋撤消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查办案，恢复李济深的自由，给李、白出洋考察名义及旅费，广西部队编遣由黄绍竑全权处理的条件。

李、黄、白一时未见回音。一日，黄绍竑正与白崇禧奕棋，李宗仁在旁观战，译电员送来一份急电，李宗仁接过一看，是陈铭枢打给黄绍竑的，转达南京政府 4 项回复：(1) 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2) 广西不准收容从武汉退回的部队；(3) 桂省部队缩编为 1 师 1 旅，剩余武器交中央；(4) 黄绍竑将以上三项办妥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区副主任。

李宗仁看完电报，良久未吭一声，递给着棋的黄绍竑。黄因棋局正入高潮，顺手将电报搁在身旁茶几上，直到一局终了，赢了棋的黄绍竑方笑逐颜开地打开电报，不料越看越紧张，连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随即将电报递给白崇禧。

白看后也不作声。过了一会，白对黄说：“季宽，像这样的条件，还有什么好说的！”李宗仁猛吸几口香烟，吐出一股浓烟，沉声说道：“算了吧，准备打仗！”黄绍竑连连点头道：“反正我们的本钱在前方输光了，家里留下这一点也无用，干脆孤注一掷，拚个痛快！”当晚，李宗仁电令省内各高级将领，作迎战蒋军的一切准备。

蒋介石抱定要铲除李、白，不留后患的决心，于 4 月 24 日赴长沙，制定由湘、粤、滇 3 路《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

李、黄白铤而走险，反守为攻。李宗仁发出讨蒋檄文，斥蒋“图使内争，涂炭生灵，动兵邦内，任用外戚，贿赂公行，凌乱度支，饱盈私壑，排除异己，残害同胞，此贼不除，党国何有？”李宗仁只身赴香港，联络国内其他反蒋势力，推进反蒋运动。黄、白率部队先取广东，剪除牵制。攻粤初时进展顺利，一度席卷西江各县，东江忠于李济深的徐景唐部起兵响应，海军舒宗鎔驱舰协同桂军作战。5 月 21 日，桂军攻至广州近郊粤汉铁路之白坭站附近。

陈济棠受蒋收买，表示效忠。悉调所部，在三水、清远严密布防，以逸待劳。桂军攻白坭时，陈亲赴前线督军反击，并出动飞机轰炸“叛舰”。一场血战后，桂军受损惨重，黄旭初受重伤，所部将士死伤无数。黄、白见攻粤无望，急率部退回广西，又改向湘省方向出击，结果又被击退。黄、白东碰西撞，头破血流，已势穷力蹙，无以施其技，在四面楚歌的处境下，只得作出决断，将余部悉交师长吕焕炎、梁朝玑，嘱其率部与回桂之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以此保存实力，待机再起。

6 月底，黄绍竑、白崇禧联袂由龙川入越南，在香港的李宗仁也被逼出境，改名易姓，亡命西贡。俞作柏受命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李、黄、白的残部被俞、李收编为新编第 16 师。但俞、李受共产党影响，显“左倾”，蒋大为震惊，电召 2 人赴京听训，俞、李别无选择，

乃于 9 月 27 日在南宁通电讨蒋，蒋故伎重演，派人收买俞、李 2 人手下大将。俞、李在广西卵翼尽失，孤掌难鸣。事败，俞、李参加了工农红军。

坐观战局的冯玉祥，见蒋占取武汉之后，于 4 月 8 日发出声讨桂系的电报，并派代表曹浩林、刘骥偕同蒋的代表邵力子、马福祥等赴武汉见蒋，努力增进蒋冯之关系。冯玉祥又暗令韩复榘向武汉推进。但是，在武汉的蒋介石电韩复榘停止进兵，并召他来见。

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招待韩复榘和韩的二太太纪甘青，不仅对韩在武胜关观望和欲取武汉的行动避而不谈，还对韩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向方兄的战功卓著”，并说，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内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设。韩复榘受宠若惊，临走之时，蒋送韩 10 万元，宋美龄也送了一枚昂贵的戒指给纪甘青。韩复榘又感激，又高兴，说良臣择主而事，蒋总司令才真是真正难得的领袖。

蒋介石解决了桂系，不需要再拉拢冯玉祥。于是，不再履行与冯玉祥约定的给冯两湖地盘及武汉政权。济南案件解决后，仍阻挠冯部孙良诚接收济南，进而任命陈调元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负责接收山东。这使冯及孙良诚等难以容忍。

蒋介石又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府》一文，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冯玉祥便致电蒋介石，指责蒋对一、二集团军发饷不公。蒋复电，谓“1 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高，2 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低，2 集团军士兵习劳耐苦惯了”。蒋还利用特务制造谣言，攻击冯将攻晋谋出平津，由外蒙勾结苏联，云云。

冯玉祥见蒋介石“削藩”要搞到自己头上，兵戎相见已不可避免。于是便采取果断措施，即刻令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同时令原在鲁、豫两省孙良诚、马鸿逵、庞炳勋向潼关以西撤退，并将洛阳以东的铁轨拆毁，以阻蒋方进兵之路。冯计划在潼关、华阴集结兵力，缩短战线，并压迫阎锡山一道反蒋。

蒋介石感到冯玉祥的行动飘忽迷离，他知道冯玉祥要反，但为什么又向后撤兵呢？于是发份试探性电报，要冯玉祥赴南京共商国是。冯对蒋电置之不理。冯部将领刘郁芬等发出铣电，请冯“统 50 万武装同志，与蒋周旋。”蒋即致冯电说：“我兄行谊磊落，众所周知，是何人斯，竟敢言兄之称兵叛党？吾甚怒之。此为诬弟不想容事小，诬兄革命人格之罪大。”冯通电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反蒋战幕揭开。于是，蒋介石遂以“背叛中央”的名义开除冯玉祥的党籍，下达讨伐命令。

就在即将开战的前夕，冯的心腹将领韩复榘满心迷惑，他在冯召集的华阴会上，说道：“全军退入陕甘贫瘠之地，给养不足，怎么生存？况且，全军将士刚由贫寒地区打出，谁也不愿退入穷地方受苦，若为环境所迫倒也罢了，如今这是为啥？”冯玉祥说出与蒋介石难以共存，蒋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我军。韩复榘一听，即向冯请缨率 10 万兵沿平汉铁路，攻取武汉，愿立军令状，如不成功，甘受死刑；并建议另由孙良诚率 10 万兵，沿津浦铁路直取浦口、南京；再以石友三统 10 万兵沿铁路线分驻郑州至徐州一带，作为韩、孙两路的总预备队；最后，留宋哲元、刘郁芬部在后方，严密监视阎锡山。如按此计划行事，必获全胜。

冯玉祥摇头认为这个主张太冒险，不予采纳。

韩复榘十分激动，面红耳赤，反问道：“当初五原誓师，人不足 10 万，

装备也差，奋勇向前，不是成了大功？如今兵多将广，10倍于昔，枪炮军械，也是全国无比，何以不进攻而只退守？”冯玉祥道：“以前本钱少，不得已而冒险；如今本钱大了，就得行万全之策。”韩复榘又要求准许他的部队驻防洛阳至南阳一带。冯也坚决不允许。

韩复榘是冯一手提拔起来的，韩在冯手下当过司书生、司务长等，成为冯的亲信，被人称为冯的“十三太保”之一。但韩在南口战败后，曾投降阎锡山。冯在五原誓师后，以宽容的态度将他召回，并表示既往不咎，但韩对冯存有戒心，韩复榘虽然作战勇敢，但当了河南省主席后，常瞒着冯去嫖赌玩乐，出巡时娶了个以唱坠子书闻名一时的伶女子纪甘青为妾。冯对手下高级将领管束得特别严，要求他们保持简朴的生活。他对韩的情况隐约得知，便在河南省府军政人员会上，不指名地批评韩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对冯的管束很反感。

在蒋桂战时，韩的部队挺进到花园。他嫌河南省穷苦，想借机得到湖北地盘，当湖北省主席，想率部直扑武汉，冯却把他大骂一顿，说他“太不懂事”，令他原地待命。

韩为此对冯极为不满，加上蒋介石的收买，使韩产生了叛冯之心。

韩复榘在华阴会议之后回到甘棠，满眼含泪说道：“把整个河南省放弃，部队全撤到潼关以西，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以后我们吃什么？穿什么？靠什么激励将士跟着我们？”韩复榘便联络在洛阳的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

石友三当过冯的马夫、警卫，也是冯的“十三太保”之一，曾同韩一起投降阎锡山。

石友三胆较小，且多疑。他多年来战功赫赫，居功自傲，因未能列土封疆，甚为不满。

他瞒着冯吸食鸦片，妻妾成群，一向追随韩复榘。蒋介石在蒋桂战争时，派钱大钧赴襄樊慰劳石友三部，给石30万元。石也接收了蒋的拉拢。

5月22日，蒋介石正在惊恐疑虑之际，忽接到韩、石表示投靠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复电嘉奖，并许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指挥。派石友三为讨逆军第13路总指挥，立即送现款1000万元作为犒赏。又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

韩、石倒戈时，冯住在华阴，最初听到这个消息尚不相信，等到证实以后，感到痛心无以复加，韩、石为冯的最精锐部队，二人一变，冯对于其他未倒戈的将领都失掉了信心，日夜哭泣，咒骂自己，不停地猛打自己的嘴巴，又拔出手枪欲自杀，幸被卫士抱住。

由于冯、蒋间隔着韩、石两部，而韩、石新叛离冯，不敢同冯部作战，战事暂告中断。冯受到意外的严重打击，于5月27日通电下野入华山：“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真是祸不单行，冯部刚出了2名叛将，又有阎锡山来欺冯，将其骗去山西软禁起来。

老奸巨滑的阎锡山，看到老蒋采用各个击破的手法“削藩”，已对付了桂系和冯玉祥，眼下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于是便施展政治阴谋，挟冯自重。他委托原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与冯又有旧交的李书城，去见冯玉祥，劝冯同阎一起出洋。冯遂决定离华山，偕妻女随李书城过黄河，赴山西。

冯到太原后，即同阎联名发出出洋通电。阎将冯安排在太原附近的晋祠居住，在太原给冯设立了办事处，还给冯安了对外联系的电台，每隔三五

天，必去看冯一次，礼遇极优。

阎常与冯商讨反蒋办法，同时也准备些出洋的服装用具。

蒋以为阎、冯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即派吴稚晖、孔祥熙去山西，劝阎不要出洋，并邀阎赴北平同蒋会面。

阎同蒋在北平密谈后，返回山西，再也不谈出洋、反蒋的事了。冯见阎迟迟不准备出洋，表示自己要单独出洋。但阎对冯说：“大哥，你如不等我，就叫我人格破产了。”冯只好收回单独出洋的打算，这正好中了阎将冯软禁在山西的圈套。冯在晋祠住了3个月后，移至五台县居住。10月5日，阎又将冯迁移到建安村，并在冯住房周围、房顶上部署了武装岗哨，村外围有铁丝网。李书城因为是奉阎委托劝冯来山西的，现在冯被阎软禁，李心中不安，决心陪冯一同“坐监”。

冯要见阎，阎总托词不见。冯忍无可忍，有一天坐上汽车开出建安村外，声言要去太原见阎。卫队师师长杜春沂阻拦无效，跪在冯的车前，求冯不要出村，冯怒而不理，仍命开车前行。杜赶忙电话令沿途驻军，把公路挖了一条大沟，使冯的汽车无法通过而被迫折回。冯怒发冲冠，大呼上当。冯的私人医生陈崇寿同冯的身材相貌有些相似，冯计划化装成陈崇寿出逃，后感到这太冒险而作罢。

阎锡山备有两套人马，一套专接南京代表，表示竭诚拥蒋；另一套则专接各方面的反蒋代表，大谈其关于以阎、冯为中心的反蒋问题。南京来的代表人物越大，蒋介石给的代价越高，则看守冯玉祥的部署就越紧；南京代表离开后，看守冯玉祥的情况就稍松些。冯本想联阎反蒋，反被阎作为人质而软禁起来，被阎作为政治上的砝码来要挟蒋介石。

## 第九章 中原混战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将领看到阎锡山趁火打劫，非常愤怒，就活动通蒋压阎。8月间，代理冯玉祥任军政部长的鹿钟麟、外交次长唐悦良、卫生部长薛笃弼，应蒋方邀请去南京复职。冯部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陈琢如去南京见蒋介石，弄到一些给养补充。阎锡山见此情形，大为着慌，深怕冯部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惟恐对自己不利，便急忙改变手法，在中秋节之夜赶往冯的住地，非常客气地拜见冯玉祥，答应与冯联合反蒋，让冯命令西北军先发难，山西的部队马上跟上。

在阎锡山的鼓动下，冯立即电令宋哲元、刘郁芬等克期举兵。阎锡山又派人和冯部将领接洽，答应对冯军粮秣等方面充分供应，信誓旦旦。冯部官兵早已看透了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毒辣手段，在阎锡山的鼓动下，酝酿讨蒋计划遂起。宋哲元一面应付蒋介石方面派来的编遣委员，不露痕迹，一面调动部队暗中准备；同时电告南京的鹿钟麟、刘郁芬等脱身赴沪。

10月10日，西北军出兵潼关，讨伐蒋介石。这次由刘郁芬、石敬亭、宋哲元、孙良诚等27位将领联名通电讨蒋，宣布蒋介石毁党、误国等6大罪状。推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冯部所有军队共编8路，分路出发，各将领公推宋哲元为西北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大怒，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好乱成性，勾结暴俄、祸国殃民，既召外侮，又图称兵，内 国本，外失威信，举国同仇，疾首痛心，全军愤激，师出正名，为党讨逆，为国牺牲，党亡与亡，国存与存，身为后死，誓不偷生，义无反顾，勇往急进，军法连坐，敌忾同心，内奸不除，国无幸存，叛徒不灭，民难安宁，歼除内奸，固我国本，肃清反叛，安我国民。”双方在交战中，西北军连打胜仗，进展甚快。蒋介石一面对冯部用兵，一面派人到山西拉拢阎锡山，命令阎锡山部属朱绶先代理军政部长职，阎锡山立即作了反应，于 10 月 15 日电南京政府，表示对宋哲元等人的行动，当尽力制止。这完全暴露了阎锡山反复无常两面三刀的态度。

蒋介石任命讨伐冯军的 5 路总指挥是：第一路方鼎英，第二路刘峙，第三路韩复榘，第四路何健，第五路唐生智。总预备队总指挥为陈调元。运输总司令贺耀组。蒋介石利用非嫡系军队去消灭异己。

由于阎锡山将冯军的军事机密向蒋报告，并接受蒋介石委任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命令，冯军受到阎锡山和蒋军的夹击之中，失败终成定局。11 月 21 日，在郾城督师的蒋介石因需要回南京主持对广西方面张发奎、俞作柏的战事，电请阎锡山赴郑州坐镇指挥对西北的军务，令唐生智代理总司令职权，进行善后事宜。至此，反蒋军事暂告一段落。

被软禁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得知因阎锡山背约，使西北军 20 万官兵陷于绝境，愤而绝食。冯绝食 100 余小时，经李书城等苦苦相劝，才复食。12 月中旬，冯玉祥强烈要求亲往太原当面责问阎锡山，被阎派的驻兵跪地拦车挡回。

鹿钟麟化装成某要人的勤务兵，随某要人去建安村见冯。冯将用米汤在《三国演义》书内密书手令交给鹿，即免去宋哲元的代总司令兼职，另以鹿钟麟代理总司令职务，并令宋哲元、鹿钟麟等部将：“勿以我为念，设法联合韩复榘、石友三，甚至不惜与南京方面修好，对付阎锡山，救他脱险。”鹿钟麟返回冯军总部所在地西安，立即提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冯亦派员向中央大员报告蒋冯战争第二期的真像，使蒋得知阎是阴谋挑起冯军第二次反蒋的祸首。蒋即派人向西北军表示，希望“合力倒阎”，蒋还致电阎锡山“恢复冯之自由”。

鹿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应钦，表示：如能给一批军火，即愿开往山西讨阎。这与蒋介石“联甲制乙”政策相符，因此一拍即合。鹿又派人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石两人回话：“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钟麟即给韩、石密电：“我弟如举兵入晋，愿受弟指挥。”蒋的“削藩”使阎不寒而栗，加上历年来各方的反蒋活动大都与阎有牵连，使阎担忧。蒋、阎矛盾日益尖锐。这时，占据北平的唐生智又率部讨蒋，想争取阎的支持。他吸取冯的教训，要求阎锡山代拟讨蒋通电以坚盟信。阎氏答应了他的要求。但等唐起兵后，阎又联蒋反唐，使唐一败涂地。

蒋介石见阎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严重威胁着南京政府，便开始对阎动刀，从阎手中接收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务机关。阎大为不满，要求南京批准发行公债以资弥补，又遭蒋拒绝。阎得知蒋在北平秘密会见张学良，内心恐慌。阎锡山从郑州返回太原前，蒋曾密令韩复榘逮捕阎，走漏消息，使阎得以逃回山西。激起阎反蒋的决心，于是阎派王鸿一到建安村请冯

玉祥来太原，共商讨蒋大计。冯未答应去太原，他忠告阎：“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又批评阎的“骑墙政策”。

阎锡山于1930年2月10日发出通电，以“礼让为国”之名，请蒋下野。阎通电反蒋后，得到各方反蒋派别的支持，国内反蒋势力派出代表云集太原，形成空前的倒蒋统一战线。

这些人中有国民党改组派陈公博、顾孟余等，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冯玉祥的代表李书城、李兴中，桂系代表潘宜之，四川刘文辉的代表胡畏三、刘湘的代表袁鸿吉，张学良的代表葛光庭，唐生智的代表袁华选，另外还有何键、石友三、韩复榘、万选才、马鸿逵、张发奎、陈调元、金树仁等，几乎包括了全部非蒋系各派势力的代表。他们不满于蒋之“三假政策”（假清党以篡党，假统一以窃政，假编遣以扩军），纷纷揭竿。他们在太原拟订了倒蒋的军事计划。

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访冯玉祥。阎用诚恳的态度对冯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

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言毕，抱着冯玉祥的头痛哭，冯亦痛哭。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阎立即送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支，面粉2000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冯也慨然表示：对于已往之事决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德一心，共同反蒋。

3月14日，冯玉祥秘密抵达潼关。同一天，阎、冯以及鹿钟麟、商震、张发奎、李宗仁等57人联名发出讨蒋通电，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

但是，冯部高级将领却认为从战略着眼，应当联蒋伐阎，因为阎的为人奸诈，阴险，不可与其共事，只有首先把阎打垮，西北军才能巩固西北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冯不以为然，他说：“首先打垮蒋介石最重要，而要讨伐蒋介石就必须联合阎锡山。你们不愿干，我和鹿钟麟两人一人一枝手枪也要和蒋介石打到底。”冯部将领见冯决心联阎，只有表示服从。在此次反蒋联合阵营中，冯玉祥的兵力最强，但反蒋的主帅却是阎锡山，而不是冯玉祥。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和自香港返回的李宗仁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其他将领也分别通电就职。但张学良不作表示，何键、刘文辉暗中接受委任，不肯公开通电就职。

讨蒋联军的部署是：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并趋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路、胶济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又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内定张学良、刘光辉、何键、樊钟秀为第五至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此外，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刘春荣为第15军军长等。



蒋介石采用一手软一手硬的对策。

所谓一手软便是争取冯、阎不反蒋。蒋电告第三集团军将领说：“切劝百川兄及早自拔，公私两全，固党国所利赖。”同时指使吴稚晖致电冯玉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蒋介石又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等到太原，劝阎锡山不要发动战事，对阎进行拉拢。蒋又派阎锡山推荐去南京任监察院院长的赵戴文回太原劝阎锡山不要造反。赵对阎说：“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蒋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吗。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阎锡山听了这番话，对讨蒋又发生了动摇。原来拟妥的讨蒋通电送给张学良征求同意，并请张学良署名后由沈阳发出，阎现在听赵戴文这么一说，便赶紧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道阎锡山在搞什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认为阎是拿他耍着玩，对阎深为不满。后来阎再决心反蒋时，派人到沈阳向张学良解释，此时蒋介石早已抢先派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到了沈阳做了多方面的拉拢工作，阎派去的代表不再受张学良重视了。

蒋的一手硬对策，就是以军事力量打垮阎冯。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了阎锡山的11条罪恶、冯玉祥的7条“罪恶”。蒋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阎锡山扰乱党国叛逆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余孽捣乱情形》等。蒋介石将部队编为3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韩复榘统率，扼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第二军团由刘峙统率，分防除州、碭山、宿县；第三军团由何成浚统率，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以杨虎城部警卫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4月6日，中原大战拉开序幕。4月中旬，冯进驻洛阳，万选才部占开封，万就任河南省主席，反蒋联军基本上控制了河南局势。5月1—3日，阎与冯先后在新乡、郑州会晤，商讨作战方略。

但战事一开始，反蒋联军就暴露出各怀异志的要害问题，且有指挥不统一的弱点，各部队均以保存实力抢夺地盘为目的，不肯努力作战。而蒋军方面攻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反蒋联军陇海东线于5月上旬一度陷于被动。由于刘茂恩部在豫东前线倒戈投蒋，劫杀了河南省主席万选才，又袭击了友邻35师杨效欧部，结果导致陇海前线阵地后退100余里。蒋军一口气攻占归德、围攻兰封，并将孙殿英部包围于亳县。讨蒋军石友三等部各存异心，不愿出力作战，蒋军乘势以精锐部队几路向北推进，在豫东、鲁西、皖北展开了大规模战斗，收攻击目标集中于陇海线上。蒋介石亲抵前线，设总司令部于兰封车站，坐镇指挥。蒋军有飞机配合，攻势猛烈。但冯玉祥立即作了新部署，全线开始发动攻势。冯玉祥派孙良诚、吉鸿昌两部猛攻蒋军精锐陈诚部，吉鸿昌素以骁勇著名，他身大体壮，满胸黑毛，肌肉横生，每到打仗，便赤身上阵，左手提短枪，右手握大刀，他身旁有两名大汉，一人执大刀，一人执大旗，三人同进，勇猛无敌。孙、吉两部同陈诚部一经接战，陈诚部便遭到很大挫折。激战10余日，蒋军全线动摇。

5月31日，冯玉祥部郑大章所率领的骑兵部队1000余人，于夜间急驰

80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12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50余名，差一点生擒蒋介石。蒋介石就在机场附近的朱集车站，他身边只有200余名卫兵，随蒋的高级参谋陈调元下令卫兵分布车站，密集射击，郑大章不知蒋介石就在列车上，郑部1000余名骑兵，误认为车站上有蒋军大部队兵力，又因夜间不便大举进攻，遇到抵抗，即飞驰而去。若郑部侦知真情，蒋介石即被擒拿。

石友三部以两师兵力绕渡柳河，夜袭蒋军，蒋军溃败，但石不了解敌情，未能乘机追击，反而后退。蒋军乘机反攻，转危为安，蒋还派特务间谍去开封、郑州一带专事反间工作，致谣言百出，人心不定，战局已入紧张阶段。

蒋介石在打了败仗时，同他关系密切之人问他：“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后？”蒋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在平汉线作战的蒋方部队都是杂牌部队，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抱观望态度，这时桂军已攻入湖南。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蒋军被击溃。但冯的作战方针保守而死板，没有乘胜追击扩大声势，动摇蒋方军心，造成战略上的一大失策。

桂军虽攻占了岳阳，由于冯玉祥未能和桂军的进攻配合，被粤军截断后路，桂军内部矛盾，后方不稳，被迫回师。

在津浦线上，阎锡山命傅作义为行营主任，代替自己指挥作战，可他又不放心，另委张荫梧为总指挥，使两人互相牵制，造成晋军指挥权不能统一。在开始攻击时，进展尚称顺利，5月下旬攻入鲁境击败蒋军韩复榘部。6月25日攻占济南。而后便兵分两路攻击胶济线与津浦线，遇到了蒋军猛烈抵抗。两军相持于曲阜附近。在此关键时刻，阎锡山忽然下令调整战线，适逢大雨山洪，部队滞留于转移途中，前后无着，在蒋军追击之下自陷混乱。而蒋军方面又调19路军在鲁东南海面登陆，直攻莱芜，晋军仓猝应战。攻击胶济线的部队进展迟缓，使津浦线晋军未得援应，首先处于劣势。阎锡山为了挽救被动局面，特派周玘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到郑州见冯，请冯指挥陇海线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

6月上、中旬，冯军在陇海东线连连获胜，西北军的勇猛顽强作战，使蒋军产生了畏战情绪，士气低落。蒋军多次派飞机侦察开封后，决定组织新的攻势，于是令各军向目标开封长驱直入。冯玉祥依预先计划部署“一个口袋包围形势”。虽然冯的密电被蒋侦知后，蒋立即变更部署，使冯部的口袋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但蒋军也遭到惨重损失，这一历时3昼夜的战役，使冯军缴获汽车100余辆和大批辎重。

8月初，冯玉祥连连接到阎锡山转来傅作义的告急电报和阎本人的急电，便组织了大规模的8月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兵分七路猛进，冯通电向各将领强调：“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冯发动8月攻势时，亲自坐镇在博爱村指挥全局，冯军1连奋战7昼夜，蒋军岌岌可危。

但天时对冯军极不利，正逢夏时，连日大雨不停，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阎又违背了事先的约定，很少供给冯军给养和军火，阎供给冯军的饼干，早已霉烂得不能吃，晋军又未予有效配合。

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就分电令各路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和亳州各城，且明码标价，敌军来攻

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2级，赏洋5万元。同时蒋介石也看到连日大雨不停，使冯军陷于颓势，而增强了信心。

8月15日，晋军放弃了济南，撤往黄河以北，数万人纷纷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铁桥上被蒋军的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其状甚惨。此次战役，双方伤亡达20万人以上。22日，蒋介石发表训令，争取冯阎部将反正，24日，蒋再次下令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9月6日，蒋部发动对冯部的总攻。

冯玉祥也通令全军悬赏：活捉蒋介石，赏洋200万元；活捉何应钦、何成浚、刘峙者，各赏洋10万元。但是，冯军已趋于败势，重金悬赏已无济于事。冯坐镇民权村，在蒋军发动总攻后，沉着指挥各将领退却，希望在晋军协助下，挽回被动局势。冯致电阎要求晋军以大部兵力进攻济南，以少数兵力牵制津浦敌人，其余绕道口攻归德，并抽2万兵力运郑州。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撤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形成孤立难支的形势。冯玉祥在中原战场上，多次被阎锡山欺骗，东援西突，损兵折将，大为心疼，痛骂“阎伯川这个老弟真不是个好东西”。

阎锡山在军事上失利之后，于9月9日上午9时，在北平怀仁堂举行了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阎曾在7月13日在北平召开了由各反蒋政治派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发表了《扩大会议宣言》。会后，阎派陈公博、邹鲁前往天津迎接由香港返回的汪精卫。汪精卫抵北平后便筹组以阎锡山为首的新的国民政府，他召开北平扩大会议，确定了筹备国民会议、倡导地方自治，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等7项基本原则，并推举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汪精卫、张学良、谢持为副主席。

不料，骑墙的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巧电，东北军大举入关，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曾在6月3日派李石曾到沈阳为年龄刚30岁的张学良祝寿，接着又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由张群将委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立即出兵入关。

张学良抱着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或能使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

7月间，蒋介石又派刘光带有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交给张学良。后来，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蒋介石又派李石曾、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皆随同往。张学良名义上服从中央，举动上却以东北四省利益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在张群、吴铁城等不断催促下，张迫不得已，曾以口头向张、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蒋军攻下济南，阎军退至黄河以北时，张学良返回沈阳。

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一番漂亮话，认为蒋、冯、阎都不是好东西，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张学良表示：“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遂发出巧电，拥护中央，呼吁和平，进兵关内。

张学良的巧电一发出，对反蒋阵线是一致命打击。孙殿英、庞炳勋、

刘春荣等立即脱离战场后撤，孙殿英是著名掘清室皇陵的枭雄，这班三山五岳的豪杰，殊非阎锡山所易驾驭。石友三早在冯玉祥发动8月攻势开始时就发生了动摇。阎锡山为笼络石，任命石为山东省主席。石若实行主席职权，便可接收韩复榘的军队，鲁事可告一段落。但阎又派自己属下人员跟石捣乱，晋军每占领一县就委派县长和税局局长，直接侵犯了石的职权和利益。当北平组织政府时，阎又反对石任军政部长。这就促成了反复无常的石友三秘密向张学良表示拥张倒阎。石趁冯、阎军退却时，拦路截击，危害颇大。

9月19日，北平扩大会议决定将阎记国民政府迁往太原，匆匆忙忙制定了一部《约法草案》借以收场，倒蒋运动就此结束。各派政客如鸟兽散。

## 第十章 井冈红旗

国民政府撤到太原，成了阎锡山的一个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有人打趣地说阎：“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就职，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冯玉祥得知东北军入关的消息后，仍自信实力尚在，可以坚持下去。他派部属张允荣去见阎锡山，请求派有力部队入豫支援。阎已完全失去信心。他对张允荣说：“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退到山西再说。”冯玉祥决心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固守郑州。不料，冯属下骁将吉鸿昌被蒋介石以河南省主席之职和大量金钱，利诱收买，于9月下旬首先倒戈，梁冠英、张印湘等通电附和。张维玺所指挥的南路七八万精锐部队遭敌包围，反蒋阵线的杂牌军更是土崩瓦解。

冯部重要将领冯治安、田金凯、任应岐等部也在新乡一带陷入蒋军重重包围之中，在蒋军从陇海路攻占开封之时，阎锡山、汪精卫密往郑州会见冯玉祥，商讨善后方法。

汪精卫提议利用现有力量最后退往大西北硬干到底，冯玉祥同意，并主张立即在黄河北岸建立稳固防线。但阎锡山装模作样地说：“这是国是之争。我们军事上虽已失败，但在政治上蒋介石既已承认错误，也就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况且中国是整个的，如果弄成华北、华南两个中国，我们就成了历史上的罪人。”次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和平解决”。

再次日，蒋军攻占郑州。冯军一部分由鹿钟麟统率，继续退往河北，转入晋南；另一部分由宋哲元率领退往潼关以西。

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阎锡山托词“奉父命侍疾”下野，回到五台县河边村老家躲避风头，寻机以金蝉脱壳之计自保，以图东山再起。但蒋介石却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一面继续派飞机轰炸太原，向阎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指使何应钦、孔祥熙等连电阎锡山，坚持“伯公不出洋无以谈善后”的条件，压迫阎锡山出走异国，断其复起之念。阎锡山不敢硬顶，便使用虚晃一枪之计来对付。阎锡山是老奸巨滑之人，他便同蒋介石斗起智来。

阎电蒋说自己某月某日赴苏，他便提前两天打扮成山西老商人模样，身着黑缎布褂，脚穿棉鞋布袜，由河边村出发抵达大同。随从李汝骧、张培梅化装成伙计。他们在大同火车站，因争夺旅舍床铺与晋军败兵发生争吵，

败兵指着阎的鼻子大骂：“瞎了眼的东西，看不见这里驻着军队，就往里乱闯，滚蛋！”阎锡山强压怒气退了出来，愤愤地对随员说：“这些东西，如此厉害。”当晚，他们乘坐列车秘密离开了山西，沿平绥路东行。次日抵达北平附近丰台车站。

在等候转车之时，他们看见一列装饰精美的“花车”正西行开去，经打听，知道这正是前往石家庄接“阎总司令”出洋的专列。阎锡山望着远去的列车，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阎锡山来到天津，住在南桂馨家中，因惧怕暗算，次日便迁往妹夫薄以众住所。阎按照预定计划，通过各种关系，与日方接洽，准备转去东北，依附日本的势力，寻求庇护之途。

《大公报》刊登了阎锡山抵津的消息。蒋介石愤怒不已，他没想到阎锡山居然变戏法似地跑到了天津。他密令特务机构向阎发出威胁与警告，不许他在天津久居。阎的住所周围出现了不少便衣。阎吓得赶快乘坐轮船渡海赴大连。

他在日本人保护下乘船离开天津时，给《大公报》记者一信，诈称自己已经大连东渡，续游欧美。实际上，他抵达大连后，便隐居起来。

冯玉祥退入山西之后，先是隐居在宋哲元部驻地绛县，不久迁往汾阳县峪道河隐居。

至此，冯历时 20 多年所经营的能征善战的西北军全部瓦解。冯玉祥从此失去与蒋介石对抗的武力，不再直接参加军阀混战，成为其转向民主派的起点。

张学良在 9 月 18 日发出名为和平实为出兵关内的所谓《和平通电》时，便令于学忠部为第一军，王树常部为第二军，作为先行部队由沈阳出发，入关参战。9 月 21 日进驻天津，26 日进驻北平。他们一枪未放，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和平接收”。10 月 9 日，张学良十分得意地就任陆海空副司令职。接着又赴南京接受蒋介石的嘉奖。南京国务会议命他处理华北善后和缩编晋冯部队问题，以完成蒋介石的所谓“统一”事业。这对张学良来说，确是“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时了。

张学良在天津召集晋军将领徐永昌、商震、傅作义等，商讨“整军缩编”。按照张的命令，晋绥军的数量将由原来的 14 个军 40 余师压缩为 4 个军 8 个师。徐永昌等人苦苦请求放宽限制，多给编制，但张学良坚不允许。徐永昌折回太原传达实施方案，引起各级军官的强烈反对。后经反复争吵，张学良终于同意再增加一个正太护路军及骑、炮兵独立旅等几个单位，以缓和矛盾，“整编方案”才得以确定。

张学良又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将西北军化整为零，各个消灭。蒋介石派西北军的降蒋张钫携重金，对西北军将领进行收买、拉拢、分化瓦解工作。又派遣与西北军有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等到河南协助处置西北军的办法。

冯军张维玺部被缴械后，张辞去军职，赴天津隐居。这位西北军名将，从此再也没有担任过军职。鹿钟麟在蒋的逼迫下，通电下野，秘密赴天津隐居。孙连仲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了蒋介石的第二十六路军长的任命。刘郁芬部在西安被杨虎城部缴械。刘秘密派人和蒋介石联系，被蒋任命为军事参议。

退入山西的冯军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残部，受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

蒋介石结束中原大战后，立马未稳，便指挥 10 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赣闽一带朱德、毛泽东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率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

毛泽东总结了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于 1928 年 3 月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尔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要求部队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无论走到那里，都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认真执行。毛泽东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积极帮助赣边各县和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

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等县，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

1928 年初春，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宁冈县新城的有利地形，埋伏 3 道防线，一举歼敌 500 多人，缴获 500 多枪枝，缴获弹药不计其数。战斗刚刚结束，毛泽东便向部队宣布了 4 条俘虏政策：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俘虏；第二，不准搜腰包；第三，受伤的给予治疗；第四，释放俘虏，愿走愿留自愿。愿参加工农革命军者欢迎，走者一律发给路费。

许多被俘人员愿意留下参加工农革命军。

有个俘虏兵黄立生，想回家种田养母，领了路费回家，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不得已又当了国民党兵。他在 5 月上旬的五斗江战斗中，再次被工农革命军抓获。工农革命军根据政策，发给他路费，放他回家。他再次被国民党散兵抓住。黄立生就这样被工农革命军三擒三纵。他终于明白：穷人只有参加工农革命军，解放全中国，才有真正的出路。于是，他在龙源口战斗前夕，串通 10 多名被抓去当兵的人，带着枪枝子弹向工农革命军投诚，并英勇地参加了龙源口战斗。

1928 年 4 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 1 万余人队伍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 1300 余人的部队会师。

朱德比毛泽东大 5 岁，是四川仪陇县人。朱德出身于穷苦的佃农家庭，自幼读过 3 年私塾，后因穷困被过继给伯父当养子，并有了读书的机会。1909 年，他进云南讲武堂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11 年离校后在云南都督蔡锷的滇军当连长，以后升为营长、团长、旅长。1921 年任云南省警察厅长。但不久受唐继尧部袭击，他带领 1 连人逃到重庆。这时，朱德的机动游击战术已经出名，四川军阀刘湘给他一个师长的职务，而朱德为了寻找共产党谢绝担任师长，离开四川乘船顺江而下，来到上海。

朱德在上海未找到共产党，便去北京继续寻找，然而又未如愿。他在上海时碰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他们劝他出国学习，他便决定去德国。

朱德在德国遇到了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又加入了国民党。他因革命活动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他环游了欧洲，于 1926 年从

苏联回国。

朱德回国后，中共中央命令他去四川领导军事运动，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朱德离开四川来到江西南昌，任国民党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新 9 军副军长，起义部队在广东失利后，他和陈毅率领 2000 余人的部队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师。

然而，在闽粤赣边立足的意图未能实现。因后有钱大钧的追兵，在武平又同钟绍奎的土匪部队遭遇，第 1 师击溃钟绍奎部后，退出武平向西面山区转移，部队进入江西后，时至深秋，官兵身着单衣单裤，露宿山林，风寒露冷。山区人烟稀少，搞不到充足的粮食，饥饿削弱体力，患疟疾、痢疾者剧增，且没药品治疗。每日作长途爬山行军，掉队、离队者日多，部队到达安远县无心圩时，散伙倾向日益明显，有人公开带着整班、整排人马枪枝离队自寻出路。部队只剩下 1000 余人。

朱德、陈毅以及原 74 团参谋长王尔琢决心带着部队走出绝境。王尔琢已蓄起胡须，发誓革命不胜利，不剃掉。朱德在排以上干部会上说：“1927 年的中国革命好比 1905 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 1905 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 1917 年革命终于成功了。只要坚持斗争下去，中国也会有个 1917 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陈毅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林彪领着几个连长来见陈毅，他们都是黄埔军校第 4 期毕业生。林彪说：“现在部队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其他几个人附和，劝陈毅和他们一起走。陈毅表示不离开部队，并说：“离开了部队就没有了枪，就会被土豪劣绅杀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林彪一个人离开了部队，但没走多远，看到关口搜查、抢夺、打人、杀人，觉得太危险，便返回部队。朱德、陈毅批评了他，仍让他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

剩下 800 多人的饥寒交迫的部队来到信丰县城，便发生了一起哄抢当铺事件。朱德、陈毅、王尔琢立即下令部队紧急集合，把部队带到离县城 20 多里的一个山坳里，陈毅宣布哄抢当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抢劫主犯 3 人，立即枪决。陈毅又讲述了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铁团的革命宗旨和光荣传统，要求官兵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心为公，并要求众人向朱德学习。朱德不屑高官厚禄，加入共产党，他目光远大，意志坚定，大家跟着朱军长走，革命一定会成功。官兵高喊：“拥护朱军长！”“跟朱军长干革命！”参加哄抢的士兵，纷纷把抢得的东西交出来。朱德感谢大家的支持，并说，如果他本人违反纪律，大家也以同样拿他问罪。

部队移驻湘粤赣边界，休整了一个多月，离队官兵 200 余人归队，加上一批新兵入伍，部队又有 1000 余人。是时，由张子清、伍中豪带领的 1 个营的工农革命军来到朱德部队的驻地，这支部队是毛泽东秋收起义军在三湾改编后的 1 团 3 营，因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切断了同毛泽东的联系，才独立向南发展到这里。朱德、陈毅等从张子清、伍中豪那里得知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的活动情况，于是便派原在第 25 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胞弟毛泽覃，去井冈山同毛泽东联系。

部队移驻广东韶关以北的犁铺头，张子清、伍中豪部返回井冈山地区。

此时，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起义人员零散投奔而来，部队又发展到 1200 余人，毛泽东所派的何长工来到犁铺头。何长工是陈毅留法的老同学。他向朱德等转达毛泽东请他们上井冈山的意见。朱德十分高兴，他的部队正处在困境之中，几个月来跑来跑去，没有立足之地，朱德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请何长工带回井冈山，并要何长工转告毛泽东：他们一定去井冈山找他。

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部来到湘南，在途经乐昌时，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当过营长的胡少海加入了部队。胡是宜章岩泉人，其父兄是宜章富户，颇有声望。朱、陈、王、胡同中共宜章县委军事部长陈东日等决定组织宜章“年关暴动”。于是，胡少海带领两个连的先头部队于 1928 年 1 月 12 日入宜章县城，在次日晚的宴会上，扣留了全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民团长官。大部队接着进城，将县政府、警察局、团防局的武器全部收缴。

朱德在宜章北门广场的祝捷大会上宣布：宜章工农暴动成功；他们是工农革命军第 1 师，他是师长，陈毅是党代表，王尔琢是参谋长。他们是为工农大众利益牺牲的军队。

随后建立了宜章苏维埃政府。

国民党独立第 3 师师长许克祥奉命率 6 个团直扑宜章，他对官兵说：“潮汕一战，朱德已成惊弓之鸟，宜章是靠欺诈得手，实际并无几多战斗力，这次务必收聚歼之大功。”朱德为避敌锋芒，率部打着火把连夜撤离宜章。他使用主力配合农军打开了顽抗的土豪寨子黄沙堡，在窠壁洞整理部队后便出击，利用许克祥轻视工农革命军而未集中其部队的时机，对运动之敌突然发起攻击，把许克祥的 2 个团打垮，次日又乘胜追击。朱德的主力军本来就有北伐打恶仗打追击的优良传统，又有熟悉地理的农军配合，声势浩大。

敌军建制大乱，溃兵向后狂逃，未战先败，草木皆兵，一路上敌军风声鹤唳。起义军势如破竹，攻下敌军后方基地坪石。此役接连击溃敌 6 个团，俘敌 1000 余人，缴获重机枪 10 余挺，步枪 1500 余枝，手枪 100 余枝，迫击炮 8 门，马 13 匹，弹药被服不计其数。许克祥化装后，混在乱军之中逃走。

工农革命军第 1 师重返宜章，随即挥师北上，直指郴州。在郴州南郊大铺桥，驻守 2 个营的敌军，陈毅采用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攻势，组织喊话，瓦解敌人。守敌被逐一分割瓦解，除少数人逃回郴州城，600 余人枪悉数俘获。

敌军少数士兵逃回城里，带去了恐怖情绪，守敌不战自乱，争相逃命。我先头连尾追入城攻占敌旅部，溃敌向永兴、耒阳逃走，朱德、陈毅率主力开进郴州。

第 1 师在农军密切配合下，先后攻下永兴、耒阳、资兴、桂阳、安仁等县城，攸县、酃县也举行暴动。各县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继宜章农军成立工农革命军第 3 师之后，郴州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 7 师，耒阳建立了第 4 师，永兴、资兴成立两个独立团。

1928 年 4 月初，国民党调集了 7 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湘南革命区大“协剿”，大军压境，腹背受敌。朱德、陈毅同中共湘南党组织商议后，决定退出湘南。在这之前，毛泽东已派毛泽覃带领一个特务连来到耒阳找到朱德，迎接他们的部队和湘南民军上井冈山。

朱德率第 1 师主力和部分农民军由耒阳经安仁、茶陵向酃县进发，陈毅率第 1 师一部及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县苏维埃及郴县、宜章、耒阳、永



兴等县的农军转移。陈毅部到达资兴一带时，农军队伍已剧增到近 8000 人。

毛泽东派何长工率领 2 团往资兴以东的彭公庙迎接陈毅的部队。二支部队会师后，湘南特委新任书记杨福涛等，要求折回湘南，陈毅、何长工力劝无效，杨福涛带领七八十人回衡阳，几天后，他们在安仁、耒阳边界全部遇难。

朱德、陈毅分别率领的南北两路部队在酃县的淝渡、十都等地会合，后，1 万余人的宏大队伍于 4 月 28 日顺利到达宁冈砦市。

毛泽东为了掩护朱德、陈毅部从湘南撤退，亲自率领第 1 团入桂东、汝城，同敌人激战于滁口。5 月 1 日，毛泽东率部队到达砦市。

朱德、毛泽东、陈毅、王尔琢等在砦市龙江书院亲切相会。

朱德、毛泽东两支革命军队会师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问题。5 月 4 日，召开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陈毅在大会上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军下设第 10、11、12 三个师，朱德兼任第 10 师师长、毛泽东兼任第 11 师师长，陈毅兼任第 12 师师长。每个师下设 3 个团，共 9 个团，即第 28—36 团。团长分别是王尔琢、胡少海、蒙九岭、张子清、袁文才，邓允庭，旷酃、黄克诚、李奇中；团党代表分别是何长工、龚楚、何挺颖、陈东日、旷朱权、邓宗海、李一鼎、黄义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红军第四军。

朱德、毛泽东会师后，革命根据地也扩大了，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苏维埃政府。

## 第十一章 转战赣闽

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四军于 6 月 23 日在龙潭口歼敌 1 个团，击溃 2 个团。这次大捷使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 3 县全境，吉安、安福各县各一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北部，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但这时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 20 岁的巡视员杜修经和杨开明来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只留 200 条枪，会同赤卫队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要毛泽东随军出发，省委决定派杨开明为特委书记。毛泽东不同意省委的意见，他说：“目前不宜分兵湘南。”杜修经坚持说：“这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的决定也可以讨论。”于是，毛泽东在 6 月 30 日主持召开了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上，他对湖南省委的主张力持异议，提出 6 条理由：第一，边界党委主张建立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红四军不宜轻率转战千里，远征湘南。

第二，在敌情方面，湘敌实力雄厚，不似赣敌易攻。对湘敌正面硬攻，正好落入敌人重围，恐要招致全军覆灭。

第三，宁冈为我军大本营，路通两省，山势险要，加上各县党和群众基础牢固，可以与敌人作长期斗争，此刻轻易脱离宁冈，必然会“虎落平阳被犬欺”，很危险。

第四，现在我们全力加强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

福及吉安西南端挺进，深入土地革命，创建地方武装，颇有胜利把握。毛泽东打比喻说，军队不做艰苦的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没有地方立住脚跟，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大风一来，就吹走了。到处流动，到处找食的思想，是流寇思想。

第五，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要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湘赣边界才有办法可想。

第六，部队伤兵增加到 500 人，对往湘南不利。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也有少数人附和杜修经的意见，讲井冈山太穷了，养不了部队，到湘南去可以扩大革命影响。两种意见互不相让，甚至闹到有人拍了桌子。会议最后进行表决，作出红军留在井冈山的决定。

毛泽东代表特委、红四军军委给省委写了报告，说明联席会议不去湘南的决议。

联席会议的决议规定不向下传达，但是少数人却把它传达下去了。由湘南宜章农民组成的红四军第 29 团，听到省委有“立即向湘南发展”的指示后，由于小农的浓厚家乡观念，由于不习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强烈要求返回湘南。有人又在他们中间煽风点火，29 团党代表龚楚对各营党代表说，要各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在部队中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

此时，28 团、29 团开往宁冈打击进犯之敌，当发现敌人已经逃跑时，29 团领导建议追击进入酃县之敌，结果部队开进湖南，坚持去湘南的呼声更高。29 团士兵再次群集要回湘南，有的甚至说，官长如不允许，他们就留下枪自己回去。

军委书记陈毅为制止部队的错误动向，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试图整顿纪律。出席会议的有 100 多人，除连以上干部外，还有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不料整顿纪律问题没有得到研究，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便振振有词地提出回湘南的主张。

龚楚听了便道：“这个小同志说得很好！”龚楚建议举手表决，话犹未了，一下举起 80 多只手。

陈毅提出先报告特委和毛泽东再作决定。杜修经自告奋勇回宁冈茅坪向毛泽东和特委报告。龚楚对他说：“你去吧，我们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杜修经赶回茅坪时，毛泽东已去永新，他向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情况，杨开明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

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29 团、28 团和军部便向湘南开进，行军一天多，忽接毛泽东派江华送来的亲笔信，断然要求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历述不能贸然开赴湘南的理由。

杜修经、朱德、陈毅接到毛泽东的鸡毛信，立即停止部队行动。杜修经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毛泽东的信。杜修经说：“事已至此，只能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万一不利，再向井冈山靠拢也不难。”多数人同意杜的意见。

红军向郴州范石生部发起突然袭击，范部驻郴州的 1 个团正在出操，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郴州。

在井冈山熬了两三个月艰苦生活的红军官兵进了郴州城，面对范石生部的大批物资、银元、不少人仰止不住、认为这不是群众的东西，而是敌人的东西。28 团班长杨得志在军用仓库门口站岗，却挡不住抢仓库的官兵。

不少官兵自由散漫地上街吃喝、购物、理发、洗澡。

范石生部驻城北 10 余里有 4 个团兵力，大举反攻。朱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城转移。范石生部夺回郴州并不追击。但红军 29 团撤出郴州后，多数营、连、排拒不执行军部和团部转移资兴的命令，他们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奔跑。

只有副营长肖克率领的 1 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随军部和 28 团撤退。

军部得到报告，28 团 2 营营长袁崇全在郴州时按兵不动，有企图叛变的迹象，到布田村后，叛变迹象更多。患病中的陈毅主张将其枪毙，朱德不同意。召开紧急前委会议，决定将袁崇全改任副团长。原来袁崇全已向朱德表示了悔过，朱便派他以营长身份率第 2 营和团直机炮连为先遣部队，去桂东县的沙田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湘粤赣边区方向执行任务。不料，袁崇全率部出发的第一天，还送回报告，接着就断了消息，数日后送信回来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28 团团团长王尔琢得悉袁崇全胁骗的团直机炮连驻扎在思顺圩，亲自带领警卫排去追寻。机炮连就应声回归了，王尔琢却在追劝袁崇全归队时，被袁开枪打死。

朱德痛感“人心难问”。此事向党员大会宣布后，一致声讨袁崇全的反革命罪行，决心革命到底，并要求派部队把袁追回。

陈毅、朱德深感领导不力，在沙田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何长工主持，朱德、陈毅作了自我批评，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尖锐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要求将朱德、陈毅撤职查办。但多数人的意见是分别给予朱德、陈毅以“留党查看 3 个月”的处分。会议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是时，毛泽东只带领 32 团 1 个营住在永新。江西敌人拼凑了 11 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

毛泽东决定把赤卫队、暴动队动员起来，发动群众，保住永新，他动员了几万地方武装投入战斗，同敌苦斗了一个月，敌人见没有打胜仗的希望，便撤退了。永新保住了，但宁冈、莲花等县却落入敌人手中。

林彪率领 28 团 1 营占领桂东。几天后，毛泽东率 32 团 1 个营到桂东，迎接朱德、陈毅及其部队回井冈山。8 月 23 日，朱德、陈毅等赶往桂东同毛泽东会合。

这次开往湘南的行动，使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均受到很大损失，因而称为“八月失败”。

8 月 30 日，湘敌吴尚部、赣敌王均部等 4 个团，以 10 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向井冈山黄洋界发动攻击。不料毛泽东对井冈山早有布防，井冈山军民凭险抵抗，激战一昼夜，次日从茨坪调来一门迫击炮增援，两发皆命中，终于击溃敌军，保卫了井冈山。

坪，毛泽东有诗为证：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边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敌人的“会剿”。

1928 年 11 月 2 日，红四军接到中共中央 6 月 4 日来信，便召集特委、军委和地方党负责人参加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指定

朱德为军委书记，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前委当即成立，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为前委委员，谭震林为特委书记。陈毅为前委秘书长，后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工作。

毛泽东总结了作战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这些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带领的湖南平江起义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受到毛泽东、朱德、陈毅及红四军的欢迎。次日，红四军、红五军在宁冈新城召开了会师庆祝大会。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年龄相当，是湖南湘潭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的农庭，自幼性格倔强，脾气暴躁，6岁时母亲病逝，失去母爱。后因在私塾里和老师对打，而被后母赶出了家门，婶母收养了他。不久他因踢翻了祖母的鸦片烟盘，祖母决定溺死他，父亲没有反对。当执行祖母决定时，舅父出来保护他。他得救后不得不离开家去当放牛娃，这时他才9岁。后来他去做矿工，尔后在鞋匠那里学徒，到烧碱矿做工，最后去修水渠。

彭德怀16岁时回到舅父那里。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他支持和帮助穷人去抢一个富豪家的粮食，事发后出逃去当兵，18岁就升为排长。

他在军队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去长沙刺杀督军，在街上扔出一颗炸弹，但没爆炸。

随后，他在程潜军队里当了谍报员，在长沙执行任务时被叛徒出卖，被张敬尧部逮捕。

在狱中被严刑拷打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招供。

彭德怀出狱后被派往湖南军校学习，以后又转往南昌军校学习，毕业后任营长，至1927年升至旅长。他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

彭德怀自1926年起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次年加入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办马克思主义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

湘军何键从1927年开始大举清洗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屠杀了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工农群众。彭德怀因极孚众望，何不敢贸然下手。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部队举行了平江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五军，以后改为红五军。毛泽东初次见到彭德怀时，就拍着他的肩头说：“了不起，真正了不起！贺龙是条龙，你彭德怀也是一条龙呀！”彭德怀激动地说：“龙没有大海就活不了！”朱德接过话来说：“现在龙归大海啦！”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集中了未来新中国的5名元帅，即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罗荣桓。

井冈山虽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毕竟是弹丸之地，红五军来到井冈山后，部队增加了700多人，对这个人口不满2000，产谷不满万担的山区来说，负担太重了。而国民党对井冈山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经济困难日趋严重。鉴于这种情况，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委、红五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的32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于1929年1月14日向赣南出击，实行外线机动作战。赣南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比较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连接，回旋余地宽广，且共产党在那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反动驻军力量薄弱，战斗力不强；交通不便，敌军往来

聚集困难，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

红四军在阴雨连绵的天气下，在偏僻的山区行军，宿营、侦察都很困难。红四军在大余县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红军突围出去。但这一仗，31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28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部队向广东南雄县方向撤退。部队在重新进入赣南时，又遇敌情，部队仓促奔走，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混乱中不幸牺牲。

2月初，红军到了赣南寻乌县的圳下，敌军刘士毅旅1个团在拂晓时分包围圳下，红军失利，朱德的爱人伍若兰被敌人俘去杀害，许多指战员牺牲了。

陈毅匆忙披上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着大衣，陈毅即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那个敌人的脑袋，陈快跑脱身。

朱德离开住房时，敌军已近在眼前。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摘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在敌我交错中夺路撤退。毛泽东经常夜间工作，晚睡晚起，他尚未起床，便被枪声惊醒，敌军先头分队已越过他的住房，他当即随警卫员乘昏暗向村外转移。红军部队突围出去。

红四军在罗幅嶂休整一天，朱德、毛泽东、陈毅等决定将红四军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林彪为纵队长，陈毅为党代表；三纵队由31团编成，伍中豪为纵队长，蔡协民为党代表。多数干部要求两个纵队分兵活动，毛泽东不同意，认为分兵活动，容易被敌人个个击破，他对分兵活动的意见压下不予讨论，对因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也置之不理。

2月11日，红军在赣南瑞金北大柏地设下埋伏，一举歼灭紧紧追随之来的刘士毅旅大部，活捉了800余名敌军，缴获800余枝枪，扭转了被动局面。毛泽东没有同意分兵，才取得此次胜利。战前，毛泽东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批准可以动用群众的粮食，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群众将信将疑。后红军再次路过，果然按借条归还。

红军挥师北上，陈毅、林彪率一纵队取道兴国向东固进发。行至葛坳，遭众多敌军截击。林彪指挥果断，迅速突围，得以脱离，抵达东固地区。红军在东固同李文林、段起凤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全军3000余人，从一纵、三纵中抽调人员，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为纵队长，彭祐为党代表。

此时，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红五军编成的30团、32团已突围，向赣南进军。朱德、毛泽东和前委决定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即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朱德、毛泽东利用闽西敌军兵力空虚之时机，向闽西急进。3月14日，在长岭寨歼福建省防军郭凤鸣旅，歼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郭凤鸣被击毙。红军乘胜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城，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给养。

此时得知红五军已到达赣南，前委作出决定：红四军回师赣南，同红五军会合，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公开建立苏维埃割据区，同湘赣边界割据区相连接。

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同红五军会合，随后在于都、兴国、宁都一带，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接着又回到闽西，3次攻克龙岩，歼灭了陈国辉的1个旅，在龙岩、上杭、永定和长汀等地建立了闽西根据地，发展了地方革命武装。

但就在这时，红四军党内和领导之间，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主要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红军的生活比井冈山时好多了，但国民党军部队的俘虏兵参加了红军，他们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旧军队的旧作风，红军的另一些成员来自农民，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点和习惯需要一个过程。中共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习过军事，有较好的军事理论修养。他一到红四军便受到推崇，担任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红军的历史和斗争情况，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这就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的问题的争论。

6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观点的那一套，要限制前委的权力，并要正式设立军委，坚持要“分权”。这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工作。6月8日，在闽西长汀的白沙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议，以多数票作出决定撤消临时军委。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但争论并没因此结束，有些方面反而更趋激烈。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在闽西龙岩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主持人是陈毅。

会上，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对这些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主张，未被大会接受，他处于孤立的地位。在改选前委时，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选为前委委员。前委又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让他暂时离开军队工作到闽西养病和指导地方的工作。

7月8日，毛泽东偕妻子贺子珍以及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

朱德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全，调了1个连的士兵担任毛泽东的警卫。

## 第十二章 诱敌深入

红四军前委向中央上报了“七大”决议案及其文件；毛泽东也给中央写了几封重要信件。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负责任绝不是家长制，主张事事都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是极端民主化。中央要求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汇报情况。

陈毅便经上杭、龙岩、厦门、香港赴上海。朱德代理前委书记。陈毅在上海很快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接上头。李立三同陈毅曾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一同被押送回国，他听了老同学关于红四军“七大”的情况汇报，

表示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求陈毅尽快写 5 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德、毛泽东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8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举行秘密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后，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 3 人组成委员会，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文件，交政治局通过。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多次交谈和讨论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政治局于 9 月 28 日讨论通过了《指示信》，陈毅便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

陈毅于 10 月中旬回到红四军，立即同朱德见面，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他毛泽东养病尚未回来。10 月初，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彭祐、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毛回信说不能回来，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这些话对陈毅震动很大。陈毅在上海期间，在同周恩来、李立三的交谈中，已认识到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他主观愿望虽然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的主张，实际上是压抑了正确主张。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因此，陈毅说：“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陈毅详尽地向朱德介绍了党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的指示信。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指示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到达汀州。毛泽东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我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毛泽东同陈毅的感情已经和好如初。毛泽东开始作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倾听战士们的意见，从一个部队到另一个部队，召开战士座谈会，分批会见红四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还走访了一些农村，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文件。12 月下旬，红四军在闽西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这里把主观主义同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错误思想一并提出，加以分析和纠正。指出这些错误思想

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罗荣桓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会后，红六军成立，黄公略为军长，陈毅为政委。

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东固的陂头村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称为“二七会议”），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4、5、6军共同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陈毅、邓子恢、滕代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潘心源、刘士奇、谭震林、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二七”会议后，又成立了红十二军，伍中豪为军长，邓子恢为政委。

1930年3—8月，在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到李立三肩上，李立三便在全国推行了他的暴动计划和“左”倾理论。

是时，中国共产党仍处在幼年时期，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又干涉过多。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由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布哈林在报告中责备了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六大”选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和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由于过分强调领导层的工人成份，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被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能胜任，无法起决策作用，党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周恩来担任。由于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很快被撤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职务，苏兆征于1929年2月病逝，李立三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1929年8月下旬，不幸的事件发生：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周恩来接任了中央军事部长。他为了准确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情报，要求陈赓负责，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务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共产党在早些时候已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提供了不少情报。1929年末，又派遣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去莫斯科，是因为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共产国际在1929年初夏派了1个德国人和1个波兰人到中国来，组成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开会，会前或会后都要由向忠



发、周恩来、李立三同他们商议。是时，蒋桂战争后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动了左、右江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远东局指责中共中央“勾结军阀”。在富农政策问题、游击战问题上，双方发生争论。远东局主张一定要把反富农问题写上党纲，又认为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周恩来等不同意这些意见。远东局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便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即：一是富农问题，二是“勾结”俞作柏问题，三是在赤色工会问题上动摇。这对中共中央震动很大，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同远东局讨论这些问题，连续开了两天会议，不但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谈得很僵。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去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的意见。

周恩来一走，向忠发便依靠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李立三又因周恩来离国，代表周参加组织局的工作，这样，李立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人物。

李立三本有“左”倾急性病，他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的长篇报告，说：“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随后，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此时还抛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全国总暴动计划。

在这一计划下，红军的编制一再扩大。

朱德、毛泽东的部队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总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下设第一、三军团，每个军团下辖3个军：

第一军团	总指挥	朱德	政委	毛泽东
	参谋长	朱云卿	政治部主任	杨岳彬
红三军	军长	黄公略	政委	蔡会文
	参谋长	周子昆		
红四军	军长	林彪	政委	彭清泉（后为罗荣桓）
	参谋长	陈奇涵	政治部主任	李涛
红十二军	军长	罗炳辉	政委	谭震林
	参谋长	林野	政治部主任	谭政
红二十二军	军长	陈毅	政委	邱达三
第三军团	总指挥	彭德怀	政委	滕代远
	参谋长	邓萍	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
红五军	军长	彭德怀	政委	张纯清
	政治部主任	吴溉之	>>	
红八军	军长	何长工（前为李灿）	政委	邓乾元
	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		
红十六军	军长	孙荷宠	政委	黄志敬
	政治部主任	吴天翼		

贺龙、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派遣，在湘西发动起义，建立了红四军，

并建立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除留一部坚持湘鄂边斗争外，主力去鄂西同孙德清、旷继勋、周逸群的红六军会合成立红二军团，下辖2个军：

第二军团	总指挥	贺龙	政委	周逸群
	参谋长	孙德清	政治部主任	柳克明
红二军	军长	贺龙	政委	朱勉之
红六军	军长	旷继勋	政委	段德昌

在鄂豫皖边区，原由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人建立的中国工农革命第七军，于1928年7月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潘忠汝、吴光浩先后牺牲。1930年3月，红十一军根据中央指示，改编为红一军：

红一军	军长	许继慎	政委	曹大骏
	副军长	徐向前	政治部主任	熊受暄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在闽浙赣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在1930年7月成立红十军：

红十军	军长	周建屏	政委	邵式平
-----	----	-----	----	-----

方志敏为中共赣东北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派张云逸、邓小平、叶季壮、袁任远、贺昌等去广西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9、10月间，俞作榆、李明瑞反对蒋介石，李明瑞师主力进攻广东陈济棠，不久失败。

俞、李转靠共产党，其军队警备四大队由张云逸率领开赴右江，李明瑞、俞作榆率领警备五大队开往左江。是年12月11日，张云逸、邓小平以警备四大队和教导队一部为主力，在右江百色发动起义，成立红七军。

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书记。1929年2月，李明瑞、俞作榆在龙州以警备五大队为主力，举行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榆任军长，何世昌为政治部主任，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何昆、李超时等在苏北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红十四军：

红十四军	军长	何昆	政委	李超时
	参谋长	薛衡竞		

此外，在广东的东江地区建立了红十一军，海南地区成立了红军琼崖独立师；刘志丹、谢子长也在陕甘地区建立了革命武装。

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命令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在1930年6月攻打南昌、九江，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红三军团于7月27日乘敌军防守空虚的机会，攻克了长沙。但因敌众我寡，不久便退出长沙。

朱德、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长沙出发，7月20日到达永丰，尔后攻克樟树，西渡赣江。一路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根据敌我实际力量对比，改变原有部署，不去执行立三路线，决定不攻打南昌，而是率领部队向湖南浏阳挺进，接应从长沙撤出来的红三军团。

敌军戴斗垣独立旅妄图阻挡红一军团前进，血洗浏阳、萍乡、宜春、万载等县广大革命根据地，开进了文家市。朱德、毛泽东率领1军团星夜兼程，经奉新，来到万载县的黄茅，准备歼灭戴部。

毛泽东、朱德一到驻地，便在地图前研究战术，布置红军攻打文家市。

文家市东西两面是山，整个镇子成长形狭带。戴斗垣旅的3个团和1个营以及当地地主武装，共4000余人把守文家市。

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军团兵分 3 路围攻文家市，凌晨 4 时，红军发起总攻，红军两个排先后两次冲锋，都被敌人的重机枪压下来。

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组织突击队，集中短枪、手榴弹，匍匐前进，夺取敌人机枪。

80 名短枪队员在火力掩护下，迅速夺取了敌人的重机枪，控制了制高点，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冲进了文家市，很快结束了战斗，全歼敌军，缴获轻重机枪、步枪、短枪 2000 余枝，敌旅长戴斗垣自杀毙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命令红一方面军攻取长沙。但猛攻不克，围攻月余未下，红军处于失利地位。

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说服军内干部和中央代表，撤退了围攻长沙的部队，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

8 月下旬，周恩来和翟秋白先后从苏联回到上海，帮助李立三纠正错误。

9 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补选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候补委员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谭秋、恽代英等。新的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翟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几天后，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 3 人组成中央常委；并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苏区，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等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派项英先去，并暂时代理书记职务。

在项英未到之前，暂以毛泽东代书记。红一方面军的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于中央局。

蒋介石于 1930 年 8 月，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剿匪”总指挥部，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钰为督办；在湘鄂西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 3 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0 月 23 日，蒋介石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主持召开湘鄂赣 3 省“会剿”会议。

12 月 9 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划第一次“围剿计划”。

他调动朱绍良的第六路军、鲁涤平的第九路军、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以及航空队，重点进攻赣闽中央根据地。这 3 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张辉瓒之第 18 师、谭道源之第 50 师、罗林之第 77 师、公秉藩之第 28 师，负“围歼”之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

第六、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入赣“协剿”。

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因而低估了红军的力量，没等蒋光鼐部的后继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

进犯。蒋指定 12 月 16 日为进攻日期。他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

毛泽东、朱德胸有成竹，分析敌情，持重待机，将 4 万红军分布在宁都、黄陂、小布地区，并在源头地区设下埋伏，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并和一方面军总机关几次从小布到源头撤来撤去，诱惑敌人钻进来，给他们以歼灭性打击。

蒋军不知朱德、毛泽东“诱敌深入”之计，以为红军必坚守死抗。蒋军公秉藩师于 12 月 20 日猛扑东固，东固却寂然无声，红军早不在了，公秉藩却通电告捷，说已击溃红军，杀俘多少，云云。蒋介石得电，即来电嘉奖。

次日，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部逼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为公师为红军，即行强攻；公部以为张部为红军，疑中伏击，亦还击固守，双方激战 4 个小时，死伤甚重，是时大雾已散，始知误会，但公秉藩认为张辉瓒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指挥。

张辉瓒亦负气不再与公联络，留下 1 个旅守东固，自己率两个旅向龙岗冒进，对发生的事，越想越气，大骂岂有此理。张部到达龙岗，见四野寂然，不似有敌情的样子，于是判断红军最近也要在 50 公里以外，便极松懈。次日又东行，1 旅在前，刚行五六里，山上突起一枪，红军主力四面杀来，成聚歼之势。张辉瓒所率 1 旅及师直属部队毫无反应。

红军迂回直取龙岗，张辉瓒部如痴如呆，未来得及进入阵地即被全歼。张辉瓒被活捉。

这一仗俘敌 9000 余人。

### 第十三章 风烟滚滚

蒋介石在南京听说张辉瓒被红军枪毙的消息，心情沉重，执笔写了 8 个字：“呜呼石候（张的别号），魂兮归来！”鲁涤平知张辉瓒兵败，即电令进攻的各部队靠拢，免再被红军各个击破。谭道源部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由于红军坚壁清野，一个向导也找不到。谭道源骑在马上发出感慨：“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朱德、毛泽东将红军调过头来，打谭道源师。

谭道源在源头停顿未动，后奉命于 12 月 31 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被红军追及，打了两个小时，被红军歼灭殆尽。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英勇作风，星夜兼程，乘胜追击，于 1931 年 1 月 3 日，在东韶追上谭道源师，双方激战，谭师为气馁疲劳之师，慌慌忙忙应战，师部完全处于红军火力之下，指挥系统陷于混乱，打了几个小时，谭师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打仗经验丰富，临危督阵，枪杀退兵多人，无奈兵败如山倒，只有单骑落荒逃遁。

谭逃后发电给蒋介石：“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号称 8 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死伤之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蒋介石复电：“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甚惋惜，尚善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愆于前而

愆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砺石也。”蒋介石为挽败局，电令前线各部，迅速向龙岗攻击，急进求战，不允后退。指示鲁涤平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德、毛泽东，前方情形，中正不能遥控，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鲁涤平见大势已去，以电告蒋说“龙冈一役，18师片甲不还”，请求撤军。

蒋介石勃然大怒，电呵斥：“18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惶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不久，蒋介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

红军在5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彻底粉碎了蒋军的第一次大“围剿”。但是，毛泽东预料到蒋介石决不会甘心失败，还会调动更多的军队进行第二次“围剿”，于是便赋诗一首：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2月，蒋介石令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投入的部队有朱绍良第六路军的5个师、鲁涤平的第九路军的2个师、蒋光鼐第十九路军的3个师、王金钰第五路军的5个师、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的2个师，以及4个直属师、3个直属旅和3个队的空军，兵力达20万人。

蒋介石分别找新入战的王金钰、孙连仲谈话。他对王金钰说：“这次打得好，让你做江西省主席。”蒋又对孙连仲说：“这次打得好，让你做江西省主席。”蒋介石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部队，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凡服从命令奋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先补充；凡进攻不力，徘徊观望，贻误戎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

蒋军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700里，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分兵合击”之战术。

4月1日，何应钦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

毛泽东分析了敌情，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势力比较弱的王金钰第五路军，然后各个击败敌人，横扫敌军700里”的战略。但有人提出把红军主力分散转移，到根据地外围去打游击战的所谓“分兵退敌”的战术。经过激烈争论，前委通过了毛泽东的决策。

王金钰第五路军分3路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和左路配合，小心向前，走一步，看一步，深沟高垒，步步为营，到达东固，部队将士叫苦连天，又胆战心惊，对红军谈虎色变。

公秉藩汇报说：“入匪区1月有半，匪军坚壁清野，所过之处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没有坛坛罐罐，匪共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每进一步，唯有小心。”朱德、毛泽东决定先攻打王金钰部。红军须穿过蔡廷锴和郭华宗两敌部队之间50里的空地。整个战役红军要长途跋涉数百里山路，行军神速，隐蔽严密，十分艰难，但红军在这些区域内已建了红色政权，发动了数十万群众，组织了赤卫队，这是战胜敌人的有利

条件。

红军主力由龙冈开至东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到东固与富田之间山上察看了地形，决定1军团3、4两个军在东固西北的九寸岭和观音岩一带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3军团绕到敌右侧，在一边背水一边背敌的阵地上投入战斗。

毛泽东问彭德怀：“把3军团布在那里有无危险？”彭回道：“无危险，敌人意料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5月16日，红一军团歼灭了王金钰的中路军47师。进到东固的公秉藩师立足未稳，突然枪声大作，红三军团如从天而降，红旗遍地，呐喊震天。公秉藩师大乱，急急呼救，红军逼近师部，公秉藩欲突围，见红军人众，突围不得，便命卫兵将捉来的向导剥下衣服，化装奔逃。

战斗打了不到3个小时，红三军团伏击了公秉藩28师。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电令：“向公秉藩师先发收容费5万元，补充步枪2000枝，着公秉藩速来南京面谈战况。”又电令王金钰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蒋又电令蒋光鼐：“公师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43、48两师尚未加入，故又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应急进，切勿因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雄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等合力进击，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然而，红军乘胜扩大战果。19日，向43、47师猛攻，将两师打得溃不成军，歼灭过半，两师死战，崩溃逃窜。

红军自西向东横扫，进攻东韶之敌，势如破竹。东韶之敌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

孙是蒋介石收编的冯玉祥部队。起初，孙接到攻打红军的命令时，进退两难，他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而战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若不去“剿共”，又无路可走，只好硬着头皮带部队来到江西。不料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孙受宠若惊。蒋不仅让他担任江西省清乡督办，还许诺让他战后当江西省主席。孙感知遇之恩，鼓舞斗志，挥师前进。孙部由宜黄、乐安向南推进，觉得十分得意，对部下说：“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孙部遭受红军截击，孙部依靠修筑在高山上的坚固工事，进行顽固抵抗。

朱德、毛泽东在离前沿阵地只有2里路程的指挥所里，命令红四军第12师从右翼迂回包抄，配合红三军的正面攻击。

孙连仲部抵挡不住，急急败退，损失甚巨，心怀恐惧。

孙连仲退回宜黄，收拾残部，召开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电告何应钦和蒋介石：“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不让红军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撤退途中，失27师之一旅，此系职指挥无方，请予处分。”何应钦驰电嘉勉，说孙连仲处置，顾全大局，是为上策，答应将所有损失，立即补充，蒋介石依样表彰，并慰勉有加，补步枪1000枝，重机关枪20挺。

处在广昌的朱绍良看到第五路、第二十六路军已被红军击破，心怀畏惧，为避被全歼的下场，下令撤退，将主力撤回南丰，仅留1个师守广昌。

5月27日，红军挥师进攻广昌城，守敌大溃，死伤过半，狼狈而逃，师长胡祖玉被打死。

红军马不停蹄，由广昌东进，攻打建宁，将由福建入江西的1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人的残兵败将。

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胜5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枝2万多，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大“围剿”。毛泽东的“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取得了胜利，他赋诗一首：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暴跳如雷：“阎桂冯70万大军我都灭得了，不信灭不了朱德、毛泽东区区3万之众！”他立即着手部署第三次“进剿”。

蒋介石6月13日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并亲任进剿总司令，调遣嫡系部队入赣。

6月20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任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143个团，总兵力30万人，分左、中、右3路并头插进。他召集各将领，分析形势，胸有成竹地说：“此次作战：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攻，尽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续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误时机；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部计划。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7月1日，蒋介石下令进攻。

毛泽东决定采取“透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让敌人深入赣南革命根据地，使其置于无用武之地，尔后红军回师北上，打其虚弱，利用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创造不利于敌人的条件，待机痛击蒋军。

7月红军冒酷暑炎热，从建宁出发，经归化、清流、宁化、石城，瑞金、绕过整个中央苏区的南部。

蒋介石得悉红军运动，判断其向广昌、宁都、石城地区移动，便指令大军扑向该地区，结果扑了个空。蒋大惊，四顾天地，又判断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指令大军狼奔豕突地扑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赴观涛”（此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第一、二路挺进军总指挥）。第三次判断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此处，正有赣水之碍，正好合围，蒋军合围，又扑了个空。

蒋介石发觉红军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之法，令左翼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蒋介石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他传电朱绍良、孙连仲、陈诚说：“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

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慎之。”蒋介石又发表《剿匪宣言》，谓：“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红军来到兴国，各路蒋军纷纷逼近，敌 47 师、54 师进驻富田，这两个师都是北方部队，不适应南方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弱。朱德、毛泽东分析了富田敌人的弱点，决定首先击败富田敌军，然后穿入敌军前沿阵地的后方，将深入根据地的敌军孤立在根据地内，红军与根据地人民武装相配合，实行截敌、阻敌、困敌、扰敌、袭敌、诱敌、毒敌，各个击败蒋军。

7 月 25 日，朱德、毛泽东率红军向富田方向出发，避开敌主力的赴观涛第 6 师和卫立煌第 10 师，悄悄地从其空隙穿出。尔后又从蒋鼎文第 9 师、韩德勤第 52 师和独立旅同蔡廷锴第十九路军之间的空隙，秘密地穿过。

红军在泰和县的沙村，捉住蒋军的两个密探。朱德、毛泽东从密探那里获悉：蒋军的侦察机发现了红军迂回其后的意图，蒋介石即调动陈诚、罗卓英两个主力师，增援富田。红军侦察排获得了同样的情报。

于是，朱德、毛泽东立即命令红军连夜折回，再次穿过敌人之间的 40 里间隙，改向兴国的莲塘，永丰的良村，宁都的黄陂一线，实行中间突破。

8 月 6 日，红军在莲塘击败了敌 47 师。红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8 日凌晨又击败了良村的敌 54 师。

红军来到龙冈附近，敌周浑元第 5 师连夜在龙冈前后山头上加修工事。朱德、毛泽东命黄公略军佯攻龙冈，令大部红军连续 3 天急行军，出其不意地袭击驻黄陂的毛炳文第 8 师。

红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冒雨袭击毛炳文师，歼敌 4 个团，缴获战利品不计其数，占领了黄陂。

蒋介石立即把南线、西线的主力部队调集黄陂，采取密集大包围姿势，猛力向红军进逼。

朱德、毛泽东决定跳出包围圈，命令罗炳辉向小布、宜黄、乐安方向前进，钳制和吸引了敌主力军；令红军主力连夜从旻斋村出发，与转向的敌人主力背道而驰，在敌人的空隙处穿过。

近 3 万红军星夜行军，飞越直插云霄的尖脑岭，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兴国境内的枫边、白石、良村一带隐蔽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反击。

罗炳辉军根据毛泽东的调虎离山计，吸引敌主力追赶半个多月，敌人最后发现红军主力在良村一带，便调头向良村扑来。红军主力离开驻地，进入兴国、赣县、万安、泰和县交界的大山区继续休整，使敌人在良村一带又扑了空。

敌人转来转去，处处扑空，加之根据地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吃不到饭，喝不到净水，赤卫队和游击队又时时扰乱袭击，敌人只好偃旗息鼓，偷偷退却。

当朱德、毛泽东得知驻扎在兴国城内的蒋鼎文第 9 师和独立旅，以及韩德勤第 52 师企图逃往吉安，立即命令红军出山。经过 1 天加半夜的强行



军，赶到老营盘、高兴圩一带，埋伏起来等待敌人。

不料，敌军刚走过两个营，一位红军战士枪走了火，被惊慌的敌人即缩回兴国城去。

埋伏在老营盘的红三军团，歼灭了蒋鼎文的 1 个旅。

战斗刚刚结束，得到情报说，敌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正往吉安撤退，敌军退到高兴圩时，朱德、毛泽东命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红军主力开火，这一仗歼灭了敌军 1 个师的兵力。

朱德、毛泽东又率红军转移到泰和、万安、赣县、兴国交界地带休整，并补充弹药。

是时，红军老交通送来了情报：兴国城的蒋军企图改变路线，走崇贤、东固、富田逃往吉安。朱德、毛泽东连夜召集红一方面军总部会议，下令追歼从兴国城逃出之敌。

红军部队跑步前进，在石岭围歼了韩德勤第 52 师。韩德勤被俘后未被识出，他化装成伙夫逃跑了。这一仗缴获上千匹骡马和很多枪枝弹药。

毛泽东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 16 字游击运动战原则指挥红军作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大胜利。9 月 16 日，红军在兴国龙冈的水头庄召开了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

## 第十四章 夜罩柳条湖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逐一战胜对手后，他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便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想当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了。不料，胡汉民起而反对，见人大发牢骚，说：“我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胡汉民曾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宝座；在蒋桂战争中，助蒋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助蒋打败了冯玉祥，又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中，助蒋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他早上 4 点半起身，晚上 11 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尽其力去料理。他原想让蒋介石在外带兵打仗，胜利后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自己。而蒋介石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事也要蒋点头。胡汉民在 1930 年 11 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与蒋之亲信吴稚晖等发生激烈争吵。那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山先生的战友与助手，只有汪精卫等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蒋介石的资历比不上他显赫。

1931 年 1 月 20 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他派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亲自挑出特务分子，以中央党部代表的身份到各地去监督代表的选举。可陈氏兄弟给蒋介石带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除蒋系直接控制的浙、苏、皖、沪以外，绝大多数的选票都将不会投给蒋介石，这就意味着如果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进行总统选举的话，那么，蒋介石只能得到 32% 左右的选票，而 68% 的选票都将属于胡汉民。这下急坏了蒋介石。他一恼之下，恣意孤行，以宴请议事为名，于 1931 年 2 月 28 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通过国民政府文官古应芬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孙科反蒋。

孙科即派医官邓真德以替胡看病为名，询问下一步应怎么办，胡要孙科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甚至不惜与汪精卫派合作，以此救他。

蒋介石发觉各方对扣胡反感很大，恐政治上起变化，便急忙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又极力拉拢孙科。请孙吃饭时，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夹菜，并以亲戚的口吻说：“我们是自己人，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你多多帮助，不可见外。”蒋介石又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四老”拉孙。孙科一下子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

胡被扣，在国内引起大哗，激起了又一次反蒋联盟的形成。拥胡的陈济棠在广东便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反蒋联盟的盟主。他于4月22日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释嫌修好，联合反蒋之意。处在上顾无望、艰难踟蹰中的李宗仁得此佳音，直觉峰回路转，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间粤、桂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而合作。李宗仁即派人去广州，洽商两广合作具体事项。

4月3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发出拥护4监委电，并宣布欢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来粤共筹团结反蒋大计。5月11日，李宗仁在广西率桂籍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内中除历数蒋之罪状外，还有对以往反蒋失败的痛省，以及此后与反蒋各派“精诚合作”的决心。唐生智等通电响应。

锣鼓一响，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等于5月18日抵穗，就组织反蒋政府和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与陈济棠等会商。几天后，李宗仁也赴广州，共策大计。又有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州，并由他们邀请在香港的汪精卫来粤参加。

5月27日，齐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上通过宣言，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来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公布了组织大纲，次日广州民国政府成立，汪精卫被推为首任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通电，限蒋于48小时内即行引退。

广州开府后，陈济棠与李宗仁相商，将两广军政人事重新作了调整。军事上，两广军队一律取消原来称号，改编为第一、四两个集团军（第二、三集团军乃留以备阎、冯参加者），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第一、四集团军总司令。陈部下辖3个军，分别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为军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则以白崇禧为副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兼第4军军长、廖磊为第7军军长，夏威为第15军军长。政府方面，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济棠兼，后由国府改委林云陔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由李宗仁建议，由黄旭初担任。由是，两广合作反蒋局面正式形成。

蒋介石因非法扣留胡汉民，国内外舆论对他不利，加上蒋在江西“剿共”也一再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若再对西南用兵，恐旷日持久，更加被动，故蒋在种种因素制约下，不敢过分造次。蒋对西南，内定的方针是“和平统一”、“设法疏通，以固国本”，即采取“冷处理”办法，期望粤桂方面内部分化瓦解，不攻自破。

广州非常会议外表看来热热闹闹，声势颇大，实际上来粤入盟的人是

三教九流，各有所图，根本形不成团结的力量。盟主陈济棠野心大，心胸小，一心想借非常会议，逞其“南天王”的私图，在人事上任用亲信，财政上一毛不拔，军事上虚张声势，他为融洽粤、桂感情，提出与李宗仁换帖。李宗仁深知陈之为为人，但又不得不回了帖。

李宗仁为了帮助陈济棠撑住广州国民政府的招牌，将广西一应事务交由白崇禧掌管，自己则以国府委员和参军处参军名义居留广州，然而陈济棠过于私心自用，多疑善变，对李等并不推心置腹，反蒋又三心二意，这使李宗仁颇感不悦。

两个月后，广州政府讨论对南京行动计划，分歧意见显见，分成主和主战两派，陈济棠、古应芬为主和派，汪精卫、李宗仁则为主战派，两派大开辩论，因主和派势力较大，气走了汪精卫。汪精卫气走香港后，陈济棠、古应芬曾试图与蒋通款，并由广州国民政办发出通电，谓“蒋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断不加以一兵”。但蒋并不领情。蒋在江西“剿共”时，企图驱共入粤，以冀收渔人之利。陈、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转过头来再谋与汪、李等主战派调整关系。李宗仁见陈态度有所转变，乃出面劝汪返穗，并由汪向陈提出“联合行动，出兵北伐，为桂军补充军饷”诸条件，陈济棠为维持广东局面，一一接受。陈四处购买飞机，配置军火，建造军用机场，摆出一副与桂军齐心协力，北上讨蒋的咄咄逼人架势。

即然两广摆开架势，蒋介石也赶紧调兵遣将，正当宁、粤双方醉心于互相攻讦，不惜一战时，东北响起了“九·一八”日本入侵的炮声。

日本陆军最高军事决策和军令统辖机关参谋部，于1931年6月初派出以中村震太郎大尉为首的几名军事间谍，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

中村震太郎一行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作了一番侦察，对经过地区的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笔载很详。他们在回国途中的兴安区余公府附近，被东北军驻防屯垦军第3团所查悉逮捕，按照国际法，将中村震太郎等4人处死。

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很快为日方所侦悉。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武装入侵的绝好机会。8月17日，他们隐瞒中村等人的军事间谍罪行，歪曲中村被杀情况，遂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肇事官兵，否则将诉诸武力。

中国政府采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办法，逮捕了屯垦军第3团团团长关玉衡。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哪肯就此善罢干休。9月，沈阳城的日本人活跃起来，开始动员在乡军人重新入伍，并从朝鲜和日本内地向沈阳调兵遣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迁往沈阳。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当上了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北平安营下寨。正当他“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时，1931年7月又爆发了石友三反张的战争。

石友三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他在中原大战中通电拥护张学良，被张学良任命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他亲自跑去晋谒张学良，还清张给他委派总指挥部的秘书长和副官长，双方关系十分友好。

但石友三部驻防平汉铁路新乡至顺德一带后，陆续扣留了平汉铁路的客、货列车车皮数百辆，机车近20台，组织了运输司令部，在石家庄到新乡之间行驶。蒋介石大怒，电示张学良催促石迅速交还所扣之机车和车皮。

张学良密电蒋，代石敷衍，同时让石赴北平商谈，劝石交还一部分车皮，以便为其开脱。事毕，石友三向张学良辞行，张善意挽留石多住几天，以待和蒋交涉的结果，但此时谣传蒋曾密电张学良扣押石。石一贯猜疑成性，误认为张名为挽留，实为扣押，乃为受蒋之命而耍手段，从此怒火中烧，对张仇恨在心。

石友三返回后，积极备战，多次写信向冯玉祥请教，同时派亲信到山西同晋军将领孙楚，以及原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韩复榘、李鸣钟等人联系。

冯玉祥即派唐悦良为代表去广州，同广州非常会议联络反蒋。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冯玉祥的意见，任命石友三为广东国民政府委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汇款 50 万元作为石部军饷，要求石在北方发动反张倒蒋战争。石友三一接受。

冯玉祥认为蒋介石此时无暇北顾，应以速战速决的战术先打败张学良，然后同粤方夹攻蒋军。于是，他亲自给旧部将领写信，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出兵打张学良，又与晋军多次联络，敦请一致行动。冯的军事部署是：

(1) 石友三部为进攻主力，从平汉线北攻石家庄，然后以大部兵力向保定、北平进攻，并分兵协同友军攻取天津。

(2) 晋军由张家口及北平迤西，保定迤北出兵援助。(3) 韩复榘部由山东沿津浦铁路北进，攻取沧州、马厂，然后与石友三和晋军会师天津和北平。

(4) 吉鸿昌、张印湘、葛运隆等部，连同河南民军，由信阳沿平汉铁路北上，袭取郑、汴，东进徐州，解除韩复榘的后顾之忧。

(5) 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孙殿英、阮玄武等部由垣曲、晋城等地向东进发，陈兵于平汉铁路黄河北岸一带。

以上各军总兵力约有 30 万人以上，若能齐心协力，确实能将张学良打垮。

实现这个计划，关键取决于晋军的态度，冯玉祥为此除派人劝说外，自己又多次函电敦请。

逗留在大连的阎锡山颇有反张愿望，他勾结日军，秘密商定由日军进攻东北，抄张后路，共同打击张学良的行动计划。

冯玉祥于 7 月对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张印湘、葛运隆、孙殿英、阮玄武、张允荣、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等旧部的兵力作了妥善安排和适当调整，加强了领导。

然而，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的威信下降，旧部将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各有各的打算，不像以前那样顺从地听从指挥，而是观望不前。

石友三野心勃勃，急不可待，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目前反蒋派都无力与张学良、蒋介石较量。他和韩复榘关系深厚，又有默契，若能趁蒋介石无暇北顾之时，先报了张学良想“扣押”他这一箭之仇，把张赶出关外，再将华北连成一片，统兵南下，他石友三便是北方领袖了。于是不顾一切，不等冯玉祥将各方运动成熟，于 7 月 20 日在顺德誓师，并公开发表了反对张学良的通电，然后即沿平汉铁路线北进，23 日就进占了石家庄，26 日已到达保定以南的望都一带，这才遇到东北军所布防线的阻挡。

石友三首先发动，各军却都是口头响应，根本没有一人出兵助战。宋哲元的 29 军刚刚接受蒋介石改编，军饷刚有着落，虽是冯的嫡系部队，但

却按兵不动。宋和庞炳勋都有联晋反蒋的愿望，却害怕与石友三联合共事，更不愿出兵援助石友三。

冯玉祥急如星火，几次派人催促。7月23日，他亲自致电宋哲元，希望宋认清反张倒蒋的大好形势，并能将冯的意见向庞炳勋、孙殿英、张人杰、鲍刚等同志恳切而言。因宋的态度，可直接影响庞、孙、张、鲍等部，关系至大。冯电文中尤望宋对庞弟等披肝沥胆，痛言利害，捐除一切成见，助石反张倒蒋，共同完成这桩当仁不让之伟业！

庞炳勋主要是对石友三、韩复榘反复无常，几次叛变冯而投降蒋介石的行径不满，直接向冯玉祥表示不愿出兵援助，冯急得坐卧不宁，又急电庞，进一步劝解。庞因与石矛盾难解，终未出兵。

冯玉祥打电报给主持晋军军务的徐永昌，鼓动他出兵助石反张倒蒋：“务请我弟排除目前之困难，决定即时发动。”电报发出后，冯又派张允荣等前往太原面见徐永昌，请他下令出兵援石。

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0万人，中原大战时调进关内约7万人。石友三发动战事，张学良又将7万人的兵力调入关内。7月23日，张学良通电讨伐石友三。同一天，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通电：“石逆叛变，实受粤中叛徒50万元之收买。”次日，蒋介石任命刘峙为中央军的南路军总司令官，调集10万大军，由河南沿平汉铁路跟踪石友三北进，使石首尾难顾。

蒋介石为迅速解决石友三部，仍以利禄为诱饵，分化瓦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对冯的旧部和晋军将领极力拉拢、收买，极力分化反蒋联军。

徐永昌等晋军将领听到宋哲元已被蒋介石拉拢，图谋乘机抢占晋、绥二省的传言，即向阎锡山报告，阎急令停止军事行动。晋军中途变卦，徐永昌决定：“拥护中央，整顿内部。”并致电张学良，表示晋方“各将领一致拥护陆海空军总、副司令”。晋军又遵照蒋介石指示，袭击石友三运送作战物资的钢甲列车。

韩复榘也违背初衷。蒋介石对韩早有戒备，韩的实力有五六万人，被蒋军牵制，难以动弹，对石友三爱莫能助。

石友三部6.6万兵力，在蒋介石的刘峙、顾祝同部以及商震部、张学良东北军的夹攻下，孤军无援，形势越来越险恶，被迫于7月31日夜突围，经深泽向山东方向败退。沿途溃不成军，及至山东德州时，人马已损失大半，后全部由韩复榘收编。

张学良虽然平定了石友三的叛乱，但由于大批东北军的主力调离东北，致使东北地方防务空虚。石友三叛乱平定后，张学良并没有立即返回沈阳，也未将东北军调回，这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可乘之机。

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湖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东北军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离兵营约800米处往南去的地方，河本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下，并点了火。只听一声巨响，震动全城。接着又响起爆豆般的枪声，日本军队向北大营射击，并在坦克掩护下，向北大营发动攻势，于是在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北大营留守的东北军仅王以哲第7旅1个旅。事变前，王以哲一再请示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蒋（介石）指示不抵抗，一切从外交解决。”事变发生时，在沈阳主持军政的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报告张学良。可是这天晚间，张学良在赵荻小姐陪伴下，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

电话来不及说完，就中断了。沈阳守军根据张学良转达的蒋介石“不准抵抗，把枪放到库房里”的命令，撤退到东山嘴附近集结，日本军很快占领了北大营。城内军警一部分退到锦州，另一部分有不少被缴械，或当了俘虏。

驻北大营的第7旅官兵，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在参谋长赵镇藩指挥下，奋起抗战，战斗十分激烈，一直打到翌日晨3时许，由于伤亡过多，遂决定从南、北两方面突围，向东山嘴转移。

从9月19日开始，营口、牛庄、安东、抚顺、凤城、海城、本溪、盖县等相继沦陷。

直至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热河也相继为日军所占。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东北4省全部沦陷。

东北3000万人民从此处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中国官方财产损失170亿。张学良父子惨淡经营10余年的北大营，付之一炬。仅沈阳一地的军械装备的损失，计有：飞机260余架、坦克60辆、迫击炮2000门、15生榴弹重炮200门、15生加农炮200门、轻重机关枪4000余挺、高射炮60门、野炮1000门、步骑枪1.2万枝、军用公用汽车2300辆、火车及各种车辆5000辆、子弹可供10个师之用。张学良的个人财产损失也极为惨重：大帅府的6个金库全数丢了，仅金银一项价值达2.5亿元。张学良满心悲愤，对部下说：“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何面目重见江东父老？我是一个民族罪人了！”

## 第十五章 坐大弄权

“九·一八”事变，全国震动，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政府抗日，正义浪潮汹涌澎湃，行动最激烈的是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四处串联，组织10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抗日救亡大会，组成南下请愿团，沪宁两地学生遥相呼应，集合于南京国民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官员拒不接见，学生愤怒异常，捣毁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

坐镇南京的蒋介石拍案大怒：“这还得了！”指使弹压。又召见《中央日报》头目，指令发表文章抨击学生的行动。《中央日报》果然发表文章，诬蔑学生的救亡运动是制造内乱。学生更加愤怒。北大学生到南京组织几万人示威游行。南京城内冲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手持警棍，一边鸣枪一边冲向学生队伍，举棍就打，几十名学生顿时头破血流，又有大批学生被架上警车拉走，遭逮捕的学生达185名。

便衣侦得北大还将有大批学生南下入京。蒋介石急令张学良强行阻止，张学良托词推过，不加阻拦，气得蒋介石大骂娘稀皮。

12月17日，北平、天津、长沙、汉口、广州、济南等地的学生代表3万多人，在南京组织大游行，走到珍珠桥时，大批军警到来，突然向学生开枪，子弹横飞，可怜无辜正义的热血青年，顿时死亡30多人，更有100多人受伤。政府做出如此血腥勾当后，还发表文告，说学生的爱国行动为“越轨”，军警残杀学生则是“自卫手段”、“正当处置”，还颁布紧急法令，称：“凡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记政府至此已民心大失，

不但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成了反政府者，连当兵的也有不听指挥的了。12月，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总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江西南都起义，加入红军。朱德、毛泽东非常重视这路起义军队，指示他们进驻瑞金的九堡、云田进行整编。毛泽东还亲自为起义部队上政治课，讲时事政治，讲红军宗旨、任务、纪律等。这支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红13、14、15军。它后来成为一支战斗力非常强的红军主力部队。

蒋介石原提出用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施行独裁统治。蒋曾在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上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宿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以为营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第三，自由民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蒋介石在分析比较这三种主义之后，亮出底牌，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并说这样可以消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国民会议接受了蒋氏意见，并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巩固蒋介石的统治。

蒋介石独裁统治，倒行逆施，促使国民党内部新的分裂。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民众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涨，蒋成了众矢之的。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广州国民政府对蒋电作出反应，表示愿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并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3项原则：（1）蒋通电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3）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统一政府。

蒋介石即派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底，然后派比较超然的蔡元培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招牌，提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

陈铭枢向蒋介石建议释放胡汉民。蒋知若不放胡，粤方代表不会北上，故被迫答应。

次日，陈铭枢去见胡汉民，讲了粤中情况，并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交给他，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

接着，蒋介石在张静江的陪同下去会见胡汉民。蒋对胡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胡汉民于当天下午去了上海，结束了被蒋介石软禁的幽居生活。同时，蒋介石派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胡汉民一起赴沪，候晤汪精卫、孙科等人。

粤方非常会议推出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覃振、张发奎、唐生智、陈璧君、陈公博、伍朝枢、黄绍竑、李文范、陈友仁等 100 余人的代表团赴沪，以汪精卫为首席代表。

蒋记南京中常会在粤方代表启程后，为达成“和谈”目的，赶紧作出决定：“凡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本党同志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这样，宁、粤正式对话开始前，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诸“叛逆”一夜间复变成“党内忠贞同志”。阎锡山包租了 1 架日本的小飞机从大连回到大同，不久重返太原，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冯玉祥来到南京担任训练总监。

汪精卫等到沪后，立即会见胡汉民。汪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本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胡汉民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汪精卫的话。然后胡、汪、孙（科）3 人合照了一张相，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

1931 年 10 月 27 日，宁粤和谈在上海开始进行，和平会议正式开张，先后开了 7 次会议，于 11 月 7 日收摊。会议自始起，宁粤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中心为：蒋介石把住大权不放，粤方要和蒋分权。起初，蒋表面上曾作考虑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应钦等人以“军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发出通电，向粤方施加压力。后见不起作用，蒋乃不再掩饰，以南京中央新闻稿方式宣布：“坚持中枢不宜更动，政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蒋的这一宣布在粤方引起强烈反应。在粤之李宗仁、陈济棠等人以非常会议名义连拍两电，致在沪代表，要其对宁方所提条件“万勿退让”。而蒋介石干脆亲自出面，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上，以强硬态度声称：“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在已打消，决不去职。”宁粤和谈陷入僵局。

李宗仁、陈济棠惟恐在沪代表退让，要求在沪代表“请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两条，一条也不能变。是时，粤方主要人物古应芬在广州病逝。李、陈便趁机电请胡汉民回粤主持国府。李宗仁派人专程北上与李济深联系，望李也能回粤共商大计。李、陈等还下令增兵赣、粤边界，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作军事准备。

蒋介石采用以拉为攻，分化粤方。他派宋子文、陈立夫、吴铁城、程沧波、吴开先等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进行分化阴谋，暗中进行拉汪活动。

汪精卫、胡汉民本有矛盾，汪在找不到托身之所时，遇到了广州非常会议的机会，跑去参加，坐了第一把交椅。他态度坚决，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但是，陈济棠亲胡拒汪，他欢迎汪个人带些中层干部进广东，而坚决排拒汪派大将陈公博等人加入。汪精卫把这种做法叫作“去皮存骨”，对陈济棠很不满。宋子文便暗中拉汪，对汪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头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的煽动性很大，顾孟余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宋子文又给了汪精卫一笔钱。这样，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一次，汪派高级干部在汪家集会，张发奎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汪精卫大怒，痛斥张发奎说：“这么多年的军人



还是不懂政治，还要胡说。”以后，汪精卫称病入医院，不参加和谈会议，并拒不见客。

宁粤和谈，粤方也不再坚持要蒋下野。于是，11月7日，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由蔡元培、张继、吴铁城回南京汇报会谈结果，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广州汇报。

上海和会草草收场，陈济棠对和谈结果极不满意，尤其对协议的“广州政府即取消”更不情愿，加上以往对汪派不满，乃向回粤汇报代表提出质问，以“为什么没有实现请蒋下野”为由，指斥汪等出卖了非常会议。

上海和谈达成协议后，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接着汪精卫又在上海召开了第3个国民党“四大”。

粤方于11月18日召开了“四大”，会议一开始，便指控和谈代表“越权妥协”，并作出决定：“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主持会议的孙科因受到攻击，无法控制会场，一气之下与汪派委员共100余人退出大会，去了香港。粤“四大”由是停顿。事情闹成这样，李宗仁担心不好收场，赶紧出面周旋，迭电在沪之汪、胡，敦请两公迅即返粤，出席、指导会议。

汪接电后拒绝南下，胡则在李等催促下，于11月27日抵粤，粤“四大”得胡主持，继续进行。去港的汪派人士100余人则应汪秘召，去了上海。

12月5日，粤“四大”闭幕。胡汉民在闭幕词中代表大会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并以粤“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名义议决：如果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粤“四大”中委不仅不赴京开会，还将自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大会通过了35个决议案。

蒋介石作了《闭幕词》，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蒋介石乃一纠纠武夫，他发表演讲作报告，其讲稿皆不出自他手，捉刀人是陈布雷，理论指导是戴季陶。

12月7日，汪精卫假法租界世界共和厅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只开了一天。汪精卫作报告说：“上海和平会议的议案，虽然不是完全足以使人满意，但在现在国难当前的时候，我们应以退让为精神，大家一致来共赴国难。粤四大不体谅共赴国难的退让精神，又不知此次和会中有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竟然随意将和会议案推翻。”大会选出了10个中央委员，史称为“大世界中委”。

3个国民党“四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不愿入京开会。蒋介石在硬顶一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他约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等人分别谈话，将以退为攻的有关事宜全部安排妥贴，于12月15日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不负总理之教训。”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行监委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于右任任主席，作出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2) 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林森、陈铭枢即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沪中委纷纷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宁、粤、沪3方中委均出席。然而作为各方领袖的蒋、汪、胡却都避不照面。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致《闭幕词》。会上通过了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专职主席，实行三驾马车制，即设常委3名，分别以蒋、汪、胡担任。会议还通过了粤“四大”所提关于设立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之提案。孙科在《闭幕词》中还特别表扬了蒋介石，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结果，我们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也不能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通电取消。然而，会上产生的孙科内阁本是蒋、汪、胡3方矛盾斗争的产物。自新内阁筹备之日起，蒋就筹划好了它的垮台。

蒋介石深知孙科的为人。胡汉民曾有形容孙科的一段话：“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蒋介石为了给孙科施加压力，便在一中全会开幕后，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各部部长和重要员司也纷纷辞职，一走了之。江浙财阀，拒绝为新政府提供钱款。原财政部在部长宋子文带领下，部内科以上职员发薪3个月，来了个集体散伙，带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使财政部剩下一个空招牌。孙科上台后政府支出不敷，1个月就达1600万元。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

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上台后为赢得民心，主张对日强硬，但立即遭到奉化蒋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

蒋介石临走前，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贺耀组为甘宁青宣慰使。这些人全以急行军速度赴任就职，死死控制了局面，天老爷的话也不听，就听蒋介石的话。

孙科本是个没有肩膀之人，内政、外交的窘境更使他一筹莫展，于是向报界抱怨：“以前五院对国府主席负责，现在行政院对中政会负责，行政院须完全听命中政会，而3常委迄今未来，行政院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盼望造成健全舆论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孙科悄悄地坐上去上海的火车，孙科政府就要夭亡了。孙科要撂挑子，急坏了一中全会后逗留在沪的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等人。李宗仁、陈铭枢等为支持孙科，扬言要对金融界采取强硬措施。孙科也以“充实中枢，否则还政于民”为名，召集李宗仁、陈铭枢、冯玉祥、李济深等密谈，决定在蒋、汪、胡未入京前，设特务委员会，负责中央一切政治上之责任。1月13日，孙科、陈铭枢、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等在沪中委联袂进京。14日，

在京召开第三次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正式酝酿成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推出特委会委员。

李宗仁等人的活动，使在奉化窥测动向的蒋介石感到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设立，在蒋看来更是夺权的不祥之兆，不便再行坐视、延宕，蒋在李等联袂进京之日，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

蒋在离宁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蒋介石在杭州写信给汪精卫。那汪精卫则因被陈济棠逐出广州，正欲投蒋，于是连夜赴杭与蒋密谈竟夜，双方达成交易。同时，蒋、汪致电胡汉民，请他北上，“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孙科）及诸同志。”胡汉民复电汪精卫，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拒绝北上。

张继、张静江由南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密谈。

次日，蒋介石派自备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

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宴毕即在另室密谈。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会后，蒋、汪分别向报界表示，为赞助政府当局，当近日内共同进京。

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之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

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 第十六章 蒋、汪卖国

蒋、汪在杭州晤面的消息传到广州，胡汉民愤慨之余乃于19日公开宣布与蒋、汪决裂，并决定依恃两广实力派与蒋、汪抗争到底。而李宗仁等则因蒋、汪回返中枢，特务委员会无疾而终，深知尚无力量左右大局，也不再在沪逗留，采取坚决拥胡立场，返回两广，继续西南割据，与蒋作长期对垒。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不幸，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演出了“一·二八”事变来。

上海打起来，南京下关的日舰也轰然开了炮，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迁都洛阳。

几天之后，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

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

蒋介石很高兴，觉得汪精卫还算识趣，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紧接着，又任命陈立夫为中央组织部长，陈公博为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从而达到了“蒋汪联合主党”的协议，蒋、汪二人成为中央的主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中心至此就基本确立了。

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法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蒋派人往意大利向墨索里尼求教，去德国向希特勒求教。蒋指使陈果夫、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的中统特务组织，因“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为C，故二陈为CC，俗称“CC派”。

“CC派”除二陈外，其领导成员还有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周佛海等。

1932年3月，蒋介石又组织军统特务组织“复兴社”，自任社长，其核心人物主要是出身于黄浦陆军学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刘健君以及周佛海等人。

后来蒋介石为便于领导，将两个特务组织合并，他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来当教练，特务组织专门从事法西斯主义宣传、摧毁共产党的组织、捕获和杀害共产党人、暗杀进步人士等罪恶活动。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对日本人侵占上海持妥协态度。

从江西“剿共”前线撤退后驻防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是一支坚持抗日的爱国军队。“一·二八”事变的前几天，张静江把蔡廷锴找去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

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锴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二人不欢而散。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19路军闸北的防务。蔡廷锴指令19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

日军从 1 月 18 日起，接连在上海寻衅，制造事端。日寇扬言：“打上海 4 个小时就可解决问题。”日本侵略者企图将上海作为进攻内地的军事基地。

1 月 28 日，19 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坚决抗击日军的入侵，打响了闻名中外的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的爆发，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

英勇的 19 路军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得骄狂不可一世、宣称 4 个小时即可占领整个上海的日军指挥官盐泽焦头烂额，连连溃败，羞愧难当而想自杀。2 月 7 日，日本当局撤了他的职。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立即向蒋介石献计，要蒋通电全国，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蒋便于 1 月 30 日发出《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 19 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诸同中正愿与众将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2 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回答说：“很好。”并指示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 87、88 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为军长率其参战。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 200 架飞机的进犯，奋战了 33 天，日军死伤 1 万余人。日军三易主帅，并且不断增兵。而 19 路军和第五军总共兵力不过 4 万人。

全国人民踊跃声援淞沪抗战，几天就捐了 3 万套棉衣，设立了几十个伤医院，仅款项就有 700 万元，社会各界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支援抗战。宋庆龄等亲到前线慰问官兵。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蒋介石在 2 月 23 日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励，奋斗到底。”蒋介石一时支持抗战，有种种原因：一是以免国人反对，二是冯玉祥、于右任、陈友仁等慷慨激昂，力主抗战。

然而，蒋介石不再调兵增援了，他要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了结淞沪战事，尔后潜心“剿共”。蒋介石对总参谋部说：“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许多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

仍须受抗令处分。”又派心腹监视各军，不准妄动。

2月13日，何应钦致电蒋光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日军增至近20万人，19路军寡不敌众，急请军政部速派援兵，竟遭拒绝。淞沪守军孤立无援，日军发起强攻。3月1日，日军从浏河偷袭登陆，19路军被迫退出淞沪第一道防线，撤至嘉定、黄渡一线。

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定了协议，内容共5条，其中第2条规定上海至苏州一带，中国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3条则规定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这个协定，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军队；另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日军同意签订这一协议，其目的是想将军队调往东北去打义勇军。5月13日，日军第14、18师团即转开吉、黑增援。

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蒋介石第4次“剿共”的整个部署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此，蒋介石调动了63万大军。

5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3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3路军。

在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此时正处于非常严峻时期。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三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是，三中全会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并指责中共中央为调和主义。

更糟糕的是：这封信还未送往中国，从莫斯科归国的留俄学生便把消息传给了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这些留俄学生不执行中央要他们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命令，赖在上海不肯走，并把消息广泛传播开去，于是，到处议论纷纷，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和博古又联名写信给中央，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云云，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还不知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而闹事，未予理睬。但王明很快写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写3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在领导同志瞿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一些曾受过李立三或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纷纷响应，也

认为党出现了危机，已经临到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曾尖锐地批评过“立三主义”的错误，但受到李立三的无理压制，说他是“取消派暗探”，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不但没为他平反，反而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同情他，强烈要求改组中央。但也有一批人，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次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瞿秋白和周恩来头上，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

年轻、狂妄、野心勃勃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却有后台。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4月生于安徽金寨县的一个集镇上，祖籍是安徽泾县云岭村。他在16岁那年考入六安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进武昌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10月，王明在商科大学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王明得到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1927年4月，米夫要王明随他来中国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由于米夫的信任，王明毕业后被留校工作，担任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

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当年6月，他安排王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工作，接着让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王明以米夫为后盾，开始排斥和打击异己，在党内搞宗派活动。连原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俞秀松，也被王明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成员。后来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瞿秋白经过调查，并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的审理，作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当时共产党内很需要理论干部。对于王明这个学过理论的青年，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中央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

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已经派定，但王明害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环境，总想留在上海，在党的上层工作。党组织允许他留在上海，派他到沪西区作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不久任命他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王明自称是宣传部长。10月，调任他为《红旗》报编辑。

1930年1月，王明去上海英租界垃圾桥附近的彩印工会出席工联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20多人被押上囚车带到老闸捕房。当巡捕问王明姓名、住址时，他说了假姓名，但供出了住址是鸭绿路。鸭绿路有党的机关，这样就影响了机关的安全。

当天下午“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就和“340号”巡捕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每送一封信给大洋14元酬劳费。巡捕表示同意，于是王明从一个被捕的工人那里找到一根短铅笔，又找到几张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信，折好后交给那个巡捕。

王明的信是写给其挚友、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现任中宣部秘书潘问友的。信中内容是他因什么事被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请求营救。王明还托巡捕向潘问友询问高介三的住址。

李求实先接到王明的信，看后大吃一惊，说：“王明这家伙靠不住了，我们马上搬家。”李求实急忙通知王明知道的所有机关，立即在一天内搬家。

潘问友给王明复信说：“你的事转华丰公司代为照料。”对于询问高介三的地址未作答复。潘问友不久被捕，当了叛徒。

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时间后，被解送到提篮桥牢监内特犯间，英租界当局宣布将要把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王明因听曾在上海监狱坐过牢的人说，国民党用刑残酷，他惧怕引渡，再加上他发现一个同时被捕的人有叛变嫌疑，更增加了惧怕情绪。夜半，王明想出一个办法：要同时被捕而被巡捕搜去记录和签到簿的那位同志承担责任，以救大家。

次日上午，王明对那位同志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你可以承认一些，说你是来作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情，你看如何？”但那人表示：“我坚决不向敌人低头。”王明当场被他顶了回去，弄得不好意思。

几天后，开庭审讯，提审王明时，判官问：“叫什么名字？”王明答：“王杰仁。”“哪里人？”“安徽人。”“多大年纪？”“19岁。”“干什么的？”“开米店的。”“为什么到彩印工会去？”王明哭着说：“老爷！俺不懂什么！俺去找俺表兄吴鲁卿先生。”敌人不明王明的身份，经王明这么一说，便给蒙蔽了。王明又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同他认“乡亲”。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德国籍代表花了几千元打通关节，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个乡亲看守，让他随便填写一个名字算作保人，于2月28日放他出狱。

王明出狱后去找高介三。高介三因王明曾托巡捕询问过他的地址，已严重威胁他的安全而搬了家。高介三搬走后敌人即搜抄了空宅。王明来到高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楼空。

王明因泄密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长李立三请求，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商量，分配他到全总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辑。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共写了近20篇文章，几乎和李立三的文章数目相等。王明在这些文章中积极鼓吹“立三路线”，他不仅是李立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难时，成为李立三的辩护士，给反李立三盲动冒险的同志扣上“右倾”、“调和倾向”等大帽子。

1930年6月，王明被调到中宣部任秘书。7月初，王明得知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便与博古一起，以“随便聊聊”为名，邀集留苏联归国的王稼祥、何子述开了一个串连会，王明说：“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谈论结束时，王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7月9日，李立三主持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但遭何孟雄反对。

王明见时机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发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发了言。王明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对李立三的报告提出了批评，指责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组织者”罪名扣在王明的头上，向忠发宣布给王明撤销中宣部秘书以及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对博古等人



也给予处分。

但是，王明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有恃无恐。次日，他给中央写信，重申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撤销对他和博古等人的处分。

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三中全会作了肯定，王明也表示“拥护”。

但是，王明曾因反对李立三而受了处分，三中全会既没有撤销对他的处分，更没有把他当作反李立三的英雄，加以褒奖、提拔，心中不满。他对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一直是耿耿于怀。瞿秋白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的小宗派，引起王明的强烈不满，一直在寻机报复。因此，当王明得到共产国际写信指责中共中央时，又串通留学苏联归国的一些 20 多岁的年轻人，要求中央改组。

## 第十七章 红军遇挫

中共中央直到 1930 年 11 月 6 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国际来信，承认在批评李立三错误问题上有调和态度。12 月 1 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其实，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是时，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是唯命是听的。

曾积极鼓吹立三路线的王明等人，对立三路线的错误没甚揭发。他们对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兴趣，而是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部，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12 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地来到上海。他分批会见了王明、博古以及罗章龙、徐锡根等，同王明密谈几次后，决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召开四中全会，全会的中心是反右倾。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严厉指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在米夫的压力下，于 12 月 6 日决定撤销对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 4 人的处分。米夫又逼迫政治局发出全盘自我否定的通告。中央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而陷于瘫痪。

王明、博古、罗章龙等因未得到权力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

罗章龙于 1931 年 1 月 1 日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并提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罗章龙毕竟不是米夫的门徒，米夫只是想让罗章龙把水搅混，而不让他摸鱼。米夫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博古等商议后，由王明等出面，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并要求

召开四中全会。闹腾一阵子后，米夫出来讲话，说已报告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并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议案》。米夫提议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政治局对那个屡犯错误的年轻人王明并不放心，没有完全接受米夫的意见，决定由尚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刘归国前由王明代理。同时决定将博古补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的中央局工作。

瞿秋白、周恩来觉得他们在处理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该团结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他们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并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提出了何孟雄。米夫因何孟雄不是他的门徒而拒绝。

瞿秋白、周恩来对三中全会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提出退出政治局的要求。米夫因他的门生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定在瞿秋白、周恩来二人中保留一人，王明早已要对瞿秋白进行报复，米夫决定瞿秋白退出。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全会只开了15个小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集14名中央委员、8名中央候补委员和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计37人出席会议，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徐锡根、李维汉、任弼时、贺昌、余飞、顾顺章、温裕成、王克全、罗章龙、陈郁、史文彬、张金保、王凤飞、陈云、周秀珠、徐兰芝、袁炳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韩连会、何孟雄、徐畏三、沈先定、顾作霖、夏曦、肖道德、邱泮林、博古、柯庆施、袁乃祥。

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共36人，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22人，且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员，不但出席了中央全会，而又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中央全会。

会议由向忠发作了政治报告。经过讨论后，由米夫作为国际代表作了结论，然后进行改选。米夫在发言中挖苦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3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两人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不仅被补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米夫没有同意。周恩来在四中全会期间，同瞿秋白一样被置于“被告”席上。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

因多数人不同意未被通过。

四中全会后，中央在米夫、王明等人操纵下，决定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派夏曦去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等等。还制定了《中央巡视员条例》。于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些“钦差大臣”握有尚方宝剑，权力极大，因而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灾难。从这时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米夫在四中全会之后，在中国又停留了半年时间，中共中央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宗派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

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威胁。显然，无论是手握重权的国际代表米夫，或是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都无法驾驭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 3 人为中央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并负责苏区工作。米夫和王明同意这样的安排，只作为权宜之计。王明公开发风说：“这只是为了实际的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周恩来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不出来稳定局面，撒手不管，党就会出现大分裂。于是他忍辱负重，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周告诫他们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王克全、罗章龙的情绪已十分激动，他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

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罗、王仍然不理睬。

1 月 27 日，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罗章龙、王克全在党内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对他们处分之后，党内局势稍稍稳定下来。

但是，蒋记国民党特务严重摧残共产党组织。党的重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因受叛徒出卖，于 1 月 7 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 月 7 日被杀害。

4 月，多次发表文章支持王明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和陈昌浩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不料，顾在途经武汉时、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特务头子徐恩曾逮捕后叛变。顾顺章原是上海工人，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因远在武汉，中共中央没能立刻获悉。顾顺章向徐恩曾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幸亏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钱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陈赓转报中央。

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国际机关一夜之间全搬了家。

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引导下在上海进行了大搜捕，一一扑空。但是，顾顺章供出被捕后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恽代英，恽代英被捕时化名“王作林”，未被识破。顾告密说王作林就是恽代英。恽代英本是黄埔军校第 4 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有他的照片，经查对，王作林果真是恽代英。敌人对他劝降失败。1931 年 4 月 29 日，敌人将恽代英押赴刑场，恽代英牺牲时年仅 36 岁。

顾顺章被徐恩曾留在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他不仅使恽代英丧命，而且带领 4 个武装便衣特务分子，又在香港将蔡和森抓获。蔡和森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服，又被刺刀刺进胸脯，鲜血喷涌而亡。

这一番折腾后，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

来、卢福坦 4 人。

王明成天惊魂不定，他曾躲到尼姑庵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到上海郊区一个疗养院隐居。

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很少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总书记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跟妓女杨秀贞姘居。向忠发和杨秀贞搬家后，将女佣解雇。顾顺章以重赏收买女佣，暗带特务分子去诱捕向忠发。向忠发见势不妙，从后门逃走。中央考虑到向忠发处境很危险，决定他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周恩来一再叮嘱他在离开上海前不要外出，但他不听警告，不守纪律，擅自在临走前去杨秀贞的新住所过夜。次日清早，向忠发从杨秀贞那里出来，到静安寺英商“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将他捉住送往捕房。

周恩来立刻组织人营救，但向忠发在两天后即叛变了，还把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供出。敌人派人去搜查，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敌人仍不死心，派人在他家守候。

向忠发又带领敌人去逮捕瞿秋白等，落了空，然后又带领敌人去破坏中央机关，亦落了空。蒋介石一气之下，下令将向忠发处死。

中央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互不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停止工作。中央决定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工作。王明像惊弓之鸟，不敢在上海隐居，又不愿去中央苏区过艰苦生活，决定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去莫斯科。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上海的都远不足半数。于是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洛浦）、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 6 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负总责。在这之前，博古、张闻天还不是中央委员，他们靠着王明，一下子成了政治局常委，真是一步登天。王明的宗派主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被蒋介石特务机构先后捕获的中共高级干部叛变革命的，除顾顺章、向忠发外，还有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叛徒加强特务工作，他们利用顾顺章开办叛徒训练班；设立“设计委员会”，搜罗叛徒参加其特工，利用叛徒站马路、坐茶馆指认共产党员，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参加其领导机构。

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李竹声、卢福坦后来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叛变。卢福坦是山东淄市人，工人出身，他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

10 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王明在临行前，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乃是王明宗派之人，又是教条主义者，绝对服从王明。王明看准了这点，才指定博古负总责，由他自己在莫斯科掌舵。

12 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在那里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组成。

中央革命根据地却是另一番景象。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得到迅速扩大。在赣南已有跨 18

个县的范围，面积纵 370 公里，横 270 公里，在闽西，有以长江为中心的 4 个县范围的苏区。赣南和闽西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中央苏区。人民为了保卫政权，踊跃参军，一方面军已有 6 万人的队伍，地方部队有独立师、独立团以及民兵等。

中央苏区因交通阻隔，王明的“左”倾政策一时尚未为人知。1931 年 4 月，中央代表 3 人团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宁都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分别在 8 月和 10 月两次给中央苏区发来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多方指责，与此同时，中央不断派代表“加强”中央苏区的工作。

11 月 1 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毛泽东在改造红军方面不积极执行中央的指示，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传统”，“忽视阵地战”；因而，要求集中火力反右倾。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项英接任中央局代理书记。

接着在 11 月 7 日（即俄国十月革命 14 周年纪念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和人民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结果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红军部队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央局书记。

远在上海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 1932 年 1 月 9 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一方面军攻占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左”倾冒险计划。周恩来代表中央局给临时中央致电，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采取了折中办法：要求红一方面军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中央局多数主张打赣州，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敌人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守赣州不易攻克，而且我军攻打赣州，敌人很快会从南北两路调兵援赣州，我军将处于险境。”但是，攻打赣州的命令下达了。毛泽东为革命前途忧心忡忡，他的健康状况极差。

中央局作出决定，要他去东华山一个古庙里休息。

一个多月后，项英带着警卫员突然来到毛泽东所住的古庙里，毛泽东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开门见山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周恩来同志让我请你下山去，领导打赣州的战斗。”项英简短地向毛泽东介绍了赣州久攻不克，部队伤亡惨重，敌人援兵又到，红军处境危险的情况，军委决定请毛泽东出山领导战斗。

毛泽东听完后，敏捷地站起身来说：“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项英走后，毛泽东立即命令警卫员收拾东西，准备下山。

天空乌云翻滚，暴风雨就要来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要他等雨过后再下山，毛泽东坚定地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等了。”毛泽东冒着滂沱大雨，打着伞，带着警卫员急匆匆地下山去了。

主攻赣州的是彭德怀的第3军团，计1.4万人。而赣州守敌1.8万人，且赣州东有贡水，西有章水，北有赣江，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2丈，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以顽强的精神苦战1个月不克。1932年3月初，敌方援兵陈诚部主力第11师突入城内，第14师随后开到，敌军增加了约2万人的兵力。红三军团腹背受敌。

毛泽东从东华山急急忙忙来到瑞金，立即致电朱德，要求3军团在1、5军团的支援下迫使敌人退入赣州。尔后，毛泽东连夜奔赴赣州前线。

毛泽东来到江口前线指挥部时，3军团已经解围脱险了，与敌人隔江相望。

毛泽东到了驻地，立即参加中央局扩大会议。会上围绕着是“撤军”还是继续攻城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毛泽东力主撤军，他说：“进则攻坚不利，敌人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余地。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敌人调出城来聚而歼之，是对红军最为有利的上策。赣州已经是座孤城，这个包袱让蒋介石背着。”毛泽东的意见被众人接受了。

江口会议决定：彭德怀率3军团向赣江西岸出击，称为西路军；毛泽东率领1、5军团向闽西发展，称为东路军。

毛泽东指挥1、5军团攻克了武平、上杭、龙岩，3战3捷。为了诱歼敌军张贞部的主力，红军马不停蹄，人不歇脚，以闪电般的速度，乘胜向漳州进发。

漳州是闽南的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张贞得知龙岩失守，急忙调主力师去天宝，扼守高山要隘，阻挡红军攻占漳州。

毛泽东来到前沿阵地，察看了地形。这一带群山起伏，敌人在通往天宝山路两旁的山峰上派重兵把守。担任主攻任务的1军团2师发起数次猛攻，未见效果。毛泽东发现左侧后的高山上没有敌人，便一面命1军团派部队占领那个山头，从后面抄敌人；一面令2师继续从正面佯攻。

敌人在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很快被击败，左右两翼的敌人见势不妙，纷纷退入天宝城内。

毛泽东命5军团插入天宝与漳州之间的要道，切断天宝城内敌人逃向漳州的退路，而后命令1军团向天宝城发起猛攻。

龟缩在天宝城内的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在1军团的猛烈冲击之下，没有坚持几十分钟，便弃城向漳州方向逃窜。他们没有料到，5军团已在前面截断了他们的退路。

敌军在红1、5军的夹击下做了俘虏。

漳州城里的敌人得知天宝失守，急急忙忙点燃了弹药库，夹着尾巴逃跑了。红军进入漳州时，弹药库还在爆炸之中。

毛泽东在闽南完成了开辟革命根据地和筹款、筹物资任务之后，于6月转旗向西，胜利回师。

毛泽东在回师途经龙岩时，闻讯西路军的3军团在湘赣边区扩军40个营，但在回师根据地时，被敌军在南雄、乌径、信丰一线切断了道路，敌人企图在那里围歼3军团。于是，朱德、毛泽东不辞劳苦，带领东路军长驱西进，昼夜兼程，前往增援。

东路军经过酷暑下的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南雄县，同陈济棠的粤军20个团在水口地区遭遇，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将20个团的粤军击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水口战役。水口战役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在很长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对于红军尔后的北线作战很有利。

8月初，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分别召开会议，通过对红一方面军整编和红军歼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的决议，会议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任命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和后方的行动方针、作战计划。周恩来赴前线后，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连续行军1星期，于8月15日抵达招携、东韶一线，同敌军相持。第2天出敌不意地突然发起进攻。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占领南丰。红军速战速决，异常迅猛，连克3城，俘敌5000余人，缴获了包括迫击炮、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

这一战役之后，红军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机再战。

## 第十八章 “左”祸肆虐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京，并指责一方面军原地久待，给“群众不好影响”。

周、毛、朱、王发现北上地形于红军不利，敌人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从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固守城镇，认为红军应使敌人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

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周、毛、朱、王前线军事领导人一方，在电报中你来我往地坚持各自意见，两方之间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中央局蛮横地决定暂时停止红军的行动，在宁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情绪支配下，对前线军事领导人，特别是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毛泽东进行无理指责。说前方军事领导人对敌人大举进攻表现出“恐慌、失却胜利信心”、“有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

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不少人给毛泽东扣上“不服从中央”、“右倾保守”等罪名。

由于会上有人提出要撤销毛泽东军队职务的问题，使毛泽东不便继续参加会议，他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后，退出会场。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不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但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在前线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请病假去后方休息，必要时再到前方。

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宣布：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撤销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毛泽东说：“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会回来的。”话是这样说了，但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不安的。他回到住所，坐在凳子上，

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半天都不起来走动，也不和别人讲话。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之前，革命根据地迅猛扩大，东起淝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囊括 26 个县，总面积达 4 万余平方公里。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后来发展成为全国 3 大主力红军之一，创建了红四方面军；下辖 3 个军，计 10 个师，指战员 4.5 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有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刘士奇等。这些人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有很高的军事理论素质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创造性地制定出以红军之长，克敌之短的作战方针，指挥部队适应战场的形势，敌变我变，灵活而又果断地打击敌人。

张国焘和陈昌浩在 1931 年 4 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首府新集（河南省）之后，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召开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撤销鄂豫皖边特委。决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为中央分局常委，张国焘为书记兼任鄂豫皖根据地军委主席。不久成立了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为省委书记。

从此，张国焘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他一方面推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一面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据地仅有 8 个县委，其中 7 个县委书记被撤换。

张国焘在军事方针上同红四军（红四方面军是后来在红四军基础上发展而来）领导人发生分歧，曾中生等提出红军主力应向南发展，张国焘不仅未采纳这个正确建议，反而指责这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命令红四军主力赴商城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

红四军只得开赴商城，因顾匪及其所部大搞坚壁清野，裹胁群众逃离家园，红军追剿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供给发生严重困难，还时遭反动武装袭扰，短时间内很难取胜。

红四军领导人复向中央分局和军委申明理由，希望采纳原来建议，又遭张国焘等人无理拒绝。

红四军领导人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向外发展问题。于是围绕着红军主力是否南下的问题，展开一场激烈争论。曾中生等人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主张，同意部队南下。

但张国焘不久又推翻了红军南下的决定，要红四军打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并限 1 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张国焘的冒险计划，仍主张先打英山，出蕲春、黄梅、广济，威胁长江，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同蕲、黄、广连成一片。张国焘则下了命令，红四军只得服从命令，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张国焘免去旷继勋军长职务，任命徐向前为红四军军长。

徐向前同曾中生合作，厉兵秣马，南下作战。8 月 1 日，攻克英山，全歼守敌，生俘敌人 1800 余人，缴获 1200 余枝长短枪、18 挺机枪、迫击炮 4 门，其它大批子弹和军用品，出师首战告捷。

打下英山后，曾中生、徐向前等又分析了敌我力量，认为东进不如南下，如若东进，对红军不利。于是他们一面行动，一面将情况和决定报告中央分局。

8 月 3 日，红四军主力南进，经过两日行军到达蕲春县境。曾、徐决定



先取蕲水、罗田，打开战场，然后诱敌而歼。

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共歼敌 7 个团，俘敌 50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4000 余枝，建立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太大片红色区域，使红军和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缓解。红四军改东进为南下，出师告捷，获得了重大胜利。

不料，张国焘以中央分局和军委名义写信给徐向前和曾中生，指责红四军“不出潜太、安庆而出武穴，是放弃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政治上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张国焘命令红四军领导人接信后，立即率部队火速北返，不准有丝毫的停留。

徐、曾不得不放弃有利战机，遵命率红四军北返。当部队在北返中到达英山县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

与会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无理指责。会议最后通过了曾中生起草的《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北返，向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军事委员会面陈一切。

张国焘等无视曾中生等红四军的正确意见，而抓住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等问题，竟将曾中生撤职，另派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匆匆赶到驻在麻埠的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

张国焘并不以此罢休，他以中央分局名义，在泼皮河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斗争曾中生。但仍有不少干部支持曾中生，为曾中生的军事方针辩护。张国焘不得不承认原订计划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所选择的目标在战术上是错误的。但他竟然反污红四军南下取得的胜利是侥幸得来的，执行的是立三路线的盲动计划。给曾中生扣上“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大帽子，宣布将曾中生调离部队到后方“考察”。

张国焘又以分局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当时的中共中央站在张国焘一边，同意其报告。

张国焘是一个权势欲极重之人，他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3 重身份，在清除曾中生在军队中的领导权之后，依靠陈昌浩、周纯全等人，开始了一场从军队到地方的以反对所谓的“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等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

在 1931 年 9 月中旬至 1932 年春，被逮捕和杀害的干部有军级 17 人，师级 35 人，团级 44 人。肃反开始后的将近 3 个月，杀掉了 2500 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地方干部被捕杀的情况也很严重。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有干部 48 人，被捕杀者达 45 人。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 200 多人，红山警卫团第 8 连从战士到连长 100 余人，一次被杀光。

张国焘的屠杀政策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黄安五区人民群众提出“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的口号，贴出“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杀人的刽子手”的标语。曾担任黄安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来显安，起初肃反十分卖力，他亲手杀了不少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AB 团”分子，但他也被张国焘怀疑，3 次遭到逮捕。

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审时说：“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我杀了許多人，

后认为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来显安亦被处死。

张国焘虽然把反抗他的人们镇压下去，但他又不得不改变做法，把以捕杀为主，改为自首为主，但仍有不少人被杀。

1931年8—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对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把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更名为赤卫军，并统一建制。全根据地共编成赤卫军15个师。在此基础上，整编并扩大了红军。在麻埠成立了红25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25军成立后，红四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辖红四军、红25军，共3万余人。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积极开展外线进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4大战役，共歼国民党“围剿”军40个团6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由3万人，扩大为4.5万人，不久在皖西成立了红27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

1932年6月29日，蒋介石抵达武汉，部署第四次“剿共”，将63万大军分成左、中、右3路军，命何成浚为左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任副司令官；李济深为右路军司令官，王钧为副司令官。除以左路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战外，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另有4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信阳，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六安。蒋介石的意图是：从东北西3面发起攻击，攻占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而后实施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战术是：纵深配合，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蒋介石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动员外逃土豪劣绅回乡执政。蒋介石拟定“剿匪”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张国焘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他在党的会议上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了7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国民党的军队已成为偏师，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蒋介石集中所有残余力量同我们作最后的挣扎，我们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人围剿一个打击一个的问题，而是要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张国焘我行我素，他令红军继续向罗山进逼，以破坏京汉路，然后沿京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

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新的“围剿”部署，建议停止出击平汉线的行动。他说：“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把主力摆至鄂豫皖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食于新区，还可以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而张国焘、沈泽民坚持红军主力南下进攻麻城的意见，他们说：“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徐向前、陈昌浩的正确意见被否决后，便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麻城。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

打到武汉去。”这样的作战行动正中蒋介石的圈套。麻城是敌人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下达固守麻城，拖住红军的命令。他要在麻城牵制红军主力，以便东西相援，中路、右路配合作战。

红四方面军虽然在江石堰、七里桥和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的战斗中，歼敌 3000 余人，但不仅未实现攻克麻城的计划，又要分兵阻击援敌，使红军主力被敌人吸住而失去主动。结果是消耗、疲惫了红军，敌人却能从容部署和展开“围剿”。

红军主力在麻城作战。麻城守敌凭城坚壕深，固守不出，红军屡攻不克。分布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之敌开始紧缩包围圈。张国焘下令旷继勋的红 25 军守住霍丘县城。

旷继勋明知这个决定不妥，但不敢违背张国焘的指令，同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与敌人拼搏 5 昼夜后，红 25 军遭受重大伤亡，7 月 20 日，霍丘县城陷落。

这个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张国焘的错误决策，然而张国焘却撤了旷继勋军长职，由蔡申熙接任。

蒋介石见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包围“进剿”，均未遭到有力的反击，便改变原定“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 8 月 7 日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总攻”。要求主攻纵队迅速插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寻找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

张国焘见形势严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于是赶忙命令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经十分疲惫之红军昼夜兼程，回师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

徐向前心急如焚，率红军一夜走了 130 里，来到黄安。陈赓的红 12 师在黄安以西徐家、冯寿两地区与敌先头部队第 10 师遭遇。趁敌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给敌以很大杀伤。

蒋介石对第 10 师失利甚为恼怒，急电卫立煌纵队加强防守，并命陈继承第二纵队限 3 天内占领七里坪。蒋命令道：“如有违误，当予以最严厉之处分。”徐向前带领几个人到前沿的一个山头观察情况。只见在错综连绵的山头上已有敌人筑好的固守工事。一个侦察员向徐向前报告：“敌人正向红军两翼迂回。”徐向前立即返回指挥部。从后方赶来的张国焘正躺在床上休息，见徐向前进来，便问：“情况怎么样？为何听不到枪声？”徐向前答道：“部队正停止待命，我看应立刻转移。”张国焘从铺上跃起身来：“是不是情况对我不利？”“如不转移，两侧敌人迂回上来，更是不利！”于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3 人决定转移七里坪，寻机会歼敌军。

徐向前集中 5 个师的兵力，同敌军在七里坪激战，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却不能改变整个战局。

七里坪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北移檀树岗、新集。蒋军两个纵队尾追而至，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胡山寨同敌激战后，向皖西转移。

革命根据地重镇红安、新集、商城相继失陷和红军连续撤退，以及敌军的步步逼进，使狂妄自大、盲目轻敌的张国焘一变而为右倾恐敌，惊慌失措。

张国焘等在撤退途中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援助。

在中央根据地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建议红四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扰敌、截敌、袭敌与

断绝交通等方式疲劳与分散敌人，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移，以便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围剿”。

## 第十九章 湘鄂西悲歌

张国焘等接到周、毛、朱、王复电后，已经失去了运动歼敌的时机和条件，于是决定以郭述申和独立4师师长徐海东等，带少部分兵力及地方武装，在皖西和潜太地区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则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

红军在英山以西石桥铺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和蔡申熙率领，另一路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约定两路在新洲会合，会合后继续北进。

红军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北返后，蒋介石觉察到聚歼红军于长江北岸弯曲部的计划已经落空，又惧怕红军抄其后路，威胁武汉，便急令陈继承第二纵队、卫立煌第三纵队，由东而西，并进长追；又令胡宗南部第1师和中路总预备队第88师和第13师等，分别由平汉线经河口镇、华家河向黄安、麻城方向堵击。

红军兜了一个大圈子，回到黄麻老根据地，只见到处断垣残墙，满目疮痍，群众缺柴，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乡亲们见到子弟兵回来，愁云满布的脸露出笑容。战士们不顾疲劳，帮助乡亲们重建家园，荒凉的山村又出现了生机。

不料，红军先头部队刚进入河口镇以东地区，即同蒋军第188师遭遇。红25军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同敌军第13师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一部后，红军主力即向黄柴畈转移。在激战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红11师政委甘济时壮烈牺牲。蔡申熙和徐向前都是黄埔第1期毕业生，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蔡1924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军委书记等职。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柴畈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在此危急时刻，张国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完全失去信心，他说：“敌军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红军经过几次战斗，未能击溃敌人，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主要城镇被敌人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红军应去平汉路以西，同贺龙的红3军会合。”沈泽民则说：“红军主力不应脱离苏区，应该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以待时机。”徐向前既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也不赞成沈泽民的意见，他说：“红军主力应暂时拉到外线，待机歼敌后，重返革命根据地。”争论结果，最后决定：留下74、75师和地方武装，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铁路以西活动。

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2万余人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越过铁路，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留下的红74、75师和地方部队，以及大批伤病员共约近2万人，分散在根据地各地坚持斗争。

蒋介石用 20 万兵并限令于 1932 年 12 月 15 日，彻底消灭留在根据地的红军。蒋介石提出“民尽匪尽”的方针，血洗大别山。要驻尽山头，杀尽猪牛，见黑（人）就打，鸡犬不留，铲除干净，绝尽根苗。蒋军对大别山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蒋军在金家寨的柳树湾一次就活埋和屠杀了 3500 余人，在六安县的上楼房杀害 1200 余人，在红安县的平台岭屠杀了 2000 余人，在光山县中部的 29 个乡镇杀害了近 1.5 万人。在乘马、泗店、田铺方圆六七十里地区内杀害 2.5 万人。蒋军足迹所至，火光冲天，庐舍成墟，田园荒芜，尸骨遍野，百里无人烟。大批青年女子被蹂躏、被贩卖。

蒋介石命何成浚 10 万左路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中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是夏曦。夏曦原是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会友，他在南昌起义后回到上海，不久去苏联学习，1930 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追随王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 年 3 月，奉王明派遣来到石首县调弦口，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书记。

夏曦宣布对湘鄂西党组织进行一次改造。周逸群，段德昌等一大批湘鄂西苏区创始人被夏曦等人斥为“富农路线”的代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统统排斥于党的领导机关以外。他用宗派主义政策，提升很多干部，如提升经验很少的杨光华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等。

不久，又撤了邓中夏的职。邓中夏是在 1930 年 8 月被党中央派到湘鄂西任红 2 军团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的。一个时期，邓中夏不听从贺龙劝告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方针，只想攻打大城市，忽视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红 2 军团由 3 万人减少到不足 2 万人。

红 2 军团缩编为红 3 军，贺龙为军长，邓中夏为前委书记兼政委，孙德清为参谋长。1931 年 9 月，中共中央撤销邓中夏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由万涛出任红 3 军前委书记兼政委。

邓中夏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他表示：“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接受。”夏曦、杨光华等人仍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对待邓中夏。急风暴雨般的批判和无限上纲，使邓中夏陷入苦闷中。邓被关在小房子里，加上疾病折磨，使他难以忍受。

但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根据切身经历和体会，向党中央写了一份 8 万字的检查报告。

几个月后，邓中夏按中央的要求化妆后回到上海，临时中央又停止了对他的生活接济，病中的邓中夏陷入困境。不久分配他到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刻钢版。他毫无怨言，仍然兢兢业业地辛勤工作。1933 年 5 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出卖，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被残害于南京雨花台。

夏曦派万涛取代了邓中夏之后不久，又派彭之玉取代了万涛，然后他自己又取代了彭之玉，这样，夏曦、杨光华终于实现了控制红 3 军的意图。

不料，许多人因对夏曦不满，以清算夏曦“右倾逃跑主义”为口号，同夏曦等人进行一场公开的抗争，争论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得诉之于党中央裁决。为此，中央分局和省委派少共书记宋盘铭去上海，请中央定夺。

当时的临时中央支持夏曦，肯定夏曦的所作所为。而绝大多数湘鄂西

苏区干部对夏曦十分不满，分歧并没解决。于是，再次派出中央分局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筠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请临时中央裁决。

临时中央再一次给夏曦支持。尉士筠本来是反对夏曦的，见临时中央全力支持夏曦，便改变了观点。临时中央又派关向应到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任命他为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3军政委。关向应同尉士筠一起于1932年1月返回到湘鄂西。

此时，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在临利县周老嘴召开。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70多人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夏曦的处境非常孤立。关向应和尉士筠回到周老嘴，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关向应、尉士筠到会之后，即分别找人谈话。次日，尉士筠首先在会上发言，说：“我去中央反映情况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私下嘱我要向中央控告夏曦，一定要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到中央讲明万涛的要求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并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现在我提高了认识，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经中央教育后，我坚决同万涛的错误进行斗争，争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关向应接着向大会传达了临时中央的指示，并表示支持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并说中央认为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厉批评，给予无情打击。

关向应发言之后，潘家辰当场气得昏倒在地。

这样一来，更加助长了夏曦等人的恶劣作风，杨光华也作了一个支持夏曦的报告。

许多人慑于中央的压力，从批评夏曦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等人，夏曦等人站稳了脚跟，更毫无顾忌地对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2年夏，夏曦、杨光华在第一次“肃反”中就杀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有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创建人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3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

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肃反委员杨成林，对夏曦乱捕滥杀政策起了疑心，质问夏曦道：“这些老党员为革命奋斗多年，逮捕和杀害他们缺乏证据。”夏曦认定杨成林有意包庇反革命。杨成林知道自己性命难保，便给夏曦写了一封信，谓：“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今后也绝对不当反革命。”尔后化装成渔夫，连夜出逃，以后一直下落不明。

“左”祸使洪湖革命区在几个月内被捕杀的达数千人。

一大批有丰富指挥经验的红军指挥员被诬杀，部队战斗力减弱。此时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左路军10万余人大举进攻湘鄂西苏区。在严重的形势下，夏曦便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围剿”，命令红3军主力在襄河以北活动，计划在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寻敌作战，开辟鄂中根据地。

7月2日，红3军第8师围攻京山县城，主力部队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敌左路军第四纵队阻止红3军南渡襄河，第一、二、三纵队则收缩靠拢，企图围歼红3军。贺龙率红3军撤围京山，向西转移。

夏曦由“进攻战略”一变而为消极防御，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要求红3军构筑工事，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进攻。夏曦多次召开会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在会上力主红3军开赴外线，寻机歼敌有生力量，打破敌人“围剿”。夏曦根本不听，他命令红3军不得离开洪湖，要红军用“两个拳头”打退敌人进攻。

8月11日，蒋军向湘鄂西苏区中心地区进攻。夏曦命令红3军攻打沙市、草市。红8师袭入草市，歼敌500余人；红7师攻打沙市失利，被迫撤出战斗。

红8师攻打草市取胜，夏曦得意忘形，遂作出决定，将红3军分为两路，一路由他自己率红7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构筑碉堡，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另一路由贺龙、关向应指挥深入敌后，转入襄北打击敌人。贺龙等不同夏曦的决定，再次提出集中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夏曦固执己见，决不收回成命，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向贺龙、关向应下达命令。贺龙说：“命令可以执行，但要两种作战方案电报党中央。”贺、关率红军主力北出后，蒋军对洪湖地区进行“围剿”，红7师付出了血的代价，部队遭受空前惨重的损失。夏曦仍对红7师指挥员说：“谁放弃阵地，就杀谁的头。”夏曦明知机关重地瞿家湾不保，便同杨光华等人商量撤退。红7师指战员正在浴血苦战，战士们喊着“誓死保卫苏区”、“誓死保卫瞿家湾”的悲壮口号，同敌人作最后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甚至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咬着敌人的耳朵死也不放。

此时，夏曦、杨光华考虑的是在撤退时如何处置被关押在瞿家湾地区的一大批“肃反”中逮捕的“犯人”。他们命令政治保卫局将1000多“犯人”押向洪湖，半数被枪决，半数被装入麻袋推进湖中。这些革命者没有死在沙场，却死在自己人手中。

夏曦、杨光华等已成惊弓之鸟，扔下后方机关和大批干部、群众不管，他们在红军战士保护下撤往江陵。蒋军惨无人道的血洗洪湖，一时间，血染湖水，尸横遍野，红军伤病员3000余人被敌人杀害，洪湖苏区几成无人区。

退入江陵后，夏曦命杨光华随第7师行动，一方面筹军饷，一方面相机处理江陵、监利“肃反”中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光华在白露湖畔的陈张台亲自布置杀害100余名被诬陷的干部、党员。

红7师退入白露湖、三湖、菱角湖地区后，敌人紧逼而来。身为省委书记的杨光华临阵脱逃。他找到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声言需要治病，索取了一批银元、衣物后，化装后逃往上海。杨在上海向临时中央写了篇洋洋数万言的奇文，粉饰夏曦，污蔑周逸群、万涛等一大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率红8师、红9师从浩子口进入荆门地区，在川军侧后牵动敌军。9月中旬，红8师、红9师渡过襄河，向鄂军侧后活动。不久又转到京山地区。

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夏曦将红3军兵分两路，命红8师、红9师出击襄北，他自己率红7师等部构筑堡垒、固守东荆

河南岸地区时，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去电报，谓：“红3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歼灭它的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夏曦对挫败敌人的“围剿”完全失去信心，对中央局的电报秘而不宣，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的作战方针。9月7日，敌军占领朱河。夏曦指挥红军向张金河转移，进入监利时，又同敌军遭遇，他命令红军突围，但又不能沉着镇静地组织撤退，以致人拥马踏，许多战士落入滔滔的河水。夏曦又将一大批地方党政干部强行遣散，许多人落入敌人魔掌，惨遭杀害。电台和报务人员也在混乱中丢失，从此通讯联络中断。

10月上旬，敌军各路“围剿”部队向根据地最后一块地盘江陵县沙岗地区合围。夏曦命王炳南、卢冬生率独立师掩护中央分局和省委书记向西北突围。夏曦这时到处寻找杨光华，后来才听李家芬说，杨光华要了一些银元和衣物走了，不知去向。夏曦大怒，但又无可奈何。便命李家芬代理省委书记，要他留在鄂西坚持斗争。

红军独立师突围出去后，在浩子口地区又被敌人包围。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才突围出去，渡东荆河，向襄北转移而去，在大洪山区同贺龙、关向应部会合。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后，便在枣阳王店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少人提出红3军开到豫西地区，甩掉敌人追堵，然后转移到陕南活动，再向汉中发展，待经过休整后，择机打回洪湖苏区。夏曦坚决反对，他说：“红四方面军可以放弃恢复鄂豫皖根据地，我们也可以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湘鄂边去。”会议争论了一天，夏曦拍板定案：全军转移到湘鄂边去。他主张走近路，强渡襄河、长江，直插湘鄂边。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计划。长江号称天堑，襄河、长江这一段敌军已经设重兵扼守，从这里穿过，凶多吉少，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主张红3军应寻找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先进入豫西，然后取道川东，再向湘鄂边开进。

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夏曦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11月初，贺龙率红3军1.4万人，从随县以北出发，开始了7000里远途大转移。

夏曦在艰苦的远途转移中，仍然一意孤行，进行所谓“火线肃反”，又诬杀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等。夏曦此时信任姜琦，让他担任政务处长。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红军边走边打仗，有时逮捕的人多了，就将这些人编成一队。在翻越秦岭南脉时，姜琦将100余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枝枪和其它东西。这些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即使如此，夏曦还是下令，将100余人在一个夜间枪杀，只有一位卫生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幸存。贺龙对夏曦捕杀十分不满，质问夏曦：“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夏曦便起杀害贺龙之心，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大怒，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贺龙将自己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夏曦张口结舌，悻悻而去。他慑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威望，终于没敢动手。



红 3 军转移到湘鄂边后，部队由 1.4 万人减少到 9000 人。1933 年 3 月，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进行第三次“肃反”，杀害了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红 9 师参谋长王炳南等 236 人，不久又进行第四次“肃反”，杀害了红 9 师政委宋盘铭、红 7 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 172 人。

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在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作诗一首：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

被夏曦依重的杀人如麻的魔王姜琦，在第四次“肃反”中暴露了特务身份。

1933 年初夏的一天，红 3 军侦察连长肖美成和军部张副官在鹤峰麻水附近捉到一个敌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的密信，经审讯，敌探承认是受四川军阀郭勋指派，已数次同姜琦秘密接头。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十分尴尬，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姜琦被击毙，红 3 军除去一大害，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

“肃反”扩大化使红军人员锐减，1934 年 4 月，红 3 军只有 3000 余人，到了覆灭的边缘。

## 第二十章 卖命不讨好

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一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地进行“围剿”。

早在 1932 年 4 月，蒋介石就命心腹大将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陈伯南为副司令。何应钦在南昌设立“剿匪”总司令部，并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 3 路，中路军总指挥为陈诚，左路军总指挥为蔡廷锴，右路总指挥为余汉谋。1932 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1933 年 1 月 1 日，蒋介石命前敌总指挥陈诚率 50 万大军的主力中路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 3 路军分途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犯，置主力于中路。

1 月 27 日，蒋介石由南京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他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军事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青年。”1 月 31 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蒋又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不料，司令部外一声报告，张学良派来的特使要面见蒋介石，言边关事急，日军于 1 月 3 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危机加深，如热河再失，平津难保，如此如何向国人交待？蒋介石沉吟半晌，无奈，遂电告张学良同意抗日。

50万“剿匪”大军闻山海关失陷的消息，驻足不前，侵略者杀进来了，中国军人为何不驰往北方前线，还在这里中国人杀中国人？有数万国民党军人对天鸣枪，表示愤怒。

高级将领也要求立即回军北上打击倭寇，并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允许。冯玉祥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说：“譬如一家弟兄3个在家打架，外面有10个土匪打上门来了，并已打开了门进来了，这3个弟兄，还不住手，还要杀掉1个再来对付10个土匪，这样削弱自己的力量是什么道理？”蒋介石把电报撕得粉碎，怒斥道：“我不是讲过多次了吗？日本的外来侵略不过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痛毒，匪共的捣乱才如同内脏里的毛病，是先治心腹大患还是先治皮肤病毒，你们难道没有脑子吗？”蒋介石督促5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中央苏区推进。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因处境恶化，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到中央苏区，1933年二三月间，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人员先后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在王明控制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立刻把党政军全部权力抓到手里，他们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左”祸来临之后，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打击。首先受害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曾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巧遇毛泽东住院，两人谈论革命策略问题，罗明非常赞赏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罗明出院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谭震林、刘晓、张鼎丞、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

罗明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并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认为党在杭、永、岩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

临时中央见到罗明的报告，十分不满，令杭、永、岩战区动员1000余人参加红军，组织一切力量同国民党军作斗争。罗明见敌人大举进攻和摧残前线地区的人民群众，民众恐慌不安，情绪悲观，他们愿意参加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保卫家乡，而不愿参加主力红军。罗明又根据这些情况写出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赣省委的报告》。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立即作出决定，撤销罗明的职务，并在福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职后，被软禁在瑞金，还召开了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大会。有少数无知的青年干部竟高呼“枪毙罗明”的口号。刘晓、谭震林、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也受到冲击。反“罗明路线”斗争一直到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下来，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都遭受打击。

接着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即邓小平，是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即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中共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即谢唯俊，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即古柏，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的。一大批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过、拥护毛泽东的观点的人，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撤去中华苏维埃工农检

察人民委员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毛泽东心里明白，博古等人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头头，就是他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率领下，于1933年1月2日从黎川出发，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5日和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和9日，又在浒湾同蒋军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

不料博古头脑突然发热，命周、朱夺取中心城市，一日数电指令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南丰和南城、抚州。

周恩来、朱德抗命。1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攻城五不利：“一是暴露意图，二是易受夹击，三是损伤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2月1日，周恩来、朱德并未按照中央的指示一味“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佯攻”战术，围点打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军围攻南丰，敌人势必救援。2月7日，周、朱指挥红军佯攻南丰城，陈诚得报后，认为是消灭红军的好机会，立即命令中路军的3个纵队迅速向南丰、黎川方向开进，企图实行内外夹击，围歼红军于南丰城下、抚河西岸。

红军佯攻南丰一星期，周、朱得知蒋军果然来增援，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留少量军队继续围南丰城外，主力红军撤围南丰，以迅速、秘密、坚决的原则，折而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南团、吴村地区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机破敌。周、朱又以红11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街公开渡河到黎川附近活动，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东移黎川，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远远调离周、朱布置的战场，集中红军主力对付敌之第一纵队。

敌增援南丰的主力是第一纵队的52师和59师。其行动路线是由乐安向南丰开进，准备由黄陂、东陂、新丰市截击红军。敌军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红军主力所在，放心大胆东进。

2月26日，周、朱命红军主力冒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点星夜秘密北上，荫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敌之第一纵队孤军深入，前进到黄陂地区，翼侧完全暴露于红军主力面前。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望远镜中看到52师大队人马来到登仙桥大龙坪，师长李明骑马走在队伍中间，他当机立断，命令预先埋伏在敌军进路之固冈、登仙桥以东及河口、黄陂之间的摩罗山、章山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出其不意地发起猛烈进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52师大乱，数小时激战，几近全歼，师长李明身披雨衣浑身是泥，被活捉了。28日，又围攻59师，激战近19小时，歼灭59师4个团，师长陈时骥在部队溃散后，窜逃于荒山中。

陈时骥以为52师安然无事，特写一信向李明求援，云：“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陈派人将信送来大龙坪，被红军战士缴获。因而陈时骥及其残部在当天夜间被红军截住消灭，陈时骥被活捉。

原来蒋介石把52师、59师合编为第五军，命罗卓英为军长，外加11师编成第一纵队，罗为纵队司令官。罗电约52、59两师于3月4日到达新丰市，举行军长同全体官兵见面式，谁知两师竟在2月下旬被红军消灭，罗卓英空做了一场军长和纵队司令官的美梦。

黄陂战役一打响，蒋军第二、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周恩来、朱德率

领红军主力于3月1日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待机继续歼敌。

陈诚苦心经营的第52师、59师遭红军主力全歼，甚是恼怒。蒋介石专此致电陈诚安慰打气说：“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费5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周恩来、朱德利用敌军在黄陂失利后并不甘心，急于反扑的心理，部署对敌军新的进攻，命红11军向广昌佯动。这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于是改变战略，将3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即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由宜黄徐徐向广昌推进。接着又从后梯队抽出1师加强前梯队。红军主力则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梯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的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3月20日，敌军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已有100里，后梯队在山路上又是一字拉开，前面的第11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后面的第9师还在东陂。第11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很强，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前后难以呼应。

周、朱已命红五军团、红12军以及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隐蔽于广昌北面之东陂、草台冈南侧地区；命红1、3军团、红21军及独立第5师为左翼队，隐蔽于东陂、草台冈西侧一带山地。

蒋军第11师、第9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内，周恩来、朱德命红军采取迅雷手段，乘着大雾向敌发动进攻。

3月21日拂晓大雾弥天，红军突然杀出。红军战士奋勇向前，与敌人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10余次，敌人在崇山峻岭被迫应战，优势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战斗进行到下午1时，终于将敌第11师和59师残部基本歼灭，师长肖乾重伤逃脱。

第二天，红军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人乘夜溃退黄陂，敌之前梯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至此，蒋介石的第4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历时50天，黄陂、东陂两次大战，丧师失械，3个精锐师被歼，1万余人被俘，被缴枪万余枝，最新式机关枪300余挺，大炮40门。

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等尚未开箱，就被红军缴去。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民兵前来帮助打扫战场，搬战利品，1个星期才搬完。

蒋介石写信骂陈诚说：“如不击退赣匪，即不要回见总司令的面。”陈诚得知11师被歼的消息时，震惊得几乎晕倒。他对收容的残部大骂：“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52师、59师和11师被歼后，蒋介石痛心如割，恨不能立杀陈诚，他给陈诚写一手谕：“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见蒋手谕，打自己的耳光，在手谕背面写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罗卓英写信给在南昌住院的第11师师长肖乾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罪人。”重伤将毙的肖乾愤愤然说：“剿共受伤住院，头都不敢露，而25师师长关麟征抗日受伤住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两下相形，谁愿干这卖命不讨好的事？”陈诚怒视肖乾：“委员长让干，你就得干！”肖乾无言。近视之，溘然已死。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之后，于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州国”傀儡政府，把他们豢养多年的宣统皇帝溥仪拉了出来，粉墨登场，扮演傀儡“执政”，后改为“皇帝”。

由于溥仪的出场，清朝遗老遗少纷纷登场，如郑孝胥、罗振玉、胡嗣媛、陈曾寿、宝熙那厮都成了汉奸角色。日本又拉拢一大批奉系军阀的军政要员，拼凑傀儡政府。

日本将我东北地区分割为 14 省，利用一批汉奸为傀儡省长，日本人为次长，由次长发号施令。省下设厅、局、处、科长，也是启用一批中、小汉奸任职。投降日本关东军的奉系军阀部队达 11 万人。

奉系军阀“红人”邢士廉被日本人任命为伪军事部大臣。

邢曾在 1925 年 5 月 30 日血腥镇压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备受张作霖信任，直步青云，先后任东北陆军第 20 师师长、兼任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最后当上了张作霖的侍从武官。东北“易帜”时，任辽宁省政府委员、东北委员会委员、东北讲武堂教育长、边防司令官公署顾问，加官晋级，十分得宠。但国难当头，他一枪没放，首先叛国投敌，当了汉奸。他被日本人任命为伪政府军事部大臣，受宠若惊，并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将东北重新划分为 11 个军管区。军管区的司令官均由投降叛变之徒中遴选，大多数是东北军军官。后来又由日本直接培养出来的奴才充实各级机构。

1933 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1 月 6 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蒋介石对长城抗战采取一箭三雕之法，一是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二是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三是迫张学良下野。

两广方面不满于蒋之误国，曾屡发通电，坚持主张对日抵抗，而蒋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派黄绍竑南下，与粤、桂当局洽商“协助剿共问题”。蒋并亲笔致函李宗仁要其“不分地畛，鼎力协助”，允以资助巨款，声言：“剿匪期间不准轻言抗日。”蒋介石一意孤行地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策。

蒋之横蛮行径深深地激怒了西南当局。2 月 2 日，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正式议决成立由闽、粤、桂 3 省联合组织的西南国防委员会，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蔡廷锴、蒋光鼐等任委员，于 6 月正式办公。8 月，胡汉民代表委员会发表公开讲话，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之口号，指斥蒋之“攘外必先安内”论纯属“规避责任之遁辞”。

闽、粤、桂 3 省组织抗日先遣军，公推 19 路军军长蔡廷锴为联军前敌总指挥，各省抽调 1 独立师，交蔡统率北上。后来 19 路军谭启秀、张炎两部抵湘境之郴州，粤、桂部队也开至三水、军田和乐昌。蒋介石闻讯，严令出发军队退回，并申令：“南方党政军各同志，在匪未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3 省出征之部在请纓无路情况下，忍痛回师。

北方抗日前线，张学良悲愤异常，东北三省丢了，山海关也于 1 月 3 日失陷，日寇以锦州为基地，眼看要入侵热河。

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终于支持张学良抗日。

1 月 8 日，张学良为山海关失陷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生命来保卫和平，来保障中国，除此之外，再无别的选择！我们要用武力阻击日本！要让日本看到我们中国有能力阻击他们，打败他们！”张学良电请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及晋军增防热河。张又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讨论对日大计，表示有中央作后盾，他张学良决心遏制住日本的进攻。蒋介石说：“很好，很好，我派力量支持你。”日本全部兵力 10 万人，司令官是武藤信义大将，兵分 3 路进攻热河，一路由辽西向朝阳、凌源、平源；一路由开鲁向赤峰；一路向多伦一带，拟 3 路围攻承

德，克承德后，再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入热河布防。他以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的名义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的旧部、冯玉祥的旧部与张宿怨未消，张难以指挥。东北军单独抗战无把握取胜，张唯一的办法是求援于蒋介石，但蒋介石仅调中央黄杰的第2师、关麟征的第25师、刘戡的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

2月中旬，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等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蒋对这些人各派用场。宋子文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持，其实是要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私下说话，要张学良下野出国，同时走英美外交路线。何应钦似乎是作军事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黄绍竑表面上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实则各为各方面政治上奔走，做些“安内”的工作。

## 第二十一章 热河热土

张学良成立两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于学忠、商震、宋哲元分任1、2、3军团长；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由万福麟、汤玉麟、张作相分任4、5、6军团长。

张作相、汤玉麟原是张作霖的老把兄弟。张作相是张学良的父辈，素有“浑厚”之名，他原担任吉林省边防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但他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又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他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有六七万人。汤玉麟又是热河省主席，在东北军中素以骄横跋扈著称，外号“汤大虎”。他在热河省命其二儿子汤佐辅为财政厅厅长，大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长，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以充军饷为名，中饱私囊。汤家父子老少“3虎将”热河省造成人间地狱。张学良本来见汤玉麟难挡国防要塞，有撤换汤的意向，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与汤玉麟交情极深，深知汤为人蛮横，绝难接受命令，请张学良考虑，张学良未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事为汤玉麟所悉，大为愤懑，表示坚决反对，阴谋同伪满勾结。张作相得到消息，深恐因此造成东北集团分裂，即派亲信到承德向汤陈述利害，进行劝解，才使矛盾缓和。张学良怕汤玉麟再起疑心，用张作相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以安汤心，以利指挥。

2月16日晚，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他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准备划防地，首先仰面向宋哲元说：“明轩，你可把守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宋哲元厉声道：“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张道：“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张极感难堪，约有几分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说：“再商量吧！”次日，张学良、宋子文、杨杰等偕同随员卫兵分乘汽车卡车30余辆，浩浩荡荡向热河省会承德进发。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左右

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视察，阁帅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并率文武官员数十人欢迎。

张学良在承德，以他和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 27 名守卫热河有责任的将领的名义，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

张作相听说发出通电抗战，生怕日本人恼怒，加速进攻热河，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岂不是惹祸吗？”张学良、宋子文于 2 月 19 日返回北平。

3 天后，日军大举进攻热河。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已在防线的汤玉麟第 5 旅旅长崔兴武即首先投降，守凌源一线的万福麟的第四军团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线阵地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向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3 月 4 日晨，在承德的汤玉麟望风而逃。

万福麟谎报军情，逃入喜峰口，汤玉麟不战而退，遁往滦平。日军以少数快速部队，长驱直入。倘日军由承德乘胜追击，轻骑疾进，在这无阻拦的道路上，一日夜可直捣北平。华北局势，危殆万分，非杀一二统兵大员，不足以维持军纪。万福麟在退入喜峰口后，电张学良要求回北平一行。张气愤地说：“要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来见我！”张学良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的建议，将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张学良调动部队，加强古北口的防御。又派代表去张家口，向冯玉祥通报战况，特请冯给予指示。冯玉祥希望张学良亲到滦州指挥，悬重赏克复山海关，并夺回锦州；要张直接电蒋，要所有的骑兵由经棚东山，抄敌后路；要张与民合而为一地去抗日，并释放政治犯，鼓励张报父仇，雪国耻。

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愤怒谴责南京政府，也谴责张学良。张学良决心抗战，他对部下说：“我与蒋先生约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要求补充 1200 挺轻重机枪和 300 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人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3 月 6 日，蒋介石自南昌北上，8 日通知张学良去保定相见。9 日，张学良到了保定，蒋介石却未如约到达，而让宋子文先来传他的话：“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全国人民谴责政府，中央政府责无旁贷，蒋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张学良说：“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请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宋子文立即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介石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5 个小时后，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的卫兵吹迎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

蒋不待张开口，首先很庄严地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

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喏喏地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阴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连说：“是的是的。”张看蒋不愿多谈，即行退出。

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 5 分钟，蒋偕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劝他次日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要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

蒋介石临走时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蒋即乘专车回石家庄。宋子文同张学良商谈，将东北军分编组为 4 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 4 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并调中央军黄杰师和关麟征师开赴古北口，以抵抗日军前进。

张学良乘自己的专车向北平进发，他在车厢的卧室里，猛一拳打在床上，随即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和王卓然闻知，过来劝他：“作为一个大丈夫，要勇敢、坚强。你还记得老师的话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的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张学良一跃而起，仰天狂笑：“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出什么戏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我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我仿佛记得林肯有这么几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3 月 11 日，张学良通电辞职。偕夫人于凤至、秘书赵荻小姐及 3 个子女等去德国、意大利“考察”。

日本大举入侵，举国震惊，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及抗日团体，都把目光投向冯玉祥。冯玉祥得知日本人占领山海关的消息时，曾毅然决定把自己在张家口的房产押出去，为前方将士做了 1 万件大皮坎肩，用去 4.8 万元。

邹鲁等人于 1 月 5 日从广州密电冯玉祥：“榆关已失，华北危机，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冯立即分别密电广州、上海的李烈钧、徐谦、程潜等国民党中委，呼吁：“现在已至最后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他痛斥蒋介石，并表示以与暴日作殊死战，提出：“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章太炎从上海给冯玉祥的信说：“自榆关陷后，弟私念今日与敌人决一雌雄者，唯兄一人。兄忍辱负重，得之天性，但求立功报国，何计委任之出谁手乎？”力劝冯迅速率军杀敌。

冯玉祥与共产党的接触更加频繁，向共产党提出派干部同他一起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共产党员张存实、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等来到冯玉祥那里工作，共产党员宣侠父也以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的身份来到察哈尔。

冯玉祥派人去北平拜见著名爱国人士朱庆澜，去天津找吉鸿昌（已加



入共产党) 石友三。请朱庆澜在饷项上帮助，朱慨然答应。吉鸿昌立即去张家口，高兴地对冯说：“我是绝对要抗日的，冯先生不找我，我也打算来，我决心以身报国，万死不辞。”吉鸿昌与冯玉祥共举抗日大旗，石友三则拒不参加抗日。

蒋介石、汪精卫那厮对冯以武力准备抗日十分恐慌，屡电劝冯晋京。1月21日，孙科电冯，称蒋“敦请”冯等齐集首都，协谋御敌，表示甚诚。冯复电道：“倘介石先生有决心抗日，就应立即兴师，以未死之人心，复已失之国土。”国民党中执会再次电冯回京“共图大计”。冯复电说：“组织统一指挥之军事机关，统筹抗日军事之全盘计划。立即调遣精锐部队开赴热河、滦州等地最前线，严密布防，相机进击。并派兵防守河北、山东、江苏各海口，以防日军扰乱，再准备充实之预备军，分驻于山东、河南、河北、察哈尔，以厚兵力，派专员设置兵站于大军行径各地，以源源接济给养，免向民间勒索，义勇军之一切子弹饷精，应予以充分接济。恢复各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南京政府又先后派王法勤、黄少合、王月芝、李烈钧、马伯援、黄绍竑、熊斌、王懋功等来张家口劝冯进京，3月中旬，蒋介石驻保定，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去见冯玉祥，邀他到保定会晤，冯派陈希文代他到保定见蒋，提出：“(1) 不可与日妥协。(2) 补充前方饷械弹药。(3) 抚恤伤亡官兵。(4) 请蒋亲率大军出关收地。(5) 政治刷新，与民更始。”3月24日，孙科再次电约冯去保定晤蒋。冯函复蒋说：“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使，亦不敢辞。”5日后，黄绍竑、熊斌来见冯，劝冯南去，冯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冯玉祥在张家口加紧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派出代表多人与自己旧部和各地联络。

张人杰和鲍刚两部首先响应，并派人去南京密约方振武。方振武即潜回山西领导张、鲍二部，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将军队开往张家口，与冯会师。驻山西汾阳的军校，系冯的嫡系，该校的领导骨干和学员多为共产党员，4月末，全校师生3000余人经长途行军，来到张家口。

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向南侵犯，沽源失陷，察哈尔的形势日益险峻，武装抗日已刻不容缓。齐集在张家口的各部队和各团体、各地区代表经共同协商，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冯玉祥于当日发表通电宣告就职：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迨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22年5月26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

冯派兵占领察哈尔省政府，撤销了原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仵墉，查抄了国民党蓝衣社派遣的特务机关“张家口骡马补充所”。委任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张砺生为警备副司令。同时发布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

此时长城边上正打到激烈处，日军既占热河，又攻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意在越过长城，进逼中原。原属冯军的宋哲元部奋起抗击，将士用大刀与日军拼杀，使日军不得越喜峰口。冷口守军商震部 32 军也奋起抗击，日军狼狈，不能推进。此处受挫，日军改由山海关向滦东进攻，占领石门寨后两面夹击冷口，进占冷口后，再占喜峰口和古北口，之后强渡滦河，侵袭滦西，冀东 20 余县均为日军占领。平津危急！察东危急！

蒋介石守定对日的既定方针，不抵抗，一味请求国联主持“公理”。5 月 3 日，蒋介石同汪精卫命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黄郛与日方代表交涉。黄郛在上海、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何应钦在北平来不及请示蒋介石，就同意日方提出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并由黄绍竑专程去庐山向蒋介石面报。蒋介石要汪精卫、孙科都到庐山听取黄绍竑汇报。

蒋在黄绍竑发言之后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5 月 27 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迭此复电，妥为运用，审慎规定，万一谈判决裂，只有不顾一切，并力死拼，尤应及早准备，北方内容复杂，前途困难，中岂不深知，递应尽吾人最后之努力，以尽其职责，不得不然耳。一切成败利害，不必再计，吾人荣辱同体，断不令兄等独任其难，艰危至此，全赖兄精心毅力以撑持，幸勿稍存消极，倘战事再发，中当此行，同生共死。”何应钦遵照蒋介石旨意，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谈判。在此期间，汪精卫电示黄郛说：“除签字不承认伪国（满洲国），割让 4 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允。”熊斌与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 19 个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给了日军以侵华的特许状，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协定签订后，汪精卫致电何应钦、黄郛：“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蒋介石、汪精卫等与日妥协，暂且不提。北平、天津及华北等地的爱国青年和学生纷纷涌向张家口，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民众抗日同盟军已达 10 万之众。6 月 15 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共产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等都出席了大会。会上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会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等数个决议案，确定民众抗日同盟军各军长官：

第 1 军军长	佟麟阁	参谋长	何章海
第 2 军军长	吉鸿昌	参谋长	崔贡琛
第 5 军军长	阮玄武		
第 6 军军长	张凌云	副军长	徐福胜
第 16 军军长	李忠义		
第 18 军军长	黄守中		
第 5 路军总指挥	邓文		
第 6 路军总指挥	刘桂堂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	孙良诚	参谋长	傅同善
察哈尔自卫军军长	张砺生		
抗日救国军总指挥	方振武	参谋长	阮玄武
抗日救国军属下之第 1 军军长	张人杰	参谋长	李庭华

之第 4 军军长 米文和  
蒙古军之第 1 军军长 德穆楚特栋鲁普  
之第 2 军军长 卓特巴扎普  
之自卫军军长 富龄阿  
总部直辖 4 个独立团和 1 个卫队团。  
警备司令 张允荣  
交通司令 高树勋

冯玉祥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以张作相领衔东北军 50 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上海的马相伯、章太炎等发来贺电，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来函，表示衷心拥护和祝贺。

6 月 20 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统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方振武不愿留在后方，执意要上前线，与敌人一决雌雄。冯又任命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

民众抗日同盟军由于有共产党人随军鼓动宣传，官兵士气高昂，沿途又得到农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大军所向披靡。6 月 22 日攻克康保城，7 月 1 日收复宝昌。

冯玉祥及抗日同盟军的英雄业绩，给全国人民带来胜利的希望。连日来，全国各地抗日组织和团体、力主抗日的著名人士纷纷发来电函，热烈祝贺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踊跃捐款捐物，进行慰劳。

但是，蒋、汪则反其道而行之。当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初，何应钦电告冯玉祥，请其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蒋介石从南昌致密电汪精卫：“冯有今日，固早预料，今其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随即，蒋又以官位和金钱拉拢收买冯的部下及愿与冯合作的将领。蒋的挖心战术，使冯占海等先后离去。何应钦还拟以孙殿英主持察政。

蒋介石谋派兵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武力镇压，他密电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派人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察政，离张家口，另谋安置。此计不成，何应钦命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各部，自 7 月 8 日起分别行动，分 3 路向抗日同盟军围攻。孙殿英部将原沙城一带防地腾出，由庞所指挥的部队填驻。“围剿”抗日同盟军的国民党大军，已压察境。

7 月 10 日，冯玉祥致电李烈钧大呼：“现我军正进至多伦西、南、北城关附近，于贼肉搏中，宁方竟公然调兵遣将，将入察攻我。此真千古奇闻，亦人类变局也。”呼吁李烈钧在南京“联合正义义士，为我义师主持正义。”此时，抗日大军分 3 路围攻多伦。多伦系察东重镇，日寇茂木骑兵旅 3000 余人及伪军李守信部驻防，防守固若金汤。吉鸿昌总指挥在晚间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爬城 3 次，均未奏效。7 月 11 日，同盟军将士舍生奋战，与敌以大刀肉搏，仍久攻不下，战斗惨烈，伤亡甚重。冯玉祥悲愤交加，向前线抗日将士发出多伦最后决战以死报国电。冯的电报给了浴血攻城的将士以极大的鼓舞。

7 月 12 日，吉鸿昌急中生智，派精兵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始将多伦城攻破。又经 3 个多小时的巷战肉搏，方将残敌彻底击败，失守了 72 天的多伦，经过 5 昼夜血战，终于被民众抗日同盟军光复。同盟军士气高涨，乘胜挥师，不久，将察东各县失地全部收复。

共击毙日伪军 1000 余人，抗日同盟军有 1600 余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生

命。

## 第二十二章 “恨不抗日死”

庞炳勋部进逼张家口。日、伪军顿时耀武扬威，气焰嚣张。日本驻平武官柴山于7月16日叫嚣对抗日同盟军“加以膺惩”。冯玉祥严词反驳，并要求日军退出东北4省。

多伦攻克，察哈尔全省光复，冯玉祥决心自率10万饥疲之士，进而为收复4省之谋。

7月27日，冯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4省计划委员会”，亲任委员长，并发出成立通电：“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何应钦见冯拒不理睬他们的“软”、“硬”两手策略，便借日军的力量来压垮冯。

何主动与土肥原贤二联络，秘密商定要日、伪军协助他夹攻抗日同盟军，以平贺及茂木两旅团，联合伪军张海鹏部，向察东大举进攻。

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向冯玉祥发出俭电，向抗日同盟军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又增调了5个师参加“围剿”抗日同盟军。至此，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16个整师，15万余人，铁甲车8列，飞机2队，在怀来设机场。

冯玉祥只有“引领云天，鹤候明教”了！7月31日，他向全国发出世电：“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顾念国难之严重如此，而豆萁之煎迫，又复如此。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祥自兴师抗日，迄今已67日矣，究竟赤化察省与否，与确保察东失地与否，事实俱在，容有见谅于国人者，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唯恐察哈尔省地盘落入蒋介石、何应钦之手，极愿宋哲元回察主政。可宋哲元却表示不愿在抗日倒蒋旗帜下，听冯指挥。冯虽多次电请宋回来，终未实现。8月4日，冯不得不发出电报：“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不少人认为冯玉祥这样做是“屈服”表现。冯听后大笑：“他们不明了当前形势。

目前国贼已和日寇勾结，已安排了进攻察省的计划，我们的枪械窳陋、弹药短缺，如果不迎宋返察以增实力，怎能御敌？”8月7日，蒋介石、汪精卫电约冯玉祥赴南京“共商大计”，冯复电婉言拒绝。冯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总部设宴送冯，冯心伤至极痛，不忍参与惨别。

宋哲元于8月12日由宣化到张家口，冯玉祥到车站迎接，含泪与之握手，哀伤无以继言。冯已身束于人势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泣而不敢痛。他接见宋哲元及29军将领，商酌今后察政与目前应做之事后，于8月14日乘火车离开张家口，满怀一腔未酬之报国壮志，重登泰山。

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后，方振武和吉鸿昌在张家口附近的老君庙召集抗日将领集会，宣誓：“举义之日，已有死志……既不辞玉碎于强敌，更何求瓦全于汉奸……。”誓毕，众人端起斟满的白兰地酒杯，一饮而尽。会上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贼军，方振武任司令，吉鸿昌任副司令。

蒋介石继续向抗日讨贼军进逼。方振武和吉鸿昌率部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沿途一面抗日，一面宣传民众，颇得民众的同情和拥护。司令部还派刘宝斋等人去北平秘密地与驻北平西苑的东北军3个师联系，东北军同意和抗日讨贼军一起发动北平起义，只要抗日讨贼军能打过潮河，占领北苑，他们就在西苑起义。方、吉2人遂决定由昌平县西北附近的一个峪口，越过昌平，指向东南，直捣北平。

抗日讨贼军行至高丽营子时，于学忠军一部驻在此地，阻止抗日讨贼军的去路，抗日讨贼军遂忍痛将该部缴械，继续向北平推进。抗日讨贼军过了昌平，遭到蒋军25师攻击，且蒋军援兵源源而来。

抗日讨贼军同蒋军在潮河北岸同南岸的蒋军激战八九日，双方伤亡很大。抗日讨贼军逐渐陷于被蒋军四面包围的状态，东、西、南被蒋军包围，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用野炮不分昼夜地向抗日讨贼军轰炸。伤亡很大，只剩下约1万人。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蒋、日军的兵力超过抗日讨贼军10多倍，且装备优良，弹药充足。

抗日讨贼军处在万分危急之中。北平8大团体，包括各国领事团在内，倡议和平谈判，保证方、吉2人生命安全，军队由蒋介石改编，师以上不咎既往，旅以下发资遣散。方振武、吉鸿昌不得已去顺义县商震部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徐庭瑶见面。徐当即密报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请示处理。何遂密电蒋介石。

是日中午，商震欢宴方、吉，徐庭瑶作陪。欢宴中，方、吉托辞到厕所去，去而不归。徐问商震：“怎不见他们回来？”商震佯装不知，叫部下去厕所查看，杳无踪影。

原来，方、吉早已乘坐商震给他们备好的汽车迅速向天津方向开去。

徐庭瑶电话通知25师派兵把守通往天津的一切通道，不准放过任何人。同时派一连人乘汽车追缉。

方、吉发现后面远处有军车追来，方振武要吉鸿昌同他在一个村子下车步行躲避。

吉鸿昌说：“你先下去，让我把他们再诱追些时候。”方振武下车后，单独离走，后来雇了一头脚驴，骑到天津，尔后搭轮直驶香港，由香港出国。

吉鸿昌到天津后，隐居在法租界。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系特务击伤，送往法国医院治疗，由蒋引渡逮捕，解往北平。

何应钦为“冠冕堂皇”地杀害吉鸿昌，煞费苦心搞了个“军法会审”。结果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何应钦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匆忙结束了这场“军事审判”的滑稽戏。

蒋介石令何应钦将吉鸿昌就地枪决。吉鸿昌毫无惧色，他踏上刑场，随手以树枝作笔，在地上写下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西北军将领任应歧同吉鸿昌一起受难，任对吉道：“我死了倒没什么，你死了太可惜，国家正用得着你！”吉鸿昌皱起眉头，抱怨地说：“在这个时候，你干嘛还这样。”他又冲着执行的特务们说：“让他先走一步，我要送他一送。”特务们答应了，枪响了，任应歧倒下去了。

吉鸿昌向特务们招招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快搬张椅子给我！”特务们不敢违拗，吉鸿昌端坐在椅子上，又说：“到前面开枪去，我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我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看反动派的子弹怎样打我！”执刑的特务只好走到吉鸿昌的前面，面对面地举枪。

吉鸿昌瞪起两只大眼，高喊：“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后，吉鸿昌直坐在椅子上牺牲，此是1934年11月24日之事。

蒋介石在南方筹划对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他总结前四次“围剿”不利的经验，古人云：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为“利其器”是绝好的办法，决定在战前进行思想训练，拿出半年时间对官兵进行心理医疗。

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剿匪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次日，又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们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蒋介石作了《统军作战制胜之道》、《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讲话，还解释了所谓的“得胜歌”。蒋在讲话中极力鼓吹：“现在我拈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1）受伤不退，被俘不屈。（2）生而辱，不如死而荣。（3）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4）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是蒋搞的一次心理战。

蒋介石返回南昌后，于5月中旬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演说。

5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随后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是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诸多报告。

蒋介石在紧锣密鼓的“剿匪”部署之中，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聘请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计划和讲授“剿共”的军事战术。

自7月18日，训练团正式开训，至9月，先后办了3期，共受训了7500余人，大都是蒋的嫡系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蒋介石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蒋介石亲自编写了《剿匪手本》作为教材。其书分绪言和6篇正文、绪言主要讲“剿共”4年，损兵折将，“反使匪势一天天猖獗起来，其根据本原因，就是革命军人主义不明，意志不坚等；以后要认识主义，发生真信仰”，云云。正文有“救民”、“气节”、“纪律”、“智勇”等篇，各有名堂，如言“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国维不张，

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胡言乱语，不一而足。

蒋介石不仅为每期作了开学训词的报告，并先后作了 25 次专题讲话。

蒋军经过训练，果然面貌大有改观，确比过去狡猾、谨慎、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红军打埋伏，如何依靠堡垒与红军作战而很快缩回堡垒去，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察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等等。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庐山脚下星子县举办了党政人员训练所，目的是要党政人员更好地推行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蒋亲自讲授了《党政工作人员须知》，要求党政人员具备“克己复礼”的人格修养，要他们做到为“剿匪”去死。

训练结束，蒋介石踌躇满志，调动 100 万大军，200 架飞机，并于 10 月上旬在南昌召集“进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部署军事进攻。

蒋介石请德国的赛克特以及维撒尔、克雷伯尔将军和 17 个德国参谋部军事专家当顾问，采用持久战和碉堡战政策，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割，分进合击，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四面包围，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绝不轻进。紧缩根据地，最后靠优势兵力寻红军主力决战，从而一举歼灭。

举世闻名的碉堡战术，即系此时所倡。

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 10 万人，因而，博古等人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而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

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主席职务由项英代理。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不久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局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发了一个长电，要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即分成中央军和东方军，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要东方军先打闽西的 19 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地区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这个作战计划。后来被毛泽东讥之为“两个拳头分开来打人，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周恩来、朱德也不同意这样的作战计划，并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三令五申，要他们彻底地最坚决地执行这一计划。

军委命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东方军于 7 月 5 日入闽作战。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战士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仍然打了很多胜仗。

9 月，一位年轻外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来的奥托·布劳恩，即李德。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员，因参加德国中部工人起义被捕，后越狱逃往苏联，加入苏联红军，晋升很快，任苏军骑兵师参谋长。后被送到陆军大学进修，1932 年毕业后被派到中国来，当年秋

来到上海，即经常和博古等接触。由于博古不懂军事，项英也不太懂怎样指挥打仗，在博古的邀请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下，李德被秘密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当军事顾问。博古便依靠他主管军事领导工作。若按共产国际规定，“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而且必须听命于中共中央。但是，博古和项英竟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指挥权，使他成了共产国际派的“钦差大臣”，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博古等人唯李德之命是听。这样一来，蒋介石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博古也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蒋介石没有把权力交给顾问，而 25 岁的博古却把权力交给了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用教科书中的条条和他在苏联红军中的作战经验对照地图，制定作战计划。李德年轻气盛，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他的作战计划，往往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

9 月 25 日，蒋军 3 个师进攻黎川。中央苏区的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肖劲光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闽赣军区的主力部队红 19 师已被抽去参加东方军，到福建去了，其独立师又被调往他地，归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黎川城内守备薄弱。肖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方向，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遭到博古、李德、项英等人的拒绝。黎川在敌我力量悬殊、后路将被全部切断情况下，肖劲光带队撤出，退到城外 60 里的溪口，避免了遭敌包围消灭的危险。

敌人于 28 日占领黎川。

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在福建同 19 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向黎川前线前进。

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不预期遭遇战中，歼灭了由黎川向洵口、飞鸾游击侦察之敌 3 个团，生俘敌第 6 师第 18 旅旅长葛仲山。这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使李德、博古得意忘形，并引以为据，提出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全线出击，以抵御敌人的进攻。

遂命东方军攻打敌之有重兵防守的、巩固阵地兼是白区的硝石。蒋军步步为营，尤讲究构筑工事，红三军团连攻不克，大有损伤，不得不退守。

10 月 20 日李德等又命令红军 1、3、5 军团集中主力，攻打敌人的另一个有重兵把守的堡垒阵地兼是白区的资溪桥。并提出：“拒绝进攻这种堡垒，便是拒绝战斗。”红军连攻 4 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军，红军主力却暴露在蒋军堡垒周围，日间遭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十分疲惫，10 月 26 日，不得不放弃攻打资溪桥的计划。此时，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和红 9 军团，红七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红 9 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

中央仍不许红军撤退，于 11 月 11 日再令红军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备要点南城以北之浒湾。不但未打下，红军却伤亡了 1000 余人，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不得不放弃阵地，继续向根据地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

浒湾战斗失利后，李德和博古等却借黎川失守问题，搞了一个审判肖劲光的事件。

肖劲光作为新编的红七军团政委，带部队和红三军团一起参加了浒湾



战斗，浒湾战斗失利后，彭德怀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责任不在肖劲光。李德、博古想整彭德怀，但不敢动他，于是整肖劲光，又避开了浒湾失利事件，重提黎川失守的责任问题。李德说：“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命运的摆布。”宣布将肖劲光撤职，关押，并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判肖劲光5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

毛泽东知道后，坚决反对、王稼祥也几次拒绝在处分书上签字，毛泽东利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没有执行李德等人的决定，在肖劲光被关压1个多月后，即将他调到红军大学干部队当军事教员。

## 第二十三章 阵地战无阵地

蒋介石“剿共”已经得手，正在得意之时，忽有急电：“福建的19路军叛变了！”蒋介石大惊，击掌顿足，举止失措，夜不成寐，哀伤地说：“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军事部署，除命令西路军、南路军仍按原定计划“剿共”外，从主力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从宁沪杭地区抽调2个师，共11师组成第二、四、五路军，由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统率，分由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命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飞机于建瓯，轰炸福州，并将驻南京的两个炮团运到建瓯。海军军舰也调到福建海面，蒋介石亲飞闽北建瓯坐镇，直接指挥这场战争。

19路军在福建，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革命根据地，进退两难。原来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前线“剿共”，目的是以19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19路军，以使两败俱伤，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蒋光鼐、蔡廷锴等也知“剿共”难以取胜，但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一个“模范省”，联络两广，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因而率19路军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纠集土著军阀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西游击区，先后侵占龙岩、连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据地。红军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毛维寿、谭启秀部5个团。蒋光鼐、蔡廷锴深深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

此时，原19路军老官长陈铭枢旅欧归国，经香港回福建，尔后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与南京蒋、汪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因对闽方抱有戒心、坚持不为所动，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在困境下，受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并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彭德怀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同陈公培会谈，赞扬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蒋、蔡等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19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陈铭枢、蔡廷锴等再派陈公培和徐名鸿带着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到瑞金谈判。中央决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这次谈判，并决定潘汉年与徐名鸿商谈。毛泽东、朱德多次接见陈公培、徐名鸿。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决定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19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李宗仁不满于闽方联共，致电福建：“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徒给叛党卖国贼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李宗仁虽然也同意“抗日重于剿共”，广西与红军也有“防而不击，互不侵扰”的“君子协定”，但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李知闽变势在必行，为补救计，李急电广东胡汉民、陈济棠：“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铤而走险，如何？”广东方面对此未有回答。

蒋介石已获闽方情报，即邀请蔡廷锴至庐山会晤，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蒋又派专机持亲笔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

11月20日，闽变爆发，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黄琪翔、方振武、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余心清等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改用公历，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政府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将福建绥靖公署撤销，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19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1、2、3、4、5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又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以示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发表了打倒蒋之国民政府的宣言。

闽变发动后，闽、粤、桂3省联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陈济棠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以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对闽变“绝不苟同”的通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开声明：“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字，决不随便附和人家。”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闽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如此，当蒋介石出动大军、飞机、海军对闽大举讨伐，狂轰滥炸时，李宗仁联合胡汉民、陈济棠通电责蒋，给闽方道义上的支持。李、白还致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两广为后方，待机发展。

蒋介石调走了9个师，使他煞费经营之封锁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这是红军反“围剿”的极好时机。毛泽东立即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毛泽东风趣地比方说：“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英明的，

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并已无兵可调，连守卫兵力也不敷调配，南京一带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依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维持。红军一旦突破封锁圈，突进到敌人后方，完全可以开展胜利的游击活动。

彭德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建议留 5 军团守卫中央根据地，集中 1、3 军团和 7、9 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持 19 路军，推动抗日战争，打破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最大的担心，就是怕红军由闽北进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那么必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引起全国政局的变化。

但是，博古、项英等中央领导人和李德拒绝采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并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还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 19 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全无音讯，十分着急，便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陈述自己的意见，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蒋光鼐、蔡廷锴都是坏蛋，打过我们，我们不能同他们联合。”毛泽东因反映了自己的意见，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周恩来、朱德几次向中央局和军委建议，红军应乘机伏击，痛歼入闽之蒋军。蒋介石怕红军和 19 路军配合作战，命令陈诚、李默庵等以 7 个师的兵力向东山、得胜关集中，以与入闽蒋军相呼应，并截断红军入闽通路。周、朱联名向中央建议：“立刻调 1 军团及 14 师，准备会同 3、5、9 军团主力，甚至 3 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决战。”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和李德所拒绝。李德将主力红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线。

周恩来、朱德对李德、博古、项英误失良机，愤慨致电博古、项英，要求：“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这个电报触怒了博古、李德、项英等人，于是，由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向中央局提出撤销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军委。

中央局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934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朱德被从前线召回瑞金，失去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除以大军围攻 19 路军外，又用高官厚禄收买 19 路军军官，他竭力收买蔡廷锴未果后，又向其下属军官下手。

结果 19 路军 5 个军长，除第 5 军军长谭启秀力战外，其余各军军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等都做了倒戈将军，举兵投降了蒋介石。福建政府孤立无援，又有内变。

1934 年 1 月 15 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龙岩亦失守。1 月底，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分别逃至香港，蔡廷锴不久亦逃港，福建事变乃宣告彻底失败。

蔡廷锴等为保存 19 路军的部分实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在广西成立一个团，安插在闽变失败后离散的 19 路军官兵。该团表面上属桂军，但军饷由蔡廷锴以原 19 路军存下的公积金支付。这支武装力量，是为嗣后两广“六·一”事变时，蔡廷锴等人入桂重新组织 19 路军的基础。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即将进攻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任命蒋

鼎文为东路军总指挥。回过头来协同其他部队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进攻，他采取的新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中共临时中央于 1934 年 1 月 15 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讨论和研究了形势与任务、苏维埃运动与任务等问题，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等 12 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张闻天对博古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满，同他发生过争吵。博古把张闻天安排在人民委员会主席位置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泽东在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原来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把策略问题上与自己存在一定分歧的张闻天从党的领导圈赶出去。

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鼎盛状态。它不但对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的政策，在组织上进一步对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改造，而且在军事上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

会后，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自 1 月下旬至 3 月底，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 月中旬，蒋军集中了 11 个师分两路，分别沿抚河西岸和河东岸，进攻广昌采用梯次配备，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垒推进，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提出“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为保卫广昌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他们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顾作霖代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 1、3、9 军团 9 个师坚守广昌，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蒋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

蒋介石集历次对付红军的经验，担心红军又转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红军主力死守广昌，蒋介石大喜过望，自问：“匪共怎么变得如此愚蠢？”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 18 昼夜，双方死伤甚众。蒋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于 4 月 27 日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红军撤离。此时，抚河东西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反击未能奏效，不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28 日，蒋军进占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果被蒋军打开。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伤亡达 5500 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 1/5。蒋军也有重大伤亡。蒋军自广昌战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嚣张，相继又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了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并且相互联络通报，谨防红军主力转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蒋介石得悉红军如此布阵，兴奋不已，知自己已稳操胜券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匪共处处犯兵家之忌，得不败乎？”红军在高虎垌、万年亭战斗中，虽然杀伤蒋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蒋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中央苏区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

9月，蒋军进逼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毛泽东此时献上一计：打破“围剿”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即蒋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的蒋军到湖南中部而歼灭之。

博古说：“毛同志又来他的游击主义了。”遂不用，依旧分兵把守各地。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瓮中之鳖，忍不住长嘘一口气，几年“剿共”之战，到此已接近全胜了。于是又在庐山开办了训练团。从7月至9月，先后办了3期，每期仍为3周。这次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但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所谓的“军人魂”教育。因为共军即将被消灭，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蒋介石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蒋介石在这次训练中，先后作了29个讲话。其主要内容是：(1)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便是蒋记的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2)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4)将过去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之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一扫而空。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

这次训练果有效果，如第18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动不已，打起仗来能效命沙场，同时减少军官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红军的阻击。

## 第二十四章 撤出根据地

蒋介石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一方面在白区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30年5月，原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回国。8月，他将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同时成立“革命黄埔同学会”，争取广大黄埔军校同学参加，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使蒋决心置邓演达于死地，以30万元悬赏缉拿。

次年8月17日，由于叛徒陈敬斋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蒋介石虽百般威胁利诱，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等，但邓演达不为所动，他始终横眉冷对、大义凛然。

蒋介石又提出要他答应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他严词拒绝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这铮铮铁骨，使蒋胆寒，尤其是历届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使蒋胆战心惊，因此决定除掉邓演达。11月29日，秘密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的邓演达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

宋庆龄曾为营救邓演达，面见蒋介石，蒋花言巧语，敷衍搪塞。后来宋庆龄得知邓被杀，无比愤慨，挥笔写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向全世界宣告：“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的领袖。”宋庆龄从营救邓演达未果中吸取教训，便联合全国进步力量，建立营救政治犯的组织。1932年12月18日，她同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表宣言，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翌年1月，上海和北平成立了分会。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立即投入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牛兰是波兰人保罗·鲁埃格的化名，他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书和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泛太平洋产业同盟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的公开名称，它的任务是组织和资助中国的工人运动。牛兰于1930年春由莫斯科来到中国。1931年6月15日，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后引渡给国民党军事当局，被监禁在南京、苏州等地。牛兰被捕的消息传开，轰动中外，国内外著名人士迅即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收到100多位德、法、美等国著名教授、作家、艺术家请求营救牛兰的电报。

1932年7月，宋庆龄、杨杏佛、埃德加·斯诺和其他中外知名人士组织了牛兰夫妇营救会，宋任主席。她多次去南京找汪精卫和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牛兰夫妇被判处死刑，由于宋庆龄的大力营救，迫使国民党政府不敢对牛兰夫妇下毒手，减判为无期徒刑。后来牛兰夫妇得以越狱逃跑。

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余文化、陈藻英，以及著名作家丁玲等。

许德珩等是在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3团去镇压北平抗日救亡运动时被捕的。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得知后，立即代表民权保障同盟致电蒋介石、宋子文和天津卫戍司令于学忠，要求释放被非法拘禁之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许德珩等被营救出狱。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书记罗登贤和总工会宣传部长廖承志，因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被捕叛变，而被捕。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又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窗好友，经宋庆龄、何香凝的营救获释。罗登贤是共产党重要干部，虽经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多方营救，但蒋介石还是于1933年8月将他秘密处决了。

陈赓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师长，他率领部队先后生擒了蒋军 34 师师长岳维峻、69 师师长赵冠英。1932 年，他在作战时不幸负重伤，化装到上海治疗。出院后他在路上被叛徒认出而被捕。陈是黄埔军校第 1 期毕业生，当过孙中山的卫士，曾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保护宋庆龄脱离虎口。1925 年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时，蒋介石的总指挥部突遭林虎军袭击，勇敢机智的陈赓背起蒋介石逃生，对蒋有救命之恩。

陈赓被捕后，宋庆龄立即设法将其被捕消息公布于众，《申报》以《共党红军军长陈赓在沪被捕》为题作了报导。

蒋介石想通过陈赓来影响红军中的黄埔生，对陈进行了一系列的劝降活动。命令用专车将陈赓从上海押往南京，蒋介石在他的手谕中写着：“查陈赓乃余昔之袍泽，勇冠三军，于北伐中卓著劳绩，姑念年轻失足，误入迷途，宜加珍惜恕容，多于照拂，促其幡悟，若能起誓归顺，效忠党国，定当重用。”陈赓被关进南京卫戍区司令部监狱。蒋介石派陈赓的黄埔军校同窗好友去游说陈赓，陈赓不为所动。蒋介石下令将陈赓押解到南昌，想以校长的威严软化陈赓，把他安排在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以锦衣美食加上蒋的心腹秘书邓文仪的劝降，但仍无结果。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南昌百花洲科学仪器馆会见陈赓。蒋介石走进客厅门口喊道：“陈赓在哪里？”陈赓拿起了报纸翻阅，不理睬。蒋走到陈赓身边说：“你是我的好学生，你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陈赓冷言冷语地回道：“我没有错误，根本不需要你原谅。”蒋介石以师长为诱饵，促陈悔过自新，为党国效命。陈赓以绝不作国民党的狗官严词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好把陈赓押回南京秘密关押，伺机秘密杀害。

宋庆龄立即面见蒋介石，斥责道：“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的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讲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蒋介石俯首无言，想到如果把陈赓杀了，将被世人说是恩将仇报，损德忘义，激起黄埔学生不满，带来后患，只得释放陈赓。

由于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丁玲免遭杀害，后来她设法逃离南京，潜回上海。

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蒋介石统治构成威胁，蒋命特务对宋庆龄进行监视，并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以达“杀杨傲宋”之目的。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 6 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1933 年 6 月 18 日，杨杏佛带着 14 岁的长子杨小佛在上海法租界乘纳喜牌篷车，车头甫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马路旁突有短衣暴汉 4 名冲出，各出盒子炮，围集车身两旁射击，弹如雨下，杨杏佛身中三枪，倒于车厢，旋即殒命。一个特务分子过得诚，在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戴笠为纪念他，后来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路叫“过得诚路”。

宋庆龄立即发表声明，严厉斥责蒋介石及其主使的一伙特务犯下的法西斯暴行。蒋介石对宋大为恼火，于是戴笠便策划了一个撞车阴谋，企图将宋庆龄撞死或撞成重伤，使其不能再参加革命活动。蒋介石虽然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是又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宋子文一定会吵闹，因此不敢贸然行事。

蒋介石命戴笠暗杀上海《申报》主持人史良才，史良才及其《申报》曾抨击过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并聘请一些爱国进步人士

参加《申报》馆工作。史良才对特务的暗杀是有防范的，除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1934年秋，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不幸被特务分子杀死在杭州返回上海的途中。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良才家属，并命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凶。凶手们已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一笔犒赏费。后来，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暗杀史良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老婆杀害。

蒋介石下令 CC 派和复兴社两大派特务组织逮捕和暗杀在白区活动的共产党员。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中，有45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杀。

李德、博古的阵地战使红军遭受很大的损失，他们在1934年春便惊慌起来，作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六七月间，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于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3人成立了三人团，秘密地进行长征的准备工作。

7月，中央决定以第7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瑞金向闽浙赣赣边前进，第7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为参谋长、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全军团6000余人。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出抗日的旗帜，取道闽中、闽东、浙西向皖南挺进，沿途散发抗日宣言，并同阻拦的蒋军进行英勇战斗，11月4日，进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重溪，部队减少到3000余人。根据军委指示，7军团同闽浙赣根据地的红10军合并，成立红10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同时，中央命方志敏为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

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后，指令红10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以方志敏为主席，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为委员，领导红10军团转到外线作战。11月下旬，红10军团经开化、婺源、休宁、太平，并在泾县、太平、青阳、祁门、休宁、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10余县，同蒋军战斗10余次，虽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红军处境十分险恶。方志敏不得不于1935年1月10日率领红10军团离开皖南，返回闽浙赣根据地。

方志敏、粟裕率领先头部队800余人，由浙江开化的杨林翻山到达港口村，进入闽浙赣根据地边沿地区，刘畴西率领的主力部队2000余人到达杨林一带。不料部队被敌人包围，方志敏命粟裕率领先头部队突围，尽快进入根据地内去。方志敏率领少数兵力冲向红10军团主力部队。敌人以7倍的兵力将红10军团围在方圆5里的怀玉山区。红军粮尽弹绝，同敌人血刃拚搏。最后除小部分战士突围出去外，大部分伤亡失散。方志敏、刘畴西不幸被敌人逮捕。

方志敏被捕后，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著作。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

由粟裕、刘英率领突围回到闽浙赣根据地的800多战士，后来组成红军挺进师，转战在浙闽边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下旬，中央派任弼时、王震、肖克等领导湘赣根据地的红6军团突围西征，向湘中一带转移，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反“围剿”斗争，并相机向北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任主席。8月，中央军委命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红6军团是1933年6月由原来活动在湘赣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组建起来的，已有9700余人。



红六军团由江西遂川的横石、新江口一带出发突围南进，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过湘南，入桂北，然后挥师北进，进入黔东地区，于10月1日袭占贵州的老黄平。红六军团西征，历时80天行程5000余里，跋山涉水，艰苦转战，历尽艰辛，所经湘、桂、黔3省，作战10余次。但于10月7日在石阡西南甘溪一带与桂系军阀廖磊部激战1昼夜，红六军团损失惨重，部队被敌人截为3段。参谋长李达率两个团及机枪连共400余人，在离开主力后临时组成特务团，经过9天的艰苦转战，到达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李达闻知贺龙部在此，便给贺龙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我们是6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找3军会合的，我是李达，率先遣队走在前头，要见贺总指挥。”贺龙见信喜出望外，即和关向应等同李达见面，并研究了接应红六军团的办法。次日，贺龙、关向应即率红三军主力从水田坝南下，迎接红六军团主力北上。10月24日，贺龙的红三军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村会合。两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红三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红2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2、6军团的行动。随后，红2、6军团转移到湘西地区，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9月底，中央三人团做出撤出根据地的决定，三人团作了分工：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对中央根据地的留守工作作了部署，决定中央根据地设立党的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3个机构。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5人，后来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留下的部队约1.6万人，另有伤病员1万余人。

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突围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主力红军，另以陈诚指挥的20多个师共20余万大军包围中央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府“死灰复燃”。

面对强大的敌人，陈毅主张打游击，他说：“过去那种死打硬拚的战术，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搞垮了，那一套方法和作风，全都要收起来，大家背起快枪打游击去，不要让敌人找到目标，把干部和部队迅速分散，化整为零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项英仍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主张集中兵力，以阵地防御战抗击敌人，同敌人打硬仗。

结果，10月26日，蒋军占领宁都；11月10日，红色首都瑞金陷落。不久，于都和会昌失陷。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接着，敌人从北、东、西三面向内紧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方法，将中央区内的广大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将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内，然后分区“清剿”，进而彻底消灭红军。蒋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绝人寰地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被杀害的人数达70万人。

11月21日，项英命红军24师和两个独立团在会昌谢坊左侧的湾塘岗伏击蒋军1个师，歼敌半个旅，但自己的部队也受损失，又暴露了目标。蒋

军 4 个师跟踪而至，四面合击，红军 24 师和两个独立团在狙击战中未能取胜，并在牛岭战中惨败，最后坚持的阵地战告吹。项英不得不接受陈毅转入游击战的意见，部署部队转入游击战争。1935 年 2 月，中央分局决定从狭小的仁风地区分 9 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敌人重兵包围，红军部队虽然相继突出敌人的包围圈，但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党政机关这一路共约 3000 人，突围到油山时只剩下 300 余人。

许多优秀的党政军领导人牺牲了，其中包括一大代表何叔衡以及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等。

瞿秋白在突围中不幸被敌人俘去，投入监狱，严刑拷问。瞿秋白不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个医生。他在上杭监狱中用化名林祺祥给鲁迅写信，请求营救。鲁迅接信看后大吃一惊，立即筹资开一个铺子，以铺子名义去保释瞿秋白。不料，瞿秋白被俘的中共福建省委一领导人的妻子供出真实姓名，瞿秋白被秘密押到长江囚禁在蒋军 36 师师部。36 师师长宋希濂敬重瞿秋白的才华，多次劝降，未果。蒋介石气恼，密令蒋鼎文将瞿就地枪决。陈立夫得悉，急向蒋献计：“瞿秋白有真才实学，在共产党内影响大，后受打击，有隙可乘，他又熟悉苏俄，可为我用，如能诱降，不防暂准他不公开反共，可在南京主持编译室。”蒋介石准予暂缓执行枪决，由中统大员即赴长汀劝降。于是，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同叛变后当了特务的陈建中一起去长汀。王杰夫等同瞿秋白进行了多次“谈话”，瞿秋白先是不理睬，尔后是侃侃而谈，劝降失败，王杰夫等狼狈而归。

瞿秋白在狱中作诗 3 首：二十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就义前，他高唱《红军歌》、《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突围出去的中央分局及其部队，来到赣粤边油山地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开始了 3 年的艰苦游击战争生活。

## 第二十五章 万水千山

主力中央红军 8.6 万余人，于 1934 年 10 月 12 日从红色首都瑞金的西红梅坑地区出发，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参加长征的有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的红五军团，周昆、黄苏的红 8 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的红 9 军团。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编成两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中央纵

队以李维汉（罗迈）为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2个纵队对外称“红星纵队”。

尽管李德和博古等对红军西征的保密工作搞到神秘化的程度，但蒋介石却很快摸准了红军的行动方向，调集几十万大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的信丰、安西、安远一线，横挡红军去湘西的通路，防守部队是陈济棠的粤军。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但他对“剿共”并不积极，既怕红军占领他的地盘，又怕红军走后，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而入广东。粤军在南线前进的速度像蜗牛般缓慢，始终未构完碉堡封锁线，只有点而未缀成线。陈济棠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军情，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打的架势；一面却极端秘密地暗派高级参谋杨幼敏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之谈判。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立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杨幼敏等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10月21日，主力红军发起突围战斗，从龙布至韩坊间，展开全线总攻击。粤军部队得到陈济棠的示意，稍事抵抗，即全线撤退，让出中间大道。这场战斗，双方都做出攻防之势，但都是假打，枪弹都是朝天上放。红军大队渡过信丰河，自南康、大余间横渡章水，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蒋介石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被突破。

蒋介石对陈济棠的不积极“进剿”态度，怒斥为“借寇自重”。然因疲于“围剿”红军，一时也只能徒唤奈何。

11月8日，红军从汝城以南之天马山到城口突破了由何键部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沿着湘粤边界继续前进。

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又突破了由何键和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湖南酃县至宜章的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等县，渡过了潇水。

尔后，红军兵分两路，一路前出道州，一路前出江华、永明，直奔湘江东岸。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两岸。

博古、李德不顾敌众我寡之势，命令红军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渡过湘江去同2、6军团会合上。红军占领宜章后，本应立占全州，以策应大军渡河。但因红军身负重担，行军迟缓，致使敌军先行占领全州，构筑了阵地。

红军从11月25日起，在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激战7天。为保卫中央纵队过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于12月1日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各军团均遭受重大伤亡，5军团的1个师、3军团的1个团和8军团被打散的部队行动慢，未能渡过湘江，其中一些人后来转到湘南去打游击，大部分则壮烈牺牲，8.6万余人的部队，锐减到3万多人。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的红2、6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川、黔、湘边界发动了强大攻势，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包围常德，威胁长沙、岳阳，声威大振。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沿大苗山脉北上，仍然准备和红2、6军团会合。但摆在红军面前的敌情越来越严重了，蒋介石看准红军的意图，集结重兵，张开网口，妄图将红军歼灭。

中央三人团的情绪极为低落。年轻的博古面临湘江战役的惨败，面临军内发出的对他和李德的一片怨恨声，十分惊慌和苦恼。他哭丧着脸，从设在隐蔽棚里的司令部内钻出来，面对困难的处境，一筹莫展。他知道自己作为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责任重大，不自觉地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朝着自己的脑门上左右比划着。

1 军团政委聂荣臻恰巧走过来，惊奇地看到博古那种反常的举动，立即上前劝阻说：“你冷静一些，别开玩笑，这不是闹着玩的，谨防走火！”博古苦笑着收起手枪。

与博古相比，李德则是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到客观条件上，继续保持那种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的作风，坚持硬打硬拚的战略，要求红军按照原计划西征，不自觉地投向蒋介石设置的网袋。

周恩来既不像博古那样沮丧，又不像李德那样鲁莽，他小心翼翼地坚守在岗位上，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倾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考虑着改变原来计划，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行军路线。

红军出发长征前，毛泽东来到瑞金，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讲了战局，并把主力红军准备西征的计划告诉他。毛泽东回到住所，心情郁闷不乐。

红军出发时，毛泽东被编在中央纵队里。博古、李德清楚知道，如果再不让毛泽东这位有极高威望的红军创始人出来，他们就有带不出红军部队的可能。让毛泽东出来，他们又不愿把和其他领导人编在一个队里，于是就把毛泽东和他的十几位警卫员以及马夫、挑夫、担架员等，编成一队。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被编在卫生部休养连里。

毛泽东每次到了宿营地，立即让警卫员用门板搭起办公桌。他在马灯下打开地图工作。毛泽东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同党、同革命事业分开。这一辈革命家大都有这样的品格。

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发现贵州省的敌人防御力量单薄，他又找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核实了这种情况，于是便向中央提出了放弃与红 2、6 军团会合，转向贵州，摆脱敌人的战略计划。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于是，毛泽东便找政治局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谈心。王稼祥在红军长征后，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由 8 万多人减少到 3 万多人，他开始考虑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毛泽东觉察到王稼祥思想的变化，主动做他的工作。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负重伤，躺在担架上行军。毛泽东向他详细地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毛泽东接着向王稼祥说明了自己对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计划。王稼祥不仅赞成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认为有必要改变中央的领导状况，产生了由毛泽东出山担任军队最高领导职务的思想。王、毛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他们两人统一思想后，决定去作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工作，争取张闻天的支持。

王稼祥先找张闻天交换了意见，接着，毛泽东去找张闻天。

张闻天原来极力为王明“左”倾路线张目。但在 1934 年 4 月的广昌战役红军惨遭失败后，他批评了博古，和博古大吵一通，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而张闻天因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逐渐转

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两人的意见日趋一致。

毛泽东主动要求在宿营时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便于彼此谈心，交换意见。

在通道县的县溪镇南的一个住宅里，毛泽东向张闻天分析了军事形势，指出博古、李德有时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左”倾错误，批评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采纳他的正确意见。

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同意改变红军长征路线，并表示立即去找博古，提出立即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部队转向贵州的问题。

张闻天的转变举足轻重，因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和周恩来，曾是博古最亲密的伙伴。

毛泽东再一次找到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在进军通道县的途中，已间接听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酝酿改变红军行军路线的问题，要求在通道县开会研究。他同时听到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的不少意见，于是便和博古商定，在通道县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即“飞行会议”）。

12月12日，周恩来在通道县的“恭城书院”主持召开了飞行会议。会上，毛泽东用大量的材料分析了敌情，说明部队去与2、6军团会合，必将折戟沉舟，唯一的生路是转向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坚决反对，他用粗暴的态度和毛泽东、周恩来争吵，甚至借口“有病”而退出会场。博古开始坚持红军去湘西的路线，但他因军事失利，灰心丧气，最后只得同意先去贵州的建议。会议决定到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是否去湘西的问题。

红军在12月15日攻克了贵州的黎平。在这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找人谈话，做了许多说服工作。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黎平会议。博古在会上提出，军队来到贵州，已避开追击的国民党部队，可以沿6军团旧路入黔东转湘西，然后一直向北，实现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因疟疾发作，没能参加会议，博古的意见代表了李德的观点。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的意图，将部队拉到黔北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在黔川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部队还可以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与川陕之交的红军协同作战。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上还提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问题，认为部队到了遵义，再召集政治局会议，对军事路线好好地进行总结。

黎平会议后，朱德、周恩来立即执行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因8军团在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且战斗力弱，不但不能独当一面地作战，反而要主力军团掩护他们。长征出发时部队有1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因此军委决定将8军团与5军团合编为5军团，由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为政委。将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并，改称中央军委纵队，由重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兼总司令部4局局长。王稼祥因伤，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由李富春代理。黎平会议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取消。

部队在黎平休整了3天，12月20日，中央红军便分两路迅速西进，继续向贵州深入，直向遵义进发。这一行动，大出蒋介石的意外，何键在湘西的4道碉堡封锁线置于无用，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成泡影。

红军从黎平出发后，接二连三地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

平、余庆等地，一路缴获和购买很多布匹，使全军的服装焕然一新。部队的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沮丧、疲劳状态全部消失。

红军前卫部队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跨越天险乌江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与2、6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决了李德、博古的意见。

会后立即组织强渡乌江。乌江古称天险，南岸要下10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在两岸峡壁间流过，江面虽不宽，只有250米，可流速却达每秒1.8米，是一条奔腾的急流。红军先强渡过去1个营，打垮了黔军副军长侯之担1个旅的守江部队，架起浮桥，分3路分别从回龙、江界、茶山关顺利渡过乌江，守敌一部被歼灭，残敌向遵义仓皇逃窜，红军乘胜追击，顺利地占领了湄潭，随即经瓮安向遵义进逼。

部队渡过乌江之后，毛泽东发现警卫班的一名战士的鞋子行军跑掉了，另一名战士的鞋子夹在石缝中，拖出时撕破了，他便把自己的床单撕成两半交给那两位战士，用它打草鞋。两位战士不肯，毛泽东笑着说：“没床单铺床是小事，你们没有鞋怎么能走到遵义呢？快拿去打草鞋吧。”战士眼含热泪呆呆地站着，在毛泽东再三催促下，才把床单撕成条条打草鞋。

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先后找了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以及其他红军领导同志谈了话。这些同志很了解毛泽东，他们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同他们交换了意见，开始思考和总结失败的教训。

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2师第6团于1935年1月6日逼近遵义，并以迅雷之势，奇袭了遵义城外敌人的一个据点，全歼敌人。红6团侦察排全部穿上俘虏的服装，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来到遵义城门前，诈开城门，红6团全部人马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守敌措手不及，黔军3个团由北门仓皇遁走。红2师派出部队追击，攻占了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占领了松坎、绥阳等地。

1月8日，红军总司令部进驻遵义。次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进入遵义南门时，群众在路两旁敲锣打鼓，手举三角彩纸小旗，高呼：“欢迎朱德、毛泽东总司令！”“欢迎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幢独立的楼房里，毛泽东安顿下来后，立即找张闻天，然后找王稼祥，3人议定，由张闻天执笔3人共同起草一份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提醒张闻天认真研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各种材料，并将自己搜集的材料交给张闻天。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他们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5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周恩来 政治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长征时的“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 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常委、中央局领导者，长征时“三人团”成

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 8 军团中央代表。

凯丰（何克全） 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 9 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 1 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1 军团政委。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3 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3 军团政委。

李卓然 5 军团政委。

邓小平 中共中央秘书长。

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9 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在遵义东北湄潭、兴隆一带担任警戒，未能出席会议。

5 军团长董振堂在党内没有担任负责职务，也未出席会议。

## 第二十六章 历史的转折

博古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正报告；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军事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

博古在报告中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与博古相反，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战略战术原则：分散使用红军兵力，用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军事上不利用国民党 19 路军军事政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去湘西同 2、6 军团会合等等。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批评了博古的报告不实事求是，借用客观情况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犯的军事路线错误可以归纳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把反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和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敌我兵力的情况等作了对比分析，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李富春、

刘少奇、陈云等人发言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改换领导的问题。除邓发、凯丰为博古辩护外，其他人都对博古、李德提出不同程度的指责。周恩来在讨论时发言，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请求中央撤换他的领导职务，提议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

会议作出4项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同时决定红军今后的去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分工，决定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撤销了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但由于李德拒不承认错误，暂时未将决议告诉他。多数人在会上同意博古交出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因博古思想不通，而暂时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

遵义会议后，红军分左、中、右3路，左路由3军彭德怀、杨昆尚率领。中路中央军委纵队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直接率领，右路军1、9、5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董振堂、李卓然率领。3路大军向西北方向的赤水河移动。

红军在土城与阻截的川军遭遇，双方都有伤亡。红军西渡赤水，向古蔺、兴文、长宁挺进。

由于土城战斗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而失利，战士、干部有些埋怨情绪，这时中央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情绪低落，再继续担任领导有一定困难。

张闻天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提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接替博古总书记职务。毛泽东则提出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他说：“张闻天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由他负责，便于团结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同志，对共产国际也好交代。”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他立即找博古谈话。

博古经过遵义会议后半个月思考，思想通了。他爽快地答应把总书记的职务让出来，总书记顺利地易人。于是，张闻天成为总书记。

红军来到云南扎西地区，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红军作了短期休整，宣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休整后的中央红军第五、九军团取消师级编制，军团下设团。中央红军编制是：

中央红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	朱德	总政委	周恩来
总参谋长	刘伯承	副总参谋长	张云逸
第一军团军团长	林彪	政委	聂荣臻
参谋长	左权	政治部主任	朱瑞
第1师师长	李聚奎	政委	黄苏
第2师师长	陈光	政委	刘亚楼
第3军团军团长	彭德怀	政委	杨尚昆



参谋长	邓 萍	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	
第 4 师师长	张宗逊	政 委	黄克诚	
第 5 师师长	彭雪枫	政 委	徐 策	
第 5 军团军团长	董振堂	政 委	李卓然	
参谋长	陈伯均	政治部主任	曾日三	
( 下设 37、38、39 团 )				
第 9 军团军团长	罗炳辉	政 委	蔡树藩	何长工
参谋长	郭天民	政治部主任	黄火青	
( 下设 7、8、9 团 )				
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	刘伯承	政 委	陈 云	
	副司令员		叶剑英	
第一梯队司令员	邓 发	政 委	蔡树藩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何长工			
第五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李维汉 ( 罗迈 )			
干部团团长	陈 赓	政 委	宋任穷	
保卫团团长	姚 哲	政 委	张南生	

蒋介石发觉中央红军行迹后，急调兵追来。

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红军已把敌人的视线引到滇东北来，造成黔中空虚，红军应杀他一个回马枪，回师贵州，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红军回师攻占娄山关。娄山关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敌人在娄山关有 1 个师的兵力把守，被红军击溃。这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个胜仗，毛泽东在颠簸的马背上，作忆秦娥《娄山关》一首：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通过娄山关，直抵遵义城。遵义城内有敌军 8 个团，被红军彻底歼灭。接着，红军又在遵义城南击溃敌人 2 个师的兵力。

贵州军阀王家烈（贵州省主席兼第 25 军军长）部在遵义战役中大败，王家烈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此电正中蒋介石下怀，他早说过：“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着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这必可造成统一局面。”于是蒋介石在 1935 年 3 月，带着顾问端纳及陈诚、何成浚、吴稚晖等由重庆赴贵阳，“督剿共匪，实行禁烟”。蒋抱定与共军决一雌雄的战略企图，亲自指挥，将王家烈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贵州省实权落入蒋介石之手。蒋介石调兵遣将，调整部署，进攻遵义。

毛泽东等洞察其奸，将红军迅速撤离遵义，向西开拔，并在白腊坎一带整休。

中央军委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毛泽东从情报中得悉：蒋介石已判断红军西进的意图，布置了防止红军西进南进的防线。蒋军向红军西进的打鼓新场调集强大的兵力。是时，1 军团指挥员林彪、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扫清西进的道路，于是，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不打，打又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但是，众人都赞同林、聂的意见，不顾毛泽东的反

对，一致要求去攻打打鼓新场。

会议通过攻打打鼓新场的决议。

散会之后，毛泽东又认真分析了形势，确认攻打打鼓新场不会取胜，便在半夜手提马灯来找周恩来，要求晚一点发布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还是好好想想。周恩来这时接到新的情报，敌人已在打鼓新场布置了夹击红军的阵势。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次日清晨，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说服了众人。军委发出停止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红军每打一次仗，都集体讨论半天没有必要，今后由几个人研究就行了。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选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3 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毛泽东从此获得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他洞察出蒋介石采用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老办法，用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压迫红军在遵义与鸭溪地区围而歼之，便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以利红军摆脱强敌尾追。

蒋介石在遵义地区调集了相当多的兵力。毛泽东即率红军突然北进，使蒋军在遵义地区扑了个空。红军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装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急调大军堵截，并在云、贵、川边境大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

毛泽东把敌人兵力吸引到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后，并不率军渡长江北上，则指挥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四川南部重返贵州，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四渡赤水河，把敌人的主力全部抛在后面，使敌人的碉堡置于完全无用。

3 月底，红军留下一支部队在乌江以北地区牵制敌人，主力迅速渡过乌江，直向贵阳挺进。毛泽东巧派另一支部队出击瓮安、黄平方向，佯装东进湖南与红 2、6 军团会合姿态；而率主力部队迅速向南逼近贵阳城。

红军打到贵阳城下，正值蒋介石在贵阳城督战，他既怕红军围攻空虚的贵阳城，又怕红军东去湖南。他急调云南军阀部队来贵州“保驾”，又令薛岳、周浑元两部 and 湖南部队前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以阻红军东进同红 2、6 军团会合。

毛泽东的目的既不是占领贵阳，也不是回师湖南，而是把滇军调出来，便于红军迅速西去，渡金沙江北上。既然蒋介石已按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毛泽东便乘云南空虚，指挥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滇黔公路，和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驰，甩开敌人，直指云南。

毛泽东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所向披靡，生龙活虎，调动敌人，把敌人搞得蒙头转向，招架不住。蒋介石调兵东拦西追，处处落空，陷于被动。敌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

红军甩开敌人之后，像插上翅膀，一天行军 120 里。在一连攻克了惠水、长顺、广顺 3 县之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

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 9 军团，胜利完成任务后进入云南，占领宣威、会泽、渡过了金沙江。另两路红军沿路翻山涉水，攻城拔寨，直逼昆明。

滇军主力全部东调，后方空虚，云南军阀龙云怕红军抄了他的老巢，吓破了胆，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调各地民团援救昆明。这样又把地方兵力抽空了，毛泽东无意去占领昆明，而是迷惑敌人。他只留一部分兵力

佯装在昆明附近准备攻城，主力却在嵩明一带虚晃一枪，随即向西北，星夜急行，直趋金沙江南岸的元谋地区。一部分兵力在龙街渡佯渡。

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在龙街渡渡江，便调集兵力围追，妄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

毛泽东指挥中央军委纵队和 3、5 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陈赓率领中央军委纵队干部团出其不意地袭击了皎平渡渡口，并从敌人手中搜获到 7 只小船，动员了 36 位船工，昼夜不停地渡江。1 军团奉命火速赶到皎平渡渡江。经过 7 天 7 夜，红军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把江边渡船全部烧毁。

敌人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无影无踪，只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毛泽东运用声东击西战术，率领中央红军在云、贵、川 3 省大范围迂回，同敌人兜圈子，几次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把几十万蒋军甩在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大胜利。但是，红军长途跋涉，十分疲惫，有些战士不够理解，发出怨言。1 军团长林彪在渡金沙江之前，给总书记张闻天写了一封信，提出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这样的指挥不行，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位军事负责人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军队中有这样的思想情绪，需要及时解决。

中央红军来到会理，有了 5 天的休息时间。5 月 12 日，政治局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对林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肯定了毛泽东的战术是正确的。毛泽东当面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林彪当时只有 28 岁），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拚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由于林彪的信提出以彭德怀取代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毛泽东在会上还批评了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批评他们有右倾机会主义情绪。但事实上，彭德怀并没有鼓动林彪写信，也不知道林彪写信。

周恩来、王稼祥等同意毛泽东对林的批评，但不再赞成把不同意见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受了委屈，但他没有向毛泽东作出解释，以致毛泽东以后多次重提彭德怀的这个“错误”。

会理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经过四川的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时，由于彝民不了解红军，向红军发起袭击，有的红军战士受了伤。毛泽东要求红军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不向彝族打枪。总参谋长刘伯承是四川人，毛泽东派他与彝民结盟，受到彝民的欢迎，并派出向导为红军带路，20 名彝民参加了红军。

5 月下旬，红军来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这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

蒋介石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蒋介石命各军在大渡河沿岸阻截红军，妄图效法清兵生擒石达开的做法。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定能越过天险大渡河。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第 1 师在安顺场渡口，歼守军 1 营，夺获 1 条小船，组织了 18 条好汉拼死强渡北岸，把北岸渡口占领。一团人马靠小船渡河。1 军团大部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以两天走完 340 里路程的速度，且战且走，星夜兼程，赶在两旅敌兵前面，抢占泸定桥。

泸定桥是用 13 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连成，桥下峭壁千尺，白水滔滔，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桥对岸泸定城里有两团敌军驻守，在桥头筑好了工事，并抽去了铁索桥上的全部木板。

一军团挑选 22 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勇士们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手榴弹，在我军强大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铁索在半空中晃来晃去，敌军在北岸架着机枪，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 22 条好汉如猛虎和猿猴似的，全然不把子弹放在眼里，直冲上去。一连红军战士携带木板，随后铺桥。勇士们快冲到对岸桥头时，敌人纵火焚烧了桥头的亭子。勇士们不顾浓烟烈火猛冲过去，终于占领了东桥头，打垮了守敌，一直冲到街头，同敌人展开巷战。后面的红军部队随后赶来增援，击溃了敌人。

中央红军飞渡大渡河，继续向天全、芦山前进。在翻越化林坪的一个山头时，突然遭到几架敌机空袭，一颗炸弹落在毛泽东很近的地方，警卫班长胡昌保喊了一声：“主席！”他随声向毛泽东猛扑过去，迅速把毛泽东推到一边。炸弹“轰”的一声巨响，胡昌保倒在地上，腹部流出鲜血。

毛泽东过来把胡昌保抱在怀里，胡昌保牺牲了。毛泽东含着热泪把他放平躺下，用一条毯子盖在胡昌保身上，他和战士掩埋好烈士的尸体，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红军经过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气候险恶的夹金山（大雪山）。海拔 7556 米、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摧残着乏食少衣的红军，使许多年轻战士长眠在那里。

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崇山峻岭无数，毛泽东为此作诗 3 首，曰：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 25 师会师。6 月 16 日，中央红军进驻懋功，毛泽东等与红四方面军 30 军政委李先念会面，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 第二十七章 面临分裂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张国焘在节节失败的情况下，对于总指挥徐向前的态度变得谦虚了，他把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徐向前。徐向前率领军队历时两个多月，转战 3000 余里，在军队体力消耗很大、衣单鞋缺情况下，又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人迹罕至的大巴山。四方面军翻过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尔后，兵分 3 路：徐向前率两个师西进巴中；陈昌浩、王树声率 1 个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 1 个师东向万源。张国焘率总部及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一个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

共歼敌 3 个团，击溃 8 个团，占领通江、南江、巴中 3 县。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 2000 余人，在共产党人张逸民的说服下，起义参加了红军。

四川境内“诸侯”蜂起，军阀刘存厚、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割据各方，连年混战。蒋介石鞭长莫及，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2 年底，刘湘同刘光辉开展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各大小军阀多被卷入，争当“四川王”。

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 29 军军长田颂尧，在“二刘之战”中，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 30 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十几个团的防兵。红军乘机占领了川北 3 县。田颂尧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同红军较量过，认为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不放在眼里。追击红四方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拒绝他们进川。刘茂恩部从陕南进万源，退了回去；胡宗南部队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也被迫退去。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地致信田颂尧，要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他打着如意算盘，待取成都后，再搬师“回剿”。

红四方面军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部队有了粮食和衣服，战士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红军离开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徐向前将 3 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尧；以 1 个师部署在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后方的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之敌。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提出互不侵犯。又派徐一新等去陕南，同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契。

1933 年 2 月，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下辖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 5 县，以及巴中特别市，陕南特区。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3 人又明确分了工。张国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等职；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能写能讲，任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张国焘、陈昌浩等负责政治、政府工作、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等。徐向前很有军事才华，张国焘、陈昌浩不能不倚重和依赖他，让他分管作战。

2 月 18 日，坐镇阆中的田颂尧令孙震率主力 38 个团 6 万余人，分左中右路向通江、南江、巴中进击，称之为“三路围攻”。

徐向前以“收紧阵地”和“决战防御”的方针破敌围攻。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中心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再举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

从 2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的 4 个月中，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先后共毙伤敌军 1.4 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 1 万余人，把田颂尧的兵力吃掉近 1A2。革命根据地扩展到 3 万平方公里，人口逾 200 万。红四方面军猛扩到 4 万人。

6 月底，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红四方面军是：

总指挥	徐向前	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
副总指挥	王树声	政治部副主任	傅 钟 曾传六
第 4 军军长	王宠坤	政委	周纯全

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		
第 30 军军长	余天云	政委	李先念
参谋主任	文建武	政治部主任	张成台
第 9 军军长	何 畏	政委	詹才芳
副军长	许世友	参谋主任	王学礼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		
第 31 军军长	王树声(兼)	政委	张广才
政治部主任	黄 超		

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张国焘这次“肃反”的主要矛头指向批评过他的曾中生等一批优秀的领导骨干。

原来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北转移，越过秦岭来到城固西北约 40 公里的小河口时，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先等，由于对张国焘在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无止境退却感到怀疑和不满，准备派人到中央去报告，后改为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众人意见，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争取在陕鄂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希望张能采纳这个意见，并转报党中央。张国焘闻知后，即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众人便对张提了不少意见和批评，要求把今后的行动方针电告中央。张国焘表面上表示欢迎众人的意见，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但他并不报告中央，对众人意见不置可否，暗下决心报复。

张国焘诬蔑曾中生是“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 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活动”，秘密地逮捕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高级干部。张国焘亲自审讯。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闻讯，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中央也了解他，他绝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吾搪塞地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张国焘哪肯罢休，终于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和一批曾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干部、战士处决。四川白区党组织派来的 200 余名党团员，几乎被杀光。张国焘和陈昌浩以及保卫局搞了一个“黑名单”，他们要抓谁杀谁，就抓谁杀谁，甚是厉害。

徐向前在 1933 年 8 至 10 月，趁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惧于红军威力，躲进老窝，刘湘、刘文辉争雄之机，接连发动 3 个战役，即攻打田颂尧部的仪陇、南部战役，攻打杨森 20 军的营山、渠县战役，攻打老牌军阀 23 军军长刘存厚的宣汉、达县、万源战役。

红军在仪陇、南部战役中，歼敌 3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枝。在营山、渠县战役中，歼敌 3000 余人，缴枪 2500 余枝。在攻打刘存厚的战役中，将刘存厚部 15 个团 2 万余人击溃，刘存厚的独立王国遂告覆灭，红军缴枪 8000 余枝。另外，此次战役，得到王维舟的川东游击军的积极配合。王维舟是 1931 年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到宣汉、达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王维舟是当地人，又有发动游击战争的经验，很快建立起游击军，多次给刘存厚部以打击。此战役结束后，川东游击军被改编为红 23 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3 次进攻战役胜利，红四方面军扩展到近 8 万人，根据地扩展到 4.2 万余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岸，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开江、

开县地区。四川军阀为之大震。蒋介石气急败坏，电责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褫职听候查办”。是时，“二刘之战”终以刘文辉军败北退居西康而告结束，蒋介石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迅速纠合各路军阀全力“剿赤”，如有“剿匪不力者，将严惩不贷”。

踌躇满志的刘湘，决心以其 21 军为基干，回师“剿赤”。蒋介石拨款 200 余万元，枪 1 万余枝，子弹 500 万发资助，并限令 3 个月内将徐向前的红军“肃清”。

1933 年 11 月，刘湘聘请“一贯先天大道”头头、外号“刘神仙”的刘从云为最高顾问，以 6 路大军“进剿”红军。6 路大军是：第一路为 28 军，总指挥邓锡侯，进击木门、南江方向，阻止红军“西窜”；第二路为 29 军，总指挥田颂尧，由苍溪、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阻截红军“南窜”；第三路为新编 6 师和 23 师，总指挥李家钰、副总指挥罗泽州，由南充、蓬安向巴中东南方向进击；第四路为 20 军，总指挥杨森，由广安、岳池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击；第五路为 21 军，总指挥王陵基，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万源方向进击；第六路为 23 军，总指挥刘邦俊，由开县、城口向万源方向进击。

6 路总兵力 110 余团，20 万余之众。

徐向前制定粉碎敌人围攻的对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击，重点突破。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具体部署是：东线为主要防御方向，配以第四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各两师及第三十三军，由徐向前指挥，对付敌之五、六两路；西线为牵制方向，配以第三十一军主力、30 军和 9 军各 1 师，以王树声、李先念共同指挥，对付敌之一、二、三、四路；另以 31 军的两个团监视陕南之敌军。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赤卫军，就地配合红军作战。

从 1933 年 12 月至 1934 年 10 月，刘湘先后发动了 6 次总进攻。红四方面军在 10 个月的反 6 路围攻中，取得了胜利。

东西线先后歼敌 8 万余人，缴枪 3 万余枝，炮 100 余门，击落飞机 1 架。刘湘损兵折将，难于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职。

1934 年 11 月，红四方面军为表扬战役过程中功绩突出的部队，授予 9 军 73 团“攻如猛虎”、75 团“守如泰山”奖旗；授予 30 军 263 团“钢军”、265 团“夜老虎”奖旗；授予 31 军 274 团“夜袭常胜”、33 军 269 团“百发百中”奖旗。

1934 年底，蒋介石以复职后的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着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等地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 200 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张国焘拖着悲观的腔调对徐向前说：“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我们去汉中行不行？”徐向前回道：“原来我和先念同志主张趁敌人溃退时，派一部兵力从南郊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你没有同意，现在敌人增兵固守已不好办了。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接着，徐向前制定了“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经红四方面军总部讨论通过。张国焘

也表示赞同。尔后便开始了新的作战准备工作。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进据广元、昭化立足未稳之际，先取广昭，后击甘南，发起广昭战役，很快完成了对广元、昭化的包围，24日开始攻城。

不料，敌军凭坚固守，红军久攻难克，且相持下去十分不利。2月初，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图发展。

徐向前等回到川陕苏区后，在旺苍出席军事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问题。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来电，要求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立即投入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准备工作。由31军和总部工兵营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同时派兵进击陕南，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向北，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

会后，徐向前率12个团突袭陕南，十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淝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4个团，俘敌4000余人。蒋介石急忙调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蒋军3个师、1个旅和5个江防团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虚晃一枪、调动敌人之目的，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拟从嘉陵江中段渡江西进。

徐向前命东线红军逐步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3月初，徐向前率兵一部克苍溪、仪陇，歼敌5个团，而后带参谋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强渡地点。

3月28日夜，徐向前发出渡江命令。红军乘船飞速驶向对岸，一举攻占了滩头阵地，全歼守敌1个营，尔后趁势架起浮桥，后续部队陆续渡江疾进，川军的江防被冲开。

红四方面军胜利渡江后，连克阆中、南部、剑阁，尔后攻险关要隘剑门关。4月2日，全歼剑门关守军3个团。剑门关战斗结束后，红军乘胜推进，攻占了昭化。接着，红军又攻克了平武、梓潼、彰明、北川等，先后攻克了8个县城，共歼川军1万余人。但红军攻江油不下，徐向前不断打电报给张国焘、陈昌浩，催后续部队来援，及早进击甘南。

此时，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已处在受敌人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并决定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余人就地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因此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

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决定向川西发展，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于是，红四方面军陆续撤离梓潼、剑阁、中坝、彰明等地，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徐向前率9军、30军经北川、墩上、土门、攻占茂县；四方面军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汶川、理县一带；4军、31军一部北进至松潘、镇江关、片口等地，与胡宗南部对峙。红四方面军总部驻茂县，徐向前率前指驻理县下东门。

6月16日，四方面军30军政委李先念部在懋功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给一方面军送来了许多慰问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牙粉、粮食等等，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会师后的红军达10万余人，其中一方面军2万余人，四方面军8万余人。

6月24日，党中央及一方面军来到两河口。次日，张国焘骑骏马带秘



书长黄超和一队骑兵卫士，30余人冒雨飞马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冒雨前去欢迎。张国焘下了马，却站在那儿不动，显出一种傲慢态度。党中央为张国焘开了欢迎会。毛、周、张、博等并不因张国焘表现傲慢无理的态度而对他有所冷淡，当晚同他进行了热情而耐心的交谈。

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红军去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讨论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提出向川康边发展的方针。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王稼祥和其他人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张国焘见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便表示同意北上。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接着，政治局作出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3个纵队和岷江支队，分别经卓克基、大藏寺、马塘、黑水、芦花等地向北前进。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刘伯承、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

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然表示同意北上，但他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理县时，便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说：“中央是一方面军的中央。”“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当李富春抵理县时，张国焘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等。李富春因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张国焘还授意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陈昌浩则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政治局决定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权。”他还致电军委主席朱德，提出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无法顺利消灭敌人。

张国焘利用陈昌浩和张闻天过去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策动陈昌浩多次约张闻天“恳谈”，希望张闻天能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支持张国焘。张国焘又派秘书长黄超到红三军团，向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游说彭德怀，打听会理会议情况等。陈昌浩找聂荣臻谈话，摸他对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态度。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说：“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在张国焘的挑逗下，有的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川陕苏区是‘逃跑主义’”。两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之间，发生了谩骂、殴斗、抢粮、抢枪等不愉快事件。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为了团结四方面军指战员，对组织作了调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张闻天提出把自己担任的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周恩来提出把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交给张国焘，朱德也提出把他的总司令职务给张国焘。毛泽东说，总书记的职务不能交给他，那样革命的性质就会改变，总政委可以交给他。

张国焘并不想要总书记职务，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于是红军进行改编。

红军总司令	朱德	总政委	张国焘
总政委部主任	陈昌浩	总政治部副主任	周纯全

总参谋长	刘伯承				
前敌指挥部总指挥	徐向前	政委	陈昌浩		
参谋长	叶剑英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周恩来				
第一军(由1军团改编)军长	林彪	政委	聂荣臻	参谋长	左权
第三军(由3军团改编)军长	彭德怀	政委	杨尚昆	参谋长	肖劲光
第五军(由5军团改编)军长	董振堂	代政委	曾日三	代参谋长	曹里怀
第三十二军(由9军团改编)军长	罗炳辉	政委	何长工	参谋长	郭天民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	政委	陈昌浩		
第四军军长	许世友	政委	王建安	参谋长	张宗逊
第9军军长	孙玉清	政委	陈海松	参谋长	陈伯钧
第30军代军长	程世才	政委	李先念	参谋长	李天佑
第31军军长	余天云	政委	詹才芳	参谋长	李聚奎
第33军军长	罗南辉	政委	张广才	参谋长	李荣

## 第二十八章 奠基陕北

7月中旬，中央北上来到黑县的芦花，于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主持会议。

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说：“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徐向前发言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特点，陈昌浩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都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红军有了大的胜利和发展。对于不足之处，毛泽东说，退出鄂豫皖是正确的，退出通江、南江、巴中是不对的；周恩来则说，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江、南江、巴中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博古最后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反“围剿”后党的路线。

看来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8月上旬，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多，他在会上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要求政治局增补9名四方面军的干部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为了团结，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

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

张国焘仍然向徐向前表示对中央不满。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部队已在这里停留 40 多天，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第五、九军团和第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第一、三军团和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 月中旬，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8 月 21 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向班佑进发。

从毛儿盖到班佑地区，中间须经过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从草地边向草地中心望去，像灰绿色的大海似的，不见山丘，不见村舍，不见林木，不见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草地尽是泥潭，一不小心陷到里面就会送命，气候多变，夜间奇寒。红军在草地行军，极端艰苦，由于不断受到风雨、寒冷、饥饿侵袭，指战员体力渐渐地衰竭下来，有些战士四肢无力，举不起步，有的倒了下去。残酷无情的草地，夺走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右路军经过 6 天 6 夜才走出草地，来到班佑、巴西地区。

距离巴西、班佑 100 余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要地，由胡宗南部驻守。徐向前命 30 军为主攻部队、4 军为助攻部队，攻打包座。从 31 日下午战斗打响，激战至夜半，总计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 4000 余人，俘敌 800 余人，缴获 1500 长短枪枝、轻机枪 50 余挺及大批供养。此次战役不仅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通道，而且使敌军逡巡不前，不敢孤军冒进。

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敌人的兵力十分空虚，此是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

不料，在阿坝的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称：“葛曲河水陡涨，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部队缺粮，坐待自毙。部队北上，恐亦多阻碍，右路军须即南下。”徐向前、陈昌浩对于张国焘突然变化，甚感焦虑。徐向前说：“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还是要劝他们上来。”徐向前、陈昌浩急电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军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当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右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立下决心，在阿坝、草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张国焘以朱、张名义电令徐、陈：“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徐、陈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把他们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不同意右路军南下，再电张国焘：“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张国焘电复徐、陈并转中央，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鉴于张国焘抗上，陈昌浩又改变了态度，毛泽东又听彭德怀说，张国焘可能会依靠优势兵力搞阴谋，他曾派人给彭送去银元，企图拉拢彭德怀，反对北上。是时，1 军团已北进到俄界，为了防止万一，彭德怀派 1 个团隐蔽在中央军委毛泽东、张闻天等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陈昌浩领四方面军解散 3 军团怎么办？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毛泽东说：“不可扣押人质。”毛泽东立即到

徐向前住处，试探性问道：“向前同志，你们的意见怎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遂告辞而归。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决定，连夜率 3 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北上。叶剑英避开了陈昌浩、率军委二局随 3 军团北上。

次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有人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大吃一惊。接着前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他们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前面又有人打来电话问：“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你看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

毛泽东和朱德走在北进的 3 军团后尾，便于应付情况。几人奉命追来，要部队停止北上。毛泽东要彭德怀打个收条给他们，收条上写：“我们后有期。”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陈昌浩当时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他们总有一天会觉悟的。”9 月 12 日，红 1、3 军团在俄界会合。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部分同志提出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毛泽东说：“这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开除他的党籍，他率领的那几万红军就不好办了，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会议还作出决定：将 1、3 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同时决定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彪、王稼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问题。陕甘支队计有 8000 余人。

陕甘支队和中央军委纵队由俄界迅速北上。国民党军鲁大昌部驻守甘南的“天险门户”腊子口。红军必须迅速地通过腊子口。是时，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杨士司的 2 万骑兵已向腊子口附近运动，朱绍良、马步芳的部队正向腊子口和西兰公路奔来。腊子口处于两座高山之间的悬崖峭壁之下，下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鲁大昌部在桥头筑有坚固的工事，形成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

先锋红 4 团与腊子口敌人激战半日一夜，未克。团长王开湘率 2 个连和侦察队、信号组组成迂回部队，攀登悬崖峭壁，包抄敌人后路，团政委杨成武率 2 营担任正面强攻任务，前后夹击。敌人惊慌地甩下枪枝逃窜。红四团突破腊子口，乘胜追击。

9 月 18 日，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哈达铺。陕甘支队编为 3 个纵队。

蒋介石在红军前往陕北的路上集结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二三十万人堵击阻截。

毛泽东声东击西，决定红军向天水佯动。敌人害怕红军东取天水，威胁西安，忙将主力向天水一带集结，同时调兵占领渭河南岸的武山、漳县，防止红军渡河北进。毛泽东见敌人已上钩，则乘机转道北进，以每天行军 100 里速度，出其不意占领渭河附近的鸳鸯嘴，渡河北上，把敌人的主力部队置于背后。

红军渡过渭河后，蒋军毛炳文部追了过来。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彭德怀问：“老毛，你看怎样？”毛泽东泰然一笑：“我

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再追。”果然不出所料，红军放了几枪，敌军蹲在河边，不敢来追。

红军突破渭河封锁线后，经过十几天急行军，又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挺进到六盘山下。

蒋介石慌忙调胡宗南、马鸿逵和东北军在六盘山布设封锁线，妄图凭借“峰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里”的六盘山，阻挡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

彭德怀、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使增援的敌人闻风丧胆，仓皇逃命。红军在青石嘴伏击敌人，缴获300多匹马，10余马车弹药以及大量被服。

红军经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是时，陕甘边特委派人前来吴起镇迎接中央。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期休整。尾追不舍的敌军骑兵追了上来。彭、毛决定给敌人一次有力的打击，于是在吴起镇西南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区，设下埋伏。

尾追而来的敌人是马鸿逵、马鸿宾和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部队。10月21日，马鸿宾部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后，即遭到红军猛烈袭击。敌人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敌骑顿时向左侧溃逃，企图向东北军靠拢。何柱国部的骑兵师刚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骑兵人慌马惊，自相践踏，不战自溃。这一仗，使敌人再也不敢贸然在红军后面跟踪追击了。

11月初，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在甘泉附近的象鼻子湾，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

15军团的领导人是徐海东、程子华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徐海东等关于当前敌情和15军团作战情况的报告。

原来，红15军团是由刘志丹领导的陕北、陕甘边红26军、27军和徐海东、程子华从鄂豫皖带来的红25军合编组成的。

早在30年代前期，刘志丹、谢子长就在陕北和陕甘边发动武装起义，创立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尔后，两块根据地建立联系，终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26军和红27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并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把两块苏区联成一片，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红25军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留下红25军的74、75师、军部特务营和地方武装。1932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指示，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全军两个师，7000余人。红25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随后，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组建红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3年3月，红军28军政委王平章在战斗中牺牲；4月，红28军与红25军合编，两军合编后称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全军约1.3万人。后来红25军副军长廖荣坤及一些师以上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同时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25军在向优势敌军的残酷进攻中，受到严重的损失。

1934年2月，中央派程子华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军事领导工作。

程子华于9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决定红25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鄂豫边界的山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时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红25军进行了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全军2980人。

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突破蒋军的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转战到桐柏山区、伏牛山区，进入陕南地区。

红25军在入陕后的5个月中，建立了5个县的革命政权。军队发展到3700余人，初步建立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7月中旬，红25军为了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决定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与陕甘边红军会师，迎接党中央北上。陕南留下郑位三、陈先瑞等坚持游击斗争。7月16日，红25军从丰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

8月，红25军先后攻下甘肃两当、天水、秦安、兴隆镇、隆德、平凉白水镇，在西兰公路上同敌人周旋17天。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9月上旬，红25军经镇原、庆阳、合水，打退尾追的敌骑兵，沿陕甘边山区兼程北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16日，到达延川县的永平镇，终于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

会师后，红25军和陕甘红26军、红27军3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7000余人。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

张学良下野后去德国、意大利考察。回国后，蒋介石便命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

红军经过长征转入西北后，张学良奉蒋介石调遣，率领东北军到西北去“剿共”。

1935年9月，张学良抵西安，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子力等，对张学良很尊重，交往频繁。

蒋介石又命阎锡山配合东北军向陕北发动夹击。蒋介石为拉拢阎锡山颇费心机。1934年9月，蒋从南昌跑到太原与阎锡山见面。蒋希望阎同意派遣晋军去陕北，帮助高桂滋、井岳秀“围剿”红军刘志丹。而阎则借机向蒋要钱要武器，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协议。随后，蒋阎一起进餐，蒋向阎打听去河边村的道路，表示立即去河边村看望阎锡山的老父阎书堂。阎锡山听罢“啊”了声，半天未说话，心想蒋还有这个打算，惊惑不安。

次日，蒋、阎驰车来到河边村。阎书堂领家人急急出门迎接，蒋介石毕恭毕敬地站在阎老头面前，脱下礼帽，口称老伯，并一连行了3个鞠躬。

阎书堂对蒋介石说：“锡山不肖，请委员长多加指教。”蒋说：“哪里，哪里！”3个月后，阎书堂因患脑溢血死去，蒋介石下令拨发“治丧费”10万元，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河边村致祭，蒋亲书挽联：“德昭颜训，勋业付儿曹，多士讴歌思元老；数备箕畴，声名垂党国，吾公福命是神仙。”蒋介石集中东北军、中央军、西北军和晋军“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刘志丹采取集中兵力，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在东线歼灭入陕晋军1个团又4个连，迫使其主力退回黄河以东地区。

1935年10月上旬，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红15军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在甘泉县劳山地区歼张学良东北军第110师。尔后，乘胜南下，于10月下旬，又在甘泉以南的榆林桥，歼灭东北军107师的4个营，活捉团

长高福源。

张学良又调东北军 5 个师，分东西两路，发动新的进攻。张学良企图把红军限制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乘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夹击和歼灭红军。

中共中央决定在 1 个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红军再次改编，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改编为 1 军团；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编制，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

中央领导重新分工，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 第二十九章 阴谋难逞

11 月 6 日，毛泽东等在甘泉拟定了富县直罗镇战役的作战计划。直罗镇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它的地形象一个口袋，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毛泽东决定在这里伏击张学良的东北军，将 1 个排的兵力留在直罗镇，其主力分布在直罗镇周围埋伏起来。

11 月 20 日下午，东北军 109 师在 6 架飞机掩护下开进直罗镇。次日拂晓，埋伏在南北山上的红军突然向直罗镇猛扑过来，东北军从睡梦中惊醒，仓猝应战。不到 2 个小时，红军占领了镇子。东北军师长牛元峰率领 1 营兵力逃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头上，被红军围歼，牛元峰被俘。这次战役共歼东北军 109 师和 106 师的 1 个团，并迫使各路敌军纷纷退却，粉碎了“围剿”，使陕甘根据地稳定下来。

是时，毛泽东开始处理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觉得问题严重。

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负责人在 10 月份被捕，有的被杀害了。毛泽东大怒：“刀下留人，停止任何逮捕，所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处理。”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 5 人委员会，并派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调查案件。毛泽东向王首道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不拔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刘志丹等被关押在瓦窑堡。陕甘边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负责审理。戴指责刘志丹是“右倾取消主义”、“同杨虎城有勾结”、“富农路线”等等。刘志丹等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不给被子盖，夜里睡觉也被绑着手脚，连绳子上也长了虱子。这位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军军长、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常常被看押人员用鞭子抽打、大刀背砍。

刘志丹同群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当他接到逮捕他的密令时，表现得十分冷静。原来，送逮捕刘志丹密令的通讯员，并不知他传递的密件就是逮捕刘志丹的密令，因此按照常规将密令送给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刘志丹看后，将密件还给通讯员，并说：“你赶快把它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刘志丹到了瓦窑堡束手就擒。

经过调查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下令立即释放刘志丹等。毛

泽东说：“逮捕刘志丹等人完全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错误，是疯狂病。”周恩来批评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被释放的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刘景范、马文瑞、张秀山等。他们出狱后，恢复了领导工作。刘志丹担任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 28 军军长。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红 30 军掉头南回，再次穿过茫茫草地，朱德、张国焘的左路军从阿坝地区南下，也重新穿过草地。两路军在马塘、松岗、党坝、梭磨一带集结。

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要把红四方面军和红 5、9 军团拖到川康边地瘠民穷、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张国焘使用障眼法，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说中央红军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大举南进是真正的进攻路线。红军战士一听南下是去打蒋介石，又磨拳擦掌。张国焘利用指战员的阶级仇恨，以售其奸。

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另立中央，声言开除毛、周、张、博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张国焘要朱德、刘伯承发言同意他的意见。

朱德说：“朱德、毛泽东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我可不能反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天下红军是一家，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别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刘伯承说：“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我双手拥护。”张国焘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便宣布成立“中央政治局”，自任主席，开除毛、周、张、博党籍，下令通缉他们。朱德和刘伯承再次表示不赞成。朱德说：“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定，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张国焘气急败坏，威胁刘伯承说：“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刘伯承坦然回答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黄超立即掏出手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了。张国焘不敢伤害朱德和刘伯承，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 5、9 军团还在朱、刘身边。这两个军团都是英勇善战的部队。且五军团官兵激愤地说：“我们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如果张国焘阻挠我们执行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红四方面军也有不少人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若真动起武来，张国焘要考虑他是否是朱德的对头。朱德要求拥护他的同志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这就避免了红军发生火并的危险。

张国焘十分害怕朱德和刘伯承，先是唆使一些伤病员去朱德那里闹事，后把朱、刘软禁起来，最后又把他俩调到前线司令部去。

1935 年 10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歼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部 3000 余人。中下旬，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在半个多月内共毙俘敌 1 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造成了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此时，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军趁势推向川西平原。张国焘仍主张进取康定、泸定，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经徐向前、陈昌浩力争，张国焘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徐、陈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



击。

11月19日，红军同敌军在百丈地区激战，十几个旅的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烈进攻。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一片火海。红军与敌人肉搏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的泥浆。敌人后续部队越增越多，像蝗虫似的，一群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7昼夜，毙伤敌人1.5万余人。红军伤亡近万。徐、陈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九顶山、天品山、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

红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方面军的多数指战员开始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产生怀疑和不满。朱德又多次劝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并说张国焘的“中央”不是中央。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已回到陕北，他打电报给张国焘，令其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表示：如果张国焘愿意放弃“第二党”，则其他事情可以从容商量。徐向前支持张浩、张闻天的来电；陈昌浩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林育英因母亲姓张，取化名张浩。他是老资格共产党人。1922年2月入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同张国焘一起搞过工人运动的工作，是张国焘的患难朋友。1924年他到莫斯科学习，翌年回国，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同毛泽东关系密切。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林育英去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1930年12月在抚顺被捕，遭受百般折磨，因多病获释。出狱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名义去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工作。

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并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林育英打扮成小商人，于1935年12月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林育英得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消息，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等，并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服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

1936年2月下旬，张国焘、朱德、徐向前等率领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退却转移，第三次翻过夹金山，由丹巴到道孚，又翻越高达海拔5000米的大雪山——折多山。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秦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南下前有8万余人，加上原一方面军的5、9军团，总数达近10万人，现减少到4万余人。部队大量减员，不得不进行整编，由48个团、1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

严酷战争实践，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彻底失败。朱德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2、6军团。徐向前、陈昌浩派出罗炳辉率领32军（原9军团）和4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迎接2、6军团。

蒋介石在1935年夏秋之际，调动湘军何键、鄂军徐源泉、中央军樊崧甫、汤恩伯以及孙连仲部，共130个团，采取碉堡推进，逐渐压缩，企图聚歼红2、6军团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

贺龙、任弼时等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离开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湘黔边转移。当时，红2、6军团已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红军总部

却被张国焘把持。1935年9月，红2、6军团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给任弼时发来的电报，询问军团情况。任弼时用密码给周恩来发了回电。不料，这份回电却被张国焘截获。

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电示红2、6军团：在小地区内，固守固然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易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

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已不宜在根据地内继续固守，决定向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

11月19日，红2、6军团1.7万余人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从桑植出发，采取声东击西、逐步转移的方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了长征。

11月下旬，红2、6军团占领了湘中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急进东南，摆出东渡资水的姿态。待把敌人吸引过来后，红2、6军团突然转头西进，把追击和迂回之敌全部抛在后面。1936年1月上旬，占取了贵州的晃县、玉屏。就地休整后，在便水地区同尾追的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歼敌近1000人。尔后，红军撤出战斗，继续向黔东转移，经石阡地区，向贵州西南方向进发。

1月下旬，红2、6军团入余庆，克瓮安，占平越、下龙里，直逼贵阳。贵阳地区敌人兵力十分空虚，敌人忙向贵阳收缩。红军乘贵阳以西敌人防空虚之际，迅速向西北急进，经扎佐、修文，赶到乌江上游的渡口鸭池河。2月2日，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天险，取得了向黔西地区进军的重要胜利。

2月上旬，红2、6军团相继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等地，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休整，在大定成立了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2月下旬，红2、6军团自毕节地区兵分两路出发，向西前进，跨越乌蒙山区，引敌向西，然后再准备转向东南去安顺地区。红军指战员在强敌尾追拦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再接再厉，攀重峦，行小道，忽上忽下，或东或西，行踪飘忽不定，使敌人难以捉摸。

在转移途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不幸溺水牺牲。

3月28日，红军进占贵州盘县，到达南北盘江之间，终于胜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将敌人远远甩在后面。

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南北盘江之间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利于红军活动，准备在这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将这个意见电示红军总部，朱德为了实现红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主张红2、6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张国焘企图乘机拉拢红2、6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也同意红2、6军团渡江北上，于是，红军总部电示红2、6军团设法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月31日，红2、6军团从贵州盘县迅速西进，突破敌人封锁线，向滇中前进。4月27日，红2、6军团从石鼓到巨甸间的100余里长的江面上，分别在木瓜寨、木秋地、格子、茨柯、巨甸等渡口，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尔后，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向北前进，在中甸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向甘孜前进。沿途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6月3日，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在理化的甲洼同罗炳辉率领的红32军会师。

肖克、王震在会师后，很快了解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立即向贺龙、任弼时报告。贺龙、任弼时等立即表示拥护党中央，反对分裂。这对张国焘来说，凶多吉少。

6月上旬，张国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下，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以“会合红2、6军团，准备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励全军指战员。

7月2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2、6军团集结在甘孜地区，受到朱德、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军热烈欢迎。红2、6军团奉中央命令，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下辖红2、6军团和32军（原红9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

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单独找王震谈话，恭维王震作战勇敢，还送给他几匹战马，王震不为所动，反在会上批评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提议召开联席会议。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看出张的意图是瓦解、吞并二方面军，便提出：“开会可以，但不能以少数压多数。”张国焘的阴谋遂告吹。

7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2月率红一方面军之1、15军团、28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阎锡山闻讯，立即召开河防会议，他决定将晋军集中于汾阳、离石、孝义、中阳山地，实行所谓“口袋阵”战术。阎氏说：“咱们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而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们作战可操胜券。”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很快突破了阎锡山的碉堡封锁线，直捣三关镇，包围中阳，徐海东的15军团直逼汾阳、文水，整个山西为之震惊。阎锡山飞电正在陕北“剿共”的孙楚，立即撤回山西救援。

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截断同蒲路交通，直趋临汾，红15军团绕过汾阳，挺进文水、交城，其先头骑兵部队进袭到距太原仅50里之晋祠与河口一带。

阎锡山闻风丧胆，恐慌至极，整日惶惶，立命太原周围各县挖壕架网，严密戒备。

就连绥靖公署大门周围都堆上了麻袋构筑了掩体，办公室灯火日夜不息。他感到红军的力量之大，绝非他一人所能抗拒，万一抵挡不住，让红军攻下太原，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死里求生，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求中央军入晋增援。

蒋介石接到阎的电报，立即命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率领汤恩伯、李仙洲、孔令恂等中央军以及空军轰炸机10余架，北上增援，又派商震部开赴晋中，担负守卫太原之责，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

刘志丹率红28军从兴县向南推进。晋军温玉如旅奉阎命堵击，在兴县南被红军痛击重创。温玉如丢弃战马，只身逃回临县。红15军团从文水、交城回师白文镇，与红28军会合。阎锡山获情报说，毛泽东、彭德怀在中阳附近，急电中央军派飞机狂轰滥炸，然而却一无所获。晋军跟随红军之后缓缓“追击”，不敢交战，只在沿途搜杀操外省口音的商人、游民，冒功请赏。

红15军团和红28军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关镇与敌激战，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红28军将士攻克三关镇以后，又重创敌人两个旅，而后向西撤去。

红一军团由孝义南下。由于晋南一带空虚，红军先后攻占灵石县、襄

陵、侯马，包围霍县、赵城、洪洞、浮山等地，直逼重镇临汾。

红军占领各地，宣传抗日，做群众工作，筹集款子，扩军 7000 余人。5 月 5 日，毛、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而后率红军西渡黄河，返回陕北。

是时，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处于微妙之中。蒋介石极力向晋绥渗透。他派各路中央军入晋，“支援”阎锡山反共，趁机以各种方式拉拢阎系大员投蒋，瓦解阎的势力，而阎锡山则不遗余力地抗拒蒋的渗入，维护独立割据状态。

红军撤出晋境后，阎锡山于 5 月 31 日派人暗杀了晋军“剿匪”第四纵队司令、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李生达。

李生达是晋军中与傅作义、张荫梧齐名的“第一流大员”。但李生达为了继续升官，使通过同乡苗培成的关系，与蒋介石挂上了钩。1931 年冬，李生达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召见了她，并赠与巨款。阎锡山发现后立即进行追查。自此，李表现消极，并进一步倾向南京。蒋、李之间还建立了秘密电台，互通情报。这一切均被阎侦知。

1934 年 8 月，李生达应蒋之召，率领晋军 72 师去江西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在南昌，李生达受到蒋介石隆重款待，给予大批军饷、装备补给，阎锡山却借此扣发了李部的军费，李及部下对阎大为不满。

次年 7 月，阎令李率部回晋，李生达则到南京见蒋，接受了蒋的“特殊使命”。李部回晋后，阎的代表赴李部“慰问”，发现李部官兵训话时一提“蒋委员长”，便自动立正，而提到“阎主任”时则无动于衷，大为吃惊。阎闻之更是咬牙。不久，李生达被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阎锡山、赵戴文、傅作义并行，风传其将出任山西省主席。

1936 年 2 月，红军东渡，阎命李生达、杨效欧坚守孝义阻击红军，李、杨见红军锐不可当，联名密电南京派大军入晋支援。这更触犯了阎锡山之大忌，必去之而后快。红军回陕时，李生达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并代行总指挥职权后，他手中掌握了 1A4 以上晋军的指挥权，势力达到顶峰，阎锡山就在李渡河赴陕前，密令其卫士熊希月将其刺杀，并派第三者将熊又当场击毙以灭口。

李生达被刺后，阎锡山装模作样派王靖国去吊唁。开唁之日，灵堂忽然失火，李的两个儿子及姨太太等均葬身火中。

蒋介石致电表示“惋惜”，并拨发丧葬费下令“褒奖”。

## 第三十章 三军大会师

蒋介石在西北部署“剿共”，不料两广发生了“六·一”事变。

蒋介石对两广半独立状况深以为虑，先后派张继、孙科、王宠惠等到穗，与胡汉民和西南当局“交换时局意见”，并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位，诱胡北上，以改变西南局面。

胡未为所动。

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再次以调整中央党政负责人名义，

另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衔拉胡入京。这时胡因在穗受制于“南天王”陈济棠，无以展其抱负，对蒋邀有所动心，乃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实际上是在静观形势，为自己从容筹措新对策留一时空余地。

1936年初，胡准备结束“养病”返回国内。蒋闻讯，急派司法院院长居正去港迎候。

陈济棠惟恐胡被南京拉去，派其兄陈维周专程去南宁向李宗仁问计。李随即赶赴广州，要陈坚决留胡在穗主持局面，并提出对胡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三点保证。陈济棠接受了李的建议，两广派出代表，远赴新加坡接胡。李宗仁亲赴香港迎接。

胡见两广方面确有诚意，答应暂不北上，蒋介石拉胡解散西南的意图未能得逞。然而胡来穗不久，因与妻兄下棋，用脑过度，患脑溢血猝死。两广突失此一中心人物，局势为之大变。

5月13日凌晨，陈济棠接蒋介石电，要陈派人去京一谈。陈乃派其兄陈维周飞京，蒋告以“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以此意妥为转达。陈维周返穗后与陈济棠密商竟日，认为两广相依为命，此乃蒋假途灭虢之计。唇亡齿寒，桂亡粤何能独存。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抢先一步掀起抗日大纛，或许还能暂保西南局面，至少也让南京政府出兵名不正，言不顺，有所顾虑而怯步。正巧，白崇禧在穗吊唁胡汉民，陈乃将此决心就商于白。白以此事关系重大，须从长计议，事不宜缓，派黄旭初飞邕向李宗仁汇报。

李宗仁闻言，即由南宁抵穗。是时，蒋派出的居正、孙科、王宠惠已来粤，借吊胡丧之机，向两广提出了包括取消西南军政两机构、发还广东军、政、财权在内的5项条件。

蒋收拾两广之意既已照明，陈、李、白斟酌再三，知无路可退，遂坚抗争之意。大计既定，两广便统一行动。

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通电。6月1日，西南两机构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向中枢呈文，坚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毅然决然，从事抗战。次日，两机构根据呈文内容，向全国发出通电，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请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两广将领发出“支”电，并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正、副司令，开始向湘南举兵。并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

两广事起突然，蒋介石恐猝然讨伐激起国内公愤，乃先行缓兵之计。6月9日，蒋致电陈、李：“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蒋矢口否认向西南提出五条件之事，要两广不要相信外边一切谣言，与中央团结一致。

然而，蒋介石表面上信誓旦旦，暗中已积极部署用兵。蒋命陈诚率精锐部队开抵衡阳，中央军源源不断地从武汉南下。首鼠两端的何键在陈诚镇慑下，拒绝了湘南游说计划，西南使者李品仙快快而返，粤桂出发的军队在湘南受阻。

蒋介石的离间计和收买伎俩初见成效。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余人被蒋收买，于7月4日驾机飞离粤境，并于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

党国。7日，又有粤机9架飞京。

8日，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离开汕头，粤军第2军军长张达也暗中向蒋输诚。

蒋介石以叛陈的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回粤收拾粤局。余部原是陈济棠之粤主力，这对陈是个致命打击。这样，广东方面不战而溃。

李宗仁见陈济棠一颓如此，建议两点以图挽救：其一重组军事，粤军改取内线作战部署，由广西派桂军东下援粤；其二财政上由桂对粤汇款，两省钞票互相收受，彼此通用。陈济棠知事不可为，无意再作挣扎，决一去了之。陈送李大洋20万元，要李回桂缓图善后，自己则于7月18日晨悄然离粤去港，就此结束了他的7年“南天王”生涯。

李宗仁虽有近10万兵力可恃，又处内线作战地位，内部较粤团结，蒋一时无隙可乘，故局面尚可支持。但广东已失，唇亡齿寒，态势已成孤立。李、白退回广西后，乘南京尚未对桂用兵，以“缓和”为上策，利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对粤、桂分而击之时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表示愿意妥协，此乃识时务者为俊杰。李、白又通过黄绍竑、吴忠信、张定等，向蒋介石表示：“但要中央真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蒋介石轻易地收拾了陈济棠，正志得意满，欲兵锋西指，一举拿下广西，以去多年心患，故广西这番表示反使蒋气焰更张。7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出尔反尔地免去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同时调遣大军进逼广西，又在穗设立委员长行营，蒋偕宋美龄由赣飞粤，以便就近指挥。

蒋把李、白逼上梁山，于是，桂方与南京公开决裂，复电中央，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迹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中央任命殊难遵令。

李、白抱定能战才能言和之主张，立即在桂省下达全民动员令，在一周内组编了21个师。

李、白发表《告军民书》，谓：“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李、白在加紧省内动员的同时，又数度对外发表讲话，声称决不因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白致电李济深，并派出特使黄旭初去港盛邀李济深，告之“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

李、白还邀请在港的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请其入桂重组第19路军。

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入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要员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抗日豪杰汇聚。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两广“六·一”事变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抗日的阶段，指示红军加速西北的发动来给两广以支持。毛泽东于6月9日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西南抗日反蒋，虽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与进步的行动，我们将在各方面给西南以可能的援助。

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派钱寿康带二李亲笔函入陕，去延安与中共商谈，探询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之可能性。

蒋介石在筹划攻桂中事态起了新的变化，不得不有所顾虑。时下，蒋之心腹之患是西北红军。两广发动后，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形势显然不允许蒋对桂战事旷日持久。若西南战事一开，蒋尚不能速战速决，被广西拖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蒋虽调兵遣将，声势汹汹，但实际上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暗中却开始谋求解决桂局的和平途径。李、白心里也十分清楚，拿广西人力、财力去与蒋对抗，纵然撞个鱼死两破，也徒伤国家元气，对抗日无益。即便为自身利害计，应以避免为上策。故蒋桂双方表面决战锣鼓敲得很紧，私下却寻找转圜的办法。

8月，蒋的使者居正、朱培德、程潜、邓世增、香翰屏等先后去桂，向李、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桂局。李、白初疑是蒋的缓兵之计。李、白便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意在了解蒋的真实意图。蒋在黄埔接见刘斐说：“你们广西方面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叫我吃亏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李、白吃不起亏，为他们政治生命，不能叫他们吃亏。”蒋要刘斐回桂把他的话说给李、白。李、白征求来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意见不一，有主张同蒋对抗到底的，也有主张罢兵歇战的。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白从抗日救国出发，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中共代表云广英希望李、白与蒋和平谈判，逼蒋抗日。

李、白接受杨东莼和中共代表意见，向蒋提出8项和议方案，由居正、程潜、朱培德带回广州，李宗仁派刘斐再次随行。

9月中旬，和议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兵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

9月16日，李宗仁按协定在南宁宣誓就广西绥靖主任职，并发出和平通电。18日，李宗仁飞穗谒蒋。蒋、李在兵戎相见、公开决裂8年后，重新晤首。李宗仁是位老实人，一见蒋走近他时，竟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吃了定心丸，当即命令开赴长沙向两广取攻势的部队，迅速返回西北，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灭共”计划。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包座挺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向包座、哈达铺前进。红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红二方面军刚走出雪山，体力消耗大，粮食、衣服帐篷等物缺乏。这次过草地所经路途较长，历时近1个月，广大指战员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皮带、牛皮等物充饥。红四方面军粮食虽然缺乏，仍尽力设法支援陷于严重饥荒中的红二方面军战友。

1936年8月上旬到9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行军，终于先后走出了广漠、荒凉千里的茫茫大草地。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决定立即以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洮西战役，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

红四方面军过大草地后，经包座向甘南进军，击败敌鲁大昌、毛炳文、王均部，先后占领腊子口、哈达铺、临潭、渭源、通渭、漳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地，给阻敌以有力的打击，并建立和发展甘南根据地；红二方面军连

克礼县、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等地区，巩固与发展甘南根据地，并把甘南同陕南根据地联系起来。红一方面军进到西安至兰州大道以北的界石铺附近地区。这样，红一、二、四方面军形成夹击敌人、即将会师的局面。

蒋介石震惊红军三个方面军大会合之势，急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安至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令国民党 37 军、3 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令马鸿逵部和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

9 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则提出《静会战役计划》，命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挺进；命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附近地区，控制西安至兰州大道；命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便三个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见中央要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心怀疑虑，迟迟不表态。经中央连电催促，张国焘被迫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会上，陈昌浩同张国焘发生了争论。陈昌浩说：“立即按照中央要求，北上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会合一方面军。”张国焘说：“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会上多数人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会后，红四方面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了向静宁、会宁地区进军的命令。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在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紧张地调动军队准备北进。

张国焘满腹怨气，带着警卫队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便对徐向前等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都未参加岷州西北局会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请张国焘坐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张国焘讲了他和陈昌浩在岷州会议的争论，越讲越激动，掉下眼泪：“我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徐向前等觉得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四方面军已是三过草地，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装备也大不如前，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决战显然没有取胜把握。他们根据张国焘的方案，对着地图，当场确定了行动部署，即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军；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 3 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张国焘将这个方案电告朱德。

朱总司令接电大惊，原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县，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想到会出现新的分歧。他即着陈昌浩赴漳县，又电告中央说：“我是坚决遵守原来方案的，如将原方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接着，张国焘、朱德等西北局成员在漳县再次会商，同意了新的方案，并将新方案报告中央。

中央复电不同意四方面军的新方案。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连续致电中央，陈述四方面军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 月 30 日，四方面军 4 万余人按中央命令兵分 5 路北进，向静、会地区急进。聂荣臻率领的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抢先攻占会宁。10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抵达会宁，



与聂荣臻、陈赓部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近1.3万人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

蒋介石调集会宁、静宁地区的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王以哲等部，分4路向红军进行追击，企图把红军歼灭在黄河以东地区。

毛泽东制定了红军打击尾追之敌，以利北进的作战方针：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王均、毛炳文部则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和红军已建立某些联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则采取积极的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红军主力在宁夏的海原及打拉池地区稍作休息后，装作力疲势弱，仓促溃退样子，继续向同心、预旺地区转移，诱敌肆意追赶。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下埋伏，击溃敌人1个旅。

接着红军主力集结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寻找有利地形，歼击尾追的胡宗南部。

11月21日，胡宗南部78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追击。进入红军预先设置在山城堡周围的伏击圈，红一方面军之1军团、15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密切配合下，突然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截断敌向西逃跑的退路，然后由东、南、北三方面向敌展开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敌78师的1个旅又2个团。同时，红28军在盐池、定边方向击溃胡宗南另一路进攻的部队。胡宗南的其余部队仓皇向西撤退。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于12月初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和党中央会合。

12月7日，中央军委作了调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等23人为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为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五军、九军于10月底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的战略任务。3个军共2.2万人渡过黄河后，孤军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同马步芳、马步青的3万正规军和10万民团作战。

11月11日，中央命令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李卓然等人为委员，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中央的意图是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得到苏联的物资援助。

11月下旬初，红军西路军已控制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不料，9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2000余人。此时陈昌浩同徐向前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徐向前认为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陈昌浩说：“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们击溃，形势大好。”陈昌浩找人谈话，准备对徐向前的“右倾路线”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

1937年初，西路红军挺进到高台、临泽地区。中央指示西路军留在高

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敌马家军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1月12日，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人在保卫高台县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掉头转攻临泽。红军1.4万人全部集中在临泽的倪家营子地区43个屯庄里。2月1日，马步芳投入7万人的兵力，围攻倪家营子。红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为期40天的大血战。3月13日，红军西路军只剩下3000余人，边打边撤，进入康隆寺地区。敌追兵又至，经过一场血战，西路军向祁连山败走。

西路军决定，现有部队分散游击，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组成西路军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西路军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

3月的祁连山依然是冰封雪盖，部队分散活动后，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9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人员分散返回陕北。由李先念率领的另一路红军，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入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

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返回陕北的路上，途经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湖北籍医生，和陈昌浩算是老乡。因那里仍是是非之地，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催陈昌浩快走，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在那里休息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他人。时而晓行夜宿，时而夜间赶路，时而宿在群众家里，时而露宿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在永昌至凉州途中，他意外地遇到特务营外号叫“曹大头”的曹营长。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大头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敌人有抓你的布告，抓住有赏。”徐向前淡然一笑：“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他俩过了黄河，到了打拉池。徐向前用一个金镢子换了长袍和棉袄，俩人脱下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俩人昼夜兼程，翻六盘山，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小屯上遇上红四军参谋长耿飏带领的侦察分队，而后返回延安。

## 第三十一章 从敌人到朋友

汪精卫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式后，全体委员往会议厅门外摄影，蒋介石因事未到，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中间，摄影完毕，大家正回身上石阶向会议厅走去，忽然从记者群中跳出来一个人，举起左轮手枪，向汪精卫射击，第一枪就击中左额，汪应声倒下，背部又中一枪，左臂也被子弹擦伤。站在汪身旁的张学良及会场警卫，迅即奔向行刺者，将其手枪踢掉，同时将其枪击捕获。行刺者两日后死于医院。

行刺者名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对内镇压、对

外妥协的反动政策，激于爱国义愤，以晨光通讯社采访员的身份潜入会场，以谋杀蒋介石为主要目标，但不料蒋因故未参加拍照，即以汪精卫为谋刺对象，当时汪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被刺也是罪有应得。

汪精卫遇刺后，被抬到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其左额的子弹取出，而背部子弹因夹于第 5、6 根肋骨间，手术容易损伤脊椎，造成生命危险，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术。

汪精卫本与蒋介石有矛盾，遇刺时蒋又不在场，更加猜疑，以为蒋是借故不参加摄影。于是，他便在出院后赴上海继续治疗，并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会长，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央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由于汪的辞职，汪氏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汪精卫既感大权已失，又怕再度遭刺，遂于 1936 年 2 月 19 日，带着枪伤乘船匆匆离开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

蒋介石却是狡猾，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对日本的政策时说：“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于是，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又悄悄地进行政治试探。他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希望与苏联签订对日的军事同盟，但当陈立夫到达德国准备去苏联时，蒋介石又命他回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谈判。

蒋介石命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要求谈判。王明回答说：“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王明后来指定潘汉年回国作为中并谈判的联系人。

陈立夫受蒋介石之命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任务交给他的亲信、CC 派重要成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便要他与共产党联系。

谌小岑通过覃振熟悉的进步学生翦伯赞的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北平地下党有联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便批准吕振羽去南京商谈。

谌小岑又通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上海地下党派中共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

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于是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请姐姐宋庆龄传达信息，宋庆龄便在 1936 年 1 月，请共产党员、上海牧师董健吾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同宋子文、顾维钧是同学。董健吾于 1928 年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工作，后来冯部清党，董潜返上海，以牧师职业为掩护，作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女儿等。

宋庆龄交给他一封信和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张二人要通过张学良部的驻区

才能到达陕北苏区，董健吾向张学良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张学良明白了南京的意图，派人护送董、张进入苏区。

张学良送走了董、张，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博古、林伯渠、张云逸分别接见了他们。并派人将董健吾带来的宋庆龄的密信送往在山西前线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毛、周给宋庆龄复了信，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健吾便带着这个密件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不久，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周恩来分别给曾养甫和陈立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抗日必须反蒋”的策略，改为“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去上海，同陈立夫会面。

潘汉年说：“蒋先生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急转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同蒋先生面谈。”蒋介石当时抱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中共对蒋氏的回答是：“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之让步。”担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的是张学良，蒋介石又下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张学良初到西北，继续执行“剿共”政策。他把东北军的主力调集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把于学忠的151军调往甘肃。他对东北军官兵说：“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为了免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这话引起了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不满，他们向张学良陈诉：“联共抗日的问题迫在眉睫，不容迟疑，应从速解决。”少壮派重感情，讲义气，对张学良竭尽忠诚，他们的主要成员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是同学，有胆有识，在张学良总部任警卫营长；应德田是东北大学学生，思想进步，抗日救国思想强烈。另外还有高崇民、黎天才一些人，这些人既是张学良的部属，又是他的朋友。

在少壮派和一些进步朋友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当时张学良吟诗一首：

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

深仇积愤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归。

张学良的十几万东北军在陕北“剿共”，连连碰壁，节节败北。1935年9月间崂山战役，王以哲的67军110师几乎全部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10月榆林桥战役，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被歼，师长牛元锋毙命；黑水寺之役，106师一个团被歼。

短短3个月就损失3个师之众。

张学良请求蒋介石补充武器、弹药，以及给两个阵亡师长特别抚恤金各10万元等，蒋介石回答说：“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张学良愤慨地说：“我张某人混得不值10万块钱了！”这时张学良才知道蒋介石

石调东北军来西北“剿共”，是一箭双雕，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或者被红军消灭。少壮派智囊人物应德田进言道：“先‘剿共’而后攘外是蒋委员长坚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样呢？进攻江西红军4年，前后5次投入总兵力达100余万，结果损兵折将，占了些什么便宜？红军还是红军，仍然存在！以往的教训，如不及早觉悟，固执坚持，东北军迟早会在天天‘剿共’声中毁灭自己，委员长的治国决策不能不令人警惕。再者，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越俎代庖，兵马弹药损失得不到补充，先不说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家属如何安抚？他们跟着副司令辗转南北，是为了有一天打回老家去，现在他们却成了异乡孤鬼，怎么不令人心寒？这些东北军阵亡将士的鲜血是感动不了委员长的。他远居南京，坐山观虎斗，是想借用内战之机一箭双雕，达到既‘剿共’又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目的。”

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委员长的决策，请副司令深思。”对于应德田的肺腑之言，张学良回答说：“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又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应该设法谏诤去说服他，不应该抛弃他。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因为委员长要‘剿共’，因此他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吧！”张学良于1935年12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之后，带领应德田等去上海会见东北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和抗日爱国将领李杜等人。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曾担任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后来杜重远赴上海和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出版《生活》、《新生》周刊。杜重远对张学良说：“日寇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张学良听了杜重远的话，精神振奋，耳目一新，表示绝不辜负友人的期望。

张学良同李杜将军谈话时，提出要尽快找到共产党负责人进行联系，他在离开上海返回西安时，把应德田留在上海，协助李杜与共产党联系。

1936年1月25日，红军以毛泽东领衔有20名将领署名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之一震。不久，张学良突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称：“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张学良看罢电报，心情激动，思绪万千：“他还活着！”高福源是东北军中最能干、最受张学良器重和赏识的一个年轻团长，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以后投笔从戎，考入东北讲武堂，后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毕业后在东北军中由连长一直升到上校团长。他不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也有一定的治军本领。

他的突出特点是：豪爽实在，争强好胜，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他曾率领619团在河南与红军多次交火，虽然吃了败仗，但他总不认输，认为能吃掉红25军。后来红25军转移到陕北，他率部尾追，在陕北富县与红军对峙。可是，榆林桥战役619团被红军全部吃掉。

他被俘后，自忖必死，但又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死在抗日战场上，偏偏死在这个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但他看到红军不仅没有杀害他的样子，而且红军卫生员还亲切地给他医治创伤，吃的饭比红军士兵还好些，又发给他一套御寒的新棉衣，行动也比较自由，每天派人同他谈话，态度很和蔼，当他了解到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他十分感动。3 个月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对红军疑惧心理完全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遂提出要求见红军负责同志，说有重要的问题商谈。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他见面。他说道：“不但我赞成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我愿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回答说：“这次你回去，先以你个人的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张学良曾给王以哲发过密电，请他在前线设法和红军沟通联系，高福源从红军那边回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遂于次日亲自驾驶飞机飞往洛川。他一走进 67 军军部，便吩咐：“把姓高的带来。”高福源一进来，便用立正的姿势向张学良报告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张学良大怒，拍案大骂：“你好大胆子！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会这样，心一横，说道：“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记了我们的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 3000 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高福源不禁大哭起来。

张学良听了高福源这番话，不由得流下眼泪，站起来拉着高福源道：“你回来很好，你说的很对，我刚才就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谈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高福源回到陕北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李克农又引高福源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高福源同志，你的情况李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周恩来接着说：“你这一步走得很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高福源激动得手足无措，木讷讷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毛泽东请高福源先去 67 军，安排好电台联络工作。

1936 年 2 月 19 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 4 人于 2 月 21 日由瓦窑堡启程，25 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安全。”李克农等先同王以哲等进行了 3 天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项协定。

3 月 3 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就飞洛川会见李克农等，他们又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亲切会谈。张学良最后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谈判地在肤施（延安）。

4 月 8 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李克农陪同下赴延安。

次日，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等 5 人在延安天主教堂举行会谈。

刘鼎是张学良委托李杜在上海找来的共产党员朋友。刘鼎是四川南溪

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后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兼东方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后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尔后又改任兵工厂政委。红军长征途中他掉了队，由江西秘密地转到上海。上海地下党考虑到刘鼎是高级知识分子，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到张学良部做统战工作最适合。于是，刘鼎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同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一起，在张学良派去迎接他们的赵毅陪同下来到西安。

张学良同刘鼎一见如故，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倾谈十多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们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天主教堂会谈，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说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认为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

他说，他两年前从意大利回国时，曾相信法西斯主义，因而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但这条路能否走通，他现在开始怀疑，向周先生请教。

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对张学良所提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动主张。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主义，讲法西斯主义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力，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抗日才能取得胜利。”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8项协议。张学良私人先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

中共中央在与张学良建立联系的同时，也同杨虎城联络。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他同共产党早有联系。早在1921年，杨虎城在陕北榆林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后来魏野畴担任了杨虎城的国民革命第十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第十军驻皖北，魏野畴便介绍当时主持中共皖北特委工作的南汉宸与杨虎城相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杨虎城遂命南汉宸为第十军革命军事干部学校校长，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南汉宸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在皖北策动暴动。杨虎城虽未参加暴动，但他以赴日本疗养为名，暂时脱离部队。临别前，他嘱咐参谋长孙蔚如：“南汉宸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朋友，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多加关照。”由于叛徒告密，皖北暴动流产，魏野畴牺牲，孙蔚如派人秘密地把南汉宸转移出去。

1930年10月，杨虎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便派人到河南开封，把南汉宸请来，委以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又释放西安在押共产党员潘自力、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等人，并资送一些年轻人潘自力、王炳南等到国外留学。1932年夏，国民党下令通缉南汉宸，杨虎城遂赠金送银，派兵连夜护送南汉宸去日本。

南汉宸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即回到天津作党的地下工作。在杨虎城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期间，南汉宸派申伯纯去南京说服杨虎城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杨虎城从南京回到西安后，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去见杨。汪锋长期在西北从事革命工作，他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以及红 26 军政治委员，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由他领导。他同刘志丹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抓起来，直罗镇战役后，汪锋从瓦窑堡被释放出来，毛泽东召见他，派他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

## 第三十二章 哭谏罔闻

汪锋受毛泽东派遣去西安，他化装成鞋铺的讨帐先生，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背着褡裢，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本，当走到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被地方民团的两个便衣拦路搜查，把藏在长袍夹缝里的信搜出，他们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杨虎城，立刻膛目结舌。

汪锋便呵斥道：“是谁派你们来随意搜查行人的！”“长官息怒，我们是奉县长党伯弧之命！”两个便衣一边回答，一连点头哈腰。

党伯弧早年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汪锋领导，后来参加了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信任。从长武到西安 300 多里，敌人的关卡、密探很多。汪锋心想，何不请党伯弧设法把自己护送到西安，遂令便衣带他去见党伯弧。

党伯弧挑选了一名亲信带领 4 个兵，乘汽车把汪锋护送到西安。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长谈 3 次。是时南汉宸从天津派王世英来西安，带着南汉宸的 6 项建议同杨虎城会面。汪锋、王世英同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等协议。

不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选派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进驻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自靖国军起，一直是杨的高级参议，与杨私交甚厚。

毛泽东又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委以他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作为掩护。

张学良、杨虎城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和共产党的关系。但由于蒋介石在西安派有特务秘密监视张、杨，蒋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任“西北剿总”参谋长，蒋又派他的最得意的开门大弟子、黄埔军校第 1 期学生、黄埔系的“十三太保”之第一太保曾扩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直接向蒋介石密报情报，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也有蒋氏特务。张、杨两人虽然都分别同红军签订了协定，但彼此都隐瞒着，他们相互之间都还存有戒心，深怕张扬出去获个“通匪”罪名，尽管这样，彼此间已分明看出，张学良便派东北老乡高崇民到十七路军做联络工作。高在东北军中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张学良非常尊敬他，他来往张、杨两将军之间，杨虎城对他也很赏识。张、杨之间开始疏通关系。

一天，张学良对王以哲说：“我觉得杨虎城不会出卖朋友，干脆和他把话挑明，反正这一步迟早都得走。”王以哲以赞成的口气回答说：“从某些迹象看，杨主任（杨兼任西安绥署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联系上了，这层窗户纸，以敝人之见早该挑破，多个伙伴也多条路嘛。”“好，就这样决定，请杨虎城到洛川去谈吧，西安城内蒋介石的耳目太多。”张学良请高崇民同杨



虎城一起去洛川。

张学良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机关的注意，特意在“西北剿总”会议上宣布，成立“洛川前方指挥所”，便于他以“督剿”为名去洛川活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洛川都谈了心里话，他们决定：同共产党携起手来，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对于蒋介石，采用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逼蒋抗日。

至此，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红军已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整训部队，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遣彭雪枫、朱理治等 40 多名干部进入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周恩来先后给蒋介石、陈果夫和陈立夫写信，规劝他们改变“清党剿共”政策。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先生揭发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攫去我半壁河山，今日登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毛泽东先后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冯玉祥、傅作义、宋元哲、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各方人士，说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抗日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命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

1936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暨红军主要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致书蒋介石，晓以利害得失，促其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便踌躇满志，他说：“红军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去吧！”蒋介石将其嫡系与精锐部队 260 个团，约计 30 万余人，调往平汉线汉口到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到灵宝线上。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剿共”不力，既行入陕，围歼红军。

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宋庆龄针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和何香凝、胡愈之等领导和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征集 10 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国际上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

蒋介石厉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罪恶主张，决心继续“剿共”内战。

他认为调集 30 万大军和 100 架战斗轰炸机，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毒气弹，就可以在两三个月内，将“匪共残余大部分歼灭在陕北地区，小部分可能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

那时他将以重兵控制黄河，对“匪共残余”相机行事，或予围歼，或予收编，收编数额最多不能超过 5000 人。

1936 年 10 月 22 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他准备向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强迫他们执行。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决定第一步将他们调离西北，免为“剿共”的肘腋之患，然后再找机会解决他们。蒋认为解决张、杨易如反掌。

蒋氏狡诈多端、诡计十足，他带着满身的杀气来西安，但初到西安却装着若无其事，要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等陪同他攀登华山，遨游终南，表现出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

在游山赏景之中，蒋问张学良近来看什么书，张回答看看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蒋正颜厉色说：“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这类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蒋介石又说：“汉卿，最近两三个月，告你状的可不少啊！”“学良才疏学浅，担当重任，还望委员长多栽培和指导才是。”张学良有些惶恐地回道。

“汉卿，我对你是很了解的，你尽管放心，我把西北已经交付给你，就是相信你，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都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蒋介石大大落落地说。

蒋介石、宋美龄下榻在距西安 30 公里的华清池。华清池位于临潼县风景秀丽的骊山脚下，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那里修建骊宫，到唐玄宗天宝六年，又大兴土木，围绕 4 个泉眼修汤井为池，环山列宫殿，宫周筑罗城，改名“华清宫”，因宫在温泉之上，又名“华清池”。邵力子担任陕西省主席后，见华清池年久失修，日趋颓衰，便筹款修葺。

蒋介石光临，辟为临时行宫，骊山上下，华清池内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蒋介石夫妇的办公室和宿舍安排在荷花池上面的一排老式的五开间式房屋。站在庭院坪上可以观览临潼县城，远眺广袤的关中平原，俯瞰华清池，池中遍植荷花，出水芙蓉亭亭玉立，阵阵清香弥漫四野，令人心旷神怡。

蒋介石游山玩水之后，便在五间厅的会议室内召开军事会议。蒋身穿军装，胸前斜挎着武装带，脚登擦得锃亮的长筒马靴，一反连日来游山玩水时表现出的那种温文尔雅姿态，显得威风凛凛，透出几分杀气。

到会的除张学良、杨虎城、晏道刚之外，还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分军、师长。

蒋介石走进会议室，威严地扫了站立着的将领们一眼，快步来到悬挂着他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边就位，并招呼大家坐下。他板着面孔说：“我这次来西安之意，一言以蔽之：围剿共匪！南方之共匪经国军多次围歼，伤亡惨重，侥幸漏网的残匪长途跋涉，现已流窜到陕甘边境，我们要乘共匪立足未稳之良机，集中兵力进行围剿，以绝后患。东北军开到陕西剿匪，为时一年，战果甚微，赤患不仅没有根除，反有向河东、关中蔓延之势。我这次来陕，一方面想了解进展迟缓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部署新的围歼，决定调集 30 万兵力，配备 100 架战斗机，力争在二三个月内，把共匪聚歼于陕甘边境。现在，你们先谈谈各自的意见。”蒋介石话音刚落，张学良便站起来说：“我向委员长再次请求，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建议，共商抗日大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请求，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愿望和要求，请委员长明

察！”蒋介石满脸怒气地问坐在左首的杨虎城：“虎城，你的意见呢？”“是的，我也有同感。十七路军全体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而‘剿共’却士气低落颇值得忧虑。”杨虎城委婉地回答。

蒋介石大怒：“你们都中了共产党的魔术了！兵随将走，什么剿共士气低落，士兵还不是听你们的，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会动摇吗？”性格直爽的张学良红着脸争辩说：“打内战是指挥不灵了，要是打日本，东北军还是勇猛善战的，可以一呼百应，指哪打哪！”“在未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准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是既定国策！”

你们绝不可被共匪蛊惑，要坚定信心。明天我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我相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深明大义，会服从党国的利益的！”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陆海空大元帅蓝呢军礼服，帽子前沿竖着五六寸长的白旄，腰悬三四尺长的指挥刀，手带白手套，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陪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走上主席台，对校级以上军官训话：“革命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要孝顺父母，为国尽忠，服从长官，这是革命军人的本份。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倒置，蓄奸养贼，便不是革命，这样的军官，党国是要严厉制裁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前任务，第一是剿共，第二也是剿共，第三还是剿共。剿共是你们唯一的、光荣的任务！”

……”蒋介石言词滔滔，台下却议论纷纷，秩序大乱，一片哗然。蒋见势头不妙，讲话便草草收场，阴沉着脸，谁也不理睬，匆匆穿过人群，直奔汽车。张学良留他吃饭，蒋面带怒容地回答说：“不吃，不吃，现在就走。”蒋走后，众人议论纷纷，这个说：“蒋简直是胡说八道！”那个讲：“作为领袖，国难当头，不讲抗战，只讲打内战，安的是什么心哟！”还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蒋氏特务贴出“安内攘外”的标语，有人将其涂改为“按内让外”，以示讽刺。

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杨准备抗日，培训军事干部的场所。蒋在那里大放厥词，激起军官们极大愤慨，张学良为了息事宁人，对受训军官们说：“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安下心来，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小不忍则乱大谋。”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去洛阳西宫军校住了一个多月。他在那里加紧“剿共”部署，调兵遣将，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等人是各路军总指挥；他下令在西安、兰州扩建飞机场，容纳100架轰炸机，供战时使用。

张学良思忖：原以为凭自己与蒋多年深厚交谊，能够说服蒋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结果竟如此冷酷，他深感失望、愤懑。还有什么办法去说服委员长呢？他想起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的庆典，何不趁此良机，邀请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一起去洛阳向蒋介石进言。想到这里，遂吩咐秘书给太原发报，请阎锡山先到西安，然后同去洛阳给蒋委员长祝寿。

张学良曾在1936年4月29日去太原，向阎锡山介绍了他同周恩来在延安会面的情况，建议阎锡山以积极姿态与共产党联络，争取合作，阎表示同意。5月27日，张学良偕杨虎城再次赴太原，与阎具体商谈联共抗日计划。中共中央也托人向阎锡山表达联合抗日之意。阎锡山审时度势，下决心与共产党谈判，请中共派代表来太原会谈，中共中央便派彭雪枫、周小舟去

山西，他们说明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阎锡山表示：要救中国，除照共产党的办法，再没有第二个办法。

9月初，阎锡山派郭挺一去北平，邀请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薄一波去太原“共策保晋大业”，以此表示他同共产党和解的诚意。薄一波随即入晋，他首先向阎锡山提出停止迫害共产党人的要求，经过多次会谈，终于使王若飞等一批被囚禁的著名共产党人获释。

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由“暑期健身团”改建的“军政训练班”任职：薄为政训处组织科长，宋劭文为宣传科长，刘岱峰为训练科长兼主任干事，杨献珍为研究室主任。

薄一波、宋劭文等还担任了山西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委员。该同盟会在数月内发展会员100万。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同阎锡山多次谈判，达成3项协议：（1）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2）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3）组织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

张学良给阎锡山发去邀请一同赴洛阳的电报，阎锡山欣然同意。张学良的专机第二天就把阎锡山接到西安。张学良、阎锡山、杨虎城彻夜长谈，约定利用去祝寿之机劝谏蒋介石。

张、阎同车赴洛阳，张学良因有阎锡山的同情和支持，情绪甚为兴奋，一路谈笑风生。

10月31日上午，洛阳西宫军校内张灯结彩，锣鼓齐鸣。祝寿典礼在军校广寒宫礼堂举行，礼堂内布置得五彩缤纷，富丽堂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鞭炮声中走上主席台。台下前几排坐着各地军政大员，后面是洛阳军分校学员。蒋介石夫妇在台上喜气洋洋地频频向台下招手，全场起立鼓掌，气氛颇为热烈。

祝寿典礼开始后，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派代表致祝辞，盛称蒋介石统一全国，消除赤患的“丰功伟绩”，以及对党国的伟大贡献。蒋介石正襟危坐，不时左顾右盼，沉稳中显露出得意的样子。

特派代表致辞后，各地军政大员相继登台为蒋氏歌功颂德，献媚一番，最后由蒋介石致答辞。

祝寿典礼完毕后，张学良、阎锡山走进蒋介石的小客厅。蒋介石朝两位啾啾嘴，示意他们坐下，他自己也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面朝阎锡山问道：“百川，近来河防怎样，共匪还经常过河袭晋西吗？”阎锡山赶快回说：“共军撤回黄河西岸以后，目前河防倒还平静。”老谋深算的阎锡山瞟了张学良一眼，话锋一转，道：“今天，委员长五秩华诞，洛阳冠盖云集，颇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盛啊！”蒋介石哈哈大笑：“全凭大家，全凭大家。……”张学良便接过话题说：“现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老百姓愿捐资热忱支援抗日，拥戴您领导国军收复失地，把日寇赶出中国去。”蒋介石正色道：“抗日，又是抗日！我给你说过多少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必须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你怎么置党国利益于不顾，把剿共放到一边呢？共匪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消灭共匪，谈何容易！我和共军作战一年了，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被人家吃掉了3个师。”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

“那是你三心二意，意志不坚！更应由此吸取教训。”蒋介石声色俱厉。

张学良争辩说：“广大官兵的家乡沦入敌手，不图收复，却叫我们到西北来剿共，你叫我们的意志怎么坚决起来？而共产党却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8年来我跟随委员长，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望委员长能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则，即使我本人愿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一派胡言，不要再说了！”蒋介石不愿再听下去，转过脸问阎锡山：“百川，你说大敌当前，哪个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阎锡山道：“这个问题嘛，依我看应该是日本鬼子。委员长，汉卿讲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全民族的抗日，是舆论所归，人心所向，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是当今中国的唯一出路。”蒋介石拍案而起：“我现在只要你们回答一句话，到底是我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应该服从我？”阎锡山为缓和紧张气氛，连忙陪着笑说：“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我们当然应该听委员长的。”“既然如此，那我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决不谈抗日之事。你们若是非要坚持，那就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抗日好了！”蒋介石说罢拂袖而去。

次日，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纪念周上，有所指地骂道：“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主张停止剿共的人，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共产党是大汉奸，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侈谈什么抗日？当面的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张学良坐在前排，心情极为沮丧。蒋训话完毕，张学良回到住所，吩咐随行副官：“收拾东西，回西安！”11月17日，蒋介石飞往太原，同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谈话，命令他们迅速结束绥东抗日战争，以免影响“剿共”决策。尔后蒋又派陈诚到绥远前线，监督和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并指示傅作义迅速抽出手来，准备“剿共”。由于蒋介石的三令五申，绥远抗战就不了了之。

### 第三十三章 双十二兵谏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乘专车再度去西安。与此同时，蒋系高级将领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朱绍良、陈调元、万耀煌、邵元冲、钱大钧等十几员大将，以及南京政府大员蒋作宾、张冲、蒋百里等接踵而至，麇集西安。蒋的嫡系军队也纷纷开进潼关，最新式的战斗机一队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一时间，西安城火药味十足，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战车奔驰，蒋系特务、宪、警趾高气扬。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

次日，蒋介石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以上军官分别谈话，要他们听从他的命令，继续彻底“剿共”。军官们表面上唯唯诺诺，口称服从命令，谁也不敢说心里话。蒋介石又产生了错觉，以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是可以供他驱使的。于是，他便和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向他们提出两个办法，逼迫他们明确表态。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若张、杨不服“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

张、杨当然不愿接受第一个办法。但他们又深知照第二个办法，两军一旦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三位一体解体，必将为蒋介石所消灭，那无异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蒋介石气势汹汹地逼迫张、杨作最后的选择，毫无其他通融的余地。

张、杨协商决定，再对蒋介石善劝，尽力说服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把他扣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

张学良来到华清池，蒋屏退左右。张学良道：“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绥靖抗日，我自己也可亲自上前线指挥；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

……”张说话问，声泪俱下，蒋先是无动于衷，继而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最后竟拍案狂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从华清池回到西安，对杨虎城说：“失败了！”他建议杨再去劝蒋。

杨去华清池，蒋介石便说：“虎城，张汉卿年轻幼稚，容易受人欺骗，你和他一地共事，要多加开导，以免误入歧路！”杨虎城回道：“张副司令年轻有为，思想敏捷，指挥果断、得当，甚孚众望，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很值得虎城效仿。”蒋介石瞪了杨虎城一眼：“他和‘共匪’暗中勾结，你也效仿？”杨虎城语句缓和地说：“委员长，请听虎城进一言。我们国家和民族已到了危急关头，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依我之见，红军的问题宜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不宜用兵。不然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蒋介石未等杨说完，挥挥手说：“你也是荒谬之论！对付共匪的唯一办法是军事解决！红军必须交出武装，听从政府的命令，予以遣散。如果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三面合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把他们消灭。虎城，你和张汉卿不同，你是本党老同志，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应当知道我们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请相信我，消灭共产党，我会领导你们抗日的。你是忠于党国的，一定要珍视自己的锦绣前程，‘剿共’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杨虎城见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便站起告辞。

蒋介石为催促东北军将领执行“剿共”计划，邀请刘多荃和王以哲两将军去临潼吃早餐。饭后，蒋先对刘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刘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很不高兴地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5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蒋又满脸怒气地对王以哲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知道你们这些举动！希望你们即刻悬崖勒马，将功补过。”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大、中、小学校学生1万余人开纪念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到绥靖公署、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队伍到陕西省政府请愿时，特务开枪，打伤小学生一人，激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列队直奔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得到消息，骂道，“娘希匹，这些学生娃子要造反啦！”他命令族侄、侍从室组长蒋孝先指挥宪兵2团，堵截游行队伍。命令蒋孝先说：“对不听劝阻的暴徒，一律格杀勿论！”蒋介石还打电话给张学良说：“西安的学生娃子受共产党的煽动，要到临潼来找我闹事，令你立即出动部队，途中加

以阻拦，如有暴徒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听到没有？格杀勿论！”蒋孝先率领宪兵2团开到十里铺和浐河桥一线严阵以待，在两旁的高崖上架起一排排机关枪，并出动了大批骑兵，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

张学良急乘汽车赶到十里铺，抢到游行队伍前面停车，张从车上下来，跳到路旁一个土坎上，面对学生，心情沉痛地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只是今天时机不早，不如请大家先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去还要快些。”“不，必须由委员长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张学良又劝阻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怒最高当权者。我为保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学生高呼：“我们愿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学生们哭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撼天动地！

张学良心头一热，声泪俱下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同胞们，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自从失掉东北4省，全国人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想打日本强盗？可上级不许我打。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上的，请你们相信我。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我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被你们处死。”请愿学生见张学良这番表示，同声高呼：“拥护爱国的张副司令！”尔后整队返回西安。

张学良驱车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报告学生请愿情况。蒋怒斥张学良说：“你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张学良同蒋介石争论到深夜，蒋拒纳忠言。蒋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蒋介石恼怒未消，提笔给邵力子写便函：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列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12月9日蒋介石对张学良已经绝望，以此刺激执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

张学良回到西安同杨虎城商量。杨虎城道：“民众和军队对老蒋的愤恨情绪，都是箭在弦上。扣蒋的时间不能再延迟了，万一你我错失良机，控制不住形势，发生骚动，那就更危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张学良说：“先礼后兵，仁至义尽，今天我们再劝他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他再不听，我们也算对得起他。”杨虎城摇摇头：“依我看，凭嘴说是没用的。咱俩轮番去闹，万一他看出马脚，立即上车走了，反而不妙。”“这个人很傲，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目下还看不出他有提防的迹象。”最后，杨虎城同意张学良明天再去试试，并设法把蒋稳住。

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潼，蒋介石一见他，就没好气地说：“我还要问你，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我的机枪是打日本的，不打爱国学生！”张学良回道。

蒋吼道：“‘九·一八’，日本人在你鼻子底下，你为什么不打？”张学良刹那间怒火万丈：“你下令不让打么，我怎么打？我那时患重病，躺在协和医院，我还打电报请示你，你又不是不知道！”蒋介石双目怒睁，无言以对。

张学良又道：“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蒋介石“啪”地拍案而起：“全国只有你一个敢这样诬蔑我！你，你太放肆了！”至此，哭谏、委婉劝说都失败了，张、杨便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介石抗日。

12月11日夜，张、杨对捉蒋作了具体部署。由东北军张学良的警卫营和105师担任到华清池捉蒋和西安到临潼线的警戒；并电令兰州的东北军解除该地的朱绍良部武装，扣留其在兰州的飞机。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和宪兵、警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午夜11时，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集在西安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宣布实行捉蒋、逼蒋抗日的决定和计划。

12月12日清晨5时，东北军警卫营的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住所。不料被蒋的卫队发现，双方展开激战。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蒋介石闻听枪声，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吓得发抖，披着睡衣，拖着鞋就向外跑。在翻越围墙时跌进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脊骨摔伤了，脚也碰破了，并丢了一只鞋。他顾不得疼痛，跌跌撞撞地往山上爬，后由他的贴身侍卫、族侄蒋孝镇背到骊山山腰，在虎畔石后的中岩洞里躲藏起来。

孙铭九等闯进蒋的住所五间厅，不见蒋的踪影，但见衣帽、斗篷仍在床边，假牙、皮包放在桌上，被窝还有余温，估计未逃太远，便分头搜索。一个战士发现后墙边有一只鞋，孙铭九率队搜索骊山。

张学良得到报告蒋介石下落不明，焦躁不安，深恐蒋介石身遭不测。他对杨虎城说：“如果发生意外，将贻害大局。我张学良便成为千古罪人。我割下自己的头，请你送到南京请罪，绝不能因此而打内战。”8时许，警卫营战士捉住了蒋孝镇。孙铭九问他：“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颤抖着回头向山上一看，示意蒋介石在山洞里。警卫营班长陈思孝向孙铭九报告说：“委员长在这里！”蒋介石抖抖索索地喊道：“我是委员长，不要开枪，你们不要开枪！”蒋走出洞口见十几枝枪口对着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孙铭九答道：“张副司令让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因蒋介石腰部摔伤，由警卫营连长王协一背着下山。兵士把蒋介石抬进小汽车，护送他到西安。

警卫营在袭击华清池战斗中，活捉了蒋孝先，因蒋作恶多端，被警卫营就地枪毙。

在东北军去临潼捉蒋的同时，十七路军也按预定计划行动。由城防司令孔从周率警备第1旅、炮兵团和宪兵营解除了宪兵第2团、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和西安城内外中央系统的武装。十七路军还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银行、邮电局等；扣留了停在西安飞机场上的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军人员。

十七路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记军政大员。邵元冲听到枪声，跳窗逃跑，被流弹击成重伤，送医院不治而亡。搜捕军政大员集中点名，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蒋鼎文、第六军总指挥朱绍良、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还有卫立煌、蒋百里、蒋作宾、李基鸿、万耀煌、陈继承等，就是不见陈诚。士兵立即搜查，在大厅后一间烧火室里发现一个空啤酒箱子微微动弹，踢开箱子，见一个人曲身趴在地下，抓住衣领揪起来一看，



果然是陈诚。原来陈诚身带处分张学良、杨虎城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他即撕毁文件投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下，然后逃到那里躲藏。

在兰州，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电报，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蒋介石被孙铭九等押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的一个房间内。张学良让他稍微休息一下，便去见他。蒋见他进来，神色突变，端坐在椅子上。张学良谦和地说：“委员长，您受惊了！”蒋介石不理睬。张学良问第二遍，蒋介石突然站起，怒喝道：“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张学良变色道：“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以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我问你，这件事是你的部下干的，还是你干的？”“是我让部下干的。”“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是拥护你领导抗日，完全是为了国家，对你并无恶意。”“既然是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回洛阳，问题在洛阳谈。”“说得轻巧！抗日之事，岂容搪塞！你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坚持从前那一套，那只有让群众公裁。”两人争吵起来。

张、杨在扣蒋同时，撤销了内战指挥机关“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杨虎城为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公安局长；通令释放政治犯；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张、杨交议的问题或提出政治建议；又组织了抗日援绥军，以孙蔚如为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还接管了西安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特请史沫特莱主持对外英语广播。

政治设计委员会根据张、杨两将军的指示，很快拟出8项救国主张，即：（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 （2）停止一切内战。
-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带着8项救国主张文稿去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的蒋记军政大员宣读，要他们在文稿下签名。陈诚签名后，还特地说了几句话：“汉卿，我有一句最当紧的话：就是咱们自己人什么事都好办，什么话都好商量，但是你千万别让戴红帽子的来。他们一插手，我们都得完蛋。”张学良哈哈大笑：“共产党也是爱国的，爱国家者都是讲道理的。天下为公，用不着怕他们。”签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廖澄流等。张学良、杨虎城将此8项救国主张连同签名，通电全国。

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张学良还分别致电孔祥熙、

宋子文、宋美龄等，说明只要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绝对保证蒋的安全。

12月12日（双十二）下午，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争争吵吵，各执己见，何应钦，戴季陶、居正、吴雅晖等主张讨伐西安；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主张和平解决。一直闹到13日凌晨3时，通过剿抚兼施决定；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准备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同时以于右任、张钫为陕甘宣抚使，前往西安。

野心勃勃的何应钦见蒋介石被扣，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便以军政部长的身份就势揽住军事大权，命20个师的中央大军，沿河南、陕西边境向前推进，命集中在洛阳的轰炸机，飞往西安上空示威。何应钦的锦囊妙计是：经过“讨伐”救出委员长，他是救蒋第一功，倘或因为轰炸西安而葬送了委员长，他是继蒋第一人。原来何应钦在1927年12月参与“逼宫”事件，使蒋介石第一次狼狈下野后，丧失了蒋对他的信任，他伴君如伴虎，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近10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兴奋到了极点，同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吴雅晖、叶楚傖等主张不惜玉石俱焚，明令“讨伐”。何应钦3昼夜未合眼，进行军事部署。戴季陶、居正等急电正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要他克日返国。蒋“不幸”时，由汪精卫出掌行政大权，何应钦执掌军权。

冯玉祥同蒋介石、何应钦面和心不和。他眼见着何趁机捞去军有大权，对何耿耿于怀，却也无可奈何。张学良，杨虎城给冯玉祥发来了一封电报：“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何应钦大作文章，说冯玉祥与张、杨勾结，寻机把他逮捕干掉。冯宅前前后后，出现了暗探特务。

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亲英、美派，在上海得到“西安事变”消息，如遇晴天霹雳，震惊莫名。他们带着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连忙飞抵南京。

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的活动，激怒了宋氏兄妹。他们与英、美大使馆紧急磋商，并请与张学良有厚交的端纳飞往西安探明真相。孔祥熙还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说：“现弟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等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电，而免延误。”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何应钦同宋美龄激烈争吵，宋美龄说：“你这样做，玉石俱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在西安，中央政府由谁来主持？”何应钦怒冲冲地说：“你女人家懂得什么？无见识，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之事，不要你管。”宋美龄潜然泪下：“你这样绝情，太辜负蒋先生了！”在宋美龄的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长名义召开会议，作出先进行和平试探，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停。

日本政府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义愤，煽动杀蒋。

德、意帝国主义与日本相勾结，积极支持汪精卫回国。

## 第三十四章 天日为证

毛泽东收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已是 12 日夜间了，他在灯下反复看着电报，然后来回踱步思考。他要人通知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秦邦宪、张国焘等来开会。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他们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认为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应该拥护。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发了言。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会后，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 20 多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西安，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热烈欢迎。张、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扣押蒋介石之后，西安的形势十分复杂，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面对正在向西安压来的数十万重兵，西安的政治前途将会如何发展，事变应如何解决，张、杨及其幕僚们，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统一的认识，陷入一筹莫展的苦闷之中。许多重大问题，都等中共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到达后研究解决，张学良一再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周恩来来到西安的当天晚上，便同张学良作了彻夜畅谈。周恩来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忱，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对蒋的处置需慎重。他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主张和平解决。周、张商定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 5 项条件，即：（1）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2）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3）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4）成立抗日联军。

（5）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他们商定，为了迎击蒋军的进攻，红军兼程南下，主力先开往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潼关西进的刘峙部队。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到九府街杨公馆会见杨虎城。

周恩来向杨虎城说明了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虎城听后大惊，他说：“蒋介石这个人，真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军阀包括我在内，谁都拧不过他，斗不过他。贵党和他敌对，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就罢。可我和张副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很不妙。”周恩来很体谅地说：“我要是处在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以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至于会不会报复，也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我们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与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团体，老蒋他纵有报复之心，也是难以施展的。”“蒋介石这个人，心如刀刃，毫无信义，诡诈阴险，睚眦必报，什么瞎瞎事他都干得出来。文人反对他，他还勉强睁只眼闭只眼；我们武人反对他，他便恨之入骨。话又说回来，贵党比我胆量大，看得远。现在，你们置血海深仇于不计，以国家民族为重，我还有什么顾虑的！我只是说，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而易举

放他走。”杨虎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端纳带着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递给他。蒋介石如获至宝，转过身去连看两遍：夫君爱鉴：

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样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

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抗日的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老蒋甚狡猾，看到宋美龄信上所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一句，便态度改变了许多。又听了端纳的劝慰，便答应搬到张学良公馆斜对面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去。

次日，端纳飞抵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事态真相。宋美龄要端纳返飞西安，让蒋给何应钦下一停战手令。

蒋介石写下手令：“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端纳的西安之行和蒋介石的手令，使南京局面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主和派占了上风。

孔祥熙、何应钦、孙科、宋美龄等作出决定：批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停止轰炸的日期延长到 22 日。

12 月 20 日，宋子文在端纳的陪同下，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都向宋子文表示：“兵谏只要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周恩来又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听了喜出望外，对中共的态度十分赞赏。

宋子文去见蒋介石，蒋情绪激动。同宋子文谈了 30 分钟。特别是他看到宋美龄信上“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一句时，竟落了眼泪。宋子文弄清了情况，即飞回南京。

12 月 22 日，宋子文偕同宋美龄、端纳、戴笠等再来西安。在蒋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蒋介石提出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名，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谈判从 12 月 23 日开始，西安方面的代表是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南京方面代表是宋氏兄妹，应德田担任记录。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在首次会上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6 项主张，即：（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2）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督促其和平解决，不敢横生枝节，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不免讨价还价。

周恩来又两次同宋氏兄妹长谈，希望他们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只要蒋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蒋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宋美龄表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时，博古、叶剑英也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周恩来在继续谈判中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 6 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12 月 24 日，谈判结束，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于当晚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十几年来残杀共产党人，血债累累。他被捉后最害怕的是共产党和红军插手，自忖若共产党来了，他绝无活路。不料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放他回南京当领袖。

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 10 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了。”蒋介石点点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你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呢？”宋美龄忙帮腔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周恩来又向蒋说了许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听着，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他最后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战等谈判议定的 6 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张学良送走周恩来之后，又返回蒋介石的住所，宋氏兄妹请求明天放蒋介石和他们回南京。张学良说：“杨主任还未松口，我不好办。”不料，蒋介石的一席话使张学良立即转变了态度。蒋躺在床上说：“我这次在西安栽了个大筋斗，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一个国家统帅走上了这种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份量呢？对于汉卿、虎城和周先生，我绝对没有话可说，你们确实待我不错。可事情已经陷入这步田地，我日后怎么领导政府，怎么发号施令呢？汉卿，你成全我罢，我想好了，还是把我和美龄一块处置了干净！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说罢便“呜呜”地哭起来。蒋介石很了解张学良，知道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便使出这一招术。

一下子把张学良挑逗起来：“我愿跟你一起去南京，负荆请罪！一言九鼎，让天下人看看我张学良！不管别人允许不允许，我决定的事情，都由得我。”翌日，张学良来到杨虎城住所，说明他要送蒋介石等回南京。杨虎城大惊：“放虎归山，久后伤人。这么大事，我们应该让政治设计委员会知道。老蒋是集中外权变手法之大成的人物，不揪住他的辫子，他一回头就要打击报复。”张学良放蒋心切，起身告辞：“既然想得这多，你我又何必当初！”准备放蒋的消息一传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信后大吃一惊，立即要宋子文去见张学良，恳求他尽早放蒋。

12 月 25 日下午 3 时许，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

蒋介石登机前拉住杨虎城的手说：“仗是不打了，以前的内战由我负责。答应的条件，我一定实行，这个你们放心。否则，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讲一遍：第一、回京后立即命令中央军入关部队撤出潼关，今后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第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第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贤良，容纳抗日分子；第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第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第六、今后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副司令、杨主任负责，西北今后就交给你们了。我说的对不对？”杨虎城直视着他，点了点头。

蒋介石以无限感激的神情对张学良说：“汉卿，到此为止吧。我看你现在去南京没有必要，南京有南京的体统，我虽是领袖，好多事情并不由我，你去了，如果他们打你的主意，对你下毒手，我可就遗臭万年了。你一定要去，也须待我回去安排安排再去。”张学良一挥手：“别再耽误了，上飞机吧！”张学良将亲笔写下的手令交给杨虎城：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师。以虎城代理余之职。

张学良 二十五日周恩来从警卫团团长沙铭九那里，得知张学良送蒋的消息，急忙驱车赶往机场劝阻。

来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无限感慨地说：“张汉卿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飞机刚到了洛阳，蒋就命令张学良立即释放卫立煌、陈诚、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等。张学良电告杨虎城照办。以后又要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 50 架军用飞机。到南京后，蒋介石下令把张学良软禁起来，又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委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员。

12 月 30 日开庭。张学良走进法庭，气宇轩昂，嘴角含笑，毫无畏惧。李烈钧问：“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学良答：“一切经过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我也不便详说。不过，我不是劫持，而是爱惜蒋委员长；也不是叛变，而是热爱国家。我们在蒋委员长面前陈述意见，实现我们的主张，怎么说是叛变？如果说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怎么能安全地回到南京呢？我跟随他一起来，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你们干这种叛乱之事，是受人指使？还是你们自己策划的？”“你看看我这个人，是别人所能指使的吗！我再说一遍，我不承认我们是叛乱。”“你们把中央许多大员都拘禁起来，这还不是叛乱吗？”张学良仰头大笑：“他们身为大员，平日穷奢极欲，不知爱国爱民，蒋委员长误就误在他们身上。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京招待所拘留不过几日，就调戏陈继承的娘姨，可谓老而风流。再如陈诚，平时口出大言，装模作样，貌似忠诚，领袖遇难，既不营救，又不殉节，却一头钻进垃圾箱里，……”李烈钧急忙制止说：“不要说了，与本案无关。”张学良说：“我有一句话想请教审判长，民国二年，你在湖口起兵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兵谏制止蒋介石独裁专制，何罪之有？”李烈钧问：“东北是怎样丧失的？难道你不知罪吗？”张学良霍地站起来，从怀里取出“九一·八”时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宣读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蒋中正”张学良又道：“九一八事变，日寇打进来，

我接到这封电报，只得命部队拔营而起，退出山海关。不抵抗主义，不是创自我张学良，而是创自蒋委员长！这次我在西安向蒋委员长上疏、哭谏，直至不得已而兵谏，完全是为抗日救国而发。我一片赤忱不料却落得这个下场！耿耿此心，天日可以为证！”李烈钧高叫道：“你不必说了。我们就宣判吧。”李烈钧拿起蒋介石交下的判决书，照本宣科：“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褫夺公民权 5 年。”1937 年 1 月 5 日，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由顾祝同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 37 个师兵分 5 路进攻西安。

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和处理复杂的形势问题。周恩来同杨虎城商量后，由杨虎城领衔向南京政府发一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周恩来还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们商定，组成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联军作战方案。周恩来还通过中共中央电调红 1 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 15 军团到达咸阳，红 27 军到达洛川。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 6 项条件，并以不客气的口气说：“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蒋氏在此种情况下，不敢贸然轻举妄动。正当中共努力转变形势的时候，不料东北军少壮派团以上军官 60 余人带着 100 余名团级以上军官签名的文件，来到杨公馆来见杨虎城，孙铭九首先说：“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东北军的头头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他边说边哭，60 余人也跟着放声大哭。还有人说：“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心甘情愿！”杨虎城流着眼泪说：“张将军被扣，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俩人共同搞了这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支撑这个局面，我实在是力不从心啊！”原来张学良离开西安后，东北军很快分化为新旧两派。老派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认为为避免内战，应采用和平方法营救张学良。他们在王以哲的病榻前开会，王以哲说：“副司令虽然不在，东北军还有我们嘛。既然顾祝同他们提出要我们从渭南前线撤兵，为了避免冲突，那就先撤兵罢。”这话传到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少壮派那里，认为老派这样做是取媚南京，投靠老蒋，企图取张副司令而代之，以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对他们很不满。

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从杨公馆出来，便到中共中央代表团住所。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刘鼎等正在开会，少壮派闯了进来，孙铭九抢先说：“我们坚持先让张将军回来，尔后从渭南撤兵，你们代表团是否同意？”应德田接着说：“东北军不同于红军，它是以少帅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有副司令在，这个团体能够维持；副司令不回来，这个团体失去中心，可能很快走向分歧、涣散、崩裂、瓦解。在这危难关头，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先把副司令营救回来。”周恩来站起来回答说：“东北军的情况，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不撤兵很易引起战争。战局一开，你死我活，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共产党与蒋介石是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

忘记。但现在以战争方式要求副司令回来，没有什么好处。”苗剑秋立时恼了：“既然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帮，我们也要打，难道说你们就袖手旁观，看着蒋介石消灭我们？！”孙铭九跪在周恩来面前，哭着说：“你们不同我们合作，咱们岂不是破裂了吗？我们这样各顾各，张副司令就完了！”周恩来只好说：“别吵别闹！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们。”周恩来、叶剑英连忙去渭北云阳镜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一起研究。翌日清晨赶回西安，通知杨虎城和少壮派：“只要你们团结一体，意见一致，中共绝不会对不起两家朋友。包括打仗在内，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同中央军决一雌雄。”

### 第三十五章 卢沟狮怒

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在王以哲住所召开三位一体会议。

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王以哲、何柱国派人把他从兰州接来。他在1月31日晚上来到西安，便参加了这次会议。少壮派急于知道会议结果，便坐在隔壁堂屋里旁听。

王以哲道：“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快决定。和平撤退的条件已经与顾祝同谈妥了，这样犹犹豫豫僵持着是有危险的，是军事上最忌讳的。”于学忠接着说：“我看还是根据鼎芳（王以哲）的意见，和就和了罢。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一下子拉不过来。”何柱国表示同意王以哲、于学忠的意见。

杨虎城道：“从道义上讲，应当主战，我们十七路军是不打算撤退的。现在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压不住阵的。我们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以至释放军政大员、放走飞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跟东北军兄弟采取一致行动，现在又怎么能例外呢！既然你们现在坚持撤兵，我们就听从你们的意见，和平解决罢。”周恩来很为难地说：“我们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不过我想提请你们双方都要高度注意自己内部的团结，耐心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生出枝节，形成想不到的风波。”少壮派群情激愤，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何镜华、刘启文、邓玉琢、于文俊、商亚东、文英奇、杜维纲，王协一等等36人于2月1日晚聚会。他们认为不救张学良的不是杨虎城，也不是中共代表团，而是东北军的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于是他们遂作出决定：于文俊带一排人枪杀王以哲，商亚东、王协一带一排人枪杀何柱国，派人杀害宋学礼、徐方、蒋斌等，派人看守住于学忠，阻止他飞返兰州，同时在街道贴出除奸标语。

2月2日凌晨，于文俊带领一排人奇袭王以哲住所，于文俊带着排长闯进王以哲卧室。

病在床上的王以哲听见枪声，手枪又不在身边，情知不妙，索性坐起来。于文俊对王以哲拱拱手：“军长，学生对不起你了！”举枪对王以哲连发十几枪，王以哲身中9枪而亡。

商亚东、王协一带人去何柱国住所，结果扑了个空。原来何柱国见局势严重，怕被少壮派暗杀，便躲在杨公馆内，请杨虎城保护。



少壮派数人又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来意。

他霍地站起来严厉训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们是在犯罪！”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错。他们自觉惭愧，流着泪跪下认错请罪。

王以哲被杀，谣言蜂起。国民党特务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杀王是受共产党指使的，共产党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

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带着李克农、刘鼎来到王以哲的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他们是最早赶到的，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安慰王夫人说：“王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我们党和红军忠诚的朋友。是他最早沟通了我们和张将军的关系，亲自参加我们和张将军的延安会谈，在这次兵谏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友情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的功劳，中国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不幸被杀，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国老百姓的损失！”周恩来边说边流眼泪。说完便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这消息传出后，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王以哲被害激起东北军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

杨虎城同周恩来派人找孙铭九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经过彻夜商量，提出3个方案：第一，他们3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红军驻地。周恩来遂派刘鼎护送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文英奇以及同志会的几个人去云阳镇。

何柱国密令缪澄流、刘多荃分头对少壮派进行严格搜捕。于文俊被剖腹挖心，已晋升为少将旅长的高福源与枪杀王以哲之事毫无关系，刘多荃却认定他是少壮派，即派人将他暗杀。这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将军，不明不白地牺牲了。

蒋介石很快将东北军的几个军调往豫南、皖北、苏北地区，驻地分散，不相统属，均直接归军政部管辖，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蒋介石因兵谏刚刚过去，不便立即公开地对杨虎城下毒手，他一方面差顾祝同对杨甜言蜜语，拉拢言欢、缓和对抗情绪；另一方面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布置特务，寻找第三者暗杀杨虎城。

陈立夫找到曾被杨虎城枪毙的西安大绅褚小毖之子褚龙吟谈话，极力鼓动他为父报仇：“具体事情有人替你干，只要你出面承认你是为父报仇就行。”不料褚龙吟颇有正义感，一口回绝了。特务对他恫吓，他便从南京逃回陕西富平乡村牺身。特务又策动被杨虎城处决的地方武装头子甄士仁之女甄芝彦，为父报仇。甄芝彦潜至潼关，进步学生彭毓泰偶然得知此事，良言规劝，晓以大义，甄芝彦迷途省悟，特务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3月底，蒋介石命杨虎城出国考察。蒋介石对付有才干的地方将领，第一步是调离部队，削其兵权。没有了兵权，第二步便可以任意处置了。

杨虎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于6月29日前往欧美考察，11月回国，他途经香港时，周恩来派张云逸去看他，建议他直赴延安，免遭蒋氏暗算。杨虎城婉拒，执意要去南昌见蒋。

杨虎城到了南昌，即被特务逮捕，1949年被杀害。张学良被蒋押送到台湾监禁，此是后话。

汪精卫于1937年1月21日抵达香港，受到国民党中央所派的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等人的迎接。邵力子和周佛海原都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邵力子在加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之前，就是国民党员，因此，他在1926年脱离了共产党，1931年任陕西省主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派蒋鼎文接替了他的职务。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1924年他接受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任宣传部秘书，不久便脱离共产党。

1926年之后，周佛海反共投蒋，并成为蒋氏的智囊团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

汪精卫在邵力子、周佛海等人陪同下，来到南京。1937年1月20日，汪精卫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会议，决定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得知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便于2月10日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5项要求和4点保证，促使国民党改变政策。

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汪精卫在开幕词中不再提“消灭中共”和“抗日必须统一”的滥调，而提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收回已失的领土”。但蒋介石又提出“根绝赤祸案”，这使大部分与会者不知所以然，他们不知蒋介石到底玩什么花样，他一会儿讲再也不打内战了，一会儿又“讨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敢吭声，但一些爱国元老却仗义执言了。

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同亲日派展开激烈的争论。宋庆龄领衔，和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孙科、鹿钟麟、李烈钧、梁寒操、经亨颐等13人联名提出“恢复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宋庆龄又发表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讲。她精辟的分析、激昂的情绪，感染了很多。李宗仁向大会提交了《抗日救亡之方案》。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持续一年的国共谈判进入高级阶段，周恩来先去杭州、后去江西庐山，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反反复复，先是讲了许多好话，说共产党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不久，他花样翻新，要把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不再上蒋介石的圈套，毛泽东在1936年到1937年8月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军事的和哲学的著作。虽然谈判一时未能达成最后的协议，但内战却早已停止，红军也得到了接济。

正当国共两党拖拖拉拉谈判之际，不料日军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

日军在事变前，于6月6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别开生面的“鸿门宴”。这天上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在怀仁堂举行宴会，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

元，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第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第37师110旅长何基沣，第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28旅旅长李致远等。日方除松室孝良等人参加外，日军驻北平附近部队的连以上军官都参加了。

酒过三巡之后，松岛起立，始而舞蹈，继而舞刀。秦德纯见状，附耳对董升堂说：“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要刀？”董道：“先打拳，后耍刀。”说罢跳到大厅中间，先打八卦拳，后劈起刀来。李致远也跳出来打拳。

何基沣跳上桌子高歌道：“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日本人又把宋哲元、秦德纯高举起来戏耍。29军军官也把松室孝良、松岛高举起来。

一时席间空气万分紧张，有一触即发之势。松室孝良才讲了一番“亲善、友好”的鬼话，不欢而散。

7月7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并以卢沟桥为假想敌阵地，遭到29军驻地部队拒绝。

卢沟桥是北平地区最古老的石桥，桥西南与长辛店相距6公里，东与丰台相距7公里。

它联络着平广、平包、平山3条铁路干线，是北平以至整个华北通向南方的咽喉要地，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卢沟桥离北平城仅20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曾到那里进行了精心策划。

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向宛平城进发，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举行军事演习。那日本军称中国军队开了枪，他们丢了一个军士，要求入宛平城搜查，中国守军不允，日军便于7月8日晨5时许炮轰宛平城，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件爆发。

7月8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县城大举进犯，我驻军部队英勇奋战，打退日军多次猖狂进攻。何基沣旅长向士兵们说：“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38岁的何基沣作战勇敢，机智多谋。他有两个团的兵力，其219团团长吉星文已率全团同日军交火，220团驻在西苑，他命220团团长沙世全说：“谢团长，今天你拿不下铁路桥，就别想来见我！”30多岁的谢世全大刀一挥，如同猛虎下山，带领战士出发了。谢世全团在音庙附近歼灭敌人一个连，并在卢沟桥地区反复拼杀，击毙日军指挥官松游上将。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武装进攻中，玩弄“谈判”而夺取平津以至囊括华北的阴谋。

它宣称华北事件可以“局部解决”，对宋哲元采取威逼和诱降兼施的办法。宋哲元在日本的欺骗下，进行一次又一次无法满足日本侵略要求的谈判。日寇在这样的烟幕下，积极地策划大规模的侵华战争。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16日即调动10万陆军来华；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议决动员侵华日军40万。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捷足先登，北宁路每天都有满载关东军的兵车自东北络绎开进关内，从海道送来的大批日军也由塘沽口紧急登陆，热河省的日军也经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

在空军方面，日本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机场的飞机以外，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侦察。日本

援军调齐后，开始大举进犯。

7月21日，日军炮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25、26日，炮击廊坊。同时，日军分乘30余辆汽车，企图从北平广安门外冲进城内。28日，日军猛攻南苑和北苑，并以飞机轮番轰炸。

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2000余人的部队守卫南苑。在敌密集炮火之下，处境极为不利。面对强敌，佟、赵二人决定誓死坚守，他们指挥部队英勇抗击。7月28日由晨至午，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下午，佟麟阁等奉命率部向大红门转移，中途被日军包围，乃挥师继续与敌人苦战。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日军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退下，他执意不肯，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佟仍率部激战。敌机又来狂轰滥炸，他头部受重伤，流血过多，英勇殉国。

赵登禹师长在激战中右臂中弹，仍继续作战。不久，他腿部等处亦受伤，传令兵要背他下火线，他对传令兵说：“不要管我，北平城内还有我的老母亲，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赵登禹率部突围北走，车行到黄亭子，赵被日军伏兵击中胸部，壮烈殉国。佟麟阁、赵登禹为国牺牲的噩耗传往全国，激发了军民抗日复仇的义愤。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宋哲元于28日晚自北平逃往保定。30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并继续向华北和全国进攻。

蒋介石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海里思潮汹涌翻滚。他把心腹要员召到庐山共商大计，张群向他献出“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4句话来。张群见蒋氏不太明白，便解释说：“第一句‘和必乱’，如果我们反对延安共产党抗战，那么老百姓当然拥护延安。

我们内部也必发生哗变，中国就会大乱，这对蒋委员长和我们大家都非常不利；第二句‘战必败’，就是说我们同日本开战，我们必败无疑。3日亡国论，7日亡国论，这都是不容置辩的名言；第三句‘败而言和’，就是说目前不能同日本言和，因为那样做不仅全国民众和延安方面都不会答应，而且还会引起国际的诧异。等同日本打了败仗，吃了亏，遭到惨败，大家认输了，认错了，到那时，败而言和，就没有人敢讲一句反对的话，如果共产党反对，那就让日本去收拾他们好了；最后一句话‘和而后安’，我们打了败仗，同日本和谈成了。好！到那时候，我们同日本不再是敌人，而是朋友，再让我们的朋友去收拾我们的冤家共产党。共产党一解决。国家不就可以久治长安了吗？”蒋介石听罢张群的话沉默良久，尔后大笑道：“好好好，这简直是十四字真言！”汪精卫发出狂热的喝彩：“妙哉！妙哉！岳军兄不愧是党国的智囊星。”蒋介石自从得了“十四字真言”，好像吃了灵丹妙药一样，自觉心里有了底，从而精神大振。

全国人民要求对日抗战的怒潮，席卷全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全国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力主抗战，蒋介石才不得不发出较为强硬的讲话：“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8月12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首先发言，说：“敌强我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特别是缺乏装备，抗战前途令人忧虑。”周恩来不同意何应钦的意见，道：“不错，日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

治组织力量在亚洲是一等的，这是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但是，日本国度比较小，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都感到缺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它虽然和法西斯国家相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量都不如日本。但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且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坚持长期全面抗战，必获胜利。”朱德接着说：“日本根据本国的情况，它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的政策，和这种政策相适应，在战略上便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我们要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以空间换取时间，进行持久战的消耗战，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蒋介石对周恩来、朱德的发言暗自佩服，共产党内真是人材济济。与会的大部分将领也都十分赞赏周公、朱公的发言，主张坚持抗战。

联席会议决定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统一指挥各个政党。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在华北集中一部分军队作持久战，确保天然堡垒的山西；国民党军的主力集中于华东，力保淞沪要地，巩固南京；另以少量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

但是，蒋介石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以内战收编地方军阀，是常胜的；而对付日本侵略者，是一败再败。

8月13日，日寇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八·一三”事变爆发，一场空前大血战就此拉开帷幕。日本统帅部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占领上海使中国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中国对外联系，能使中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日军投入上海的总兵力达20余万人，大炮300余门，战车200余辆，兵舰数十艘，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战役。

日本参谋部8月12日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3师团、第11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

13日上午9时，日军军舰突然轰击闸北，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和江湾地区。

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在日军进攻之前，已调动军队，预定在13日拂晓向日军发动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人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他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张治中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他得到的复电仍是“不得进攻”。

8月14日，蒋介石才电令张治中对敌发动总攻击，努力确保大上海，但已失去良机。

是时，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32艘，并有海军2000余人登陆增援，敌军已先后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等地。日军出动空军狂轰滥炸，军舰也胡乱开炮轰击。

蒋介石又下令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汇山码头；空军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担任要地防空。

中国空军首次出动，对虹口及汇山码头等处日军据点进行轰炸，并炸伤日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首战告捷。随后，张治中部第87、88

师并列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进攻，战斗至日没，夺回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地。

正当张治中部连续取得进展之时，不料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命令：“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中国军队的进攻不得不因此而停止。

全线攻击虽然奉命停止，局部的进攻仍在进行，我军攻占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第 87 师 259 旅第 7、8 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海军俱乐部，战斗最壮烈、最英勇。

## 第三十六章 上海溃退

张治中将军向全国发出通电，曰：治中奉命统率所部，保卫我先祖列宗莘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四亿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彼曲我直，彼怯我壮。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最光荣之胜利。撰甲阵词，不胜激越！

8 月 17 日拂晓，张治中部开始全线总攻击。在枪炮声中张将军到前线视察，所见官兵士气高涨，不怕牺牲的精神极为可嘉。中午 12 时至下午 4 时，万国体育场附近，战斗异常激烈。敌机限于航程，未能对中国军队形成大的空中威胁，中国空军在连日空战中，击落日机 42 架。中国陆军在空军配合下，向敌阵地纵深进击。张治中又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暂停进攻的命令。是时，蒋介石对“国联调停”仍存幻想，因此战争打打停停，延误了不少战机，给日军赢得了时间，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8 月 20 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国划分为 5 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程潜，辖平汉、津浦两路北段地区，兵力为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辖晋、察、绥，兵力为第六、七集团军及骑兵第一军等。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副司令长官为顾祝同、前敌指挥陈诚，辖江苏、浙江，兵力为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五集团军。

第四战区由何应钦任司令长官，辖福建、广东，兵力为第四、第十二集团军。

第五战区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辖山东，兵力为第三、第五集团军。

同时命令第一战区阻击沿津浦、平汉两路南下敌人，并侧击南口敌军；第二战区进攻察北的敌人；第三战区击灭淞沪登陆敌军；第四战区固守闽粤海岸；第五战区防守山东及津浦路徐州地区。

第三战区的全部兵力有 19 个师另 6 个旅，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围攻淞沪日军；张发奎的 8 集团军负责杭州湾北岸守备区；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负责浙东守备区。

围攻淞沪的国军第 36 师加入第 87、第 88 两师之间，再次向日军发起总攻，并将攻击重点由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改为汇山码头，拟将日军截为两段，再分别围歼之。经一夜激战，第 36 师突破日军阵地进抵百老汇路，

后又进至汇山码头。但官兵伤亡达 2000 余人。

8 月 23 日晨，日援军第 3、第 11 师团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从张家浜、狮子林、川沙口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未能阻止日军进展。日军夺占了沿江一些重要点，其后续部队陆续上岸。第 3、第 11 师团主力登陆后，即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发起进攻。

中国新编成的第 15 集团军加入第三战区作战，于 8 月 23 日开到吴淞镇以下沿江防线，先后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方面之敌发动进攻，予日军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伤亡甚大，后来罗店、吴淞、狮子林炮台、宝山、月浦镇先后失陷，双方在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一线展开激烈争夺战，陷入苦战状态。

冯玉祥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于 8 月 16 日赴上海郊区南翔指挥作战。他多次致电蒋介石：“兵贵精，尤贵多，诚以非有极厚之兵力，不足以收最后之胜利。”请求调兵增援。

蒋介石屡次敷衍。

冯委任了一批愿为抗日救国献身的人员，冯的旧属人员纷纷前来投奔。前线正急需用人之机，冯这样做壮大了抗日力量。冯又不怕敌机跟踪投弹，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

但蒋介石的亲信将领，对冯的命令只是敷衍，实际上事事都要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将冯的指挥权架空。

冯玉祥痛感前方军事混乱的情况太严重。张发奎对冯说：归我指挥的军队，彼此都不认识，我熟悉的部队只有 1 个排。8 月 18 日，张发奎问冯：“前头 1 个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否你下令调开了？”冯回答道：“我没有下令，也不知道那个连到哪里去了。”查来查去，才知道是蒋介石隔着战区司令长官、总司令、军、师、旅长等等长官，把 1 连炮兵随便调走了。

上海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派代表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特务前去阻挡，不许进去，不许同负伤的官兵谈话。各种慰劳品经特务中转，被特务偷的偷了，拿的拿了。

前方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更没有担架队。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无人埋葬。

医院里重伤员，伤口上长了蛆，散发臭气。冯多次电蒋请求运送药物来，蒋一直拖着不予解决。

冯想派出侦察人员去侦探敌情，也受到蒋介石阻拦。

到了 9 月上旬，蒋介石划津浦路为第六战区，便将冯玉祥调往该战区任司令长官。冯于 9 月 12 日前往津浦路桑园赴任。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是时，日军已增兵到 20 万，坦克 200 余辆，飞机 300 余架，军舰 70 余艘。日军决心将侵华战争的主要方向，由华北转移到上海，作出一副不拿下上海死不罢休的样子。蒋介石针锋相对，决定增兵到 70 万，并再次调整部署，分左中右 3 军迎敌；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 9 集团军司令，辖第 9 集团军和第 21 集团军；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 19 集团军和第 15 集团军；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 8 集团军和第 10 集团军。

9 月下旬到 10 月初，日军第 101、第 9、第 13 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9 月 30 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突破万桥、严桥、

陆桥等处阵地。刘行方面的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令左翼作战军各兵团，向蕴藻浜右岸陈行、施相公庙、浏河之线阵地转移，至10月3日拂晓前，完成新阵地的占领。

10月5—8日，日军第3、第9师团在第11师团和第13师团一部的掩护、配合下，向蕴藻浜地区实施猛攻。中国军队经数日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11日后，日军继续猛攻，企图进占大场，向南翔发展，截断京沪铁路。中日双方军队在蕴藻浜南岸阵地进行激烈争夺战，中国军队伤亡甚重。

10月15日，第三战区重新调整部署，将蕴藻浜南岸划归中央作战区，廖磊的第21集团军于19日在蕴藻浜南岸地区发起攻击，适逢日军主力亦发动步、炮联合进攻，形成双方大规模遭遇战。中国军队由于装备相形见绌，加之连日战斗，伤亡过大，乃于23日开始撤退。26日，大场失陷。中央作战军遂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转移。

日军统帅部急于打开局面，决心采取新的措施，增派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第十军由第6、第18、第114师团组成，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又从华北抽调第16师团等部来上海作战。至此，上海周围的日军已达两个军9个师团，比华北方面还多1个师团，日军已把赌注下在上海地区。

第三战区根据战区变化，撤销中央作战军，将全军正面划分为左、右两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张发奎指挥。

日军第十军第一梯队登陆兵团——第6师团、第18师团于11月5日拂晓，利用浓雾，在海军、飞机火力掩护下，在杭州湾北侧的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咀、漕泾等处登陆。

中国军队曾令驻浦东之第62师、独立第45旅和驻枫泾之第79师夹击登陆之敌，并令第一预备师由苏嘉路赶往增援，但部队联络困难，行动迟缓，未能如期实施。日军乘机突进，一举进入黄浦江一线。

11月7日，派遣到上海地区的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大将。次日拂晓后，日军第十军主力渡过黄浦江，进入淞江附近，同中国军队第108师展开激战，松江陷落。

第三战区征得南京总参谋部的同意，于11月8日晚命令各部队向吴淞线国防阵地转移。

但这一撤退命令，遭到蒋介石的严厉反对。他全身戎装，怒气冲冲地来到总参谋部说：“必须收回撤退命令，要各部队仍回原来阵地死守！”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猛吃一惊：天哪！淞沪三角地带的数十万大军已经接到撤退命令，有的已经行动，怎么能收回撤退命令呢，这不是儿戏吗！我军已陷入敌人的重围，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他站起来说：“要部队再回到原来的阵地，我看十分困难。”蒋介石生气地说：“打仗，怕困难还行？”白崇禧道：“现在收回撤退命令，恐怕来不及了。”“如果前线将领和部队有意见，我去前线说服！”蒋介石果然乘火车来到苏州前线指挥部，召集军官训话：“你们坚守上海快3个月了，这在我国战史上是罕见的。你们在前线作战非常英勇，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继承我们黄埔的传统，表现了我们革命军人的伟大精神，博得了国内外的赞扬和支持。有你们这样善于指挥、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将领，何愁打不败日寇！只要我们在上海再坚决死守一下，九国公约国家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我要收回撤退的命令，命令你们仍回到原来的阵地死守，死守！”中国几十万大军集中在沪西、青浦、南翔至昆山的一条狭窄的公路上，没有接到新的命令的部



队在继续后撤，已接“回原阵地死守”新的命令的部队返回，都在这条公路上相遇，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公路全堵塞了。人喊马嘶、乱成一团，分不清谁是哪一部分的。将士们怨声载道，骂骂咧咧：“蒋介石一会儿命令撤退，一会儿又下令死守，这么折腾，再好的部队也让他搞垮！”日军乘机派飞机狂轰烂炸，日军炮兵部队也乘机向中国部队开炮。第三战区 70 万大军，联络中断，失去指挥，溃不成军。11 月 12 日，上海市区陷入敌手。日军在上海战场上死伤 4 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达 30 万余人，这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牺牲之大是罕见的。上海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介石不听前线将领的建议，朝令夕改。

日军占领上海后，气焰更加嚣张，遂分兵 3 路，向南京进发。

日军在华北侵占平津后，集 30 万重兵，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分 3 路发起进攻：一路沿津浦路、胶济线进攻山东，一路沿平汉线进攻河北和河南，一路沿平汉线进攻察哈尔和绥远，尔后向西发展，切断同蒲路，南下与平汉线、正太路的日军配合攻取山西。

蒋介石在这一战场上集兵力 70 万人，约 70 个师，其中 30 个师集结于陇海线以北和山西以东地区，27 个师集结于山西境内（阎锡山所部），余下十几个师集结于黄河以北和新乡等地。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冀、鲁正面战场对日军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从而使晋、察、绥等地的部队得以从容展开；而晋、察、绥地区部队则打破日军惯用的包围行动的企图，从而使日军不敢放手对冀、鲁正面战场展开攻击，同时牵制日军，使他们对淞沪作战不能转运兵力。日军极为狂妄，高叫“速战速决”，要在两周内攻下大同，1 个月占领华北战略要地山西。8 月初，日军调第 20 师团、及第 5、第 10 师团各一部、第 11 混成旅团，以第一军司令香月清司为总指挥，沿平绥路发动进攻，目标直指南口。

南口为察、绥、晋 3 省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南口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负责的区域。阎锡山统一指挥的部队有：由晋绥军编成的第六、第七集团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刘汝明部，以及 8 月 25 日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 115、120、129 三个师。115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120 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29 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八路军共计 4.5 万人。

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所部第十三军及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在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一线，依托长城天险和日军展开激战。蒋介石命卫立煌第十四军从石家庄往援南口。阎锡山令刘汝明部及骑兵军分别由崇礼、张北、尚义、商都一带攻击日军，策应南口作战。阎锡山又命傅作义率 1 师又 3 个旅增援怀来。

8 月 20 日，察北日军向张家口发起攻击。傅作义不得不率 2 旅人马回援张家口。卫立煌部增援南口行至永定河右岸，遭日军狙击，卫立煌部旋即被迫撤走，致使南口一线守军孤立无援，战至 25 日失守。张家口也因刘汝明部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迅即陷落。

南口、张家口失守后，蒋介石又将汤恩伯第十三军、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刚由师扩建）调往平汉路。这样一来，山西北部完全暴露。

阎锡山在雁门关下的岭口设立行营，亲自督战。

9月上旬，日军进犯山西门户天镇，击破了李服膺第六十一军据守的永嘉堡、天镇间的国防工事，随即又攻下了阳高城。李服膺部一触即溃，不仅不能按作战计划北移，反而南逃大白登，直抵桑干河南。李部溃败，危及全线，使平绥线正面失去了防御力量。

日军坂垣的第5师团主力沿蔚代公路进攻广灵，在洗马河一带打败了刘奉滨73师，并紧追不舍，直趋广灵。

阎锡山闻讯大吃一惊，认为日军的主攻方向不在大同——雁门关，而是灵丘——平型关。若日军攻占了平型关，就断了雁门关的后路，于是他急调孟宪吉独立第8旅赴平型关，增援73师；另调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到大营，指挥高桂滋部17军、73师以及33军的独立第3、第8两旅，在平型关南北狙敌。阎锡山放弃了大同会战计划，下令放弃雁北和绥远，将李服膺61军、王靖国19军、傅作义第七集团军一律撤至雁门关内。

日军坂垣师团选择中国军队防御空档地区，长驱直入，于9月13日占领了大同。3日内，日军连下呼和浩特和包头，将平绥路全线占领。日军主力从阎锡山的背后插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阎锡山极为沮丧。

日军主力选择的进攻路线是一个静态的战役走廊，地形复杂，为用兵之大忌。阎锡山认为日军人地生疏，绝不敢冒此风险，因此没有部署兵力防御，而日军偏偏钻了这个空子。日本人怎么对地形了如指掌？阎锡山猛醒：原来他早年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好友坂垣，于1936年夏作为关东军使者，来山西拜访阎锡山。坂垣不坐飞机，也不乘汽车，而是徒步旅行，他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即蔚县到代县的蔚代公路。阎锡山想到这里，暗暗叫苦不迭。

日军的另一路在平汉线上推进。以其第6师团、第14师团和第20师团为主力，目标在于攻取保定，进而攻取石家庄，从而打开晋东的门户，协同平绥线一带的日军攻击山西和河南，以便达到窥视中原的目的。这一线的日军指挥官是坂垣。

驻守平汉线的中国军队是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商震的第二十集团军、万福麟的第十三军等。

守卫严密的地段是永定河沿线。

9月初，坂垣指挥日军强渡永定河，同中国守军激战多日，日军以优势炮火掩护，强渡告成，尔后进攻固安、霸县一带。

驻守固安、霸县一带的是孙连仲部冯治安师，冯治安率部猛烈抵抗，杀伤日军甚众，日军集主力猛攻，先后攻占了固安、琉璃河、涿县，使保定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守保定的刘峙见势，无心抗争，一溜烟向南逃走，直撤到河南为止，是撤得最快的一位将军。

人们讥他是“长腿将军”。

日军轻取保定。保定既陷，日军得势疯狂，又在10多天内攻占了华北交通枢纽石家庄。接着兵分两路向前推进，形成直指太原的势态。

阎锡山重新集结兵力，沿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阳方口一线设防，其重点是平型关。

平型关是内长城的重要关塞，地势险要。阎锡山设下“口袋阵”，说是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他召见将领们，面授机宜。

9月20日，日军下令进攻平型关，一部由灵丘实施正面进攻，一部从广灵、浑源进击，偷袭平型关右侧后。

战斗打响后不久，阎锡山听信了孙楚等对敌情的错误判断，动摇了作战方针，令平型关、团城口一线所部固守，并相机出击。

由浑源南下的日军与高桂滋部接触，随即绕过高部向南穿插，至平型关右侧后，从背后向高部发动攻击。高桂滋屡请增援不上，放弃了团城口阵地，退至大营以北地区。

日军遂占领了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一线正面长城阵地。是时，担任正面御敌的 73 师，早已退至平型关以东、以南一带。

阎锡山多次要求八路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进，阻滞日军的攻势。林彪、聂荣臻的 115 师急驰晋东北前线。林的部队进逼悄然而隐蔽，9 月中旬，主力到达平型关西面的大营镇。

林彪扎下部队，带了几个警卫、参谋人员和电台，乘汽车急趋灵丘。是时灵丘已在激战，车到灵丘，林彪等人下了车，已见炮弹在城内炸响，硝烟弥漫，日军已推进到离城 10 里的地方了。林彪了解战况后，即发电命令部队不必赶来灵丘，立即向平型关急进设伏。他预计灵丘必守不住，日军一旦攻占灵丘，必然西犯平型关，那里定有一场好仗。

电报发完，林彪即在炮火中离去，单车向平型关方向驱进。

9 月 23 日，115 师主力刚到达上寨，林彪也就赶到，是时，灵丘已经失守。林彪马上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开会，他动员说：“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能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打一个大胜仗。”林彪命令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和灵丘与广灵之间，截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以 343 旅两个团为主攻，344 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预备队。攻击部队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以猛烈打击。

当晚，乌云盖顶，寒风飒飒，部队悄然疾行，天却下起大雨来，全师无有雨具，冒着倾盆大雨，于次日拂晓前到达平型关东北预定的伏击地区。官兵们身着透湿的衣服，卧在潮湿的地上。此时雨过天晴，天地间一片宁静。

日军开始在地平线上隐约晃动，素称精锐部队的坂垣师团之第 21 旅团，约 4000 余人，走成一路纵队从山谷里走向伏击区。敌汽车 100 余辆，大车 200 余辆行驶在泥泞的道路上，如入无人之境，摆出一副骄横的样子。

敌人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林彪命号兵吹冲击号。全线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向敌人冲击，115 师在 10 余里长的地段上如从天而降，一齐呐喊向公路猛攻，日军立时被截成许多段。我军利用地形，先以手榴弹炸毁敌人汽车，使敌无法逃走。因敌突遇袭击，数千人的部队即在窄狭的山谷中乱作一团，汽车、大车、马匹、兵士相撞击。

115 师乘敌混乱之际，向敌展开猛烈冲锋。685 团 5 连和 686 团 1 连，首先冲到公路与敌展开白刃战。其他部队也迅速冲杀过去。

日军万分狼狈，慌忙凭借被炸破的汽车、水沟和老爷庙等有利地物或地形进行抵抗。

115 师第二梯队迅速越过公路，夺占了老爷庙有利地形，将残敌分割包围起来。涞源、蔚县之日军，企图增援被包围在老爷庙地区的 21 旅团，但途中遇到了 115 师杨成武独立团和骑兵营的狙击，而不能得逞。日军来了飞机在上空飞来飞去，但下面已厮杀一团，毫无办法地飞去。

经过一天激战，歼敌 3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大车 200 余辆，缴获大炮 1 门，轻重机枪 20 余挺，步枪 1000 余枝，日币 30 万元，以及大

量军用物品，单是军用大衣，就够 115 师每人一件。在战斗中，115 师伤亡 600 余人。

平型关战斗是中国抗日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一仗，打破了日寇不可抗拒的神话。

八路军 115 师还想一举消灭东跑池处 3000 余名日军。林彪请杨爱源调兵合击，杨命郭宗汾火速行动，但郭却不听命令。杨爱源大怒，严令郭宗汾部出动，郭仍不听。杨忍无可忍，急告阎锡山。阎锡山闻讯拍案道：“这还了得！有不听军令贻误战机的，军法从事！”阎当即带了一名执法官，连夜驰往平型关，传令：“召郭宗汾来见。”郭宗汾来见阎锡山，见阎怒气冲冲，便使出浑身解数来辩解，他言语滔滔，讲得阎锡山火气顿消。

由于郭宗汾部不援，日军经东跑池向西北突围出去。

### 第三十七章 铁血捐躯

林彪师给坂垣师团以歼灭性打击时，阎锡山急调陈长捷军驰援平型关，并电傅作义进驻大营，全权负责平型关方面的军事指挥，还将高桂滋、刘茂恩两军归傅作义指挥。

敌我双方在团城一线展开激战，呈胶着状态。

占领大同后南下至怀仁的日军突然转向东南，猛攻刘茂恩军防守的茹越口，刘茂恩军溃败，日军占领茹越口。阎锡山从岭口赴大营督战。

阎锡山虽说手中有数十万军队，但那些军队大多军纪败坏，不少官兵染有吸毒恶习，吃喝嫖赌，欺压人民，战斗力极差，往往不战自败、一击就溃，遇到日军谈虎变色、望风而逃。

9 月 29 日，日军猛攻铁角岭阵地。203 旅虽坚决抵抗，但旅长梁鉴堂阵亡，终未挽回败势，日军占领铁角岭，旋又攻占繁峙城。

阎锡山在沙河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召集前线将领会议，会议中间忽然接到平型关前线的紧急报告，说日军正向平型关南翼移动；接着又获悉反攻铁角岭、茹越口的方克猷军溃退代县。阎锡山见无法挽回局势，又深恐通往五台山的退路被切断，遂下令全线撤退，令各路大军向五台山、云中山、芦芽山之线转移，集中全力于忻县、忻口之间，以保卫太原。当夜，阎锡山直奔五台山。

山西形势危急，在阎锡山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于 10 月 2 日急令第一战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 4 个半师从石家庄沿正太路星夜驰援山西，经太原转赴晋北对日作战。

阎锡山放弃平型关后，集结主力准备在忻口附近地区筑起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

阎锡山严令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在崞县死守 10 天，姜玉贞的第 196 旅坚守原平镇，马延守的独立第 7 旅固守轩岗，阻滞敌军南进。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在沙河附近与敌激战，掩护各部队逐次向新阵地转移，阎锡山由五台山回太原制定保卫太原的作战计划。

日军把侵占华北的攻势以山西作为突破口，以抢占太原，堵塞平汉路

中国军队的西退之路，威胁河北左侧背，继而东进河北，实现平原会战，将国民党军队聚歼于黄河以北，日军统帅部急于攻克太原，以如期开始河北平原会战，遂于10月1日下令开始太原作战。

10月2日，日军步兵协同骑兵、装甲车向崞县、原平阵地发动进击，接连猛攻数日，都遇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急进的企图受到阻止，且林彪师在平型关给日军以重创，使日军不敢冒进。是时，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之第十四军李默庵部、第九军郝梦龄部已集结忻口，进入阵地。

忻口是入晋中的交通孔道和通向太原的北大门，称之为战略咽喉之地。阎锡山抽调第二战区总兵力的1A2，组成左、中、右3个兵团，在忻口以北布防。蒋介石命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忻县。

日军在占领崞县、原平后，即以5万重兵开始向忻口正面阵地的中国守军猛攻，主攻方向是中国守军中央阵地的左侧，即忻口与云中山之间的川道。中国守军李仙洲师与敌接战，几经争夺，我南怀化阵地失守。卫立煌严令李部收复，收复南怀化战役虽未能取得成功，但中国军队的血战精神给敌以震慑，此后数日，在南怀化阵地的战斗仍十分激烈，形成拉锯战。

10月17日，日军分3路猛攻，阎锡山令骑兵军长赵承绶率部出阳方口，向广武方面活动，焚毁南桑于河大木桥，断敌之交通。令马延守独立旅同120师一个旅，袭击敌之右侧背；令卫立煌、傅作义整饬构筑忻县附近及石岭关各处工事，总预备队由卫立煌统一指挥。命朱德指挥第十八集团军（由八路军改编而成）向敌后进击，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和后方目标。并阻止敌增援部队，相机歼灭敌之退却部队。

18集团军贺龙师在10月18日袭击交通线，摧毁敌运输汽车500多辆，歼敌500多人，一度收复宁武和雁门关，给进攻忻口敌军的运输线造成很大困难。刘伯承师的先头团在10月19日夜袭日军严密戒备的阳明堡机场，烧毁日飞机24架，使急于夺取忻口的日军失去空中支援能力。林彪师在繁峙、蔚县、曲阳一带配合作战，收复这些城镇和平型关等重要隘口，切断了日军通往张家口、北平的交通线。

几天来，忻口正面阵地的战斗一直十分激烈。10月2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见忻口久攻不下，又调动萱岛联队增援，并改变突击方向，转攻大白水一线阵地，企图打开一条道路。阎锡山及时调整战线，加强兵力。日军向大白水阵地猛攻3天，虽然中国守军前沿阵地冲开了几处缺口，但很快就被我军反击，将缺口堵住，战斗又形成胶着状态。

忻口阵地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是郝梦龄，辖第九军、第十军、第三十五军和第六十一军。战前，他召集4个军的营以上军官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拚杀，决不后退半步！敌人已经打到我们家里来了！是我们中国军人洒热血的时候了！”郝梦龄出身在河北省一个农民家庭，14岁投入奉军，不久考入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回奉军，由排长升为连长、营长、副团长。因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战争，失败后转归冯玉祥的国民军。之后，郝梦龄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剿共”时期，他曾两次申请解甲归田。抗战爆发，他数次请缨上前线杀敌。获准后便给妻儿留下遗嘱，来到前线。

郝梦龄指挥部队在忻口西北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日军在飞机、战车和重炮掩护下猛攻，郝军伤亡惨重，一个团的部队缩编为一个营。阵地几次易手，郝梦龄亲临第一线，在战斗激烈的322团阵地上指挥。该团连续

激战多日，全团只剩下 100 余人，郝梦龄站在阵地上说：“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下 100 多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日军又疯狂进攻，郝梦龄从中弹的机枪手身旁端过机枪，向敌人扫射。官兵们见兵团总指挥如此，人人舍命死战，日军又溃。

10 月 16 日，郝梦龄指挥 7 个旅从正南攻击敌军。他身先士卒，挥兵疾进，连克几个山头，当他急于前往独立第 5 旅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官兵们告诉他，前面有一段路是被日军火力封锁着的，十分危险，劝他写个书面命令，派人送去。

郝梦龄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说罢，便同 54 师师长刘家麒一起向前沿阵地奔去。在穿越日军火力封锁地段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同日，独立第 5 旅旅长郑廷珍部向敌人冲击，部队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郑廷珍振臂高呼：“谁先为国死，准最光荣！”他率先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战，连续攻下几个山头，在混战中，郑廷珍不幸中弹身亡。

郝梦龄、刘家麒等灵柩运回武汉，武汉各界 4000 余人到车站迎接。武汉市下半旗致哀，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代表蒋介石主祭。蒋介石发表祭文。国民政府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刘家麒、郑廷珍为陆军中将。

郝梦龄阵亡后，蒋介石命王靖国为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是时，左翼兵团前敌总指挥是李默庵，右翼兵团前敌总指挥是刘茂恩。

日军见忻口坚如磐石，前后近一个月的血战，日军用尽浑身解数，强攻仍不能奏效，乃改变方略，决定改从晋东方面进攻，调第 20 师团主力和第 108 师团、第 109 师团各一部，由川岸文三郎为最高指挥官，分成两路纵队，从保定沿正太路西进，直扑娘子关。

娘子关为晋东之要冲，阎锡山在此筑有窖洞式半永久性的工事和钢骨水泥永久性的火力点，是易守难攻之关隘。10 月 10 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在娘子关设立指挥部。10 月 14 日，阎锡山急调第 3、第 26、第 27 军和第 22 集团军、第 18 集团军林彪师、刘伯承师，沿正太路布防，迎击西犯的日军，固守娘子关。刘伯承师两次在七亘村设伏，毙敌 400 余人，给日军以痛击，使敌军不敢贸然深入，有力地支援娘子关一线的防御。

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战至 10 月 26 日，中国守军娘子关阵地被打开了缺口。为防止后路被切断，中国军队开始撤退。

阳泉、寿阳失陷，日军逼近榆次。

阎锡山见忻口守不住，命傅作义撤到太原固守，在太原四周实行依城野战，阻敌前进。阎锡山又令卫立煌部在莱水、青龙镇、天门关一线占领阵地，俟敌接近一举歼灭之。

11 月 2 日，阎锡山召集卫立煌、傅作义、杨爱源、朱绶光等高级将领开军事会议，部署固守太原的战术。他下令晋北方面的军队向太原附近阵地转移。当日晚间，晋北部队开始南撤。晋东方面的军队也奉阎锡山命令，向太原东南阵地转移。阎锡山又电令第 18 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以主力牵制晋东方面之敌，并破坏交通，狙击敌人西进，以一部协同赵承绶部，极力迟滞日军南进，尔后进东关口西北地区，威胁敌人，掩护中国守军之左侧。

11月4日，阎锡山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黄绍竑、孙连仲来太原共商事宜。阎锡山同黄绍竑在固守太原问题上意见分歧，争吵不休，卫立煌也表示异议，会议不欢而散。阎锡山一怒之下，于当夜匆忙沿晋西公路退往交城。

黄绍竑、卫立煌不赞成阎锡山固守太原的战略方针，又见阎锡山临战先退，更为不满，于是，他们根本不服从阎锡山的部署。从晋北撤下来的中央军各部来到太原，均未进入既定的防守阵地，而是绕城南撤。

晋东方面，由于日军已逼近太原，预定防守太原城东的部队，有的未能及时到达阵地，有的虽已进入阵地，但却无斗志，一经接敌，即向南退去。在太原城北郊一线依城野战的，只有晋军王靖国、陈长捷部，在太原城西一带防守的是郭宗汾71师和独立第7、第8两旅。

11月5日，日军进攻太原城北阵地，守军迅即溃退。西线守军闻讯也即向南撤退。日本空军对太原进行轮番轰炸，太原城内一片火海。11月8日，日军从东、北、西三面进攻太原城，又向太原城内空降伞兵。傅作义虽率部抵抗，终难以挽回大局，至晚上9时，傅作义下令守城部队向石交镇方向撤退，太原失守。

忻口会战，歼灭日军近3万人。中国军队有10万之众血洒战场。

另一路日军沿津浦路推进，于8月中旬向中国守军第29军进攻，突破阵地，之后进攻沧州。此处守军是第3集团军，总司令是韩复榘。

韩复榘拥兵10万，他一心要作土皇帝，既不愿当蒋介石的驯服工具，也不想当日本的忠实奴仆，而是要利用蒋、日矛盾，在蒋、日夹缝间力图自保。韩复榘盘踞的山东，地处华北要冲。日本对山东的侵略由来已久，便设法对韩进行拉拢利诱，尔后利用同韩的特殊关系，加紧其侵略势力向山东渗透。

韩复榘同日本人拉拉扯扯，若即若离，一日，日驻济南领事西田向韩提出由日方开采胶济路侧的矿藏，要韩在合同上签字。韩觉得出卖矿藏，事关重大，怕引起国人反对，未敢答应，日领事便弄来了两个美貌的日本歌妓，安置在商埠一家日本妓馆里，当日晚间秘密邀请韩复榘去妓馆吃酒。韩复榘去妓馆，事过半夜未归。省府参议韩多峰担心韩在那里出事，急带人来到妓馆，见韩在两个妓女的陪伴下，喝得烂醉。韩多峰谎报道：“南京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立等复电，请主席赶快回去！”说罢将韩架上汽车拉回去。

韩复榘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日本侵略势力乘机而入，日本先后在济南、青岛等地设立特务机关，进行各种间谍活动；又在济南、青岛、芝罘等地办有许多报纸；还办了许多工矿企业，榨取山东财富。日本多次诱韩宣布“独立”。

冯玉祥得知韩复榘同日本人打得火热，便写信给韩说：“复榘，惊闻你与日方打得火热，这是与民族不利，与民意不合的，现在全国都在注视山东，你不能卖国当汉奸啊！吉鸿昌为抗日牺牲了生命，没有给我们西北军丢脸，他的英雄业绩可以留芳千古了。

你应该向他学习。”韩复榘看过信沉思良久。他觉得当“儿皇帝”不如当土皇帝自在，当了汉奸会被人唾骂，“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仍设法引诱韩“中立”。韩采取了断然措施，令日本领事馆人员及侨民撤走。

蒋介石把山东划为第五战区，负责津浦路南段苏、鲁方面作战。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加上东北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和沈鸿烈的青岛守备队与第三舰队编为第三集团军。由韩复榘任总司令，于学忠、沈鸿烈任副司令，兵力

10 万余人。蒋令韩指挥山东军事，并承担黄河防务。1937 年 10 月，蒋令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

韩复榘一向珍惜自己的实力，贪财苟安。他虽作出抗日姿态，但不真心抗日，只是在全国性抗战的影响下，与日妥协，势必孤立，只好以消极抗战而保存实力。

冯玉祥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于 9 月 18 日率鹿钟麟、石敬亭进驻冀鲁交界处之桑园，担任津浦线北段方面的作战。这时正是八路军林彪师在晋北平型关大捷之际，日军抽调平津兵力增援平型关，平、津日军兵力空虚，正是一举收复平、津的大好时机。

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是鹿钟麟，第六战区辖宋哲元，冯治安的第 1 集团军等部，蒋介石命韩复榘拨两个师归冯玉祥指挥。但韩对冯北上抗日，内心并不欢迎，他对冯又有戒备，对拨两个师归冯指挥更不甘心。

当冯北上经过济南时，没等冯开口，韩复榘便首先强调山东防务紧张，言下之意，他无力助冯，使冯碰了一个钉子。

冯玉祥又劝韩复榘坚持抗日。这时，张自忠将军由北平脱险后，经天津乘英国商船南下，由烟台登陆，来到济南。冯写信要求蒋介石让张自忠回部队代理 59 军军长。

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路东侧、中岛师团沿津浦路西侧，并驾南侵。宋哲元部虽奋力抵抗，但力不能支，节节败退下来。

冯玉祥命副司令长官鹿钟麟到前方和李文田、黄维岗、刘振三等，分 4 路从右翼抄敌后路，给敌人拦腰一击。津浦线正面则调韩复榘部一旅向北攻击，收复沧州并直捣平津。

但这一仗只有鹿钟麟一路遵命令出击，其余各路均未完成任务。李文田和黄维岗只走了五六里路，李文田便说，不能再走了。蒋总司令不主张抗战，我们打胜了，他不喜欢。

蒋介石果然任命李文田为军长。

津浦线上的军队大都是西北军旧部，蒋介石一面想利用冯对西北的旧关系，阻挡日军南下，另一面却又害怕冯重新掌握对旧部的指挥权。蒋命迎合他的肖振瀛为第一战区总参议，肖不去第一战区任职，却在第六战区跟冯捣乱。冯从南京出发前，肖即先行，一路宣扬：“拒绝冯玉祥，罢免张自忠，推倒宋哲元，拥护冯治安”，大肆挑拨离间。

促使第六战区的军队不服从冯玉祥的指挥，使冯玉祥无法掌握实际的指挥权。

冯玉祥要求韩出两师兵力开到德州一带集中，支援前线作战。韩置若罔闻。蒋介石也命韩移师，增援德州，韩仍置之不理。因此，冯玉祥只好由桑园退守德州。后经两日激战，德州也于 10 月 15 日失陷。韩不仅不援冯，反而又下令保境安民，不准冯军入境，致使冯玉祥陷入困境。

德州失陷后，韩复榘沿老黄河右岸布防，与敌对峙一周。后来日军偷渡老黄河，韩复榘部则消极地退守徒骇河一线。

蒋介石命冯玉祥、韩复榘趁日军主力集中在山西方面而津浦线方面兵力薄弱的机会，以主力攻德州，并进击沧州，以牵制西线之敌。于是，冯玉祥乃指挥展书堂师和曹福林师等部自徒骇河一线向北反击。20 日在平原激战，21 日克德州、桑园，并一路北进，直指沧州、马厂。正在乘胜追击日军之际，韩复榘令展书堂等师撤回前线，遂使战局陷入逆境，刚刚获得的战



果旋又丢失。这不仅使冯玉祥十分气愤，就连韩复榘的部队也非常不满，纷纷要求打日本，过黄河迎战。韩不但不理，反而还散布对冯的不满情绪，恶语中伤冯玉祥说：“冯先生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由于蒋介石和韩复榘等人对冯抗战拆台，招致冯的失败。蒋介石将冯调到平汉线。

冯玉祥先到郑州，后到新乡，以后又接蒋的电报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冯到南京后即被蒋免职，第六战区随之被取消。

由于韩复榘的消极抗战，日军很快逼进黄河北岸，并占据鹤山，向济南打炮。但是日本进抵黄河北岸后，并未马上渡过黄河，而是按兵不动。一直到12月23日，日军与韩军竟隔河对峙一个多月。

日军不渡河，韩军也不过河迎战，其中的奥妙是：日方仍对韩抱有幻想，总希望韩出来当汉奸。所以兵临城下，又不攻城，以给韩留有考虑余地，逼其就范；韩复榘是出自保存自己实力，另有图谋的想法。

日本兵占领上海后，分兵三路向南京进击。一路沿京沪铁路北进；一路经苏州、金坛向西进；一路沿太湖南岸进击。

由于蒋介石在上海战区战战停停，停停战战，未抓紧有利时机歼灭敌人，且朝令夕改，造成混乱。国民党军队在上海至南京之间，既不能组织逐次抵抗迟滞敌人的进攻，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因而各自为政，拼命西奔，致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进抵南京附近。

战局直转直下，迫使蒋介石急于解决南京的防守问题。他在11月中旬连续召开3次幕僚会议。

第一次幕僚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参加。那大本营作战厅长刘斐道：“日寇利用它在上海取胜后的有利形势，依仗其海陆空军和重装备的优势，进攻南京，则南京将处在被敌即将包围之时。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后方进行较长时间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是守不住的。我军应避免在抗战初期与强敌进行决战，更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日寇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就非垮台不可。但南京是我国首都，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做象征性的防守，适当抵抗后即主动撤退。”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表示赞成刘斐的意见。蒋介石也说刘斐的意见很对。因此，刘斐的意见便作为当时的作战方针。

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人增加了唐生智、谷正伦等，唐生智持有异议，他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蒋介石模棱两可地说：“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 第三十八章 屠城血证

11月8日晚，蒋介石召开最后一次高级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在场者都默不作声，最后唐生智站起来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

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高兴地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又转过脸去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蒋介石又问：“由谁辅助孟潇守南京。”唐生智道：“我提议罗卓英和刘兴。”蒋介石说：“很好，那就是罗卓英和刘兴好了。”会后，蒋介石委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唐生智找蒋介石说：“既然由我守卫南京，我就抱定必死决心，与日军一战，决不搪塞了事，现在南京只有3个师，兵力远远不够，我希望至少有10万大军。”蒋介石说：“行，再给你6个军。”蒋介石命令唐生智固守南京后，又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表示要长期抗战。

是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多次空袭，其中有两次轰炸了飞机场。所有中央机关各部门都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很少的人留在南京。蒋介石为了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冒着危险留在南京。他躲避到中山陵山下树林荫蔽的“四方城”的一幢极小的两间房子里。

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结成反共同盟，它不仅公开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现在又极力劝诱和压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投降。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日本所提出的7项停战条件，即：（1）承认伪满、内蒙独立。

（2）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3）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上海国际共管。

（4）中、日共同防共。

（5）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关税。

（6）根绝反日运动。

（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蒋介石不敢全部接受，他对陶德曼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我只接受‘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蒋要求陶德曼对谈判的一切都不要公布。陶德曼表示：“我仅仅是极秘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军逼近南京，再次让陶德曼出面诱逼蒋介石。蒋氏面对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不敢轻易拍板，便于12月2日召集军事长官会议，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表示可以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蒋又电阎锡山，阎也表示赞同。于是，蒋介石便与陶德曼继续会谈，蒋氏表示：“中国政府愿以日本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基础。”不料，日寇在战场上处处得手后，在原7项条件外，又增加了4项“亡人之国的新条件”，其中包括日军要在占领地域内建立伪政权和中国对日给予战争赔款等内容的苛刻条款。蒋介石这才明白，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他若妥协，就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他遂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蒋又作出抗战姿态，于12月4日晚召集守卫南京部队师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作临别训话：“抗战5个月来，虽然军事上是暂时的失败了，丧失了许多地方，但也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使日军不能达到它速战速决的目的；也正由于我全体将士英勇抗战，获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地，为国际观瞻所系，所以必须固守。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现云南部队3个师，装备齐全，兵力充足，又有作战经验，不久就可到达武汉。我将率领这支部队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蒋介石于12月6日在宋

美龄和端纳陪同下，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南京危急！保卫南京的战事已经部署完成！”他声色俱厉，振臂高呼：“我庆幸有个忠心耿耿、自告奋勇守卫南京的大将唐生智，唐将军同进犯南京的日军拼命！”蒋介石从记者招待会来到唐生智司令部，对守城将领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何况我是军委会负责人！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说中，日将要停火。这个仗我是要打下去的，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奋起抗战！一直把日本人驱逐出国境！我命令唐总司令负卫戍南京之责，把 10 多万军队交给他指挥，服从为军人之天职，希望你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努力杀敌！”唐生智表示：“孟潇等在此杀敌，义无反顾！请委座赶快离开南京。”蒋介石作关切状：“孟潇！南京的一切，就拜托与你了，我一到汉口，一定把团结御侮的工作做好，请你放心。”次日凌晨 5 时许，蒋介石乘坐“美龄”号机，在一小分队飞机的保护下，飞往武汉。

南京城郊到处硝烟弥漫，炮火冲天。守卫南京的军队有：宋希濂的 28 军，王敬久的 71 军，孙元良的 72 军，叶肇的 66 军，俞济时的 74 军，邓龙光的 83 军，徐源泉的第二军团，以及教导队和宪兵团等，共计 11 万余人。这些军队大都是刚从淞沪战场退下，损失惨重。这样疲惫之师，战斗力之差，是不难想见的。

日军凭仗优势的装备和旺盛的士气，步步进逼。日军不断突破阵地。12 月 9 日，日军攻到南京光华门附近，便暂时停顿。一架日机在南京城上空盘旋，投下一个空投袋。守城官兵捡起一看，见袋上书“南京卫戍长官唐生智收”，即送往司令部。

唐生智打开，见是日本司令官松井石根致唐生智的劝降书，内称：“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但对一般无辜之良民及没有敌意的中国军队将宽大为怀，并保障其安全。特别是对于东亚文化，更将竭尽全力予以保护，然而，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之一旦，10 年的苦心经营也将化为乌有。

限于 12 月 10 日午答复，否则开始攻城。”唐生智一声冷笑，下令：“准备与敌死战！”10 日上午，城中寂然，日军知不降，开始攻城。日军第 114、第 6 两师团主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几处同时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光华门被日军两次突破，但冲入城中的 100 余名日军全部被歼灭。当夜，中国守军 156 师选敢死队坠下城墙，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少数日军及盘踞在通光营房的敌军全部消灭，光华门、通济门遂得以转危为安。但雨花台失去阵地前要点数处，紫金山第三峰阵地也落入敌手，守军撤守第二峰阵地。

这日，日军第 18 师团攻占芜湖，向当涂前进，中国军队后路被切断。

12 月 11 日，日军继续猛攻雨花台、紫金山，并以一部攻占杨坊山及银孔山。城南日军一部由大胜关渡江至江心洲，向中国守军侧背射击，守军撤向水西门，雨花台阵地遂陷于孤立，右翼被敌破。次日，雨花台主阵地陷于敌手。孙元良率残部 2000 余人向下关方向败退。日军乘机而入，于是，南京城防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南京城在危急之中，将中山北路以北地区，即自新街口为起点至山西路止划为难民区，区内约可容 25 万人。

南京城在激烈战斗时，唐生智接到蒋介石电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即于 12 日夜晚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下令一部渡江，

大部向城郊各处突围。

各军长师长立刻四奔而去，所到之处，大声叫撤。部队立刻大乱，军心一下收不住。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 36 师掩护下渡江而去。他下达的突围命令，只有 66、83 两军遵照执行，当夜分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其他各部都不顾命令，涌向江边。挹江门内挤满部队，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顿形混乱。而丢弃的车辆、驮马，使通路更为狭窄。负责把守挹江门的第 36 师一个团因阻止敌兵通过，与之发生冲突，一时枪声四起。

随着败兵蜂涌而至，下关也陷入混乱之中。下关至浦口之间，一次可渡七八百人的两艘大的轮渡，已撤往汉口，仅剩数艘小火轮及 200 多条帆船。船少人多，秩序十分混乱，于是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没者有之，装载过重沉没者亦有之。下关一带到处是退下来的军队，抢着要过江逃难，自相残踏与残杀，长江里漂满了抗战队伍的尸首，伤兵无人过问，景况甚为悲惨。

由于没有周密的撤退计划，或有了撤退计划未能严格执行，多数部队困于城内，未能渡江，日军便于 13 日晨攻入城内，南京沦陷。唐生智在卫队队员保护下渡过长江，又一路步行到六合，他见 11 万大军在他身边的不过百十人，他便带着这百十人向滁州方向奔去。

日军进城，便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六朝古城的南京，变成一座人间地狱。阴风惨惨，芳草萋萋，殷红的鲜血遍地，火焰四起，腐臭的气味冲天，在法西斯野兽的践踏下南京陷落在鲜红的血泊中，陷落在熊熊的火焰中，陷落在悲愤和仇恨中。

蒋氏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的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盖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兵过烈，使我军作无谓牺牲过甚时，将阵线向后转移。”日军入城时，一路猛跑，大路上的人群纷纷散开，日军向两边扫射，两边人群立刻血肉横飞。最先攻入南京的谷寿夫指挥下的日军第 6 师团，有两个准尉，一个叫富冈，一个叫野田，两人约定作砍杀 100 人的比赛。从南京下关一直杀到夫子庙，一个杀 105 人，一个杀 106 人。这杀 106 人的就是冠军，赌一瓶白兰地酒。接着两人又重新打赌，看谁先杀满 150 人，于是杀人竞赛又重新开始。这两个野兽便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劈成两半。在他们砍杀的人数各自达到 150 时，他们便相约登上紫金山高峰，面朝东方，举行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狂欢乱饮，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日军进城后，聚集在下关车站和中山码头的几万中国人，已无船过江，更无车逃离，几万人惶惶不安之际，日军突然打开挹江门杀来，用机枪向人群扫射，打开几条血巷，然后分割人群，用军刀和刺刀步步追杀，把一团团人群逼到一起，四周架起机枪，尔后几十挺机枪向人群扫射，几万人魂归西天。机枪扫射之后，死人堆内走出一个 9 岁儿童。

一个日军中队长走近那儿童，儿童用仇恨的目光看着那日军军官，日军官也看着他，两人对视一会，日军官对儿童咧嘴一笑，举起手枪，对准那儿童脑门就是一枪，孩子没有作声，向后倒下。另有一位 3 岁幼儿爬了出来，

他几乎还不会走路，一个日军士兵见状，端着刺刀走上去，一刀刺入幼儿的肚子，幼儿未立死，惨叫着，日士兵显出急躁的样子，又补一刀，仍未死，他便举刀将幼儿的小脑袋砍下来……中国军队有 10 万人当了俘虏。日军兵将俘虏集中到下关的长江岸边排队斩首。第一排被杀完，让第二排把尸体抛入江中，然后排成一列，同样杀头。这样从早到晚只杀了 2000 人。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机枪，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让俘虏面对江岸，排成一列，机枪一响，俘虏们一齐跳江。然而没有一人能游到对岸，便死在江中。后来日军长官传下话来，俘虏不杀了，让他们去干苦役。

日寇围住华侨招待所，把所里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全赶出来，集中在空地上。有两个人动了动，被日寇拉出来，一刀一个劈下头来。尔后用几十辆大卡车，将 5000 人分批运往下关。这 5000 人到了下关，如同到了阴曹地府，只见满地都是血水和尸体。他们被驱赶到尸体上去，机枪一响，5000 多人无一幸存。

日寇又把 5.7 万难民和俘虏捆成两人一扎，或用铁丝从掌心穿过，两人串为一扎，赶到慕府山。然后强令他们排成 4 路向草鞋峡前进。有不服从的，立刻就杀。5.7 万余人被驱到草鞋峡后，那里早已架好了无数机枪。机枪响后，几万人立时大乱：“向日本鬼子夺枪，快夺枪！”几万人潮水般迎着子弹冲上去。前头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冲上来，人潮起伏。几十挺机枪组成火力网阻止人潮的潮头。然而潮头伏下又起，不断涌去，愤怒地迎着死亡向日军扑去。这 5.7 万人终于被日寇杀死。日寇见没有站立的人了，便端着刺刀走上尸体上，每个尸体补上一刀。因为尸体叠了好多层，日寇只能刺上层尸体，怕有遗漏，便用煤油、汽油浇尸体，然后点燃，大火顿起。这 5.7 万人只有两个幸存者，一个是教导总队的，一个是保安队的。机枪一响，他们就卧倒在地，手上的绳子被他们挣脱，有许多人倒在他们身上，血流到他们身上，大火烧起，他们感到灼热和人肉烧焦的恶臭，他们背部皮肤在高温下退去，只能强忍着，最终活了下来，成为这次被日军大屠杀的见证人。

在燕子矶，有 10 多万难民和俘虏被日军围住。日军嫌捆绑太费力气，且一时难找到那么多的铁丝和绳子，便决定直接用机枪扫射。将 10 多万人赶到燕子矶的沙滩上，面对长江。日军围绕人群，成环形架起机枪群。机枪喷出火舌，人群大片大片中弹而倒，几十道火蛇将人群吞杀。人被杀尽了，尸体堆在沙滩上，有些尸体顺江水向下游漂去。

观音门一带，有 3 万多难民和溃兵被围。日军将每个人捆住，原来他们想换个花样杀人，说是为天皇节约子弹。3 万多人被赶到树林子里，四周架起机枪，不给他们水喝，不给饭吃。日寇在四周大吃大喝。几天几夜过去，许多人在饥寒和绝望中死去。日寇从四周向树林纵火，3 万人一片惨叫，饥饿的人群，无人有力量站起来，烈火中 3 万余人活活被烧死。

在紫金山，有 2 万多难民被捆住，推到一个大坑里，集体活埋。日军长官说，这样既节约子弹，又省得以后打扫。

在雨花台，被围的有 2 万多人，日军让各中队用刀屠杀，这 2 万多人全被杀尽。

在汉西门外，约有 7000 人被围，日军将这些人身上都浇上汽油，然后点火。7000 人一片火海，乱窜乱跳，惨不忍睹，日寇却在四周大笑取乐。

日本人在沙洲挖了一个大坑，用几十辆卡车拉来 1000 余老人和孩子，

骗他们说是运到安全地方去，可一到沙洲，全把他们推入大坑活埋。老人和孩子全没上捆，有的向坑上爬，日军在四周一锹一个砍他们的脑袋。

日军在上元门用机枪扫杀 9000 余人。

有 1 万多人藏在英国人办的制蛋厂和江公司内，被日军发现，把 1 万多人全部杀尽。

在凤凰街上新河，数千难民和溃兵被捆住，全部推入河中，然后掷下稻草，又在草上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河内一片火海，人声惨叫，日军狂笑不止。

日军用各种花样，杀人取乐，他们把中国战俘手足紧缚，排倒于地，以军用卡车往来飞驰其上，以致辗压成连环肉饼，不分彼此。或用马匹分尸，然后给军犬分食。

日军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令狼犬扑食上身，血肉淋漓。日寇把人吊起来，用铁钩钩着舌头，名曰：“钓鲤鱼”。或用铁床架在一堆木柴上，将人捆在铁床上，点燃木柴，名曰“烤全猪”，残忍之状，目不可睹。

日军将几百人赶到国民政府司法院房顶上，然后火烧房屋，“蒸”死这些人。又把 1000 多人赶到广场，等到夜晚浇油烧杀，广场一片光摇曳，日军狂叫不止。又将几十人剥光衣服，逼入水中“捕鱼”，下水者尽被冻死。

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 6 个星期。大规模的屠杀之后，则将居民分批集中到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广场等处，说要进行良民登记，每日被迫集会的常达 1 万余人。日兵诱令说：“充当过士兵及无家可归的人，站到一旁，以便给予职业。”有人信以为真，出列一旁，被日兵拉去惨杀，平均每日杀害的达 1000 余人。这样又屠杀了一个多月。

日寇在南京屠杀的中国人总数达 43 万多人（一说达 35 万多人），其中青年学生约占将近 1A2。

中华门、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山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10 余年来辛苦经营的大建筑物，被日军纵火焚烧，大火烧了一个多月，还未熄灭，成为一片瓦砾。南京市金银财宝，被日军抢劫一空。日军三五成群，有组织有计划地分片抢劫，将财物装上货车运走，然后纵火烧房屋。

日军一进南京城，除烧杀抢劫之外，还有人神共怒的大奸淫。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传令各将官，让士兵进城后“得乐且乐”，借此使士兵不思乡。各将官传此令后，日本兵一片欢呼，窜到一切角落寻找中国妇女。日军中队长中岛对士兵们说：“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事后要把她们杀掉。”因此，多数死难妇女，都是先被奸后被杀的。

日寇在下关把妇女抓去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 15—20 个人玩弄，妇女被轮奸后统统杀死。

南京到处是女尸，几乎全是面目青黑，齿落腮破，挖出乳房，刺穿胸和腹，有些女尸肠子流出。许多女尸都是一样姿势：赤身裸体，下身肿破。许多妇女是遭几个、十几个日本兵奸淫致死的。

12 月 14 日上午，一群日本兵窜到铜银巷，绑去妇女多人强奸，其中有一半人被轮奸致死。在兴中门内东城根草房内，有 5 位 12 岁到 70 岁女性被奸后杀死。

12 月 5 日，大批日军涌入陆军大学，将那里的几十名女性架走，关起来供他们发泄兽欲。日军强奸妇女，已完全失去人性。他们抓来一个 70 岁

老太太，用皮带打老人下身，打肿后再行强奸。

在 6 周之内，每天 24 小时，无一时没有妇女不被日本兵强奸。每日被奸妇女都在 1000 人以上。

山西路一住宅内，当一妇女被日兵强奸时，其丈夫在旁哀求释免，结果夫妇同遭刺死。

时值隆冬，有一日兵发现雪地上有被奸死的裸体女尸，乃捉一市民强与交合，市民抗拒，立遭惨杀，那裸体女尸下部也被戳数刀。

在七里街，有一位陈锦福老汉领一个女儿，日本兵轮奸老汉的女儿，还迫使老汉在旁“参观”，最后迫使老汉也轮奸，老汉一头向日本兵撞去，日本兵向他刺了十几刀。

一家屋内住有姑嫂 3 人：一个少妇，两个少女。日兵五六人闯入，少妇机警忙往屋内草堆藏匿。两个少女躲避不及，便遭日兵强奸。那少妇只听见大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吭声了，那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后也不响了，只剩下兽兵们狰狞的狂笑声。少妇听得直发抖。两个小时后，兽兵离去，少妇大着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涂满了血，胸和肚皮被刀戳了两个窟窿，肠子流了出来。那大姑娘赤身露体仰卧在床上，满身是血，下身还插着一把刺刀。这少妇受此刺激，疯了。

日军在中华门外，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与之行奸，僧人拒之，竟被处宫刑至死。

在三牌楼 3 个日兵轮奸一位 58 岁妇女，轮奸后，又用木棍从下身将她捅死。

妇女莫不人人自危，乃相继奔避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垣入内，不择老幼，摸索强奸，有阻拦或反抗的，日兵即开枪。金陵女子大学在安全区，日本军黑田部以大批部队抢走 100 多女学生，强奸了几天几夜才送回来，许多女学生死了。

国际救济委员会设有妇女收容所，收容妇女约 7000 余人。日本兵在挨门挨户搜索妇女奸淫犹感不足，每天都到收容所用大卡车劫走大批妇女，号哭之声，数里可闻。大凡自 12 岁到 70 岁的女性，都成为日兵奸淫对象，稍加抗拒，即遭惨杀。

难民区妇女为避免受辱而有女扮男装者，但又被日军拉去做壮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那 30 余名壮丁被日寇捉住，正当绳捆索绑时，一日兵忽触及一人胸部，觉得可疑，便解衣检查，发现都是女扮男装，于是悉数加以奸淫。事后剥光衣服，裸体钉在墙壁上活活折磨而死，有的削去两乳，有的搅烂下身，有的切开腹部把肚肠挑出来，死状之惨，目不忍睹。

在铜银巷 6 号，几名妇女被日兵绑去，白天强迫她们洗衣，夜里通宵被轮奸。日军每夜从广州路用卡车拉走青年妇女，妇女竟夜惨哭，人不忍闻。有一批孕妇，遭日兵奸淫，事后再用刺刀开膛破肚，将胎儿取出蒸食。

南门里桥有 3 妇女拒奸，被刺眼、割鼻、剖腹。

日寇强掠妇女设“行乐所”或“俱乐部”。曾在苏州掠 2000 多女子，在无锡掠 3000 多，在杭州掠 2 万多，更在南京掠有大批。日寇将掠来女子，分上中下三等，编了号码轮奸。许多妇女绝食而死，日兵每日掠补。日寇规定女子必须裸体仰卧，盖薄毯。当奄奄一息时，就扔掉。

日军的罪恶罄竹难书！

## 第三十九章 杀一儆百

日军既然北占东北、内蒙、山西和平津，南占上海和南京，它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便是打通津浦线，以便使南北联成一片，解除中间的威胁。然后举兵西进，拿下武汉，囊括中原，迫使中国屈服。于是，日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沿津浦线，一路自北向南打，一路自南向北打。

是时，蒋介石下决心在津浦路南北两头死堵日军，在徐州一带形成顽强阵地。徐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目下日军南占南京，北占平津，徐州更为瞩目。

在津浦线上同日军死战的任务落在李宗仁的肩上，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守备范围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至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的海岸线，辖山东全省、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所属部队有：孙连仲的第 2 集团军、韩复榘的第 3 集团军，李品仙的第 11 集团军，廖磊的第 21 集团军，邓锡侯的第 22 集团军，顾祝同的第 24 集团军，杨森的第 27 集团军，庞炳勋的第 3 军团，冯治安的第 19 军团，汤恩伯的第 20 军团，张自忠的第 27 军团等，计 29 个步兵师，3 个步兵旅，共计近 30 万人。

李宗仁将第五战区司令部设在徐州，他审时度势，制定了“先拒南下之敌于黄河北岸，而后集中主力先求击破由南京北上之敌”的作战方案，然后从容布阵，伺机与敌决战。

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以 4 个师团兵力渡江沿津浦线北上，另以 6 个师团的兵力以及一特种机械化兵团自德州一线南下，以图徐州，打通津浦，连贯南北战场。

然而，津浦路北段防守指挥韩复榘不听指挥，消极抗战，日军很快逼近黄河北岸，并占据鹊山，向济南打炮。就在韩复榘与日军依黄河对峙期间，李宗仁到济南，他同参谋长张任民来到韩复榘的司令部里，韩见李便问：“长官，你看我们抗战有把握吗？”李宗仁说：“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如果济南失陷，3 集团军可以退到沂蒙山区，监视津浦路左侧，使日军不敢急剧南下。”韩复榘眼珠瞪得溜圆：“南路日军很快就要打到蚌埠，北路日军如过了济南，两路一夹，我岂不断了接济？沂蒙山区贫困，就地无法筹措粮饷，即使饿不死，还不是让日本人拿我们当‘包子馅’吃了？”李宗仁见话不投机，不再说什么，不欢而散。

李宗仁离开济南，韩复榘便做出放弃济南，后撤逃跑的计划。他决定炸毁黄河铁桥，以阻日军过黄河，建设厅长劝阻道：“黄河铁桥是中国著名的伟大工程，炸毁未免太可惜了，如果对军事不利，是否可以将主要机件卸走。”韩复榘勃然大怒：“你去拆吧，日本人的炮弹都打到屁股上了！炸掉！”韩复榘命令一个连队运送了 2000 公斤炸药，装置在黄河铁桥各桥墩、桥孔和桥基上，炸了黄河铁桥。

当晚，韩复榘把 3 个妻妾以及孩子们叫来，让他们带着家私在护兵们的保护下逃回河南去。



次日一早，韩复榘召集厅局长、师长以上的军政官员开会，欲下撤退令时，秘书送来南京急电：“向方兄，请你务必死守黄河，绝不可放弃济南。蒋中正。”韩复榘看过，随手摔在桌上：“不管它！如果拿我们兄弟的头去开玩笑，我们今天也就彻底完了。”教育厅长何思源说：“我认为，在大敌当前不能只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现在是全面抗战。蒋总司令讲过，民众抗战，一切损失由中央补。因此，今后的地盘不必考虑，还是应该打。”韩复榘冷笑一声：“你太天真了！蒋介石的话你能信以为真？你们知道这蒋委员长什么时候又和日本妥协吗？我们就这几万人，这个家底抖落完了，蒋委员长突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定，华北就肯定没有我们的份了。蒋介石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他们不守南京，却让我们死守济南。一打仗便釜底抽薪，我们差一点没有死在他的诡计和暗算之中。”台下有人高声响应：“对，不给他当炮灰，走吧，不听他那一套！”韩复榘道：“我们有这些人，到哪里都可以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吃有花的。诸位，不要犹豫了，回去准备吧！”韩复榘在撤出济南以前，以“焦土抗战”为名，纵兵在济南等地大肆焚烧抢劫，并向各县强征“救国捐”。一等县 20 万元，二等县 15 万元，三等县 10 万元。愈期不纳，即拿县长是问，限令即到，县长不敢违抗，遂向百姓勒索。人民叫苦连天，致有不少跳河和悬梁自尽者。

韩又命令心腹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 1.5 亿两黄金、3 万两白银全部装好，连夜装车运到河南洛阳，在韩的纵容下，韩部官兵连抢 3 天。中国银行和交通等银行、各面粉公司、各大纱厂及其仓库，均被抢劫一空。从银行里抢去 270 万日元，加上损失共有 600 万日元，被抢的小麦和面粉数十万包，在撤离济南的前一天，韩复榘下令焚烧省政府各厅局、法院、兵工厂、裕鲁当、“进德会”、前总督署等处建筑物。顷刻间，浓烟滚滚，火光触天。济南全城，一片混乱，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

韩复榘退往泰安时，蒋介石发来十万火急电报，要他“千万不能放弃济南”。韩阅后哼了一声：“老子已经到了泰安，看你怎么样？！”12 月 28 日，韩复榘乘车南下至济宁。李宗仁电令他：“你部务必死守泰安。”韩在电报上批：“南京不守，何守泰安。”韩复榘不顾军令，不战而逃，沿路抢劫；津浦路大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几天之内，山东大半沦入敌手，数千万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恨，蒋介石便借机诱杀韩复榘。

蒋介石要李宗仁在徐州召开第五战区会议，要韩出席。但韩诡计多端，为预防不测，让何思源代表他去徐州开会。李宗仁见韩未到会，大为不快。

老蒋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立即召开“北方抗日将领会议”，规定所有师以上官佐一律到会。1938 年 1 月 10 日，蒋介石借白崇禧等抵开封，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说：“我决定明天召集师长以上官佐来开会，请向方兄同孙军长等务必出席。”韩复榘召集部下商议，他的总部的处长们认为老蒋险毒辣，居心叵测，劝韩不要去，再派代表去参加。但韩认为这次军事会议有四五十人参加，大概不会有什么不测。

韩复榘正在犹豫之时，蒋派隐藏在韩身边的特务“青天鉴”，根据老蒋的指示，用“解梦”方式，鼓动韩去开封赴会，说韩若骑白马西行，定有好运气等他。那韩复榘听了“青天鉴”荒唐无稽的鬼话乐不可支。他当时正和四川军阀刘湘、河北的宋哲元等策划倒蒋的宏谋大略，心想我骑马西行，有众神保佑，理想将成为现实。于是，他踌躇满志，决意西行。

1 月 11 日下午 2 时，韩复榘和孙桐萱在卫兵陪同下，乘坐汽车来到开

封，在会场大门口，突然被军警宪兵拦住。门前贴着通知：“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等人步行到第二道门，墙上贴着：“随员接待处。”韩心中生气，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把4个卫士留在接待处。

韩进了第二道门，走了不到50米，墙上又有一张通知：“与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随身自卫武器请暂交副官处保管。”韩虽有疑心，但见站在他身边的许多将领都将腰间手枪交出，他也就不再迟疑，交出手枪后，步入会场。

第一、五战区80多位师以上将领都来参加会议。韩复榘被安排同刘峙坐在一起，同其部下分开。蒋介石首先训话，他目光咄咄逼人，像闪电一样从韩复榘脸上划过：“外敌入侵，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如再不铲除保存实力的落后思想，洗刷那卑劣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重，就一定要踏着东三省伪军的覆辙，要被敌人压迫来毁灭我们祖宗的庐墓，残杀我们自己的同胞，绝灭我们子孙的生命。真是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我们打败仗，并不是倭寇的军队怎么多，实力怎么强，也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个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照此下去成何体统。敌人由济南攻下泰安的部队，不足一师人，而且不是正式部队。他们如此脆弱的部队，居然向南深犯，这完全是我们等敌人到了就退，既不攻击，也不死守的缘故。此种现象必须坚决纠正，绝不允许有类似情况发生！”当宣布散会后，众人纷纷离席之际，刘峙起立对韩说：“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对你讲。”会场内只剩下李宗仁、刘峙、蒋介石及卫士四五人。刘峙指着卫士对韩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走。”韩见状，知大事不妙，但也无法可施，只好蹒跚地跟卫士走去。

特务头子戴笠和龚仙舫立即带着一帮特务将韩复榘押送到武昌军法执行总监部。

韩复榘被押，解到武昌后，蒋介石才在会上宣布：“韩复榘目无中央，违抗命令，大敌当前，擅自撤退，为民众所不容，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现已逮捕法办，交军法总监部审理，请诸位安心供职！第3集团军由于学忠任总司令，孙桐萱为副司令。”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巨为军法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对韩进行审讯。审判长何应钦问他：“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项，这许多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韩昂首微笑，一句不也答复。几位陪审的法官，一再追问，韩仍一言不发。

1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韩复榘不战而逃，罪有应得，不过，蒋介石杀他还有另一原因。日寇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往四川，韩认为这是反蒋的好机会，他便同四川军阀刘湘密谋，并与宋哲元联络。其计划是由刘湘派川军封闭蒋介石入川之路，韩复榘率部撤到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宋哲元部撤至潼关以西，韩、宋两部击蒋背后，刘、韩、宋3军对蒋形成夹击包围之势，然后通电联合倒蒋。蒋介石很快获悉了这一密报，因此，便决心乘机杀韩。

在津浦路南段，中国军队打得相当漂亮。日军占领南京后渡江到浦口，

一路呼啸向北开，想象一定像走大路一样就会开到蚌埠，未料刚到张八岭、岱山铺、株龙桥、藕塘一带，遭到第五战区的韦云淞第 31 军的阻击，双方对峙。日军屡次增兵，兵力已有 3 师，总兵额为中国军队的数倍。敌军原意是以旅次行军方式，直趋蚌埠。孰料行抵明光以南，即为我军所堵截，血战逾月，双方打成平手，日军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出日军指挥官意料之外。待日军主力被吸入明光一带时，中国守军主动西撤，将津浦路正面让开，日军猛扑明光，连下定远、怀远、蚌埠，然而中国军队阻于淮河南岸。

淮河北岸西 30 里铺等处，敌我激战正烈。各守军往复冲锋不下数十次，我空军亦飞往助战，猛烈轰炸津浦路沿线之敌，迄 3 月 6 日，廖磊第 21 集团军一部向定远反击，并以增援张自忠军接替于学忠部淮河北岸各阵地之守备，敌虽数次猛攻，迄未得逞，旋以张军奉命北调临沂，淮河北岸仍由于学忠部固守，并以韦云淞军固守炉桥洛河之线，周祖晃军在老人仓向池河镇、定远积极反攻，并到处发动大规模之游击战。敌军因之被我吸引牵制，大受打击，虽曾进出淮河北岸，仍不能前进，其大部撤回南岸，形成对峙态势。

日军北守南攻之图不能得逞，复改为北段主攻。坂垣第 5 师团在海军配合下，在青岛登陆，并迅速沿台潍公路经高密南下，进逼临沂。李宗仁令孙桐萱向济宁，汶口反攻，予敌重创。

日军矶谷第 10 师团在获大量增援后，向界河阵地猛攻。邓锡侯第 22 集团军之王铭章师夺滕县，与敌激战两日，毙敌 2000 余人，王铭章壮烈殉国，所部牺牲殆尽。3 月 17 日，滕县失陷。

日军大有豕突狼奔之势，杀气腾腾再攻峰县、枣庄。相继得手后，更不可一世，以为自此而后，沿台枣支线攻取台儿庄，如探囊取物，徐州也可一鼓而下。然而李宗仁则临难不惧，决以数万哀兵与敌周旋，深信只要善抓战机，集中主力，使用攻防得当，战胜日军是完全可能的。

矶谷的第 10 师团移师台枣支线时，沿台潍公路推进的坂垣第 5 师团攻占了汤头，正向鲁南重镇临沂猛攻，准备拿下临沂后，同第 10 师团会师台儿庄，而后分进合击，实现攻取徐州的战略目标。

临沂告急，在此紧急关头，既无总预备部队可资调遣，只有就近抽调原守海州的庞炳勋军团，前往临沂，固守县城，堵截敌人前进。

庞炳勋原是冯玉祥旧部，是有名的善于“保存实力”的杂牌部队之一。庞虽任中将军团长职务，但他所指挥的军队只有 5 个步兵团，实力尚不足一个军。庞已年逾花甲，久历戎行，经验丰富。他对编入第五战区序列，有些不满，觉得司令长官李宗仁论年龄是他的晚辈，受李指挥，觉得不是滋味。

李宗仁对庞也有警惕，觉得不易驾驭。他听说庞炳勋来了，便破格到大门口迎接。

庞见李宗仁全副戎装出来相迎，慌忙敬了军礼：“卑职前来晋谒李长官，怎敢惊动长官出迎！”李将庞引到客厅道：“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只是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位而已。仅就公事而言，我是司令长官；以私交而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以往我们曾被迫在内战漩涡中打转。那样的内战，败不足耻，胜亦不足武。

今日天如人愿，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这才不愧为一个军人，以终其生。”庞炳勋听了这一番话，很受感动：“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

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拚到底！”李宗仁问庞有什么困难。庞叹息道：“我原有5个团，现在中央有命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共编为4个团。我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要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不归并，只有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各部队都在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遣散！”李宗仁对庞甚为同情，允诺呈报中央军委，力争解决。

李宗仁几经交涉，军政部复电说，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消息传出，庞部大喜过望，庞氏更感激涕零。之后，庞部又得到了弹药、装备的补充。

庞部在临沂同日军发生攻防激烈战斗。日军以一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庞部猛扑。庞部全体将士，据城死守，日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连日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

日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遂于3月9日撤至汤头以南阵地，经过整顿补充，并调来援军一部，人数共5000人，配属大炮30余门，坦克20余辆，复又向临沂防地压来，先后攻占沂河以东汤头以南沙岭子、白塔、太平、亭子头等村。庞军严阵以待，誓与临沂城共存亡，全军上下虽奋力拚搏，但因牺牲太大，渐感不支，连电告急，请求援助。

临沂系鲁南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如果临沂不保，日军则可由青岛直趋台、徐，威胁陇海、津浦两路之安全，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李宗仁一面电令庞部“坚决保卫，拒敌前进”；一面急调张自忠率59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张自忠原是冯玉祥旧部，所部大刀队曾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近战夜战歼敌，杀出威名。卢沟桥事变时，张自忠为宋哲元第29军中将领师长，由宋氏保荐中央，委为北平市长，张以北平市长身份，奉宋氏密令，与敌周旋，忍辱负重，掩护29军安全撤退，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概。中国部队南撤，张自忠被困北平城内，缒城脱逃，由冯玉祥向蒋介石请求，让张自忠任59军军长。

张自忠由济南到了南京，舆论界吁请中央将张严惩，以儆效尤，军中更有人想乘机收编张的部队。

李宗仁认为张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在张受难时，李邀张恳谈，李对张说：“葱忱兄，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张自忠听了，忍不住流下泪来，他忍住激动的感情，微微点了点头，默默地听李宗仁说下去：“现在舆论谴责你，因他们不知底蕴，等他们明白了事实真相，就不会责骂你了。”

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想，你会原谅他们的。我是了解你的，当然，也谅解你。”张羞愧地说：“这次个人冒险来京，是以待罪之身前来投案，等待中央治罪。”“葱忱兄，我劝你不要灰心失望，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承蒙李长官为我缓颊，中央如能饶恕我，让自忠待罪立功，我一定以自己的生命报国，绝不辜负李长官的期望。”在冯玉祥和李宗仁的帮助下，张自忠被命为59军军长。他向李宗仁辞行时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缲继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国，以报知遇。”庞炳勋在临沂被围，情况危急，除59军之外，第五战区已无军可调。但张与庞有隙，张、庞原来都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

庞被蒋收买，倒戈反冯，并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张部，张、庞从此结怨。张调来第五战区时也曾私下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拚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而李宗仁知人善任，断然命张率部赶往临沂助庞作战。

张自忠蒙此信赖，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率部星夜赶赴临沂，与庞部密切配合，血战5昼夜，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胜仗，毙伤敌人数千人。

临沂不下，敌之会师计划受挫，轻狂骄横的日军不以为训，仍然决定孤军冒进。3月下旬，日军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南下。日军有坦克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100余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台儿庄发起猛攻，著名的台儿庄大战由此展开。

李宗仁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命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的3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命汤恩伯的第20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峄县、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围歼敌人。

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督战。同时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厅长刘斐等组织临时参谋团，于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日军投入的兵力有两个师团又一个炮兵旅团及伪军两个师另一个旅，总计七八万人，中国方面先后投入作战的约40万人。

## 第四十章 台儿庄大捷

3月23日，日军自峄县沿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南犯台儿庄。守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30师师长池峰城，以王冠五团扼守台儿庄，以王郁彬团北上诱敌。24日，敌以猛烈炮火轰炸刘家湖一带工事，然后以坦克为前导，向守军阵地猛冲。当晚，日军一部突破台儿庄城东北角。师长池峰城以一部坚守城内，将突入的日军迅即赶出城外；然后以大部在城外与敌人展开肉搏厮杀，常为争夺一村一地，与敌军反复肉搏一二十次。至25日晨，中国军队在援军炮兵和装甲列车的配合下，将台儿庄北丢失的五六个村庄相继收复。

日军伤亡惨重，一时无法集中全力攻城。但敌军续有增兵，并倚恃其优势火力，再次以步炮兵向台儿庄城四周阵地猛烈攻击，一日间落炮弹达六七千发；更以飞机轮番轰炸，迫使守军逐渐后退。然而守军以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坦克相搏斗，至死不退，英勇坚守阵地。

3月27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对台儿庄发起第3次猛攻，突破了城东北角，但受到守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守军死伤近3000人，北面的城墙被日军重炮轰毁，城内阵线呈犬牙交错状态。日军福荣大佐指挥的攻坚部队主力南下，汇合攻城部队再次向城内猛冲。次日，日军占领了城西北角。城内守军第31师全力奋斗，由东向西发起反击；城外炮团积极配合，向日军猛烈炮击，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

日军久攻不下，矶谷恼羞成怒，亲临台儿庄西范口附近督战。30日晚，日军占据了城内东半部。池峰城师决心与台儿庄共存亡，以血肉之躯与敌军坦克炮火搏斗，利用宅院墙垣同敌军展开巷战，在大街小巷与敌人白刃拼搏，

至死不退。城外孙连仲部黄樵松、张金照两师进至台儿庄城外三里庄、板桥、南洛等地，两翼出击日军，截击日军炮兵部队，在城周围与敌人激烈厮杀，以减轻城内守军压力。

李宗仁急调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恩伯仍消极避战。

在姑婆山逡巡不前，迟迟不进。李宗仁严厉警告汤恩伯：“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蒋介石也致电汤恩伯，督令其率师南进。汤部不得不全军南下，以主力向台儿庄北部开拔。

台儿庄守军第31师的4个团已经伤亡过半；由第30师调入城内的两个团接替了部队阵地，伤亡也很严重。至4月3日，台儿庄城西北门、北门、东门、东南门均已陷于敌手，全城1A2的面积已被敌军占领。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坚守，并组成大刀队夜袭敌人，予敌以很大杀伤。

3日和4日，敌军连续发动了第七、八两次总攻，并且使用燃烧弹，妄图摧毁城内所有房屋和军民，将台儿庄夷为平地。城内各守备队利用地形和断墙残壁，筑起第三道阵地工事，挨街逐巷与敌人周旋搏斗，并组织起200余人的奋勇队，偷袭敌人据点，连连突破敌人阵地。

守军虽然英勇奋战，但伤亡太大，实力愈来愈不支。4日深夜，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向李宗仁报告说：“第二集团军已伤亡7A10。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李宗仁思考良久，道：“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并要组织夜袭。坚持就是胜利，待明天援军到后，我们就可对敌人内外夹攻！这是我的命令，如违背命令，当军法从事！”孙连仲组织夜袭已十分困难，预备队已全部用完，部队伤亡过大。但经他动员，轻伤员自动组织起来，主动要求承担向敌进攻的任务。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池峰城奉命后，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战至黄昏，敌人即停止进攻。至午夜，孙部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逆袭，冲入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官兵手持大刀，向敌砍杀，敌军血战经旬，已精疲力竭，不料我军尚能乘夜出击。日军在慌乱中仓促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市街，竟为我军一举夺回3A4，敌人死伤累累。

5日拂晓，汤恩伯军团抵达台儿庄以北，我军遂对日军形成反包围，尔后内外夹击，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以敢死队冲入敌军阵地，勇猛刺杀敌人。

4月6日，我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完，机动车辆多数被击毁，其余也因缺乏汽油陷于瘫痪，全军胆落，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乘胜追击，敌除濛谷支队残部数千人逃掉外，其余全部就歼。

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2万余人，缴获各种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汽车100余辆，机关枪数百挺，步枪上万枝，及其它战利品。

日军在台儿庄吃了败仗以后，知徐州不可轻取，但并没有改变攻袭徐州计划，仍意在拿下徐州后攻取武汉。矶谷和坂垣两师团从台儿庄撤退后，

重新集结，补充休整兵力，并从平、津、晋、绥、苏、皖等地陆续增调 13 个师团，计近 40 万人，日军组成了以桥本群作战部长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协调指导南北两兵团作战，日军兵分 6 路对徐州形成大包围，企图一举消灭徐州的中国军队。

蒋介石为扩大台儿庄胜利成果，采取与日军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使第五战区的兵力由 29 个师增加到 64 个师又 3 个旅，共达 60 万人，试图在徐州与日军一决雌雄。

日军以第 16、第 144 师团增援北线的第 5、第 10 师团，沿津浦路向南推进，以诱引中国军队主力；以第 14 师团从濮阳渡黄河入鲁西南和豫东，断陇海路，从而阻遏援徐州之中国军队，亦断徐州守军退路；以第 13 师团在南线的蚌埠、怀远间集结；以第 6、第 9 师团向凤阳、合肥进逼；以第 101 师团向苏北攻击。到 5 月中旬，日军已占皖北、豫南、苏北等地及合肥。

徐州四周为平原地带，日军是机械化部队，又多有空军助战，在此处打起来，中国军队要吃大亏了。李宗仁从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出发，认为在徐州同敌军作阵地相持的消耗战是愚蠢的。他为避免重蹈京沪战场的复辙，提出撤离徐州的意见，而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人却陶醉于台儿庄的胜利中。李的意见被否定之后，即部署徐州会战。

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汉口最高军事会议商讨，遂于 5 月 15 日决定放弃徐州。

5 月 17 日，李宗仁下令所属各部按序列，部署逐次突围。令汤恩伯军团向西突围，猛烈冲击日军；又令孙连仲、张自忠、庞炳勋在运河设防，凭险固守，以掩护大军撤退。

日军见中国军队大幅度行动，随即迅速收缩包围圈，一则向运河攻击，一则阻止汤恩伯军团西进。

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无所不破，大军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两路都相继冲出重围。

5 月 18 日黄昏，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一应人员 700 余人，乘夜色经宿县、蒙城，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同日军激烈战斗，日军见中国军队大部已走，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状，及见各路大军撤尽，便弃城撤退，于 19 日离开徐州。敌军不但没有击溃刘汝明部，甚至连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

徐州突围成功，日军捕捉我主力强迫决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而立即变更战略方向，以主力沿陇海路西进，期切断平汉路，尔后挥师南下，直取武汉。

守卫在平汉线上的部队属于程潜的第一战区。豫北中国守军为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其任务是利用豫北坚固的国防工事，阻止日军南下。土肥原师团于 1938 年 2 月初发动了对豫北的攻势。2 月 7 日，日军第 27 旅团长馆悳率 5 个步兵大队、3 个炮兵大队从大名出发，向南乐、清丰、濮阳一线推进。由于守军精神不振，战斗力薄弱，一经接火，就弃枪逃窜，使日军得以长驱直进，攻陷南乐、清丰、濮阳。

濮阳乃战略重地，程潜急令第 77 军副军长张凌云指挥 3 个旅以及张德

顺骑兵师由东明、道口向濮阳反击，因其行动迟缓，畏敌不前，又遭失败。土肥原师团主力约3个联队1万余人也由安阳向平汉铁路万福麟、高树勋部阵地猛攻，宝莲寺陷入敌手。万福麟声称阵地被毁，两翼受围，伤亡严重，擅自命令放弃汤阴阵地，退至淇河南岸。

蒋介石闻讯，十分震怒。他电令程潜固守道清、滑县、浚县及淇河阵地。但宋哲元并未执行命令，他的副手秦德纯声称：“豫北我军兵力薄弱，应援不及，如两日内新乡无大部援军到达，深恐无法收拾也。”果然，日军越过淇河逼近淇县，万福麟部又主动退至平汉路西侧地区，日军轻占淇县。

2月14日，濮阳日军一个混成联队5000余人，携带大量架桥器材和渡河工具迅速南下，当天侵入长垣，次日攻陷封丘，并向新乡南之平汉路急进。日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连陷新乡、获嘉、狮子营、修武。守军一退而不可收拾，毫无抗敌斗志，急先逃跑。

宋哲元在从获嘉西逃时，差点被日军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19日，日军数百人，坦克4辆，向焦作进攻，守军石友3师1个旅在阵地遭到炮击后即弃城而去。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在豫北有近10万人，依据着坚固的国防工事，竟面对日军一个混成旅团的攻击，却不问敌情，闻风而逃。

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斥责宋哲元何以不战而逃，宋哲元称：“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程潜非常气愤，命令第46军军长樊崧甫严密戒备黄河南岸，无战区长官命令，不得放任何部队渡过黄河，并炸毁了郑州黄河铁桥。

台儿庄战役后，程潜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置于兰封、商丘、碭山之间的陇海铁路附近。日军兵分东、北两路向陇海路东段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势。

东路日军第16师团于5月18日攻陷丰县后，其快速纵队沿丰碭公路直扑碭山、商丘，攻势凶猛。5月27日，程潜命军长黄杰、刘汝明率部死守商丘、亳州，在兰封之敌未消灭前不得放弃。不料黄杰临阵脱逃，日军一个旅团于5月29日凌晨占领了商丘。

北路日军第14师团于5月9日向郟城、荷泽一线攻击。11日攻占郟城，次日零时又以骑兵一个联队向鄆城猛攻。13日，日寇14师团主力渡过黄河，由鄆城直攻荷泽，尔后向考城挺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主力在内黄、马庄寨、人和集一线，右纵队在仪封附近，共1万余人，炮100余门，战车100余辆，企图沿陇海路西进，直攻兰封。中国军队决定将土肥原师团围歼，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

5月25日开始，中国军队以手榴弹、大刀与敌肉搏，激战数日仍无进展。蒋介石迭下手令，训斥各军、师、旅、团长：“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其少数，大都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战局迁延。”遂下令将丢失兰封、归德的桂永清、黄杰两人撤职查办，枪毙了擅自退出兰封的第88师师长龙慕韩。

兰封会战，国民党以精锐部队13个师近15万人，竟未能歼灭被围困的土肥原师团近2万人，在战史上为一千古笑柄。

东路日军攻占商丘后，其一部沿陇海铁路向柳河、民权推进，主力混成第3旅团约4个联队于5月29日占宁陵，尔后陷睢县，向杞县进攻，同李汉魂军展开激战，企图由杞县直指汴都。

第一战区司令部决定全军向平汉线以西撤退。6月初，日军侵占杞县、通许、陈留、兰封。日军增援3000余人由白兰寨向北城进攻。敌重炮数十



门、飞机 10 余架向开封城猛轰，日军步兵多次登上城头，均被击退。师长宋肯堂连发 5 个电报，称“开封城郊东、南各方战斗激烈，现敌尚陆续增加，如再战，难免于溃。”程潜当即严令宋师与开封共存亡。敌军由开封东、北两门攻入城内，守军与敌展开巷战，但宋肯堂擅自下令撤退，并率先逃出开封。

日军攻占开封后，由开封进攻中牟。守军一个营顽强御敌，激战两日，伤亡殆尽，中牟遂陷。日军继续向郑州进逼。

东路日军第 16 师团攻占尉氏、扶沟，并向郑州和平汉线前进。是时，同蒲铁路南段已为日军控制，并窜到风陵渡的五七高点山，设置炮兵阵地，用 15 门大炮向潼关猛轰，与开封之敌遥相呼应，大有东西并进切断平汉线的趋势。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狼奔豕突，竟无法摆脱敌人的追击，处境更为险恶。

郑州危在旦夕，万一郑州有失，武汉保卫战北路外围就会洞门大开。第一战区见事急，遂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掘开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

蒋介石到了黄河岸边，拿起望远镜随便望一阵后，决定炸毁黄河大堤。但有些将领持有异议：“水淹三军，古已有之，但时至今日，这样做会不会牺牲太大？而且老百姓会不会有闲话？”蒋介石说：“现在国难当头，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我已经决定了，把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炸四五个大缺口，就可以利用黄河的水阻止敌人前进。”蒋介石怕夜长梦多，随即把商震叫来，令他尽快执行这一任务：“要注意保密，绝不让日本人事先风闻！”6 月 4 日，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先在中牟县境内赵口挖掘黄河大堤，次日又加派第三十九军一个团协助，并悬赏法币 1000 元，以图加快进度。当天夜晚，工兵营用黄色炸药和地雷炸开堤内斜面石基，开始放水，但因黄河冬春水落，水发量小，仅流丈余，即因决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峻，遂致倾颓，水阻塞不通而告失败。于是在第一道掘口以东 30 米处掘第二道决口。又命新 8 师师长蒋在珍于 6 月 7 日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关帝庙西重新掘堤。

为加快速度，由黄河大堤之南北同时动工，师长蒋在珍和副师长朱振民前往督工。

同日，蒋介石闻赵口第二道决口因塌方亦告失败，异常焦灼。他一日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况，并要蒋在珍随时汇报。在蒋介石监督下，花园口决口加宽至 50 米，斜面徐缓。

6 月 9 日晨 6 时，花园口黄河大堤用炸药炸毁堤内斜面石基，9 时放水，水势不大，约 1 小时后，因水冲刷，决口扩至 10 余米，水势遂猛烈。后又用平射炮两门，向已挖掘的堤岸轰击，将缺口又打宽约 2 丈，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时值大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京水镇以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河水沿京水镇以南的索须河、贾鲁河以东向东南流去，开始流速尚缓，3 日后水流到达陇海线的白沙车站附近，其水幅约二三里。

与此同时，赵口决口亦被河水冲刷开来，达六七十米宽，水深丈余，浪高 3 尺，其水由赵口以西三刘寨向南流去，在中牟同花园口水流汇合继续沿贾鲁河南泻，水头经尉氏、鄢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20 日抵达周家口，由周家口流入沙河向太和、阜阳而去，入淮河，经洪泽湖至界首汇入运河，沿运河南下进长江。

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 400 余公里，流经豫、皖、苏 3 省 44

个县，淹没耕地 1700 多万亩，冲毁民宅 140 万余家。浮尸遍野，90 万人死亡，1200 多万人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并造成了连年灾荒。难民流离失所，哀号无边。

日军从北边进攻武汉的行动受阻，便改变进攻策略，重新组编战斗序列，以畑俊六大将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下辖第二军和第十一军，集 12 个师团 40 万之众，于长江流域，配合海军陆战队，以 500 架飞机协战，分 4 路西逼。在长江以北为两路：一路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一路沿长江北岸直扑汉口。在长江以南也分两路：一路沿南淦路南进；一路沿瑞武路西进，直取武昌。另以舰队溯江而上，视机随时登岸作战。

蒋介石调集 100 万兵力对付日军，共 60 个师，其中有骑兵、炮兵、工兵、飞机和长江舰队。蒋介石从国外购买作战机 100 余架，野炮、高射炮、轻榴弹炮、战车防御炮 100 余门。

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军委讨论制定保卫大武汉作战计划，其总体战略方针是：将主力军置于武汉外围，争取行动上的进退自由，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的自然屏障，以及长江两岸湖泽丘陵作持久战；守备现有的华南、华北、华东阵地，实行积极的游击战争，阻滞长江航运，全力在长江下游消耗日军，不让日军攻到九江，从而形成武汉屏障，争取同日军主力打 4—6 个月。

蒋介石说：“战争打到现在，基本是平原作战，现在战场移到山地和湖泽，已对我军有利。湖北是‘千湖之省’，遍地为湖，都是地障，武汉地处千湖中心，千湖之中，约有 1A3 在武汉东侧，此是绝大的地利。日军北面已为黄泛区所阻，唯一攻击面是东面。

从日军战略看，是要以速战攻取武汉，压迫我政府屈服，同时歼灭我军主力。我们的计划是固守 5 个月左右，以武汉会战彻底打破日军的速胜战略，此种会战本拟在徐州进行，因地形不利，而移武汉。武汉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的地位十分重要。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其成败得失，内则关系我抗战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安危，外则足以影响国际局势，实在是关系重大的一件大事。”保卫武汉的具体布防是：程潜的第一战区，主力布防于汜水、确山，主防黄河、河南东部、山东西部，重点放在郑州南部的禹县。兵力分为 3 股，一是在郑州西北的黄河北岸泌阳一带置预备队；二是向河南北部的日军以游击方式出击骚扰；三是以相当兵力为前锋接敌阻击前进。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阵地，遏敌前进，同时向津浦路南端出师，以游击方式对日方施行骚扰，破坏其后方补给线。兵力分为 3 处，一处驻防商丘，目标在于侧击向西南进攻的日军；一处六安、舒城、桐城一线，目标是阻击西进的日军，一处安庆、无为、庐江一线固守，目标是从侧面向沿江西进的日军发起进攻。

新组编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下辖薛岳第一兵团，李汉魂第二兵团，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在第三战区、第五战区背后的鄱阳湖以西作第二道屏障，主阵地设在平靖关和广济一线。城防用 8 个师；另以 6 个师与第三战区比肩江防，设重兵于马当要塞以求固守。再以一部分兵力与第五战区比肩，师出宿松、信阳一带制敌。

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重点是长江防御，主要阵地是在长江南岸的东流和马当之间，随处阻止日军登陆，尤其要协助第九战区固守马当要塞，造成

武汉外围鄱阳湖以东战场；同时与东面江北的安庆相呼应，扼住日军西进的主要通路。同时扼守杭甬、浙赣等交通线。

汤恩伯的豫鄂边区总司令部，集中兵力于南阳、襄樊一线，目标在于协助第九战区制敌。日军如由平汉线南下，就从侧面向日军发动猛攻；日军如由陇海路向西或向南，就与第一战区一起协力制敌。

空军主要集中在汉口、南昌两个机场，其任务是：不分日夜地对长江中的日军舰轰炸；遇有日机西来，即起飞迎战，携弹轰炸南京、芜湖一带的日本飞机场。

海军主要防止沿江要塞马当、湖口等地，择点布雷，封锁长江、阻止日舰前进。

## 第四十一章 华南败退

蒋介石召集保卫武汉的各部队官长会议，作了长篇训话，说：“各位此次奉令率部守卫武汉，职责异常艰巨，使命格外重大，今后武汉的存亡，整个抗战的胜败，要由你们负起全责。我们一定要藉此一战，将寇军主力歼灭于我阵地前，这样，才算达成我们的任务，才对得起总理和一般革命先烈在天之灵。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高级长官应始终不离部队，誓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高级将领应有坚决的企图心，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誓死求其贯彻。”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激烈战斗，取得重大战果。

2月18日，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袭击武汉。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4大队长李桂丹，率飞机29架起飞迎击，经激战击落日机14架，李大队长以下5名航空战士英勇牺牲。

4月29日，日军飞机39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集中飞机67架严加戒备，待日军飞机侵入武汉上空后，分别向日军轰炸机、驱逐机展开攻击，共击落日军飞机22架。

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唤升、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2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阵地加油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地城市散发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

在武汉会战时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关系较好的时期。

1937年11月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在延安机场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王明，以及康生、陈云、曾山等人。

曾身居高位的王明此时已身价迭落，他从莫斯科启程回国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你虽然在国际工

作多年，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毛泽东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王明等人，说他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他们期望王明能同心同德地一起工作，然而，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以钦差大臣自居，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显出他志大才疏、爱放空言论的毛病，但多数人却接受了王明的意见。

毛泽东、张闻天等对王明的报告不以为然，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是有的，不要将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张闻天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是必要的，保持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保持动员与组织群众的自由也是必要的，这是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不然就是投降主义。”尽管毛泽东、张闻天同王明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王明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还有康生、陈云同时入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重新作了分工，张闻天仍主持日常党务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项英等组成东南局，领导新四军工作。

蒋介石特邀王明去武汉一谈。蒋急需了解共产国际对抗战以及国民党的态度。王明同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到了武汉，开始同蒋介石就两党进一步合作、团结抗战事宜进行协商。

老蒋对王明的重视并不表明他会诚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而是他有求于苏联的援助。

但王明对此却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同蒋介石会谈后，便迫不及待地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公开放弃中共中央以往的原则立场，对国民党表示让步。接着，王明又连续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宣称中共领导的军队应服从蒋介石、阎锡山的统一指挥，中共领导下的政权、军队在组织上应同国民党的政权、军队合并。

当王明摸清蒋介石绝无请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之意时，便放弃了“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的最后一个要求，宣布共产党现在并不要求参加政府，只准备从旁帮助国民党抗战。

然而，王明的妥协退让，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结果，相反被蒋介石视为软弱可欺。

1938年2月，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报刊群起鼓噪，大肆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甚至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之“新的封建割据区域”和“自行其事”的八路军。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不仅毛泽东、张闻天，而且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对王明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提出：“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不愿留在延安。

最后决定同意王明同凯丰去武汉，但只准他们在那里留一个月。王明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直到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才被迫回

到延安。中共中央努力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王明在武汉临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长江局下设5个机构，叶剑英为参谋处参谋长，李克农为秘书处秘书长，董必武兼任民运部部长，博古兼任组织部部长，王明任党报（新华日报）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一再邀请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陈诚），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这个职务。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主管文化）厅长。

国民党在1938年3月底4月初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会议还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日力量案》，并成立了参政会。蒋介石也作出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姿态。中共方面参加参政会的共有7人，即：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请假外，其他6人都参加了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同日寇作战中取得很大的胜利。

日军从1938年6月初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大规模行动。

日军一部从蚌埠、凤阳集结于合肥，再从合肥出发攻打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攻下舒城、桐城，进逼潜山，威胁安庆。

日军在长江集结44艘军舰、83艘汽艇、13艘客轮、数百条木船，溯江而上，配以飞机掩护，海陆空联合，猛攻安庆。杨森部因兵力分散，苦战两昼夜，遂被攻陷，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日军以合肥、安庆为据点，出兵西攻。

日军占领安庆、潜山，下一步进攻第二道防线的重要据点马当要塞。第九战区在马当置有6个师的重兵，第三战区也以重兵呼应，并在长江布雷。日军一边派兵扫雷，一边集几十艘军舰徐徐西进，对沿江两岸施以猛烈火力攻击，自东流起随处登陆。日军越过东流，以上百架飞机轰炸、扫射，掩护军舰冲击，马当告急。

第九战区长官部急令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马当。167师驻马当西不远的彭泽，薛蔚英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结果日舰队从江中的岛北边绕过，绕到马当要塞的背后，施以猛烈炮轰，一时间马当要塞炮火弥天，日军借炮火掩护，蜂涌登陆。马当守军炮位不佳，发炮时对日舰威胁不大，守军不敌，援兵未到，26日马当失陷。

马当失陷，蒋介石震怒。最高统帅部认为，薛蔚英师若能及时增援，马当当为无虞。

蒋介石便下令逮捕薛蔚英，处以死刑，并将167师解散。

日军占领马当以后，猛力西进。中国军队以重兵阻击，日死战，以5天时间攻克彭泽。

占彭泽以后，便集重兵向湖口猛进。湖口是鄱阳湖通长江的咽喉，进攻3天，于7月4日攻陷湖口。

7月13日，蒋介石调整部署，重新划分战区，下令长江以北属五战区，长江以南及武汉属九战区，并向全军发表训令，号召全军奋起打击日军的狂妄气焰，保卫武汉。

是时，潜山、太湖、宿松、黄梅已失，日军豕突猛进。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形，增加援兵，于8月底克复潜、太、宿各地，截断日军之后方，毙

敌甚多。

日军从湖口出兵九江。中国军队重兵布防，中日两军都是海陆空三军齐出，江上、天上、地上处处枪炮隆隆。日军原计划5天左右拿下九江，结果打了22天，付出重大代价，才攻占九江。

日军变更联络线于江岸，且于黄梅集有步兵约2师团，炮兵4个联队，战车七八十辆，并在九江北岸的小池口筑有机场，停机七八十架，于9月1日，分3路进犯。

中国守军刘汝明部、覃连芳部、王缙部死守广济，与日军激战数日。日军前进不得，便施放毒气数十次。广济为一盆地，易中毒气，守军遂移到广济以西之界岭南北之线阻击敌人。日军占广济后，又并力攻打田家镇要塞。

田家镇在九江与黄石之间，中国守军在此设有坚固防御。日军以海陆空3军齐上，每日以飞机投弹千枚以上，炮击500余次，田家镇坚如磐石。日军不顾国际法竟使用毒气，其毒气一种是剧毒“红剂”，化学成分为二苯氰胂；另一种是“特种烟”，比“红剂”更具杀伤力。中国军队无防毒面具，亦无毒气战精神准备。毒气一来，几乎是坐以待毙。

我两营官兵，除2人外，均在阵地被毒死，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日寇在中国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其命中率达80%。日寇使用毒气后，立即猛攻，并打扫战扬，以不留痕迹。

田家镇守军与日军鏖战28个昼夜。张义纯、萧之楚、何知重军，向日军侧背猛攻，形成夹击歼敌之势，但由于田家镇南岸要塞失陷，日军以另一部由水道登陆，猛袭北岸要塞之侧背，9月28日，田家镇失陷。

日军在合肥集结5万兵力，分3路向六安、霍山进犯，同于学忠、冯治安部激战。这两地不久失陷。

日军又以13师团继续南犯，与中国守军在富金山激战一周之久，富金山失陷。

日军13师团及第10师团之濂谷支队打到河南商城。尔后日军13师团和16师团向南转进，在沙窝一带，与孙连仲、宋希濂等部激战30余日，日军无法前进一步。

日军第10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继续西犯，同张自忠军激战于春附近。中国军队以众寡悬殊，乃转进于潢川，又与日军激战一周，而放弃潢川。日军再进，与陈鼎勋军激战，再陷罗山，进至栏杆铺，遭胡宗南部迎击。日伪军不敌，退入罗山城。日军第3师团前来增援，胡宗南部伤亡过众，乃渐向西撤退。10月12日放弃信阳。

韦云淞、孙桐萱所部，扼守武胜关一带，阻敌南进。最后，因武汉转进计划业已策定，所有第五战区部队，除留置有力之数部于大别山脉担任游击外，其余均陆续转进平汉线以西。

在长江南岸，第九战区部队也是节节抵抗日军进犯。九江失陷后，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在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率领下，分两路进攻。右路由第9、第27师团和波田支队组成，主攻瑞昌、幕阜山，断粤汉线，然后迂回武昌之南；左路由第101、第106师团组成，循南浔路挺进，直攻南昌，从而牵制第九战区的第一兵团，掩护右路军攻击。

日军波田支队于8月10日由瑞昌东北之港口登陆，遭孙桐萱第三集团军迎头痛击。双方激战，日军不敌，急以第9、第27师团合击，并配以几十架飞机攻击。第三集团军死战，双方激战14昼夜，日军以重大代价攻占

瑞昌。

日军占瑞昌后，急于扩大战果。张发奎第二兵团调第 6、第 75、第 98 军迎敌，双方相持不下。

8 月 20 日，日军第 101 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进攻星子，在星子同中国军队叶肇、王敬久、陈安市各军激战 3 个月。第 101 师团消耗殆尽。

9 月 1 日，日军第 9 师团一部，乘王陵基部部署未定，突破王部阵地，沿瑞德公路窜扰南浔路之马回岭，经黄维、俞济时军截击，日军南下德安之策遂失效。

日军第 27 师团企图攻下武宁，以威胁德安，先后在麒麟峰、张古山、万家岭一带，经薛岳兵团各部狙击，歼灭其迂回部队 4 个联队。

日军第 9 师团由瑞昌攻马头镇、富池口要塞，经汤恩伯集团军猛烈抵抗，消耗其半数，但在军舰、炮兵及空军援助下，并频施毒气，马头镇、富池口先后失陷，汤部继在富河南岸滞日军西进。张发奎兵团在阳新、大冶及半壁山、黄颡口、石灰窑、黄石港一带任江防、湖防之守备，屡予日军以重创。最后阳新、大冶先后失陷。日军继而分 3 路进攻，企图截断粤汉线，围攻武汉。

蒋介石指挥武汉会战，远非所愿，虽节节抵抗，但节节败退。

日寇为了策应武汉会战，并谋切断中国同国际的联络起见，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做出攻占广州的决定，随即抽调第 5、第 18、第 104 师团，以及第 4 飞行团为基干组成第二十一军，与海军第 5 舰队协同，以主力在大亚湾海岸，一部在珠江沿岸登陆，攻取广州。1938 年 10 月上旬，第二十一军部队相继到达台湾海峡、澎湖岛集结。

10 月 11 日黄昏，日军约 4 万人乘几十艘军舰，在 100 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突入南海大亚湾口，强行登陆。

是时，中国军队主力北调，广东方面驻军为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所部尚有 8 个师，一个独立旅和其他部队，共约 10 万余人，但余汉谋事前忙于同日军苟合，亲自到香港图谋与日联络，没做任何防卫，日军骤然进攻，他慌了手脚，一边骂娘，一边仓促阻击，但因兵力分散，戒备松弛，尤其是大亚湾地区防御力量极为薄弱。10 月 12 日凌晨，日军几乎未受抵抗，即于大亚湾登陆。

是日，蒋介石电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县等地调兵，保卫广州。日军登陆后，连续攻陷淡水，稔山、惠阳，尔后主力沿广州惠阳公路进攻，相继占领博罗、增城和从化，一部沿樟木头至东莞公路进攻。日军在惠阳县飞鹅岭四出劫掠，强奸妇女；沿途拉得民夫，到广州后枪杀。日军在淡水一带掳获妇女 600 余人，每日轮奸，稍不遂意，即遭枪杀。

10 月 17 日，广州各界人民 7 万多人举行游行，决心保卫广州。蒋介石从第九战区抽调第 64、第 66 军驰援广东，以迟滞日军前进，但援军未到达战场，余汉谋奉命放弃广州。

日军由从化、东莞进占广州。另一路日军由珠江口溯江而上，并先后占领中山、顺德、佛山、三水及深圳等地，又向广州方向突进，占领虎门要塞。日军控制了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主要地区。

日寇进入广州后，就在西堤大马路迄十三行、汉民路、惠爱路一带纵火焚烧。偌大一个广州城市，市内大火 3 昼夜不熄，市街被焚 40 余条。财产损失不可数计，实是广州有史以来未有的浩劫。日军在纵火之前，沿街掳

掠货物，各大商店和公司被劫一空。日军将沙基平民住宅焚毁，并在市内构筑工事，在黄花冈附近日兵枪杀外侨，陈尸路旁，无人过问。

对余汉谋不战而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党文武官员，尤其是广东籍官员，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在军委会会议上，不少人向蒋介石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求查办不战而退的将领。蒋介石无言回答，一筹莫展，只是笼统地说，对失职人员一定查办不怠。但此话也只是说说而已。

广州失陷后，粤汉铁路即被切断，加之平汉铁路被切断。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10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葛店，武汉附近发生激战。蒋介石急忙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北面的南岳。蒋氏下令放弃武汉，他在命令中说：“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这样，武汉燃烧了两天。

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且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武汉会战，从6月12日到10月27日，共约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出动12个师团计40万人。中国军队调动了130个师，计100多万人。双方在皖、豫、鄂、赣4省，纵横数百公里的辽阔的华中大地展开大规模会战。日军公布其伤亡3万余人，国民党官方公布，日军死伤20多万人，即占参战兵力的1/2。日军损失军舰90艘，飞机80余架。中国军队牺牲人数约40万人。

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门迁到长沙。蒋介石夫妇在10月25日去了衡山，觉得不但交通不便，而且设备也差，于是前来长沙，先在城外何键家里安顿下来。何键曾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今却皈依吾佛。蒋见何键不是谈话对手，忙要人把唐生智找来。

唐生智自南京沦陷后，脱险回长沙，但一想起南京陷落和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便心惊胆颤。听蒋介石唤他，便硬着头皮来见。寒暄一阵，蒋劈头问道：“根据你守南京的经验，你看这个仗，还能打得下去么？”唐生智也是位很了解蒋介石的人，蒋介石的话一听便明白，他不想打下去了，又不想明说，要别人先为他说出来，唐生智道：“拿目前情形看，我们是处下风，但望前看，日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南京失陷，并非在敌善战方面，……”唐生智本想接下直言批评这位蒋总裁，但又改口道：“只怪我孟潇指挥无方，城里有那么多军队，反而弃城而逃。”蒋介石闻言甚为尴尬，苦笑道：“过去的事不提了，我们还是谈谈今后该怎么办吧！”“委座，中国是不会亡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两人正在谈论之际，只见冯玉祥满身灰尘大踏步进来。原来李烈钧于10月26日在桂林找到冯玉祥说：武汉失守了，你赶快去找老蒋，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冯遂驱车去衡山，又从衡山来到长沙。



## 第四十二章 敌我相持

冯玉祥见蒋介石便说：“武汉丢了，大家都很焦心，要让全国都深切明白，广州失陷，武汉撤退，都不要紧，我们抗战已入佳境，抗战到底必定胜利。”接着以三国东吴孙权拔剑砍桌为例，说明只有抗战才有生路，并劝蒋介石对众宣言，如再有敢言和者，即是汉奸国贼，必定要严办。

蒋听了表示赞成。冯玉祥又提了 10 多条抗日救国的建议。蒋道：“您说的都极重要，最好请您写下来给我。”冯玉祥即写了《上委员长书》，共 17 条，其中包括“为整饬政治，以适应目前新阶段，实有改组政府，使成真正抗日政府之必要”等等建议。

11 月初，蒋介石主持高级军事会议。蒋介石问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说：“我们已构成了 1000 余公里的国防工事，可以凭借工事进行坚强抵抗。”“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敌人的进犯吗？你以为省府可以在长沙待下去吗？”蒋介石已准备放弃长沙，他不愿再说守长沙的事。

张治中说：“我绝不躲避责任，绝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 3000 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保卫湖南！”唐生智和冯玉祥相继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张治中誓死保卫湖南。

蒋介石说：“文白的决心很好，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敌人来了，长沙怎么办？”张治中恍然大悟，蒋介石并不关心湖南准备怎样抵抗敌人的进犯，而是考虑怎么处理长沙。武汉和广州失守前，不少物资和交通工具都运到了长沙，敌人来了，这些东西怎么处理，确实要有个办法。于是便说：“长沙囤积的物资，以及运来的火车头和车皮，是否趁早运到西南去？”蒋介石不耐烦地说：“不行！这些车头和车皮运到西南，就把铁路占满了，西南铁路要不要开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烧掉！”白崇禧说：“车头和车皮恐怕不好烧吧！”蒋介石道：“有什么不好烧的？倒上煤油，把所有的火车头和车皮都烧掉！”张治中见蒋介石讲得那样坚决，猜想蒋还有什么想法，试探着问：“长沙呢？”“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了。长沙我们不能住了，也不能让敌人来住，都给我用火烧了！”张治中内心不同意蒋介石火烧办法，但他深知蒋介石的脾气，凡是决定的事，下级很难改变。他认为蒋没有深思熟虑，又不好当面反对，便提醒道：“长沙的物资怎么办？”蒋介石不加思索地说：“不论什么物资，粮食也好，器材也好，凡是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统统烧掉！不容易烧的东西，要多准备一些煤油，就可以全部烧光了！”冯玉祥不全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便道：“放火烧东西，是表示抗战的决心，可也要照顾到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了，我们也没法住了。”白崇禧道：“焕章兄的话有道理，值得重视。物资，特别是前方所需要的物资，是否利用空车皮运一些出去？”“运到哪里去？放在什么地方？现在是什么时候？来得及吗？”蒋介石已成惊弓之鸟。

蒋介石见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一再支持张治中的意见，便草草结束会议。

当天晚上，蒋介石密召戴笠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 2 团团团长徐

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叮嘱说：“局势紧急，万一日军要来，先放火烧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次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门暂时移到衡山。

11月12日，日军攻陷岳阳。蒋介石电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还不放心，要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给张治中打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接电大惊，思潮起伏，矛盾苦闷已极：他在长沙工作一年多，对长沙人民有了深厚感情，怎忍使长沙人民的生命财产付之一炬？但若不执行，此为最高统帅命令，是抗令不遵。想来想去，还是把警备司令酆悌找来，示以蒋介石电令，说：“此事可否交你去办？”酆悌前已在蒋介石面前信誓旦旦，现又见到蒋的电令便道：“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半个中国都丢得，一个长沙有什么丢不得的？既有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就照办！”他把文重孚、徐昆找来，说：“日军离长沙只有200多里了，上峰有令对长沙实行焦土政策，我们3人负责具体执行。”于是这3位法西斯狂徒分头行动，各自召集军警、布置放火任务。当日深夜，3人率300余人肩背油桶，分赴全城各处，一齐纵火烧城。大火四起，初时只见火光不见人声，继而人声大喧，哭天喊地，惨叫四起。因为火起骤然，又在深夜，居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大火吞没。那放火大军，三五人一队，每隔十户八户人家，便往房屋上洒汽油，尔后纵火焚烧。火柱升起，被风一吹，风助火势，火势越来越大，连成一片火海。长沙城惨叫哭喊惊天动地，大火映红天空。这场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长沙古城烧毁了9A10，成了一片灰烬，男女老少和伤兵烧死近3万人，烧毁100万余户人家，公私财产损失无法统计，整个长沙市只有东南角还留下一些房子。

然而日军却停留在130公里之外的岳阳，并没有来攻长沙，而且在以后的6年内长沙仍由中国军队防守。这场大火激起民众极大愤怒，国人闻之，无不切齿，坚决要求国民政府追查责任者，绳之以法以平民愤。

蒋介石见民愤汹涌，严厉训斥省主席张治中，说：“让你焚毁长沙，并没让你焚烧民众，此事当由你负全责！”命令立即写一份焚城报告上交。张治中只好把“长沙市火变——日记”呈蒋。蒋看了知道张治中的用意，怕追究责任追到他的头上。然而为维护“领袖威信”，他只能心中有数，“火变”闪烁其词，没有点明，并且还说：“我应该承担责任，没有领导好，是我的过失，请求委座严予处分，以为失职者戒！”蒋介石要戴笠派人四出把事态查明。蒋介石也由衡山来到长沙“视察”，外国侨民以及外交使团人员纷纷找上门来：“为什么日兵未到，城先烧了？”“为什么纵火之前，不通知外侨？”蒋介石无言以答，只表示一定要严办失职人员。

蒋介石为安抚外国人，举办一个茶会，邀请长沙外侨，当面道歉。不料茶话会变成了控拆会。外国洋人纷纷讲述他们遇到的苦难，和目睹到的惨景。一位洋人说：“蒋先生，你们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大了。伤兵医院没人管，伤兵们在地上乱爬惨叫，抱住看护小姐不肯放，有几位女护士就是这样活活烧死，有几位小姐头发烧光。那些伤兵一面被烧，一面惨嚎！”蒋介石道过歉，向满目疮痍的长沙瞥了一眼，疲乏地垂下头来，用颤抖的手写道：“祸首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交由军委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决死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用人不当，特予革职留任处分，并负责办理善后。”张治中认为酆悌等人不过是执行了蒋介石焦土抗战、火烧长沙的命令，当了蒋的替死鬼，死得冤枉。他两次向蒋介石建议，可否

不判死刑，或者判死刑缓期 2 年执行。蒋介石一度认为可以考虑，旋即想起不能留下“活口”，否则说出真相，后患无穷，没有改变决定，酆悌等 3 人便被枪决了。国民政府又拨出 10 万元经费给长沙民众，以安抚人心。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治中，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惶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这个匾额把“张治中”3 字嵌在其中。但他们哪里知道这里的奥妙。

岳阳失守后，蒋介石认为抗战第二期开始了。11 月 25 日至 28 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第三、第九两个战区师长以上 100 余人参加。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应邀参加。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作长篇讲话。他说：“自去年 7 月 7 日我们和敌人开战，直到现在，已经 17 个月了；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截止目前 17 个月的抗战为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战争。在第一期战争中，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从第二期抗战开始，希望各位将领要本着我们自己对一般先烈与已死官兵所应有的责任心，以及我们对于国家民族和主义应尽的责任，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看如何才能求得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然后，以万众一心协同一致的精神，彻底实施，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在第二期抗战中，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重于正规，从而达到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的目的。”蒋介石强调了整顿军队的必要性，要求分 3 期轮流整训全国的军队。说以后的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军队素质低劣，以前作战时，阵亡官兵，多暴尸疆场，士兵逃亡也不能制止。军队所至老百姓就争相逃避，谎报军情不负责任，躲避命令，规避责任，诸如此类，以后都要加以改变。至于第一期作战中的许多重大失败，蒋介石也承认是“统帅职责所在，实不能辞其责”。

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介绍给蒋介石，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看。

蒋介石要中共派干部担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员，讲解游击战。此事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周恩来任讲师。

南岳会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战场态势，重新划分了战区，即：第一战区，辖河南和安徽一部，司令长官卫立煌。其部队有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辖第 30、第 42、第 68 军）、孔桐萱的第三集团军（辖第 12 军），以及战区直辖之第 40、第 76 军。兵力有 12 个步兵师，1 个步兵旅，1 个骑兵师，1 个骑兵旅和其他特别部队。

第二战区，辖山西和陕西一部，司令长官阎锡山。其部队有卫立煌兼任总司令的第 14 集团军（辖第 14、第 93、第 98 军）、孙蔚如的第 4 集团军（辖第 38、第 96、第 47 军）、曾万钟的第 5 集团军（辖第 3、第 15、第 17 军）、杨爱源的第 6 集团军（辖第 61、第 19、骑 1 军）、傅作义的第 7 集团军（辖新 1 军、第 22、第 35、东北挺进军）、朱德的第 18 集团军，以及战区直辖第 9 军和第 71、第 66 师、暂 1、暂 2 师等。

兵力有 32 个步兵师，14 个步兵旅、5 个骑兵师、3 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及地方部队等。

第三战区，辖苏南、皖南和浙闽两省，司令长官顾祝同。其部队有陈

仪的第25集团军(辖第100军、第28师)、刘建绪的第10集团军(辖第28、第91军)、上官云相的第32集团军(辖第25、第29两军、第67师)、唐式遵的第23集团军(辖第21、第50军),以及战区直辖叶挺的新4军。兵力有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两省,司令长官张发奎。其部队有吴奇伟第9集团军(辖第65、第4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辖第62、第63、第66、第83军)、夏威第16集团军(辖第46、第64军)。兵力有18个步兵师、2个步兵独立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第五战区,辖皖西豫南鄂北诸地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其部队有廖磊的豫鄂皖边区游击总队(辖第7、第48军)、张自忠第33集团军(辖第55、第59、第77军)、李品仙第二集团军(辖第84、第39军)、孙震第22集团军(辖第41、第45军)、王钻绪第29集团军(辖第44军),兵力有2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保安部队。

第八战区,辖甘宁青及绥远诸地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其部队有马鸿宾第17集团军(辖第81军和第168师)、门炳岳第7集团军(辖骑兵第6军),以及战区直辖第80、第82、骑5、骑2、新2军和191师。兵力有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保安部队。

第九战区,辖湘、鄂南和赣之一部。司令长官陈诚,由薛岳代理。部队有罗卓英第19集团军(辖第79、第49、第70、第78、第32军),周晷第31集团军(辖第13、第18、第92、第37、第52军)、樊松甫的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辖第8、第73军)、龙云第一集团军(辖第58、第60、新3军)、杨森第27集团军(辖第20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辖第72军);商震第20集团军(辖第54、第53、第87军),以及战区直辖第74军。兵力有53个步兵师,以及其他特种、游击部队。

第十战区,辖陕西之一部,司令长官蒋鼎文。部队有蒋鼎文兼任总司令的第34集团军(辖第27、第90军),战区直辖第16军。兵力有9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以及其他特种、保安部队。

鲁苏战区,辖苏北及山东,总司令于学忠。部队有第51、第89、第57军和一支游击总队。兵力有7个步兵师,以及其他特种、保安部队。

冀察战区、辖冀察方面,总司令鹿钟麟。部队有第99、第69、新5军和河北民团。兵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以及其他特种、游击部队。

蒋介石除了重新划分战区外,撤销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重新设立桂林和天水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同时,在沦陷区设立战场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各沦陷区设立分会,其任务是“发动民众对敌全面抗战,并消灭伪组织,阻止敌政治、经济、文化之侵略”。

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其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蒋介石虽然也提出“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但他这只是“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而将大部队调去整训,保存实力。这样一来。日军和蒋介石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和业已形成的客观态势出发,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摆在抗日战争主要战场的地位。

实际上，中国抗日战争从广州、武汉陷落后，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

这一阶段的抗日战争更加呈现犬牙交错形态。中国军民从“七·七”事变后，经过一年多的奋力抗战，日军的兵力已大量消耗。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的兵力越来越分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敌后根据地的相继建立，使日军的后方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由于军费支出的剧增，租税日重，使日本国内人民厌战的心理日增；战争的长期化，使其军事进攻的锐气大受挫折，日军上下都有泥足深陷之感，各种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

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表明日军“速战速胜”的方针彻底破产。日军本来采用的是“闪电战”，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侵占南京前，他们便估计“南京的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投降”。尔后断言攻占徐州，会促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或瓦解；后来又寄希望于占领广州、武汉而征服中国。日寇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其进攻的主要矛头是针对于国民党，其口号是“反蒋反共”，或“灭党（国民党）剿共”。

日本陆军在“七·七”事变前只有 17 个师团，但到了 1938 年底扩充到 34 个师团，4 个独立混成旅团，并把其中的 31 个师团和 4 个混成旅团近 100 万兵力用于中国战场，占日军全部兵力的 94% 以上，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占据了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主要的点和线。中国军队仍控制着绝大部分领土，它原有主力并没有被消灭，新的主力军即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成长起来。而此时的日军伤亡已达 40 万人，损失飞机 700 余架，舰艇 100 艘，消耗了大量的各种军用物资。日军的锐气日减，士气低落，已深感战争的烦闷和疲惫。

日军在后方占领区，虽有 10 余个师团和 4 个独立混成旅团担任驻守和警备，但只能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成为大海中的孤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它的生存正在受到严重威胁。正面战线无力再发动战略进攻，后方地区又不断丢失，日本侵略者处于两头失控的艰难局面。

1938 年 7 月，日军在苏联边境挑衅，受到苏军的猛烈反击，双方在张鼓峰发生较大规模的战斗，日军死伤 1400 余人，遭以惨重失败。1939 年 5 月，日军又挑起诺蒙坎事件，先后出动五六万部队向苏军进攻，经过 3 个月战斗，被歼 1.89 万人。从此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敢轻举妄动了。日本侵华战争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中产阶级动摇，知识分子烦闷，国内厌战思想和反战运动日益高涨。

日本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入超增加，海外市场开始缩小，国内黄金储备逐年减少。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刺激物价上升，通货膨胀。而民用工业原料匮乏，电力不足，生产陷于停滞状态，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剧增。青年壮年被抽去当兵，农村劳动力不足，粮食减产，农民债台高筑，广大人民生活日益陷入困境。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困难和矛盾，迫使日本侵略者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改变其侵华的策略和政策，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蒋介石政府的“争取”和诱降活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的政策由过去的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侵略战争失利的情况下，谋求以政治进攻、诱降谋略灭亡中国。并分裂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蒋介石派的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共产

党，停止或减弱向蒋介石的中央军进攻，从政治上鼓励他们进行反共活动。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 1938 年 11 月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其作战方针是：“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并规定：华中方面，参加武汉会战的部队除在安庆上游留下 6 个师团基干兵力外，其他主要部队调往华北方面。日本侵略者改变了过去轻视共产党和只以第二等部队对付其后方的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现在要转移其主力来对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

日军在华北方面原有第 1 军、驻蒙军，现增设了第 12 军。

从华中、华南调来第 5、第 10、第 27 师团等部队。1939 年 2 月，又在华北增加 5 个独立混成旅。同年 4 月，又从日本本土调来第 32、第 35、第 36、第 37 师团。

1939 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之日军，即占其侵华总兵力的 64%。日军制定“治安肃正计划”，以“巩固点（城市）线（铁路、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首先缩小平原游击区，扩大其占领区，并攫取平原地带的人力、物力，作为进攻山岳地带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尔后实行分区“扫荡”，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并大肆修筑铁路、公路、碉堡和据点，实行“囚笼政策”。

日军在华北，在公路上每隔 10 余里，在铁路上每隔 2—3 里便设一据点；在湖泊地区则挖新的河沟，把我根据地分割成不相联结的若干小块。日寇利用“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以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我游击队的所谓“牛刀子战术”，“竭泽而渔”的所谓“掏水战术”，集中一路优势兵力深入急袭我中心地区的所谓“单刀直入”战术，妄图以此来消灭我八路军、新四军。

## 第四十三章 百团大战

八路军 115 师在平型关战役后，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以山西、察哈尔、河北 3 省交界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120 师在晋北管涔山脉地区，开辟了晋绥根据地。129 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建立了晋冀豫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建立了根据地。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扩建了陕甘宁根据地。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撤到晋西，后来又撤过黄河，到了宜川。至此，晋察冀 3 省边界完全被分割在敌后。

平型关战役后，115 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北地区，留下杨成武的独立团和骑兵团、教导队的两个分队、总部特务团政治处、供给处和 1 个营部又两个连、343 旅工作团，以及 120 师 359 旅工作团、685 团 1 个连和随营学校，总计 3000 人。这支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各支小部队广泛出击，大刀阔斧地开拓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杨成武的独立团夜袭涞源城，守城日军仓皇溃逃，涞源遂告光复。随后又进行了冯家沟伏击战，以小的代价，毙伤 300 余名日军，并乘胜收复了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原、易县等县城。尔后向平西、平绥路和平汉

路北段挺进，在晋察边区的北部解放了一大片地区。杨成武的独立团由出征时的 1700 余人，发展到 7000 余人。八路军总部将杨成武的独立团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 1 师，另外还组建了游击支队和县大队。

聂荣臻派出的另外几支小部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由赵尔陆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活跃在五台山以西地区。

由王平等人率领的 120 师 359 旅工作团和刘云彪率领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会，建立了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稳定下来。

由周建屏和刘道生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在平山建立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平山团，并在井陘、获鹿、正定、平定、阳泉、寿阳等地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

共产党延安总部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军区下设 4 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邓华；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政委王平；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生。

1938 年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宋邵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晋察冀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很快连成一片，面积达 20 余万平方公里，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到 80 余县，人口约 1200 万。山地和平原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便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

晋察冀根据地举世瞩目。大后方民主人士和国际朋友纷纷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惊奇地提出：“怎么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八路军积极抗战，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日本鬼子已经打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了，他们吃睡都不安宁，八路军来了，他们就吃得香，睡得甜了。”在一些偏僻的深山区内的高山峡谷里，过去人民和外界隔绝，形成了一个独立世界。

如房山、宛平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几十个村子，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

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那里，清朝、民国的统治都始终没有进入这一地区。

八路军来了，抗日政府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帮助他们的子女读书学文化，八路军医疗队免费为老百姓看病。他们说，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八路军的后方机关钻进这些深山沟，老百姓热情欢迎。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日军不敢贸然突进，“扫荡”又往往扑空。汉奸、特务、土匪也无法在根据地活动。日军 101 师团长桑木说：“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日寇在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春，调集重兵，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多路进攻和围攻，结果次次失败。1938 年秋，日寇为实现“南取广州，中取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集中 101 师团、109 师团、26 师团和独立第 2、第 3、第 4 混成旅团，共计 5 万多人，采取

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五台和冀西山区进行围攻。在 48 天中，边区军民同日军共进行了大小战斗 130 余次，毙伤日军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 5200 余人。日军“北围五台”成为梦幻泡影，落了个损兵折将的下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

中共中央派原红军团长孟庆山回冀中平原的高阳、蠡县、安新、任丘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很快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孟担任中共河北省保属特委和军委书记。

原东北军 53 军第 691 团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在国民党军队狼狈败退的时候，率部回师北上，进入冀中地区，受到孟庆山等人欢迎，这支部队改编为人民抗日自卫军，部队由 1000 人发展 4000 多人。吕正操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率领自卫军两个团和两个支队到冀西整训，其余部队留下编为游击军，由孟庆山任司令员。

人民自卫军整训后返回冀中，在短短的 3 个月中基本肃清了冀中腹地的土匪、汉奸、联庄、会道门等复杂的地方反动武装。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 3.6 万多人，根据地扩展到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辽阔富饶千里的冀中平原都为抗日武装控制起来，并建立了 38 个县的抗日政权，成立了冀中区的政权机关——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吕正操为公署主任。冀中部队改编为第 3 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为纵队副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副司令员，王平为纵队政委兼军区政委。

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4 月，日寇集中优势兵力，用“鲸吞”式的围攻对冀中根据地连续进行了 5 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冀中部队连续击溃日寇的两次“围攻”。八路军 120 师抵达冀中，此时，敌人的第三次围攻开始，120 师同冀中部队配合，连续击溃日寇的 3 次围攻。

冀中军民在 5 次反“围攻”战役和反“分散扫荡”中，对敌作战 322 次，毙伤日伪军 4440 人，俘日军 12 人，俘伪军 1310 人，缴获步枪 1122 支及大量军用物资。冀中的抗日武装力量已发展到 6.3 万人，拥有步枪 5 万枝，各种机枪 515 挺，迫击炮 21 门，野炮 3 门，平射炮 2 门。另外还组织了大量的游击队和民兵。

在冀中抗日武装迅速发展的同时，北平郊区和河北其它地区的群众抗日斗争力量也迅速发展起来。活动在北平郊区和平绥路一带的平西抗日武装，攻克了德胜门外北平第二监狱，救出受难同胞 200 余人。中共直南特委在内黄、濮县、滑县等地，成立了以唐哲民为司令的抗日游击队。正太路和阳泉煤矿的工人，组成了工人游击队，活动在太谷、榆次地区。

共产党员、北平大学教授杨秀峰在赞皇、元氏一带成立了“河北民军冀西游击队”。

中共磁县特委成立了抗日政府，建立了民军第 4、第 13、第 14 支队、磁县警备队、抗日义勇军平汉纵队。

在冀东地区，共产党员李运昌等以开滦煤矿工人为主体的，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开展了游击战争。

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控制了 9 个县，有 1.5 万余人。

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的 120 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的 1 个支队，在平西组成八路军第 4 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向冀东挺进。第 4 纵队越过白河，进军冀东，连克延庆、昌平。4 纵队的 1 个大



队在昌平、滦平、密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开创北平根据地打下了基础。4纵队又配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冀东各县发动抗日大起义，攻占了玉田、乐亭、芦龙、蓟县、平谷、迁安等县城，捣毁了伪政权。抗日武装达10余万人，共产党的部队约4万人。

在山东，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攻入牟平县，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3军。掖县、蓬莱、黄县的地下党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胶东各地起义部队整编为第4路，共7000余人，由第3军军委会领导。共产党还帮助范筑先（原国民党山东第六区专署专员）将鲁西北的游杂武装改编为30个支队。中共鲁西北特委还独立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编为范部的第10支队。1938年1至5月，山东人民抗日武装作战百余次，解放了肥城、长山、邹平、淄川、盐山，乐陵、博山等15座县城，声威大振。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4万人。

1939年5月初，日军第109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约5000人，多路向台怀等地合击，并企图控制各地要点，“扫荡”五台山根据地。我军灵活使用游击战术，寻机歼敌。

5月14日，正在豆村镇附近进行整训的贺龙师第359旅一部，在上下腰涧附近与正在撤退之敌展开激战，歼敌千余人。易县之敌占领大龙华，涞源之敌占领上庄，企图修筑易县到涞源公路，断我平西与北岳区之联系。5月20日，我军强袭大龙华之敌，歼敌数百人。此后，敌又集中4000余人向易县、满城、徐水一带“扫荡”。我军经20余天战斗，歼敌1000余人，粉碎了敌之“扫荡”。

9月25日，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协同部分伪军共1500余人，侵占灵寿西北之陈庄。

是时，从冀中调至北岳区的贺龙第120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力战该敌。120师主力进抵陈庄附近，以一部袭扰陈庄之敌，主力在东西寺家庄和冯沟里设伏。敌向东撤退，陷入我军包围。我军立即向敌发动总攻，将1500余人敌军全歼，毙敌独立混成第9旅团长水原。

这年深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阜平青山村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杨成武风尘仆仆地从前线来到会场，报告说：“坐镇张家口的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派过村宪吉大佐率领日军第一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及伪军1000余人，已经进驻涞源县城。并有经白石口、鼻子岭向我银坊镇地区扫荡的迹象。”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关向应决定歼灭这股敌人，于是布下阵地，诱敌歼之。

骄傲狂妄的过村大佐，为“天皇”立功心切，率领日军600余人，行军和休息不派警戒，对两侧也不搜索，竟大摇大摆地向前急进。其先头部队进到雁宿崖与张家坟之间时，已开始入杨成武部队的伏击圈。我军向敌军展开一场激烈的拚杀，600余名日军除13人当了俘虏外，其余日军的尸体散布在山谷里。

骄横成性的日军一旦吃了亏，总是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我军立即重新布阵，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以1个支队在银坊镇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时，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贺龙的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参加战斗。

阿部规秀统领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又是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盛誉的将军。他擅长运用“新战术”，被称为

“山地战专家”的“俊才”。

他以伪“蒙疆驻屯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日军的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中将够得上荣膺师团长之职了。阿部还担任北线进攻边区总指挥。辻村宪吉大队被歼，他便于第2天亲率1500余人的“精锐之师”，沿着辻村宪吉走的旧路，进行报复性的“扫荡”。

11月5日，阿部规秀率部向白石口前进，受我军引诱，于次日进入黄土岭一线，我军将其包围。7日下午，我军伏兵四起，向敌军猛烈冲杀。敌军受到突然袭击，阵势大乱，急忙占据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我军紧缩包围圈，同敌军展开激烈的山头争夺战。

阿部规秀被我军发射的炮弹击毙。日军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几次突围，均被我军击退。日军用飞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又派110师团和26师团，前来增援，企图在我军包围圈外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我军将阿部规秀大部歼灭后立即跳出包围圈，脱离战场。

黄土岭战斗历时6天，共歼日军1500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和军事物资。

阿部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阵亡公报。在华北战场上，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还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

八路军刘伯承129师，根据毛泽东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立即开往山西前线，大刀阔斧地开创根据地。1938年2月，日寇集中3万人，向晋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不战而溃。八路军英勇出击，寻机歼敌，在井陘至阳关一带歼日军1个加强中队后，即转师南下，于3月16日袭击黎城，设伏神头，迅速干脆地歼灭了由潞城出援之敌1500余人。尔后又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布下伏兵，将由黎城东开的敌汽车180余辆全部烧毁，全歼其掩护部队4000余人。

刘伯承129师主力三战三捷，日军感到对它威胁太大，于4月初集中3万多人，兵分9路围攻，合击129师主力，刘伯承、徐向前率部转出敌人的合击圈，于4月16日，在武乡长乐村地区抓住敌军一路，经过一天激战，歼敌2000余人，给日军108师团以严重打击，其他各路敌军即纷纷回窜。我军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将日寇赶出晋东南。

从1937年冬至1940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地创建并发展起来。东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

1938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在此后的一年内，山东纵队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伪军4.1万余人，克复过县城和重要市镇20余座。

罗荣桓率领115师1个旅进入冀鲁边和微山湖等地区，使山东抗日斗争的局面为之一新。115师在鲁西、泰西、冀鲁边、湖西、鲁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鲁南山区多为地主和土匪武装所盘踞，传称司令的就有72个之多。他们多数接受国民党委任，称霸一方，欺压百姓，鱼肉乡里。其中还有一些与日寇密切勾结，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1939年8月1日，田敏江带领600余日军，前有汉奸、骑兵开道，后边用两门10多匹骡马拖的野炮压尾，中间步兵排成3路纵队，大模大样地向北取道靳口，朝梁山地区进犯。

115师东进支队几个连的兵力，在青纱帐里设下埋伏，日军来到那里，

经过一场激战，全歼来敌。

梁山战斗后，敌军恼羞成怒，纠集 5000 多人，分乘 160 余辆汽车、坦克向梁山驰进。

我军民依托青纱帐，沿途游击敌人，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击毙敌 200 余人，击毁汽车 10 辆，坦克 3 辆，日军狼狈撤回。

在费县西部的白彦镇，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中间，是汉奸孙鹤龄的老窝和日军控制鲁南山区的重要据点。115 师调集 686 团、特务团、苏鲁支队等向白彦镇之敌发起猛攻。

摧毁了白彦镇及其周围的据点。敌人受此打击后，集中兵力，连续数次向白彦进攻，双方反复进行争夺，在 14 个昼夜的 3 次激烈争夺战中，共毙伤日伪军 800 余人。

日军不甘心失败，集中第 32、第 21 师团和独立第 6、第 10 混合旅团各一部，共 8000 余人，分多路向犭崮山区根据地地进行大规模的合围和梳篦“扫荡”，敌人大有一口鲸吞鲁南根据地之势。

我军民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大小战斗 30 余次，毙伤敌军 2200 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0 年底，115 师的 1 个旅发展到 7 个旅，共 6 万余人；山东纵队也发展到 5 个旅又 2 个支队，共 5 万余人。在山东建立了 14 个专员公署和 95 个县的民主政权。

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在 1940 年 7 月准备组织一次交通大破袭战。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 3 人签发了预备命令，规定的战役目标：一是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拔除该地区若干据点，开展正太路沿线两侧的工作，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二是打破日寇进犯西安的企图，影响全国战局。

正（定）太（原）路全长 249 公里，横贯太行山脉，是华北敌人重要战略交通线。在这条线路上，有日寇侵略战争所不可缺少的炼铁用煤基地阳泉和井陘煤矿。日寇第 4、第 8、第 9 混成旅团，分布在正太铁路沿线 50 个据点担任守备，还经常派装甲车巡逻。日军说正太路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八路军除破袭正太路外，还要破袭彰德以北的平汉路，归绥以东的平绥路，临汾以北的同蒲路，德州以北的津浦路、白晋路、德石路、北宁路、平古路等。这些交通线和地区驻有日军 3 个师团、5 个独立混成旅团、2 个联队、2 个骑兵大队、2 个步兵大队，计 20 万人，另有伪军 15 万人。

8 月 20 日 20 时，八路军各部队开始向华北地区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击战。

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参战的部队共计有 104 个团，20 余万人，另有近 30 万民兵和群众参战，左权根据参战部队数目，称之为“百团大战”。

聂荣臻指挥 19 个团又 5 个游击支队和 3 个独立营，组成左、中、右纵队。右纵队的作战任务是破袭乱柳至娘子关段，奏效后向阳泉方向扩大战果；中央纵队指向娘子关至微水段及井陘煤矿；左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据点。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及 129 师部队，组成左、右翼破击队和总预备队，对正太路西段日军展开攻击。

贺龙的 120 师，以 22 个团的兵力破击同蒲路大同至阳曲段、汾（阳）

离（石）公路全线。重点在阳曲南北，任务是阻敌向正太路增援。

总攻击开始，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队象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整个正太路线和同蒲路都陷于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攻占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陘煤矿敌人的战斗，尤为激烈。

天险娘子关在抗战前，阎锡山已构成了国防工事，日军侵占后，又依据险峻的山谷，在原有的工事前，加修了 34 个大堡垒。在娘子关下的村子里还驻守了伪军一部。战斗开始后，我军先潜入娘子关村，将伪军击毙，然后依托村庄向据险顽抗的日军进行强攻。

我军在日军浓密火力封锁下，前仆后继地向娘子关仰攻。架起的云梯被炮火打断了，就搭人梯上，用绑腿带连结起来，搭在悬崖攀登。日军据守有利地形，凭借优势武器，我军伤亡较大，正面攻击一时受挫。而由娘子关侧后迂回的部队，正好接近日军堡垒群附近，由翼侧向日军展开猛攻。

日军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乱，慌忙实施反扑，经激烈的肉搏拚杀，日军被歼一部。

我军乘势以手榴弹、手雷及缴获的爆破筒爆炸敌堡，经过 3 个小时的反复冲杀，终于夺取了日军的堡垒，攻占娘子关山头。黎明时分，据守娘子关的日军大部被歼，八路军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被日军盘踞 3 年的天险娘子关。

八路军进击井陘煤矿的部队，事先已同矿区工人取得联系，在工人的配合下，进攻前就切断了矿区电源，靠夜幕掩护，向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经过一夜激战，于黎明即将敌人全歼，并夺回了东王舍新矿，对厂房、矿井给予彻底破坏，使其在半年多不能恢复生产，日军不能掠夺煤炭。

聂荣臻部破坏了正太路东段铁路，连续攻克娘子关、井陘、苇泽关、贾元、头泉等车站和据点、毙敌 1000 余人。冀中参战民工，一夜之间破坏了全部公路，冀东民工把七八个县内敌人的公路、电线，破坏得一干二净。使日寇变得道路不通，电话不灵。

刘伯承、邓小平部的各破击部队，乘夜暗绕过日军外围据点。对正太路西段铁路线上守备之敌猛攻。部队行动隐蔽，战斗动作勇猛突然，使日军措手不及，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芦家庄、和尚足、马首、桑掌等车站，歼敌有生力量。至 8 月 25 日，正太路西段，除少数据点外，已被我军控制。日军多次组织反扑，八路军在 10 多天内击毙反扑日军 1100 余人。

贺龙部夜袭同蒲路的一切据点，又于 21 日夜强袭忻（县）静（乐）公路重要据点康家会，全歼守敌。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延续 20 余天，到 9 月 10 日共歼日伪军 7000 余人，攻克日军据点 91 座，破坏铁路 300 余公里、公路 700 余公里，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完成了预定的计划。

## 第四十四章 新四军建立

9 月 16 日，八路军总部发出《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命令贺龙

第 120 师集结主力彻底破坏宁武至轩岗段铁路，截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聂荣臻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坏涞（源）灵（丘）公路，并夺取涞源、灵丘两城，以打开边区的局面，另以有力之一部于同蒲铁路东侧积极行动，配合贺龙部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第 129 师集结主力进行榆辽作战，收复榆社、辽县两城。9 月 20 日开始第二阶段作战。

聂荣臻部主力迅速由正太路北进，执行涞灵作战任务。涞源、灵丘地区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团和第 26 师团各一部，计 1500 余人，另有伪军 1000 余人。敌人的一些据点已经深入到抗日边区内部。9 月 22 日，杨成武率部队奇袭涞源城，经过一夜激战，1 团攻占了城关东、西、南三面，大部守敌退进城内防守。2 团、3 团在进攻时，遭敌猛烈反击和施放毒气。杨成武改变部署，由 1 团 2 团的一部攻击涞源城东的敌三甲村据点。这个据点工事坚固，守敌有日伪军 80 余人。

23 日晚，我军以炮兵配合，猛攻敌人碉堡，冲进村庄，激战数小时，将守敌全部歼灭。

我军第 3 团集中力量攻击东团堡，这是由日军士官组成的井田部队，抵抗十分顽强，并不断施放毒气弹。我军勇猛冲击，激战 1 昼夜，残敌退出堡垒，凭村几间房屋死守，并继续施放毒气，组织反扑。我军干部战士几度苦战，伤亡很大，不少人中毒，不得不撤到村边。

25 日下午，我军再度发起猛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经反复冲杀，敌人支持不住，又不愿投降，遂将据点所存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纵火焚烧，然后跳火自尽。

聂荣臻部先后攻克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据点，并袭击了金峰店、黄台寺等地日军。

刘伯承、邓小平部发动了榆辽战斗。榆辽公路处太行山腹地，是日军切开太行山根据地的刀子，一路修的全是碉堡，粮食弹药很多。刘、邓部一路攻坚打过去。那榆社守敌 400 余人，以坚固碉堡和有利地形顽抗。刘邓部把几架梯子绑在一起，战士头顶湿了水的棉被，勇猛爬到碉堡上，一下捂住枪洞，将敌人火力压住，部队随即冲过去，同敌展开白刃战。工兵从大碉堡下面往上挖洞，用炸药把碉堡和工事全部炸飞。敌人 400 余人被全歼。

冀南军区部队、太行和太岳部队，对各交通线展开连续破击，并袭入长治机场。

晋西北破袭了同蒲路忻县至朔县段，一度控制了朔县至原平间的铁路。

百团大战一、二阶段打了一个半月，华北日军大乱，伪军大动摇，成批投降。日军没想到八路军有如此力量和手段，恼羞成怒，急忙拼凑调遣兵力，集结十几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向我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报复“扫荡”。

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部队进入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作战，挟胜势再歼来犯之敌。

敌第 36 师团、独立混成第 4 旅团各一部近万人，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榆社、辽县、武乡区进行连续“扫荡”，企图打击八路军总部等指挥机关和第 129 师主力。

我 129 师各部英勇地展开反“扫荡”作战。新编第 10 旅一部于和（顺）辽（县）公路之弓家沟设伏，歼灭日军一支运输队，击毁日军汽车 40 余辆。日军从水腰奔左会，我军拦腰一顿猛打，日军大乱，收拾队伍后再奔，又被

我军追击。日军奔到关家垸一带山地，已狼狈不堪。我 129 师主力将日军包围于关家垸高地，炮兵对日军的前沿阵地猛轰，然后向日军冲锋肉搏，逐渐缩小包围圈，日军伤亡殆尽。

日军第 36 师团、第 41 师团、独立混成第 9 旅团各一部，共约 7000 余人，分路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敌军所到之处，均遭我军沉重打击，遂分途撤退。

敌伪 1 万余人进攻晋察冀的平西、北岳等地区，我军民英勇作战，给敌伪以严重杀伤。

在晋西北、大青山、冀中、冀南等地，敌我均有局部“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多起，我抗日军民均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至 1940 年 12 月 5 日，历时 3 个半月的百团大战，遂告胜利结束。在整个战役中，共进行战斗 1824 次，毙伤日军 20645 人，伪军 5155 人，俘日军 281 人、伪军 18400 余人，日军投降 47 人，伪军反正 11845 人，拔除日伪据点 2993 个，破坏铁路 474 公里、公路 1500 余公里，车站、桥梁、隧道 260 余处，缴获各种火炮 53 门，长短枪 5600 余枝，轻重机枪 200 余挺，以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共收复县城 50 余座，得以巩固的有近 30 个。其中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等，太岳山区有沁源、浮山等，五台山区有阜平、灵邱、涞源等。

在晋西、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区均有县城收复和巩固。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伤亡 2.1 万余人。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数十万军民，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百团大战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粉碎日寇紧缩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和“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梦想。日寇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破产，而被撤职。日寇认识到，虽然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但共产党八路军是难以战胜的。

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军民欢欣鼓舞，国内空气为之一新。不仅震动了全中国，而且轰动了全世界。苏联、美国记者都作了连续报道。

东北的共产党组织，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早在 1936 年 6 月，中共南满在吉林省金川河里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南满省委，杨靖宇为省委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指挥，魏拯民任副指挥兼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下辖第 1、第 2 军，杨靖宇任第 1 军军长兼政委，王德泰任第 2 军军长、魏拯民为第 2 军政委。

抗联第一路军在西起辽沈，东至鸭绿江畔，北抵长（春）图（们）铁路的 30 余县广阔地域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这年冬天，日军调集南满 16 万人的日、伪联合部队，向辑安、临江、通化等县进行“冬季大讨伐”，宣称“剿灭南满红匪”，并悬赏通缉杨靖宇。杨靖宇为了使部队转移，自己率领警卫排 30 余名战士将敌人吸引到辑安县内。杨靖宇等藏在黄柏甸子附近的山中。

敌军封锁、搜山。杨靖宇等机智地利用一破房挖洞藏身。敌人几次搜查均未发现，但仍不甘心，继续封锁、搜山。洞内的粮食吃光了，又无法生火和觅食，严寒和饥饿威胁着 30 多人的生命，杨靖宇带头撕下衣服里的棉花充饥，终于渡过了 15 个日日夜夜。第 16 天，敌人颓丧地撤退。

“七·七”事变后，第一路军很快发展到1.5万人。不料在1938年6月29日，第1师师长程斌在敌伪诱降下率部叛变，不仅供出第一路军的行动计划、部队的实力、活动特点、游击区建设等重要机密，而且派人到抗联策反，并为日伪军带路“讨伐”。第一路军为摆脱敌人包围，将部队转移到东部山区。

1939年，杨靖宇的第一路军先后奇袭桦甸，攻克辉南县、安图县、并围城打援，伏击敌人。这一年毙伤日伪军数千人，缴获各种步枪3000余枝，手枪百余枝、轻重机枪30余挺。

1937年秋，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赵尚志为副总指挥，辖第4、第5、第7、第8、第10军，和救世军、义勇军。第二路军的活动范围西起哈（尔滨）长（春）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吉林省东部地区。

日本关东军纠集2.5万人“讨伐”宝清县内的抗联部队，抗联第5军第3师第38团一连共16人，于炭窑沟里头道卡子阻击日伪骑兵400余人。激战一日，歼灭日伪军100余人。

毙战马90余匹。我1连连长以下12人壮烈牺牲。战后，头道卡子被第5军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1938年6月底，第二路军向五常、舒兰方向西征失利。8月下旬，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叛变，给部队带来很大危害。第5军进入五常境后，被强敌追击，遂突围东返牡丹江地区。第4、第5军之妇女团东返时，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与日伪军“讨伐”队遭遇，指导员冷云率7名女战士掩护大队突围，弹尽援绝，宁死不屈，毅然跳入乌斯浑河激流中，这便是著名的英勇悲壮的“八女投江”。

1939年3月，日伪军6000余人“讨伐”抗联第二路军。周保中在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沟里召开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主力分路向外线转移的决定。4月初，部队开始向蛟河、舒兰地区移动。途中与日军伪军发生两次战斗，毙日伪军400余人。第二路军转移后，与第一路军取得联系，协同抗日。

1939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第3、第6、第9、第11军合编为第三路军，李兆麟为总指挥，冯仲云为政委。第三路军1.6万余人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的广阔地区，控制30余县。第三路军是一支英勇善战、敌人闻之惊心丧胆的部队，被日寇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

第3军仅在1938年就同日伪军作战427次，毙伤日伪军7600余人。第6军在汤原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了下江人民政府，日寇惊呼：“汤原地皮红透三尺！”1937年3月，关东军纠集1000多日军、2000余伪军，并有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血洗汤原。是时，第6军参谋长冯治刚率领100余人留守在汤原附近，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仍决定乘敌未站稳脚跟之际，夜袭汤原。我地下党先派十几人打入城内，作里应准备。4月7日晚10时，冯治刚100余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城。里应外合激战通宵，攻进汤原县城，伪警察署被缴械，全歼县守备队，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当场毙命。缴获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500余枝，子弹5万余发，并从监狱内救出300多人。

抗日联军神出鬼没，到处打击敌人。东北抗日联军12支队30多人夜袭肇源县城，从城西角翻过城墙，袭击县公署，解决200余名伪警察，尔后

去攻打警察署。枪声在城里爆竹似地响起，城内日伪机关中的日军不是被毙便是被俘。抗日联军从监狱里放出百余名同志，部队即发展到 200 人并缴获了 300 余匹战马。黎明后，部队骑上战马，浩浩荡荡地离开肇源县城。

在江南活动的原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成新四军。

原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不断粉碎国民党部队残酷的围攻、屠杀、搜山，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活动在南方的已有浙南、闽北、闽东、闽南、闽西、赣东北、赣粤边、闽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豫南桐柏山和琼崖等 14 个游击队和游击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国民党不但不同意反而趁机变本加厉地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野蛮的“清剿”。蒋介石密令南方各省“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集 40 多个师、60 多个保安团，对南方 8 个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

1937 年 1 至 7 月，国民党军队采用碉堡封锁、放火烧山、移民并村、大规模的屠杀、制造无人区等手段，疯狂地进攻游击区。各个游击根据地遭敌人破坏后，变成一片废墟，遍地是白骨。但游击区是“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英勇的红军游击队和苏区人民同敌人展开了生死的搏斗。但是，到了 7 月 11 日，国民党军队突然停止了对游击区的进攻，并且撤走了。

负责领导南方各省游击队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陈毅等在赣粤边游击区的梅山斋坑，已经两年多没能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4 月中旬，由于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的陈宏被捕叛变，供出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以及项英、陈毅的活动情况和驻地。国民党军队悄然将梅山斋坑包围起来，项英等听到哨兵发出的鸣枪警报，拿起武器转到小山包上隐藏起来。300 余人的国民党兵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搜到一个人。他们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淋灭，再点火烧山，火点不着了。天近黄昏，敌人撤走。

项英、陈毅等转移到离斋坑 30 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起来。第二天，国民党军 4 个营把梅山包围起来，一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项英、陈毅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双，也没跳出包围圈，只到 7 月 11 日，才得解围。

项英、陈毅在报纸上看到大庾、南康、信丰 3 县的国民党县长联合发表的《告中共同志书》，其中有：“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爱国志士无限钦佩”等语。项英、陈毅等决定一面下山同国民党谈判；一面招兵买马，扩大部队，准备抗日。

陈毅先同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国民党 46 师代表和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尔后又同项英一起赴南昌同江西省政府谈判，在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 6 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时，项英得知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问题继续谈判，便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情况，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周恩来在“七·七”事变后，多次同蒋介石在谈判中谈及南方红军游



击队改编问题，双方同意南方游击队改编为 1 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一致。

7 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谈判后来上海，在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到上海的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已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估计由他出来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也许能够接受，于是便同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

叶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直接去见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建议。蒋介石果然同意，在没有同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些情况，项英、陈毅并不知道。直到 11 月初，叶挺去延安，毛泽东等欢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项英此时也到了延安，正式商定组建新四军问题。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后叛变）为东南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

陈毅、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在 10 月中旬奉命召集南方各省游击队下山整编。因各个游击队流动不定，活动地区广阔分散，又长期失去联络，要召集起来，是个很艰巨的工作。他们披星戴月地奔走在各个游击区，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说服游击队下山，因为有些游击队认为同“围剿”红军的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游击队当作“叛徒”杀害了。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戈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 16 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

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亲自去这些游击队。1937 年 11 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他们不认识陈毅，听陈毅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们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前不久，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个自称由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人，和游击队联系，他走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就跟着来搜山了。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所在地甘子山，被捆了起来，绑在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次日，陈毅被带到棚子外边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机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辩论。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

在以后的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来剿，反而撤退了。谭余保便派一个交通员去吉安了解情况。交通员从吉安新四军通讯处回来，带着中共中央文件，谭余保激动得潸然泪下，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1937 年 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 年 1 月 6 日移至南昌，军长叶挺，副军长项

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共辖4个支队，全军1万余人。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由湘鄂赣边游击队编成的第1团和由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游击队编成的第2团，共计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由闽西游击队、闽赣边游击队编成的第3团和闽西（一部）、闽南、浙南等游击队编成的第4团，计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五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由闽北游击队编成的第5团和由闽东游击队、闽北游击队（一部）编成的第6团，共计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由鄂豫皖边区游击队编成的第7团、第9团和由豫南桐柏山游击队编成的第8团，共计3160人。军部直属机关、部队980余人。新四军驰骋在大江南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食寝不安，汉奸组织闻风丧胆。

新四军在1938年4月下旬，从第1、第2、第3支队抽调一部分力量，组成先遣支队，在粟裕带领下向苏南敌后进军。陈毅率领第1支队、张鼎丞率第2支队，也挺进苏南。三军会合后，即向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展开，主要活动在南京、秣陵关、溧水之东北地区，以主力在茅山山脉及溧水一带，以天王寺以南的山地建立根据地。又以小部队向句容、溧水、南京之线游击，歼灭敌军，击毁汽车。

陈毅多次与丹阳抗日自卫团管文蔚联系，帮助管文蔚部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下设6个支队，委任管文蔚为司令员，派一批共产党干部到各支队工作，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使这支部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 第四十五章 激战太行

陈毅领导的部队，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之间，运用灵活机动游击战术，分散穿插转移，乘虚袭击敌人，在9至12月的4个月内，先后粉碎敌人大小“扫荡”20余次。

第3支队在1938年7月1日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至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60公里的狭长地带。第3支队以机动防御方式与敌周旋，多次歼灭日伪军。

高敬亭的第4支队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游击活动，多次伏击敌人。在桐城附近之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中，击毙日军70余人，毁汽车50余辆。在攻克无为、庐江的战斗中，肃清当地反动土顽武装3000余人。

第4支队第8团于1938年11月进入淮南路以东地区，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和党掌握的东北军挺进团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在皖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张云逸率领军部特务营过江后到达无为地区，将当地党组织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以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委。这支部队在皖中开展游击活动。

中共河南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队 300 余人挺进豫东，途中与第 3 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扩大为 3 个大队，1021 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游击支队东渡黄河，进入鹿邑境内，尔后开创位于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新黄河及淮河之间，包括豫东 13 县、皖北 8 县和苏北 3 县的豫皖苏边根据地。至 1939 年 11 月，游击支队发展到 9 个团，1.2 万人，改编为新四军第 6 支队。

1939 年 2 月，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1 月将第 1、第 2 支队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部队；江北的新四军部队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徐海东兼任第 4 支队司令员；另以第 8 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 5 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第 4、第 5 支队发展到 1 万人，在淮南地区和以半塔集为中心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并很快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

中原局在 1939 年春先后派李先念、陈少敏各率一支武装和一批干部，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联络各地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了信阳四望山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至 1940 年夏，独立游击队对日伪军作战 280 余次，歼敌 1.4 余万人，创建了鄂中、鄂东和豫南抗日根据地，游击武装力量发展到 1.5 万人，并拥有民兵近 10 万人。成立了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朱理治任书记，统一领导豫鄂边区的党政军民工作。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将华北、华中打成一片的战略部署，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确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日军扫荡，坚持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南党的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统战工作；另组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由项英任书记，继续领导新四军军部和苏南、皖南的抗日斗争。

中共在广东东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等地开辟了华南抗日根据地，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从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4 月，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 400 余次，毙伤敌人 1 万余人，缴获步枪 3000 余枝，轻重机枪 100 余挺，毁敌汽车 500 余辆。1938 年 5 至 10 月，同敌战斗约 1000 余次，毙伤敌人 2 万多，缴获步马枪 8000 余枝，轻重机枪 150 挺，毁汽车 800 余辆。

至 1938 年 10 月，共产党的部队已发展到 25 万人。到 1939 年，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 50 多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 80 万人，民兵发展到 100 万人。

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区迅速发展。蒋介石恐慌起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将其政策转到反共反人民方面。他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1939 年 5 月 7 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

为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挥原则”。

蒋介石制定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其核心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

他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蒋介石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东起黄河，西至甘肃的西峰镇长达700余里，构筑了纵深堡垒群。用陆空军配合，占领了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部队，准备进犯延安。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在山东，顽固派响应蒋介石号召，叫嚣说“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对八路军实行“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的手段，端的厉害。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是沈鸿烈，二是秦启荣。沈鸿烈是蒋介石任命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提出的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秦启荣是国民党别动纵队第5纵队司令。

1939年3月下旬，沈鸿烈唆使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3000余人，于博（山）益（都）边之太河镇，伏击我山东纵队第3支队过路的干部和掩护部队，杀害我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以下指战员400余人，造成“博山惨案”。8月上旬，秦启荣在莱芜的雪野地方，乘我第4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之机，指挥顽军向我后方合击，造成“雪野事件”。

8月中旬，在淄河流域又发生围攻我第3、第4支队10余天的“淄河事件”。仅在6至12月，山东顽军向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余次，杀我军民1350余人，扣押干部、战士近1000人。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经过几天的连续反击作战，解放了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部击溃，其残部逃至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东北车第111师，不满国民党政府反共、投降政策，光荣起义转为人民武装。

毛泽东同新闻记者谈话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蒋介石委任反共专家张荫梧为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密令冀中民军的3个团长把部队拉走，袭击冀中军区特务营，还将民军中思想进步、坚持抗日的警卫营包围缴械。尔后，把主张抗日的张仲瀚司令排挤出民军。张仲瀚便参加了八路军。张荫梧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名义，委派他的老乡、旧友张存实为民军司令。殊不知张存实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就任民军司令后，便把这支部队改造为八路军，少数顽固分子偷偷率部下去投靠张荫梧。

张荫梧命他的副司令率3000多人，进攻安国、博野、蠡县等地区，结果全被八路军俘获。1939年6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亲自带领3000余人，偷袭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因八路军主力正在同日军作战，后方空虚。张荫梧连夜将后方机关包围，惨杀八路军官兵400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深县事件”。吕正操率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获张部旅长以下2000余人，张荫梧只率10余人逃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特务营包围了新四军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打死通讯处主任涂正坤，活埋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造成平江惨案。延安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抗议国民党当局惨杀我官兵，为平

江惨案被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

八路军的总部在太行山。蒋介石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鹿钟麟和河北省政府机关进驻南宫，在冀南掀起“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1938年10月底，鹿钟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以及对他不尊重为由，撤销赵鼎新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的混乱局面。不久，日寇对冀南进行“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徐向前率部对日寇反“扫荡”，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宣布撤销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徐向前以巧妙的方法回击，派一营兵力以“保护”鹿主席为名义进驻南宫，保卫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鹿钟麟对此无可奈何。

鹿钟麟与山东沈鸿烈串通一气，合作反共，妄图把八路军挤出冀南。鲁西北的聊城市有一支武装，县长范筑先是山东省第6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的部队有30多个支队，号称铁军。鹿钟麟、沈鸿烈要把这支武装改编为与八路军对抗的队伍。其实，徐向前早就做了联合范筑先的工作，鹿、沈终未得逞。

国民党军中也有不赞成搞“摩擦”的，于是出现了微妙的事情。

1939年11月，彭德怀准备从延安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毛泽东同他彻夜长谈，要他对国民党军的磨擦，有理、有节、有威，多一分则太过，少一分则太弱，太极柔韧，柔中藏刚，充分展示优秀的东方智慧。

彭德怀告别毛泽东去太行山。这位性格耿直的将军乘坐大卡车行驶，寒风萧索，天和地显出亘古如斯的苍凉。遥远的地方似乎有隐隐的炮声。大卡车轰轰隆隆地向前开，颠簸得很厉害。车至三原，前面忽然爆出一声断喝：“停车！”车煞住了，见路上有两名特务举着手枪拦住去路。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那两个特务说：“要检查，要搜车。”彭德怀的警卫说：“这是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的车。”“管你什么车，就是要检查！”“车上是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司令！”“就是要查，不给查就扣车！”彭德怀大怒：“你们想干啥！是谁的命令要查我的车？是蒋委员长还是程潜主任？”特务还想要横，彭德怀大吼一声：“给我抓起来！”警卫们立即跳下车，下了两个特务的枪。两个特务这才慌了手脚，面色如土，以为必死无疑。

彭德怀说：“我不枪毙你们，我要当面把你们交给程潜主任，问问到底是谁命令你们要查我的车的。”特务求饶说：“我们有眼无珠，求彭副司令放了我们的。”彭德怀命令：“开车！”车到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出来迎接彭德怀，见抓了两个特务，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彭道：“这是我准备送行辕主任程潜的礼物。”林伯渠问明缘由，道：“把这两个人交给程潜，事情闹出去，若蒋介石知道了，这样有无不妥。”彭说：“我就是要闹出去。现在蒋介石和我们“摩擦”不断，我这一次是政治侦察，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敢不敢打内战。”彭德怀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让警卫押着两个特务，一起去见程潜。程潜见彭德怀押来两个人，大惊，问这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两个证人，他们要搜查我的车，我想问问这是谁的命令，是委员长的命令还是你程主任的命令？”程潜满脸陪笑道：“彭先生多心了，这一定是误会。”“人都抓来了，还有什么误会！问问他们，是奉了谁的命令？不说，我就把他们枪毙了。”特务碍不过，只好照实说：“是奉了何绍南的命令。”何绍南是绥德地区的专员，一个极为仇恨共产党和八路

军的顽固分子，他在陕北一带专事袭扰八路军的勾当。

彭德怀道：“程主任，你听见了吧？现在中国有一个汪精卫投降日本当了汉奸，他是站在明处，暗处却还有无数秘密的汪精卫，这些顽固分子就是秘密的汪精卫！”正说着，那何绍南凑巧从外面走进来。他见到彭德怀，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十分狼狈。彭德怀眼快，道：“你何绍南站在那里干什么，过来我有话问你，你为什么命这两个特务拦我的车？你在陕北一共干了多少坏事？”何绍南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说一句话。

程潜忙打圆场说：“彭先生息怒，现在大敌当前，大家还是以大局为重，不要闹，闹起来不得了，那会闹成鱼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与你程主任的想法一样，可是这何绍南却不是这样想，他专干反共和破坏八路军的勾当。我今天来见你程主任，就是表明态度，我是主张好好团结一致抗日的，可是我也不怕顽固分子反共。”彭德怀看一眼何绍南：“今天我有话放在这里，谁要反共，他放第一枪，我放第二枪，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彭德怀在临走时依然怒气难消，他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这个汪精卫听着，你在陕北做尽坏事，已对人民犯了罪，你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彭德怀对林伯渠说：“我看程潜这位国民党元老是批准我的反摩擦行动了，他说打第三枪不对，意思就是不能干得太过分了。”林伯渠说：“程潜和卫立煌都是中间派，都不想弄得太过分，都怕内战打起来不得了。”彭德怀的大车从西安出发来到洛阳。卫立煌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请他吃饭，彭在酒席桌上畅抒己见。八路军（十八集团军）此时归卫立煌指挥，卫立煌劝彭德怀：“相忍为国。”彭道：“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么办？”“顽固分子毕竟不是多数呀。”卫立煌见彭德怀意志坚决，请他在洛阳多停留几天，要多请他吃饭，并不断重复“相忍为国”的话。

彭德怀心中明白，忍是不错的，但如果忍过了头，太行山根据地就会被顽固分子一口口吃掉，朱怀冰、石友三等人正在虎视眈眈，大规模进攻太行山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发生。他想起毛泽东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没有一次大的反摩擦行动，局面将会继续恶化。

次日，彭德怀在卫立煌处遇到了第5军军长孙殿英。孙的部队与朱怀冰、石友三为邻，如果打朱怀冰等，孙殿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孙是土匪出身，一身绿林气息，为人心性狡猾，思想敏捷，然而却不是顽固派。彭德怀想试探他对反“摩擦”的态度，便同他谈论起来。彭德怀说：“大敌当前，八路军意在专心杀日寇，可后面老有人扯后腿，这样怎么抗日？而且现在有人竟打起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的主意了，孙军长有什么看法？”孙殿英笑笑说：“你们八路军是会有办法对付的。”彭德怀见孙殿英话中有话，进一步试探说：“我还要请你孙军长帮忙。”孙殿英明白彭德怀的意思，道：“我按你们八路军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彭德怀以目光传达谢意，孙殿英心领神会，却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

彭德怀离开洛阳时，卫立煌设宴饯行，一再叮咛要忍耐些，一定要相忍为国。他送彭德怀很远的路，临别时说：“你过垣曲河以后，到第10军去，军长陈铁来电话，要请你吃饭。”彭德怀过了垣曲河，果见陈铁派来了迎接的队伍。他被迎进第10军军部，心想，我与陈铁素无交情，也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他这样热情可能是支持八路军的统一战线。

果然不出所料，陈铁热情招待彭德怀之后，便指着地图对彭德怀说：“彭先生，在你回去的路上，从垣曲河到阳城有15公里的隘路，悬崖绝壁，险

象四伏。你此行有多少人？”彭德怀道：“警卫班加上报务、译电员，总共十几个人。”陈铁又道：“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走路要小心些。”彭德怀点头，他告别陈铁，率十几人避开隘路，专拣无人走的地方爬山。天黑了，就在山头上露宿。彭德怀没睡，在晴朗的夜空中望着太行山。到了深夜，把报务员叫醒，架起小电台向八路军总部发电，命令部队向指定的地点集中，调动7个旅，准备采取反“摩擦”的军事行动。

天空微露曙色，他们立即出发，悄然无声地在险峻的山岭前进。

彭德怀回到八路军总部，即派秘使去见孙殿英，孙说：“即便在我尾后打，我的第5军也只关心操练的事。”彭德怀得到回话，即向7个旅的部队下达进攻命令。太行山里突然起了激战，一共打了3天，朱怀冰的两个师、侯如墉的一个旅、张荫梧的一个纵队，全被歼灭，一共除掉了顽固派的10个团。进攻太行山的顽军被扫除。

彭德怀就此止住，这便是按程潜的话说，不放第三枪。

## 第四十六章 “低调”阴谋

日寇在1937年11月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察南、晋北、绥远等地区。12月4日，又成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辖平津和华北等地区。

该伪政权抄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模式，设立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部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朱深任司法部部长，齐燮元任治安部部长，王揖唐任赈济部部长。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余杭县人，清末举人。他一生狂嫖滥赌，由于斫丧过度，使他两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镜，人称“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投靠北洋直系军阀，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成为直系的“夹袋人物”。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失败后，王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像一条丧家之犬，栖栖皇皇，逃往日本避难。“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沉渣泛起，王克敏回国。是时，张学良筹建北洋财政整理委员会，张自任委员长，任王克敏为副委员长。后王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务主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是王克敏的好友，黄以回南京述职为由，长期住在上海不回北平，委托王克敏代理委员长之职。日寇侵占平津之后，便策划在华北建立伪政权。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并未能看中他。

日本人选中曹锟、靳云鹏、吴佩孚那帮北洋派做傀儡，但未能如愿，便转而打王克敏的主意。是时，王克敏避居大连，日寇委派一名少将军官找王谈话，要他出来担任华北伪政权主席。王听后，一口答应，并飞往日本福冈同日军部负责人密商有关事项，由于王克敏卖国条件颇彻底，博得日寇华北派遣军的支持，跃登群奸之首，当上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把这个宝座视为命根，因而甘心当个卖国奴。

蒋介石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怒，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召来，气愤地说：“娘希匹，国难当头，王克敏卖国卖民，组建傀儡政权，为虎作伥，应严惩不贷。”戴笠即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电，要他克日赴平，积极部署，刺杀汉奸王克敏。

陈恭澍不敢怠慢，即化装成做钱币、邮票生意的天津盛大钱庄的老板，来到北平。

他通过北平的军统特务机关，很快摸清了王克敏的活动规律。但王克敏的警卫森严，一时无法下手，而戴笠的电报一封封地来催，使陈恭澍坐立不安，思考良久，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拼。

王克敏与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见面的地方是煤渣胡同 20 号。那里原是“平汉铁路俱乐部”，日寇侵占北平后，成了伪政权高级头目的消闲玩乐的场所。每周二下午 2 时，喜多诚一的专车准时来到这里，而王克敏的专车要比喜多诚一提前一刻先到。陈恭澍便令王文带 6 个特务去现场行刺。

1938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 时 45 分，王克敏的专车驶入煤渣胡同，汽车在胡同口刚露头，几支手枪同时响了。但是，只打死了与王克敏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王克敏虽然没有被刺死，中国人也稍稍出了一口恶气。

就在王文等人刺杀王克敏的同一天，日寇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篆任外交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长，任援道任绥靖部长。

梁鸿志是福建长乐人，早年结识北洋皖系大红人、安福系王揖唐，入段祺瑞的麾下，充当北洋政府陆军部长、京畿卫戍司令秘书长。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梁鸿志被列为八大“祸首”之一，逃往日本兵营避难。1924 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执政，梁鸿志时来运转，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他得意非凡，自比诸葛亮。但好景不长，段祺瑞通电告退，梁鸿志也唯有随之下台。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我同胞，而官瘾十足的梁鸿志在日寇的拉拢、引诱下，居然出任伪职，在同胞尸骨未寒的石头城坐上了伪政府第一把交椅，并野心勃发地写下了“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雄谈破夜吾犹健，野哭终年众己暗；只手待援天下溺，吏休宾退一沉吟”等诗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

梁鸿志上台后，声称“绝对否认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对日密切提携”的三大原则。

在日本人的眼里，“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的主要人物王克敏、梁鸿志之流虽然是忠顺的奴仆，但他们不是旧社会的遗老就是国共两党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太小，于是，便决定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在国民党内存在抗战派和妥协派，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鱼雁往来，断断续续地进行活动。蒋介石由于害怕国民党政府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也怕日方过多地损害他的统治权，因而采取暗谋妥协，明里抗战的两面政策。汪精卫同蒋介石不同，他既嫉妒蒋介石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早在 1937 年底，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在接到日方“和谈”条件



后，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在汪精卫周围，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卫、蒋介石献策：在思想文化战线建立一个和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汪精卫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表示采纳。

1938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艺文研究会”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

“艺文研究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更多，就连脱离革命队伍的叛徒张国焘都是他们收买的对象。

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以参加祭黄帝陵为名，私自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投靠国民党。

周佛海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狡黠善变的资产阶级政客。周佛海于1924年春接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离开日本至广州，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兼广东大学教授。不久，他便向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组织。

他脱党后，便于国民党右派流瀆一气，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周佛海由于戴季陶的关系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长、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蒋介石身边为蒋弄文舞墨的“文胆”之一，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智囊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初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周佛海投靠戴季陶、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打起了“反共产”的黑旗。而汪精卫其时则是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周佛海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周佛海也曾写文章反唇相讥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

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汪精卫同蒋介石长期争斗，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一直到蒋汪之间消除对立，实现蒋汪合作，形成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时，蒋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以弥缝长期对立的裂痕。

由于有了蒋的指示，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往，而且无所顾忌，对汪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而深得汪的好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汪精卫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改任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极力阻止对日抗战。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

周佛海在南京有一座花园式洋房，座落在南京西流湾 8 号。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映着青水绿波，真像一座世外桃源。在花坛下还有一个地下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往。来客中间文的有陶希圣、胡适、陈布雷、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等。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他们的主张。胡适觉得这个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后来没有发展到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梅思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罗君强是中共叛徒。他们都是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同周佛海相识的。陶、梅 2 人当时任政治教官，罗任政治部科员，周佛海是他们的上级。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系，1932 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汪精卫对他很欣赏。1933 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调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为亚洲司司长。高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就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

周佛海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向日本求和的心思，于是便求见蒋介石，同蒋在密室里谈了一个下午。周向蒋建议说：“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蒋介石觉得周佛海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于次日召见了高宗武。

高宗武被蒋介石召见，诚惶诚恐，不知是福是祸，他笔直地站在蒋介石面前，连大气也不敢出。蒋介石望着他足足看了一分钟，尔后双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高宗武坐下后，蒋介石说道：“亚洲战事频繁，你辛苦

了！”“委员长辛苦了！”高宗武慌忙站起来，挺起胸脯道。

蒋介石又双手向下压了压。高宗武重新坐下。

蒋介石又说：“看你的脸色，有疲累之感，你为国事奔波，中正于心不忍。你可以请个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些日子。烦闷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为了走动方便，我发给你一个军用特别通行证。一些别的事情，你可以找周佛海谈谈。”随后，陈布雷即命侍从室第2处秘书、军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罗君强，为高宗武准备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特派员”的头衔，以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

高宗武并不知蒋介石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周佛海，才明白蒋介石让他请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主要是设法试探日本东京方面的谈和条件，并伺机尽快东渡日本，为重新和谈作准备。同时他还得知，蒋介石破例每月在军事委员会的开支中，拨给他8000元活动经费，由罗君强持蒋介石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

于是，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他买好了1938年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飞机票。21日，高宗武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王宠惠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这里蒋委员长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高宗武将这一新情况告诉周佛海。周听完后立即推想，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便道：“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你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你留在汉口安妥。”由于蒋介石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于是，高宗武便秘密地奔波于香港、上海、汉口之间。

高宗武走后，周佛海才向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蒋介石听后，道：“是吗？”蒋的心理很矛盾，既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高宗武从香港到了上海，找到了松本重治，向他打听近卫内阁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真假情况。不久，他从受他委派刚从日本回来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那里得知，日本虽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日军内心真正的意向，是想迅速招致对华的和平。高宗武带着这一重要情报回到武汉，并将它送到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很高兴，指示高宗武继续同日本人接触。

不久，高宗武又去香港，在香港大鹏湾旅馆里，同日本人松本重治、西义显进一步密谈。两个日本人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说近卫内阁在日本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到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然而，陆军中的多田骏参谋次长、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等人一直对那个声明进行猛烈的反对，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权”。何应钦、张群在日本读书时，同影佐祯昭是同学，影佐祯昭直接写信给何应钦和张群，说明他有着“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

高宗武向日本人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和平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日本人听了，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兴奋异常。

随后，西义显即去东京，大约 10 天以后，又到达香港，等待高宗武的答复。

高宗武带着影佐祯昭的信，一回到汉口，便把信交给汪精卫和周佛海。汪精卫看了信后，认为这信虽然是给私人的，却明显地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意图。于是，汪精卫委托陈布雷，把影佐祯昭给何应钦和张群的私信，交给了蒋介石。信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后。

蒋介石把高宗武召来，说：“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并不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高宗武从汉口再去香港，同西义显见面，道：“蒋委员长读了影佐大佐的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以口头传递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亲口说：我方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安心。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若我的真意能承你们了解，我有考虑下列条件之意：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是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东北四省、内蒙可留他日协议，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西义显由香港回到东京。他在参谋次长室向多田骏次长、影佐祯昭大佐、本间雅晴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报告了高宗武转达的蒋介石所提条件。多田骏和影佐等却一言不发。是时，形势发生变化，日军正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徐州，气焰嚣张，日军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尽管西义显拼尽全力讲演，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

西义显只好空手而返，将东京的“实情”告诉高宗武。同时，西义显还带来一个消息，日本内阁即将改组。新内阁会重新策划其对内对外政策。西义显要求高宗武亲自赴东京游说。

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商讨对策。是时，日本内阁果然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务大臣。宇垣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施放钓饵。对此，蒋介石集团表示欢迎，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电贺宇垣出任日本外相，实现中日“友好亲善”的夙愿，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

此时，汪精卫集团更显得倍受振奋。周佛海几乎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并频频劝高到东京去一趟。高宗武跃跃欲试。

## 第一章 无耻求“和平”

蒋介石与汪精卫仍在明争暗斗。蒋介石对高宗武的行动一清二楚，高宗武同汪精卫关系密切，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觉得和谈有望，又怕汪精卫行之太过。在他看来，无论是“和”是“战”，都得由他负责，而不许他人染指。如果因高宗武的活动而使汪精卫与日本相勾结，这对他的

地位，不能不是一个威胁。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蒋介石的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陈布雷将此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高正在兴头上，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沮丧，急忙向周佛海求计。

汪精卫和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有望，不能就此撒手，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指令高宗武去日本，而高宗武已知道蒋介石的打算，不敢造次。汪精卫和周佛海对高宗武软硬兼施，高宗武吓得匆匆忙忙赶到香港。虽然高宗武此行未经蒋介石同意，但陈布雷认为高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仍批准照发其活动经费。

高宗武同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在香港九龙广东酒家订立双方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觉书”。高宗武还讲了自己的设想：日本发表撤兵声明，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由各种“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的“和平运动”变成全国性运动。

松本重治望着戴着黑色眼镜、矮个子、高颧骨的高宗武，希望高宗武一定去东京，以实现他的上述计划。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唆使下，决心以汪精卫为同伙。他认为蒋介石冷酷，而汪精卫温暖。他决定背着蒋介石，亲自前往东京。

6月22日晚，高宗武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苏科科长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客轮，日人伊藤在那里等候他们一起前往东京。

7月5日，“皇后”号抵达横滨。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高宗武等被接到东京，住在麻布区住友公馆建筑古雅的贵族别墅里。是时，日军陆军省也已改组，由板垣征四郎任陆相，东条英机任次官，影佐担任了参谋部谋略课长兼任陆军省军务局课长。军务局是陆军省内最有权势的一个局，局长中村明人，对影佐十分器重，因而，影佐等于兼任军务局长，深受板垣信任。陆军省的这一布局，使高宗武的赴日，达到了汪精卫集团所意想不到的后果。

高宗武经影佐的引导，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首相近卫、外相田八郎等人。高宗武发现，日本对蒋介石既想要跟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强烈不满，因此表示不能同意与蒋进行谈判，而寄希望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高宗武便要求日本内阁总理近卫写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但近卫认为，一国内阁总理如这样做，未免过分，至少为时尚早。

他只允许由陆相板垣写这封信说明此意，由高宗武带回转交。

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所谓“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五相会议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规定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

高宗武由伊藤陪同，从日本长崎乘船回到上海。因咯血，住进杨树浦医院治疗。待身体稍好，即于8月下旬回到香港。高知道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私自赴日，恐被蒋逮捕，不敢回武汉，便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派

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

周佛海看到报告，立即拿着报告去同汪精卫商量，周道：“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为妙。”汪精卫看到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虽然感到吃惊，但心里是高兴的。不过汪精卫此时还未下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的决心，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想借日本人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便对周佛海说：“这是没关系的，将报告原样交给蒋。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方无疑是要他下台，十分恼火。将高宗武的报告交给张群看。

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已经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过了3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怒气满面，大发雷霆，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

真是太大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的？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其活动经费立即停发。”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决心继续干下去。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高宗武使用。并要高暂时再观形势，无论如何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

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判。是时，梅思平奉“艺文研究会”之命，在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但他对这项差事并不感兴趣，颇感寂寞，静极而思动，因此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佛海、高宗武交给他的与日方直接谈判的任务。

梅思平从此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一员干将。梅思平后来公开投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儿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说：“梅思平不是我的父亲，我要捉拿他，杀掉他，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篇文章，一时全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传布极为普遍。

梅思平于1938年8月29日同松本重治在香港岛酒家举行第一次谈判，由日语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译。谈判一开始，松本为了要判断一下梅思平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故意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使梅毫无拘束之感，便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

松本在谈判时说：“和平运动成功与否，在于撤兵；日方认为，蒋介石下野，日本才能撤兵。”梅思平道：“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权力，成了中国战场上的最高统帅。

如果日方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撤兵的条件，这样既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会适得其反，使汪精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使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松本表示下次再从从容容谈论。为了不被人跟踪，梅思平提议以后每次谈判，都要改变地点。

梅思平在继续谈判中，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说道：“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方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即使说日方声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

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这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在保护民生。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都有同样见解。根本问题是人道问题。松本，你精通中国的事，对此不会不知道吧。”汪精卫汉奸集团，标榜他们“倡导和平”的目的，是为了“考虑中国的民生”；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实行撤兵，这是他们打出的两块招牌。

松本立刻表示：“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梅思平又称：“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士，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从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5次谈判，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

10月21日，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梅思平同周佛海、陶希圣3人商谈后，往见汪精卫。尔后，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11月2日，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离开重庆，经河内返回香港。同高宗武会面后，为避人耳目，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特亚号”去上海，同日方继续谈判。

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的一幢孤零零西式的灰色二层楼房内。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东体育会路7号”。今井武夫事前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修，并作了精心布置，并改名为“重光堂”。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庠先后被接到重光堂，与今井武夫，伊藤举行预备会议，几天来，重光堂内鬼影幢幢，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政治交易在这里成交。

在谈判中，高、梅承认日方所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并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高、梅两人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华租界。

这些所谓“要求”、“希望”，仅仅是一纸空文，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条件时制造的一块遮羞布。然而，日方代表还嫌价码太高，不肯同意，双方争论了6个小时，才达成初步协议，将上述汪方的意见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高宗武、梅思平还提出重建“中国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不得同新中央政府处于同等资格的地位，否则，新中央政府就难以建立。他们声称：作为“中国新政府”，不考虑与被人民认为是傀儡的南北两政权合作或合并，热切希望日方考虑取消这两个组织。对于这两个政权中“善良者”，不妨包容为“新政府”中的地方官吏。

今井武夫予以驳斥，声称：“临时”、“维新”两政府均系日本指导下的政府，在有关日本帝国范围内，均为友好之地方政权，从而期望其存在及发展，此乃我帝国之信义。因此，不能考虑约定将其取消。

双方争论不下，今井武夫认为既然不可能“一争到底”，可待以后由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协商，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临时”、“维新”政府发表声明，明白表示它们为“救国”而一时出马，现汪政权既已成立，则可自行解散。于是，这一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卫提出所谓“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及其有关政策。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表示同意。

会谈后，今井武夫急匆匆地离开上海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脑会议作了报告。

会议决定以重光堂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尔后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同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高宗武、梅思平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草拟了近卫、汪精卫声明要点，制定了汪的叛逃计划。《协议》规定：（1）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

（2）中国承认“满洲国”。

（3）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华租界。

（4）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5）赔偿日侨损失。

（6）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重光堂秘约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只是设下一个圈套，把在重庆的汪精卫等人勾引出来。重光堂密约并没有把日寇的欲望全部端出来，免得超过汪精卫集团所肯承受的程度，致使其分裂中国抗日阵营的阴谋落空。10天以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对中国提出更广泛、更苛刻的要求。

重光堂会谈一结束，日汪双方的活动更加紧张起来。

影佐祯昭、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相板垣、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等提交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尔后板垣带着影佐、今井去首相官邸，向五相会议提出报告，并商定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今井返回上海，等候汪精卫集团的答复。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堂会谈之后，即返回香港。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密约”藏在上清寺汪公馆里，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心怀鬼胎，怕不保险，即把它放在一只小皮箱内，亲自上锁，由她内侄陈春圃陪同，送往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她胞妹陈淑君处。陈璧君还不放心，于次日将小皮箱取回索性拿出“密约”烧掉，省得提心吊胆。

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梅思平等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讨论是否接受“密约”问题，急于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接受。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她自1926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以后，



政治欲望逐渐膨胀。她随汪精卫沉浮于政海，为汪出谋划策。她生性尖刻、高傲自大、目空一切。

她不仅依靠汪爬上中国政坛顶峰，且左右汪精卫。有人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没有陈璧君，办不成大事；没有陈璧君，亦不致于败事。“惧内”成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

汪精卫在历史上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尖锐的斗争。汪虽然仍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但仍然在蒋介石之下，且未能掌握实权，因此很不满。

周佛海也是一个权力迷，他在敌机轰炸武汉时，未经蒋介石许可擅自离职躲到重庆，蒋知道后震怒。周佛海并不以代理宣传部长为满足，极想得到财政部长位置，而财政部长始终都由蒋的妻舅宋子文或蒋的联襟孔祥熙充任，不准他人染指。周在日记中抱怨说：“蒋从未以‘国土’对待他。”汪精卫集团和蒋氏之间在战和问题上又发生分歧。一次，汪精卫对蒋说：“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介石则说：“抗战易，和平难。”汪反驳道：“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虽然汪精卫投敌心切，但总是惶恐不安，他惧怕全国人民反对他，也顾虑同日本人的交道不好打。周佛海、陶希圣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时，和日本打过交道，还算是顺手的。”汪回道：“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那时，我兼外长首当其冲。类似的事，不遑枚举。直今我还心有余悸。”汪精卫犹豫不决，每天晚饭后总是在寓所的院子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陷入穷思的苦海中。他在一次会上忽然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方须商量”。

周佛海、梅思平则以冷淡处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原来，周佛海对汪精卫深切了解，认为汪为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10余年屡遭失败。但汪仍想实现其领袖欲，虽有反复，必仍按原计划也，便采用以退为进策略。果不出周佛海所料，次日，周佛海、梅思平再赴汪宅，汪开始提出难题甚多。周佛海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闻此言，担心果真作罢，便改变态度，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决定照此答复。”汪精卫在家设筵为梅饯行。宴后汪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作了答复。日方也通知汪精卫集团：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根据计划，汪精卫将于12月10日左右到达香港，高宗武通知西义显说：“我已准备接汪先生来香港。但必须设想突发情况，需要日总领事馆保护，而现任总领事我们不熟悉，若能以我们熟悉的田尻爱义君代之最好。”日本政府立即回答，表示可以满足，急电影佐转告外务省，将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调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于12月10日抵达香港。

汪精卫选择逃离重庆的路线，一是由重庆直飞香港，二是经昆明赴河内。由于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这样做有很大的冒险性。因而选择了经昆明赴河内这条路线。因昆明是龙云的地盘，他便事先征求龙云的同意。

龙云自1928年起任云南省主席，成为拥有地盘的地方实力派。龙云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对国民党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抗战爆发后，龙云拥护抗战，云南军队被编为第六军，由卢汉任军长，开赴前线参加抗战。

但龙云对蒋介石利用抗战蓄意牺牲非嫡系部队不满。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往西南后，蒋介石积极向云南渗透，龙云深恐他的地盘被吃掉，同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汪精卫乘机拉拢龙云。

陈璧君 3 次去广州、两次去湖南、广西活动，窥探虚实，同广东军政要人余汉谋、吴铁城等人晤面，进行拉拢，回渝途中在昆明停留，与龙云“促膝长谈”。龙云道：“云南因不合理之负担而消耗殆尽，而武器弹药，及装备分配与中央军部队相比较，则天渊之别。”陈璧君鼓动龙云反蒋，答应帮助龙云解决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她提出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龙云开发锡矿，以资拉拢。龙云虽与汪精卫素无交往，只见过汪一面，但一向对汪十分推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想结纳汪，利用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与影响，作为他的政治依托。经陈璧君串通，龙对汪更有好感。陈璧君见火候已到，便哭丧着脸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

龙云为之动容，道：“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 第二章 卖国“艳电”

陈璧君回重庆后，对龙云赞不绝口。汪精卫便决定经昆明出走，为避人耳目，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汪精卫托词去昆明讲演离开重庆，陈公博自成都飞往昆明。陈璧君的远房侄辈陈春圃打前站先走。

陈春圃时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兼侨民教育处长，在政治上同汪精卫如同一辙，加上他办事认真细致，深为汪夫妇器重。汪精卫以送子女到香港读书为名，要陈春圃把他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恂护送到昆明。并要陈预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

汪的行动十分诡秘，将侍卫队长刘文焕支走，将雇佣的女佣遣散。他们清理东西，有的书籍文件装进印有“双照楼”3 字的箱子里。除汪等少数几个人之外，连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汪精卫的侄子都不知道，许多汪派骨干也没有通知。陈璧君问汪：“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介石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汪精卫道：“蒋介石是个奸雄，我们走后，他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

他们是被严防，不会被害，我们现又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汪精卫希望陈公博随他出走。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1938 年春又担任国民党四川省部主任委员，长住成都。11 月底，汪精卫给他发去电报，要他立刻到重庆来，陈急忙返渝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中日和平已成熟，我就要离开重庆，希望你随我出走。”陈公博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原来，汪日间的秘密勾结，陈事先一无所闻，且陈在“和”与“战”问题上同汪有一定分歧。陈根据他过去几年对日交涉的经验，认为日本绝无诚意，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要他一道出走，持反对意见。这便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陈公博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当蒋介石的官好了。”陈璧君深知，陈公博同汪精卫的关系实在太深了，他们走后，陈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她说这话不过是使激将法

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陈公博一回成都，反复考虑走还是不走，思想斗争极为激烈，夜不能合眼。他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出走为上。

于是，汪精卫集团便开始行动。周佛海照计而行，12月5日飞往昆明。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搭机前往昆明。

日本政府向新闻记者透露：首相近卫文麿将于12月11日晚在大板大礼堂发表演讲，宣布对华“新政策”。

不料，事情发生了波折，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蒋介石突然从桂林返回重庆。汪精卫一时无法脱身，不仅打乱了他叛逃的计划，而且他担心以前的行动是否已经暴露，汪的眼前老晃动韩复榘的影子。前不久，韩复榘不战而退，被蒋处决。汪深知蒋的手腕，若知道了自己出逃的底细，下场将不堪设想，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掩人耳目，汪精卫便频频在公开场合活动，接见记者，出席讲演会，分别接见孔祥熙、戴笠、陈布雷等蒋氏亲信，听取他们的“汇报”。

但他掩盖不住其内心的虚弱，时而流露出 unnatural 之神态。

已到达昆明的周佛海从陈春圃那里得知：“蒋先生今日到重庆，汪先生嘱一切慎重。”他惊慌起来，如坐针毡，举棋不定，坐立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周佛海通知龙云，汪先生暂缓行期。此一变化，也关系到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的问题。周佛海电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们通知日本方面，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

近卫于12月11日在大坂发表演说的消息已公布，得知汪未能如期脱离重庆，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伪称近卫因患肠病，中止大坂之行。

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感到十分焦急，不得不取消了为汪精卫代定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等待着重庆的消息。

蒋介石与陈布雷本在桂林行营，此次返回重庆，并非获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有秘密勾结和叛逃的缘故。

在重庆的汪精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盼右盼，才找到了一个脱逃的机会。18日，蒋介石发表训话，汪可以不参加。趁此机会，汪精卫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几张飞机票。彭原汪系人物，自然奉命照办。

这天上午9时，陈璧君和汪的亲信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4人，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她和汪约定，汪在启飞前数分钟内赶到。陈璧君到机场时，刚巧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要搭机飞滇。陈璧君做贼心虚，连忙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仅含糊其词地说是“汪夫人”有事赴滇。离开起飞的时间将到，汪精卫仍然未来，陈璧君心里十分着急，嘱咐曾仲鸣，如汪精卫迟到，就向机场说明有汪搭乘，令飞机延缓起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正沿着珊瑚坝疾驰而来，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都上前谒见。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说汪精卫去昆明讲演。

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想乘这个机会，在汪副总裁面前显露一下自

己的飞行技巧。

他进驾驶室，亲自操作。这下把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吓得虚汗直冒。他们以为周至柔是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令他驾机返航。陈璧君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暗中告诉汪的侍卫，要他作好一切准备。正当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忐忑不安之际，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汪精卫这才松了一口气。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汪精卫走出机舱，龙云率领省政府各部门官员列队相迎，顿时军乐大作。汪精卫见此，生气地责问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汪精卫事先电告陈，要他以“保密及防备日机中途拦截”为名，只许龙云1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2人。陈照此通知了龙云。龙虽口头答应，但一转身却告知了各厅、署、局长，不多时，各条街道的商店也零零落地挂起了“国旗”，奉命表示欢迎。陈春圃看到后十分着急，去见龙云，请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张扬，但已来不及了。

汪精卫历来爱出风头，这次一反常态，到了晚上，他才向陈春圃道出秘密：“我虽然是托词演讲而来，实际上是借路溜走，因此接见的人越多越难对付。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汪精卫要曾仲鸣出面，说汪精卫在飞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有间歇，当地官员一律改日延见。

由于蒋尚在重庆，汪感到此行极其危险，能否离开，惟在龙云态度如何，忙问周佛海与龙云接触的情况。周佛海认为龙不致为难。汪于当晚与龙云交谈，将自己组织政府的计划向龙云作了详细介绍，果然得到龙云的赞同，并保证响应汪的声明，负责汪安全出境。汪精卫见目的已达，长舒了一口气。

陈璧君却想得周到：万一明天天气不好不能起飞，而被迫改乘火车的话，到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会狼狈的，因此指派陈春圃明晨一早乘车先走，以备万一。汪精卫知道后，笑逐颜开地表示赞同，并关照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愷、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干人等，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汪精卫为掩盖自己投敌真相，在离开昆明前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飞行过高，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几日，再行返渝。

次日，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

汪精卫集团对云南龙云、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寄以很大希望，千方百计拉拢。他们的计划是引诱他们一道下水。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的旗号时，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这样既可釜底抽薪，削弱抗日阵营力量，挖蒋介石墙脚，又可增强自己的势力，拼凑一支武装力量，陈璧君、汪精卫都同龙云深谈过，龙表示拥护。

然而，汪精卫等人一走，龙云立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2时已离滇飞航河内”。待陈公博离开昆明后，龙云再次致电蒋：“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详，不无诧异。匆匆离滇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知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通过中日间“和平”，以保存其地盘和实力；又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而且还会遭到蒋介石大军

压境，丢失一切。

龙云的动向，引起蒋介石集团的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前线屡遭失败，蒙受重大损失，若云南、四川等地脱离抗日阵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云南是后方的一个大省，又是重庆通往国外的主要门户，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外物资供应的交通线，昆明机场成为飞航重庆、香港和印度间最忙碌的中国机场。云南的向背，关系到整个抗战全局，也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蒋认为，非得要做好龙云的争取工作不可。

李根源根据蒋的请求，首先跑到云南。李是国民党元老，是云南军政界老前辈，在云南颇有威信。李又是龙云的老师，龙云对他十分敬重。李劝龙云道：“若你发出通电，中央的飞机就轰炸你，你首先被解决无疑。”龙云问：“依老前辈的意思，应如何办呢？”李根源道：“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你没有行动，中央也不会追究，你就无事了。”唐生智也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昆明。唐曾是汪精卫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把自己在1927年和1929年跟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龙云，要龙云警惕，他说：“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并告诫龙云：“民族大义，千古是非，在抗战其间，忠奸不两立。”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劝告，使龙云面对现实，最终未按汪精卫集团的愿望而行，而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使汪精卫一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

日本首相近卫卫得知汪精卫一伙逃到越南河内，遂于12月22日晚，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长约十分钟的声明，他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便是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声明。“善邻友好”，就是要中国停止抗日的行动，承认“满洲国”，并与其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共同防共”就是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并以“内蒙地方为防共特殊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要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而且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汪精卫集团收到近卫声明全文后，由汪精卫起草声明响应。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携汪之声明由河内飞往香港，要在香港公开发表汪之声明。

根据临行前汪精卫的嘱咐，他们3人一下飞机，由陈公博出面，将电文交给当时在香港闲居的顾孟余，希望能得到顾的支持。不料，当顾看完以后，表示坚决反对，道：“这电文万万不能发，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汪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失误，一切由我负责。”顾孟余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38年3月又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但始终并未莅任视事，而是飘然远行，蛰居香港。因此其职务只得由周佛海代理。他对汪精卫出逃前暗中通敌的详细情况，一无所闻。他同汪精卫有很深的历史关系，他和陈公博长期以来为汪的左右手。这次顾孟余能明民族大义，极力反对汪发投敌声明，并随后即离开香港回重庆，比之陈公博虽不同意汪与日谋和，却仍随汪离开抗日阵营，后来终于落水当了大汉奸，实相迥异。

陈公博听了顾孟余的话，就去找周佛海商量。

周佛海自河内到香港后，就住在九龙塘约道5号一幢清水砖瓦砌成的独立式小洋房里。

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手拿汽枪，一个身备匕首，日夜守卫在门口。

陈公博到了周家，将顾孟余的话转告给周佛海，周害怕自己的主张告吹，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陈公博夹在周佛海和顾孟余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但他毕竟是个老政客，将电报交给林柏生，让林去处理。

林柏生在 1924 年就担任过汪精卫的秘书，成了汪的亲信。抗战爆发后，林柏生奉命带了《中华日报》主要成员来香港，出版《南华日报》，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创办“艺文研究会”国际编译社。当陈公博将顾孟余的意见告诉林柏生时，林就干脆地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 29 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汪精卫的声明称为《艳电》，是因 29 日的韵目代日为“艳”而来。汪精卫的《艳电》是致蒋介石的，内称：“顷读日本政府本月 22 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防共目的在于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之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盼采纳。”蒋介石看后不禁大怒，将戴笠召来。戴笠来到重庆南岸黄山蒋氏官邸，见蒋的脸色阴沉，小心问道：“校长，叫学生有何吩咐？”蒋介石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是个笨蛋！你手下有 10 万人，居然让汪兆铭跑到河内去了，你是干什么吃的，这样无用！”“学生有罪。请校长息怒，学生马上去布置人，处理这件事情！”戴笠说完转身欲走。

“慢！河内的事情，先不要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动手！目前，只是密切地关注其动向。如果兆铭走得实在太远了，中正也只得忍疼割爱了。”戴笠道：“学生明白了！”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又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 4 点要求：（1）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摩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2）在军事发动以前的 3—6 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 300 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3）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 （4）彻底轰炸重庆。

汪精卫的要求，是以日军的军事行动加快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以便支持他上台“收拾时局”，实现其当儿皇帝的野心。

汪精卫的《艳电》一出笼，立刻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在香港的何香凝发表文章，说汪精卫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斥责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国民党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战区高级将领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汪明令通缉究办。就连为汪寄予厚望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也通电斥汪，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

龙云也公开通电，表示“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

蒋介石对汪精卫则采取软的一手，硬的一手。他先是下令各报严密封锁汪精卫出逃的消息。但汪毕竟是全国瞩目的政界人物，是隐瞒不住的。12月26日，蒋介石才在中央党部发表演讲说：“汪主席已去河内，实有此事，但是，他是因为身体欠适，前往治疗，这纯属他个人行动，于国民政府，于政治均无关系。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个人久共患难之深切关系，无话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见，亦必在中央公开或私人相互讨论，因此，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 第三章 “硬性行动”

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后，蒋介石才主持召开临时中常会，他主张对汪晓以大义，处以宽大，为留悔改余地。但会上群情激昂，均极愤慨，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选举吴敬恒起草决议案，称：“汪兆铭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悖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此决议中有通缉令一并发表字样，但蒋介石拒绝发表通缉令，他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他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正如汪氏所说的那样，蒋对留渝的原汪派的人物，进行安抚。蒋介石还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

谷正鼎原本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他奉命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向汪转达蒋介石的话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听罢，断定蒋介石在耍花招，要断绝他的通敌之路，极为反感，道：“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

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中央对于我的主张，如果经讨论一致否决，我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蒋介石又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晤周佛海，劝他回心转意，返回重庆。

周托词拒绝，萧同兹的“工作”终于落空。

汪精卫指定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陈璧君和他自己等所谓的“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尔后又成立了政治、军事、财政3个委员会，自任政委、军委主任委员，周佛海为财委主任委员。

汪精卫集团四处活动，网罗党羽。周佛海最先拉了叶蓬入伙。叶曾爬上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高位，但他狂嫖滥赌，为世人所不齿，最后成为失意军人。周佛海又拉了国民党文化特务樊仲云入伙。樊是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所谓十大教授之一，是“艺文研究会”的研究员，他投敌后，使汪精卫集团又多了一个摇笔杆子的人。

在河内的汪精卫也亲自派附汪投敌的周化人带钱到重庆活动。周在重庆见了许多汪派人物，转达汪精卫之意，送给路费，要他们见机投奔，但多数人拒绝接受，周化人只拉了几个小角色。

蒋介石见软的一手失灵，便决定采用硬的一手。

蒋在派遣谷正鼎、萧同兹等人奔赴河内、香港进行游说的同时，又令军统特务跟踪而去。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初来到香港，邀请林伯生等人见面。因林是中宣部特派员，不能同意。几天后，林收到戴笠的信，写道：“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自己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戴笠又放出火烧和殴打的空气。《南华日报》在恐怖气氛下，排字和印刷工人纷纷离去，林伯生等亦惶惶不可终日。

1月17日，刚从河内赶来的陈璧君约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到她寓所开会。午后3时，林柏生在回去途经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窜出两条汉子，从背后赶上用2尺长的铁棒猛击林的头部，将他击倒在地，后经人送进玛丽医院抢救，才免于死。此后，林柏生改名换姓，隐藏起来。

林柏生被狙击，是蒋氏对汪精卫一伙的警告，但汪不回头，戴笠奉命又布置新的行动。他给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去一份“十万火急”电令，要他克日来香港待命。

陈恭澍到香港后，到半山区薄扶林道的高级住宅区来见戴笠。戴笠道：“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军统局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陈恭澍感到迷惘，便去问王鲁翘。王原是戴笠的侍卫。两人寒暄之后，陈问：“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等人搭机飞往河内。先他们10多天到达河内的是方炳西。

方曾留学比利时，回国后为戴笠所罗致，参加了军统。他遵戴笠指令，在河内一处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1楼1底的房子，楼上有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连饭厅。这幢房子便成了军统“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次日，戴笠召集陈恭澍、方炳西、王鲁翘等人，说：“我们这次到河内



来，我现在可以决定的任务有两点：一是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二是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

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你们 3 人在这里组成临时工作组，由陈恭澍任组长，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我们经常保持联络。”戴笠布置就绪后，独自飞回重庆复命。

戴笠刚到重庆，便发来电报：“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逕行去欧，是否有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陈接到电报，心里紧张。他们刚来河内，人地生疏，对汪精卫等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连汪的住宅也还没有“查”出来。按照军统的“家法”，如完不成任务，轻者受责备，重者可能判刑。正当陈茫无头绪之际，戴笠又从重庆来电催询陈联络“徐先生”的事，并说：“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徐先生磋商。”陈恭澍这才想起戴笠临行前向他推荐的那个称为“徐先生”的神秘人物。

徐是戴笠在河内的重要耳目，40 余岁，曾留学欧美。他在当地华侨中享有声誉，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们交往甚密，同安南法国籍总监结为知己。他是个神秘人物，神通广大，能提供高级情报。戴笠还曾交代陈恭澍，只让他亲自找徐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找他。

陈恭澍面见徐先生，果得汪精卫的住址和汪有离开河内的意思，汪已向当地的主管方面说明。

汪精卫住在静寂的山中“丹岛”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早已料到蒋介石要除掉他，甚警惕。这一天，突然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活动，立即秘密地移到河内高朗街 27 号。

高朗街离河内闹区不远，但却僻静，是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两旁还植有一排榕树、棕榈，中间有几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行人稀少，显得十分幽静。27 号是一幢西式 3 层楼房，正面临街，门前有一片草坪，后面是一个小院落，围有矮墙，且有后门、角门。如由后门进出，须经过两道门。汪精卫夫妇像蝙蝠一样，白天躲在楼里，不敢出来走动。这幢楼住有曾仲鸣和汪的秘书陈国琦等 20 余人。曾仲鸣负责与外界联系，他每天进进出出数次。曾在大陆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代表汪对外接触。会见汪精卫的人，要先同曾仲鸣洽谈好，再由曾决定安排同汪见面。曾仲鸣是个生活糜烂之徒，每天晚上 10 时一过，等汪夫妇就寝后就出门逛窑子，直至深夜二时三时才回来，怕惊醒汪夫妇，不敢开铁门，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安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降到院子，再跑回卧室。

陈恭澍等特务对汪精卫的情况了如指掌。戴笠又派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 3 人来河内。余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他又曾任军统局临津特训班副主任；张系黄埔生，动枪动笔均行。不久，又有两名特务郑邦国、陈步云奉命而来，这两人行伍出身，熟娴用枪，能连续发射。陈恭澍暗自检阅这个阵营，觉得满意。

一天，有个名叫曹师昂的人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从昆明飞到河内，约陈恭澍到他住宅见面，有“机密大事”相告。陈恭澍不敢耽搁，急忙前往见面。曹交给他一包东西，说是他在出发前，戴笠为他饯行时，要他带来转交的。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支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 1 盒子弹。不久，戴笠又派人从昆明、广西、香港等地带来了手枪、板斧、利刃、钢锯和毒药。3 月初，戴笠电陈恭澍，要他们做好行动前的准备。

陈恭澍责成唐英杰设法潜入汪宅察看汪精卫一伙生活起居规律，如不

能入室，至少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窥探。陈恭澍又考虑采取什么行动方式。

军统特务杀人的手段有二，即“软性行动”和“硬性行动”。“软性行动”一般采用“无声武器”，即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硬性行动”则使用“有声武器”，即用枪械轰击。陈恭澍决定采用“软性行动”。余鉴声善用此术，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纸匣，取出一个瓶子，瓶内装有无色无臭的液体毒药。尔后将毒药注入从面包店买来的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面包内，准备收买给汪宅送面包的本地人，将注入毒药的面包送给汪精卫去“享受”。不料，将注入毒药的面包切开查看，见面包瓤里有淡黄色斑点，此乃注入的药水所致。又经过几次试验，特务们对这种“软性行动”，感到兴趣索然，决定采取“硬性行动”。

3月19日，戴笠从重庆发来密电：“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即复电“遵即积极进行”，又召集全体特务人员，宣布说：“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脱去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

进入汪的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2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3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指挥。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3月20日上午，汪精卫、陈璧君等分乘两辆黑色轿车，前往河内至西贡间的游览胜地三桃山，去解解闷气。陈恭澍得到情报，立即带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张逢义驾驶福特牌小车尾追而去。

车过红河大桥不久，便见前面八九百米处，两辆黑色轿车停在路旁的空地上。陈恭澍怕车上有越南警察，也怀疑汪精卫是否真在车上，便驱车前去看个究竟。车子快速驶过，如浮光掠影，但已看清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等人。当陈恭澍的车子开过汪的黑色轿车几十米时，汪的车子突然开动，沿着原路疾驰而回。特务们追赶不及，失去一次良机。

下午4时，陈恭澍又接到情报，说汪精卫夫妇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谈话，似乎在争论什么。机不可失，陈即带王鲁翘、张逢义奔上汽车，直驶高朗街而去，可一到那儿，门前杳无一人，27号大门紧闭，同往常一样十分冷清。

两次扑空，特务们十分光火。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汪宅进行一次夜间奇袭。21日23时40分，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乘夜色驱车前往汪宅。夜幕下的高朗街路旁高耸的大王椰子和参差丛丛的老榕树、棕榈，经夜风吹动，树枝叶摇曳，犹如女魔影怪手，显得阴森森的。车子驶到27号后门，陈恭澍令张逢义、陈步云留下呼应，其他4人逾墙而过，陈邦国力大身粗，勇猛强悍，由他当开路先锋，唐英杰前引登楼。他们劈开楼下的小门，飞步跃入3楼，冲进预先侦察好的汪精卫房门外，用利斧将木制的房门劈开一个大窟窿，破门而入，房内一片漆黑，房内的人已被惊醒，特务们凭手电光，见床上无人，床下有一男一女，男的趴在床底下，腰背双腿却露在外面，女的缩成一团。特务们认定他们是汪精卫夫妇，立刻开枪射击，将他们击毙，尔后仓皇逃跑。

当地军警闻讯赶到，将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3人捕获。军警一查，见被击毙的男女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

将卧室让与他们，汪氏夫妻住到隔壁房间，因而毫毛无损，曾仲鸣却被击中数十枪，其妻亦中3枪，等被送往医院，一命呜呼，当了替死鬼。

陈恭澍、王鲁翹、唐英杰等回住所，立即给重庆的戴笠发去电报：“任务执行完毕。”戴笠急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总算把汪精卫除掉了。

蒋介石只高兴了一天，河内电台播出新闻：被杀的是曾仲鸣夫妻。

曾仲鸣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副秘书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铁道部、交通部次长，是汪精卫最亲近的心腹。他一死，顿时断了汪氏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使汪感到万分悲痛。于是，他亲笔写了《曾仲鸣先生行状》，来纪念曾仲鸣。同时决定对蒋进行反击，办法是写一篇文章。是时，汪已成惊弓之鸟，偶尔间他俯瞰高朗街面，发现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徘徊，还不断抬头向楼中窥察，为了保住生命，找来一身越南土布衣服穿上，整日困坐在地下室里，不敢与外人接触。

日后，他悲叹道：“在河内之孤独，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汪精卫写了《举一个例子》的文章，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汪精卫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天举一个例吧！”汪精卫接下来便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最高军政长官的主和细节，全部揭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的情况，更披露无遗。汪精卫又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质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汪精卫的文章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打得蒋介石暴跳如雷。蒋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但在一片叫骂声中，吴雅晖却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题为《对汪精卫 举一个例 进一解》的文章中，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以泄漏秘密，处刑更严。”这就说明，汪文所据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

蒋介石无奈，命戴笠又组织3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

汪精卫在地下室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连续两次向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求救，日本领事馆答应马上与日本政府联系，并让汪精卫耐心地等待。

4月6日，日本政府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和日本前总理大臣犬养毅之子、众议院议员、近卫智囊团人物犬养健，以及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等人，乘“北光丸”货船，专程前往越南，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河内，同汪精卫密商，研究逃离河内、前往上海的时间、路线和方法。影佐道：“汪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500吨‘北光丸’号货船，以供先生使用。”汪精卫道：“北光丸号目标太大。重庆方面有新的袭击计划，二三日，邻居的3楼突然有人租去，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由远处监视。越南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有好感，但对我的政治行动则采取禁止态度，深恐卷入政治漩涡。就目前形势来说，我坐日轮去上海尚不适宜。我已经租了

一艘法国小船。”影佐问：“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重庆政府对先生已下通缉令，在中国沿海航行时，需要特别小心。”汪精卫告诉影佐，这条法国船是760吨。3个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条小船，怎么可能将汪精卫一行载到上海？但汪执意表示：“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我主和后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4月25日夜，汪精卫收拾细软，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慌慌张张登上“冯·福林哈芳”号法轮。离开了越南。行至北部湾时，突然海风骤起，恶浪盈丈。“冯·福林哈芳”船身太小，在浪峰涛谷里驶行，几次出现倾覆的险情。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搅得晕头晕脑，呕吐不止。周隆庠认为这样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此船，汪精卫也顾不得什么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28日，“冯·福林哈芳”号与“北光丸”号终于在汕头海面靠拢，汪精卫由人扶着爬上日船，与日本帝国主义“同舟共济”了。

他不禁“万感俱集”，写下七律一首：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汪精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在“北光丸”轮上进行多次会谈。汪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像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影佐回道，待他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方，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评。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5月6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汪精卫深知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列强手里，这租界被人称为“孤岛”，而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们大多以“孤岛”作掩护，活动频繁。汪精卫一想起曾仲鸣的死，便心有余悸，所以日轮“北光丸”号到达上海后，汪精卫一伙迟迟不敢上岸，直到5月8日，今井武夫再次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汪精卫一伙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下船住进“重光堂”。

#### 第四章 汪记“驿站”

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

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 1136 弄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 34 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5 月 31 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 11 人，登上飞机，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 月 11 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 50 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

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6 月 6 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 3 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 10 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 月 10 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

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便迎合板垣说：“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板垣警告汪精卫，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

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再想办法。

汪精卫在6月18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

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憚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

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嚷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之和之理”。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

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6月24日，汪精卫一行秘密地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策划：汪、吴在该总司令官住宅会面，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的正副关系。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

后来，汪精卫又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1）吴对外发表政见汪须采纳；（2）汪不得干涉军事；（3）汪不得私与外国签订任何条约；（4）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到了10月19日，汪又给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7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病死亡。他总算保全了一点晚节。

汪精卫在吴佩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就开始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精卫在北平会见了王克敏。王克敏说：“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汪精卫见王克敏不许他在华北染指，心灰意懒地回到上海。

是时，日寇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目的是扶持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它由日本陆军、海军、外交、兴亚院派员组成，负责人是影佐祯昭少将。“梅机关”让汪精卫迁往沪西愚园路1136弄去住，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分别由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陈春圃、林柏生、罗君强等以及日本沪西宪兵队特遣小组成员分宅而居，是清一色的汉奸巢穴。在每家房屋围墙上都加装了铁丝，门窗上都装上铁栅，汪精卫、周佛海住宅后面，还加设了了望楼。有1个警卫大队，专门负责保卫全弄的安全，没有特别通行证，或预先通知为特定宾客，任何人也无法进入弄内。后来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设在这里。

6月29日，汪精卫约梁鸿志来会谈。两人一经交谈，汪精卫发现梁鸿志

比王克敏更不理想，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7月5日，汪精卫去南京同梁鸿志第二次会谈，梁提出：新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院、部长人员维持原状，仍由梁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又同温宗尧、任援道、陈群等会谈，仍没有结果。

汪精卫一气之下，准备撇开“临时”、“维新”政府，在广州寻找立足之地，建立一个“华南政权”。7月24日，他顶着南方盛夏的酷热，飞往广州，先后拜访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等日方要人，又用粤语广播发表了《怎样实现和平》的演讲。但是，汪精卫仍然是毫无收获，“空路离粤”，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汪精卫终于认识到，要建立伪中央政权，就不能离开日本的支持和“临时”、“维新”政府的合作，伪政府的地点，除南京而外，别无他处。

汪精卫卖国集团一面大造“和平运动”的舆论，一面招兵买马，只要能赞成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先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傅式说等人。赵尊岳出身名门，是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是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此人名不见经传，被人称为烟花浪子，是唐绍仪的“乘龙快婿”，早与日寇勾结，暗中策划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被蒋氏军统特务砍死后，他又为梁鸿志卖国活动献计献策；傅式说原是个教授，附汪后得到重用。

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有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愚园路的“经济资料室”。

他们对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也进行拉拢、收买。这些“地下工作人员”由于战时经费紧张，薪俸极低，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汪精卫集团一面采取“钢弹”攻势，通过汉奸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威胁；一面军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不少人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

汪精卫集团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

被网罗来的有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的郑大章；曾任武汉绥靖主任何就浚的参谋长的杨揆一；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师长、国民党军师长的刘培绪等人。

汪精卫又命刘培绪去北平，打起“中国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募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汪精卫依靠这些人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自任团长。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

汪氏集团在为世人舍弃的情况下，却以特工打天下。

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丁默村。李、丁二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李士群曾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后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他贪生怕死，叛变投敌，被任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同叛徒丁默村等人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书局编辑《社会新闻》杂志。



该杂志是国民党 CC 系特务的刊物。不久李士群、丁默村在中统特务内部狗咬狗的角逐中，将“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打死。李、丁因此同时被捕。丁默村因有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不久获释。李士群因无靠山被押到南京，饱尝酷刑。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 CC 系特务，她用大量珠宝首饰左右贿赂，买通了调查科长徐恩曾，李才得获释，留在南京任调查科编译员等职。南京沦陷时，他奉命“潜伏”下来。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在特务系统中又没有根基，竞争不过别人，总想改换门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投靠了日本，当了汉奸。

丁默村被保释后，一直爬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 3 处处长的职务，其地位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但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共产党叛徒张国焘时，因贪污招待费，戴笠乘机向蒋介石告他一状，受到追查，军统局第 3 处被裁撤，丁默村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养起“病”来。李士群派人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为首领，他一听，正中下怀，随即起程，来到上海。丁默村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

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又决定援助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务工作，使其“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每月货与 30 万日元，借与枪支 500 枝，子弹 5 万发以及炸药 500 公斤。同时要求这支特务组织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丁、李便招兵买马。李士群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世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丁默村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

汪精卫来上海后，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丁、李在同汪精卫会谈时提出合流条件：（1）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2）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

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与一些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上海、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丁默村不满意，仍坚持要上海市市长位置，汪精卫许诺说：“不久即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这样，双方才算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 第五章 刺刀下的政权

丁默村、李士群汉奸特务组织便选定沪西极司非而路 76 号为新的剿穴，这便是后来上海人一提到它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76号坐落在极司非而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私宅。丁、李对76号的房屋构造作了改进，把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两侧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了20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建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76号主要建筑物是正中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话接线室、贮藏室、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村、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丁默村晚上睡在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的浴室里。三楼有两个房间作为“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门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步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后来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丁、李强行将76号右侧一条“华村”弄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弄内20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家属的住宅。

丁、李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76号西邻“华村”两头墙沿下，搭间木房，派几个特务开起一家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开设什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从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互为联系。那76号门内外，更是层层设岗，戒备更加森严。

76号开张后，丁、李一伙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

76号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76号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丁、李一伙还越出政治暗杀的轨道，在黄浦滩上，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

8月28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预计有300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党员冒充党籍当代表。有的非国民党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尽管是随意指派、乱点鸳鸯谱，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

汪记国民党“六大”在76号开锣，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此案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

会议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等，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一张张标签。

会议在通过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上一阵骚动。名单中有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卢英等人，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两名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志宁左右，丁默村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胡志宁的话到了嘴边，只好咽回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一

看这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汪记“六大”草草结束后，于9月5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村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这便是汪精卫投敌集团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汪精卫急于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

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战治会议。

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

汪听了满心喜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

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梁说：“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王克敏、梁鸿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便加紧了同日寇进行缔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约的签字日期。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1）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方面，均有自主权。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2）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

（3）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项，日方将作必要的援助。

(4) 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

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严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 21 条凶恶 10 倍，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 1 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来汪精卫集团麀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平地飞升，可他却被汪内定为外交部次长，内心极为不满。陶希圣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所谓的 CC 派有矛盾，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CC 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

正当高、陶忿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通过杜月笙将其亲笔信交给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宋美龄也派人规劝高宗武的妻子，这正中高宗武夫妻下怀。高宗武即准备拆伙而去。高宗武、陶希圣对汪精卫、周佛海同日本人作过多的让步不满，又看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离他们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意识到再不悬崖勒马，必然死路一条，于是借口生病，拒绝参加日汪签字仪式。高宗武等密约签订后，将原件盗出，加以摘录或摄影，作为日后向蒋介石“反正”的见面礼。

高宗武、陶希圣态度反常，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说李士群、丁默村特工总部正在策划刺杀他。陶希圣深感自危，带着一支手枪护身。

1940 年 1 月 4 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秘密地乘美国轮船由上海抵达香港，由高宗武妻子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底片，也携带到港。1 月 21 日香港《大公报》在《汪的卖国密约》标题下，公开披露了日汪密约，同时发表了高、陶致该报及致汪精卫的公开信。

高、陶的出色表演，取得了蒋介石的欢心。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日后成为蒋介石的捉刀人之一。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横渡太平洋，跑到美国定居。

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是时，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

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另一个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正当汪记政权登台紧锣密鼓之时，出现了一幕所谓日、蒋、汪合流的

闹剧。日方通知汪精卫：“日方与渝方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因此，日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汪精卫听了头上犹如浇了一桶凉水。若日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送给蒋介石手里吗？汪精卫悲哀地想，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使用罢了。

在汪精卫集团内部，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他逃离到香港后，曾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对戴说：“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周到上海后，委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等人去重庆，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蒋介石通话，希望能与重庆合作，实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同蒋介石、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司徒雷登来到上海，托人找到周佛海。周佛海、陈公博同司徒雷登3人进行了会谈。司徒雷登说：“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

日本人背着汪精卫从1940年3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

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自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等3人谈判。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蒋介石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但他们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又不愿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备忘录”。

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爱国志士有针对性地掀起反对投降的高潮，迫使蒋介石不敢公开投降。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日本人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组府的时间定在4月1日。

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周佛海慢悠悠地道：“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11人，“临时”、“维新”政府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6名当然委员，4名列席委员，19名指定委员，11名招聘委员。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原是虎踞龙盘，气势雄伟，但沦陷以后，已是满目疮痍，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由日本人设计的所谓“国旗”，真是：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在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加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国府大礼堂内，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在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那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正式开始。汪精卫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法”政权。

按照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衣冠趋跄，宣誓就职。他们是：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村，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

汪精卫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他的目的是要重庆国民党也实行“和平”，宁渝间合流，可谓煞费苦心。

当天晚上，第一号汉奸头目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地说：“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讲话说：“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不料，在汪精卫等宣誓就职时，日本政府并不立即予以承认。汪、陈、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政权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日仍未理睬。

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铃木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在南京城里，又发生日本兵殴打市民的事情。原来，汪精卫集团要市民挂起“国旗”，不少市民不按规定挂猪尾巴似的黄色飘带的“国旗”，这下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日本给汪精卫脖子上套的绳索越勒越紧。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到 11 月中旬，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布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11 月 30 日，阿部信行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汪精卫又同阿部信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州国。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汪精卫也急忙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

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史上最

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建立起来。

## 第六章 千古奇冤

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1940年4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何应钦作《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并叫嚷：“必照军纪，予以严厉之制裁。”7月16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所谓“提示案”，其内容有：1、拟定“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2、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3、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1个月内，全部开到规定地区之内。

4、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3军6个师、5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

蒋介石的这个“提示案”的目的，是阴谋把战斗在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地区，把50万大军紧缩为10万人，然后围而歼之，同时取消陕甘宁边区，从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发展到9万余人，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是中央东南局书记，军长叶挺还不是共产党员，由于项英对叶挺很不尊重，使叶挺感到难以工作。毛泽东电告项英，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项英不听劝告，对叶挺处处冷遇，连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向叶挺传达。叶挺电告周恩来等，表示要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即致电叶挺表示挽留：“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

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两个月后，叶挺离开新四军去香港。当他得知他的家乡惠州一带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即找到在香港的共产党负责人廖承志，要求在粤从事游击战争，并不再坚持辞去新四军军长。尔后叶挺在香港组织起100多人奔赴东江，收编了溃散在广九铁路附近的5000粤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叶挺的离职在国民党方面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对周恩来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周恩来即与毛泽东电商，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叶挺，劝叶回新四军。

叶挺来到重庆，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并同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了长谈。

叶挺对周恩来说：“我只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如加入共产党，只有

去八路军工作，仍在新四军，蒋介石会怀疑我。”周恩来亲自送叶挺去新四军军部。周对项英说道：“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项英并未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也未见改善。周恩来对项英十分不满，他叮嘱在重庆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马上回新四军去，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项英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袁国平不敢“以下犯上”，项英也未改正错误。

蒋介石提出“提示案”，遭到共产党的拒绝后，蒋介石还没有敢最后下全面反共的决心，斯大林决定给蒋介石军事援助，则促使蒋介石下了决心。

1940年9月，苏德关系日趋恶化，希特勒准备东进苏联。苏联为防止日本进攻，避免两线作战，便急于同国民党修复外交关系。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力量太孱弱，还不能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的团结感发扬不够。毛泽东永远得不到美英大国的支持，而蒋介石有美英的援助。他决定不给中国共产党援助，而电告蒋介石，决定再次向国民党提供包括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汽车的军事援助，要求蒋介石排除对日议和的可能。

斯大林派崔可夫将军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10月16日，蒋介石接到斯大林肯定援助的电报，摸清了苏联的底细，便决定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施加压力。10月19日，蒋介石又生一计，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皓电，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诬蔑我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军”，不听其指挥等，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率10万兵力向皖东北进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率5万兵力向皖东进攻。

早在10月初，顾祝同就开始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顾先将担任对南昌方面日军防御任务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由赣东调至皖南，又下令调驻赣东的146师、驻浙东的79师、驻苏南的40师、驻浙东的63师，以及九战区的19师进至皖南，集结待命，时刻准备围歼新四军。不久，顾祝同又命144师、52师、40师、新7师、108师等共约七八万人部队迅速向皖南新四军靠近，或封锁交通要道、或占领战略要地。并布置说：“如果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了。”使日伪军严密地封锁了长江，并焚毁了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同时在苏南、皖南、皖东等地大举扫荡。李品仙、冷欣等部在江北、苏南布防堵击。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又说：“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



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佳电”，对“皓电”作了公开答复。对“皓电”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我军限期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同时，为了顾全团结抗日大局，采取了让步政策，表示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是时，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有 1 万余人，驻扎在安徽泾县和繁昌一带，地区狭窄，纵横不到 100 公里，而且北靠着日军封锁的长江、东临日伪占领区，东、西、南 3 方面还有国民党重兵包围。

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安危极为关注。早在 1940 年 3 月，中央军委鉴于国民党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发起进攻，致电项英说：“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到袭击。”此后，毛泽东等曾 20 多次电示项英，要他们认真准备北移，要有应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准备。

但项英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存在右倾错误，他一直株守皖南，等待时机。

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一行奉命来到重庆。蒋介石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在真正了解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是支持他，而非支持中国共产党，便冒险发动皖南事变。12 月 9 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凡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限本年 12 月 31 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 1 月 30 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 月 10 日，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该军“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毛泽东在 11 月和 12 月多次电令项英提高警惕，迅速渡江北移，并指定了北移的具体路线，严防袭击，并限令 12 月底全部北移完毕。但项英对蒋介石集团存有幻想，根本不相信国民党军队会对皖南新四军进攻，说顾祝同不敢进攻军部，一直按兵不动。

12 月 26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部队决定以战备姿态移动。军长叶挺前往上饶，去见顾祝同，与顾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以及保证北移安全等问题。叶挺同顾祝同谈了两天，最后定下：新四军开始北移时，所欠 9—12 月份经费当即转请补发；自 4 月份起尚未发给的子弹当转请补发；对在前方抗敌受伤的将士，答允予以适当的处置；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移动期限：部队限 1941 年 1 月 28 日前撤完。兵站留守处限 2 月 2 日以前全部结束。

新四军动身前，驻泾县的国民党 52 师，还请新四军军部篮球队到泾县去作临别的“友谊比赛”，故意装做相安无事的样子，这是蒋介石集团在事变前策划的阴谋之一。

国民党一方面催迫新四军北移，一方面又故意刁难，不发给军需补给，不批准限定北移路线的驻地。虽然新四军领导多次交涉，仍不予解决，故意拖延时间，从而为歼灭新四军寻找借口。蒋介石命令“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密电发出后，皖南上空，顿时战云密布，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即将开始。

新四军进行了北移的必要准备。1700 余人的北移先遣队，携重要器材 1300 多担，分三批移往苏南北渡。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眷属，也随之先行。

军部又把各部队共 9000 余人调到云岭地区，准备北移。以老一团、新

一团编为第一纵队，由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委；老3团、新3团编为第二纵队，由周桂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委；5团和特务团编为第三纵队，由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委。其余尚有军直、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约1000余人，随第二纵队前进。新四军军部在云岭驻了3年，部队已与当地群众结下血肉之缘。现在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只好委曲求全告别皖南。

1941年1月4日夜，军民依依惜别，部队里响起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军歌：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

别了，三年的皖南！

……新四军兵分3路，向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前进。那日晚上天漆黑，部队打起灯笼火把，如多条火龙，蜿蜒游动于起伏的山峦，织成奇景壮观。加上连日大雨，山径泥泞，河水陡涨，章家渡的浮桥也被冲坏，只好涉河，部队行动困难，甚为疲劳，走到5日下午，才到达茂林。

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命令第三、第五战区：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于6月下午3时，命令第三十二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即命令所部，以主力开始围剿茂林、铜山一带的新四军。

6日下午，新四军特务团前哨部队到达丕岭，就遭到国民党第40师的堵击。新四军军部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一纵出击求岭，二纵出击丕岭、博刀岭，三纵特务团出击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是晚，崇山峻岭中枪声四起，部队和国民党反动军展开了争夺山头的拚杀。

7日拂晓，各部队将指定的山头占领，继续前进。10时，军部越过丕岭，三个纵队，分3路会攻星潭，准备攻下星潭后，分两路向三溪敌40师师部处突围。但各部行动后，即遇到敌人碉堡的火力封锁。国民党军在1个月以前就在这些地区建筑了碉堡。当下，部队与敌人对峙激战。加上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未能攻下星潭。

此时，毛泽东、朱德致电指示叶挺、项英：“新四平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新四军军部决定，当晚12时开始折回，经高岭向太平方向突围。

后卫的五团在高岭已同敌79师打响了，激战正酣。突围高岭未能实现。军部决定，改道由茂林方向突围。

8日夜，上官云相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击。军部让3团为前卫，5团为后卫向茂林方向进发。夜里，大雨滂沱，军部达高坦时，敌144师已向高坦猛攻。叶挺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了一夜。9日晨，叶挺仍在前线，以教导队增援3团，士气大振，激战一日，将敌144师一部击退。部队伤亡甚大。

项英试图带小部队绕道突围，派人去请叶挺商议。叶挺因在前线指挥将士们激战，项英便同袁国平一起带小部队出走。9日晚，叶挺决定率全部人员经泾县与丁家渡之间的青弋江至孤峰突围，黄昏开始行动。沿途遭到顽军的袭击，且战且走，情况十分混乱，一夜只走了20余里，于是，全军退入葫芦形横五六里的石井坑中，情况十分险恶。

叶挺和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致电毛泽东，报告部队北进又受包围，项英等去向不明等情况。尔后叶挺命令紧急集合，他站在高滩阵地上，向全军作了极其沉痛而悲愤的讲话，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处于生死危急的关

头，唯一的道路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我想不到蒋介石的卑鄙无耻竟到了这步田地，真是较之秦桧犹不如的中华民族的罪人。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以挽回当前国家民族的危机，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如果我叶挺有所动摇，枪在你们手上，大家都有权打死我。”全军将士眼含热泪高呼：“坚决突围出去！”“誓与军长共存亡！”新四军将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向敌人，接连从敌人那里夺下五六个山头，到了10日中午，敌144师被新四军击退，但敌79师又从144师后面增援上来，双方对峙激战到天黑。局势更加困难。

项英和袁国平于10日下午重新归队，并致电中共中央，承认错误，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同时，叶挺、项英又致电毛泽东、朱德，请党中央速向蒋、顾交涉，要其撤围。

11日，新四军继续坚守石井坑阵地，战斗更加剧烈，并打退顽军多次进攻，但终因众寡悬殊，弹粮不济，情况变得十分危急。于是，新四军军部在石井坑召开会议，检讨受挫原因，制定行动方针。在顽军40、144、79、52、108各师合围的情况下，新四军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1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给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叶挺向全军将士说：“从我军长直到战士、伙夫、马夫，只要有最后一人一枪，也要和敌人拚到底。我们为了抗战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要在革命史上留下悲壮的一页。”12日，顽军发动5个师的兵力，进行向中心合击。叶挺指挥着将士，坚守石井坑，浴血苦战。是日，中共中央致电新四军，宣布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决定：1、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 2、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

中央又指示：新四军“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突围不成时，要准备打游击的计划。万一失败，要注意多保存一些干部。”当日黄昏，石井坑周围阵地相继失守，叶挺决定分散突围。

13日凌晨，在部队突围时，袁国平壮烈牺牲。

14日，战斗更加恶化，新四军经过8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弹尽粮绝，除傅秋涛、黄火星等2000余人突围出去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饶漱石强迫叶挺与顽军谈判。

叶挺说：“我现在是败军之将，根本没有条件去与敌军谈判，我是坚决不能去的。”饶漱石说：“这是军党委做出的决定，我负完全责任，我马上发电报给中央，你只管去谈判！”叶挺无奈，只好去谈判。他一到上官云相那里，立即被非法逮捕了。

日本陆军、空军和海军，也与国民党军队配合默契，陆、水、空三管齐下，围攻新四军突围出来的零星部队。南京伪政府的绥靖部队，亦帮同协力，出动作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隐蔽在泾县蜜蜂桶山蜜蜂洞里，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刘原总杀害。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均遭惨无人道的残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新四军战死和被残害计7000余人。

蒋介石干了这桩血腥勾当之后，竟于1月17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

员会名义发出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已将“其全部解散”，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而对“剿共”有功的上官云相和第二十五军则各奖赏法币5万元。

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的新四军。

是日晚，周恩来在重庆得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即打电话向何应钦提出严重抗议。他愤怒地斥责道：“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们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夜，周恩来义愤填膺，亲笔手书：“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翌日，周恩来将它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 第七章 延安整风

日伪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称快。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大好事！”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发表谈话说：“救国必须和平，和平必须反共”，并呼吁重庆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伪“同立于统一领导、统一国策之下，共同奋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见，皖南事变是日、伪、蒋勾结，共同反共的铁证。

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十分不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对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庆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重庆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发表评论说：“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局势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即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7个师1个独立旅，9万余人。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第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时局的12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 第二、取消 1 月 17 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 3 人。
-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当新四军军长。
-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又说：“如能实行以上 12 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说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

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检查总结，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皖南事变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思，实践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客观条件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影响了革命的发展。项英、袁国平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力量的发展比八路军慢得多，八路军发展了 5 倍，新四军才发展 1 倍，项英不听从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变中，投入蒋介石的罗网。在党内，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彻底清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指挥，通过王明等人还在起作用。王明在 1940 年 3 月公然再版了他在 1930 年 11 月写的《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在毒害一些人。抗战以来，党吸收了 70 万新党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热情和愿意接受教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常常成为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的条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考虑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

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党内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党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毛泽东4次找王明谈话，任弼时、王稼祥参加了前两次谈话，陈云和康生参加了后两次谈话。他们同毛泽东一起对王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希望王明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在同王明谈话中，批评了王明以下几个问题上的错误：（1）在形势估计问题上表现盲目乐观。

（2）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一战线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

（3）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王明助长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4）在组织问题上，王明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常用个人名义打带有指示性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擅自用中央名义发表许多文件。

王明没有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他解释说，他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

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布有病，从此便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王明有以下路线错误：（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从“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

（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

（3）王明到苏联后，虽然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同意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4）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在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

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级学习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全党整风从1942年初开始。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向全党发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号召。

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尔后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运动的领导机关。

整风运动共分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5 个阶段，历时 3 年多，至 1945 年夏才结束。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个方针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是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弄清思想路线是非的方法，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左”倾机会主义是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革命文艺的创作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对文艺界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 1942 年 10 月 19 日到 1943 年 1 月 14 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检讨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批评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一些同志所犯的 error，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 error，对闹独立性和官僚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演说，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号召开展全边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大生产运动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泽东要求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 90% 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 10% 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说凡是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的，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是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当时，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再加上连续遭到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根据地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无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无被盖的境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很贫苦。

1942 年 8 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由各县县长参加的征粮会议，天下着大雨，突然一声巨响，把礼堂的一根木柱子劈断，有一位县长当场被雷电触死。这件事很快传出去了，有个别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毛泽东没有追问是谁说的，更不准别人去抓什么“反革命”，而只是向干部了解说这话的原因。通过了解才知道，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群众有意见，便借“雷劈”发泄不满情绪。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 20 万担公粮的任务，减至 16 万担。毛泽东这样处理和解决问题，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了，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泽东发动部队，机关、学校开荒种地。他召集延安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非常简单明确地说：“国民党不发军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的。

解散回家吗？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难。”众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当场表示，他自己也参加开荒种地。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工作太忙，不必参加开荒。有人提出为毛泽东代耕，毛泽东说：“我一定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

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代耕。”毛泽东果然在自己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他白天工作一会，去那里劳动一会，夜间还要通宵工作，没过多久，他根据少年在家种田的经验，认为差不多了，让人认真丈量，果是一亩多地。他在那里种了蔬菜和庄稼，长得很好。

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八路军 359 旅，开赴荆棘丛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开荒 26 万亩，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平川稻谷香，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全旅的经济、物资不仅能全部自给，而且达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交了 1 万石公粮。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积极参加“变工队”、“扎工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 1942 年底，全边区共开荒 180 万亩，增产细粮 47 万石。学校、机关、部队做到粮食、经费自给或半自给。与此同时，边区的工业、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全边区有 62 个国营工厂，职工近 4000 人，年产土布 10 万匹，这些工厂不仅能炼油、炼铁，而且能修理机械、制造军火。全边区的公粮任务，由 1942 年的 16 万担，到 1945 年减至 12 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题了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3 年 3 月 16 日到 20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3 人组成，毛泽东任中央书记处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成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为副校长，任命刘少奇为中央研究局局长，杨尚昆为副局长。

毛泽东身居显位，能够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共产党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王明曾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作《学习毛泽东》的演讲，说：“青年干部学校既然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王明又说，要从 5 个方面学习毛泽东，即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王明把他的《学习毛泽东》的讲演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我的理论一点也不好，不要发表。”毛泽东在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在写给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的信中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1943 年 4 月，中共中央开始普遍的审查干部。在审查干部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偏差，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搞起“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 10 多天内便弄出大批冤假错案来，还在报纸上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大特务案，案件中的“主犯”已判死刑，即将枪毙。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错误，即批评道：“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务如麻，闹得人人自危。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下，搞审干肃反，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随便杀人，杀戒一开就难以收住，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训。只要有人在，错了好纠正；人杀了，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真正的特务也一个不杀。”延安行政学院被审查的人很多，他们不服，说道：“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定会给我们平反。”不少人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说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毛泽东看了申诉信，亲自到行政学院，在教职员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像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有些好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就叫做实事求是。”毛泽东提出，审干运动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甄别平反的指示。

## 第八章 秘密大营救

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在认识上多次出现波动。刘少奇在 1943 年春回到延安，找王明谈过多次话。王明想拉刘少奇支持他，不料刘少奇把王明谈的话向政治局作了报告。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 3 人一起同王明谈话，王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不愿再谈。

王明不但想拉刘少奇，还想拉张闻天支持他。张闻天在 3 月回到延安去看望王明，王明便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张闻天道：“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王明见挑拨不成，便转口说：“我以前也想下去工作，但后来生了病。”李富春同王明谈话，告诉他：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 700 多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王明认真作出检讨。是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王明见大势已去，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

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

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用三三制原则建立政权，早在 1940 年 3 月就开始实行了，

即在建立政权时，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 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 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1/3。三三制的目的，是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把根据地建设成为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爱国阶层的统一战线政权，防止少数党员包办代替。

1941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普选教育，动员全区人民不受财产、性别、职业、民族、文化等限制，以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全区 80% 以上选民参加了投票。按三三制原则改选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为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县以下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是经普选产生。

1942 年秋，晋西北根据地也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续范亭、武新宇为行政公署正副主任，林枫、刘少白为参议会正、副会长。1943 年初，晋察冀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成仿吾为参议会参议长，选举宋劭文为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为副主任。1941 年夏，晋冀鲁豫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申伯纯为议长、宋维国、邢肇棠为副议长，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子和为副主席。华中根据地各县以上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从 1942 年起，各个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奖励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在减租减息中，一般按二五减租和实行年利一分及一分半的利息。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生产积极性。

1941 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 3%。“精兵”的目的是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扩大和加强地方部队及民兵建设。

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一般以在山岳根据地二比一、平原根据地一比一为原则。根据军委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和民兵，建立独立的军事建制和指挥系统，进一步健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在一些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精兵简政一方面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精干了指挥机关，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加强地方兵团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对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日寇为一举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便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兵力定额逐年递减，以便抽调足够兵力转向南方作战。规定在华兵力：1940 年 11 月由年初的 85 万人减到 72 万人，1941 年减到 65 万人，1942 年减至 55 万人。但是，日军已陷入中国战场的被动和不利的情况，再抽出大量的陆军和海军对印度支那展开新的进攻作战，就遭到因兵力不足、陷于中国战场苦战而疲惫的中国派遣军的反对。他们认为，在穷于应付的不利情况下，缩减和撤退大量兵力，放弃相当的占领区，可能演成不可收拾的惨重的大败退。

因而，日本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的 11 个师团的计划落空。

1941 年 12 月 8 日，战火烧到了香港。日军出动以第 38 师团为主力的 1.5 万人装备精良的陆军部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下，从中国大陆兵分两路，沿着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南段推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从此，这个“灯

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城市，变成了魔鬼世界。

日本侵略军仅用三天时间，就突破了英国经营了两年之久的防线，迫使英军从 12 日起放弃了九龙半岛，退守香港岛。日军炮兵部队进驻九龙塘何文田阵地，架起远射程重炮，不分昼夜地对准香港的英军阵地和炮台轰击。一部分炮弹落在市中心区，每小时都给数以百计的和平居民带来伤亡，真是血肉横飞，尸骸枕藉。12 月 25 日，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进入香港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路上饿死和打死的人，尸体堆积如山，海上也到处漂浮尸体。香港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盗贼蜂起，汉奸猖獗，黑社会分子更趁机劫夺，弄得民不聊生。日军封锁了港九交通，日间岗哨林立，入夜实行宵禁，行人经过岗哨要鞠躬并被搜身，妇女倍受凌辱。日本特务机关和汉奸的魔爪也伸向了香港的各个角落。日军的行径，严重地威胁着港九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在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面临极大的杀身风险。一个名叫何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在香港各个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要茅盾、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文化名流到日本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

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是在 1941 年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来到香港的。他们原在重庆、桂林等地结社办报，通过各种途径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为人身安全，先后来到香港，并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来进行抗日、反顽的爱国民主活动，在香港出版各种进步报刊。其中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长江、胡仲持的《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等人的《大众生活》，茅盾的《笔谈》，俞颂华的《光明报》，郁风的《耕耘》，张铁生的《青年知识》，张明养的《世界知识》，马国亮的《大地画报》、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的“国际新闻社”，乔冠华、胡一声、吴金衡、郑书群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夏衍、于伶、金山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等等，一时蔚为大观。

香港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张文彬、梁广、尹林平、杨康华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开展紧张的营救工作。他们决定，首先分头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取得联系，设法把他们从香港营救到九龙，然后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从那里转送到大后方。是时，国民党顽固派乘日军攻占港九之机，派正规军 187 师和地方反动民团，围攻我东江游击区。游击区受日伪顽夹击，处境十分险恶。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行动。共产党人和东江游击队，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争夺战，他们英雄虎胆，神机妙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寻找、组织、偷渡，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批批地救出虎口。

廖承志等人按照营救方案，先行打通各地的关系。他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尔后去东江、赴韶关，沿途部署营救和接送的任务。

香港地下工作者则紧张地寻找联络困在香港的文化人。自日军攻占香港后，知名的文化人大都分散隐蔽起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邹韬奋已经六易其居，住进了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里，茅盾夫妇也搬了四次家。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他们，是很难的，地下工作者先找到了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昕，然后在他们帮助下，首先找到柳亚子和他的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经普椿，不久又

找到夏衍、千家驹、胡绳、邹韬奋、茅盾、廖沫沙等等。尔后将他们打扮成难民偷渡到九龙。

从九龙半岛到东江游击区，东江游击队开辟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元瑯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九龙至西贡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

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安全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时，周恩来发来了慰问电。周恩来还专门对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张友渔、韩幽桐、胡绳、吴全衡、于伶夫妇、章泯、戈宝权、沈志远、刘清扬等数十人的去向，分别作了具体安排。鉴于国民党特务对柳亚子、邹韬奋的缉捕很紧，周恩来倍加关注，指示南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接待和护送，确保柳、邹等的安全。周恩来要撤退人员：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他还从重庆派人去桂林，接济经广州湾已到那里的夏衍等人。为使营救工作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

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200天，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市，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属800余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刘清扬、张明养、羊枣、千家驹、黎澍、戈宝权、韩幽桐、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杨刚、胡风、沙千里、高士其、蔡楚生、司徒慧敏、萨空了、梁漱溟等。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急需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使其太平洋战争能顺利进行。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根据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意图，从1941年起，便在推行“治安肃正”的基础上，采取“治安强化运动”，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实行政治、军事、文化一元化的“总体战”，妄想确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面对着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毛泽东制定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来对抗日本的“治安强化”战略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军区建起了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造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从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扫荡”作战42205次，毙伤日伪军33.1万余人。但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伤亡很大，八路军由50万人减少到40万人，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有不少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根据地由1亿人口减少到5000万人口。

1941年1月25日，日军趁八路军外线作战之机，纠集附近5个县16个据点数千人，乘黑夜把冀东八路军后方机关活动地潘家峪团团包围。拂晓，日军进村后把全村男女老少驱赶到一个大院里，房顶上架起机枪，院内堆满柴草。面对赤手空拳的无辜百姓，侵略者大施淫威，边点火焚烧，边猛烈扫射，霎时间，1300余村民惨遭杀害。

1942年4月1日，日军以第27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5旅团、关东军、伪满军各一部、冀东伪治安军17个团，共3万余人，对冀东进行残酷大扫荡。日伪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东根据地实行包围，继之逐步压缩包围圈，并割断山区与平原、东部与西部的联系，然后分区进行“清剿”和“连线合击”，企图歼灭冀东军分区主力。冀东主力除留两个营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外，其余部队适时突破敌人封锁，越过长城进至热河南部地区，对敌占区交通线展开破击战，牵制敌之兵力，迫使日伪军结束“扫荡”。

日伪军寻找我主力决战阴谋未能得逞，便烧杀抢掠，约有 2 万群众惨遭杀害。2 万青壮年被抓到东北和日本去当劳工，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日伪军在冀东基本区建立了许多据点，使根据地 1000 多个村庄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

9 月中旬，日军 7 个联队，伪军 4 个团，伪治安军 19 个团，以及杂牌军一部共 4 万余人，对冀东游击区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冀东部队主力先机转到热河南部、滦东等敌之侧后地区，打击与牵制敌人，留下一部分游击队和党政干部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日伪军发现冀东主力外转后，为了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即以优势兵力反复出击，还拉夫拉丁，在长城内外构筑 3 道封锁线，并在热河南部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和“绝缘地带”，以彻底割断长城内外抗日军民的联系。

日伪军在冀东游击区根据地基本区大肆筑堡挖壕，进行分块分割，严密封锁、四处搜索“清剿”，残酷屠杀中国同胞。10 月 28 日，日军突然将潘家岱庄包围，在全村纵火烧房，把群众赶到广场上，用机枪扫射、火烧、活埋等手段，将全村 1280 余人杀害，又制造了潘家岱庄大惨案。

1943 年初，经过整训的冀东主力部队，除一部留在热河南部山区外，大部分返回基本区。日伪军慌忙调集 6000 多人，对突入基本区的冀东部队发动围攻。冀东部队在南青坨消灭日伪军 300 余人，转至遵化芦各寨地区。日伪军 1 万多人层层包围芦各寨地区。冀东部队白天坚守阵地，顽强地抗击敌人，入夜后迅速突击重围，并毙伤日伪军 400 多人。

战后，坚持基本区的地方武装乘机镇压汉奸，捕捉特务，袭击日伪据点。转到日伪侧后的主力部队连续取得袭击战斗的胜利。在长城内外，滦河以东，北宁路以南地区，冀东军民不断打击日伪军，攻克日伪据点，扩大游击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

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又是一番气象。他们根据平原斗争的特点，创造了“爆炸运动”、“地道战”等游击战术。

1942 年 5 月 1 日，敌人纠集 3 个师团、两个旅团共计 5 万余人，并以飞机、坦克配合，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一大扫荡”。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给冀中军区发去电报说：“你们肩负着保卫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光荣任务，这种任务正是和整个华北战局密切联系着的。我们正在号召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积极向敌出击，配合你们作战，你们的战斗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全华北八路军与华北抗日人民直接支援的。……冀中反扫荡将是一段异常险恶、异常痛苦的过程，然而这种暂时的黑暗，你们一定能战胜它。”5 月 1 日至 10 日，敌军 5 万多人，并配有 3 个中队的飞机和数十辆坦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滹沱河以南、滏阳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以鱼鳞式的纵深配合，实行“铁壁合围”扫荡，企图歼灭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

冀中主力部队机动灵活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使敌军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

5 月 11 日至 30 日，敌人对我分区和县级领导机关，实行“奔袭合围”，反复扫荡，结合“清剿”，建立据点、筑碉、修路，实行封锁分割，摧毁县区村各级组织，妄想达到“确保占领”之目的。冀中根据地被分割成 2670 多个块，敌共建立据点 1700 多个，修筑公路 7500 多公里，封锁沟 4000 多

公里。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造成冀中广大平原地区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的惨状。

冀中军区除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游击队坚持作战外，大部主力转向外线，配合县区游击队靠近敌薄弱点，以袭击、伏击打击敌人。地方武装则利用地道战、地雷战、村落防御战等战术同敌军展开斗争。

冀中七分区 22 团两个连，与赵户村民兵协同作战，在 5 月 1 日敌军一部进攻赵户村时，以猛烈火力阻击，毙敌 40 多人，缴获战马 8 匹。次日敌又来进攻，被我打死打伤 20 多人。

5 月 8 日，敌人发起第三次进攻，结果死伤 80 多人，狼狈窜回。5 月 23 日，敌人集中 1000 多人，向赵户村发动第四次进攻。我两个连的部队同冀无县大队一起，同敌展开争夺战。

敌人首先从南边进攻，接着便从东南、西南包围上来，我指战员同民兵一起，连续击退敌人数次冲锋。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我即退守村边，依房屋继续抵抗。机枪手边成杰被敌人炮火掀起的土埋了 5 次，依然向敌人射击。敌人冲锋了 10 多次，均被我击退，并留下 100 多具死尸。下午 5 时，敌人放了毒气弹，并向街口冲击，战士李三子利用房屋墙角工事，向敌人连续投掷了 180 多个手榴弹，打死 80 多人，敌人不能前进一步。敌人先后四次进攻赵户村，留下了 300 多具尸体，大败而回。

5 月 26 日夜，日军 110 师团驻保定的 163 联队主力，在联队长坂胜大佐带领下的 2000 余名日伪军，向定县北町村扑来。县大队政委赵树光指挥县大队和群众武装迎敌。敌人进至我前沿阵地 50 米时，机枪、步枪火力齐发，手榴弹和布设的地雷也在敌中间爆炸，四五百名日军倒在血泊中。敌大队长持刀督战，当即被我击毙。敌人 3 次冲锋均被击退。敌又组织敢死队，也被一捆捆集束的炸弹炸得血肉横飞，激战了 10 多个小时，我手榴弹和子弹打光，敌人突破阵地。我指战员被迫转入地道。是时尚缺乏地道战经验，地道内挤满了群众，混入地道内的汉奸特务乘机煽动破坏，地道内失去交通和同敌周旋作战的作用。敌人将各种毒气点燃后投入洞里，又将毛柴点燃投向洞里，将洞口密封，使毒气在地道内蔓延、扩散。千余名军民惨遭毒害，中毒较轻者爬往洞口，被枪杀或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

冀中军区从北町惨案中吸收教训，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确保地道畅通无阻，充分利用地道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各地立即照办。

5 月 30 日拂晓，深泽、安平等地千余敌人向白庄扑来，驻在该村的 200 多名八路军和 30 多民兵，在副营长指挥下先把老百姓经地道送出村外，尔后战士和民兵利用房屋和街口工事，同敌人展开激战。村西口敌人 5 次发起冲锋，均被击退。我 30 多名战士带 1 挺轻机枪通过地道从村外钻出来，从敌人的背后进击，敌人压不住阵脚，顿时大乱溃退，敌指挥官晋藤联队长被击毙。这次战斗，我伤亡 20 余人，毙伤敌人 400 多人。

次日，敌人把附近大小据点兵力悉数调来报复。我军决定从地道内转移，6 位民兵自告奋勇掩护。副营长不许。他们却说：“我们地理熟，打掩护我们是老手！”6 位民兵在通街口的一座地下堡里，打死了冲进村内的 20 余名鬼子，尔后也安全转移。

敌人占了白庄，却不敢下地道。直到下午，才把地道挖开了一个口子，向里边放毒气，投手榴弹，是时，八路军和民兵早已通过地道，游击在辽阔的原野里了。

## 第九章 军民反“扫荡”

我军3个连于6月9日来到深泽城东北15里的近敌区宋庄，该村是有400多户人家的中等村落，分为南北两部。部队同民兵建立联防。那日本旅团长坂本少将率领日军300多人，向宋庄扑来，我军以村沿阵地为依托，以潜伏手段痛击敌人，我1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集中火力猛烈射向敌人，当场将坂本少将旅团长击毙。300余日寇立即分两路从东、北两面向我军前沿阵地进击，我军连续打垮日寇数次冲锋。时至中午，日军集中深泽、无极、定县、饶阳、旧城、安平等大小据点日伪军1800余人，并配以4门大炮，7挺重机枪，80余挺轻机枪，会攻宋庄，战斗异常激烈。敌军连续发动38次冲锋，均被我军击退。直到夜晚，敌人才不得不停止冲锋。但敌人点燃一堆堆烈火，并以零散的枪声，阻止我军突围，以待新的援兵继续对我围攻。

我军避开敌人火堆，于10日凌晨1时胜利地突出重围。天亮后，敌寇集中火力向宋庄全面进攻，结果扑了个空，沮丧地拖着700多具死尸、400多个伤员，狼狈而回。我300名英雄健儿，与2000多敌人血战16个小时，毙伤日军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1100余人，我军伤亡仅有13人。

日寇为了扑灭冀中抗日烈火，采取所谓“淘水捉鱼”政策，派出大量的“清剿队”“易扶队”，逐村、逐院、逐屋地搜索我军政人员和地方干部，只要发现蛛丝马迹，便全家抄斩，血洗全村。冀中人民英勇无畏，忠贞不屈，机智顽强地同敌人周旋。冀中军区将大兵团划整为零，组成机动灵活的二三百人的战斗单位，采取“敌进我退，避实就虚”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并抓紧有力时机，相机进退，痛歼小股敌人。民兵和地方武装加紧战备，坚壁清野，抓紧地道挖掘，广泛进行爆破活动，凭借地道坚持村落战。

日寇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采取了“驻屯清剿”手段，调集重兵，重点突击我游击战争最活跃地区。冀中人民便创造了神奇的地道战。军民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挖成家家相通环绕全村的隧道，尔后村落地道再向四野延伸，与邻村地道衔接起来，便构成村村相通的地道网。地道战变敌军碉堡林立、沟路如网的敌占区的平原为我军后方。我军小型兵工厂、医院、报社、印刷所、电台、仓库都有了稳妥的工作场所。日寇为了破坏地道，使用水攻、火攻、烟熏、施放毒气等手段，都未奏效。我军里外夹攻，敌人丢下成百具死尸，狼狈而逃。我军又利用清纱帐的有利条件，发动青纱帐战役，毙伤敌人，平毁公路和封锁沟、炸毁碉堡据点。

日寇集中7万余人兵力，从1941年8月起对我北岳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在两个月内摧毁我山区根据地。日寇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法，并施以野蛮的“三光政策”，有计划地制造“无人区”。

我华北各地区部队配合晋察冀北岳地区的反“扫荡”，协同作战。刘伯承部向平汉铁路南段进击，先后攻克6座县城，摧毁敌据点200余个，连战连捷，敌伪胆寒。晋西北部部队攻入忻口车站，使同蒲铁路北段一周不能通车。

敌寇主力于9月中旬被迫撤退，但仍留2万余人于边区内继续“扫荡”。

9月24日清晨，3500多名日军带领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突然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包抄。被合围的狼牙山上有地方党政机关、周围村庄群众和掩护部队1个团，共计有三四万人，团长邱蔚根据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指示，命令7连2排6班战士坚守阵地，掩护部队、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

部队、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地撤走了。6班5名战士扼守着狼牙山。他们趁着月色，把手榴弹一束束捆扎，当作地雷从山脚下一直埋到半山腰，尔后爬上狼牙山通往棋盘陀的路上隐蔽起来，等候敌人进攻。次日拂晓敌人果然向棋盘陀猛扑上来。敌人进入地雷阵，轰轰轰天崩地裂，大批敌人被炸死。

硝烟过后，敌人又向山上爬来。5名战士揭开手榴弹盖，子弹进膛，目不转睛地盯着敌人。敌人越来越近，只有二三十米远，班长马宝玉喊：“打！”手榴弹飞进敌群中爆炸，接着举枪向敌人射击。敌人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敌人连续4次冲锋，都未成功，死伤90多人。

日军用炮火猛轰。5名战士撤离原地，向棋盘陀山上转移。每到一险要处，即扼守一阵，杀死一批敌人。敌人吃了几次亏，又不知我有多少兵力，不敢硬拚直冲，他们使用炮轰、机枪扫射和轮番冲击的办法进攻。5名壮士沉着战斗，一直打到中午，敌人未能爬上棋盘陀。

班长马宝玉见已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但若沿部队转移的路线撤退，有可能把敌人引过去。若不走这条路，只有向棋盘陀的顶峰的一条路，那是三面都是悬崖的绝路。

马宝玉毫不犹豫地带领4名战士向棋盘陀顶峰攀去。5壮士攀上顶峰，大批敌人接踵而上。

5名战士弹尽，便投石头袭击敌人。敌人见他们没有子弹，向他们涌来。马宝玉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示意4位战士向他靠拢。4位战士一齐靠向班长。敌人一齐涌来，嚷着：“抓活的！”马宝玉大吼一声：“去你娘的！”即将手榴弹甩向日本兵。10多个日本兵被炸倒。

马宝玉大声喊道：“我们宁愿牺牲，也不能当俘虏！同志们跟我来！”五名壮士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尔后纵身跳下23丈高的悬崖！

敌人惊呆了，日本兵在崖头上排成几列，竟恭恭敬敬地向悬崖处三鞠躬，他们被我中华壮士捐躯殉国的牺牲精神所折服。

五壮士中的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当场牺牲，葛振林、宋学义受伤后得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授予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授予葛振林、宋学义“勇敢顽强”奖章。

我主力部队挥戈回击，敌人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遂全部退走。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军歼敌8000多人。华北敌酋冈村宁次哀叹：“肃清八路非短期间所奏效，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1943年，日军对游击区采用“逐步蚕食”、“跃进蚕食”手段，以分进合击的姿态，突然占领，驱逐抗日力量，控制要点，筑路挖沟，修建碉堡，图谋一举蚕食成功。日军纠集1.2万余人，对北岳根据地分区辗转“扫荡”。日伪军或轻装急进，施行大迂回包围，或夜间远程奔袭，直插根据地腹心地区，捕捉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根据地军民抓住敌后守备空虚之机，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日伪军后方，开展袭击战，交通破击战。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一起进行麻雀战，地雷战，相机打击敌人，给日伪军以很大威胁。



5月中旬，日伪军700余人由党城进犯阜平，途经五丈湾。民兵队长李勇率领游击小组，布下地雷阵，炸死日军中队长以下30多人，途经龙泉关时，又踏响李勇游击小组埋设的地雷，死伤100多人。

李勇的地雷战术，不仅做到“敌到雷到”、“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叫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

1941年之后，日军更加紧了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进攻。日军在平汉铁路西侧构筑了3道封锁线，企图割断我太行区与冀南区、冀鲁豫区的联系。在冀南、冀鲁豫平原地区，日伪军以纵横交叉的公路、碉堡、封锁墙，将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

十八集团军总部命86旅、决死1纵队、212旅组成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纵队兼任太岳军区工作，军区下设6个军分区。于是，陈赓、薄一波便在根据地、边区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武工队相结合的游击集团，与敌展开斗争。

日寇集中3万多人，对太岳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电击反转”的大扫荡。太岳军区以主力分遣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活动，内线外线积极配合，进行反“扫荡”作战。

在不到1个月之内，毙伤日伪军1360余人。

日寇把“扫荡”的中心移到太行区，使用“捕捉奇袭”战术，以优势兵力连陷黎城、洪水镇、蟠龙镇、涉县等。我军民以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杀伤敌军。敌退出涉县。

不久，日寇以“电击反转”战术复占涉县，并沿清漳河向北猛犯，指向黄崖洞。

黄崖洞是太行根据地腹心地区。沟壑两边土黄色的石壁拔地而起，犹如刀削斧劈一般，抬头一线天，低头难伸拳，地势极为险要，这里军事上叫“南口”，“纵深千米，迂曲回环”，俗称“瓮圪廓”。从那里沿着右侧峭往上走，可达制高点起马站、桃花寨。

过桃花寨，前面有一座两厢对峙的天然石台，一道飞瀑从三四丈高的石墩上跌宕而下，隔绝去路。横放一架云梯，方可通行，故取名断桥。过了断桥天险，葫芦形的黑山沟豁然开朗，穿过金石坪，便到沟口上。沟口一分两岔，左通水窑，有泉有土，兵工厂设在这里。左边是黄崖主峰，崖畔上有个天然石洞，洞内设军火仓库。沿着沟下那条小路，可到西北的左会山垭口，是黄崖洞通武乡的唯一通道，八路军特务团一部担任警戒。

日军第36师团主力5000余人，在第4、第9混成旅团一部配合下，分路向黄崖洞、桃花寨、水腰山猛攻。我特务团1000人奉命坚守阵地。敌以炮击、兼施放毒气，久攻不克。次日，敌强攻水腰南陵口、桃花寨东南阵地，死伤200余人，不克。第三日，敌集中炮火向桃花寨、南陵口阵地猛攻，血战竟日，反复冲杀，死伤300余人，仍不克。第四日再战，死伤600多人，大败而退。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命769团、772团、新1旅2团、14团在黄崖洞与黎城间的三十亩、曹庄一带设伏。狡猾的日军虽多次派出侦察开路，但伏兵与山川混为一色，他们无法察破。日军大部队像一群鳧鸭一样进入伏击圈，顿时枪声四起，弹如急雨，敌人丢下了500多具尸体，狼狈窜回黎城。左权命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黎城。

1942年5月24日，日寇兵分数路并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将八路军总部及直属机关部队包围在桐峪、尖庙、周家埝、南艾铺地区。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党校、报社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山沟里，四面都响起激烈的枪声，日军采取“张网捕鱼”、“纵横合击”的战术构成包围圈，并统一控制包围部队的前进速度，以防止八路军乘隙突围。各路分散部署的敌军指挥官为协同策应，都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进行突然急袭。日军独立飞行的红头飞机，围着总部转移的高山深沟轮番俯冲投弹。日军在窑门口、南艾铺、十字岭、挖拉铺东峪一线摆下“铁环合围”阵。

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门的上千匹骡马在敌机投弹、扫射情况下，惊跳起来，有的负伤倒下，有的吼叫，有的挣断缰绳在沟上乱窜。熙攘无序的机关人员被骡马与辘重堵在山沟里，左权见状，急忙跳上一匹黑骡，兼前顾后地把混乱了的机关队伍迅速集合起来，加快行军的速度。

彭德怀、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第一纵队，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第二纵队，由政卫连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后勤部为第三纵队，由杨立三率队向东北角突围。

日军发现八路军分路突围，快速紧缩包围圈，密集的炮弹、子弹向突围队袭击。彭德怀没有立即突围，左权见情况万分危急，命作战科长王政柱和两位作战参谋，随彭总一起突围，并命1个警卫排掩护，彭总见还有不少人，特别是机要部门的女同志未突围出去，不愿先走。左权道：“彭总，你的安全事关重大，现在日军摆的是铁环合围阵，再晚一会突围就更困难了！”即命人把彭德怀扶上马背，冲出重围。

左权等彭德怀突围后，急奔司令部直属队。十字岭硝烟滚滚，日军野兽般的吼声同掩护部队的喊杀声、枪声、炮声、手榴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左权登上一块高地，继续指挥突围：“同志们冲，突出山口就是胜利！”一发炮弹在左权身旁爆炸，左权壮烈殉国，年仅36岁。左权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出，太行、晋察冀、冀西北、冀鲁、平西、鲁西北响起“为左权将军报仇雪恨”的口号，在1个月里，太行军民歼灭日伪军3000多人，摧毁伪组织340多处，攻克碉堡、据点30个，解放民夫2000多人。

山东军民在抗日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41年2月，八路军115师教导3旅两个连，在津浦路西的反“扫荡”中，为掩护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和超过他们10倍的敌人奋战终日，毙敌近千。日寇施放毒气，我两连健儿全部光荣殉国。

冬季，敌人以5万重兵对我沂蒙山区进行2个月的“扫荡”。我主力为避敌锋芒，由内线转入外线，敌人合围扑空。当敌人兵力分散时，我部队又秘密回到中心区，采取伏击、截击等手段。10天打了7仗，毙敌千人。

1942年秋，日寇对胶东地区“拉网扫荡”持续40多天，除使用1.5万人陆军外，还有海军、空军配合作战。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后，分成许多小股，互相保持火力联系，边压缩，边搜索，白天摇旗呐喊，夜晚沿合围圈点火，控制山头，封锁要道。11月，日寇5000人合围博山东部的马鞍山，我军一个排同敌人打了两天，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刺刀、枪托和敌人死拚，给敌重大杀伤，敌蜂拥而来，排长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战士们高呼：“宁死不做俘虏！”一齐携枪堕崖殉国。

11月24日，日军“收网合围”马石山，有2000多群众被围困在山上。

我军 5 旅第 13 团 1 个交通班执行任务后返回途经马石山，毅然决定带领群众连夜突围，他们同民兵一起往回数度冲破敌“火网”，护送出 1000 多群众突围。拂晓后，他们再次进重围抢救群众，被日军团团包围在山峦上。全班 10 名战士奋勇杀敌。7 名战士阵亡，3 名战士弹尽路绝，紧紧拥抱一起，拉响仅剩的 1 颗手榴弹，血染马石山岗，英勇献身。

1943 年 11 月，我鲁中 1 个连，在敌人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下，凭借险要地形，在岱崮山上战斗 18 天，牵制敌人 2000 余人，以伤 7 人亡 2 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 300 多人。

山东军民空室清野，以搬空、藏空、躲空“三空”，对付敌人野蛮残酷的抢光、杀光、烧光“三光”政策。在平原地区挖掘了纵横如网的抗日交通沟，使敌人快速部队无法行动，又便于我军隐蔽活动。各地还建立了侦察网和通讯网，广泛开展“麻雀战”和“地雷战”，对敌人进行袭扰、围困、伏击。

特别是地雷战使敌人无从捉摸、防不胜防。在普遍开展的“飞行爆炸”运动中，民兵把大量地雷埋到敌人的交通线上和据点周围，甚至埋到敌人的堂房、操场里。敌人出动时，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因此不得不用牛拉着石滚在前面探路。鲁南铁道游击队更使敌人胆寒。

铁道游击队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线上，使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物资的车厢忽然前后脱节。游击队将列车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送往根据地，敌人赶到出事地点，已人去物空，列车也化为灰烬，追到微山湖边，茫茫湖水，不见人迹。

这支游击队开始只有 18 人，3 支短枪。为了解决枪支问题，决定去打枣庄火车站对面的“国际洋行”。这洋行实际上是个特务机关。游击队员们摸了进去，杀了两个日本兵，夺了 1 支乌龟匣子。第二次从洋行南边厕所旁挖墙而入，将 14 个日本兵杀死，夺走他们手中的枪。铁道游击队逐渐壮大起来，6 年发展到 2000 多人，从敌人手中夺回 400 多个村庄。

新四军在苏北战场上英勇杀敌。

1941 年 7 月 18 日，日军第 15、17 师团和第 21 旅团 1.7 万余人，伪军 3 万多人，兵分 7 路合击盐城。“扫荡”的规模之大犹如泛滥的洪水。新四军第 3 师转出外线，以奇袭、伏击等手段毁敌汽车 60 多辆，消灭日伪军 300 余人，并攻克蒋营、涟阳、永兴、新河等城镇。

苏中新四军第 1 师连克黄桥、古溪、加力市等据点，毙伤日伪军数千人。

1942 年秋冬，日伪军几万人从陇海铁路南压，由淮海区而盐阜区，由盐阜区而“扫荡”到苏北平原各地。日军首先控制纵横交错的交通线，建立了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据点，修起坚固的碉堡，然后由点、线向面扩展。苏北地区被一块块地分割，敌人分区进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用“梳篦”、“拉网”战术“清剿”，残忍地实行“三光”政策，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

苏北游击队、民兵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牵制敌人。

1943 年 2 月初，新四军第 3 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开展反“扫荡”战斗，20 多天内，在盐阜地区歼敌 1800 余人，攻克据点 50 多个。

## 第十章 “最后一跳”

正当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蒋介石却接受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曲线救国”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对其心腹们说：“对日本这场战争，我本是不主张打的，后来没有办法，非打不可，也只得打了，看看现在成何局面！战争初起时，我在庐山曾对一些高层领导说过，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可是目前共产党越来越多了，力量越来越大了！日本也发现了这个危机，因此已把重心指向共产党，我们也早该把重心指向共产党了！千万不能够让共产党再进一步获得人心，千万不能够让汪精卫利用这个局势获得日方信任，我们要在剿共方面同日本方面有所配合，让日方对我们有信心！万一有人说闲话，你们不要管，这是‘曲线救国’，你们要按照我的口号去做，‘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在蒋介石授意下，由汉奸陶希圣代笔写的。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而已。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歌颂中国封建主义。书中写道：至于所谓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

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我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

……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者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寄托，……。

蒋介石在极力夸大国民党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之后，便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新式割据”、“新式军阀”，是“革命的障碍”。尔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地宣称“二年内决定命运”，想在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受到日本和汪精卫的特别关注。不久，戴笠就收到上海的秘密电台报告说，最近将有一个“神秘人物”，前来重庆。蒋介石左盼右盼，终于把汉奸吴开先盼来了。蒋介石即派朱家骅、潘公展、洪兰友、杜月笙等百余人赴机场欢迎，又有军警周密保护。

汪伪政府要员吴开先来到重庆的第3天晚上，蒋介石即单独同他谈话，蒋说：“本来，我老早要请你来，无奈外面流言太多，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吴开先一躬到地，答道：“委员长的处境，南京、北平、上海各地友人都很清楚。

自汪先生以下，都委托开先致敬请安。动身之前，日本军部小林少将说：日本同重庆迟早会化敌为友，共同反苏反共。今日之下，准许汪先生的政权独立，完全是希望蒋委员长回来的准备，即华北也可以恢复战前政委会的组织形式。”蒋介石道：“这个，慢慢谈罢。”吴开先又道：“日本方面要先向委座劝驾，双方合作，共建亚洲和平，他们这样说：如果中日和平了，日军便可以从广州、武汉撤退，方便我们从武汉、广州派兵北上剿共；不过南京与沿海一带暂归日军掌握，待共产党全部肃清后归还；华北定名为剿共

区；至于汪先生的去留问题，倒容易解决。”蒋介石道：“这几个条件，我当然可以考虑的，双方都为和谈再创造些条件。”蒋介石感到“蒋日合作剿共”而让日方出面，问题更好办了。于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得到蒋介石默许后，在苏南率5万人向日军投降。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总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等，在蒋介石“可略走曲线”的指使下先后投敌。庞炳勋于1943年5月在豫北投敌后，即被敌伪委任为晋冀鲁豫“剿匪”总司令。山东国民党李仙洲部队联合日军夹击八路军，公开宣称“奉中央命令来打八路军”。

到1943年8月，先后有20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名旅长、参谋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和50万军队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国民党50万余军队投敌，占80万伪军的60%。这些“曲线救国”的军队，成为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反动力量。

后来日军无条件投降时，这些“曲线救国”的汉奸们，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同共产党的军队争收失地，抢夺胜利果实。

蒋介石的“曲线救国”并不限于军事方面，在情报和特务工作上也是联合日伪反共。

国民党山西省委李犹龙，在太原帮助日寇反共，后来回到重庆，被委任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1942年下半年，大汉奸陈公博竟为重庆方面设立了两个专用电台，一台供蒋介石侍从室刘伯川使用，一台是供戴笠使用。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去，陈公博当了南京汉奸政府主席。蒋介石通过何世桢、顾保安、赵冰谷、何柱国等和陈公博联系，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反共。何柱国派人去见陈公博说：“奉蒋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陈公博即设电台与何柱国通电。

戴笠竟将八路军、新四军布置地域、番号及指挥官姓名详表交给陈公博，陈即按表布置剿共。

重庆国民党密电陈公博：“转告刘启雄、孙良诚、吴化文等，目前应严密布置，协力剿共。”蒋介石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43年8月死去的机会，在9月6日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一手操纵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掌握全国一切军政大权。接着，蒋介石在全会上“选举”自己为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就有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等职，成了一手包揽全国党政大权的大独裁者。

国民党统治区与敌后根据地团结抗战、欣欣向荣的情况相反，黑暗重重、充满着十分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而不允许其他党派和人民群众有任何民主和自由。为了箝制舆论，国民党特务横行，并规定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蒋介石为维护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提出“全国党化”的口号。宣扬“中国人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中国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权利和义务”，处处推行“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办法，使许多人糊里糊涂地成为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

蒋介石拨出巨额特务经费，聘请美国特工专家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戴笠为主任，美国军官梅乐斯为副主任，参加这个特务组织的美国特务就有1000多人。

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各单位普遍建立特务组织，有许多地区设立了集

中营，诸如江西上饶、重庆磁器口、贵州息烽，西安集中营等，囚禁和残害共产党员、抗日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国民党特务在国统区内横行无忌，任意捕杀人民，造成一片恐怖的黑暗世界。

从城镇到农村，普遍实行保甲制，保甲机构由特务系统操纵和指挥。保甲长必须加入国民党，得到特务支持的保甲长横征暴敛，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维护着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反动政权，在经济上进行毫无限制的掠夺。从1942年7月份起，施行“货币统一发行办法”，四大家族掌握的4大银行存款数额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大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行外汇统制政策，因外汇紧束，又助长了黑市交易之风，国民党权贵们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卖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特权，又垄断了金融，进一步发展到公开垄断工商业，垄断原材料加工制品，以及对内对外的贸易，从而操纵市场。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而被官僚资本吞并。在农村，苛重的田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农民的剥削量高到农民收获量的一半左右。加上高利贷、抓壮丁、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走投无路。

广大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重庆，甚至中产阶级也难以度日，大街上乞丐、饿殍、卖儿卖女的越来越多。国民党各级官吏寻机中饱私囊，勾结奸商，囤积居奇，营私舞弊，利用权势地位贪污受贿，大发国难财。大官大发财，小官小发财。国民党要人仅在美国、巴西、瑞士的存款多达5亿美元，利用这笔存款可装备300个机械化的国际师。孔祥熙1人在美国的存款就达1亿美元。国民党官僚们在昆明囤积的物资，足供全省5年之用。国民党各战区军官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和普遍。诸如就地抽税、敲诈民财、虚报兵额、克扣军饷、走私贩毒，屡见不鲜。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群众为争取生存权，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民族起义。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在1944年7月举行起义，反对第一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并将前往镇压的第69军第28师缴械。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其海上交通线也更加难以维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决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与南洋地区同日本建立交通联系。

日本大本营为了修复黄河大铁桥，恢复南北两岸的交通，命令关东军拨运铁桥钢梁和架桥机械，由铁道兵在河南中牟县霸王城附近进行修复工作，同时命令关东军拨运渡河器材和部分兵力，支援华北方面军。

1944年3月下旬，日军修复了中牟附近的黄河大铁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面极其秘密地调兵遣将，把第12军所辖的3个步兵师团14.8万人，集结在黄河北岸的新乡南部和南岸的开封西部地区；一面进行虚假宣传，制造情报，以迷惑麻痹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使他们认为日军准备西进去攻打重庆，达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目的。

东条英机发出命令，要求在4月下旬从黄河两岸发动攻势，1个半月打通平汉铁路，6至9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这个命令定名为“一号作战”。

这是东条在中国大陆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故称“最后一跳”。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 400 公里，从湖南的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 1400 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 600 公里。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日军出动约 50 万人，10 万匹战马，1 万多辆汽车，1500 门大炮和 250 架飞机。

4 月 17 日夜，日本第 12 军的部队强渡黄河，在中牟突破了守军的阵地，18 日凌晨便向郑州突进，19 日傍晚攻陷郑州，日军主力接着向新郑一线集结，于 23 日攻陷密县。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蒋介石懵头转向，不知所措。随即召集军政要员紧急会议。

参谋长、亲日派何应钦，对日本的意图了解得最清楚，他发言说：“昨天我同几位盟军高级军官在一起吃饭，他们向我转达了盟军对河南战局的看法，美国认为东条看到欧洲战场上的苏军节节反攻胜利，太平洋上的盟军也发动了越岛进攻，海上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可能，所以就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配合海上作战，并可与孤悬在南洋的日本兵联系起来。”对何应钦的看法，蒋介石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吗？”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说：“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昨天几位美国空军朋友也对我说，日军这次攻打河南，在于决定执行一个早已准备的企图，就是开放东北到广州与越南的直接铁路交通线。因为盟军的潜艇与空袭一天天加强，日军在沿海的移动很受影响，而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在铁路沿线的活动更使日军伤脑筋。日本占领军远布于东南亚，急需一道安全的输血管，而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已不再是安全的了。”蒋介石故作镇静地说：“我已经电令河南前线的将领，要他们一定顶住！日军在河南只有五六万人，而我们在河南却有 40 万精锐之师；40 多万对付几万人，无论如何是不成问题的！”蒋介石话音刚落，陈布雷送来十万火急电报：“郑州已告沦陷！”蒋介石立刻惊恐万状，问：“怎来得这么快！蒋鼎文哪里去了？”何应钦忙说：“委座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后，他已奉调调走了 3 个军的兵力回陕西反共去了。”蒋介石又问：“胡宗南上哪里去了？”何应钦又答道：“胡司令奉委座的命令，派出 2 个军，去新疆镇压叛乱去了。”蒋介石又恼怒地问：“那汤恩伯呢？”“汤司令今晨也曾给我一个电报，说是按着委座指示，为了保全实力，不打算和日本死拚，他已调集了 800 辆大卡车，装运重要东西，看看风头再说。”河南守军司令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汤恩伯，他拥有 43 个师，兵力可谓雄厚，武器可谓精良，但这个汤司令只知搜刮民财，祸害百姓，河南人称他“水、旱、蝗、汤”，即四大灾害之一。他对日寇却十分亲善，这个号称 40 万精锐之师的统帅，与日本交战，一触即溃，望风而逃，20 天之内就丧失郑州、洛阳等 49 个市县。

蒋介石虽说有 321 个步兵师、22 个骑兵师，号称 600 余万人军队，又有苏联、美国、英国等国援助，美国在 1943 年底援助蒋军的军事物资计为 3.927 亿美元。另外，美国为蒋介石训练和装备 30 个师的部队，向蒋提供战斗机和飞行员，成立航空志愿队，帮助在中国设立军官学校，派出军事代表团等。然而，蒋介石把外国援助的军事物资、用小部分来抗战，用大部分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路线影响下，国民党一些爱国将领无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些人以保存实力作为保持官位的手段，一见日军压境就仓皇退避，望风而逃，汤恩伯就是这类将领中的一个。

5 月 1 日，日军从许昌沿平汉路南进，5 月 5 日占领郾城，9 日到达确

山，设在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令在长台关的日军北上，与南下日军会师。至此，平汉线南段完全沦入敌手，中断6年的平汉铁路又恢复了交通。

日军占领许昌之后，便转向西进，攻打郑县、登封、禹县、襄城，对中国军队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术，在洛阳周围消灭汤恩伯的主力。洛阳东南地区汤恩伯军队一部陷入日军包围圈，损失很大。日军第十二军主力乘胜前进，向洛阳、新安猛扑。

侵占山西的日军约2个旅团，从垣曲南下，强渡黄河后，攻下澠池，向新安推进。孟津日军也从北面近逼洛阳。至5月14日，日军从四面包围了洛阳。19日，敌人以部分兵力攻城，但被击退。23日，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开始攻打洛阳。25日，中原名城洛阳终于陷入敌手。日军38天完成了“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的计划，占领了河南全境。

5月28日，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从南京潜入汉口指挥部，准备向粤汉、湘桂铁路发动猛攻，以打通这两条铁路线，消灭沿线两边的中、美空军的飞机场，并威胁重庆，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

日军调集11个师团，36.2万人，此外还有海空军。5月27日、28日，日军5个师团12万人从湖南岳阳一带分3路向南进军，准备在长沙北面的沅水和益阳之间、新墙河和汨罗河之间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然后迅猛南下，夺取长沙。

长沙守军还没有望见敌人影子，内部却先争吵起来。城外岳麓山炮兵要求城内步兵保护，城内步兵立即拒绝，说是要请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然后才能决定，但哪里都找不到薛岳，炮兵们赌气不干，一窝蜂似地散了，步兵没有炮兵掩护，也乱糟糟地撤退，走得慢的便做了日军刀下之鬼。日寇占了长沙，继续南攻。

此时，战区司令长官却在重庆辩论在长沙失陷的责任问题。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薛岳等人各有一套，分别下令，弄得指挥官们无所适从，糊里糊涂。日寇一冲过来，便都七零八落，一哄而散。

中外记者们见国民党军队如此风卷落叶地败下阵来，便纷纷前来采访。蒋介石发言人奉命答复说：“此乃诱敌深入之计，不必惊慌。”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衡阳。衡阳地处战略要地，日军沿粤汉路和湘江南下，水陆兼程，急取衡阳。

日军飞机从7月30日起，开始对衡阳市区狂轰滥炸，地面4个师团发起猛攻，并以重炮轰城，困守在衡阳的中国守军伤亡重大，又不能轮换休整。加上盛夏酷暑蒸人，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将士多患腹痛痢疾，医药不济。后来曾派出几个师的部队为守军解围，但均被日军击退。日军攻势越来越猛，衡阳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于8月8日拂晓奉蒋介石命令，率部投降。中国爱国将士在困守衡阳期间，违令奋勇抵抗，毙日军师团长久间为人中将，日军伤亡1.9万余人。

日军占领衡阳之后，便进行休整改编，建立第六方面军，任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兼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四军，以及长沙、衡阳地区直辖部队。日军又赶修粤汉铁路和公路，补充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作继续进攻准备。

9月初，日军第十一军占领湖南零陵，14日又攻下广西的全州。尔后经过1个多月的休整，又发动了桂林——柳州战役，国民党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部队望风披靡，狼狈逃窜，桂林、柳州混乱得不得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



行李堆积如山。

另一路日军第二十三军于9月9日从三水、四会西犯，于22日占据广西梧州。休整后，继续西进，于11月24日占领了南宁。

是时侵占越南的日本南方军，派出一支部队进入中国国境，向南宁推进，12月10日，在绥淦与从南宁南下的日军会师。至此，日军打通了从黄河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日军攻陷桂林、柳州之后，陷宜山、渡龙江，大有直犯贵阳之势。山城重庆震惊，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安，急忙从四川、陕西等地调遣部队，赶运贵州，守卫西南门户，但鞭长莫及。广西、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尽成惊弓之鸟，望风而逃。张发奎率部在怀远镇迎战，一连10天却不见蒋介石派兵增援。到11月27日，日寇自怀远镇西南渡金城江入河池，28日又陷南丹，29日向大山塘进击。大山塘方面守军受不了车河方面日军的威胁，当晚败退六寨之东。

更糟糕的是一队美国飞机糊里糊涂把南丹以北贵州境内的六寨，当作河池县龙江北岸的六甲，大炸一番。几十万难民，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挤满了黔桂公路和铁路，从大山塘到六寨路上，千辛万苦奔走的人，死伤达2万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张发奎也没料到有此一着，险遭不测，狼狈而退，实在令人寒心！

面对败局，蒋介石唉声叹气，大骂张发奎。

日军第十一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贵州独山，3日又攻都匀。贵阳危机，直接威胁四川，如果贵阳有个三长两短，那重庆岂非完了？蒋介石焦急起来，急忙把河南败将汤恩伯调来，借以加强贵州方面的防务，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征得美国同意，从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中调回2个师，加强昆明的防务，使西南门户转危为安。

日军从4月中旬到12月初，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五六十万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3条铁路干线，占领了洛阳，长沙、桂林、福州4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宝庆等146个大小城市，取得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可谓取得重大胜利。但是，日军在中国大陆取得这次最后胜利后，多占许多地方，无异于作茧自缚，使自己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 第十一章 日寇投降

东条英机发动“一号作战”后，侵华日军有50多万人用于豫、湘、桂战役，在其余广大占领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抓住这一时机，开始局部反攻。在这一年里，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都取得很大的战果。

在山东，鲁中、鲁南、滨海、渤海和胶东等地区，八路军向敌人展开了多次进攻，共歼日伪军3.6万余人，伪军向八路军反正投诚者37个中队又2700余人。

在晋察冀，1至10月，八路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深入昌黎、博野

等 24 县，并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主要城市，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八路军又推进到热河，解放了热河的大部分地区。

在晋冀鲁豫，从 2 月到 12 月，八路军先后攻入 19 个县城，攻克碉堡、据点千余个，收复国土 20 余万平方里，解放人口 500 余万，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溃败后，八路军立即组织豫西支队，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解放区，这个支队共作战 130 余次，解放人口 113 万，建立了 16 个县政权。

在华中，陈毅的新四军广泛出击，积极反攻。

3 月 4 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第 1 师，以 3 个团为主力，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向苏北淮安的重镇车桥一带发动攻势，是日夜间，第 7 团战士用云梯爬上 7 米多高的围墙，进入镇内，30 分钟后，1000 多名指战员就冲到车桥街上，猛袭睡梦中的敌人。次日黎明，50 多个碉堡被拿下一半。至下午 4 时，战斗结束，粟裕部解放了车桥，并击退前来增援之敌。这次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线，使苏北、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

1 年内，粟裕部共毙俘日伪军 1.5 万人，攻克据点 135 个。

李先念指挥的新四军第 5 师，在鄂豫边区根据地分兵向南北两面出击，收复了大片国土。到 1945 年初，李先念部活动的地区面积已达 30 万平方里，人口 920 万。

活跃在苏南，皖中、浙东等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也在频繁地攻势中歼灭日伪军，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在华南，东江纵队和海南岛的琼崖纵队都有很大发展。到 1945 年初，华南解放区已有正规军 1.5 万人，民兵数万。解放区人口 300 万人。

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为此，由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 2 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李先念师抽 7 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第 4 师西进豫皖边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南发展，琼崖游击队在海南岛发展，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1944 年 11 月，中央军委命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率领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护送干部团，从延安出发，经鄂豫边区根据地，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至 1945 年春，解放区的正规部队已增加到 130 万人，民兵发展到 2225 万人，解放区增加到 19 个，总面积 95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

美英苏三国巨头于 1945 年 2 月 4—11 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聚会。谈笑间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和分配胜利果实。中国是四强之一，却未受邀请。美英两国为促使苏联对日宣战，背着中国同意维持原属中国领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同意苏联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大连国际化；同意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日寇尚未被赶走，又有大国乘虚而扰。

1945 年年初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逞作垂死挣扎状。5 月上旬，日军在湘西芷江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最后一次进犯，中国军队同日军激战，日军士气低落。中国军队将日寇分割包围，歼日寇近 2 万人，取得反攻胜利。5 月 18 日，中国军队收复了福州，5 月 27 日收复南宁，6 月 29 日收复柳州，7 月 28 日光复桂林。

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于7月17日到8月2日，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由美、英、中、苏四国签字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敦促日本投降。

8月6日早晨7时许，美国飞机数架，飞入日本广岛上空，盘旋几周即行离去。8时许，美机B—29两架又从高空进入广岛上空，很多广岛市民仰看美机，一架美机突然投下降落伞，即发生令人眼花缭眩的强烈的白色闪光，广岛市中心上空随即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间，城市即突然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全市即被这黑色烟云所淹没。接着即冒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遂化为灼热的火海。

这就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向日本投掷的原子弹。广岛市当日死亡7.8万余人，负伤失踪者5万余人。美国在投原子弹之前，盟国飞机曾多次在日本各大城市大量散发《波茨坦公告》和传单，警告说日本将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任何迹象。

8月9日，苏联红军157万雄师兵分4路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又有太平舰队和红旗黑龙江分舰队协同作战，还有作战飞机3400多架，坦克5500多辆。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积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经过20多天，一举打垮了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整个战役共击毙日军8.37万余人，俘敌59万余人，缴获大炮1565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以及其他许多武器。

在苏联红军出兵对日作战的同时，中国军队全面开始反攻，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八路军朱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延安总部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路大军向日寇发起大反攻，共歼灭日伪军39.8万余人，缴获步枪马枪24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火炮1300余门，收复县级以上城市2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共谈判，一直是断断续续谈谈停停。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里约见周恩来，道：“国内问题要弄好，敌人不足惧，问题在国内，敝人想在兰州转西安时，在西安同毛泽东谈谈问题。”蒋介石并非真心想解决国共两党关系中的实际问题，只是想缓和一下舆论压力，待有了机会再行消灭共产党。周恩来深知蒋介石此人，认为毛泽东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便电告毛泽东，提出3条意见：一是由林彪代毛泽东同蒋介石谈；二是由朱德代毛泽东同蒋介石谈；三是由周恩来同蒋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偕林彪或朱德一起同蒋介石谈。但这封电报被康生收到，没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便以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回电：“同意林彪到西安会蒋，毛泽东称病不出。”周恩来即将此电转告给在兰州视察的蒋介石。

两天后，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说，他要亲自见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见蒋，态度积极。周恩来还是认为毛泽东不能去西安，一旦毛泽东在西安发生意外，中央在延安，周恩来在重庆，都鞭长莫及。于是，他便二次致电毛泽东，力谏劝阻，恳切陈词，劝毛勿出。

9月14日，林彪在伍云甫等人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是时，蒋介石已离开西安回重庆。林彪等人又奔重庆，住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林彪在重庆滞留近10个月。10月16日下午，林彪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与林彪以师生关系略事寒暄后，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对蒋介石的

问候。然后转入了谈判的正题。林彪提出八路军扩编军队和发给药品的要求时，蒋介石避重就轻，只说药品问题，可找何应钦去具体洽谈，闭口不谈扩编八路军的问题。林彪又提到新四军问题。蒋介石即表现出极为反感的情绪，此次谈话毫无结果。尔后国共之间又进行了几次谈判，仍无结果。

1943年6月7日，周恩来同林彪一起去见蒋介石，提出谈判无法进行下去，近日返回延安。20天之后周恩来同林彪等从重庆返回延安。

1944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等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进行初步谈判。林伯渠向张治中、王世杰通报了边区的情况，尔后就国共两党的关系及政府的政治问题，问张王两先生重庆政府有什么打算。张王让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便提出3个条件来：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施地方自治，以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

张王表示不赞成，他们提议不谈政治，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林伯渠道：“敌区抗日武装已发展到47万人，我们认为应编为6个军18个师为宜。”张治中道：“统帅部认为，最多可编4个军12个师。”以后又会谈几次，最后决定将双方历次会谈意见整理成纪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张治中约林伯渠去重庆，再继续谈判。

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等由西安去重庆，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林伯渠等。中共中央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等发去电报，要他们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其主要内容有：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至少给予共产党5个军16个师的番号，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之封锁；停止对抗日部队的进攻；从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装、弹药、药品，应公平合理配给八路军、新四军应得之份，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建党办报等等。

林伯渠等将20条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请他们转陈国民党中央。但张王认为有些条件的提法，无异是宣布国民党的罪状，不肯接受。为了顾全大局，林伯渠等经请示中央后，将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为口头要求。

林伯渠等再与张治中等交涉。张治中、王世杰表示对12条意见“仅充留下，但不能转呈”。张王将国民党《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

国民党的“提示案”主要内容有：一、八路军、新四军共编4个军10个师，其余部队一律限期取消；二、八路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三、陕甘宁边区之主席要由国民党中央任免，并要求其他各解放区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等等。

后来张治中虽将中共12条意见转送给国民政府，但他告诉林伯渠说，解决办法，仍按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更。

谈判陷入僵局。

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届三中国民参政会上，报告了4个半月以来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原因，并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重庆同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了3次谈话，赫尔利表示代表罗斯福帮助中国搞好团结。

11月7日，赫尔利乘飞机去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谈判。经过反复谈判，双达成5点协议：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协定草案》达成后，周恩来同赫尔利一起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赫尔利的最终目的是让共产党交出军队，而以共产党的将领参加政府和军委，作为交换条件。他私下对人说：“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但蒋介石与赫尔利的想法相去甚远。蒋一向靠独裁统治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权力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因此，他只是“赞同”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却不同意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蒋介石完全抛开《协定草案》，另行提出3条反建议，并通过赫尔利把它交给周恩来，其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周恩来看了，即约蒋介石会面。周恩来、董必武同蒋介石见面寒暄过后，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说道：“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说：“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若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蒋介石理穷，只能含糊其词地回道：“是的，是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对部分国民参政员说：“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因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周恩来只好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毛泽东听了

生气地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干！”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再进行国共谈判。1月24日，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同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以及赫尔利继续谈判。张治中、王世杰表示承认结束党治，开党派会议。周恩来提出会谈结束党治、共同纲领和改组政府问题。但在次日的会谈中，王世杰又改口说：“形式上不能接受。”周恩来深谈下去，王世杰都回答不了，只是表示愿意考虑。

2月2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提交《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内容有4条：一、党派会议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党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

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

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

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

国民党不同意召开党派会议，提出一个政治咨询会议案。

会谈不欢而散。

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竟以傲慢的态度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周恩来怒不可遏，说：“除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联合政府外，中国共产党是很难参加政府的。”由于蒋介石宣称：他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国共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周恩来于2月26日返回延安，抗日时期的国共谈判基本结束。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为了继续维护其一党的独裁统治，动员全党力量，准备发动内战，大举反共，以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大会由党国“铁老”、蒋介石的文臣领班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吴鼎昌作政治报告，程潜作军事报告，何应钦作部队整编与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蒋介石在致开幕词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党内许多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岂不知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反共精神，作出了《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以加强反共，准备内战。

国民党中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围绕着抗日和民主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出：大会为什么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怎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决心？冯玉祥、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主张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与活动，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有的代表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在选票上写上“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八个字。段剑鸣竟在选票上写了一首诗：剑鸣革命廿一年，辛苦不值半文钱。

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愿花好月长圆。

蒋介石见后大怒，破口大骂：“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大会在CC派操纵和把持下，通过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及有关措施，并发表了宣言，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22人，候补中央

执行委员 90 人，中央监察委员 104 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44 人，蒋介石连任总裁。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 2 天，蒋介石便命令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 10 个师的兵力，分 3 路向苏浙解放区进犯，妄图消灭该区的新四军。7 月 15 日，胡宗南调集了 9 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突然向淳化、耀县爷台山一带进攻。日寇尚未投降，蒋介石便迫不及待打内战了。

## 第十二章 蒋介石“摘桃子”

中国共产党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到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着全党 121 万党员。这次代表大会与上届大会相隔 17 年时间，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主持大会，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制定了党的路线，选出了中央委员 44 人，候补中央委员 33 人，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 月 19 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 13 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 5 人为书记处书记，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五大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

中共七大的任务是：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命运。七大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共七大通过一个重要的决定：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早在 1942 年 3 月，张如心（党的理论工作者）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中提出；刘少奇在 1943 年 7 月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中，再一次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几天之后，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 年 12 月 4 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也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就成为中央领导人讲话和中央及地方组织的文件广泛运用的词句。

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概括和论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刘少奇称毛泽东：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中国化这样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

毛泽东开始并不同意用他的名字的某些提法，他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经过酝酿讨论，大会仍坚持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这时才说：“你们一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一個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中共七大闭幕之后，中共中央及各解放区的负责人立即奔赴抗日前线。为加强东北地区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并组织指挥各解放区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

在苏联红军未进入东北之前，斯大林就有了把东北主权交给蒋介石的考虑。1945年6月30日以后，宋子文和蒋经国在莫斯科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苏联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以及以大连和旅顺口的租借界限为准，将大连划入军事区，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明确保证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不援助中国共产党。8月10日，斯大林约见宋子文，警告说：“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地同苏联达成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要进入满洲了。”于是，宋子文作出让步，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其主要内容是：（1）中苏两军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2）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3）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中国应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苏联经该口之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

（4）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该海军根据地由苏联担任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旅顺市主要民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

（5）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所给予中国的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

斯大林为取悦于蒋介石，于1945年9月将苏联驻延安的3名代表召回，并撤走了无线电台。此后斯大林多次声明，他支持蒋介石政权，并将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精神，打算将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

斯大林在12月20日邀请蒋介石大公子蒋经国访问苏联，并亲自接见他。但是，蒋介石同斯大林之间又有微妙的矛盾。1946年1月1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凡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即对蒋介石说：“斯大林对中国政府这一声明很生气，中国政府的声明，



既无根据，且无效力。”驻东北苏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向蒋介石提出：“如果苏联能得到东北日本企业股份的一半，则设备可以留下，否则，苏联将拆运回国。”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结果，苏联将东北的日本企业设备大批拆卸，装运回国，价值达8.58亿美元，若加上拆装损坏，约达20亿美元。

斯大林的行动，引起蒋介石反感。1946年6月6日，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等地会晤时，蒋介石道：“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蒋介石为了夺取胜利果实，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就同美、日反动派暗中勾结，三方达成默契，决定利用日军、伪军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绝不让中共部队受降。

8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浴血奋战，抗击了64%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伪军，毙伤日伪军136万人，解放了广大的土地和上亿的人民，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几乎都已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将近全部的伪军和绝大多数日军，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纵队的包围之中，只有包围日伪军的部队，才有受降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具备受降的资格。蒋介石的军队，80多万人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又有一大批装备整齐的军队留在后方，准备大打内战。山西阎锡山的部队，早在1939年就开始投敌。那时，阎锡山对他的部下说：“抗战只是手段，存在就是一切。要学狡兔那样有三窟。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才能存在：第一窟窿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是年11月，阎锡山密令19军军长王靖国、61军军长陈长捷派人同日军密谈，提出晋绥军一部改编，实行“剿共”，日军撤退一些据点，供晋绥军驻扎，日军接济晋绥军武器弹药，并帮助“剿共”等条件。12月，阎锡山在山西制造“12月事变”，杀害和绑架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千人以上，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损失3500余人。从此之后，阎锡山的部队，已暗中通敌。

华北已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距离日军所占的大城市很远很远，无法迅速受降。

当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到国民党总部后，蒋介石一连发出4道命令：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要他们加紧进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中共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日伪军解决了才到，并保证交通工具由美国负责，要火速进军！

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部队，通电所有日伪军将领，各原有阵地，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命令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他的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

第四道命令，电请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要他在蒋介石的军队接受之前，当负责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军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中央接收部队。

蒋介石立即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对受降问题作了一番布置。到会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等人。那何应钦已由军政部长改任陆军总司令，蒋介石鉴于何应钦主持军政部克扣军饷，迟发补给，造成官喝兵血，兵困扰民，中外舆论纷纷谴责，决计改组军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以陈诚接任军政部长。蒋介石宣布了指定日军投降地区及受降长官。并委任汉奸、投降将领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吴化文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济南市市长，

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

蒋介石这一倒行逆施的决定，不仅引起共产党的抗议、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一些正直的国民党人士的不满。国民党老将冯玉祥大怒，当面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偏偏不准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这究竟是为什么？”冈村宁次在8月15日听到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感到无限忧烦，特别是听到日本陆相阿南在8月14日夜剖腹自杀，更使他惊魂不定。但他还是率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按平时遥拜队形，在广场集合，收听天皇投降诏书，并对全军下达了“训示”：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过的最大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既定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8月16日，惊魂不定的冈村宁次收到蒋介石要他“忠于职守”的电报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为“效忠”蒋介石，复电表示：“遵令执行，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冈村宁次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到北平、上海等地接收。日本战犯成了蒋介石集团的贵宾，受到国民党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优待。汉口的中国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竟特地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广泛地掀起了中日“亲善合作”的热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不刺激对方，对投降的日军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到遣返为止，不解散日军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称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称各方面军司令官为“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冈村宁次为了配合蒋介石反共，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写道：“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在华一切军用及国有各种设施、器材等严禁破坏损毁，如数向中央政府移交，以利其复兴。”日军一投降，那南京伪政权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陈公博即打电话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量后事，16日，周佛海抵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内哄和混乱之中，由陈公博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当晚广播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伪政权曲终人散，彻底完蛋。

就在伪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潜伏在南京的军统局南京站少将站长周镐便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宣布自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那周镐原是戴笠于1943年应周佛海之邀派往南京负责策反伪军的特工人员，任军统局南京潜伏站少将站长，他又是密码员。他同军统局报务员陈士达一起架起电台同戴笠保持联系。

周镐自任南京区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即在南京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

大楼挂出司令部牌子，在市内张贴布告，并在当天晚上，指挥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 800 人的武装，在南京市内采取行动，接收各伪党政机关，强迫各报馆改变名称，并分头捕人。将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宣传部长赵尊岳、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及伪市政府各委员，一一捕获，并送至中央储备银行关押，打伤了拒捕的军政部长肖叔宣，肖因伤重，两天不治而死。17 日下午，周镐派人往伪中央军校进行接收，并要对陈公博采取行动。

周镐的行动，使南京城内的大小汉奸胆战心惊，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汉奸头目陈公博吓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伪考试院长陈群惊吓之余，自感罪孽深重，难逃法网，自杀身死。许多汉奸浑身哆嗦，抱头痛哭，如末日之将至。有的准备送金银财宝，有的准备送花园洋房，以图苟全性命。而广大人民则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周镐派人捉拿伪军校总队长鲍文霏，将其关押。不料第二天伪军校的千余名被煽动的学员，包围了周镐的指挥部，要求放还鲍文霏，否则就动武。周镐只有 800 人的武装，面对千余名荷枪实弹的学员怕不相抵，不得不暂时将鲍文霏释放。

周镐对于身份已经暴露的或隐蔽在伪政府内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没动一根毫毛，相反，他通过各种关系，将其中一些人秘密送往解放区。

周镐的这些行动，被坏人偷偷向军统局告密。蒋介石、戴笠得知后，对周镐竟敢“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的“胆大妄为之举”，大为震怒，怀疑周镐有“个人野心”。周镐率先搜捕汉奸，引起了刚刚被蒋介石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的任援道等伪军头目的不满，任援道急电蒋介石，报告了周镐发动的“南京之变”的情况。任援道等人又要求日军出面“维持地方治安”，他们宣称：“决不能容忍周镐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那遭到枪击身亡的伪军政部长肖叔宣和重庆也早有联系，周镐并不知情。肖之死也成为重庆怪罪周镐的缘由之一。

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周镐的厄运终于来到了。经陈公博、任援道等人策划，驻南京日军于 18 日派兵包围了周镐的指挥部，迫令周镐释放被捕汉奸，立即停止接收南京的一切活动。

周镐费尽心机发动的“南京之变”，便宣告结束。

周镐被大汉奸任援道逮捕，送进南京先遣军司令部，尔后被押送到上海，关押到军统局上海监狱里，后来又被送回南京拘押。关关放放，完全丧失了自由，听候发落。但周镐受此次重大挫折后，竟申请加入共产党。1946 年 10 月，经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批准，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周佛海于 8 月 19 日乘车离南京到达上海。是日，周佛海发表谈话，宣布自己奉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业已成立行动总司令部，负责维持治安。周佛海为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上海等地的接收，调集由其指挥的全部伪军，加强上海周围及上海到杭州地区的布置，调伪中央税警团及警察编成 6 个纵队，驻守上海各军事要地，并设杭州区与宁波、绍兴区两个指挥部，周佛海又勾结上海日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及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要日军必定要听候中央命令。

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伪上海市警察局长罗君强，发布紧急命令，宣称：今后上海治安，在过渡时期由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负全

部责任，所有官警及保甲人员，自应归顺中央，服从蒋委员长命令。各官警未得许可，不得任意参加任何团体，更不许有自由行动。

周佛海还在经济上为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军队提供大量资金及物资保障。

蒋介石在利用日伪汉奸势力，维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广州、武汉、香港 8 大都市“治安”的同时，还在美国的援助下，大量地向上海、北平、南京等地运兵。9 月 5 日，国民党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次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一部空运到上海。

### 第十三章 敌人在磨刀

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主持受降典礼，接受冈村宁次统辖的 128 万军队的受降，其中包括总司令部、3 个方面军、10 个军、36 个师团、41 个独立旅团、19 个独立警备队和 6 个海军陆战队。蒋介石为了抢占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北古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等 24 个重要城镇，赶紧把全国分为 15 个受降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9 月 9 日，亲日派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来到南京同冈村宁次举行“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密谈，何应钦竟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大战犯冈村宁次即感激涕零。不久，他便邀何应钦进行第二次密谈。何应钦秉道：“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进行顺利。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后，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卢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同苏联恶化关系，并接受广田三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被我言中。”密谈结束后，何应钦拿出甜酒款待冈村宁次，并频频举杯，为“捐弃前嫌，中日密切合作”而干杯。

汤恩伯在 1 年前失守河南，被蒋介石撤职，现在奉蒋介石之命来接收上海。他在上海华懋公寓接见战犯、原日本第十三军团大将司令官松井，开口便说：“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到这里来谈谈。”坐在汤恩伯身旁的美国顾问立刻警告汤恩伯说：“汤将军，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汤恩伯才不得不改用命令的口吻发话，但腔调十分滑稽。

事后，汤恩伯又单独同松井会见，居然用抱歉的口气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日本军队名义上投降了，但他们依然在上海街头昂首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汉奸们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伪政府的部长、市长、局长官员们一变成为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正

副司令、秘书长、办公厅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等等。群众说：昔日的汉奸卖国贼，今日成了国民党的新贵，威风不减当年。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人们送给他们三句话：“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五子登科”，即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有；“有条有理”，即那些汉奸、日寇、恶霸等坏人，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无论罪恶多大，还是“有理可讲”，网开一面。小汉奸出法币 30 万元，大汉奸出黄金万两，都可免罪；“无法无天”，接收大员到后，任何事都要钱，如果没有法币，没有金条，那就无法无天，没法活了。

国民党将领争相抢购接收大员“肥缺”，汤恩伯当了上海接受大员，顾祝同大为失望，气得吹须瞪眼，更有人向蒋介石告汤恩伯的状，但蒋介石岂肯改变自己的主意。

蒋介石向甲级战犯冈村宁次躬身问安，并要冈村“切勿客气，如有问题，可随即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蒋介石又聘请冈村宁次为高级秘密军事顾问，要冈村为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人民出谋献策。阎锡山也将山西侵华日军万余人，组成反共别动队，让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屠杀人民。

中国共产党要求严惩汉奸。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公开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共产党开足宣传舆论工具的马力，指出国民党当局对汉奸纵容和袒护的倒行逆施行为，大大破坏了我国立国的纪纲，斫伤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丧失了作为五强之一的国家体统。并表示，绝不能让汉奸们超脱于法网之外。

国民参政会常务会也通过了《请政府严惩汉奸，本忠奸不两立之训，贯彻到底，以伸正义，而维民族气节案》和《请政府迅速将惩治汉奸法规切实执行案》。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面对民众的强烈要求，不得不从 1945 年 9 月 26 日起，在各地相继开始逮捕汉奸。

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 1947 年底基本办结。伪政府主要汉奸头目除周佛海与重庆有勾搭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为无期徒刑外，被判处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伯生、丁默邨、梁鸿志、王揖唐、苏成德、杨揆一、叶蓬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春圃、陈璧君、卢英、江亢虎等。

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在 1945 年 8 月 11 日连续发出 6 道命令：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所部，即日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命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向北行动；命令由贺龙统一指挥山西解放军，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的敌伪军，并准备接受太原的敌伪军投降；命令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人民军队，肃清中国境内的交通要道的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命令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率部向朝鲜进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命令各抗日根据地所有部队在进入敌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残留的敌探奸细进行破坏活动。

中共中央还做出《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提出在目前阶段我党的任务：“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中央要求各地应将部队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组成正规师团，

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

“日本解放联盟”配合共产党的行动，发出通话说：“现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本士兵们应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即带着武装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朝鲜独立同盟总盟亦发出通电，要求所有敌军的朝鲜士兵，不管长官有何命令，应立即携带武器，向附近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本同盟将保证其安全。

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毛泽东面对蒋、日、伪三方合流，中国面临内战危机情况下，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指出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是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对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毛泽东提出，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基本方针是，对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

毛泽东说：“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以自卫战争，粉碎他的进攻。对于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欺骗，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决不上当受骗。”中国人民军接到中央和总部向敌人进军的命令后，闻风而动，奋勇前进，冀热辽人民军队沿着北宁路，向东北进军，与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武装联合协同作战，解放了东北。晋察冀人民军解放了察哈尔省，包围着北平、天津、保定。晋绥人民军解放了绥远、山西西省的广大地区。晋冀鲁豫人民军队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人民军解放了山东100个县。华中人民军向沪杭甬、江南、浙赣、淮南等路、陇海东段反攻。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向广九、潮汕等地进军。从8月11日到10月10日的两个月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收复国土31.5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万余人，收复城市190座，毙伤敌伪军23万多人。

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6项紧急措施：（1）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权利，以昭公允。

（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5）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6）立即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立即表示坚决支持。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10项主张，要求实行普选，以明令重申保证人民一切基本自由，废止一切妨碍人民基本

自由的法令与机构，包括特务，劳动营，以及束缚言论出版的检查条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思想犯，惟贪污分子和汉奸不在释放之列！要求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等等。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以及成都文化界 248 名教授、作家等知名人士，昆明各界 628 名知名人士等等，都纷纷分别发表《对时局严重献言》、《对时局宣言》、《告国人书》、《呼吁书》和“通电”，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通过谈判、民主协商解决问题。

慑于全国舆论，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几经密谋，导演出一场“假和谈，真备战”的闹剧。8 月 14 日，蒋介石给延安发去“万急”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丞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8 月 14 日毛泽东知蒋介石演戏，于是朱德总司令根据毛泽东计策，于 8 月 16 日给蒋介石发了一电，对蒋介石不准十八集团军受降的命令，提出抗议，尔后毛泽东复蒋介石一电：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铄 8 月 16 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一面狡辩朱德总司令提出的问题，一面督促毛泽东赴重庆：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天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8 月 20 日此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毛泽东看出蒋介石的阴谋，但他若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宣布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去谈判，蒋介石决无诚意，只是借此时机，加紧运兵，部署大规模内战，并在谈判时诱逼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在延安的枣园的梨树林中，晃动着毛泽东安详踱步的身影。毛泽东的办公室的灯光通夜亮着。

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若谈不成和平，也可在谈判中揭露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以此教育广大人民，进一步孤立国民党。中共中央考虑研究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于是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中，得读先生复电，兹有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慰。

毛泽东未养 8 月 22 日延安蒋介石见毛泽东电，以为毛泽东果然不敢来重庆，忙又致电毛泽东：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8 月 23 日蒋介石发了此电，便对他的心腹们说：“毛泽东不会前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来，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他来，我们则利用谈判拖延日子，挥兵北进，把他们包围的包围，消灭的消灭，到了那个时候，就有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好戏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8 月 23 日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说：“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应该去。如果我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希望我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毛泽东遂复电道：特急，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赶渝进谒，弟亦准备随时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24 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说明党的谈判方针，并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如果国民党胆敢发动内战，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

蒋介石弄假成真，慌了手脚，但又不得不派张治中陪赫尔利乘飞机去延安。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由延安飞往重庆。

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的人群人山人海。官方人物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各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著名爱国文人郭沫若、陶行知等。

## 第十四章 山城“鸿门宴”

毛泽东走下飞机，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各党各派代表则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和毛泽东接近。

周恩来见状，立即离开毛泽东，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大声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一大群记者一下子拥向周恩来，周恩来见毛泽东能够和各党各派代表们握手交谈，才笑着把纸包打开，向记者们分发“礼物”，即毛泽东的书面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



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毛泽东在人群中首先发现年近古稀，银髯飘拂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不待人介绍，便迈过去，一见如故地说：“你是张表老？您好！”张澜紧握毛泽东的手，道：“润之先生好！您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同张澜寒暄之时，周恩来安排了毛泽东同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人合影留念。

蒋介石特地派侍从室组长陈希曾负责毛泽东的警卫，特别拨出一辆篷车供毛泽东专用，周恩来很客气地对陈希曾说：“毛泽东同志暂住化龙桥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的山洞歇凉吧！”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赫尔利等，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去住所。

次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参加会谈。蒋介石没有任何准备，只好说一切问题愿听中共方面的意见，并重弹“中国无内战”的老调子。毛泽东即说：“如果说中国没有内战，这不是事实，而是欺骗！”接着毛泽东列举了大量事实，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没有内战烟幕下而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

张群听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后，尴尬地说：“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并在你们来重庆之前就已经公布。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毛泽东本来准备在重庆谈10天，由于蒋介石提不出具体谈判方案，陷于被动，只是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几个代表与共产党应付，周恩来、王若飞按照同毛泽东商定的方案，同他们具体谈判。谈判一直进行了44天。

蒋介石同毛泽东前后会谈了10次。蒋介石同毛泽东会谈回来，对陈希曾感叹道：“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但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此决心与精神决不可小视！”蒋介石在与毛泽东几番会谈后，深感自己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怕谈判完了“放虎归山”，遂起冒天下之大不韪邪念，想软禁毛泽东，但又怕由此而失信于天下，“有碍国府声誉”。周恩来听到此消息后，亲自拜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爱国名将冯玉祥，恳请他们力谏蒋介石。于右任和冯玉祥一起见蒋介石面陈。于右任对蒋介石道：“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外界竟有微词，谓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不仅于和谈有碍，而且有损先生声誉，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不知此举妥否？请先生定夺。”蒋介石听了，知道这是于右任与冯玉祥使的软刀子，十分恼怒，但又不好发作，于是道：“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中正为国为民之心，神人共知，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蒋介石迫于各界压力，又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只得打消了软禁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与各界人士交往。他先后会见了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由于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方便，张治中主动腾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白天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晚上仍回红岩去住。

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是毛泽东早年在广州工作时的老朋友，他同毛泽东

促膝畅谈后赋诗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著名爱国大将冯玉祥设宴欢迎毛泽东。他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毛泽东久久握手，向他热情问候，称赞毛泽东是国内和平、团结的象征。毛泽东赞许冯玉祥的进步倾向，激励他在晚年更加向人民贴近。

张澜听说毛泽东要去拜访他，喜出望外，兴由衷发，一阵熏风，活跃了静谧的寓所。

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了他家门时，他热情地走出来迎接，同他们步入花园，穿过葡萄架，进入内室，促膝而谈。张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毛泽东道：“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毛泽东同张澜互称“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这时你一句，我一句谈了很久。

毛泽东还登门访问了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部长就是戴季陶。

戴虽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特别是来拜访他，十分高兴，谈话中对毛泽东寄予热切期望。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 20 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9 月 13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

陈立夫虽然在西安事变前，曾作过国共两党间的联系工作，但他是反对共产党最坚决的人，他认为与共产党和谈，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只有动大手术才行。毛泽东同他一见面，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

毛泽东说：“10 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样的教训还不深刻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巧妙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政策，希望陈立夫不要逆潮流而动，陈立夫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无以措词，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9 月 2 日，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宋庆龄出席中苏文协宴会，一些在重庆的共产党、国民党要员、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会议，有董必武、孙科、王若飞、冯玉祥、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张治中、陈立夫、郭沫若、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李德全、王昆仑、史良、刘清扬、茅盾、侯外庐等各方人士 300 余人，这是个盛大的集会，毛泽东成了宴会的中心人物，很多老朋友围拢着他，说他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

蒋介石在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一周后，才仓促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主要内容有 4：(1) 中共军队之组编，以 12 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

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定决定。

(2) 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

(3) 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考虑。

(4) 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将谈话要点交给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要他们严格按照要点精神与中共谈判。

一天上午，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手拿一首词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给柳亚子写了一首词，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词文在山城到处传咏，影响可大了。”蒋介石很不高兴地问道：“什么词，给我念念。”陈布雷便展开词文，摇头晃脑地念起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蒋介石惘然问道：“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吗？陈布雷回道：“很多人亲眼目睹是他自己写的。布雷所虑的，就是这首词。”“为什么？”“这首词填的非常得体。刚才布雷给几位词家看过，他们一致认为气韵高华，词采明丽，同时寄托遥深。现好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他们都在唱和着。先生想想，我们的谈判还没有完毕，毛泽东已经在重庆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这后果不是值得我们考虑吗？”蒋介石思忖片刻，尔后说道：“陈主任，你想得很对，对付共产党我自有办法。不过，也不要为敌人张目。延安毕竟是个弹丸之地。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也无法同我们的部队相比，我们是假谈真打，在谈判桌上设置种种障碍，使他们无法接受，只要谈判一破裂，我就动手了。”蒋介石见毛泽东深受人们欢迎，显得特别烦躁，便把为他献计的吴鼎昌叫去，训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娘希匹他们真来了！你说，你说怎么办好？”国民党谈判代表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谈判并无诚意，只是虚与委蛇。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 11 项交给国民党代表，再转给蒋介石，其要点是：(1) 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2) 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3) 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4) 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5)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 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7) 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 结束党治，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9) 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包括由国民政府召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中解放区的解决办法，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 5 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 6 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 4 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组织。

(10) 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改编为 16 个军 48 个师。重划军区，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11) 党派平等合作必要办法。

国共双方几经交锋之后，美方对中共的态度不仅惊骇，而且慑服，赫尔利和魏德迈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毛泽东气魄不凡，远非重庆国民党人士所能比拟，特别是周恩来在谈判桌上舌战群儒，震慑对手，在西方著名的政治家中，也极为少见。

9 月 8 日至 21 日，国共双方代表共进行了 7 次谈判。双方争执得最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双方意见十分悬殊，相持两周，仍无进展。为了打开僵局，中共作了让步。

周恩来说：“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 1A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 1A6，即中央现有 263 个师，我方应编 43 个师；如果中央军队缩编为 60 个师，中共军队应为 10 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 120 个师，中共应有 20 个师。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 8 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 3 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 43 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 7 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接受。他们说，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不能超过 5 个军 16 个师；即令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队指挥系统，予以适当的名义，以便统帅指挥。至于解放区的民选政府问题，应成为过去，解放区应取消，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中共代表为避免和谈破裂，采取十分克制态度，在解放区问题上再作让步。提出冀、鲁、察、热 4 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

国民党代表仍不肯接受，说：“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尽量开列名单，请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兄等所提华北 4 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割据地盘？”周恩来大怒，斥责道：“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

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赫尔利除极力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外，又找毛泽东谈话说：“中共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答道：“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中共为了打破僵局，再一次让步，提出：“在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蒋介石又加拒绝：“对于中共的新方案，我不答应。”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在 22 日中断同国民党的谈判。

## 第十五章 边谈边打

周恩来向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赢得他们的同情，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做到仁至义尽，为共产党鸣不平。

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以武力进犯解放区，形成国共两党边谈边打的局面。

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的第二天，即密令大量印发反动的《剿匪手本》。9月初，蒋介石令绥远的傅作义部沿平绥路进攻察哈尔解放区，逼近张家口；命令阎锡山部队沿同蒲路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9月中旬，我军起而自卫，击退了傅作义军，俘虏了大批官兵。10月初，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指挥部队一举歼灭了阎锡山的 3.5 万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和谈掩护下的军事冒险阴谋，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

蒋介石也看到，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而这次谈判为举世所瞩目，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向国内外难以交代，且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又吃了败仗。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取缓和态度。

国民党代表不得不在谈判中断的第三天，找周恩来表示要重开谈判。中共方面再次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中共军队缩编到 24 个师，至少 20 个师的数目，国民党方面表示可以考虑中共军队缩编为 20 个师的意见。至于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商定：为具体计划解决军队整编有关问题起见，组成 3 人小组，中共方面代表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为军政部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在解放区和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申述了各自的立场。

中共建议将 1 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会谈纪要》并提交讨论。

周恩来在 10 月 5 日起草了《会谈纪要》，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而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写得很有特色。

双方就《会谈纪要》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作了修改。终于在 10 月 10 日下午由双方代表签字，称为《双十协定》，并且公开公布。

《双十协定》共 12 项。它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即国共双方“ 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 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一致认为“ 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在此前提下，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10 月 11 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毛泽东在返回延安的当天，就向政治局报告了重庆谈判的情况和双十协定的内容。

毛泽东说：《双十协定》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 6 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有了这些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演讲。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我们的任务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把他消灭，他就舒服了。

早在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即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确定“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 的战略方针，并调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率领分局和军区领导机关及山东部队 5 个主力师、18 个基干团，约 9 万人马进入东北，同时又调已经到达冀鲁豫平原的林彪、肖劲光转向东北，调新四军第 3 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主力 3 万余人进入东北。又从各解放区调集 2 万名干部进入东北。政治局委员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及李富春、林枫等 14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入东北，去东北的部队从邻近的冀热辽边区和山东，由水陆两路兼程进入东北。开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解除敌伪武装，组织人民政权。进入东北的部队和抗日联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不久，东北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于 10 月 13 日密令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努力进剿。胡宗南、孙连仲部 20 余万人沿着平汉、同蒲、正太、平绥、津浦 5 条铁路，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进攻的目标，是要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北平、天津。

国民党部队又在美国帮助下，调动各种运输工具。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集中在中国与印度境内所有美国军用和民用飞机，在帮助蒋介石将驻湖南芷江的新六军运到南京、驻柳州的第九十四军和汤恩伯总部空运到上海、将第九十二军空运到北平之后，又以飞机帮助蒋介石将第五十二军、第十三军运到山海关，蒋的这两个军长驱进入东北，第一步跃至锦州，再跃至沈阳。美国又从海上运送新六军，由广东运送新一军经秦皇岛登陆窜入东北。尔后又从越南海防把第五十三军和云南第六十军、第 93 军海运至东北，还有第七十一军和几个交警总队也从海上经秦皇岛运入东北。

美军当时占领了津沽至秦皇岛一带的滩头阵地，等待蒋介石的军队前来接收。蒋介石派杜聿明去负责打开自北平至沈阳的交通线。杜聿明至天津

时，美军先遣部队正在塘沽登陆。杜聿明同美军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会面时，便同骆基一起研究占领北平至山海关的铁路线的军事行动问题。蒋介石为集中力量抢占东北，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第一战区胡宗南的两个军，经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开抵石家庄；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3个军，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下，从豫北的新乡沿平汉铁路北犯，企图夺占邯郸，北上同石家庄的胡宗南部会师。蒋军所到之处，实行“清剿”，摧毁民选政府，屠杀抗日干部及抗日军人家属，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人民惨遭荼毒，愤不能忍。

八路军为和平团结大计，仍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最后退至漳河以北。蒋介石仍以各军进军太慢，命胡宗南秘密飞赴郑州，颁发《剿匪手本》，坚决进剿；又强迫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所属各部，限期进攻。高树勋的新8军、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在蒋介石严令督责下，渡过漳河，分路北进。10月23日占领磁县，24日占领马头镇，并向武安、邯郸进犯。

是时，解放区军民开始自卫反攻。25日收复磁县，将进攻各部队予以包围，同时向进攻各部队官兵实行劝告，要他们共体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之重要，立即拒绝内战命令。

10月30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深明大义，率其直属之新8军的暂编29师、新6师全体官兵起义。但第40军和第30军一部将领尚不觉悟，继续向解放区进攻。八路军被迫反攻，激战1昼夜，将第30军和第40军击败。该两军多数官兵愿意放下武器，仅少数部队向南逃去，被八路军预伏部队击溃，大部被歼灭。时由安阳、石家庄出援之敌，闻风而逃。此战役，八路军获全胜，除争取万余人起义外，共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官兵2.3万余人。

高树勋率部队起义后，被任命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次起义，只有一个原因，这就是遵照全国人民的意志，反对内战。抗战8年中，我和官兵先在敌后奋斗了5年，生活上虽然受到千辛万苦，但精神上是兴奋的；以后在大后方3年，目睹行政机构的腐败情形，国家危机的严重，心中感到十分失望。我在敌后艰苦奋斗了5年，不料到了大后方不到2个月，我的第69军，即被汤恩伯夺去了。我领导的原三十九集团军的2个军，现在还剩下一个新8军。将士的死亡，中央一概不管，器械损失也不给补充，想起来是很使人痛心的。国家统一是需要的，但先决条件是要真正开诚布公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解放区是八路军解放七八年的地方，如果国民党在不改变政策的情况下，北上进军，且进一步占两步，这势必造成内战局面。国民党当局对外宣传是叫我们北上受降，实际给我们的命令是北上‘剿共’。中央还颁发了一个《剿共手本》。这些行动，与我们全体将士的意志是完全违背的，就以过去的历史而言，国民党打了10年的内战，仍未把共产党消灭，现在共产党的力量，百倍千倍于昔日。即使允许国民党再打10年内战，也绝对不能消灭共产党，何况全国人民今天都反对国民党再打内战。如果国民党不能改变现行的政策，倘仍执迷不悟，国民党自己会断送自己的前途，会遭到清朝同样的悲惨命运。”高树勋对记者的谈话发表后，又有国民党第30军92团团团长周敬之等300余名中下级军队联名发表通电，号召在各地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官兵，立即放下武器，拒绝内战，勿为内战挑拨者

所利用。

在地方，反对蒋介石内战和独裁的又有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的 6000 余名师生。11 月 25 日，他们在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的草坪上召开时事晚会，由费孝通、钱端升等 4 位著名教授演讲。国民党立即镇压，派特务混入场内捣乱。大批军警包围会场，并鸣枪放炮，子弹擦着与会师生的头顶呼啸而过。

次日，昆明 3 万学生罢课抗议，并提出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要求。

12 月 1 日，国民党特务、军人数百人拿着扁担、石头，扛着木棍、锄头，到西南联大新校舍，打进校园里，1 颗手榴弹将 1 名教师炸成重伤，抢救无效身亡。几十名便衣武装冲进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扔了 3 颗手榴弹，炸死 3 人，重伤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宋庆龄和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等人在上海为“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并以大会名义致电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及惩办屠杀学生的凶手等要求。会后，举行了有 1 万多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改换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召回臭名昭著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停”。12 月，美国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 3 国外长会议上，同意苏联提出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但是，马歇尔在中国以“调停”为名，仍助蒋介石打内战。由于蒋介石的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华北的兵力仍然不足。要将大军调往华北或东北打内战，还需要时间，于是，他便重新高唱起“和平”来，美蒋勾结玩弄新的阴谋。

12 月 27 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恢复了国共谈判。1946 年 1 月，成立了由马歇尔、张群、周恩来组成的 3 人军事小组，共商各项军事问题的办法。经过 10 多天的反复磋商，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双方统限于 1 月 13 日 24 时，完全停战。

中共中央于 1 月 10 日即发出通告，命令部队切实严格执行停战命令，不得有误。然而，蒋介石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并催促部队星夜前进。孙连仲部迅速行动，企图于停战命令生效前占领承德，或占领古北口、建平、陵源等地。在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部队仍继续向解放区进攻。

3 人军事小组决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成员 3 人：共产党代表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代表是军统局副局长、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美国代表是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罗伯逊为主席。一切事宜，均须 3 人一致通过方能生效。执行部除 3 人小组外，尚有 3 方参谋长。国民党方面蔡文治，共产党方面罗瑞卿，美国方面海斯克。执行部下设 36 个小组，分赴各地进行工作。执行部连续发出第一、第二、第三号公报，要求各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2 个多月后，全国各地才实现了停战。

遣返日俘日侨的工作也在逐步进行，滞留各地的日俘日侨，都由铁路运往沿海港口。

由美国海军送运回国。在近 10 个月内，共遣返日俘日侨 29.864 万余



人。

军事 3 人小组就“军队整编和统编基本方案”达成协议。规定，第一期为整编：国共双方在执行部监督下，将军队集中于执行部指定的地区改编。政府将其所有陆军缩编为 120 个师，中共将其全部军队缩编为 30 个师；第二期为统编：将国共军队合编为国防军，全国保持国防军共 20 个军，每军 3 个师，共 60 个师，其余一律解散退役。整编、统编签字后，国共双方曾对整军方案的实施多次进行商谈，因为防区和统帅权两个关键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和谈破裂。

1946 年 1 月 10 日到 31 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 38 人。国民党代表 8 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代表 7 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民主同盟代表 9 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勱、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青年党代表 5 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无党无派代表 9 人：莫德惠、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邵从恩、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郭沫若。

5 个方面代表了 3 种政治力量。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坚持一党专政；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希望建立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青年党已从民盟中分化出来，在政治上追随国民党；无党无派大多属于中间派，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实现和平、民主方面，与共产党的要求是一致的。

在政治协商会议上，3 种力量，3 种主张，3 条道路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和复杂的较量。

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军队与政权问题。最后，大会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问题、宪法草案、国民大会 5 项协议。

——改组国民政府问题：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对方针、大计有决策权，对高级官员有任免权；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40 人，国民党和非国民党人士各占半数；提案性质及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 2/3 的国府委员通过；国民政府主席对某一决议的否决，须有 3/5 以上的国府委员赞同。

——军队问题：确定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等原则。

——施政纲领问题：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规定全国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自由。

——宪法草案问题：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的根本原则。

——国民大会问题：由上届大会已选出的代表 1200 名，再另增加台湾、东北等地区的代表 150 名，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 700 名，总计 2050 名，宪法的通过，须经 3/4 代表同意。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决议。国民党一面在政协决议上签字，一面随时打算撕毁决议，挑起全面内战。

政协决议公布后，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其实蒋介石并不准备实施这些协议，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骗，玩弄政治阴谋，以掩盖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内战准备。蒋帮特务们对庆祝政

协会议成功的活动进行破坏，蓄意制造流血事件。

1946年2月10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1万多人，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大会公推出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庆祝大会的群众，满怀着胜利喜悦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赶来，陆续地步入会场。国民党派出特务五六百人混入会场。

大会尚未开始，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邀请公推出来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上主席台入坐。

不料，台下跳出六七个汉子来，冒充大会主席，宣布开会。他们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宣传科长庞仪山、重庆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总工会理事长潭泽森、李森荣、李克愚等人，这些人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驱使下登台冒充大会主席，宣布开会。

李公朴见此情况，忙出来劝阻。是时，藏在会场群众中的一伙特务暴徒，窜上主席台，一拥而上，把李公朴推倒在地，并拳脚交加，把李公朴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施复亮、陶行知、马寅初以及新闻记者60余人，也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制造成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

2月21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构纠合流氓地痞，组织“还乡请愿团”，在东四大街举行反共示威，并冲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侮辱殴打中共办事人员，制造捣毁军调处事件。

接着在22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部分学生，在重庆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营业部，把工作人员杨黎原等打得遍体鳞伤。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也被特务暴徒捣毁。

蒋介石曾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本会议的一切决议。”但刚过1个月时间，蒋介石便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覆手为雨，宣布说：“政协代表不是人民推选出来的，政协的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蒋介石要求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于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开否定了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的修改宪法草案原则，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协议，并决定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其权力置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上，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任。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完全否定了政协协议，坚持一党专制。

## 第十六章 内战乱命

3月20日至4月2日，国民政府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议，在国民党包办下，在重庆召开。

蒋介石发表了长篇演讲，一方面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一方面撕毁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内战。蒋介石声称：“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陈诚也扬言要接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美军也企图帮助蒋介石

石接收中长路。于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举进攻。四平街的猛烈炮火震惊全国。

4月8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的中共代表博古，冒着恶劣天气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情况，同机回延安的还有原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以及曾参加辛亥革命的老教育家黄齐生。叶挺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因天气恶劣，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

周恩来在重庆为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沉痛地说：“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中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为了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于5月1日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1）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在还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能够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2）准备工作中，除精减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3）3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的很不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练，此种情况应立即检讨改正。

（4）接到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下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之关键之一。

（5）练兵内容，军事上练3大战术：练攻城、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和信心。

（6）执行情况速告。

解放区掀起了练兵高潮，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改进了军队政治工作方法，克服了军队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不仅提高了解放军的军事技术，统一了战略战术思想，而且还增进了官兵之间、军政之间的团结，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

中共中央又于5月4日作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规定：（1）保护中农的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

（2）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

（3）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4）对于中小地主和对大地主、豪绅、恶霸要有区别，应给地主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

（5）对于工商业者要加以保护，凡富农及地主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应予保全。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阶级的办法，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

(6) 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果实，必须公平合理分配给贫苦烈士遗族、抗日干部及其家族和无地少地的农民，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凡由于自己勤勉节俭，善于经营，因而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

此后，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各解放区先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农民有了土地，掀起了支前参军热潮。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于 5 月 3 日由重庆飞抵南京。两天后，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5 月 23 日，国民党部队占领长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长春巡视。

原来，国民党第五十二军自 3 月 12 日以从苏军手中接受的方式进占沈阳，随即配合新一军、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展开进攻，相继进占辽阳、抚顺、铁岭。

林彪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虽在抚顺以西及三保本溪作战中给敌以打击，消灭国民党军 6000 人，但仍不能遏制国民党军的进攻。蒋介石又把云南的 60 军和 93 军调到东北，使进攻东北的兵力增加到 7 个军。国民党以 5 个师的兵力向中长路南段之海城、营口和安沈路上之本溪进犯；另以 5 个师的兵力向四平进攻。四平地处京哈、平齐、四梅 3 条铁路的交会点，是东北的战略要地，国民党的 5 个师兵分两路平行向四平推进，遭到民主联军的节节抗击，进展迟缓。林彪、罗荣桓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最大限度的集中兵力，于四平地区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四平战打得惊天动地。民主联军集中了 12 个团的兵力，于兴隆泉一线歼敌新一军 38 师一部。尔后又集中 14 个团的兵力，将 71 军 87 师诱至大洼、八面城地区袋形阵地，乘敌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将其大部消灭，并击溃援兵第 91 师、共歼敌 5600 人。

民主联军在南线保卫本溪，同国民党军战斗也十分激烈。

先后击溃新六军 14 师、54 军 25 师和 60 军 182 师的进攻，击伤 54 军副军长郑明新、25 师师长刘世懋等，共毙伤俘敌 4000 人。民主联军主力又在东满、北满、西满地方武装配合下，于 4 月 18 日至 28 日，接连解放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歼国民党收编的武装主力 2.7 万，清除了北满腹地之敌。

国民党军在 5 月 15 日集结了 10 个师，分 3 个集团向四平发动全面进攻，5 月 18 日突破联军防线，经过反复争夺，联军终因伤亡过大，被迫放弃阵地，于当日午夜撤出四平。持续 1 个月的四平保卫战，联军虽然迟滞了蒋军的进攻，杀伤蒋军 1 万余人，但联军也付出了 8000 人伤亡的代价。

国民党军进占四平后，于 21 日攻占了公主岭，23 日拂晓攻占了长春。蒋介石春风得意，不可一世，即于 21 日偕宋美龄到沈阳巡视，对东北解放区作进攻部署，并在杜聿明等高级将领的陪同下，游览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说：“自从 1914 年奉孙总理之命前往东北调查革命情势，实则已是相距 32 年之后旧地重游。”不料，从南满传来消息：共军采取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惜放弃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以各个歼灭”之战略，于 5 月 25 日攻克鞍山，全歼国民党第六十军 184 师 1 个团，乘胜南下海城，逼海城守军 184 师师长潘朔端率师直和 1 个团起义。联军进而又攻占大石桥、营口，歼 184 师另外 1 个团，威胁沈阳。蒋介石急忙于 6 月 3 日赴长春，在飞机场大厅召集长春市地方豪绅巨富慰问，又召集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指示机宜，命令必须尽快抢占战备要地，尔后蒋介石于 6

月4日飞回南京。

蒋介石刚到南京，便收到在海城火线上举行起义的184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等将士的通电：

蒋主席、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熊主席、杜司令长官、林总司令暨全国各界父老钧鉴：

朔端等籍隶云南，多年从军，每以卫护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是以抗战期间，也曾尝艰苦，以期尽国民之天职。抗战胜利后，奉命调越南收缴日寇武装。虽背井离乡，远赴异国，但为国家荣誉，个人得失在所不计。

唯任务完成后，政府应能体谅全体军民血战8年之艰辛，而予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建国图强，此其时矣！全师同志，对此咸抱无限希望，无不原以沙场余生，再为建国大业竭尽绵薄。唯事与愿违，本师自安南奉命航海北上，名曰接收主权，实则为进攻中共在东北之武装。身为中国人，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残杀自己同胞，朔端等每念及此，莫不悲愤填膺。近日政府大军云集中满一带，夺取四平，攻占长春，又命本师肃清南满地区之中共武力及一切民主分子。府念东北沦亡14载，人民已血肉枯竭，复何忍大动干戈，杀人遍野？而今仍战线绵延数千里，炮火所及，庐舍为墟，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军乃竟征敛仍如火急，人谁无良心，实不忍睹此。因此朔端等思之再三，乃于海城火线上实行反内战起义，决心与民主联军合作到底，不再执行兄弟自残之乱命。

蒋介石看罢，大怒，向东北拍训斥电，要熊式辉、杜聿明亡羊补牢，从详具报，熊、杜2人只得报告说，一切不知，只知道潘朔端等人不满现状，曾屡在会议上表示愤慨，如今既已倒戈，当严防这类事件重演，赔罪一番。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责令他们对部属严加管教，绝不允许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是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将近160万军队调到前线，蓄谋已久的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6月上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陈诚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剿共”。6月17日，蒋介石向中共提出了人民解放军退出大片解放区的5项要求：（1）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

（2）胶济全线。

（3）承德及其以南地区。

（4）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5）1945年6月7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山西两省从日伪军手里收复的一切地区。

这一蛮横无理的要求，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拒绝。周恩来愤怒地说：“国民党当局在强占长春后，自以为局势对它有利，便提出种种苛刻要求，企图压迫共产党屈服，或者造成破裂，而把破裂的责任推给共产党。蒋介石逼人太甚了，这个方案我们无法接受。”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4项建议。蒋介石不予理睬。蒋介石又提出新的要求：“胶济铁路线的中共军队在8月1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的地区，中共交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白城子、热河、察哈尔、威海卫等地。”周恩来严词拒绝。

国民党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原解放区。6月22日，蒋介石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率领国民党30万大军，向李先念的中原军区6万多人

进攻。中原军区是抗战胜利后由3支部队汇合而成。一支是原在鄂豫边区的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一支是从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一支是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的嵩岳军区部队。这3支部队在豫西桐柏山区会师后，组织建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蒋介石纠集大量兵力向桐柏山区进逼。中原军区主动撤离，由平汉路东移，来到以宣化为中心的东西不到100公里，南北不到25公里的狭小地区待命。蒋介石决意消灭这支在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下的部队，利用停战期间，调集11个正规军26个师，紧紧包围这块地区，并构筑碉堡6000多座，将中原军区及所属的3个军分区，割成“品”字形，还断绝了这个地区的粮食、医药供应。蒋介石发狠说：“即便不能把他们一举消灭，也要把他们饿死，困死！”周恩来叮嘱李先念说：“你们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党发善心，他们不会发善心的，你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中原军区即于6月22日兵分3路突出重围，一部主力在王震率领下转入陕甘宁地区，一部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其余主力在陕南、鄂西创建了游击根据地。国民党30万大军扑空。

6月26日，蒋介石摘下假面具，命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正式爆发，而马歇尔也宣布他的“调停”失败，让蒋介石放手进攻，露出他的帝国主义的原形。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极大，国民党的总兵力共有430万，拥有3亿以上的人口，控制着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大部公铁路交通线和丰富的资源，接受了日军109万人的全部装备，特别是有美国的巨大援助。蒋介石的内战部署，是马歇尔“调处”时完成的，美国为蒋介石训练军队、特务等15万人，装备美械师45个，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及借款40亿美元。内战爆发的第2天，美国国务院决定，为蒋介石建立833队空军；美国总统杜鲁门又批准1个美蒋秘密军事协定，供给国民党飞机1000架、大炮7000多门和其他大批军事物资。7月16日，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杜鲁门，将总数不超过271艘的舰艇“赠送”给蒋介石政府。8月30日，美国空军军官陈纳德，在美国政府指示下，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协定，成立“陈纳德空中运输公司”，为蒋介石空运打内战的军队和军用物资。8月31日，美国又把它在西太平洋的原值8.25亿美元剩余战争物资，以1.75亿美元低价售给蒋介石，美国还以它侵驻上海、天津、秦皇岛等地海军陆战队9万人，直接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

同国民党相比，共产党的军队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120万多人，不及国民党军队的1/3，且装备简陋，有小米加步枪之称，又被迫分割在十几个根据地里。解放区只有1.3亿人口，大部分地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政权还不够巩固，交通不便，现代工业极少，又没有经济外援，一切依靠自力更生。

但是，国民党军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在政治上，国民党军队则处于劣势。

蒋介石自恃军事的优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把160多万正规军布置在内战第一线，其具体部署是：武汉行辕的程潜所属21万人加上十几个保安团，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吴奇伟所属46万人，向苏皖及山东解放区进犯；郑州绥署刘峙及徐州绥署另一

部共 24 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进犯；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及傅作义所属 16 万人，向晋察冀解放区进犯；太原阎锡山所属 9 万人，向晋绥解放区进犯；西安绥署胡宗南所属 15 万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杜聿明部 18 万人向东北解放区进犯；另有 7 万人向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进犯。

蒋介石宣称：“在 48 小时内歼灭中原共军，两个星期占领苏北，3 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3 个月至 6 个月完全消灭共军。”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对蒋介石的力量估计得过高，对人民的力量估计得太低，对战争前途产生怀疑和忧虑；在国际友人中，有人担忧美国会大量出兵，干涉中国内政，甚至会使用原子弹，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只能同蒋介石合作，不能与蒋介石打仗。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必须打败蒋介石，并且能够打败蒋介石。7 月 20 日，毛泽东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他指出：“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是在美国指挥之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我们表示软弱和退让，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变成黑暗世界，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全国才有和平民主的希望，才能保卫人民的生存和利益，才有民族的独立。

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毛泽东的取胜方针和策略是：在军事方面，战胜国民党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要将抗日战争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法，改变为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其中心要求是，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若干地方和城市的暂时放弃，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

在政治方面，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农村中，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同时应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在经济方面，必须作持久打算，一切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必须努力生产，提倡节约，力戒浪费，反对贪污。在财政供给上，实行军民兼顾，既要使自卫战争的物资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

毛泽东又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的指示，要求无论是在战役部署或战术部署上，都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 6 倍、或 5 倍或 4 倍于敌人的兵力，至少也要有 3 倍于敌人的兵力，首先包围歼灭敌军中较弱的一路或敌军阵地中较弱的一点，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

毛泽东要求在作战中必须打歼灭战、速决战。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

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全歼方能把敌军的武器和兵员，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或避开敌军增援部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对于解放军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变我之劣势为优势，变敌之优势为劣势，从而扭转战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蒋介石发动内战时，策划使黄河重归故道，不仅水淹解放区，并将山东、豫东、苏北等解放区同华北解放区分割开来。

蒋介石曾在 8 年前的 6 月 9 日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改道南流。古老的黄河故道已变成良田，如果再使黄河重归故道，就会因原有堤防未及修复，而河水四处决溢泛滥，解放区蒙受巨大的灾难。

6 月下旬，蒋介石严令“宁停军运，不停石运”，并派白崇禧、陈诚到现场监督指挥，企图赶到在洪水季节到来前，把花园口堵复，使黄河复归故道，水淹解放区。

周恩来闻讯，昼夜操劳，呼吁各界制止国民党的这一罪恶行径。同时急令解放区军民加紧筑堤防洪，打击袭扰国民党堵复花园口行动。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 第十七章 进犯解放区

蒋介石无法创造“剿共奇迹”，遂令陈布雷把他的“加强剿共，有我无匪”的决心三令五申传达给国民党高级将领。7 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华东解放区的苏中、淮北、淮南、鲁南、胶济路等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其中进攻苏中解放区的主力为 5 个整编师，15 个旅，约 12 万人。国民党京沪绥靖司令汤恩伯驱使他的部队，浩浩荡荡，来势凶猛地向苏中解放军扑来。

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中野战军只有 3 万多人，粟裕选择在江都至如皋一线与敌人决战，而且改变传统的“诱敌深入”的战法，乘敌正在实行战略展开之际，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给敌以打击，打乱其部署，暴露敌弱点。敌人恃强，以大军向解放区进攻，以为解放军不敢撻其锋，粟裕恰恰在此时此地主动向其反击。7 月 13 日，粟裕以六比一的优势兵力，在宜家堡、秦兴一带，痛歼敌整编第 83 师第 19 旅的两个团、1 个炮营及 1 个步兵营，共 3000 余人，首战告捷。尔后又进行了如皋南战斗，李堡战斗，丁埝、林梓、东陵战斗，如皋、黄桥公路战斗，海安和邵伯两次防御战，七战七捷，共歼敌 6 个旅，5 个交警大队，共计 5.3 万人。敌人遭到沉重打击以后，那种不可一世的气焰被打消，敌军行动彷徨、畏缩，一旅人不敢走路，两旅人走路也是提心吊胆。

粟裕、谭震林率部向北转移，逐步进行防御作战。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线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路出击，歼敌 1.6 万人，攻占城镇 10 余座。尔后又以劲旅深入豫东敌后作战，迫使蒋介石仓促地从中原、华北调出 7 万兵力前去增援，以 22 个旅分兵两路向刘邓大军扑来，刘邓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来自郑州一路敌军，在定陶附近歼敌



4个旅。又以远距离奔袭野城，再歼敌1个旅。

这样，在不到3个半月内，共歼敌9个旅，近5万人。

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张家口进攻。张家口是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聂荣臻统率晋察冀解放军奋起自卫，歼敌2万多人，尔后主动撤离，在平汉线上出击。

山东、山西、东北各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都有力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从6月至10月，4个月内，国共两军作战80余次，解放军歼敌33个旅，计29.8万人。

国民党作战部队，除傅作义、程潜、马鸿逵等部没有受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外，杜聿明、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队，都受到了初步的或相当严重的打击。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承德、淮阴、张家口、安东等105座城池，但每座城池都须有重兵把守，这样，国民党的兵力越来越分散，能用于进攻的兵力也就越来越少，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

蒋介石已意识到中共以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他提醒将领们说：“共产党现除了在经济政治上多方扰乱之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领，主要的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便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10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蒋介石改变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作法，改为重点进犯，其战略为：1、在东北方面，以主要都市及铁路为中心采取防守和持久的态势。

2、进攻延安、夺取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神经中枢。

3、在山东方面，集中兵力歼灭共军，并向黄河以北推进，平定平、津、保三角地区，以统一河北平原。

蒋介石因刘峙打了败仗，勃然大怒，褫夺了刘峙所任各职。

刘峙原由何应钦向蒋介石保荐，担任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辖河南、陕西两省，指挥第一、第五两个战区的军队。刘峙坚辞不就，这是因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虽然曾是他的学生和旧部，但此时声望远远超过了自己，因此，他向蒋介石苦苦哀求，不肯就职，声称：“在胡宗南的头上，硬加上一顶退了色的旧帽子，实在没有必要，纵然胡宗南一向很尊敬我，但我总觉得如芒刺背。”蒋介石反复劝慰，刘峙方才就职。

蒋介石令刘峙沿平汉路北线进犯解放区。刘峙来往驻马店、南阳指挥军队进行围攻。

当围攻部队开往陕、鄂边境，豫省空虚之时，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渡过黄河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中原。刘峙急忙回师考城进行拦截。其部在攻至鲁西砖庙附近，第3师赵锡田部战线超前，被刘邓大军包围，全军覆没。

刘峙被撤职后，带着三姨太太狼狈飞往南京，被蒋介石训斥了一顿，随即闲居上海，过起“悠闲”的寓公生活。他牢骚满腹，逢人便讲：“孙总理是天下为公，委员长是天下为私。”是时，蒋介石与何应钦的关系，亦发生微妙变化。美国总统曾派人去重庆，询问中国继承人的问题，蒋介石以自己体力还健，尚未考虑回答。日本投降后，美国总统又派人到南京重提旧事，蒋介石不得已姑以何应钦应之。何以为蒋介石“圣心”回转，同意他继承“大统”，高兴起来，就忘乎所以了，想在黄埔系中“自成体系”，还要搞什么“何氏内阁”。结果，触到蒋介石痛处，蒋介石便派他往联合国安理会去，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何被蒋一脚踢到地球那一边，闲置起来。

蒋介石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的建议，将原军令部、军政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一概撤销，职权统一划归国防部。经过激烈的角逐，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陈诚出任参谋总长。国防部下设陆海空及联勤总司令部，顾祝同出任陆军总司令，桂永清出任海军总司令，周至柔出任空军总司令，郭忏出任联勤总司令。

蒋介石当务之急是尽快“戡平中共势力的扩张”，需利用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为其反共战事效力，故对李、白羁縻、拉拢，期收为己用。李、白表面上对蒋极为恭顺，蒋、桂之间暂时相安无事。李宗仁被蒋委任为北平行营（后改为北平行辕）主任，辖第十一、第十二两个战区和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天津、青岛5省3市。但李宗仁并没有实权，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所部，全是由空运或海运而来的“中央军”；第十二战区是傅作义的部队，与李素无渊源，华北各机关都直接听命于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各自为政，行营对此莫之奈何，就连北平市市长一职的任命和调职，事前事后并不通知李宗仁一声。

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其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均为陈诚亲信。蒋介石给国防部规定的组织纲要、国防部的职掌，只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本身不能决定任何问题。而参谋总长却集中大权于一身，直接秉承国府主席的命令，统率陆海空军，可不受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的节制。国防部长一职形同虚设，蒋介石亲信陈诚参谋总长的权限之奇特，报界称为中外古今所无。

陈诚被称为“小委员长”，权力的巅峰令其陶醉，也使他失去理智。他在北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国防部组织健全，各部队多系美式装备，实力强大，与共军决一雌雄，3至5个月便能解决。”他先后9次离开南京，飞赴郑州、徐州、济南、青岛、沈阳、归绥、太原、苏北、张家口等地，策划指挥。规定参谋部官兵一律实行“新生活运动”。

鉴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他大张旗鼓地标榜“刷新军政”，整顿军纪，严惩违令。兵团司令陈明仁在四平街战斗立下战功，但因擅自动用救济总署物资，被他革职查办；鲁南战役中，非嫡系部队司令黄伯韬作战有功，他特颁“青天白日勋章”和奖金；而对嫡系部队将领邱清泉援黄不力，予以撤职留用处分，以示不分亲疏，赏罚严明。陈诚的这一套办法，颇能迷惑一部分人，对维系军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战局的发展，却完全出乎陈诚的意料。

毛泽东于11月21日在延安枣园邀集刘少奇和刚从南京返回延安才两天的周恩来会商，一同对比分析了此时与抗战初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力量的变化，认为1年的谈判教育了全国广大人民，使他们看清了国民党蒋介石是发

动内战的罪魁祸首，从而使共产党赢得了人心。结合着战场上的胜利，便下定决心，作出“争取3—5年打倒蒋介石”的决定（暂不对外公布）。中共中央随即举行会议进行了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宏伟纲领是：1年内线，2年外线，3—5年打到南方去。但是，要打倒蒋介石，必须首先取决于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打大歼灭战，整旅整师地消灭国民党正规军中的中央嫡系。

毛泽东的决策给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极大的鼓励。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继续向苏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进攻，而主要战场则在苏北和东北。

1946年12月中旬，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25个半旅，分4路从峰县、宿迁、淮阴和东台向解放区华东战场扑来。陈诚不无自信地宣称：“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国民党将军见华东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战略位置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自恃优势，急于见功而忘乎所以。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亲自督率其中路宿迁一线的7个旅，越众出班，浩浩荡荡地向沭阳、新安镇攻来。

是时，中共中央军委已将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毅、粟裕等判断：国民党军4路进攻，战线长，间隙大，应援不便，而宿迁一路孤立突前，便于我军围而歼之，可以先予以歼灭。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集中24个团的兵力，分割包围并歼灭由宿迁进犯之敌。

苏北大地，已是衰草枯黄，芦花飞白，满目肃杀气氛。

12月14日晚，战幕拉开，华东野战军8师奉命首先攻取敌军据守的峰山，那是苏北战场上独耸的制高点，又是敌69师左翼预3旅旅部驻地晓店子的正面屏障，是敌军设防的要点。战斗打响后，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次日天亮之前，解放军先头部队终于攻占了峰山之顶。尔后勇猛攻破晓店子，一举歼灭预3旅。敌69师在解放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全部被歼。整个宿北战役于12月19日结束，共歼国民党第69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计2.6万多人，师长戴之奇在大势已去的绝望时刻，举枪自杀，为蒋家王朝殉节了，副师长饶少伟却没有步师长的后尘，老老实实地俯首就擒，作了俘虏。

1947年元旦刚过，陈毅便对粟裕说：“蒋介石派军队侵占我解放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搞得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现在倒好，26师师长马励武回到峰县过快活年去了，老子偏不让他过，你看怎样？”粟裕微笑着答道：“乘敌不备，攻则必胜。”国民党第26师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蒋介石从其二公子蒋纬国为团长的战车团拨出数十辆坦克，为该师配备了一个战车营，该师还有一个装备重榴弹炮24门的榴炮团，一个装备各式汽车300余辆的汽车团，两个从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旅中拨来的步兵团，该师是薛岳手中的王牌。

陈毅、粟裕趁敌人过年而疏于戒备，发起鲁南战役，率部猛攻，敌人猝不及防，陷于混乱状态。蒋介石派几十架飞机助战，也无济于事。解放军破坏了道路和桥梁，埋了地雷，挖了反坦克壕，使敌人坦克、车辆行动受阻，乱作一团。解放军抓住时机，紧缩包围圈，并歼敌于突围途中。敌26师残部和快速纵队余部脱离阵地，向西突围。解放军分兵多路对敌猛追，愈打愈勇，敌军斗志全失，争相奔逃，漫野遍地，豕突狼奔。至4日下午3时，战斗基本结束，进至傅山口到卞庄一线的国民党军第26师包括第一快速纵队

共3万余人，全部被歼灭在兰陵以北的原野上。此役，解放军又在峰县、齐村、枣庄全歼第51师，整个鲁南战役共歼敌5.3万余人，缴获全部美械装备。包括24辆坦克，89门重榴弹炮、野炮、山炮，474辆汽车，以及其他大批火炮、机枪等武器，全部成为解放军的战利品，活捉了敌26师中将师长马励武和敌51师中将师长周毓英。

蒋介石恼羞成怒，调集31万大军，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南线突击集团由8个整编师组成，分3路沿沂河、沭河北犯；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的3个军组成，由济南南下莱芜、新泰。蒋介石亲自到徐州指挥，并制定了从陇海、胶济两线南北夹击山东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又派陈诚坐镇徐州督战。

1月31日和2月2日，蒋军分别从陇海线和胶济线南北夹击，直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妄图在临沂及其以北地区歼灭解放军华东主力。蒋介石来势汹汹，咄咄逼人，陈诚扬言：“党国成败，在此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编组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军长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并任党的华野前委书记，饶漱石为军区政委，张云逸为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委，粟裕任野战军副司令员；谭震林任野战军副政委，华东军区共约30万人。毛泽东电示陈毅等：“敌愈深入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毛泽东的电示正合陈毅本意，于是便于2月6日晚命部队先歼灭叛军郝鹏举部。那郝鹏举原是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郝本人原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他反复无常，看风使舵，搞政治投机。在1946年1月9日，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他率部在台儿庄宣布起义，表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受到山东军民的宽待。时隔一年，1947年1月27日，当蒋介石南北夹击山东解放区时，他背叛人民，又投靠蒋介石，得了第四十二集团军的番号，配合李仙洲的南线左路，担任侧翼掩护。经过一昼夜战斗，于2月7日黄昏，解放军将郝鹏举总部及其2个师全部歼灭，活捉了郝鹏举。陈毅得到报捷，作诗一首：

教尔做人不做人，教尔不苟竟狗苟。

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陈毅率主力北移，同时令第2、第3纵队，使用各个纵队番号，伪装华野全军，制造敌人错觉，并以寡敌众，顽强阻击。2月15日，南线敌人占领临沂城，蒋介石、陈诚得意忘形。但在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得到解放军主力北移的情报，急令李仙洲全线后撤。陈诚大为不满，以参谋总长的身份严词命令王耀武：“着该司令官派1个军进驻莱芜，1个军进驻新泰，诱敌来攻，勿使其继续北窜。”蒋介石亦命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心烦意乱的王耀武，虽然执行了蒋介石和陈诚的命令，但当他看到解放军有围歼李仙洲部的意图时，又不顾违抗蒋介石和陈诚的命令，急令46军从新泰撤到颜庄，193师从颜庄撤到莱芜，同时命令驻在胶济线上张店的73军77师立即经博山南援莱芜。但已为时过晚，陈毅率领的主力已在莱芜东西地区形成对李仙洲部的战役包围。2月20日，陈毅命令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攻击。

李仙洲不断向陈诚告急，但陈诚并不派兵解围，王耀武考虑再三，与其在莱芜被歼，不如坚决突围，于是便命李仙洲：“全军经吐丝口向明水突

围。”蒋介石看到王耀武的突围决定，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向王耀武发出话来：“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李仙洲派出的突围先头部队刚走出莱芜北门，就遭解放军痛击。一场血战在鲁中展开，小小的莱芜城内，几万蒋军惶惶不安。李仙洲下令突围，先头部队还没有突围出去，后卫部队便仓皇撤离矿山和莱芜城，去追赶北撤的部队，也钻进了解放军预先设计的“口袋”。解放军立即封死了敌人的归路。李仙洲集团4万多人困在东自芹村，西到高家洼，南自南白龙，北到周家高庄，东西只有六七里，南北不过十来里的狭长地区内。2月23日下午，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同时从东西两面向敌人发起大规模冲锋，敌左右侧卫的两个师被解放军斩成几段，尔后被全歼，敌军的两个师长肖重光和海兢强被俘。

蒋介石命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调集几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到莱芜上空作战。但仍无济于事。李仙洲集团已成落网之鱼，几万人马乱作一团，各自逃命，呈作鸟兽散。李仙洲左腿中弹负伤，挣扎着继续向北逃跑。敌73军军长韩浚侥幸带了1000多人同李仙洲一直乘混乱之机突入口镇，同口镇守敌第36师残部会合在一起，共5000余人，向博山方向逃窜，刚到青石关即被华东野战军九纵全歼。李仙洲夹杂在俘虏群中，头戴一顶掩耳的棉帽，换上士兵军服，但他身躯肥大，服装窄小，被解放军战士识破。

莱芜战役前后不到3天，共歼敌5万多人，除46师师长韩练成事先放弃指挥，脱离部队外，19名国民党将军被俘，1名将军被击毙。

蒋介石从南京飞到济南，把王耀武大骂一顿：“你们只是在莱芜战役就损失了两个军和1个师，又损失了很多轻重武器，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东北野战军至1946年9月已发展到23万人。10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8个师10万多人，分三路向南满进攻。东北野战军四纵队于本溪东南，将分路冒进的敌52军第25师合围于宽甸新开岭地区，经过3天激战，于11月2日将敌自诩为“千里驹”的全美械装备的第25师8000余人全部歼灭，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被俘。

1947年初，北满野战军三下江南，寻机在运动中歼敌。野战军一纵渡江西进，在二纵、四纵配合下，于3月12日断敌退路，将敌88师大部、87师一部及军部特务团、工兵等堵截于德惠、农安间之郭家屯，激战一昼夜，88师除少数逃脱外，全部就歼，此战役一举歼灭敌2个主力师之大部，取得重大胜利。

## 第十八章 陕北“蘑菇”战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命令杜聿明拼凑14个师，以营盘至通化公路为轴线，分3路向临江发起进攻。东北野战军在通化西北，以少数兵力诱敌进入三源浦西红石砬子一线伏击圈内，尔后突然发起进攻，战斗10个小时，全歼敌7800余人，俘敌副师长张校堂、秦世杰。其余两路敌军闻讯纷纷四窜。

东北野战军又消灭土匪8.2万余人。至此，东北战场上出现了敌军由进攻转为防御，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的历史性转折。

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的4个月中，人民解放军作战80余次，共歼灭国民党军41.4万人，虽然放弃了87座城市，但又收复和解放了87座城市。战局已开始向更加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军由前4个月的疯狂逼进，改变为敌我一进一退的拉锯战局面。

解放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国民党军在全局上已转入了被动。至此，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已经破产。

由于国民党兵员大量被歼，战线延长，士气下降，后方空虚，从1947年3月开始，被迫改变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犯解放区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

1947年2月底，北方还是冰雪天地，西北风呼啸着，雪花漫天飞舞。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要员，亲自布署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蒋介石动用33万军队，第一线就用了25万多人。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依仗着兵多武器好，决定向陕甘宁边区全面进犯，妄图在3—6个月内，解决陕北问题。胡宗南秘密调动其嫡系部队，向边区南部的洛川、宜川集结，于3月10日前集结完毕。他以董钊的第一军、刘戡的第二十九军，编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的解放军，占领延安以至整个边区。又有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向陇东、盐池、定边、安边等地挺进，邓宝珊部则向绥德、米脂等地攻打。各路皆系蒋介石精锐之师，美式配备之军，浩浩荡荡，好不吓煞人也。

陕甘宁边区解放军兵力只有2.6万人，不及敌军的1/10，处于绝对的劣势。3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1万多人参加的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说：“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边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以为上两次没有来，这一次也许不会来。同志们，不要这样想，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因为他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它的大量部队。蒋介石在财政上也破产了，滥发票子，人民已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和他闹。因为这样，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去的人心，这岂非梦想！”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带领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同彭德怀住在一起。

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下辖6个旅。

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运动中寻机破敌。

许多解放军战士甚至不少干部对暂时撤离延安都想不通，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毛泽东耐心地说：“我们在这里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

我们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过去8个月内，蒋介石已损失60多个旅，他能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他已走近穷途末路，离灭亡之日不远了。目前全国正面临着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我们要用百折不回的毅力，去克服所有的困难，促进新的高潮很快到来。我们用2万多人的力量，去消灭敌军25万人的兵力，是有困难的，要战胜敌人，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现在，

就靠你们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团团转。这种办法，就叫‘蘑菇’战术，陕北山高路隘，你们牵上敌人去爬吧！等它爬够了，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少则3个月，多则1年，我们一定能回来的！”胡宗南部15万大军日夜兼程地向延安进军。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机关，主动撤离，同时实行坚壁清野，只留下一座空城。撤退工作有计划有秩序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最后撤退的。

国民党的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胡宗南部已接近兵临城下，毛泽东还是谈笑自若，在他那缺乏睡眠的脸上，依然显露着乐观坚定的容颜。外国记者在最后一次去采访毛泽东时，恰巧收到了撤退的通知。毛泽东对客人们微笑着说：“我们很抱歉，为了你们安全，不得不把我们的朋友送回你们的来处去；可是，你们也不必为我们担心，照目前形势来说，不出两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战争便可获得胜利。

到那时候，再请各位到北平、上海等地去参观吧！”外国记者都为毛泽东的话感到惊愕：形势这样严重，他的信心是那樣的坚定。

3月18日黄昏时分，炮声、枪声已经很近了，延安市内除了少数几个扛步枪、拿梭镖的青年游击队员外，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情况紧急万分，据侦察员报告，敌人的主力部队已到达七里铺。毛泽东、周恩来还在王家坪的窑洞里没有走，警卫排长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经常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我们要保证你的安全，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怕什么！”国民党军队越来越接近，连手榴弹的爆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仍在办公室内办公。周恩来忙完检查机关和群众撤离工作回来，已是晚上时分，他对毛泽东说：“该走了！”毛泽东答道：“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饭后，周恩来先走出窑洞，命令：“准备汽车，马上出发。”毛泽东从窑洞里走出来，站在窑门前，向隐现在夜色中的延安古城凝视良久，问秘书叶子龙：“老乡们和机关工作人员都走完了吗？”叶子龙答道：“早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走下坡来，在上汽车前，双手握着彭德怀的手说：“你的担子很重，要谨慎用兵，出奇制胜。天空黑下来就预示着黎明在即。我们走后，你要检查一下群众纪律；把延安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胡宗南进来，这叫有客不容怠慢。”3月19日，胡宗南的“天下第一”的第一军进入已是一座空城的延安。他们根本不知解放军主力的去向，但董钊仍由延安致电西安说：“我军经七昼夜之激战，第1旅终于在3月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接此电报，信以为真，喜出望外，即回电嘉奖：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

希望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的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又奖给胡宗南“河图勋章”，并提升胡宗南为陆军上将。

许多中外记者要求到战地采访，胡宗南急中生智，在延安设战俘营10座，从边区抓来500名青壮年村民，再从国民党军队中挑选1500名“伶俐”士兵，加以排练，每人每天一块半大洋，以示恩惠。让这2000人扮演“战俘”，先住进第一座战俘营内，等记者参观后，即被运到下一个战俘营，让记者前去参观，他们换了10个战俘营，记者也跟着参观了10个战俘营。胡

宗南又把其部队中的一些武器送到“战绩陈列室”供记者参观。白天送去，晚间取回，以防夜间解放军来袭击。此外，还在延安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阵亡烈士或共军的亡魂。

记者发现作假的马脚，便提问：“这些新式轻重机枪和美式自动步枪，共军是从哪里得到的？”“那个战俘我昨天在那个战俘营见过，今天怎么来到这个战俘营来了？”那解说员事先经过训练，当无法回答时，便挺起胸脯，以立正姿态站立，一言不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6日深夜到27日，在绥德以南的清涧县北的小山枣林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都参加了会议。有人提议毛泽东离开陕北，毛泽东立即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调到其他战场上去，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毛泽东也不同意增加陕北解放军部队的意见，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敌我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前往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会后，刘少奇、朱德等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朱德在临行前，召集警卫部队连以上干部开会，他说：“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重大，也很艰巨，你们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此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历时1年零5天。毛泽东根据胡宗南急于和解放军主力决战的野心，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制定了“蘑菇战术”，即先同敌人周旋一个时期，待敌十分疲劳、十分缺粮后，寻机歼敌。

彭德怀采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以一小部分兵力把敌人主力5个旅的部队诱往延安西北的安塞，而以主力埋伏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设伏，待机歼敌。3月25日，敌31旅旅部和1个团进入伏击圈，解放军立即出击，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全歼敌军，活捉了旅长李纪云。

胡宗南急忙将其主力掉过头来，扑向青化砭地区，解放军主力已转移到榆树坪一带隐蔽休整，只派出一小部分部队同敌人“蘑菇”。

胡宗南率主力兜了400多里的大圈子，企图稍事喘息，解放军又在羊马河地区设下伏击圈。4月14日，敌135旅由瓦窑堡向蟠龙镇前进，途经羊马河地区，被解放军歼灭，旅长麦宗禹被活捉。

志大才疏的胡宗南大伤脑筋，便生一计，在蟠龙镇建立规模颇大的永久性兵站，屯积物资以加强兵力，妄图逼迫我军东渡黄河时予以聚歼。我军将计就计，以少数兵力沿途遗弃臂章、符号、旧军装、破担架等物，做出主力仓皇退走的样子，把敌军主力9个旅吸引到绥德，使蟠龙镇孤悬于榆林、延安之间。5月2日，我军以4倍于敌的兵力，向蟠龙镇发起猛攻，经两昼夜激战，全歼守敌1个旅又1个团，活捉敌旅长，并缴获军衣4万余套、面粉1.2万多袋、骡马千余匹、山炮6门，及其大量弹药。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3次战役，胡宗南损兵折将2万多人。五六



月间，西北野战军又出击陇东，收复安边、定边、靖边，8月，进攻榆林，不久，又在沙家店歼敌1个师。

经过7次作战，共歼敌3.1万余人。那胡宗南在6月14日给蒋介石的告急电报中惊呼：“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国民党政府为筹措内战经费，在国外依靠出卖中国主权，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和协定，诸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航空协定》、《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中美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等等，中国的所有主权，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物质，都被美国人所侵占。

中国共产党发表郑重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谅解，均不予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国民党在国内用强征田赋、征收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垄断工商业、攫取高额利润、套购黄金、外汇，操纵金融市场等手段，囊括全国财富，对国统区的城乡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地掠夺。尽管这样，由于军事开支越来越大和国民党上层贪污腐败、鲸吞公款等原因，国家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使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城市失业人口骤增，广大农村更是饥民遍野，饿殍载道。1946年各地饿死人数达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严重的经济危机，把各阶层人民推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迫使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蒋介石又对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1.3万人。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10万人汇集到火车站，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联名发起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送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当马叙伦、盛不华、阎宝航、胡厥文、雷洁琼、胡子婴等11名代表肩负着上海人民委托的反内战争取民主的重任来到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先埋伏在车站的几百名特务的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受伤。

7月，蒋介石下令，封闭了反对内战、呼吁民主的文化团体、言论机关100余处。同时，蒋介石还向特务机关发出密令：“中共与民盟分子同样可以密报、密捕、密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7月15日，民盟中央委员，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在昆明主持李公朴的追悼大会，厉声责问国民党反动派。是日晚，闻一多亦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周恩来、董必武闻讯，即向国民党政府提交抗议书：“特务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国。殴打未已，暗杀继之。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不知政府当局何以自解耳！”民盟发表了《李闻惨案调查报告》，揭露国民党政治暗杀的真相，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追悼李、闻烈士，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活动。

深受国民党黑暗统治压迫的农民，逼上梁山，纷纷起来反抗抓丁、征粮，掀起民变风云。从1946年9月起，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湖北等13个省的广大地区的群众都先后参加了民变运动。仅四川西康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由1946年12月份的10多万人，到1947年初增加到50多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以武力抗租、抗征、抗捐、反抓丁、

惩办恶霸，其中尤以“抢米”风潮最为猛烈。许多工人、学生，以至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也参加了这一运动。

1946年底到1947年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城市，50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暴行（因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两个美国兵强奸，而导致反美学潮），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继这一斗争之后，国统区广大学生又发动规模更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反蒋反美斗争结合起来，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蒋介石惊慌叫嚣：“学生已越出国民道德，形同暴徒，要断然处置。”1947年5月20日，军警特务对到国民党行政院游行请愿的学生大打出手，500多名学生被打伤，造成了“五·二〇”南京惨案。

蒋介石一手实行法西斯高压政策，一手玩弄政治骗术，他披上“民主”的外衣，以召开“国民大会”的名义，用高官厚禄和金钱收买，来拉拢中间党派。民盟中央委员张君勱经不住国民党的拉拢，不顾民盟总部的劝阻，以民主社会党的名义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参加“国大”的代表有1600余人，其中国民党占85%，余者来自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以张君勱为首的民主社会党，以及“社会贤达”王云五、傅斯年等人。民盟中央常委立即作出决定：对盟内的民主社会党成员参加伪国大者，一律开除盟籍。

这次“国大”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故又称“制宪国大”。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抄袭了欧美资本主义宪法的“自由”、“平等”等条款，揉合了一些政协宪草决议的词句，然后再由蒋介石亲自删改而成。这个宪法草案违背了政协决议的联合政府责任内阁制的原则，恢复了总统独裁制；违反了政协决议的地方自治原则，实行中央集权制，又用“紧急”、“必要”词句限制人民民主自由；这部宪法的特点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政府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

伪国大闭幕后，中国共产党便郑重声明：蒋记国大和它制订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12月28日，周恩来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说：“蒋政府的伪宪，也只有把它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人民也决不会承认它的。”两天后，民主同盟在声明中说：“坚决否认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同日，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11个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这种宪法产生的基础和基本精神是反和平反民主的。”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作好行宪准备，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案》。4月，蒋介石又玩弄改组政府的把戏，表示容纳所谓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入阁。4月1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18日，公开宣布改组政府名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副主席孙科，行政院长张群，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29名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占17人，青年党4人，民主社会党4人，“社会贤达”4人。

国民党改组的“多党政府”宣告成立后，蒋介石便大肆吹嘘说：“还政于民已经实现。”然而，“新政府”刚一施政，就颁布了镇压人民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人民群众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

示威，对爱国民主运动要采取“必要的措置”和“紧急措施”。改组后的政府比先前政府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引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农工民主党、民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以及国民党左派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纷纷发表声明或宣言，反对国民党改组政府。蒋介石本想通过伪国大和改组政府来孤立共产党，打击民主力量，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使自己陷于更加孤立的困境。

## 第十九章 沂蒙山“啃核桃”

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归罪于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于是便下了一道严令：“主官不退而部下先退，致主官有伤亡情形者，杀其次级官；部下未退而主官先退者，杀其主官；见难不救，致友军有重伤，而己身完整者，杀该军将领。”蒋介石为扭转败局，于1947年4月开始，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团。4月15日，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张，为期两个星期。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作《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长篇讲演。蒋介石言词滔滔，吹嘘说：“以期今后剿匪的军事能够顺利完成，而建国工作得以迅速推进。”“目前这个时机，正是我们剿灭匪军千载一时的机会，各高级指挥官务须把握这个时机，认清敌人，负责自动，知耻自强，来加速消灭匪军，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两天之后，蒋介石又作了《剿匪战争中精神的影响与心理战的重要》讲演，尔后又连续作了《军官训练团训练之目的与方法》及《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两次讲演。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结束之后，接着又办了第二期，蒋介石同样为军官训练团第二期作了多次演讲，讲演的题目和内容又有翻新，如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演的题目是《剿匪必胜的事实》，下一次讲演的题目是《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等等。总之，蒋介石效法他在庐山军事训练团的样子，梦想再出现一个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好结局”。

1947年4月上旬，蒋介石先后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并以其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整编第11师、第五军第74师等作为骨干，编成3个机动兵团，向山东解放区进攻。那74师是蒋军5大主力中的主力，蒋介石把它作为百战百胜的王牌拿出来进攻山东解放区，并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再加上兵团司令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等一批高级将领，以74师为先锋，向鲁中进犯。

蒋军的战术不断翻新，先前进犯苏北，采取的是“长驱直入”，进攻涟水则为“分头并进”，进攻宿北为“齐头并进”，进攻莱芜为“南北对进”。以上战术都以失败告吹，这次扑向鲁中山区，则采取“硬核桃”和“烂葡萄”战术。蒋介石为此战术，颇费苦心，他把嫡系主力作为“硬核桃”放在中间，而两翼放置的则是“烂葡萄”的杂牌军和二流部队。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如果解放军插到中间去打他的嫡系主力，不仅74师、11师、新5军3个主力能够互相策应，两翼部队还可以赶来，就啃不动这个“硬核桃”；如果解放军打他的两翼，他拚着牺牲几个“烂葡萄”；等打了几仗，弄得解放军精疲力竭时，他的主力部队突然从横里出来袭击。蒋介石以为这样的战术，万无

一失。

蒋军来势汹汹，向鲁中地区的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一线大举进攻，迫使解放军主力决战。

毛泽东致电陈毅：“对沿津浦路向北犯的敌人不要阻止，让其分散兵力，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陈毅遂集中部队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地区休整，以逸待劳，作好战斗准备。

5月初敌军继续向北推进，步步逼近，侵占了新泰、蒙阴等地，形势十分紧张。是时，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敌军密集不好打，但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胶济路以南广大地区仍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唯：（一）要有极大的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陈毅、粟裕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一系列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的军事行动。他们调动部队，实行要龙灯式的高度机动，时东时西、时分时聚，使敌弄清我军意图和动向。对刚占新泰之敌包围之后，又主动撤围后退。华东野战军主力再后退一步，撤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

蒋介石及顾祝同果然产生错觉，误认为解放军主力已向蒙阴东北及淄川、博山撤退，决心跟踪“追剿”。蒋介石密令各军改变战略，将“稳扎稳打”改为“稳扎猛打”。敌军密集靠拢的态势终于很快发生了变化。敌军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不待王敬久和欧震两个兵团统一行动，便指挥所属的8个整编师向沂水、坦埠方向进击。急功近利的第74师在左翼25师、右翼83师的配合下，疯狂地向坦埠扑来。那74师更是急切，不久便脱离左右两翼，直向坦埠冲来，形成孤军深入的态势。

陈毅查明了汤恩伯兵团的行动计划，抓住战机立即命令正在向东向南行动的各部队掉头返回，集结待命。是时，毛泽东命令陈毅：“敌有向淄博等地急进模样，你们应集中主力待敌进至适当地点，不失时机发起反击，首先解决一两个师，依陕北经验，敌增援能力不大，如有一定间隙，以有力一部筑工事抗击，可使敌强大援军根本不能增援。”陈毅见了毛泽东的电报，异常兴奋地说：“毛主席真是明察秋毫，用兵如神，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个指示来得非常及时，十分英明。”陈毅立即召集各纵队指挥员会议，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不打敌军侧翼，改打中部强敌74师，采取正面突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南北各部援敌的战法，迎敌74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将其从敌人重兵集团中割裂出来，予以围歼。

整编74师，原是74军改编，最早任74军军长的是蒋介石心腹干将王耀武，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也曾被派到74军第85师任师长，这个部队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特种训练，武器装备完全是美式的，蒋介石指定74师为国民党军的“典范”，74师一直充任国民党陆军总部的南京警卫部队，是拱卫蒋家王朝的“御林军”。74师师长张灵甫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他身材魁梧、个性强暴，具有武士道精神，崇拜拿破仑、希特勒。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又受训于“陆大”甲级将官班。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升迁，由旅长而师长，后至军长。张灵甫违善从严，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反复重复蒋介石的话：“一年之内不消灭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这次北犯鲁中，锋芒毕露，决心“一鼓作气”，攻下沂蒙由区。

陈毅决心先吃掉74师。5月13日晚，解放军向74师发起攻击，在漆

黑的夜幕掩护下，我军两翼的迂回穿插部队各以一部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同时，第一纵队迅猛插入敌人纵深，实施中间突破，逼近蒙阴，阻击敌第 65 师，割裂了敌 74 师与敌 25 师的联系。第八纵队割裂了敌 74 师与敌 83 师的联系。第四、第九纵队，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原来迂回鲁南敌后去的第六纵队，也取捷径回师，昼夜兼程，从西南向东北的垛庄方向急进。

解放军各部队的行动集中目标，指向敌 74 师的外围阵地，很快完成了对敌 74 师的包围。

骄横跋扈的张灵甫仍不在乎，说道：“不要大惊小怪，共军想一口吃掉我 74 师，他们不但不敢做，恐怕想也未必敢想！”遂命令部队照旧执行进占坦埠的命令。直到 14 日上午 10 时，解放军已经攻占天马山、磊石山等要地，并向垛庄、万泉山进击，张灵甫才如梦初醒。于是，便命令 74 师放弃北进，立即向孟良崮、垛庄方向撤退，并拚力向我第一纵队反扑，企图打开返回垛庄的道路，沟通与敌 25 师的联系。但已经晚了，解放军已经占领垛庄，断绝了张灵甫 74 师的退路，张灵甫被合围在中心，插翅难飞了。

本来坐待捷报的蒋介石和顾祝同、陈诚等再也坐不住了，接连发出电令，一面好言抚慰张灵甫，一面调兵增援，调在新泰的第 11 师、在蒙阴的第 65 师、在桃墟的第 25 师、在青驼寺的第 83 师、在河阳、汤头的第七军和第 48 师等部队，迅速向 74 师靠拢，并调第五军从莱芜南下，调 20 师及 64 师从鲁南向垛庄北进，调 9 师从津浦路的大汶口向蒙阴东进，妄图以 10 个整编师的兵力，夹击我军，实行其与我军决战的企图，并解第 74 师之围。那张灵甫又神气起来，自鸣得意地说：“以我张灵甫为诱饵，把共军吸引在我周围，有利于四面夹攻，两下一挤共军就完蛋了。”蒋介石又派白崇禧和陈诚去临沂作新的部署和传授蒋介石的指令，他们要张灵甫“中心开花，拚命厮杀”。

陈毅得报，则说：“白崇禧、陈诚叫张灵甫居高临下，中心开花，我叫张灵甫片甲不留，自掘坟墓！”遂命令主攻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 74 师，不让敌人跑掉一个。

5 月 15 日下午，解放军向孟良崮发起总攻，从四面八方进击，敌 74 师竭力顽抗，每一个阵地、每一个山头都在进行反复争夺战。解放军在炽盛的火力掩护下浴血奋战，越战越勇。孟良崮是沂蒙山区的著名平顶大山头，周围群山连绵，溪流纵横，72 崮装点其间。

在这绚丽多彩的山区，硝烟弥漫。经过 3 天 3 夜拚杀，解放军各战斗部队，顽强冲杀，扫清山麓，突破山腰，奔向山巅。

次日黎明，解放军对张灵甫的 74 师残余力量所占据的最后一个山峰，进行最后决战。

那张灵甫从报话机中发出向 25 师师长黄伯韬、83 师师长李天霞呼救的声音越来越急促：“黄先生、李先生赶快向我靠拢，赶快向我靠拢。”蒋介石见 74 师将葬身沂蒙山区，给增援部队发出手令：“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者，定必以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汤恩伯也向他的部队发出急电：“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为，亦恩伯所不忍言也。”但蒋介石、汤恩伯的命令都没有发挥作用，直到 5 月 16 日下午，各路援敌始终没有跨越解放军包围圈一步。

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在猛烈的炮火和纷飞的弹雨中向大崮顶北侧敌 74 师指挥所山洞猛冲，张灵甫组织少数残兵败将反扑，刚从洞内露出

头的敌兵，就被击毙。特务团冲进山洞，顽抗中的张灵甫和副师长蔡仁杰均被击毙。此役共击毙和俘虏敌人3.2万人。

74师被全歼，张灵甫被击毙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痛心疾首，气急败坏，惊呼：“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长叹“真是空前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陈毅大喜，赋诗一首：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点点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上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解放军在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在5月13日发动了夏季攻势。

林彪、罗荣桓命令东北野战军从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和热河、冀北6个地区，向国民党军分头发起进攻。以南满、北满主力，向长春、四平、吉林之间实施主要突击，作战指导思想是：集中优势兵力，针对防守薄弱之敌，各个击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北满的东北野战第二纵队于5月15日首先包围怀德，歼灭守敌5000人，增援怀德之敌军71军见势不妙，掉头逃跑。东北野战军独立1师当即追击，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迅速将敌71军第88、第91两个师围困在公主岭以北大黑林子地区，经激烈战斗，除敌71军军部少数人逃跑外，1.5万人被全部歼灭，俘敌军参谋长冯宗毅、88师师长韩增栋。战斗结束后，解放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四平。

5月30日，蒋介石在12架战斗机保护下，由南京直飞沈阳。下机后直趋康宁街行辕，听取各方报告。熊式辉、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等人两旁坐定，静听蒋介石训话。

蒋介石以低沉的声音说：“今年，正好是去年我到东北的一周年，可是局势大不相同，现在共军正广泛展开进攻，以切断东北和关内交通，阻碍我方援军的行动。并破坏长春至沈阳间铁路，然后对我分割包围，情况的确严重。”杜聿明此时一筹莫展，以致忧郁成疾，怕蒋介石责备他，便道：“我本想去铁路沿线看看，只因风湿病发作，不能走动，短期内还不能出去。”蒋介石暗吃一惊，局势危急，主帅却害起不大不小的病来。是时，杜聿明的副官走到杜的背后，在他耳旁轻轻说了几句，杜聿明顿时满头虚汗，面色如土。蒋介石忙问：“杜长官，有什么事？”杜聿明道：“报告委座，梅河口情况不明。”蒋介石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呆若木鸡，良久才醒过神来，命令孙立人：“明天你就回长春去吧，为防万一，长春新的机场，马上动工修建。准备降落伞部队应用，你立即进行。”次日早晨，蒋介石刚起床，刘斐急忙进来报告：“刚才平津有消息来，情形不好，天津人心慌乱，北平彻夜炮声，我们在这里不可久留。”蒋介石心头一惊：“消息从何而来？昨晚还没听说。”刘斐回道：“共军猛攻津浦路北段。唐官屯已被占领，平津路再遭切断，因此天津人心慌乱。同时共军又向长辛店猛攻，北平近郊也遭袭击。”蒋介石等遂于当天上午11时，急奔机场，飞往南京。

东北野战军遂于6月14日对四平发起总攻，经过勇猛顽强突击，很快突破了敌人的城防，打退敌人连续冲击之后，进入巷战。四平守敌71军，虽然刚受过严重打击，但以地方团队迅速作补充，依托坚强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经过半个月激烈战斗，歼敌1.7万人，最后将敌压缩在四平东北隅，

未能攻下，敌人增援部队逼近，我军撤出战斗。

东北野战军夏季攻势 50 天，歼敌 8.3 万人，收复城市 42 座，解放人口近千万，扩大解放区 16 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联成一片。

晋察冀解放军在四五月间出击正太路，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冀鲁豫解放军发起豫北战役，歼敌 4 万余人。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共歼敌正规军 97 个多旅，计 78 万余人，连同歼灭的非正规军 34 万人，共计 112 万人。

国民党军队的将士因对蒋介石打内战和对内排斥异己不满，400 多名中训团将官分乘卡车去南京中山墓哭陵。他们在中山陵前博爱坊整队，由黄埔一期生黄鹤将军担任总指挥，他在队前说：“今天我们不是谒陵，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三哭！现在我们的政府对我们 1000 多个将官不加理睬，简直要断绝我们的生路，我们也是一个人，我们要求活着的时候有一碗饭吃，死的时候要一块板！”400 多人的队伍到陵前献花献祭、诵读祭文，内称：“今白骨成狱，碧血为渊，嫠妇夜泣，羁魂不昧，皆莫非为主义之实现及民族之复光，借知国运维新，大敌扫除，宪法颁行，飞鸟尽兮良弓弃，训政结束兮还民，军人职责已尽？……念及先烈之血迹未干，遗族之孤寡谁矜？成仁者固死得其所，成功者也应返回故里。”祭文触到众人伤心处，放声大哭，最后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在哭陵的队伍中有 6 名特殊人物，他们是刚刚病逝的原国民党军 190 师副师长陈天民的太太和 5 个孩子。陈天民在 5 月 1 日患肺病死去，他在抗战时期有战功，他死后家人无钱给他买棺材掩埋，由全体受训学员每人捐 6000 元办丧事，但物价高达 50 万元买一担米，所捐之款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陈布雷把哭陵的事件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怒：“这种事情，其实该早点告诉我，非常简单，何必到中山陵出我的洋相！”陈布雷又道：“因为先生日理万机，不想拿这些事烦扰，可主管人等，又不能为他们解决问题，因此只好哭陵。去哭陵的还有老华侨奚泽，他是同盟会员，早年是华侨富商，追随总理革命，变卖家产，得银 170 万两，捐献本党。后来在一个集团军任参谋长，因年老体衰，又不善理财，家境很窘，举家挨饿，太太不辞而别，留书：‘今生不能见面了！’径去自杀，奚泽不堪刺激，竟在陵前晕厥。”蒋介石愤然道：“我不听了，我现在正倒楣，他们却为了生活问题给我出难题，不以党国利益为重，真叫人生气！”陈布雷暗自叹息，颓然而去。

蒋介石气未平，秘书又送来一束卷宗，报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济深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说国民党政府是独裁专政，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蒋介石看罢，火冒三丈：“这简直反了，一定重办！”蒋介石又把陈布雷召来，吼道：“娘希匹，李济深太不象话，违犯党纪，反抗中央，应开除党籍，送交中央监察会议处理！”陈布雷道：“先生息怒，不要着急惩罚李济深。否则，反而使他获得别人的同情，把事情闹大。你不加追究，反而显得你宽容大度，讲究民主，如果办他，不是正中了他的话吗？”蒋介石低头不语。正当他生闷气时，陈果夫又来报告：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世界日报》5 月 26 日发表了冯玉祥的《告全国同胞书》。蒋介石十分疲乏，道：“果夫，你挑几段念念，这位老家伙又来教训我来了。”陈果夫读道：“青年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青年主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诚恳地向仆人们说：‘你们不要打仗！’这是他们的本份，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力，仆人杀主人，仆人打主人，这是彻底

地反叛行动，忍心害理，丧尽天良，把子弟们打伤，应该马上认罪！”蒋介石冷笑道：“嘿！口气倒不小啊？”陈果夫又读道：“自去年推翻政协决议，开始打内战以来，在国际上，美国的报纸没有一天不说：南京是坏政府，南京是独裁政府，南京是最贪污的官僚集团；又说世界不和平完全由中国打内战惹出来的，非共管中国不可。美国人要共管我们，我们自己还打什么？自打内战以来，台湾的民变，杀死了我们台湾多少同胞？还死了许多官吏，不打内战哪有这个事情？”

## 第二十章 挺进中原

台湾民变发生在 1947 年 2 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接管了被日寇侵占 50 年之久的中国领土台湾，台湾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货的倾销市场。台湾省 90% 的企业和 73% 以上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抢劫。国民党为内战而横征暴敛，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8 万多工人失业，300 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国民党驻台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军队纪律败坏，奸淫妇女，掠夺财物，无所不为，人民怨声载道。蒋介石夫妇去台北参加第一届光复节，向居民说尽好话，然而他们走后，台湾人的白糖没有了，大米也没有了，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属于南京，台湾人比以前更穷了，于是，台湾人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2 月 28 日，台北市民游行示威，国民党军队向游行民众开枪，当场打死 3 人，伤 3 人，激起台湾全省人民愤怒，爆发了“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起义者在电台中广播说：“全省同胞们！”

台湾自从光复以来，政治黑暗，遍地贪官污吏，国民党当局，对贪官污吏未曾惩办一人，以致贪官污吏无法无天，呼朋引类，官官相护，且武装军警与地方污吏勾结走私，以致米粮外溢，人民无谷为炊，与其饿死，不如起来斗争，以求生存。”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发不可收拾，有些地方警察局也参加了起义，三青团也参加了抗暴行列。蒋介石闻讯大怒，命令武装部队对起义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并调驻江苏省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开赴台湾，限令 3 月 8 日前到达，镇压“乱民暴动”。从 3 月 8 日起，国民党军在台北市戒严，台北广播电台每天数次广播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一切公务人员必须立即上班，所有学生必须立即上课，所有工人必须照常上班。”但上班的公务员大都死在街头，上课的学生一批批死在校门口，上班的工人大都没有回来。这些死尸都被投入淡水河里，连河水都变成淡红色，膨胀的尸体、腐烂的尸体，一个个浮在水面令人目不忍睹。其他各地都仿照台北方式屠杀人民，全省共屠杀了 3 万余人。大屠杀之后，就是大逮捕，军车、警车在街飞驰，车内载满了被捕的学生、工人、市民、公务人员、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等，总数达 1 万多人。

这些人中一部分被枪杀。一直到 6 月 5 日，国民党才停止逮人。

陈果夫继续给蒋介石读冯玉祥的文章：“党员看不见主义在哪里。在重庆开大会时，王昆仑同志上台说话，有人说：拉出去枪决他，叫他滚出去！在中山先生手里，没有这个情形。如今变到这种坏的光景。……国家用人本来应当任用贤能，军人如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戴戟、马占山等，都是



因为爱国同日本人拚命到底，本应当重用，而全置之闲散。……忠心赤胆的李济深先生，排斥之，不得重用；如七君子沈钧儒先生等为了救国而下狱，张澜先生负全国的人望，因为他主张和平、不打内仗，现在把他们看成眼中钉，这是什么道理？……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主张和平民主，不打内战，便对孙夫人用谣言来攻击，为什么对于国母即这样压制？何香凝女士的发言都被种种检查扣留，……我们的特务，布置在各地各界，比明末时候的东厂西厂还厉害多少倍，一点不满他们的意，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目前紧急万分，应该马上实行：(1) 即日停战议和。

(2) 在上海成立议和机关。

(3) 请张澜、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戴戟、马占山，诸位先生和沈钧儒先生等民盟的朋友主持和议大计。

(4) 国共各党各派各出代表 5—7 人。

(5) 各大学学生，各出代表若干人，农工商各出代表若干人。

(6) 首先要对各大学、中学先发足米贴津贴，好监督政府和读书。

(7) 对于国共双方军队都认为有功于国，都是服从命令，一律实行优恤。

(8) 真正成立联合政府。

蒋介石听罢，青筋毕露，满脸涨红，骂道：“娘希匹，如今党国有难，一些国民党元老，不但不与我同心协力，反而和共产党勾结在一起，专拆我的台，使我内外受敌，照此下去，前途危殆！”冯玉祥对蒋介石独裁政策早已不满。他曾在 1942 年 7 月对共产党人于志恭说他要到陕北去，并叫于志恭去三原为他准备住房，又派旧属葛效先、刘致军四出探路。

冯决定到陕北去同共产党合作，便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支持他的行动。董必武当时出于对抗战全局的考虑，委婉地向冯指出，以冯的身份，稍有动作，就会被特务注意，甚至有人身危险，若乘苏联飞机转途去陕北，便又牵涉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建议他继续留在重庆，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制止国民党右派的投降活动，逼蒋继续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贡献，不亚于上前线杀敌。

冯不愿轻易放弃去陕北的主张，便同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联系，结果并没有超出董必武的估计，冯才心悅诚服，决心留在重庆。1946 年 9 月 2 日，冯玉祥乘船赴美国考察，便在美国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

1947 年 10 月 10 日，冯玉祥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上发表了《国庆演说》，继续呼吁实现和平民主，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暴行。11 月 10 日，在纽约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冯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激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被蒋介石政府操纵的宣传机器，掀起一股反冯恶浪。冯宁折不屈，为阐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发表了著名的《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他在文中不仅谈了他同蒋介石的分歧，而且揭露了蒋介石的种种暴行，写道：“在蒋介石掌握权力的那些年代里，他是从不理解民众支持这一秘密的，像所有北洋军阀一样，他只相信建立自己的实力。”“他不允许任何批评与意见，至于我时常以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作为掩护向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表示同意，以保全我的面子，但是却从未实施过。”“能争取农民的唯一途径，便是实现孙逸仙博士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各种建议，蒋介石是一

概充耳不闻的。”“蒋介石残暴的恐怖主义已将所有反对派赶入地下。”“那些进步的国民党同志以及包括有影响的民主同盟在内的其他民主团体”，“在几乎所有中国大城市中，都是十分活跃的。”“蒋介石将他们迫害的人都指为共产党，这是一种无耻的谎言。”“宛如 1928 年三民主义的重大政治影响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一样。我正是怀着孙逸仙博士的精神，去坚决对待中国为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任务。”冯玉祥揭露蒋记政府的贪污腐化，说蒋介石的一个亲戚，因“出卖了价值 1700 万法币的大米和价值 1000 万元的汽油以牟取私利”而犯罪，蒋介石发挥他即“愚弄民众而又不伤害他的部属的‘才能’”，“首先下令处决罪犯，然后，改判徒刑 13 年。又从 13 年减为 7 年，3 个月以后，罪犯便随之被带到浙江省，成了该省的保安副司令。”“李济深元帅被迫流亡，并被开除党籍；余心清将军遭到了更痛苦的命运。目前在上海的孙中山夫人，是在秘密监视下生活，不准她自由地收信、会友。民盟盟员是作为叛乱分子对待的，10 月 7 日，有 20 位民盟领导人被处决了。著名学者，如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和考古学家郭沫若都被列入了黑名单。在 3 个团体中，约有 3 万名男女指定要予以消灭。”“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蒋介石大怒，于 12 月 26 日勒令冯于 12 月底回国。

冯玉祥于 12 月 30 日发表声明，予以严厉抵制。蒋介石无奈，只好用吊销冯的护照的手段迫使他回国，但这一招又无济于事。

国民党元老李济深、谭平山、何香凝、柳亚子、朱学范、蔡廷锴、王昆仑、陈铭枢、陈绍宽、朱蕴山等，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蒋光鼐、朱蕴山、朱学范、陈铭枢、陈绍宽等 15 人为常务中央委员。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发布了《成立宣言》及《行动纲领》。这些文件揭露与痛斥了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的政纲、政策及革命事业的罪行，宣称：“本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外对内政策为基本原则”，“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李济深、何香凝等团结党内有识之民主人士，积极开展有效的反蒋和反帝斗争，声援人民解放军抗击蒋军的战斗。在美国的冯玉祥得知自己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后，无比兴奋，积极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各种文件，广为宣传。

国民党在军事上屡吃败仗，国共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 430 多万，降为 370 万，其中正规军由 200 万降为 150 万。整个战场上能机动的兵力只有 40 个旅左右，即除南线的顾祝同系统、胡宗南系统尚有兵力可以作战役进攻外，南线的程潜系统，北线的孙连仲、阎锡山、傅作义和东北系统，大体均取守势。在后方担任守备的只剩 25 个旅，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等 13 个省的广大地区。

而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奋战，力量获得迅速发展，总兵力已达到了 195 万，其中包括正规军 100 万以上，正规军的兵力已经接近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而且，这些兵力，可以全部用于机动作战。解放军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无后顾之忧。

由于国民党部队的大部分主力被吸引并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抓住战机，发展有利形势，果断地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把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毛泽东早已考虑成熟：战略进攻大别山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3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那里崇山峻岭，绵延不绝，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解放军容易立足生根。占据大别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沙，瞰制中原。毛泽东提出，进军大别山应采取跃进的方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命令刘邓所部争取在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大别山进击；陈粟部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

刘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把渡河地点选定在鲁西南的濮县至东阿之间。这里河宽水深，蒋军自恃这一天险可抵40万大军，仅在黄河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解放军为迷惑敌人，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在渡河的前几天，以太行山、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进攻，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攻，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刘邓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地、神速地从豫北开赴渡河地点，并派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渡河，以接应主力南渡。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6个纵队共13个旅，计13万人，从临濮集至张秋镇150余公里的地区，强渡黄河。蒋军河防战线，全线崩溃。7月1日，刘邓大军已深入蒋军防区50公里以上，负责河防的国民党整编55师、68师，在刘邓大军强大火力袭击之下，不顾违反蒋记国防部的严令，虚晃三枪回头便跑，不及逃跑者悉数被歼。

55师师长曹福林及残部被围于郟城孤城中；敌181旅旅长米文和则于深夜仓皇放弃郟城向菏泽逃去。解放军一部进驻郟城后，乘胜长驱直入，进到菏泽城郊。

蒋介石闻讯大惊，仓皇从豫北战场和豫皖战场调集了3个整编师和1个旅，并从山东调王敬久任兵团司令，分左右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并以右路主力击刘邓大军侧背，迫逼背水作战，把刘邓大军围歼于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逼过黄河。

蒋军动作已在刘邓预料之中，刘伯承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兵分3路，一路围攻郟城，吸引援敌北上；一路向西南急进百余里，直插敌人纵深，攻取定陶、曹县；另一路兵力向正南猛插到冉堙集、汉上集地区，打击敌人的侧背。

7月10日，解放军攻克郟城，歼敌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共计1.5万余人。躲避在1.6米深的掩蔽部内的敌师长曹福林仓皇换上便衣，瞒着部下，率少数亲信，从地洞窜出东门，向东南逃命去了。进击定陶、曹县的部队，全歼定陶守敌和敌左路军的1个旅。

敌右路军3个整编师摆在巨野东南、金乡西北的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毛泽东电令刘邓：“应该放手歼敌。歼敌灭敌愈多，对跃进大别山愈有利。”刘邓大军遂以远距离奔袭的动作，迅速将敌3个师分割包围。独山

集敌军慌忙逃向六营集。7月14日，我军发起六营集战斗，采用“围三缺一”战法，表面上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实际上布下一个口袋阵，诱敌歼灭之。入夜，解放军由两面猛攻，敌阵大乱，果然纷纷夺路东逃，被装进了“口袋”。敌3个旅和两个师部被全部歼灭。

刘邓大军接着攻击困守在羊山集的敌68师。

蒋介石命令68师固守待援，急调8个师又两个旅赶来救援。羊山集战斗打得十分艰苦。

刘邓大军连攻4次不下，刘伯承重新部署，第5次进攻，全歼羊山集敌军。

刘邓大军在突破黄河天险后，经28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敌9个半旅和4个师部，共5.6万余人。

蒋介石急忙于7月20日从南京飞往开封，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东拼西凑地调了20万人军队，包括5个集团30多个旅的庞大兵力，分5路向郟城、巨野地区实施分进合击。

毛泽东于7月21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震、陆定一、陈赓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方针。三军配合是：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由陈赓、谢富治率领太岳兵团主力为右后军，趁胡宗南陷在陕北，豫西敌军处境不利的时机，以雷霆万钧之势，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依托伏牛山作战，创建豫陕鄂根据地；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两翼牵制是：彭德怀率领陕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地区，调动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北上；山东解放军在胶东展开攻势，把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引向海边。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做到：两翼配合中间，三军确保主力。毛泽东非常形象地打比喻说：“蒋介石伸出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好得很啊！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拖住这两个拳头，让刘邓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周恩来接着说：“刘邓直插大别山，朝蒋介石的胸膛刺进一刀！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再砍他一刀！陈毅、粟裕大军进入鲁西南，挺进豫西，再扎他一刀！这三路大军，在战略上就布成了‘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在南起长江，北至黄河，西从汉水，东到黄海的中原大地上，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毛泽东又面对陈赓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陷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说来很巧，‘破釜沉舟’的故事就发生在你们将要渡河的地方。项羽跟秦兵打仗，过河以后就把锅砸了，船沉了，激励士兵不打胜仗决不生还！”陈赓道：“主席，那我更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到豫西去！”毛泽东笑着说：“只要锅别砸了，船也别沉了！”陈赓和众人哈哈大笑起来，7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的电报，要求刘邓所部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担任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兵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刘邓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作好准备，并于8月7日黄昏，率领大军从鲁西南的金乡至菏泽以南一线出击，千军万马，像无数支离弦的箭，

向大别山直射而去。是时，连降暴雨，河水猛涨。

蒋介石错误地判断刘邓军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他除从蚌埠抽调少量部队插到太和，协同地方民团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刘邓军南渡外，急令鲁西南的主力兵团 20 万大军尾随追击刘邓军，敌我两军相距只有几十里，情况险恶。

刘邓把这次行动比作是“釜底抽薪”，把手伸到“釜底”去“抽薪”，就不要怕烧伤。蒋军上有敌机轮番轰炸，下有尾兵追击，13 万解放军以惊人的毅力，以两天的时间，神速地渡过宽达八九十里的黄泛区。那黄泛区，遍地积水污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酷暑季节烈日当空，解放军指战员艰难地一步一步跋涉前进，重武器陷在泥里，就把它拆散成零件，扛着、抬着前进。

部队来到沙河北岸，敌军已被甩在后边。战士希望休息一两天再走。沙河宽达 120 米，水深 3 米以上。刘伯承道：“背水作战，兵家所忌。”遂命参谋人员，立即组织架设浮桥，限两个小时架设好，让部队通过。

蒋介石一面命国民党军星夜跟踪尾追，一面电令驻守淮阳的交通警察大队及淮阳保安团，火速将沙河两岸大小船只全部扣押，向周家口及沙河南岸各渡口集结，固守沙河南岸。

将刘邓大军阻滞在沙河以北的黄泛区内。

## 第二十一章 豫西“牵牛”

8 月 17 日拂晓，刘邓大军先头部队首先在新站集进行抢渡。经过一昼夜的搜集动员，许多逃脱蒋军拘捕而隐蔽起来的商船，都纷纷自愿驶来为解放军摆渡，一些民众的自用小舟，也陆续运来下水。是时，蒋军空军进行大规模的狂轰烂炸，沙河两岸的每一个村庄，平均每村至少落弹 5 枚以上，尤以新站集为最，先后投弹 120 余枚。蒋机一批接一批，最多时有十几架一起轰炸。入夜，照明弹此起彼落，彻夜照亮着河面，解放军仍以继夜抢渡。

8 月 20 日下午 1 时半，国民党尾追的部队匆匆赶到新站集，解放军部队已踪影全无，蒋军只好望河兴叹，无可奈何地用机枪和大炮向南射击，以此聊以自慰。

刘邓大军胜利渡过沙河后，为快速前进，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了一些笨重武器、车辆，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蒋介石大梦初醒，急调一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赶到汝河南岸的汝南埠一带，占领渡口，毁掉民船，摆开阵势，挡住解放军进击大别山的去路。

解放军先头部队冒着敌机轰炸扫射，于 8 月 23 日下午架起浮桥，抢占了河南岸的一个桥头堡大雷岗。蒋军从东西南三面构成一个马蹄形阵地。蒋军尾随追击的 3 个师相距刘邓大军只有五六十里，形势万分险恶。邓小平对纵队和旅团指挥员们说：“前有阻师后有追兵，现在只有坚决打过去，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你们要把情况和任务向部队交代清楚，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刘伯承接接着说：“两军相逢，勇者胜！从现在

起，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解放军两个旅的先头部队经过一场血战，占领了河南岸的王庄、东恒等七八个村子，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个缺口，刘邓大军边走边打，终于突破敌军层层拦阻，胜利地渡过汝河险关。

8月26日，刘邓大军到达淮河北岸的彭店，背后蒋军19个旅紧追不舍。刘伯承亲自手拿竹杆到淮河侦察水情，发现有的地方水并不深，可以徒涉，遂命令部队快速徒涉。解放军分成6路，浩浩荡荡踏渡过淮河，这是千里南征的最后一个险关。

尾追的蒋军赶到淮河北岸时，河水猛涨了1丈多，蒋军惊呼：“这是天意！”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分兵3路，先后跨越了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终于在8月末先后进入大别山区。

陈赓、谢富治兵团8万金人，积极准备渡河作战时，黄河水势突然猛涨二三丈。陈赓、谢富治非常焦急不安，但也只好冒险强渡。

陈赓选择洛阳、陕县、灵宝、潼关之间作为强渡地点，这一带黄河两岸都是山地，便于隐蔽，群众基础好，且敌军守备比较薄弱。蒋介石饬令国民党军在黄河南岸星夜赶修河防工事，河边修有集体堡垒和交通沟，山上则筑有大碉堡，这些工事居高临下，地势雄险，又逢河水暴涨，浪涛汹涌，渡船异常困难，敌人认为河防万无一失。陈赓掌握了敌情和水情，为求在较大范围正面同时突破，并防止洛阳、陕县之敌东西夹击，以保证部队迅速进攻，陈赓命令先锋部队强渡后，迅速歼灭南岸敌人，并向陇海路突击，攻占新安、渑池，并相机夺取洛阳。

太岳军区为配合陈谢兵团渡河胜利，以第22旅及各分区的基干武装，向临汾南北、同蒲沿线进击，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迷惑牵制敌人，配合主力行动。

8月22日夜至次日拂晓，陈谢兵团偷渡与强渡黄河天险。左纵队第10旅避开原有渡口，另辟牛湾、李河口、下关阳三个渡河点，实施强渡，一举攻占对岸石山头，控制滩头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前进道路。第13旅渡河后，神速前进，犹如神兵天降，接连占领新安、宜阳、渑池3座县城，歼敌4000人。西线右纵队第三十八军和第12旅，于22日24时在平陆茅津偷渡。由于部队行动隐蔽，动作神速，一举成功，陈谢兵团乘胜向陇海路进击，于23日拂晓即逼近陕县东侧的会兴镇，并击溃陕县出援的敌人，在当天19时攻占会兴镇，炸毁会兴车站铁路大桥，抢占了尚村、洪渠之线。

蒋介石一面惊慌地将西援的军队同洛阳地区的部队共8个旅的兵力，组成第5兵团，由李铁军指挥；一面将分布在陕县的4个半旅的兵力，组成陕东兵团，由西安绥署陕北指挥官谢甫三指挥，从东西两面夹击陈谢大军。

毛泽东连续给陈谢发来电示：洛阳地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主力应向西，乘胡宗南在西面尚未完成部署的机会，抢占陕县、灵宝、阌乡等城，歼灭分散守备之敌，然后以一路出陕南，一路出伏牛山，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

陈谢大军遵命挥戈西指。敌陕东兵团集中1万多人据守陕县，陕县以西之敌正在集结部署。陈谢大军乘机以神速动作，攻克灵宝、卢氏等城，然后分兵一路西叩潼关，而将主力回击已经陷于孤立的陕县，以瓮中捉鳖之势，一举全歼陕县守敌。陈谢兵团在半个月內，歼敌陕东兵团等部3万多人，生

俘敌旅长 2 人，敌总指挥谢甫三落荒而逃。解放军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敌人的东西联系。

陈谢兵团西进直逼潼关，西安一片震惊。蒋介石于 9 月 20 日急飞西安，胡宗南已在前一天惊恐万状地从陕北赶回西安。蒋胡一筹莫展。

是时，毛泽东又电示陈谢：抽出一部进军陕南开辟陕南根据地，并调动胡宗南部相机歼灭之。陈谢以第 12 旅、第三十八军进击陕南，于 9 月下旬一举解放商南县城及豫陕鄂咽喉荆紫关和西荆公路上的重镇龙驹寨、商洛镇；继而渡过丹江，解放山阳、镇安及湖北的郧西县城；再越汉水，解放旬阳、白河县城，前后一个月，连续攻占十几座县城，歼敌 1 万多人。

解放军第 12 旅、38 军在陕南为了迷惑敌人，用了十几个部队的番号，先前因为形势险恶，化整为零，一直隐蔽在深山老林和群众中间的游击队，也都重新聚集起来，迅速扩大，四处出击，搞得敌人晕头转向，失魂落魄。

胡宗南果然听从毛泽东指挥，把进攻豫西的部队调到解放军第 12 旅的周围，并把关中的兵力也调到安康一带。敌军的兵力十倍于我，斗争环境虽然艰苦，但解放军指战员士气高昂，对敌作战节节胜利，在陕南成立了两个专署和军分区，尔后又成立了陕南军区及陕南行政公署。直接威胁着西安胡宗南的老巢，震动了整个汉水流域，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惊呼：“大巴山是陕南入川捷径，赶快修建大巴山防线！”弄得敌人手忙脚乱。

陈谢大军在豫西战场方面，连克临汝、郟县、登封、鲁山、宝丰、叶县、南召、方城等 8 座县城，共歼 5700 余人。

李铁军又纠集第五兵团 3 万之众，气势汹汹地扑来，企图在临汝、鲁山、宝丰地区与陈谢兵团主力决战。陈赓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即派一支小部队迷惑敌人，把李铁军这条“大牛”牵走；另抽一支部队，乘机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主力部队则隐蔽待机出击平汉线，策应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战斗，一旦时机成熟，一举歼灭李铁军兵团。毛泽东批准这项决策。

陈谢兵团第 13 旅和第 25 旅执行“牵牛”任务，陈赓命令他们：“要设法把敌人牵到伏牛山去，同时把‘牛’拖疲、拖瘦、拖垮，为杀‘牛’作准备。李铁军兵团 3 万多人全是美械装备，我们不是和它斗武，而是和它斗智。”我 13 旅和 25 旅兵分多路，虚张声势，浩浩荡荡地排成宽大的扇面形向前推进。陈赓又命“牵牛”部队奔袭内乡，经过激战，外围据点被扫除干净，李铁军急向“牵牛”部队扑来。这样，就把李铁军兵团牵到赤眉镇。

赤眉镇是由内乡通向伏牛山深处的一个隘口，再往里走，“八百里伏牛山”山高林密，重峦叠嶂，沟深路窄，大部队运动不便。李铁军决定一决雌雄，丢掉辎重，扔下大炮，拚命往山里追赶。李铁军和陈赓都是黄埔一期的同窗。此人十分狂妄，他用报话机指挥部队时用明语讲话，十分得意地说：“我知道陈赓会听到我的讲话，他听到也没有办法，我一定要追击，歼灭他的部队！”“牵牛”部队到了夏馆镇；而在伏牛山东麓隐蔽待机的陈谢兵团主力，向平汉线靠拢，已同华东野战军的部队会师，形成了对敌第 3 师的合围。李铁军清醒过来，见形势不妙，星夜驰援。

解放军“牵牛”部队一泻直下，一昼夜行军 200 余里，绕道超前赶到前面“恭候”。

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的主力部队已摆开了聚歼的阵势。李铁军兵团部和第 3 师全陷入了解放军的重围。经过昼夜激战，李铁军部被围歼。李铁军微服出走。至此，平汉战役结束，敌军 2 个旅长被击毙，敌兵团参谋长李英

才，副参谋长邹炎、第3师师长路可贞和2名旅长被生擒。

陈谢兵团经过4个月的苦战，共歼敌6.5万人，解放了36座县城，建立了豫陕鄂、陕南根据地的40多个县民主政权。

8月间，由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18万余人，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挺进鲁西南地区，并南越陇海路向豫苏皖地区进击，辗转歼敌，至11月，共歼敌10万余人，解放和收复县城20余座，恢复并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

至此，南线3路大军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津浦路中原地区，建立了鄂豫皖、豫陕鄂、豫皖苏3大解放区，形成了“品”字形的有力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

转战到陕北葭县神泉堡的毛泽东，于9月底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宣布人民解放军的8项基本政策：（1）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2）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內战罪犯。

（3）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等项自由。

（4）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5）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6）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

（7）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8）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个宣言于10月10日公布。毛泽东开始考虑解放战争胜利后的建国问题。

战局的发展出乎陈诚的意料，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完全失败。战事失利，国民党内部集矢于陈诚一身。白崇禧责骂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李宗仁说他专横跋扈。蒋介石也对陈诚指挥全局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改由自己直接指挥全盘，令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受此顿挫，虽不免沮丧，也只能寄希望于在东北创造奇迹，以挽回军事上的败局，恢复个人声誉。

国民党东北军经1年零3个月厮杀，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被迫龟缩在中长路和北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只能以所谓“重点防御”来苟延残喘。残存的长春、四平、沈阳等几座孤城已如漂浮于狂涛之上的几叶危舟。杜聿明一筹莫展，忧郁成疾，不能视事，电请蒋介石准其离职治病，并于1947年7月8日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东北。蒋介石对一再碰壁的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极为恼火，加之不利的军事形势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更使熊式辉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把熊式辉一脚踢开。熊式辉灰溜溜地回到南京，坐上“战略顾问”的冷板凳。



何应钦在 5 月奉召回国，出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何不甘寂寞，想当行政院长，经好友劝说，方转意，但他却虚情假意地说：“这是报上拿我来做材料，连在美国时，美国当局认为蒋扶植不起，希望我作他的替人，愿在经济、政治各方面加以援助，我曾以条件不够加以谢绝，还想做什么行政院长。”陈诚为出任东北行辕主任事，绞尽脑汁，他说服密友和智囊罗卓英出任行辕副主任，起用反共专家朱怀冰为行辕总参议，并带了自己认为最得力的干将车蕃如、石祖黄、戴朴等，于 8 月底浩浩荡荡奔赴东北。

陈诚抵达沈阳，提出“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培养战力”的方针。为扫除军政界奢侈腐化之风，他下令将所有高级餐厅都改为大众饭店，连女招待（日本下女）也遣送回国。为洗刷部队暮气，增强战斗力，将前任行辕主任熊式辉和前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收编的伪军和地主民团全部裁撤，同时大力扩充嫡系部队，又将保安司令长官部撤销，代理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调为挂名的行辕副主任。陈诚培植嫡系，排斥异己，作威作福，许多高级军政人员深为不满，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待他，内部矛盾加深，士气低落。

陈诚认为过去东北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是没有把北宁路锦州到沈阳段以西地区的解放区彻底肃清，这样会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他把新由苏北调来的 49 军及由华北抽调去的 43 师，调到这个地区来扫荡解放军。不料 49 军的 105 师刚到锦州西北的杨家杖子，就被解放军歼灭，陈诚吃了当头一棒。

是时，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兵力日益发生显著变化，蒋军虽然兵力数量有所增加，装备有所改善，但占领区缩小，经济困难，士气低落。解放军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共有 51 万人，敌我兵力人数相当，但质量上解放军占明显优势。

东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发动秋季攻势，集中更大兵力，采取轻装奔袭，渗透割裂，围点打援等战术，调动敌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东北野战军首先在辽西歼敌 1.6 万余人。尔后继续向中长路进击，于 10 月 1 日突然向四平南北之敌发起攻击。三纵队远距离渗透奔袭，一举全歼西丰、昌图间之威远堡、郜家店守敌 53 军 116 师 8100 人，俘敌师长刘润川；四纵队攻克开原东南八棵树，歼敌 1 个团；七纵队克法库、彰武。

蒋介石闻讯，飞往沈阳，提出“巩固沈阳及其与关内的交通联系，加强沈阳北各据点之守备力量”的作战方针，将新六军调守铁岭，调华北 92 军 21 师、94 军 43 师、13 军 54 师、暂 3 军 10 师、11 师和骑兵 4 师等 6 个师急援东北。

东北野战军主力遂转向吉林、长春地区作战，以求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活动在南满地区的七纵队，袭歼新立屯守敌暂 57 师师部及所辖两个团，计 3500 人，尔后夺取黑山、阜新，歼敌暂 51 师师部及所辖 1 个团。

蒋介石从华北调来的援敌开始反扑，重新占新立屯、阜新等城。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八纵、九纵歼灭该敌。10 月 23 日，九纵攻击朝阳，诱敌西援。敌 92 军军长侯镜如率 21、43 两师贸然西进，至义县西朝阳寺一带。八纵、九纵乘敌立足未稳，迅速将敌包围，激战 3 昼夜，歼敌 21 师大部和 43 师一部，共 6500 人，俘敌 21 师师长郭惠苍。

秋季攻势历时 50 天，歼敌 6.98 万人，收复城市 17 座。

陈诚为挽救危局，又增编了新 3 军、新 5 军、新 7 军，总兵力达 13 个军，44 个师，58 万人，采取重点防守、保持军力，保住沈阳的作战方针。

是时，解放军已发展到 42 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 31 万人，合计为 73 万人。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总结作战经验，整军训练，采用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战术。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林彪、罗荣桓发出冬季攻势的命令。12 月 19 日，解放军攻克大石桥，歼敌交警 3 个总队。为诱敌出援，东北野战军以二纵、七纵围攻彰武，主力进至沈阳西北辽河岸边石佛寺一线，对彰武发动攻击，激战 5 个小时，全歼敌 49 军和 79 师 9000 人。四纵袭入沈阳皇姑屯，六纵歼灭新民以北万金台敌军 1 个团。九纵攻占新民、大虎山间的白旗堡。

陈诚为虚张声势，在 1948 年元旦发表《告东北军民书》，声言：“国军作战准备已完成，东北危险时期已过。”东北野战军为了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则分散行动寻歼弱敌。陈诚见解放军主力分散，遂于沈阳地区紧急拼凑 5 个军 15 个师出击，兵分 3 路，以新六军、新 3 军为右路，新一军、71 军为中路，新 5 军为左路，在跨度为 200 里面上，齐头向沈阳以西作扇形推进。

林彪、罗荣桓以六纵坚决扼守沈阳西北公主屯阵地，以一纵、十纵打援、四纵在沈阳以南牵制敌人，二纵、三纵兼程南下，三纵从敌左、中路之间楔入敌阵，与七纵配合切断新 5 军退路，将敌新 5 军合围于公主屯以南地区，并以迅速发起猛烈攻击，全歼新 5 军 2 万余人，俘敌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缴获大量新式武器。右路、中路敌军向西增援，被解放军歼灭 1.1 万余人。

陈诚连战皆败，手足无措，一筹莫展。蒋介石急忙于 1 月 8 日飞往沈阳。

## 第二十二章 攻破石门阵

蒋介石召开东北地区师长以上将领会议。陈诚为了诿过于人，把新 5 军被歼的责任推到将领不服从命令上去，并拟请蒋介石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 6 军军长李涛。蒋介石在会上痛骂廖、李“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去解救新 5 军。

公主屯此役，出乎陈诚意料，林彪善用闪电战术。陈诚放弃公主屯举棋不定时，东北野战军即将敌新 5 军包围，当陈诚下令新 5 军向沈阳撤退时，已为时过晚，解放军在一夜之间，将其全歼。陈诚并未命令廖耀湘、李涛教授新 5 军。

廖耀湘和李涛被痛骂，很不服气，先后站起来说：“我们并未接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接着争吵起来，形成了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陈诚想借惩办他人来维持自己面子的计策，也就无法遂行，弄得狼狈不堪，尴尬异常。陈诚在无可奈何之中，乃面孔一变，由嫁祸他人，改为“勇于任过”，慷慨地说：“新 5 军的损失，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以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就坡骑驴，道：“现在仗正在打，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你们要振奋精神，报效党国。”林彪、罗荣桓遂将主力转向敌防御薄弱的辽南作战，断敌水陆交通。以四纵、六纵、辽南独立 1 师及

直属炮兵，夺取辽阳、鞍山；一纵、二纵、七纵进击沈阳以南打援；三纵、十纵围歼开原之敌，使沈阳之敌南援增加后顾之忧。

1948年2月6日，四纵、六纵攻克辽阳，歼灭敌新54师等部1.7万人，旋即挥师南进，攻克鞍山，歼敌52军25师1.3万人。法库守敌暂62师弃城逃跑，被三纵、十纵追歼于法库东北通江口。四纵和独立1师继续南击，威逼营口。守敌暂58师在师长王家善率领下举行起义，并逮捕了52军郑明新等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多人，协助解放军歼灭城防司令部3000人，解放营口。

东北野战军再接再厉，决定夺取战略要地四平。以3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任务，以3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在四平南北阻击敌援兵。经过23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71军88师等部1.9万人，解放四平。吉林守敌见势不妙，弃城逃向长春，解放军独立师当即追击，歼敌一部，吉林解放。

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共歼敌8个整师，15.6万人，收复城市18座，将敌人压缩于沈阳、长春、锦州3块孤立地区12个据点内，解放军已解放东北地区总面积的97%。

国民党军队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诚寝食俱废，胃出血大发作，但他知无法向蒋介石交待，只好在病床上约见军政官员，通过电话指挥作战，表示“决心死在沈阳”。

这可吓坏了在南京的陈诚之妻谭祥。谭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又有宋美龄作干娘。她哭哭啼啼地找到宋美龄，请调回陈诚，蒋介石先派名医戚寿南赴沈，尔后亲自飞往沈阳，见陈诚确实病重，返回南京后即批准陈诚辞职，陈诚遂于2月5日离沈赴沪就医。

陈诚东北之行未能力挽狂澜，反而一败涂地，国民党内对陈诚的攻击达到顶点，有的“国大代表”甚至要求枪毙陈诚，以谢“国人”。但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他仅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

陈诚黔驴技穷，蒋介石只好另觅他人。蒋介石以前曾考虑起用张学良，但对此并无把握，曾派张学良的好友莫德惠赴台湾试探，被囚禁中的张学良未等莫德惠开口，便赠诗一首：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拒绝去东北赴任，莫德惠好言相劝，张学良便说：“人家把我送到深山，我肚里是什么滋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谢谢人家一番好意，要我‘清’，我何乐不为？犯不着10年之后，教我还俗，你以为如何？”张学良拒绝出山，在蒋介石意料之中。

现在，蒋介石在四面起火的危急关头，决定打他的王牌卫立煌的主意，便把卫立煌召来，对他说：“目前军事形势紧急，东北剿匪总司令一职非你莫属。”卫立煌答道：“辞修（陈诚字辞修）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介石见他推诿，便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轮番“劝驾”。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嫡系中的杂牌。蒋卫即合即离，1942年3月的一天，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某叛变，告发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有“通共、容共”之嫌疑，蒋介石大怒，命戴笠立案调查。戴笠将所查结果告蒋，蒋介石认为卫立煌缺乏政治头脑，受共产党迷惑，没有深究。

卫立煌便顺水推舟，请求回成都奉养老母。蒋介石为表现他气量恢宏，爱护功臣，同意卫的请求，卫便开始了无聊的闲居生活。1年后，蒋介石恢复卫立煌上将军衔，任命他为远征军司令长官。1945年5月，卫立煌远征

缅甸的战事结束，蒋介石授卫以青天白日勋章，委任他为陆军副总司令虚职，卫立煌称病婉辞，1946年11月，卫立煌偕夫人、参谋、秘书等人出洋考察，次年10月回国。

劝卫立煌赴沈就任的人络绎不绝，卫立煌一时莫知所从。

正当卫立煌踌躇徘徊之时，报端忽载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的消息，蒋介石也打来电话，约他共进午餐。蒋介石一见到卫立煌，便先发制人，滔滔不绝地讲起去东北的注意事项。午餐后，卫立煌又被一群蜂拥而至的记者团团围住。卫立煌就这样被推上了“东北剿总司令”的“宝座”。

1948年1月21日，他率随员由南京飞往沈阳赴任。

朱德和刘少奇等于1947年春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先后兼任晋察冀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等职。1946年冬，第一、二野战军奉命撤销，领导机关同晋察冀军区合并，作战时由军区临时组织前方指挥所。朱德和刘少奇认为野战军司令部同军区司令部合并后，既不在前方，也不在后方，各纵队之间处于一种联合作战的形式，各旅乃至团都有自己的后方，缴获资财、俘虏训练、伤员治疗、后勤供给都各顾各的，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并未建立起来，为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应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争求了聂荣臻的意见，并取得一致认识后，报中共中央批准，于1947年7月宣布成立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耿飏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野战军在朱德、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

1947年10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在正太、清沧、保北3个战役接连取胜后，便乘机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保定以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解放军一部猛攻徐水，另一部在容城、固城与敌人接触，原想将敌第九十四军等部分割开来，予以歼灭。但因敌人5个师猥集一团，所以敌我双方在徐水东北地区形成了对峙。是时，蒋介石飞到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参谋长宋肯堂，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副司令长官邓宝珊、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16军军长袁朴、第3军军长罗历戎、新编第2军军长池峰城、13军军长石觉、92军军长侯镜如、94军军长牟廷芳等40余人。蒋介石训示说：“各军都要注意部队的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次日，李文同罗历戎去见蒋介石，罗历戎向蒋介石报告了石家庄的防务情况，并婉转地提出撤离石家庄的建议。蒋介石说：“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三军抽调1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以便配合北面的国军消灭徐水地区的共军主力。”李文道：“保定地区战事频繁，需要机动部队，可将22师66团一同调往保定。”蒋介石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罗历戎早已感到困守石家庄的下场不妙，很想乘机脱身，便主动提出可由他带领部队北去。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作出决定，第三军主力增援保定。

第三军是国民党元老部队，它的前身是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人讨袁护法的护国军，北伐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将该部编为第三军，第一任军长是朱培德。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是唯一保持着北伐时授予番号的部队。

会后，孙连仲命罗历戎限期作好出发准备，以4天行程到达保定。罗历戎接到命令后，封锁石家庄外壕进出口，行人只许进，不许出，以防消息

外泄；留下了 32 师继续固守石家庄，并将军部铁甲车两列、战车一连、炮兵一连、汽车一连，拨给 32 师师长刘英指挥。

命第 71 师、第 22 师的 66 团和军直属部队共计 1.7 万余人，携带 4 日以上粮秣和冬季服装，于 10 月 15 日下午，浩浩荡荡地由石家庄向北开拔。

聂荣臻从中共华北局社会部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的刘光国发来的情报，获悉罗历戎率部北移保定的消息，当机立断，决定留 4 个旅的兵力，在徐水地区布下阻击阵地，把企图沿平汉路南下的敌人堵住。命保北地区的其余野战军主力，立即强行军，日夜兼程，向南疾驰，把罗历戎的部队歼灭在保定以南的定县境内。聂荣臻又命独立 8 旅和冀中、冀晋部队，以及当地民兵，立即死死拖住北进的罗历戎部队，即要迟滞其前进，又要阻止其后退，防止他们缩回石家庄去。

野战军主力部队兵分 3 路，向南急进，一昼夜走了 200 里路程，到达指定位置。而罗历戎的部队刚刚走过定县。他们每到一地，均遭到晋察冀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阻击，不时有冷枪和地雷爆炸。蒋军胆战心惊，群众坚壁清野，人粮皆空，水井也被填死，罗历戎一筹莫展。

罗历戎率部抵达定县清风店地区，蒋军飞机一架由北飞来，给他投下一个通信袋。

罗历戎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北上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大部共军南下，距离你们不远，请即作战斗准备。”20 分钟后，又有一架由北而南的飞机照样投下一个通信袋，内容是：“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不远，请第三军急作战斗准备。”罗历戎即改变行动计划，命部队在清风店附近东南合等村宿营，紧急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并急呼孙连仲和李文，请求火急救援。

解放军在民兵的引导下，跑步前进，迅速将全部敌人迂回包围。10 月 20 日拂晓，解放军不顾长途行军疲劳，发动攻击，经过两日激战，活捉罗历戎以下 1.14 万余人，打死打伤 24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装备。

战役结束后，聂荣臻制定出攻打石家庄的计划，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电示聂荣臻：“侦察石门，完成攻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石家庄又名石门，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它位于太行山脚下，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燕晋咽喉，南北通衢”之称。

“背水一战”之语就起源于这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第三军抢占了石家庄，石家庄便成了华北反动势力的中心堡垒之一。石家庄的城防非常坚固，罗历戎利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的旧工事，连年加修成三道防线，头一道防线是外市沟，上面有密集的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外市沟后面是环行铁路，铁甲列车可以随时机动和巡逻。第二道防线是内市沟，第三道防线是由建筑物组成的核心工事，除设有铁丝网、鹿砦、地雷、碉堡、电网，还有纵横交错的地道和交通壕，把城郊的各据点连结起来，大小碉堡 6000 多个。蒋军扬言：“共军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朱德、聂荣臻、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决定以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及冀晋、冀中两个兵团对石家庄进行战役进攻；以第二纵队、独立第 9 旅及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集结于定县南北地区构筑阵地，阻敌来援。如敌不增援，则采取积极手段，力争攻下石家庄。并决定先攻占四郊，依托村庄，改造地形，从地面伸展交通壕，

构筑攻击阵地，尔后突破第一、第二道市沟，展开巷战，猛插核心工事，全歼守敌。朱德提出“勇敢加战术”的口号。

朱德、聂荣臻召集炮兵和工兵指挥员开会，决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有组织、有步骤地进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战法。

朱德，人们用“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来形容他。这位身经百战的统帅，同聂荣臻一起对攻取石家庄作了周密的部署。

11月6日零时，攻打石家庄的战役正式开始。解放军首先扫清外围，并以迅速动作占领飞机场，切断敌人对外的唯一通道，使敌军成为瓮中之鳖。接着又占领石家庄东北面的制高点云盘山，并依托云盘山，炮击市内的发电厂，切断整个市区的电源。

敌军外市沟防线，蜿蜒盘踞在石家庄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解放军夜间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各进攻部队以第一梯队构筑进攻阵地，以第二梯队挖进攻阵地的交通壕，战役第二梯队和民兵、民工挖后方交通壕。经一天两夜，交通壕已伸展到距敌外市沟百米内，隐蔽的坑道则控制到敌外市沟外沿。

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敌外市沟发起全线攻击。第三纵队第20团首先在外西兵营爆破成功，将市沟炸开两个宽8—10米的缺口，后续部队乘爆破的烟幕跨越市沟，夺取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尔后向两翼发展。

次日夜，寒风习习，细雨濛濛。各部队在夜色掩护下，顶风冒雨，开始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即内市沟前进方向作大规模的土工作业，通宵达旦，一刻不停。经一夜奋战，地形全部改观，数不清的掩体和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沟，满布于内、外两道市沟之间纵深2000米的开阔地带。在距内市沟60米处挖掘了坑道，直达内市沟外壁，并构筑了装药室。

11月16日，解放军强大的炮群突然咆哮起来，对内市沟的总攻开始，重炮向敌纵深施行压制射击，内部爆破和外部爆破同时进行，伴着炮火的轰鸣，震天撼地。石家庄到处闪着火光，到处浓烟滚滚。解放军突破内市沟，一场激烈的巷战展开。经20小时激战，石家庄市大部被解放军占领。敌32师师部和第95团残部仍据守在铁路大石桥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内顽抗。大石桥桥孔已被堵死，四周立起围墙，能攻能守、能打能藏。在大石桥附近的高大的正太饭店，也筑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那孤守在大石桥防御体内的敌师长刘英在36小时内发出告急电报45份，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固守待援”。蒋介石的来电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铁路会合点，命令空军竭尽全力配合。”刘英见蒋介石干打雷不下雨，知大势已去，命残部停止抵抗，缴枪投降。至此，蒋军吹嘘的“可坐待三年”的石家庄，经过6昼夜激战，终于获得解放，全歼守敌2.4万余人。连同清风店战役，共歼敌4万余人。

解放军各部捷报频传。

1947年10月至12月，刘邓大军先后粉碎白崇禧指挥的33个旅的“清剿”，开辟了桐柏、江汉两个新解放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大别山解放区像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区的南京和武汉之间。

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从8月份之后转入反攻，至11月，收复了延川、清涧等城，歼敌万余。12月，西北野战军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克攻运城，歼敌1.3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从 9 月份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10 月初在昌邑歼敌万余，山东战场也转入进攻。12 月底，又收复威海卫、莱阳、胶县、高密等 10 余城市和广大地区，歼敌 6 万多人，改变了整个山东局面。

在苏北，华东野战军一部在 8—12 月间，先后进行了盐城、李堡等战役，共歼敌 2.4 万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于 11 月 22 日，转移到陕北脂县杨家沟。这是个较大的山村，虽然交通不大方便，但地处偏僻，环境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

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林伯渠、陆定一、李井泉、谢觉哉、杨尚昆、王明、习仲勋、张宗逊、张德生、马明方、王维舟、李涛、甘泗淇、李维汉等 19 人。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18 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毛泽东对解放军的作战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 10 大军事原则：（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

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时间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毛泽东总结了土地改革的经验，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3 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合法经营。又规定：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

毛泽东在 12 月 28 日作会议总结时，严肃地告诫全党说：“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

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 5 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第二十三章 西北转战

解放军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无往而不胜，经过外线、内线的全面进攻作战，在 1947 年下半年消灭敌军 75 万人，深入敌人心腹地区，解放区迅速扩大。至 1948 年春，解放军已有正规军 10 个兵团，50 个纵队，156 个旅，132 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全军总兵力已有 249 万。

美帝国主义在蒋军全线溃败的情况下，惊魂落魄，赶忙来挽救危局，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于 1947 年 7 月 23 日来华。魏德迈四处“考察”、训示。魏德迈回国后，于 9 月 19 日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一份长达 10 余万字的报告书，即臭名远扬的魏德迈亡华计划。魏德迈认为，援蒋侵华是美国向全世界侵略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美国至少在 5 年内应给国民党军事和经济援助，而这种援助要以下列各条为交换条件：国民党政府要求联合国促成东北停战，并请求东北归于联合国监护或托管之下；国民党政府、军队与经济方面都要延请美国顾问人员并订立许多丧权辱国的协定。这个出卖中国各种主权和将整个东北划归联合国、实即美国托管的亡华计划，因解放军迅速取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告吹。

1948 年春节刚过，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便决定进行宜川战役。

宜川西临洛川，东接黄河，北通延安，形成了咸榆公路上的三角地带，是战略上的要地。胡宗南在这个小小的山城驻有一个旅的兵力把守。我西北野战军一夜之间将其包围，并用围城打援战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

胡宗南不知是计，当他接到宜川的求援电报，遂命刘戡就近指挥整编 27 师和整编 90 师共 2 万余人，前往宜川解围。

当敌先头部队 27 师行至永乡东北约 50 公里的观亭附近，发现有解放军的部队。27 师师长王应尊即向刘戡报告，并乘夜色派出一个轻装营进行火力搜索，结果被解放军歼灭大半。

王应尊见情况不妙，向刘戡建议先集中力量打观亭，然后由观亭前往宜川解围。但这一建议被胡宗南否决。王应尊不得不率 27 师继续东进。是时，不仅两侧山中有零星枪声，而且在瓦子街以东，有解放军警戒部队出现。王应尊意识到他们已钻进彭德怀的“口袋战术”内。果然不出所料，敌 90 师师部行抵东瓦子街附近，南边枪声、手榴弹声、迫击炮声越来越密，战斗趋于激烈。刘戡勉强作出决定：“就地宿营，严密警戒，明日拂晓前沿公路，一举突到宜川。”当晚，刘戡同王应尊及 90 师师长严明商量行动计划，王应尊提出立即向黄龙山撤退，变内线为外线，以解宜川之围。

刘戡表示同意，但严明却讥讽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的职守是解救宜川，必须甩开敌人的一切阻拦，尽快让汉初旅脱险，有小股共军出现，不过是彭德怀的虚张声势罢了，我想如果共军设伏，我们先



头部队怎么会轻易地发现他们呢？请军座不要忘了，宜川还在共军主力的包围之中！”刘戡道：“严师长，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共军一向注重全歼我有生力量。如果他们有意攻打宜川，为什么围城三天之久却不攻城，况且宜川城是他们唾手可得的，我们即便放弃宜川，仍可凭借坚固工事，死守洛川、黄陵，从而牵制敌人，阻其南下，确保西安无恙，现在对我们来说，等待就是胜利。阁下，战场容不得感情用事！”刘戡、严明素有矛盾。他们两人原来都是中将军长，后因军队改为整编师，年轻气盛的严明当了师长，而刘戡却保住了军长职务。严明不服，一直耿耿于怀。严明依仗自己是胡宗南的心腹，根本不把刘戡放在眼里，刘戡对他虽恨之入骨，但大敌当前，只好忍气吞声。

正当敌人踌躇时，彭德怀命解放军发起猛攻，经过 2 昼夜激战，宜川战役胜利结束，全歼刘戡第二十九军，计有 27、90 两个师，5 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共计 3 万人，刘戡和严明被击毙，俘虏将校官 50 余人。

宜川大捷之后，彭德怀制定了收复延安的计划。4 月 20 日，攻克延安，胡宗南的军队盘踞在这个城市 1 年零 32 天。西北野战军乘胜追歼敌人，连克陕北扶风、宝鸡和甘肃的灵台、崇信等 12 座城市，解放了黄龙山区，先后歼敌 5 万多人，胡宗南统治的西北根基动摇。

就在彭德怀连战连捷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于 3 月 21 日离开杨家沟，经绥德县吉镇、葭县刘家坪，在吴堡县川口村南的黄河渡口园则塔东渡黄河。

这天中午，聚集在渡口的除中共中央机关的数百名工作人员外，陕北乡亲们也拥向渡口送行。河滩里、山坡上都站满了欢送的群众。十几条木船停靠在岸边，数十名船工做好了开航的准备。

开船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和中央机关人员一起在野外用餐，当地区镇干部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没有照顾好首长。”毛泽东笑着说：“我们这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吃顿饭，也得使你们忙几天呀！我们打游击在野外吃饭惯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离开陕北了，陕北的乡亲们待我们很好，现在离开陕北，还真有些舍不得呢！等全国都解放了，我们还会来看望大家的，请你们转告陕北的乡亲们，谢谢他们。”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年多，他们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吃完饭，毛泽东等同区镇干部一一握手告别，并向送行的乡亲们招手致意，尔后登上木船。

渡过黄河便进入晋绥解放区。他们沿崎岖的山路，循湫水河上行，到达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三交镇是中央后方委员会的所在地。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大多数移驻在这里。中央在陕北只有一部电台，后委有几十部电台，中央统帅部同各地的联络，一般通过后委下达，这里不仅是一个通讯枢纽，而且负责陕北前方的供应工作，后委机关本来由叶剑英主持，是时，叶剑英已奉命先期率队前往西柏坡准备，由杨尚昆留在这里迎接毛泽东等。

毛泽东等在这里停留了两天。毛泽东发现晋西北的土改搞得很“左”，他批评说：你们后委对这些事根本不反映，究竟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对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作了一个估计，认为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打 60 个月。

60 个月者，5 年也。这 60 个月又分两个 30 月，前 30 个月是解放军“上

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占优势；后 30 个月叫“传檄而定”，解放军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毛泽东等要从双塔出发，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兴县城西 15 里的蔡家崖村。从双塔出发时，由步行换乘汽车。

3 月 26 日上午，毛泽东起床后穿着那件多年来一直穿的旧布棉衣，手里拿着转战陕北时一直拿着的那根柳木棍，在院内散步，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转战陕北时，他起床后，总是先活动活动，然后再吃饭。他散步的时候，突然问比他大几岁的马夫老侯住在什么地方？警卫员回答说，住在南边不远。

毛泽东吃过饭就来到老侯跟前，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老侯，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 1 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就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走吧。机关可能老弱病号多，你也是老人，又有病，你就骑老青马吧。你同你的领导说，就说这是我的建议。”老侯听罢，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办。”上午 10 时，毛泽东在临上车之前同杨尚昆等亲切握手告别。他高兴地对大家说：“到河北平山再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各自乘一辆中吉普，陆定一、胡乔木、师哲坐小吉普；电台、警卫部队等乘坐几辆卡车。毛泽东的汽车领头，汽车队开动后，在土路上行驶，尘土满天。

但他们在泥土中生活习惯了，谁也不在乎。

汽车终于开到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李井泉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大门口等候多时了，毛泽东下了车，同贺龙紧紧握手，贺龙兴奋地说：“主席，你可到河东来了，你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毛泽东笑着说：“见了你们，我很高兴。”贺龙、李井泉等都把自己的住房让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毛泽东说：“你们把房子让我们住，你们到哪里去呀？”贺龙答道：“我们在这个院子里随便找一间房子住下，也比主席在陕北打游击的时候住的房子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离开延安 1 年多，现在才第一次在这样好的住房内休息。屋内有电灯、电话，办公用具、家具等样样齐全。

毛泽东等在蔡家崖停留了 10 天，他们连续 3 天听取贺龙等汇报军队作战、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农民互助合作和支前工作等情况，还召开了 5 次座谈会。

4 月 1 日和 2 日，毛泽东分别对晋绥干部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了 5 个问题。他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成绩；分析了晋绥解放区获得成功的原因；肯定了晋绥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领导路线基本正确，又指出应当吸取的教训；指出晋绥党组织的任务：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强调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帮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

地财产。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之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打击面一般不要超过农村户数8%左右，人数10%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数目还要减少，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很危险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毛泽东在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和搞宣传及写作人员的座谈会上，首先说：“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他在谈话中肯定了《晋绥日报》的优点，也指出了问题。他说，《晋绥日报》在去年下半年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但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

贺龙邀请毛泽东到野外广场去看戏。第一个晚上看了晋绥平剧团演出的《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第二个晚上看了山西北路梆子剧团演出的《打金枝》等。

看戏的人很多，众人都想看看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还想和他们握握手。在散场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周围挤满了人，毛泽东回到住所洗脸，贺龙走进来说：“没料到戏场秩序这么乱，给主席添了麻烦。”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嘛，你不让他们看，反而会引起非看不可，我们脸上没有多长一块，也没有少长一块，看一看没有什么关系嘛。”贺龙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一行于4月4日乘车取道岢岚、五寨、神池，出雁门关，再从北路经代县上五台山，在4月11日到达晋察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在经过雁门关时，毛泽东下车兴致勃勃地读了许多碑文，说道：“古代在这里是反对外来侵略的关口要塞。现在战争中，这里也是有名的战场，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名闻天下，平型关离雁门关不远，都在雁门北地区。”聂荣臻和肖克等在城南庄迎接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次日，任弼时在这里主持召开了部分县、区委书记座谈会，座谈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试点的经验。邓颖超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你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取得了成绩，又有了经验，很好啊！可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也没有，可苦了恩来呀！”邓颖超参加了阜平土改试点工作，有1年多没同周恩来见面了，但她笑着说：“恩来的身体很好，又有警卫员照顾，又有主席的关心，我不去也很放心呀！”毛泽东道：“那可不行，我们都代替不了你这个后勤部长啊！”周恩来也笑着说：“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而在城南庄住了一个多月。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去平山县西柏坡村，刘少奇、朱德等在那里领导着中央工委的工作。

毛泽东在城南庄多次听取了聂荣臻等的工作汇报，同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共同研究了华北的作战形势，制定策略，毛泽东认为，解放战争不能拖得太久，解决越快越好，第一步解决东北、华北，第二步解决西北、西南。

毛泽东住在军区大院内。一天，敌人的飞机来轰炸，聂荣臻和警卫员把毛泽东刚拉出军区大院，敌机在军区大院丢下了炸弹，毛泽东住所飞进了

不少弹片，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土块和砖瓦片。聂荣臻把毛泽东安排到花山村去住。毛泽东说：“敌人不愿意叫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只好搬个家吧，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失败了。”花山村在高山下的深沟里，目标小，便于防空，毛泽东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房子宽大亮堂。

4月25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刘少奇等，要他们在西柏坡讨论若干问题，然后来城南庄商定，其中包括：邀请港、沪、平、津等各地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今冬召开二中全会，酌减人民负担和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取消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政权；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陈毅、粟裕大军行动等问题。

4月30日到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书记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大书记都出席了，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也列席参加。

会议主要研究了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决定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地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此决定，构成了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

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不便离开国内，决定暂时不去苏联，他在5月26日来到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村子里有七八十户人家，它离石家庄90公里。毛泽东来到这里，这里便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解放战争的最高指挥中心。毛泽东住在西柏坡村的一个大院内。这个院子有两间北房，两间西屋和两间南屋。

毛泽东住在北屋两间套房内，里面一间16平方米是卧室，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一套木制沙发，一张小桌，一把藤椅。外间20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办公室，放着两套沙发，还有圆桌和茶几，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西屋和南屋是江青和女儿李讷以及保姆的住房，在院子前面有水房和卫士值班的两个房间。

周恩来、任弼时住在毛泽东住所的北边；刘少奇、朱德住在毛泽东住所的南边，相距很近，便于工作。

蒋介石在警卫的护卫下来到南京中央训练团“训话”。他不待主席致词，便沉痛地说道：“我们年年开会，月月开会，我不知道我们开会有什么用处，前方军事失利，各地行政腐败，再闹下去，我们明年今日能不能还在这里开会，都很难说，如果你们再不改，不久之后，我就要做俘虏，你们也要做战犯，我们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你们为什么这样腐败颞顽，目无法纪！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敌人？他们决定做什么，就全力以赴去做，认认真真地去做，而你们又怎样呢？我们的党员奉命去做一件工作时，就只听其自然，甚至什么都不做，只知道以权谋私！”蒋介石越讲越气，忽感周身乏力，天旋地转，连忙示意侍卫架着他上车回家。

蒋介石回到卧室，浑身发冷，心头更加颓唐。面对如此动荡的战局和疲倦不支的身体，颇想去庐山，但又担心庐山是否安全？宋美龄却不以为然地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不必呕气。美国总统在局势紧张时照样钓鱼打猎，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反给人一个安定的印象，至于庐山是否安全，我看不大靠得住。长江洪水成灾，上山瞧了不舒服，再说是否会影响交通，也

很难说，不如到莫干山去散散心。”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偕宋美龄及儿子前往杭州。蒋介石一路沉默寡言。举目望去，乌云瘴气，展望未来，不堪设想。

面对国民党风雨飘摇的破船，美国政府一方面竭力扶植加强蒋介石势力，一面物色亲美的新傀儡，以备蒋介石一旦垮台时出来支撑局面。1948年3月，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表示希望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将被容纳到国民党政府中去。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的所谓“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主要目的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蒋介石想通过投票合法地当上中国领袖，企图以新的形象，来改变美国对他的不信任感。

## 第二十四章 阴暗“竞选”

“行宪国大”从筹备起，就充满阴暗。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国民党与民社党、青年党之间明争暗斗，结果选出的国大代表，形如乌合之众，在国大的会场上，更是乌烟瘴气。上面大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下面的代表有的闲谈，有的说笑，有的打瞌睡，有的吹唢呐，有的吃花生米，有的喝茶，有的脱鞋弄足，有的拂袖舞拳，大打出手，蒋介石不得不几次出面训斥。

“行宪国大”代表3045人，出席大会的只有2814人。在总统竞选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旨意，传给蒋介石，杜鲁门希望蒋介石能够表现一下民主姿态，以笼络民心，重树个人威信。杜鲁门又暗示蒋介石，就目前中国政府腐败状况看来，能够拯救中国的，比较理想的人物，是自称“过河卒子”的胡适。

胡适在1938年至1942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

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1947年南京发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五二〇”惨案，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相继举行罢课抗议国民政府暴行、华北学生也酝酿响应时，李宗仁在北大校长胡适等帮助下，以“导”为主，恳切劝谕，北平预定的学生“六二大游行”未得举行。于是报章大加吹捧，称李宗仁是“处置北平学潮，不用军警、不用枪支，不用弹压，只用胡适的舌头，稳定了万丈波澜”。

蒋介石对于美国人的“暗示”，敢怒不敢言，为了对付美国人，他采取以退为进的惯用手法，先抛出一个“卒子”，听听舆论反映，然后制定对策，再取而代之。于是在选举总统的问题上，蒋介石便做出“让贤”的架式，列出总统候选人应具备的4个条件：(1)文人，(2)专家学者；(3)国际知名人士；(4)不一定是国民党员。

总统候选人条件公布后，国民党上层人士一下子便猜中一定是暗指胡适。但是蒋介石这一反常的作法，却使众多“国大”代表困惑，而蒋介石的许多亲信都心领神会，于是，他们首先摆出了胡适不适于当总统的众多理由，轻而易举地拿掉了这个“过河卒子”。

接着又提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居正为总统候选人，吴稚晖深知蒋介石的伎俩，遂以年事已高，不能恭政为由，改推蒋介石为候选人。

是时，蒋介石见火候已到，便以“国难当头，义不容辞”等词，“当仁不让”了。4月19日蒋介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

副总统的竞选，便成了各政治派系争夺点。“行宪国大”共推出6名候选人：国民党方面有孙科、李宗仁、程潜、于右任4人，“社会贤达”方面是莫德惠，民社党方面是徐傅霖，而副总统的主要竞选者却是孙科与李宗仁。

李宗仁在北平与学者、名人揖让往来，相处甚得，画家齐白石因无法买到米、煤，到行辕请求救济，李当即亲自为之筹措，白石先生为此特地绘了一寿桃横幅送李。李宗仁颇得舆论界好评，有评论说：“李宗仁在军人中实有儒将之风。”一时间李宗仁“文武兼长”、“稳健开明”、“老成持重”、“深谋远虑”之颂扬声不绝于耳。李由此赢得了“民主将军”的美号。李宗仁有此舆论界支持，便积极参加副总统竞选活动，认为若竞选成功，可望桂系再兴。早在1947年10月12日，他便把程思远召到北京，手书信函两封交程带去南京，一封给蒋介石，表示他有意参加副总统竞选；一封交吴忠信，请其在蒋面前为他善为疏通。另有一封用火漆密封的英文信，嘱程面交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尔后，李宗仁与南京的白崇禧电话联系，告以竞选打算，要白转报委员长，探其口气。

李宗仁又在北平搭起助选班子，并派出高级幕僚携带重礼，去南京、上海、西安、东北、四川、山西等地分访与桂系有点旧谊的“闻达名流”和实力派人物，争取他们对其参加竞选的鼎力相助，美国的一些报刊也开始为李宗仁出面竞选捧场。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公开表示：“中国人既要走民主，实行宪政，凡是为人民所喜爱的人和有能力的人都应出来参加竞选。”李宗仁在1948年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向中外记者正式宣布参加竞选。而蒋介石对李宗仁参加副总统角逐极不乐意。在白崇禧代李向蒋探询旨意时，蒋介石当即训示：1、北平行辕剿匪任务重要，不可轻离。

2、我为军人，李某也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

蒋介石要白据此立即向李转告。白崇禧见蒋态度如此，也就劝李慎重考虑，并认为即或侥幸获选，恐亦遭猜忌，若不幸而失败，更何以善其后？但李宗仁主意已定，表示：竞选得了不回北平，不能得到也不回北平，作了破釜沉舟的架势。白崇禧既与李宗仁风雨同舟，也就不再阻拦，并拉来时任监察院副院长的黄绍竑，要黄主持李的“助选委员会”。黄较李宗仁小几岁，原本是桂系三巨头之一，他精力旺盛，头脑清楚，且果敢能断，外理政事极有条理，为政坛中纵横捭阖之能手。李、白让黄负责竞选事务，堪称用人得当，这样桂系三巨头一齐出动，摆出了大干一番的架势。

蒋介石虽然反对李宗仁参加竞选，但因他有“自由竞选”之言在前，不便立即公开反对，只好另作打算，遂派宋美龄两次去找孙科，要孙科认真参加副总统角逐。

李宗仁向孙科伸出一只触角，给孙科一信说：“副总统仅我兄可以担任，但是听说我兄不参加竞选，我预备试试，请兄协助。”孙虽然对李此信颇感不悦，但尚无意竞选。

蒋介石便亲自出面劝驾，孙科也就表示：“愿听从党的指示。”于是公开宣布加入副总统的竞选。

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也有优势，他是孙中山的哲嗣，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党、政界潜势力极大，孙为粤人，有广东派的支持，又有蒋介石和CC派的支持。

李宗仁见孙科参加竞选，便开足马力，大张旗鼓地先在北平展开竞选活动。频频举行记者招待会，分访北平各团体、各学校、各机关负责人，并将签题了上下款的本人照片分赠各位，以联络感情，争取舆论拥护。3月22日，李宗仁去南京参加国大，专机特地在上海停留。在沪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提出5点主张：(1)政治上提高效率，根绝贪污。

(2) 给予人民言论结社、学术自由。

(3) 政府人民共同节约，增加农工生产。

(4) 实行传统的睦邻外交，用和平方式，改善中苏关系。

(5) 陆海空军应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李宗仁一再表示：“本人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一为倡导民主风气，同时为基于对国家之责任感，愿以个人30年来从事军政工作的经验辅助元首，由中央着手来从事彻底的改革，本人如能获选副总统，即愿作为人民与政府之桥梁，使各方面的意见能转达元首，以供采择。”李宗仁抵南京时，桂系全班助选人马早已在重庆安乐酒家安下竞选大本营。桂系要员统统出动，邱昌渭、程思远、黄雪村、刘士毅、张岳灵、韦贻唐、李扬等少壮派各名角分别担任总务、财务、交际宣传、情报各部负责人。黄绍竑为助选班子总参谋长，黄旭初、李品仙、夏威夷集左右，决策机关另设于白崇禧公馆，每天晚上助选各部负责人在大本营报告情况，商定次日行动方针，而后分头活动。

李宗仁确实有雄厚的竞选基础。广西、安徽两省为桂系多年来经营，北平、华北一带李颇孚盛誉，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与各省军人均有联系，白又为回教，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信徒甚多，加上黄绍竑几年在中央各部都有不少人情关系，而且李宗仁背后又有美国人支持。

李宗仁摆开竞选阵势，孙科便在中山路龙门餐厅安下竞选营寨，餐厅内的国大代表、新闻记者络绎不绝，许多人为了饱餐一顿，领受美味款待而常来光顾。那孙科虽无什么竞选精彩主张，但由于他参加竞选是蒋介石指使，认为胜利者非他莫属。他的助选要员则说：“竞选活动里面，感情要占很重要的成份。如果已有自然深厚的感情存在，就不需要活动，否则也是白费力气。”在龙门餐厅四处贴满红绿标语，上书孙科是民主的先进、进步的象征、国际问题权威、制宪的领导者等语。

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其他4人，也各显神通。程潜和于右任均为国民党元老。程拥有两湖民意，于有西北根基；程的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宣称：“最后胜利必归最不雄辩然最诚实的人”，程的《养复园诗集》也在国大代表中广为散发，诤之为“以文会友”，融洽感情；于右任则在国大会场挂上自己的巨幅美髯画像，并出动宣传车多辆，小学生随车歌唱，歌词中有：“于右任，于右任，他是一个老革命。”于的墨宝也成了国大代表的抢手货。那两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莫德惠、徐傅霖倒是态度谦和，一再声明“凑凑热闹而已”。

蒋介石对李宗仁无视其旨意，出面竞选已十分不满，又见桂系咄咄逼人，更是烦躁不安，不得已于4月3日把李宗仁找来，说道：“希望未来的副总统最好是一个文人，候选人已内定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答道：“既已宣布竞选，势将进行到底，碍难中途退出，贻笑中外。”蒋、李话不投机，不欢而散。蒋见此招无用，另打主意，由吴稚晖等出面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提出“本党同志参加副总统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

党提名”的动议。

不料广西籍及与桂系有关的执监委一律不出席，以示抵制，会议议而不决，一哄而散。

事后，李宗仁助选班子反守为攻，采取行动，以广西、安徽两省代表退出选举相要挟，并与其他几个副总统竞选人结成抵制此议的临时联盟，并将此事大作宣扬，不少人为此愤愤不平。蒋见情势不妙，生怕事情闹僵不好收拾，只好请陈立夫、吴铁城到李宗仁处为之转圜。

蒋介石见由党提名招数不灵，便让陈立夫以国民党组织部长名义，全力替孙科拉票，蒋介石也召集黄埔系国大代表秘密训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无疑将一把利刃插入我的心胸，你们如果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忠贞干部，就应该替我把这柄利刃拔出来。”蒋介石弄巧成拙。蒋记三青团、复兴系代表与 CC 系有矛盾，不愿让陈立夫得逞，反而掉过身来把给孙科的票给了李宗仁。而李宗仁出其不意，先发制人，于竞选当日，给每个代表座位上免费发了一份《救国日报》，报内一版刊登了以《敝眷蓝妮》为题的文章，记述了孙科与他的情妇蓝妮的一段风流韵事。蓝妮是著名交际花，抗战初与孙科同住重庆“园庐”，以后潜往上海、南京等敌占城市，同陈公博、周佛海往来密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孙科闻讯亲函信托局，称这批颜料是“敝眷蓝妮”的。桂系抓住此事，由黄绍竑捉笔，写成文章，在《救国日报》刊登，在会场散发，引起哗然，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话。

由于桂系突然袭击，副总统竞选的第一日，便旗开得胜，李宗仁得票 754；孙科得票 589；程潜得票 522；于右任不足 500 票；其他两人各得 200 余票。后 3 名副总统候选人被淘汰。

李宗仁独占鳌头，而孙科则恼羞成怒。散会后，孙科派广东代表由张发奎、薛岳等率领，前往《救国日报》报馆大打出手。报馆主编龚德柏躲了起来。事后，李宗仁命程思远着人给龚送去 4 根金条，作为补偿。

蒋介石见孙科不是李宗仁的对手，便召来陈立夫，要陈把可以控制的代表开个名单，组织力量对李反击。于是，那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一起出动，威胁利诱，无所不用，甚至半夜三更还去代表住所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自毁前途。

李宗仁的做法却不一样，他带着夫人郭德洁走遍各代表住所，不论熟识与否，亲递名片一张，握手寒暄，代表们进场投票时，李宗仁夫妇迎立于大门一侧，向代表亲切致意，态度极为谦恭，以至于因握手使劲太大，回到寓所手膀肿痛，连举手都困难了。

孙科夫妇虽也曾模仿李宗仁的做法，但毕竟放不下架子，握手时也有气无力，比较之下，令人感到李为人更为谦虚诚恳，加上蒋手下陈立夫等人以势压人的幕后动作，徒增代表反感，结果会场上出现了“党要支持，我偏不选他”，“我们支持党所不支持的人”的愤激口号，舆论界把同情放在受压制的李宗仁方面。李宗仁巧妙地利用这一逆反心理，展开宣传攻势，会前会后大谈其竞选主张：“革新政治，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实施土地改革，保障人民四大自由”等等，还慷慨陈词，表示不怕戴红帽子！

李宗仁的这些话时常博得掌声。

4 月 24 日，第二轮投票开始，李宗仁得 1163 张选票，孙科得 945 张选票，程潜得 616 张选票。李宗仁一马当先，而孙科则渐呈不支之势。蒋介石



狗急跳墙，单独召见程潜，直截了当提出要程在下轮竞选中，将他的选票转而投孙，表示他将起用程潜的助选人，并负责补偿程的全部竞选费用。

程潜同李宗仁在竞选初订有攻守同盟，如今虽知道自己竞选无望，但不甘屈从蒋的意志，对蒋此举极为反感，不仅拒绝了蒋的要求，于当晚即以“不能自由竞选”为名，公开宣布退出竞选，以示抗议。

蒋介石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得不惜拿出最后一手，指使陈立夫运用“非常手段”，制造谣言：“李的竞选另有政治企图”；“桂系准备在李宗仁当选后3月，逼‘领袖’出国”；“李宗仁竞选费用是李品仙以保安经费为名从安徽搜刮来的”；“郭德洁飞香港来回贩卖黄金”；“李宗仁在北平利用行辕职权，高价批售运煤执照”等等，大有不搞臭桂系决不罢休之势。

李宗仁也抱定了志在必得之心，把这次竞选作为桂系多年来与蒋争雄改武斗为文斗的一次短兵相接的政治交手，拚将桂系全部本钱，与蒋决一高低，他召集桂系全班人马，急谋对策。有人提出“以退为进”之策，要李宗仁以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宣布放弃竞选，使蒋在国大代表和美国人面前无法交待，尔后再作良图。此议深得黄绍竑、白崇禧赞许，李宗仁总觉得一旦放弃，倘若弄巧成拙，人力、物力、财力牺牲太大。但由于黄、白等人的极为怂恿，认为此计是反击蒋的上策，李便不再坚持，决定照此进行。

桂系智囊会议深夜两点散会后，李之助选人士即连夜行动，立即分发李宗仁《弃选声明》。次日晨，南京各报均以头版赫然刊登李宗仁弃选消息，称：这次国民大会，在选举副总统时存在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最近有人制造谣言，谓本人此次竞选，志在“逼宫”。为肃清谣言，消除误会，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进行。李宗仁的助选委员会也刊登声明，称“最近有人散发传单，公开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就要迫害或三个月后就逼迫领袖出国。此外，并制造种种谣言，极尽诬蔑、侮辱之能事，迹其用心，无非欲颠倒黑白，淆乱视听，以打击李宗仁之竞选活动，而遂其操纵、把持之诡计。兹悉李先生为表示其光明磊落之态度，已向国大主席团正式声明，放弃副总统竞选，深恐社会不明真相，特为郑重声明。”程潜、李宗仁相继放弃竞选，果然产生轰动效应。到会代表，尤其李、程的支持者愤愤然嚷成一团，声称：“此种选举还不如曹锟的贿选，曹锟至少还是出了钱的。”于是，代表们纷纷罢选抗议，孙科也因此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中，最后不得不发出声明，表示“没有对手来作竞选是不民主的。”也放弃竞选。大会无法继续进行，只得宣布暂时休会。

蒋介石不得不转换姿态，硬着头皮召见白崇禧，表示支持李宗仁参加竞选，要白向李转达此意，重新参加竞选。

李、白等便顺水推舟，答应取消放弃竞选的行动。白崇禧向国大代表宣示：“李主任宗仁对于放弃竞选本甚坚决，原定于27日离京赴平。惟26日晚奉蒋主席召见，恳切劝慰，仍望其继续参加副总统竞选。对于恶意宣传，主席已甚明了，对造谣生事大为震怒。

至于代表投票，主席郑重声明，绝对自由，故李主任已表示仍继续参加竞选。”白为人向来好观察，不为人所喜，亦为人所忌，此番宣布别出心裁，使蒋系人物又恨又恼，却莫之奈何，极大地加强了李宗仁的地位。

28日，进行第三轮投票，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按大会规定，最后一次投票于29日上午进行，在李、孙两人中表决。在此关键时刻，李、孙两夫人郭德洁、程淑英各带女将，前往程潜的助选代

表住所拉票，安乐、龙门两家酒家竞相摆开宴席，大宴国大代表。那孙科去找程潜面议，请程潜帮忙，会谈时间过久，使被拉到龙门去的代表感到受了怠慢，哄散了许多，无形中输了一着。

蒋经国在南京中央饭店为孙科次日竞选部署一切，蒋介石的官邸也灯火彻夜通明，李宗仁的助选班子也是通宵达旦地忙碌，全力以赴。

29日晨，李、孙两对夫妇各自拿出最后的心机和气力，早早来到会场迎候各位代表，投票结束：李得1438票，孙得1295票，李宗仁以微弱多数战胜了孙科，取得副总统竞选的胜利。李宗仁得意非凡，郭德洁喜极落泪，蒋介石却大为震怒，一脚踢翻了身旁的收音机。翌日，李携妻到总统官邸向蒋介石作礼节性拜访，在客厅中枯坐了30分钟，蒋夫妇才姗姗而出，李对蒋的“异常关怀”表示感谢时，蒋一连三声地说：“辛苦啦！”双方话中带刺，不洽之情溢于言表。

5月17日，孙科当选为立法院院长，陈立夫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翁文灏当选为行政院长，顾孟余当选为行政院副院长。

蒋介石为削弱桂系势力，立即掀起“倒李（品仙）运动”，将桂系要角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的种种劣迹，编印成《李品仙主皖劣迹录》在街头广为散发，报刊上大肆攻击，并由CC派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向国民党中央请愿，要求撤惩李品仙，陈立夫等出面答复学生，再由监察院提出对李品仙的弹劾。

李品仙试图反击，盛宴招待记者，即席发表演说，到场者人手分得《主皖政清录》一册，然而终因李品仙在皖声名狼藉，被抓住小辫子，搞得李宗仁很被动，被迫将李调离安徽，另派他人接替他在安徽的职务。

蒋介石为防止李宗仁与白崇禧合谋，把李、白调开，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一职，由何应钦充任。调白崇禧去汉口，就任华中“剿共”总司令。李、白不甘任蒋摆布，当蒋向李探询调白出任华中剿总司令一职意见时，李不客气地问：“你能给健生多大权力？”蒋无法回避，尴尬地说：“只要健生允予出任华中剿总司令，我一定设法给他相当大权。”蒋调白出任华中剿总司令不仅削桂系势力，又企图挑起白崇禧与程潜不和。程潜时任武汉行辕、绥靖公署主任，蒋又打算把华中剿总设在武汉，让白与程同置一处，同掌大权，以互相掣肘，挑起摩擦。

白崇禧被称为“小诸葛”，他早已洞明蒋之心机，立即予以还击，他首先声明坚辞华中剿总司令职，另荐程潜兼任，并派心腹邱昌渭携白亲笔信函向程致意，表示自己已推诚荐贤，避免误会。

蒋介石岂肯让步，坚持己见。白崇禧也不示弱，一怒之下，避走上海。蒋介石无奈，请出黄绍竑为其当说客，并答应白的华中剿总司令部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及参谋总长节制。白崇禧仍不答应，黄绍竑道：“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后，掌握一些部队，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蒋介石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经黄这一点拨，白崇禧恍然开窍，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

白崇禧外调，李品仙下台，李宗仁的副总统形同虚设，倍受冷落，连顾祝同继任参谋总长，余汉谋出任陆军司令这么大的事，蒋介石都不同他商量。

## 第二十五章 晋中酣战

解放军转战中原的3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在1948年3至7月，先后攻克了国民党军强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洛阳、开封等城市，进行了宛西宛东、睢杞、宋河、襄樊等战役，共歼敌16万人。山东地区的解放军，连续出击胶济线，津浦线和潍坊、兖州和济宁地区，歼敌15万，使山东省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解放。华北解放军于3—4月份出击察南、绥东、冀热辽和平保线，5月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晋南完全解放。

5月上旬，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华北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兼华北军区政委，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分别为军区第一、二、三副司令员。华北又成立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兼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央赋予徐向前一兵团的任务是：发起晋中战役，在晋中打阎锡山，直至攻克太原。徐向前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晋中战役。

阎锡山召集王靖国、赵承绶、孙楚、梁化之等军政大员商讨办法。赵承绶表示愿率部开往晋中作战，高倬之愿率领第三十四军打先锋。于是赵承绶率野战军从太原开到晋中。

阎锡山在晋中有3个集团军，3个总队，22个保安团，21个警备大队，共13万之众。

而解放军作战部队是第八、第十三两个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军区部队、陕北警备旅、晋绥、太行与太岳及北岳军区部队各一部，共46个团，约6万人。在装备上，阎锡山军队优于徐向前部队。阎锡山的战略是以守为攻，即以一部兵力据守晋中各县城乡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隘口要地，以其主力机动于铁路、公路沿线，摆出与解放军周旋决战的架势。阎锡山扬言，以照这种布防，可以永保晋中，万无一失，退一步说，一旦晋中不保，太原城有兵有粮，固若金汤。

徐向前的战略方针是：战役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割裂阎匪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某些据点，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而野战中求得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匪实力，缩小阎占区，创造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6月上旬，徐向前派遣吕梁部队进入孝义和汾阳地区活动，同时部署太岳部队由南向北挺进，相机攻占灵石县城，他率兵团主力由太岳山区东倒隐蔽向晋中敌侧背地区开进。

6月11日，吕梁军区部队一部突然出现在汾阳、孝义以西的高阳镇地区，威逼汾阳、孝义两城。12日，沿同蒲铁路北上的太岳军区部队一部，解放了晋中南端的灵石县城。

次日，阎锡山指派其34军军长高倬之，率“闪击兵团”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以所谓“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战术，向心合击高阳镇。解放军坚守阵地牵制敌人。

阎锡山又派其“亲训”的第72师和“亲训”炮兵团增援。

徐向前见敌军主力已被诱调出剿，当即率兵团指挥所向子洪口要隘兼程进发。子洪口是两山狭谷的咽喉之地，阎锡山构筑了星罗棋布的碉堡群，

其中最为坚固险要的白狮岭据点，在子洪镇南侧，居高临下，控制着公路的出入口，阎军称为坚不可破的“金钢岭”。

徐向前避实击虚，暂不取子洪口。是时，敌“闪击兵团”被吸引到汾河西高阳镇地区，祁县及其南面平遥敌人的守备空虚，徐向前令主力第八、第十三两纵与太岳军区部队，以突然动作，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间东南山口的敌据点，并前出同蒲铁路东南平川作战，意在诱引“闪击兵团”回援，在它回窜途中予以包围歼灭。徐向前令第十三纵队于6月19日黎明前，乘黑夜绕过白狮岭，直出山下，以37、39旅，分头突袭守敌不足一个团的菩萨村与元台沟两据点，以38旅插至东观镇与子洪镇之间，监视、阻击东观镇敌人的出援。

19日晨4时30分，解放军发起进攻时，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仓惶应战。因山上无动静，以为不过是“小股游击队”活动，便凭借坚固工事抵抗，等判明是徐向前野战部队奇袭，顿时惊慌失措，军心动摇。激战12个小时，两处据点被攻占，守敌全部被歼。敌人的子洪要塞被隔断在后。八纵和太岳部队也分别攻占了平遥、介休东南山口的东西泉、段村、洪山等多处要点。吕梁八分区部队在汾阳东北神堂头地区重创阎军第70师，毙其师长侯福俊。

徐向前指挥主力拔除据点，歼灭封锁山口的小股敌人，打开了晋中敌人的“大门”，即乘猛虎下山之势，出现在平遥、祁县地区作宽正面展开，近迫同蒲铁路，给敌人以严重威胁。北面解放军部队向忻（县）太（原）榆（次）太（谷）间破击，攻歼小据点，斩断铁路交通线，牵制敌人。

阎锡山绝没料到徐向前部会大踏步前进，向自己的腹心杀来，更没想到徐向前对子洪要塞置之不顾，而“金钢岭”守军，又竟然连眼皮下面通过的大部队也没有发现，失守了门户。阎锡山为保住老剿太原的绝对安全，急命高倬之回师东“跑”，并强作镇定，令榆次、太谷驻军南下祁县与之靠拢，以观动静。

徐向前得报敌34军已开往介休，便以第八纵、太岳部队一部堵截，并以主力追击，在运动中歼敌；又令第十三纵队主力转至祁县以南，洪善以东地区，切断平、祁间的交通，以隔绝南北两敌的联系，布下了“口袋”阵，等敌来钻。21日晨，阎敌“闪击兵团”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以多路纵队，经张兰镇沿同蒲铁路回撤，进到平遥的大甫村和曹村后，果然钻进了徐向前设置的“口袋”。预伏的第八纵队和太岳部队，采取中间突破和前后夹击的战法，将敌人压缩到铁路西与汾河东狭窄河滩地区，同敌激战了3个多小时，“亲训师”被全歼，副师长白玉崑，参谋长刘国祥等大批军官被俘，师长陈震东被击伤后逃回太原。解放军第十三纵队于平遥东北之北营村又歼灭阎军暂40师师部及其两个团、暂45师1个团，并击毙暂40师副师长辜和鸣，击伤师长曹国忠。

徐向前决定打开子洪口，拿下白狮据点，使后方的粮、弹等物资，能通过白晋路运来。白狮岭据点由敌人一个营300余人凭险防守，地形复杂，工事坚固。徐向前从缴获的敌《金钢岭守备方案》中，选择恰当的突破点和隐蔽的突击道路，于7月1日5时发出进攻令，步、炮、工兵部队协同作战，攻克白狮岭要塞，敌营长率10人逃往师部后，被赵承绶就地枪决。

6月30日，敌33、34军由祁县沿铁路东开，利用沿线据点作为依托。7月2日，敌33军主力集结太谷地区，34军及第10总队也抵东观镇一线。徐向前随即决定以“前牵后逼”战法，诱歼赵承绶集团。

7月2日，太岳部队奉命昼夜兼程，北进至榆次和太谷间的铁路沿线，协同太行部队展开破击战，并构筑工事。赵承绶发现铁路切断，侧背受威胁，急令一部兵力攻击东阳镇解放军阵地，并以33军主力，暂编第九总队，在飞机和装甲车掩护下，轮番猛攻董村。

赵承绶和33军军长沈瑞亲临指挥。不料，连续4昼夜猛攻董村，伤亡近千人，仍无指望。

赵承绶遂指挥其主力撤离铁路线，妄图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

徐向前当即命令第十三纵和第八纵一部，跟踪追击由东观镇向徐沟逃窜的敌34军，插入徐沟、尧城镇以东、子牙河以南地区，切断敌往徐沟逃路；以肖文玖集团由东阳侧击，西插车辋东西一线，与第十三纵队接通，切断敌向榆次逃跑；以太岳部队在东阳以南地区堵击敌33军，以吕梁主力部队自汾河以西东进，位于榆次西南永康地区打援堵溃；留第八纵的两个旅攻下祁县后，兼程北上投入战斗。

7日晨，吕梁部队解放了交城，逼退清源之敌，控制了太汾公路北段，独立第3、第7旅向永康地区急进。当日下午，第八纵队经4小时激战，攻下祁县，俘敌37师师长雷仰汤以下3200余人。当晚，第十三纵队与第八纵22旅赶到指定地点，与车辋东西一线的太岳部队和晋中部队接合，宛如两臂环抱，将赵承绶集团包围于大常镇东西长10余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长地带。

阎锡山发觉前景不妙，电令赵承绶立即从小路和田埂撤回太原。赵承绶无心恋战，意欲逃跑，找副司令、第10总队头子原泉福商量，原极力反对，骂阎锡山胆小鬼，要赵承绶把部队集中起来，“同共军决一死战”。赵承绶无奈，只好听原泉福摆布，不但没有集中兵力突围，反而分兵3路向解放军进攻，企图一决雌雄。

7月8日，敌34军73师及第10总队企图攻占榆次以南的东辋村，打通由榆次退往太原的通路，结果被解放军在戴李青村一带歼灭。11日，赵承绶命沈瑞率2个师及装甲汽车队沿大路打通榆次道路。沈率部队行至胡村时，与34军会合，继续往北打，结果遭到解放军的阻击，尔后，解放军将敌34军围困于徐沟县东南的大常村。12日拂晓，第十三纵队向大常村发起猛攻，激战到晚上，攻入村内，敌34军军长高倬之见大势已去，便丢下部队换上农民服装，趁混乱之机逃往榆次。大常村一战，歼灭敌34军军部及73师，师长王檄猷被俘。

解放军立即进攻小常村，小常村驻有赵承绶的野战军总部及沈瑞的33军军部，原泉福的残部也龟缩在这里。阎锡山得知赵承绶部陷入重围，即电请蒋介石增派飞机助战，命赵承绶全力突围。同时组织了3个师又2个总队分别由榆次、太原向南挺进，援赵承绶突围。

16日下午，赵承绶率部在敌轰炸机的掩护下拚命突围，赵部虽有小股突出小常村，但随即又被解放军在野外歼灭，而赵部大部在猛烈火力封锁下，无法突出。赵承绶仍想组织抵抗。是时，一颗炮弹落到赵承绶指挥部的院子内，原泉福小腿被炸伤，他在绝望中即开枪自杀。7名日本军官也纷纷拔枪自杀，赵承绶见此情景，听任部下四散逃命，自己与沈瑞束手就擒。

晋中战役从6月14日开始，至7月16日结束，徐向前兵团6万人歼敌10万余人，其中包括赵承绶1个野战军总部，5个军部，8个师又1个师部、4个团、2个总队、4个保安团。解放了孝义、汾阳、文水、文城、徐

沟、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清源、晋源、灵石、忻县等晋中地区 14 座县城，从而使太原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中共中央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进度，于 9 月 8 日至 13 日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前先开了 11 天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 7 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14 人，重要工作人员 10 人，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毛泽东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号召。为此，会议提出建立 500 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 5 年左右的时间（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歼敌 500 个旅，计 750 万人的宏伟目标，并规定了必须每年歼敌 100 个旅的具体任务。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开始运筹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并首先在东北战场上拉开序幕。从此之后，中共中央的活动更紧张了。以前，虽然也常开书记处会议，但次数还不太多。现在几乎天天开会，每天晚上 8 时左右，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来，集体办公，有时作战部和宣传部的有关人员也来参加。会开得很长，几乎每次都是通宵。会议重要的议题是研究三大战役。

五大书记中，朱德年纪最大，已年过花甲，并且他在平常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晚上 10 点钟睡觉，早晨起来散步打拳。毛泽东等为了照顾朱德的健康，有时劝他早点回去休息。朱德不肯，说：“这么重要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但连续开会毕竟太疲劳，有时他在开会时打盹，醒来时总是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毛泽东关切地说：“咱们这一段会议多，总司令在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精力更充沛，是件好事嘛！”任弼时患有高血压病，过度紧张和劳累容易头晕，他每当感到不舒服时，就靠在躺椅上闭会眼休息一下。毛泽东等怕他太劳累，有时劝他早一点回去休息，他却说：“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都坚持工作，我回去休息那怎么行呢？我应当比你们多做一点事情才对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3 人的身体都很好。三大战役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他们晚上开会，白天随时见面，有什么新情况或新问题，随时交换意见。

经五大书记研究定过的决策，或毛泽东同周恩来临时商定的对策，多数由毛泽东起草电文，少数由周恩来起草，发送出去。在中央发送的军事电文中，多数是五大书记商定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发出，但也有一些是先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经其他书记阅后发出；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时，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先发出去，再送其他书记传阅。

9 月 7 日，毛泽东拟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军遵照此方针，集中主力 12 个纵队和 1 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 53 个师，约 70 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发起了辽沈战役。

蒋介石于 1948 年 8 月 3 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参加会议的有 120 多人，主要将领和高级幕僚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韬以及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会议开张这天，蒋介石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

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蒋介石提出“起死回生”，改造精神，改革生活，明廉知耻。

蒋介石表示：“继续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何应钦在会议的第3天作了全盘军事形势报告，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消耗的数字，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300多万人；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1000多门、追击炮小炮1.5万多门，以及战车、装甲车、汽车、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等。会议议论纷纷，充满了悲观和疑虑。

蒋介石于次日登台讲话，要止住失败的气氛。他说：“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9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会议的最后一天，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速编练第二线兵团。”会后，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宴请参加会议的人，散发了《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品。

又分别召见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亲信将领，布署新任务。要杜聿明去徐州剿总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蒋对杜说：“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转举渡江的。”徐州的“剿共司令”原是顾祝同，因顾祝同升任参谋总长，蒋介石要蒋鼎文继任徐州“剿总司令”，蒋鼎文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顾祝同认为蒋鼎文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已不堪重用。于是，蒋介石想起了寂寞已久的刘峙。但有人认为刘峙是败军之将，遇事迟疑，不能委以重任。蒋介石则认为刘峙虽然打了一些败仗，但终究忠信可靠，虽然缺乏果断，但辅之以杜聿明、郭寄峤这样的虎将，可收短长互补之效。刘峙对于蒋介石的再次任用受宠若惊，表示“义不容辞”，尔后赴徐州就任。对刘峙的上任，时人有言：“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蒋介石要宋希濂去汉口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兼兵团司令，他对宋说：“华中剿总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蒋介石要黄维到平汉路的信阳编组一个兵团，他对黄说：“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蒋介石将“分区防御”改为“重

点防御”，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为 5 大战略据点，企图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其具体部署是：东北剿总布 4 个兵团约 55 万人。总司令卫立煌率 30 万人防守沈阳，副司令郑洞国率 10 万人防守长春，副司令范汉杰率 15 万人防守锦州，以保持与华北的联系。

华北“剿总”布 4 个兵团，约 55 万人，分布于北宁路和平绥路沿线的山海关至归绥一带，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北平。

徐州“剿总”布 4 个兵团和 4 个绥靖区，共约 60 万人，分布在徐州及其附近的津浦路和陇海路沿线，刘峙坐镇徐州。

华中“剿总”布兵 75 万，分布于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

总司令白崇禧坐镇汉口。

西安“剿总”布兵 30 万人，分布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带。总司令胡宗南坐镇西安。

毛泽东等策划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首先打响的是辽沈战役。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曾致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指示林罗刘：为就地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这样既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军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实行中间突破，使东北的卫立煌与关内的傅作义相互孤立。

果然，在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上，有人提出“干脆撤出东北，集中军力，可作他图”的主张，并建议第一步撤到锦州，视时局变化，进可以“恢复东北”，退可以安全撤出。

但蒋介石对美国出兵抱有幻想，举棋不定。

蒋介石同卫立煌在战法上也有争执。卫立煌主张采取稳重态度，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守军如何告急，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共军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当。”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闾飞抵沈阳，建议卫立煌趁沈阳暂时稳定之机，以精锐部队打通北宁路沈锦段。卫立煌坚决反对，派副司令郑洞国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说：“目前各军均疲惫不堪，正在休息，若侧敌长途行军，在兵法上有破绽，至为不妥，东北实地指挥将领均不同意出兵辽西方案。”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相机打通沈锦线。蒋介石颇为不快，坚令卫立煌执行原议，并将主力撤至锦州，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郑洞国快快回沈复命。

郑洞国向卫立煌转述蒋的意见后，卫立煌仍坚持己见，再派赵家骧等赴南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是时，蒋介石不想在军事上造成大的动荡，方才允许卫立煌在东北暂时维持现状，加紧补充训练，待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

不久，蒋介石把卫立煌召来南京，要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卫立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谈话不欢而散。

蒋介石见卫立煌如此固执，决定制定矛盾，架空卫立煌，以实现他的撤兵计划。他暗示廖耀湘，许以西进机动兵团司令，率领沈阳精锐开赴锦州。随后，又命令范汉杰建立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委以指挥东北全军之全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蒋介石拙劣的手法，使东北国民党将领各揣心腹事，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剿总”内部一片混乱，无明确的战略方针。



## 第二十六章 关门打狗

林彪对毛泽东要他到敌人要害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却有顾虑：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再像1947年攻打四平未下一样，定将影响战局。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先打长春，强调打长春的条件有利，南线作战有诸多困难。并准备集中9个纵队打长春，其中7个纵队攻城，2个纵队在四平以南打援，其他3个纵队置锦州、沈阳、四平之间，钳制敌人。并说：“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也曾加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在林彪的坚持下，中央军委同意林彪打长春的计划。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说：

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林彪在对长春的敌情、地形没有完全弄清楚，兵力和火力部署上没有形成绝对的优势，攻城方法上也没有采用近迫作业和坑道爆破的方法，便匆忙决定派两个纵队攻打长春。

林彪部在外围战斗中歼敌5000余人，占领了西郊机场，但因伤亡较大，被迫停止了攻击。然后，林彪又提出对长春“长围久困”，开展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等敌人军心动摇再攻的办法。

毛泽东多次批评林彪：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战略门户，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之地。所以，先下锦州是关键，然后既可关门打狗。然而，林彪对南下作战还是未下决心，认为锦州敌众，工事强，不是急切可下的。因而提出先打北宁路上锦州、山海关间几个小点之后，再去打已经划归傅作义指挥的承德第十三军，而出动时间，不宜东北军先行动，而拟华北野战军派兵团攻大同，把傅作义的主力调西线，东北野战军出动时间，视华北野战军出动时间才能确定。

毛泽东要求林彪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目前北宁路正好打仗，你们应当迅速出动。

林彪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最终决定南下北宁路作战，并向全军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发扬高度的英勇精神，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以积极精神运用技术和战术，争取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但在兵力部署上，仍以主力置于新民、沈阳及长春之间，以应付沈阳敌人出来增援和长春敌人突围，以偏师用于北宁路作战。

毛泽东见林彪对北宁路作战的决心不大，又致电林、罗、刘：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

经毛泽东多次说服，林彪才决定辽沈战役先从北宁路打起的问题，并重新布置兵力。

从9月12日起，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发起攻击。

解放军以迅猛动作攻克昌黎、北戴河、兴城、绥中，迅速切断义县与锦州的联系，包围了义县，并插向锦州以北，歼灭了薛家屯敌军 27 个团，夺取了帽山屯和锦州以北诸高地。

解放军 1 个连在白老虎屯打退敌人在飞机大炮和 11 辆坦克支援下的 4 个步兵团的 15 次反击，激战 16 个小时，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顽强地守住了阵地。解放军又攻占了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切断了锦州和锦西敌人的联系。至此，解放军已将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各点之敌，一概分割，切断了敌人的陆路交通。

蒋介石大惊，急电卫立煌出兵援锦。卫立煌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解决，回电拒不执行命令。9 月 24 日，卫立煌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在总统官邸，蒋介石歇斯底里地命令卫立煌执行援锦计划，卫立煌据理力争，最后，蒋介石派参谋长顾祝同与卫立煌同赴沈阳，以监军身份逼迫卫立煌行动。并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卫立煌仍持反对意见，与顾祝同多次争吵。是时，锦州防线形将崩溃，锦州机场被解放军炮火封锁，49 军仅运去 1 个师就不能再运。顾祝同见卫立煌仍无动于衷，便召集东北将领开会，要卫立煌出兵援锦，卫立煌坚决反对执行这一命令，并与顾多次争吵。卫甚至赌咒发誓：“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画押之意）。”顾祝同大骂卫立煌，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骂出来。卫立煌极力忍耐，但就是拒绝出兵辽西。顾祝同无奈，只好飞回南京向蒋介石告状。

蒋介石闻报大怒，于 9 月 30 日飞北平亲自指挥，随行者有军务局长俞济时，联勤总司令郭忏，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参军罗泽等。蒋介石一到北平，就要傅作义出兵增援东北，调华北的 62 军、92 军、独立 95 师，由海运向葫芦岛集中，命华北第 17 兵团司令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

林彪仍未完全打消顾虑，他致电中央军委，说打了义县、高桥、锦西、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敌人没有撤，则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敌人撤了再打锦州。毛泽东则回电说：“如果同时打山海关、锦州，则同时打，否则集中兵力打锦州。打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攻克锦州是有把握的。”如果先打山海关，回头再打锦州，劳师费时，给沈阳敌人以增援时间。林彪这才决定攻打锦州，并下书锦州守敌云南部队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晓以大义，劝其停止抵抗，以免无谓牺牲。卢浚泉拒绝。

10 月 1 日，解放军攻克义县，激战 4 个小时全歼守敌，活捉师长王世高。是时，林彪得到蒋军 62 军和独 95 师由山海关和天津海运葫芦岛，增援东北的情报，增添了新的顾虑：“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他致电中央军委，请求放弃北宁路作战，仍然回师打长春。毛泽东回电批评林彪说：

四五月间长春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州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之敌第八军、第九军已经调走，你们又因 62 军和独 95 师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 10 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林彪看了这份电报，才最后下定首先攻取锦州的决心。

锦州地区蒋军守敌 15 万人，利用市周帽儿山、大小紫荆山、罕王殿山

之绵亘起伏地，和日伪统治时期构筑的旧工事，构成了互为犄角的坚固的外围阵地，市区工事以制高点和坚固建筑物为核心，围以若干地堡和副防御，形成点点相联以点制面的全纵深防御体系。城墙之外有外壕、铁丝网、鹿砦和布雷区，城墙上布满相互交叉的明暗火力点。城防可谓坚固也。

林彪以 6 个纵队和炮纵主力约 25 万人攻打锦州，其中 3 个纵队从北向南作主要突击，2 个纵队从南向北同北面主要突击部队对攻，1 个纵队由东向西作辅助突击。作战原则是：大胆穿插，各个歼敌，先吃肉后啃骨头，求得首先歼灭西半城敌人。另外，2 个纵队在锦州西方向塔山一线打援，3 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1 个纵队又 9 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1 个纵队作为战役总预备队。

毛泽东看到如此布署，立即回电：

甚好，甚慰，这才算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了，纠正了长时间内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地坚持实施。

10 月初，解放军攻城部队先后开始外围战，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敌人凭坚顽抗，反复争夺。

蒋介石于 10 月 2 日由北平飞往沈阳，“御驾亲征”。蒋介石召集师长以上将领，说道：“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至柔总司令、郭忏总司令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大家一定要振奋精神，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我已经 60 多岁了，死了没有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后悔晚矣！”蒋介石作了部署，要范汉杰坚守锦州，要葫芦岛集中精锐部队向东攻，要沈阳的廖耀湘兵团由新民出彰武、新立屯，切断解放军后方补给线，借以影响锦州攻城，再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打开东北局面。

蒋介石作了部署之后，飞往天津，并赴塘沽新港视察，尔后乘“重庆号”军舰，赴葫芦岛部署指挥。蒋对各将领说：“你们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

你们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军。”蒋令集中在葫芦岛的部队向塔山攻击，又令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指挥海军，以 24 厘米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蒋介石部署完毕后回到北平。

蒋介石到北平后，接到宋美龄的电话，要他立即去上海救孔令侃。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孙令侃。蒋介石于次日去上海。果然，蒋介石一到上海，即将孙令侃救出，但金圆券贬值，市场混乱异常，知底细者认为：“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一举一动犹如洞中观火。当他发现廖耀湘兵团由新民出彰武，妄图切断解放军补给线，即致电林彪：蒋介石想用取巧的办法引我回援，借以解锦州之围，只要你们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人进占彰武并非不利。待锦州打的激烈，彰武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了时间。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林彪、罗荣桓把锦州外围敌人肃清之后，以 2A3 的兵力冒着敌人轰炸和炮火的拦阻，不分昼夜大挖交通壕。虽然大军云集，但地面上看不到人的行动，密如蛛网的土工作业，一条条战壕伸到城墙跟前。

10 月 14 日 10 时 15 分，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击，900 门大炮一齐射向锦州预定目标，锦州顿时硝烟弥漫，烈火熊熊。经过 45 分钟猛烈轰击，打开了突破口，继而攻城部队发起冲击，主攻部队在炮兵和坦克支援下，迅速突破城防，随之进入激烈的巷战。经过 31 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 10 万，其中生俘“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国民党上将范汉杰等以下官兵 9 万人。

在锦州攻城战的同时，塔山阻击战硝烟滚滚。塔山是北宁路上锦州、锦西间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蒋介石企图打通增援锦州的通道，对塔山一线进行猛烈攻击。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左凭渤海，右以虹螺岬为依托，在塔山、虹螺岬之线占领阵地，以少数兵力，顽强阻击敌人。蒋军独 95 师、8 师、151 师、157 师在数十门重炮和军舰、飞机炮火的掩护下，采取两翼突破、夹击塔山的战法，全力向解放军阵地猛烈攻击，解放军经过 6 天的拚搏、血战，至 10 月 15 日中午，终于赢得了胜利，敌人留下 7000 余具尸体，全线溃退。

蒋介石闻讯，即飞到沈阳，派飞机去长春空投给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的命令，要他立即率众突围南撤。近半个多月来，蒋介石来去匆匆，飞来飞去，席不暇暖，食不知味，寝不安枕。

解放军自 5 月 24 日起开始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并成立了以肖劲光为司令、肖华为政委的围城指挥所，10 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国民党驻守长春部队约 10 万之众，其中西半部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新 7 军，东半部队是云南滇系的第六十军。

解放军围城部队断绝敌粮草，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在长春城外方圆 50 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10 万国民党军靠空投食物生存，空投的敌机遭解放军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时常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惶回逃，有时空投落到解放军阵地或封锁区内，要 20 架飞机每天飞行 2 次空投粮食，才能供上长春的需要，而蒋军飞机每天只有三四架运送粮食，而后来只是一周空投一次。因此空投粮食只能是杯水车薪。蒋军内部，为争夺粮食，经常发生械斗。由于缺粮，蒋军加倍地搜刮长春市 50 万无辜居民，他们组织了军政警合一的“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将城内的粮食甚至麸子、豆饼都搜刮殆尽，管制起来，统一分配。由于粮食奇缺，城内粮价飞涨，到了 9 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国民党军依赖着很少的空投活命，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常有老人饿死在道旁。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蒋介石在 10 月初曾命郑洞国率部突围，10 月 7—8 日，郑洞国组织全副美装的第 38 师连续突围，均被击破而缩了回去。郑洞国不得不向蒋介石报告：“共军严密封锁，无法突围。”中共中央分析了长春城内国民党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决定作争取滇系 60 军起义的工作。朱德以滇军旧僚的身份，给兵团副司令、60 军军长曾泽生等写信，东北局还利用各种关系给长春城内上层军官写信。曾泽生认为长春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死守长春必然是城破军亡，于是他决定反蒋起义。10 月 14 日，曾泽生和 182 师师长白肇学、21 师师长陇耀商议后，派张秉昌、

李峥先前去解放军联系起义事宜，被派出去的人迟迟不归。曾泽生正十分焦急之际，郑洞国打电话要他马上去，说：“有紧要事相商。”曾泽生十分犯疑：莫不是走漏了消息？他吩咐白、陇两位师长：“我去兵团司令部，在我回来之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曾泽生忐忑不安地来到兵团司令部，见郑洞国坐在沙发里，形容愁苦、憔悴，大口大口地抽着烟，见曾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空援机油两缺，立即向沈阳突围。”这是蒋介石在沈阳亲手下的命令。郑洞国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让曾看，并沉重地说：“今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信是蒋先生在沈阳亲笔写的，今天中午派飞机用大麻袋装着投下来的，要部队马上突围，违者以军法论处。”曾泽生解除了疑虑，便问郑洞国的意见如何。郑说：“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日出击，18日突围。突围不出去，就拉部队上长白山。”曾泽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张秉昌、李峥先也回来了，他们说解放军欢迎他们起义。

曾泽生按解放军的要求再派李佐、任孝宗2位副师长出城，并把蒋介石的手令送交给解放军，以表示起义的诚意。

解放军代表刘浩奉命入城同曾泽生见面，曾泽生便于当天晚上，先到21师师部，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曾泽生道：“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办法，我们该怎么办？”一位营长站起来道：“我主张起义，反对蒋介石，跟共产党走！”曾泽生立即回道：“这是一条可走的路，我赞成这个意见！”

大家同意起义吗？”众人回答：“同意！”陇耀站起来面对曾泽生说：“报告军座，我们21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吧！”曾泽生宣布：“现在，60军起义。陇师长立即指挥21师，向新7军布防！我们有解放军作后盾，不怕他们！”曾泽生再去182师，宣布说：“21师已经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众人回答说：“起义！”于是，182师继21师之后，向新7军布防。

21师、182师宣布起义，只剩下52师了，这个师原是国民党交警部队，是蒋介石派来监视他们的，且这个师又驻在21师与182师之间。曾泽生施调虎离山计，打电话给52师师长李嵩，要他带领52师的三个团长到军部开军事会议，要准时到达，不得有误。当李嵩等人来到军部，立即将他们扣留，并强迫他们给副师长、副团长打电话：“服从起义，听从命令！”午夜，曾泽生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并派人送给郑洞国：桂庭司令钧鉴：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

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吏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剥削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

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危亡，向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无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身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敬启郑洞国看完后，对送信人说道：“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郑洞国派参谋长杨友梅、长春市长尚传

道等去见曾泽生，说道：“郑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派我们来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从长计议。”曾泽生冷笑道：“60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因我们打内战而在死亡线上的几十万长春老百姓，反对蒋氏政权，救国家于危亡，非与郑司令有隙。假如郑司令有这样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我们已经决定这一正义行动。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新7军愿和60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们要先把60军剿灭了，再突围也只有听便！”10月17日午夜，60军向解放军交接防地后，悄然出城，开往九台并发出起义通电。

60军起义，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敌更是人心惶惶。

周恩来为争取郑洞国起义，致电郑洞国：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

郑洞国接到电报后，颇有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不料防守长春西半部的的新7军人心大乱，新7军军长李鸿于10月19日向解放军投降，长春遂告解放。郑洞国率少数人据守中央银行，至10月21日也放下武器。至此，国民党10万精锐集团全部就范。

我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立即向东北方面回师，从黑山、大虎山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

廖耀湘辽西兵团进犯彰武。廖得知解放军猛攻锦州，遂将辽西兵团置于彰武、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以观动静。但蒋介石连电催促廖向锦州急进，并派参军罗泽闾监督。罗泽闾声色俱厉地对廖说：“战况危险和地形困难，不能成为不打仗的理由！”罗泽闾回沈阳急电蒋介石告状。蒋介石立即手电严责，要廖耀湘亲率辽西兵团主力星夜渡新开河进占新立屯，再向锦州前进：“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解放军攻克锦州，辽西兵团好像是水上飘流着的两不靠岸的无根浮萍，退回沈阳，渡过三条大河，困难很多，即便成功，也只是慢性自杀，充其量，不过得到长春守军的结果；撤退营口，虽然有困难和危险，比仍然西进好些。正当廖耀湘反复权衡利害得失时，蒋介石命廖西进。

## 第二十七章 辽沈决战

10月18日，蒋介石和杜聿明等从北平飞往沈阳，召集卫立煌、廖耀湘、赵家骧等开会。蒋介石说：“据连日空军侦察，共军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我料定共军不会守锦州，现在锦州已没有什么共军。我决定将五十二军、第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继续向锦州攻击，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锦州。”

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说：“敌军兵力超过我军近两倍，而且无后顾之忧之虞，可以集中兵力同我决战。而我军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南

北分进，既不能合击，又有被敌军各个击破之虞，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是值得慎重考虑的。”蒋介石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蒋问罗泽闾：“你看怎么样？”罗泽闾完全仰承蒋的鼻息，说：“委员长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空军、炮兵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击一举收复锦州。”蒋介石脸上泛起一点笑容，又问杜聿明：“光亭的看法？”杜聿明说：“赵参谋长的判断可能符合实际，目前敌我力量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介石见杜未迎合他，怏怏不乐，会后急忙飞往北平。

次日晨，蒋介石召杜聿明、卫立煌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傅作义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卫立煌坚持集中兵力守沈阳，而蒋介石非要收复锦州不可，杜聿明同意卫立煌的意见。

蒋介石问傅作义：“宜先兄的意见如何？”傅作义道：“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蒋介石见没人附合他的意见，急得头胀眼红，从沙发上站起来，拍桌瞪眼大骂卫立煌一顿。

晚间，杜聿明睡不着，心想：东北已弄得不可收拾，危在旦夕。徐州方面，共军即将发动冬季攻势，我如果再在北平待下去，势将又弄得一败涂地，东北我可以不負責任，徐州我作为“剿总”副司令不能不負責任。无论如何，我明天也要回徐州去。

正当杜聿明辗转不眠，勾命小鬼罗泽闾于午夜12时又来造访，传达蒋介石要他代替卫立煌作为东北战场主帅的旨意。

罗说：“老头子认为东北只有你去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挽回败局。现在卫立煌和各将领都不听老头子的话，不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所以弄得一败再败，希望你去能替老头子分点责任。

不知杜兄意为如何？”杜聿明一听，心急意乱，说：“卫俊如的能力见解都比我高，经验又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我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徐州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打得一败涂地，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法撒豆成兵，增加部队，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再遭失败，则南京也危，我们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下定决策，要守就叫卫俊如守着，尚可能牵制东北共军主力不至马上入关。如果不守东北，就干脆从营口撤退。”罗泽闾借蒋介石的命令威胁杜说：“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杜聿明大怒：“就是下命令，我也不去！”罗泽闾拔腿就走。杜聿明又骂道：“你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敢以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我！”清晨起来，杜聿明去见蒋介石，蒋定要杜聿明去东北，杜聿明只好说：“既然校长决心命令学生去，学生当然服从。希望校长对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同过去一样，中央统一计划，并要尽先补充兵员，充实装备，恢复已损失的各军、师部队，才可以完成收复锦州的计划。”蒋介石听罢，大发雷霆：“为什么共军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到呢？”杜聿明回答说：“共军现在占有整个东北，而我们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我就是想要就地筹饷筹粮，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蒋介石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道：“娘希匹，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怯懦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蒋介石边骂边上楼去了，一个小时后，又走下楼来，面带笑容地对杜说：“好！我们再谈谈。”10月20日，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杜聿明开会，蒋介石宣布说：“现在杜聿明任卫立煌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

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回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要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由杜聿明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祝杜聿明马到成功！”杜聿明听罢，惊恐万分，但又没有勇气抗命。

林彪、罗荣桓等命令两个纵队进入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坚守防御，阻击敌人南逃和再占锦州。原驻彰武地区的两个纵队，进入黑山东北，切断廖耀湘向沈阳的退路。

担任主攻的6个纵队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分头向辽西急进。打法是：拦住敌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由长春南下的肖劲光的第一兵团，主要任务是拖住沈阳敌人。10月20日，林彪、罗荣桓签署全歼东北敌军动员令：“全军指战员，必须有连续打胜仗的决心，一口吃掉敌人七八个师，十数个师，一次俘虏七八万，十数万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廖耀湘兵团10多万人的全美式机械化部队，配有大量飞机，坦克和上千门大炮，浩浩荡荡地由彰武、新立屯地区沿北宁路向锦州前进。此路西边是高大的医巫闾山，东边水网纵横，均不利于大兵团行动。但为廖耀湘兵团去锦州的必经之路，其间又有黑山、大虎山的天险门户。廖耀湘虽不愿走这条路，但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不得不从。

10月23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于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东北与解放军阻击部队前沿接战。次日，敌军5个师在200余门重炮和200多架次飞机支援下，向我黑山、大虎山25公里弧形正面展开进攻。以黑山以东、大虎山以北为重点，企图控制北宁路，夺取黑山、大虎山间约9公里的南下孔道，战斗非常激烈，敌人冲击20余次，阵地前沿尸堆成山。

廖耀湘遭解放军顽强阻击，受到大量杀伤后，信心动摇，又获悉解放军主力将蜂拥而至，遂放弃沿北宁路进击的计划，改向东南，企图经台安、大洼去营口。但退营口之路，也被解放军切断，便向沈阳撤退。不料，在绕阳河、二道境子一线，遭到解放军的强力阻击，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死伤惨重。廖耀湘兵团的左翼，在康屯、前尖岗子地区，也遭到解放军的阻击，战斗持续14个小时，堵住了企图东撤的敌人。廖耀湘虽然动用了他的精锐部队猛烈冲击，但都没有获得成功，撤退沈阳的计划又成泡影，廖耀湘再次改变决心，仍想回师东南退走营口，但阵脚已乱。

10月26日凌晨，林彪、罗荣桓命令10个纵队及若干独立师，对黑山以东、大虎山东北、绕阳河以西120平方公里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包围、突击。经过一昼夜的冲杀，敌人已无法组织战斗，溃军纷纷缴械投降。廖耀湘见大势已去，带新6军军长李涛、22师副师长周璞等4人，昼伏夜行。不料在徒涉一条水渠时，那周璞不慎，掉入水深处，禁不住大呼救命，引来了巡逻的解放军，把李涛冲散。廖等3人绕过一处小树林和一个村庄，一直跑到黎明，想躲进一个村庄，又被解放军捉去1人。廖、周2人便躲在野外高粱杆堆里，隐匿一天，夜间再走。又弄到便衣和食物，化装后继续向沈阳方向逃走。到了辽河边，无法渡过河去。转来转去，终被解放军查获。此役，解放军歼灭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10多万人。

卫立煌心绪烦乱、坐卧不宁，对杜聿明说：“我早就向蒋说，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画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吧！”杜聿明向卫立煌传达了蒋介石要他加强沈阳防务的命令，卫立煌愤懑地说：“从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如何守法？”杜聿明



问：“退营口怎么样？”卫立煌道：“长春共军几个纵队已经南下，退出去会马上完蛋！”毛泽东于10月27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面敌人解决之后，应以不少于3个纵队的有力兵团，星夜兼程东渡辽河、歼灭海城、牛庄、营口之敌，阻塞敌人海上逃路。如果沈阳敌军已正式向营口逃跑，则我军应迅速向海城、营口方向进击。”林彪、罗荣桓等立即命第十二纵队歼灭铁山敌53军一个师后，迅速向浑河铁桥及沈阳以南急进，意在截断沈阳之敌南逃。东北野战军主力乘胜前进，矛头指向沈阳和营口。

第十二纵队行至沈阳北新城堡一带，发现从铁岭逃出来的敌116师和东北守备第一纵队，在铁甲列车掩护下，沿铁路线附近向沈阳逃窜。解放军第十二纵队立即包围敌人，于次日晨展开激烈的围歼战。敌人困兽犹斗，在铁甲列车掩护下，企图杀出一条血路。

解放军35师机枪连战士杨宝胜，敏捷地跳上装甲车，揭开天窗，投进手榴弹，装甲车车毁人亡。其他战士见杨宝胜杀敌立功，立即模仿他的动作，将敌人装甲车个个报废。敌人失去装甲车掩护，四散逃命，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生俘4000余人。

解放军第十二纵队未及打扫战场，便轻装快速继续前进。途中捉到一名俘虏，经审讯，得知在附近的大兴屯有第五十三军的1个团和40军的1个营。解放军立即围歼了这股敌人，歼俘敌人2800余人。

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于10月28日东渡辽河，分头向沈阳和营口急进。10月31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进抵沈阳西郊，与已先到达这里的第十二纵队、独立师会合，迅速攻歼了铁岭、抚顺、本溪、苏家屯等沈阳外围之敌，对沈阳形成合围态势。

驻守沈阳的敌军尚有13万余人，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敌军元气丧失，军心大乱，犹如惊弓之鸟。蒋介石见东北大势已去，便于10月30日乘机由北平飞回南京。他亲自在北平指挥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不到一个月，损失精锐部队30余万。卫立煌在沈阳不保的情况下，得到蒋介石允许，飞往北平。

主帅卫立煌一走，沈阳守敌更加惶恐，只有号称青年军的整编207师企图顽抗到底。

11月1日，林彪下令对沈阳守敌发起总攻击。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从沈阳西、西北突破，第十二纵队由城南向城北突破；一兵团由沈阳东、北突破。沈阳守敌大部出降。

敌重炮11团守着完好的18门美式重炮，汽车11团将汽车排列整齐，司机端立车旁，等待解放军接收，他们说：“这是国家财物，现在我们把它们交还国家！”沈阳守备第二纵队司令对解放军说：“你们今天来缴枪也行，明天来缴也行，我们等着就是。”敌207师被解放军歼灭。沈阳之战，打得比较轻松，仅一天就解放了沈阳。歼俘敌1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合计13.5万人。缴获各种炮1685门，轻重机枪4811挺，各种枪7万余支，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

东北野战军第7、第8两纵队东渡辽河，横截鞍山、辽阳、海城一线；第9纵队和辽南独立2师向营口进击，堵住敌人从海上逃窜的唯一出口。沈阳南下之敌52军于10月24日占领营口，并布置后续部队继续南下。

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批评他们说：“忽视对营口的控

制，致使 52 军部队于 24 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林彪等命第 9 纵队火速赶到营口断敌逃路。第 9 纵队以 25 师为前队，以急行军的速度直取营口。部队以每天 140 里的速度，连续行军七八天，指战士脚上打满血泡，因为过度疲劳，有的战士行军途中晕倒。连队给每个班发一条绳子，班长在前牵着绳头，副班长在后抓着绳尾，战士们在中间握着绳子，可以边走边打瞌睡，防止因困极而倒下去。

10 月 30 日，先头部队 25 师到达营口远郊，迅速肃清外围守敌，9 纵 27 师攻占海城后，迅速进至三四道沟，五台子附近；26 师也紧紧赶了上来，集中于老边、姜家房一线。

11 月 1 日，25 师经过一日激战，占领了营口东南，26 师占领营口西南，并掩护重炮团占领营口以北阵地。

次日，9 纵队、25、26、27 师三路大军，像离弦之箭，迅速突破敌人层层防线，向市区猛击，25 师仅用 30 分钟就攻占了海关码头，又攻占了火车站。营口之敌被拦腰截断。

东部之敌被分割包围歼灭；27 师一部攻占西海口小高地上的炮台，控制了海岸阵地及海口，主力于五台子突破敌防线后，绕过小股敌人，向海岸方向猛追，断绝敌人的逃路，大炮和各种火器向登船在逃之敌射击，一艘载 3000 余人的兵船被击中，兵船爆炸、燃烧，3000 人几乎全被炸死、淹死。至 11 月 2 日上午 10 时许，战斗结束，共歼敌 2 个师又 2 个团，敌军约万人乘船从海上逃脱。

至此，历时 52 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 47.2 万，解放军付出 6.7 万人伤亡（其中有 1.4 万余人牺牲）的代价。

11 月 9 日和 12 日，锦西、葫芦岛和承德之敌，分别由海上和陆路撤向关内，东北全境解放。

蒋介石在东北吃了败仗，便把责任推到卫立煌身上，他无视委任卫立煌时许下的不追究战败责任的诺言，发布命令：“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蒋介石致电北平，命傅作义扣留卫立煌。傅作义将蒋介石的电报拿给刚刚到北平的卫立煌看，卫看完电报十分冷静地说：“如此说来，我是阶下囚，而非老兄座上客了。”傅作义不平地说：“东北之战，分明是他指挥，与你何干！”卫立煌道：“想我一介武夫，28 年前从陆大毕业以后，本想为国家做些好事，但却跟着蒋介石打内战，为他效忠尽力，蒋还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共产党说我是靠‘剿共起家’。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去东北接陈诚的烂摊子，担任东北这个‘剿匪总司令’，命该如此，罪该如此。”卫立煌在北平独居下来，不久秘密飞往广州。他在广州被保密局特务发现，解回南京，被软禁在卫家大院。特务们向他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不准出门，不要会客，不许通信、打电话。

东北全境解放，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们：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 1945 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胡匪共达 110 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 3 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 100 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 3700 万同胞，粉碎了中美

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全东北军民表示感谢与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辽沈战役开始的时候，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 2 个纵队在谭震林、许世友、王建安的指挥下，于 9 月 16 日对济南发起进攻，采用两翼钳形攻击，对敌外围据点不依次逐个攻击，而是选择有力部位，集中火力大胆楔入，直插敌人心脏的打法，经过 8 昼夜浴血奋战，歼灭国民党军 10 万余人，第 96 军军长吴化文在西郊机场率 2 万人起义，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

正在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等抓住有利时机，立即部署淮海战役。

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集团不得不采取以退为守的战略，把部队龟缩成几团。在徐州方面，以刘峙为首，集结了邱清泉、李弥、黄伯韬、孙元良 4 个兵团，以及刘汝明，李延年第四、第九两个绥靖区的两兵团，沿陇海线布防于徐州两翼，并以第三绥靖区冯治安的 59 军、77 军置于徐州东北地区。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相交的十字架上的所谓“一点两线”上，国民党军队共约 70 万人。

毛泽东根据中原、华东战场的军事形势，于 10 月 11 日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把整个战役划分为 3 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要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之敌；第三阶段在两淮作战。

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在兵力部署上，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 1 个军的办法，以 6—7 个纵队，分割歼灭敌 25 军、63 军、64 军；以 5—6 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 1—2 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 1 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 1 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邱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 3 个军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 1—2 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璧地区，以牵制李兵团。以上部署是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达到歼灭黄兵团 3 个军的目的。

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 2—3 个星期内结束。

## 第二十八章 前线起义

毛泽东把淮海战役计划拟好后，请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审定。

周恩来说：“这个计划很周到，可以按预定的时间发动。徐东如能顺利完成分割，包围住黄伯韬兵团，则中原野战军主力乘势南下津浦线，出敌不意，攻占徐南之宿县，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联系，那整个徐州守军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朱德说：“只要首战完成中间突破，在徐东包围住黄伯韬兵团，则徐州敌人的部署必然大乱，那时，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毛泽东道：“歼灭徐州集团最大难处，是它太靠近南京的大本营，分割比较难。从目前徐州敌人的守备态势来看，蒋介石对于究竟是守徐州还是守淮河，仍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利用敌人部署未定之机，集中力量分割徐东黄伯韬兵团，是最好的一着。”五大书记商定后，由周恩来拟定发动淮海战役的指示，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名义电令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这一战役按计划坚决执行，非有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朱德建议电告华东野战军前委：“要放手大胆地打，要坚决、勇猛，不要怕伤亡，不要怕打乱建制，第一仗一定要吃掉黄伯韬兵团，决不能让它溜掉！”陈毅、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于10月21日首先向郑州、开封蒋军发动进攻，3天内解放了两城，歼敌1万余人。接着挥师东进，以4个师的兵力，向驻商邱守敌发起进攻，以牵制邱清泉兵团东援，并准备在徐东黄伯韬兵团被围后，出敌不意，神速南下至徐、蚌之间，攻占宿县，切断徐州蒋军同蚌埠之联系。并以1个纵队向涡阳进击，1个纵队向蒙城进击，分别阻击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向徐州增援。

粟裕代表华东野战军前委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请求，让已在中原野战军总部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负责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工作。陈毅在中原的职务是：中原野战军副司令、中原局第二书记。毛泽东让他负责调节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以及地方党政工作。是时，中原野战军的任务是将国民党华中“剿总”的张淦、黄维、宋希濂的3个兵团引向豫西，好让华东野战军在豫皖苏鲁有所作为。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粟裕的建议，乃由中央决定成立淮海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

刘伯承为淮海前线总司令。总前委委员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由邓、刘、陈任常委，邓小平为书记，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统一筹划和指挥淮海战役作战。毛泽东向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发出指示说：“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之大战役。

此战役胜利，长江以北局面即可大定。”11月5日，粟裕、谭震林根据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命令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40多万人马，兵分4路，在西起单县东至赣榆700余里宽的地区浩浩荡荡地向徐州蒋军防区进击。

第一路（左翼）为苏北兵团，由兵团司令韦国清统领，共3个纵队8个师的人马，由赣榆县向南朝阿湖镇前进，准备切断黄伯韬兵团向海州、连云港东逃的去路，并配合苏北地方部队向海州、连云港发起进攻。

第二路（中路）为华东野战军总部，由粟裕、谭震林统率，共7个纵队，20多个师人马，由临沂南下，向黄伯韬兵团驻地新安镇疾驰，突击包抄黄伯韬兵团，并断割它与李弥兵团的联系。

第三路（右翼）为山东兵团，由许世友、王建安统领，共3个纵队9个师人马，由滕县南下，直插徐东陇海路大许家车站，切断黄伯韬西逃去路，并阻击徐州蒋军东援。

第四路（徐州西北一路）为华东野战军孙继先、丁秋生的第三纵队，曾生、雷经天的两广纵队，加上冀鲁豫独立旅共7个师人马，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西南进击，以拖住商邱的蒋军邱清泉兵团东援，以便徐东各路人马完成对黄伯韬兵团之包围。

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的战幕拉开了。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加上各地方部队，共计60多万人马，在纵横700余里的淮海战场上，协同动作，从11月6日起开始，按毛泽东制定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分别向各自预定的目标发起攻势，声威震天。

蒋介石焦急如焚，他一面责成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部署兵力挡住东北解放军入关，一面责令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准备进一步集重兵，固守徐州，必要时放弃徐州，死守淮河，以便拱卫南京。

徐州是著名的军事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曾有徐州建都。

它是南京的大门，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交叉点。济南解放后，徐州“剿总”有两种作战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以攻为守，即向北进攻，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第二种方案是向南退守，即放弃徐州，退守蚌埠，扼淮河而守，以加强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蒋介石似乎欣赏第二个方案，他说：“徐州已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不如守淮。历史上项羽败于垓下，垓下便是徐州附近之沱河集。徐州不是决战之地。”但蒋介石又怕撤出徐州政治影响太大，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且撤防而守，若解放军跟踪南下淮河，那局势更加危险，因此，他又认为徐州为南京大门，决不可轻易放弃。蒋介石呈骑虎之势。徐州主将刘峙优柔寡断，莫衷一是。而杜聿明力主第一方案，认为徐州兵力雄厚，趁解放军济南之战后正在休整，由武汉白崇禧部牵制中原野战军东进，集国民党军主力向华东野战军发动闪电进攻，以佯攻济宁而收复济南，来扭转徐州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个计划经蒋介石批准，白崇禧也同意配合行动。杜聿明决意指挥徐州西之邱清泉第二兵团和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徐州黄伯韬第七兵团和李弥第十三兵团，在滕县附近同华东野战军决战，定于10月15日行动。

杜十分骄横地说：“对陈毅用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50万大军一战而胜，定可改变华东的战局！”但出乎杜聿明意料，在10月15日这天，蒋介石因辽西会战非常危急，急调杜聿明赴东北指挥辽西作战，杜的这个狂妄的“计划”成为泡影。

杜聿明一走，刘峙束手无策，大嚷道：“正在节骨眼上，光亭走了，叫我如何是好！”他一面命令前线部队停止行动，原计划暂缓执行；一面向南京何应钦、顾祝同请示尔后行动方略，并要求速派一名副总司令接替杜聿明的职务。

何应钦、顾祝同决定仍按杜聿明北进部署不变，拟定以徐州为核心点，以徐东之陇海段和徐南之津浦段为两线的防御计划。并提名调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任徐州副总司令，建议由武汉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个“剿总”协同作战，以对付陈毅、刘伯承的华东、中原野战军的联合攻势；调华中“剿总”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转用于徐州会战。这个“一点两线”的方案，经蒋介石批准，速即着手实施。

然而宋希濂认为：徐州“剿总”所辖邱清泉、孙元良、黄伯韬、李弥4个兵团，李弥是他的旧部，黄伯韬也较为踏实，指挥这两个兵团，人事上不

会有很大困难。但孙元良虚伪狡诈，邱清泉骄横跋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两个人很难对付。且邱清泉又恃宠于蒋介石，宋希濂感到内则难于指挥，外则难以料敌，稍有错失，就可能遭灭顶之灾。

他方寸大乱，踌躇焦虑，久而难决，便同几位亲信幕僚反复研究之后，决定弃新枝而踞旧巢，较为上策，遂于10月26日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做种种规划积极部署”及“对徐州方面不熟悉”为由，电复蒋介石，请收回成命，同时亦婉复刘峙。

蒋介石不允，宋希濂只好匆忙带上随行人员由荆门到沙市，候船东下，这时却意外地接到蒋介石一封电报：“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希按原拟计划，实施为盼。”蒋介石要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刘峙闻言，闷了好几天，并发牢骚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还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宋希濂免去徐州，刘峙弦外之意，白崇禧见势不妙，以刘伯承、陈毅“两股未会合，华东由经扶（刘峙）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之必要”，而逃之夭夭。

10月30日，蒋介石令何应钦、顾祝同立即改变徐州“一点两线”态势，必要时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实行所谓“守江必守淮”防御计划，主持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并说：“我军为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击破共军攻势，达成戡乱建国之目的，着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包括临淮关、怀远、凤台间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蒋介石黔驴技穷，朝令夕改。杜聿明见蒋介石这个出奇方案，提出：“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分别同时撤退，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各个击破的危险。”蒋介石命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主力于11月3日向涡阳、蒙城集结，其第九十九军和刘汝明第四绥靖区部向蚌埠、固镇集结。

蒋介石对刘汝明、冯治安有疑心，急电召刘、冯2人去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通电。

蒋介石早已惶惶不安，他要顾祝同于11月3日去徐州，召集邱清泉、黄伯韬、李弥、孙元良等研讨作战部署。那黄伯韬提出：“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备战，进行深沟高垒，采用各兵团互相衔接的‘乌龟战术’，这样才能持久，海州守不守并无关系。”于是决定缩短战线，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

顾祝同、刘峙便调整了部署：黄伯韬的第七兵团确保运河西岸，同一、二“绥区”密切联系；邱清泉的第二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迅速集结；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以蒙城为中心，掩护津浦路之安全，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移驻临淮关。正在东开的第100军归入黄伯韬兵团，撤退中的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后，也划归黄伯韬兵团。

黄伯韬兵团原有3个军，数日之内就增加了2个军，兵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成为徐州“剿总”序列中最大的兵团。

但兵增多了，行动迟缓。

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分头疾进，直扑黄伯韬兵团所在地新安镇。

11月8日，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于进军途中一举攻占鲁南重镇郟城，消灭了长期盘踞在鲁南一带残害人民的土匪武装伪山东保安旅王洪九部

5000 余人，除掉了敌人的耳目，扫清外围。

蒋介石命刘峙：要徐州以西的邱清泉、孙元良两个兵团放弃商邱、砀山，撤至黄口一带，向徐州集中；要徐州以东的黄伯韬、李弥两兵团放弃海州、新安镇等地，向徐州收缩；把刘汝明部调至蚌埠一带“绥靖”，要李延年在蚌埠组织新的兵团。蒋介石又抽调武汉集团的黄维第十二兵团从平汉路之确山、驻马店一带集结东进，增援徐州。这样一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一点二线”上的兵力达 80 万人。

陈毅和邓小平亲自率领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在东进途中，于 11 月 9 日、10 日连续接到毛泽东要他们迅速切断徐蚌路、拿下宿县的电报，电文结尾有“至要至盼”4 字。

11 月 10 日，刘伯承也到达了中野指挥部亳县，同陈毅、邓小平会见。7 天前，刘伯承在豫西同中野副政委邓子恢、参谋长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致陈、邓说，蒋匪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请陈邓切实考虑，机动行事。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所见略同。

陈毅、邓小平下达徐蚌线作战命令：中野陈赓、谢富治的第四纵队在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的协同下，于宿县以北向徐州方向发起攻击；中野陈锡联第三纵队和秦基伟第九纵队一部要不惜一切，夺取徐蚌线上宿县城。

刘峙怕徐州有失，命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离开宿县去徐州护驾。邱清泉探得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纷纷南下，以为是去图黄维兵团，他们机关算尽，却失了一着，没料到解放军切断津浦路关门打狗。

11 月 15 日，经 10 个小时激战，攻克宿县，歼敌万余，生擒敌津浦路护路总司令张积武，控制了津浦线 190 余里，斩断了徐蚌铁路联系。

黄伯韬深感自己的兵团所处战略位置极为不利，于是在 11 月 7 日慌忙率部沿陇海路西撤，妄图靠拢徐州，猬集一团，以免其被歼的命运。陇海铁路沿线，黄伯韬兵团十数万部队，慑于几十万华野大军南下的威势，西撤竟然变成了溃退，沿路丢下辎重、伤兵、器材，败鳞残甲一望无际。整个陇海铁路两侧烟尘滚滚，南北 10 余里，东西百余里，全是狼奔豕突的部队。乱枪声、脚步声、喘息声、机械撞击声，互相淹没，浑浊翻滚。

粟裕一边将黄伯韬兵团西撤情况报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一边立即调整部署追击：电告山东兵团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插向徐州以东大许家、曹八集地区，截断黄伯韬兵团西逃退路，分割其与徐州的联系；位于陇海路以南皂河地区的华野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经土山镇向大许家前进，由南向北配合山东兵团断敌后路；华野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及中野第十一纵队从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沿陇海路南侧向西追击；华野第四、第八纵队在陶勇、郭化若指挥下，沿陇海路北侧向西追击。严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抓住黄伯韬兵团。

一时间，陇海线两侧的解放军的华野官兵如两股狂潮，轰轰烈烈地南北呼应，昼夜兼程，以一天 120—140 里的速度急行军，向西勇猛追击，席卷而去。

担任左翼掩护的敌 63 军，被华野第九纵队捎带着吃掉 1 个团，又被第十一纵队迎头给了一棒，其主力缩进了窑湾。尽管窑湾镇城坚台高可作依托，但哪挡得住随后赶来的华野第一纵队的攻击。激战一天一夜，窑湾镇便成了一片废墟。在联络指挥中断，部队土崩瓦解之际，敌 63 军中将军长陈章拔

出手枪，钻进运河边的堑壕，作困兽斗。他还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腹部就中了一弹。他按着肚子爬出堑壕，投运河自尽。63 军被歼。逃在后边的 44 军在溃败中被我军歼灭将近一半。

粟裕的野战军司令部一天转换几次宿营点，追击部队气势很猛，捷报频传。但粟裕心里并不轻松，他最关心的是山东兵团，只要山东兵团直下徐东，攻克万年闸，强渡运河，拿下徐东据点大许家、曹八集，从西边切断陇海线，中央军委围歼黄伯韬兵团的作战意图就能付诸实施。徐州东北门由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防卫，粟裕知道这个部队有临时起义的可能，但他不存半点侥幸心理。

陈毅已派华野第十三纵队联络部部长杨斯德，前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部策动临战起义。第三绥靖副司令官何基沣中将和张克侠中将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部驻守在徐州东北台儿庄、贾汪一线。

何基沣是个传奇式人物，11 年前在卢沟桥事变中，他率西北军 1 个旅反击日军的侵略，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后来，由于国民党军内部倾轧，何基沣和他的袍泽们虽然拼死厮杀，终因孤军无援，致使大名失守。何基沣痛心疾首，含泪写下“马革裹尸去，不演风波亭”的诗句，拔枪自杀，弹穿右胸，血流如注，一时震惊朝野。伤愈后，何基沣开始寻找救国出路，时任 77 军副军长。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称赞他说：“南京中山陵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到延安去看看。在周恩来的鼓动和安排下，何基沣秘密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叶剑英等人的亲切接见。离开延安前，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

张克侠是西北军元勋冯玉祥的连襟。他早年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他为人谦和，不像何基沣暴烈如火，在西北军内威望甚高。他多次旁敲侧击开导西北军中旧部首领、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早日与蒋介石脱离，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冯治安怕共产党，对解放军能否得天下心存疑窦，也丢不下恩恩爱爱的小妾，所以张的规劝对他说来如风吹牛耳。好在西北军旧部还算团结，冯与张又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不会把张献给蒋介石。可冯治安还是架空了张克侠，让他只挂个副职，并且一直住在徐州，与部队脱离。

张克侠、何基沣在第三绥靖区下层官兵内发展了不少党员。杨斯德见到何基沣，两人商谈后，何基沣让秘书弄来一套毛料军服和少将军阶。杨斯德在何基沣那里住下。

几天之后，张克侠冒险摆脱重重监视，从徐州回到贾汪前线，和何基沣一起率领第三绥靖区 59 军、77 军 3 个半师的官兵战场起义。2.3 万人的部队一律反穿着棉衣，传着口令“杨斯德”，北渡运河，迎着南下的华野将士向兰陵开去，解放军华野第十、第十一纵队穿过第三绥靖区防地，直插徐东大许家地区。

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 107 军军长孙良诚率部由睢宁地区向徐州方向逃跑，闻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受到很大震动，深怕部队被解放军前后夹击，全部被歼。

孙良诚本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和“五虎将”之一，后受蒋介石拉拢，投蒋后被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1942 年 4 月，孙良诚投靠汪精卫，



任汪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但孙良诚狡兔三窟，他脚踏三只船，四方讨好，八面玲珑，一方面听命于日汪；一方面对蒋介石、戴笠派去的周镐待如上宾，百般巴结；再一方面又与新四军信使往返，他左右逢源，保存实力。

## 第二十九章 击毙黄伯韬

国民党军统南京潜伏站少将站长周镐也是位传奇式人物，他发动“南京之变”后，被戴笠逮捕，后被释放。中共派往国民党军队中搞策反工作的徐楚光是周镐的同乡、黄浦军校同学，又是莫逆之交。1942年，徐楚光奉命打进汪精卫集团，当上了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后任汪伪陆军部第6科上校科长，并挂了个上校参赞武官衔。他与周镐本各为其主，政治上没有瓜葛。但徐楚光在与周镐的交往中，听到了周对蒋介石集团的弦外之音，便对他进行了说服工作。果然，周镐表示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46年10月，经中共华中局邓子恢、谭震林批准，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他为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他主动承担做孙良诚的策反工作。是时，军统局已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周镐被任命为少将直属组组长。由于共产党内叛徒告密，周镐先后两次被捕，吃尽了皮肉之苦。但由于没有证据，由于周镐人缘甚好，均被释放。1948年9月23日周镐回到解放区后，又去孙良诚处做策反工作。孙良诚让周镐担任他的高级参议。

孙良诚变幻莫测。他本答应把107军集中睢宁，然后通电起义，忽然接到刘峙电话，叫他迅速率领部队撤往徐州。11月10日中午，蒋介石派飞机给孙良诚送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表示“慰勉”。他又一次发生动摇，从徐州“剿总”要来10多辆大卡车，亲率107军260师沿海郑公路向徐州方向狂跑，遭到解放军小部队拦击和伏击，孙且战且走，后又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尾随而来，随时有将该部包围的模样，孙良诚见形势不妙，决定在邢圩一带宿营，构筑工事，进行防御，等待261师前来接应突围。华野第二纵队将孙部包围。

周镐于11月12日经长途奔波，急匆匆冒险只身闯入敌营，见到孙良诚便正言厉色地说：“少公早就准备率部举义，缘何反反复复，动摇不定？古人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矣！少公如此失信，岂是堂堂的为军为将？你这样做，使我有何脸面去见中共领导人为你说项？”孙良诚支吾其辞地说：“战场情况变化急速，通信、联络都很困难，以致未能与你及时取得联系，这是我孙某的疏忽。为今之计，希望你向中共方面负责人说明按照我与你在宿迁时商定的条件，同意我部起义。”周镐驳斥道：“当时我们确实已商定了起义的时机和条件，但少公一再违反协议，错过了多少良机！现在解放军大军压阵，贵部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就像项羽当年垓下被围，四面楚歌。在此情势下，只有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向人民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孙良诚听到“投诚”二字，大惊：“我们约定的是起义，不是投诚，你们不能失信。”周镐道：“失信的不是我们，而是你孙少云将军！原来我们洽谈好的，可你出尔反尔，背信弃义，逃离睢宁，要把部队带到徐州去，现在，你们已

经跑不掉了，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你们已陷入天罗地网，山穷水尽，进退无路。要打，势必全军覆没，作阶下囚，在这种情况下，再谈起义，为时晚矣！除放下武器投诚，你们已别无选择。”夜半，周镐同孙良诚乘吉普车来到华野第二纵队第5师师部，孙良诚见到5师政委方中铎，以先声夺人的气势说：“我是来接洽起义的，请贵军给我番号，让我率部到朝阳集起义。”方中铎冷冷一笑，一字一句地说：“孙将军，现在你来洽谈起义，已经迟了。我们过去相信你，曾经几次给你机会，让你起义，而你迟迟没有行动，这些，周镐同志可以作证。现在，我军已兵临城下，贵军四面被围，这个时候你来接洽起义，时机早已错过，你们只有缴械投诚。”孙良诚自知理亏，但又不肯认输，强辩说：“起义的事，早在宿迁就和贵方联系好了，你们不能失信！”方中铎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当时确实联系好在睢宁起义，但你为什么要带着部队往徐州跑？既然要起义，为什么当我军在海郑公路南北把你的部队夹在公路中间的时候，你还不停下来？现在你被四面包围，提出无理要求到30里外的朝阳集去起义，这哪里是真心起义，分明是要阴谋，搞缓兵之计，妄图借机脱身，溜之大吉，试问，你这套鬼把戏骗得了谁？”孙良诚哑口无言。沉默一会儿，蛮横地说：“我是堂堂军人，军人有军人的气节，起义可以，要我投诚，我不干！”方中铎不禁心生怒火：“孙将军，你有什么气节？你有什么资格侈谈军人气节？当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将军失败，你为什么背叛了他，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8年抗战，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以当汉奸为耻，你不是率领部队抗击日寇，马革裹尸，而是认贼作父，背叛祖国，当了伪军，你部盘踞苏北，配合日本侵略军下乡‘扫荡’，和日寇一起残害中国人民，试问你作为中国人的气节到哪里去了？抗战胜利后，你摇身一变，由伪军成了国军，继续与人民为敌，替蒋介石打内战，作为一个军人，你还有什么资格谈气节！”老奸巨滑的孙良诚先是低垂着头，面红耳赤，继而心生一计，要求打电话给苏北兵团司令韦国清，同意让他起义。

方中铎接通第二纵队司令滕海清的电话，滕海清回答得很干脆：要孙良诚立即率部队投诚，否则就用武力解决！

方中铎放下电话说：“你不愿意投诚也可以，我现在就放你回去，但你知道，投诚和被俘是不一样的，你部已被包围，插翅难逃，我们部队马上可以打进去，把你活捉，那时候，你就不能享受国民党投诚将领的待遇了，你将不是座上客，而是阶下囚，你是战俘，我们可以把你送进监狱，或者送到扬州、盐城、睢宁，交给人民去处理。你在那里干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人民会怎样处理你，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方中铎语调平稳，棉里藏针。孙良诚喃喃地说：“那好吧，我向人民投诚！”方中铎、周镐对此表示欢迎，异口同声地说：“那好呀！”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早就应该作出这样的抉择了。”孙良诚不得不提笔写下“放下武器”4个字。

11月3日，周镐、方中铎来到邢圩，接受107军投诚。107军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瀚是中共特别党员，在他的配合和支持下，该军军部和260师官兵5800余人，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华野第二纵队第4师在双沟集西北40里的郭集追上了77军261师，将该师4000余人全部歼灭。

龟缩在徐州的刘峙见张克侠、何基沣起义，解放军40万大军追击包围黄伯韬兵团。

他担心的倒不是黄伯韬，而是徐州，他怕共军声东击西，他熟知共军

围点打援、明修暗渡的一贯做法。徐州危在旦夕，当即命令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火速集结徐州，又命孙元良兵团向徐州靠拢，将这3个兵团猬集于徐州，却不理睬蒋介石催促东援黄伯韬的命令。

他要确保徐州的安全，总怕会有什么疏漏，特别是徐州市内，说不定已满街都是共军的奸细，于是他又命令，凡进入总部者要佩出入证，进出总部办公厅要佩特别证，“剿总”各处与总部直属官兵要将行李捆好，做应战准备。

徐州看来是万无一失了，而黄伯韬兵团却彻底陷入了重围。就在李弥兵团奉刘峙之命放弃曹八集和大许家，西撤徐州时，解放军华野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滚滚南下，与陇海南侧的华野第十一纵队、江淮独立旅南北对进，一举占领了徐东重要据点大许家、曹八集，切断了陇海铁路。至此，黄伯韬兵团被粟裕指挥的14个纵队结结实实地包围在离徐州不到50公里的碾庄一带，约18平方公里的圆圈内，黄伯韬兵团如龟入瓮中，坐以待毙了。

黄伯韬预感到凶多吉少，对总统府参军、陆大同窗好友李劭文说：“看来这次，我这个兵团是首当其冲了，你和李延年明早速行，以免发生变故。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批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杜聿明于11月11日来到徐州，黄伯韬兵团被围困碾庄一带，粮弹两缺，攻既不能，守亦成问题。邱清泉、李弥和黄维兵团被解放军牵制，刘峙束手无策。面对困境，杜聿明思之良久，觉得解放军总有主次之分，绝不会到处都是主力，于是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以黄伯韬兵团坚守碾庄7至10天，以李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会合黄维第十二兵团先击破中野6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华野，以解黄伯韬之围。

第二案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解黄伯韬兵团之围，以黄维兵团向徐州急进，以72军为总预备队。

刘峙等赞成第二方案，遂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星夜向徐东南集结。

11月13日，邱、李两兵团在空、炮兵配合下，向解放军阵地攻击，一时硝烟弥漫，村落尽成瓦砾。而解放军战士各自为战，勇猛狙击敌人。双方激战一日，国民党军无甚进展，且士气低落，谈虎变色。次日，解放军的打援部队抓住国民党军不能夜战的弱点，集中力量在夜间反击，越战越强，邱清泉兵团不仅毫无进展，而且损失很大。

空军向蒋介石告状说：“邱清泉畏敌怯战，按兵不动。”蒋介石电斥邱清泉，并派顾祝同于15日到徐州督战，顾祝同问杜聿明：“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打不动？”杜动气地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胜败要靠两军的实力！”邱清泉兵团的第七十四军，于16日奉杜聿明之令，由潘塘镇经双沟向土山镇方向解放军侧背迂回攻击。不料74军刚一行动，即遭到解放军的顽强狙击，激战终日，不仅未越雷池一步，而且第一线部队全部溃灭。邱清泉在电话中告急说：“74军垮了，请调72军增援。”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粟裕、谭震林施用诱敌之计，令解放军一部突然向东南撤退，杜聿明闻讯，错误认为解放军已被击溃，遂下令全线追击。刘峙欢喜若狂，一面向蒋介石报捷，一面令人通知各机关鸣鞭炮庆祝。《徐州日报》刊登出刘峙致各省主席告捷电报。顾祝同、何应钦发表谈话，为黄伯韬吹嘘，说解放军在

碾庄伤亡 5 万人，伏尸遍野，碾庄固若金汤！国民党中宣部长奉蒋介石之命，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前线慰问，不论官兵，一律犒赏金元券 3 元以资鼓励。

就在南京和徐州吹吹打打欢庆“胜利”的时候，国民党追击部队与解放军激战一昼夜，死伤惨重，增援的各兵团均伤亡过半，被围困的黄伯韬兵团也于 11 月 19 日失守碾庄，第四十四军和 100 军全部被歼，只剩下 25 军残部和 64 军主力据守大院上、尤家湖、小费庄等 8 个村庄，危在旦夕。黄伯韬请求援军火速驰援，否则只有“来生再见了！”刘峙、杜聿明乃命 72 军、战车团救出黄伯韬。

72 军军长余锦源夸口说：“请总座放心，大许家离碾庄圩只有 30 里，大炮炮火已能相接了，我可以一连打下几个村庄，打过大许家，单刀直入，解黄伯韬之围。”战车团团团长更说：“我亲率战车团，誓解黄伯韬之围。如果步兵跟不上，我的战车团也能单独打到碾庄去！”次日，两个吹牛大王率部苦战一日，被解放军打得狼狈不堪，叫苦不迭：“我们牺牲惨重，再也不能攻了。”11 月 21 日黄昏，解放军对大院上黄伯韬之残部发起总攻，激战到 22 日晨 4 时，大院上附近村落国民党残部皆被歼灭。黄伯韬、陈士章、刘镇湘等见势不妙，决心各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黄伯韬刚出茅棚就被击毙，其他人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彻底获胜，共歼国民党有生力量 17.8 万多人，约占整个淮海战场敌军兵力的 1/4，解放了广大地区，使山东、苏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断绝了徐州和蚌埠之敌的联系，控制了津浦路南段近 200 里铁路线，使徐州之敌完全陷于孤立地位。

淮海前线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淮北小李家的作战室内，策划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歼灭黄维兵团为目的的计划。11 月 14 日，总前委向中央军委致电：“如敌（指黄维）出永城和宿县，我以集中 1、2、3、4、6、9 及华野 3、广共 8 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因为黄维在远道疲惫，距离后方之运动中，只先来 3 个军 7 个师，其中强者只有 3 个，我军也能适时。”11 月 19 日，总前委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伯韬，尔后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 3 兵团，争取休息 10 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 5 个纵队或 3 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灭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总前委给中央发的电文的署名，次序有个规律：刘伯承起草的，署陈邓刘；陈毅起草的，署刘邓陈；邓小平起草的，署刘陈邓。

毛泽东认真研究了来自淮海前线的电波，决定让中野全力打黄维，而由华野第六纵队接替中野第九纵队，负责对付李延年兵团，华野粟裕、陈士榘、张震也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和总前委的决定。

黄维兵团共辖 4 个军，即第 10、第 14、第 18、第 85 军，另外还有一个快速纵队，总兵力约 12 万人，兵团 4 个军几乎都是蒋军嫡系。该兵团自从 11 月 8 日奉命离开河南确山，日夜兼程向徐州方向前进，沿途虽受解放军阻击，但一直没有停止前进。黄维十分得意，心想我的兵团在战场上左右闯荡似乎无人敢撻其锋。其实总前委巧妙用兵，将黄维兵团步步诱入囊形阵。

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恳请：

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而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 11 纵队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 4 个纵队加入歼黄维作战。

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

我们即照此实行。

仅过十几个小时，毛泽东便复电总前委：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黄维兵团于 11 月 16 日抵达涡河北岸时，在战场上拾得解放军的宣传品，其中有“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活捉黄维”、“看你黄维哪里逃”等口号。第 18 军军长杨伯涛拿给黄维看，黄维看后只是付诸轻蔑的一笑。

但杨伯涛却十分小心，他想：共军作战向来是各自战场上行事，而今则是刘伯承陈毅联璧，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刘陈的诱军之计？共军一贯采取侧击尾击、不意袭击，亦即变化多端的运动战术。这次我们北进，在涡河以南他们根本不理，而在涡河以北，他们则处处构筑工事，堡垒式掩体星罗棋布，并利用河川有利地形，设置防御阵地，改变了迎头堵击的作战方式，似乎有大打硬仗之势。杨伯涛想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便向黄维建议：兵团须迅速调整部署，站稳脚根，以应付非常之局。

黄维思之良久，接受了杨的建议，并制定了以蒙城为核心的作战计划，即暂停北进，就地构筑工事，屯积粮弹，把触角远远伸出，同解放军保持接触，但把拳头抱起来，等到了时机，再狠狠打去；再前进时，先占领前方有利地形，作为新的核心，如此逐步跃进，稳扎稳打。

不料，蒋介石于 11 月 19 日电令黄维兵团迅速北进，企图抢回宿县，再北上徐州。黄维不敢怠慢，即拔营北进，所谓的“蒙城作战计划”也如此告吹。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北有邱清泉、李弥、孙元良 3 个兵团，南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中间有黄维兵团的情况，及时制定了捕捉黄维兵团的计划。采取南北堵中间围歼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围歼黄维兵团。对黄维兵团又采取“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具体部署是：首先由华野的 8 个纵队，由徐东转入徐南三堡东西一线，坚决阻击徐州守军南下，决不让其实现打通徐蚌线的企图。再由华野 5 个纵队从徐东南下向蚌埠方疾进，阻止蚌埠守军北上。中野则集中全部力量，坚决包围向徐州增援的黄维兵团。中野第二、第六纵队和豫皖苏解放区地方部队，对黄维兵团沿途进行阻击、截击、侧击，迟滞黄维兵团的行进速度，并使其消耗和疲劳。尔后把黄维兵团诱至浍河南岸，即以中野的 5 个纵队，加上华野的 2 个纵队，在浍河以南涡河以北地区，布成一个巨大的口袋，把黄维兵团包围起来。

毛泽东同意总前委的这个作战方案，并指示：“黄维兵团一旦被阻，估计徐州守敌可能向武汉和两淮方面逃窜。此点，你们必须预作准备，决不让其逃脱，力争全歼徐州集团主力于长江北岸。”11 月 24 日上午，黄维兵团第 18 军过了浍河，进入中野预设的囊形阵地，黄维才觉察上了圈套，当天下午，他命令 18 军掉头向浍河南岸退缩。中野乘敌人混乱撤退之际，开始全线出击，猛力合围，中野第四、第九、第十一纵队在东平集、邵围子一线由东、北向西、南攻击，第六纵队和陕南第 12 旅由南向北攻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由西向东攻击，8 个纵队构成巨大的包围圈，加上华野第七、第三、第十三纵队协同作战，把黄维兵团 12 万人马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 20 里，南北 15 里的包围圈里。那黄维兵团本是白崇禧指挥下的精锐师

团，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现在完全钻进天罗地网之中，再也插翅难逃了。

淮海前线总司令刘伯承以“胆大心细，足智多谋”著称于世。他拯民于水火的抱负、潜心于军事的志向、聪慧过人的心窍实属罕见。他身世寒微，打过短工，贩过煤炭，有感于社会黑暗而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在策应蔡锷指挥的护国军入川作战中，头部连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右侧太阳穴穿入，透眼而出，造成右眼失明，有人说他五官不全，难于立足战场，劝他弃军经商，但他立志于军事誓不回头。他熟诸《孙子兵法》、《司马法》、《百战奇略》，在历次指挥作战中着着融会贯通，屡屡出奇制胜，大革命中便以川中名将声闻遐迩。国民党军中不少将领读了他的《重校合同战术序文》拍案叫绝。刘伯承指挥作战，时而大马金刀，纵横驰骋，似海立云横，如闪电雷鸣；时而细流涓涓，鱼石可数，云敛风轻，像雨过天晴。此次对黄维兵团作战，刘伯承指挥部队犹如疾风暴雨般地把敌军包围起来。

### 第三十章 徐州大逃亡

黄维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地区，黄维组织兵力突围，没有得逞。11月26日晚上，黄维在军事会议上拍着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的肩膀说：“老弟，你看怎么办？”廖运周自告奋勇地说：“我同意明天用4个师突围的计划，我师打头阵。”黄维听了很高兴，连声称赞说：“好！好！”顺手拿出一瓶酒，说道：“老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特地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廖运周暗自高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黄维你失算了。

原来廖运周师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第2师，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主力之一，共产党在该师内发展了中共地下组织，廖运周便是地下党员。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该师被国民党收编。解放军把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后，廖运周决定率领全师起义。他召集全师营连干部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的援兵打不过来，徐州被围，黄伯韬兵团已被歼灭，蒙城、宿县被解放军占领。我们既无援兵，又无退路，粮弹即尽，坐以待毙。蒋介石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我们为什么还为他卖命！共产党解放军是人民的救星。现在很多人要求我利用朋友关系，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我们已经同解放军联系上了，见了他们南线司令员，解放军非常欢迎我们，你们赞成不赞成这样做？”众人异口同声：“赞成！赞成！我们愿跟师长走！”11月27日清晨，廖运周率110师，在8架飞机掩护下，排成四路纵队按照解放军指定的地点，来到解放军中野阵地，举行火线起义。

黄维蒙在鼓里，见110师进入解放军阵地，命18军11师、118师和10军的18师在坦克、大炮、飞机的掩护下紧跟110师前进。不料，110师刚过，解放军的大炮机枪一齐射向尾随110退，后队人马继续向前涌去，自相践踏。许久，黄维才醒悟过来，马上命令部队，调整部署，向东南方向解放军阵地小李庄冲击。坚守阵地的解放军击退敌人10余次冲击，毙伤1000余

人，敌军大败而退。

毛泽东写了敦促黄维兵团投诚的广播讲话稿，于 11 月 27 日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广播：

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装，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你们的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及其他一些被俘将领，都在我们这里住得好好的。其中许多人已放回去了。还有许多人我们准备放他们回家。你们都是中国人，何必替美国人打仗呢？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等少数反动派卖命呢？时机紧急，牺牲无益，你们应当立刻放下武器，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坠。

黄维兵团 11 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掉转枪口，和我们一道打到南京去！

毛泽东又以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华野司令员陈毅的名义，写了广播讲话稿：

国民党 12 兵团司令黄维将军及黄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

你们和我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十几华里内的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在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平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面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利，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罢。放下武器的都是生路，一个不杀。愿留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军官，对中级军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罢。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罢！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片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仿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了爱惜兵士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及早派遣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的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告。

广播讲话对黄维兵团官兵影响很大，军心摇动，但黄维不以为然，仍然命部队向双堆集南的马庄突围。惨败后又向西南、东北撞击，四面都是突不破的铜墙铁壁。连续 5 天突围不成，黄维这才安定下来，采取固守待援方针，向蒋介石求援。

毛泽东等 5 大书记在西柏坡见淮海战场上黄维兵团由突围转而固守，致电总前委：“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和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总前委即令前线部队进行了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筑成千百条长龙似的战壕，从四面八方伸延到敌阵地

前沿，最长的战壕长达 20 多里，最近的离黄维兵团司令部核心阵地只有 50 米，构成了完整的围攻黄维兵团的阵地。

蒋介石急令刘峙、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 3 个兵团由徐州向南攻击；命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由蚌埠向北攻击，妄图“打通徐蚌，三路会师”，挽救败局。

蒋介石同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在给淮海总前委或中野、华野将领的电文中，总是采用“请酌办”、“望酌复”、“望酌情机断行之”，甚至“临机处置，不要请示”等字眼，蒋介石既优柔寡断，又固执自信，他的电文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词厉句，甚至对国民党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刘峙也拉下脸来：“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蒋介石是国民党唯一的特级上将。国民党有一级上将 10 名，其中包括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何应钦、陈济棠、陈绍宽、陈诚；二级上将 30 名，如白崇禧、程潜、刘峙、顾祝同、龙云、傅作义、陈仪等等。刘峙早在 1930 年就晋升为二级上将，可见刘峙在国民党军界的显赫地位。刘峙见徐州垂危，来个金蝉脱壳，将徐州指挥大权交给杜聿明，自己以指挥南线各兵团作战为名，避居蚌埠。

尽管蒋介石的电令如此严厉，但他命令黄伯韬碾庄待命，黄伯韬碾庄被歼；命令邱清泉、李弥限时东援，邱、李徐东受阻；命令黄维赴援徐州，黄维途中被围困；命令南北对进，打通徐蚌，南北两军却寸步难行，屡战屡败，几乎没有一个命令生效。

11 月 27 日，邱清泉、孙元良建议，如此强攻，伤亡重而战果少，要求南京速派援军并加强空军轰炸。

蒋介石无奈，电令杜聿明速去南京商讨对策。杜一到南京，便向顾祝同吵着要援军。

顾说道：“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啊！”杜聿明反唇相讥：“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要打，把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顾祝同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 1 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杜聿明沉思良久，道：“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 3 个兵团马上送掉。

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顾祝同、何应钦都表示赞同，于是 3 人去见蒋介石，蒋立即同意。

毛泽东早已料定蒋介石要撤出徐州这一着，因此，在包围黄维兵团时，他就向总前委指出：“在黄维兵团被包围后，徐州之敌可能倾巢出逃，你们要做出妥善的部署。”在 11 月 28 日杜聿明飞南京磋商撤退计划，这晚，毛泽东又电示总前委：“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29 日夜，粟裕潜心揣测徐州敌军集团可能逃跑的路线。他对参谋长张震说：“如果徐州敌人固守不走，对我无害，可以在解决黄维兵团后再打。但是，蒋介石后方已无机动力，因此徐州之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比较大。其逃窜方向可能有三：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海运受船只和码头限制，遭我尾追必陷入背水作战，更易全军覆灭；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这样



距离最近，但此地河川纵横，不便于大兵团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线绕过山区南下，此区域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又距黄维较近，还可与李、刘兵团相呼应，实行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退守淮河，达到所谓‘一箭双雕’之目的。”粟裕的这种预测同毛泽东的估计不谋而合，而总前委的部署，与粟裕的预测更加一致。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命华野在徐州以南、津浦路西侧地区，布成强大的纵深阻击阵地。整个阵地东西全线有百余里，第一线共展开 11 个纵队的兵力，以 8 个纵队阻击由徐州南犯的杜聿明集团，以 3 个纵队机动作战，这种兵力部署，毛泽东十分赞同，说这盘棋子摆得好。

杜聿明从南京回来，还没传达撤退命令，徐州就动荡起来了。各部买绳子扁担，征用车辆，都在未雨绸缪。

杜聿明命令警备司令谭辅烈率员立即查封徐州市公私银行。不久，谭辅烈无精打采地回来说：“完了，人家早他妈的溜啦！”杜聿明急问：“怎么回事？”谭说：“你在飞回徐州的途中，南京的电话就打到了徐州各家银行，刚才我带着大队人马连走几家，都是人去楼空，不但现金运走了，连职员、家眷、细软都已不知去向。”杜聿明听罢大怒，拍案大吼：“老头子，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打什么仗！”杜聿明命国防部保密局徐州爆破队长张亦东，在撤离徐州之前，把火车站炸了。张亦东面善心狠，和共产党作对，搞起破坏来屡屡得手。他带人将美国进口的软性炸药，像泥一样糊在火车头上，轰隆隆一声声爆炸，震得房倒屋塌。一辆辆火车顿时支离破碎。

这些宝贵的交通工具，就这样被国民党摧毁了。

虽然张亦东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还是挨了杜聿明的训斥。杜命令等大部队离开徐州后再点火，可张亦东竟提前了半天，这一爆响，整个徐州为之一震，把人的耳门震得发麻，好长时间嗡嗡直叫，吓得军民满街乱窜，搅成了一锅粥。

粟裕在徐州东南 30 里以外的津浦路东侧时村的华野司令部里听到了巨大的轰鸣声，觉得这声音有些怪异，但一时难以断定声源在哪里。

11 月 30 日，国民党军开始准备从徐州狼狈西逃，杜聿明施声东击西计，一次又一次命令徐州东南方的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在西起四堡、东迄水口、东西 20 里宽的正面，集中 5 个军，全面展开强攻。于是，徐南战场战斗格外激烈。敌 12 军连克四堡、燕桥、潘家庄；敌 72 军攻下后古堆，南下直掠小高庄、杨庄、牌坊；敌 70 军从柳集发起攻击，连占后铁营、官庄、刘庄、韩庄；更凶猛的是敌 74 军，沿番塘至褚兰公路，连克谢庄、宝光寺、褚兰，飞机、坦克、大炮造成的滚滚战云，隆隆南下。

华野将士的阻击异常艰苦。他们与敌人逐村争夺，反复冲击，几乎每一个阵地都展开了肉搏战，致使敌人的飞机、大炮无法轰击前沿，只能在二线消耗弹药。

当粟裕正为一线吃紧调整部署，邱清泉为伤亡惨重大发雷霆的时候，狡猾的杜聿明坐着何应钦送给他的轿车，下达了命令：“撤！”杜聿明有葫芦岛撤退的经验，直到徐州空巷之后，粟裕才从各个渠道得到确凿情报。

12 月 1 日晚 10 时，解放军渤海纵队奉命进入徐州，古老的徐州满街龌龊之至，北风起处，被遗弃的杂物满城飞舞。被战争和苛政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穷苦市民拥挤在街道两旁，瞪大眼睛打量井然有序地开进来的解放军队伍。

国民党 3 个兵团 21 个师 30 万部队混杂着从徐州逃出的商人、地主、职员、军官眷属，甚至还有和尚、道士、妓女，约 40 万人拥挤在宽 5 里的肖（县）永（城）公路两侧，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人喊马嘶，卷起屏天盖地的尘雾。人流所过，留下了一条宽宽的沙河滩般的黄尘大道，遗落的破烂什物、被汽车压断腿的伤兵、被坦克碾碎的尸体零零落落撒在路上。

蒋军在撤退中出现了异常混乱现象。大部分军官把撤退当成了逃跑。9 军 166 师 497 团所有军官，人人备了士兵服；“剿总”军官教导队 13 个大队只集合了 5 个大队就开走了；“剿总”直属军官收容队和 8 军留守处竟没有接到撤退通知；肖县、毛庄遗落了几百位军官太太。至于遗落在村头、路旁的汽车、武器装备更是不计其数，东关里两门崭新的大炮套着新炮衣弃在屋檐下，被视为累赘，谁都不愿带走，41 军 122 师山炮营 12 门山炮出城不久就丢了 9 门；两辆坦克被遗弃在城外公路上，其中一辆连电门都顾不上关闭，马达突突地响着。

“毒不过蛇蝎，恶不过逃兵”。邱清泉的第五军还算是个像样的部队，可他们在经过肖县时，抢走了 300 余名年轻妇女。大军所过，村村年轻妇女遭到轮奸，上吊投井者，惨不忍睹。兵士一路撤退，一路奸杀掳掠。

粟裕在 11 月 30 日得到杜聿明将放弃徐州的情报，便向部队发出了动员令。12 月 1 日，粟裕急电命令豫皖苏地方部队控制涡河、沙河渡口，迟滞敌人；电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希望在南线支援中野围歼黄维兵团的第 13 纵队归还建制，从南线北上堵击；并用电报、电话、骑兵各种通讯手段通知各纵队，火速全线追击。30 万华野将士开始了规模宏大的追击。

国共双方六七十万大军在徐西广袤的黄淮平原上卷起无边无际的烟尘，中间是灰色的，两侧靠后是土黄色的。这构成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波澜壮阔的奇观。12 月 2 日下午，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乘飞机来到徐淮上空，他看到这巨大的流动的烟尘，吃惊得瞠目结舌，恐怖得毛骨悚然。他投下蒋介石告杜聿明的亲笔信，便匆匆飞返南京。

追击杜聿明集团的数十万华野将士在宽正面 100 余里的淮北平原向西席卷。总前委和华野命令各纵队，不仅要进行平行追击。还要实行超越追击，拦住敌人的头。渤海纵队进入徐州后，留一个师控制徐州市区，主力向肖县跟踪追击；第 3、第 8、第 9 纵队、鲁中南纵队由城阳地区直插祖老楼，截歼逃敌；第 1、第 4、第 12 纵队从徐南转向西北，尾敌侧击追歼，第 10 纵队沿宿永公路急进；苏北兵团之第 2 纵队经宿县向永城前进；第 11 纵队沿固涡公路急进；冀鲁豫两个独立旅及两广纵队控制原阵地待命出发。追击部队不顾敌军空军昼夜阻拦，向徐州西南方向漫山遍野地追去，将士们废寝忘食，辎重、骡马丢在后头。炮兵扛着大炮紧跟步兵，公路两侧留下无数路标，已无法辨认是哪一纵队，但所有箭头均指向西方。各纵队指挥员如是下达命令：

路标就是路线！

枪声就是目标！

追击就是胜利！

第 9 纵队 76 团是南路先锋，抄小路急进，不料在夜间竟追上残留的敌 77 军。他们听到前面有喘息声和瓷缸、铁锹、手榴弹碰击声。部队的行进速度便慢下来。营长刘绍毅有些火了：“怎么搞的？前面 3 营出什么事啦！”他跑到前面找 3 营长老阎。老阎手一指：“前面来了一支部队，我们挤在一

起，老走不动。”刘绍毅见插过来的这支部队都背着大包小包，压得东倒西歪，觉得不对。便往前走了两步，仔细一着，圆圆的帽徽上全是青天白日！他忙往后传：“准备战斗！”敌 77 军副军长许长林骑在马上，眼睛涩涩的有些睡意，只听一声大喝：“站住！缴枪不杀！”他的枣红马惊得猛直立，差点没把他摔下来。他勒住缰绳，气恼地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还不赶紧前进，在这儿穷嚷什么！”解放军班长詹美玉道：“喂，快下来！”许长林大怒：“混蛋！你晓得我是谁？”“晓得，你是老子的俘虏。”詹美玉上前一步，抓住许长林的腿，往下使劲一拖：“你给我滚下来！”许长林不明不白地当了俘虏。

杜聿明集团经过 2 昼夜强行军，12 月 2 日晚部队已到达远离徐州 100 余里的李石林、孟集一带。由于部队建制混乱，又有空军通知说发现大部队共军由濉溪口南北向永城前进，杜聿明考虑夜行军会与共军混乱穿插，于是决定休息一夜，次日再向永城进发。

次日拂晓，杜聿明用过早餐，正准备登车启程，秘书送来邓文仪空投的蒋介石手谕：

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被消灭，我们将要亡国亡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放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看罢，心想：原先讲好了的，打就不走，走就不打，现在已放弃徐州坚城，半路与敌纠缠，必致全军覆灭！老头子怎么又变卦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别管他，向永城前进！但他又转念一想：如按原计划撤到淮河，再向共军攻击，果能解黄维之围，尚可将功补过；若沿途遭共军截击，损失重大，又不能解黄维之围，老头子势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我，弄不好要受到军法裁判。战亦死，不战亦死，如之奈何？他思之良久，命各兵团停止前进，召兵团司令官前来共商决策。

众人看过蒋介石手谕，脸色黯然，默不作声。

杜聿明道：“如果依原计划行动，到达目的地绝无问题；如果照此命令打，未见得有把握。”邱清泉颇不以为然，道：“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他见杜聿明忧虑重重，犹豫不决，将桌子一拍，信誓旦旦地说：“总座，照命令打吧！今晚调整部署，从明天起，我的兵团担任攻击，第十三、十六兵团在东、西、北三面掩护！”于是做出决定：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能攻即攻，不攻即守。同时电报蒋介石，请示空投粮弹。

## 第三十一章 阵前劝降

12 月 4 日，华野第 2、3、8、9、10、11 纵队及翼独立第 1、3 旅计 20 万部队，到达王引河一线，在东西 50 里的宽正面构筑袋形防御阵地；第 1、4、12 纵队，渤海纵队到达洪河集以北向南压迫，终于将杜聿明的 3 个兵团合围在徐州西南 130 里的陈官庄附近地区。当日，总前委和华野司令部的电话架通。陈毅在电话中对张震说：“我是陈毅，敌人 3 个兵团，正采取东、

西、北三面掩护一面南攻的战法，要向南打过去同黄维会师，你们必须对症下药，实行东、西、北三面猛攻，南面全线坚守的战法，就可使敌人的围圈迅速缩小，然后再从容收拾它！”张震听到陈毅的声音，甚为高兴，自从陈毅6月份奉命去中野工作，半年多没有见面，也没有电话联系。他立即回答说：“司令员，你放心，我们一定照你的命令办。”陈毅又说：“重点要注意南面，决不能让它冲出去。敌人要冲击，就给它狠打猛揍，叫它痛得要命，它就老实了。我们这里正收拾黄维这个老冤家，你们那里一定要把杜聿明看住，绝不能让他跑了。”“好！好！我们保证！请你放心，请刘司令员、邓政委放心！”张震口气坚决。

蒋军邱清泉兵团以45、46师为前锋，集中5个团以上的兵力，向南滚进；李弥、孙元良两兵团在东西两侧逐次跟进。淮北平原、东起张寿楼、西迄赵破楼，北自袁圩，南止李石林，由炮火和拼杀形成一股方圆40余里的战争台风，向南方缓缓移动。密集的炮火所及，房倒屋塌，草木焦萎，天昏地暗，日月无光。12月6日“台风”艰难地向南推进到陈官庄地区，就只能原地打转了。

邱清泉一脸怒气，和孙元良来见杜聿明，火爆爆地说：“要重新考虑一下战略！”杜聿明便同邱清泉、孙元良、李弥一起商量下一步如何行动。

孙元良道：“总座，目前共匪东北野战军已南下，而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多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并不乐观。唯今之计，只有轻装突围才是一条生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总座独断专行，才可挽救大军。”邱清泉击节叫道：“我同意良公意见！”杜聿明问李弥：“丙仁呢？”李弥沉吟半晌，道：“请总座决定，我照命令办。”杜聿明又气又恨，站起来说：“是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们如果3天前说这话，还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今天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脸面去见老头子！”最后商定，这日晚上3个兵团从东、西、南3个方向全线突围。

孙元良性急，突围心切，命令部队将重武器和装甲运输车悉数破坏，把炮兵牵引骡马改为乘骑，钻隙迂回。孙元良3个军从邱清泉兵团5军阵地越过王引河，潜跃而出，但在薛家湖一带遭解放军迎头痛击，孙元良掉头回宿，夜幕之中又误遭5军强烈火力阻射。

顿时死伤枕藉哀嚎彻夜，1万余人或死或伤或擒，1.6万多人溃散，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被击毙。军长胡临聪、汪匣锋，副军长陈远湘、李家英、师长张光汉、陈玲等被俘。孙元良率领少数卫士向西南逃跑，结果被解放军冲散，卫士跑光了，只剩下他一人，见到处是解放军，乃趴到老百姓床底下，未被解放军搜索战士发现而幸免。尔后趁老百姓家中无人，脱去军衣换上老百姓衣服，昼伏夜行，最后侥幸逃到武汉。

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一夜之间灰飞烟消。

邱李两兵团调整部署后，乃合力南攻。邱清泉建议以他的“集团冲锋”对付解放军的“人海战术”：每次攻击集中5个师以上的兵力，以坦克为先导，蜂拥出击，以倾天裂地之势，一举撕破解放军的防御。于是，连犯刘楼，郭楼、李楼、孙庄等村，然而进至鲁楼这个仅有72户人家的村庄，被华野第10纵29师遏住，未能越雷池一步。

粟裕在电话里向29师传达总前委的指示，询问阵地情况。29师已伤亡近半，有的连队只剩下三四个人，但肖锋师长坚定地说：“请粟司令转告总

前委首长，人在阵地在，我们决不后退一步！”鲁楼阻击战坚持了10昼夜，杜聿明集团终于未能前进一步。

南攻失败，邱清泉和李弥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向来稳重的李弥狂怒，下命枪毙了失守高窑的团长。杜聿明见突围无望，决定就地固守。他连连电告蒋介石，速调大军前来增援。华野将士乘势缩紧包围圈，加固工事，将杜聿明集团重重叠叠地包围在陈官庄地区。

小李家的总前委指挥部刘、邓、陈见华野已经把杜聿明集团围困，认为已到了解决双堆集黄维兵团的时候，遂于12月5日下达了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命令。

甲：从明（六日）午后4时半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推迟。

乙：陈、谢集团务歼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锡联集团务歼三官庙、马围子、玉皇庙、许庄地区之敌；王、杜集团务歼双堆集以南王皇庙、赵庄，及以西前周庄、宋庄之敌，并各控制上述地区，然后总攻双堆集，全歼敌人。

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丁：各部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的协助友部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这个严厉的总攻击令由总前委作战室直接用电话传达到一线部队。

6日下午4时30分，总攻在猛烈的炮声中全线展开。

东集团：陈赓、谢富治率领中野第4、9、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向沈庄、张庄一线奋起冲锋。

西集团：陈锡联指挥中野第1、3纵队和华野第13纵队、特纵炮兵一部向三官庙、许庄一线发起攻击。

南集团：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中野第6纵队、华野第7纵队、陕南第12旅，向周庄一带进攻。

中野从艰苦的阻击战到此刻发起总攻，已伤亡2万余名将士。但整个部队在刘、邓首长“打下黄维，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的决战号令下，个个奋勇拚杀。经转战大别山，在严酷战争环境中锤炼出来的钢铁战士，同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黄维兵团拉开了殊死战的帷幕。陕南第12旅35团1营和敌人反复10余次争夺小李庄，200多名官兵战到最后40个人，而倒在他们脚下的敌人尸体达1000多具。

黄维兵团副司令胡璉，决定实施他的“刺猬胀蛇法”，命令各部紧缩猬集，以家屋为核心，以地堡群为骨干，依托坚固工事，夜间坚持抗击，白天则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突袭反攻。

解放军各集团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重点连续攻击，烟尘滚滚，激战犹酣。解放军4个营攻占了大王庄，将敌85军的1个团击退。敌人调18军的“老虎团”向大王庄冲锋。他们不仅成群地上，单个也上，有炮上，没炮也上，枪打得准，拚刺刀也行。解放军4个营的指战员利用断墙、壕沟，打退了他们的15次冲锋。最后敌“老虎团”全团覆灭，只剩下孙团长一人，他满身污血、跌跌撞撞地步回师部，遇见了胡璉。胡璉逼他自杀。那孙团长颤

颤抖抖地摸出腰带上的手枪，向缠满绷带的头颅举去。随着一声枪声。他倒在胡璉脚下。

解放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野第6纵队46团3营只剩下营长1人，仍坚守在大王庄阵地上，其他3个营也大部牺牲。华野第7纵队首长为了保住大王庄阵地，将纵队警卫连调上去。敌人将18军的汽车兵、后勤兵、伙夫、马夫调上来冲锋，但这些人不经打，他们虽然人多，还是被打下去了。

原被解放军击退的敌85军那个团，趴在掩体里看“老虎团”同解放军争夺大王庄，见他们的部队被打完了，那个团长放下望远镜，说：“弟兄们，莫打了，咱们投降吧！”当夜，他们向华野第7纵队缴了械。

蒋介石派他的二公子蒋纬国率战车2团100余辆坦克前往蚌埠督战。

毛泽东、粟裕曾试图于徐东割歼邱清泉、李弥兵团而未果，便遣华野第2、6、10、11、13纵队等部及江淮军区独立旅直奔李延年而来。李延年、刘汝明到底熟谙军机，看华野重兵来袭，便急电报告国防部，迅速率部南撤，并炸毁浍河铁路桥，然后龟缩淮河一线，再也不敢北越雷池。蒋介石制定的“南北对进，三军会师，打通徐蚌”的战略计划虽未实现，但得以全师蚌埠，也深为庆幸。

李延年所部本是徐州“剿总”第九绥靖区建制，刘汝明所部是第四绥靖区建制。东北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李延年得东北“剿总”的第六兵团番号，刘汝明得东北“剿总”第八兵团番号。李、刘分别把绥靖区改为兵团。李延年第6兵团下辖39、54、96、99军，其中54、39军是从葫芦岛撤出来的。李延年4个军都是蒋介石嫡系，装备优良，颇能冲杀。

刘汝明第八兵团下辖55、68军。这两个军曾被解放军歼击过，但刘汝明是杂牌军，怕蒋介石整肃，不敢实报伤亡情况，虚额甚大。

12月4日，李、刘两兵团倾巢而出，与蒋纬国的战车2团相互助威，凶焰万丈。而阻挡他们的仅中野第2纵队和华野第6纵队的数万将士。

陈毅在小李家给华野第6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写信，他知道第6纵队打得很苦，部队很疲惫，但又抽不出力量来，只有鼓励指挥员沉着、镇定、坚毅，灵活地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要有牺牲大部的决心，与敌人拚斗。王必成、江渭清、皮定均没有辜负陈毅的嘱托，指挥部队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长城，一次又一次地顶住了如洪水般卷来的敌人。

蒋纬国在第一线督战得手，12月5日占领仁和集、周家口，9日进至火星庙一线。但好景不长，华野渤海纵队11师和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5个团陆续开到，配合中野第2纵队、华野第6纵队顽强阻击，国民党军攻击浪头就像撞上了礁石，被碰了回去，仅李延年兵团死伤达1.5万多人。蒋纬国忽然接到南京统帅部来电，命令他的战车2团撤出战斗，听候差遣。蒋纬国带战车2团退出战场，李、刘兵团北进，以失败而告结束。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刚在指挥部内研究完南线阻击李延年、刘汝明的战况，又分乘吉普车出小李家直开双堆集战场前沿。车在一处路口停下，他们步行亲临战场，直接观察第一线激战。

刘、陈、邓回到指挥部，指示粟裕抽调3个纵队参加双堆集会战。粟裕即命参谋长陈士榘率华野第3、11纵队和鲁中南纵队星夜南下。艰苦的歼黄作战由8个纵队增加到11个纵队。总前委立即调整部署。

东集团：陈赓指挥，率中野第4、9、11纵队和豫皖独立旅，攻击敌10军、14军残部，直逼敌核心阵地平古堆。

西集团：陈锡联指挥，率中野第 1、3 纵队和华野第 13 纵队直迫双堆集。

南集团：陈士榘指挥，率中野第 6 纵队、陕南 12 旅、华野第 3、7 纵队，直掠尖古堆。

双堆集北面，从总前委指挥部小李家直到双堆集前线，由华野鲁中南纵队防守，该纵队作为预备队准备策应。

解放军 30 万大军压迫黄维兵团数万残兵，步步紧逼。12 月 10 日攻克杨围子，击毙敌 14 军军长熊绶春，敌 14 军全军覆没。

中野第 6 纵队 17 旅 49 团 1 营和华野第 3 纵队 23 团 1 营，即著名的“襄阳营”和“洛阳营”，合力会攻黄维兵团的前门——马庄，一举歼灭国民党著名的“威武团”，即 10 军 114 师 54 团，占领了由大炮、坦克、子母堡构成严密防御的核心据点。黄维见大势已去，开始焚烧文件，并命令他的警卫团全力反击，企图夺回阵地，而兵团的后门——尖古堆，争夺战正在更激烈地进行。

残酷的拉锯战在尖古堆周围 200 米之内覆盖了一层尸体，尖古堆高出一马平川的地面十几公尺，站在上面，四周田野村庄尽收眼底，险兵恶阵一览无余。尖古堆上原先构筑的坚固工事已被炮火夷为平地。国民党军尸体垒起了一道长达 150 余米的半人多高的弧形“围墙”。

中野第 6 纵队将士们已扫平了尖古堆外围的敌军工事，现在轮到华野第 7 纵队的 61、62 团攻击。坚守尖古堆的是敌 18 军 118 师 354 团，敌人施放毒弹。刘伯承有破毒气的妙法，他命令进攻尖古堆的部队，尿湿毛巾，捂住鼻口。毒气弹失灵了。尖古堆前的枪声、爆炸声、喊杀声震耳欲聋。解放军终于攻克了尖古堆。敌人失掉了制高点，使整个双堆集敌军处在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

12 月 12 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

黄维将军：现在你所属的 4 个军，业已大部被歼。

……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们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 80 里之外，……你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牺牲。

那黄维仍然拒降。黄维、胡璉等在解放军攻占尖古堆时，匆匆撤到平古堆。

12 月 15 日，黄维决定夜间全线突围。胡璉提出“四面开弓，全线出击，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策略；黄维部署了突围的方案，决定黄昏后 6 时行动，并电报蒋介石。不料蒋介石闻报大惊，特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来双堆集上空，传达蒋介石口谕：“夜间突围飞机无法轰炸支援，你的突围计划必须改变。”黄维对胡璉说：“四面共军已可东西对答南北呼应，哪还等到明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决定违背蒋介石的命令。

当夜突围为时晚了。解放军的炮弹落在了敌战车营，几十辆坦克移动疏散，惊慌失措的黄维兵团官兵顿作鸟兽散。至 15 日 24 时，黄维兵团全部被歼。黄维和副司令官吴绍周被活捉。胡璉趁混乱之机逃往蚌埠。至此，沿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孤立无援，已成瓮中之鳖。

毛泽东于 12 月 16 日对总前委发出指示：“从即日起，两星期内对包围

的杜聿明匪部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便蒋介石在毛泽东施缓兵之计，要求总前委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制造一种缓和的态势，使蒋介石产生解放军只能包围，而不能吃掉杜聿明的错觉，从而将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迅速调入关内，与华北野战军合力围歼国民党军华北部队。

华北傅作义的 60 多万军队正在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

毛泽东给蒋介石吃了定心丸，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犹豫不决，没有把华北傅作义大军从塘沽撤到上海。而林彪的数十万大军出敌不意，入关占领塘沽和新保安，切断了盘踞在北平、天津一线的傅作义部的东西逃路，完成了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战略包围。

傅作义再想从东西两头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毛泽东对被围困中的杜聿明集团实行政治劝降。12 月 17 日，毛泽东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将军、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 15 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士兵和很多干部，大家都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 40 天，你们方面已经失败了黄伯韬 10 个师，黄维 11 个师，孙元良 4 个师，冯治安 4 个师，孙良弼 2 个师，刘汝明 1 个师，宿县 1 个师，灵璧 1 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 34 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 3 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 1 个师起义，孙良诚率 1 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 27 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这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过解放军前沿阵地向被围的杜聿明所部官兵广播，同时在各个阵地前沿普遍开展火线劝降工作。蒋军下层军官和士兵，开始成班成排，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营地向解放军投诚，先后投诚者达 1.4 万人。

12 月 22 日，毛泽东指示淮海前线司令部，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应休



息到 1949 年 1 月 5 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 第三十二章 淮海大捷

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时只带足 7 天的粮弹。从 1948 年 12 月 10 日至 1949 年 1 月 7 日，整整 1 个月，全靠空投补给。30 余万人的生命全系在那飘飘忽忽的降落伞上，于是，每当降落伞布满天空的时候，便处处发生武装争夺食品的悲剧，一块大饼从空而降，一群饥饿士兵扑了上去，先抓到大饼的士兵边啃边逃，背后枪响了，那开抢的士兵冲上去，从倒在血泊中的同类怀里抓起大饼，又是边逃边啃。后面的枪又响了，7 个士兵就这样为一块大饼死于非命。最后那个抓起大饼后，刺溜一下钻进了地洞。

70 军 288 团团长因团里几天未分到空投物品，打电话给师长，师长正为空投场被 72 军控制而大为恼火，命令道：“派人到空投场抢米去！”团长命营副率领 2 个连去，将重机枪抬去掩护。他们扛了十几袋大米，但却丢了十几个士兵的尸体，用一条人命换来了一袋米。但也有不走运的时候，70 军一个小炮班冲进空投场，抢回一袋大米，可打开一看，是袋泥土，士兵们大骂起来，为抢这袋“大米”，不光赔了一个弟兄的生命，还有 2 人负了伤。

在陈官庄周围十几里见方的土地上，一下子麇集了 30 多万军队和非军事人员。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以及随军而来的太太，小姐、公务人员、教员、学生、和尚、戏子、妓女等等，这片被围困的土地上的人群如一块癌肿在溃疡、腐烂。最不幸的是女人，最后连下级军官的太太、女儿也逃不脱乱军的奸污。从徐州撤出的女学生为了生存，有的当了官太太，有的成了高级军官的女文书、女护士，供他们取乐；而更多的则遭到士兵们的集体暴行。官兵杀人越货，连公务员们也无法幸免。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共 43 人。中共发言人指出，这 43 名战犯罪大恶极，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战犯名单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勱等。

蒋介石便将近百万刊有战犯名单的南京《救国日报》和《黄伯韬烈士纪念册》空投到陈官庄地区，目的是警告杜聿明等人：“中共把你们列为战犯，非死战到底不行！”同时“激励”他们以黄伯韬为榜样，效命沙场。无奈官兵们需要的是粮食，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后大骂蒋介石：“老子要吃饭，投这些废物有鸟用！真他妈的混帐！”看到这些宣传品杜明聿却想：我既然被认为“国人皆曰可杀”，除了为蒋效命别无生路。蒋介石又给杜聿明一电：“闻吾弟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杜聿明回电说：“生虽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刘伯承、陈毅在双堆集战斗结束后，便去西柏坡同毛泽东等商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邓小平则坐镇总前委，他一面组织中野部队休整，一面做好对付蚌埠、怀远之敌北援的兵力部署，又将中野第 1、2、3、6 纵队配置于涡阳、蒙城一线。作为沿海战场的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围歼可能突围逃窜之敌，以便让华野放开手脚，全力进行攻击。

杜聿明集团被围困了 20 多天，已有数万国民党官兵忍受不了饥寒，爬出来向解放军投诚，连副师长都出来了。华野如果继续围而不歼，可将杜聿明集团彻底围垮围灭。但粟裕考虑到淮海战役后，无疑要渡江作战，于是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整部队部署，决定：东集团：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率华野第 3、4、10 纵队、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独立第 1、3 旅，向敌阵东部攻击。

北集团：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率华野第 1、9、12 纵队由北向西南攻击。

南集团：韦国清、吉洛指挥，率华野第 2、8、11 纵队由南向东北攻击。

另以华野第 6、7、13 纵队、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及第 35 军为外围拦截部队，截歼可能突围之敌。

1949 年 1 月 6 日 15 时 30 分，粟裕下令攻击，陈官庄立即淹没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之中。

中野战士试制成功的“飞雷”已在华野推广。“飞雷”所到之处，天崩地裂，人形犹在，却五内俱碎。敌人胆战心惊，仓皇而逃。

6 日一夜之间，解放军即攻克敌人外层坚固设防的 15 个村落据点，消灭敌人约 10 个团。

7 日又攻占了夏砦等 20 个敌人村庄据点，并攻占了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李弥逃窜河西。这日歼敌 11 个团。

8 日和 9 日，解放军继续猛攻，战斗空前剧烈。蒋军各级军官均出动督战，空军亦实施狂轰滥炸。李弥兵团阵地已崩溃，邱清泉兵团也纷纷败下阵来。9 日黄昏，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来到陈官庄第 5 军司令部，解放军的炮弹也跟踪而至，他们赶紧躲到掩蔽部去。

杜聿明主张按蒋介石命令，于 10 日上午在空军放毒气弹掩护下，实行突围。李弥、邱清泉和第 5 军军长熊笑三认为白天突围无希望，而且不能再等，力主当夜突围。双方争执不下。熊笑三施了一计，他悄悄离开掩蔽部，叫他的部队在掩蔽部四周放机枪、大炮、投手榴弹。他自己又跑回来对杜聿明说：“敌人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要下决心突围，再拖延就出不去了！”杜聿明细听，枪炮声向外边响，知道是熊笑三弄的把戏，便说：“这是你的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杜聿明终于执拗不过众人，只好说：“既然都这样主张，那就分头突围好了。”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人作鸟兽散时，解放军已以猛打、猛冲、猛攻的动作，迅速插入中心阵地。敌军群龙无首，大势已去，于是被俘的被俘，逃跑的逃跑，乱作一团。

至天明，战斗结束。

邱清泉带着特务营向北狂奔，指望赴混乱抢先突出去。当他跑到陈官庄西北张庙堂西南 400 米处时，突然碰上解放军一阵机枪扫来，身中 6 弹，一命呜呼。这个外号“杀人魔鬼”的邱清泉，两天前还让女戏子在床前唱《贵妃醉酒》，抱着青年女学生取乐。这时结束了肮脏的一生。

李弥夹在乱军之中，化妆逃出包围圈，后来逃到青岛。熊笑三和 70 军军长高吉人等，化妆成伤兵逃到上海。

杜聿明化装后带副官、卫士 13 人逃跑，被俘。他自称是军需处长，后被识破。

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发起攻歼黄伯韬兵团，至 12 月 6 日发起总攻黄维兵团，到 1949 年 1 月 6 日发起围攻杜聿明集团，最后在 1 月 10 日战斗结束，历时 65 天，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 25 个军、56 个师，共 55.5 万人。缴获坦克 215 辆，火炮 4000 多门，飞机 6 架，汽车 1700 余辆，以及大批枪枝弹药。

中共中央于 1 月 17 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及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发来了祝贺大捷的电报。

在淮海战役正酣之时，毛泽东于 1948 年 12 月 11 日起草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他指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否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

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平津战役由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共同完成，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3 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任书记。

蒋介石和傅作义对华北国民党军的动作，曾提出过 3 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固守天津、塘沽，准备南撤。这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他为了保存军事力量，重建江南防线，恨不得把华北 60 万军队，在一夜之间撤到江南。但傅作义深怕中蒋介石“调虎离山计”，不愿把自己的 20 万军队跟蒋系的 40 万军队南撤过江。

第二种方案：西撤绥远。这是傅作义的意见。绥远、察哈尔是傅部老巢，他不愿轻易离开绥远。他提出，把平津数十万部队西撤绥远，背靠西北“三马”和胡宗南，互为犄角，可保大西北。蒋介石不愿让他的 24 个师西去，也不愿让傅作义的 20 个师单独西撤。

第三种方案：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这实际上是个举棋不定，折中的方案。

蒋介石终于暂时同意第三方案，他对傅作义说：“好，好，那就照第三方案办吧！”

总之，今后华北的军政财大权都交给你了。”傅作义道：“请委座放心，我尽力照你的意图去做就是，关于华北的防守，我认为按照第三方案部署是比较稳妥的。我已命令承德、保定等处过于孤立的守军，按计划逐步撤归平津，只留 1 个军驻守山海关，监视东北共军的动静。”蒋介石狡诈多变，几天后，他要傅作义去南京参加最高紧急军事会议。蒋在会上宣布任命傅作义为华南军政长官，并通过何应钦在会后同傅作义谈话，说华北军队经海、陆两路南撤过江，舰船已准备好，由傅全权指挥，以此来诱使傅上钩。傅作义作出以攻为守姿态，说南下太困难，不赞成马上南撤。他又在会上坚决主张同共产党血战到底，以最突出的主战派面目出现，提出坚守华北，誓死挡住东北和华北共军南下，并说：“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时间，让总统在江南顺利组成第二线兵团，尔后就好组织反攻。”蒋介石拿他没有办法，几乎每天晚上同他个别谈话。蒋一再要傅率部南撤过江，出任华南军政长官，指挥华南 4 省蒋军作战。傅作义对蒋的高官诱惑，婉言谢绝。他对蒋家王朝的前途，

丧失了信心。

1948年11月10日，傅作义回到北平，立即向心腹幕僚们讲了他拒绝蒋要他南撤的情况，他决心在林彪主力入关之前，抓紧时间，利用美援装备再扩编10—12个师。傅作义说：“只要手中有兵，一切都好办。共产党搞土地改革大得人心，我们也搞‘耕者有其田’，争取人心。誓死坚持华北，实在不行，再到绥远去打游击。”傅作义定下“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并把他指挥的60万军队部署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约1200余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分3个防区。

第一防区，为西翼张家口防区，由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负责，下辖104、105两个军又1个师和2个骑兵团。

第二防区，为北平防区，包括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李文的第四兵团、石觉的第九兵团。共5个军1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团，25万人马。傅作义的总部驻北平中南海。

第三防区，为左翼津塘防区，包括蒋系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共5个军，16个师。侯镜如兼津沽防区司令，驻守塘沽，津沽防守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驻守天津。

傅作义煞费苦心地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路，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解放军主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向绥远方向逃之夭夭。

毛泽东洞察了傅作义的两手政策和踌躇难决的心理。敌人或逃或缩对我皆不利，遂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我们的方针是：不能让敌人逃走，更不能让敌人缩回，要迅速地完成对敌人的战役分割和战略包围，以求全歼。在辽沈战役未结束之际，你们就应组织成先遣团，战役一结束，火速向北平开进。

毛泽东一份又一份电报发给林、罗、刘：

部队要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突然隔断北平与天津、天津与塘沽、塘沽与唐山各地之敌，不让缩回，也不使逃掉。

部队行动必须十分隐蔽。东北局要让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个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我军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林、罗、刘你们几位，可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前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阳的新闻，这则新闻并经新华社播发。

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80万人马，10万匹战马，拖拽着各种大炮、辎重，数不清的汽车、大车载着弹药、物资，夜行晓宿，分3路神速入关，进入蓟县、宝坻、兴隆地区。傅作义的飞机天天在长城内外侦察，有时飞得很低，机翼都快擦着长城了，可是它始终没有发现解放军的行踪。部队白天睡觉，夜间行动。热河至长城之间的丛山密林是难得的天然屏障，队伍兵分多路，隐没其间。

但是，东北野战军的后尾3个纵队没有绕道热河，却沿北宁路直插进山海关，大摇大摆地入关。这路东北野战军的行动暴露在敌人眼皮之下，遭到傅作义成群结队的飞机的轰炸。林彪选择这个路线，事前没有请示，事后向军委电告说：

由于山海关以北地区及平泉至遵化这条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

同时我们大量军队已经长途行军南下，每日每夜均有敌机侦察轰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 3 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

林彪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夹杂在行军部队中间，驶进挂着“天下第一关”匾额的长城门洞。东北野战军像洪流一样涌进山海关。林彪走着 he 预定的路线。军委命令他的部队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灭塘沽、芦台之敌，他却独辟蹊径，下令要他的两个纵队赶往南口，歼灭敌 16 军。毛泽东又给林彪发去一份电报：

你们打南口的 16 军，在全盘中是行不通的。在平津之敌尚未隔断的情况下，你们打 16 军，并把其消灭了，那就逼使北平之敌早日逃到天津、塘沽。这对我们就地消灭平津之敌是不利的。天津之敌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绝平津，包围唐山，歼灭芦、塘之敌。

林彪有几分恼火：“我在战斗的前沿，还不明白哪里该打，哪里不该打？16 军这种敌人战斗力小，一敲就掉。”他给军委拍去的电报，称：“我已令 3 纵队、5 纵队全力向南口前进，抓住南口之敌，并防止北平之敌北援。”林彪先斩后奏。毛泽东认真考虑林彪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棋子放在南口。两个纵队打南口，有没有可取之处？5 纵队从东北方向直逼南口，倒是可以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可是 3 纵队呢？它到南口，就只能在平津间留下空白，逼使敌人逃往天津了。于是，他采纳了林彪的合理建议，修改了自己的方案，立即给林彪回电：“3 纵不应去南口，理由另详告。”林彪服从了，他让 5 纵队继续前进，令 3 纵队改变行军方向。

毛泽东紧跟着又给林彪发去一份长长的电报，详细地对平津战役的重心和兵力部署及歼敌先后顺序做了具体明确的指示。

华北野战军徐向前一兵团正在围攻太原。杨成武、李井泉的三兵团正在围攻归绥，杨得志、罗瑞卿的二兵团集结在曲阳地区，准备赴太原作战。东北野战军程子华的先遣兵团刚进到冀东地区。为了防止敌人收缩或逃跑，毛泽东急令徐向前兵团缓攻太原，急令杨成武、李井泉兵团主动撤围归绥，尔后迅速包围张家口。毛泽东在电令中又说：

我军抓住包围张家口之后，不要攻击，就是说，包围张家口不是为了马上夺取张家口，而在于吸引北平之敌西援，然后协同华北二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把傅系主力分割包围于平绥线上。

11 月 25 日，杨成武、李井泉兵团以 3 个军的兵力进入张家口附近地区，形成对张家口敌人的包围态势。傅作义果然中了毛泽东的圈套。他为了在形势不利时能保住逃往绥远的通道，立即令驻守北平附近的第 35 军、驻守怀来的第 104 军，分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这样，傅作义的嫡系部队 10 万人，已被解放军钳制在平绥线上，实现了抓住傅系，拖往蒋系，掩护我东北野战军入关的第一步计划。

12 月 5 日，东北野战军程子华的先遣兵团之第 11 纵队，一举攻克密云，歼敌 13 军 115 师。傅作义大惊失色，误以为解放军要攻北平。于是便亲自飞往张家口，部署 35 军撤回北平。张家口、宣化之敌，分东西两面向解放军阵地发动进攻，目的是打通张宣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曾几次指示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必须加强兵力，切断张家口、宣化两敌之间的联系，不使敌人会合或逃窜。然而，敌 35 军却从那里的防御阵地突破，乘 400 余辆汽车，越过沙岭子，扬长而去。

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急电发给杨成武、李井泉并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飏，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克诚，以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1纵不够，应将2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你们务必明白，只要宣化敌4个师不能到张家口会合，则张家口之敌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人到张家口会合，则不但张家口集敌9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尔后难以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4个师，再歼灭张家口5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1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2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

### 第三十三章 围困北平

敌35军的队伍继续东逃。前面便是宣化、新保安，路上却没人阻挡。

12月7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往前线，收报人是：程子华、黄克诚、杨得志、罗瑞卿、耿飏、杨成武、李井泉，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

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35军东逃（35军两个师竟敢乘车300余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1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观，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果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现35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军委早已命令杨、罗、耿，应以迅速行动，于5日到达宣化、怀来之间铁路线，隔断宣、怀两敌联系，此项命令也是清楚明确的。杨、罗、耿所部即便5日不能到达，6日上午也应该可以到达。35军于6日13时由张家口附近东逃，只要杨、罗、耿6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也跑不掉。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

华北第3兵团放走了35军。现在，毛泽东把堵截35军的任务交给了华北第2兵团，他不希望2兵团效法3兵团，因此在电文中详细说明。

第3兵团司令杨成武、副政委李天焕承担了责任，向军委做了检讨，对部队进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处分了撤兵让35军东逃的那个团的主要负责干部，并下了死命令，不准敌人突围，从哪里突围，哪里要负全责。各部队要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包围。1纵队将功赎罪，大显雄威。他们当即占领了沙岭子周围的村庄和庙鬼山阵地，斩断了张、宣段通路。

宣化守敌有2个师，1个师弃城逃往张家口，另1个师被1纵全歼，该

师师长被生擒。

宣化宣告解放。随后完成了对张家口守敌 1 个兵团又 5 个师 2 个骑兵旅的包围。

毛泽东有决策千里的本领。他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克诚协同华北第 2 兵团杨、罗、耿歼灭敌 35 军。

12 月 9 日，程子华、黄克诚的先遣兵团赶到了平绥线，立即向怀来、南口间展开进攻。

是日夜，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包围了西援 35 军的第 16 军军部，及 16 军所属的 109 师全部和 22 师一部。次日拂晓，该敌向八达岭突围被解放军全歼，接着又占领了康庄岔、青龙桥一线，断绝了敌 104 军的后路，104 军和 16 军 22 师一部遭解放军东西两面夹击，自身难保，不得不舍弃 35 军东逃。他们企图经十八家、横岭关，沿沙丰线回窜北平，被东北野战军第 4 纵、11 纵包围在横岭关一带，于 11 日全歼，并将敌 35 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解放军在平张线已歼敌 2 个军 5 个师，同时调动了津塘之敌 92、94、62 军开进北平地区，从而打乱了傅作义的整体防御部署，拖住了傅作义集团，使他不能迅速决策南逃或西撤。

12 月 11 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加速向平津地区挺进，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在 12 月 25 日之前，有些是围而不打（如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如对平、津、通线），以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平津之敌决不料我军在 25 日之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完成上列部署后，按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的顺序，从容攻歼各敌。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东北和华北 150 万大军，于 25 日以前，将傅作义 60 万军队包围在平津、平张线上，并先后完成了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 5 个地区的分割，实现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的。

“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敲掉了两头，中间的北平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很大，这是毛泽东的妙计。为此，中央军委火速做出决定，命令杨得志华北 2 兵团担任攻歼已成瓮中之鳖的新保安 35 军的任务。就如何歼灭 35 军和防止张家口守军逃走问题，毛泽东又发出指示：

张家口敌人兵力在 5 万以上，杨得志部开始攻歼 35 军时，张家口守军有极大可能突围逃跑。为此，攻歼新保安 35 军之前，张家口方面我军有增加兵力之必要，以防张家口守敌突围。为此，决定以东北四纵队全部（3 个主力师）开往张家口，并归杨成武统一指挥，防敌西逃。

以东北第 11 纵队位于八达岭、南口、沙河镇地区，接替四纵队的防务。

毛泽东的这个巧妙部署是为了歼灭新保安之敌，又不致吓跑张家口守军。

35 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又是他军事上的一根精神支柱，全军是美械装备，是快速之师。军长郭景云其貌不扬，满脸麻子，还是个贫家子弟，他逃荒要饭流落于天津，在大沽盐场做工。后投奔国民军徐永昌部当兵，以后任团长、师长，一帆风顺。1948 年 1 月担任了 35 军军长。他在就职时演说：“35 军是常胜军，常胜军的军长就是那么好当么？你们这些师长、团长、

营长、连长、排长都不是好干的差使。前任军长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样子。如果你们给我丢了人，我也自杀。”傅作义把郭景云看作“猛将”。

新保安是平张公路上的一个城堡，9米高的城墙全部砖砌而成，坚固异常，绕城设有东、西、南3座城门，宏伟壮观。

华北2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奉命围歼35军。他们为避免35军官兵作无谓牺牲，在对新保安发起总攻的3天前，发出紧急劝降书：

郭景云军长暨35军全体官兵：

你们被包围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

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南苑、廊坊、唐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就要全军覆灭。104军、16军在怀来、康庄之间已大部被歼。

105军已被我包围在张家口，同你们一样欲逃不得。傅作义既然救不了104军、16军和105军，又怎能救得了你们？既然保不了北平、天津，又怎能保得了新保安、张家口？因此，你们不要想任何增援，你们不就是因为增援张家口而陷入重围的吗？104军、16军不就是因为增援你们而被歼灭了吗？你们也不要幻想侥幸突围出去，本军对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东至北平、西至张家口沿途到处都是解放军，不要说你们没有长着翅膀，就是你们长着翅膀也是飞不出去的。你们更不要幻想你们所筑的那点工事能够固守，请问新保安的工事，比之石家庄、临汾、保定等处的工事如何？更不要说济南、锦州、长春、沈阳、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等地方了。

本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只要向你们集中轰击几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立刻就会使你们全军覆灭。

本军为顾念你们2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学习长春郑洞国、新7军的榜样，本军当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和你们随身携带财物不被没收。本军所要求你们的，只要投降时不破坏武器，不破坏汽车和所有军事资财，不损坏全部文件等，如果你们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地消灭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此紧要关头，谅你们中当不乏能作聪明的人。时间不会太多的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愿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军司令部谈判。

郭景云接到劝降书却不以为然，他狂妄地说：“让共军来吧！没有20天、30天，休想打进来。”但下级军官和士兵却惶惶不安，许多人说：“死活快点，不要活受洋罪。”傅作义接到郭景云求援的电报，先是命令郭景云忍痛烧掉400辆汽车，轻装突围；郭景云正要点火毁车时，接到傅作义的第2道电令：留下2个连看汽车，其余人马步行突围。

郭景云集合部队准备冲出新保安时，傅作义的第3道电令传到：明晨派30架飞机前往新保安，空投150吨弹药和给养，对于解新保安之围，本部已有了妥善办法。

傅作义朝令夕改，举棋不定，弄得十分崇拜他的郭景云也不敢相信他。到了次日早晨，郭景云不见飞机，等到中午，也未见到飞机的影子，气得郭景云骂出脏话。

郭景云忽听新保安东关炮声如雷。

杨得志、罗瑞卿发出劝降书，等待3天之后，已做到了仁至义尽，开



始攻城了。150 门大炮向新保安猛轰，5 分钟内就发射了 8000 发炮弹，把东关城厢工事全部摧毁。第 4 纵队 11 旅从炮火轰开的缺口处首先攻入城内，10 旅也相继攻入城内。第 3 纵队 9 旅亦从西门杀入，并向敌 101 师防区勇猛穿插，从房上打到房下，穿墙破壁，逐院争夺，敌 101 师师长冯梓见大势已去，即令其部打白旗投降。

解放军多路人马攻向郭景云的 35 军军部，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郭束手无策，他站在电台旁让报务员向傅作义发电报时，一个解放军战士跳到郭景云指挥部的屋顶上，一梭子弹打毁了电台。

郭迅速躲入掩蔽部，他急命副官：“快去推汽油桶！推到掩蔽部门口点火。”郭景云要集体自焚。军部政工处处长张鸿恩忙说：“我去看看！”他一个箭步窜出，令人把汽油桶移开。

郭景云见集体自焚已成画饼，乃拔出手枪自杀身亡。副军长王雷震、参谋长田士吉等人束手就擒。至此，号称傅作义“王牌”主力的 35 军，以及张家口随军东下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共 2 万余人，全部被歼。

傅作义于 22 日下午 5 时，向张家口的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和 105 军军长袁庆荣发出电令，“新保安已失，郭军长壮烈殉职。据确息，共军即将进攻张家口。兹特密令，孙兰峰、袁庆荣，立即率张市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由袁庆荣统一指挥这次突围行动。”袁庆荣接电令后，深怕走漏机密，不敢召开部队长会议，独自制定了一个由大境门外突围，然后由商都撤往归绥的行动计划。他命令驻防张北附近的整编骑兵第 12 旅鄂友三部，向狼窝沟方面共军进攻，掩护张家口守军突围撤退；命令 259 师陈跻堂部队为前卫，由大境门外突围，经狼窝沟同鄂旅会师，掩护全军通过后，改为后卫向商都转进；命令整编骑兵第 5、11 旅在卫景林统一指挥下，由七里茶房向老鸦庄、沈家屯、杨家屯方向突围，突围出后经高堡、洗马林一带向商都方向转进；命令 210 师掩护全军突围后改为后卫，在 105 军后跟进，向商都转进；其余为本队，按 210 师、105 军司令部、251 师、新兵师的顺序，沿 259 师撤退路线向商都撤退。

敌 259 师乘夜偷偷溜出大境门，被华北三兵团第 1 纵队 3 旅发觉，当即予以堵击。同时，第 2、6 纵队和东北第 4 纵队蜂拥而至，截断敌人去路。次日拂晓逃敌数万被解放军压缩在朝天洼、大境门之间 20 里长、一里多宽的狭窄山沟里，车辆人马竞相逃命，骑兵踏过步兵、车马闯入人群，人喊马叫，乱作一团。战到下午 3 时，袁庆荣的 105 军和十一兵团司令部，约 4 万多人，在陶赖庙附近全部被歼。

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靳书科所部和新 32 师等部，约 1 万人在乌拉哈达山区也被全部歼灭。

东北解放军进入张家口市区，很快肃清市内残敌。

平绥全线解放，使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成为泡影。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12 月 30 日给华北前线发去“大捷电”：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我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占领沈阳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任务以后，迅即向华北前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合在一起，以出敌不意的手段，逐一分割和包围傅作义系统全部敌军，并在短期内歼灭了敌正规军 14 个整师，解放了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

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城、重镇及广大乡村，使北平、天津、塘沽3处的敌军陷入我军的重围之中，如不投降，即将全部被我歼灭。凡此伟大战绩，深堪庆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匪军解放平津而战！

敌人西逃虽成泡影，但从海上南逃仍有可能。为此，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务必刻不容缓地攻克塘沽、天津，切断敌人南逃之路。

在平津前线总部里，林彪披着狐皮领的日军呢大衣，悄然无声的坐在桌前藤椅上。

很久，很久，他从藤椅上站起来，朝罗荣桓跟前挪了两步，以深思熟虑的姿态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我们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否则，就要出错。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是塘沽还是天津？依我看，这里面有文章可作。”罗荣桓手里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先打塘沽，后取天津。”他接过林彪的话说：“我也想过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刘亚楼道：“形成决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改变它的充分理由。”林彪以坚定的语气说：“不能先打塘沽，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塘沽守敌侯镜如把他的指挥部早已设在军舰上，他的5个师随时都能逃跑。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全歼塘沽之敌。另外，在我们攻打塘沽时，北平、天津之敌有很大可能实行突围。一头跑了，一头惊了，打塘沽还有什么实际价值。”3人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林彪连夜起草紧急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毛泽东收到这份修改原定先攻取塘沽计划的电报，完全同意林彪等人的建议，立即复电：“放弃攻打塘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林彪看了电报，如释重负。罗荣桓、刘亚楼看罢电报，望着林彪。林彪道：“按照军委的电令办。”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率领6个纵队、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共34万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兵包围天津，气势磅礴。

林彪乘坐吉普车来到杨柳青以东的桑园。平津大战指挥所就暂时转移到这里。林彪发出他到达新指挥所后的第1号命令：派第12纵队主力去军粮城附近，严密监视塘沽之敌。

天津东临渤海，是个低洼河网地区，市区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切成许多片断，不利于大兵团作战。

天津守敌指挥官陈长捷，乃是傅作义心腹。他同傅作义都曾是阎锡山晋军的著名将领，彼此有多年的袍泽之谊。半年前，傅作义将他调来任天津防守司令兼警备司令官后，他立即令所属各部遍设永久性的坚固地堡阵地，市区内外共设有380座大碉堡，并以大碉堡为核心，布设了许多地堡群，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他又强令10万民工，环绕天津市区挖了一道宽10米，深4—5米的护城河，放进运河，海河水，使护城河水位保持3米多深。在护城河内侧筑成一道士墙，从墙顶到河底，高6—7米。土墙上附设电网，每隔20—30米有一座大碉堡。为扫清射界，便于发挥火力，将环城防线5里内的居民村一律拆毁或放火烧毁，一时烈火冲天，哭声遍野。

陈长捷声称：“天津已成固若金汤的要塞。”东北野战军34万人马将天津守敌13万人围困在天津。刘亚楼担任天津前线司令员，他在杨柳青召集总攻天津的各纵队指挥员开会，中共天津地下党早已送来了关于天津守军的

各方面情况的报告，对天津城坊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等，都有详细的说明。会议确定，攻打天津的部署是：首先实施东西对进，拦腰斩断敌人的防御体系。

然后，再用先南后北的打法，实行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逐一全歼灭天津守敌。

于是，刘亚楼命令：以 4 个纵队东西对进，第 1、2 纵队并肩从天津城西和平门地区突破，由西向东进击；第 7、8 纵队从天津东面民权门一带楔入，由东向西进击；两路部队在金汤桥会师。另外，1 个纵队，则由天津南的尖子山一线，向北攻击，1 个纵队作预备队。

陈长捷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河水放入护城河，每天派人在河上打冰，以防结冻。

并在赵各庄、陈官庄附近，堵塞了护城河通入海河的河道，让河水向广阔的西南郊倾泻，造成一片水淹区，以增加解放军作战的困难。解放军立即采取对策，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将碱河的水闸打开，让南运河的水流入碱河，切断天津护城河的水源。

随着攻城时间的逼近，蒋军内部更加惶恐不安。陈长捷一再宣称：“要战到弹尽粮绝为止，不考虑放下武器。”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和工业会理事长李烛尘向他探问局势，他说：“一切由傅作义主持，平津是一体，傅不会置天津于不顾。”陈长捷向守城官兵下了死命令：“加强城防工事，拚命挡住共军！”蒋系 62 军军长林伟俦召集连以上军官讲话说：“没有命令，不准冲锋，也不准撤退，要守稳阵地，与阵地共存亡。”蒋系 86 军军长刘云瀚对部下说：“上级要求一定要守住天津，我们打仗时要实行连坐法，临阵退缩者杀！”林彪、罗荣桓派通讯员给陈长捷等人送去一封信：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

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以及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市长杜建时看过信沉默好一阵子。

尔后陈长捷说：“复信。给他们写封信，礼尚往来嘛！”于是陈长捷口述、秋宗鼎写下封短信：

林彪、罗荣桓二将军：

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陈长捷嘴硬心里弱，回信之后，惊慌不安，一直考虑着回信是否有些措词不当？于是便派了代表毕鸣歧等 4 人出城同解放军商谈。

## 第三十四章 古城迎春

刘亚楼接见了毕鸣歧等人，对他们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

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并对首要分子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要在1949年1月11日8时前放下武器！”1月10日，4位代表第2次出城，要求放宽期限。刘亚楼准其推到12日18时前放下武器。

次日，4位代表第3次出城，声称：“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两位军长有些犹豫，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去。”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当即予以驳回，要其认清时局，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并再次告诉他们：“我们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解放军又通知来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的傅作义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守敌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门，听候处理，否则14日攻城。傅作义反命令陈长捷：“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唯傅作义马首是瞻，他发疯似地吼叫：“我们要效仿斯大林格勒战术，逐屋抵抗，坚守三四个月！与天津共存亡，必要时把天津全部烧毁！”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了！天津城西，李天佑的第1纵队、刘震的第2纵队；城东，邓华的第7纵队、段苏权的第8纵队；城南，詹才芳的第9纵队一齐向天津攻击。天津的大地开始颤抖，炮弹在吼，连绵不断。从天津和平门两侧至天津北站九里宽的地段上，炮弹如冰雹般地袭击敌人的防御工事，顷刻之间泥土飞扬，黑烟冲天，敌军碉堡被炸得四下崩塌，铁丝网、木桩、砂袋、冻土块全炸得飞上了天，敌阵地地雷也被引爆，地面到处是坑，铁丝网炸成一段段地东歪西扭。敌军炮火被压制住，根本无法还击。

经过1个多小时的炮击，西城和平门围墙工事和堡垒火力点，已大部被摧毁，并在西城42、43号碉堡之间，炸开一条数丈宽的大缺口，解放军将士随即向着纵深奋勇进击。

天津护城河此时结了冰，那蒋军原以为护城河不会结冰，每日放水，结果每放一次水便结了一层冰，冰愈结愈厚，河上已能行人。蒋军所恃的安全带，一下子不安全了。解放军从护城河冰上越过，向敌军阵地进击。

敌86军东阵地多处被解放军突破。刘云瀚派兵增援反扑，没有成功，解放军又突破62军的预备阵地，陈长捷急派总预备队保安师增援，被解放军一击即溃，败下阵来。

解放军从东西两面插进来，城南又被解放军猛击，各个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双方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蒋军坦克出动，立即遭到解放军反坦克炮猛烈轰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纵队分左右翼分头向市区猛进。巷战、街垒战十分激烈。蒋军从街心碉堡里喷射出交叉火力，封锁道路，从高楼上掷下手榴弹，从窗口拽出炸药包，用立体封锁方式抵挡解放军。解放军编成3人一组、4人一队的战术队形，交替掩护，穿插分割，进行逐屋逐街的争夺。战至黄昏，第1纵队左翼进到市中心区。

黄昏之后，蒋军纷纷向金汤桥靠拢，越挤越密，互相残踏，盲目扫射。解放军架起平射炮，将敌人的桥头碉堡摧毁，击毙敌师长，占领了金汤桥。

解放军西路2个纵队和东路2个纵队在金汤桥胜利合师，天津市的蒋军被拦腰斩断，敌阵地被分割成数块。

15日上午8时，解放军向敌警备司令部大楼发起攻击，用炸药将司令部大门炸开，冲进院中，同敌人逐屋争夺，很快占领司令部大楼。陈长捷已转到地下室，两名解放军战士跟踪而至，大吼道：“别动！举起手来！”陈长捷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们缴枪！我们缴枪！”尔后向全体守城蒋军下达了“缴

枪投降”的命令。

警备司令部附近便是广播电台，解放军进去之后，对正在广播的播音员说：“小姐、先生们，可以休息了！”几个小时后，这个电台换了另一种声音，它向全国宣布：“天津解放了！”天津战役共进行了 29 个小时，共歼敌 13 万多人，打死打伤 1.1 万人，生俘陈长捷、秋宗鼎、刘云瀚、林伟俦等将领，缴获各种炮 1100 多门，轻重机枪 3500 多挺，步枪 5.4 万多枝，汽车 800 余辆。

天津解放了，黄克诚以军管会主任的身份，走进天津。他不骑马，也没坐车，而是步行。他身边没有工作人员跟随，只有 1 个警卫员在身后，黄克诚身上棉军装和战士们一模一样。他在军管会办公室对大家宣布：“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困守在北平的傅作义此刻内心矛盾重重，他曾经是抗日爱国将领，后来又是华北“剿匪”总司令。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与蒋有较深的矛盾，但蒋介石把华北 60 万军队交给他统领，他便通电全国：“如果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早在 1948 年初，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接近能影响傅作义的人，促使傅作义起义。

在共产党物色的去作傅作义处工作的地下党员中，有傅作义的大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这时也从天津大公报社调来北平。在这些地下党员中，杜任之起了很大的作用。杜任之的公开身份是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教授，同傅作义是同乡，又是老交往，关系颇深。他的胞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又被傅提升为军医处处长。1948 年夏，杜任之便奉命由太原来到北平试图动员傅作义率部起义，但没有得手。他便退后一步，通过傅作义的恩师刘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刘厚同年近 7 旬，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心目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担任过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现在是傅作义的少将参议，出谋划策的人。刘、傅关系深厚。傅作义当年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能够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阎战争阎锡山逃到大连后，傅作义能够出任绥远省主席，后来傅作义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皆因刘厚同的高参起了作用。

杜任之通过他人介绍，和刘厚同一见如故。但涉及敏感问题，杜不得不十分谨慎。

他含蓄地问刘：“在目前形势下，傅将军是否会另作它图？”刘厚同不直接回答，反问道：“杜先生所说形势是指什么？”“国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共军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这是人所共知而且无法否认的事实。”刘厚同也持这种观点，便说：“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曾多次对宜生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合人民心愿，违反历史潮流，必然失败，依我看，南京政府维持不到一年半载了！国民党江河日下，这是不可逆转的。”“既然看清了形势，按刘老和傅将军的关系，何不劝他放弃目前固执的主张，另走一条生路和中共谈，和平解决北平。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傅作义本人也不失为一个英雄！”刘厚同道：“宜生是一个倔强的人，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至于和谈的问题，他也曾想过。他的意见是，按照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他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进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组织联合政府。”傅作义本着这种愿望，于1949年1月17日，通过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以及彭泽湘、符定一等转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先生：

我不愿再打内战了。为了保卫北平的古迹，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坏，我愿意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接受和谈。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我手下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想法、做法是彻底错误了。今后我决心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傅作义于1948年12月11日派出《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作为谈判代表，李炳泉又是地下党推荐，是傅作义和共产党两方的联络代表。傅作义让他们2人携带电台一部及报务员、译电员乘车秘密出城。他们来到三河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刘亚楼接见了他们。崔载之谈了傅作义的谈判条件：组织华北联合政府或华北行政委员会。刘亚楼则回答说：“解除武装是前提条件，绝不允许保存军队，更不同意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双方条件相距甚远，谈判无法进行。

崔载之回到北平之后，傅作义便命参谋长李世杰：“你好好准备打吧，双方条件差距太远，根本不能谈！”李世杰道：“我们是军人，在未实现和平之前，自然随时准备打仗。但打仗容易，谈和难，谈和需要更大的勇气。希望总司令慎而思之，不要感情用事。”正当傅作义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王牌35军被歼，他悲痛欲绝，哀叹道：“这下我的政治生命完了！我现在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只剩下坠毁、埋葬自己了！”他的恩师刘厚同走进来，口气坚定、不容置辩地说：“不！只要脊梁不断，就永远不会趴下，你的旧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蒋介石现在日暮途穷，自顾不暇，大局已不可为。他要你率部南下，是拿你当替罪羊，利用你来挽救他的危亡。可是能挽救得了吗？你如果南下，只能使北方子弟兵与他同归于尽。况且现在北平陷入重围，南下已出不去了。同时，你要回绥远也不可能了。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现在我们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远不如过去，但和议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护，这可是深得人心的大事啊！”傅作义的另一位老朋友、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也规劝说：“傅先生是发奋有为、励精图治的，但是，你毕竟是叶，所依附的根已经腐烂了。所以，你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所作为，局势变化太大，你不如趁此机会脱离腐根。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山东，对全局情况不甚了解。到了北平，我接触到的事情多了，看的也透了。觉得自己从一个低台阶攀上了高台阶。我现在知道跟蒋介石走下去是一条绝路。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不是蒋先生撤了我市长的职务，而是我何思源脱离了老蒋的羁绊！”傅作义请何思源去南京探听消息。何在南京下榻李宗仁住处。何、李是莫逆之交。

他们几乎每夜都谈得很晚，时而乐观，时而伤感，但更多的时间是一筹莫展，茫茫然。

何思源返回北平后对傅作义说：“现在南京政府四分五裂，勾心斗角，蒋介石还想靠杀人来稳住天下，这当然只是他一相情愿。他已经管不了我们，你应该彻底挖根。万万不可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那一套。对和谈不能再犹豫观望，已经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杜任之奉北平地下党组织之命，和刘厚同老先生一起告诉傅作义：“不要心灰意冷，立功可以赎罪。共产党光明磊落，有路线，有政策，一向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绝不会像蒋介石那样

不讲信用。只要接受和平条件，和平解放北平，对国家、对人民就是一大贡献，是会得到中共的宽待的，如果一再拖延，解放军围城已久，不能再等待，一旦城破，岂不是罪上加罪。”傅作义这才鼓起勇气，于12月23日给毛泽东发了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毛泽东接电大喜。他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派一位可靠之人，通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引见，当面对傅作义讲清：1、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傅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同时，我方也不能接受傅作义的这种做法。

2、傅一直追随蒋介石反共，我方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宣布他为战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更立即加强了。他可以借此大作文章，表示除与我们坚决打下去再无别的出路。而实际上，则与我们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使我们有理由赦免他。

3、允许傅编1个军。

4、傅给毛的电报已经收到，毛认为他的做法不切实际，应按上述办法办理。我方才能接受。

5、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欢迎今后再来联络以传达双方意见，但我方希望傅作义能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一道来谈判。

6、傅没有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是对的，今后也不能再去，否则有被蒋扣留当张学良第二的危险。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委托李炳泉进城，通过崔载之等人引见，当面向傅作义陈述6条意见。傅作义解除了一些顾虑，决定派少将处长周北峰为代表，邀请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教授一起去谈判。

周北峰早年留学法国，后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是傅作义的同乡，又是谈判老手，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肖克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朱德也接见过他，后来多次担任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与八路军谈判。

张东荪曾在1916年担任过北洋政府参议院秘书长，不久任光华大学文学学院院长，1930年起任燕京大学哲学教授。

周北峰、张东荪2位教授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在白石桥下车后，穿过火线，到了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院子，对上了“找王东”的暗号，由解放军的一个干部陪同，乘吉普车到了西山的一个小村庄，见到程子华，由他派吉普车把他们送往蓟县。

聂荣臻会见他们，并问他们：“傅作义将军这次谈判有诚意吗？”周北峰道：“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

决的条件。”“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传统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一起谈？”“我是奉命来谈全部问题的，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稍许，聂荣臻猛然问道：“历史常常很有意思地走回头路，不知傅先生是否还会采取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来个困兽犹斗、负隅顽抗？”“不会，不会。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迫，人心所向，只有这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将军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

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次日上午 10 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来到周北峰、张东荪的住处，和平谈判正式开始。

林彪首先发言：“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几位一起同你见面，想请你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周北峰道：“昨天夜间我已同傅先生打了电报，说我们已安抵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商谈。傅复电很简单，只有‘谈后即报’四字。”双方在 6 天内进行了 3 次会谈。刘亚楼把《会谈纪要》整理出来。纪要的最后一句话是：所谈各项务必于 1 月 14 日午夜前答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在纪要上签了字，周北峰也签了字。轮到张东荪时，他说：“我不签字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将军，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这次我不回城了，返回燕京大学后就起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周北峰回到北平，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并把《会谈纪要》交给他，傅作义看后并不说话，在屋里来回踱步。

是时，前来相助的前东北军将领马占山说：“我看你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刀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叫他帮你分担点，看怎么办好？”邓、马、傅是抗战时期的结拜兄弟，互相倚重，私交很深，傅作义欣然应诺，派专机去包头接邓宝珊来。

邓宝珊民国初年就是国民军宿将，久负声誉。他对蒋介石反共政策不满，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他曾去过延安，毛泽东请了李鼎铭为他治病。邓应邀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并以来宾身份致词，赞扬边区军民生产的成绩。抗战期间，邓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有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

1948 年 8 月，傅作义邀请在三原家中静观时局变化的邓宝珊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因有与傅商谈今后出路的打算，便顺从傅的安排，驻节包头，并将新 11 旅从榆林调到包头。

傅作义把邓宝珊当作最能信赖的人物，派专机把他接来北平。邓对傅说，只要你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这一番话解除了傅的后顾之忧。

## 第三十五章 蒋介石下野



1949年1月14日晚，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出门迎接。寒暄之后，便开始谈判。

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邓宝珊要周北峰电报请示。傅作义回电称：“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就在这时，蒋纬国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见傅作义，信中写道：宜生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专此敬候，勋安。

傅作义看罢信，笑了笑说：“请向总统致意，时到今日，一切全晚了。”蒋纬国道：“不晚，不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总统的意思是，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国家大局高于一切。”

我是炎黄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请向总统致歉！”邓宝珊、周北峰在通县谈判中，罗荣桓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次谈判只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对于绥远问题，将来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解决。1月16日，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

次日，邓宝珊带着林彪、罗荣桓给傅作义的一封信，回到北平。就和平解决北平的办法，信中写道：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由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0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上，而对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

傅作义看完公函，又联想到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的与南京政府和平谈判8条：（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他对邓宝珊说：“我决定接受离城改编，由你转告解放军方面，就说‘傅作义已决意服从人民’。”邓宝珊道：“好，只要你同意军队出城改编，一切具体执行办法，由我们去细谈。”他俩商定后，邓宝珊去执行。

蒋又给傅作义来了电报：相外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一面复电“遵照办理”，一面报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届时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蒋机着陆。次日，蒋机果然飞临北平上空，在解放军炮火轰击下无法着陆。蒋介石企图用飞机运走这个嫡系精锐军及装备成为梦想。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2)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3)城市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4)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5)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6)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7)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8)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9)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10)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11)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12)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3)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

(14)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2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队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31日，解放军举行正式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傅作义和邓宝珊于2月22日乘飞机到达石家庄，尔后改乘汽车到西柏坡，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们。傅作义向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泽东笑着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和傅作义畅谈起来：“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毛泽东在谈到对在战场上俘虏的原傅部人员的政策时说：“我们俘虏你的人，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傅作义不解，忙问：“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傅作义回北平后，于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8月，毛泽东派傅作义、邓宝珊到包头促成绥远国民党部队起义。

蒋介石派徐永昌携其亲笔信到包头，企图把傅拉去广州，遭傅严词拒绝；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的特务头目，对傅进行暗杀，其阴谋也被傅等粉碎。在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通力合作下，终于实现了绥远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兼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等职。邓宝珊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国民党江河日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向蒋提出与共产党谈判的建议，蒋介石不听，反而在1948年11月8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一次“破釜沉舟”的讲话，宣称：“抗战8年，‘剿匪’也要8年。”并声色俱厉地痛斥主和派即是向共产党投降，声称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他战斗到底的决心。陈布雷听了目瞪口呆，在整理记录时，想将其略去，蒋则坚持保留，这对陈精神上是个巨大的打击。

11月11日上午，陈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返回住所时脸色大变，一进门便问秘书，自己的脸色如何。秘书见他面颊灰暗无光，一副病容，便催他赶快吃饭休息。在饭桌上，他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对几个文秘人员侃侃而谈。从自己读书、考秀才、作记者、入参戎幕20余年的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时局，最后他深为感慨地说：“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不知道我不常说话，现在在委座面前说话的人多了，我更少说话，即使不得已而言，委座也未必肯听。”他又郑重地告诉副官和秘书：“让我安静些！我需要休息。”他从此闭门谢客，在一天半时间内，从容地写了一批遗书和杂记，然后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蒋介石获悉陈布雷之死，十分震惊，他在室内踱了几圈，一边踱步，一边思潮翻滚。

他对这个追随自己20多年，日日夜夜为他起草文稿，忠心耿耿，又一尘不染的人死去，痛感如失左右手。他不禁提起笔，颤栗地写了一幅横匾：“当代完人”。

蒋介石已是黔驴技穷，为了争取美国对他的支持，派张群到华盛顿为之说情。但张群询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使告知，前往游说恐无济于事，张群只好作罢。虽给蒋介石浇了一盆冷水，但他并不死心，1948年11月间美国大选，蒋介石派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赴美，携款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期杜威当选后对蒋之国民政府以更多军事和经费援助。不料选举结果偏偏是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蒋之举十分恼火，蒋因此更加被动。蒋不愿看到美国对他逐步冷淡，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请美军将领来华指挥作战，让宋美龄去美作秦庭之哭，让张群去活动司徒雷登等等，但均无结果。美国“弃蒋扶李”决心已定。

蒋要阻止共军过江，唯一可恃之兵仅剩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而蒋不下野，华中部队不仅不为蒋用，反会成为变生肘腋的祸源。蒋虑及这一点，深感恋栈下去，美国人的脸色也愈来愈不好看，不如择一时机，再来个“以退为进”的故伎重演，给桂系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自己则可得一喘息，退居幕后争取3至6个月时间，训练200万新兵，再行卷土重来。12月4日晚，蒋介石召见了曾做过李宗仁幕僚的吴忠信，要他准备接替吴鼎昌当总统府秘书长。蒋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李德邻上轿。”吴忠信当天就向李宗仁透露了这一信息。10天后，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同李宗仁商谈蒋下野后

问题，他们达成了非正式协议：1、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2、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3、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4、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蒋介石见到此协议，怫然作色曰：“去便去耳，我一走开便算了，为什么要协议，提出如此许多的条件呢？”蒋介石下野之议无形停顿，李宗仁急欲上台之情按捺不住，他让吴忠信转告蒋：从反共来说他与蒋的利害是一致的，他的成败，与蒋氏息息相关，希望蒋能信任他，放手让他干去。幸而挽回危局，不但是国家之幸，蒋个人对国家、人民也有个好交代。然而蒋毫无反映。白崇禧愤然表示：“如果局面还是不死不活，我要将军队拉回广西再说。”李宗仁也认为时局岌岌，不容坐视，决计与白联合采取行动。

12月24日，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发出“亥敬”电：介公赐鉴：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重20余年，当兹危机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蕘：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白崇禧的通电虽然语气和缓，但驱蒋的态度咄咄逼人。李宗仁在京通过甘介候等人也公开亮出了“和平主张”的5项要求：(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离30里；(5)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李宗仁明确提出：“总统下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蒋介石看了“5项要求”，愤然说：“他李宗仁做副总统是华盛顿撑腰，他今天逼我下台也是华盛顿撑腰，娘希匹，打狗要看主人面，现在他们却在放狗咬人，实在可恨极了！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权，太可恨了！”蒋介石正在骂人，秘书慌慌张张地送来一份急电，蒋介石打开一看，不料是程潜发来的“艳电”：介公惠鉴：腊鼓频催，又逢残年；局势恶劣，非言可喻！生灵涂炭，变本加厉，今日之下，惟有言和，盖非如此不能救中国也！而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事，则非吾公辞职，不能顺利进行也！以吾公一人之辞职而换得中国之救。

白崇禧邀请湘、鄂、赣、豫、桂5省参议会会长去汉口，成立了“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并以民意机关之名，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蒋氏“对个人进退问题作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

12月30日，白崇禧又给蒋介石发出“亥全”电：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平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

创造新机，试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战和，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退请趁早英断。

桂系急欲上台，蒋介石不能不吭声了。他借除夕夜邀请李宗仁以及五院院长、国民党中常委 40 多人到黄埔路官邸餐叙。蒋介石满腹愁肠，但不得不勉强装出一副笑脸，招呼大家就坐。大家面色阴沉，表情忧郁，既无谈笑之声，也无碰杯之兴，好酒好菜，哪里还吃得下。饭后，蒋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蒋讲话时板起面孔，似乎十分恼火。

在讨论时发生争论，蒋介石更加恼火。他愤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李宗仁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白崇禧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1949年元旦，蒋介石给白崇禧拍去一电：“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白崇禧不仅不“持以宁静”，反而活动得更加厉害。河南、湖北省参议会继续发表通电，尤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的通电措词激烈，有“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等语。武汉街上处处贴出“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谈和”、“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等醒目标语。

蒋闻白态度日趋激烈，乃于1月3日赴李宅，要李、白以大局为重，让他有余裕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然而李、白进逼更甚。市上复传“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等流言。蒋介石担心迟迟不去，势必激起事变。到时不仅于事无补，局面也将不可收拾。便派蒋经国去上海，命令将中央银行的3000万元银元和92万两黄金、蒋介石私人的4200两黄金，移存台湾。过了两天，又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布设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1月14日，蒋介石看了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认为这是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再无恋栈的可能。于是马上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在人事上，也重新做了部署，把京沪警备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他的心腹将领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命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蒋介石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

蒋介石还特别授权他的特务机关“中统”对不受蒋介石领导者予以“制裁”。为实行这个恐怖计划，秘密成立了14个“特派队”，由特务头子刘芳雄负责。“特派队”于1月19日在上海大逮捕。特务机关决定，将重要的“政治犯”迁往华南，情况紧急时可予以枪杀。

1月21日下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宣布下野。

## 第三十六章 “代理总统”

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22 日下午 4 时 10 分乘“美龄号”专机离开南京。飞机起飞后，绕南京城一周，望着巍巍钟山，浩浩长江，想到江山依旧，人事已非，蒋介石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1 个半小时之后，专机降落在杭州笕桥机场。浙江省府主席陈仪同机到杭。

冬日苦短，暮色苍茫，杭州已是万家灯火。蒋介石一行驱车沿西湖前行，来到坐落在西冷桥畔的“楼外楼”。陈仪在这里设宴为蒋介石接风洗尘，以尽地主之谊。出席作陪的，有同机到达的蒋经国、陈诚、俞济时，以及奉召赶到的汤恩伯。

“楼外楼”有一道名菜叫“西湖醋鱼”。上桌前临时从西湖的鱼池中抓来活蹦乱跳的鲜鱼，立即宰杀，加上烹调别具特色，使这道名菜誉满中外。过去，蒋介石每次到杭州，都要品尝这道富有家乡风味的佳肴。但今天却不同，心事满腹，食不甘味，面对着刚刚端上桌的“西湖醋鱼”，蒋介石连筷子也没有动一下。

善于察言观色的陈诚、俞济时等人，劝蒋吃菜喝酒时都说些阿谀奉迎、讨蒋介石喜欢的话。但陈仪心直口快，常常口不择言，在劝蒋吃鱼时说：“蒋先生，俗话说：拿得起，放得下。来，尝尝西湖醋鱼的味道吧！”不料，陈仪的这句话却戳到了蒋介石的隐痛处，只见他脸上由青转红，由红转白，一怒之下，拂袖而起，说声“不吃了，走！”就悻悻然离席而去，并且不到他经常下榻的西湖岸边的“澄庐”去住，而以第二天乘飞机方便为借口，改住在笕桥空军军官学校，以为离陈仪远一些，一来可扫除心头的不快，二来这儿也比较安全可靠。

陈仪原名陈毅，曾是光复会会员，和徐锡麟、秋瑾等相熟。1905 年光复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陈仪便是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比陈仪晚好几年；陈仪和蒋介石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蒋介石又比陈仪晚 5 期，所以蒋介石对陈仪很尊重，有时称陈仪为老师，以师礼相待。陈仪从 20 年代、30 年代，直至 40 年代，在长达 30 多年的民国史上，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早在北伐时期就是师长、军长，后来成了国民党中声名显赫的二级上将。陈仪早就预言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然而他没想到共产党会胜利得这样快，蒋介石会失败得这么惨。陈仪参加了“逼蒋和谈”及“逼蒋下台”的大合唱，还竭力劝蒋“急流勇退，出国一游”。蒋介石恨一切逼他和谈、下台的人，对陈仪同样也是怀恨在心。

陈仪秘密接受共产党的策动，毅然转向人民，他效法傅作义和平解放北京的榜样，暗中准备在京沪杭地区和平起义。殊不料，凡事不密则成害，他秘密谋划的这件机密大事，被最亲密的人汤恩伯出卖。汤恩伯是他一手提携，情同父子侄，汤恩伯原名“克勤”，陈仪对他有知遇之恩，情同父子，恩重如山，便将“克勤”改为“恩伯”。陈仪从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他，他想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再拉汤一把，对汤再提挈一次，哪知汤恩伯却向蒋告密。蒋介石免了陈仪浙江省主席职，秘密押送到台湾枪毙，演出了一场恩将仇报的恶作剧。

蒋介石在一群高官的护送下来到溪口，他虽不作总统，但仍是国民党总裁，主持中常会，凌驾于李宗仁之上。李宗仁没想到蒋介石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蒋介石下野后两个多星期，南京国民政府就土崩瓦解。

李宗仁于1月24日举行总理纪念周那天，正式上任，举行了“代理总统”的就职仪式。

然而京城已人去楼空。行政院院长孙科避去上海，中央各部则奉命搬家，总统府各局官员也早迁到广州，偌大一个南京变成一座“空城”。

李宗仁便将蒋介石的悍将权臣暂放在一边，利用“代统”职权，恩威并重，逐步去销蚀蒋与其亲信的联络，把权力一步步夺到自己手中。李上台伊始，即以“早启和谈”为第一要务，视事当天，即对外正式宣布愿与中共就“和谈”问题开始洽商，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为之斡旋。又派邵子力等先后赴沪，分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民主人士、社会名流，请他们为促进和谈有所赞助，李宗仁特饬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1)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2)取消全国戒严令。

(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4)释放政治犯。

(5)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李宗仁以“代统”名义和亲笔信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但蒋已把张学良押解台湾，软禁在新竹上井温泉。

李宗仁派程思远专程赴台与陈诚交涉，结果得到的只是蒋介石托陈诚之口向李宗仁传达的训示：“我们宪法所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行政院长尽管由总统提请任命，但前者应向立法院负其责任，所以国家元首有什么决策，应提请行政院协商。”杨虎城由军统特务秘密监禁在何处，外人不得知晓。李宗仁的命令对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形同废纸，没有蒋介石的手令，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孙科内阁是以“举党一致”自诩的“巨头内阁”，它包揽了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等太子系、政学系、CC派显要领袖在内的各式人物，却偏偏没有桂系的人。李宗仁亲赴上海与孙科晤谈，要其速返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但未有结果。后来孙科在蒋授意下，于2月4日擅自将内阁迁往广州。国民党当局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即溪口的蒋介石、南京的李宗仁和广州的孙科。

孙科率行政院到达广州，要占用迎宾楼，便不客气地把戴季陶赶到条件较差的东园招待所。戴气愤不过，大骂孙科。他见国民党政府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纷纷逃往台湾，广州城里乱作一团。有人劝戴去台湾，他十分坚决地说：“不必去！”他想共产党定会取得胜利，会统一中国，他以前接触过马列主义，接触过共产党，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么样，决意离粤赴川，回老家去。当时他的儿子戴安国任交通部航空署长，已备好了专机，因气候恶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戴季陶服安眠药死去。

戴季陶的把兄弟、称戴为“畏友良师”的蒋介石闻耗悲痛，中夜唏嘘，发出明令褒扬，谓戴季陶为“才识恢宏，勋尤懋著”云云。

李宗仁决定采取以柔克刚之策，以虚怀若谷之举，争取舆论同情，拉拢中间力量，分化蒋、孙势力。他首先竭尽全力把尚留在京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立法院院长童冠贤争取过来，仰赖于、童之襄助尽快使立、监两院复

会，以此向孙科的行政院施加压力。

又以“于此飘摇之际，肩起责任”相号召，召集在京国大代表餐叙。餐叙会上，李氏夫妇一唱一和，诉陈“苦衷”，以博“国代”对“代统”的同情和声援。尔后又让复会后的监察院及临察委对孙科之“渎职”提出弹劾。除此之外，李宗仁派黄绍竑、黄旭初携带李、白给粤籍军人余汉谋、张发奎、薛岳等人的亲笔函入穗。二黄积极活动，果然不辱使命，粤、桂两系军人开始尽释前嫌握手言欢。新任海南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受余、张、薛之托，专机飞汉与白晤面，随后又转京晋谒李宗仁。李当即命李汉魂为总统府参军长。

李宗仁又亲自出马，于2月20日飞往广州，李态度谦恭，对孙科尤甚，左一个“拜望孙院长”，右一个“务请返京主持一切”，使孙科极为尴尬被动。李宗仁又驱车去薛岳官邸，与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叙旧言欢”。“南天王”陈济棠做寿之际，李宗仁借机前往庆贺，手书“如冈如陵”寿屏一幅。陈济棠被蒋介石搞垮之后，只存国民党中委空衔。然陈虽羽翼被翦，实权被夺，但在粤仍为一元勋，粤将余汉谋、徐景唐、李杨敬、李汉魂等都出其门下，李宗仁看准了这一点，同陈济棠闭门深谈。李请陈出任海南行政长官，接任李汉魂遗缺，陈慨然应允。粤将张发奎等一向同蒋有矛盾，同李宗仁极易合拍。

李宗仁莅穗2天，瓦解孙科在粤势力的工作进行得颇为顺手，粤籍大员纷纷附李，要孙返京。孙科不得不向李低头，答应把行政院搬回京城。

孙科在未返京之前，立、监两院在李宗仁的默许下，开始对孙科群起责难，孙科与蓝妮之颜料案又被旧话重提。待孙科灰溜溜从穗来京后，又受立、监两院鸣鼓而攻，指责为“和平之障碍”、“民国以来最恶劣无能之内阁”等等。孙科无招架之力，乃于3月8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孙阁至此倒台。

蒋介石本来怂勇孙内阁南迁，现见舆论对孙不利，怕引火烧身，便见好就收，示意阎锡山出面“协调府院矛盾”，又暗示：继任行政院长人选让李自行决定。

被解放军围困在太原的阎锡山看到这个机会，即指使在南京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杨爱源，在李宗仁面前巧于周旋，意图是请李宗仁发表阎锡山为行政院长，李宗仁便命人打电报给阎锡山，称阎名望很高，不敢以行政院长一职委屈。不久，李宗仁又打电报给阎锡山：“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阎锡山正欲逃离太原，接电报后，任命了个5人小组负责太原所有事务，自己匆忙登上飞机去了南京。

李宗仁同白崇禧几经商量，认为何应钦有利用之处，便竭力相邀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何应钦正在战战兢兢不敢拜命之时，蒋介石却深知何应钦有利于他对桂系的控制，劝何组阁。于是何立即提出以蒋之亲信黄少谷为行政院秘书长，表示愿接受蒋的监督。

3月23日，何应钦正式就职，他回到家中，便有蒋邦特务头子谷正纲在他家“恭候”多时，声言要与何“好好谈一谈”。在此情况之下，何应钦对蒋奉命惟谨，动辄向蒋请示，不敢越雷池半步，李宗仁交办的事，何阁却无一实现。李宗仁向行政院提出免去参谋总长顾祝同职务，换由白崇禧继任，何则向蒋请示。溪口复电：“参谋总长顾祝同不能动，白崇禧千万不可用。”李宗仁提出要把蒋运到台湾去的大量黄金拿出部分支配，何亦向蒋请示，得复电：“台湾金子李宗仁不能管”，何都不敢违命，白崇禧愤而怨何“为人懦弱，没有魄力”。何反唇相讥说：“你们不怕同蒋介石闹翻，我却不能这样。”



李宗仁悉心组织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 4 位老人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在桂系人员黄启汉的陪同下北上。李宗仁让黄启汉携带他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嘱咐口头向中共领导人转达 6 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

（2）和谈以毛泽东提出的 8 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

（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

（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

（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

（6）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代表团到北平后，又专程赴西柏坡，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对李宗仁愿与中共就和谈进行协商的姿态抱欢迎态度。

2 月底，代表团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南旋。毛泽东要他们转告李宗仁：“中共方面对他上台后有无实际谋和能力最初是很抱疑问的，现在和谈之门既启，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否真正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如果李、白果有反蒋、反美、接受中共方面 8 项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峰、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CC，结果必为复兴、CC 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但李宗仁的和谈目的是延缓共军进攻，阻止中共渡江，留下半壁江山给自己经营，日后徐图再举。他对其部属说：“我要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蒋介石为了防止把桂系逼上与中共妥协之路，频频请人向李、白递言：只要李、白能“站稳本党立场”，与蒋目标一致、行动一致，蒋当竭力赞助李代总统备战谋和，自己则“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蒋、李、白“备战谋和”是一致的，李、白演出了双簧戏，李宗仁在台上信誓旦旦主和，白崇禧在台下扩军备战。

何应钦就职次日，行政院召开政务会议，议决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入刘斐）为代表组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其余为随团工作人员、顾问等。何应钦又召集会议研究了和谈腹案等重大问题，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和谈依据。国防部也依次拿出一个“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此腹案由张治中带至溪口向蒋介石汇报，得蒋首肯。尔后由李宗仁提议在南京成立“和谈指导委员会”，以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为委员。3 月下旬，中共方面也发表了和谈代表团名单，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其成员有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等，并确定了谈判日期。4 月 1 日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其随员、秘书以及顾问屈武等一行 20 人飞往北平。

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壮大，1949 年初，中共中央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改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改编后的人民军队为：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总参谋长 周恩来  
总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  
副总参谋长 聂荣臻 叶剑英  
总政治部副主任 傅 钟  
秘书长 杨尚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 第一野战军

司令员兼政委 彭德怀 第一副司令员 张宗逊  
第二副司令员 赵寿山 参谋长 阎揆要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辖第一、二兵团

#### 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 刘伯承 政 委 邓小平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张际春 参谋长 李 达  
辖第三、四、五兵团

#### 第三野战军

司令员兼政委 陈 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 粟裕  
第一副政委 谭震林 参谋长 张 震  
政治部主任 唐 亮  
辖第七、八、九、十兵团

#### 第四野战军

司令员 林 彪 第一政委 罗荣桓  
第二政委 邓子恢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谭政  
第一参谋长 肖 克 第二参谋长 赵尔陆  
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十九、二十兵团、  
铁道兵团，其中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铁道兵团为总部直属。

#### 地方部队

##### 西北军区

司令员 贺 龙 政 委 习仲勋  
副司令员 王维舟 参谋长 张经武

##### 东北军区

司令员兼政委 高 岗 副政委 李富春  
参谋长 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 周 桓

##### 华北军区

司令员 聂荣臻 政 委 薄一波  
副司令员 徐向前 参谋长 唐延杰  
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

##### 华东军区

司令员 陈 毅 政 委 饶漱石  
副司令员 粟 裕 张云逸 副政委 谭震林  
政治部主任 舒 同

华中军区

司令员 林彪 第一政委 罗荣桓  
第二政委 邓子恢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谭政  
参谋长 肖克

## 第三十七章 和谈破裂

在解放军进入北平的那一天，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车子直接开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大门口，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握着客人们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周恩来请米高扬等脱下大衣，并让警卫员把大衣上的尘土打扫干净。客人们在院子内洗了脸，然后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坐下喝茶休息。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等一一作了介绍，接着就亲切地交谈起来，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担任翻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任生活翻译。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毛泽东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我们很想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也听听你们宝贵的意见，这样一定会有好处的。”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等共会谈了3次。

在交谈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将革命进行到底问题、当前战争形势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等。

米高扬等要启程回国，临别时毛泽东亲切地和米高扬等握手告别，希望以后在北平再见面，并请他们转告向斯大林同志和苏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食堂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重要工作人员12人。

毛泽东特别高兴，他穿上新棉衣，迈着稳健的步伐，面带笑容地走进会场，代表们看他进来，热烈地鼓起掌来。五大书记在主席台上就坐之后，毛泽东便开始作重要报告。

在军事战略方面，毛泽东说，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有天津、北京、绥远3种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动它，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主力的主要部分，尔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

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必须是一个工作队。200 万野战军必须准备参加解放城市和在广大农村建立和掌握政权的工作，来解决新解放区干部不足问题。在乡村中，要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城市中，要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前提。

毛泽东说明了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说，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要求我们的同志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方法，学习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防止骄傲自满，防止个人崇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6条规定：(1) 不做寿；(2) 不送礼；(3) 少敬酒；(4) 少拍掌；(5) 不以个人名字作地名；(6) 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部队领导人谈了关于解放军渡江问题。会议结束后，五大书记同代表们握手告别。

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彭老总很辛苦，第一野战军是能吃苦的，苦中有乐嘛。”

希望你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早一点从新疆凯旋归来。”彭德怀表示：“我们一定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在送别邓小平、陈毅时，毛泽东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再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修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的问题。”邓小平说：“在淮海前线，各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大军渡江还需要各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分别乘坐吉普车，少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团的手枪连等乘坐卡车，离开西柏坡，经唐县的淑闫村、保定到涿县，然后改乘火车去北平。

临行时，五大书记兴奋地谈笑着。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他们在涿县换乘火车，叶剑英由北平赶来迎接他们。毛泽东在火车上深有感慨地说：“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

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火车开进北平清华园站，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在那里迎接。他们便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休息。周恩来没有休息即去西苑机场，准备下午举行入城式的工作。

下午接近 5 时，毛泽东等乘坐小卧车来到西苑机场休息室，稍微休息一下，叶剑英、聂荣臻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别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受检阅的大约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 3 万人。毛泽东频频向指战员招手，并向他们问好。

检阅部队后，毛泽东等又来到北平市 1 万多名群众代表跟前，亲切地接见他们。然后乘坐吉普车向 100 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站之处驶去。

毛泽东等都下了车，同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亲切握手，热烈问候。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以前见过面的，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等。毛泽东这次见到他们，真是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有些不熟悉的人士，周恩来、叶剑英、彭真就一一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称他们老先生、老朋友。他们称赞毛泽东是伟大人物。毛泽东等同他们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

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告别之后，毛泽东等和中央机关移住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后来毛泽东等搬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搬到了北平，有利于和平谈判的活动。4 月 2 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白崇禧的秘密谈判代表刘仲容。李济深等以第三者资格派出神秘人物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 3 人由北平飞往南京。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个别交谈。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

毛泽东通过刘仲容、黄启汉以及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们接受真正的和平条件，那么：（1）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代总统。

（2）如果谈判成功，欢迎李宗仁、白崇禧到北平来，也欢迎何应钦来。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李宗仁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量。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们对等，毛泽东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至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

毛泽东又谈到了白崇禧，说：“只要白崇禧先生放弃企图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共划江而治、维持江南半壁河山的幻想，不要再打维持不住整个江南‘大局’、就维持广西‘小局面’的算盘，我们在军事方面可考虑给予白先生

以较大的让步。但是，解放军不过江不行。如果白同意谈判，那就在武汉不要动，我们可以绕开走，还可以考虑将河南信阳到湖北武汉一线地区及安庆一带已被我军包围的蒋军予以解围。如果白崇禧要撤退，我们可以不追击。他可以退到长沙甚至退到衡、宝一线再看。如果他要退到广西，也行，我们可以3年不进攻广西。你白先生喜欢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你带五六十万人，做个大统帅好不好？白先生要解放军不过江，这办不到，也阻挡不住。”李济深也转告李宗仁，要其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

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应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应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为李宗仁先生安全考虑，可先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

李宗仁仍幻想“划江而治”，白崇禧手下有几十万华中部队的实力，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江山尚坚具信心，当他得知解放军一定要渡江时，当即表示：“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要谈什么？”白崇禧的态度直接制约和影响李宗仁。4月7日，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后，给毛泽东发去“卯阳”电：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商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8条为基础。

宗仁慎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之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李宗仁的“卯阳”电，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其实质乃是拒绝中共方面的某些和谈条件。毛泽东立即给李宗仁复电：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

贵方既然同意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8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至4月13日举行第一次会谈。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说明。对于这个8条24款的草案，南京代表团提出了40余处修改意见，中共代表团对南京代表团提出的凡是有利于推进和平事业的意见，都尽量采纳了。中共并对草案作了20多处重要修改，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南京方面仍坚持“就地停

战”和“划江而治”两点，中共方面认为不能再作让步。

15日，第二次正式谈判中，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交给了南京政府代表团，规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的日期，要求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须于20日前作出表示。

南京代表团张治中等一致认为，尽管中共的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力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好。因此，他们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

16日，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李宗仁此时已完全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既不敢擅作主张接受协定，也不敢断然回绝。于是，他接受何应钦的建议，立即派人把《协定》，送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看到《协定》，击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又对亲信们说：“可恶之极！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蒋介石要国民党机构举行会议，作出绝不接受《协定》的声明。

李宗仁更加进退维谷。黄绍竑对李十分恼火，认为和议到决定关头，李不去向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咨询，反而庸碌迟疑，甘愿听命溪口，作茧自缚，不智孰甚。

李宗仁召集桂系主要成员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人，举行秘密会议，黄绍竑首先向众人介绍了北平和谈内情，解释了《国内和平协定》内容。并说：“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在政治上，也就不可能取得绝对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决不能同蒋介石同呼吸、共命运。蒋还可以退守台湾，我们形格势禁，无路可走，唯有和局，才足以自保。”白崇禧不以为然，他看了《协定》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重，至于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至于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要吃光。”黄绍竑还要解释，白崇禧不耐卒听，甩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李宗仁则始终沉默无言，面部没有表情。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白走后，黄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上面有他在飞机上写的一道词《好事近》，给李宗仁看：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

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

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药，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宗仁看后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黄绍竑：“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8项条件为基础了！”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尔后说：“难呀！

即便这个协定签了字，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一张废纸呀！”此时，桂系内部已产生严重分歧，白崇禧的态度又毫无商洽余地，而白的态度对李至关重要，没有白的赞同，李宗仁即使签了和议，也不能保证贯彻。李宗仁已别无选择，他依从了白崇禧的主张，打消了接受《协定》的想法。

4月19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开会，作出决议：电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中共方面早就识破了南京政府所玩弄的花招。

20日晚，南京首席代表张治中以长途电话通知李宗仁：“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当日深夜，李宗仁、白崇禧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至此，和谈完全破裂。

### 第三十八章 占领南京

张治中向中共方面表示，定于24日回南京“复命”。周恩来对张治中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留了下来，白崇禧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代表，代表们一个也没有回去。周恩来还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将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9人，乘来接代表的飞机到了北京。

是时，李宗仁、白崇禧一致认为要让国民党政权苟延下去，蒋、李二人必有一人主政，否则互相牵制，必得同归于尽下场。蒋介石此时得知李宗仁拒绝《协定》，约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同赴杭州会商大计。于是，蒋、李、白、何在杭州笕桥航校聚合。

蒋问李：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李宗仁表示：和谈使命既终，求去之心已决。蒋介石知道眼下自己复职并不适时，便假意慰勉，为李打气，要李“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蒋又反守为攻，乘机提出成立“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其委员会主席自然由蒋担任，李宗仁为副。李宗仁无法反对，只好默认。会议还作出3项决定：（1）政治上，宣告和谈破裂，政府今后惟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

（2）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力，参谋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3）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的联系。同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从南京迁往广州。

国民党在发动“和平攻势”的同时，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便策划凭借长江天险，增强布防，阻挡解放军南下。长江防线调集了陆军115个师，海军舰艇120艘，空军飞机600架，共75万兵力，在宜昌到上海1800公里沿江线上，分设两个战区：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挥15个军约25万人防守，



其中有 13 个军守备沿江地带和武汉，两个军配置在长沙、南昌等地，作为机动部队。湖口以东由汤恩伯指挥 25 个军，约 45 万人防守，其中 18 个军守备沿江地区，7 个军配置在浙赣路及浙东等战略纵深地区。

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地区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进行持久防御，以待国际事变。但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哪里抵挡得住解放军的攻击。

中共中央任命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制定《京沪作战实施纲要》，纲要决定以第三野战军陈士榘、袁仲贤第八兵团和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共 8 个军 35 万人组成东路军，由粟裕、张震指挥，在江苏江阴至马鞍山段渡江；以第三野战军王建安、谭启龙第七兵团，宋时轮、郭化若第九兵团共 7 个军 30 万人组成中路军，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渡江；以第二野战军陈锡联、谢富治的第三兵团、陈赓的第四兵团、杨勇、苏振华的第五兵团共 9 个军 35 万人组成西路军，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棕阳镇到湖口段渡江；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由西路第二野战军指挥，在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主力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作战实施纲要》。各部队立即作好了渡江的准备工作。

4 月 21 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解放军指战员：（1）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2）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3）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定案。

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4）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解放军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强大的渡江战役。4 月 20 日夜，谭震林指挥的中路军第七、九兵团，在当涂到贵池段首先发起多路强渡，撕开了 200 多里的大缺口，不到 24 小时，30 万解放军突破敌阵，占领长江南岸，随之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进击。汤恩伯急忙赶往芜湖，派兵堵击突破口，然而军无斗志，纷纷溃退。蒋介石视为“固若金汤”的防线被突破。

西路大军驰向长江彼岸。陈赓的第四兵团在九江以东，从彭泽到东流沿线突破蒋军江防。西路大军所向披靡，占领了马当、彭泽、贵池等地。东路大军在江阴的长山、申港以及杨中等地渡江成功。江阴要塞官兵，在炮台总队长、共产党员唐秉琳带领下宣布起义，要塞司令戴戎光被共军俘虏；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带领 25 艘舰艇在南京江面起义，加入解放军的行列。

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原定 4 月 23 日晨 2 时，开始撤往广州，由于南京城内已听到解放军炮声，立即陷入一片仓皇败逃的惨淡景象中，人群夺路南逃，道路堵塞，直到早晨 6 时才挤出城去。李宗仁怅然乘专机南逃，途中改变航向，转飞桂林，他对蒋介石成立“非常委员会”非常反感，认为是蒋介石由

幕后走向前台的先兆，用心至为阴险。李宗仁思前顾后，认为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一即与蒋介石公开摊牌，要他保证绝不再干预政治、军事、财政和人事。李宗仁在机上召集同机幕僚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等谈了自己的设想。并决定派程等分头去汉口、广州找白崇禧、张发奎等洽商，他表示决不糜烂广西，绝不下广州。

23日，解放军35军渡江直取南京。是时，南京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发出贺电说：“南京迅速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毛泽东心潮澎湃，欣然提笔，作七律一首：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解放军胜利渡江之后，迅速调整部署。东路军、中路军在粟裕指挥下，不顾疲劳，不为小股敌军钳制，分别神速南下，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包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南逃之敌；以中路军和西路军一部迅速向苏州、杭州和浙赣进击，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切断汤恩伯部和白崇禧部的联系。

4月27日，解放军东、中路军占领了苏州、吴兴，并将芜湖、南京、镇江地区南窜之敌第4、28、45、51、66军包围在郎溪、广德山区。经2日激战，将8万余敌人全部歼灭。

5月3日，王建安、谭启龙的第七兵团占领杭州。5月4日，陈赓第四兵团占领浙赣线的上饶、贵溪、横峰；陈锡联、谢富治的第三兵团占领了金华；杨勇、苏振华的第五兵团占领了衢县。在上述追击中先后歼敌第68、88、106、73军各一部，残敌向福建、浙东逃窜。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

4月2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8章，要求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共同遵守：（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日常生产或营业，不受侵犯。

（3）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经营的工商企业、银行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不受侵犯。

（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国民党的党政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不俘虏、不逮捕、不侮辱。听候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接收处理。旧职人员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予以分别录用。

如果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予以惩办。

（6）一切散兵游勇自动投诚报到，上交武器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7）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农民群众应

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初步的土地改革工作。

(8) 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否则受法律制裁。

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

第三野战军王建安、谭启龙第七兵团继续向浙东、浙南地区进军，解放浙江全省；陈士榘、袁仲贤第八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并肃清苏浙皖边境溃散之敌；集中宋时轮、郭化若第九兵团和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及第八兵团的一部共 8 个军攻取上海，令第二军主力在浙赣路金华、东乡段休整待命。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罗荣桓第四野战军，以先遣兵团伺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第三野战军部队单独经营东南地区。渡江战役前夕，三野司令员陈毅曾向中央提出：二野部队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在渡江后由二野占领并经营富庶的江浙和整个东南地区，三野部队在完成渡江战役后再担负进军大西南的任务。

毛泽东不但没有同意，还曾个别征求过陈毅的意见：你还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毛泽东考虑到三野前身大部分是由红军江南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对江南水乡地带作战比较熟悉，而二野前身则由红四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第 129 师，过去长期活动在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而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去大西南作战相宜。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曾召见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要求将南京的 5 大厂（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机器厂）拆搬台湾。孙几次婉言拒绝，蒋则紧追不放，最后孙托词拆迁费无着落，蒋又手令发给 5 个厂 132 亿元的拆迁费。孙不得已，只好掉了一部分装船，蒋介石下野。孙又将拆掉的部分卸船运回。但蒋介石在溪口仍派人催孙越崎尽快拆迁。孙找了李宗仁才把拆迁的事压下来，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的孙越崎撒烂污，他不迁厂，又骗了我的钱。”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上海，督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国民党政府库存的所有黄金、白银、外汇悉数运去台湾。从上海抢运出大量金银、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通过海运的就有 1500 只船的耗资。一直到了 5 月 22 日，蒋介石还要蒋经国到上海抢运物资。这样，既掐断了李宗仁政权的经济命脉，又对日后稳定台湾经济发生重大影响。

蒋介石从国库运走多少黄金？台湾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过准确数字。有几种说法：——当年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说，用海关缉私舰装运了 80 多吨黄金与 120 吨白银到台湾。

——国民党文人陈孝威说，黄金 50 万两。

——曾担任转运工作的詹特芳说，美金 8000 万元，黄金 92.4 万两、银元 3000 万元。

——李宗仁的秘书梁升俊称：国库尚存黄金 280 万两，美钞 5000 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美金 1500 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合计约美金 2 亿余元。

4 月 25 日，蒋介石和蒋经国悄然离开溪口，乘轿车前往象山港，从那里登上“泰康号”军舰，驶往上海，途经宁波时，停泊 3 天，并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表示反共到底，无论何时何地，必将始终不二。

4 月 30 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汤恩伯和上

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对淞沪防务作了周密部署。守卫上海的国民党军队有9个军又2个师、海军第一舰队30多艘舰艇、空军4个大队130多架飞机、炮兵、装甲兵、工兵、通讯十几个团，以及交通警察、保安警察、宪兵等，合计约20万人。蒋介石、汤恩伯将上海分为3个守备区，即沪西北、沪西南、浦东，整个守备阵地由外围阵地、主阵地带及市区核心阵地构成。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河、嘉定、南翔、华曹镇、七堡镇、华泾镇一线；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一线。主阵地前沿一般距市区3—6公里，在纵深内布钢筋水泥子母堡群，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碉堡1.4万个，各主要碉堡间战壕相通，壕沟内还可行驶吉普车，电网、鹿砦，层层叠叠。所有飞机场、车站、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都构成抵抗重点。市区核心阵地，是由高大坚固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构成，并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大厦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汤恩伯吹嘘上海防御体系是攻不破、摧不毁的“钢铁阵地”，中央社誉为“固若金汤”。阎锡山视察了阵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蒋经国将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蒋介石要求汤恩伯最低在上海打上6个月，以待二线兵团建立和美国大规模介入。

5月1日下午，蒋介石到汤恩伯司令部，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训话，声言他要上海亲自指挥，“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政工方面由蒋经国负责，他本人管军事指挥，并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把装甲车部队调到上海。蒋家父子这回要以死相拚守上海。

陈毅、粟裕、谭震林命部队首先把上海外围的敌人肃清，把上海的出口封死，造成关门打狗势。5月12日夜，肃清上海外围敌人的战斗打响。宋时轮、郭化若第九兵团从沪西南、浦东向敌人发起钳形攻击；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从沪西北、沪西向淞沪进击。

5月16日，蒋军上海外围阵地丢失。两军战斗异常激烈，至5月20日，蒋军高桥等一带主阵地全部丢失。解放军为避免战火对城市的摧毁和对上海市民的伤害，采用“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战术，整团整营的敌人，一个个被解放军解决，呆呆的作了俘虏。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仅提供了军事情报，还组织工人、店员、学生以及公教人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工人阶级武装和群众团体，配合解放军行动，进行护厂、护校斗争。

21日上午，上海对外航空联络中断。汤恩伯仓促地把司令部搬到长江口的军舰上去。

上海市内，蒋军军长找不到司令，师长找不到军长，团长找不到师长。各部队开始寻路撤退。

解放军宋时轮、郭化若第九兵团于24日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敌人一面继续调集兵团增强月浦方面的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蒋介石下令上海总撤退。

26日，宋时轮、郭化若兵团攻占上海市区。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21、123军向解放军投降。叶飞、韦国清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等地。

26日深夜，上海战役胜利结束，除汤恩伯率第54军等部约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万人全部被歼。

蒋介石在5月25日见大势已去，便在蒋经国、蒋纬国的搀扶下，登上“江静号”军舰离开上海向台湾方向驶去。过舟山群岛时，见从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撤到舟山群岛的蒋军约15万人，还有大批的政府行政人员及家眷。残兵败将和政府官员、家眷拥入舟山群岛，其状十分混乱。

蒋介石于6月1日抵达台湾高雄。他草拟了一个“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来封锁、包围大陆，以作将来反攻大陆的基地。蒋介石又专门召集国民党在台高级官员研究了在台湾整军、防务、军政等问题。

陈毅、粟裕在上海战役刚结束，就命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未担任警备任务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第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命令王建安、谭启龙的第七兵团准备攻取舟山群岛；命令陈士榘、袁仲贤的第八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命令宋时轮、郭化若的第九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渡海攻台。

陈毅、粟裕考虑到福建的国民党都是残兵败将，计划以叶飞、韦国清兵团两个军入闽。叶飞提出两个军入闽，兵力不足，于是便决定第十兵团第28、29、31军共10万余人全部入闽作战。

7月2日，叶飞、韦国清率第十兵团从苏州、常熟、嘉兴等休整地出发，冒酷暑南进，乘国民党军处于欲守无心、欲逃不准的尴尬境地，向福州发起大迂回进攻。

蒋介石对福建放心不下：长江防线各路败兵退入福建，俱无斗志，且溃军过处，借粮征草，拉夫派工，骚扰百姓，闹得鸡犬不宁，民怨鼎沸，福州绥靖总署主任朱绍良是老资格，对蒋介石并非俯首听命。蒋曾三番五次电告朱绍良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朱绍良阳奉阴违。朱绍良受解甲寓居的两个闽籍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的影响，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在福州决战，以免在炮火中毁于一旦；朱绍良认为大上海的钢筋水泥纵深防线还守不住，福州南临闽江、东面大海、背水之阵，何能固守？！福州市市长何震也说：“福州太穷，征工征料十分艰难。”他对死守福州，毫无信心。

## 第三十九章 鏖战大西北

蒋介石获悉：上海丢失后，李宗仁同朱绍良电信交往频繁，朱绍良视李宗仁为后台，李宗仁拉朱绍良这股势力，把福建作为退守之地，李宗仁将在6月底或7月初去福州。于是，蒋介石便决定去福州作一番布置。

蒋介石乘“美龄号”总统座机越台湾海峡只用一个小时就在福州南郊机场降落。朱绍良早已率领福建党政要员在机场迎候。朱绍良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对他突然大驾光临，心存疑惧，因而吩咐手下全城动员，要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蒋介石下机被朱绍良等官员们簇拥步出机场。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道：“我看就不必进城去惊动市民大众了！要开的会就改在机场办公大楼开吧。”蒋介石突然提出不进城，使朱绍良等官员惊愕不止，面面相觑。蒋介石在机

场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李以勳师长以上军官参加。蒋介石作了训话，他痛心疾首，几乎要落下眼泪来。他要求国军要“用自己的热血，死守福建，巩固台湾，失去的国土一定能够恢复”。

当天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腾空东去。军官们送走了蒋介石，有一个师长咕哝一句：“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晚都不敢！”7月26日，李宗仁飞到福州巡视，朱绍良招待甚周，这惹得蒋介石不快，加上朱绍良对蒋抗共的命令态度消极，蒋介石决心换马。蒋令汤恩伯飞往福州，在机场打电话给朱绍良，约朱来机场相商要务，朱绍良当即赶到机场相见，汤恩伯取出蒋介石手令，上面写着朱已被撤销福建省主席之职，由汤接替。朱绍良大惊，声称当即同汤去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催促朱即刻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样。汤恩伯便做起新任的福建省主席来了。

汤恩伯没有做几天省主席，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便于8月14日向福州发起猛攻，经过4天战斗，占领了福州。叶、韦兵团乘胜挥师南下，摧枯拉朽，攻占泉州、漳州都没遇上大的战斗。至9月底，叶、韦兵团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阵地，形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

厦门岛是中国沿海重要通商口岸，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被大陆环绕，最近处与大陆相隔不足2公里。西与小岛鼓浪屿邻近。鼓浪屿与大陆仅距1公里，厦门岛上筑有永久性工事，前沿阵地由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原守岛的是刘汝明第八兵团第55军。

蒋介石不放心，特将嫡系主力第5军第166师、第96军1个团和1个装甲连调来加强厦门的戒备。蒋命汤恩伯以省主席身份取代刘汝明的指挥权，并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率领特务武装赶到厦门，并担任厦门警备司令。蒋命他们死守厦门。

叶飞命第28军从福州乘木船走海路南下，进攻平潭岛。将士在海船上一路颠簸，多数人呕吐不止。部队又缺乏潮汐气象知识，途中又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台风，船队被吹散。

9月16日，28军登陆平潭岛时，只有2个团上岛，幸亏岛上有地下党游击队接应。因台风肆虐，国民党空军无法出动，金门、厦门和台湾的国民党军也未向平潭岛增援。解放军2个团的部队上岛后，国民党守军上万人，惊魂未定，不堪一击，军官们纷纷寻船逃向台湾，士兵们纷纷投降。未经过激烈战斗，平潭岛即被28军顺利占领。

叶飞第十兵团攻占厦门、金门因渡海缺乏船只，不得不推迟。28军所乘的大帆船，大部分被台风吹散。在福建沿海的轮船、机帆船乃至大一点的帆船都被国民党在撤退时掠走或者毁坏。叶飞在泉州湾、九龙江一带征集了一些船只，但大多数是平底江船，出海行驶困难。叶飞将作战方案由“金厦并取”，改为“先厦后金”。

10月15日，叶飞部越海进攻厦门的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鼓浪屿全岛仅有近2平方公里，是块弹丸之地。但岛上怪石嵯峨，叠成洞壑，树木葱郁，四季常青，亭台楼阁，掩映错落，以“海上花园”著称于中外。汤恩伯派2个团据守此岛。

解放军精悍的4个一梯队营在炮火掩护下，于黄昏时分登船出发，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公别向鼓浪屿驶去。不料遇到了上逆风，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翻滚。船队多是平底江船，大

部分船队被风吹散而漂了回来。少数船只航至鼓浪屿 200 米处，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解放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向前，登岸后在滩头又遭到国民党军火力杀伤，解放军又组织了 3 个二梯队营起渡，大部分船只又被风浪漂回，只有 2 个排上岸。解放军将士具有孤胆作战的精神，他们上岸后，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入滩头地堡，直插日光岩两侧制高点。

汤恩伯认为彭浪屿是共军的主攻方向，以为共军夺取鼓浪屿之后，将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于是即将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解放军登陆部队；汤恩伯并将控制厦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调至鼓浪屿。

解放军攻击鼓浪屿部队浴血苦战，但告失利。

叶飞攻击鼓浪屿，使的声东击西之计。强击鼓浪屿，吸引国民党军主力。然后解放军以 3 个师偷袭厦门，又以第 28 军监视金门岛之敌。如其增援厦门或撤退，则立即对金门发起攻击。

第 31 军和第 29 军抽出 5 个主力团组成突击部队登船起航。几百艘木船在茫茫夜幕下顺风顺流，迅速地驶向预定地点。国民党守军发现解放军的船队时，第 31 军突击部队的大部已经在厦门岛北部多处抢滩登陆。大陆岸上的炮兵此时猛烈开火，摧毁了国民党在海边的许多堡垒和工事。经过艰苦奋战，次日清晨，从厦门岛北部登陆的部队终于占领了第一线阵地。

解放军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后，返航的船队冒着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将后续部队源源运上厦门岛。在厦门岛中段，解放军 85 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号称“海上堡垒”，汤恩伯守以重兵。解放军经一夜激战，终于攻克了这个要塞。天亮后，又占领了高崎机场，国民党守军丢弃一架运输机和几辆坦克向南逃窜。解放军 86 师从厦门岛东段的钟宅、下马一线登陆后，攀越陡壁，出其不意地突到国民党军阵地，蒋军先是误认为自己人，待清醒后，以坦克和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解放军与之苦战。

国民党守军虽然竭力反击，但其正面防线被解放军全线突破，陷入顾此失彼、惊惶被动境况。当汤恩伯明白解放军的主攻方面不在鼓浪屿而在厦门本岛北部时，为时已晚，他急调仅有的 1 个团及特务头子毛森的特务营，在飞机掩护下反击。解放军施放烟幕使飞机迷失目标，并猛插纵深，抢占据点，以近战打击国民党反击部队，在松柏口全歼毛森特务营。汤恩伯完全失去守岛信心，率先向海边逃去，部队失去指挥各自奔逃。

汤恩伯在海边用报话机呼叫海上军舰放小艇来接应。叶飞听到，拿过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打头的追击部队只顾猛追猛打，不同指挥部联系，当他们进击到厦门港时，汤恩伯和几个随同刚乘小艇逃往金门，追击部队未携带火炮，只好看着他们逃走。被汤恩伯丢下的 3000 多官兵都在港口附近当了俘虏。刘汝明带领 4500 余人上船逃往台湾，他的第 55 军其余官兵全部被俘。

解放军越海厦门作战，历时 2 昼夜，胜利结束，歼国民党军 2.7 万人，其中俘虏 2.5 万人。

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彭德怀，在 1949 年 4 月初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中，抵达太原前线，并留在太原前线指挥部，同徐向前一起指挥 3 个兵团作战。解放军开始发起对太原的总攻，杨得志第十九兵团由南、杨成武第二十兵团由北、周士第第十八兵团由东，数十支攻击部队先后突破敌前沿，继以长驱直入，猛烈向纵深进击，经过 5 日激战，解放了太原。

太原解放，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两个兵团立即投入西北作战。杨得志兵团从禹门口西渡黄河，周士第兵团从凤陵渡河入陕，人不解甲，马不停蹄，昼夜兼程，直扑西北战场。

5月19日，古城西安解放。但蒋介石不甘心彻底失败，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予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盘踞在西北的胡宗南部队，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官中曾流行着“陈胡汤”之语。陈者，陈诚也；胡者，胡宗南也；汤者，汤恩伯也。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后，非嫡系部队已消灭殆尽，留下来的主要是这3大派系部队。蒋视“陈胡汤”为保身救命之汤。而在这三味补汤之中，胡宗南这一味，又特别为蒋介石所珍爱。因为胡既是黄埔出身，又是浙江人。在抗战期间一贯积极反共，悉力包围陕甘宁边区，颇得蒋介石赏识。在解放战争中，陈、汤部队被解放军消灭。现在蒋介石则依靠胡宗南部队，蒋存则胡存，胡亡蒋亦亡。

胡宗南部队在西北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45万人的军队还剩下20万余人马。

蒋介石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马步芳、马鸿逵。国民党中央于1949年5月18日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并许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二马约有18万人马，马步芳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遂伙同马鸿逵组织3个兵团，分兵3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

敌人得悉解放军华北两个兵团入陕，二马主力从乾县、礼泉地区慌忙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宗南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宽大正面，以防解放军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胡宗南主力猬集于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合，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四个兵团，即王震的第一兵团，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杨得志、李志民的第十九兵团，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敌军的总兵力相当。

7月6日，彭德怀在西安召开野战军前委会议，决定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战术，发动扶（风）眉（县）战役。彭德怀命令杨得志、李志民兵团钳制马步芳、马鸿逵，王震兵团、周士第兵团、许光达、王世泰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7月10日，扶眉战役开始，杨得志兵团进至马军对面之乾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扬言进攻。卫戍西安解放军第61军则向南山秦岭之敌佯攻，以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并钳制马军及秦岭胡军，保障解放军主力侧翼的安全。

7月11日拂晓，解放军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进攻。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的许光达、王世泰第二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到敌侧后；周士第第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风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王震第一兵团，以渭河南岸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全线猛烈攻击。

胡宗南部队猝不及防，一天之内即被强大的解放军团团包围，陷入绝境。解放军激战两昼夜，除部分残敌越秦岭溃逃外，歼敌4个军，4.3万



余人，解放县城 8 座。

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尚有 10 万余人的兵力，但分散在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到徽县、成县、两当、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及其以南地区，已成惊弓之鸟，时刻惧怕解放军进攻，短期内已无向关中发动进攻的能力。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的指示，乃决定以周士第兵团之两个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王震兵团，许光达、王世泰兵团，杨得志、李志民兵团，以及周士第兵团之 62 军，共 10 个军，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以杨、李兵团附骑兵第 2 旅为右翼，沿西（安）兰（州）公路及其两侧向平凉进击；以王震兵团，许、王兵团为左翼，分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打击由兰州、固原方面可能增援之敌，以周士第兵团之 62 军为总预备队。

7 月 21 日至 24 日，解放军各路大军纷纷出动，坦克车、装甲车轰轰隆隆，步骑大军浩浩荡荡，公路上黄土飞扬，向西北奔腾而去。

马步芳、马鸿逵虽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各自为保存实力，谁也不愿到第一线作战，在解放军主力尚未迫近时，便各自后撤。

杨得志、李志民第十九兵团先后占领邠县、长武、泾川、平凉等地，并在固原以南歼马鸿逵 5000 余人。尔后控制了六盘山；许光达、王世泰第二兵团先后占领安口窑、华亭、化平、通渭等地；王震兵团突破敌固关防线后，歼灭马步芳骑兵第 14 旅等部。

解放军在 20 余天的作战中，千里追击，气势磅礴，势如风卷残云，歼敌万余，解放了陇东广大地区。固关一战，二马成了惊弓之鸟，马步芳向陇中逃窜，马鸿逵回窜宁夏。

解放军分别向兰州、银川追击。

8 月 6 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马鸿逵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于兰州，尔后再聚歼马鸿逵部。第一野战军主力分别向兰州、西宁挺进。

马步芳匪军逃回兰州，困兽犹斗，妄图依北面黄河天堑、东、南、西三面环山之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准备在兰州同解放军背水一战。他们将其主力分布于各主要阵地；国民党反动政府更不惜挖肉补疮，连日向兰州空运军事物资。

8 月 20 日，许光达第二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从东、西、南 3 面包围兰州。8 月 25 日拂晓，总攻开始，第二兵团首先攻克沈家岭与上下狗娃山、营盘岭等主要阵地；第十九兵团经过反复争夺后，攻克了马家山、古城岭等要点。当日黄昏，攻城部队占领南由主阵地，马步芳军伤亡惨重，全线溃退。次日凌晨，第二兵团攻占兰州西关，抢占了黄河铁桥，切断敌军退路，并迅速攻入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第十九兵团主力全歼东关守敌。兰州宣告解放，马步芳部主力 2.7 万余人被歼，其余部分别向永登、西宁逃窜。一路上满目溃兵，人马争道，车辆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死伤累累。

兰州战役之后，解放军人不停步，马不停蹄，继续追歼中国西部大片土地上残留的国民党军队。彭德怀发布了解放大西北的青海、宁夏和新疆的战斗命令：王震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许光达、王世泰第二兵团向甘肃的河西走廊进军；杨得志、李志民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

从兰州落荒而逃的败将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光头鹄面，带着少数亲信

随从窜回西宁。

王震兵团直逼西宁城下，西宁岌岌可危，马继援惊慌失措，不敢久留，惶惶然爬上飞机出逃。马步芳和马继援父子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西宁城内的官兵作鸟兽散，西宁城已成为一座空城。9月5日，西宁解放。

王震兵团一部又向甘肃河西走廊重镇张掖进军，旨在切断沿河西走廊西撤的歼敌退路，与许光达第二兵团会师张掖，全歼甘肃境内之残敌。于是，解放军分左、右两路追击敌人。此时国民党在西北的大势已去，残余敌军将领都在各寻出路，有的打算起义，有的准备逃跑，顽抗到底的寥寥无几。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甘肃省师管区司令周祥初在岷县通电起义，起义部队整编为独立第1军，尔后随周士第兵团向四川进军。

9月9日，杨得志、李志民兵团兵分3路，挥师宁夏。大军进抵中卫时，70余岁的爱国老人郭南浦，自愿前去做马鸿逵、马鸿宾起义的策动工作。同时傅作义、邓宝珊也劝导马鸿宾同解放军签订和平解决协定。9月19日马鸿宾和马惇靖父子起义，其部队改编为独立第2军，马惇靖为军长。

马鸿宾部起义后，杨得志兵团顺利渡过黄河，日夜兼程，直捣银川。在银川的马鸿逵、马敦静父子先后逃往重庆，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和第11军军长马光宗率部起义，卢忠良的第128军负隅反抗，被击溃。9月23日，宁夏宣告解放。

至此，西北地区除新疆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全境解放。对于新疆问题，周恩来派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给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鲍尔汉的信件去乌鲁木齐，希望他们和平解决新疆问题，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

次日，鲍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宣告解放。

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等人劝李宗仁重开和议。李宗仁自忖：蒋介石凭借优势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我们在大陆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然而，李宗仁“和平”念头却遭到白崇禧的反对。白崇禧向来以反共坚决著称，虽在桂系逼宫时，曾以“主和”招摇一时，但自李上台主政后就一反前态，备战日甚一日。

他扬言“凡再言安抚中共者，应首先杀之”。李宗仁想联共反蒋，由于白崇禧的坚决反对而下不了决心，联蒋反共，几等于自杀。正在李宗仁坐卧不宁之时，行政院长何应钦促驾电频频而至，阎锡山、居正、张发奎等也到广西促驾。经蒋之说客阎锡山“涕泪横流”的一番劝说，李宗仁表示赴穗。

李宗仁到广州后，迫于内外压力，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声称中共如欲始终以兵戎相见，他将领导政府作坚强之抵抗。

李宗仁要行政院长何应钦请蒋介石从台湾运回一些黄金、白银，解决国民政府吃饭问题。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两次飞台，均无结果而归。何应钦在蒋、李之间左右为难，便提出辞职。李宗仁准其所请，提出以居正继任行政院长。

居正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的态度一向不卑不亢。李宗仁计划由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张发奎当参谋总长，甘介候当外交部长。蒋介石窥破李的用心，责成陈立夫、陈果夫组织CC派力量抵制。国民党立法院投票结果，

居正行政院长之议以一票之差胎死腹中。

张发奎等主张重提居正，再次表决，也有人主张电召白崇禧来粤组织军人内阁。但李宗仁考虑再三，终觉没有把握，拒走极端，乃屈服于立法院中 CC 势力的压力，改提属蒋意的阎锡山为行政院长。立法院再次开会，以多数票通过阎行政院长之任。

阎锡山组阁，李宗仁向他提出让白崇禧入阁当国防部长，老于世故的阎锡山与李周旋，不作让步。白的国防部长当不成，张发奎的参谋总长更没份，外交部长也由阎任命了胡适（由叶公超代）。李宗仁的计划无一得逞，反而徒招怨言，威信一落千丈。白崇禧未当成国防部长，对李软弱不满，说他“抓不起、放不下”，是“糊不起的烂泥巴”。

## 第四十章 进军华南

7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偕大批随员乘机来广州，召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分发了4个文件：《国民党改造纲领》、《国民党改造实施程序》、《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筹备组织条例》、《总裁交议本案意见书》。接着非常委员会正式成立，主席蒋介石、副主席李宗仁、孙科，其委员全由蒋的亲信爪牙担任，如阎锡山、张群、何应钦、朱家骅、陈立夫等。

“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后，按规定总统及行政院长的一切措施须先经该会核定始可施行。这样一来，李宗仁的代总统大权旁落。蒋介石为了对桂系来个釜底抽薪，故意忽略广东防务，准备不战而退，让出广州。两广齿唇相依，失了广州，广西势成孤立，桂系老家也就不难连锅端了。广东的实力相当薄弱，余汉谋所部钟彬、李振两兵团，均远戍川、鄂，归胡宗南、宋希濂掌握，不能调回归还建制。广东省内仅有一些保安团和新组织的暂编师，战斗力薄弱。粤、桂将领联名向蒋致电，要求：把撤往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扫数开粤增防，并将存台黄金、白银拨出一部充军费。蒋介石不但不允，反而密令在广州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对粤、桂的联防保卫广东，作无情打击。

7月28日，李宗仁为国防部长一职和保卫广东问题专门飞台湾找蒋。蒋仍回答说，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因胡宗南、宋希濂反对，眼下不能有此命令；保卫广东，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李去台一无结果而回。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确定在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赋予林彪、罗荣桓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地区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桂、粤6省。

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第四野战军80多万大军分3路南下。5月6日发起了新（乡）岳（阳）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守军3万余人。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19兵团司令张轸，在贺胜桥率部队起义。

5月上旬，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南逃。张轸在第四野战军的支持下，拟

订了一个迎接解放军渡江，配合解放军截击白崇禧部队南逃的计划。5月14日，白崇禧电召张轸火速到武昌总部参加“紧急会议”。张轸推测起义事机可能暴露，此去凶多吉少，但尚未得到解放军答复又不能贸然宣布起义，便毅然驱车前往武昌。

白拿出顾祝同的电报：“已得密报，张轸图谋叛变，速将张及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张轸知无可掩饰，直言不讳承认与中共方面有过联系，但咬定是遵从白的指使。在此之前，白崇禧为制造和谈假象，确曾让张轸与解放军作过联系。

白崇禧出示顾电，不过是胁迫张轸同他一道南逃，并未掌握张轸的真正行动计划。

经张轸巧言争辩，白无可奈何。张便借口去19兵团驻汉办事处，趁机脱离虎口，乘车急驰金口127军部。他得悉19兵团司令部已被白崇禧的第7军捣毁，知事不宜迟，立即召开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布置起义。是时，白崇禧的军队逼近127军，双方开始战斗。

次日，派去江北与解放军联系的人返回，带来接应起义的联络信号，于是，张轸正式宣布起义。除一部分拒绝起义的部队南逃外，参加起义的有第128军之312、313、314师，127军之369师，共2万余人。起义后立即在贺胜桥一带击退白崇禧的包围和截击。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解放军第51军，张轸任军长。

5月17日，武汉三镇解放，解放军过江后，势如破竹，白崇禧集团望风而逃。

7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说：“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3地，而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和白部作战方法，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7月底，四野肖劲光十二兵团、程子华、肖华第十三兵团，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长沙城内正在酝酿着起义。

原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见桂系企图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认为事不可为，不愿再为桂系陪葬，私下通过可靠关系向中共方面作了愿意走和平起义道路并表示。中国共产党立即通过湖南地下党组织，加强了与其周围进步人士的联络，通过他们不断对程潜施加影响。程潜取得中共长沙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后，间接通过与中共早有联系的白崇禧亲信刘斐出面，提议调与程潜有师生之谊的武汉警备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回湘，暗中襄助掩护程潜准备起义。白崇禧认为陈反共坚决，第一兵团驻守湖南，既能保持桂系的退路，又可监视程潜的行动，便同意了。

中共党组织设法从上海找回倾向革命的程潜的长子程博洪，由他去做父亲的工作。

程博洪是复旦大学教师，编过进步杂志《时与文》。中共又通过章士钊去找程潜谈话，章与程私交甚笃，章向程谈了毛泽东对程的期望，反复说明形势，要程相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程进一步打消了顾虑，起义准备工作开始积极进行。

5月中旬，白崇禧部20万军队撤至湖南境内，向有“白狐狸”之称的白崇禧早已觉察湖南的和平动向，他到长沙后，表面上不露声色，暗中却派人加紧对程的压迫和牵制，并强制调走了程潜周围的“不可靠人员”，以桂系人物杨绩荪充任省府秘书长，又在省政府中安排了一些特务，监视程的一举一动。程潜感到和平起义刻不容缓，于6月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复电程潜，对他决定走和平道路表示“极为佩慰”。程潜受到极大鼓舞，立派代表去武汉，请示林彪、罗荣桓从速派部入湘。

陈明仁虽愿跟程走和平道路，但他既怕起义后共产党跟他算旧账，又怕国民党同僚骂他“投降”。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余志宏为此亲自登门，向他宣传了共产党和平解放湖南的方针政策，并策动陈明仁的亲信李君九、温汰沫为之讲解形势。章士钊又托人从香港给他和程潜带来亲笔信，其中提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明确表示对陈明仁既往不咎，只要起义，还要加以重用，陈明仁打消了顾虑。

7月中旬，白崇禧为保存实力，准备率桂军向衡阳撤退，由陈明仁代其守长沙。白崇禧在离开长沙之前，利用李宗仁的名义，要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遭到程的拒绝后，拟逼程退去广西，但又担心程入桂对桂系后方产生不利影响，乃改逼程潜及其绥署机构撤往邵阳。7月21日，白崇禧亲至政府为程潜“送行”，见程登车后，才放心启程赴衡阳。

“小诸葛”机关算尽，却没料到陈明仁已同程潜站在一起，程西走邵阳也是将计就计，借此脱离白的控制。

程潜离开长沙后，立即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起草了起义通电文稿，几天后，他从邵阳秘密返回长沙，会见了第四野战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李明灏，具体商妥了和平起义的有关事项，起义准备陆续就绪。

程潜秘密回长沙的消息为白崇禧侦知。白知事情不妙，大为惊恐。8月1日，蒋介石、白崇禧派出特使黄杰、邓文仪乘专机抵长沙，想以同学至友之谊劝说陈明仁“大义灭亲”，将程潜杀害，并设法阻止起义。但陈明仁已决心跟随程潜一道起义，蒋、白的阴谋未能得逞。

8月5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和平起义通电。宣布：“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8条24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之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新中国而奋斗。”程、陈通电发表后，湖南各界人士100多人在唐生智领衔下发出响应通电。同时，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进入长沙市。

毛泽东致电程潜、陈明仁：“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湖南和平解放后，程潜担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明仁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长沙和平解放后，大军飞速南下，乘胜解放了衡阳、祁阳、耒阳、宝庆等地区，歼敌4.7余万人。接着挥戈南下，挺进广东。

李宗仁知再不行动，将陷于绝境之中，于是不顾蒋之反对，自行召集两广军政首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举行会议，讨论两广合力守广东问题，并作出决定。

(1) 改任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赋以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

(2) 广州市原为院辖市，着改由广东省直接管辖，以利于集中事权，适应军事需要。

在此之前，吴铁城奉李宗仁之命给台北的蒋介石送去保卫华南的书面意见和行政院关于加强华南防务的会议记录。吴铁城由台北飞东京，访晤美军司令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表示美国已决定不援蒋，但对广州政府仍寄予期望，美国国会已通过 7500 万美元的拨款，准备用于中国一般地区，如广州能坚持 6 个月，这笔款子将用于支持华南的局面。

李宗仁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外交上加强联络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寻觅新的出路。

在他的邀请下，颇负时望的顾孟余从香港来到广州，组织“第三势力”。顾孟余同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反复交换意见后，认为“为少数人把持、操纵之国民党，既为社会人士所鄙弃，更为青年群众所仇视，名存实亡，不可再用”。故有必要以“新组织、新号召”来重立门户，起废振衰。于是，他们拟出了一个方案，以“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第三势力”相标榜，自称：“取国共两党之所长而弃其短，在经济平等上与苏联看齐，但在保障人民生活，思想行动，信仰之自由，在政治民主上则与英、美看齐。”一时间，广东“组新党、行新政”之呼声大起。

蒋介石对李宗仁在穗的一切都了若指掌。8 月 23 日，蒋介石再次来到广州，召见了粤将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他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大发雷霆，怒声训斥：“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在蒋淫威面前，粤将噤若寒蝉。余汉谋受训后，坚不就任华南军政长官一职，薛岳被蒋一骂，不敢再哼一声。倒是张发奎、陈济棠坚决些，张发奎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但张手下无兵无将，无法施展。如此这般，支持李宗仁搞粤、桂合作的一班将领人心四散。正欲开张的“第三势力”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见势不妙，也匆匆收摊，避去香港。李宗仁羽翼尽失，成了孤家寡人，“保卫广东”终成画饼。

9 月下旬，蒋介石在四川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对西南顽抗之要务作了部署后，飞抵广州，当即召集军政委员会议，宣布放弃广东退保琼崖。

李宗仁见大势难挽，预感已到春残梦碎之日，但他对蒋仍拒不合作。蒋抵穗时，李未去机场迎接，到后也避而不见面。经阎锡山等人再三疏通，李才于蒋来穗后第三天宴请了蒋，席间彼此都感无话可说。李在愤懑之余，压抑不住，乃以“国家主席地位”给蒋当面训斥，以此稍抒胸中积愤。

10 月 12 日，解放军陈赓兵团迫近广州市郊，“国民政府”的头目们纷纷作鸟兽散。

阎锡山逃往台北，余汉谋、薛岳乘军舰溜到海南岛，李宗仁与最后一批随员匆促登机离开广州，途经桂林作短暂停留，续飞重庆。

10 月 14 日，广州解放。

陈赓根据毛泽东电示精神，率领第四兵团追击逃敌，部队以惊人的顽强精神每天连续行军 150 里以上，进行 5 天大追击，在广东的阳江、阳春地区海边追上逃敌，将敌人包围，并发动攻击，大部敌人被围歼，少数敌人夺海路潜逃，因仓皇抢渡，纷纷被挤落海中淹毙，又有 4 艘大船被击沉，船上

2000 余人同归于尽。这次广东战役共歼 6.2 万余人。

中南解放后，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蒋介石在 8 月就密令宋希濂部队由湘鄂西退保川东，胡宗南部队由陕南、甘南退入川北。这样盘踞在西南的国民党军有胡宗南的 3 个兵团共 12 个军，孙震指挥的孙元良兵团 2 个军，谷正伦指挥的何绍周兵团 2 个军，卢汉指挥的 4 个军，宋希濂指挥的 2 个兵团 6 个军又 4 个师，罗广文兵团 2 个军，郭汝瑰指挥的新编兵团 2 个军，此外还有刘文辉、邓锡候、杨森等部队，总计兵力约 50 万人。然而，这 50 万人军队中，胡宗南和宋希濂的部队超过半数以上。因此，这两个人是蒋介石在西南的两张王牌。蒋介石一意经营西南，妄想保持一个偏安之局，继续顽抗，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中共中央将进军西南的任务交给刘伯承、邓小平第二野战军。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中共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 5 省区。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调动大军向西南进军；杨勇第五兵团由湖南直趋贵州，然后插入川南；陈锡联第三兵团则向湘西进击，然后插入川东；周士第第十八兵团由北向川西压迫；陈赓第四兵团完成广西作战后，即挥师云南。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第二野战军分兵数路进军西南，林彪、罗荣桓第四野战军向广西追杀白崇禧集团暂且不提。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积极筹建中央政权，毛泽东接见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中国致公党陈其龙，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了，我们还没建立新政府，在中国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地方人民政府有的已经建立了。早在 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已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48 年 9 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1949 年 3 月，中原地区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中原人民政府。8 月，东北成立了以高岗为主席的东北人民政府。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出席会议的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等 134 人。

大会通过主席团人选之后，毛泽东等主席团成员走上主席台入座。周恩来致了开幕词之后，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先后发表了讲话。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麦克风前。他微笑着向代表们致意。他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

成熟，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中，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火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讲完话，全体代表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敬意。

筹备会议共开了 5 天，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筹备会议顺利结束后，毛泽东特别高兴，他对人说，总算完成了一件心事，现在就可以集中一些时间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了。又说，统一战线的威力无比，只有搞好统一战线，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共同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把国家建设富强。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确定了下来。但是，受到全国人民尊敬的宋庆龄还居住在上海。6 月 19 日，毛泽东派邓颖超、廖梦醒携带亲笔信去上海，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 4 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贺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宋庆龄本来最怕去北平，因为孙中山是在北平去世的，北平是她最伤心的地方。但是，毛泽东的信给她带来极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北上。

8 月 26 日，毛泽东听到宋庆龄已从上海动身的消息，非常高兴地说，邓颖超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

毛泽东提前从中南海乘车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车站月台上已经来了许多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陈铭枢、谭平山、郭沫若、聂荣臻等站在月台上。毛泽东同他们招手致意，并和他们握手。

火车进站了，毛泽东立即扔掉手中未抽完的香烟，向火车跟前走去。宋庆龄一下火车，毛泽东就走上前去，伸出双手，与她紧紧握手，高兴地说：“欢迎您！欢迎您！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兴奋地说：“谢谢你对我的邀请，向你们祝贺。”“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祝贺中共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当天晚上，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

## 第四十一章 开国大典

9 月 7 日晚，程潜从长沙乘火车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100 多人来前门车站迎接。

程潜走下火车，毛泽东快步迎上去，亲切地握住他的双手，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程潜感动得流下眼泪，激动地说：“你的工作那么忙，不应来车站迎接我，我应当到府上去拜访你。”毛泽东说：“欢迎你到我家去作客。”次日，毛泽东设家宴请程潜作客。程潜面向毛泽东高举酒杯说：“我过去被辱国辱民的蒋介石拖进了苦难的深渊，走错了路，很惭愧。愿今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未来努力奋斗。”9月21日下午7时，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提前10分钟来到怀仁堂，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怀仁堂休息室里热情畅谈。

大会开始时，毛泽东等步入会场，600多名代表一致起立，会场上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大会开幕，军乐队齐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鸣。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并通过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自1949年9月27日通过之日起，改名为北京。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通过这个决定的一年是1949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确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大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即：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 刘少奇 宋庆龄 李济深 张澜 高岗

委员：

陈毅	贺龙	李立三	林伯渠	刘伯承	吴玉章
叶剑英	何香凝	林彪	彭德怀	徐向前	彭真
薄一波	聂荣臻	周恩来	董必武	赛福鼎	饶漱石
陈嘉庚	罗荣桓	邓子恢	乌兰夫	徐特立	蔡畅
刘格平	马寅初	陈云	康生	林枫	马叙伦
郭沫若	张云逸	邓小平	高崇民	沈钧儒	沈雁冰
陈叔通	司徒美堂		李锡九	黄炎培	蔡廷锴
习仲勋	彭泽民	张治中	傅作义	李烛尘	李章达
章伯钧	程潜	张奚若	陈铭枢	谭平山	张难先
柳亚子	张东荪	龙云			

9月30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慰问电。会议还通过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全体政协委员来到天安门前，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碑奠基仪式。周恩来代表政协主席团致词，然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默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文。最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全体政协委员扬起铁锹铲土，给纪念碑奠定基石。礼毕，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选举结果，并举行闭幕式。朱德在庄重热烈的气氛中致了闭幕词。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亲笔起草次日将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黎明时分，毛泽东身披

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写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步入周恩来办公室，他们坐在桌旁，一字一句地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

早晨 6 时，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后，才回房休息。下午 1 时，卫士把毛泽东叫起。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便下床刷牙洗脸，吃了饭，穿上一套绿呢服装，步行走进勤政殿大厅，2 时在那里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兼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下午 3 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沿城西侧古砖梯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 30 万群众欢声雷动。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在《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顺着旗竿冉冉升起。他心潮澎湃，热血奔涌，胸脯开始起伏，用很大的声音脱口喊出：“升得好！”与此同时，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它象征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 54 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英勇斗争的 28 年。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公告宣读完毕。由朱德总司令担任检阅司令，聂荣臻担任总指挥的阅兵式开始。朱德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尔后受阅部队开始从天安门前由东向西行进。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海军。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接着是陆军，步兵师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过天安门前。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轰轰烈烈地开过去。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上空。尔后在《骑兵进行曲》弓引导下，3 个团的骑兵师缓缓而过，高头大马一个团毛色全红，一个团毛色全白，一个团毛色全黑，骑士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

3 个小时的阅兵式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游行，群情沸腾。

“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响彻云霄。毛泽东激动异常，两手交替举起，时而禁不住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直站了好几个小时。尽管很累，但他一步也没有离开主席台。后来，他在别人多次劝说下，到休息室去休息。他坐下刚点燃一支香烟，周恩来走进来对他说：“你一离开主席台，游行群众看不见你，就不前进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他回到主席台，服务员给他拿来了凳子，毛泽东坐在凳子上继续向群众挥手致意。他一直到游行结束，才走下天安门城楼。

10 月 9 日，政协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

10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任命政府各负责人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程 潜

总参谋长 徐向前  
政务院副总理 董必武 陈云 郭沫若 黄炎培

秘书长 李维汉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陈 云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谭平山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高 岗  
 内务部部长 谢觉哉  
 外文部部长 周恩来  
 贸易部部长 叶季壮  
 燃料工业部部长 陈 郁  
 食品工业部部长 杨立三  
 铁道部部长 滕代远  
 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  
 林垦部部长 梁 希  
 劳动部部长 李立三  
 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  
 司法部部长 史 良  
 人事部部长 安子文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李维汉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  
 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  
 财政部部长 薄一波  
 重工业部部长 陈 云  
 纺织工业部部长 曾 山  
 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 朱学范  
 农村部部长 李书城  
 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  
 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  
 法制委员会主任 陈绍禹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副主席 6 人，党外人士有 3 人；委员 56 人，党外人士 27 人；政务院副总理 4 人，党外人士 2 人；政务院 34 个部、会、院、署、行、局长中，党外人士 14 人。在党外人士中有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冯玉祥在 1948 年 7 月 31 日从美国乘轮船去苏联，准备经苏联回国，不料轮船在向敖德萨港开进时船上失火，冯玉祥被烟熏而窒息，抢救不及而遇难。

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了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我们不会忘记，1949 年那个金色的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它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同时也宣告了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历史在中国的结束。自此，尽管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竭力垂死挣扎，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各部门负责人的时候，蒋介石密令从潮汕走海路的胡璉第 12 兵团第 19 军去金门驻防，命令胡璉以第 12 兵团司令官名义兼任福建省主席，取代汤恩伯。

国民党守金门换防的部队应走的还没走，而奉命到金门的 18 军正好刚下船，就发生了解放军登陆金门的战斗。

金门只是个并不知名的小岛。主岛大金门面积为 124 平方公里，小金门为 15 平方公里。

金门岛位于厦门以东 10 公里处，北距大陆也只是 10 公里。该岛状似哑铃，东半部为山地，西半部为丘陵，北部岸滩地段便于登陆。岛西部有金门县城，岛上居民约 4 万人，多是华侨家属，岛上十分荒凉。

金门对于蒋介石十分重要。厦门丢失后，他让汤恩伯退守金门，还连

续给金门岛增加守备力量。国民党军原负责防守金门的李良荣第 22 兵团。加上刚从台湾调来的青年军 201 师，总兵力不过 2 万人。蒋介石调整部署，先将胡璉的第 18 军从汕头调到金门，又令从汕头调往舟山群岛的胡璉兵团第 19 军中途改航金门。蒋介石考虑到汤恩伯连遭败绩，深恐金门岛也会为他断送，因而决定及时换马，要胡死守金门。胡璉不敢怠慢，于 24 日晚冒着风浪驶往金门。19 军改航金门的船队已于前一日驶近金门岛的海面，因遇飓风警报，风大下船不便，延迟至 24 日，转船到大小金门之间避风，同时用驳船登陆。

第三野战军叶飞第 10 兵团第 28 军于 24 日晚向金门发动进攻，当时，他们并没有确切了解胡璉兵团已开到金门岛。

粟裕对金门作战作了特别指示：(1) 以原敌 25 军 108 师 1.2 万人计算，只要增加一个团也不打。

(2) 没有一次载运 6 个团的船只不打。

(3) 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 6000 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

但是，叶飞并没有完全执行粟裕的指示，仍按原计划攻打金门岛。当天晚上 9 时，攻打金门的第一梯队 3 个团主力分别于澳头东北海湾及大嶝岛、运河一带登船，在夜幕掩护下，向金门开进。这是解放军步兵用轻武器乘木船向国民党优势兵力加现代化海、陆、空立体防御的岛屿进攻的战斗。

解放军 28 军第一梯队的 3 个团来自 3 个不同的建制师，又没有师级指挥员随船统一指挥。部队于 25 日凌晨 2 时登岛时，正值涨潮，国民党军设在海滩的铁丝网和许多水下障碍物被潮水覆盖，许多登岛船只船底被挂，船只一时动弹不得，部队只好下水前进，因无人组织船只返航，错过了涨潮高峰，海水退潮使已经抢滩的船只和海边其他船只因未及时返航，全部搁浅在沙滩上，没有了船队，第二梯队 4 个团无法增援，原定的作战计划已无法实现，已登岛的第一梯队在金门岛上孤军浴血奋战。

国民党军派 2 个团去执行烧船任务，又用大炮轰击船只，尔后又朝木船倾倒汽油、花生油，放火烧掉了所有的木船。

解放军第一梯队 3 个团的突击部队，在既无退路又无后援的情况下，手持轻武器同据有防御阵地及重型武器，还有坦克、飞机与军舰助战而兵力高于 5 倍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他们各自根据事先提出的：“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口号，向纵深猛插。登岛部队相当勇猛，登岛仅一两个小时撕破了国民党青年军第 201 师的阵地，使该敌昏头转向，丢弃工事南逃。登岛部队俘虏了不少敌兵，但因缺少看管的人而成了负担，第 244 团一举占领了金门两部的制高点双乳山。

天亮后，登岛部队遭到国民党军坦克群和援军的联合攻击而严重受挫。登岛点在海边开阔地，敌坦克群的火力向登岛部队猛击。解放军指战员发扬大陆上反坦克作战的传统，一面在防风草中集中火力射击，一面组织爆破手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因地形平坦，接近坦克很困难，许多战士当场牺牲，未能靠近坦克。坦克车更肆无忌惮，冲入解放军隐蔽处做蛇形碾压，许多战士被射死或碾死。中午时分，坦克群冲至海边，被看押在海边的国民党俘虏群也乘机跑散。胡璉兵团的 2 个军投入战斗，解放军顽强与之苦战，但打倒一批国民党军后，很快又有一批新军投入战斗。国民党军队越打越多。25 日中午，解放军 3 个团部队被迫从抢占的高地，先后撤向海边古宁头阵地，

古宁头是 253 团登陆后留下的一个营巩固下来的唯一的滩头阵地。国民党军在黄昏前投入许多兵力向古宁头发起攻击，企图一举消灭解放军登陆部队。结果攻击被打退。天黑了，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只好转入休整。

在大陆岸边待命的第二梯队将士看到对岸金门岛登岛船队被烧，“隔岸观火”痛在心头，异常着急而又无计可施。

解放军登岛部队在 25 日晚至 26 日天亮前的一夜，奋力激战，顽强不屈。国民党军 4 万余人全部投入战斗。

25 日，叶飞下令从厦门紧急调集船只，却因国民党海军巡逻舰轰炸，入夜只有一艘小轮船和几条木船调到澳头、大嶝岛一带，只够装运 4 个连的部队。第 28 军军长令即将担任副师长的 246 团团团长孙玉秀率领 4 个连的部队增援金门，并由孙玉秀负责统一指挥金门登陆部队作战。孙玉秀率 4 连将士顺利地金门登陆，无奈兵力太少，难抵众敌。

登岛部队不顾整日苦战的疲劳，又发挥夜战的传统，展开反击，以小部袭击金门县城，主力在岛西北夺取了国民党军的部队阵地，天亮前推进到林厝、浦头一线。

26 日天亮后，国民党军集中主力，在海军、空军和坦克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浦头一线猛烈反扑，林厝和浦头是两个村落，解放军凭藉石屋、阵地工事和高地顽强抵抗。战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每占一处阵地和一座房屋，都要付出很大伤亡，至中午 12 时以后，林厝失守。胡璉、汤恩伯及日本顾问根本博（侵华战犯）一起到前线督战，蒋介石又派蒋经国飞到金门督战。

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璉、汤恩伯要求台湾加派飞机，对古宁头村中房舍猛轰，再用火箭筒和坦克炮抵近逐个轰击。只有几百名解放军据守的古宁头这个小村落仍没有被攻下来。26 日晚间，解放军已经两昼夜苦战，粮尽弹绝，难以支持。孙玉秀用报话机向军指挥部报告，登岛部队 10 个营已伤亡 5000 多人，活着的 3000 多人准备分成几股突围上山打游击，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

26 日午夜，古宁头的解放军乘夜突围，先向北突到海边，没有找到船只，又向东南突围进入山区。次日上午，没有突围的少数人坚守古宁头以北的地堡之中和在古宁头村内据屋抗击，国民党军逐屋搜索攻打，才解决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向古宁头附近的北面海边发起攻击，军舰也绕到古宁头北面海上，用炮向地面轰击。在海陆军夹攻下，在海边的一些有武器的解放军伤员战斗到最后牺牲，大部分伤员被俘。

从古宁头突围到岛东南山区的解放军部队，因岛小地窄，在几万国民党军的搜索下难于回旋与隐蔽，246 团团团长孙玉秀在沙头附近被包围，不愿当俘虏而自杀牺牲；244 团团团长邢永生因重伤在东山沟被包围，被俘后牺牲。251 团团团长刘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 50 多人打游击，因弹尽粮绝被俘。253 团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中牺牲。253 团团团长徐博，在太武山的山洞中藏了 1 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蕃薯维生。国民党军在俘虏中查不到徐博，遍岛寻不见他的尸体，又不相信徐博会泅水逃回大陆，乃派兵反复搜山，才将他逮捕。

华东野战军第 10 兵团兵败金门，共损失两批登岛部队 3 个团零 4 个连，计 9086 人（其中包括船工民夫 350 人）。国民党军伤亡 9000 余人。

华东野战军兵败金门，全军震动。这是三年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损失

最大的战役。

10月31日，第10兵团在厦门老虎洞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叶飞发言说：“我因轻敌，听不进意见，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我严厉处分。”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于是，中央军委命令叶飞准备再攻金门。

## 第四十二章 山倒西南

金门作战失利后不到10天，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61师以4个营的兵力，利用天降大雨敌机不能起飞的机会，渡海向登布岛发起攻击。木船队起航后，风向逆转，潮渐退，船队被海浪冲散，导致第一梯队9个连只有7个半连1000余人登岛。这支劲旅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守岛国民党军，却能持轻武器连续突破守军阵地，经几小时战斗，至天亮前已占领了全岛的3A4，歼灭国民党军8个连，俘虏500余人。但后续部队却因风向和潮汐变化而无法起航；而第一梯队因占据过多的阵地需分兵把守，减弱了突击力，又未能夺取岛北部的渡口，以阻截国民党军海上援兵，国民党军4个团的援兵乘军舰顺利上岸，岛上的形势逆转而有利于国民党军。敌人在海军空军炮火掩护下进行反扑，形成岛上解放军7个半连同敌军4个整团对阵。

解放军顽强作战，坚持到天黑，第二梯队又有7个半连在夜幕掩护下登上登布岛。岛上解放军部队增加到2000余人，仍然少于岛上的敌军。解放军又同敌军苦战一天，敌军有海、陆、空配合作战，显然占优势。解放军61师指挥员考虑无法再增援，决定撤出战斗。于是登岛部队以一部向流水岩发起佯攻，使敌人转入防御，尔后迅速携带伤员上船，1000多人安全撤回。

进攻登布岛的战役歼敌2825人。解放军伤亡、失踪1490人，由于未占领登布岛，仍然算是一次失利。

金门、登布岛的连续失利，揭示了渡海作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根据金门、登布岛作战的教训致电三野：“舟山作战必须集中足够兵力，充分准备，如果准备不周，宁可推迟发起攻击的时间。”这样，解放军在东南沿海渡海作战暂时停顿下来。部队转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渡海攻岛作战的规律。蒋介石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暂时没有了被“毁巢拆窝”的危险。

解放军准备进攻的渡海作战有4个大的目标，即台湾岛（3.6万平方公里）、海南岛（3.2万平方公里）、大小金门岛（140平方公里）、舟山群岛（1200平方公里）。国民党军守岛部队兵力分布是：台湾为20万人，海南岛为10万人，金门为6万人，舟山群岛为12万人。

白崇禧从湖南逃入广西后，经过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保安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即董杰第1兵团、鲁道源第11兵团、刘嘉树第17兵团、张淦第3兵团、徐启明第10兵团，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人。企图以桂林

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进入粤桂边的余汉谋所属第4兵团残部据守合浦地区，以确保向海南岛的退路。但是，白崇禧集团连续被歼，已成惊弓之鸟，士气极其低落。

李宗仁到了重庆之后，深知蒋介石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蒋介石派吴忠信携亲笔信自台抵渝，要求由李、蒋两氏发表一个联合宣言，说明和谈失败，李氏自动告退，敦请蒋氏复出领导。吴忠信还带来了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上面赫然书明：“请蒋总裁复任总统，李副主席回任副总统。”于是重庆“请蒋复职”之声鼓噪而起。李宗仁不觉勃然大怒，乃气愤地让吴忠信对蒋回话说：“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吴忠信见此，转而与白崇禧商洽。白崇禧此时已转向蒋介石，他认为蒋之复出已成定局，便帮助吴劝李让步。李宗仁知白已被蒋软化，但为了维护桂系内部统一，同意召开桂系高级会议作一讨论。然而，会议议来议去，未有明确答案。原来，李、白对蒋的态度已有歧异，部下捉摸不透，不便妄作议论。白崇禧便说：“建议德公先去昆明休息一个时候看看局面发展再定行止。”李宗仁也意识到蒋介石数日内必抵渝，不如先行避去，于是便以“出巡”为名，率随员数人，专机赴昆明。

李宗仁飞离重庆，白崇禧同程思远、邱昌渭等，拟出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1）蒋介石宣布复职。

（2）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进行外交活动。

（3）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任国防部长。

此方案由吴忠信飞台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答复如下：（1）蒋介石同意复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

（2）李宗仁出国之议此时不宜提，一提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

至于白崇禧任行政院长之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蒋甚至怀疑李在出国后将进行反蒋活动。

李宗仁在昆明，已摸清“卢汉不稳”的底细，云南省主席卢汉已与共产党暗中往来，有举行起义的可能，当程思远乘专机来向李汇报与蒋妥协不成的消息后，李宗仁便乘专机由昆明飞往桂林，同白崇禧商量最后的退路。

是时，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急急由台北飞抵重庆，他致电李宗仁来渝“共扶危局”。同时电告白崇禧“力促命驾”，并放出话音，谓“白即将出组新阁，兼任国防部长、总领师干。”蒋的来电被李宗仁拒绝，他派程思远到香港，安排他去美国之事。11月20日，李宗仁乘专机飞往香港，尔后由香港飞往美国。

白崇禧靠蒋已定，也于11月20日飞往重庆。蒋见白时虽对李不辞而别表示“不胜骇异”，但对白并未责难，反而抚慰有加，连声说，“德邻走了不要紧，只要与我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蒋又假心假意许白以“国防部长”的画饼之诺。

林彪、罗荣桓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关于远距离大迂回的战术，首先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向云南、雷州半岛、钦州的道路，对敌实行分割围歼。在李、白分手的那一天，第四野战军开始进攻桂北。30日，鲁道源兵团被击溃。12月3日，张淦兵团、鲁道源兵团在博白以南被解放军包围，各个击破，全军覆没。兵团司令、白的得力干将张淦被活捉。4日，徐启明兵团在大寺、上

思撤退途中被歼。解放军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 17.3 万余人，解放了广西全境。解放军于 12 月 14 日占领了中越边境镇南关，白崇禧残部 2 万余人逃入越南境内。

白崇禧在 12 月 3 日乘飞机去了海南岛，他形容憔悴，两眼无神，精神涣散，声语低沉，与往昔神采奕奕、一向自负的“小诸葛”判若两人。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白对李牵制，故于 12 月 10 日派专使到海南请白去台北“归队”。蒋许白去台后“自有重用”，还给白捎去一些金砖，说是发清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

白崇禧对去台踌躇不决，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但李品仙此时已决定投蒋，在台北来电：蒋介石、陈诚都希望白去台湾，共荷“戡乱救国”之责。白遂于 12 月 30 日乘专机赴台，从此落入蒋的严密控制之下，境遇每况愈下，从此消声匿迹，冰消雪融。

广西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批准第四野战军以韩先楚的第 40 军和李作鹏的第 43 军，共 10 万人的兵力组成渡海兵团，由第 15 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是我国第二大岛。它和广东省的雷州半岛隔着宽度有 20—50 公里的琼州海峡相望。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海流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海南岛守敌为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部 5 个军，海军舰艇 50 余艘，飞机 40 余架，总兵力约 10 万余人。尽管第四野战军在解放军中装备最好，拥有远程火炮，但由于海峡过宽，航渡距离太远，登陆地点也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

毛泽东依据金门战斗失利的教训，指示林彪、罗荣桓：“渡海作战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兵力，与 3 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行，而不要依靠后援。”“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 2 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渡海兵团立即作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和训练。

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第二野战军各路大军进兵西南。11 月中旬，贵阳解放，解放军前锋已接近彭水。宋希濂部已撤到乌江西岸。在川北的国民党军南逃的道路已被截断。11 月 21 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接受“约法 8 章”，停止抵抗，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地方秩序，并要求解放军将士在进军途中注意作好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

国民党军队能抵抗解放军入川者，仅胡宗南、宋希濂两黄埔系门生所率领的 30 万人马。蒋介石派蒋经国携带亲笔信去乌江见宋希濂和第 20 兵团司令陈克非，希望他们卖力打仗。但宋希濂纵有杀身成仁的决心，又岂能挽救全国败局，他率部且战且退，愈退愈快。11 月 23 日，就退到离重庆仅几十公里的南川。钟彬的第 14 兵团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陈克非兵团主力也败下阵来。宋希濂在撤退途中，吉普车轮胎破了，赶快换上陈克非的预备胎，才得仓皇续逃。15 军军长刘平狼狈地搭上陈克非的车子，才得以免作俘虏。

11 月 28 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抵重庆市郊南温泉，重庆被围。蒋介石带领蒋经国于次日中午召集军政头目开会，部署国民党政府迁往成都和破坏重



庆市。晚上 10 时，重庆市已枪声大作，蒋氏父子乘车去白市驿机场，途中阻塞，至午夜始达机场，当夜睡在专机里，30 日逃往成都。

重庆即失，成都无险可守，蒋军败势如山倒。12 月 9 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领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宣告解放。蒋军第 22 兵团司令郭汝瑰也率所部 72 军于宜宾宣布起义。

12 月 10 日，解放军周士第第 18 兵团逼近成都，成都市内秩序大乱。卢汉给在成都的刘文辉致电，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蒋介石侍卫人员发现“可疑人物”，蒋见势不好，速奔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逃去台湾。他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4 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再俯视眼底，已是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宋希濂在解放军追击下，节节败退，从川东到川南，狼狈不堪。宋部到宜宾时，他的 10 万大军只剩下 1 万。有人劝他投奔胡宗南，以谋共存，但他觉得寄人篱下俯仰由人，亦非善策。他决定第一步先到西昌去，不行再转至滇缅边境。主意已定，对随行人员做了一番动员。他语气悲凉，在场的人都感到穷途末路，凄然落泪，一部分人自动离去，剩下的人西行。

12 月 18 日，解放军追击宋部，宋的一名警卫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宋希濂听了，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果然，第二天黎明，宋部刚过大渡河，就被解放军包围，经 1 个小时战斗，这支落荒而逃的军队全部被歼，宋希濂也作了俘虏。

胡宗南集团和第 15、16、20 兵团向川西撤退。北路的裴昌会率领第 7 兵团于 12 月 23 日在德阳县西的孝义镇宣布起义，接着李振的第 18 兵团、陈克非的第 20 兵团，罗广文、张荣宪的第 15 兵团都先后起义。

胡宗南于 12 月 23 日偷偷撤下部队，逃出四川，飞至海南岛三亚。蒋介石在台湾不知胡宗南的去处，下令四处去找。最后得到胡逃到三亚的消息，即派顾祝同去三亚“查办”他。顾祝同从中疏通，让胡宗南去西昌戴罪立功，蒋介石正当用人之际，只好宽大为怀。

12 月 28 日，胡宗南飞到西昌。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固守西昌 3 个月，并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但 3 个月的守期未滿，解放军逼近西昌，胡宗南便乘飞机逃之夭夭，去了台湾，西昌解放。

## 第四十三章 海南岛战役

1949 年 12 月 6 日至 1950 年 2 月中旬，毛泽东出访苏联。

毛泽东在苏联期间，不断地与林彪电报联系。他指示林彪，解决海南岛问题，要 15 兵团邓赖洪指挥，琼崖纵队冯白驹配合。邓赖洪即 15 兵团主要领导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

琼崖纵队是海南岛有 20 多年武装斗争历史的共产党部队，并建立了五指山根据地，纵队有 1.5 万人。冯白驹是琼崖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有琼崖纵队作内应，是海南岛作战的最有利条件。

2月1日，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海南岛作战的广州会议，15兵团、第40、43军和琼崖纵队的指挥员参加了会议，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15兵团作了周密的战役准备，广东各级政府和军师两级参战部队共同组织了“船工、船只收管委员会”。先后征集了4000名船工和2100多艘船只，保证一次运载10万以上部队登陆。又将部分木帆船改装成“火力船”，为木帆船安装上汽车发动机，把步兵小炮及高射机枪固定在船上，经过多次试航、试射，造出了“土炮艇”，组成了一支“土舰队”。参战部队经过3个月海上训练，指战员学会了划桨、摇橹、拉帆、掌舵和识别风向、潮汐，掌握了海上作战的多种战术，又培训了600余名水手。

3月5日19时，15兵团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精心挑选出800个壮士组成渡海先遣营，配备了电台和两门迫击炮，分乘13只木帆船起航，顺风顺流，向预定的登陆点海南岛西北白马井地区破浪前进。

先遣营在苟在松的率领下穿过海峡时，风突然停了，木船只能靠划桨、摇橹航行，行驶很慢，不可能按原计划在天亮前登陆。苟在松遇变不惊，当即命令各船准备战斗。

天亮后，苟在松发现有同方向行驶的几十艘国民党军帆船，当即下令各船伪装成民船，尾随国民党船队行进。当遇到国民党巡逻飞机盘旋时，就摹仿前面船队的做法，使巡逻飞机没法分辨。至中午1时，先遣营船队驶近白马井地区预定登陆点，被国民党军察觉。

受到国民党两艘军舰、4架飞机的火力拦截和岸上国民党军队的猛烈射击。在国民党军立体攻击下，先遣营一面奋力划船靠岸，一面在船上以火力还击。预先秘密运动到白马井地区的琼崖纵队一总队第8、9团，从背后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将敌人击退，先遣营登陆成功，并进入琼崖纵队根据地休整。

3月10日下午1时，第43军的一个加强营从湛江市郊洲岛起渡，战胜了途中的暴风雨，顺利地琼东北赤水港一带登陆。

3月26日下午7时，第40军一个加强团3000余人，分乘81只木船在琼崖纵队副司令马白山率领下，从灯楼角起渡。31日晚10时，第43军的加强团3700多人，在师长王东保率领下，分乘88只木船，从雷州半岛东南端博赊港起渡。这两个加强团船只众多，目标大，在航行途中被敌人发现，先后遭到国民党飞机、军舰的猛烈攻击，加强团的“土炮艇”奋起应战护航。第40军加强团因遇海上浓雾偏离了预定登陆地点，在国民党守军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登陆。加强团抱着“强敌面前勇者胜”的信念，实行强攻抢滩登陆，摧毁了守军前沿碉堡群而上岸，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会合。

一个月内，渡海兵团两批4支先遣偷渡部队相继登陆成功后，15兵团便决定以主力实施大规模的强渡海峡登陆。以第40军主力和第43军一部为第一梯队，以第43军主力为第二梯队。4月16日，第一梯队5万余人分乘350只木帆船起渡，分东路、西路编队，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刚离岸8海里，便遭到国民党军的巡逻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渡海将士毫无惧色，用机枪、步枪向俯冲扫射的飞机射击。下半夜，船队遭国民党军舰的攻击。

“土炮艇”迅速开足马力迂回到国民党军舰侧后，对准敌舰艇指挥塔、轮机舱、炮塔等要害部位猛烈射击，打得敌舰上的官兵不知所措，经过彻夜

激战，渡海第一梯队接近海南岛，不顾守敌的疯狂射击，冲向海岸。船队距岸边 60 米处，先头船的将士们纷纷跳入齐胸深的海水，向陆地冲去，琼崖纵队又来策应。17 日 6 时，第一梯队全部在临高角至花港一带登陆，并直扑敌军沿岸据点。第 40 军连续攻克 9 个地堡群，抢占了临高山，包围了临高县城，主力向纵深推进。第 40 军 118 师歼灭了美台地区的敌守军；119 师奔袭加来敌 64 军军部，占领了加来。第 43 军 128 师主力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敌据点，包围了花场港。

敌军主将薛岳不敢怠慢，调集 4 个团的兵力开赴福山，阻止解放军。解放军 127 师先遣团向福山出击，协同 128 师主力将福山守敌击溃，占领了福山。19 日下午，解放军突破了薛岳所谓的“伯陵防线”。

20 日清晨，解放军 128 师在澄迈县城以北的黄竹、美亭地区，将敌 252 师师部和两个团包围。薛岳命 62 军和暂编 13 师，教导师及 252 师的另一个团，对解放军 128 师反包围，薛岳得意地说：“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呵！据我所知共军已没有后续船队渡海，已登陆的共军即将被我全歼。”他忘乎所以地向蒋介石报告：“已包围登陆共军”。并在海口市中心部署召开“祝贺大会”会场。

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解放军第 15 兵团司令邓华决定将计就计，来一个更大的包围，布下了包围圈层层相套的琼北围歼战。他命第 43 军 128 师坚守阵地，顶住数倍敌军的围攻。

又命第 40 军主力急速从琼西北东进，将包围 128 师的敌军大包围，琼崖纵队协同第 40 军作战。

解放军 128 师迅速调整部署，用少数兵力抗击外线围攻，集中主力于内线歼灭被包围的敌 252 师。第 40 军又将围攻 128 师的敌军包围起来，形成了内外夹击的态势。战场上出现了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的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双方都不敢炮战，在许多地方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解放军越战越勇，22 日上午，解放军和琼崖纵队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

薛岳这才知道解放军四野的大部队来了，他想起蒋介石叮嘱他的不要将兵力都拿去拼了，因担心主力被全歼，急忙命令部队撤退。

这次围歼战，解放军全歼薛岳的 252 师，重创其 62 军等部。薛岳的环岛防御体系的核心阵地——琼北守备区土崩瓦解。23 日早晨，解放军进攻海口市，并占领了海口。

薛岳见大势已去，下令全线撤退。他急电台湾火速派军舰来琼南榆林港和八所港，接运部队撤往台湾。薛岳同陈济棠等军政要员，登上飞机，逃往台湾。敌军撤退途中大肆破坏道路、桥梁。7 万名敌军丢弃重型装备，在榆林等港乘船撤往台湾。

整个海南岛战役，解放军伤亡、失踪 4500 余人，击毙敌军 6000 余人，俘虏 2.6 万余人。

毛泽东在 1949 年 7 月 10 日写信给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 6 个月至 8 个月，同时购买飞机 100 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中央军委已在 3 月 30 日成立了航空局。早在日本投降后中央军委就在东北筹建空军，在通化办了航校。教员是留用关东军的日伪人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限于条件，空军建设极为困

难。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信，立即行动，于第二天召见了正在北京的第四野战军第 14 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说了组建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刘亚楼提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四野的 14 兵团机关再加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

是时，刘少奇正在秘密地访问苏联。他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向斯大林提出中国空军建设问题，希望购买 200 架左右的战斗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完全同意，说航校不必设在苏联，可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他还说，中国现在建立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空军便可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

斯大林同意帮助中国建立空军的消息传来，中央军委马上要求预定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迅速组织人员研究空军建设规模问题，他们提出一个比毛泽东原设想更大的建设规划，准备通过向苏联购买作战飞机和突击培训飞行员，在一年内组建一支拥有 300—350 架作战飞机的空军部队，要比国民党空军略占优势，以便在渡海作战时能夺取制空权。

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并同意刘亚楼立即带随员赴苏联商谈空军建设的具体事宜。

12 月初，毛泽东又决定组建海军问题，他召见了第四野战军第 12 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肖被内定为海军司令员。毛泽东征求了肖劲光对解决海军装备的意见。肖劲光懂俄语，又在苏联学习过，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苏联的一些情况。谈话之后，肖劲光便受命组织海军领导机关。

早在 4 月下旬，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接收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的基础上着手组建工作。蒋介石最害怕中共军队拥有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一旦出现蒋军舰艇起义投诚，蒋介石即下令出动空军对其轰炸，具有 5270 吨位的巡洋舰“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舰艇。“重庆”号于 2 月起义后，立即遭到国民党空军不停的追踪轰炸，负伤后被迫在葫芦岛码头自沉以保全舰体。以后国民党海军有多艘军舰起义，结果也多被炸沉或自沉。

蒋介石向国民党空军提出“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对东南沿海城市、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机到舟山群岛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华东乃至武汉。

1950 年 1—2 月间，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及华东沿海港口连续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解放军三野部队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2 月 6 日，国民党空军机群分 4 批轮番轰炸上海发电设施，炸死炸伤上海市民 1400 多人。使上海电力丧失 90%，多数工厂停产瘫痪。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于 1950 年 2—3 月间派出一个空军师到上海、徐州担任内地防空任务。该师装备了米格 15 和拉 12 飞机共 99 架。米格喷气式飞机在上海机场出现，使国民党军十分惊慌，国民党空军连续被击落 5 架飞机，从此，不敢进入上海地区。

1950 年 5 月，解放军空军在南京组建空军第 4 混成旅，终于有了一支可以配合陆军作战的空军力量。5 月间，可以用于海上作战的华东海军第四舰队也在上海组建，装备了大型坦克登陆舰 10 艘，中型坦克登陆舰 9 艘。大批的船只也在浙东、苏南沿海集结。陈毅、粟裕的第三野战军积极准备对

舟山群岛的登陆作战。

蒋介石判断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对舟山群岛的攻击。国民党军在舟山的守军有 15 万，是国民党陆军的 1A3，亦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蒋介石为保存实力，便于 5 月 11 日给在舟山的国防部副参谋长郭寄峤、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群岛防卫部司令官石觉写了亲笔手谕，部署秘密撤退，规定 12 日晚间开始登舰，并期于 15 日至迟 16 日上午，必须全部撤退。

5 月 13 日，舟山撤退秘密开始。守岛国民党军队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 2 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往船上，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花费了 4000 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被彻底炸毁。

5 月 16 日，解放军发现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立即以 3 个军的部队渡海，17 日占领了舟山本岛。

海南岛解放、舟山群岛占领，毛泽东下一步棋就是进攻台湾岛，台湾顿时进入战时状态。台湾是不是能守住？已经成为台北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台湾岛上，沉浸在一片悲观与惶恐的气氛中。《中央日报》的社论大声疾呼：“我们国家实在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军政总部，发动各部队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要做到“成功成仁誓为国死”。

台湾岛的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山脉占去 2A3，但可耕地不及 1A3，原有人口 600 万，人民生活粗可温饱。蒋介石一下子带来军民 200 多万，人口骤增，经济恶化，生产失调，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根据台湾国民党当局颁布之平均物价指数，1949 年是 1945 年抗战胜利时的 7000 余倍。好在金库里尚存从大陆劫掠来的几千万两黄金，但也只能稳定一时。

## 第四十四章 残喘台湾

国民党在军事上，从大陆撤退下来的蒋军，号称 60 万之众，但实际上这些未经整补训练的残兵败将，是乌合之众，根本无战斗能力，早已成为惊弓之鸟，或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空留番号。官兵成分也是五花八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空军有 8.5 万人，各型飞机 400 架，但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只有半数。汽油储量也只有 2 个月。

海军有 3.5 万人，舰艇约为 50 艘，与空军面临相同困难；零件、燃料皆不敷接济。

经济严重困难，人心不稳，台湾人民对蒋介石的“光临”并不欢迎。台湾人民被日本奴役长达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盼的是过上自由康乐的生活。但随着国民党大员的到来，腐败风、涨价风也随之吹到台湾，造成工人失业，市民破产，农民陷于生活绝境。

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曾在大陆有几年热闹风景，如今落得风流云散，分崩离析。

宋子文没有陪妹夫蒋介石在大陆坚持到底。中共把他列为重要战犯，国民党内又有人说他侵吞巨款，要他至少交出全部财产的一半。美国人大骂

蒋介石政权腐败时，也总忘不了把他扯进去。他在大陆无法呆下去了，便于1949年1月辞去广东“省长”职务，带着妻子张乐怡先走香港，转巴黎“治病”，6月10日踏上美国，去料理他的大量家财。

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促成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成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第一号聚敛之臣，曾一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3要职。终因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被宋子文、政学系、CC系联合挤下了台。于是，宋霭龄从美国来电，称她要在美国开刀，要他前往。孔遂于1947年去了纽约，住在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经营他的银行业去了。

陈果夫、陈立夫随国民党党部一起迁来台湾。陈氏兄弟当年深得蒋介石知遇，成为蒋介石反共事业的中坚，他们结党营私，形成了渗透于党、政、军、文化教育、财经各方面的CC系。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感到，自己的统治正面临着CC派的潜在威胁，从而埋下了蒋陈明争暗斗的种子。陈氏兄弟为了扩大实力，常常以党内民主派的姿态出现，对蒋多有微词。蒋介石想让蒋经国逐步接管党务系统，而CC派却不给面子，霸住阵地不让。1946年3月，蒋介石想让陈果夫让出中央组织部长而外放为浙江省“主席”，他对陈果夫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当即顶撞说：“现在中央谁又做得好？！”他不肯让出组织大权。

CC派还想扩张势力，建议把蒋经国任教育长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与CC派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党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企图吞掉蒋经国的三青团干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将计就计，提出由自己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由蒋经国任教育长。CC派便暗中唆使“政大”学生闹事，在公告栏中贴出校长蒋中正的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学生们怒吼：“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蒋介石获知，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但小蒋因此未能当上教育长。

1947年秋，蒋介石把国民党与蒋经国的三青团合并。蒋经国率领大批亲信进入党的中央，硬性打入CC派的势力范围，矛盾因此加深。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前召见有关人士，将积蓄已久的愤懑爆发出来，破口大骂：“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然后他转脸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一班人。”他赌咒发誓，今后永不进中央党部的门。

蒋介石到台湾后，觉得CC系是个累赘。在大陆时，蒋为了借重CC派对付其他派系，不得不倚重二陈。在台湾孤岛，桂系集团已彻底崩溃，其他地方派或是有将无兵，或是有兵无将，均不成其为目标了，只剩下CC派了。而蒋介石也从自己人生的大起大落中，看透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决意将来要由骨肉至亲的蒋经国继承“大宝”，卧榻之侧，自容不得陈氏兄弟酣睡。再者，美国人早就因蒋、陈勾结而对国民党有所抨击，为了取悦美国而牺牲二陈，是合算的。

CC派又与蒋介石的“顾命大臣”陈诚闹得不可开交。陈诚亲历了国民党由兴盛而衰败的历程，深知人心的力量比飞机大炮和原子弹还大。他在台湾任“省主席”，特别是“行政院长”之后，想进行各项改革以稳定台湾局面，因而他希望其“行政院”的令行有威，要求援例享受“立法院”授予“行

政院”可以行政令代替法律的特权，遭到陈立夫把持的“立法院”拒绝。陈诚仍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又被“立法院”予以否决。陈闻讯大怒说：“授权案乃是被他 CC 派所否决，从此行政院长只有陈立夫能当，本人决心马上辞职。”并宣布“行政院”立即休会。

陈诚又向蒋介石告状，建议把陈立夫和 CC 派骨干统统送到火烧岛去监禁起来，陈立夫见事情闹成轩然大波，而蒋介石又偏向陈诚，便避居到台中去了，并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国。

蒋介石本来就想驱逐陈立夫，他已经不看陈氏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他送来的文件，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常委召开的会议。于是蒋托卧病于榻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准许其离开台湾。同时，蒋经国和陈诚请 CC 派的两员大将余井塘、张道藩吃饭，饭后陈诚请余、张给陈果夫传达蒋经国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鉴于蒋介石不出席中常会，也退而不看中央党部的文件，1950年6月22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时，CC 派大将肖铮提出建议：全体中常委自觉辞职，以便让蒋总裁实施对党的改造。此建议被通过，并派于右任、居正、邹鲁3元老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胸有成竹，随后召见陈立夫问：“你们兄弟俩跟我一起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几十年，当初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个海岛上来吧？”陈立夫摸不清蒋的用意，顺口应道：“确实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又问：“我不知道你对我党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陈立夫察言观色，沉默片刻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3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不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蒋介石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再出声。

7月下旬，蒋介石宣布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仅有陈诚、蒋经国、张道藩、张其昀等16人。CC 派只有张道藩、谷正纲两位幸存者，其余14人中有10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包括蒋介石的侍从秘书5人，余下的不是蒋经国的亲信，便是陈诚派的成员。这个16人的小班子，取代了原来460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陈立夫在四周的舆论压力下，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离开台湾去美国，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而陈果夫则于1951年8月病死于台北。

其他非蒋派系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以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为首的政学系，也逐渐瓦解，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虽然尚未烟消云散，但也已日薄西山。张静江、戴季陶一手扶植的朱家骅也早已失势。台湾成了蒋介石的一统天下，国民党成了蒋家店。

有很多国民党要员，更把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在蒋氏父子退台前，纷纷带着金银细软外逃，自我放逐。曾任“台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滞留香港；原大名鼎鼎的徐州“剿总”总司令的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尼当了华侨中学教员。

国民党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有1300余人，有的留在大陆，有许多人已成为北京新政协的代表，有的则不知逃向何处，担任过“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在撤出大陆时，任“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主任”，不愿跟随蒋介石而寓居香港，蒋介石请他去台，并说，若不愿去台，由经济部赠美金5万元请他赴法国研究及讲学，以免翁文灏北上投奔新中国，翁便到法国住

了一年多，他思乡心切，向往新中国，终于辗转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人的热烈欢迎。翁文灏的两名助手，原“民国国营事业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孙越崎从香港起义到北京，受到新中国的重用。

有些从大陆迁台的企业家，机器设备刚运到台湾，终于放心不下，又高价雇船，将机器迁到南美去了。

1950年新年伊始，对蒋介石集团并不吉利，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元月5日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抛弃台湾：“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没有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谋求特权优惠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意利用其军事力量干预现状。美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美国政府不对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意见。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资源足以使他们获得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美国政府建议在现行立法许可范围内，继续执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方案。

同时，美国宣布从台湾撤退侨民。

这无异给了蒋介石当头一重棒。蒋介石赶忙下令让平时受到严格新闻控制的台湾报纸，不得登载半纸只字；只有少数几个掌权者，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蒋夫人宋美龄，逗留美国经年，备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950年1月13日默然归台。

原来，美国在1949年底得到密报，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冷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有隙可乘，如能使毛泽东“铁托化”，与美苏保持等边关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艾奇逊的主张，符合杜鲁门心意。于是当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访问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美国乘隙而入作文章。当然美国政府早已对蒋介石集团冷淡。在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将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昏庸、专制、无能一一历数，以说明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美国支持不力，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并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去一封电报，通知李，由于时势与环境的需要，他已在台北复任“总统”，希望李以“副总统”的身份在美国作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李宗仁立即通过甘介侯在美国各报刊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为违宪行动。李引证“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3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他指责蒋介石说，即使我“代总统”缺位，也该由“国民大会”来补选“总统”，你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已成为一个平民，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对李的声明，蒋介石置之不理。

美国政府收到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的正式通知，又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政府”的“首脑”，还声明说，关于谁是中国“总统”的问题，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的问题。

蒋介石复“总统”职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记”独家统治。但他的亲生子蒋经国资望尚浅，此时不便一下子把他摆在太惹眼的位子上，怕弄出“蜀中无大将”的寒酸相，有碍各方的观瞻。因此，必须另外物色人选出任“行政院长”。这个人必须对老蒋、小蒋都忠诚不二，既能帮助老蒋支撑眼前局面，又能保证小蒋的地位稳步上升。



符合这些条件者，只有陈诚。

陈诚是四星上将，历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东北行营主任”、“参谋总长”、“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陈诚的优点是治军严格，要求部下不贪财，不怕死，在军中实行人事、经济、意见三大公开，个人操守比较廉洁检点。在贪污腐败成风的国民党显贵中，确属佼佼者。但更主要的是陈诚对蒋忠诚，他与小蒋的关系处得又好，因他的夫人拜宋美龄为干妈，与蒋夫人的关系也非寻常。

于是，蒋介石让陈诚代替阎锡山出任新的“行政院长”，组织台湾“内阁”。陈诚的台省“主席”位子由美国人欣赏的吴国桢递补，吴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向推崇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套法制，有“民主先生”之称。“陆军总司令”一职由孙立人担任。孙立人也在美国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在军中一副美国式作风，也很讨华盛顿喜欢。美国人很早就寄希望于吴国桢和孙立人，希望他俩掌握实权甚至取代蒋介石。1949年10月，郑介民受蒋介石之命出使华盛顿。郑从美国携回3方案，其中之一是美国希望台湾厉行改革，由吴国桢担任台省“主席”，使台湾“人民获得更多的参政机会”。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内外交困，阮囊羞涩，争取美援是它的第一要务。蒋介石任用吴国桢和孙立人是为了讨美国的青睐。他对争取美援，一往情深，从未气馁；然而一旦达到目的，就立马换人。

孙立人曾在抗战中立下卓著的战功，美国人称他是“史迪威的孩子”。后来孙奉命调任“陆军训练司令”，赴台练兵，他有3个军的番号，美国人又称他训练的军队为“新军”，称他为“伟大的军事家”、“常胜将军”等，又向李宗仁和蒋介石建议由孙立人出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以攻为守，表示愿意让位给孙；蒋介石也向孙表示格外亲切。但这不过是陈诚和蒋串演的一出双簧戏，陈诚不仅没有从省“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反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孙立人见到美国人时情绪低落，埋怨美国人不肯及时行事，落得一场空忙。美国人便通过各种渠道，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防止蒋介石去台。

蒋介石去台湾之前先到马公岛，并想办法探测孙立人与美国的关系已达到多深的程度。他派国民党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去见孙立人，由陈为他投石问路。陈向孙立人说：“蒋先生不想亡命国外，但求台湾一席之地。若孙将军以为未便，则他父子迳去马尼拉矣。”孙立人听后吓了一跳，知道蒋对他不放心，便连夜召集人商量对策。次日，孙立人率部下去马公岛，表示欢迎蒋介石去台。孙立人说：“台湾一切当以领袖之命是从！”蒋介石这才稍稍放心，高兴地握着孙立人的手说：“蒋某人从此息影田园，再不过问政治。孙将军将来可以出任陆军总司令。”蒋经国被安排在“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编阶为三星上将（二级）。官衔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之大。他主管的政治部，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去大陆的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另外，蒋经国又兼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长，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因此，吴国桢当面对蒋介石说，经国兄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蒋介石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白崇禧被蒋骗到台湾后，挂了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实际上处在一种无形的软禁状态。一次，白的妻子去香港，到了机场，检查人员对她说：“你的皮包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寄去，不应该由你带去。”白的妻子果然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什么要事，不必交出

邮寄了。

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经国派人去检查过，连地板都被挖开搜查一遍。名义上说是对所有人都要搜查，实际上，只有白、薛两家如此。每逢当局攻击李宗仁时，白无例外地都要随声附和，发表一通攻击李的言论，以明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模样，台湾的同人见了为之可怜。

何应钦到台湾后，也只是挂了个空有其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牌子。何应钦自知大势已去，因此处处做出一副绝意于政坛的样子。自称是除了“三打”之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桥牌，二打猎，三打球。后来他又转而成为所谓“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写写“道德”文章。一次，何应钦去东京，久久未回台湾，蒋介石便起了疑心，急派张群去东京“促驾”。

阎锡山到台湾后，当了几天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后改任“总统府资政”。蒋介石不让他染指自己的“反共大业”，他只有躲在台北附近的一座山上，写空头反共文章去了。

顾祝同、汤恩伯、胡宗南之辈也都统统靠边站。

蒋介石复职以后，急切地采取措施，安定台湾局面。1950年3月，他在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面对2000名国民党中上级干部，作了一次演讲，其要点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政府”；(3)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一贯板起面孔教训人，如今能当众认错，同时众人又亡命海外，同病相怜，因此，与会者大多落泪。

蒋介石觉得是狠抓改造的时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独思党政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顿军队，以求内部精纯，团结一致。”蒋介石越想越觉得，国民党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

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了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决心：“父亲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凡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彻底与共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而让有为之志士革命建国也。’父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改造本党，无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蒋介石以16人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个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48岁；蒋又使三军首脑年轻化。任命周至柔为“国防部长”、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王叔铭为“空军总司令”、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

蒋介石痛定思痛，得出结论：政治工作尤为重要。他强调，要和共产主义战斗，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首要的问题是加强政治宣传，以收拾人心，鼓舞士气。他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硬要人们相信，台湾会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并且还订了“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日程表。

蒋介石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令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以从上海偷运来的200万两库存黄金为准备，限额发行新台币2亿元。每新台币1元合旧台币4万元，每5元新台币合1美元。此项币制改革，遏制了通货膨胀，使之不演变为恶性。

蒋介石一贯反对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他亡命到台湾之后，不

得不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实行“三七五减租”。此前台湾佃农要缴纳收获量的 50%乃至 70%给地主。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后，佃户可从收获量中减除 25%的肥料等实际费用，其余部分，再由地主和佃户对半均分，各得 37.5%。

在治安方面，蒋介石的措施更为严厉，他让陈诚以“行政院”名义发布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接着又公布了检肃“匪谍”条例，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必须告密检举。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保甲连坐法”的翻版。同时，禁止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管理书刊出版。是共产党人者，则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不必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是枪毙人的刑场；在那些岁月，频频传出枪毙“匪谍”的枪声。大逮捕大屠杀，令人恐怖异常。蒋经国所指挥的 5 万多人的特工队伍，气势实不亚于明朝的锦衣卫。

1950 年 3 月，台湾最大的两家企业的总经理被枪毙。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人事室主任林良桐以“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产党来接收”之罪被枪毙，其部下多人被判刑。

但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以“其子在台大参加左倾团体被捕，刘将他保释出狱后，纵其赴大陆”罪名被枪杀，刘晋钰的职员严惠先以“通共嫌疑”罪而被杀。

台湾当局又称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如吴石案、蔡孝乾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等。《中央日报》仅在 1950 年上半年以《匪谍 × × × 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内出现好几次，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母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课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 第四十五章 大军进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日，第 10 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和朱德：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20 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又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进军西藏。

11 月 23 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表示嘉勉：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西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但是 40 年代初之后由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西藏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占了上风。1949 年 7 月 8 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要他们全体人员及眷属立即离开西藏，这即是所谓的“驱汉事件”。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于 1950 年 7 月，派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西藏，但格达活佛 7 月 24 日刚刚到达昌都，就遭到英国特务福特部署的阴谋阻挠，不能前往拉萨，并于 8 月 22 日被福特在饮食中下药毒死。死后全身发黑，皮肤手触即行脱落。

同时，西藏反动分子扩军备战。组织应变机构，设立“外交局”，成立“藏军司令部”、“军饷收发局”，将藏军由 14 个代本扩充为 17 个代本。在阿里、黑河、昌都一带布防，企图与解放军对抗。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命令解放军向西藏进军。10 月 7 日，解放军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向西藏进发。藏军在昌都进行顽抗，企图阻挠解放军前进。解放军向昌都发动猛攻。至 10 月 19 日，昌都战役结束，歼灭西藏军 6 个代本的全部。3 个代本的一部，争取 1 个代本起义，共歼敌 5700 余人，解放了昌都。

11 月 1 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政治动员令，向西藏进军。

以大札为首的西藏反动分子眼看解放军就要挥师入藏，便挟持 14 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企图把达赖带到国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卷土重来。

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于 11 月 10 日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解放军入藏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样供职。

以大札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的活动，引起西藏三大寺和一些官员的反对。1951 年 2 月，大札摄政下台，由 14 世达赖“亲政”。达赖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 5 人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前往北京谈判。

阿沛一行在北京同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进行谈判，所有重要问题都获得解决。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签字仪式。17 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有：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出西藏，实现祖国大家庭的统一；西藏地方政府协助解放军进藏；巩固国防，藏军逐步改编为解放军；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必须实行；实现西藏内部团结，主要是达赖和班禅的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发展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

协议签字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靠我们努力。”7 月 16 日，中共代表张经武在亚东会晤了达赖，并交给他毛泽东的亲笔信。8 月 17 日，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

9 月，西藏召开僧侣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和平解放协议。10 月 24 日，达赖致电毛泽东，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决议。10 月 26 日，解放军在张国华、谭冠三将军率领下，进抵拉萨。随后，解放军进驻黑河、日喀则、江孜、隆子、亚东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上喜马拉雅山之巅。

至此，中国大陆领土全部解放。

西藏解放后，中央政府大力帮助西藏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修通了西藏全境主要地区间的公路；在各地开办公费医院，为藏民免费治病；设立学校，让藏民子弟入学；开办工厂、农场和牧场，发展西藏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举办低利贷款，扶助西藏贫苦人民发展生产；设立国营产业机构，高价收购西藏土特产，廉价供应西藏人民的日用必需品，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措施，得到西藏广大民众热烈拥护，西藏的落后面貌迅速改变。

从 1950 年秋，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逐步展开。在总结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新区土地改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将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把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的政策改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均不没收；规定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在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 200% 者均保留不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团结和保护中农；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对使用机器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场、牧场，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土地改革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分批分期进行，一般在冬春农闲时进行；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

毛泽东提出要求说：“现在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1951 年全国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长 26.9%。

但是，国民党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同国民党在大陆的潜伏势力勾结起来，利用大批恶霸、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武装进行破坏活动。仅贵州遵义地区，共产党就破获了“反共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后方救国委员会”、“反共救国军”、“反共保产动员会”、“平黔军”、“游击纵队”等几十种，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人一般拥有武装，盘据和流窜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地方。

从 1950 年至 1951 年 5 月，仅广西一地，土匪特务组织暴动达 52 次，袭击区、乡政府 247 次，围攻县城 52 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 3703 人。1951 年 6 月，贵州仁怀县，除县城及附近村寨外，其余乡镇全部为土匪所占，26 个原国民党政权的乡镇长，有 22 个叛乱为匪。

在 1950 年春到 1950 年秋，全国有近 4 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1950 年秋，在北京破获了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准备武器，预谋在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案件。

1951 年上半年，国民党土匪、特务在湖南零陵、广西恭城、湖北汉口等地纵火焚烧民房，抢劫财物，使数万人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严重。广西在匪患严重时期，交通阻塞，行旅不通，农民不能耕种，工人不能做工，商人不能经商，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威胁和恐吓积极分子，离间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除此而外，他们还制造事故，破坏生产，恐吓农民，破坏

土改，腐蚀收买干部，刺探收集情报等。一向比较平静的东北地区，从 1950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11 日，一个月內，铁路上共发生大小政治事故 154 起。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半老区，也不断发生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的事件，他们威胁农民退回土改中所分得的土地、耕牛和房屋。

1950 年 7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解放军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和镇压。在城市，勒令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登记，通令取消各种反动会道门，并破获了一批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杀、关、管了一批特务、土匪。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对盘踞在湘西、桂西、贵州等地的土匪进行了围剿。

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 10 月，在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先后剿灭土匪数十万人，搜捕特务分子 1397 人，缴获电台 175 部，破获国际间谍 7 起。

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干部滋长和存在一种和平、轻敌的麻痹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已经胜利，天下已经太平，有几个泥鳅翻不起大浪，对反革命分子一味宽大，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力，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恶分了镇压不够，该杀的未杀，该捕的未捕，重罪轻判，久押不问，甚至对捕获的匪特“4 捉 4 放”、“8 擒 8 纵”，致使一些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得到镇压，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一些坏蛋今日释放明日做案，此处释放彼处做案；有的地方土匪越剿越多；有的反革命分子把公安局叫“公安店”，把人民法院叫“司法旅馆”，甚至有的在监狱中公然叫嚷：“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人民群众批评政府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民主人士批评政府“姑息养奸，遗害人民”，并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

195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开始纠正镇反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公安部召开了公安会议，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指示，规定镇压反革命运动，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必须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 3 年，即从 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秋，大体经历了 4 个阶段，即发动阶段（1950 年 10—1951 年 2 月）、镇压阶段（1951 年 2—5 月）、清理积案阶段（1951 年 6—10 月）、扫尾和建设阶段（1951 年 11 月—1953 年秋）。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 150 万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50 万人，另外还有 150 万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

镇压反革命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大陆上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焕发，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 第四十六章 经营“家天下”

至 1950 年 6 月份，解放军人数已经达到 540 万的庞大数字。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及经济建设的需要，除了保证有足够的力量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及镇压反革命，经毛泽东批准，准备在 1950 年下半年复员 140 万人，使部队保留 400 万兵力。

此时，发生了朝鲜战争，金日成的部队和李承晚的部队在三八线激战。驻日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兼任朝鲜战场联军总司令。6 月 25 日，蒋介石收到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的急电，询问蒋能否派一个军赴朝作战。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兵赴朝问题，并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蒋介石拍板出兵后，立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其中包括派遣主力 52 军附加第 13 师共 3.3 万人出兵朝鲜，准备经空中和海上将部队运到朝鲜战场。

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授意驻美“大使”顾维钧及在美文化名人胡适赴白宫拜会杜鲁门总统，面交了蒋介石向杜鲁门建议派 52 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

杜鲁门召集美国军事与外交的高级官员会议，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经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讨论的对朝鲜战争的 3 项建议：(1) 向南朝鲜运送军援计划外的武器装备；(2) 动员空军掩护美国侨民撤退；(3) 命令驻菲律宾的第七舰队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共军队进攻台湾。并希望第七舰队实行双向封锁，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艾奇逊认为蒋介石诡计多端，居心叵测，只是想达到要美援的目的。

艾奇逊劝阻了杜鲁门不要让蒋介石的军队卷入朝鲜战争。他说：“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共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军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干预朝鲜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湾。”美国三军参谋长们也明确表示避免蒋介石卷入。此外，已经开始中英建交谈判的英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一起并肩作战。美国权衡利弊，也只能采取取英舍蒋的方案，拒绝了蒋介石的援军。

6 月 27 日，杜鲁门政府下令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两天后，第七舰队的 6 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开始在台湾海峡巡戈。7 月，美国又增派 13 航空队常驻台湾。

蒋介石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其目的是直言不讳的：他期望通过赴朝作战，就可以从北朝鲜进攻东北，或者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如意算盘。蒋介石提出的出兵建议无效后，于 1950 年 8 月又通过麦克阿瑟，提出派 1.5 万人的“志愿军”的名义入朝，结果又遭到美国拒绝。美国认为起用国民党军队只能有一点表面价值，却会遭到英国等盟国强烈反对，还有引发同中国的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认为，即使暂时无兵可派，也不能引蒋入朝。当蒋介石第 3 次提出出兵朝鲜的时候，杜鲁门却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蒋介石参战的用心，是在于挑起美国和新中国之间的大战，因此杜鲁门不能让蒋介石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其企图。最后，杜鲁门不但拒绝了蒋介石出兵的要求，还干脆以指挥权调整的名义，把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截然分开。蒋介石为此对杜鲁门抱怨甚深。

为配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蒋介石发出“反攻大陆”的疯狂叫嚣，在台湾孤岛发起了所谓“国民党改造运动”。蒋介石强调，改造国民

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首要的任务是检讨过去，反省缺点，必须从痛苦经验中寻求教训，以沉重的心情赎罪。

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1) 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2) 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3) 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切实铲除。在积极方面，首先要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9月1日宣布《本党改造纲要》，同时宣布“现阶段政治主张”，提出所谓的“4大主张”：(1) 坚持反共抗俄战争，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2) 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主张配合国家建设计划，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者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国营企业应加整顿，民营企业应加扶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对外贸易尽量发展；更主张厉行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平均社会的财富。

(3) 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主张本着“宪政”的精神，贯彻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决心，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树立坚实的基础。

(4) 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点是党员归队和党员整肃。

1950年9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发布《党员归队办法》，号召党员归队。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只见党部，不见党员，组织系统完全涣散。掀起党员归队运动后，办理党员归队，使脱离组织的党员再度纳入组织，并趁此机会清除所谓的“动摇腐化、信仰不坚定分子”。

国民党整肃也有标准，根据《改造纲领》的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为整肃对象：(1) 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

(2) 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

(3) 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

(4) 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

(5) 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

(6) 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

(7) 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

(8) 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

国民党整肃的程序，初步以小组为基本单位，互相检讨。对被检举人应作调查，被检举人可提出申辩，并将检举书、答辩书及调查报告，逐级转呈国民党中央核定。干部的整肃，由其所任职务单位的“改造委员会”或区党部及小组办理。干部的整肃，即可由下而上，也可由上而下进行。

在“整肃运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指导各级组织进行层层“改造”，重建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和组织系统。其党的组织，在小组之上，便是区党分部及县（市）、省等地方党部。地方党部直接与当地民众接触，参予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地方自治的推行。除省、市、县等地方党部之外，又有职业党部及知识青年党部和海外党部。

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协调党政关系与开展民运社调工作。关于党政关系，其基本精神是：以主义制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并规定：在民意机关如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以及省、县议会、乡镇民代会，保民大会中建立党团或党部，而在政府机构如行政院、考



试院、司法院、省、县政府、乡、镇公所中，则成立党员的政治小组，原则上实行党政分开。关于民运工作，则向国民党全体党员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如号召党员“深入民众，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利益，党员能为民众利益而奋斗，藉以巩固党在民众中之组织与领导”等等，并制订了“中央民运工作会报简则”，提出国民党的“民运工作”实施措施：(1) 为广大农民利益而努力。

(2) 为广大劳工利益而努力。

(3) 妥善照顾“全国”青年。

(4) 提倡女权，团结“全国”妇女。

国民党在改造过程中还提出“沟通全党思想，发展群众路线”，开展“社会调查”等任务。

1952年2月，国民党又掀起了所谓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发表了《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纲领》，其主旨是所谓“联合党、政、军3方面的力量，发挥全国人力、物力，建设台湾基地，俾早日光复大陆，争取反共抗战战争的胜利。”为促进“总动员”运动的实施，分别大力推行经济、社会、文化、政治4大“改造运动”。“经济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互助合作，调整经济结构、维持币值稳定、保障投资安全、促进劳资合作、发展出口创汇、厉行增产竞赛等；“社会改造运动”则主要是转变社会风气、培养“民主法治”习惯、厉行战时生活、加强民众组织等；“文化改造运动”主要是进行“青年救国运动”，筹组“青年救国团”，创造三民主义的“新文化”等活动；“政治改造运动”则包括实行行政三联制、充实地方自治等政治方面的“改革”。

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从表面上看，大有“脱胎换骨”的气势。历时2年又3个月的改造活动，在蒋介石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通过“改造运动”，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组织，稳定了国民党的内部，并相对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在“改造”运动中吸收了大批所谓“爱国的革命分子及优秀青年入党”，又从本地人口中吸引新党员，增加了党员人数，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给国民党充实了一定的新生力量。1951年国民党知识分子党员占61%，农民党员占37.7%，而30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41%，初步实现了国民党的知识化和年轻化。同时，有计划地训练了国民党的高、中级干部，确定了各级党部的监察制度等。

蒋介石通过“改造运动”，对国民党加强了控制。其腐败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在岛内民众中的声誉也有所好转。由于强化了组织，国民党对岛内的统治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四大改造运动”中贯彻实行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初步确定了台湾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方向。然而，国民党在本质上仍未发生任何变化。

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央委员，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同时，设立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一批失去权势的国民党元老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48人被任命为评议委员。

随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最终成为泡影。但通过“改造运动”，蒋氏家族在台湾的统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逐渐崛起，成为台湾“政坛”最有潜力的政治集团。

蒋经国 1910 年 3 月生，是蒋介石的长子。1925 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后滞留在苏联 13 年。1937 年回国，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 年 6 月加入国民党。“改造”之初，蒋经国只有 12 年党龄，便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改造委员”。在“七大”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常委，进入国民党组织最高权力阶层。

蒋经国“太子系”的班底是“三千一俄”。“三千”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等，战干团的学生以及 1952 年开办政工干校的干部；“一俄”则是指留俄时的同学。在“三千一俄”中，赣南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位卑名微，“一俄”则为蒋介石所忌讳。政工干校蒋经国则下了大力经营，俨然是他的黄埔，“太子系”门生多出于此。

1952 年 10 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

“救国团”是三青团的借尸还魂，是国民党的预备队，而蒋经国则利用“救国团”作为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

无论是中央“改造委员”，还是中央常委、“救国团主任”，都是明是一盆火；而蒋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又暗是一把刀。他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调查官兵思想行为，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实权超过三军统帅；又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名义，操纵台湾特务机构，逐步掌握台湾的特务情治系统，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之上。

蒋经国在国民党组织系统内的地位迅速上升，为日后蒋经国的上台，实现蒋介石的“家天下”作了组织准备。

既然“改造”的意图是重新分配统治权力，调整上层统治结构，就难免充满着人事倾轧的意味，虽然元老派大都已经降伏，然而国民党内新起的政治势力却并不都一心情愿地拜伏在蒋氏父子的脚下。集权的背后，反抗独裁、向往民主的思潮，逐渐在孤岛内外知识分子阶层兴起。于是，便发生了“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兵变案”。

吴国桢 1903 年出生在湖北，1926 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归国，历任国民党政府外文部秘书、科长、副司长、湖北省税务局长、汉口地政局长、财政局长，1932 年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不久改任江西盐务、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1942 年改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颇具才干，为蒋介石所赏识。

又独得美国政府青睐，于 1949 年 12 月担任了台湾省“主席”。当时，蒋介石要吴接替陈诚台湾省主席职务时，吴国桢谦逊地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较为和陈合作。”蒋介石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就任“台湾省主席”的当天晚上，便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 4 点施政纲领：（1）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2）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3）推进民生主义，为人民谋福利；（4）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他宣布起用台籍人士。

吴国桢认为蒋介石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于是刷新吏治，厉行改革。一时间，台湾省“政局”也有些可观之处。他自恃有美国人作后台，有时难免恃宠而骄，同到处抓权的蒋经国发生冲突。

吴国桢同小蒋的不快可以追溯到 1948 年。那时吴任上海市市长兼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奉命赴沪任经济副督导员，他用铁腕手段，全面打击投机商人，

同吴发生意见分歧，引起正面冲突。吴国桢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

吴亲赴南京，向老蒋力谏，剖陈利弊。小蒋则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认为只要争取上海民众的通力合作，施用铁腕手段，通货膨胀是可以控制住的，然而“扬子案”的风波，把小蒋那份声威志气一扫而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小蒋以失败告终，乘兴而来，落荒而走。

到了台湾，蒋经国身为“太子”，“中华民国”当有其一半，而且以情治特务头子的身份，到处插手，凌驾于一切军政要员之上。吴国桢又是“难得糊涂”的角色，不愿意装聋作哑。于是，吴蒋潜在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冲突不断升级，形同水火。

蒋、吴冲突的焦点，首先在军事与治安权上。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陈诚任省主席时，因不能分出精力来兼管，一切都委诸副司令彭孟缉等去全权处理。吴国桢接任省主席，也兼任保安司令，但不得不因袭陈诚的旧规，保安司令部的事，基本上无从插嘴，而獐头鼠目的彭孟缉早已投效到蒋经国的麾下，同蒋经国互通声气，听其驱使，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国桢放在眼里。

特务机关毫无法制而言，抓人无正当手续，往往公民失踪，家属无法知道，就连吴国桢这位保安司令也茫然无知。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 14 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然而蒋经国、彭孟缉根本不理睬。1950 年某天，“省政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被捕，抓人的又是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国桢召见副司令彭孟缉，令其查明原委。

原来台湾火柴公司的总公司原设上海，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吴性裁留在大陆，于是保安司令部将吴列为“附匪商人”。吴在大陆从事电影事业，拍摄了一部《民国 40 年》的影片，其中有对国民党、蒋介石诸多“诋毁失敬”之处。蒋经国通过情扳机关获悉，勃然大怒。然而无奈吴性裁何，于是下令彻查台湾火柴公司，逮捕王哲甫。

## 第四十七章 无奈的“金刚计划”

吴国桢认为王哲甫同吴性裁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于是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王哲甫。彭未执行，并同蒋经国一起见吴国桢。蒋经国说，王哲甫有罪不能释放，吴国桢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吴责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蒋经国走后，当天晚上，“总统”贴身秘书周宏涛来见吴国桢，奉命转达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吴国桢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蒋先生看你的面子，将王的死刑改判 7 年徒刑。”在这次事件中，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另外一次事件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蒋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检查户口为名，一夜间逮捕 398 人，其中仅 19 人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吴国桢作为省主席和保安司令，不得不出面干预，将人全部释放。但大

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基隆市有两位议员于午夜失踪，吴接到报告，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后又推到保安司令部某处长身上。那处长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吴国桢下令他在3个小时内开释。开释后，吴召见此两位议员。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就不要再追究真相了，原因是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因两位议员未遵守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

吴国桢要彭孟缉把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查办，彭表面敷衍，并不照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介石的手令来，搞得吴国桢进退两难，好不尴尬。

蒋吴斗争，又表现在经济上，台湾省经济来源有限，应付的开支很大，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往往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而蒋经国正在广植势力，花钱的地方特别多，他便兵分两路，向吴国桢和财政厅长任显群要钱。

吴国桢在穷于应付之余，难免会牢骚形之于色。而任显群则八面玲珑，几乎是有求必应，以致连蒋介石也称赞他是财政的“长才”。后来吴国桢才发现，任显群除了把日产房地大拍卖之外，还用“政府”自大陆运来的黄金抛售了不少，最不可原谅的，则是他把所有公营单位包括台电、台铁、台碱、台铝等存在美国购料的存款，未经吴国桢批准，擅自提了回来，自己做人情，为他政治前途铺路。任显群支给蒋经国的经费，吴国桢自然把帐算在蒋经国头上。蒋吴冲突，越闹越大，最后竟发展到蒋经国企图暗杀吴国桢。

1952年复活节那日，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却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司机简火山，改请包姓司机驾驶。途中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饭毕下楼，见司机吓得脸色刷白，说是有人把汽车前轮的螺丝扭松了。要不及时发现，则要送命了。吴十分怀疑是蒋经国的特务所为。

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美国人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已不再需要用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人物装点门面。吴国桢终于意识到是他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于是便以健康欠佳为借口，请求辞职。

蒋介石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个月。又派黄伯度传话，只要吴愿和蒋经国合作，愿当行政院长，便当行政院长；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吴国桢一概谢绝。后来蒋介石召见吴国桢，问道：“黄伯度给你传话了吧？”吴国桢回道：“经国兄，当然我是来帮助的，总统叫他管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如果不做特务，做点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决心尽力协助。”蒋介石面露不快之色，踱步走向火炉边：“今天我头痛，改天再谈。”吴国桢终于明白了，蒋介石的“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他去意更坚，3度请辞。行政院终于在4月准其辞职，任命俞鸿钧为台湾省新“主席”。吴国桢暗中活动两个美国学术团体，邀吴到美国讲学。蒋介石开始不让吴离台，但吴国桢有美国人支持，宋美龄也为吴出面向蒋介石说情和施加影响，于是，蒋介石不得不放行。

吴国桢遂于5月24日离台赴美，蒋介石留下吴的父亲和儿子做人质。

12月发生了王世杰免职案件。蒋氏父子决定乘机削除“政学系”势力，吴国桢虽然并不身隶“政学系”，但和张群、王世杰等人都过从甚密。于是，蒋经国决定痛打落水狗，将吴国桢也牵涉到王案之内。1954年1月，台湾报纸披露吴苟取巨额外汇的内幕，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长篇社论。吴闻之要求台湾报纸登启事辟谣。但吴的父亲跑遍各报，不得要领。吴国桢

忍无可忍，于是在美国发表对台湾 3 点“政见”，主要内容是：“（1）台湾如不实行民主，将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美国的同意与支持；（2）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3、政治部全然照搬苏联方法，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这 3 条分明专指蒋经国，但尚未指名道姓。

吴的意见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政府所支持的竟会是这样的“政府”，对美国公众来说，不啻是一个耻辱。《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新闻周刊》等著名报刊，无不争相报道，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刮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吴国桢风暴”。

台湾自有许多忠于蒋介石的要员已“义愤填膺”。立法院长张道藩带头“揭竿而起”，始与吴国桢隔海骂战，指责吴“反动”、“狂妄”、“非法乱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地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共达 13 项之多。陶希圣则发表《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口诛笔伐。

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桢一纸上书，使蒋氏父子极为震怒。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 5 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 2 月以来，竟连续散布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和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 20 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底查究办，此令。”接着又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官方策动“上书”、“签名”、“声讨”运动，以维护领袖和领袖儿子的形象免遭吴国桢糟蹋，喧嚣一时，结果是不了了之。

通过吴国桢事件，中外人士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蒋介石十分后悔让吴国桢出走，造成吴国桢借外国政治保护，肆意攻击“国府”。蒋经国更是对蒋夫人帮助释吴不满，此后蒋经国与宋美龄之间的矛盾激化。

吴国桢的骂声尚未息，蒋介石便造出“万年国代”来。

1954 年 5 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国民党宪法规定，台湾当局应于 4 月选出第二届“总统”。于是，蒋介石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但“国大代表”远远凑不够法定人数。蒋只好命令大法官们修改“选举法”，重新规定，依法不足的“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很多人据此摇身一变，凭命令被“选”为“国大代表”，并且规定是终身职，台湾人称“万年国代”。而且这些“万年国代”一改过去不能享有薪给，蒋介石批准“国大代表”重新建立薪给制，于是皆大欢喜。“国大代表”有了钞票，蒋介石有了选票。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当选”为第二届“总统”。孔祥熙意想天开地想竞选副总统，特派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从美国回到台湾窥察行情。蒋经国和陈诚看穿魏道明的来意后，立即命报纸发表文章，大骂豪门，并影射魏道明是豪门走狗。孔祥熙见势不妙，命魏道明停止活动回美。蒋经国和陈诚传出风声，似乎要与魏道明清算其任台湾省主席时营私舞弊的旧帐。魏吓得胆颤心惊，立即走了宋美龄的门路，离台返美。

蒋介石传出话去：“问问何应钦愿不愿竞选副总统？”何应钦自知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1927年伙同桂系逼蒋下野；“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对不起”总裁，连忙作揖婉谢。蒋介石乃顺理成章地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陈诚便成了没有竞选对手的“副总统”候选人。

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外界公认是蒋介石的继承人。实际上，陈诚继承的希望非常渺茫。陈患有严重胃疾，且已57岁，早不堪繁剧。他也清楚了解，蒋介石最后剩下的这点江山，是一定要传给儿子的。

老蒋将小蒋调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扑朔迷离，来路欠明。它的常设机构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

这样一来，“国防会议”成了制度化了的“太上特务机构”，蒋经国更上一层楼，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经国“太子系”的势力已经形成，为太子“亲密战友”的人，都安排到重要位置。

陈诚空出的“行政院长”职位，由俞鸿钧接替，另一位“太子系”主将唐纵，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

蒋介石连任“总统”，蒋经国羽毛丰满，环视党政军各界，与之抗衡者，便只有孙立人了。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毕业，保送赴美留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后入费吉尼亚军校学习，毕业后回国，历任党务学校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长、新38师师长、新1军军长、第4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1951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同美国顾问团团团长蔡斯交往十分亲密，蔡斯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可以说是蒋台政权的“衣食父母”，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氏父子所不满。而蔡斯又从美国的民主观点出发，对蒋经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军中政工制度，无法容忍。蒋经国对于美国人干预他的事，气恼万分，但因他们是“衣食父母”，只得忍气吞声。但孙立人同蔡斯一唱一和，引起孙蒋冲突。

1950年12月底，孙立人召开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蒋经国认为孙立人居心叵测，便召开“庆生会”，给予反击。

孙立人认为，在现有的领导之下，台湾是无法久存的。他在私下谈及大陆之失，认为这纯粹是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的结果。他主张面对现实，放弃不切实际的“反击”希望。

孙立人的话，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说的，都通过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情报机构，传到蒋氏父子的耳中，蒋如何能够容忍？1954

年及稍后，美国欲指使李宗仁、孙立人推翻国民党政权，以谋台湾独立。蒋介石认为，孙立人不除，就不能根绝美国人换马的企图。孙立人存在一天，蒋介石父子就“终日乾乾”，不得安宁一天。

1954年6月，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蒋介石调孙立人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尽管孙立人被解除“陆总”职务，但羽翼尚在，在陆军中还有班底，蒋氏父子就必欲除之而后快。

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突然被捕。6月15日，孙立人受到看管侦讯，即所谓的“孙立人兵变案”。8月3日，在封锁孙被捕消息两个月之后，台湾当局才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孙立人是个优秀的带兵官，但他与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他与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之间都闹得很僵。孙因为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孤立无援，遭致众人打击。所以当“孙立人兵变案”发生后，三军将领都表示沉默。甚至有些人落井下石，参与制造“孙立人兵变案”的活动。

“孙立人兵变案”是台湾当局蒋氏父子为了根除孙立人的潜在威胁而蓄意制造的一个政治事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成立的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当事人郭廷亮，1948年在沈阳任新1军少校营长时，同共产党接触，并被共产党派到台湾，又在孙立人军中先后任营长、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长等职。1954年9月，有操北方口音的李某到郭家相访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以上军官100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变”。孙立人在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造册送给他。1954年8月和10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1955年6月初，蒋军在台南地区举行阅兵，蒋介石亲临检阅。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5月15日到台北见孙，向孙报告情况。孙本人计划于5月25日左右南下，将于5月底或6月初有所行动。不料，5月25日郭廷亮事机不密被捕。蒋介石等觉察到孙立人的“兵变”意图，便谕令孙立人30日与蒋同机赴台南，孙实际上处于被看管状态，孙立人“兵变”的计划也就死于腹中。

然而，这份官方调查报告，不能自圆其说处甚多，就连香港《祖国》杂志也登出《孙立人案件献疑》的文章。蒋介石又不得不令“监察院”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5人小组，对孙案重新调查。但这毕竟又是蒋氏的戏法而已，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孙立人兵变案”影影幢幢，扑朔迷离，至今仍然是个谜。

蒋介石发布“总统”命令：“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坦诚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即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蒋介石师法前人，恩威并施，孙立人送台中软禁。在孙案爆发前后，蒋军总政治部又发动“效忠总统运动”，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1954年9月15日至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不久，人民解放军在11月1日出动米格15型战斗机10余架次，掩护轻重轰炸机13架次，飞抵大陈岛上空，反复投弹轰炸，人民解放军陆军岸炮也发出3000多发炮弹，将大陈岛港口设施与停泊炮艇炸得遍体鳞伤，大陈岛硝

烟弥漫，国民党空军因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 15 型，龟缩地面不敢迎战。11 月 14 日，解放军出动 6 艘鱼雷艇将国民党护航驱逐舰“太平号”击沉，台湾的所谓海上优势的神话破产。

消息传到台湾，蒋氏父子大为震惊。自从败退海岛之后，蒋介石就刻意经营大陈岛，1951 年派“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并挂名“浙江省主席”，驻守大陈。

胡宗南在大陈岛先后训练了约 7000 人的挺进队员，不断派遣这些携带美式武器和特务活动器材的挺进队员，登陆进入内地，和当地土匪结合在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大陆沿海数百次。胡宗南得手的次数并不多，他获得较大成功的一次，便是 1952 年“双十节”对南日岛的袭击。胡宗南的游击队配合金门岛国民党军正规军，接近 1 万人，在飞机和舰艇掩护下猛袭南日岛，解放军损失兵力 1300 人，胡宗南喜不自禁。

解放军加强了沿海防备，1953 年 5 月下旬，解放军向羊屿、鸡冠山和大小鹿山 4 岛发起进攻，歼灭守岛的蒋军 230 人，俘获胡宗南部干将纵队司令何卓权，并铲除了大鹿山的一个特务巢穴，缴获 8 部电台，捕获一批准备潜入内陆的特务分子。

蒋介石失去 4 岛，严厉申斥胡宗南。胡宗南决心夺回羊屿等 4 岛将功赎罪。6 月 19 日晚，他乘驱逐舰亲率 1600 余人攻击羊屿等 4 岛。结果被歼 700 余人，大败而回。6 月 24 日，解放军又奇袭了大陈港西口的积谷山岛，予以占领，使大陈岛海面处于解放军陆上大炮射程之内，大陈岛局势更加紧张。

蒋介石将胡宗南调回台湾，委派刘廉一中将接替胡宗南。

1954 年 5 月 6 日，解放军海陆配合，轻取大陈外围的鳃门、头门、田岙 3 岛。

正当解放军要解放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之时，美国和台湾当局于 12 月 2 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宣称美国和台湾当局双方有“为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台湾方面如遭攻击，美国要立即采取行动。条约同时还规定，美国有“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个条约是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国出兵侵略台湾合法化的侵略性条约。条约签订后，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加强了，美国提供给台湾的第一批 F—86 型喷气式战斗机也运到台湾。周恩来就美蒋条约发表声明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回击。

1955 年 1 月，解放军集结了两个陆战师、154 艘各类战船和 230 架各类飞机，于 1 月 20 日开始攻击与大陈岛密切相联的一江山岛。18 日封锁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联络通道。

60 架 IL—28 型轰炸机在米格机的掩护下，对面积仅 1.3 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岛轰击，解放军 1 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登岛作战，几个小时后便占领全岛。

一江山岛解放后，解放军的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加上空军轰炸优势，大陈岛已指日可下。台湾当局“国防部长”俞大维要求美国第七舰队介入大陈战斗，还要求美国空军给大陈岛守军以空中支援。艾森豪威尔总统



要蒋介石放弃大陈等岛，美国提供海空军掩护让大陈守军撤退。杜勒斯又通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劝说中共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攻击。解放军指挥员张爱萍想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予以打击，彭德怀给他发去电报：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就让他们撤退算了。

1月26日，蒋军在大陈岛发布文告，准备撤离，其代号为“金刚计划”。2月10日，大陈岛军民3万多人，在美国第七舰队协助下，撤到台湾岛，解放军随后占领大陈岛。

至此，本“春秋”的叙述结束。这里敬录毛泽东1954年夏天在北戴河写的一首“浪淘沙”词作为结尾：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 后 记

这部多卷本长篇历史纪实是个巨大而艰难的工程，它囊括了中国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历史。这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骤变的年代——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最痛苦但最伟大、最辉煌的时代。可以说这半个世纪的变化超过了一千年乃至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真可谓一日等于20年的时代。这半个世纪，在军事上是大决战，在政治上是大革命，在社会制度上是大变革。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前浪，革命势态汹涌澎湃。

要完全详细地把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内幕描叙出来，不是这些文字所能办到的，但文字再多，对读者也是一大负担，因此，这部著作只能尽可能地反映历史的主要脉络。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200多本历史资料和专著，特向这些资料的编者和专著的作者致谢。参加这部书写作工作的还有高涌香、刘昊钰、刘弘略诸同志。本书在修改定稿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指导，特致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限制，一定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5年6月10日

